血 

孔令平 著

目 录

写在《血纪》出版前

这部长篇传记，取材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想通过它反映出中共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一角。所以，它既是我个人一生不幸的记录，也是那个时期的历史悲剧。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份，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组成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许都在想，自己这一生为什么而生存；为什么而奋斗？任何人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是想为自已树碑呢，还是想真实总结过去，拿出一点对人类有益的教训以告戒后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有过几年的“伤痕文学”时期，我看“天云山传奇”、“漩涡里的歌”、“牧马人”、“泪痕”，感觉这些作品产生于中共监视之下，留着专制主义的影子。它们不敢真实暴露毛泽东时期的内幕，缺乏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缺了脊梁。

《血纪》记述了我所经历地狱里，一些人炼狱的过程，他们怎么生龙活虎走进来，被饿死，打死，踢死的真实过程，令人为之惊心！同时记述了他们中不堪压迫的一批人，毅然在刽子手屠刀下举起了“火炬”，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举起的“火炬”永远照亮着这片苦难的热土！

可惜，在今天“一切为经济发展”的指导中心下，在金钱诱惑和生活压力下，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中共历史上最血腥的毛泽东时代。今天，毛泽东留下的种种流毒没有被批判，真像依然蒙蔽，黑白仍被颠倒。这样，历史完全可能重演新一轮的悲剧，这是我们这一代亲历暴政者最耽心的事。

看到年轻一代对中共独裁专制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浑然不知，想到一个个牺牲烈士们的生前嘱托，我无法安享“改正”后的晚年。于是，本着对民族负责的精神，整整二十年来每夜每夜，我在灯下伏案疾书，点点滴滴记下我所亲历的这段血腥历史。

《血纪》寻找到它的根：一小撮掌权的中共顽固派，死守着既得利益不放，死守“独裁”不放。

我想，有着像我一样的情感和经历的海外人士、为中华民族前途而奔走呼号的人不在少数。相信会在一大家帮助下，克服重重因难，使《血纪》能尽快问世，与读者见面。为我们共同总结这段历史，并为中华民族今后怎么走路，提供一点教训。

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

作者：2007.7

仅以此纪念在反对独裁专制主义中

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们！

个人简历

姓名：孔令平 1937 年 8 月 4 日生于南京古楼医院。

1955 年毕业于重庆市第十三中学，并考入重庆大学机械制造系。

1957 年 11 月被划为右派（因父亲“株连罪”），同年 5 月由学校押送到南桐矿区丛林煤矿劳动考查，1960 年 1 月被南桐公安局逮捕，同年 8 月由南桐法院判处十八年徒刑，1960 年 9 月去重庆市第二监狱（孙家花园）“劳改”。

1962 年 3 月放逐到四川省甘洛彝族自治县“劳改”，1963 年 2 月流放西昌盐源县 969 信箱“劳改”，同年 6 月押赴该农场古柏分场“劳改”，并于 7 月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第一次绝食以示抗议。1963 年 8 月押赴二道沟分场进行了一年的禁闭反省。1964 年 9 月放出小监，进行为期十天的第二次绝食抗议。1966 年 3 月关押于盐源农场第六中队，并叫我去成都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图片展览。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疯狂的斗争会上我直呼打倒毛泽东，1966 年 10 月，六中队管教何庆云向我宣布场部管教已因我狂呼反毛泽东及反文革，申报了我的死刑（后来该队队长郭川小告诉我，因农场第一把手高德胜反对，我的死刑没有准），并于 1967 年 4 月 21 日召开宣判大会以加刑至 20 年了结此案。

1968 年 6 月在农六队进行了连翻斗争，为抗议斗争我进行为期七天的绝食抗议。

1974 年管教科再次警告我，再反对毛泽东定杀不赦。

1979 年平反回重庆，年底在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我当庭责问丁审判，入狱后我连续百余次申诉为什么置之不理，要求该法院补我入狱二十年的工资，并保留控告该法院的权力。

1980 年在重庆二十四中任教，1984 年由重庆大学出面第二次落实政策始到重庆专用汽车厂工作在那里退休，2005 写完我个人传记《血纪》。

我的父亲：孔祥嘉，1948 年下半年在顾毓秀先生举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1951 年底在北碚被捕，1956 年 11 月瘐死中共狱中。

我的母亲：方坚志，1941 年创建嘉陵中学，1957 年划为右派，1967 年 7 月我的年仅 23 岁的弟弟无故被造反派枪杀，痛不欲生的母亲自杀未遂。1999 年 11 月 20 日，在北碚逝世。

在 2009 年国际法兰克福书展上对《血纪》的介绍

武宜三

孔令平的《血纪》三部曲，全书共 100 多万字；是史诗式的展现了作者一家在极权中国的困难图卷；是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后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所闻所见，极具震撼性，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此书未曾面世已轰动，2009 年参与此书编辑的荆楚先生，被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秦某、桂林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某等中共宣传部门官员约谈，警告如敢出版，将报复其妻子和孩子。而且声称此书的出版，将影响中国的稳定，有关人等将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孔令平父母都是一介书生，对抗日救亡和建设新教育有过供献。孔祥嘉，在 1951 年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并蛮横的拒绝通知家属，也拒绝向家属提供判决书。直到 1982 年，四川省公安厅才在发了一纸共 32 个字的《来信来访通知》中说他 1956 年死在狱中。

1957 年孔令平和母亲方坚志先后以替父亲翻案而打成右派分子，年幼无知弟弟于 1967 年被不明不白杀害。母亲因忍受不了非人虐待而投塘自杀（未果），孔令平也几乎被处死。

《血纪》再现了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高产卫星、社教运动、一打三反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场景，以及人们被活活饿死、被斗争、被打死的心惊场面。《血纪》描述被监督劳动的饥寒交迫和所受非人虐待：遭打骂、戴内圈有倒刺的小铐、吊打绳捆，关禁闭、陪杀场等，还要在饥饿中服苦役。记录了他们被打死、捆死、踢死、自杀死，以及为活命逃亡被击毙，饿死在途中的真人真事……

《血纪》也记载难友们在暴力的侮辱、摧残下，奋起反抗的故事：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皮天明等烈士们将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国家不幸作家幸，一生在苦难的血泪中浸泡的孔令平，终于在把呕心沥血的《血纪》贡献出来了。这不朽《血纪》三部曲也将使它的作者成为不朽的人物；孔令平又是幸运的作家。

《血纪》告诉了你什么

这一部长篇回忆录，是通过我一生经历的回忆，用事实揭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历史，因为它的真实性，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大陆从 1949 至 2009 年期间历史的参考，为不了解大陆真像的年青朋友，提供一本关于认识独裁专制的读物。

中国的悲剧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包括中共内部的异见者，他们在读到这本书时如果引起良知和人性的震撼，感到不应固守着毛泽东独裁衣钵不放，而毅然接受民主，投身到民主大潮中，便是我衷心的愿望。

愿它成为"中国的良心"，留给我的民族，并献给年青一代。

《血纪》全书分上、中、下三集，全书共一百万字，上集从中共建国写到 1964 年"文革狂飙"，中集从 1965 年写到 1979 年"平反"，下集从 1979 年写到 2009 年。

上集，述叙了我的家被中共破碎的过程：我的父母都是新教育的开拓者，他们对抗日救亡和建设新教育有过供献。我的父亲孔祥嘉，中共对他洗脑后，仍于 1951 年底抓进监狱，判处结果不告知家人，不发判决书。

直到我"平反"后，向公安机关一再追问（共发信 11 封），先说下落不明，直到追问到四川省公安厅，才在 1982 年发了一纸共 32 个字的"来信来访"通知，说他 1956 年死在狱中。

如此草菅人命还不算，还对我们一家四口进行了残害：1957 年我和母亲先后以替他翻案打成右派，我的年幼无知弟弟以"黑崽子"1967 年被不明不白杀害。我的母亲因忍受不了非人虐待而投塘自杀（未果），我也几乎被处死！

这种对无辜者无缘无故的"灭家"，便是毛口口声声的人道主义！幸好我大难不死，今天我得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讲述我二十三年冤狱和六十年来的所见所闻——

"上集"记载了在农村中我所见到的场景，再现了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高产"卫星田"、"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历史，揭示了大陆饿死几千万人的原因，剥开毛泽东的画皮，这是一个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暴君；一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上集"描述了年仅二十岁的我划成右派后，被"监督劳动"受到非人虐待；记下了我入监的过程，为了扭曲我，逼我"认罪"，我被颈上吊三十斤重的砖头，遭暴打；还要在晚上睡觉时戴上内圈有倒刺的小铐子；使我整夜痛彻心脾，吊打绳捆是我受到的家常刑罚。

1964 年盐源农牧场小监里关了我和陈力俩人，后来我又在农六队与张锡锟、刘顺森等人一起战斗，今天他们都先后去世多年了，若非神灵安排我一个传扬他们的使命，我哪能坚持长达二十年自始至终写完这部巨著？特别是今年清明节，我们再访盐源时，神又将四十余年前的现场完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将当地老百姓亲眼所见提供给我们，以充实《血纪》。

当年流放甘洛，我被饿得皮包骨头，一个 1.7 米的骨架靠水肿的双脚支持着 30 公斤的骨架，形同骷髅。已这般可怜，而队长并不放过我，白天逼着我们开荒，因饥饿偷地里的包谷，我被捆死在山野里的水沟边喂毒蚊；把我捆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我在狱中只有用绝食表达我软弱的反抗，没有人性的刽子手居然剥夺我喝屋檐水的权力；为了侮辱我，在我睡觉时用刺刀划破我的头；用绳子五马传蹄捆着把生病的我抬上工地，至于关我的禁闭、陪杀场、用死亡威胁我更是常事……我惊叹我顽强的生命力，支持着我撞过了一个又一个鬼门关。

《血纪》用大量篇幅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描述狱吏的贪婪，自私。直到今天这些故事仍被当局禁谈，正好说明中共对血腥的过去十分心虚，更害怕老百姓觉醒，起来声讨他们，推翻他们！

《血纪》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奴隶们向施暴者进行的反抗。

"中集"记载了难友们在暴力摧残下，奋起反抗的故事：

陈力：早先加入共产党，参加"抗美援朝"立过"战功"，后来生活使他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了中共，因宣传铁托而被捕入狱，入狱后更加认清了中共，痛感自已被骗。在狱中留下痛斥刽子手的五十万字檄文，声讨毛泽东，痛斥中共。

1969 年 8 月 21 日，昂头走上刑场，他的英勇就义故事至今仍在民间传颂：胆怯而残暴的刽子手，怕听到他临刑前的斥责，割下了他的舌头，并用刺刀逼令他跪下，他却扭过头去将口中鲜血向他喷去。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举起枪用枪上的刺刀向他后膝弯刺去。这壮烈的一幕至今们在盐源老百姓中传颂。

张锡锟：为反抗中共的暴虐，他在狱中举起反抗的火炬，在狱中制作刊物惊动了中共公安部。事情败露后，疯狂的刽子手用宽大诱他交待出"同伙"，他坦然回答："要我交待我的同伙吗？那么我告诉你，全中国在你们铁蹄下受压迫的六亿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他牺牲于 1975 年 8 月 26 日，临刑前被刽子手残暴的用铁丝锁住喉咙。

刘顺森：在狱中高举"火炬"，他渊博的知识和口才成为流放奴隶人人尊敬的良师益友，被当局认为最危险的煽动家。张锡锟的牺牲并没有吓住他，反而更激发了他探求光明的意志，抱着追求光明，1976 年越狱，被抓回盐源后，于 1977 年 9 月 27 日在盐源就义，临刑前刽子手用铁丝锁住了他的喉。

皮天明：火炬忠实的追随者，1976 年掩护刘顺森越狱，为反抗狗的盯哨和欺侮，用利斧怒劈狗腿子，1976 年 7 月 28 日在盐源农场从容就义。

烈士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被中共宣传所骗，当他们觉悟到被骗后，便以十倍的愤怒向施骗者还击。抱着为真理而牺牲的信念，无悔无怨献出了生命，这种反抗暴力的动力，是中共永远都没有估计到的，这正是中华民族魂在近代的复生，欲知其中细节，请阅读《血纪》中集。

《血纪》下集记载了中共邓小平开创的后集权时代，以平反冤假案开场，因此我的下集就以"落实政策的马拉松"开始，写下了平反的自相矛盾及受害者为争生存权而斗争，特别是

在家破人亡后，修复‘家’所留不可克服的“后遗症”，这场冤狱将无尽的苦难留给了下一代。

此外我以典型的案例描述了一群官僚在落实政策中的胡作非为，把这场消弥毛泽东的遗害，变成一场踢皮球甚至向受害人的勒索之中。

《血纪》“下集”以真人真事描述中共“改革开放”的混乱。“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才是好猫”论，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论。正好说明共产党是“没有任何主义”的党。“没有主意”怎么执政？

中共建立的特权却是不可触动的，于是一群自私的官僚变成了国库里的硕鼠，硕鼠的特权加没有主意的“执政”，社会被搞得一团糟。“六四”为什么在北京风起云涌？当年学生举起的大旗中明明白白写着：“反对腐败，反对官倒”。

结果没有主意的中共在学生运动中分裂了；结果邓小平慌忙决定用坦克碾压“自由村”，创下当今世界惊闻，于是邓小平惊呼：“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正走向灭亡，一股复活毛泽东的力量蠢蠢待动。

我想通过这本书对这个“没有主意”的中共进一言，希望能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从全人类出发，能直面过去，对所作所为能向受害的中国人有一个交待，向全体人民有一个交待，若能放弃独裁，走民主的路，人民幸矣，国家幸矣，中华民族幸矣！

但愿我善良的愿望不致又一次落空！

子乙于 2009.8.

上 集

第一章 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1957 年 4 月初，重庆大学校园里春意正浓。这天中午，学生们正在学生食堂用餐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校党委办公室的通知：“今天下午两点正，全校员工在新修学生食堂听取校党委书记传达中央重要文件，自带坐凳，不得缺席。”

广播里放着周旋唱的优美四季歌。我端着饭盅，走出第一食堂西侧的大门。同班女同学马开先正坐在门前石阶梯上边吃饭边晒太阳。

“今天下午又要听报告，我们谁拿凳子？”我问。

她转过那张被春光晒得像苹果般微红的少女脸蛋，回答道：“当然是你去啰，我就在这儿等你。”说完她朝我顽皮地甩了甩脑后的小辫，做了个鬼脸。

我是 1955 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大学的生活学习与中学有许多不同，没有固定教室，每一节课上课都是按照课表上排定的教室，时间一到就到指定的教室自选座位，下课就离开。平时自习、复习都没有固定的场所，除了下夜自习归宿和上课以外，同学们都挎着书包，各自寻找图书馆或教室，自由度确比中学时代大多了。入学两年下来，为选择自习的最佳场所，我便熟悉了校园内所有的角落。

我和马开先选中了松林坡后校门处一幢很旧的教学楼，教室里面的课桌板凳多数都已残缺，很少有人光顾。不过，这儿很安静，周围是松林，空气特别清新。那时，我俩正在初恋，这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一起复习讨论，而又不受他人打扰的固定场所。我们自己动手，修好了两套桌椅，钉了两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专供开会和看露天电影时用。

那天下午，传达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声讲话录音。开始时，党委书记郑思群在麦克风里宣布，今天的传达不准作记录。

他的话音一字一板，从那严肃的口气中表达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纪律。原先曾拿出笔记本的几位老教授悄悄收起了笔记本，坐在那里翘首聆听。毛泽东那浑浊的湖南口音，加上录制过程的杂音，虽然影响了收听效果，但他的许多在以往政治学习中没听到的话，令人感到新鲜，与郑校长严肃的禁令，构成了一种与往常多少不同的气氛。

当时大家对这位党和“国家”的最高元首怀着肃然的感情。尽管那录音讲话冗长而杂乱，但现场秩序一直很好，将近一万平方米的“会场”上，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半，很少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中途溜号。

我至今都记得那慢悠悠的湖南腔，讲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十九大，讲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到东欧局势。当时在我们的政治课程里，联共（布）党史是我们的主修课，对于工科学生，尤其是像我这种“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一直没有兴趣去弄清楚那些课程中的真

正内容，即使当时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全世界公诸后，引发一连串共产党阵营内地震般的分裂，也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正视和思索。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罩着，一听到反革命暴乱和镇压反革命的话，就如芒刺在背，想的都是挨整和可怕的后果。我入大学的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每次学习都彷佛在我耳边念紧箍咒语，我从来不敢认真去追问：胡风为什么要反革命？我发言、说话除按团员们干巴巴的老调门重复一遍，绝不敢再多说。

我上中学时，父亲就被捕入狱，在一连串红色恐怖运动中长大的我，始终谨记着母亲的教导：“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不要去过问政治，读好你的书，有了求生的本领，才有一切，其它的千万不要多嘴，不要参与，孩子，你要记住你父亲惨痛的教训。”

关于苏联，我只知道：“社会主义阵营是坚不可摧的，是无比强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反革命阴谋。”

然而，这个下午，我们却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听到这位湖南人对被神化的偶像斯大林作了“功”“过”三七开的评价——那个被推崇到“导师”、“父亲”尊位上的苏共头目，成了一个犯了“错误”的凡人！

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些全新的说法，如：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游行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没有很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有时是很激烈”，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民主、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学术界应当遵循的“根本方针”；如“大鸣、大放、大字报”。

这些说法，如阵阵春雨，让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寒透了心的大学学子们，无不感到亲切和鼓舞，我注意到那些坐在中心地带的老教授们挺直腰板，聚精会神……

传达会开完后，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来。甚至有人在学生食堂绘声绘色地讲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潜入苏共二十大，窃取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政治报告。

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以及刊登这些报导的翻译刊物被抢借一空，大家争阅着这些材料，思索着国内外发生的一切。

我和恋人阿先也不例外，我们两人在我们选定的复习地展开讨论。

一个思想活跃的春天降临了！

第一节 “大鸣大放”

两天后，教学大楼前挂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巨大红色字幅。

接着，全校的党团员和教师职工，在松林坡大礼堂参加了由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主持的“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动员会。会场上和周围建筑物的围墙上，张贴着各种彩色标语，上面写着：“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动群众，和风细雨的帮助党认

真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那次动员大会上宋殿宾用异常委婉和诚恳的语气，表达了当时学校中共党委的态度，他拍着胸口保证自己带头在这次运动中，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管有多么尖锐都要接受。

宋殿宾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在团结广场又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鸣大放动员大会，所有的校级领导都登台表态，欢迎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向他们提意见。紧接着，便是系的、年级的、班的大鸣大放动员会；这些会更具体，更直接地面对着全校的师生员工，要求他们无一“逃避”。

与此同时，全国媒体开足马力，一个劲地鼓吹：“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党的整风运动就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党外民主人士更要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

当局摆出了一副中共“要与人民同心同德，与人民共同建设繁荣昌盛新中国”的决心，展示出“同民主党派人士为建设国家共存共荣，相互监督，披肝历胆”的坦诚。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坐谈会上，这些人的发言中有代表性的，诸如陈名枢的《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我读后，认为陈名枢的讲话全是对共产党的奉承话，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下，奉劝了共产党也应当向非党人士听取意见这一条，也是毛泽东自己说的。

至于黄绍竑所说的“以党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产党领导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不过，既然领导要讲究“方法”，包揽一切可不是好作风，好方法呀！事实不正证明，事无巨细都得由共产党点头，不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才真有点怪。

再说张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四条却真是给毛泽东见仁见智的“把诊切脉”。毛泽东不是诚恳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要畅所欲言么？谁又能料到张先生的这一番苦心，正好经切中毛泽东的心病和大忌？

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讲些什么？主张共同“设计”政治蓝图么？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可是毛泽东自己屡次讲过的话。他不是主张百花齐放么？这一政治设计院，未必不是对他的号召一种热情反映呢！

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轰动一时，原出于小和尚给老和尚唱颂经这么一点幽默，“党天下”者可以顾名思义了，不像陈名枢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黄绍宏更为直接，共产党的霸道，虽然已引起了当年中共盟友们的“不满”。

专制同民主之争本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主题，然而被红色恐布所控制的大学生们怎么能懂呢？大小事宜共产党一手遮天难道不是事实么？反对一党专制的微弱呼声，难道不是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时积极主张过的么？

至于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正好说明党天之下冤海无边的事实么？在那个年代中包含

因家庭受到冲击的人那一个没有体会？从执政党的角度考虑，为错案和冤案纠偏，正是一种最好的补正，至诚之见啊！

要知道，这些“见解”提及人权，曾是为中共呐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们，（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共产党的取胜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这些老朋友所说的，大多都是共产党曾经提出和主张过的东西。现在反过来应用在执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罢了。

一针“全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是和平建国新时期”的强力麻醉剂，使三反五反，镇反和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恐怖空气一扫而空。似乎欧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1957 年旧历 3 月的阳春花开季节，毛泽东为全国送来了一阵迷人的“香”风！在一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轻松乐曲中，袒露出对中共领导下所出现的民众“闹事”，以引咎自责的“宽宏胸怀”，躬身欢迎百姓的“责备”和“建议”。

他像一个“伟大”的“民主之神”为了国家和人民，来到校园里培植这“百花齐放”的美景来了。春天正是耕种的季节，春天正是显示“造物主”伟大形象的时机。

在中共红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们，对于这种突然的宽松气氛，感到一种受宠若惊的惶恐，习惯于被剥夺了的民主权利，对言论自由向来讳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论，那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反了才几个月？

他们习惯于国家大事都由“党的政策”所包代，学校“大政”由党委包代，而从不去用心思考。他们甚至为怕沾着“反动”家庭和“反动思想”，被“追查”，而远远躲开。

因为胡风分子有先例，凡收听外台的均可以投敌叛国治罪下狱，所以他们不敢收听外台，相反，他们认为，中共这种专横的做法都是天经地义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懦弱到连自己的亲人在运动中遭到冤屈，而上诉的权利也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放弃了。

至于他们对于党组织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更是不敢公开反对。

所以，面对着党团支部再三的诚恳开导，鸣放会在开始时反而冷场了。

叫这些工科学子们说什么呢？他们可以在一场学术讨论中，在答辩一个设计论文时，争得上火。可现在让他们坐在“主人翁”位置上，“凭空”向党提意见，确无准备，也没有想过。

为了检查各班鸣放情况，系党支部书记召集了所属各年级各班的团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吩咐他们必须准确完整地记下一天内发言者的姓名，并摘录发言的内容，规定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前，必须将笔记本交到他的办公室里。

当时不光各班的团支书们闹不清楚要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就连系党支部书记自己也只是奉校党委指示办事，共产党的保密制度极其严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层组织只能不折不扣执行，不能问为什么！

我们班的鸣放会，在团支部书记陈思所住的 204 房间进行。那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

系里一千三百名学生中，才十几名党员。这种本应由党员主持的会议，在班级都是由班的团支部书记代理。

陈思对这种政策性极强的会议，心中没有底，拿不准犯了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二年级政治辅导员邓某就曾在这间屋子里，举行过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背靠背”揭发批判会。当时的一位助教因说“学习，是独立奋斗独立拼搏的过程”而被划成了胡风份子，后来还送去劳动教养。

陈思并没有想通，这提倡学习的独立奋斗错在哪里？罪从何来？他亲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车。从此，他同党员接触便分外小心，平时传达政治学习，总是按年级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的话记下，回来逐字照读不敢走样。

这事还没隔上一年，邓指导员杀气腾腾的话音犹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广开思路，鼓励知无不言，大家真没有来得及想通。

陈思根据在系里开会时记录的笔记作了“开场白”，班长郭英华打开了会议记录本。第一天开张就冷了场，开会发言同图书馆或饭堂里的高谈阔论的“乱侃”是绝对不同的。

这可急坏了陈思，像这种哑巴会，怎么去交那党书记的记录本？于是只好沿用历次政治学习的老办法：挨次发言。

结果，所有的发言几乎都与陈思的“开场白”一个谱调，尽管郭英华在记录时作了语言的调整，但无非只是用词的不同，意思却没变。拿到党书记那里，果然挨了批评。

不过，全系各班的情况大致雷同，党书记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务必想一切方法，让大家说出“心里话”来。

陈思回来召开了一个团支部的支委会，宣教委员出了一个点子：自告奋勇去找平时就爱放大炮的林娟和刘唐先发言，让他们就班的团支部工作发表意见，组织委员刘奎则建议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说话，林娟必会作出反应，大家从中一激，就会让气氛活跃起来。

第二天的鸣放会“依计”而行，雷田沛首先发言，只说了不到十句话便草草终结。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翻挖苦，说他像一个放音都放不好的录音机，不像一个男同学的样子。她说完后出其不意，话峰直逼班长郭英华，说她的工作作风简单生硬，经常凭个人主观想象组织班里的活动，凡是她不喜欢的就不搞，比方说组织郊游，本学期已过去两个多月了一次都还没进行，邻班五班已组织去了长寿湖，又去了大足，每周都有活动。希望郭英华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拿的笔停了下来，等到提起笔作记录时，竟不知怎么的记法，只好记下几句：“林娟发言：批评班长郭英华思想古板，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组织班上工作死板，应当改进。”

林娟既开了头炮，刘唐紧跟而上，他举了一个实例来批评郭英华的“官僚”作风。他说：“去年，机械原理上齿轮课时，大家对齿轮变位齿的正负变位的选齿还没闹清楚，认为林教授

讲快了一点，希望他能在自习课抽点时间给大家再补一下，偏偏郭英华却反对，她说‘自习课就是要自己学习，自己消化，根本没必要全班抽时间为一个小问题而补一堂课’。结果，就这么一个主观认识，大家的意见便被轻易否定，这种作风就是主观主义，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对不对？”

为了同大鸣大放的主题相切近，刘唐对这位不到二十岁的班长，连扣了两顶帽子。郭英华不是党员，似乎同“帮助党整风”完全不沾边，虽文不对题，但毕竟有了争论，大家七言八语，鸣放会开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生活检讨会。

工科学子们的大鸣大放，只局限于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直接发生关系的班干部们。别说年龄还未满二十岁的陈思、郭英华，恐怕就连重大最受人尊敬的党委书记郑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国有几个人弄得清？毛泽东葫芦里卖的药，这是在运动的后期，乃至十几年、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地暴露出来。

然而校园里最初贴出的大字报，为平静的校园搅起了一点风波。

我记得机械系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以客气而谦恭的语气，向曹英“进一言”。曹英是年级的党小组长，系党支部组织委员，是某机关调来的“调干生”。他比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嫩娃娃大十岁，他文化程度不会高于小学毕业，是一个已有两个小孩的父亲，从机关专门抽到大学来“镀金”的。

机械系有好几个像这种带着党员和官帽的大龄“调干生”。“解放”初期，为改变知识分子“结构”，在剥削阶级出生的学生中，渗入工农成份，“调干生”就这样来到了大学校园。学习是否跟得上不管，他们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党的利益，言必训人“阶级意识太差”。谁都对他们畏惧三分。

贴大字报的人，谦卑语言中含着讥讽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这次整风中为自己洗个澡，与其装腔作势训人不如多读点数学和力学，不至于毕业考试吃鹅蛋，今后工作时“辜负”了党的期望，难以真正为人民服务。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领会和懂得。

接着就有第二张、第三张，以至于无数张。曹英在学生中已有绯闻，说他借“政审”和“个别谈话”之机，常常对那些刚入大学的漂亮女孩子们动手动脚。

鸣放期间，闹得最凶就是对膳食科长贴出的大字报。据说这位四十多岁的北方农家子弟，扛着步枪从农村跟着大部队干了几年革命，曾当过营长，复员后被分配到学校当了膳食科长。大鸣大放别的说不上，唯独一事引起全校轰动，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猪肉事件。

不知这位张科长从哪里买进了几百头肥猪，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养猪场便开始发瘟。猪死后卖到学生食堂，顿顿猪肉，但学生们并不知吃的是瘟猪肉。

大鸣大放时张科长上了大字报，瘟猪肉事件使他无地自容，他既说不清何以从不法中间

商那里一次买那么多病猪，更说不清楚为什么明知是病猪，却用来毒害三千多名大学学子。

张科长是一个老党员，老八路，做出这件可恶事，便成了众矢之的的“贪官”、“杀人犯”。使他许多天夜不能寐，负着沉重的罪恶枷锁，那些日子成天低着头走路。

看来，学生们有相当的舆论能力，口诛笔伐用得好，足可以监视共产党的不良作风的。这一点并不比当今南韩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差劲。五四运动就有光荣传统，只是因为共产党的霸道，而使学生们处在愚昧和迷信状态，对客观是非缺了理性判断罢了。

张科长的“后台”，便是校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主任宋殿宾，这几年，频繁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哪一次运动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岂止是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杀人冤案的制造也首推其人。于是对张科长放的这把火，便烧到了这位平素里颇给人以势压人的“太上皇”头上。

不过，所有贴出的大字报依然很懂政策，绝不会超过“批评”这个框框，语意和用词绝对的“以人为善”，只是在漫画大师林毓森的笔下，将宋主任画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这幅漫画上，见他每天上班时间将脚翘在办公桌上，旁边摆着茶杯和香烟，和一些刚刚批示的散乱文件，附打油诗一首，意思是说：宋书记平时办公时，喝茶抽烟，草率地批发文件，而不关心师生疾苦的作风，希望他能在这次运动中认真改一改。

另一些对党团干部批评的大字报，基本上只属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意见。偶尔出现几张附会教授治校，反对党委独揽的大字报，以及批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党委包办的大字报，和历次运动中伤害无辜的大字报也是语调低沉，张数寥落，被淹没在对校内各领导干部，提出个人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大字报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还出现过几张列举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联武官和旅顺港总领事馆苏联驻军的兵士，在中国举办的舞会上，对中国女招待动手动脚强行“接吻”的非礼行为大字报。

重庆大学的学子毕竟以工科和技术为“宗”，那时，家庭出身被定为“剥削阶级”的，占学生总人数的 80%。“解放”后经过了斗地主、杀恶霸、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那些被沾上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虽然暂时在大学生人数上占着优势，但在社会气氛的压力，已形成对他们的精神压力。

以我这种父亲仍在狱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属，在这种压力下，对“政治”敬如鬼神，自觉“矮人一等”。这种很深的“阶级烙印”，使我每闻“反革命”三个字就提心吊胆，家母的教诲“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平时更要休谈国是”随时响在耳畔，所以我下决心攻读理工科，今后能与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错了。

对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们这些孩子成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在西师任教，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以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来说明他的观点——共产党在执政上的专断独裁。

重大邀他来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龙的演讲会，他的演讲，给从小就受中共传统教

育而闭塞的大学学子们，开了一个认识世界，自由思考的窍。可那次我却没有去。

倒是马开先去了，她回来向我传达，显露出受益匪浅的快感。她说：董先生所讲的全是两种制度的对比，全用事实说话，比方说，在美国，学校的一个教师和学生，可以就学校设备、教学安排、乃至于教师待遇向校董事会提出质疑，而校董事会必须给予答复，凡正确的，需采纳并出示改正时间。

还有，美国政府必须遵守美国宪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任何人有权批评政府，并通过议员弹劾政府官员，等等。

其实，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我们已从报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过被中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是有钱人的民主，在那里被剥削的阶级过着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将崇美恐美当成了极大的反革命罪恶，不敢正视和思考。

在整个大鸣大放中，我完全处于无知之中，愚昧使我们失去了对世界潮流和进步文化的任何接触，失去了对民主社会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动力。

压抑使愚昧顽固化，愚昧使压抑合法化。

大鸣大放触动了我们长期的压抑和愚昧，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真是长期处在愚昧和压抑之中的可悲人类！这种状况仍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保证，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视“民主”为洪水猛兽，一有露头便要彻底铲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毛氏极权再明白不过，中国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压抑的可悲处境，独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对于大鸣大放将预伏着一场比反胡风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狂风暴雨，更是我们这些闭塞的年轻学子们想不到的。

有“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各级党组织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庄严承诺，谁会想到等待“言者”们的是手铐和监狱！

直到谭天荣在北京大学刷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为胡风鸣冤；四川大学冯竹君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时，重庆大学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团委书记蒲世光，贴出了一张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大字报，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团员学生们，喊一声“反对唯成分论”罢了。

即使如此，全国大学生们的思想仍没摆脱“愚昧和压抑”的牢笼，也绝没超过中共思想的封锁圈。

谭天荣的大字报是以“中国共产党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口号为结束语；林希翎所呐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在压抑之下的呼喊，这种同共产主义理论“靠拢”的姿态，并没有丝毫感动毛泽东。

已步入专制迷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阳谋”——向民主疯狂挥动屠刀的“阳谋”。连蒲世光这种对“唯成分论”的小小反对声，也没有逃掉残酷的镇压。蒲世光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并被处以二十年徒刑，尽管这个取名“非团员编辑部”的全体

成员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节 我的少年

1949 年底，“解放军”占领了重庆和大西南，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改革”运动，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1951 年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对数以百万计在国民政府中服过役的人员，大肆捕杀。

1950 年我十三岁，常去附近农村看斗争地主的大会，那些被斗的人，有些还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双膝血流斑斑，惨不忍睹。公判大会由军管会主持，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每隔不到一个月就要开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处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边的码头上，每次公判大会的最后一幕便是在那里枪毙人，人血染红了鹅卵石铺盖的河滩，日久变成了黑色一片，虽大雨冲刷，也难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这是继长达五年的内战后，同胞们自相残杀的延伸。

（一）1950 年我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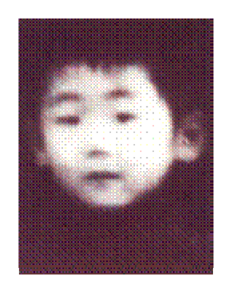
1940 年的外婆



1966 年的母亲



1947 年的父亲



6 岁的弟弟

作者家人（作者提供）

我的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师范担任校长。1948 年下半年他应顾毓秀先生（抗战时中央大学校长）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任职，我们一家便离开了杭州迁居南京，接着父亲又经上海、广州，辗转再赴重庆。

1948 年冬天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代理校长，次年任分校校长，1949 年下半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亲、外婆、我和弟弟安顿到了北碚，住在当年父亲的同班同学兼证婚人刘汉良的家里。

从此以后，我们便定居在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1951 年他因“历史罪恶”，被当时刘伯承担任校长的西南革命大学召去“学习”。他所在的班称作“特别高干班”。后来，半年的学业届满毕业，历史问题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留用人员身份，听候分配。

不料，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被当时的川东行署军管会逮捕入狱。

我的母亲，是三十年代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师孙起

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母亲学生时代的同窗在孙起孟先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了苏州女子师范的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曾轰动当年的苏州教育界。后来，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外围，1939 年纷纷从重庆去了延安。

唯有母亲与父亲结了婚，滞留在南京。她悉心办学，一生从事教育，1943 年在国民政府军工署署长俞大韦的支持下，在重庆双碑创建私立嘉陵中学。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迁居南京，本以为可以过几天和平宁静的日子。

不料国内战火纷起，我们这五口之家又辗转迁徙，像一叶行驶在战火火海里的小舟东撞西突，颠沛流离。

1948 年国民政府已呈败势，父亲曾要她携带家人从广州去台湾，她却自恃着过去"光荣"的历史，以及和孙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计共产党不会给她为难，便断然决定留在大陆，等候"解放"。

1950 年后，母亲便与中共国务院第六办公厅主任的孙起孟取得了联系，希望在当年学潮中共患难的知己的保护下，得到一个继续从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学潮的友谊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的脆弱。

1951 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机关托儿所担任了一名"教养员"。

1951 年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名军人来家中把父亲抓走，并抄了我们的家，他们抄走了母亲用多年积蓄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存款，还硬说这是国民党留给父亲做反革命潜伏的活动经费。搜走后也不给任何手续，母亲为此气得三天没吃饭。从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就靠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艰难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绪年间，出生贫寒，十六岁嫁给了一个苏州城的浪荡子，但很快就被遗弃搁置一边。后来因为有了一个男孩，才改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可她儿子不久就去世，于是她被当成弃妇，从方家大院迁出。两年后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时我母亲还不满四岁。

在那个三从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随意改嫁，只有守着这妇道的名节，方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资助，外祖母虽不是《镜花缘》中的才女，却实实在在做到了"苦守名节夫死孀居"的节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为命，外祖母靠着女红和亲友资助度日，自是吃不尽的苦头。她认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业报，便一心修佛，常年斋戒，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默然负着生活的重负。大抵因为严重缺钙，她五十多岁就驼弯了腰。我是在她的怀抱中长大，并在她的教养下铸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1952 年，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弟弟六岁，刚上小学。我们住在托儿所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层楼房，我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五华里。为了补助母亲收入的不足，我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劳动。

那时，北碚凡半山之间是不通自来水的，家里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脸洗脚洗衣服，

吃的水必须在离家一华里的水井中去挑。自从父亲被送往革命大学“学习”时，我就开始从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装水不过五十来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担压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摇摇摆摆走不上百步，便觉得肩上承受不住。水从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气喘吁吁。

因为不断的换肩，扁担在我的两个肩头之间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难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惨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伤出血是常有的事。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的力气一天一天大起来，肩头上磨破和红肿的地方也长出了厚厚的茧巴，挑着能装一百斤重水的大桶，从山下雄赳赳地挑上来，不需五分钟。从此以后，家里挑水的事就由我包干了。

（二）陈户藉

家被抄以后，每月靠母亲的三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实在太难。初中三年级时，班主任说，如果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可以向学校申请助学金，免交学杂费。但是，申请必须要由街道办事处签字。我们住区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也是朝阳派出所的所长，我写好了申请书，修改了两遍，端端正正地誊写在一张信笺上，拿去找陈所长签字。

派出所在北碚公园坡脚下一个原来的旧庙里。那一天天气很沉闷，天空中淅淅疏疏飞着毛毛细雨。庙宇隐没在梧桐林荫之中，显得十分阴森。走进梧桐树丛中，雨点敲击树叶发出滴滴嗒嗒的响声，有一种神秘感。这是我第一次与成年人打交道。我才十四岁，又背负着父亲入狱的精神重压，头一次同政府打交道，心里不免害怕紧张。我一边向里走，一边心里直打鼓。

到了门口，我定了定神，努力稳住加剧的心跳，怯生生地站在门外。门里黑洞洞的，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没人应。等了片刻，仍不见动静，我向里看去，黑乎乎的什么也没看清。我心中暗想，这里可是衙门，倘若别人把我当小偷，我就说不清了，于是大声吼道：“报告！”

“啪”地一声，电灯一下子亮了起来，藉着黄色的灯光，我才看清了那正屋中的办公桌旁，坐着身材魁梧、一脸横肉的陈户籍。一年前我为父亲办户口时，曾跟着外婆来过这里，当时经办户口的人正是他，大家喊他陈户籍。

他从座椅上微微欠起身，懒洋洋地从桌上把腿收下。不知是因为看我是一个身高不足四尺的孩子，还是本来就对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子女早有印象，他似乎很不满我惊吵了他的好梦，轻蔑地瞄了我一眼，又重新躺了下去，恢复了刚才的姿势。

我连忙跨进门，慌张中将刚才想好的的开场白忘得精光，傻乎乎地站在那里，右手下意识地揣进口袋里，紧紧捏着那张申请书。如此等了三分钟，他才半睁着眼不屑地问：“干什么？”我把申请书拿了出来，嘴里却像被什么塞住，说不出话，只得把捏着申请书的手伸了过去。我觉得伸过去的手在发抖。他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左手从我手里接过那纸条，右手叉着腰，

活像一个夜叉对着一个小鬼。

他看过申请书，右手从叉腰的地方缓缓提上来，摸着那很肥很横的胖下巴，嘿嘿冷笑道："没听说过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还要申请人民助学金。"说着便把那纸条扔在桌子上。嘿嘿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我觉得脸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他一巴掌，脑门里嗡嗡直响，耳根也火辣辣的。

此时，积郁在我心灵上的伤痛一阵阵地袭来：父亲被捕那天早上，全家人在惊吓中回不过神来；母亲抱着才七岁的弟弟躲在床角满面恐怖；抄家时，外婆和母亲束手无策；星期天母亲在地摊上拍卖衣服的窘境；托儿所母亲的同事门对我们兄弟俩的白眼。

那一瞬间，好像天地间本来就嫌我这种渺小生命的存在；无数张扭曲的脸莫名其妙地向我吐口水，如果当时地上突然裂开一地道缝，我会毫不犹豫地化作一溜青烟，从那裂开的地方钻进去，永远羞于再回到这个人世中来…….

突然一股勇气涌上我的心头，我猛然伸过手把那张扔在桌边的纸抓住，拼命地把它揉成一团，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跑出那黑洞洞的大门，我踩着地上的水凼，溅起的泥浆噼噼啪啪在身后直响，彷佛还听见那梧桐林在身后，发出的嘿嘿冷笑。

外婆在洗衣服，我扑倒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

从此以后，那张点缀着雀斑，一张横肉狞笑的脸，和那叉着腰像夜叉的凶恶姿态，便常常闯进我的恶梦中，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位姓李的中年妇女是我家紧邻，她在房后搭起一个猪圈，以街段名义喂了四头猪，每天下午以三毛钱一百斤的价格收购猪草。我看准这个机会，每天放学归来，沿途打猪草。从学校到家五里路，路两边是交错的农田，那里面的蛾儿常，马斯苋品种齐全。我每天放学抓紧采集，一背兜大约三十斤，如此下来每月可挣两块钱，够我的学费了。

十四岁的我，羞耻心已经很重，每天早上上学我都背一个背兜，为怕同学们看到，每天我都比其它同学早到学校。到学校后我将背兜藏在教室背墙与后山间不足半米的窄缝里。

等到放学后，同学们散尽，我赶紧从后墙里取出背兜，打猪草回家。此外，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途上还有两处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是北碚医院，另一个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园。

1952 年李家花园被没收，做了北碚法院的临时看守所。医院和看守所伙食团外面都有倾倒垃圾的山坡，有大量炭灰渣，炭灰渣里夹着许多小块的没有完全烧尽的"二煤炭"。虽然炭灰渣中倾倒着有酸味和恶臭的污水，但我还是常常背着背兜去光顾。

我每天都要在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那时，天已断黑，我背着沉重的背兜满载而归，那里面装的不是猪草，便是二煤炭和柴火。

每当我登上石阶，就会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外婆花白的头——她早已在那里躬腰盼望了。

还没有等我爬完那七十米长的山坡，她便会走下坡来，从我的背上接下沉沉的背兜，同我一起把它一颠一簸地抬进家门。

回到家，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已放在小方凳上，我脱下被泥土、煤灰和锯末弄得又黑又臭的补巴内衣，洗擦满头满脸的灰尘、油汗。洗净之后，再同她和弟弟一起共进晚餐。每一顿饭，她都把最好的菜往我碗里夹。

那时家里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外婆总是避开弟弟，在我的碗底设下埋伏，在她的眼里我每天付出得太多。而我总是要从碗底翻出来分给馋嘴的弟弟。这推让之间，倒也使我们很深地感受到家人相依为命的温暖。那时，家里从不缺柴和煤烧，也从没有花钱去买过。

有时候星期天一大早，我还背着背兜钻进龙凤桥周围的密林中采摘野菜和则耳根，托余妈妈拿到菜市去卖，龙凤河水浸透的丛林中地下泛出一股股腐植的难闻的臭味，下过雨，路也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偶尔还会碰上从草丛中蹿出来的蛇，我都从不畏惧，好像老天时时保佑着我这可怜的穷孩子，无论是打猪草，拣二炭，拾柴禾，从来没有受到过意外的伤害。

学校后门有一个砖瓦窑，那也是我少年时代出卖劳力的场所，周围的邻居都夸奖我懂事，特别是紧邻的余妈妈，她常常把我当她的孩子看待。这极大地拂去了因为父亲被捕而带给我的阴影。

那时间我虽又苦又累，但心情还算愉快，学习的成绩也是班上前几名。

那些年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做过新衣服，脚上以布鞋和草鞋为主，布鞋的鞋底是外婆每天晚上用旧衣裁下的布、糊成布壳，再在电灯下一针一针的纳出来的，鞋面也是用笋壳和碎布裱糊而成，外婆年轻时就在苦水里渡过，对于针线活习以为常，晚上她戴上老花眼镜纳着鞋底的时候常常哼着苏州小调，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躺在她的脚前听她低声吟唱，那声音里充满了慈母的爱。晚上，她几乎天天在半夜里为我和弟弟盖被子，常常深情地吻摸着我们的脸颊，在她的心中，我们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

我勤劳节俭的习惯就是在她的熏陶下养成的。那时，为了让我在学校吃中饭时有一点补充，有时，妈妈给我一毛钱，好在附近的小饭馆去端一碗小面，可我从来都没有花过，回来便交给了外婆。为这事外婆常常责备我，并在我的书包里放着专门为我煮的鸡蛋。

有一天从学校打猪草回家时，天色突变，狂风骤起，雷电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里赶，刚到李家花园，滂沱的大雨便倾盆而泻，我急忙躲进看守所厨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伙夫走出来，蓝色的背心上印着一个硕大的“劳”字。我联想到历史书上，载着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这相仿的标记，不过那圆圈中是一个“囚”字。他走到炉堂前，打开火门，用火钩去勾火，一股浓灰夹着浓烈的煤气从炉膛下卷了起来。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着浓厚的江苏口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哪儿读书？”

“北碚一中。”

“叫什么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岁。”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进厨房去躲雨，还揭开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笼，从笼里取出两个馒头来递给我。我猜想我的样子看上去很可怜，我下意识地盯着我脚上大脚趾姆已突出鞋帮的破胶鞋，腼腆地接过馒头。

“你的爸妈呢？他们做什么的？”

我警觉地望着他。我知道这就是关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学或放学，途经这里，我都会下意识地朝这群神秘的房子窥视，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出现在坝子里或者在某一号房间的窗口洞中，但始终就没有看到过。眼前这位叔叔很和善，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和处境，兴许还会从他这儿知道一点父亲的情况。

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后，盯着我看了好一阵，似乎明白了什么，便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的父亲住在×号房，那背后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么原因，戴着脚镣。”他接着说：“这儿带脚镣的人，肯定是问题严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问题，或不认罪。”说完他又盯着我。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一惊，不但担心爸的安危，还担心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我们能到这儿来探望他吗？”我问。

“难，不过你实在要看他，可以到张家湾工地，他们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在那里劳动。”

雨渐渐停下来，天色也已黄昏，我本想去掏那炉膛下那刚刚勾下来的二煤炭，但一点心情都没有，于是便收拾起背兜、书包，匆忙赶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婆。自从父亲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伤心的一个。我们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辈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国民间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关爱，往往超过同辈之间或下辈对上辈的关爱。

这些天来，她常常合掌祈祷，暗中哀叹流泪，也常常向女儿唠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关在哪里？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生活上缺什么？不管怎么说，总该去法院问个究竟。……探监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给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么？”

母亲心里更难受。撑着这个家，谁还有她的压力大？自从丈夫被捕以后，周围的同事就将她视为异物，往日相处不错的几个人突然间不大同她说话了，即便说话也小心翼翼。那时电影院放电影都是反特影片，组织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学习，那主持人翻来覆去讲，被推翻的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这个新生的政权。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战争，国民党败退后遗留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到处都在蠢蠢欲动，企图恢复他们

失去的天堂。

母亲听了这些话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托儿所没有共产党员，最高领导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张世模，她认为母亲曾当过中学校长，可能瞧不起她这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出于这种心理，她特别对这个“反革命家属”严加教育，好几次谈话都是以组织的身份要她“主动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主动检举揭发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这样才能得到组织上的谅解。”

每一次张世模对于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人一番训斥以后，都会从我母亲露出的恐惧和惶惑中得到一种奇怪的快感。这种快感吸引着她，她便越是用最严厉的口吻教训母亲。

母亲白天脸色异常的苍白，晚上几乎都失眠，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许多次还莫明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学习归来，独自对着电灯发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么罪？丈夫又犯了什么罪？仅仅因为丈夫是国民党的校长吗？他任校长时可没有“密告”过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没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当学生上街游行时，他确实劝说过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们，那是因为他是一校之长，出了人命他可要负责的呀。他确实把学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恶么？学生不是反饥饿么？他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扫帚打扫学校的大门口，那也是破坏学潮笼络学生么？如果这些都不对，那么作为一校之长又该怎么当呢？就算那是为国民党做事，但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过了吗？政府不是说既往不咎吗？

张世模刻薄而带刺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她胆寒了：万一那些首饰，真的被确认为“反革命活动经费”，自己不是也要跟着被抓？

如果真如此，两个没成年的孩子怎么办？七旬老母该怎么活？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当初真不该不听丈夫的劝告，犟着留在大陆。现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杀。

（四）余妈妈

余妈妈是我们的紧邻，她的丈夫是托儿所的会计，她本人是一个合川的农村妇女，和母亲年纪差不多。她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比我还小一岁，最小的才一岁多，凭着丈夫菲薄的工资，七口之家比我们还困难。好在她出身贫农，自小就勤劳惯了，一个人除了带孩子包揽了家务，还包下了附近二十多人洗衣服的活。

那时洗衣服特别难，要下到嘉陵江边去。她外出洗衣时，拜托我外婆为她照看三个最小的孩子。因为她特别勤快，也乐意帮助周围的邻人，在孩子们心目中，她就像一个母亲，那层楼的孩子们都管她叫余妈妈。

外婆不便上坡下坎，家里买菜买米便全由余妈妈代劳。我每天中午都看见她背一大背衣服，拎一大篮菜从坡下吃力地走上来。

父亲被捕后，周围的邻人对我家怀着戒备，生性善良的余妈妈便成了外婆和母亲唯一的

安慰人。

听见母亲的泣声，余妈妈便会进来安慰她：“你急有什么用？急坏了身子病倒了，外婆咋办？两个孩子咋办？”余妈妈拿过手绢替母亲擦去眼泪。“你看，你们家小平这么个小孩子，挑水、捡二炭，打猪草样样干，成绩还那么好，有这样的孩子你还伤心什么？你生气，气谁？气生病了还不是自己痛苦。再说这几年斗地主、杀恶霸、抓反革命、抓贪污犯，像你这种遭遇的人还少哇？你看对面的王光英。丈夫关起来了，两个儿子比你的还小，还不是很重的负担，可人家还不是照样的活。外婆是善心人，你也是好人，就是你丈夫，什么反革命？我看不出来。我还比你困难，要不是外婆常常照看我的孩子，我能下河去洗衣服挣钱吗？人要讲良心，你有什么难事跟我说。外婆说要去看人，我哪一天就陪他去一趟法院，正大光明的，怕什么？”

人也需要点拨，想得狭而钻了牛角尖的人，无人点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悲剧，而一经人提醒又往往可以避免。听了余妈妈的一席话，母亲似乎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从想自杀的绝望里解脱出来。

得到父亲每天在张家湾劳动的消息，外婆立即去找余妈妈商量，请她能否抽出一天时间，陪她一同去探望工地上的父亲。余妈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时间就订在本周星期天，那一天余叔在家可以照看孩子，我也是放假，可以一同去。我为外婆准备了一根扎实的木棍作拐仗。外婆准备了一联肥皂，一块毛巾和一卷草纸，装在一个布口袋里。

从家里到张家湾，一大半都是乡间小道。我们那天起了一个大早，我和余妈妈扶着外婆，天亮不久就上路了。

初秋的早上，郊外的空气分外新鲜，但山路却有些泥泞，外婆是小脚走得很慢，许久没有到乡下来了，她不免东张西望。

我格外小心，生怕她跌倒，心里却翻腾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不知道父亲究竟怎样了，他还健康吗？他的问题有多严重，他能回来么……

一路上余妈妈不断的向路人点头，她的人缘真好。

到达张家湾工地时，大约已是十一点了，远处传来嘈杂的响声；二锤打在钢钎上发出铿锵的撞击声；石头泥沙垮塌声；石匠长声幺幺的呼号声；杂乱的人声合在一起。

前面没路时，我们才看见山沟中的人影。

“工地”是两个小山丘之间狭长的山沟，山沟里有四五十名身穿带“劳”字背心的人，其中想必也有我的父亲。

我看见草丛中的石缝间还安放着两挺机关枪。我们这一老、一妇、一小，一进入岔口，便引起监视兵士的注意，这里是不准人在这儿逗留的。机智的余妈妈连忙向那兵士主动发问：“唉，同志，请问你到雷音石怎么走？”那士兵打量我们，确认了是走亲戚的路人便挥手道：“这里不能走了，绕山梁过去吧！”说着还用手指着东边梁子上，一条被杂草遮盖得很难辩认的小路。

于是我们又扶着外婆装着找路的样子，爬上山梁。

（五）与父亲的最后一见

在山梁上，下面的人尽收眼底。我紧张地睁大眼搜寻。哨兵没有理会我们，他们正在聊天。我蹲在草丛中，拉着外婆和余妈妈叫她们蹲下，她们立刻会意的弯下了腰。拨开乱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见他了——我的父亲！

他穿着灰色的劳改服，脚上套着脚镣，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头剃得光光的，脸却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剃过胡须。

我心中一阵酸楚，眼泪涌了出来。回头看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热泪纵横。

父亲埋着头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铁镐，此时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正在山颠的草丛中用泪眼凝视着他。

我们的行踪终于被对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见了，他们向我们高声吼叫，使劲地挥手，要我们立即离去。

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余妈妈的携领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接下来一个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妈妈的携扶下，来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单位的介绍信，余妈妈解释说不知道要开证明才能见到人。人虽没有见到，但在余妈妈好说歹说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给父亲带来的那一联肥皂、一盒草纸和一块毛巾。

当外婆询问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时，那位看守不耐烦地说：“他的案子不能向你们家属说，你回去吧。”

母亲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我们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她想，只有这样，才能释下沉重的精神枷锁吧。

半年以后，我们接到了父亲从狱中寄来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已同意和母亲离婚。他告诉我他已判了徒刑，现在正在西康的一个伐木场劳动改造。他说他一切都好，身体也很棒，相信我们一定还有相会的一天，只是需要争取了。

他在信的最后写着：“平儿，爸爸对不起你，没能使你成人便要撒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经长大，已经懂事。今后一定要好好念书，照顾好外婆和妈妈，生活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那洒满纸页的泪痕呢？我怎么就没有查觉到他暗藏着与世永别的绝望呢？我还真以为他会健健康康活在人间，并且终有一天和我们相聚。

我犯了与母亲完全相同的错误，我没有回他的信，轻率地认为，为了我自己今后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开地表示对他的眷恋之情！

倘如当时我就洞察了毛泽东的一切阳谋，断然地表示了对父亲的亲情，并且写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许他会在亲情的抚慰下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也许真的还会相逢。当时我幼稚的幻想，让我付出了终身悔恨的代价！

父亲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慈父之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并且让我自责曾经对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无奈的我，幼小的心灵却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着寄托。当我刚刚泅入其中，便被光怪陆离的科学现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学的、物理的、电磁的、宇宙的。

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打倒另一群人，杀戮、掠夺，产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会。一部份腐败、穷奢极欲，一部份受凌辱、被杀，这种无休止的人类自杀悲剧何时才能了结？人类为什么不能洗刷这种欺压同胞、欺压同类的污迹，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讨索宇宙玄机的科学家？

我虽不可能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么崇拜，但也还并不敌视它。既不敢，也不愿。我只是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产生出对政治敬若鬼神的距离和戒惧罢了。

后来，母亲常以父亲的悲剧告诫我远离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样从事教育，他们体会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决心，不问政治、埋头苦读，立志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或者成为设计师、工程师。

第三节 灾难袭来

我和马开先逃避大鸣大放，躲在重大后校园那幢我们选择的“世外桃源”里。但是，民主自由的思潮，使马开先耐不住了。我没有能阻止她在临近尾声的鸣放大会上，含着一腔被激发起来的正义，走上鸣放讲台，讲出在三五反运动中的悲剧，并为董时光叫好。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一张巨大的预设的灾难之网，已经向我们罩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已经定好的“右派份子”框框，以庐郁文收到“恐吓匿名信”为突破口，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一场预谋的浩劫，向神州大地劈空袭来。

才开始走向人生旅途的大学学子们、一群被民主思潮拨动的初生牛犊，陷入了“阳谋”的陷阱。

在重大学生们的心目中，包括那位团支部书记蒲世光，共产党仍是一个威严的“母亲”。他们天真地相信共产党是由“特殊材料”铸成的、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优秀分子。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闻者足戒”的“诚挚”许诺，原来是一个陷井！

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没看出，鸣放动员会上“坦诚相待”的外衣里，竟藏着一张“毒草香花六条标准”的罗网。等他们说出真话后，便被一网打尽了。

学校的“工人阶级”也被组织起来，由伙食团的炊事员、临时工、门卫们组织起来的一

支队伍，从民主湖畔出发，沿着环绕学生宿舍刚修好的马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一路高喊着：“不许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右派老实一点！”等口号。

学校的同学都挤着去观看了，随后，各系还组织了讨论。大家心里还不明白，这“右派”们究竟是谁？尤其没想到游行队伍背后的组织者竟是张科长和曹英们。

想在反击右派的运动中立功的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击”火药味甚浓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出来。在林毓森张贴那张漫画的位置上，代之以一张巨幅“质问”书。那几幅将张科长画成胖猪，将宋书记画成矮怪物的画已被撕下，并被收藏到校党委的整风办公室里去了。

至于《XX 讲教授治校是什么意思？》、《不准 XX 污蔑党》、《“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反革命真相》等大字报更是一个比一个充满杀气。最初被点了名的几位同学，傻乎乎地站在自己贴大字报的地方，感到一场大祸临头了。

有些人刚被推上“右派言行批判大会”的讲台时，就像一群被渔人之网捞起的小鱼，开始还在渔网中蹦跳，声明自己善良的动机，显露出乞求宽恕的可怜相。但哪里再有你“辩论”的余地？他们被主持批判的人喝令“不准狡辩！”只有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才可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凡被批判的人在开过批判大会后，便要接过主持会议者交给的一叠白纸，没完没了地写“我的检查”。

也有很有个性的同学拒不认罪，我看到在机械系组织的斗争会上，二年级的殷世红同学一直昂着头不说话，开过会以后拒绝写检查，但他立刻遭到了隔离、禁闭。在冶金系批斗大会上，蒲世光面对气势汹汹的几个打手，用冷笑来回答，但他也立即被关了起来。

就这样，早春的暖风迅速变成了寒流，刚刚开始活跃的校园空气，变得更加凝重而沉闷。

我侥幸地躲开了这最初的袭击，这要托我严守了不问政治的“忠告”，我既对党天下“麻木不仁”，对“政治设计院”如观海外奇闻，至于《人民日报》上提到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黄绍竑的批评“以党代政”更是从未研究，就连在松林坡礼堂董时光的报告，我都没去听。

因为我远远躲开了大小鸣放会，所以我也暂时躲脱了“秋后追查”。当各系将一个多月前鸣放大字报的照片作为“毒草”刊登出来，我才惊叫：“好险！”

机械系的年级党小组，在支部宣传委员曹英的组织下异常活跃。曹英到学校来与其是求一技之长，不如说是共产党在学校中的统治骨干，他们班上说他几乎没有一个学科是及格的，他的专长就是“整人”。

此时凭着他多年干“革命”的嗅觉，正是“接受党的考验”，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他今后平步青云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这种机会岂可放过？

他这些日子特别忙碌，系里的批判会几乎都由他主持，将在大鸣大放中提了意见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个推上批斗台。

马开先没有幸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别谈话，她是青年团员，得按六条划定毒草的标准，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写出检查和认识。曹英威胁她说，所有在董时光鸣放会上跳出来攻击党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

马开先不愿屈从，突然向机械系主任呈递了退学报告。

她收到了她父母的回信，父母认为她之所以如此，全是受了我的影响。她的哥哥在给她的回信中，明确要她立即断掉同我的恋爱关系。在他们看来，她之所以会如此"反动"，全是受了我的影响。

得知她要退学，我坚决反对。我们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她认为：现在读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无心读书。我则认为，不读书，何以在这个社会中求取生存之地？

一天下午，我几乎强拉着她到松林坡我们系主任钱企范的家里。钱教授也劝她回心转意安心求学，可生性倔强的她并没有被说服。当我们从钱教授家里出来以后，我出奇不意地向她表示："如果你要退学，我们就此决裂。"

一句戏言，不欢而散。唉，我刚撞进了情场，哪里懂得爱情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甜果，一不小心就被摔坏了。

后来，我的不幸遭遇使我明白，马开先的退学选择恰恰是正确而明智的。可惜，悔之晚矣。

放暑假，我独自忧伤地回到北碚，在车站分手时，她说她去城里姑妈家暂住一段时间，在学校没有批准她退学的申请前，当然还得回校。

弟弟迎出来了，接过行李，兴冲冲地喊着外婆。外婆闻声走了出来，照例用她那慈祥的眼睛，仔细端详我，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比寒假回来的时候瘦了。"

母亲依然心事重重，虽然四年前她与父亲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但她没有能力抗住社会的压力和良知的责备。这些年来，她从没给父亲写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内心常常自责，有一种负罪感，这使她经常做恶梦。

父亲被判刑的通知书和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开始我们还去法院怯生生询问过，但法院拒绝回答我们，并说他的情况，你们家属无权过问，面对这种无理拒绝，我们就再也不敢问，更从来不敢抗议。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写了数十封信，寻找父亲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发给我一张巴掌大的回函，告之 1956 年 5 月 6 日父亲因病死于西康一个伐木劳改营。

（一）躲不开的阳谋

1957 年，母亲终于在大鸣大放的"和煦春风"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区，小心翼翼的向托儿所所长倪佩兰讲起她对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怀疑：不是说革大学习以后，他的所有历史问题都交待了吗？作为"班主任"的邓小平不是在散学典礼上向他们宣布："你们终于

丢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此可以轻装上阵，参加革命的队伍了吗？”不是曾许诺让他充任当时十分稀缺的大学教师么？政府的政策怎么就突然变了呢？

还有，那“反革命活动经费”就纯属子虚乌有了，那家庭的积蓄怎么被当成了“活动经费”呢？

母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这几句疑问，使她钻入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让她付出了一生的惨重代价！

我回来后不几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还有张世模，这些年龄上属于我长辈的人，是看着我长大的。她们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在所有托儿所家属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劳、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个孩子。

入学重大以后，她们改变了过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气，相见时显出一种尊重来。但我在她们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战战兢兢”的谦恭。

“我们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也让你来参加对你母亲的帮助。”张世模说。“你妈妈在鸣放期间给你写过信吗？”

周生碧抽出钢笔，开始在小本子上记起来。我点了点头，并没有领会她们的意图。“这些信谈到你的父亲了么？”张世模接着问，用狡猾的眼光盯着我。我迟疑了一下，又点了点头，但不明白问这干嘛。

“你妈一共给你写过多少信？”

她们想调查什么？

我想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来往的信件么，心中一愣。

母亲确实把她对父亲被捕的种种疑虑，以及她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写信告诉了我，但那又怎么构成犯法了呢？我如实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张世模带着显然是装出来的“宽慰”和“鼓励”对我说：“小伙子，你已是大学生了，前途远大，好好读书，对你母亲要帮助她一下，旧社会的人常钻牛角尖，脑筋转不过弯来。”

她们的盘问使我莫名其妙，十九岁对于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绝没想到一场横祸已经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眯了眼睛，在她看来，一家四口人，两个外孙，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托和延伸，她是可以为我俩付出一切的。

（二）我的外婆

自幼父母亲很忙，很少管过我，我的生活起居全是外婆呵护。晚上，我都是睡在她的脚下。

1957 年的那个暑假，她叫我坐在她的身边，唠叨着那些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故事，讲我

是怎么难产降生在南京鼓楼医院中，讲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讲我因为医院护理不当几乎窒息死亡，讲如何从炮火连天的南京逃难出来，从遍地尸首和弃儿堆中，抱着我拼命挤进逃难的人群……

她苍白的头发蓬乱地散盖在满布皱纹的脸庞上。我发现她真的已经很老了，背也越来越驼。

说到她的驼背，她便会述说当年的艰辛："抗战时，我们一家人从南京逃到重庆，经济窘迫，在上清寺租了一间阁楼。那阁楼又矮又黑，平时人在里面是直不起腰的，只是价钱便宜，每月只付五个铜板。白天，你爸妈整天在外奔波，家务活和你全扔给了我。你小时候托妈的福，她奶水特别好，你长得又白又胖，但是你白天非要人抱，于是我就只好成天弯着腰一边背着你，一边洗衣做饭。半年下来，我的背就开始驼了"。

她讲述这些脸上全是幸福。

每当我注视她佝偻、苍老的身躯，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她青年守寡，中年跟随女儿颠沛流离，操劳终日，从来没有过过气派的悠闲日子。我握着她那长满老茧的手，轻声而自信地对她说："外婆，你为了我们兄弟俩劳碌了一辈子，从没享过福，等我大学毕业，我一定把你接在我身边，给你专门找一间舒适的房间，好好地过几年快快乐乐的晚年生活。"

她笑了，眼里含着泪花。

二十多天的暑假，我的心情始终是阴郁的，面对着犯愁的母亲，心中老是压着一块石头。

我不时想到马开先，想起她对生活的绝望。若不是这场"大鸣大放"，我们本打算在这个暑假同车回北碚。她的姨爹和姨妈在西南农学院任教，她可以住在她姨爹家，趁着一个多月的假期，一同去缙云山和北温泉，痛痛快快地玩。

可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假期她竟忙着办理退学手续，今后我们的关系也不知会发展成怎样。

因为心境不佳，我提前了五天返校。弟弟帮助我收拾东西，外婆不停地唠叨冬天的衣物要带好。她好像有一种恐惧的预感，一再地提醒我，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同人吵架。她拄着拐杖，一直拉着我的手，颤抖着把我送到那竹篱笆做的小门外。

当我跨上马路，她突然把我叫到她身边，一再地抚摸我的头，我情不自禁将身俯下，把我的脸贴在她那苍白的前额上，吻了吻。我感觉到她热乎乎的泪水顺着脸夹向我的脖子里流。

到了拐弯的地方，我又回过头去，她的身影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木门边。这一幕像永远不能褪去的底片，储存在我的大脑中，跟了我一辈子。

我对她许下的诺言，也许正是她盼望了一辈子的梦想。但是，它终于成了泡影。而这一别，也成了我和她饮恨一生的永诀！

（三）马开先

回到学校，刚刚跨进寝室，正碰上留校“工作”的郭英华，她诧异地看着我，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马开先呢？”我吃了一惊，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回答她：“我怎么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你们吵架了吗？放学那天你们不是一起离校的吗？怎么她那天晚上独自回来了？还酗酒大闹了一场，学校正在追查这件事。”

我说：“我们确是一起出校的，但到了车站，她说要上姑妈家去，便分手了，后来，我就再不知道她在哪儿。”

郭英华便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向我一一叙说。

那天晚上大约九点钟，马开先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糖果独自一人回到了她的寝室并关上门窗。不一会，屋里传出走了谱的歌声，沙哑而不清，但听得出是“丽达之歌”，接着是一阵狂笑，狂笑后又是一阵哭声，后来传出了玻璃摔碎的声音。

有人从门的一条细缝向里看，只见她满脸通红，手舞足蹈在那里“跳舞”。一瓶白酒只剩下了半瓶，酒杯摔碎在地下。

门外的人拼命敲门，但无济于事。不一会，里面突然静下来，郭英华赶紧到男生寝室找来陈思和刘大奎。踹开门，只见马开先正大口大口呕吐，屋子里充斥着酒味和发酸的臭气。

听到这里，我知道悲剧终于开始了。我连忙到她的寝室去，在她的课桌前呆坐。

她酗酒和狂舞是因为我吗？女孩子真有这样脆弱吗？她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上哪儿去找她呢？这时，我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我想得很复杂，她是出走还是自杀？

我决定要先找到她的姑妈。想到这里，我便打开她抽屉，寻找她收到的信件。信件提供了重庆城里的两个地址，一个是黄花园某巷 10 号；一个是在枇杷山公园。

我匆匆走出校门，坐上了开往牛角沱的公共汽车。到了牛角沱，便下车步行。我按信封上的地址，边走边问路，整整在城里找了四个小时，下午四点钟，我终于在枇杷山公园下街的某巷中找到了她姑妈。房主人打开了嵌在围墙中间的小门，里屋竟传出了马开先的声音。

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从楼上迎了下来，看到我，她十分惊喜，接着带着歉意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一块空悬的石头终于从我的心里落地，我装出神秘而顽皮的样子说：“我有特异功能，随便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出来。”

我在车上准备好的那些道歉话全部吞了回去，两个人的误解也立刻冰释。

“你吃饭了吗？”她问道。此时我才感到饥肠辘辘。从早上北碚出发到现在，整整九个小时的奔波，疲劳和饥饿竟在这一连串怪诞的过程中忘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阿先主灶，饭菜很香，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也得了教训，暂时对阿先退学的事缄口不提，也没有问她那晚何以酗酒狂唱？她的姑妈对人挺热忱，看不出她是不是同她的哥、妈一样，反对我和阿先的初恋？

晚饭以后，我和阿先漫步在临江的公路上，凭着石栏望去，嘉陵江蜿蜒如带，两岸分布在岩壁上的建筑点点灯光，映着月色，立体的构成一幅很有诗意的图画。

重重愁绪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母亲的忧郁重新爬上我的心扉，我看着面前的这个阿先，江风拂动着她的白色连衣裙，显得动人而潇洒。

我希望第二天她能同我一起归校，但是她拒绝了。看来，我昨日的辛苦并没有动摇她退学的决心。

学校并没有如期上课，自习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国庆节刚过，团结广场召开了由千余名大学生组成的下乡支农的誓师动员大会。第二天大学生们便开赴井口参加挖水堰的“劳动锻炼”。

下乡支农的劳动大军一走，秋天的校园空荡荡的，几场连续的秋雨之后，更显得寂寞苍凉，一种积郁在我心中很久的不详之兆，越来越近地向我围拢。

终于有一天，陈思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教室，语气严峻地对我说：“你必须认真反省在大鸣大放中的思想言行，包括与母亲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也包括与马开先的言行。”他还说：“你要看清形势，争取主动，党的政策摆得很明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凡是在鸣放中有过错误言行的都要彻底弄清楚，予以批判帮助，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蒙混过关。”

紧接着他用严肃的口气警告我：“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这次井口劳动没有叫你去，就是给你充分的时间反省和交待自己的问题，早交待比拖延好，不交代就等于顽抗，性质是可以变化的，希望你争取用人民内部的方法解决你的问题。”说完他给了我一叠稿笺纸，那纸就是一年多前在反胡风运动中曾用过的，用来让有问题的学生写交代的那一种。

我接过稿笺纸心里一阵紧张，现在，我终于不得不改变我原先的态度——置身运动之外而自乐了。

不久，我收到了弟弟给我的来信，告诉我是母亲叫他写的，他说母亲已在组织的监督下。周生碧警告她说，这一段时间不准向重庆大学写信。

我立即找到了那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册子，翻到香花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一一对照。我个人在鸣放中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发过言，更谈不上右派言行。

我不知母亲是不是犯六条中的哪几条。是分裂了人民、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破坏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摆脱和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损害了社会主义国际团结？

我想，即使母亲在鸣放中对父亲提出了几个政策上的疑问，也够不上这六个破坏和削弱的大罪呀。

至于马开先，她在鸣放时说了什么？党天下？教授治校？对照六大标准似乎只有涉嫌摆脱和削弱共产党领导那条了。

在我看来，纯洁无邪的马开先怎么也不可能同“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右派扯在一起。这么一想，我紧张的心态开始松弛下来。但是，母亲忧伤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眼前。陈思的警告又使我的神经绷紧了。

从开学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阿先，我是直到在下乡劳动队伍中，才看到她的背影。看来，她是在故意躲避我了。她为什么一直躲避我？阿先啊，你可知道，我现在也陷入了麻烦。我是多么想你，多么需要你给我安慰和鼓励。

（四）荒唐的辩解

我忽然想到了该写信了。

第一封是：“开先，你知道我母亲的痛苦吗？父亲被捕以后，她一人负担着四口老小已不容易，加上反革命家属的精神压力，她终于选择了同父亲离婚。她年轻时就已经在教育事业上显示才能，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这一次大鸣大放，本想向组织说清多年积疑，消除认为她包庇自己丈夫的怀疑，这样提出来，没有别意。”

我这封称谓马开先的信，是寄给母亲单位上看的，张世模不是在寻找我和我母亲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通讯吗？让张世模看到这封我给女友的信，更能为母亲辩诬。

第二封是这样写的：“妈妈，你好吗？外婆和弟弟也好吗？整个暑假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返回学校时得知马开先因误解了我，伤心过度，竟然酗酒伤身……我真地感到对不起她，她是真爱着我的，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开学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心中非常挂念，我不希望她辍学，那前途全毁了，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女孩子单独流到社会上闯荡该有多么危险。妈妈，我求你，劝劝她吧，也许她能听你的话，让她去掉那个荒唐决定吧……”

这封称谓妈妈的信，却是寄给马开先的。

两封信，当然要张冠李戴颠倒了寄，称谓开先的信，信封上写了母亲的地址寄给了北碚托儿所，而称谓妈妈的信笺却装进了寄往井口的信封。

这两封信里面包含了多少无奈。倘若当年我就看清了毛泽东心狠手辣的阳谋，我也不会那么可笑地“表演”。

信寄出以后，我心情放松了许多。

日子也真难熬，才两个月的日子就像过了几年，发出的去的信一封也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又担心这些信是否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中。到了十二月初，我又提笔写了内容与手法与前面完全相同的两封信。

这次，寄往北碚的信终于有了回音。

（五）同弟弟的最后团聚

1957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大约上午 11 点钟左右，弟弟突然出现在我寝室的门口，他的到来，给我孤单悲伤的心吹来了一阵暖风，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忧虑。他手里拎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见到他，我慌忙站起身来，紧握着他的手，那手是冰凉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大早。"

屋里还坐着其它人，不便多说什么。

他打开黄布口袋，说："这是外婆关照带来的，天冷了，外婆叫你注意不要生病了。"口袋里装着一双旧毛线打织的毛袜、一双新布鞋，还有一张用手帕包好的二十块钱。见到那毛袜，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戴着昏花的老光眼镜一针一针织出来的。

中午时分，我便同他去学生食堂吃了便饭，然后牵着他的手，从后校门慢慢走到小龙坎医院，当时我的痔疮结痂还没有合好，那儿还留着我的病床。

小小的病房没有其它人，是我们兄弟俩谈心的好地方，弟弟坐在床前细说我走以后发生的情况。

"自从你走以后，托儿所一连开了许多天批判会，妈妈和陈玉如两个成了批判对象。妈妈的主要问题就是替父亲翻案，会上会下追她交代，特别追问同你的联系，说什么串通大儿子订攻守同盟。上星期起正式给妈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规定她今后外出和投信都必须事先告知组织"。

弟弟说得很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喉，边说还边痛苦地思索。

他才十三岁，从他呆滞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嫩弱心灵上的阴影和莫名伤害。

妈妈会被划为右派，从假期中周生碧的态度和语气中我早就听出来了，本是预料中的事，所以也不太惊诧。

弟弟接着说："昨天下午，外婆把那黄口袋交给我，还给我五块钱作车费，叫我马上到你这里来一趟。她说：家里情况不好，要你不要回家，也不要再写信回来，她说你的信被周生碧拿到会上当作死不认错的证据。外婆还关照你就在学校过年，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同人多说什么。"

弟弟讲完，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忽然想到，过不了几天就是新年了，今年过年肯定不能回家，便建议说："今晚我们俩上馆子，算是提前团个年，晚上就同我在病房过一夜，明早我送你上车回北碚。"

弟弟眼里闪了一下，点点头说："好，今晚我们过年"。

我们兄弟俩手牵手，朝土弯方向走去。我们进了一家饭馆，选了一个窗口临江的座位。既是过年，自然要“奢侈”一点，我破天荒地点了五个菜，是弟弟平素最爱吃的砂锅鱼头、蒜泥白肉、白砍鸡、烧白，还要了一小杯酒。因为舍不得剩下，便慢慢地吃，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五盘菜全部吃光。

吃完晚饭，我们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踩着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向沙坪坝逛去。我俩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远方隐隐传来如诉如泣的“拉茨之歌”。在一家卖副食品商店的门市部，我买了一小袋花生米、一袋水果糖，一小袋桃酥，仍装在弟弟带来的黄口袋中，嘱弟弟明天带给外婆和妈妈，关照他们，我在这儿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牵挂……。

十点钟左右，我们回到病房。那晚，我们兄弟俩和铺而眠。他已经很累，不一会便入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他童稚的脸，万般愁绪涌上心头。打开临江的窗户，嘉陵江的江风令人清醒、令人断肠……

我没有料到这是苍天安排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次相聚，第二日车站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俩的生死永诀。

第四节 被揪斗的日子——扭曲人性

在井口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军，一直到年底前最后几天才回到学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学，相别了两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问起我的病情。他们见了我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再没有以往的玩笑和亲切的交谈。尤其是没有见到马开先，我更感到疑惑。

我偷偷向刘玉华询问，她很神秘地反问：“你还不知道？你慢慢就知道了。”同寝室同学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

1958 年元旦后五天，陈思和郭英华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拿出我年前交给他们的那份“检讨书”。陈思十分严厉地训斥我：“你这叫什么坦白交待？给你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你白白放过了给你的机会，你那个材料除了替自已辩解就是隐瞒，照你所写的，还有什么右派言行？”郭英华也一脸怒气地说：“既然你的态度如此顽固，那么从明天开始就向全班同学交待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从中学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怎么突然变了脸？变得狰狞可怕，想到前年清理胡风集团的漏网反革命份子时，一位高年级同学，被隔离反省，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入监狱。想到这里我十分害怕。

第一天的批判会叫我坐着辩论，全班同学显然背着我开过“准备会”。我注意到马开先没有到场。青年团组织委员刘大奎是这次批判会揭发我的主要发言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

我们曾在一起偷过学校香蕉林种植的西红柿，曾经趁黑夜把学校过河的小船偷走，划到对岸去“夜游”，寒假时在一起打过野狗，在寝室里偷偷煮了“改善伙食”，我们还捉弄过班上一位年龄比我们大五岁的女同学，捕风捉影硬说她与班主任老师“偷情”，弄得来全校当成新闻传播。

总之，一切孩子干的调皮事我们都一起干过。后来由于我父亲被捕，我变得老成起来，这种调皮事才收了手。中学毕业，我们同时考进了重庆大学同一个班，而且同住在一间寝室，颇有“手足之情”。所不同的是他积极靠拢组织，当了团干部，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长期关在青年团的门外。

鉴于这种关系，批斗会开始时我并没有产生恐惧感。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手足之情”也要翻脸不认人，硬说我父亲被捕时，我曾哭过，还说过：“共产党乱抓人”。另外，他还揭发说我背地里经常赞扬大右派董世光。

我试图否认这些揭发，当场争论起来。陈思说，我的检查是在事实面前抵赖，并且暗示说我更为严重、更为关键的问题已经被组织掌握。他再次警告我必须端正态度，休想蒙混过关。

批判会，特别好朋友刘大奎的冷酷，让我心中寒透。这是我第一次偿到斗争会的滋味。难怪我看到斗争自己父亲时，有儿子登台揭发，当场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的。

怎么在政治压力下，人性被扭曲得这样快，这样可怕？

第二天的批判会责令我站在会场的中间，气氛比前一天严肃多了。但我察觉到有一半同学眼里流露出对我的同情，他们并不发言，只是在喊口号时为虚张声势举举手。

上纲上线本是共产党一贯的党风，这一点我已在历次运动中初步领教过了。平时一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我，从来没有去想共产党的好坏，也从来不发表意见，真没想到因为几封同母亲的家信，就被搅进了这次政治运动中。

这么一想，我马上产生了抗拒心理。开始我还承认这些信属于认识问题，但是刚刚说了几句，就遭到了刘大奎和陈思的驳斥，他们硬要把我们母子通信往替反革命份子翻案上套，说我的言行是公然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我横下心，绝不向批斗会屈服。我一口咬定我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说过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话，并且说刘大奎的检举纯属无中生有。

我的拒不认错态度激怒了包围我的同学们，会场气氛开始敌对。陈思说在全校的斗争会上，还没有看到一个被批判斗争的人有我这么蛮横。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

三天的批斗会下来，我被机械系反右领导小组认定是全系右派分子中态度最恶劣的一个，于是决定对我采用特殊的斗争方法。

（一）曹英主持反右“批臭”会

从第四天开始，年级的反右领导小组长曹英亲自指挥了对我的批斗会。反右以来，他的反右领导小组，在全系组织了几十场斗争会，这人有一种使被斗争的人在他的面前垂头丧气而获得快感的心理癖。

为了满足这种快感，他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全年级二十几名同学都败在他手中，一个个低头认罪，乖乖地戴上右派帽子。

四班的一位女生被他斗得几乎跳嘉陵江自杀，事隔二十五年以后才知道那位女生因拒绝过他的求爱才遭此下场。他得意洋洋夸下海口说，没有在他面前不低头的右派分子，所以他深得校党委的青睐。

那天，曹英将批斗会场专门进行了布置。会场上贴着标语，所有的课桌集中到教室的最后面，反右领导小组的三人成员坐在教室的讲台上，曹英坐在中间。会场笼罩着一种紧张空气。曹英的“三角眼”里，射出凶光。

斗争会开始，他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孔令平抓出来！”

我的心一震，被推到会场中间。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我头脑里空荡荡的，耳朵里分辨不出谁究竟在说什么。斗争会开了一整天，我也整整站了一天，两腿发硬，两眼发黑，心里难受极了。

散会后曹英宣布，晚上不准我回寝室，要在他们指定的房间里继续反省，并写出检查交待。这天晚上，三名党员轮流值班，守着我写了一个通宵检查。

天快亮时，我实在支持不下去，想打个盹。头刚刚伏在桌边，就被值班人在我背上打了一拳。

第二天，我又被带回批斗会现场听大家的辱骂和口号。因为一夜未眠和精神上的压力，我的身体已经渐渐不能支持，耳朵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曹英拿出我早晨交给他的检查材料，当着我的面撕成碎片，一边吼道：“这叫什么检查，重写！”他还骂道：“你这反革命家庭出身的黑崽子，生下来就反动，不过你放明白一点，你在鸣放中写给你母亲的信，她都做了交待，你怎么赖得掉？现在你越是替自己狡辩，你脖子上的绞索就套得越紧。”

第二天早上，我几乎交了一张白卷。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曹英拉长脸，冷笑道：“你以为你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就可以掩盖你的右派本质么？现在根据大家的揭发，你已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老实告诉你，你的那个反革命老子注定了你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毛主席怎么说的，你那反革命家庭和社会地位，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是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你们千方百计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你的出生就注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你在大鸣大放中越是一言不发，越是表明你的阶级仇恨深！”

照此逻辑，我便明白，对我进行专政是天经地义的了。既然罪恶在我生下时就印烙在我身上，我这辈子就在劫难逃了。

既然如此，还要开什么斗争批判会，还要我向同学交待什么呢？

又过了一天，曹英突然说：“今天你向全班同学交代你和马开先的关系。”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这么多天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她，她并没有参加我的斗争会。据说她在另一间教室里受到追查，我们被曹英有意地分割斗争。

“你看，这是马开先的交待。”曹英手里捏着一叠纸，狡滑而得意的向我宣示。“你必须老实交待鸣放期间你和马开先发生的奸情。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处份你，开除你的学籍，现在这些丑事，她已经交待清楚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此时终于如梦初醒，我与阿先隔绝，原来是工作组的预谋。为完成上级交给的抓百分之十的右派份子名额的任务，反右工作组这几个月来真是煞费苦心！

男女私情是中国封建残余的禁区，现代中国虽不像古代那样，男女授受不亲，但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始终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大学同学中，谁沾染上这种嫌疑，必会招致周围人的谴责，不但父母不容，就是同学之间也会受到冷眼和攻击。

因忍受不了这种攻击，涉嫌通奸的女同学在校园里投湖自尽的事时有所闻。我同开先虽有这种生理上的冲动，但始终不敢偷吃禁果。

今天，阿先怎么会这样糊涂，难道她也痛苦到了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抓屎糊脸”的程度了么？

为什么这种严肃的政治批判会搅进这么一出莫名其妙的绯闻？我来不及细细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识地向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给我看。”我盯着他手里的那叠纸，他奸笑一声，把那叠纸收了回去。

“把她叫来同我对质！”我冲他吼道，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正是借用了这一手，会场兴奋起来，批判会立刻出现了高潮，先前一直缄默，并用恻隐眼光看我的几位同学，此时露出来的是鄙视和惊诧。

会场上一片骂声、吼声：“伪君子！”、“下流！”、“装什么假正经！”

那天晚上，我依然躺在那间关闭我的小房里，面前还是那张桌子，桌上还是放着一叠纸，曹英正坐在我的对面。

“何必装疯卖傻，自讨苦吃！”他以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挖苦语气说。“在强大的工农民众面前，哪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缴械投降？别说你一个学生，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人物，还要写不完的检查，你算什么？你必须下决心彻底认罪，彻底交待，今晚必须写出深刻的检查……”

我不知道如何写完了我最后的一次“检查”。我至今已完全不记得上面写了些什么，那几乎是在曹英一问和我的一答中写下的。

“抓屎糊脸吧！”只能如此了。我写完只觉得六魂出窍，恶心想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伏在那桌上呼呼大睡，梦中突然又被一阵震耳的口号声惊醒。

曹英已经走了，屋里静悄悄的，就我一人，我向玻窗望去，黄黄的灯下面，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鬼！我心似刀割般难受，脑子里又开始膨胀起来，耳朵里还响着那可怕的回音：“反革命的儿子必是反革命。”

我想，自己是不是神经失常了？我想起那些疯子在垃圾堆里寻觅腐烂食物，找到后大把往嘴里塞的情景。我一阵心惊肉跳，立即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和脸，待证明我还能判定这些最重要的身体部位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我便想唱歌，或大声地发些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呐喊。晚上老想出去"散步"，在后校园的环校马路上，觉得凉爽的江风真够刺激，可以使我忘记那些我无法再忍受的苦恼和悲哀。我听得清楚身后跟踪我的脚步声，我便唱歌，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了些什么。

我想，我已临近疯狂了，我得躲开这可怕的后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中不知有多少与我相似遭遇的人被逼疯、自杀、我算尝试到了那悲剧的滋味。就在这精神快错乱的时候，我忽然从当时盛行的师生写血书向党交心中受到启发，我也写了一封交给党委宋殿宾的"血书"。

斗争会上口口声声说我是国民党的孑遗，因而刻骨仇恨共产党，既如此，为了解开这根套在我身上的绳子，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请求中共派我到"对敌斗争"第一线，接受中共的考验。我想，有了这封"血书"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孝子贤孙的罪名就不会再纠缠我了。

不料，这恰恰成了套我一生的绞索，这是后话。

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地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死了"可不好交代。也许还出自童稚之交的那份良心发现和同情可怜吧！

我以"全校的右派极品"受到了"保留学籍，劳动考查"的最高处分，这是全校顶级右派分子中的第一类。除了按"敌我矛盾"被抓的蒲世光、被劳教的林毓森之外，我便成了性质最严重的"右派分子"。

全校一共七十六名这样的极品，其中还包括四位年事已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处分既已确定，七十六人集中交总务处统一管理。

我终于从被人四面包围和监视的第二学生宿舍里搬了出来，搬进早先我同阿光一起复习功课，那幢旧教学楼旁边的楼房中，开始了我们正式接受监督劳动的改造生活。

临近春节了。那年的春节怎么过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

（二）校园里的牛

老图书馆崖下，那片长满杂草的老足球场被划为重庆大学农场的耕作基地，这里便是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品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基地。

五八年二月，春寒料峭，我们七十六个人便靠锄挖、肩挑，将球场周边高低不平的地方填平成一湾足有五亩大的"水田"。"水田"灌满水后，用人力拉着犁耙将它刮平。

拉耙的五、六个大学生一字排开，踩着刺骨的冰水，在水田中歪歪倒倒挣扎着前进。我们满身被溅起的污泥弄成了泥人，摔倒在田里的就更惨了，那是寒冷的早春，冷得瑟瑟发抖，这种“壮观”还常常吸引路过的昔日同窗。

他们三五成群站在高处，指点着这些挣扎在水田中的“牛群”，有时还能听见他们的窃窃笑声。

当年抗日图存时学生走在街头，面对喷来的高压水注的那种前赴后继、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不是还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过的么？今天，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残忍对待起自己的同学？他们的怜悯之心，当真被毛泽东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弄得荡然无存了么？

然而，反省起来，我的神经不是也完全麻木了么？我并没有因遭受冤屈，受到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而奋起反抗，当时胸中冷冰冰的，连一点反抗的火星都没有。经过斗争会那剧烈的刺激以后，神经处于麻木状态了。

在我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的躯壳内，只有恨在猛烈生长。遭到无端的残酷折磨和侮辱而不知道恨的人，恐怕不是白痴就是疯子！

到了晚上，脚上总是奇痒难忍，水田里灌进了从教学大楼的蓄粪池里抽出的屎尿，痒大致是钩虫作祟，加上被石块瓦砾划破的伤痕，真是又痛又痒。

这倒分散了精神上的苦恼，使我不再想其它事，每当仰望窗外的夜色想哭泣长叹时，却拼命去搔那双又痛又痒的脚板。

有一次，外语教研室的郑老师拉耙时，摔倒在水田里，我和旁边的两个拉耙手却喘着气，既没有马上把他扶起来，又不曾安慰他，看着他一个人蹒跚从水田里爬起来，全身发抖。

在他生病时，我未给他端过一杯开水。后来，每忆这事，都觉得惭愧，面对他，我的人性不也被这些可爱的同学们毁灭了么？我当时不是只想到个人的不幸，还在千方百计的向共产党辩诬自己的“罪恶”么？

不过，我并没有丧失记忆，正当我们挣扎在水田里向全校同学们，上着活生生的“监督劳动”的“现身课”时，全校的同学正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开展了“红、专”大辩论。

松林坡的大礼堂前的松树树杆上，牵着一排排的钢丝，上面挂着一幅幅用白纸写成的“向党”交心书，这是些令人看后就呕心的杰作，其中许多篇还隐隐带着斑斑血迹。

那抬头的称喂就很令人肉麻，千篇一律以“亲爱的妈妈”开了头，下文抓了些“学而优则仕”或“光宗耀祖”的帽子胡乱戴上，以痛骂自己的“糊途”。

作者的这些“杰作”是出于真心还是慑于某种“淫威”？若出自真心，我想，前提就是虚构的。以我自比，自幼读书从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东西，光宗耀祖和剥削他人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扪心想来，若不是不断的运动步步逼迫，社会的歧视和压迫，我怎能由怕变成恨？

但直到当时，我肯定没有对共产党的刻骨仇视，也更没有预谋的猖狂进攻，我只是可怜和渺小的牺牲品，是一个用来使周围人产生害怕而不敢反抗的牺牲品而已！

至于要讨论这些“交心书”问世的原因，我想当时看到我的同学们如此受人践踏，也未必不会像他们一样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来！

无奈啊！也罢，且看看另一张怎么写：

那标题是醒目得多了，《拔 XX 白旗，与 XX 商榷》：

“近来据我观察，你的思想包袱背得不轻，平日生活无精打采，学习不发言，斗争右派不表态。好像完全置身运动之外，你在想什么自己最清楚，单提你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的错误言论就已不少。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我们不禁要问你所要的是什么自由？自由自来就是有阶级性的。

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自由；今天有我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由，就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自由。我们今天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你当然会说没了自由。

由此可见，你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来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了。你又说：‘我们现在是非都是由党来划，不是按大家认定的标准来划。’你又错了。

难道你所谓‘大家的标准’还有与党的标准完全对立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那个‘大家的标准’不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么？你又说：‘大鸣大放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但确无反党的意思，我只觉得应当尊重事实。’

姑且我们也承认你并无恶意，但是你那个‘尊重事实’该首先承认党的领导是无比正确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比强大的事实；一切与这个事实相违背的不是错误的就是反动的。

你之所以现在生活消极，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认识不到根本的原因，是你长期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你灵魂深处还牢牢树立着一杆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白旗。但是你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的可悲下场！前车之覆不可不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好厉害的逻辑，彷佛世界上除了共产党的主张绝对正确，再无其它意见的容身之地！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有“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个人迷信。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极权就从这里生下了根。

至于那些“运动”，就好比在街上无故地抓了些行人，硬给他们加了一大堆罪名便拉去砍头，砍头时还要他承认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样。

直到今后证明，一人独裁，一党统治，变成了少数人追逐自己的“权”、“利”给国家带来的不是繁荣幸福、而是灾难绝途时，人民才起来反抗它、推倒它，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经历几十年残害的我，意外的苟活至今，回忆起五十年代之大学校园的同学大家庭，其成员中许多人格的卑怯，懦弱和盲从。理性地思考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专制主义暴力的扭曲，一党专制肆无忌惮践踏了人的尊严！！

它的领导就是典型的党独裁的代表，灌输着共产党至高无上的信条，学校一经变成了狂热个人盲目崇拜的发源地。中华民族就面临着自相残杀和毁灭。

然而，生活又以无情的事实鞭挞着校园。当市场上的供应一天一天匮乏，尤其是那个为控制农民而施行的农业集体化，施行以后，全体人民都已尝到它的苦果，所谓的“天灾”正用饥饿惩罚着每个中国人。

每到吃饭时，当每个学生都排着队在领取饭菜的窗口处，领到一个三两重的馒头和一勺白菜时，学生们当然不会忘记十年前，他们的大哥大姐曾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吃饱喝足后，还要走上街头，举起小旗同游行队伍随流着高喊“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

那殷世红仅仅说了稀饭清的像“浪打浪”，便被抓了出来斗争，最后关进了劳动教养所。现在，回想到那一时冲动而贴出的“交心书”，该不该有些矛盾和尴尬呢？也罢，共产党本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何必对他如此“认真”？

问题是，他们真得到了忍饥挨饿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了！

当人们醒悟到这些，起来反对时，国家已挣扎在灾难绝途上了。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三）饥饿的大学生

五月一日，伙食团传来一个特大喜讯：为纪念国际劳动节，放假一天，五一全天三顿饭可以敞开肚皮吃。这一喜讯确实使我们这七十六名苦役犯振奋不已。

四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我们提前收工，平时最感到吃不饱的江远被派去厨房帮厨，深夜十二点江远回来，兴高采烈地宣布：“伙食团拿出了比平时多五倍的面粉，张科长说，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

张科长说：“大家老喊吃不饱！其实只差了点油荤，我平时还没有你们吃得多，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看你们吃得到多少？”

可中国人就是天生的穷命：肉食一直是打牙祭时才能见得到的。劳动的农民从来是拿粮食打主食，这些年来这统购一搞，农民连猪也不喂了，猪肉没了，加上我们也成了体力劳动者，原先那点定量当然就不够，这些道理，谁都明白。即使五一节这一天可以美美的撑一肚子，又能管过几个小时？

难道中国真因为人口骤增，土地收入微薄，收到的粮食已不能满足六亿老百姓果腹了么？那形容得似天堂般的共产主义岂不成了海市蜃楼？

我们为明天的“精彩”生活而兴奋不已，江远报告说，明天早上是稀饭、豆干和油炸花

生米，中午六菜一汤，馒头随便吃，只是准吃不准包。有人大声喊道：“打二两白干庆祝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

唯独我独自躺在床上想家。弟弟走后，一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如何了，他们可知道我现在也身陷右派泥潭，失去了自由，今后恐怕难以回家了。最让我牵挂的是外婆，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的不幸。

唉，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你不是自称是受苦受难者的救星么？怎么就连我家的四个老人孩子都不能宽恕呢？

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已不比往常，干得能插稳筷子。那豆腐干和花生米大概已经半年没有上过饭桌了。黄豆和花生米是一类统购统销物资，普通商店里买不到，若问为什么买不到，答道：“去向苏联老大哥换机器了。”

中午时分，每一个桌上摆着六碗菜和一盆排骨豆芽汤，主食是白花花的馒头，一桌一笼。那一顿，我吃了五个馒头，刘武吃了九个。

馒头毕竟不是早上的稀饭，加上肉食，下午胃便感到难受，肚子发胀的滋味并不比饥饿好受。我找了个僻静处在那里对肚子进行人工按摩。按摩的人渐渐多起来，按摩许久，仍不能消解，晚饭时就再也不想吃了。

张科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嘲讽地说：“怎么样？我说呢，这国家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的，成天喊不够吃，我看是思想作用。不好好劳动改造，却盯着这粮食定量做文章，就凭这一点就该好好改造。”

晚上八点钟，忽然男生宿舍传来了救护车的鸣号声。有人传出消息：冶金系一名学生得了胃穿孔，正被救护车送往医院。阿弥陀佛，我们这七十六名“同改”还算平安无事。

不过躲了今日祸，未测来年灾，年纪轻轻我们已陷在这种绝境中，还不知命中有多少灾难等着我们呢！

批斗示众，杀鸡给猴看过后，我们这七十六个人自忖这堂堂学府、几亩水田，又岂能久留我等被批倒批臭的五类极品，作脱胎换骨的天地？

能想出了一个“大鸣大放”，使出了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划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声名狼藉的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封住刚刚想开口说“不”的口，已属亘古首创、闻所未闻的中外专制独创。

毛泽东很明白，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划到了“专政”位置上，暂时是不能用“杀”以儆效尤的，对这个已产生出来的群体处置，确实很费了毛公的一番“苦心”。

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他“博大与宽宏”的政治胸怀，提出了一个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已经成为“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群。

这种瞒天过海，既欺瞒了他的党内信徒，也堵住了世界诸公的指责。

以后的历史证明，消化掉这么一个完全出自独裁阴谋的无辜知识分子群体，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比焚书坑儒更大的悲剧。我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消化、改造全过程的幸存者。

五月二十日，全校师生员工在校园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上午十点钟左右，彩旗、标语和横幅，从四面八方向风雨操场汇集。主席台上，悬挂的横幅红布写着“重庆大学首批下放干部欢送大会”。主席台两侧是标语式的对联，左边是：自觉响应党的号召，干部下到农村去。右边是：接受农民再教育，决心改造世界观。

校长金锡如在主席台上讲了话，接着呼“下放干部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批因“家庭出身”不良的员工，和社会问题复杂的“干部”共二十余人，站到了主席台前，他们在一片口号声中，戴上了校方特制的“大红花”，游行队伍簇拥着他们登上一辆披红戴绿的公共汽车。接着，彩车开路，游行队伍锣鼓齐鸣，跟着缓缓驶进的彩车沿环校公路绕行一周，以示告别。

这批下放干部，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右”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工作组，不过这二十几人中除了几位共产党员是专职的特工人员外，其余都各自有问题，他们从此也永别了学校，再也没能回去。

我们七十六人一早就接到命令，叫打好各自的背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分。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欢送”大会，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才是这次“欢送”的主体。大家默守在黄色楼房前面，默默无语，各自都有难言的悲哀和惶恐。

午饭后，驶来五辆“吉尔”卡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装满每一个车厢。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大彩车的引路之下，我们离开了重庆大学，向着南桐矿区进发。当重大的一草一木，一舍一楼，一一从车旁驰过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必竟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了。

我忽然想到了阿先，一直就再没见到她，她真的永远消失了？她终于固执地主动地离开了学校，这总比我现在被押送离校要好得多。不过，一个女孩子在那个时候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今后的路还不知怎么坎坷，她现在上哪儿去了？她的命运又该如何呢？也许缘分就到此结束，我们真的就这样失散了，多么不祥的恋爱啊！

（四）余协和

当我们从学校押上炼狱之路刚刚两个月，1958 年 7 月，余妈妈的大儿子余协和来到了我住的宿舍中。

一进门他见我昔日睡的铺上堆着乱谷草，却不见了我的行李、什物，忙向周围邻铺的人询问，他们都只是简单的摇了摇头，并不答话，问到上铺的那一位，他面露惶恐的回答说“这铺从来没睡过人。”

余协和反复看那满铺堆着的乱草，心里拥起了一阵阵的疑惑，必竟当时他才十六岁，虽耳闻大学校园里的种种传说，并不太懂这“反右”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疑虑我这个比他才大三岁的邻居，一个未出茅芦的大学生，怎么会身陷其中？

一九五五年我考入重庆大学时，我家紧邻的余妈妈家中就有了七口人，兄妹五人的吃穿上学，仅靠父亲菲薄的工资，幸好余妈妈没日没夜为人帮佣、洗衣，拼死拼活赚钱养家。

年仅十岁的余协和也同我一样背着背篼遍山遍野地拾柴火、捡二碳，十四岁初中毕业，本打算辍学在街上找零工，但是慈祥而善良的余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才 14 岁的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直到十几年后才知道，为了筹孩子上中学的学费，在劳累之余还每个月到医院卖血一次……）

1955 年初中毕业的余协和，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市的升学考试中被市一中和市三中同时录取，为了能减少学费，他听从了我的建议，选择了凭成绩减免学费的重庆第一中学，一中是当时重庆的重点学校，又紧邻重庆大学，从此他每遇到学习上弄不清楚的难题都会到我的宿舍，找我这个儿时一同背背篼的伙伴，也兼有一种照应的意思。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时同他在一起揹着背兜，满山遍野为生存而挣扎的伙伴，就这么离开了学校，消失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了！

那时的校园已是特务密布，处处陷阱的恐怖场所。

第二章 监督劳动的最初岁月

从沙坪坝到南桐，进入目的地南桐矿区丛林煤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车队一直开抵丛林小学的操场坝里才停下来。藉着教室走廊射出来的微弱灯光，我们从车上御下了各自的行李，搬进了一排已没有学生上课的空教室里，打开行李，吃了随带的干馒头，在升旗台左侧水池边洗漱后，已是深夜了。

顾不得那教室三合土地上的潮湿，便打开了被子就地而眠。

第二天天刚亮便被下放干部的领队催促着醒来，全体人员在升旗台前集合，由下放干部的组长王怀寿点了名，并按照预先编好的名册，将所有的人分成五个大组，每一个组都配备了四至五名的下放干部，并指定了组长。

我们这个大组共十八名右派，四名下放干部，鲁召是我们的主要管理者。四名下放干部中有一位女干部，这次下放唯独她一直很沉默，好像心事重重的。

分组完毕，王怀寿讲了话，他说："从今天开始，根据党的政策和学校安排，我们每一个右派将分散的到指定的农家，接受农民的监督劳动，这是一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应当认清前途，在这个改造环境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讲话完毕，各队分列出发，我们这个组在鲁召的带领下，穿山越岭，绕着山路走了十余里地，中午时分才到达名叫"界牌"的地方。

南桐是四川著名的煤窝子，矿区大大小小数十个矿井散落在山丘起伏的山陵中，同农家田舍交织相倚。这里的农村、农田阡陌交错，小溪潺潺，被一个接一个的山包分割成一些小小的村落。

时值初夏麦黄季节，山坡上一块一块麦地里，泛出一种泥土和霉气混杂的气息来。

才下过几天雨，今天正是晴天，却难看到下地干活的农民。麦子好像被草交缠着显得荒凉。但那绿树成荫的小道，倒挺秀美，走在其间并不觉得热，只因为背负行李，手提沉甸甸的帆布书包，走不上三里地大汗直冒出来。

在一处山梁上小息五分钟，迎来田梗上吹来的风，敞开自己的衣服，特感凉爽，似乎驱散了几个月郁积在校园内的烦闷，大家开始说话，指点那嵌在绿荫丛中的点点农家："小屋平头虚落里，炊烟起处是人家。"

可惜，我们现在落魄的心里总是凄凄惶惶，不知道，哪里才是落脚栖身的住处？

第一节 南桐矿区丛林

界牌原是一个镇，自从合作化以后，这儿便是一个联社中心。以一座很大古庙为核心，依附它的近百户农家围成一个祠堂，名叫曹家祠堂，这儿就是我们今后集中学习的地方。

古庙里原本彩色的观音，也已剥落凋零，留下了千疮百孔的泥身，香炉也被推倒，半埋在垮塌的泥墙之下。不过，地上还算打扫得干净，堂中摆着十余张方桌，这里似乎是食堂的样子。

当我们这支装束古怪的队伍，背着背包，提着各自的帆布书包，脚穿草鞋跨进殿堂时，引来一大群孩子围观。他们用好奇、陌生、稚气的眼光观察着这一支古怪的队伍；既不像勘探煤矿的地质工作队，又不像来这儿搞合作化运动的工作组。我们自己都感到很猥琐。

两名头上缠着环形盘状白布头帕的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看样子好像是这儿的干部，那年长的大约四十多岁，鲁召向他迎去，递过重大介绍信，谦让着向里屋走去。那年青的一面招呼我们，一面吆喝着围观的孩子们。

我们放下各自的行李，各寻坐位，拿出毛巾擦着身上的汗，古庙殿堂上的挂钟已经指着十二点了。

不一会，两名食堂的炊事员，端着一个甑子和两大碗菜出来，摆在两张桌上，那便是我们离开学校在农村里的第一餐饭。那甑子里黄澄澄的包谷饭，不见一粒大米，吃下去满口钻，大碗里是蒸的牛皮菜酢，每桌一盘小碟子里是红辣椒面和盐巴水。

对饥肠辘辘的我们和下放干部感到喷香可口，这是三个月大学校园里的定量伙食和劳动磨炼的成果，那一顿我们吃得很饱，很满足。

而那些一直围观我们的孩子们并没有散去，从他们瘦削而蜡黄的脸上那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童稚眼睛里，流射出一种毫不掩饰的饥饿和羡慕来。

吃过午饭，下午三点钟，白头帕中年人引来十几名背着步枪的年轻小伙子，我们猜这大概是镇政府武装部的民兵。我们便由那中年人指派：每一个人由一个年青民兵带路，押送到各自将落户接受农民“监督劳动”的农家。

押送我的是一个年龄稍大于我的小伙子。从他那傲慢的态度便知道，在我们初识的关系中，他是以高人一等的“管理”身份待我的。

一种敌意已反映到脸上。我背上背包，拎着书包，走在前面，出了祠堂大门，他便保持着同我大约五公尺的距离押着我。我们出了那祠堂大院，在弯弯曲曲的田坎上迂回前行，每到一个岔路口，就会听见他从背后传来的生硬喝令声：“向左”或“向右”。

间或我回过头去想问他朝哪一条田坎上走？便见他警惕地用手握住枪栓，用极不友好的态度喝道：“干什么？”好在，校内三个月的锻炼，已让我明确了身份，习惯于低人一等，对别人莫明其妙的无礼训斥，从不吭声反对或稍现出自尊心受辱的愠怒来。

过了许多水田田坎，进到林荫覆盖的山路。对那田梗两旁田地里种的什么庄稼

庄稼和景色全没留意，心里充满了孤单和害怕，好像是一只被猎人牵着走的受了伤的小山羊。

看看天色渐晚，背包渐渐的沉重起来，汗水早已湿透了背心，眼里死死地盯着远方，同身后的这个人已是无话可说了，心里却像乱麻缠着，想着，我将去的究竟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地方呢？

第二节 赵家湾

（一）赵凡父子

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岚的垭口，眼前夹在两座山丘之间的盆地是一弯弯水田，山丘的坡土里荒草丛生，远远看得见，靠左边的山腰间，一座被竹林覆盖泥墙围住的院落，我们沿通向院落的石板小道走去。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那小院落里，三排瓦房围着一片大约 500 平米的三合土院坝。进入院子大门，正堂屋阶檐坎上，一位抽着旱烟的老人，斜躺在一张很旧的竹凉椅上。那旱烟杆足有一米多长，乌黑的像是铜的。

他头上缠着大白布盘，斜襟布衫和齐着膝盖的裤子，那装束和模样活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老土匪。他见我们进来，也斜着眼睛朝我们仔细打量，一面把含在嘴里的长烟杆拿下来靠在墙上，慢慢地从凉椅上站起身来，沙哑着喊道："张二娃，咋个这个时候才到？"

"唔，赵大爷，下午三点才从界牌起身，这小子又走得斯文，磨蹭到这个时候，反正现在任务完成了，人交给你，跟队长说一声，天色不早，我还要赶回去。"那张二娃向赵大爷交待完毕便背着枪，转身走出围墙的大门。

我在院坝的中央放下了背包，两边厢房门口的阶檐坎上，早已站着两家人家的大人小孩。此时的我活像一只被许多人围观的猴子，还来不及看清这即将进入我"改造"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便在十几双陌生好奇目光的逼视下低下了头，呆呆地站在那里，搓弄着我那帆皮书包的背带。那时的心情很像做了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学生。

那赵大爷提着长烟杆，点燃了刚刚装好的一袋烟，一边扎巴着，从正中那排堂屋的阶檐坎上走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你姓孔对吗？"我惶恐地抬眼望着他，点了点头。

"我的儿子没有回来，你跟我进屋去吧。"他的语气温和多了，我想，此时我一定很让人可怜，便一手拧着背包，一手提着书包跟着他跨上堂屋的石阶，跨进那朱红漆已剥落殆尽的大门。

天色已很暗，藉着那盏斜挂在堂屋正中的电灯光，看清这家共三间屋子，正中间的堂屋正中满被灰尘的神龛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已由一张毛泽东的彩画所代替，神龛下方放着一个老式的雕花大黑漆方桌，右边是一个巨大的老式大粮柜。

左面墙上开的小门里面，是两张木床和一个旧式的衣柜，木床上罩着的帐子在昏暗中显得又黑又黄，也许许久未洗过了。

每一间房子很大，显得异常的空。堂屋右面墙上那道小门后面，便是一眼土灶，那里面

堆了许多麦秆、稻草之类的燃料，旁边堆着一小堆煤炭。

我走进“卧室”的那一间，老大爷点燃了一个松明子走进来，我才看清，天花板顶部有一层厚厚木板铺成的“阁楼”。

一个可以移动的木楼梯，斜靠在一个足有 2 平米大小的长方形“天窗”口。赵老汉指着那“天窗”说：“楼上是空着的，今后你就住在上面。”

仗着他手上松明子的光，我爬上了“阁楼”，这里倒也宽敞，里面没有点灯，一缕月光从两排亮瓦中射了进来，隐约只见屋角落里堆放着杂物，两只老鼠突然从那杂物里窜出来，沿着瓦缝钻了进去。

地板上到处是泥块灰尘和已经干枯了的树叶，估计那一定是从瓦阁缝里飘进来的，四面的蚊虫发出的嗡嗡声，就像一队飞临空袭的轰炸机。

赵老汉从天窗口里给我递来了一把扫帚，我便开始藉着月光和从天窗口射进来的松明子火光，将地板清扫出 10 平方的位置，打扫干净后，便藉助老汉的帮助，将自己的行李就地打开，正好房主人赵队长推门进来。

这是一个中等个子的年青人，比我年长两岁，他满不在乎的看了我一眼，便端了一条长板凳，坐在门前的屋檐坎上抽起旱烟来。

大约半小时后，赵老汉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盆菜粥，一碟子辣椒盐水，菜粥由包谷面搅成，里面放着许多菜叶和萝卜头，吃起来有一股苦味。

赵队长并没打听我的家境和学业，而是简单向我交待了今后的“政策”：每天必须跟大家一起劳动，力所能及，但不能偷懒；不准乱说乱动，有事要到哪里去，必须向他本人或他爹说一声。

吃完饭，夜已很深，我在院落门外的小溪边洗净了一身的泥汗。赵老汉引燃了卧室里堆着的一堆艾草，滚滚浓烟呛得人无法在屋里呆下去，好一会儿，浓烟散尽，空气里充满了苦艾的烟味，那“轰炸机群”也被这滚滚浓烟驱散。

我爬上了阁楼，躺在铺开的被子上。夜晚已退热，凉风刮过瓦缝，吹在我的身上还真有一点凉意，便拉着一张被单盖上。透过亮瓦漏进来的那束月光，已斜移到堆放杂物的角落里。虽然白天行路一天，累得精疲力竭，但脑子里还在闪现白天种种的突变。

此时，我的家门，那竹篱笆边上老外婆抚摸我头的那最后一别，又重新浮到了我的眼前，还有弟弟与我临别在小龙坎那最后的晚餐……母亲的眼泪和父亲山头上的相见，阿先含恨的目光，统统都复印出来。

两行泪水悄悄地滚落到我的枕头上。正是：“夜深风竹敲竹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木兰花．欧阳修）。

下乡直接管理我的“教育者”，就是这赵氏父子，赵老汉解放前一直佃地主的田种，做地

主的丘二，为地主抬过滑竿，也跟着去重庆跑过码头，那市井经历，市俗见识是这里从未出过山沟的男人无法比的，这赵家湾上上下下二百来号人家都得让他三分。

他一共三个儿子，老大“光荣”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他被尊为烈属，老二又在修筑川藏公路时，因工伤亡故，这都是他的光荣家史。

现在跟着他的就只剩下这个最小的儿子赵凡，年纪才二十二岁，也是合作社赵家生产大队队长兼基干民兵队长，虽然还没有婚配，但据赵老汉说他眼光太高，这弯里的几个姑娘他全都看不起，想到外地去物色一个有文化的。

赵老汉的老伴五〇年就已去世，所以这一排足有一百多平米的住宅里，暂时还只有他父子二人，家里的摆设是当年分田分土时，从地主家得到的“胜利果实”。

如此看来，这父子俩是这赵家湾五六十户人家的“父母官”，将我安排在他们二人的管制之下，当是理所当然的。

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很快适应了日常的农活，不论下地挖土，挑粪上山，都勉强可以充个数。加上，当时正在从农业合作过渡到人民公社去，农村中的统购统销和定量政策，农民已经怨气连天，对社员是否下地干活，干多干少，并没有人认真过问，只凭生产队工分员做出的工分记载，以供分配粮食的依据。所以无形中，对我的压力就减小了。

时间一久，同这些质朴的农民打交道，还会听到他们的真话，不像学校中满口阶级观念的同学那么复杂，大可不必小心翼翼地不敢说话，防备着祸从口出，防备着有人记下我的“牢骚”话，拿到我的斗争会上施压。所以渐渐的，心里上释了重负，感到轻松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从楼板上轻手轻脚的起来，走出赵家院子大门。这院子之外的环境真很幽雅，茂密的竹林，在围墙四周，环抱着整个小院，院子的大门石梯坎下，横着那通向界牌的石板路，与石板路平行的是一条流着清瀫溪水的堰沟，跨过堰沟就是横贯两边山坡的田坎通道。

围墙门口石梯坎两旁两颗绿荫遮天的大枣树，更添了这小院的秀色。四周很静，静得令我总觉得这正常的农家，缺了一点什么？侧耳细听，果然没有鸡叫、犬吠。

问到这赵大爷，他翻着白眼，没好气的说：“喂啥子牲口，社里的干部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通通宰掉，再说，分那点口粮，连人都没得吃的，那还有去喂鸡鸭？”赵家父子俩所住的屋后靠着灶房，还有一个用竹条和木棍围成的猪圈，里面圈着一头尖嘴驼背，骨瘦如柴的架子猪。

赵老汉说，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粮食统购了，所以没粮食喂猪了，所有的猪，便由生产队统一圈养，每头猪每天只配给一两包谷，而喂猪的人家自己的口粮都还差老远，那猪便只能吃“草”了，所以一个个都瘦成那样，一过冬天死了一大半，能熬到今天已不容易。

房子的背后，是一片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分自留地。自留地是赵老汉的主要劳动基地。里面种的菜以牛皮菜为主，还有南瓜和红苕，南瓜的瓜藤牵出了界围老远，那上面的花蕾已开

始雕落，园里的瓜果与大田庄稼截然不同，所种的瓜菜长势十分茂盛。

（二）农民怎么解决饥饿

对我们当前最大的威胁仍是食不果腹。按照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界牌乡镇村舍的收成，合作社分配给全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仅只有八两黄谷，折合大米不到六两。

赵氏父子自不例外，而我的口粮按城市户口拨发每月大米二十八斤，尚且不够，更何况劳动惯了的赵氏父子？既成一家，三个人当然是一锅吃饭，这严重的短缺部份，当时只好到屋后那自留地里去找，我明白，统购统销的最大受难者，便是这些生产粮食的农民。

五月底，正是桃李成熟的季节。这丘陵地带，听老汉说，满山遍野都是李子树。这个季节李子树已硕果满枝。

口粮短缺的饥饿农民，见着这些果实，谁都会打它的主意，但是合作社制定规定，这些果木树统统是社里的集体财产，谁如果去那树上摘下或打落果子，谁都会因此而受到扣除口粮的处分。

好在近年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渐渐明白，就是合作社把李子全部收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社员们也分不到几个李子钱，倒不如不去收，也不去管，凭它熟透而掉在地下，拣来吃还可以充饥。

成熟的李子既没有人过问了，许多社员中午下班也从来不回家的，反正锅里无米可炊，对着冷灶发呆，不如就在坡上满坡的寻觅那些掉在山沟里、土缝中的烂果子充饥。

有一天，东面背湾里一位叫曾二爷的社员，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在包谷地里喊肚子痛，中途回家休息，回家后见他痛得大汗直冒，在地上打滚，连忙请来邻院村社卫生员。他拿着药箱去他家时，只见他脸色惨白，口吐白沫，曾二娘慌了手脚，请几个年轻人帮忙抬到界牌去，又没有找到担架，还不到午夜时分曾二爷就断了气。

第二天背湾那院子里围满了人，曾二娘哭得死去活来。邻人说这一个月来，曾二爷中午就从没回家烧过火，靠拣山坡上的烂李子过一顿，这一次一定是吃上被毒蛇爬过的烂李子了。

我去看时，那曾二爷全身浮肿，两眼睁开，好像有什么不甘心的冤情。曾二爷死后，那山沟里的从树上掉落下来的烂李子，仍然是社员们充饥拣食的东西，只不过，拣的时候多加了一分小心，充其量把它们包好，拿到堰沟里清洗一下。

（三）大量饿死人从此开始

水肿病终于开始蔓延起来。赵家的自留地已经跟不上三个人的需要，最高产的牛皮菜已经砍得差不多了，新种上的白菜还只有健子那么大。

赵大爷已把谷子、连壳都磨成“谷面”并且将四季豆的叶子，南瓜叶、红苕藤上的叶子勒下来，搅拌在“谷粉”中，以充主粮，开始还蒸成了酢，后来干脆煮成了粥。在我们三个人中，赵老汉最先得了水肿病。

据我亲身经历，这全国性水肿病当从 1958 年夏天开始，一直蔓延延续到毛泽东寿终正寝。得病的原因很简单，饥饿性营养不良，而医治的办法也很简单，吃饱啊！中国大陆上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饿饭”期。

曾二爷死的第二天晚上，我从蚊鸣中惊醒，饥肠辘辘不能入睡，突然听见，灶房里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噼噼啪啪响声，接着，飘进来一股显然是什么米粑烤出的香味，便悄悄地从天窗里探头往下面看，赵家父子的床上没有人，我便爬下楼梯，蹑手蹑脚的走进堂屋，把头探向灶房，藉着那灶膛前平时熏蚊子的火堆发出微弱的火光，看见赵氏父子俩正在火堆里向外掏什么东西，再定睛一看，分明是用铁丝串在一起，正香味四溢的嫩包谷。

自留地里并没有这种国家一类“统购物资”，这火堆里埋的，分明是山坡大田里偷来的无疑。

不一会又见父子俩从铁丝上将这些烧得香喷喷的东西抹到地上，堆成一堆。再从那里拣起一个拍净裹在上面的灰，便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

看清了这么一回事，我倒抽了一口凉气，连忙把脚退缩回到了里屋，悄悄地爬回了楼上，心里却跳个不停。

三天以前，下水湾院子里一个放牛娃，借在包谷地里割牛草的机会，偷了十几个包谷埋在草背兜里，被民兵张二娃抓了个“现行”。便连人带背兜押送到这里交给赵队长，赵队长便将他五花大绑捆在门口那棵大枣树下示众。

那张二娃才十五岁，怎经得起这等刑罚，早已哭嘶了喉咙，等到晚上把他放下来时，已晕死过去。

晚上界牌合作联社的书记专为此事跑到赵家湾来，赵队长就在那堂屋里向他的顶头上司叨叨诉苦，说社员野得很，山坡上的庄稼守不住，现在天天都有人偷，请书记解决。

当即召开了全体赵家湾的社员大会，就在这小院里，赵队长当着百来号乡亲们正颜厉色的宣布：“这山坡上没有成熟的庄稼，谁去碰，被民兵抓住，挨捆，吃枪托自己受，就是打伤打死也自认晦气吧。”当时，他一脸杀气，百来号社员没人吭声。

记得十一岁时曾在龙凤桥一带看到过农村斗地主，叫跪煤炭渣，被跪者双膝血肉模糊，看后心中十分害怕。有一个地主婆就因不堪此虐待被逼上吊，但终没有探究其中的是非。

“苦大仇深”的农民未必没有过头之气？后来在重大大鸣大放时，就有为这种野蛮的行为被人指责过，说农村中的干部横行霸道私设公堂，结果提意见的人被扣“右派”的帽子。

今天，我竟亲眼目睹了这赵队长对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岁的放牛娃，施行如此酷刑，便感到心中非常害怕。这偏僻的小山村，农民们固然纯厚，但也相当的粗犷和“匪气”，小小一个赵队长便是一弯之主，他下的令就是法令，谁都必须执行。

为了偷社上几个包谷，那十五岁的孩子可以整得他个半死。这可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没提到过的。

想到“战国策”中秦晋乞籴的故事，与晋国为敌的秦君尚能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为饥晋籴粮。何故自家一村的弟兄，竟会如此残忍？

而我自认了身份，岂敢说半个不字？而现在面对赵队长刚才的一幕，我好不心惊。自保为上策，我只有回避，躲进小阁了。

第二天是挑粪上山淋包谷，我刚刚将第一挑粪淋完，天时突变，大风卷着一堆浓云向这边压来，没出五分钟，阴风起处，风雷大作，上山淋粪的社员，匆忙收拾各自的“家伙”往山下跑。我却一不小心踩在石骨子上面，从半坡摔了下来，一只粪桶的“耳朵”也摔断了，左脚被石骨子擦伤了一大片，强忍疼痛，拎着桶，冒着已狂泻的大雨，一瘸一拐的回到赵家，甚是狼狈。

这一次赵老汉很是宽容，不但没有追究那被跌破了耳朵的桶，叫我擦干湿辘辘的一身，洗净伤口的污泥，从神龛上取下一个纸包，那是他平时上山采集的草药，磨成粉自制的专疗跌打的药，倒了少许白酒在碗中兑上，浅浅敷在我的脚上伤口处。我只感到火辣辣的痛，老汉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往那长烟竿斗中装上晒干了的茄子叶、巴打巴打的坐在那里抽起烟来。从嘴角滑出的一缕缕带着草香味的烟子里，不时用眼斜瞄着我。

说也真灵，老汉的水肿渐渐的好起来，我的脚伤也一天天恢复，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看来我的装聋作哑是明智的选择。

自从那一晚上的事发生以后，晚上我便十分的警醒。过了大约五天的晚上，大家入睡后一个多小时，大门被推开，发出微弱的响声，把我从迷糊中惊醒，轻轻的把头从天花洞口向下探望，又是五天前那一晚上听到的噼啪声，接着又是那一股包谷烤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大门又重新轻轻的打开，这下藉着微弱的月光，我辩认了那熟悉的身影，不是张二娃吗？此时他的怀里揣得胀鼓鼓的，掩上门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

自从我发现他们父子俩的半夜秘密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天一天在变化。同赵老汉几次谈心便把我的家，划右之前前后后，向他交了底。他的眼里充满了惊讶，“组织”上交给他必须严加管理的人。原来如此单纯。

（四）大跃进时期的农村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毛泽东的爱好，他要成为中国百姓的太阳，岂能不时时发光？赵凡把界牌联社下发给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来了，他说他因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虽然联社要求他向社员们全文宣读，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现在他决定委托我宣读上级下达的文件。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事，我答应了。

成熟的包谷，刚刚从山上抢收完毕，便碰上连日秋霖，稻田里已熟透的稻子，倒伏在水田里，发黑发霉，无人收割。遍山的红苕烂在地里发霉，生芽，也不敢私自抢收到家里。谁要是把这些烂在地里的粮食收藏进屋，那么那十五岁的放牛娃就是“先例”。

大伙的目光都盯着的同村的人，虽然那目光极为饥饿和渴望，但对同村人的违规举动会

马上喊起来，“看，谁在土里挖红苕了？”并且报到赵凡这里来。他们最多饥肠辘辘的望着这些烂掉的粮食，以“水肿病”为理由不出工。静静地忍受农业合作制的淫政之威。

然而大概受了曾二爷亡灵的启示，下湾的几家人，竟趁着深秋的两个雨夜，突击抢挖，把两块大约一亩地最好的红苕，挖了个精光，还连夜把挖出来的红苕用炉膛的草灰裹过，下到了两个大窖里。等到过了几天天色放晴，张二娃来向赵队报告时，那埋在土窖里的红苕，已被饥饿的农民吃掉了一半。

想瞒是瞒不住了，赵队长除了如实上报外，带领三个民兵收缴了地窖里所剩余的全部红苕。接连还开了三天批判会。这一次，下湾的人第一次齐心，大家闷坐着，一个也不发言。赵凡出于无奈以每人每天扣除口粮二两，时间一个月，向上作了的交待。

连续二十天的阴雨，我睡的楼板上到处都泛出白色的霉灰。我在楼阁上私藏了许多包谷，那是在收获季节时从院坝里取回留下的。此外，还有那枣树上打下的枣子。因为食物丰富起来，老鼠却常常在我睡觉时，在我脚前蹿来蹿去，而我一个人特感孤单。

想到复学，我便从书包里取出课本笔记本来，伏在地板上，藉着天花瓦片的光，细细地复习起功课来。我还天真地担心到劳动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功课荒废了怎么赶？

一直到将临中秋的时候，老天才开始收敛起它的哭脸。天刚放晴，赵队长便将赵弯的百余劳动力驱上了土地。首先，当然是抢收已经烂在田里的水稻。工间休息，大家都会把稻穗捏在手心里用力搓，再将搓下的谷粒一把把往嘴里送。乡里人的吃谷吐壳的本事真强，一把黄谷入口，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把那谷壳往水田里吐出，然后嚼那吐了壳的“米”，这倒是“充饥”的好办法，比偷红苕、包谷、拣烂李子吃，无论从营养和卫生的角度都好。我也跟着大家学，只是那刚从穗上剥落下来带着刺的谷壳，老是“缠着”舌头。

第二天赵凡到界牌去开了整整一天的会，晚上回来得很晚，他带来了界牌人民公社将于下周开成立大会的消息，并且还带回了一大捆“志愿申请加入人民公社”的表格。

共产党一贯的规矩，“务虚”以后就要“务实”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内容虽然不同，但程序都一样。

次日晚上的学习会上，赵队长亲自主持社员大会，嘴里生硬的翻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总路线这些怪拗口的名词，不时用眼睛打量我，似乎希望我能对他完全讲错了的话多加“包含”。

但从他那别扭而一本正经的态度上，想象得出，这是“上级”十分重视而又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当成平时学习可以交给我。虽然人们对诸如：什么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那里？为什么必须“坚持”社员自愿加入公社的原则？可否不加入公社，甚至于单干等等，一头雾水，这位队长讲得连自己都一片茫然。大多数“社员”仍以鼾声回应。

他却并不顾及这些，只知道“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只能完成”这一条。当场就把志愿申请加入××公社的表格，发给到会的每一家。对于没到会的两家人也由他们相邻的人带回去。并且告诫大家，必须在三天之内填好，交上来。

任务一下达。我的事便多了起来，赵家湾五十户人家的上百张表格，几乎全由我一人填写。那三天，从早到晚，我就“脱产”出来成为填表的突击手。虽然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符合志愿”这个原则。好在上级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查实，也不会去检查这些表格真实性的。

第三节 一夜进入“人民公社”

界牌公社成立那一天，下午我们很早就收工。赵队长集合起参加庆典的代表，天刚黑，就到达了界牌祠堂。入夜，界牌祠堂的宽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靠殿堂那台阶搭起了临时的主席台，正中横幅上写着：“界牌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两旁垂挂着标语，我挤在人群的后面，向主席台望，今天鲁召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四处寻找我们同来的伙计。

一个戴草帽的人宣布了公社的成立，听出声音，正是我们第一天来界牌时，头缠白布盘的中年人。他向到会的人宣布：这次自愿报名参加加入界牌人民公社的农户，占界牌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全场报以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便由另一个戴军帽的人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界牌人民公社组织章程》，说这是一个集农、林、牧、副、渔为一体的，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是一个人类社会创世纪的社会制度。

到会的人都不明白，将自己交给了一种什么组织，从此，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会怎样。“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锣鼓鞭炮声，表示界牌地区高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一万多个农民就这样在一晚上，跨入到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天堂”。

散会以后已是十一点钟，虽皎月当空，但在通向赵家湾的山沟道上，连串着星星点点的松明子火光使山道通明，第二天又是中秋的前一夜，赵凡在他的大院里向两百号赵家弯的人民公社社员宣布：为集中力量抢收抢种，完成当前最迫切的“三秋”任务，从现在开始红苕不算粮食。全村的所有劳动力已正式编为界牌地区赵家湾突击连。

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和赵家弯进入共产主义。赵老汉还端出了一瓶不知已存放多久的江津老白干，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围拢来，用土碗盛酒，划起老拳，将赵家院衬托得特别热闹。

不过，事情并不如赵氏父子规划得那么顺利，上了岁数的老头子并不愿为了吃几块红苕跑很远的路，特别是下水湾的几个老头，他们一辈子都守着自己的穷窝老灶，论资格和成份，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也不会向这赵老头低头。当张二娃领着民兵要来收锅砸灶那天下午，就遇到了李大爷和曾大爷的狙截。

这千年祖宗留下来的灶神牌位岂能毁掉？这不等于给子孙后代断炊么？老头们可是看着这些娃们长大的，仗着祖宗的威仪，按过去的规矩，他们完全可以操起扁担，把张二娃们痛痛快快的打一顿，并从院子里轰出去。

但是老爷子们自知时代变了，平时虽然早就对这帮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干部看不惯了，也只好忍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叹息自己管教不严。不过，今天要拆老爷子们的灶就没那么可忍了。

两家的儿孙们站出来同张二娃们对恃，灶没有被拆掉，锅就那么一口，碗就那么几个，

爷们的“衣钵”只好给留下。当然要动员这两位耄耋之龄的人，白天去赵家院照看各家的孩子，就更没门了。

这可是赵凡所不曾料到的。两个老人要求自炊，并不抵触社员自愿加入公社并在公共食堂用膳的原则，强求显然说不过去，但已纳入到食堂里的两份口粮要退回去，就难了，若给这两个老人开了缺口，就难以对其它人维持下去。

于是两个想延续灶王菩萨烟火的老人，面临着无粮可炊的绝境，中秋刚过的第二天，两个老人相伴地来找赵老汉评理来了。

赵老汉虽然板着面孔，仍说不过两人的祖宗之训，晚上便召开了赵家两爷子外加媳妇的工作会。三个人一商议，灶还是留下了，但伙不允私开。商量的结果找两家的后生们交待政策，两家儿女在政策的威胁之下，只好说服两位老人，灶虽不拆，但“伙”是不准开了，老人走不动就由儿女送，留着的锅灶，就是为了把凉了的饭热一下用。

风波暂停息下去，赵凡叮嘱民兵们这几天务必加强监督，并在吃饭时，当众宣布，禁止私煨乱煮，谁家违犯了，就砸谁家的锅灶。每天晚上还专门派出民兵在山梁上巡逻，只要看见谁家的瓦房上炊烟袅起，便去那家，必定是砸锅毁灶，定不轻饶。以后的几天，几乎隔一天都会发生砸私灶的事。

正当赵家湾为强制农民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接到了要我立即去界牌公社集中的通知。

第四节 快步进入共产主义

到此，下农村的第一堂课，历时四个月下课了，同赵氏父子相处得不错，远不像我初来所想象得那么可怕，相互之间虽说不上相敬如宾，可还算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相处。比起在学校同班上的同学相处，反而觉得融洽多了。

走的那天上午，当我从楼阁上收拾好行李下楼时，赵老汉取出了一个纸包，塞进我的书包里，那是一包晒干了的红枣。自从劳动开始以来，按学校规定，我们每月仅只能得到两元钱的零用钱，用来买毛巾、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自幼节俭惯了的我，居然还能把这两元的零花钱中积攒下来。此时我想我没有其它可以相送的纪念品，便从笔记本里抽出五块钱来塞到老汉的手里，关照他下一场赶场时，一定去场上买一件新衣服。

看来，相处以后，他们已对右派的敌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我的遭遇以及深藏我内心深处的苦水，他们至少会认为上级所交待的这个必须监管的坏人，其实是一个天真的学生。

回到界牌，原先丛林分到这儿的二十二个人重新会聚到一起，我和其它三名“同学”加上鲁召一共五个人，住在离公社食堂不到一百米远、一位叫王大娘的家里，她为我们五个人专门腾空了一个房间。

王大娘的独生子和媳妇都在公共食堂工作。界牌的公共食堂比赵家湾大了好几倍，炊事

员和喂猪的饲养员就有九人之多。在这里吃饭的是附近大约三百名农民和他们的子女。

食堂的旁边还附设了一个供烟、酒和小百货的小卖部。食堂的后面一排猪圈还可以圈养数百头生猪。不过，那时，圈里只关了二十多头猪，这些猪原先由各家分养，公社化以后又集中到这儿来的，这是些与赵凡家相似的尖嘴隆骨的架子猪。

不过，这几天沾了红苕不作定量的光，不仅供应食堂，每顿用大甄子抬出来，让社员吃饱了，好下地干活。还拨出一部份，用来摧肥那些饿得尖嘴隆骨的架子猪。但是粮食管理员却说，红苕也是有限的，眼看就要挖完后，社员们供应什么还没有决定，于是饲养员从几百头嗷嗷待食的猪里选了两头，另围圈圈养，准备过年杀了分给社员们过年。说也奇怪，另圈喂养的两头猪只喂了一个多月的红苕，便被摧成了两百多斤的肥猪。

公共食堂里上顿下顿的红苕，苦了几十个孩子，每顿吃饭时孩子们围着饭甄满甄的选，在红苕中挑选饭粒，三岁以下的儿童啼哭着要他们的母亲给他们饭吃。公社食堂每顿都是吵吵嚷嚷。

王大娘的媳妇刚刚分娩，奶水不够，想专门弄点米浆来喂孩子，公社粮食保管员却无可奈何的向她说："每人每天还是原来配给的二两黄谷，对于婴儿额外由公社每月配了二两白糖，人多嘴杂，怎么好在大伙的伙食中专门匀出米来，推米浆？"王大娘无奈，只好写了一个申请，她家里的四个大人只吃红苕，所配的黄谷专供孩子推米浆。

不料又引起其它社员的反对，集体去找到公社书记，要求把王大娘媳妇从食堂里解聘，参加大伙一起干活。为了一个新生婴儿，全家人都作出了牺牲，大人们另灶开了"无米"伙食！

第五节 界牌公社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户农家生活、聚会、"学习"的中心场所，悬挂在大梁上的两个麦克风，每到吃饭时就会播出南桐矿区的广播。学生时代，我们习惯了新闻传播的"单音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厌倦这广播中的重复、虚假和枯燥。其中言而失实，言而无信，言而欺骗的地方一天天多起来，反而逆向去思考，才会得到符合实际的真实结论。

而由新华社发出的正版头条新闻，对比我亲身经历农村之所见所闻：庄稼没有草长得茂盛，成熟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农民们饥饿潦倒，断炊绝食，水肿，死亡成了多巨大的反差？

例如 1958 年自河南省遂县，放出一个小麦亩产二千三百斤的社会主义高产"卫星"，而荣登全国第一个小春千斤县以后，全国各地不甘示弱，先后报出亩产四千斤，亩产四千五百斤和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来。

此时，已是大春结尾，报纸和广播像向赌场上押"注"一般火爆，经过一番哄抬，最终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的中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最高记录中标。

与此同时，除了粮食外，广播中相继报导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涉及棉花、油料、蔬菜和生猪等等；有亩产百万斤大白菜，以及重八千斤的生猪这样的"国家吉尼斯"记录。

这种向全国老百姓撒出的弥天大谎，除了给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提供依据；为搞得人民啼

饥号寒的农业打强心针外，还能有什么作用？难道毛泽东当时昏庸到不明真像，连“民以食为天”这种最简单的民生道理，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治国信民道理都不懂吗？

我到农村一年，每当听到“东方红”和“人民公社好”的广播，就会条件反射：那是向中国老百姓公然在说谎。

听不到真实的新闻，已是六亿央央大国的悲哀。而今天，当这些从广播中传出的声音，与真实的完全相反时，我们对共产党何止厌恶？

正当毛泽东批转山西洪赵县委《就实论虚》的报告，吹嘘小麦从此以后产量可以达到亩产 8.9 万斤的神话，是可以用冲天的干劲来实现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时，“一天等于二十年”就这样提出来了。

新时代的赵高“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之历史丑剧，正迎合他的独裁丑剧在全国公然上演。

可是，就在他的中南海里根据全国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和丰收喜报，津津乐道“粮食多了怎么办”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便降到六亿中国子民的头上。

（一）高产试验田

根据高产这个方针，界牌公社选定了一百亩小春高产试验田，按照公社干部计算，只要认真执行“精耕细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达到亩产五千斤水平，算下来比往年五千亩面积的小春播种总收成还要高。于是界牌的党委在国庆节以后，抽集了两百多号劳动力集中兵力打抢播小麦的“歼灭战”。

第一块试验田就选在公共食堂附近一块十亩的大田中。按照兵团指挥部的安排，包含了我们的二十名“右派”在内两百号劳动力，排成四个茬口，公社的干部，兵团的指挥官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三尺长的竹棍，监视着每一排的茬口，发现没有挖到三尺深必须重新返工。

那块田原是界牌最肥的冬水田，为了“深翻”，排了足足两个星期的水，肥泥的泥脚最深不会超过两尺，要把肥泥先挖上来，再将一尺的红谷子老底翻上来填在肥泥上才算标準。

这几乎同挖战壕没有什么区别，最初人们弄得一身的泥巴还不能达到深度。后来便摸索出经验，先将肥泥挖翻转，再将红谷子底土挖松成一些大块，丢下锄头，跳进像深沟般的茬口，将一块一块的红谷子扔到翻过来的肥泥上面，才算达到了深度。

原来的茬口，一上午还没有推进到三公尺远，我们便已经一身泥泞，一身汗水。手打起了血泡，腿疼得站起来直打哆嗦。

这难倒了那位女下放干部，她的个子小，跳下茬口那深沟里已齐到了她的腰，爬上来就更困难了。没到一个小时，便只好蹲在沟里不再爬起来，当她回过头去望那刚才挖过的“田”，竟是一条被自己踩成了像一条泥板样的“红带”。失声叫道：“这哪是种庄稼，简直是折磨人。”

大家听她的尖叫一齐掉过头来，撑着锄头，回头看了看挖过的地方，站在那里发呆，也

藉此喘气。站在田坎上监视挖田深度的头缠白布巾的“指挥官”走了过来，厉声吆喝着，要我们开动。

她自下乡以来一直心情不好，被人吆喝，自尊心承受不下，便同那白头巾顶起嘴来。全体同学哄笑不止，唯独只有一位同学没吭声，仍在不停的挥动着锄头，继续不停的挖。工地上发生的争吵，惊动了鲁召，他今天也是“指挥官”，看见她在同社里的干部吵架，走过来，叫走了她。

第一天的挖田除了中午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工间不到半小时的休息，一直到天色发黑才告收工。在迷迷糊糊的夜色中，看看一天下来劳动的“成果”，老农们摇着头叹息说：“这是那一个出的馊点子？今后种下去的麦子，往哪儿扎根？”

不过，我们已顾不得思考这试验田今后的庄稼生长和收获，回到食堂累得连红苕都不想吃，喝了一点菜汤，便粗略地洗淨满身的污泥。正想倒床睡觉，却被鲁召叫到食堂里，由他主持，就那位下放干部的言行，开了一个批判会。

论身份，轮不到我们这些划上右派的同学发言，可是其它三位下放干部却闷坐在那里不吭声，于是鲁召便叫当时继续挖土的同学发言。这位同学把自下乡以来这位女干部的一些牢骚话抖了出来。接收监督的右派，反过来批评起下放干部来，真是违反了规矩。

但细细想来，这种“反戈一击”的立功表现，不是一直被赞扬的么？平心自问：我们这十几名“右派”同学中，谁都是在政治上极端幼稚的受害者，哪一个不想摆脱这痛苦的处境，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书啊？

听到数落她的种种，我的心里无形之中产生了警惕，筑起一道防范之墙。同这些“右派”们交谈，可不是同大字不识的农民，说话得长一个心眼。

但是由于她的抗争，第二天对挖田的深度明显的减少了，只要把肥泥挖到见老底就够了，进度加快了。即使如此，二百多号人挖这十亩水田，耽误了整整八天。深挖以后紧接着就是碎土，打窝，下种，和盖肥。深翻过来的田面，早被挖土人自己踩成了一个连毛细孔都没的板块，碎土无从下手。

打窝工序又是指挥官严加控制的环节，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两根长短不等的小木棍，短的一寸长，像一根火柴，那是用来量窝距的，长的两寸长，那是用来量行距的。

亩产五千斤，纯粹是一棵麦穗的平均收获量乘上一亩地的窝数算出来的。所以窝子的尺寸仍是“保证”亩产五千斤的首要措施。谁说“疏秧密植”的首创人不懂科学？然而被踩平了的田面，用锄口挖，不管怎么小的力量，带上来的那片土，都不止两寸长。

好在，翻过来的田泥还来不及干硬，在柔软的泥面上，若用锄跟去“敲”，倒反而勉强符合规定的尺寸。不过那用锄跟“敲”出来的园窝子，虽然光滑，敲出的地方犹如蜂窝上密密麻麻的“洞”煞是好看，只是丢种子得小心，站直了身丢，那麦子非溅出来不可。其实，那么密的“窝”不等于撒是一样么？

要知道，这是北京的最高指示啊，至于我们，得了的教训，就连牢骚话也不敢公开的说了。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10 月，整整一年，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人祸，酝酿了这场饿死人数空前多的大灾难。

（二）王大爷

年三十晚上，两个树疙瘩在堂屋的地坑里燃起红红的火。王大娘的一家，儿子、娘俩和两个孩子，加上她的大哥，连同我们一共十一个人便围着“火炉”团起了年。

按中国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准备睡觉。王大爷的精神特别好。也许，今晚上这热闹的气氛打破了他长期独居的沉闷，看得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式农民，两杯白干下肚，便打开了话匣，叨叨不绝的讲他民国三十年后为地主帮长工十几年生活。

他说：“那时，我佃的是李老七的五亩田，两亩坡土，到了秋收，打完谷子，要交粮是真的，可是，你们知道吧，这儿富得很，天府之国你们清楚吗？”他抹了一下花白的胡须，像一个老教师在教一群孩子。“每年除干打净，七亩地也要收三千斤，除交了租子，再差的年份也要把堂屋里的谷囤子装满，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没得粮食吃的。”

王大娘向他直丢眼色，示意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但是被酒涨红了脸的王大爷没有理她，继续唠叨着：“一过中秋，我们就跟老七挑粮交佃，那老七也算仁义，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几坛子酒放在那里，他家开的酒厂，现在还在岩弯那里，你们知道一坛酒有多少吗？大坛六十斤，小坛三十斤。帮他家的佃户，见人一大坛。”

他又倒了一小杯酒，端了起来：“这儿过年，讲的是规矩，主人家挨家挨户，到佃客屋请酒，从三十晚直喝到初五。腊月初八杀年猪，哪一家都要把圈里的过年猪拖来宰了。年要过到十五，肉是吃腻了的，年年都要剩半边，熏来挂起。”他讲得十分的得意，一双长满了茧巴的大手不停的在空中比划。

鲁召已经喝得酒糟鼻发红了，他在那里听他讲，一言不发。长期生活在城市，对“解放前”的农村一无所知的我，从他那平凡的介绍中感到了新鲜。在我的印象中，他说的李老七，就是在 50 年我所看到的龙凤村斗地主时，被农民包围跪在煤炭渣上，双膝流血苦苦哀告的秀才了。这些人至今大多已死去，留下来的也是被民兵们严格管制，不敢说一句真话。当然，问题绝不在这些李老七如何，就像我们今天的遭遇一样。

夜渐渐深沉，王大爷也渐渐关上了他的话匣。孩子倒在他的怀里，在温暖的炉火前沉沉睡去。我却凝望着王大娘开始花白的头发出神，看上去她比我的母亲年长大约十岁。

我脑子里重新翻腾起这一年来传奇般的经历，隔离反省，扣右派，挨批斗，下乡；赵家父子烧苞谷；界牌的大兵团作战……

我体会到在这场巨变中，亿万农民的不幸和所陷的惨境，尤其是亲身经历了被报纸吹得天花乱坠的“卫星试验田”的内幕。这是当时在校园里，在宣传报导中无论如何都无法知道的。

就从这开始，我丢掉了少年天真的幻想。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怀疑人性会被暴力扭曲得令人无法看到希望。

第六节 丛林铁厂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从界牌农村回到丛林煤矿，第二次回到这里，第一景象是人流如海，热闹非凡。在那狭窄的丛林街旁，布满了临时搭起的蓬帐，里面挤住着从重庆、南桐各地调集来的“炼钢大军”。丛林地区政府的大礼堂面前，悬挂着一个硕大的木牌，上书：“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

大礼堂既是这里大炼钢铁的指挥中心，又是平时炼钢大军暂时的食堂。这儿的吃饭完全是“共产主义式”的，凡参加炼钢战役的“战士”，一律供给制。大甑子里的包谷面糙米饭可以随你自取，八个人凑满以后组成一桌，就可以到伙食团窗口领取一桌饭菜，仅此一点措施，就足以招揽那些城里吃着定量供应的居民们。

那路边街旁的帐篷里，挤着一家一家的妻儿老小，每两个家之间只用一张布单隔开。那里面，嘻笑哭闹，夫妇之间、母子之间、两家之间，纠纷不断，热闹非凡。

我们近一百号劳动力，暂时仍安住在丛林小学的教室里。小学已经完全停课，除了两个看守的老头，教职员工全部抽去建设丛林铁厂的“小高炉”。学校的孩子们当然只好回家，随父母一道去为“大跃进”献身了。

我们连下放干部在内的所有的人员到齐以后，王怀寿才召开了全体人员的大会，他简短总结了下乡十一个月来全体人员的改造成绩，着重讲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伟大意义。

他的讲话很平缓，好像是在背诵一篇熟读了数百遍的经文，使我们这些习惯这八股文的人感到乏味，更因为他所讲的除了中共那套谎言并无新鲜东西。

分别了九个月，他的党棍形象丝毫没有变，由于疲劳，我看见了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

“精神集中一点!”王怀寿吼道，那一排排打瞌睡的人被他的吼声惊醒，重新正起了腰板。

他环看了一下四周，继续用平淡的声音背诵下去：“今年是党中央部署的持续大跃进的第二年，也是决定大跃进总路线成败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在去年农业取得极大成绩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任务，为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跨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他的平声调，表明下乡这一年来他之所见所闻，冲淡了去年初来时的那一股冲劲。这可能算是一种进步。

经他这一讲，我们便明白了，把我们重新集中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全体人员仍按照原来的编制分成五个组，进行了一下午的讨论学习。

第二天，全体人员整队出发，去丛林铁厂炼钢指挥部的大礼堂，参加“丛林铁厂筹建大会暨大炼钢铁誓师动员大会。”

我在墙上读到了一条用绿纸写的十分耐人寻味的“小标语”，上面写道：“敞开肚皮吃饭，

鼓足干劲干活”。我想写这幅标语的人讲实际的味就很浓了，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标语才能鼓动到这儿来的市民们。

按老套式召开的这种大会，本就是过场。会上主持人宣布，七座小高炉，必须在五月底全部完工，六月开始炼钢。他讲了一大堆可以完成这个最低产量的理由。会场里乱哄哄的开起了小会，大家七言八语的全是妇道家常。

我们最初的任务是为丛林铁矿小高炉的建设筹集原材料。这是一些结构古怪的“小高炉”，可以容纳十个人踩动的踏板像农村中的水车一样的“鼓风机”，配套在每个小高炉旁。

当时我们实在没有兴趣关注这些“设备”，我们只顾着吃饭和完成交给的劳动，我们只望着尽早回到学校的一天。

分给我们这一百来号人的具体任务是，将那些从附近农村各地砍伐供“建筑”高炉用的“圆木”运抵高炉建设工地。开始时，早出晚归，没有固定的地点，只是跟在伐木者的身后，砍下就运走。

丛林地处山区，两山夹沟，山林茂密，农村里的宅院里，世代居住的农家，为了自己的环境和水土保持需要，素来有植树的习惯。种下的树木，就是缺柴也舍不得砍，祖辈相传形成了这儿茂密的树林，画出美丽村寨，成了农民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人民公社化以后，这些秀丽的山林虽然都充公社所有，现在为了奉献给丛林铁厂的建设和建筑高炉，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首显“优越性”，在炼钢指挥部的安排下，无条件的奉献了所有可供建炉的树木。

于是伐木者持着手令，对附近的农村施行了“三光政策”。唯有那些世代居住在这儿的老农，才敢对这种败坏祖业的行为表现出反感和心痛。每当这些老者请伐木者手下留情，不要对那些幼林下手而同伐木者发生冲突时，又必会招来炼钢指挥官们的痛斥，扣上破坏大炼钢铁的帽子。

一片二十亩才长成酒杯那么粗的幼林，在被砍伐时，被守林人阻拦，他痛斥指挥伐木的人：“这简直是破坏，简直是造孽。”他当下便被民兵抓走。农民们看到有例在前，谁敢抗拒？

就这样，不到三个月，丛林周围竹木成林、风景如画的山村便成了光秃秃一片。在田坎上，在山坡上，在平时绿茵葱茏的行道边，留下了一个个树椿，那些原本就荒芜的人民公社田野更显得荒凉。

丛林地处山区，从此以后，每到夏季，山上的洪水暴发时，便无阻挡的直泻而下，肆虐美丽的长江，冲刷着中下流的沿江各大城市。

遗憾的是，当二十八年后，江泽民向抗洪救灾中牺牲的民工默哀致敬时，却不敢去清算毛泽东当年给中华民族欠下的这笔孽债。

附近的山林砍完后，砍伐队到远处寻木头，最远的是距丛林足有二十里地的白果山区，这些坑木最小的也有 20 厘米的直径，每根最轻的也有三十来公斤。抱着一根木头，还不知怎

样往肩上放。我们运坑木的规定每天必须跑两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被鲁召吹响的哨声追起，手里拿了馒头，手执绳索和助杵，匆匆上路。

这么大的坑木对于从未用肩来扛的人，真像第一次背十字架，垫肩往往挤到一边隔不着肉。几次换肩便把颈项和背部肩上到处擦破，鲜血斑斑，疼痛钻心，可算是下乡劳改以来最苦的“活”。我们白天一身污泥，常在路边沟旁，因重心掌握不好而跌倒，遍体鳞伤。

回到住处，连脚也不洗，忙着给伤处擦一点红药水，碘酒之类，倒在铺上便呼呼大睡，即使翻身伤痛而惊醒又马上睡去。遇到雨天，行走在陡峭路滑的山间小路，踩在碎石路面上，稍一不慎便要滑倒。

有时，一跤摔下，坑木便猛然压在身上，人和坑木一起往下滚，身上被那锋利的石块划伤，血肉模糊。喘喘气，平息以后还要忍着创痛，踉踉跄跄的扛着那带血的圆木往回赶。唉！干吗要我还存着复学的念头呢？有了这个幻想，拼了性命也不在乎。

（一）草脚码

有一天，当我刚上山，便起了大雾，山上顿时四处茫茫，阴风四起，这是要下雨了。气温突然下降，我却只穿了件夹衣，肩上除了一个护肩什么也没有，冷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心里突然很慌，嘴唇发紫，心里明白，这是高山反应，连忙走进了山腰的一户农家暂避。

白果山区的老百姓，常年不断地在堂屋地坑里燃着树疙瘩，我穿着破夹衣和破胶鞋，那单薄的裤子上还沾着一血迹，自忖一定比乞丐还狼狈。

走进大门，怯生生望着那火红的地灶。那旁边正坐着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大娘。从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面容判断，大约都上了七十多岁，平时路过已很面熟。老俩口见我进去，老大爷从旁边拿了一张长凳，面对着火炉，叫我坐下。

那火炉送过来的一股暖流，使我瑟瑟作抖的身子镇定下来。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将双脚伸向火边。

老汉注视我裤子上沾着的血迹和脚上的破胶鞋，片刻以后，便叫我把裤脚管卷起来。脱下鞋，双脚上被石片划破的伤口在火光映照下，已现出紫色。他回身里屋，取出些捣碎的草药，又去灶房取了一瓢泉水，为我轻轻洗去血痂，在伤口上敷上他调制的草药，用一块白布替我包好。

我联想在赵凡家落户时，那赵老汉也是用自采草药疗伤的，心里好奇，想问这草药是什么草，但没有开口。

那老奶奶却从地上拣起我穿的那双破胶鞋，叹了口气，进里屋去取了一双草鞋出来，告诉我这是她老伴平时闲下来编织的，叫我穿上后，指着那破胶鞋说：“这哪能穿呢？扔了吧。”

尽管毛泽东天天在摧毁中国礼教的仁慈、宽爱，把人和人变成了除厮杀和仇恨外，什么也没有的野兽。但今天，两个老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植根于人性之上的仁爱，永远不会被暴虐的政治所泯灭。

我将要离开时，老汉走出门外，拣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绳，然后把挫好的草绳，套在脚跟上挠结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脚板上，护定我的脚跟踝骨，踏下脚觉得挺轻快。他告诉我：“这叫脚码子，山里人是从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随便在那个草树上，挽上这脚码，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穿上了老奶奶送给我的那双草鞋，站起身来，深深向二老鞠了一躬。走出茅舍，回头用心记下了这儿的位置。从此以后，我每经过都常来这儿歇脚，我真想知道他们何以单独的住在这荒山野岭中。

三个月后，当小高炉相继在丛林小学山背后山梁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也是全国粮食告急之时。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无法再维持下去，所有从城里来的居民陆续地遣送回各自的城镇。丛林街道上的蓬帐一天天减少，留在马路边的是一些破衣烂裳，竺林沟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清静。

丛林铁厂的伙食团也已落成，从大礼堂搬到了紧靠马路的一幢平房中，所有丛林铁厂的职工重新按照定量吃饭，八人一桌。自取米饭的共产主义生活，仅维持了三个月。

八人一桌取消后，铁矿的工人按自己的粮食定量和经济能力，买回所需的饭菜票。对我们这七十名右派，剥夺了购买菜饭票的权力，每个人的菜饭一律按定量发给了我们。这种定量对我们这些运送圆木的小伙子勒紧了喉管，超负荷的劳动本已难以承受，再加上腹中饥肠辘辘，怎么完成规定的任务？

记得以往早上，我出发时都要揣四个馒头上路。现在按定量，只能拿两个，还没来得及在白果山头打转身，肚子里的两个馒头便下了肚家坝。开头几天还忍着，不几天，饥饿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困扰，我们脑子里成天都在打吃的主意。

开始，我们还用乞讨的办法，每次晚上等打饭的人都走以后，等到结尾时，走到取菜的窗前乞求炊事员，把剩下的菜多给我刮一点。但碰上菜全打完时，便只好饿一顿。

有一天，伙食团长嚷道，发现有人把饭票的数额私自窜改了。我明白，这多半是我们这几十个苦孩子干的事，便想也学着干。

晚上天色已黑，灯光昏暗，上夜班和下班的人正多，瞅准炊事员正忙碌的机会，便把事先一张一斤的票额改成十斤的饭票，塞进了窗口，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

只见那炊事员正要找补，却不料那伙食团长走了过来，抓起刚才塞进来的饭票逐一辩认，恰好，我就碰在了钉子上了，当场被抓了一个现场。自尊心对我们已经很淡，当场的难堪还算不了什么，倒是偷鸡不着倒蚀了一把米，那一斤饭票被没收了。

晚上鲁召又召集了小组会，雷尧黑着脸数落我平时对食不裹腹的牢骚话，提上抗拒改造的纲上。这下子辛辛苦苦一年累下来返校求学的希望，被这件事影响了，心中着实懊悔了一夜。最后打定主意，勒紧裤带，苦熬下去，等到过年以后，看看能否重新返校吧。

然而饥饿毫不留情地折磨着我们，尤其是大肚皮江远，他竟在半个月内吃掉了发给他一

个月的饭菜票，剩下半个月只有吊粉肠了。王怀寿看到他一派无奈，对他采取了特殊“照顾”，每天只发给他当天的饭菜票。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运送木料经过途中，满山遍坡的包谷红苕地里。那时，包谷已挂了黑须，红苕也结出疙瘩。然而这些诱人的庄稼，却又偏偏集中在沿途都有农家的山沟底下。

天晴时日，一目可穷数里，白日行窃，极易被社员捉获。夜间打扒又无法赶回住地，便瞄准阴雨晦暗的时候，看准了农家稀少的地带，无人时，便连忙把包谷、红苕连泥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慌慌张张赶到半山上的伙食团，趁人不备，便将这些猎物埋在那里的炉膛下面。

等到捞坑木一趟打得转身，又偷偷地去那里取出烧得香喷喷的“加班粮”。但这样作案，所遇风险极大，不是被民兵截获，就是埋在灶膛下的东西被他人扒走，一无所获。

渐渐的，大家也将发给我们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凑集起来，去向那伙食团长“分”出些胡豆、包谷之类的东西，就地添了从地里所得的新鲜货，可以勉强吃饱一顿。

然而，无论复学的诱惑力有多大，“右派”们所承受的压迫有多沉，饥饿和内心的冤屈，加上下乡以来对共产党政策之所见所闻，都会产生巨大的反抗力，这种在我们心中增长的反抗，便陆续暴发出来。

面对这种不堪忍受的役使和饥饿，想逃亡的岂止一人？成天同右派们生活在一起的下放干部，对这些蛛丝马迹有了查觉，这正是这些干部起作用的时候了。他们专门开了会，对这七十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防范，去上山伐木的小组，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下放干部跟着，来去要求集体行动。

（二）叛国投敌集团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白果山已无法上去，王怀寿决定扎雨班，同时派了四个人把邮件和报纸从南坪取回来。上午十点钟左右，值班人发现临时保管室的门关着，听见派去南坪的四个人正小声说话，侧耳听到说话的人杨治邦。是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此时他正低声说道：“从这里到綦江再到贵阳，由贵阳再到昆明通公路，可以搭乘汽车出国境到河口或西双版纳……”

据下放干部查他的档案，他在解放前，在昆明当过国民党宪兵。

四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去边境方向的路，这引起了神经敏感的王怀寿怀疑：四人讨论附近的交通，一定是想从边境逃往国外。既然如此，便要挠开他们的嘴，让他们招供出来。

他施展出反右派时整右派材料的贯伎，先对其中最薄弱的人下手。四个人中，除杨治邦外，其余三人都是刚刚进大学，年龄比我还小的毛娃子，而其中陈国喜出身富农家庭，最为无知，也最自私，是我们中意志最软弱的一个。

午饭之后，王怀寿将陈国喜喊进了下放干部办公室，经过一下午的审讯，陈国喜被单独隔离反省，其余三人都派专人跟踪，禁止他们相互交谈以防订立攻守同盟。接连两天，在威逼利诱下，陈国喜终于按王怀寿的意图，交待出第一起投敌叛国集团。据陈国喜招供，这个集团以杨治邦为首。

在那个年代，只要有思想，就算有了犯罪的根据，何况成员有了交谈。中共发明的这种罪名名字叫思想罪。

十天以后，重大的一百号人在升旗台前集合。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升旗台旁，那形势够紧张的，一个姓陈的南桐矿区派出所警察，站在升旗台上宣读了南桐矿区公安局的拘捕令，并以“组织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罪，逮捕杨治邦、毛贯益和李天德。同时对陈国喜则以悔改立功，免于起诉。

接着，三个人就在五名警察的喝斥声中戴上了手铐，押上了停在丛林小学门口的吉普警车。

从此以后我们格外小心的管着自己的嘴巴，同时也防范着周围的人。处在相同命运之中的这些伙伴并不齐心，有些人可出卖他人。

正好在这个时候，小高炉炼出来的铁，送到炼钢厂去被统统地被打了回来，化验结果证明，它所含的杂质和有害的成份，超过合格铸铁的数倍，是一种无法冶炼，也无法使用的废铁砣。

指挥部傻了眼，连忙分析，当然首先怪那座古怪的土高炉炉温不足，排渣困难，风力不足，燃烧不完全，罗织了一大堆原因。但那“土高炉”是上级指定这么干的，再错也不能直言。

就像种的试验田，乃“元首”处方，谁敢不照办？荒了庄稼，误了农时，谁负得起卜二一这大责？然而，铁还得继续炼下去，高炉也不可能马上丢掉，今年的十万吨钢材还要如期完成。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如何提高进炉原材料的质量，那铁矿本就在丛林背山的山顶上，采样化验证明，那绝对是富铁矿。

就只有焦碳是就地从丛林煤矿挖出的煤，经炼焦炉炼出来的，含硫，磷较多，所以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提高焦碳的质量，建立一条洗煤的设备。指挥部把这个设计并建设洗炼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王怀寿这些天正在担心，杨治邦案虽稀里糊途以叛国投敌罪宣判了，但，事情本身却在向他提出警告。等待时机逃亡的人说不准有多少？他心中非常明白，在这些年轻的学生中，仅靠“复学”这一点吸引力，正在被高强度的劳动和短缺的口粮抵消。

如果在这时万一发生集体的逃逸，他王怀寿也很难担待这个责任。去白果山扛坑木一直是令他最耽心的事，那无异于给想脚板擦油的人创造了便利溜走的机会，所以趁洗炼煤厂即将兴建，便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所管的重大全体人员，集中到洗炼场当泥水匠。

丛林铁厂新修的库房，暂作了我们七十多人集中的宿舍。

当铁厂职工恢复口粮定量的同时，农村中也恢复了每人每天黄谷四两的旧制。那时，在我们刚刚搬去的住地，每天可以看到一个提着瓦罐，从集体食堂进出的老人，听说，这是一位丛林公社的“五保户”。

有一天，出于好奇，我拦住了老人，请他让我看看他们每顿吃的什么？他将他手中提着

的瓦罐。战战兢兢地递给了我。我打开盖子向里一看，那里面是一罐照得清人影的黑汤汤。便用他手里的筷子去一搅，便看到搅起来的，是一些牛皮菜和从红苕滕上勒下来的红苕叶子。

此时那老人眯缝着水肿的眼皮，喃喃地问我："这年头，三晴两雨的好天时啊，地里的庄稼，本该好收成啊，咋个弄得来连饭都没得吃了？"

我们同丛林公社的农民，又一次为粮食、钢铁"大丰收"，交融到一起，没日没夜地打疲劳战。所不同的是农民们除了白天为秋收秋种忙碌一天，晚上还要打着松明子挑着萝兜为铁厂运矿，妇女、孩子们在公社指定地方，去砸碎那些堆在马路上的矿石，另一些劳动力还要在晚上下田收割未收回的谷稻。而我们白天当泥水匠，晚上则同他们一起蹲到水田里割谷子，或者在收打包谷的晒场上捶打已经晒干的包谷。

唯一能刺激我们日夜加班的，就是晚上超过十二点以后，农民可以在集体食堂里领到三两粮的罐罐加班饭，而我们则可以在铁厂的伙食团吃到三两粮的馒头或三两面条。我们实际上已同当地的农民，成了共渡难关的难友了。

农民们吃过夜班饭"歇稍"，重新回到工地上或水田里，但除非有书记亲临坐阵，下半夜以后，无论在挑矿石的工地，还是在晒场上都是静悄悄的。

倘如有人去收割的稻田里看一下，那儿一片漆黑，侧耳听去便在一片蛙鸣声中夹杂着人的鼾声。如果拨开稻杆，去寻隐藏在深处的挞斗里，就会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社员，横七竖八的睡在里面。

第二天公社的广播喇叭里，照例播放前一天晚上，社员们如何响应大跃进号召，不分白日黑夜加班抢运抢收的"动人"事迹，以及谁也不会相信的关于高产卫星之类的丰收"喜讯"。

（三）运铁矿的玩命活

洗炼场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我们这支劳动突击队接受了运送铁矿石的任务，转战在通往炼铁厂的马路上。沿着丛林西北面的山崖，一条四米宽的公路蜿延着向上，那上面是著名的海孔农场，山顶的右方，隔着一道万丈深壑的陡峭绝壁上，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山洞，隐藏在山峦奇峰之下。山洞的后面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据说这便是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依凭着这个天堑，靠它上面的奇峰掩蔽驻守的地方。

马路左侧相距两里距离，在那山洞略低的地方，便是今天正在采掘供丛林铁厂的小铁矿。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工棚里，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带职的工人，也有才开始学的农民，他们用镐头挖掘，再推着矿车，将矿石运到铁轨尽头一个露天矿石场上堆放着，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堆放着的矿石，运回丛林铁厂的高炉旁。

我们将人分成两组，一组将矿石从采矿场挑到马路边，另一组从马路边将矿石一车一车的运达小高炉边，配置给我们的工具是箩筐，扁担和三人一部的人力木板车。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卡死的，必须保证小高炉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供应。

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还增派了重庆市财税系统的二十多个人，加入我们之中。经过分

解和计算，每一个人挑矿石的重量，和人力木板车每车的重量都有定额规定，完不成任务是不准收工的。

我被分配在人力车大组。我们这架人力木板车上还有江远和袁如。袁如身材微胖，是一个口才利索，性格开朗，处世大胆而又精明过人的女孩。饥饿的折磨对她并不是一件难以克服的事，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无人得知。

拉车运矿，重车上坡是最吃力的，重车下陡坡又是最危险的。为了完成每天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车都必须满装满载，从车胎压下的弹性变形估计每一车都不会少于一千斤，好在去海孔铁矿上坡的路是空车。运回矿石基本上一路下坡，只有在抵达小高炉才有一段大约五十米的缓上坡路。

三个人驾车，上坡时驾辕的中杠必须掌好车把，肩上勒紧套绳，拉长颈项，埋头用力的跨着碎步，呼着号子，以便让两边的“飞蛾”按号子的节拍，保持三个人步调和用力一致，将板板车一点一点向那山头上拉，到了装矿石的地方。连汗水都没有擦净，便赶紧装上满满一车矿石马上离开。

重车下坡，中杠又必须死死的用两臂抬着车杠，以保证车尾下部的刹车着地刹着下行，两边的飞蛾要死死的拽着僵绳，控制着车速，以免冲刹失控发生惨祸。就这样晴天顶着骄阳，下雨迎着狂风，起早贪黑，完成交给的任务。

我们三人中因为江远的个头最大，他担负的中杠次数也最多。因为有袁如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常常冲淡着劳累和苦闷。

有一次江远对袁如说道：“我们这个车啊，天天在演骆驼祥子。”“怎么讲”？我问。“我演祥子，袁如就扮演虎妞，怎么样？”江远挑衅道。

袁如毫不示弱回敬道：“那我就不拉车了，你养得活我吧？”停顿片刻她接着说：“老实告诉你，虎妞喝的燕窝人参汤，穿的绸缎绫罗，祥子喝的五加皮，吃的涮羊肉，你江远怕是看都没看过，想都不敢想呢。”这话里尖酸刻薄，带着刺，谁叫江远得意忘形。

我想倘如老舍见到我们这样子，那么他必会摇头叹息：“怎么了？中国的大学生，就是这般的苦力么？待我有机会也写上一本‘丛林沟’来。”

他今天若在这里目睹没命飞奔的人力车，恐怕会叹息，小说中描写的旧北京底层人物，竟让今日的大学生们羡慕不已，因此要停止骆驼祥子的出版了。可惜文革中他跳了昆明湖，这就是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然而，江远用手捂着嘴巴，意思说打住，说话出格，会惹祸的。

“嘿唷！嘿唷！”山谷里回荡着沉重的号子声，汗水顺着脚弯洒在烈日烤得烫脚的马路上。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拉着空车跑第二趟的时候，刚刚拉进一个山弯的僻静处，江远把车停下来，对我说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到山边方便方便，说着便朝路边草丛里走去。我和袁如把车停隐在那里等他，等了好久，后面的车都过去了几趟，还不见江远露面，袁

如着急起来，咕噜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该怎么办？”

那草丛还不到十米远，我顺着那个方向找去，走到崖边向下看，下面是一个只有宽两米的土坎，种着红苕，只见江远正用随车带的一个铁铲，紧张在挖，边挖边用手抹去还没长成熟的红苕带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一切我都明白了，江远是挖红苕的老手，从白果运坑木开始，全仗着公社地里的红苕解了他不少困难。

此时相对审视，下乡一年多，我们己面带菜色，毫无年轻人的朝气了。

运送矿石的那一段日子，经常晚上做梦，梦到我们所驾板板车正从那山上腾空飞下。马路边写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牌，一刹那变成了一些巨大的石碑，突然一声巨响，那石碑群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紧跟着我们的板车向我们倒下来。

我们无论如何的飞奔也无法躲避，最后那些标语像咒语般的悬在空中，发出一片魔鬼般的怪叫，在一片天昏地暗后，我们的板板车被这塌下来的巨碑压在底下!。

奇怪的是，那板板车像一块钢铁一样硬撑着这堆石碑，使我们能存生于它垫起来的逢隙之下，免了一场“肉饼”之灾。当我们从那夹缝中战战兢兢钻出来，却看见那王怀寿不知什么时候，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站在我们面前，吼道：“算你们的命大!”

真的，我们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紧紧地攥在自己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真的，从回到丛林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便开始了新的灾难。

王怀寿心里十分明白，他所管的几十个人中，已经渐渐觉悟到自己的处境，他们已对学校复学的诱惑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诺言产生了怀疑。杨治邦案已经给了他第一次信号，现在，难免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虽然他每天牢牢控制着像雷尧、王山这一类迷信极强的学生，试图把握着每一个人。他明白，现在要凭学校反右那一套办法，恐怕难以控制这些被生活一步一步逼向反抗的年轻人了。

（四）迷魂的“摘帽”

第二天，王怀寿一脸严肃向大家宣布了一椿令所有人振奋的特大好消息：国庆节前由金校长亲自率领的工作组，将来丛林检查一年半以来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将根据在座的人所表现的好坏，考虑给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填写右派份子劳动考查期间鉴定表。说着便将手中的一叠表格发给了大家。

这个消息对在场的人确是一剂强力的兴奋剂。人们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然而大家的担忧远远多于乐观。

王怀寿宣布完这个消息后，是自由发言，雷尧滔滔不绝地叙述自下乡以来的一年半中，学校党委根据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我们这七十多人“给政策，给出路”的伟大改造方针，王书记如何长期耐心的对我们进行挽救和教育。

听他的吹捧，大家心中虽十分反感，但出自雷尧口中已练成一经，不会产生任何的肉麻和语塞。

国庆节前，丛林煤矿的周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丛林沟非常认真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区委办公大楼已经张灯结彩，两边巨幅的标语像镇慑小鬼的鬼符贴了满街。

为了迎接重庆大学的“下放干部慰问团”即将来到丛林检查一年多以来的“改造”工作，王怀寿亲自督阵，将我们的住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会议室，布置了“改造专刊”，久违的节日气氛又隐隐的来到我们之中。他还亲自检查了每个人的衣着，督促大家拿出了最体面的衣服换上。

王怀寿一大早就到丛林沟的进口处，恭候下放干部慰问团的专车，一直到中午才将慰问团接到我们的驻地。当显得苍老的金付校长站在升旗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慰问”讲话时，我们才注意到了，经过这一年半以后，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因为什么原因，原来的二十几名下放干部，只剩下几个人了。

在场的主体几乎就是我们这几十个“极右”份子了，那场面和气氛似乎是专门为我们而安排的。作为实际上的主体，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母校向我们伸过来的手。我看到杨家铭同学眼眶里包着一片泪花，感到一股被抛弃的弃儿又被捡起的那种悲凉。

晚上，和第二天整天，我们便分组的在铁厂的那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了“改造一年半以来的心得座谈会。”我们这些弃儿暂时忘却了这一年多以来所受到的痛苦和目睹的种种荒唐事。大家浸沉在复学的迷梦之中。

第二天晚上随慰问团同来丛林的学校文艺组，在丛林小学的升旗台上演出了他们带来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被三面红旗的框框束缚，成了干巴巴毫无艺术味的说教，慰问团的每一个人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年多来经历着多少痛楚和磨难。

第三天一早，慰问团返校，他们带走了那一大卷这儿的弃儿们精心琢磨写出来的“右派劳动考查调查鉴定表。”

（五）夺命练焦场

国庆节过后，不知道是出于王怀寿进一步收缩监视圈，以加强管理，还是出自丛林煤矿的某一管理人员的建议，我们全体“右派”集中到炼焦场从事专门的出焦劳动。

丛林煤矿出煤洞口的前方，一大片开阔地上排布着一群状如铁锅似的“土炼焦炉”，这是几百年来所沿用的最古老，最落后的手工炼焦法。

在像锅底般的炉膛上面，架铺好一层层的木材后，再从洗炼场运来的洗净的原煤，一层层地铺垫在它的上面，每一层之间用一排碗口大小的圆木造好“通气孔”，煤层堆好以后，像一个倒置的窝头状土丘，周围再糊上一层稀泥覆盖严实后，从炉底生火。经过十来天的焙烧，这玩意便成了一炉用来炼铁的焦碳，再将底部的炉膛封闭，断绝空气，炉膛上便“焖成”一炉焦炭，等到熄火后，再用冷水从炉顶灌下，使火红的焦碳冷却，剥开最外层的“球壳”，将出

炉的焦碳捣碎取出。

这是小煤矿中最脏、最累、也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所以，煤矿工人宁可甘冒瓦斯爆炸的杀生之险，也不愿从井下抽上地面来干这种活。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无条件服从调派的监督劳动力，是不会考虑我们没有经过培训，没有防毒用品，也没有经验的一群苦孩子的生命和安全的。

没有人指导我们该怎么干，发给我们的是每人一根钢钎，一条竹杆铁爪子和两只口罩。规定我们每炉六个人，一天必须将一炉炼好的焦碳全部出净。我们一早杠着钢钎，铁爪上到炼焦炉前。当我们打开已烧成黄白色的泥层“球壳”时，已感到灼热逼人。

用了好大的劲从四个方向凿开那“焦球”，炉心中暗红的火焰，便从凿开的缝中辐射出灼人的气浪，直扑我们而来。那气浪中，夹杂着燃烧的硫化物所释放的黄褐色有毒煤气，立即使我们感到窒息和昏弦。

我们被这股股毒气，逼到炉沿无法再往后退的地方，只好背过身来，脸朝着外面直喘气。

有人想到了水，便跳下炉沿的土坎，找到一个铁桶，提来满满一桶水，朝着炉心中最红的地方泼去。然而这才叫杯水车薪，从泼进水的地方，回卷起一股夹着煤气的白色气浪，猛烈反射回来，差一点没把他击倒，而那炉心处只稍稍地暗了一下。

此时六个人已经脸红耳赤，身上的汗水早已被那不断袭来的热浪蒸发得干干的。只感到皮肤被灼伤的疼痛和呼吸的困难。六个人只好从炉上暂时退却下来，相顾对视彼此的口罩，早已被那热浪卷起的黑灰糊上了一层厚厚的“壳”。脸上除了看到眼珠还在转动外，其它的地方也已成了灰红一片。喉里便觉得被堵上了什么，干咳着吐出来的便是黑色的痰。

刘汉光直摇着头，喃喃地嘀咕道：“没想到，这工作竟这么恼火，这样干怕要作牺牲的准备了。”可是，休息还不到二十分钟，大气还没有喘过来，那雷尧却在附近的炼焦炉上向这边喊道：“今天要出完啊，不出完是不准回去的啊。”刘汉光做了一个不肖的鬼脸，骂道：“假积极，催命鬼。”

我们只好重新站回到炉边，灼热的气浪似乎退了一点，便挥动手中的铁钎，向着那焦碳猛砸，将它们捣碎成水桶那么大的碎块，然后，执着长铁钩，冒着不停地向我们扑来的热浪和令人窒息的煤气，一块一块地把它们勾上岸来。

倘如碰到那大块的焦碳，一个人往往无可奈何，便两人协力去钩，倘如不留神其中的一个铁爪子滑脱，那么那人便可能向后抑跌，跌下高高的炉坎，轻则伤及皮肉，重则跌断手脚。而没有滑脱铁爪的那个人，如果不赶快甩掉手中的铁爪，便会被那沉重的焦块连人带钩拖下炉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掉进那火炉中犹如葬身火海，难保性命。

突然间听见有人发出惊叫声，他是我们中个头最小体重最轻，因而也是体质最弱的一个，我们连忙侧头去看他发生了什么？只见他正在那里很吃力地伸着腰，脚上穿穿跌跌，手也不停地在空上乱舞，好像在反抗一股看不见的，正将他向炉中吸进去的力量。

我们便丢下手中的工具连忙将他抓住，并将他拖到距离炉边十米远的潮湿的地下躺下。

只见他双目紧闭，口里不断地吐着白泡沫，原先红灰色的脸变成了青色，不停地喊道：“水、水、我要水。”

这一天，当黄昏降临，我们这一炉焦碳才出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是更深的下层。加上天已黑了，就是加班今天是无论如何都完不成任务了。看焦场之外丛林场口，昏黄的灯光，已爬上了路灯的灯架，抬头望着银灰色的天空，上弦月已在空中露脸，星星点点的星光也同我们一样摇摇晃晃。

我们心里发慌，又累又渴，满身的毛细孔已被焦碳的灰尘粉末堵死，除了眼睛还能吃力的眨动，一身像被捆住一般，也罢，休息一下再作计议。

唯独邻近雷尧的炉子上，传来了“捷报”，他们正在最后的打扫炉底，第一个胜利的完成任务了。

我们炉上的五个人在夜色中暗自吃惊，实在佩服那雷尧的亡命干劲，看来不完成任务还真的要受到严厉的呵责了。那理由是难以辩解的：“为什么雷尧那一组能完成，你们这一组只完成一半？”

但是，我们已顾不上那么多，且回去吃了饭，休息一下再作计议。早上同来的六个人此时只剩下五个。拖着沉重的脚往回走，走出炼焦场的出口一百米以外，我猛然回头向焦场望去，炼焦场在夜色中呈现火红一片，各个炼焦炉都争着从那些烽窝状的出气孔中，将数尺长的火舌喷向夜空，交织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白天所看不清楚的，难怪身临焦炉之上便感到灼热烧身，煞似西游记里的唐僧过火焰山，可惜肉眼凡胎的我们，却要从那火烫的炉中取出焦碳来，这不是在火中取栗一般么？

到了食堂，第一个动作便是取过脸盆去盥洗间洗脸，先让自己从煤灰的捆梆下解脱出来，用力擤鼻涕，擤出来的全是黑糊的炭粉。耳朵里也塞满这些东西，两盆水洗下来，水己是黑色的，解下来的口罩还不敢洗，晚上加班还要用。用力的将灰拍掉，留下口腔处一圈黑黑的印圈，来不及去想，吸进肺里，吞下肚里究竟有多少污物？干这种活真像被夺命一般。

藉着取饭菜的机会，打听昏倒在焦炉上那位的情况，说他在医务室，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肚子里虽然很饿，却更感到口渴。狠狠地灌下一大盅开水，胃液便被冲得淡淡的，面对着饭菜却不想吃，我呆呆的坐在那里发愣，大家也呆呆地坐在那里，平时的话匣子今天关闭了。

上阵第一天，彼此都对这火中取栗的活感到害怕。想到雷尧那个组已经完成任务，那王书记说什么也要逼我们去加班。又听见刘汉光在那里的咒骂声，吃过晚饭五个人蹒跚着重新回到工地。

“大跃进”以来，白天黑夜，连续的守着工地已成了习惯，不管其效果如何。官话曰：“昼夜加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是病倒了，死也要死在工地哇。好在炉温暖和，虽已十一月的冬天，穿着件夹衣蒙头大睡也不觉得冷。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在那一夜里守着这炉要命的焦碳，磨蹭了整整一夜。

白天出完了焦碳，晚上还必须全体加班，去空出的焦炉上运煤炭“造炉”。任务虽调整，出焦的劳动仍是一个难以胜任的工作。即便是炉子完全熄火，打开以后，那一股带着浓烈煤气的灼热气流，令人窒息。

为了完成任务，白天几乎不敢休息，付出大量汗水以后，胃口极差；下班后，煤灰依然塞满了我们每个人的七窍，堵死全身的毛细孔。尤其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完成那心惊胆战的造炉任务。

从洗炼厂运到炼焦场的煤炭，像一座长长的小山脉，堆放在炼焦场出口处的前方。从那里到小焦炉群，最近的大约三十米，最远的足有一百五十米。每一炼焦炉的炉面都高出地面两米左右，用长跳板搭在上面，以沟通地面和炉子之间的高差。

两个人从堆放煤炭的地方满满装上一筐煤，然后抬着这上百斤的重量绕过高低不平的场坝，最后还要踩着那跳板摇摇晃晃地登上炉顶，将煤炭倒进炉膛才算完成了一趟。对于容量五吨的小煤焦炉，足足要抬一百箩才够一炉。

两个已在白天出焦时耗尽了体力的年青人，抬着满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炼焦场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前进，稍不留神，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倒，那么两个人就会连带那满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轻也要擦破表皮，跌伤韧带。

脚上已经因疲劳缺乏稳力，加上光线暗淡，跳板摇晃从高的跳板上跌下来可就不好玩了。如果人跌伤后，随之坠下的那一箩煤正好又压在受伤人的身上，那么其后果就更惨了，那是有性命之虞的事。

偏偏为了增加“大跃进”的气氛，每到晚上，煤窑出口处的高音喇叭便不停的发出鼓杂讯。

进行曲刚刚停，便是一阵阵催命似的喊叫：“五号炉已快装完了，其余各炉加油！”“八号炉怎么掉这么远，赶快跟上”之类的吼叫喊个没完。

我同刘汉光对抬，他在扛绳的位置上要小心眼儿，虽然我们争执着，但也不停地提醒对方，大家都已十分困乏，加上漆黑的路又被耀眼的炉火晃花了眼睛，跌倒是常有的事。每次跌倒，他都要朝着喇叭的方向诅咒道：“夜班饭吃了不消化是不是？有本事你来试试。”

晚上过了十二点以后，整个的脑子便会不由自主的停顿了指挥，脚上往往不听招呼的直打“醉拳”。抬着沉甸甸的煤，有时两个人会突然的停下步来，我有几次在后面听到抬着杠，他清晰可辨的鼾声，便索性叫醒他，两人干脆就倒在炉旁呼呼大睡，直到被人从梦中踢醒。

这就是狂噪的“持续第二年大跃进”的最后时刻，我们就是担负着这种有毒的，高强度，高度体力消耗，也是高度危险的劳役渡过了 1959 年最后的两个月。

幸好，托老天保佑，这种带着生命危险的劳动也仅仅只有两个月，就在这两个月中，几乎人人身上都挂了彩，明显呈现中毒的人数占了一半。万幸的是，还没有发生手足致残，中毒丧命的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们这六十余人难保不会有捐躯丛林的悲剧发生。

第二年即 1960 年春天，留在丛林的六十余名同学和两位老师，集中到广元坝农场，在广元坝农场，学校分别为三十几名同学摘了帽，并回到重大，算圆了他们复学梦。

不过，这两年的监督劳动倒真使他们成熟不少，原先对共产党的迷信，终于在所见所闻中矫正过来。只是迫于压力和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虑，而把这些所见所闻暂时的隐瞒在心底里。

他们虽然复学了，却永远留着“磨难的烙印”。在以后不断地揪动阶级斗争和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依然是“运动员”。

挨批斗，入学习班，游街，从来没有断过。其中因承受不了这种侮辱而自杀的就有好几位。

例如 1959 年第一个被活活踢死的颜亨楷，那时我们刚下农村，分散在农家，大家又互不通气，直到后来才知道，其经过的情节至今都不清楚。

1960 年因无法忍受非人虐待。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尹安民，便是我进了南桐看守所后发生的事。

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仍为坚持其一党专制，而隐瞒这段悲惨的历史，将它轻描淡写为“极左”思潮的危害。

而我们这一代可悲的受害者，仍慑于专制主义的淫威，还不敢公开揭开这一页。

不过，我们终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这一页，面对着这段历史史实。我们中当年受残害的人将以毛泽东罪恶的见证人，等待着正义的法庭将罪魁祸首推到历史审判台上的一天。

“向征夫之前路，恨晨光熹微”(归去来辞）

1960 年春天，由于冶炼出来的是一堆不能炼钢的废铁，丛林铁厂同全国各地一轰而上的小土群高炉一样，被迫关闭。

重大“右派”同学离开丛林去广元坝农场集合的那天，炼铁厂的几个工人，指着那些耸立在后山坡上望天长叹的小高炉，摇头叹息道:“那是花了好多工人、老百姓的血汗干的‘空事’呀。单单为建立这几个炉子而损失的树木，就是几十年也长不成原来那样了啊，真可惜。”

然而，当年大吹大擂建立这些小高炉的策划者、组织者、督战者，现在却一个都见不着了，他们兴许认为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还会在以后的个人履历表上填写上这一段“光荣的历史”，说自己如何付出了好多不眠之夜和心血，为绘制三面红旗的“壮举”而贡献了一切。

在即将离开丛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用心地思索和总结这一年零七个月，而我却因那本“反动日记”被人发现，成为又一个脱离这个集体的游离份子，被押到新的地狱里。

1960 年 1 月 26 日下午，我被鲁召押送到南桐矿区看守所。

第三章 监狱归宿

1960 年 1 月 26 日下午两点钟，鲁召叫我将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不及同朝夕相处的伙伴告别，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车，也不知该向我作怎样的表态，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临时的调动或是分批离开南桐。他们不知道，我就此与他们分别了。

车刚开动，我便怯生生地向鲁召问道：“把我调到哪里去？”他看着我淡淡一笑，从那笑里分明泛出了一丝可怜，只说了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我在晃动中昏昏睡去，不知走了多久，只听见车窗外面有人在喊：“万盛到了。”

万盛的市容于我已无任何兴趣，我拎起背包和行李，跟着他就像一只拖着去屠宰的羔羊。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逮捕的预兆，我想知道的是，我究竟调到什么地方去。鲁召看着我天真的模样，好像是跟着老师去上学一般，所以一路上对我非常放心。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绿茵覆盖的土墙门口。

鲁召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将我一个人留在哪里。我将自己破烂的衣物和“行李”放在墙边，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

突然，监狱的边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吆喝着从门边涌出来的十几名光头囚犯，他们一律穿青色囚衣。我猛然想到七年前，我在北碚看守所远远看见那坝子里也是这般模样的人。一个信号才迅速地闪过了我的大脑：“我被关进监狱中了。”由是我想到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狱了！

倘若在两年前我会惊得全身颤抖，但经过这两年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久临其间而不觉其险的感觉，脑子里还浮动着大炼钢铁时种种恐惧，而今脱离那里反而感到轻松，认为随便往哪儿送，都比丛林的炼焦场好。

第一节 我被糊里糊途带入看守所

大约半小时以后，鲁召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并不与我“告别”，便径直从我们刚进来的那个门走了出去。

到了此时，我才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心中再次泛起一阵悲哀，又过了二十分钟，我曾在逮捕杨治邦的大会上认识的丁户籍，把我叫到办公室门口，对我全身上下来了个彻底搜查。他脱下了我的棉衣，仔细摸完了棉衣上的每一处缝线和疙瘩，并将它同我的破皮箱打成一捆，丢进了一个标着“保管室”的小屋。然后，有人给我送来了同老犯人们完全一样的青色棉衣，穿上后叫我进到办公室，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进来前的“工作单位。”

当问到我因何故被押到这里时，我自己都不知该如何回答，我莫名其妙的按了手印。接着，那位自称姓王的干事，带我走进了阴森的监舍巷道。那巷道均布着两排铁门，每一道的门

上留有一个可以左右滑动的小窗口。他将我带到巷道右侧尽头的一道铁门旁，拉开了那道门上滑动的风窗口向里张望。

王干事用命令的口气向我交待："今后你就住在这间舍房，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在他们中谈监外的事，也不能用你自己的姓名，只可以用自己的代号，你的代号是 419，除了反省交待等候提讯，你不能同他们谈论与之无关的事。"

交待完毕，打开铁门，我低着头跨了进去，迎面扑来一股霉味和汗臭夹杂的浊气。身后哐当一声，铁门关上了。室内很暗，除背墙上两米高的地方，有一个 10 厘米见方的窗口投进一束光能依稀看到室内的概况，还看不清里面住着几个人。

我站在那里，闭眼定了定神，大约两分钟后，我看清这是一间大约 15 平米的桶子屋，没有床，门口的进口左侧放着一个马桶，从进门的左墙角开始，地上垫了一圈大约有两米进深的稻草，一直铺到靠门右边马桶边。对着门的地方中间地带留着一条长约两米、宽不到一米的空地面，上面放着鞋。

从右边墙角开始，依次排坐着五个人，都盘腿而坐，每人的身后都垫着一床破烂被子。我呆站在那里，五个人用一种新鲜而警觉的目光打量我。

过了一会儿，地铺中间位置上，一个人从铺位上慢慢站立起来，缓缓向我靠近，发话问："哪来的？"我因为陌生而防备着，加之两分钟前刚进来时王管教的交待，所以没有回答。

冷不防对方伸出一记快掌，重重打在我胸口上，我毫无防备，一个踉跄，顺着那拳风的方向跌倒在马桶边。我正要从地上爬起来反抗，其余四个人一起吆喝起来。

打我的那人紧逼一步，捏紧着拳头在我的眼前晃了晃，恶狠狠吼道："既然进来就得懂规矩，从现在开始，你就睡在这个位置，没有我的同意不得移到任何其它位置上。"我只好就地坐下，一声也没吭。

我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忽然觉得脚上坠涨得难受，关节酸软，便在自己的踝关节上面的"穷骨头"捏了一把，却是软绵绵的再也弹不回去了。

自从炼焦碳以后，我就开始患水肿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回想那些晚上抬着一筐煤上跳板心惊肉跳的景象，事后感到害怕。

也罢，总算离开了那要命的炼焦场，躲开了那道鬼门关，可以在这儿睡上几天，恢复一下几天几夜没合上眼的极度疲劳。我闭上了眼睛，听五个老犯人说些什么。

其中一个说道："明天就过大年了，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见？"另一个答道："这年头家里人都没得吃的，哪里还有东西往这里头送。"再一个接着说，"再怎么说，我工作的单位也要发两把挂面吧。"

听他们对话知道五个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农民或工人，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监墙之外，公社的农民每天只分给六两黄谷，工人和城乡居民每月十八斤的口粮中，还要抠一斤出来"备荒"。

经他们提醒，我才恍然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还真没想到，1960 年春节我要在铁窗里度过了。自从下乡改造以来，我的脑子里常处于空白状态，有时连自己的年龄和出生年月都记不起来，最开始在学校里受到的强烈刺激，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消磨，使受到重创的大脑处于休克状态，忘记了一切。

这种忘掉过去的自我休克，使我整个神经处于麻醉状态，无论别人怎样吆喝、斥骂、公开的撒谎、肉麻的吹捧、黑白颠倒、对弱者的欺凌等等，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连什么时候过年，这种儿时从腊月初八就掰着指头算的日子，都忘得一干二净。

当我突然孤零零地置身在这阴森、陌生、四面铁桶般的牢房中，我那幅久未拉动的记忆屏幕便开始晃动起来。

白发苍苍佝偻着腰的老外婆，又彷佛在抚摸我的头颅，长呼着我的小名；可怜的弟弟算来已十七岁了，他的爸、妈和哥哥真对不起他，留给他那么深重的"阶级烙印"，使他怎么在这社会中生活啊。他现在是在上学呢，还是在社会上流荡，甚至被关进"少年管教所"之类的地方？

还有，爸，您此刻在哪里？我们一直都害怕来看您，您能原谅我吗？我现在也同您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我能与您相见吗？

自从我被划右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往家里写信，开始是因为我真不知怎么下笔，我被弄成这样，错在哪里？是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呀。至于今天为什么会被抓进这儿来，今后又怎样，我就更说不清了。

如实地告诉他们说我是冤屈的，不是反而徒增了他们精神的压力么？如实告诉他们我已被关进了监狱，那不是在逼老外婆么？上了年纪的人可经受不起这等打击的啊。

倒不如不给他们写信，隐去了我现在的处境，兴许对他们免去了无尽的牵挂。

母亲一定去重大打听我的下落了，当她知道我还保留着学籍，保存着一丝希望的幻觉，觉得"我会那天奇迹般的从学校归来，重新回到他们身边"，这样不是好得多么？而现在我进到这里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一）看守所里的年夜饭

突然一声铁门的响动，幻影立即消逝。监房尽头的大门打开了，整个过道里顿时躁动起来，过道两旁的监舍里传出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发出的蹿动声，我们监舍的五个犯人也一齐站了起来。啪的一声，铁门上的风窗口打开了，那个刚才出手打我的人，趴在刚刚打开的窗口上向外张望，室内昏黄的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亮的，后墙那窗口已是一个黑洞，无法判断此时已是晚上几点了，现在真的是饥肠辘辘，饿得难受极了。

过道里响起了一个长声吆吆的喊声："大家听着，大年卅的年夜饭提前吃了，等会每个房出来领饭的人多派两个，有菜，还有汤。"

两分钟以后，我们监舍的房门打开了，三个头剃得发亮的犯人，一个挑着箩筐，里面盛

的是容量两升的黑色盅子，里面盛的是一盅子饭，另一个端着一个大盆，里面是白菜烩着点点的肉丁；最后的一个挑着桶，一桶里面装的是汤，面上有油星，另一桶装的是空盅子。

我从打开的门中向外张望了一眼，与对面监房趴在窗口边的饥饿眼光碰了一个正着。大家几乎没有过年的欢悦，目光中透出渴望，这顿盼望已久的“年饭”，能否填够一回从未满足过的饥肠？

此时领来的饭菜已排成两排，整齐的放在那“铺”围起来的中间地带。我本能的伸手去领靠我最近的那罐，手还没有伸拢，便被 303 一掌打回。正要向他理论，五个人又一齐向我吆喝起来，我只好垂手等着。

只见 303 对每一个罐子都仔细的掂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不慌不忙的将这些饭菜端给了其它四名老犯人。剩下最后一罐，他取过那个要来的空盅子，取出准备好的一块竹片，用迅速的动作将那罐饭分划成两半，一半倒进那空盅子，将剩下的另一半和那盅汤端给了我。

不明狱中牢霸规矩的我，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欺侮。这年头饭菜就是命，这监牢中每天名分上的八两囚粮，摊掉吏耗、鼠耗、炊事员的消耗，落在这罐子里头每顿有三两就算很不错了。每天两顿、每顿三两、油荤全无，每顿吃喝完，对罐子里的饭迹都要用舌头舔了又舔，名曰舌洗。那时节，水肿病在狱中猖獗，几乎每隔两天，就有人被抬往监狱中专备的“太平间”。

我盯着他端过来的半盅饭菜，又看到他眼里一股凶光紧紧逼着我，我顾不得力量的对比，一股必欲拼命的力量，集聚在我的拳上，便出其不意的打在对方的胸上，并顺手去夺刚才被擀出来的那一半饭。就在那一瞬间，五个人一齐向我扑来。

303 喊道：“把他按倒角落去，免得弄脏了饭菜。”于是四人一齐动手，将我按在左边那墙角里，铺天盖地的拳头向我身上雨点般落下。另一个人已将摆在地上的饭盅子挪到了 303 铺位上。此时，我已完全失去控制，不顾一切的挥拳踢脚。没有目标的回击。

正此时，监舍的门忽然打开，押送饭菜的王干事已经走了进来，叉着腰站在那里厉声喝道：“要造反不成？”

我此时已失去了理智，翻身站起来，也不向这王干事诉说起因，便猛地向那 303 扑去。303 连忙应战，从他刚才的位置上抢步上前，两个人扭成一团。等到室内的人将我们拉开，我才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特别是鼻孔湿漉漉的，用手一摸，满手血迹。

王干事冲着我吼道：“鸡巴个大学生，狗屎不如的大学生。”

好在监狱中关久了的人已被磨得十分虚弱，经过刚才这番搏斗，双方都受了点皮肉伤。屋里暂时平静以后大家才发现，中间的那一小块空地上已水迹一片，空气里充满了臭味，不知什么时候，那门边左侧角落里的马桶被掀翻了，王干事捂着鼻子走了出去，五个老犯人连忙在门外过道里找到了一件破棉衣，便一齐动手将撒在地上的尿水拈干净。

幸好，盛饭菜的盅子安全地放置在 303 铺位上。

大家端起了各自的那份饭菜默默无声地吃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也顾不上去擦脸上

的鼻血和手上的污泥，捧着自己的那份东西狼吞虎咽的吞下了，并且一如往常地把饭罐和菜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此时，大家才平心静气相对而视，其实，谁都不是鬼，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会抢人吃食？缺了牢食，关在这里面的人便不能活下去。正因为都不想变鬼，就只好为生存而争了，不知中国历史上监狱中曾有过多少这种记载。

像这种和平年代的大饥饿，滥及全国，因抢夺食物而发生的杀人事件甚至吃人的事，有史以来闻所罕闻。鲁迅先生若能活到今日，他的狂人日记所撰写的人肉筵席必会重新改写。

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新来监舍的人，头两顿只吃一半的罐罐饭已成不成文的“监规”。本来，任何朝代中新到监中的人，由于狱中的牢饭本来就粗糙难咽，加上初涉讼狱，难免心情难受，在开头的几天不想进食的并不是什么怪事。偏逢这“大跃进”搞出来的饥荒，加上刑狱滥施，每次运动后，监狱人满为患，原先只关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的房舍，现在竟关上许多人。初来者，被牢头们吓服，牢饭减半，睡在马桶边闻臭气，又是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没有进过监的人，被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了监内情况，不知道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监狱原来如此。

“团年饭”吃完，我在暗淡的灯光下，开始抚摸方才格斗时所留下的伤痕，轻轻将我的脸上和手上已结出的血痂抠下，因为没有水，肮脏的手脚只有对搓擦一下便可睡觉，只是那被打泼的尿水浸透了稻草的地方，可正是该我今天安息的地方，加上还没有领棉被，这隆冬季节的夜就难熬了。我忽然想到，一个人倘若遭逢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会冻死或饿死，心中不禁哆嗦起来。

我对着门外的走廊呼喊着：“报告。”还好，没过一会儿，炊事犯人依次挨着监舍来收吃过的空饭盅，我把浸湿的稻草抱到过道里，又在那里找到一些破布，烂絮重新铺好，领了一床被子，便将就着那还在散发臭气的地方躺下。

不知道因为刚才流血太多身体虚弱，还是因为天气太冷铺垫太薄，我刚睡下，全身一阵阵发冷，不停的打抖。便重新坐起身来，将被统里的棉絮翻出来看，那中间有一个盆口般大小的洞，只好重新穿上棉衣，裹着那被子睡下。

渐渐地，一切安静下来，我听见监舍外呼呼吼叫的寒风中，隐约夹着远方传来的鞭炮和锣鼓声，想到这国度中的公民们，哪一个都是在鬼门关下忍受饥寒的煎熬，谁还有钱去买鞭炮礼花？

那一定是哪一个单位，哪一级政府正在欢庆“大跃进”的辉煌“业绩”：人说鞭炮能镇妖除魔，驱晦气。

然而这年头怎么这么多倒霉事？而且每逢怪事便鞭炮大作，人民公社成立界牌的鞭炮不断；小高炉建成的第一炉又是鞭炮大作；粮食高产放卫星又是鞭炮不断，这是哪门子邪门呀？

（二）看守所见闻

第二天，王管教特别的把监规印成了许多份，每一个监舍一张，贴在监舍的门上，规定吃完早饭以后，由组长领读三遍。对那些繁冗的条款我已经忘记，唯独其中两条至今还记得：一条是不准谈监外的事，一条是不准相互交谈案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弄清楚了这五个老犯人各自的情况，这些人同那刚进来的农民一样，身世实在太简单了。紧挨着 303 的那一个，年纪三十岁上下，原来是万盛公社某大队的仓库保管员，因为从种子库清理大春备耕的谷种中私自挪下了两口袋，被人发现，便以破坏大跃进的罪名下到狱中，等候判处。

第三名是某大队的牲畜饲养员，他告诉我说，公社的牛马饲养从去年国庆节以后就没有配粮食了，他负责喂养的两头耕牛整个冬天就靠发了霉的谷草和盐水维持生命。年老的那头水牛已经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起来，哪能再下水田迎春耕？而他的一家五口人中，老娘和两个儿子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妻子也久病不起，眼看一家人都要饿死，于是在一个晚上他宰了一头耕牛……

第四名则是为了殴打公社的民兵队长抓来的，他当时已全身浮肿，他说：“我们那个生产队连田坎上栽的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队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患水肿病。”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民兵队长却在寒冬逼我们到试验田去挖田。我说：‘我都已水肿到肚子了，要我的命么？我不去。’那民兵队长提着绳子气势汹汹要捆我去，还动手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我想绝了，反正是死，便从床头抽出扁担向他头上砍去。”他就这样被抓进来，好在他出身贫农，不会沾着“阶级报复”与反革命挂边。

第五名是南桐矿区的一个井下工人，在六个人中他的个头最大，他为保命而逃，逃亡中砍伤了追捕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曾在丛林煤矿劳动过，他向我坦言说：“你是知道的，我们那点定量上半个月吃了就缺下半个月。”

至于那 303，他一直对同监的人绝口不提他本人的案情和身份。给人一种假象，好像真的最听“政府”的话，但只要联想他对新来犯人扣吊命粮的那种残忍，便可知他对政府其实是阳奉阴违，虽然他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经过几次家属探亲，我们弄明白，他是万盛公社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因逼公社的社员们出工和以旷工为由，克扣社员的口粮，酿成三条人命案，被公社社员告上法院。

看守所每天生活极单调，早上七点钟，过道里便响起了那个王管教的皮靴声，然后起床依次到院子里的水池漱洗，然后读监规，每天重复。

大约三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们监舍关进来了一个上着脚镣手铐的年青人，也许这里面关的这几个，还没有见过这种戴全刑具进来的犯人，我猜想，这大概是负有命债，足可以处以死刑的人。那人被关进来以后，303 被王干事叫到办公室，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钟开饭以后，王干事煞有介事的来了，宣布对新来的犯人进行“帮助”。这种取名“帮助”的会，同我在这两年里经历的斗争会完全一样，不过手段更为残忍。多半是让被帮

助者在暴打中精疲力竭时，按官方认定的罪名在招供上画押。表面重证据，禁止“刑讯逼供”，其实是利用犯人“以毒攻毒”。

王干事并没有宣布那人为何被捕，又为什么上了刑具，只宣布了他的代号叫 319，并反复交待了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随即要大家帮助被斗人认清形势，将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

我望着他脸上四、五处青包，以及满身泥垢，那被脚镣铁匝擦伤后凝结的血痂，知道他在逮捕时，已挨过一顿毒打。

现在 319 站在监舍中间，颈项已经挂上一对早已准备好的铁桶，每个桶里装着四块砖头，铁桶一挂上，年轻人的背立刻弯下。303 走上去捏了一下他手上的铐子喝道：“进到这里就别再想耍花招，要想不再受皮肉苦，就乖乖的招来，免得爷爷动手”年轻人迟疑了一下说：“我叫刘青平……”

话刚开始，他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掌，他一个踉跄几乎跌倒。303 厉声喝道：“谁叫你说名字，你叫 319。”周围响起了一阵呐喊。319 继续说下去：“我是工人，收听敌台是事实，但我没有投敌叛国。”不等他说下去，背上又挨了重重一拳，又是 303 喝道：“谁要你交待案情，你要交待就向政府交待去，不准你在这里乱说。”

由于水桶的阻碍，319 艰难的侧过头去，惶恐地看着站在他背后的 303。在这种会上，他除了任打是没有一丁点自卫能力的，他确实弄不清楚他在这里“交待”什么？便怯生生问道：“那我该说什么？”颈上的重物使他身形扭曲，额上冒着冷汗。

“要你交待为什么要狡辩，是想赖？推卸责任，蒙混过关？”303 吼道。看来，王干事对他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唔，我没有蒙混，我没有抗拒，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投敌叛国，那是周书记强加在我头上的。”319 涨红了脸，努力的把头向上抬，作出挣扎的姿势，所有的人马上站立起来，将 319 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掌，像打排球似的。只听见铁镣在地上发出急速的金属撞击声，以及拳头落在 319 身上沉闷的回应。水桶猛然晃动，319 终于站立不住，连同他身上的所有附加物，砰然的跌倒在铁门边！

大家住了手，303 走近一步，看了看满身伤痕，直喘着气的 319，那水桶仍套在他的颈上，样子很像古时候套着刑枷，脸上黥字的死囚犯。那杀耕牛的走上前，替他取下了水桶后，303 便又将他拎了起来，又是一阵吆喝声，第二次站稳以后，又重复着刚才的那一过程，重新套上水桶，喝令交待……站起……打倒，一直重复了四次。

最后，我再打量这年青人，血顺着颈项向下流着，手、脚到处是血。这才将他颈上的水桶拿掉，让他站在中间反省，其余的人再不理会他，按照老样子扯开了各自的龙门阵。

使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本身已十分不幸的老犯人，他们还患着水肿病，除开那工人外，无一例外的都对那 319 下着拳头，这些同 319 素昧平生、无怨无仇，怎么忍心对这么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下手？难道中国人真有那种从别人的痛苦中寻找释放自身的怪僻么？

319的“帮助会”一直开了三天，直到303将他从地上再也拉不起来，瘫倒在地上为止。319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三天。最后王干事再次提审319。这个遍体鳞伤的年青人终于在“投敌叛国”的供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明白，如果不签字，等待着他的将是前三天的继续。

签字后，319回到他所睡的那个马桶边位置，再也没有人去理他。两天后，他被调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被转移到了哪里。唯独我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担心他是不是会被处决。

两个月中除 303 和我以外，大都已调出，同时又陆续地抓进了不少新来者，他们大部分都是附近公社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因饥寒所迫，有为抢一小袋苞谷而杀人，甚至为抢一碗粥而酿出人命来的，更多的是因为水肿而抗工发生的各种情节的斗殴、杀人，从他们口中知道，农村中饥荒越来越严重，水肿病越来越烈了，用他们的话说：“曾祖父的那一辈，从湖广遭水灾逃荒来此，便以为这是天府之国，逃荒来时也吃过观音土，但还从未听说这天府之国有遍地饥荒的事，这是什么“灾”啊？

公共食堂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悄然解散了，许多人家因为锅中无炊，懒得去找回一年前被砸碎的锅盆碗盏。自留地重新退归农家了，但面对着这荒芜的土地，上哪去找菜秧、种子来“生产自救”？观音土成了普遍的“食物”，有的农家整户整户地死于无法救治的“水肿”病，真的是“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绝境。

到了五月份，南桐看守所已从巷道里抬出了十来具饿殍。不过，进来的人反倒说：“这儿比农村好多了！这儿好歹每天还有两顿吊命饭，农村里芭蕉头都挖来吃完了。”

（三）人民公社是农民的坟地

五月中旬，接连下了好几天雨，天气转晴以后，有一天，丁管教挨着监房的次序点名完毕，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将人关进监舍，在背后的操场坝洗水池放风盥洗后，他手里拿着点名册，宣布凡点到的人，马上到篮球场集合。我们监舍那天除了三个刚进来的人，其余五个人全都在列，其中也包含了我。

丁管教将我们整好队列，依次报数，一共四十个人。他向我们宣布：“今天下乡，支持农业，帮助公社割麦子，每人的饭每顿多加一两米，多加一瓢菜，但是必须完成任务才能回来。”他顿了一下，补充道：“政府相信你们，但也还要把话说在前头，如果遇到老乡，不准同他们交谈，不准单独行动，谁如果想开溜，打死了该背时。”接着炊事员便给我们送来了加班饭。

算来，我已在这监舍里度过了四个月，胃还真有点萎缩，加班饭吃下去，倒也有一点“饱”觉。心中怀疑“公社劳动力缺到这种连关押的未决犯也要派去的程度了么？”

大家吃完饭，重新排好队，四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已守候在看守所的大门外。

跨出看守所大门，没走上两百公尺马路，便是农村的机耕道，那街道两旁半年以前贴出来的标语，纷纷已被寒风撕去，只剩下墙上用墨汁刷出来的标语。

广播喇叭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声音。过路的居民见到我们，似乎习惯了，并不围追“看稀奇”。

出了场口，我们走了一段机耕道，便踏上了蜿蜒依附着丘陵的小道，队列只好拉成单行，警察们不断地向那些掉队的人发出吆喝声。

这一天适逢初夏，又是晴天。四个月的桶子监生活后，乍然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我拼命的大吐大吸，想把四个月来，在牢房中存积在肺里的污垢全部吐出。

四个月来没有像丛林那样消耗大量体力，但吃进去的那点营养大抵也只能够维持着吊命，刚入狱时的水肿病并不见好转，还没有走出一里地远，手脚发软，头顶上的太阳射得我眼睛发黑，心中也开始发慌，便拼命的掐着人中穴。但腿已不听使唤，渐渐掉下队列，任凭那丁管教怎么吆喝，也赶不上大队伍。前面的队列不得不停下等，就这样，拖拖拉拉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转过一个山坳，眼前呈现出一弯麦田，四名警察早已拣了那最高处的一个山头上，分作两起撑起了带来的大伞席地而坐，将枪口对准了下面的这四十个人。

一个身穿土布补疤衣物，头上裹着白布头巾的农民打扮的人，早已站在那最上面的田里，身旁还放着一个背篼，此时他走到丁管教的面前，指着那背篼说：“那是四十五把镰刀。”他们俩交接完毕，那农民顺着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很快的消失在山丘后面。

接过镰刀，我看着眼前的这弯麦田，不禁想起了一年半以前，我们在界牌公社由那里的书记和社长亲自指挥的杰作、听说夏收时连种子也没收回。只收了一把细细的麦草。

眼前又逢了夏收，面前这弯麦地怎么看也是荒凉一片，在荒芜的杂草里稀稀拉拉的麦穗像是已经收过，但没有收净的一片田野，只不过没有留下麦椿罢了。

下到田里定睛细看，需仔细辨别才能看出麦秆来，不过那距离与前年的竟完全相反，不是三寸间距二寸退行，那窝与窝之间足有一尺多远，走到田里，那些在荒草之中的麦穗，已倒吊在草丛里，需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

那时，饥饿的农民出工后，便各寻静背的田坎屋角里睡足了大觉，醒来便胡乱的撒些种子在田里，到了中耕除草，大家排成了一排像散步似的在那大田里“过”一趟。有的田“种”下后就从没有人去看过一眼，碰到公社偶尔检查工作的检查团，一面推口太忙，一面还虚报这三锄三施。

不过，今天对我们来这儿收割的四十个人，倒是一件幸事，要不，这么大一弯足有百来亩的麦田，怎能在一天之内收完？

丁管教把所有的人分成四个大组，每组占一块田，十个人一字排开，一边像拦河里的鱼似的搜索着前进，在草堆里割下那稀稀拉拉的麦草，正因为是“寻找”，不会蹲下来使出骑马桩刷刷的割，倒像是排着队散步似的同那些麦秆捉迷藏。

割下来的麦草难成一把，一块两亩田，稀稀拉拉的东一堆西一堆，集中起来连带着麦草，捆不起一大挑的。

忽然有人发现，那田坎上还按着老庄稼的模式种着豌胡豆，只是因为草更加茂盛，完全遮去了田坎边的豆杆，需要扒开草丛，才能看见那些隐藏在草丛中的豆杆，豆杆开着紫色的小花，结着一两片绿油油的豆荚。于是大家争着靠田坎去割，一边顺手摘下那隐藏在草里的豆荚。

找到后，迅速摘下，不管是黄的还是绿的都塞进自己的嘴巴，那股清香和甜美当然就比“精神牙祭”中的肥大片实在得多。丁管教在山顶上连声喝斥，于是，十个人中便会有一人出来指挥，将田划成十段，每个人包干自己那一段的麦秆收完，也包干那一段田坎里草丛中埋藏着的美食。

今天真算争气，还没到中午，这一弯田就已收完了一大半。丁管教走下已经割完的麦田检查，也说不出哪儿还没有割完。便吩咐大家坐在田坎上歇息片刻，大家便就地坐下。唯有几个特别好动的小子，还在那刚刚割完的田坎上，不断的寻觅着漏网的豆荚。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哭泣声，由远而近，几分钟以后，就在右侧刚才我们过来的山腰小路上，依次地冒出了几个人头来。哭声越来越近，到挨近了方才那警察撑伞放哨的地方，已看得分明，前面是两个年青人晃晃悠悠的抬着一个担架，那担架上躺着的分明是用一床竹席裹着的死人，后面跟着一老两少，都穿着已经破烂的白衣服。头上裹着的白布长带在风中飘荡。

走近我们，一个警察上前拦阻盘问，抬担架的见阻便放下了担架回答。

“怎么在这里埋人？”

“公社规定的。”

“什么时候死的？”

“前天晚上。”

“怎么死的？”

“水肿窜上了胸口，破了皮。”

这几天在狱中不断传来农村里一家人都饿死的消息，今天正赶上我们亲眼目睹了。

“埋在哪里？”

“你看，就埋在前方。”顺着那抬担架人伸出手指的方向，果然，就在那山梁左侧，距那哨位不过五十公尺的地方，密密排着几十个新垒起来的小土冢。两个人重新抬起了担架，吃力的绕过哨位。

我们的目光紧紧地跟着这支送葬队伍，看得分明，那一老两少都是肿眼皮泡的，想来，不光是因伤心而哭成那模样，因为就连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也是浮肿着脸。送葬的人中，一个老者走出来指划着，其它几个人就在近处，七手八脚的挖出一个坑洞来，大家比划着又挖了一会，等到那洞足以安放那裹着的竹席以后，便将那竹席抬进刚才挖好的洞穴中。

两个孩子从坐着的地方爬起来，扑向这新的坟堆……

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祖孙三人才相互搀扶，蹒跚往山坡来的方向走去。那老奶奶还在路上跌倒了两次，我目送着她那摇摇晃晃的身躯，头上裹着的白布巾在春风中抖动，好像在为她的儿子撒一把纸钱。

恐怕她老人家过不了几天，也会来这儿，躺在他儿子的身边安息。

我们这四十名割麦的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农人，兴许其中还有死者相识的好友亲朋，看到此般光景，心情能不沉痛？同病相怜，自己的家人也包括了自己，不是也在同刚才那死者和他的母亲一样，同赴此难么？

当我们目送着这一老两小的身影消失在这山林丛中以后，大家已无心言语，快快的收拾完最后一块田，丁管教下令收工，此刻，他的心情如何？从他的不吭一声便知一二。人心都是肉长成的，就是他的家未免能避此劫难。

警察们已收下岗伞，我伫立在那山岗上良久的回味着刚才目睹的一幕，不禁回过头去望了望不远处那刚刚摞起的新坟。

这种草草浅葬，没有灵柩、坟茔和墓碑的无名死者，同恶战沙场马革裹尸的弃尸又有多大区别？此刻的死者正面对着这一弯弯祖祖辈辈赖以孕养的土地，面对着这一片荒凉吝啬的土地，去向谁诉自己的不幸啊！

苍天将他变为人类，降生到这里时，就同时赐给了他面前这一弯弯安家乐业、繁衍子孙的乐土，他们的先祖们一代代耕种在这里，并不介意当今的皇上是谁，也不管这些统治者们如何争夺江山和荣华富贵，只要他们不被当成炮灰抓走，或是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驱赶他乡，他们仍可以忍受这些爷们土匪的强征暴敛，依靠自己的勤劳，精耕细作换回这片土地丰厚的回报。

可惜，这一代的儿女们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从什么时候起一个曾使他们狂热追随的魔王，将他们引到眼前的这种绝境？迷幻式的“社会主义”，使他门眼睁睁的看着这片沃土连年荒芜，连年歉收。最后，竟昏头转向跟着大跃进的大兵团，像着魔似的抛弃了这片土地，让它在荒草中哀叹！

此时，我彷佛听见了那死人，面对着面前这片荒芜的土地，当着苍天的一番对话：

死人说：“土地呀！你怎么不负起苍天交给你的神圣职责，继续用你丰美的庄稼抚养我们，而留下这片荒地，让我们挨饿、直到死去，回到你的面前来？”

土地却在荒凉的草丛里回答：“唉！我原是冰凉无情的泥土，仅仅靠了你们祖先勤劳汗水的浇灌，才从我们身上长出丰盛的粮食，也有了我们盎然的生机。苍天将我们赐给你们，原是回报你们那番诚恳地投入，而现在，踩在我们身上，却不给我们施肥除草，我还能拿什么来回报你们？”

死人跪在地上对着苍天喊道：“老天呀！你为什么让我出生，却给我饥饿？把无穷的天灾降临给我们，让我们活活的饿死而你见死不救？”

苍天震怒了，扯起了浓浓的乌云，擂动起沉闷的雷声，恶狠狠的向着那下跪的人怒斥道：

“你这软弱的懦夫，可悲的族类，世界上怎么偏有你们这种人，不看天时，不讲人和，不究地利，不老老实实的干你的活，却听凭着那独断专行的人世魔鬼，向你们胡编天堂的梦幻，而你那可鄙的人格和鼠目寸光，甘愿听凭那魔鬼的驱使和摆布，去干残害同类的勾当，而今大错铸成，饥荒难逃，却还在责怪我，以为我是哑巴，能替你担当所有的恶果？”

我们回到监舍，天已黄昏，大家又聚在那篮球场上，分食着炊事员提来的豆渣煮的加班稀饭。在那饭桶边免不了争多论少，中国人对那瓢稀饭的多少向来看得很精确，也很认真，谁的瓢打满一点，谁的瓢打浅一点都会引发争执吵架。

我喝下了稀饭，同大家一样，辘辘饥肠得到暂时满足。大家抓紧时间洗了手脚，便各回各的监舍，劳累了一天大家很快睡下，不到八点钟，监舍里便响起了一片鼾声，然而不知为什么，躺在铺上的我，脑子老翻动着白天割麦所看到的那坟堆，尤其是那老态龙钟的老奶奶和她的孙儿……

“人已闭门鸟已栖，黄昏冢畔孤儿啼！”我又联想到我的外婆和弟弟，不知道他们能熬过这灾难的岁月么？

“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

（四）初悟与反抗

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的颂歌，离开了“作假”便唱不下去的，不过，这假也实在太离谱，那老天爷也真怪，从夏初开始便把暴雨没头没脑的往南方河流交错的沃土上狂泻，使那里水汪一片，庄稼荡然无存。接着又跳过广大的丘陵山川，又没头没脑的把暴雨狂泻到黄河流域，使那儿黄汤一片，哀鸿万里，唯独就欺侮那山陵田野不给一丝雨水，来了个连续一两个月的连晴高温。

这玉皇大帝的雨司、雷公们真够开毛泽东的玩笑，故意同大跃进过意不去。再说，那排成长龙一般，将一盆盆水从山下递到山上去，能解得了几块田的渴？救活几棵庄稼？真来了那么大的旱灾，就凭这种可笑的办法行得通，救得了灾吗？如果这也叫人定胜天，不是愚弄中国百姓么？

耳听那 303 叨叨絮絮的读报声，恍惚中明白那报纸说瞎话的原因。看透了那满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根本利益的中共，连百姓整户整户的饿死都毫无动容，毫无自责，毫无歉意，往“天灾”上一推了之！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到这共产党的真正面目，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将我步步紧逼到这种地步，一点都不是“家庭出身”，而是这位混世魔君为独揽皇位，复辟专制而采取的卑鄙手段，我同全国百姓无非都是这场“政治试验”的牺牲品。一场政治骗局的炮灰！

就在这个时候，王管教开始了对我的预审。我既是莫名其妙的进来，当然面对这位无法用语言沟通的审讯者，不知怎样来回答他向我提出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向他交待什么？偷人抢人，投机倒把，杀人放火，还是组织暴动？我招惹了谁呀？至于提出那本“日记”就更令我反感，能说明什么？造谣、谋反？到了这种地步，将自己扭曲得来连替自己辩说的勇气都被剥夺

了，只会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以泪洗面，以文舒哀，这算哪门子事啊！这也叫“罪”么？

“交待一下你的罪恶。”

沉默。

“你听到没有？讲讲你写的那本日记的动机和目的。”

沉默。

持续了足足十多分钟的沉默后，那姓王的忍耐不住了，向我递过来一摞纸，“那么，你写吧，把你的犯罪连同认识全部写出来。”

在那个年代里，“罪”，原是一顶被人捏在手里玩弄的帽子，例如，据实申辩，可以说是死不悔改不低头认罪；揭示真相可以被说成“以点带面，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若说“那卫星是假的，那公社报的产量也是假的”便是诬蔑，破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至于说道：“大炼钢铁劳民伤财”，“那报上假报丰收，老百姓饿得吃草皮树根”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判十年刑；若说那人民公社化造成农民大量饿死，那么就只有枪毙有余，死有余辜了。

若说“共产党太霸道太专制，该讲讲民主”那么就等着挨斗、挨打、坐监、枪杀吧！反革命帽子反正不花一分钱，帽子公司有的是，斗争会总要不断开下去，不然凭什么来振慑老百姓？监狱拿来干嘛呀？

而此刻的我已被压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两年来，我一直都在挨打，受侮辱，连替自己说句真话的权力也被剥夺的处境。我说：“我没有替父亲翻案，也没有希望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的想法。”回答的除了斗争会、除了拳打脚踢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这样压抑自己，强迫认罪，兜着圈子打诳语的日子，是一种精神肉体同被煎熬的苦日子，我说真话便是攻击，我说假话良知又不允，这般苦恼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回到监舍，整理了一下思路，我鼓足勇气，提起笔来，在那位王管教所给的“交待材料”的白纸上写下：“浅谈三面红旗之所失”的大字标题。

我毕竟是学生，虽然患着水肿，但血气依然亢直，又没有太多的坛坛罐罐顾忌，可惜，我的社会知识、历史和文学的知识、阅历和写作能力都受限制，在这些方面我只不过中学生的水平。一种逃避精神折磨逼出来的勇气，一股存于天地间的良知所鼓起来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中国人良心道德的啼血和哭泣。

这一篇写成，还保留了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对中共当局的幻想。作为被动客体，作为跪在庭下受审的“罪人”除了呼冤，并寄希望中共领导能体察民情，纠正“错误”，就别无奢求了。

我原想，在事实面前，用一种诚实和真情未必不会唤起当局者的回应，当事者迷，说不定百姓遭受的灾难，中南海里的决策人并不太清楚，要不然怎能忍心让自己的百姓受着这水深火热的煎熬？

但是，我是完完全全的想错了，我把中共理想化人格化了！我这一篇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成了判处我“十八年徒刑”的依据。

对于王管教这是一份不打自招的供词，只要随便的摘下其中的句子都可冠以“恶毒攻击党的政策”予以判决。只是这毕竟不像是一份案情交待书，关了这么久，不但不“悔罪”“认罪”，竟牛头不对马嘴的阔论起中共的大政来了！

看守所不是“反革命”清谈讽政的场所。大致出于这种原因，他们认为必须给我一点颜色看看。两天以后，他提着一付洋铐子，满脸怒容的走进了我们监舍，大声的责令我起立立正，并将洋铐子狠狠扣到我手上。

这是一付特制的洋铐，铐子里圈贴着被铐者手腕的地方，有几处尖利的倒刺。

随后，他便将各监舍的组长统统调集到这监舍，于是，我成了重点批斗的主角，被推到看守所的斗争会上来。

狱中被斗虽然是第一次，但我已看过几次了，无非是吊水桶和挨打，这我知道，早已作了精神准备。我明白，不过这一关，便不能在精神上彻底解脱自己，所以斗争会的开场很利索，若不是因为双手被铐住，我会自动地去提那个足有二十斤重的桶，套在自己的颈子上。

这样做当然会减少参会者故意营造的紧张气氛，而使会议变得“轻松”一些。其它的程序我都很熟悉，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要因挨打大喊大叫，使得这种用刑，达到预期令人恐怖的目的，只是对这帮子赴会的无赖，最好的方法是闭口不答，装聋作哑。不就那么气势汹汹的几下，是做给王干事看的，效果一经达到，大家就不再纠缠，而王管教如果离开，就等于散会。

使我没有估计到的是，303 狠命捏紧我的“洋铐子”，捏紧之后，内圈上的铁棘便深深地扎进肉里，洋铐子的自锁作用，捏紧之后非钥匙是无法松开的，铁刺扎入肉中，同铁钉子钉入十指间相比功力绵长而有力，钉指尖往往因创痛而使人昏厥，人一昏，便失去了令受刑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效果。

这铁棘扎入肉中却是一种长痛，特别是晚上睡觉，当手腕一动，那铁刺就像一把把扎入肉中的利刃，在剜我身上的肉，让我痛彻心脾。人既不会因一时剧痛而昏死，就只有提着神经来体验这种毒刑的功力。整个夜晚，那扎入肉中的铁刺合着心跳的节拍，一下一下地撕裂着清醒的神经，头上沁出了一颗一颗的冷汗，别说少顷安息，就是每一秒钟都在数着过，直到痛昏过去……

王管教和他招来批斗我的那一帮无赖，我可以置之不理，这扎入我肉中的手铐却使我痛不欲生。后来每想到此等酷刑，用心极妙，用不着下油锅、烧烙铁，劳神费力，只需轻轻一捏，便可以使人整夜，乃至持续几天几夜的疼痛不堪，实可作来俊臣《告密织罗经》之近代刑罚新发明而补入“刑典”。

如此用刑，几天几夜下来，我双手贴着手铐的部分便起了一圈血泡，两只手连着手臂已肿成了馒头一样，浓血顺着手铐往下滴。到了这种时刻，我便横下一条心，大声吼骂，痛斥侩

子手的法西斯手段。到了晚上，不断用脚和那滴血的手铐去砸那铁门，想藉此痛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

那几天整个监舍都在聆听我的哭喊和咒骂。开始，303 还站起身来踢我，但我拼命地吐他的口水，他自知没趣，看到我已近似发狂的样子，便不再理会我，任我在深夜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叫骂和吼声，直到我自己都吼不出声来……

三天以后，被折磨得不像人形的我，终于被解下了那副手铐。解下时，那手铐上，满粘着从我的手颈上撕下的肉屑。整个手颈已经血肉模糊，并从溃烂处发出阵阵带腥的恶臭，而手颈的周围结出了一串串像葡萄一样的水泡。两只手已发烫，那医生皱着眉头，彷佛在嘀咕“还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并发症，造成死亡和截肢都是可能的。”

只是我命大，靠着苍天的庇佑，熬过了又一道鬼门关。从此以后，每当我看见一些中共描写敌伪对中共党员所用的毒刑，便会自然联想到这一段经历来。真想不到，共产党监狱也会对我这种无过无罪的人，使用如此惨烈的刑罚。

第二节 石板坡看守所

解下手铐以后，过了三天，我便被押送到了重庆市石板坡看守所。那些日子，我还真记不起我是怎样端起那黑盅子吞食下那吊命饭的。

我早已听说过重庆市石板坡看守所，是四川有名的关押并审理各种反革命要犯的地方。被中共抓捕到的国民党重要官员，都曾被关押在这里进行审理。没想到当局把我当作了重犯。

记不得我是怎样被带进那幢被层层电网严密封锁的监狱大楼的，在进门处的一个大房间里，我被换下了所有的衣服，然后，跟着一个中年警察，走进了大约两米宽的水泥过道，过道里亮着电灯，仗着灯光看得清楚，水泥路面和墙壁周围都很干淨。绕过两个弯道，我已弄不清我被带到了这幢大楼的那一个位置。

带路的警察在一道铁门面前站住，拉开了铁门上的滑动风窗口，对着里面喊道：“08 号。”里面有人应声，带路警察说：“给你们舍房增加一名新犯，代号 419，从现在开始，要监督他好好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又是一记闷声的回应，那警察关上了风窗，从兜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铁门。

我恍惚地跨进了铁门，面前是一间大约只有十平米的小监房，除了门口大约占整个监房四分之一的地方，并与过道相平的水泥地面是空着的，其它地方都是高出地面大约一米高，用木材做成的“炕”，那“炕”围成了一个 L 形，很像日本家庭的榻榻米。

屋子里除了四个人和靠在空地左侧放着一个马桶之外，什么也没有。那炕上收拾得非常干净，正对铁门的位置上端坐着两个人，与之垂直方向坐着两个人，全都是光头，盘腿端坐。炕面的木质地面擦得很干淨，泛着浅黄色的反光，增加了房间的严肃气氛，这同南桐看守所发霉的地铺显示了水平。

08 号坐在对着监门的两人中靠右的位置上，看到我已进屋，便站起身来，招呼着原来监

舍中的其它三个人，依次挪动了一下各自的座位，在靠门的左侧腾出了一个空位来，那下面正对着放着马桶。正对着铁门的墙壁上，距铺面大约也是两米的上方，开着一条窄而长的缝，太阳光从那缝中射进了屋里，使整个屋子比较亮，足以看清监舍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

我环视了一下同监舍原先已住下的四个老犯人，那 08 号年龄大约已五十开外，表面看不像 303 那样粗野霸道，但从他那眯缝着的三角吊眼里射出的那股阴深莫测的眼光估计，他可比 303 狡猾。从四个人苍白的面容判断，他们都是住在这里有些时日的久客了，不像南桐看守所拘留的人皮肤黝黑,举止和言谈那么粗野。此刻我已经注意到四个人的目光正集中在我的身上，尤其是 08 号，它正盯着我那双包扎着纱布沁着血迹的手。

因为手伤，我无法爬上那炕，便脱下鞋倒坐在炕边，磨动着身子，归到了刚刚他们为我腾出来的空位上，仿效着他们盘腿端坐。我明白，刚刚跨进这里什么也没弄清楚的情况下，最容易祸从口出。监房对于新来的人宛如一个监视器，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马上呈现在审讯室的桌面上。新来的人犯除有审讯人员特殊的授意外，挨斗、挨打多半是因不慎而发牢骚、喊冤枉所致。

在这种当局严密监视的监房内，喊冤诉苦不但唤不起任何同监人的同情，反而会遭致意外的麻烦。况且我手上伤得那么重，拿东西都感到困难，不愿因自己语言的疏忽而带来新的折磨。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不再继续一片茫然，把自己摆在任人侮辱的境地里，我必须彻底埋葬一直控制着我的复学梦，从一个莫名其妙的、无知幼稚的学生位置上，开始转到与独裁政权自觉抗争的位置上来。在这种人生转折的关头上，我必须认真思考我该怎样走这条路，今后需要采取哪些方式和手段。

每天早上大约七点钟，起床号吹响，炊事员送进来的先是一盆洗脸水。老犯人们依次爬下炕来，先埋下头，从那盆中喝进一大口水，对着马桶咕隆咕隆漱起来，有的还将手指伸进嘴里上下搅动几下，再喝水漱口，将漱口水吐进马桶，便算完成了第一道漱口刷牙的工序；然后依次用双手在那盆里捧着水，将头埋入盆中，向脸上浇几下，重点是抹下眼角的污物，再用自己随身带的毛巾擦尽脸上和手上的水迹。算是完成了洗脸的工序。

我在开始的几天，由于手无法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也只能漱漱口了事。

两道工序完毕，大家复归原位，盘腿而坐，其中一人便开始用一张专用的帕子，借那洗脸水抹着炕面，抹去刚才溅出来的水迹和灰尘，等到一个多小时后，外面的人，将这盆脏水端了出去。大约九点钟那便是开早饭的时间，这与南桐相似，每一天监舍最主要的节目就在两顿饭上。

听到过道里微微的响动声，08 已经下了炕，恭候在门边。门打开，08 号从炊事员的手中接过两个面盆，其中一个装着一盆蒸好的白米饭，上面扣着两个洋瓷小碗和一个竹片，另一个盆里装的是菜，那菜的品模拟南桐上顿下顿都是萝卜茵好，以白菜和牛皮菜为主，间或还可以吃到豆芽、豆渣之类的豆制品，菜汤里还依稀可见油星点点。只是数量就少得多，菜盆子面上放着与监舍人数相同的盘子和小勺。

08 号接过两个盆子放在炕沿上，便站在炕下，手里操起饭盆上的两个小瓷碗，藉助竹片的帮助，先盛满两碗饭，再将两碗口对口地合上用力按住，旋转几次，再轻轻地拍着碗，使那两碗与中间夹着的饭团脱开，用手接着就成了一团光滑的白色饭球，另一只手从菜盆上取过盘子，将那饭球放在盘子中，上面再将一勺菜扣上，如此操作，每一个人都会聚精会神从 08 号盛饭、合碗、挤压、旋转、拍打，这几个在几秒时间里连续的动作中，精确观察出每一个饭球和每一勺菜的差异来。

分饭完毕，大家从 08 号依次接过饭盘时，还在互相盯着其它人的盘子，眼睛里还在嘀咕自己端的那一盘是“赢”了还是“输”了。然后才各自以不同的姿势和速度吃下这份“美食”。

吃完以后，必须用舌头将盘子舔得干干净净。据 08 号说这是所里面的规定，剩下的两个装饭和菜的盆子，也轮着次序由一个人用手和舌头将它们舔得像洗过似的干净。

初来的几天，因为手不能捧盘子就只好站到炕下，将盘子挪到炕沿边，像狗似的吃那饭团和菜，不慎撒在炕上的，也要用嘴去含起来吃掉。

回想起初入图圄的这段日子里，常为争一份饭菜的多少而相互大骂，甚至可以同 303 拼命一搏，打得头破血流，想我堂堂五尺男儿，拍着胸脯，可以叱咤风云，古之哲人视生死如归者何止千百。承继了中华精魂之我辈，落到如此田地，整日里竟为争那一口牢食，而到了此种可笑的程度，鼠目寸光都不足于贬，那一点人的正气和威严就这么荡然无存，岂不汗颜自愧！

从另一角度去想，也深深地惊叹中国人思维及观察力之精微，关在这里的各种智能型人物，不论其属于何类，都可以凭着目测，从那饭球形成的过程估出它们相差几克，看出同一勺舀出的两瓢菜有多少差异，如此智慧却偏偏地用来对鼻下这口饭食作计较；若同窃取权位的高层中，荒淫暴虐里埋藏的诡秘和龌龊的伎俩比较，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老大中华之贫弱的根，是笨？是愚？还是生性中的缺陷？

人到了处于笼中困兽的地步，又能做什么呢？不信你不妨去听听关在这里的“政治要犯门”在两餐之外的大量空余时间里，又在摆些什么龙门阵吧！

同南桐看守所的农夫们摆谈猪身上的哪一处最肥，以解馋为目的的精神牙祭完全相同。这房里的四位人物成天交流的仍是以解馋为目的的“食文化”，这仍是人处在饥饿中的一种生理本能的反应，似乎与身份、素质不大相关。

不过，身份、文化之不同其所讲的内容不大相同罢了。这里讨论的内容有重庆名吃：冠生园的点心、傅园的包子和颐之时的名菜。

当有人说到如何咬开那刚开笼的“富油”包子，那糖油便会顺着嘴角流溢的时候，都会吞着口水无一例外的称许它的美味；讨论家常菜肴的做法是另一个主题。常常因争论烧麦该放几两糖，香酥全鸭上蒸笼前该怎么酥制；芙蓉鸡片该选哪一类鸡脯并怎样下刀等等，可以争论一上午，这比南桐的农夫们就高雅多了。

大家讲到的好多菜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以前也从未品尝过。争论是难免的，每到争执不休时，总是由一个排在 08 号后面那位，年纪大约六十上下的人作裁判。听他介绍，他曾

是云南王龙云的私人厨子，能背诵前清御膳堂的菜谱，你若听他讲宫廷筵席便是他的父亲的绝传，办满汉全席光备料的厨子就够凑一桌人。然而，人随境变，当年视山珍海味如粪土的人，今天关在这里吃牢饭的香劲丝毫不差于任何人，争多论少，照样面红耳赤。

入这石板坡看守所的最初几天，一切都还平静，我照例不大说话，而是静听大家的龙门阵以排遣时光，双手的伤也在渐渐的好起来，可以端起盘子吃饭；只是有十来天没有洗过脸，脸上和身上觉得难受，但日子久了，反而没有了感觉。后来在西昌时，我接触到那些山上的彝族同胞，长年不洗手脚的，便不感到替他们难受。

（一）致死人命的批斗会

有一天下午，警察送进来一个看上去年龄与我相近的年轻人，第一次打破了十来天的平静。进来时，他的脸蜡黄而沮丧，被反铐着手，身上到处沾着血迹，看来是一个刚刚抓住，临时关到这儿来的犯人。虽然他有些惶恐，但性格挺倔强，满头乱发活像一个流窜犯。

08 号随即被叫了出去，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把他唤出我们这个监房，一定是布置对这小子的斗争会，逼迫他招供什么。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08 号回来，果然是宣布对新来者的“帮助会”。不过，我想，这种“帮助会”开起来恐怕比南桐要困难，参加斗争的人，除了我以外都可以配得上他称为伯伯，甚至爷爷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些人面容苍白而浮肿，即使暂时因淡食而没有水肿，也是得着“准水肿”病的老年人。

以老对少，动作迟缓，欠缺了那斗争会必用的拳脚功夫，恐怕未必能致斗争对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加上缺了那带着砖块的水桶，倘若被斗的那小子偏像雄鸡公般的不肯低头，又能如之奈何？

正思索间，只见那 08 号和那厨师连手，二人站在那小子面前的炕上，一声吆喝，一边一个抓住那年轻人的膀子，直楞楞地从水门汀地上拎起，将他脸对着大家，背对铁门，坐在那炕上凹成 90 度的缺口上，我从旁边看得清楚，支撑他整个身体的屁股有大半吊在那缺口上悬空着。

08 号又走上前用脚踢着那小子的双脚，迫使那小子盘脚而坐，坐在那种悬吊吊的位置上，正拼命的将身子前倾，使整个身体的重心能保持在炕的内侧，加上反铐着手，为保持重心，不致后翻的努力使他整个身体扭曲得非常奇怪。不一会，我已看到他的额上沁出一粒粒的汗珠。

倘若此时正前方谁若拿手轻轻的推他一把，让他的重心落到水门汀地面的范围，那么，他必会向后仰翻，反铐着的手不但无法在仰翻时紧急自卫，抓住炕沿或改善反翻倒跌的着地部位，反而会加速他的后翻。

如果真的从他的座位上仰翻而下，重重的跌下这足有 1 米多高的水门汀地面，其头颅极可能撞在铁门或坚如石板的地面上，后脑勺脑浆迸裂而亡随时都可能发生，或颈椎脊椎折断造成终生瘫痪，手臂折断终生残废等等悲剧。他小心翼翼地靠盘曲的腿，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想使自己的屁股离开那危险的缺口。08 号把他推了回去，并且索性在他的双膝下面一边

放了一个枕头，使他始终处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险中。

他头上冒着大粒汗珠，08 号发出冷笑，不紧不慢地说道："今天你干的事，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不交代清楚，你休想下来，明白吗？"此时他的三角眼里正流露出一种平时不曾流露出来的得意，彷佛在说："政府难以撬开的口，拿给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心中暗暗地为中国人的"聪明"和对同胞的残忍而叫绝。

谁说我们肆意践踏人权？古之"罗织经"可不适用于今天，时代在前进，使用的刑罚也要前进才好。

那小子双腿在枕上直打哆嗦，没出一刻钟，便用发抖的声音向 08 号哀求道："我说，我交代。"先前的倔强劲已荡然无存。

08 号并没有马上理会他，直等了半小时，只见那小子已汗流浃背才取下枕头，将他拉了进来。那小子显然明白，刚才自己如果稍稍失稳，往后倒栽下去的后果，这不是在拿命开玩笑么？监中死一个两个犯人算得了什么？片刻以后，稍稍平静下来，便开口交待道："家里已经有两天没有开伙了，我和弟弟两天已没有吃东西……"

08 号大吼了一声，止住了他的话头："今天不是来听你诉苦，现在要你交待犯罪动机。"那年轻人用恐惧的眼光盯着他，害怕又让他重新回到刚才的位置上去。

"真的，我真是为了抢吃的。"他好像在同政府争辩。"一大早，我就像从前几次那样，守在中山路口那家国营食店门口，寻找下手的机会，但是从早晨开始，来这儿买面的都是比我强壮的年轻人，他们都带着盅子，盅上有盖，抢那盅子很不容易，挨顿打什么也捞不到的事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虽然我饿得慌，但只能等机会。到了中午，终于来了一个妇女，三十来岁，她和前面几个来买面的不同，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大碗，肩上还挎着一个女式用的手提包。我想，机会终于来了，便紧挨着她，装出也是在那窗口下买面的样子，那女人并没有注意我，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个钱夹，从里面拿出了粮票和钱，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儿，从那窗口里递出来了那碗白花花的面条。当她刚接过碗正转过身来的一刹那，我双手一起向那碗中抓去，从那碗中抓着一大捧面条，也不管有多烫拼命往嘴里塞。那女人惊慌地抓着碗，另一只手却狠狠地抓着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向那窗口下的墙上猛撞。我挣脱，忽然看到她挎在肩上的挎包，正打在我的腰上，我便毫不犹豫地去抓那包，猛地从她身上拽了下来，没命地往街上跑。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还没有跑出那条街就被警察逮住，挨了好一顿打，便送到这儿来了。"

年轻人一口气便将过程讲完了，08 号并没有制止他，按监规规定，犯人是不准相互讲案情的，当然更不允许在这种公开场合讲案情。08 号是否得到官方的授意，我不知道。

"胡说，你既是抢吃的，怎么去抢那包？"08 号喝问道。"那里面有钱包，有粮票和钱。"年轻人回答合乎逻辑。"胡说，你明明是抢那皮包，你抢面条是虚晃一招，抢包才是你的目的，老实告诉你，今天，你不把抢皮包的目的交待出来，休想过关。"08 号终于挑明了"帮助会"的主题和宗旨。听到这里谁都清楚那包里有谁都不能动的东西。年轻人似乎也从一头露水中清醒过来了。他除了看准了那钱夹子里装的钱和粮票，他也许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说，你为什么抢那包？是谁指使你的？”08 号站了起来，向他逼了过去，那年轻人恐惧的望着他，带着哭声哀求道：“我真的是饿极了。我抢面条吃……”他语无伦次起来。

但这并不能挽救他。“那么，你就好好反省吧！直到你想说为止。”号恶狠狠的将他重新推到了那空缺上，并且在他的两膝处重新垫上了两个枕头。

监舍里又重新回到十分钟前的状态，我只见他脸色苍白，整个的炕上已感觉得出他那种剧烈的颤抖。“啊！我说，我说！”年轻人的两腿显然已支持不住了，他的喊声带着恐惧和哀求。08 号向他渺视了一眼，并没有理他。

一分钟，两分钟，突然，那年轻人恐怖地吼了一声，直挺挺地仰天翻了下去，在那最后一刹那间，我还能看到他带着无奈和痛苦的脸。接着，便是一声重物坠地时发出的沉闷响声。

全监舍的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在一秒钟的寂静中，我看见他的头正撞在铁门边上，一只脚还倒挂在炕边。我判断他昏过去了。08 号却蹲在炕沿边往下看。“耍什么死狗。”他嘀咕着便下了炕，我看见血已经从头下沁了出来。08 号按动了报警铃。

五分钟以后，监门打开了，两个警察将他拖了出去，我最后看了一下他惨白的脸，铁门重新又被重重的关上。

一个不祥的预兆爬进了我的脑子里，我下意识地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心中喃喃念道：“可怜的生灵，可怜的中国小老百姓。”

那小子再也没回来过，外面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

我在石板坡看守所经过了十五天，双手才能握笔写字。提审员将我传去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写出材料，交待我写的“反动文章”。我知道，这是认定我“反革命罪”的第二道程序，实际上就是“终审程序”。

重述我的观点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我“认罪”却难办到。我不需要谁来“帮助”，我没有任何行为可以隐瞒，我坦然地面对法庭，按照我所确定的路子走下去。

“装疯”曾是我被划右派和沦于狱中最无奈时刻用的护身法，我既无力去打倒这种疯狂的专制，又骨鲠于喉不能痛斥这种苛政淫威所苦；既不愿屈从于毛泽东的阳谋，更不屑那跪地叩首，从狗洞中爬出的下流动作，只好用装疯来表达我对现实的愤怒和反抗，宣泄被压抑的痛苦。

在石板坡看守所一个多月的韬光养晦，写成交代材料，准备入狱以后，与当局抗争到底。

第三节 回到南桐看守所

第二次回到南桐看守所，与初来这里时的“学生心态”已不同，短短八个月的监禁，使我再次亲眼目睹了“三面红旗”的成果：人民公社荒芜的土地；至今还隐没在荒草丛中的小高炉残垣断壁；老百姓长期忍受着缺吃少穿而不敢言说。

这年夏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赵凡，我俩在放风时相对凝视良久，那晚又勾起了我对赵家

弯的回忆，很想找机会问他，怎么也落到我这个地步。但没找到这机会。

看来他与南桐看守所的 303，石板坡的 08 当属同一类型，这是些人类社会的渣滓，曾是“革命”的柱石，当过中共的枪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后来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变成了另一批枪手的牺牲品。毛用权和利作绳子，牵着他们的鼻子围着权势团团转，可悲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可耻。

而我正好充当了毛皇上登基过程的牺牲品。

监狱反省，使我弄明白划我右派的原因：那用“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层层包装的，已被民国废弃的，一人死罪，满门抄斩的连坐法，进一步为毛泽东恢复，并创意为“烙印”罪。

“成分论”乃是无穷冤狱的源头，在历次运动中被中共击倒的父辈们，被重重地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踩在最底层后，无辜儿女们，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奴隶，成为中国最大的冤海！这些受害者，越用低沉的哀告以求躲避，越被整得惨！

有一位昆虫学家在他临终前说：昆虫的四肢是那么长，而我的生命是那么短！那是对生物生存长河中，不留下痕迹可怜苍生的惋惜。时间对于人的价值，就在他短短一生中留下些不被人遗忘的东西。

可惜，我竟落到了一个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的可悲年代，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真觉得活得太累，那时间太长太难过去，可我观察周围浑浑噩噩的人时，我真奇怪，生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为了几片肉和几俩粮食，可以费尽心机，这同成天觅食的昆虫有何两样？尤其是那些暂时操纵权柄，肆意浪费别人生命的人，生命对他们实在太贱了！

1960 年 9 月，我带着略呈水肿的身体，背着破被裹就的行囊，提着那口从家里带出来的破皮箱，在警察押解下离开了南桐看守所，到了重庆弹子石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人转运站”，开始了我长达十九年的劳改生涯。记得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被叫醒，从保管室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便被押上了一辆警车。车出南桐时，最多是早上六点钟。

第四节 大跃进后……

此刻，1960 年 10 月份，我结束了两年多的“右派改造”生活和八个月的监狱生活，彷佛一直在一场漫长恶梦中跋涉。我的炼狱还刚刚开始，我将去的地方，是一所更残酷的人间地狱。

我从囚车的窗缝中向外窥望，三个月前当我从南桐到石板坡看守所时，由于双手伤势严重，几乎没有留意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

后来，我从石板坡看守所重返南桐时，囚车的窗门又是紧闭的，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次，到弹子石监狱的途中，承蒙开车人照应，一路上窗门大打开，手上又不戴手铐，我可以附在车窗边上较为自由的，对重庆市的街道容貌好好认识一下。

我想：阔别整整三年，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指引”，经过持续三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再怎么说也应当有一点新的气派。虽然，我在狱中，重新进来犯人的口中知道，市民每月只有十八斤粮食的供应，每年只有五尺布票，街上买肥皂，火柴都要票；买不

到副食品，连盐巴也是每月二两的供应。国营食店里经常出现抢饭和面条的故事。

但百闻不如一见，真想看看这城市被三面红旗搞成了什么样子了。

当囚车开进南坪以后，街道便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同两年前一样，街道依然是那么窄，汽车行驶在开裂的路面上，因坑凹太多，颠簸不已，所以行驶速度很慢。街道两旁依然是十年前泥墙、夹砖柱结构的老房。这种黄色和灰色的建筑，高矮不一，使街道变得“衰老不堪”。

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平民住房，商店就夹在矮小的平房中，偶尔一幢三层楼略加粉饰后，鹤立鸡群的引人注目。配以横置木匾上写着“××路国营商场”的招牌，几乎成为这条街最豪气的代表。不过，这一天大概不是星期天，出入商店的人并不多。

囚车经过两扇朱红的大门，我看清楚那门边的两排货架上摆着稀稀拉拉的布匹。想来这年头，成衣太贵，贫贱的市民们都是手持布票去商店买布，再到缝纫铺中去打或拿到家中自己裁缝。

往里看去，便是热水瓶、面盆、瓷盅之类的搪瓷用品，从那里面走出来的人手里拿着毛巾、肥皂、火柴可判断，里面是些消耗性日用品，那年代买这些消耗品多半是要凭票供应的。

说到这票，1960 年市民每人的布票仅仅三尺，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当时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指的就是三个人一年的布票加起来才够买一条裤子的意思。

这话当是市场的供应实况，没有任何的贬义和夸张，可是后来竟变成赫光头猖狂攻击中国三面红旗，引发“中苏关系破裂”的罪证。

囚车再往前走，街的右侧夹在矮小的平民居舍中，在一个平房结构，铺面很宽的商店面前排成一个长长的队列。那队列是由老太婆和中年人组成，手里各拎着一个竹篮。门上立着的招牌上书：“××街蔬菜公司”，那里面可是人声喧哗，人墙严严实实挡住了里面的货柜，看不清店里的陈设。

我从那拥挤人群的篮子里，看到了牛皮菜和萝卜。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在那里抢着一个篮子，我听见那柜台里传出来争“两”论钱的吵声。

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粗野的骂声，给死气沉沉的街道增加了一点闹意。

囚车继续向前开出大约五十米，又见一个门口挂着：“××街二段缝纫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本店服务项目，其中竟有一项是“补缝归衣”!

看那很狭窄的店面里，悬挂的竟是一些洗净了的补巴衣服！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们的衣着，与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装为主体的衣着没什么区别，色彩依然的蓝、灰、白，三种流行色。

只是所有行人身上穿的全是补了巴的。区别仅在于补巴的整齐不整齐。那巴很有规律，按上衣四点式：两肩，两肘；裤子三点式：两膝、一垫，几乎是统一的。

还有的几乎连巴都没有，巾巾挂挂的一身，那似乎不像乞丐。不过在那个年月里，老百

姓的日子恐怕连乞丐都不如。在这稀稀拉拉的店铺中，这种补巴为业的缝纫铺，生意顶火红。

那个年代老棉布是我国唯一的纺织品，老棉布不经磨，一件新衣服，如果小心保护，最多也只能穿一年就破了。布票那么缺，怎不是“遍地补巴衣，不见新衣人”。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在报上注销，叫“节约是美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毛泽东鼓吹节约仍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

不过在这里，实在同他自吹自擂的“市场繁荣”形成反衬。我不禁惊叹，中华民族子民们忍受饥寒的耐力，堪称世界诸民族之最！需知同一时期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拿出来救援受灾国家灾民的，都难找一件像中国百姓身上穿的千巴万补的破衣服。

已接近十二点钟了，街的左侧，一个很狭门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那店的门口挂的木板黑字，写着：“××街二段国营食店”。门口几个戴着红袖笼的中年人正在游弋，突然从店里窜出两个扭成一团的人，并没注意正在缓缓向他们驶近的囚车，囚车紧按喇叭，喇叭的尖叫声并没提醒那两人，囚车被迫停了下来。两个戴红袖笼的人按了过去，一面怒吼着：“把他们两个人带到看守所去，真他妈不要命了。”

旁边站在队列中的人叹息说：“凭什么为二两粮票打得头破血流？”我再去看方才厮打的两个人果然脸上都挂了彩。在红袖章的干涉下，两个打架的年轻人才分开，在司机一再鸣笛声中，围观的人让开了道。

我回过头去再望了望那渐渐离远的街道，就没有看到一处糖果铺和水果铺。它们在长长的街道上消失了。至于肉店，禽蛋商店现在也所剩无几，肉和蛋统统留给蔬菜公司凭票出售了。

整个城市像死一般的沉寂。马路上看不到几辆破汽车，也看不到忙碌的行人，九月炎热的余威还控制着城市，随着疾驰的风带进囚车，带进我耳朵里的是一些隐隐约约念经的声音——听得出那是街段的居民，按上级安排组织朗读报纸和文件，传达党中央的大跃进“捷报”。

我感到了疲倦，开始打起盹来，耳朵里隆隆的发动机响声带我进入了梦乡。离家似乎正在靠近。我现在明白，我已经不能回去了。说不定是永远不能回去了，还好，就让我默默无声的离去吧，悄悄的走开，会避免一场临别的大悲恸……

我又彷佛看到了外婆那花白的头。我不敢想，否则我的心会立即出血，二十年后，九死一生的我重新踏上回归的路，他老人家已与世长逝了整整十五年了。我连她的骨灰盒都没有找到，当我将她的遗像放置在我卧室的衣柜之上，我才号啕大哭了一场，天哪！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

弟弟在哪儿呢？可知今天哥就要离去，赴那地狱的煎熬么？想到今后，家的重担将会落在你骨瘦如柴的双肩时，泪就会充满我的眼眶，我哪能回答你稚气的发问：“哥，你怎么会犯错？”今天当改口问：“哥，你怎么会犯罪？”

妈妈，我去了，我知道这些天您比我更沉重，如果说我还有一层孩子的稚气和健忘，保护我幼嫩的神经免受过分悲伤而失常。而您一直在用母爱承受我们四人的所有不幸，现在担忧这一老一少的脆弱生命受到威胁和折磨。

此刻，我只有深深的祈祷苍天，不要再将新的灾难降给无辜的孩子和老人，让我们母子俩在天涯两处，共同面对着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十年、二十年！

我知道我将去的地方是我的父亲先我十年去的地方，如果苍天命定了我们父子俩将归宿于此，那么父亲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命运之神会不会安排我们在这里相聚？。

第五节 孙家花园监狱

囚车在颠簸的街道上，足足开了一个小时，绕过了好几条小街后，驰到了一道巨大的铁门前，那铁门旁边没有悬挂任何的标记，他的右侧，一座大约十米高的岗楼上面，隐约可见架着的机关枪和荷枪实弹的哨兵，守门的是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从押车人员的手里接过一张纸，验过以后，便打开铁门栅，囚车便缓缓的驰了进去。

（一）入监

一进大门，左侧是一个很宽的大坝子，大门左侧靠马路的围墙内，是一个高出大坝一米多高好几百平米的看台，若遇到开大会时，这儿便是临时的主席台。

大坝子周围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绑起来的临时工棚，里面放着许多长条的钳台桌和钻床，马达之类的设备。大门右侧是两排很长的厂房，那里面机器在轰鸣。

这孙家花园原是一个从毛铁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齐的机械加工工厂。许多穿着蓝色背心、背上隐约有劳字标记的犯人，就是这儿的工人。

囚车一进监门，在左侧的空地上停下，车间前方的一排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身着白汗衫的中年人。在双方交接之际，我下了囚车，虽然天气很热，但心却很冷，一阵莫名的颤抖控制了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几分钟后，我从车上拎下了那又破又脏的“行李”。

偌大的中国国土上，被这些小监狱密密麻麻的控制着，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这儿被称为“下水道”。那监狱的墙壁和车间的墙上全是与大街上相类似的标语，仗着警察和刺刀，监狱对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钟以后，白汗衫领我走进黄色办公楼。我拎着那两捆破烂跟着他，到了办公室门口，叫我站在门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进去办了交接手续，大约一刻钟才走出来，白汗衫在腋下夹了一个档案袋，领着我向那一直通向里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这时已近正午，车间里的蓝背心们陆续从车间里向外涌，他们看见了我，向我投来了一束询问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说：“又来了一个不识时务的。”

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挤在车间外一长条洗手水池边，用木屑和沙子搓着满手的油污。然后，陆陆续续的又走回车间，拿着自己的“碗”，这些硕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脸盆和铁皮制作的餐具。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在当时就留下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以作为后辈

人对这个时期监狱生活的活证物，就像当年在大邑县地主庄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处搜寻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们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样。

一个臂上套红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劲吹着口哨，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在饭桶面前按车间排成了十几个队列。红袖章挨着队列从左到右队清点人数，清点完毕，便小跑到站在队列左侧的，也是穿着白汗衫的人面前报告了人数，只见那人挥了挥手，队列分成两排便开始蠕动起来，鱼贯的走到两个大饭桶边，由站在那儿的炊事员依次发给一盅“罐罐饭”。

接过饭罐的人，将手中硕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着舀菜的那勺子舞动起来，生怕炊事员打起来的那一勺菜，因碗没有及时凑上去而洒到菜盆里去了。接过菜的蓝背心们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头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对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后，兰背心们便端着自己的“饭”、“菜”，回到自己那个组已围成的圈子里，席地而坐，并把盅子里的蚕豆倒进硕大的碗里去，一边数着那豆的粒数，几乎无一例外。

我至今还记得，领到手的如果是蚕豆，每一两大约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两大约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黄豆，大约每两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种不同有三两、四两和五两三种份额。翻砂和运输工种最高，电工最低，按两数数豆粒可算一种求放心的游戏，倘若吃到的粒数与额定粒数多了出来，便津津乐道向同伴们夸耀称自己运气好。倘若，颗粒数不足，便嘟哝着说自己运气不好，这一顿“输”了。

我跟着白汗衫走过了那足有百米长的水泥过道，再缓缓的顺着石阶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带上的小山头。这儿是一幢很宽的两层楼房，四周围着整齐的花圃，花圃与楼房之间环绕着一条一米多宽的三合土通道，周围打扫得倒也干净。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铁门。从铁门进入黄楼是一条宽约两米的木地板铺成的信道，信道两边便是一些很大的监房。我们进去时巷道里正在开饭，一些头剃得精光，面容苍白，穿着清一色蓝色囚服的犯人正排着队，在一个饭桶边领取饭菜，与下面坝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参加劳动的人小很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并没有用铁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将一名正在发饭大约五十多岁的老犯人叫到门口，高声向他吩咐道：“方伯非，这是刚来的新犯，你看现在哪一个组还有空位，安排一下。”说着便独自离去。

那姓方的一只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头发已经花白，他向发饭的炊事员交待了一声，便领着我顺着巷道往里走。

在巷道尽头，他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锁，一股霉气向我袭来，我把我的破烂写上我的名字，放在货架上。他又打开了隔壁的房间，从那里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样的被盖和蓝色的衣裤，交给我。

接着又领着我返回巷道，把我带到了门上写着 4 的房间。那房间足有六十平米宽，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个地铺，每一个铺上放着蓝色的棉垫、蓝色的被子和枕头。那铺位上

已坐着十几个人，此时他们都在津津有味的数着自己罐里的胡豆。监舍组长的铺位是靠门右侧的第一个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边第六个铺位上。

我将所领的衣被放在我铺位上以后，第一个动作便是去领我的中饭。自入狱八个月来我还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时感到十分的困乏。当我领过那最小一号的饭盅，顾不上去细看饭面浮渣，也没有去数那盅子里的豆颗数，狼吞虎咽吃下入监的第一餐饭，吃完便倒头睡在刚指定的铺位上。

整个黄楼分为两层，过道尽头便是到二层楼的楼梯，楼上八间监舍中住的全是在车间里从事机械加工的犯人们。住在底楼的六个监房中是等待转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还有两间特别小的单人禁闭室，底楼六个监舍中一共有一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诉、“案情待定”的上诉者，和从车间因“抗拒”改造，交到这里来进行批判斗争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监规，静坐反省和交待“余罪”，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这些年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或因无法忍耐饥寒交迫而奋起反抗的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凡是不认罪守法，打上诉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规定的，具有最高权威性，反对党的政策便是反党已是无疑，因反对错误政策而划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认倒霉，于是“申诉”不断。申诉再次触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当局施加的压力也越大。

解决这个无法调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这楼下的“新犯组”，经常开斗争会，吊水桶、捆苏秦背剑、以“端正态度”为名的拳打脚踢，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那时间常因公开喊吃不饱，或因饥饿逼迫“企图越狱”而送来批斗的人特别多。

以“吃不饱”为内容的斗争会，往往开起来变成了对现实的控诉会，红毛犯人常借人之口，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成了对当局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儿的白天十分热闹，骂架声、打人声、充斥着这里。

清晨五点钟，东方还没有显出鱼肚的白光，监舍外花圃里欢叫的蟋蟀还没有停息它们的鸣叫，整个监狱还浸沉在黑夜的迷蒙中，那令人心惊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声刺破了监狱上空的宁静。

“东方红”开始曲后，便是那单音调的呐喊：“社会主义好。”这调门没有改变，歌词却作了修改，然而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咒骂，还是对右派份子的咒骂，一清早刚睁眼，就被它弄得神经兮兮的。

大监各监舍的组长立即从铺位上跳起来，用脚踢醒那些入睡还不到两小时，此时还沉睡在梦乡里，困乏不堪的“劳动力”们！他们中大部分人大约在凌晨三点钟，连脚都没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钟以后，那杂沓沉重的脚步，逐渐向楼梯口移去，一阵下楼的咚咚响声以后，脚步

又经过我们舍房门外的过道。

木地板上的敲击声和四壁的回响，使我们睡在楼下的的人再也无法安睡。刚刚熄去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灯和岗楼上的强光探照灯都一齐打开，在强光的护送之下，一群蓝灰色的影子忽长忽短的由广播乐曲伴送着进了车间。

接着便是隆隆的机器声，把整个的工厂淹没在"跃进"之中，大跃进的又一天就这么开始，隆隆的轰响一直在监狱上空盘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新犯组规定住在这里的犯人，早上六点钟起床，按照监规的规定，起床的哨声一响，全体人员都必须爬起来背靠着墙静坐反省。等到七点钟，值班的管理人员打开监舍的门锁，大家才走出铁门，在大楼右侧的洗脸池中取水洗脸漱口。

七点半钟，炊事员送早饭上来，八点以后，吃饭完毕便开始监规学习，或继续前一天晚上没有开完的斗争会。斗争会是新犯组的主要内容，晚上依然是这种堂会式斗争会，有时一直开到十点钟还没有结束。

与看守所完全一样，这儿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及时发现，斗争会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平时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饭后的休息时间被允许在黄楼周围散步，可以围坐在花圃周围捉虱子。

我们监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水肿病，即使很年轻的人行动也很吃力。平时无论是开斗争会或在花圃边纳凉，谈论的主体必是"吃"。

晚上开饭，全监人员不分工种一律二两，开饭中，端着硕大的洗脸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着炊事员手中的勺子上下飞舞的戏，当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两瓢以后，桶中的饭一般都有剩余，于是便挨着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监不同于小监，那装着稀饭的大黄木桶虽然已被刮尽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余的残羹，是无法用瓢清理干净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后一人，炊事员便会将桶交给那个人，任他用手指细细地在桶边抹净，有时遇到稀饭较稠的时候，那从桶上抹下的足足有两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大坝子里抹桶的事，让新犯的一个名叫王三的小伙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员在坝子里分稀饭，没空光顾小监送饭的机会，混在上班人的队伍中到了大坝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马上端着预先准备好的"洗脸盆"，接过那最后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净的饭桶，正用手细细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残羹时，新犯组正四处寻找他，方伯非气急败坏的报告值班干事。

当两个套红袖套把王三在坝子里捉到，像拎小鸡一样送到方伯非面前时，仔细看王三，那光头上还沾着在刮桶时糊满的稀饭浆，一面还喃喃的叨念那脸盆里已经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饭"。

王三成了我们监舍当晚斗争的"对象"，这王三说来聪明，他发现了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意外食物，为了王三这种"浪漫"，黄楼小监里的一百多号人被管紧了几天，不准我们走下那

石梯阶。

虽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残害，但人心不蛊，想从这地狱里象狗一样爬出去的人到处都是。祸从口出的意外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告密，更无所谓可耻。为了给自己已经很苦的日子，少添烦恼，所以我对紧邻的前后铺，有一种特别的谨慎，前面铺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监的一贯道首，从不与他交谈。

（二）张腊元和王大炳

我宁可同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他俩都是长寿地区的农民，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们质地纯朴，虽文化层次极底，但与他们相交起码少了提防之苦。

黄楼右侧，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坡道下面，是铸工车间倾倒化铁炉排出的炉渣和废铁芯的地方，每天从监房清扫出来的垃圾也倒在那里，所以有些破布、用废的围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们俩人常来这里捡些破布，洗净后用来修补自己的旧棉衣。日长之后，我也跟着他们在这里捡破烂。

有一天，我见张腊元独自坐在这里发呆，从他那瘦削的肩头侧面望去，只见那清瘦的脸上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好像哭泣过，可是眼里并不见泪水。王大炳说他这样对着臭气，可以蹬上一个上午，发呆以后，长叹一声慢慢离去。

从他记事时就没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时相继亡故已说不清楚。十几岁开始，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农村中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开始了缺吃少穿过日子，从十二岁开始，他跟着哥嫂每天在生产队的土地里挣工分粮。

后来小侄子出生以后，晚上带孩子的事就交给了他，白天干活已很劳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保姆那样对孩子按时施尿，尿床是经常发生的，而他哥哥便经常迁怒弟弟身上。老实巴交的张腊元，身上到处是他哥嫂用柴块给他留下的伤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岁的张腊元，由于天生的呆笨，哥嫂不仅克扣他的口粮，把分到的很少的谷米，留给自己的孩子。并把剩下的杂粮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红苕滕是专给张腊元准备的，另一盆加上包谷面是留给自己的，吃饭时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们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这是哥嫂对他的虐待，但却不敢说。饥饿的张腊元很快得了水肿，他只有拼命在山上寻找野果野菜充饥。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时，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饭盆里去抢饭，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惊呆了，拿起饭瓢往弟弟头上猛砸，哥哥闻声从里屋走出，两个人给张腊元一顿好打。满头血迹的张腊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头，猛然轮起了斧头……

血案酿成，张腊元投案，本来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脱下衣服，显示哥嫂给他留下的无数伤痕，然而，善良而可怜的张腊元，口口声声说他杀人该抵命。

法院根据邻居的介绍和他的年龄免去他的一死，判决了他的无期徒刑，在孙家花园关押

了几个月，便转到了南充监狱去了。

我们短短相处两个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无期徒刑对于张腊元公平吗？他的罪孽又是谁造成的？每每我在回忆到他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张腊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诉衷肠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据大炳的自述，他早年丧父，母亲在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抚养他和弟弟两人成人，按当地农村中的普遍情况，找一个能维持生计的劳动力嫁人，于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给了当地一个李姓的小光棍。后来，年仅十六岁的王大炳，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重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没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联社时，姓李的抛弃了人老珠黄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变迁，重创了他的母亲，母亲吵不过那个姓李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们的房子晚上失火，蛮不讲理的继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烧死他，理由是火灾的现场发现了一双烧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有人看到失火的当天晚上，母亲曾提着那双刚洗过的鞋进了厨房，母亲被领着民兵的李姓队长痛打一顿，抢去住房。

闻听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强占，母亲受伤，露宿街头，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长寿，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农村里中共党员的横霸，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以后，王大炳和几个同伴将这个事写成控诉材料在工厂散发，并被工厂保卫科以煽动反革命传单立案起诉。

苦难使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劳改工厂

我在新犯组只呆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制作电机转子用硅钢片的冲模钳工一组。里面放着十来张宽大的钳桌。每张钳台上安装着六至八台数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钳，可以容纳八个人在上面同时干活。

我刚到车间，钳桌上钳工工具和马达的另件混堆着。从马达机壳，转子绕组、硅钢片和螺丝螺帽锉刀宰子等等无序的堆放状况便知道，这是一个管理极差，章法极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类似中世纪的工奴，没有习惯，也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铁货架上杂乱的堆放着零件，弄不清正在组装的，还是报废的。

把我引来的“红袖套”向我介绍，其中一位大约五十来岁，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孙经海，是整个钳工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听大家说它是一位八级钳工，当时，整个重庆市像他这种级别的钳工屈指可数，能凭手工制作零级块规。是这模具组的掌火人。

先于孙经海以前的钳工组技术负责人，因制作模具冲出的硅钢片用来装机后，发生温度

超过技术标准而报废了一大批马达，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并流放外地。

那百吨冲床还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汉阳造，属前清张之洞时代的遗产，早已报废，加上测量手段几乎只有一个百分表，在配制时没有磨床。孙经海口中不说，心中却犯着愁。以为这简陋的设备和加工条件搭上一只手不说，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辙就是喊冤也没用！

从此以后，直到从孙家花园调出，我便与铣刨组编在一起学习。

划线平台的后面并列着两台冲床，靠广场的一台便是夺去了孙师傅右手的 100 吨冲床，是一台大约服役了几十年的老掉牙的设备，稍不留意便会造成硅钢片批量报废，或打烂冲模。横过车间中过道的左边安放着四台铣床和三台立式钻床，四台铣床中最大的一台旧式铣床，是当年中共新华社印刷传单的大型印刷机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铣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开外，但精神挺好，穿着的那件补丁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显出它与常人不同的身份。经过介绍，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内战时期任过浙江金华县的“县太爷”，在国民党部队中供职汤恩伯部下，任少将军衔。那段日子他终日沉默寡言，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与他同机床共事的是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年青人，名字叫陈旦，外表看去很老实，甚至有点招人怜悯。

这台卧式铣床的后面摆着两台立式铣床。一台较新铣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苍白而浮肿。另一台铣床上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平时阴阳怪气的，永远是打不湿扭不干的那种。

我刚调进车间时，陈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来我的划浅平台找我聊天，说他从前是××中学的学生，因家贫，读不成书流浪街头，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图。后来每次吃饭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来。

有一天晚上陈旦从沈师傅的工具柜里偷了一块肥皂。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便为难别人，颇有些为陈旦不平，便注意地听起来。只听见那姓潘的愤愤地喊到：“你真没出息，年纪青青就知道偷，进到这儿来还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里厌恶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脚下踩的作风。虽然我知道，那时间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凭票供应，每人每季仅 1/4 联，车间里发给大家用来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硷和锯木面。

只见那年青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下班晚了一点，硷盆不知放那儿去了，我看沈师傅的工具柜开着，顺手拿来用一下，就忘了还回去。”他不停地眨着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吼道：“不，你这娃儿不老实，上个月还偷了我一块毛巾，国庆大检查才查出来，你是惯偷。”“真不要脸。”潘老汉继续在升温。我感到过份，他还不是因为太穷才偷，在今天这种物质条件下，谁也犯不着为这么一小点肥皂而遭人辱骂。我一边听着铣床

组传过来的七言八语，心里很为陈旦不平，也对那潘老头产生了反感。

没想到过了才一个星期，负责洗刨组的张管教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大大地训斥了我一顿，他把我向陈旦讲的很一般的话，例如说："形势大好什么都买不到"、"大跃进吃不饱"、"活有你干，饭不让你吃饱"全都抖了出来。

他严厉地警告我说："政府看见你年轻，又是机械制造专业的，才相信你，允许你单独行动，你还反动本性不改，在监狱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后，要我立即写出反省，否则就要召开车间批斗会。

我着实地小看了这可怜巴巴的陈旦，没料到，与我做出伪善友谊的他，竟会用我的话来表现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刑事犯罪的人特别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劳累的监狱中，人们缄口不言的原因。

另外也开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对待他的学徒，平时又为什么冷冰冰的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开始接近和交谈。不过，看得出他在告诉我有关他的身世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并不作评论，也不讲他的感情，在那种环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

从他的介绍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战场上与中共打过很惨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准备潜入香港被中共发觉抓获。当时没弄清他的身份，在广州服了两年刑，刑满后回到重庆，正逢大镇反，他便在枣子岚垭被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来的伤悲告诉我，他内心一直牵挂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爱人。也许就因为这种身份，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监狱中的挚友和老师，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含着未能伸张的怨恨离开人间。

（四）邂逅蒲世光

由于我的特殊工种，我被允许在所有车间单独的走动，被允许单独上厕所。当时的厕所在翻砂车间旁也只有一个。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见邻位置上冒出了一个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几乎惊叫了起来，这位当年青年团冶金系团委书记，曾以人很难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的大字报，并因此而定罪为组织反革命集团。

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被捕时，我也只在冶金系大门口见过，他被捕后，我们七十六个同学被押往南桐，从此与他断了音信。当时，只觉他怎么会为家庭有问题的"阶级异已"者鸣不平，并因此而蒙冤，所以，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印象却很深。

两年后，经过南桐的煅练，对他深刻的印象中渗入了一种敬佩。在这里，他突然的出现并被我认出，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了。然而，他却并不认识我，他见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诧异，转过头去看了看与他一同上厕所的另一个人。我只问了一句："你在哪个车间？"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车间"，便带着一种疑惑匆匆离去。

由于连续的日夜鏖战，几乎没有时间洗衣服。冬天到来的时候，有时连续一个月没换过

内衣，也从没洗过澡，加上转运站来往人员复杂，衣服和被盖上染上虱子习以为常了。坐在过道里，脱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时间的一种消磨法。人在那种环境下，同乞丐已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虱子令人烦恼，所以每当化铁炉开炉化铁的时候，便会有人通知各车间去那里烫虱子。那方法极为简单，只消拎着铁桶装半桶水，将化铁炉内排出来大块的带着火花的炉渣，用铁钳夹进盛水的桶里，在一阵爆炸声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会沸腾，然后再将长了虱子的衣物按进沸水中……换下来又臭又汗内衣，没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这种方法兼去油汗。

借烫虱子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询问了我们去南桐的同学情况。我告诉他。去年杨治邦，李天德他们被抓进监狱了。问他碰见过没有？他摇摇头说：他不认识杨治邦们，也不曾听过此事。

接着便介绍了他自己的经历，自从五八年夏天，他从学校被捕后就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重庆检察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他起诉，这使他愤怒不已，在预审中，他要提审他的人，拿出“集团”纲领和组织成员的证据来。法院明知给他定的罪是强加的，于是回答他，非团员呼声编辑部，既是一个编辑部，那一定是一批人，还要他交待其它成员，只经过一次预审，便一锤定音了。

蒲世光就这样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两年，最后以趁中共整风之际，书写反革命标语，大字报、策划反革命组织，猖狂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大罪极恶，处以廿年徒刑。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当时，真要处以极刑，那又怎样呢？当法庭向他宣判时，蒲世光毫不犹疑地向法庭申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判处后，蒲世光便被送到这里，殊途同归，我们终于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来了。相同的归宿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政治目的牺牲品。

他告诉我这里共三个车间：铸造车间、金工车间和电工车间，并说出它们的负责人，看来他对这儿的情况很了解。

刚来的第一天，新犯组的李队长问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说：“一天！”“什么？”“一天。”他重复地回答着。李队长被这种明显的轻蔑和作弄惹恼了，立即厉声训斥道：“你给我放规矩点，这不像你在重大可以胡说乱言，老子对你的狂妄可以铐你，斗争你。”

然而蒲世光却笑了笑不紧不慢的回答道：“这刑期可是你们给我定的，这话也是你们讲的，怎么就不认？”“你敢顶嘴：你敢嚣张，你以为打不掉你的气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当下安排了晚上开斗争会。

晚上斗争会开始了，姓李的问道：“你说，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向政府说话？”他对着到场的陌生面孔，不紧不慢答道：“一天等于二十年，可是你们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判的就是二十年这也是你们法庭判的。我用你们自己说的话回答你，你怎么就听不懂？向我一个小犯人发火？”斗争者哄堂大笑，连那李姓的干事也忍不住把脸扭了过去。

用轻蔑的态度，讥讽鞭打横蛮的人实在是一种上智，何必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笑对着

暴政，笑对着今天，这种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修成的，“推古验今，所以不惑”。看来这位同学入门了。

我们本约定，下次开炉时，再在这里约见。可没有料到，五天以后他便被调走了，后来他到那里，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难生还的同学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间？他的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笑谈，却至今还流传在我们之间，与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与蒲世光相见前后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车间，邂逅南桐看守所认识的“319”。那是为解决一个车头箱的主轴孔加工余量不足该如何捕救时，我到了车工组那架老八尺车床上，当时他是这台设备的主机手。我最先认出了他，自从南桐看守所斗争以后，他被很快调走，就没听说过他的下落。至于当时在看守所，他如何会严重到像死囚犯那样截着全刑具入狱，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渐渐来临，1961 年最后的岁月充满了寒气。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在黄色的灯下触摸这些冰凉的铁块，全身都会发抖，人们说肚子里没有货，身上当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种内心寒冷所控制，废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车间的分队长，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盯着致废的工件咆哮，虽然有时参加斗争会的人，听着听着竟闭上了眼睛打起瞌睡来，他们显然是太疲劳了。疲劳得连这位分队长操起铁棍向他们刺来，他们只是白白眼。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

这牢头那里能体谅到在如此恶劣条件下，仅靠用手工操作的个人技能，是无法保证毛胚不会发生废品的。其实疲劳至极的人内心虽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并没有用废品来发泄不满的想法。在废品面前，人人都在动脑筋，如何弥补。

几乎个个明白，倘被队长认死了某道工序的责任，与破坏生产相联系，轻则遭到斗争，重则加刑！扪心自问，谁都不至于烂到在这安心坐穿牢底而不想回家的。划线工序是夹在各工序之间的，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难过起来，几乎所有废品的事件都要把我叫去。

有一天，见沈师傅的铣床四周，站着一大堆人，六名铣工全在那里，分队长也在那里板着脸，只见沈师傅哭丧着脸，双手下垂站在他的铣床面前，沮伤的面对着一大堆待铣的电机主轴。两个机修工已经把铣床的变速箱盖打开，正在卸下工作台。平时专供清洗另件的大油盆里面，堆着从变速箱里拆出来的齿轮，轴和其它零件。

他是一个在铣床上操作十几年的老铣工了，平时虽然不多说话，对工作却非常认真。那时由于每天几乎持续近二十小时工作，一般操作者在工作中打瞌睡，往往忽视对机器的维护，而他坚持每天对他的铣床实行保养，足见他对设备的爱护。他只有十年刑期，已过了五年多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的年纪也四十岁了，对工作不敢马虎。

大约一个月前，他曾向我讲过，这台铣床工作不正常，并且还拿出这台设备的说明书，那上面有传动机构的简图，想同我一起找找铣床每次由低速档换高速档时，发生异响的原因。

问题发生后，我曾多次看到他在每次停机的短暂时间中，打开变速箱盖，用手拨动齿轮，

进行检查，但是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我认为，新机床在使用初期，齿轮因齿面误差在磨合期发生异响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按说明书及时进行保养，更换机油，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要么请机修工，彻底的寻找并加以排除，那非得停下生产，至少也要花两天时间，这首先是分队长不允许的，只有等三保大修时再说。

不过机床可不像人，人可以带病每天二十小时工作，机器不行。

果然，几天后一天早上开机不久，咔嚓一声巨响，正在检查另件的沈师傅连忙去关电闸。但为时已晚，机床被卡住，再也无法启动。拆箱检查，齿轮箱冒着兰烟，主轴上一个双联齿轮被打烂。分队长咆哮着，铣刨组一片沉寂。我检起那已被打烂的齿，细细看着，想从那齿的缺陷中找到原因，替沈师傅摆脱他所处的狼狈局面。

从那刚刚断裂的白颜色断面看，显然淬火过大，但没有测硬度也未作金相分析，无法作结论。我又在灯光下细细看有没有旧的裂纹，再看齿形结构，能不能在过量根切上找到原因，但没有测定工具，也没有测量手段无法判断，这些非主管人所不能的。

现在，只有听凭那分队长在那里妄下断语了，一味只知道政治挂帅见物不见人，一味只知道暴力能征服一切，不尊重科学的人却是作结论的主人，就是这些横不讲理的大老粗，会吼人，会骂人，再把一切都归于所管的犯人。

斗争会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的铣刨组全是陈旧不堪的设备，就这么一台新的立铣，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钱买的设备，这一台当家铣床一停，由印刷机改制的铣床和另一台立铣床是无法承担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铣床工位，其后果可想而知。

幸好经过对变速箱的彻底打捞和清洗，除了在残油中找到了断裂的齿轮碎片，还什么都没有找到，否则那沈师傅有意将机床打烂，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行，便是无法抹去了。

“我确实请机修工检查过，但是他说，没有测量工具怎么检查？光凭肉眼也只能看看装配是否松动？销子是否脱落？半轴是否晃动？齿轮啮合面吃合得好不好？该装的垫子是否有漏装？润滑油是否加足？”沈师傅沮丧地哀求道。

铣刨组的人谁都知道，沈师傅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平时我与他接触就知道，凡是图纸上他没弄懂或工艺编得有误时，他总要叫我把车间调度叫来，直到弄清了以后，才敢动手加工。

三天后，买到新的齿轮装上，结果仍然换不起档，搭上挡开机，发动机嗡嗡直响，就是不转，看来，事故并未排除。修复方案拿不出来，沈师傅的祸算是闯大了，铣床组一连开了一周的斗争会，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大家已经疲劳之极，坐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从门逢里透进来的寒风，使参会者缩着头，分队长象审讯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样，朝沈师傅狂吼。

斗争会开得令人无奈，倘若不是因为没有比沈师傅技术更高的人代替他，他恐怕早已关进了小监。就是在斗争他的那一周内，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制了的，连上厕所都必需向组长报告。显然，检察机关已对他立案起诉了。

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把所有的罪过推在沈师傅身上。最后还是找到了机床原来的生产厂家，将整个传动系统全部进行更换，如此闹了整整两个月，才使这台设备重新运转。

三个月后，沈师傅接到法院的判决，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加判十年，合并原判二十年，但一直又没有将他调走，监狱的管理人员十分明白，求一个无偿劳动的技工并不容易，他们也知道沈师傅决不是故意破坏，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刑事处份，既可以吓唬所有在押人，还可以继续奴役这些技工。

后来，沈师傅的爱人接到他被加刑的消息，以为盼他出狱无望，只好与他离婚。从此以后，沈师傅更加消沉，人也痴呆了。

沈师傅的铣床破坏一案还没有结束，车工组发生一起学徒工组织逃跑的事件。三名学徒：唐元，徐均和胡大鹏先后被推上了金工车间的批斗大会。这个斗争会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这一时期鼓噪大跃进而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同新犯组不同，斗争企图逃跑的人还是第一次，因为生产车间开斗争会，必须在完成当天生产任务以后进行。

又只有开斗争会，斗争会又选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到了此时，持续了十八小时的劳动、眼睛都睁不开，谁也没有兴趣在斗争会上干吼，对被斗争者动手动脚。“端正态度”的任务全由红袖套们所组成的“打手班子”担任。

想到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遭这罪，心中自是恨恨不平。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呼啸的冷风直往颈子里灌，真叫又冷、又累、又饿。为了减轻这种折磨，所以个个都作了准备，把所有的破棉袄、烂夹衫都统统捆在身上，用毛巾或被套当作了围巾将颈项死死地围住。头上包着床单破布之类的东西，单将眼睛和鼻子露出来，如此装备就如同银幕上看到的战俘营里的战俘一样。作好准备后就盘腿坐在那里，安安心心的打瞌睡。

（六）春节“同乐”

从监外不断涌进来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饥荒像洪水般肆虐着老百姓，大街上抢粮店，抢食堂甚至抢菜店的事层出不穷，农村中抢粮仓，攻打县武装部，县政府等以往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特别令当局吃惊的是，这些“反革命暴乱”的头目，竟有中共的地方干部。

当局比任何时候加强了防范和镇压，监狱不断暴满，刺刀下“下水道”密如蜘蛛网，就在这种背景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噪，渐渐从广播中，报纸上消声了，而我所在的监狱工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恢复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也记不起从哪天开始，铸造车间就停止了化铁炉，生产那些苏联式的机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内进行时效的铸铁件，也许就永远堆在那里无人过问了。

直到 1963 年春天我离开时，被废旧公司用卡车拉走，我想他们多半同丛林铁厂的废铁，落得相同的命运。

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再没被驱赶，日夜不合眼的连续二十小时“困战”，同时也再没那么多

废品纠缠我们。自从对唐元三人斗争会结束后，一段时间就再没开这种令人困倦的"疲劳"会了。

尽管我们仍在这铁丝网中，被刺刀比着，穿着囚衣，每顿依然是半罐杂粮一瓢菜，过着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压力明显在缓解，三年毛氏疯狂的三面红旗消失了。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国家很困难，尽管在为暴政作掩饰。

1962 年春节。我们所在中队准备监狱联欢晚会场地。分队长说话的口气，相对缓和了好多。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些劳动力们讲出"辛苦了"这句话。他说国家很困难，厂部正在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剂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并宣布春节以前提前三天，各车间停下生产，打扫清洁，特别清理，被电焊工的焊机和工具零件堆得乱七八糟的"戏台"。

传出消息，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春节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

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不过，大家都学乖了，有话都咽在肚子里。在这高墙深监之内，告密已成为公开，人们因告密而处处防备。每个人早已习惯了在盘石压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领，每个人都强忍着饥饿而不说，每个人都对暴政怒目而不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紧锁在骨瘦如柴的身躯壳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既恨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人连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残酷的斗争磨灭了。像乞丐一样，只要有半罐饭，维持着生命，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吧。我这么强忍着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弃和清算的时候。

那时，我仍对我说，谨记着："冷眼观变。"

我这几年来就是被中共抛之荒野的孤雏腐鼠，像一个过早被人抛弃的孤儿。犹如泛萍浮梗，随着风吹而动，从大监狱而至小监狱，又从小监狱而到大监狱。回想前年春节，我被那鲁召带进监牢时还是那么幼稚和无知，来不及用理性的头脑审视面前这条布满杀机的坎坷路，为半碗囚饭而大闹监房，不可不谓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纸判决书，我才预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节"，都难免勾起我对苦难亲人们的情眷。顾复之恩，无以回报。我至今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高墙之内，离他们也并不远，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下落，因为，倘若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外婆，驼着背，柱着拐杖由我的弟弟扶着，隔着铁窗与我相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监舍的人被唤去接见自己的亲人，抱回一卷草纸，一联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这年月得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看着归来者眼角里留着刚刚淌下的泪痕，不免替他们感到伤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没有肥皂，我的衣服就从此不用肥皂洗。没有草纸，

我用惯了废纸，这些小困难怎能算一回事？

初二这天，大坝子里果然热闹非凡，当我们按照划定的位置坐好以后，四中队的女犯和二中队的老犯，相继从大门进入坝子。这对于一中队四百多号几乎与世长期隔离的关押者来说，两个队的来到无疑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虽然事前分队长一再打招呼禁止“窜队”，但是我周围的人们都争着跷首相望，不断的有人从自己的坐位上站起身来，同进场队列中的相知或亲友招手致意，并不理睬分队长的制止和吆喝。

那一天，我同老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今天带着一个大布包，打开里面，放着针线袋和一卷蓝色的旧布，一付老花眼镜和一件刚刚才领到的破棉衣，看样子是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补一天衣服。

这一年的冬天，监狱没有新棉衣，发给大家的是不知从那里收来的旧棉衣，还要确实没有棉衣，又无法过冬的人才能领到。我因此才意识自己身上所穿的，其实比老潘正在缝补的更破烂。从那时候起，我才效仿老潘，准备了针线盒和破布，自己动手补巴，否则就等着衣不蔽体受冷吧。

大家坐定，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川剧开始。我对川戏实在是门外汉，由于缺乏起码的修养，我甚至对那有名的“高腔”颇反感，如果允许自由参加，我一定不会来的。而周围人讲的龙门阵，除谈接见时收到家属送来的东西而外，便是一日两餐的罐罐饭。

戏台上在唱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绝境，政治上这个舞台，已够精彩。戏在天天的演，自然有心的人就会天天看，看好这本戏，于我一生也就蛮不错了。

侧眼去看老潘，他正一本正经，全神贯注在那里穿针缝补，不时拿起补的巴来端详一下，似乎津津有味的在欣赏自己的一件艺术品，对周围就漠不关心了。

倒是戏台上的那些演员在卖力吼着高腔，令我颇有感于他们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精力，在这饥饿的年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啊！

晚上，戏台上扯起了电影幕布，今晚电影：“乌鸦与麻雀”，看那剧中人物的悲剧，就比中学时代看这部电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现在看这部影片会时时与自己对比，我们正在演出的，比之电影中的悲剧更惨十倍。

只要保持着一片清净的心，悲哀也就不致于那么伤心了。

春节过后，生产一直很闲，除了马达外，原先的产品已逐渐不再生产了。工厂明显的在找活干，新增加的品类，例如电瓶车，拉丝机和洋钉机，因为所来的配件已不是自己生产的铸件，结构也简单得多，事故已渐渐的消失。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除了因分罐罐饭和稀饭尾子，经常发生争吵外，相处得也平和多了。

人们有了空余的时间补衣服，甚至打牌下棋。到第二年“五一”节时，分队长还组织了一次车间的篮球比赛。而我所关注的是监狱里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在技术室里我天天都

要读报，报纸上的消息也极其低调平和，在经过了一阵狂热的喧闹后，编辑们似乎也在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毛泽东显然在极不情愿情况下，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来收拾这被搞得一塌糊涂的烂摊子。

但几年以后，当国家渡过难关，稍有喘息后，黄雀在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事实上确实证明刘少奇再没有翻过身来，最后死在牢中，充当了现代的活生生的东郭先生，留下了中共专制之下倾辄的历史奇闻。

受苦的当然是老百姓。水肿病像幽灵般，长期缠着我们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囚奴们，当时，铣刨组八个人中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有五个人因患严重水肿病而住院。住院病人最后进太平间是常有的事，狱方对水肿病人配给名叫消肿丸的黑色药丸，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怎么能治好这种长期饥饿的“病”？

（七）监狱医院里临死前的饿殍

1962 年 5 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 39℃，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于是我便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积水。当即便留在医院里住下了。后来，医生为我抽出了胸腔积郁的黄水，打了几针，病情有所好转。胸不痛了，烧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过了几天，稍能行走，我便怀着好奇心，打听到对面的几间病房是专门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特级病房，一来，想询问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二来也想了解一下一下这些“高级犯人”的情况。便在一个下午吃过饭后，私自走进了那编号为 02 的房间。

一走进去第一眼就觉得与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宽松，若大一间房间只有两张病床，住着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头。我进去时正碰到他俩正在分护士刚刚送来的一盅“流汁”，那长脸的老者正将流汁倒进两个盅子里，让那圆脸的先拿，两人一付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大监房中的犯人。最后还争着去括那送来盅里的残羹。

他俩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来陌生的询问。我开始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说出他的名字后，他们都摇头并不回答，眼光里含着长期蓄养的警惕。我又问道：“听说你们二队供应优惠得多，每月每人还有二两白糖？”

哪知道，那圆脸的老者一脸不高兴，板着脸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闻得其中不甚欢迎的口气，我正要回答，那长脸的却开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住院规定，病房里的犯人是不准窜病房的？按照监规也是不准窜队的么？”

那口气分明在训斥我，我还没有认真思索说错了什么话，便被下了“逐客令”，讨了这个没趣，一脸羞愧的走出他们那房间，心中老大的不畅快。

想到两位在“旧社会”还颇有地位的人，到这儿来怎么会变得如此的猥琐？连那口流汁

都要斤斤计较？是被长期监狱训驯得如此，还是他们本身就养出的防范和忌讳？难道这是一个衰落民族阴暗的心理？看来，在这个牢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除了一种偶然的缘份，人海茫茫，监狱封闭得比铁板还死。

两天后，由两名犯人抬着一个担架送来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据说是重庆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头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单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颅在外面，一张像骷髅的惨白的脸，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

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七手八脚将他抬下担架，安置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我们这病房一共安放着八个病床，全是呼吸系统的病人。除我之外其余病床上全是生命处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刚刚送来的病人，经过医生的一番忙碌，打过强心针后，输液架便在他的床边升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护士手艺太差，还是这个病人的血管已经细到难以用输液针头插入。打针的护士费了将进一个小时，才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中，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醒来后便一个劲的狂咳，从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觉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后的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声吵得无法入睡。没有人陪伴他，医生指定刚刚退了烧的我为他义务护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药液输完以后为他传唤护士，按时给他服药和喂开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输完液后，拨下针头……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轻声地嘀咕什么，可是那声音低得来根本无法使旁人辨听。只见他做着手势，示意希望能坐起来，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髅架一般，将被子塞在他的背后，刚刚坐定，又是一阵猛咳，见他用手指着小便盆，我连忙递了过去，便见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来。

九点光井，护士又给他输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输液的手，我细细看去，那手背早已肿得像发泡的馒头，手背上已扎了二十几个针眼。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在那里扎针了，只好换一个手，又废了好大的劲才给他输上液。

虽面对着这个命在垂危的人，从他那黑洞洞口中艰难喘出带着血腥的臭气，令人沤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驱使，我还是很细心照顾着这素不相识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医生决定的全流汁，所谓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浆或耦粉，每次我用小匙喂进他的嘴里，但他只喝了几口便摆手，中午配给他的是稀饭和馒头，他每次也只喝几勺稀饭，将馒头紧紧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不下去了，如此紧捏着，足足两个小时，也许再也捏不住时，才缓缓地松开手指，馒头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见到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唉，活着的时候，想吃却没得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有吃的，却又吃不下去了。”一个又接着说：“看他那样子隔死也不远了，还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一个又说：“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里的人没有，听护士说，这个人还是长航局的一个副局长。”另一个人接着说：“当官的又咋个？进来都一样，当官的也赏赏当犯人的滋味。”

一个病房七言八语，议论开了，据我所见，在看守所也常有抬进太平间的，也不见送过什么医院，这一个人能从远地送来，证明了他为官的身份。

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一条阶级路线管着的，只是他的妻室儿女恐怕此时未必知道，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住在这里进行抢救，渡过他的最后几天。

不管这个人真是“当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也罢，这种临终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对他的活人们的同情。于他来说，幸好还有一个我为他端水送药，免去了临终时的孤苦无助，我因而联想到我的父亲，倘如也是这般的病危，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守着了。

接连两天，新来的病员异常的不安，咳嗽呻吟、吐血，不停的呻唤，令整个病房不安。然后是医生的打针、输液，那手脚虽被针头和窜在皮下的药液胀得馒头般浮肿，看着他那痛苦，想到关进来的人，生前受不尽的折磨，为显示政府的“革命的人道”临死还是被弄得这付惨状。

第二天晚上，大概因连续两天的躁动耗废了他仅有的体力，而安静下来，咳嗽也渐渐停止，除急促的呼吸，呻吟也渐渐消失。不料靠门口床位上的那一位中年人却开始恶化，气喘不止，护士忙为他输了氧气，打了针，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才稍稍平息。

两天两夜没有睡好，我困乏已极，大约凌晨五点便熟睡过去，直到八点钟，送“流汁”的饮事员才将我惊醒，接过流计，我用勺揍近病人的嘴边，他只轻轻地抿了抿嘴，并没有张口，仍在昏睡着。用手掰开他的口送进了药片，也不知他吞下没有，直到中午时分他突然醒来，伸手接过那白面馒头，像很饥饿很想吃的样子，但终于没递进口中，不一会又沉睡去，这天中午，天气亢热，病房里却一反常态，安静异常。

大家都累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嘭的一声，我从迷蒙中惊醒，只见我面前这病人左手垂在床沿上，手中拿着的半边白馒头已掉在地板上。右手还按在胸前紧紧的抓着另外半边馒头，双目已经紧闭，骷髅的脸上微微的一种不屑之情，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死亡。

忙看那胸脯已停止了起伏，用手触摸他的鼻孔，先前直喘的气也已平息，我俯身贴在他的耳朵，轻唤了一声，他没有任何反应，忙叫来值班医生和护士为他测了脉搏，然后看了瞳孔，最后，将他盖在身上的白布，拉到头顶，蒙上了脸。

我明白，他已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便从他的右手瓣开那深陷在白馒头中的僵硬的手指，一边取下那馒头，一边喃喃地说：“唉，可怜的人，阴曹地府中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不必带这人间的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今天你自由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为饥饿烦心，为寻觅这烟火食发愁。只可怜你的儿女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死在这里。好在现在你的游魂自由了，即使这监房锁着你的尸身，你的游魂此刻可以去寻找你的儿女亲人了。”

收拾他的遗物才从他的衣袋里得到一封信，那是半个月前他在看守所里写给自己女儿的信，从信中知道，他确曾是航运局的领导，信中他告诉女儿，他已身患不治之病，吐血不止，估计不久将离开人世，在生命最后这段日子，他同意妻子向他提出的离婚请求。也同意女儿和他划清界线，但忠告她，“今天世事险恶，一定要小心处世。”

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不管他身前是何许人，但已在囹圄之中，定有他的原因。也许若干年后这妻女知道他如此而赴黄泉，并读到这封临终没来得及发出去的信，有何想法，是该悔恨，还是痛恨？

我呆呆地望着那具被白被单裹着的死者，这具等候火化的躯壳，也不知此刻他出窍灵魂可曾觅到自己的妻儿。忽然我俯下身去将那半边滚在地上的馒头拣起来，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半个馒头合到一起，悄悄地塞进了那被单底下的骷髅头边，满足他在临死前那点愿望。

他死去第二天，那靠门床位上的中年人也落了气，凑巧的是他的遗物中，出人意外地的搜出了一封长长的“上诉”。于是，我想到这些死在狱中的人，临终时在他们的口袋里会不会都有些令人费解的遗物？如果把它们揍合起来，未必不是对这个黑暗政治的一份有力控诉？

现在看来，忠告也罢，申冤也罢，都随着死者一笔勾消，其中一定会有许多永远都没说清的沉冤无法见到天日，埋到了浩浩冥府之中了。

病房中不出三天就接连死去两个人，顿时显得一片沉寂，那些卧床者枯瘦的脸上在想些什么？说不定他们就在明天或者后天，也步这两个先行者的后尘，一同去阴司，谁又能料到？

我忽然感到一种死神擦身而过的恐惧，想到我不明不白的被划为“右派份子”，继而又莫明其妙地关进看守所，想到我们全家人的悲惨遭遇，与其等死，也得弄清冤枉的名份。

知道医院的大门外就有邮筒，投递极为方便。被判刑以后曾经有过申冤的想法，现在被那刚刚死去的人所引发，过去一直苦于无法投递，今天便是时候。于是我找倒纸笔，开始写下了第一次“上诉”。

（八）第一次上诉

第一次的上诉告到了重庆法院，就投在那医院大门外的邮筒之中。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办公室去，我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那天只有院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一付冷竣，我在对面的板凳上坐好后，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冷冷的发话道：“你叫孔令平么？”“嗯。”“什么病住院的？”“急性胸膜炎。”“你知道监规吗？”“嗯。”“政府不究你的犯罪，你有病为你治病，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你体会得出吗？”

沉默，因为我摸不准他说话的含意。“然而，你却不好好的养病，却在病房里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没有违犯你们的规定。”我辩解道。

“什么？”院长霍的一声站起身来，“你现在是伏法的犯人，敢于在住院院期间乱说乱动，现在还要否认，要我给你略点一二么？”他怒声喝道。

我不想去同他说什么，我知道在监狱里只有政府发言的权利，我的解释只能是多余，便坐在那儿闭着嘴一动也不动。

“你们以为一脱离了中队就可以胡言乱语，不守监规？你以为政府的人道主义是软弱可欺么？你以为你是病人就可以藉机攻讦党和政府么？”他把话题缩小了，但，我实在还没有识

别我讲错了那些话？

“你借服持病人，说什么人死了就不食人间烟火了，还说什么带着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真是攻击我党人道主义，恶毒至极！不，你听听？你还说，监房锁得了你的肉身，却锁不了你的游魂，说再不必为饥饿烦心了，真是恶毒至极!”一连两个“恶毒之极”，使他的情绪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他站起身来，一面吼着，一面用手挥舞着桌子上的一张“检举”。

我终于晃然如梦初醒。半个多月来的高烧，烧得我确实有点糊涂了，我开始对我这几天的“放荡”有所查觉了。

这年头，无论到那儿，都要把自己的嘴封得严严实实，那怕是这群快要死去的人中也不例外，我这一曲给死人送殓时吟唱的内心悲歌，竟不知被那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当作请赏祭“神”的刀头了。

这位写检举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难道他真认为这么一纸检举，会使他得到病人特别的优惠，还是想得到“保外就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此刻，我突然地感到了一种特殊的窒息之感，比之在病房中耳闻呻吟，鼻嗅病人吐出的血腥气更加的令我呕心。

但我实在愤恨这个昧着良心，歪曲我说话的恶棍。但是，转而一想，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在当局的高压和引诱之下，形形色色急欲跳出火坑的人，充当当局暴政的“卫巫”们，还少吗？倘若不是毛泽东为了独裁统治，制造使任何言论不能存活的文字狱。这病员中怎么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怪事？

我这么想着却完全无以对答，沉默了几分钟，院长抬起头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明天你出院了，但对于你在病房放的毒，必须向政府作出检查。你住院二十多天表现得不好。”他斩钉截铁的下了结论。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我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开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个碗，一张旧洗脸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内衣内裤，我什么也无须收拾。

邻床的病人见我这般反常举动，向我问道：“要出院了吧？”我点点头。其实这些天同这里的人相处得蛮不错。在病号中比较起来，我是病情最轻，年纪最小的，平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乐意为他们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对我挺客气，但此时我的心中像塞着一块异物，看着他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髅脑袋里真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带着我打好的小布包，跟着医院的一名干事归队去了。我的病真的没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队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到我的铣刨车间那块划线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

队的反省组。进反省组的第二天，年轻的姜干事责令红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内写好检查。然而我该怎么写这检查？我说：“死人不食人间烟火错在那里，又伤及政权的那一根毫毛？说带吊命粮去见阎王爷不是事实么？又攻击了谁？监房能否锁得了人的游魂？我不知道。人死了当然不会再为饥饿而烦恼！我所说的错在哪里？”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成千上万过去迷信过中共的人，能抗拒这种教育吗？难道在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来对死去的人说这番话，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须交待么？

在医院大门口投的那一封上诉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来从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涂的过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狱都这样糊里糊途将人屈打后，胡乱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来，遭受的奴隶般的折磨和饥饿，同这一块土地上一连串的悲剧竟有机的粘合在一起。

从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制造冤案，以此公开回答狱方。于是我在狱方责令我写检查的纸上，写了第二封“上诉”，这一次不是投在邮筒内，而是面对面的交给了那位姜干事。

差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触犯“监规”而被责令写检查时，我的“检查交待”，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些材料中我痛骂重庆法院，我知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我加重惩罚；但在法律已被猥亵，无理可讲的年代，这样做说不一定比一味忍让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么诡辩就占了上风，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对的。定罪的原告，被证明是冤判，照样可以被打成被告，这也许就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们难以预料的了。

我的“检查材料”果然触动了监狱的管理者。

1963 年初，一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去，他给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说：“你在狱中，特别是在医院期间，没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规矩服法，屡犯监规，这种不认罪守法行为，是监狱所绝对不容许的。至于你有冤情进行上诉，又为什么不在上诉期内写？何况，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着你原来的判决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决还没有得到原判机关改正之前，你必须在这里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而决不容许你乱说乱动。”

1963 年 3 月 12 日，由石板坡，凤凰台两处监狱关押的两百余名已决新犯，和一中队经过调整产品结构认为多余的人员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孙家花圆一中队，下午五点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那一次的大调动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这次发配边荒的名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边荒流亡苦役的生涯！

第四章 流放甘洛

在我们同一车厢里的一百多号犯人，许多都是原来在一起的人，除了王、潘二人外，同车的还有那在金工车间被斗争的唐元澄和徐世均等，不知道是因为相互存在戒心，还是因为对于将被派往何处怀着渺茫，我们彼此很少说话，夜间行车在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中，昏昏入睡。

3 月 14 日，三百多名从重庆送来的犯人在成都宁夏街监狱集结。等待从四川其它县市看守所，陆续来这里集中的人员。两天以后，各路集结的人员到齐，总数五百人。这么多人的集结，调往何处？去干什么？这些事关每个集结者切身的问题，一直还是一个“迷”。

事前，由于严密的封锁消息，我们中只有瞎猜。那几天，我把自己当作一片飘落在湍湍大河中的落叶，不知汹涌的河水会再次将我卷向何方？

当晚，狱方把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宣布明天就要出发，所去的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山青水秀，十分富绕”的农场。介绍情况的那位干事用了一大堆诱人的字眼，说在那里牛羊肉当小菜，有吃不完的瓜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的饥饿的囚犯，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诱惑？

这一晚上，老潘同我聚在监舍角落里，我低声问他：“对我们将调去的地方你有何见解？”他抬起头来，愤声说道：“全是鬼话，要去的地方是西昌地区或梁山州，那里的情况我十分清楚，要说是不毛之地也许过份，但什么牛羊肉当小菜，瓜果吃不完，全是骗人鬼话，越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未来就越险恶。”

第一节 流放途中

3 月 16 日清晨五点，大家被尖锐的哨声吹醒。我们立即从地上跳起来，收拾好各自的破烂，开过早饭，挨着监舍，便在一连串的吆喝声中，五百号人依次被押上停在监狱大操场中的二十多辆绿色军用卡车。每辆卡车上装着二十多人，同携带的行李挤在一起，挤得满满的。

半个小时后，一列长长的军用卡车车队，便在两辆吉普车的“押解”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宁夏街监狱大门。

装载我们的卡车里，每一辆车的驾驶仓中，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押车员。在驾驶室的铁板背窗上开着一排小孔，那押车员冲锋枪的枪口，已从那洞里伸进了车厢，对准着挤成一团的在押者。

二十多个人与散发着霉气的破烂行李挤在一起，车顶又被带着浓烈腊臭的蓬布严严实实封闭着。本来经过长期的饥饿和关押，体质极虚的流放者如同一群易市的牲口，身在车中的我感到呕心。

我环看四周一个一个面带灰色的人们，有的眯缝着眼睛也许还在做着“牛羊肉当小菜，吃不完瓜果蔬菜”的美梦。

汽车在开出城区，上了公路后，便在乱石谷子马路上剧烈的颠簸前进，没超过半小时，便有人晕车了。这时还是早春时节，天气还冷，蓬布异味的刺激越来越凶，加上剧烈的颠簸使人忍耐不住，一口发着酸臭的秽物，在忍无可忍时，终于在车厢里飞溅开来。

大家想找一把小刀，在那周围的蓬布上抠开一个洞，但是所有的硬器在上车时都被押送者收搜一空。不知道谁保存着一把吃饭用的铁瓢，几个人就用那瓢和自己的指甲，去那牢实的帆布蓬上抠开了一个小洞，让冷风直向车厢里灌，以驱散污浊的气息。要呕吐的人都依次的去那洞口，把肚子里早上倒进去的两瓢苞谷稀饭，翻肠兜肚地倾倒出来。

等不及的人只好就地发作，顿时呕吐的秽物，带着一阵阵的酸臭、充满了整个车厢。于是大家拼命的扩大那蓬布上的洞口，一直扯到足有碗口大小，那洞便成了大家急救的出口，算是解了围。只是满地都是呕吐出来的秽物，车箱里的人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车箱里就像一群被押着的牲口。

从成都到雅安，是这支庞大队伍千里行程的第一天。当年联接这些川西主要城市的干线，四百里公路依旧是黄土垫地，乱石铺面的“机耕道”。经过雨水冲刷后，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在上面行驶，左右摇晃，猛烈颠簸，加剧我们这些牲畜般流放者的晕车。

中午时分，车队到了邛崃，停在城外的小镇上，押车的士兵和军官走进了小镇上仅有的一家食店。我们在押车武装的指定下狼狈下车，每一个车围成了一圈，士兵们取出了干粮桶，按规定每人每顿发给一个由三两面粉做成的馒头，士兵叫来了几个附近的农民，挑来了几担水。

趁着下车休息的机会，我站在那里深深地呼吸着从田野吹过来的冷空气，长长地舒了一下腰。先前被晕车弄得天旋地转的状态，慢慢恢复，一面打整着流在衣服上的呕吐物。

回头向这支押解我们的车队望去：前后有吉普车押送，车上架着机枪，绿色的卡车一字长龙，浩浩荡荡，足足拉了一百多公尺。路边衣衫褴褛面色腊黄的“公社社员们”用陌生而恐惧的目光，看着这条绿色长龙，有的两眼直勾勾盯着我们手中拿着的馒头，样子很是可怜。

（一）夜宿雅安

天色已晚，车队才开进了雅安城，按当局安排，半小时后，车队开进了雅安监狱，我们从漆黑的车箱里爬出来。三元宫，本是道家修行的场所，如今改成充满血醒味的监狱，已是对先圣的大耻大辱了。道家奉行的是清静无为，主张相互杀戮的凶手都可在太虚、元清之中修成正果。

而今，暴力可以洗劫它神圣的殿堂，却永远改变不了天道的真谛。那屋顶房梁，窗铺，雕塑中留下来的八封图文中，就有那永恒不灭的精灵藏匿其中。此时此刻正在那寂静无声的雕梁壁画中切切私语，听去宛如晚风拂过的回声。

雅安的监舍比宁夏街的监舍大得多，一个房间里足可以容纳白天两个囚车里的人，我们房中挤着五十多个年轻人，借着微弱灯光，彼此相看，大多都是重庆孙家花园的老熟人，原先在孙家花园那个大坝中，平时被监规约束，很少说话，今天便成了老乡，打破了过去对面相撞从不交谈的僵局，亲热劲一上来，话匣子也冲开了，彼此互问身世，拉着家常。

当五百人陆续被关进监房后，三元宫院内短时间宁静下来，我们感觉到，周围黑洞洞的窗口里投射出来的，是这儿主人们饥饿的眼光。

片刻宁静以后，监舍中有人在喊报告：“报告，要吃饭。”奇怪的是那清脆单调的呼喊，经过那些藏匿的精灵们的回应，竟像一片呐喊。岗楼上投下了一束强烈的探照灯光和厉声的喝斥，好像在给自己受惊的魂壮胆似的。

整整一天，早上落肚的两瓢稀饭，已被颠簸的汽车从肚子里翻浮。中午只吃了三两干馒头和一盅开水，一天旅途劳顿急需补充，此时与其说旅途让人困乏和难受，不如说饥肠辘辘使人心慌。

不到一个小时，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几名雅安监狱的犯人头，将刚刚出锅的一大桶苞谷面调的粥抬到了院坝里。监舍的铁门后面开始骚动起来，不一会，牢头提着一串钥匙，打开了第一号监舍门，每个人拿着自己的饭钵，鱼贯着排成队，到桶边接回两瓢稀饭，端回自己的监舍。

半个多小时，所有的人都捧着饭钵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片唏唏呼呼的喝粥声回荡在廊沿里。两瓢稀粥下肚，逼退了周围的寒气，心里顿时热呼起来，旅途不堪忍受的饥渴冲淡了许多。

忽然一个戴眼镜的人高声的提醒大家，他喊道：“你们想到没有，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馒头没吃到。”

经过眼镜一提醒，腹中的饥饿发作了，一位瘦瘦的年轻人立刻响应说：“早晨的稀饭都吐干淨了，一天只吃了一个馒头，肚子依然是饿的。”这年头，同一个家庭，兄弟之间为争一口饭而成仇的有之；农村中为争几个红薯失手打死人进监狱的人有之；大街上为抢人碗里的面条米饭而酿成流血事件还少吗？何况是政府发的一个大馒头。

经方才那眼镜和瘦子的点拨，立即引起了五百来号人的共鸣，有人立刻证实：“对，我也亲耳听事务长给押车员这样交待的。”年青人一齐吼道：“刚才吃稀饭时，为什么不把馒头发给我们”？“肯定是押车的老婆娃儿吃了！”大家七言八语议论开了，平时在监狱中绝不敢公开讲的话，现在公开的说出来了。

在粮荒如炙的今天，如果牢狱的看守们克扣被囚者的囚粮而引发的惨案，这狱吏们该罪不容赦！

（二）狱中抢馒头

“找老管要馒头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人喊道，他一声吼，其它的人一齐响应。“报告！”“报告！”的喊声此起彼伏在三元宫上宫空响成一片。

在高墙下这些随时可被打骂的犯人，敢于为一个馒头集体与全副武装的执勤兵算帐，最先提醒大家的眼镜，成为带头人和组织者。并且率先的对着铁门上的风窗口向过道里喊道：“报告干事，我们车上还有一箩筐从成都出发带的馒头没有发给我们。”

那进来的管教干事朝发声的门走去，“报告干事，我们今早从宁夏街出发时，事务长就向我们宣布了政策，今天路上带的干粮是两个馒头，中午我们只吃了一个，还有一个该晚上拿给我们吃，但一直没有拿。”眼镜不卑不亢的解释道。

不出一分钟，在刚才抬稀饭出来的门中，雅安狱方的一个管教干事打着电筒走了出来，岗哨上再次打开了探照灯，对这支充满了不安的大队人马，雅安监狱加强了戒备。“干什么”？那人走近以后用手电筒在发出报告声的监门上直晃，一面疾声喝问。

关在十个监舍里整整五百号人，此时全都扒在各自监门的风口上，关注着眼前发生的事。但是，手电筒熄灭了，那人转身向原路走了回去，也不知道他是去询问，还是根本就不与理会。大家耐心地等候着，大约又过了十分钟，进门口那一方依然毫无动静，看来，刚才进来的那人并没有过问这件事。

于是，第二次报告声浪响了起来，这一次是十个监舍，五百个喉咙同声呐喊。

又过了十分钟，过道上那隐蔽的进口处打开了，刚才抬饭出来的几名炊事员，抬着一大箩筐的馒头放到院坝中央。然而，走过来打开监门的牢头，并没有像刚才那样依次的把监房门打开，而是将所有的监门一齐打开了。

顿时，五百号人一齐涌到坝子里，在探照灯下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谁也没有被指挥，大家便一齐向那筐白馒头围了过来，将几名炊事员团团围住。

“站开一点，一个一个的来，排好队！”炊事员向越围越紧的人们喊道，“排好队站好，否则就不发了。”押车员迟迟赶到，向着围绕的人吼道。但是人们拥挤着，嘈杂声把几名押车员的吼声淹埋了，五百人开始乱起来。

“站开一点，排好队，一个一个来”那围在最中间的炊事员吼道，声音里带着颤抖，他们预感到一场无法控制的事件就要发生了，就在这一刹那，有人动手向箩筐里抓馒头，这像无声信号，顷刻间所有的人一齐扑向箩筐，顿时人声鼎沸，抓抢，扭打像炸弹般爆裂开。

人们扭成一团，隔箩筐远的拼命向里挤，里层的人被压倒，有的整个身子压在箩筐上，盛馒头的箩筐也被踩扁。抢到馒头的拼命向嘴里送，向衣兜里塞，馒头在人群脚下踩成碎块，遍地都是踩碎的馒头屑，还有人将碎馒头捧进脱下的帽子里，有的因此手被踩伤，手上脸上到处在流血，院中一片混乱。

三秒钟后，被院内大乱惊呆了的岗楼上才回过神来，怒斥与吼声已被淹没，哨兵们拉动枪栓扣动了板机，向空鸣警，机枪喷出了火舌，子弹在抢馒头者的头上呼啸着掠过，伏在三元宫房顶上的精灵们怒吼了，一场监狱内闻所未闻的数百犯人集体抢馒头的悲剧，炸炸呼呼地在上空拉响了。

一分钟后，一队大约由三十名全副武装的看守，端着冲锋枪冲进了庭院，对这群抢馒头的流放者大打出手，饥饿的囚犯被军警打伤，并被军警们驱赶回到监舍，跌倒在地上的人爬了起来，不顾身上在流血，仍在不停地狼吞虎咽地啃着到手的馒头，有的用手紧紧的护着装馒头的衣兜。

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岗哨的认定下，将刚才为首抢馒头的几个人捆翻在地，拳打脚踢。顿时，喊声和哭声大作。

在院坝中当场捆起来的“带头者”，被单独地关在一间专门的小房子里，此时他们身上几乎全是伤痕和血迹，三元宫的监狱当局连夜对他们进行了提审，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集中前所属的监狱，以及捕前所在的工作单位。

那眼镜名叫邓自新，原西南毛纺厂的一个工人，那瘦个子叫文廷才，高个子叫锺平波，原来是一个中专学生。

当问到陈力时，提审者问他：“今晚的骚动谁带的头？”他冷笑的回答道：“这一切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么？如果按时把大家的馒头发了，会有这场事么？”提审者没有和他计较，明天还要赶路，谁也不敢躭误这次大调动的行期，审问草草了结，到了凉山再作计较。

如此过了很久，随着一排排上锁声和岗楼上厉声的喝斥响过之后，院坝里慢慢的静息下来。成都的押车员开始在各个监舍里清点人数，走廊外不断地有背着冲锋枪的士兵在游弋。

凌晨两点，一切都渐渐地静息下来，疲惫不堪的流放者带着刚刚经受的惊恐和伤痕，卷缩在拥挤而肮脏的牢房中沉沉睡去，料峭的寒风掠过三元宫上的瓦脊发出阵阵啸声，卷起院坝内那些洒在地上的馒头屑，发出沙沙的响声，有的馍屑被干凝的血迹牢牢的粘附在坝子中间，不肯随风而去，彷佛要在那里作证昨夜发生的一切。

而此刻，恐怕只有那藏匿在道观的精灵们，才能证明这场五百人监狱骚动的真正元凶是谁？

然而，在那个被高墙的枪杆压迫得可怜的中国囚犯们，在中国人连自己挨饿都不敢直言的时代里，今天，竟有这五百个在枪杆子下面驱押的流放者，群起而动，不但敢于直面枪杆子索讨属于自己的那份口粮。渺视这铁窗下和枪口下恐怖的秩序，大闹了三元宫，干出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中国人的反抗没有也不可能被暴政消灭？！

尽管他们是自发的，今天在中共长期黑暗的专制统治下，没有讨饶没有屈服。这一群为生存而搏斗的无名英雄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因为这是些处在长期专制主义下，用血肉身躯在刺刀下开拓民主曙光的人！

以后，这支队伍中许多杰出的人，在流放边荒的苦难中，频繁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反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故事，在一潭死水的中共监狱中，绘出了一幅幅对黑暗控诉和不屈不绕反抗的灿烂图画。

抢吃，今天已成为中国公开的社会悲剧。只是老百姓间为争一口饭发生的搏斗，无论演得多么惨烈，却无损悲剧的始作俑者。苦的是老百姓，忍着饥饿连“饿”都不敢说！谁说：“吃不饱”或“我饿”，这种生理本能的话，必冠以闹粮，及对三面红旗不满的罪名追到斗争会上。轻则挨斗，重则坐牢，杀！

周厉王“道路以目”的时代竟大摇大摆的复活了，老百姓饿肚子既归于天灾和苏修，谁还敢说共产党半个不字？

人类因没有足够食物而濒临死亡绝境时，妄命抢夺食物，甚至出现同类相食的情况，在人类史中累见不鲜。汉书就有汉未黄巢举事，其部下高欢用车载人肉充军粮的记截。

就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人吃人仍常见于各种刑事案例中。当然，就广义而言，人吃人，可以说成是一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寓意着统治者的残暴。

1963 年，当我们从甘洛农场的“鬼门关”调往西昌黄联关，以后调往盐源农牧场时，这个案件的立案卷宗一直跟随着我们，1963 年，还在盐源正式开庭。

当时，邓直新的口供依然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借这件事大闹雅安监狱，更没有谁进行有组织和预谋的暴乱，检查官，我说的是事实，我只是饿慌了才伸手去拿那个你们配给我的馒头的。我当时并没估计事态会因此而失去控制。如果我不饿，怎么会为一个馒头而被打，被捆，直到今天，我的手上还留着残迹。”

从雅安到甘洛，邓自新被捆了两天，一直押到甘洛时才松的梆。长时间的受捆，使他在松绑时，双手不能复原，成了一辈子的伤残。1964 年他因此刑期由原来的八年加到二十年。

除邓自新外，当晚记录在案的几名为首者，文廷才、邓小祝、锺平波等人都无以幸免的受到加刑的惩处。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端专制主义者，正是靠这种残酷的镇压，镇服着六亿大国的普通民众，让他们长年忍受着饥饿，还不敢吐出“饿”字来。

（三）老母坪-鬼门关

历史上因押解饥饿的囚犯而发生暴动的事，像著名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义，可以导致秦王朝的倾覆。

经过昨夜的折腾，成都派出的押车人员怀着猛然惊醒的不安，第二天从雅安监狱押往汉源的途中，雅安的狱方增派了警力，每一车的押车员由一人增加到两人。为了进一步镇慑被押送者，当着五百人人的面，将昨晚被大捆的五个人并不松梆就押上了囚车。

其实我们知道，这五个人并没有产生妄命一搏的打算，更何况这其中的年青小伙子绝大部份患有水肿而虚弱不堪。

到了天亮时，昨晚那股不知从哪儿窜出的劲已消失，人可不是钢铁，而是非常脆弱的动物，旅途的困顿，加之昨晚几乎一夜未眠，早上，当牢狱们打开监门时，许多人从地上爬起来，都显得艰难。我感到两腿直打抖，两眼直冒火星。

当我吃力的提着破行李艰难的爬上车厢时，我感到混身发烫，我知道我是病了，上车后便一头栽倒在车厢里，迷迷糊糊的睡去，直到汽车在颠簸不平的车道上重新摇晃着行进。我不希望就此结束生命，抛尸在这放逐途中。

天老爷果然没有抛弃我，当我们最终要到达目的地的那天上午，我的烧神奇般的退掉了。

第三天中午时分，汽车队在离甘洛县城大约几公里的，名叫老母坪的地方停了不来，通向目的地大约二十里了，是一条几乎是由这儿的山民们踩出来的，曲折盘环在大山山腰间的小路。当我们被喊下汽车时，足有三个班全付武装着的士兵已在那里迎候着我们。

想必甘洛农场的管教干部们已接到通知，知道这是一批曾在路途上发起过“暴力抢劫”的危险队伍。要他们步行在山间走这二十里地段，要确保安全。

其实，被长途跋涉拖得虚弱不堪的队伍，已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大家原本水肿，加上连日路途风寒，五百多人仅靠两个随身携带的红十字医药箱来应付各种疾病。能撑到这里暂时还没有人死亡，已属于苍天怜悯。

押送这支重伤的伤病囚奴，走过这最后的二十里地真该担心的是，他们能不能挺住越过这段山路而不被抛尸荒野！

站在老母坪那片吊在半山崖间的巨石坪上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藏隐在茂密原始森林中的峡谷。就在那云雾缭绕山势重迭的原始老林中，隐隐约约从那峡谷中冒出来的炊烟和破旧茅舍中，找出这儿有人栖息的踪影。这里是汉彝两族为主体的民族杂居地带，就是百姓们所称的蛮荒之地。

我们脚下的这片巨石平坝上，排着几幢刚刚建起来的土木结构的平房，平房前悬挂的木牌上写着：“甘洛县城市建设指挥部”。从左侧傍山一片伸向密林深处地方，已砍下树木一片，依稀看出一条与“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马路雏型，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开山放炮声，告诉我们甘洛城正在被开发中。

两天的高烧已经退去，人很虚弱，但脑子已经清醒多了，面对着眼前这场境，脑海里映出了大炼钢铁的景象，我们像一群奴隶，被中共任意的驱使着。

高烧始退，打着趔趄的脚才站定，我们五百人便被四十多名士兵集合好，排成一列长队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唧唧跄跄的被驱赶着，走上了那条通向“神秘”去处的山路。

老母坪上空悬在半空中那像鹰嘴的山石上，彷佛正用它凶煞的目光，审视着这一队从它爪下经过的破衣裳们。饥饿、腊黄、憔悴的面容并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年龄。这是一支平均年龄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年青队伍。

他们怎么也不甘愿此刻一过这“万夫莫当”的关口，等于投入了万丈深渊，五百人进去不到十个月，竟有一半生命就葬送在那深山隐藏的去处，再没有出来……

（四）彭大胡子最先去死

行不到一里地，队列中一名大约三十多岁，满脸胡须的人就倒在地上呻吟不止。他的破行李撂在一旁，坐在地上喃喃的说着胡话，听那口音分明是福建人，看样子是病得不轻了。

押队的士兵走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朝他身上猛踢了两脚，喝令他立刻站起来跟上队伍，

但无论怎么踢、吼他都站不起来了。

当兵的便把随行的一名背着药箱的犯人叫来，问过以后，证实他已经发了两天烧，现在的体温至少是四十度，便无可奈何的给他取来水壶，送上两片阿斯匹林，叫另一个年轻犯人背上他的行李，押在队列的最后继续赶路。

一路上因为疾病而停停走走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足足拉了两里多长，派来的士兵被迫分散成好几段，虽然这些士兵本能的残暴想发作，鞭打驱赶这支队伍。但是，那队列中狼狈不堪的状况使他们感到无奈，就这样拉拉扯扯，直到傍晚时分，“先头”部队才到达一片开阔的长满了草的坪坝上，这就是此行的终点——甘洛农场的场部所在地。

当我踩进这片草坪时，天已十分暗淡，天边阴蒙蒙的寒雾已包围着山坪，借着寒雾泛出的余光，我抬眼四顾，草坪周围突兀的山峦中隐约藏着一条神秘的小道。一座无形的“围城”使我陷入八卦阵的感觉。

这真是一处天然的地狱，整个的草坪唯有我们刚才进来的地方，才像是一条通往阳间的路。如果把这蒙蒙不清的围城比作一个袋口，那么唯有这条路便是口袋的袋口，谁进来了就别想只身再撞过那袋口。

那平房倒十分的宽敞，其中的一排显然住着这儿的管理人员。因为那儿有武装的警察把守着门口，另一排里则圈着牛羊。不过，那牛圈真是太宽大了，足有几千平米的木柱式建筑中，还没关到二十头牛。

这一夜，我们这五百人就被安置在这宽大的牛棚中，与牛同宿一室。好在，已经快四年的改造生活，早已淡忘了我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回想汉初，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所囚，而过着牧羊人的生活，十八年与羊共寐。

大陆，从六十年代开始，把人关进牛圈的事已是阶级斗争的家常事。改造的形像莫过于把活鲜鲜的人当作牲畜来驱使。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当权派也关进牛棚，从此以后，“牛棚”便成了毛泽东堂而皇之称作“改造人的理想场所”。这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里统称“下水道”，就是法西斯的集中营中也没有听说这名词，当为首创。

中共当局对我们的改造，不过是把我们当作一些用两条腿走路，会说人话的牲畜而已。所以很自然用“牛棚”，形象表示了这种场所，不会回避这种人牛共寐的怪事。

为了寻到一处少沾牛粪和牛尿的水门汀地，而抢着到堆着谷草的草树上抱回尽可能干而新鲜的谷草，铺下铺位以后，打开破行李将那床破棉絮铺在谷草上面，想美美的睡一晚，休息一下病体，看看明天会指派到那一处深山丛中去。

安好铺以后，取过洗脸帕，跟着别人摸黑在草坪的周边一条潺潺细流的小溪边洗了手脚。那溪水冰凉冰凉的，两天的发烧，触到这清凉的溪水，很觉爽快。忙过以后，天已全黑。

这一天好像是下弦月，上半夜戚黑一片，士兵们把早已准备好的电石灯在草坝和房子的四周挂了起来，并把由马驭着的干馒头箩筐抬到草坪上，一个老头挑来了水，大家狼吞虎咽地

吃着干粮，直到把筐里的馒头屑都分光了。

押解的大兵们，大抵以为目的地已到，一方面对一路上这群十分虚弱的流放者已有了掌握，预计他们决无非份的打算。此刻就不再像一路那样过分紧盯这数百人的行动，不知跑到营地的哪一间屋子里去了。院坝里除了几个值勤的士兵外，白天押解我们的大兵竟一个都没有露面。

吃过干粮，大约又过了两个时辰，已是晚上十点钟左右，才从我们进来的路上传来一阵凄惨的呻唤声，掉在最后的两个人，在三名士兵押送下，踯跄走进了这块草坪，那最先倒在路边的满脸胡须的人，在一位同行犯人的掺扶下，几乎是爬行到了这里。他那痛苦的呻吟，撕裂着静寂的夜空，在电筒光的照射下，看见他全身都在发抖，我预感他已难于再活下去。

难道这陌生的草坪，这黑糊糊的四周就是冥间么？天啊；他还只有三十岁，就这么被抛掷在这荒无人烟的草野之中？想到这里便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他似乎想从地上站起来，拼命地挣扎了几下，终于没有爬起身来。见他卷伏着身体，我真难以相信，他是怎样咬着牙关走完这二十里山路，爬进这里来的？

一个便衣提着一盏电石马灯，指挥着两名犯人，把他抬进了牛棚，七手八脚地把他放平在一堆乱草上面，那马灯就挂在他头顶的墙上，在这黑压压的马棚中就这么一个亮点，不一会，一切复归于寂静。

距我睡的铺位大约五米以外栓着一头小牛，当我躺下时，我看到它那睁得园园的眼里，在黑暗中闪着淡绿色的光注视着我。我睡的旁边是一条尿沟，听得见那里面顺沟流淌的屎尿声，空气里弥散着牛粪的臭味，我嗅出那牛粪中还残存着一股山野野草的芳香。

几天的急行军和劳顿，五百号人大多已经入睡，宽敞的牛棚里响着阵阵鼾声。我仰睡在那草铺之上，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一种恐惧，久久没有入睡，穿过牛棚的房檐望着天边黑兰的夜空，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稀落落的星星伴着她眨着鬼眼，出奇地窥视着这牛棚中新来的陌生客人。

早春的夜是那么静，又那么寒彻心脾。当我回想白天看到老鹰岩前的最初印象，鹰嘴般的山石上似乎有一股凶隼的眼光在逼视我，预测将去的地方，脑海里一片恐怖。

第二天清晨，我在半酣中被嘈杂的人声惊醒。好一会我才想到我已经到了甘洛，并清楚地辨识身临之境，急忙睁开眼，看见昨天放置那大胡子的地方正聚着好多人，大家正议论纷纷，几个人正忙碌着。

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张门板，朝牛棚的出口处走去，那门板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我急忙爬起身来，下意识已经明白，便匆匆的向那门板走去。

果然，昨夜那呻吟了一夜的大胡子，正直挺挺躺在门板上。从与他同调来的人口里知道：他姓彭，原来是台湾高山族人，后来因为在战场上被俘，整偏以后“光荣”地成为解放军，并因战功当上了连长。不久裁员，落户在四川南充市，在工厂当了一名小干部，后来，工厂清理阶级队伍，把他列为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又不知怎么搞的抓进监狱。

这次从南充监狱调出来时就有严重肝病，到了西昌，便发高烧，一直押送到老鹰嘴时，病情十分沉重。挣扎着连爬带滚，到了这甘洛农场的场部终于咽了气！

当他的尸体抬出牛棚，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昨天下午押解的武装和穿着便衣的农场管教们，从后面那排宿舍里走出来，驱散着围观的人群。

我呆呆的站在牛棚的出口处，目送着那张越来越远的门板，直到消失在那“口袋”的出口处。就这样，用门板抬出去，打一个坑，独自埋在这荒山野岭之中了。回过头来看看所有在场的人，此时，一个个都呆呆地面朝着同一方向。

一阵莫明的悲哀再次在我心头揪起，我暗自为他的亡灵祈祷，这是我们这支五百人的流放大军中第一个去上帝处报到的先行者。

他死了，总算免却了后来岁月所受到的磨难，免去活罪也许是一种幸运。

然而，对于站在这里的 499 名同难者心中，却压着一层阴云。谁如果不能挣扎着，挺过将受到的折磨而殒身在这口袋般的死亡谷里，谁都会同样被无声的弃尸在这荒野。这就是我们进入甘洛农场的第一个早晨，一个异常清醒和永生难忘的早晨。

第二节 西西卡的死亡谷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就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初上唱片时就是反右派运动。当时的百姓们那里知道，后来中国接二连三上演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在这首拼命鼓噪的歌声中，灾难便一个个降临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刚刚抬走了老彭，我听那歌就像是摧人命的丧歌。中国百姓被这首歌唱进了水深火热，饥寒潦倒。真不知这要命的歌声还要响多久？但那广播里发狂的回放，似乎说明当局在给自己壮胆了，难道他们此时一样的心虚？

九点钟后，穿着便衣的管教人员拿着点名册，将全体人员站队集合好，便各自呼喊着划入名册上的名字。按照点名册早已定好的分流，将五百人分成了四大部份，将分别的被押向山谷深处的四个队。

我被一姓李的年轻人点到后，站在我们那一组的已有一百多号人，基本上都是从孙家花园调集来的，这一次王大炳、老潘同我又分到一个队。

集合好队伍后，我们便各自背上自己的破行李，在那姓李的和五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盘旋在山间的羊肠小道。山回路转，出了场部的草坪，便一直在向上爬。这儿人迹稀少，经过一个冬天，路上茂盛的荒草虽已枯黄，但仍把小路严严实实覆盖着。

脚下的路好像是留在荒草丛中一条浅浅的划痕，昨夜的白雾在那划痕上凝成霜一般寒露，一边踢着荒草寻路，裤管已被湿透，加上从路边崖洞中不断喷出来的寒气，好像西游记里妖魔出没的地方，令人浑身发抖。

循着山路，转过第一个岔路口，回首再望那落在盆底的场部草坪，已被乱石遮去。还没

走上三里路，草丛底下的石谷子路，用它尖利的石头刺破了我的破胶鞋，我的脚被割伤了。一阵剧痛，我已感到脚底在流血，便坐在一块石头上想脱鞋看看，却被紧跟我的士兵厉声吆喝，我只好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艰难的走，就像被打受伤的牲畜，被主人抽赶着！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山谷深处一个小山寨，听那地名怪怪的，像是翻释名称，叫“西西卡”。“山寨”的前面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黄桷树，黄桷树背后排着两列互成直角的平房。

其中靠西的一排，墙已塌掉。几个同我们一样的破衣服们正围着一付墙板筑泥墙。而那南面的一排平房，是经过修筑而成的“新”房子，房顶上冒着炊烟。

那些还在筑墙的“老”犯人告诉我们，这儿曾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康巴叛乱发生地，那些乱石就是的“叛民”们垒起的工事。

那远地方，应是彝族人曾聚居的村寨，那黄桷树必是寨大门的标致，恐怕只有它才能诉说当年亲见的一切！房前户后稀稀落落留下来的几颗柏树，还保留了当年村寨的遗迹。

当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伍，充满了不安和彷徨的神色，拎着破行李，零零落落地进入到黄桷树南侧空坝子时，早我们一步，先来了几个月的三十余名选遣者，从平房中走了出来，他们的年纪比我们大，最年轻的都在三十岁以上。

一个身披草绿军大衣，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两手叉腰，已经虎视眈眈地站在黄桷树下面望着我们。他腰间别着一个黑色的左轮枪套，右手握着枪套里露出来的枪把，左手执着一根一米长的青杠棒，用他透着杀气的鹰眼，紧紧地盯着我们。那模样极像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林海雪原”，荧屏上的土匪头子栾平。

等到我们的队伍陆陆续续已经到齐，那位带领我们来的年青干事，向他搂过去，递上了方才从场部带回的文件夹，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提着青杠棒的中年汉子，将套在颈项上的警笛长鸣一声，几个管教人员便从南面的那排房子里走了出来，指挥着将新来的队伍和原来的犯人合在一处，排成六列纵队。

一个编制 150 人，临时分成六个组的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便在那提棒汉子口中宣布成立。那人作了开场白，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吼道，横肉在他的脸上抽动。在他一一宣布了本队任职的六名干事的名字以后，随即作了第一次中队训话：“呃！你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改造你们才来的，为了把你们这些鬼改造成人，我们才到这娘屁的鬼地方来！”

“你们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到这儿来是开荒改造的，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你们的……”他停顿了下来，显然在思索下面该说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出来，那一瞬间脸部的横肉厉害的抖动起来。

“世界观，”带我们来的那个李干事在一旁接了下话，解了他的围。“对，改造世界观”他清了一下嗓门。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这似乎使他难堪，脸一沉用纯粹的河北腔吼道：“谁他妈的不听话，想从这里脚板上擦油的，就别怪我的枪子不认人！”他亮了亮腰中别的黑亮的左轮枪匣，继续宣布着：“谁他娘敢调皮，抗拒劳动，偷奸耍懒，我这青杠棒就要吃他的肉。”

他把手中的青杠棒向着天空挥舞着，一阵呼啸掠过我们的耳边。队列中一片静寂。看着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心中直打哆嗦。

看来，这儿除了打人没有其它压服这群流亡者的办法。在凶恶的鹰犬面前，我们这群瘦弱不堪的人，简直是一群在狼面前的软弱羊群。

此时，我突然想到昨晚死去的那姓彭的台湾人，下意识的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四周全是高耸的青山，眼前除了一片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那张队长便向已集合的队列宣布开中饭。并且规定："今后开饭就照这个队列排好，各组清点完人数后，报告中队长才可依次打饭，吃饭时不准吵闹喧哗。"

说毕，便朝南边那排房子的尽头招了招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个炊事员，立即抬出了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烧箕，放在坝子中一个预先安放好的架子上。随后又进厨房里面端出了一个大盆子和一只水桶，大盆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菜"，水桶里装的是一桶米汤。

饿极的流放者怀着复杂的心情，一齐盯着那烧箕和菜盆。两个炊事员中个子稍矮的站到烧箕的背后，一支手抄着一个在看守所最常见的小洋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竹片，队列从最右边的一排开始，人们依次的走向那烧箕。

第一个人双手捧着他自制的大铁钵，接过那炊事员手里已刮好的饭团。他盯着那饭团，也许与他原来估计的实在差得太多，错觉的认为是不是还有一碗？便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让位给后面的意思。直到那抄碗的炊事员用手去推他，他才极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钵移到菜盆边，那舀菜的炊事员便将一瓢黑黑乎乎的菜叶，舀进了那大钵里面。于是他盯着那大饭钵里连底都没有盖住的饭菜，一面又回过头去盯着那盛饭的烧箕。

突然，他眼睛一亮，盯着了那桶米汤，不假思索的将就手里端着的大饭钵，向那米汤里猛地舀去。这个动作迅速变成了无声的号令，正直着脖子看着前方打饭的队列轰然一声，所有的人一齐拥向那桶米汤。顿时，一场三天前夜晚，在雅安抢馒头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不过这一次在场的没有一个是雅安事件的"为首份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西面那排房里所有的管教和士兵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那张队长直着眼睛，手里拿的青杠棒一时还不知该向谁打去，眼看一桶米汤被"抢完"，地上到处洒着打泼的米汤，那木桶倒在地上。抢到米汤的一个个咕都咕都的将抢到的水喝下了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士兵和干事制止他们，像看希奇似的目睹眼前这一场"戏"。

只有那张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两个炊事员将饭烧箕和菜盆抬进了厨房里，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走出来，厉声的喝道："娘的屁，你们刚刚才到这里，就抢吃的，不想活了不是？老实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雅安监狱，谁他娘要找死，杀两个拣一双，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他又摸了摸别在腰间那乌黑发亮的枪套，此时院子里的人全都垂着头，那张队取出了点名册，对中队进行了第一次点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治邦"，循着那应声的地方看去，果然是他。自从他们三人在丛林小学被逮捕后，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三人的下落，真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重逢。

当我接过那一团饭和那一瓢菜，定睛看时，那“菜”竟是平常人根本无法下咽的干萝卜茵，不但色黑味苦，而且只有一小撮，那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还少，而且几乎像像干稀饭一样。这点东西对我们这些饿枯的人，乍填饿壑？

接过饭菜，我便向杨治邦揍过去，他告诉我，自五九年春被捕以后很快调到了雷马坪农场，三个月前突然接到调这里的指令，一来就接受这突击筑墙的“任务”，西边刚刚筑好的这排“新房”就是在原来残墙的基础上赶筑起来的。

他还告诉我，那中队长叫张丑德，是一个生性凶残的家伙，为了避免吃眼前亏，他告诫我遇事忍着点，不要去惹他。

眼下这儿根本吃不到一点疏菜和副食，那做菜的干萝卜茵还是特地从几百以里以外的西昌买来的。平时厨房的灶头上连盐巴都看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锁在事务长的专用柜子里了。这儿的定量除了“仓耗”等说不清的原因，落到犯人口中的，每天恐怕不足六两。

我的心里对“活下去”发生了巨大的疑虑。便向他发问道：“那么，这么几个月了，你们怎么熬过来的？”他摇了摇头，一脸憔悴。“你们没来时，那张丑德为了我们赶进度，每天按规定量发足了我们的定量，同时每天还放我们下班时到山里挖蕨萁根。”他指了指放在厨房外侧的一蹲石磨，“靠它每天晚上把蕨萁根碾成浆，过滤以后便将那白色浆液与米共煮，味道虽苦，但可以充饥。”

监狱方面用牛羊肉当菜吃的谎话，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比画饼充饥还可笑。我们将在张丑德的青杠棒下，在高山峻岭的荒野里，现开荒地，再种上庄稼，等到神话实现那一天，我们中便不知有多少骨头，已在荒野地中去敲碎了。到了秋收时，命大的能挣扎着活下来，恐怕就寥寥了。

吃过饭，在张丑德指挥下，我们取出库房里已经破烂的绿色军车篷布，七手八脚的支架在那些刚打好的泥墙上，于是便成了我们“临时”监房的房顶。然后按所编的六个组，搬进了这“新居”的监舍中。

地上刚打的三合土还没有完全干透，我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就去那些黄桷树旁的几个谷草堆中抱来了谷草，又一阵忙乱后，便各自按点名册的顺序打开自已的破行李。

当我把行李从坝子里搬进来时看到，挨着我铺位外侧的一个名叫胡俚的小个子，正趁我不在，将已垫在我铺位上稻草挪到他所睡的位置上。我被他这种自私损人的小动作激怒了，待我把自己的行李放下后，便不客气的将那一堆被他抱走的草重新抱回来，那小子又黑又矮，操着一口江津土话骂开了。

唉，真想不到已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在逞强欺人，一种被人欺侮的羞耻感折腾了我整整一夜。

这一夜，我心里真不是一个滋味，心想在这种保命关头上怎么竟与这样的人相邻？听着山上的风，吹着帆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又失眠了，西西卡的第一夜，给我极坏预兆。

从第二天开始，中队出动了一个组，进山打野菜，恰恰张丑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组。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个背兜，满山遍地去摘采野菜，规定每天每人要采三十斤的任务。

阳春三月，野菜虽然品类很多，但还没有冒出地面，开始唯一能大量采集的，便是那些从石逢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蕨萁苔。

派出去的人，没有不以寻觅充饥食物为自己的头等大事，而要在这光秃秃的山野里找吃的，首先就要寻找附近的彝家村落，虽然张丑德一再严厉禁止我们同这儿的老彝胞接触，除规定外出打野菜的人，每天必须完成最低的采集任务，还明确向我们规定，若发现谁与彝胞发生不轨的交往，除按违犯监规之禁条处置外，还用彝胞活活打死逃犯的消息恐吓我们。

另一方面，像我们这种纯粹的政治犯，不知会在这些灾难中充当什么样的牺牲品？不过，无论如何，最初人们寻找彝胞兄弟的目的，都是求取生存。

毕竟是边寨，由于民族的成见，以及毛泽东这几年强迫同化政策造成的反抗，他那套农业合作化政策，遭到了这些民族坚决的抵制。所以这儿农村中受到“三面红旗”的破坏，不及内地的农村。附近的村民们保留着大片自留地，每一家还存有没有吃完的粮食，客观上可以用来救助这些陷入饥饿和死亡边缘的流放者。

开始时，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饼和包谷粑！不过他们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这么远的距离以及路途上遇到狗或野兽，及其它种种危险，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加上这里人迹稀少，散居在附近村落中的农家就那么几十户，所能提供的食物也是从他们牙缝里挤出来的，数量有限，流放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可换到。

换到手的食物又不敢公开带回住地，因为张丑德们一经搜出，当即便被没收，何况这一百多号人，鱼虫混杂，就是在求生存的斗争中，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相互检举并不鲜见。

所以，到手食物便塞进肚子里救一日之饥。偶有藏于野外建起秘密小仓库的，有时逢到了山耗子、兔子或野猫之类的动物，一夜之间偷袭一空。

再说我们身上的钱是被彻底收光了的，同村民们进行换取食物的只能“以物易物”。开始流放者将随带行李中的较为值钱的东西，比如皮衣、毛衣、皮鞋、床单、围巾、毛巾之类的东西带出去，没几天又被张丑德们发现。

对外出打野菜的人出大门时，受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身上有夹带，便被无缘无故的“没收”。任你费什么口舌和哀求也是拿不回来的。

有的索性把要换的衣服穿在身上，毛巾围在颈上，皮鞋穿在脚上到了外面再脱下来……这其中还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方法，先把被子捆紧捆好，外裹一床破席子捆紧在背兜底，然后将背兜翻过来，底朝天捆紧在底部的被盖并不掉下来，于是便倒背着背兜给值勤的人以一个“空背兜”的假像。

不过像这种瞒天过海的作法，也真够惨的，五一节大检查时，张丑德们才发现，整个中

队竟没有一件好的毛衣。保存着换洗衣服的人不到一半，多数人的破衣箱里已空无一物。还有十几人连破被盖也没有了。

流放者们挖空心思，像蚂蚁搬家一样将自己破行李中能换食物的东西，都悄悄搬进了附近村民的家里，剩下的是衣无二件的彻彻底底“无产者”。

我要算这一百多号人中最穷的一个，历经南桐的监督劳动，以后经过看守所孙家花园又是近三年的劳役，要讲耳闻目染，什么偷、拿、骗、诈在这种社会大学里本应学到一套“适应生存”的本领。可惜，本质决定了我却偏不染恶习，顶着政治犯这不识时务的帽子，与当局顶着干。

（一）同彝胞换荞粑

上山打野菜才两天，揍巧半路上，就碰到了两个赶着羊群放牧的小伙子。他们俩身上都披着这里的人叫作“查尔瓦”的黑色羊毛披颤，头上顶着大白布盘。我虽然并不相信那张丑德带有恶意诽谤的警告，但必竟是第一次，单独的同这些从未相交过的异民族同胞接触，还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种防备对方的警惕。

他们站在一条岔路口弯道边的一块巨石上，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背着空背兜向他们走进。“嗨！上哪去？”那年纪稍长的用生硬的汉语向我招呼道，口气非常和平，凭我的直觉对方并无任何恶意。于是便将脚步停下来，将自己的空背兜御下来，放在他们立足的那块巨石上。但是从何说起呢？于是小心翼翼的问：“附近有老乡的人家吗？”

“你到村子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换粑粑？”那年长的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也猜中了我的意图。看来，这里的村民们对我们拿东西到村里换食物，已成了他们人人皆知的事。也许因为交通不便，出于对某些工业日用品的需要，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换”。所以，只要一看到我们这种打扮的人便知道要干什么。

“唔”，悴不及防地被人道出内心意图的我，显出了一股尴尬的表情。

正要回答，那年纪较轻的小伙子说话了：“你走错路了，这里的人家都住在河溪边有水的地方，照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山上了，走到天黑都找不到人家的。”

他的汉话，比年长的那个伙计流利，他的补充显然充满了善意。唉！村落傍水这是一个常识，怎么我会糊涂到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也罢，既然对方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思，我也只有把话挑明了。

“你们有荞粑吗？”我坦言相对。那两人相对一视，年轻的那一个从他那散发着异味的“查尔瓦”里面取出了一个布口袋，彝族人向来有长年不洗澡和不洗衣服的习惯，所有用的东西都有一股说不清的异味，一般的人会下意识的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衣衫褴褛，饥饿潦倒的流放者，就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了。

那布口袋里装的是两个足有两厘米厚，直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颜色呈黑色带着膻腥气的大荞粑。一股饥饿控制着我，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成天为饥饿所困的五年里，我还是第一次

被这么厚实食物的占有欲所支配。

一股充满渴求和羡慕的眼光，从我的眼里迸发出来扫向那布袋，于是，便解下了那条围在颈项上的鲜黄色的新毛巾。

“用这同你换能换多少”？听我这话，那年长的便爽快的从那布口袋里取出了一个荞粑，并不犹豫地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真想不到，第一次同彝胞的交换竟这么顺利。尤其想不到一块毛巾竟换了这么大一个荞粑！

我接过来掂了掂，那粑少说也有三斤重，这如果在重庆地区，三十个“高级饼子”未必有这的份量。早知道毛巾在这里能换这么多食物，我真该在重庆监狱里多准备几条带上。

我啃了一口手中的荞粑，证明这确实是荞子做的，便开始大嚼起来，吃着那粑并不觉得有苦味，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饥饿。那两个年青人看见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透出了怜悯和同情。

当吃完它的三分之一以后，原来十分饥饿的胃顿时感到一种满足，直到贴实以后，便停了嘴，看了看面前的两个人，将剩下的大半个荞饼，用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破布包好揣进了怀里，先前对于他们俩的警惕和防范早已荡然无存，反而对他们的朴实、坦诚产生了一种亲切和好感。

于是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那年长的开始询问我的家和身世，也问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开始语塞，别说语言的障碍，对于我的个人身世，就是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也难以理清其中曲折，我想我当时褴褛一身，已经说明了我的遭遇。敞如我告诉他们，我原是一个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以及我的“教师家庭”，恐怕会令这两个人吃惊，他们不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会落到如此地步，所以只好避而不答。

“读过书吗”？我答非所问的反问道。那年纪小的看了看我，似乎觉得这问提得好怪！点头回答道：“读过，读了小学，后来黑骨头反了，学校关门了我们就不读了。”这是一个非常直率和纯洁的彝族人，那张丑德为什么要恶意的宣传这些可爱的同胞呢？

“这是你们家的羊吗？”我指着山崖下正在咀嚼枯草的羊群，大约四十多头骨瘦如柴。他依然十分率真的回答我：“不，这是我们村二十多人家所共有的。”那语言里有一种遗憾。“那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养羊呢？”我问道。

“那是叫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村里的工作组不准那一家私自养羊，否则就要一律没收杀掉”！他那话音里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你们现在靠种庄稼还是放牧？”我的问话一下子打开了两人的话匣子。

“过去这里很富的”，他顺手抓了一把土地里的泥土揍到我的面前：“你看，这土色黑油油的，什么粮食都出得很多。”说完便滔滔不绝地赞美起他们的家乡来：“没有合作化时，这儿家家户户每年收打的粮食怎么都吃不完，像这么四十只羊，过去一家人就要喂那么多，肥肥的，平时从来不愁吃肉。”

“后来，黑骨头造反啦，他们不要共产党，不参加合作社，不要当官的汉人。”他指着右

边一排穿着枪洞的石垒群，讲述六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枪战。

当然，康巴事件的内幕恐怕不是他们俩搞得清楚的。那一次事件终于被共产党血洗了。后来，靠枪杆子逼迫，老实巴交的彝民依然没有躲掉合作社的枷锁。

“一切都归公了，这儿驻进了上面派的工作组，清理造反的人，开斗争会，哪一家不听安排都不行。从此以后家家户户再没有丰收节日了，家里短缺了粮食，连牲畜也跟着遭殃。”

那年青的小伙子露出愤怒的样子，这些年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巨变”，都在他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反感！

他望着那些在荒草堆里寻觅食物的羊群，停顿了片刻，继续往下说：“一个冬天下来死了二十头羊子，原先由各家集中起来的两百头肥羊，现在也死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几个做种！有什么办法？合作社不配越冬的牲畜口粮，那牲畜哪能熬得过？”

我们之间这番坦露心迹，使我们初识便成为好朋友，临别时，我们相约过两天我们仍在这里相会，便挥手道别。

往回走时心里特别高兴，今天我的运气真好。趁着腹中有货迅速采满了一背兜蕨萁苔，便兴冲冲地赶回黄桷树。

（二）阎王的“饿死鬼殿”

回到中队的院子里，时间还不晚，院子里已经堆了一小堆野菜，这告诉我还有人先我一步回来了。我放下背兜，一边喊那代昌达为我“过秤”，一边取过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个厕所后再吃，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墩子上，便朝那刚围好的厕所走去，听见里面传来轻声的说话声，听那声音极像胡俚。

于是轻轻地走到门边停下脚步侧耳去听，果然是他，他正向张队长报告卢建华早上外出时穿的一套新西装。

听说一名华侨卢建华，法院认定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特务”。别看那张丑德外表一付土匪像，对于这 150 个人的档案上，几个挂了号的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此刻胡俚的检举引起了他的重视。不过，在张丑德看来，卢建华内着西装外出，恐怕不会只是用它来换彝人的包谷粑的。

想到这毒蛇就睡在我身边，心中未免发毛，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怀揣的荞粑，知道带了回来恐怕反而是祸事。一面回过身去看那距厕所不远的黄桷树下，灵机一动，快步地走出厕所向黄桷树走去，回头去看对面的哨兵正朝我张望，于是我装成寻找东西的样子，重新折回那条打野菜的路，绕了一圈，藏好荞粑，再回来。饭钵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装的中午饭菜不知谁已“代劳”了。

我拿着那空钵闷闷不乐的走进监舍，下意识地看了下胡俚那铺，心中正纳闷间，坝子里张丑德的哨子响了，开晚饭了。

代昌达正在用撮箕将堆在坝子里的蕨萁苔，装进厨房里的洗菜槽，草草清了泥巴，便撮进了厨房的大锅中，煮沸后将熟野菜装入河边的一个大木桶中，用清水“漂洗”。石梯阶下横躺着一条长流着溪水的溪沟，大木桶就放在那小溪边。

第二天清早，代昌达便从那大木桶捞出已变黑的熟野菜，倒进煮开的苦荞粥里，用勺一搅，便成了每天这些劳役者的早餐。这是一种又涩又苦，黑褐色带着苦艾“清香”的东西，我敢说是连猪都不吃的。

每天早上张丑德点名以后，衣衫褴褛的人们端着自己的大铁钵，排着队，焦急地向那饭桶靠拢，依次接过两瓢野菜羹。那接过粥的，一边走，一边还在用舌头去舔沾在铁钵边上的“米”汤。

自从第一顿中饭就发生了因抢米汤的事后，中午便改成了“罐罐饭”，外加一瓢又黑又苦的野菜。开始的一段时间罐子里蒸的是两个人的“定量”，两个人分一罐饭，纠纷当然不断。

到这儿来体质已极度虚弱的流放者，身体更趋恶化，水肿病肆虐着一百多号人。他们中除附近打野菜的人，暂时可以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随带衣物用品，向附近村民换取一点食物，其余的人从一早开始，便在士兵枪托和张丑德青杠棒的押解下，驱向周围的山地从事开荒。

那生荒地底扎满了盘根错节的芦草根，一锄挖下去，锄头便被那芦根咬住。全身浮肿的开荒者常常因体力不足，无法将芦草根挖翻，弄得不好，被芦草根扯住锄头，自己也栽倒在茬口上。

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起初规定每人两分地的开荒任务，谁也没完成过，那张丑德下了指令，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工。为了督战他亲自提着马灯，在深夜四面漆黑，山风呼呼的山梁上，听见后山传来的锄头声。

但是，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并不送医院，只令一名姓冯的犯人医生做一下人工呼吸，扎几下银针，吃两片药。等到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继续劳动。但是，几天以后，有的昏倒的人经救治不能苏醒。张丑德被迫下令往场部医院送。结果，送去的人一去就再没送回来。

（三）卢建华等人之死

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燥，用自己手中的青杠棒，抽打那些倒在地上满身浮肿的人已成为家常便饭。工地上一时成了虐打流放者的场所。那儿经常可以听到刺人心弦的呼救声。

自从西装事件发生以后，卢建华第二天便停止了出外打野菜的劳动，并调入了开荒大部队。张丑德对流放者的残暴虐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绝望。连日来不断的有人昏倒工地，送往场部医院的人使这个中队迅速在减员。卢建华被安排开荒工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称病不起。

当张丑德杀气腾腾提着青杠棒走进窝棚时，卢建华横躺在乱草堆中。“起来!”张丑德开始用青杠棒去打他的头，卢建华并不理睬他，依然双目紧闭。对于像卢建华这样的犯人，上面是打了招呼的，张丑德忍着卢的“无理”，向棚外喊着黄大中，黄医生提着药箱立刻出现在门

口。

“去，给他检查一下什么病？”张丑德向黄大中吩咐道，一面去坝子里集合点名。

十分钟后，黄大中走出了窝棚，向张丑德作了口头报告：“卢建华体温和脉膊都正常，没有病。”张丑德听到这个结论，顿时怒从中焦起，恶向胆边生。他无法容忍这个卢建华对他的渺视，立刻走进窝棚中，这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一下，拿起手中的青杠棒，向横躺在草堆里的卢建华劈头砍去。

血，立刻冒了出来，卢建华依然一声不吭。张丑德盛怒益发不可收拾，举棒在卢建华身上猛劈！直到张丑德忽然觉得有些不妙才收了手。

卢建华此时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血还在不断的从头上，身上冒出来。张丑德怅然的提着那染着血迹的青杠棒走出了窝棚，喝令在院坝里已集合好的人上山劳动。

谁也没有再去过问他，卢建华就一直躺在那里，中午收工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直到晚上收工点名开饭时，张丑德才发现卢建华今天一天都睡在窝棚中没有出来过，立刻再令黄大中进去检查。一分钟后老黄慌慌张张向张丑德报告说，卢建华失血过多，心脏已十分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张丑德才意识到今天“失手”打死犯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挂了号的犯人，立即命令两名炊事员抬上担架，将卢建华连夜送往场部医院。

半夜归来的代昌达透露，卢建华抬进医院时已经死去。然而张丑德严密封锁了卢建华死亡的消息，他自己内心最明白他是打死卢建华的凶手。直到场部后来有人来西西卡调查卢建华死因，仍按他的意图写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又过了两天，开荒工地上另一个小伙子赵小光，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喊肚子疼。当时他面色苍白在满坡芦根的荒地上打滚、呻唤。张丑德走过来，先说他一惯不好好劳动，现在是为了躲避劳动装出来的。后来又说他乱吃地里的野生植物，总之是这小伙子的错，这一次他不敢下手打人了。但拒绝了赵小光求医的要求，也不准他离开工地回棚里休息，这么一直熬到晚上收工。

第二天早上，当张丑德提着他的青杠棒，驱赶大家上山开荒时，不见赵小光入队，走进赵小光的窝棚，见他扑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用他那青杠棒去戳赵小光的头，竟然毫无反应，这使他本能的察觉，赵小光已经死去。马上用手取出了一个大口罩，一面喊黄大中，一面将口罩严严实实罩在嘴上。

晚上张丑德召集了中队会，煞有介事的规定：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后任何人不准偷吃生冷。并以此为队规，公开贴在墙上。

西西卡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农场场部的注意。尽管在这种草菅人命，把流放者的命当作猪狗不如的年代，可对于急需廉价劳力，刚刚才成立起来的农场场部，一个中队成立不到半个月，短短两天中，就接连发生这种现场恶性死亡总是一个问题。赵小光死去的第三天，场部便派了两名干事到西西卡实地调查连续死人的原因。

几个对“罐罐饭只吃了定量的一半”，认定中队克扣粮食早有怨怒的小伙子，听说来人是场部下来调查卢建华死因的，便围着来人告状，声称“我们的口粮只吃了一半”，“大家靠吃点野菜怎么劳动，怎么活下去”？还有人不惴冒昧，诉说张丑德打人的恶习，这些经历了雅安事件的人，面临死亡威协，正在寻找求生存下去的斗争方式。

当然，这种控告无异于小鬼向阎王爷告状，不要说来人不可能同情犯人，即使碰到讲一点人性和良心的人，对大家的呼吁也只能无可奈何。何况张丑德早有防范，在他的安排下，向来人提供情况的胡俚，代昌达和李治和之流。尤其是那胡俚，怀着卑鄙的动机为了讨好张丑德，着实将卢建华污蔑了一翻。

来人根据这些“犯人”所提供的材料，最后在他头上以“一贯坚持反改造立场，对抗中队教育”的大帽子作了“盖棺论定”。在死亡原因上写着“因病死亡”。而赵小光则作了“偷吃生冷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结论，在这种任意殊杀无辜的大势之下，无数无辜者就死在张丑德之类的酷吏之手。

紧接着又过了两天，当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野菜组的组长向张丑德报告，何亮从早上出去就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张丑德一起床就跑到野菜组来，证明这何亮一夜未归后，便命令立即清点何亮的铺位和行李，检查证明何亮铺上除了一床烂棉絮和一床破被单外一无所有。究竟是何亮的东西平时换东西吃完了，还是昨天早上席卷而去，连这位组长也说不清。

当下，张丑德对何亮作了逃跑的结论，建队不到半个月首开了逃跑记录。也许原先他曾估计这儿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这些犯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贸然外逃，殊不知流放者目睹这儿无异于死亡谷，早就有了死里逃生的打算。

（四）张棒棒

特别令张丑德心烦的，首例逃亡，竟发生在他原先估计不会有人外逃的野菜组。野菜组的人逃亡所带来的麻烦比其它组要厉害得多，这些人早晨放出去，满山放野鸭，谁也不知谁去向何方，如果有人早上就跑了，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发现，隔了整整一天，已经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派出人追捕吧，在这茫茫大山中间那里去追？

野菜组自建组以来，成了秘密“搬家组”，整个中队的犯人们都已行囊空空，从重庆带来稍微能穿的衣服，值钱的用品，就被这个组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彝家村寨去了，这些情况张丑德哪有不知道的？但是，派谁打野菜还不都一样么？尤其令人恼怒的是那个阳奉阴违的胡俚，他夹带出去的东西竟是全野菜组最多的一个，只因为这胡俚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张丑德一时没有撤换野菜组，何亮的外逃终于促使他对野菜组进行了大调整。

当天出工，张丑德即宣布原来的野菜组撤消，它的所有成员全部参加开荒劳动。今后打野菜与炊事员编成一组，他宣布了六个人的名单，全队立即大哗，今后西西卡的一百五十号人的这点口粮又多了几个两条腿的耗子，日子更难过了。

进入西西卡时我本已极瘦，身高 1.7 米，体重仅 34 公斤，可谓真正的皮包骨头，唯独两脚肿得像馒头。开始，每天外出打野菜，不时会碰到好运，换些吃的，精神还有所寄托，每天

耗蚀的体力也较小，即使如此，每天背回二十斤的蕨萁苔也会两腿打摆。经常耽心会因失去平衡，一交跌下去便爬不起来。

野菜组撤消，我被编入开荒二组，说也奇怪，开始那几天连续地在夜间做梦，刚刚死去的两个人似乎不愿去阎王殿，几乎每天都走进了我的梦境。我小时候虽素来并不相信人真有灵魂，但从打成右派，便开始接受了鬼神这种信仰，常常以此来理解我所碰到的“噩运”。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开荒以来抡起的锄头，扎进那芦根盘错的土里以后，就像被那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前的那一坯土，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直盯着我。

我同几个形体一样干枯的人，站在布满芦根的黑土地上发呆，这时我不禁想起南桐看守所外出收麦的情况，想到那肥沃的黑土地，被三面红旗的巨风吹得荒芜一片，埋下了多少老实农民的尸骨。说不定明天我会跟着死者一道埋尸在这里！想到了死，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发慌便倒在地上。

张丑德走了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听见他先是怒吼了一声，用他的青杠棒敲我的头。此时，我已打定注意与其拼命劳动，耗尽最后一点体力而死，不如干脆睡在这里，挨你张丑德的棒棒，以死与你一搏。主意拿定紧闭双眼，装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黄大中！”张丑德气急败坏的向山下吼道。不一会，那中年人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开始为我按摩切脉，如此持续了三分钟，“体温正常”，他怯生生的说。他已经亲眼看到，就凭他一句诊断，张丑德就当着他的面，结束了卢建华的生命，但他又不敢作错误的结论。那张丑德果然在怒喝声中向我的背上抽下了第一棍！我缩成一团，咬着牙关忍着剧痛准备迎接他的第二棍！说也奇怪，这一次张丑德踢了我一下，愤愤的走开了。

“张棒棒！”看着他提着青杠棒渐渐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称谓。自从到这儿以后，我总觉得称他为“张队”实在不符合他的土匪尊容，喊起来十分别扭，早就想给他取一个绰号像“张土匪”、“张杀手”、“张屠夫”之类，又觉得太露骨。一般犯人也不敢这么喊！喊不出世的。

唯有“张棒棒”则比较的形神相一，喊出去也不会受到追究。倘若传开了，送进农场场部他上司的耳朵里，说不定还会让他们知道其人在西西卡的作风，今后，西西卡死人也会落原因于他身上，便打定注意，一定把他这个绰号喊出名。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死”在工地上，黄昏渐渐地压下来，脑子里又在盘算，该怎么结束这台“戏”？也罢，索性就睡在这里装死，看你张丑德，不，张棒棒今天拿我怎么办？主意打定，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等到大家集合好队伍，往下走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着张丑德对我的处理。他一面吩咐大家收工，一面命令两个组长，到队部拿来一根麻绳。

队伍走了，天色越来越暗。他一个人留下来，在我的周围走来踱去，显然十分的烦躁又十分的无奈。不时的向山脚下望着那两个回队部拿绳子的犯人。我却一动也不动，在这种时候，

决不能打草惊蛇的。

两个犯人终于提着绳子从山下气喘吁吁的走来，这一次他已无怒意，取过了绳子，便向那二人说道："你们俩，一个抬手、一个抬脚，试试看抬得动不？"他的口气好像是同人在商量怎么搬动面前这个怪物。

（五）"死狗"战

我被两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按说两个人抬六十多斤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是对于虚弱极点的流放者却是好吃力的"活"，还没有抬出十米远，我便被抬手的那一个喊"停"，重新放到地上。

"把两手两脚捆在一起好抬些。"他建议道，于是那绳子便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走走停停，好在张棒棒带着电筒，便在后面撑灯压阵，足足费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黄桷树下时，天已漆黑。张棒棒无可奈何的回他的宿舍时，我的周围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开始哼起来。一个人捧着我的大铁钵，递到我的手里，里面装的是晚上的两瓢苦菜羹，我认出那人便是老潘，他与我同赴西西卡，与我在同一个"野菜组"，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沉默是对这种特定环境采取的一种自卫，沉默其实在某些时候是最好的反抗。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也是抗拒劳役的作法，名曰："耍死狗"。这生平第一次的"耍死狗"，虽然背上挨棒，挨踢的地方痛了两天，但并无巨大伤害。

吃完了野菜羹后，张丑德打着电筒又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正坐在那里双目发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吼道："装死卖活的，你这家伙就他妈会反动！告诉你，明天还得照样给我上工地去！"

看当时我的外形，无异于一具活的尸体，死亡对我随时可能降临。我被特殊地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跟在开荒挖地人的后面，将那些已被挖断，却仍埋在土里的芦草根抖出来堆在一边。

然而，张棒棒的这种"让步"立即产生连锁效应，几天后，同我一样，放下锄头，与我并排坐在地上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我坐在黑色的泥土上，脑子里空荡荡的，全身像瘫痪似的。最苦恼的还是饥肠辘辘，便将那粗壮的芦苇根用手抹去泥巴，送入口中咀嚼，可惜那草根干得像竹子一样，嚼不出一点汁来。

张丑德无趣地盯着这些枯瘦如柴的拓荒者，慢慢踱着步，走远了。

我抬起头来舒着长气仰望着天空，天空真美，无数彩色的云变换着奇奇怪怪的图形。小时候，我常常着迷于这些魔幻般的图形，把它们看作是在蓝天上自由奔跑嬉耍的小狗小兔。而今，在我的眼里，它们更像大碗里盛着一个个尖尖"冒儿头"，旁边散开的几片云彩，则像一些盘子里装着的菜肴。

我向身旁的人指点着那云彩说："你们看，那儿不正摆着一餐饭吗？"周围的人便一齐朝我手指的方向张望，于是大家便认真地讨论那大碗里装的是几两米的饭，一个人一顿能吞下几

大碗？一直到张丑德悄悄从远处转回来。“张棒棒回来了！”有人喊道，于是大家便一齐埋下头去。

我的可怜的“死狗”战，迅速在扩大，坐地抖草的人严格的说，按照国际上的规定，像我们这种濒临死亡的状态，即使是囚犯也该住院治疗。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在这蛮荒之地，我们却被驱赶着照样服劳役。

“张棒棒”迅速成为这个队对他的称谓，他当然知道是我给他起的这个雅号。在焦急和愤恨之余，他终于接受李管教的建议，改变战术，采取新的措施。

一天晚上，以我抗拒改造，消极怠工，煽动全中队集体怠工的罪名，召开了全中队建队以来的第一次斗争会。殊不知这种老套的迫害手段，对于处在生死边缘的流放者已完全失去作用，张棒棒的打手班子建不起来，开场白那段惯例的“端正态度”只能“暂免”。

那天晚上，“张，李”轮翻独白，黄桷树下鼾声微闻，正要散场，大组长慌慌张张报告说开荒三组的两人借解手，去厕所没回来，窝棚里不见人，大概是跑了。

张棒棒挥了挥手，斗争会停止了，一面气急败坏的命令汤干事，带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出发进行搜捕，各组清点人数。一阵哄闹后，西西卡重新进入黑沉沉的夜。

我并没有入睡，倒是替两个瘦弱不堪的逃亡者担忧。天黑路迷，山沟里其实并没有路，任何悬崖绝壁都是张开大口的坟墓，野狼的嗥叫隐约可闻，令人毛骨悚然！前有大山，后有追兵，两个骨瘦如柴的人还不像掉在虎狼群中的羔羊，怎逃这虎口？就是幸免得脱，又何处求生？时下虽已是仲春三月，在这荒山之中，除彝家村寨家园果圃里有一点绿色的小菜地，荒山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第二天下午，汤干事回来了，晚上张棒棒再次招集中队大会，在全队犯人中宣布逃出去的两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寨被村民抓获，当场就被彝胞打死。这一次，在他连日忧闷的脸庞上出现了红光，站在一百多号人面前，将两名外逃者带走的两个小布包高高举向天空，活像一个凯旋的士兵用枪挑着战利品向俘虏宣告：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们的老百姓就有这种觉悟，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叫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谁跑得脱？”

他得意的吼着，一百多号人搭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两名逃亡者，做了什么，谁都对这个张棒棒恨之入骨。

谁不明白，两个不幸的逃生者，是在饥寒奴役逼得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如此孤注一掷。如果他们真的死于非命，直接的凶手还不就是你这得意洋洋的张棒棒么？！

（六）死亡谷里的老鸦叫

翌日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树身捆在那里。那姿势很像一个负着巨大十字架向地狱走去的人。我因而想起了《神曲》，我该落入九层地狱中的那一层？但是我清

楚地明白，我的可怜身世，哪一层都没有我容身之地。

如果，我将进入天堂，可这儿怎么也看不见通往天国的大门，于是我才深深知道，这儿就是人间地狱。暴君毁灭了圣教和神灵，泯灭人性和良知，把人间变成地狱。

中午，大家收工归来，张棒棒将全体衣衫褴褛的流放者召集在黄桷树周围，开了一个现场处理会。宣布对我“停止劳动，就地反省”。他冷笑道：“对这个顽固份子我们已向场部批报，等待他的是严厉惩处。”

真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把人捆在树上，背树反省。如此的“严厉惩处”就像一个精神的恐怖咒，会收什么效果呢。他说完后，便正式宣布“不准再有人在开荒时坐在地上抖草了，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可以减半。”

从此，白天我便独自在黄桷树下，也没有人来理我。其实，对我最难忍的还是饿，饥饿像幽灵一样缠着我，我想起了冥界中的“阎王殿”。阎王殿中有饿鬼的说法，使我确信饿确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此刻，我的四肢不能动弹。饥饿便像鞭子抽打着我，我于是不自觉的口念“阿弥陀佛”。

正念之间，忽然想到不知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曾经说过：“唱歌能使人忘掉饥饿”，正好山下飞来了一只乌鸦，围着黄桷树拼命的鼓噪，一边用它那已秃掉了许多羽毛的翅膀拍打着树枝，一面发出“哇！哇！”的叫声。

窝棚的房顶上原来筑墙的基建组，正在为房顶铺草作最后的修整，听见乌鸦的叫声，有人拾起头石向那乌鸦掷去，咕噜道：“不知又死了谁了，这几天老是缠着我们这儿叫。”“唉！不祥之兆！还不晓得挨到哪一天！”

那房顶上传来隐隐可闻的议论声。

我抬起头来，却见那老鸦并不离去，人们越是驱赶它，它越叫越厉害，于是我便清润了喉咙，拉长了声调向它应和着，“哇、哇”这喊声由低到高，由闷到亢。房顶上的人一齐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

坐在大约五十米远处的哨兵，此刻大约正在打瞌睡，被这阵哇哇的叫声惊醒，站起身来，用手中的棍子向那乌鸦挥去，乌鸦这才拍拍翅膀，很不情愿的掠过枝头飞走了。

而我却不停地断断续续地哼唱着：“哇！propose！”，哨兵端着枪向我走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直楞楞地盯着我，我相信当时我那模样一定很可怕，如骷髅般的身上巾巾挂挂，衣不蔽体，两眼发直。两根像干柴棍一样的脚杆撑在一双发肿的脚上，倘若是夜间听到那声音又目睹此景，一定会认为遇到了鬼。

而他却站在我的面前，像欣赏这蹲“收租院里”的“准泥塑像”。也许他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形象还在喊，喊的又是什么呢？在一片莫明其妙的眼神中他终于摇着头，若有听悟的自语道：“装疯卖傻，疯了，疯子，真是疯子！”哨兵喃喃地咕噜着走开了。

我就这么隔着三五分钟，有节奏的唱到中午。房顶上的人下来了，围住了我，尤其是杨

治邦，用一种怜悯的眼光久久注目着我的脚。张棒棒走到我的面前，眼里闪着凶光，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几分好奇和无奈飘进了那三角眼。他回过身去，喃喃地咕噜着："疯了，疯了，装疯卖傻！"

他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喊！因为徜若，我用另一言辞来呻唤，他必会与我答话，那就是："哇！我饿！我饿……"可是，我为什么要让他与我接话呢？"唱歌可以使人忘记饥饿。"我想到的只是一首减轻痛苦的歌。

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把我套上黄桷树，到晚上放我就寝，我就用这个音符，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哇！propose！"三天过去了，农场场部的庞总管教长闻讯专程赶到西西卡，张棒棒当着他的面，用他的青杠棒指着我向他报告："这家伙死不悔改，不劳动装疯、装死狗、装老鸦叫，什么都装。"庞大管教像观赏一个奇怪的东西盯着我，一脸的狐疑。

从此以后，我在西西卡装死狗，装老鸦叫便成了吏、囚皆知的趣闻，我也因此而名扬甘洛农场。

后来到了盐源，邓扬光曾几度以此来取笑我。他说："你有什么能奈，除了装死狗装老鸦，你又有什么能奈！"比之轰轰烈烈死于枪口的反抗者，我确实是逊色了。但与那些从你们狗洞中爬出的败类，我又值得骄傲，而我的同难们说道："怎么啦，你们就把他没办法！"

直到十五年之后，我被当局传去宣布我"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的同难们都还在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趣闻。

他们说："老鸦和死狗帮你抗拒了那非人的奴役。"而我则坦然地回答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自卫。否则，我也许就同当时那些耗尽体力，饿死在西西卡山上的冤魂一样，无法超越那道鬼门关，也无法活到今天了。"

苍天不灭我，我得感谢苍天！只是回想起那张棒棒，便觉得中国人的愚昧，可笑可悲。其实这一切灾难全都源于专制极权。若非毛泽东陷大陆于饥饿，我们怎会身陷在如此绝境中？

第三节 黑色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我看到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记录的有关资料。杨尚昆按四川省"三年自然灾害"的呈报，承认饿死了 1250 万人。根据中共对灾荒一贯瞒报、谎报的惯例，这个数目是被缩减的，实际的数目只有到清算"三面红旗"时才会得出，然而这个数子在毛没有死时，是绝对封锁的。

1962 年 3 月，我们流放到甘洛时，已处于大饥荒后期。但是一群形容枯槁的流放者，仍然被驱迫进行高强度的劳作，从而使这些流放者迅速变成饿殍。

西西卡的房顶刚好铺完，几场春雨便降到久旱的西西卡大地上。初降的雨露，本是苍天降给人间"润物细无声"的爱抚，但对于我们这些虚弱不堪的苦役犯来说，却是又一场飞来的灾难。

大雨连降几天，我们憩住的草棚，雨水顺着泥墙，如注地倾注到我们的被子下面。浸透了谷草，也浸透了破烂不堪的棉絮。三合土地面上水汪汪的，就象流水一样。黄褐色的雨滴，渗过屋面的蓬草，趁夜滴打在这些浮肿的拓荒者身上。

开始的时候，疲惫不堪的人们，并无精力去理会那些打在他们身上的雨点。只要脸上不被雨点打着，便蜷着身子躲避，直到满屋都是雨滴，又无处躲藏时，大家才惊慌的起来。

人们相继爬起身来，用自己的破脸盆和大铁钵承接雨水。苦的是被雨水浸透了的被盖，已无法抵挡寒冷，我们卷曲在湿透的被子里瑟瑟发抖。

若在内地，现在正是播种、插秧的农忙季节。然而对于被困在西西卡的这一百五十名流放者来说，却正经受着一场生死大劫难。

迫于无奈，他下令扎雨班。那雨一下就是七八天，中间没个间歇。被饥饿缠昏了头脑的人们这才想起，一年一度的黄霉雨季已经来临。

极度虚弱的苦役犯，经过这番袭击，发高烧的病人迅速增加，由黄大中送往医院的人，又多半死去。

一场春雨在张棒棒的花名册上，一下子又删去了六个人。张棒棒开恩，命大家趁下雨的间隔，到周围山林中捡干树枝烧成火炉。一来取暖，二来烘干已被打湿的衣被。

于是各监舍马上腾出一块空地，围了几块砖，准备生火。经历了一个冬天，西西卡周围的山林中到处是干柴。不一会，大捆的干柴就堆在各监舍的门口。一阵忙乱，窝棚里腾起一阵滚滚浓烟以后，大家便开始烘烤被打湿的衣被。因为下雨，我也免去了背黄桷树的处罚，跟随大家去山上拣柴。

连日的阴雨，野菜也渐渐接不上了。铁钵里的稀粥越来越稀，人们越来越饥饿。

初降春雨浸透的山林，从地心中蒸发出的一团团的白色雾气，覆盖了西西卡四周白茫茫一片。我想，此时此刻，必定会有人打逃命的主意。

果然，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说昨天夜里开荒三组又跑了一个人。中午时分，打野菜的人便来向张棒棒报信，说昨天逃跑的人，就在不远处被野狼吃掉了。

下午三点钟，张棒棒集合全体流放者，冒雨跟着带信人向出事地点走去。距我们的驻地最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块在五天前刚刚开垦出来的一片荒地附近树丛中，领路人停下了脚步。

在一丛荆棘围住的青岗栗树枝上，挂着一些蓝色和白色东西。定眼细看，树枝上斑斑点点，挂着从一件破棉衣上撕扯下来的棉花和破布条。在树丛脚下的杂草堆中，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赫然摆在大家眼前，那是死者的头颅，以及被撕咬得不成人形的残躯，令人毛骨悚然。

距残躯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扔着一个小布包。在小布包上面，也染满了血迹。仔细再看，周围的树技和树杆上溅着点点的血肉，留下了死者在临死前同野狼拼命搏斗的痕迹。死者年仅

二十岁，但已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努力回忆着他的外貌和举止，以保存一份记忆，但我仍然想不起来。这是一个我不认识也不曾有过任何交往的同龄人。死者的父母和亲人，还在远方倚门祈望着他能平安回来，但他葬身野狼的腹中，永远不能回去见到他的亲人了。

张棒棒柱着青杠棒站在尸体边，手舞足蹈的向我们进行着现场教育。

人们沉浸在恐惧和悲伤之中，树丛中的雾气里面，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除了饥寒、奴役和鞭打折磨之外，还有一群出没于营地周围的野狼，虎视着想逃脱这地狱的任何人。这难道不是当局的精心选择么？

那死者是我们之中还不懂事的孩子。他究竟触犯了哪一条死罪，该送进这荒山野壑中的野狼口中？离驻地这么近，夜深人静中，怎么没听见死者同野狼搏斗时发出的呼救声？我努力地去回想昨晚睡觉前的所有细节，想回忆起昨晚所听到的异常的响动。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察觉。是死者因饥饿虚弱恐惧而无力喊叫，还是他压根就不想出声，抱着宁可搏斗而死，也不想被抓回来活受罪？

我被血腥气憋闷得慌，忍不住，脱口喊道：“哇！哇！propose。”所有的人都向我转过头来。张棒棒不屑地瞪了我两眼，但没有吭声。

不一会儿，打野菜的几个人杠着锄头随后赶到。三个人就在那荒地旁边挖了一个大约只有一尺深的坑。将就着把死者的头、遗骨和那包刨进了坑里，垒起了一个小土包。

尸体埋下以后，张棒棒还用手指着那个小土包恶狠狠地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反改造的下场。”

是的，这就是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无辜的流放者的悲惨下场。不过，他毕竟太年轻了。风沙和泥土可以很快地淹灭了他的血迹。然而却无法抹去这血淋淋的血债。

其实，我对死亡已没有什么恐惧。

回转的路上，我忍不住再次向苍天哀呼：“哇！哇！propose。”只有这样，才能略抒我心中的悲伤。

身临绝境的人，只要死神还没摸到自己的头颅，必然对自己的生存抱着希望，并且有所行动。像这位刚刚死去的小伙子，未必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成功，便朝着死神手指的方向走去了。

在当时，像胡俚那样不惜出卖自己的同难而祈求获得宽恕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看到希望渺茫后，只好忍耐和沉默。

当然，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调到另一个可以维持半饥半饱的劳改队。

虽然到西西卡不到四十天，这一百多号人中就已先后死去了十一个人。虽然死神天天都在摸着某一个人头颅，但是只要没有模到自己的头上，人们依然抱着各种“希望”熬下去。

西西卡没有暴动，西西卡依然无声无息地在等待着死人。人们在沉默，在等死和各种“希望”中扳着指头熬日子。

（一）人吃人

五一节来临了。这一天，也是我们在这死亡谷中熬过的第四十天。我们谁也不会去想共产党何以会对这个节日怀着“虔诚”的敬意？节日，早已对我们毫无意义，充其量带给我们思念亲人的痛苦。

而这一天引起了死亡谷中大家的关心。因为在前一天中午，王事务长已当着大家的面，煞有介事的说：“场部为了让大家过好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五一节，专门组织了一个车队去了成都，采购腊肉和干菜。”他这么一句信口说出来的话，谁也不会去细细思索。

其实从成都来的时候，王事务长“牛羊肉当小菜”的诺言，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上这儿才一个多月，他便立即改口，好像成都那儿又有取之不尽的肉和菜似的，竟会派一个车队去成都运来？这比哄孩子还要可笑。

中共对我们骗惯了，对这一百多号饿昏了的人，谁还有兴趣去追究他们当初的谎言？不如阿 Q 一点，把它当作一个希望，真的从成都开回一个车队的肉和菜。

王事务长看到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因而来了劲，提高了嗓门吼道：“经中队研究，五一节给每个人加大米四两，腊肉二两！干萝卜一两，干咸菜一两。”人群活跃起来，几个骨瘦如柴的人竟举手欢呼起来。

屈指算来，从春节到现在，整整三个月了，几乎没见过肉是什么样子的流放者，有人在脑海里盘算，二两腊肉切开来有几片？王事务长信口开出来的菜单和加餐粮，能够填饱一顿肚子吗？有人就地发言：“只要政府开恩，哪怕吃饱一顿，马上去死也心满意足了。”这话听来，道出了我们的无尽辛酸，四十天来死去的十一个人，不都是些饿死鬼么？

大家的眼光，一齐聚焦到了厨房里，盯着那里的炊事“官”，好象会从他们的身上盯出五一节“丰盛”的菜肴来。

代昌达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们称他为一号猎犬，是西西卡中队的头号红毛犯人，张棒棒钦点的炊事员班长，他是从成都监狱来的，自从当上了那炊事班长的“官”，便比一般犯人高出一头，炊事组单独住在厨房里，平时从不同任何犯人往来。

代昌达被捕前是有“前科”的，因为偷摸被警察抓过，他充当刑警队“二排”后，专盯“反革命犯”的“反动”言行，并在刑警队管吃、管用，后来，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打伤了人，才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关进了监狱。

这种败类，历来是“阶级斗争”所依靠的对象，虽然谁都知道其人品极其卑劣肮脏，是一条靠一百多犯人的“血”养得一身横肉的“两脚犬”，奈何我们一百多号人的生活大权，有一半掌控在他手中，我们每一顿的“吊命粮”，就是由他称米下炊，开饭时，又由他手里的勺子，给你的铁钵里装上孰轻孰重的两瓢。

因此，大部份的流放者，虽然心里对他恨之入骨，但在表面上却不敢得罪他，面子上还得陪着笑脸，与他寒喧。

站在代昌达身后的人叫李治和，是代昌达的搭当，此人是一个将事务长交给他们的全队口粮先行吃饱后，再将所余部份熬成米汤倒进野菜桶里的“克扣能手”，他原是重庆地区的一名惯偷，翻墙越壁，撬锁破门，本是他混迹江湖的看家本领。

入狱后，他常将犯人们不堪压迫和虐待的牢骚话打成“小报告”，及时面呈管教干部们，因而讨得张棒棒的信任。

雅安抢馒头事件的为首分子，便是他检举告发的，到了西西卡，他便成为张棒棒选择的炊事组人选，爬上了流放者们的头上，变成一只吸血的蚂蟥。

李治和的榜样作用，影响了一些人，胡俚多半就是跟他学的，西西卡中队成立四十天，连续十一个亡灵，代昌达、李治和可谓直接的小帮凶。

五一节前的下午，大家开始打扫清洁，厨房的外面，围观了一大群囚奴，一向专横独裁的张棒棒，今日破例，第一次向这些围观的流放者表现他的公正。

这大概是因为西西卡连续死亡事件，有人向场部报告西西卡克扣囚粮的一种反映。下午三点钟，张棒棒亲自提着秤杆，叫王事务长打开保管室，从里面取出了一块熏得黑黄的腊肉，然后亲自撑秤，并将秤足的四十五斤刻度亮给在场的人看，以此表明没有切下一块私藏。

称完肉，张棒棒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吩咐代昌达：“全部一次下锅，每人三两不能少。”同时还指派了基建组的杨治邦作“监厨”。围观者盯着那黑里透黄的腊肉当场锁进了厨柜。

第二天放假，中午大家特别守秩序，各自围在院坝内被指定的圈子里，每一个组派出三个人从厨房的窗口取回全组的“丰盛”午餐。

今天是“两菜一汤”，那已经蒸满的罐罐饭面上，盖着几片黑中透黄略带“哈”味的肉片，每一个圈子中间，都摆着大大小小形状怪异的铁钵，两个人紧张的向铁钵里分进菜和汤。其余的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分菜人手里的勺子，看是否公平，也看勺舀进铁钵里的菜有没有撒到地上，今天的干萝卜特别香，各个圈子里都传来分菜多少的吵嚷声。

菜分完后，大家把领来的罐罐饭排成一列，围成一圈，令一个人背过脸去，另一个人拉开排列着的饭菜中为首的一罐，插入筷子，由背过脸的人任意喊圈子中某某开始拿第一份，其余的按顺序取走属于自己的那份。

即使如此，端到菜饭以后，大家仍然不断地评多论少，那些分饭时洒在地上的萝卜干，当然被捡得干干净净。大家端着盖着肉片的罐罐饭，数着那些黄熏熏的腊肉，多的有六片，少的五片，一直都舍不得吃，等到了把菜汤都喝干净以后，才如珍品般的慢慢品赏。

忽然，开荒三组的那个矮个子组长，带着王事务长出现在厨房门口，并径直向灶边的煤堆走去，只见他操起煤堆旁边的铁铲，当着王事务长的面，在煤堆中刨出一块黑黑的腊肉来，王事务长面对这黑里透黄的肉，一脸尴尬无奈，人们立刻哗然。

原先安静的院坝，立刻乱哄哄的，大家把厨房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代昌达、李治和二人被叫了出来，面对着那块沾着煤屑的腊肉。有人拿秤一称，有六斤三两，“看，总共才四十多斤的东西。张队长称给大家看的，叫一点不少下的锅，却被这两条狗衔了这么大一块走！”人们愤怒地呐喊了起来。

“真他妈的歹毒，天天喝我们的血！”

“喂不饱的狗，你们看，代昌达长得像头猪！”

“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两条狗什么时候偷了那么大一块肉？”恶骂和尖叫，喧嚣了整个院坝。人们只有用厉声叫骂来发泄对他们久积在胸中的怨恨。

“还有那监厨的呢？那不是一伙的吗？”

“黑心狼，滚出炊事房。”

“滚出来，代昌达！”院坝里一片呐喊声。

张棒棒闻声赶到厨房，看到现场，早已明白了一切，两条狗见主人的到来，像见到救星似的，用乞求的眼光期待在众怒之中得到保护，因为这事真给主人丢了脸，只等着主人如何的发落，脸上的表情十分狼狈。

再看张棒棒，面对着院坝里一片“滚出厨房”的吼声，第一次在那横肉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走到那块肉旁边，不屑地朝那两条狗瞪了一眼，狠狠地吐出两个字：“混账！”随即吩咐，各组派一个人把那块肉洗净，切成小片煮熟，重新分给大家。

大家边吃边在七嘴八舌的咒骂，并要求张棒棒立即把他们赶出厨房，另换新人。在众怒难犯之下，为了平息大家的怒气，他当众宣布“李治和从明天开始，到开荒组参加开荒劳动。”想不到这一次同代昌达李治和口中夺食，竟以大家获胜而告终。

我第一次看到监狱中群起围攻红毛犯人并获得胜利的事，不禁想到雅安监狱那一晚上的情节来，当时的几个主角，虽然已分散到各中队去，但那种反抗精神却留在我们中间。

如果连同我的学老鸦叫以抗拒苦役也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这些抗拒既是当局逼出来的，也是雅安斗争的延续，这些斗争证明，我们这一批流放者虽良莠混杂，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仍然是非分明。

后来我们又从李治和的口中知道，五一节按当时成都的供应标准，干部每人供肉五斤，犯人每人供肉半斤。从成都买回的肉，西西卡中队总共分得一百斤，一半鲜肉，一半腊肉。供应给犯人的肉，实际上是七十斤，结果慷慨的王事务长和张棒棒只拿了一半肉分给大家，且全是腊肉，剩下的肉便全部归存保管室，以供看守们“细水长流”了。

如此说来，这李治和不过是效仿他的主子罢了，比起张棒棒和王干事，真还是小巫见大巫，只怪自己不小心，把切下的那块肉，放进煤堆时被人看见了，才闹得沸沸扬扬。不过，从我们这些随时都有饿死可能的人口中夺食，真是太残忍了。

吃犯人、吃死人、吃逃兵的缺空事，自古有之。历史上朝政腐败的时代，军官吃逃兵的缺额以自肥，狱吏吃死囚的缺空以中饱，直至公开克扣他们的粮饷，虽然并不鲜见，但一经上司们查出，轻者掉乌纱帽，重者甚至掉脑袋的。但对代昌达和李治和的处罚，如此轻描淡写，实在还比不上朝政腐败的时代。

在"全国饥馑"情况下，看守监狱的干事、管教们，从失去自由的犯人口里抠出一点吊命粮，从而造成囚犯们大批死亡，则是中共对"历史"的新"贡献"。

为吃一点肉，西西卡的主管人敢于这么做，可见他们平时对犯人口粮的克扣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中共不是说给个人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足可维持人的生命的么？那么到了西西卡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饿死？

不知在西西卡的日子里，这些"病"死、外逃、打死、毒死的无辜冤魂中，有多少是被这班吸血鬼所害死的？由此推及全国，当年被流放的无辜者中，有多少是被活活的折磨死的？至今没有统计，也没有人提到，更何况，追根溯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不是中共独裁势力黑老大么？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罪恶，侈谈共产党拯救人类，消灭剥削真是太可笑了。

李治和自知到了开荒组，一时半会是进不了厨房的，眼下怎经得起那苦不能入口的野菜羹煎熬？正好，"五一"节前连日阴雨，过了五一野菜告缺。张棒棒安排他到野菜组打野菜。

那李治和自到西西卡以后，仗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的机会，对西西卡附近的几家村寨早已摸熟，尤其熟悉靠河边的寨子，这些人家有几口人？作息出入规律？粮食堆放到哪里？他都弄得一清二楚。

到开荒组的第三天，李治和趁去打野菜的机会，便首告捷战，晚上提回了一袋大约十余斤重的荞粑，这年月，边寨的彝胞比内地的农民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生产的粮食，照例是农业合作化后，国家搜刮的最稀贵物资。

同四川内地不同，这儿没有种小春的习惯，只靠大春一季栽种，五月份正是大春栽种之季，所分的包谷和稻子已经吃完，只是遍山沟里的荞麦并不缺乏，在这种青黄不接之际，荞麦便成了救荒渡饥的唯一食物。

荞麦粑充饥颇为贴实，所以彝家多半都将荞麦磨成面粉，在锅上烙成大块的荞麦粑，上山干活、放羊打柴时，便用布包着，绑在腰带上，中午不用回家开炊，就山沟里的泉水，啃荞粑充饥。李治和弄来的那一袋荞粑，估计多半是从人家的灶头、锅中收集来的，为了封住他相邻铺位人的口，他十分大方把"猎物"分给周围的人分享。

然而，在这惜粮如金年代里，对于被偷的人家，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李治和把别人锅里的东西偷走了，岂不是要这些穷苦的边民的命么？被偷的村民，必将被偷的消息，立即遍告附近的人家，从此便有了戒备。

果然，一张无形的网正悄悄地张开，专等着这位不速之客的第二次"光临"。

李治和第一次出击后，过了三天，他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村落。这一次，他刚刚进村，就

被盯上了。

在李治和翻墙越壁，以为四下无人，还没等他摸进厨房，五六个彝胞青年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把他擒住。不由分说，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棍棒像捶死猪一样，朝着他身上雨点般打去，直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取出绳子将他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任他怎么的告饶呼喊，也不理他。

直到黄昏时分，张棒棒才从打野菜的人那里听到李治和出事的消息，只好带着两名士兵，找到出事地点，天已黑净。先是向村长说情，要他放人，但是捆邦李治和的几家人硬不答应，张棒棒只好又去找公社书记，官腔、私话费了不少口舌，并一再承诺，将他押回中队以后，一定严加看管，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把李治和从房梁上放下来，此时，他已经喊不出声来，命在旦夕，深更半夜，又从队上叫了几个体力较好的人把他抬回西西卡。把他抬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了，抬回来时，并没有听见他哼一声。

我原以为看在他对张棒棒摇尾乞怜和忠心上，在这种重伤情况下，张棒棒会立刻把他送医院的，却没有想到，第二天出工后，张棒棒下令两个炊事员把这条打得半死不活的癞皮狗，抬到黄桷树下责令其“反省”示众。

也许因为我持续几天的老鸦叫，使张棒棒感到对我乏了劲，或者看到我形容枯槁半死不活的样子，感到再整下去，很可能闹出人命，只好放过了我。

我的那个位子，就这样被他占据了，中午收工时，我见到他正仰卧在地上，在长着一身横膘的皮肉上，一条条黑色的棍迹满布他的全身，从他被撕破的上衣看见，几道血印是吊打给他留下的终生“记念”，两条胳膊已被黑红的血迹模糊得不堪一睹。除了头脚的血迹稍微少一点，浑身上下，几乎是一个“血人”。

比之几天前看到的那位被野狼吃掉的小伙子的残躯，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李治和人品卑劣，不足相悯，但看到他那般惨状，不得不令人心惊肉跳。幸好是他占了体质强壮的光，倘若换另一个人，恐怕早去见阎王爷了。

五一节以后，张棒棒重新调整了劳动组合，撤下了一个开荒组，在工地四周开苗园，种菜和打南瓜窝，我被取消“背”黄桷树的处罚后，也没有让我上山开荒，而是叫我为蔬菜地干点杂活。

李治和被抬回的那天，见他像死人一样，脑子里总是翻动他肆意克扣张牙舞爪的劣迹。为了惩罚那些敢于向他争多论少的人，他故意给他们打“半瓢”，甚至还要抡起铁瓢，将不愿离去人手里端的吊命粥打翻在地，不断用张棒棒的腔调训斥对方。

联想到大陆被弄到如此地步，不正是依凭像张棒棒、代昌达、李治和之类的不同层次败类，横七竖八的架成了这台畸形的国家机器吗？没有张棒棒、代昌达之流的为虎作伥，大跃进，三面红旗能这么肆无忌惮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么？而今所有惨祸全都转嫁给了全国普通百姓，不靠这台机器的运转和镇压能平稳无声么？

张棒棒和李治和之间不过是一种充满野性的相互利用。在利用中建立起主仆关系，利用价值一旦失去，便被一脚踢开，这便是李治和的必然下场。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一次大劫难，李治和伤愈康复后，会不会认识到这层可悲的关系？我敢说，在中共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下，李治和即使死里逃生的康复了，其损人利已的本性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想到这些，我忽然心中闷得发慌。想起了有几天没有学老鸦叫了，于是又一次拉长了嗓门，对着他："哇！哇！propose！"

李治和在黄桷树下示众一天，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这条癞皮狗，直到下午五点钟，黄医生来了，经他的诊断，他终于被抬走送进了医院。

两天以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说他已经死了。同所有葬身此处的流放者一样，他被草草挖坑埋进了荒野之中，天道无常，天网恢恢，由不得人间的专制魔王了，他的死应证了"善恶终有报，只差迟与早。劝君勿亏心，冥天不可恼。"

（二）杨治邦之死

蔬菜组成立的同时，张棒棒又抽调了一个组，在开垦出来的土地周围铲草皮沤草木灰积肥，以备大春下种之用。他把积肥收方的任务交给了杨治邦。

为了弥补西西卡暂时没有安装高音喇叭的缺憾，场部为各中队订了报纸，并下令各队必须指定一名读报员，每天中午或晚间保证一小时的"读报学习"时间。

中共向来关注"宣传"工作，越是饥寒交迫，就越要控制人们的头脑。通过强制灌输报上的谎言，来达到精神控制之目的，张棒棒把这事选中了杨治邦。

他比我大四岁，自幼父母双亡，因贫穷所迫，在他的一个叔叔介绍下，16 岁补了昆明市一个宪兵的空缺。"解放军"占领昆明以后，他便编入了"解放军"，不久复员，靠做工读完中学，考进了重庆大学。然而他的宪兵历史"污"点，按照共产党的政策，难免受到严格审查，他已是毕业班的学生，却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关。

我们同属极右份子，并一起于 1958 年同赴南桐丛林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来因下雨闲谈，与李天德等人一道，被罗织成"叛国投敌集团"下到狱中。

这次相遇我才知道，他被王怀寿派往南坪取邮件，曾当着王怀寿的面发了几句牢骚，争吵过几句，王怀寿便怀恨在心。

16 岁时留下的"历史污点"，注定了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然而，他生性软弱，背上历史包袱后，一味的逆来顺受。

张棒棒叫杨治邦担任收方员和读报员，除了他的大学生的招牌外，主要看中了他性格懦弱，便于控制。

到了西西卡，我们彼此有了接触，搞清了他的"叛国案"的冤屈，但对于他的逆来顺受

态度，我非常反感，后来在与他单独交谈时，我才明白，他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刑期只有七年，按照刑满的时间，应当是后年获释，他还将肩负做父亲的天职。

自从杨治邦接受读报的任务后，每天中午，他便抄起那只破话筒，按照李管教指定的篇目朗读报纸，虽然他多次向我诉说读报的苦衷，他说“肚子饿得发慌，有时读着读着就感到眼前发黑，金光四射，脊背和额上冒出一股股冷汗。”

他明知自己所读的全是谎言，但在“按期获释，一家团圆”梦想支配下，仍然坚持着读下去，听他读得结结巴巴，脸色铁青，有几次我实在听不下去，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地对他说：“唉，你这人怎么搞的，这种差事你也干，你就不能把这事交给别的人么？”但他仍然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

有一天中午，杨治邦像往常那样，读完报纸后，单独到厨房里领用了一份在数量上优于一般流放人的饭菜后，便上山“收方”去了，当他穿过那片每天都经过的灌木丛时，竟意外发现矮矮的灌木下，长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蕈子，他朝那里走去，随即发现更远处长着更多更大的蕈子。

杨治邦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蕈子，它们原是霉雨季节摧生出来的，他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但接着便疑团重重，因为山蕈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再看那颜色漂亮的山蕈，宛如魔鬼变成美丽妖女向人招手，是毒饵？还是救命的草？

杨治邦将蕈瓣开来细看，那白嫩的肉里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用舌头去舔了舔，感到并无怪味，在饥饿冲动下，不一会他便收采了一大包，兴冲冲的来到积肥的工地上。看看四周无人注意，便在那火堆的一角刨开一个洞，将那一包蕈子埋在那发着暗红火光的草木灰堆中，重新盖好草皮，便收方去了。

下班后，大家收工回去，杨治邦便独自留在工地上，刨开那刚刚埋蕈的火堆，那蕈已烧得香喷喷的，便独自饱享了一顿丰盛的美餐，殊不知，这正是魔鬼给他安排的“最后晚餐”。

吃饱以后，天色渐黑，杨治邦便踏着暮色，慢慢往回走，还没有走到黄桷树下，便觉得恶心反胃，心里阵阵翻腾，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他强忍着走进了监舍，便倒在铺上。

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蕈子毒性大作，他的脸色铁青，手捂着肚子在床上痛得打滚，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股股冒出来，接着便是猛烈的呕吐。

黄大中为他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看到他情况危急，连夜抬去医院。第二天早上，送他的人回来说，才进医院，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杨治邦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间。这里的青山又一次拥抱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撇下他仅六岁的孩子和苦命的妻子，不管他怎样的逆来顺受，仍然没有圆上他合家团聚的梦。

亲眼目睹这位同学和许多同难的生前和死后，我的心反而十分平静。我知道，当死神抚摸着我邻铺上的头颅时，距我就近在咫尺，也在审看我这棵枯瘦的头颅呢。

我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招去天国，反倒为他巴望不久就要回家，同他的妻儿们团聚

伤心？！想到这里，我便不自觉地迈向那黄桷树下，对着大山长长的哀号：“哇！哇！Propose。”

这一次青山竟发出了悠远的回声，好像同我一起为杨治邦共唱着送葬的挽歌……

（三）新“食品”

雨水浸透以原来坚硬无比的生荒地，也变得特别的松软，蔬菜组的人在打南瓜窝时，意外的发现深土层里埋藏着一根根像红苕一样的块根。初尝其味，除了一股泥土的腥臭外，还有一点甜，略带水份，生吃很像红苕，细细观察，这些深藏地底下的块根，用它像筷子般粗细的主根窜出地面后，便长出了一束带着细长绿叶的藤蔓来。

这些藤蔓附着在遍地的荒草上面，须细心察看，才可以找到埋藏它们的地方，我们叫不出它的名称，就根据它的外形颇像红苕，称之为“野红苕”。

后来渐渐发现，那些野红苕窜根极深，一窝野红苕，可以结出几窜的块根，延伸得很远，循着那根挖得越深，野红苕越大，虽然它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味，但充饥是可以的。

野红苕的发掘，给西西卡饥饿的拓荒者送来了救命的“粮”。饥饿的人们在野红苕的引诱下，忘记了水肿和虚弱，把南瓜窝子打得又大又深，超过了定额的要求，碰着好运气，一窝里挖出的野红苕，足有七八斤重，够饱饱的吃上两顿。

开始时，大家挖出它们，仅用手抠掉上面的泥，最多只在肮脏的衣服上擦两下，便坐在南瓜窝边狼吞虎咽大嚼起来。

蔬菜地下埋有野红苕的信息立刻传到了全体开荒者，一时间，挖野红苕充饥便成了“公”“私”两顾的风潮，风糜了西西卡。

对这种既能充饥，又有利于开荒的风潮，张棒棒也没有多加阻拦，一段时间后，证实这玩艺儿并无毒性，还指定野菜组的人到山上去搜寻它的滕，将挖出来的野红苕加在苦菜羹里。

积肥组负责烧制草木灰，准备大田备耕，也有他们寻找“野食”的门道，他们在草丛中搜捕形形色色的蚱蜢、蟋蟀和藏在粪担里肥胖而发亮的“老母虫”，以及那些刚刚脱去尾巴从溪边跳进草丛里的“石蛙”、“癞蛤蟆”和“四脚蛇”等等富含“蛋白质”的品类。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附近农村，调皮大胆的大孩子，常常用一些形体怪异的“毛毛虫”“蚱蜢”之类的虫子去吓唬小女孩，常常会使这些女孩子们吓得发出尖叫，现在这些虫类，统统都变成我们充饥的“野味”。

捉到以后，便把它们穿在一根预先准备好的铁丝上面，就近的火堆中扒开一个洞，把穿好了的虫子窜塞进火堆之中。过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去取这些烧得很香的“野味”了。

在这些“野味”中，恐怕要数蚱蜢是最常吃的“肉食品”了，拓荒者给了它一个很“肥美”名字叫油蚱蜢，只要火候适宜，把这种虫刚刚烧黄就取出，它的表面就呈现出一种油亮的皮来，放进口中，真还有那肥肉被烧熟的味道。

至于对稍大一点的动物，例如癞蛤蟆，烧的时候一定要取出它身上一种叫“蟾殊”的毒

物，并包上一层稀泥，烧成的效果比肉类差不到那里去。

其实饥不择食，人到极饿时，其觅食的范围与动物并没有多大区别。

后来，我成了家，仍不敢忘记毛泽东时代这段身穿巾巾，棉铠甲御寒，尝百草解饥，茹毛饮血的日子。有了孩子以后，为教育他勤奋求学，常将这段生活讲出来教育他，然而环境变了，我的说教被中共另一套腐败意识所冲淡。然而，我不得不提醒年轻的一代：忘记过去，意味着遗忘教训，那是多么危险啊！

（四）雷田食子

开荒一组有一个叫雷田的简阳农民。有一次，他在草堆里捉到了一条四脚蛇，他便从头上脱下了那油腻的破毡帽，把那小动物包了起来，晚上吃“野菜粥”时，只见他用熟练的动作，剥下了皮，然后迅速地装进自己的大铁钵中，两瓢滚烫的粥冲下去，蛇身便挣扎起来，尾巴翘出了钵外，他便用手倒提尾巴，将那不知烫熟了没有的蛇身塞进了他的“血盆大口”中，丢手以后，只见那蠕动的尾巴带着鲜红的血，还在他的嘴边盘绕蠕动，血却顺着他的嘴角向下流。

人们对雷田的这一幕表演已见惯不惊，只听得他自言自语唠叨：“再毒的东西，人比他更毒，只有你毒它的，哪有它毒你？”那一瞬间，配以那身巾巾挂挂乞丐不如的穿着，必令人张口结舌，至今，我仍清晰的记得那种场面，那场景在梦中，常常成了恶梦。

二十世纪科技高速发展，自称人类最优秀份子代表的中共，其统治下的劳改队，出现原始人类茹毛饮血的惨状，你也许还会怀疑，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共当局也许会否认，说这是“反华”势力对他们的中伤和污蔑，但是今天曾在边荒充过军，至今还幸存的人，绝不会把这些深刻铭记在心中的一幕从记忆中抹去！并会向他们的儿孙们讲述。

就是这个雷田，从不向人们回避和隐瞒自己亲身经历的残酷“家史”，当有人问他，怎么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杀掉？他总是坐在地上两眼发直，呆呆凝望着五月凉山的灰色天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重复地述说：

“1960 年春天，家里面已断了两天的炊了，我娘双目失明，一身浮肿，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困难，我和老婆已两天没见一粒粮食了。那几天，我先是在竹林里挖芭蕉头回来吃，后来芭蕉头也挖完了，便到土地庙挖观音土，两个娃儿，大的六岁，小的才三岁，因为那几天吃观音土，拉不出屎来，天天坐在板凳上哭，公社配来的那几两包谷，让老娘和娃儿吃，三个人还要争。

一天晚上，我老婆去井里寻了短见，几个人把她打捞起来就在村头埋了，我娘和娃儿全身肿得像发泡的馒头。那天晚上，我刚端出红苕藤煮的包谷羹和一盆炒了的观音土做的粑，两个娃儿不去吃粑，却去抢那羹，结果盆打翻了泼了一地，我娘听到声音，爬在床上，用双手在地上去抓那泼在地上的羹往嘴里送。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心中一发狠，抓起一根棍子就向小儿头上砍去，那知道娃儿都是吊着命的，那一棍正好打在脑门上，只见他在地上翻了两下，叫都没叫出声来，两脚一蹬就死了。我看到这里，心里发狠，想到反正是死，便取过菜刀把娃儿的头砍下，丢到厕所里，身子砍成

几大块，立马升起了火，当夜就把他煮了……”

雷田停顿下来，脑子里似乎还停留在当年的恐怖之中，此时，他脸色铁青，看得出，他心里非常难受。

“煮好以后，我把娃儿的腿舀给瞎子娘吃，娘吓得直哆嗦，我说：‘妈，反正娃儿已经死了，杀一个救一个’”讲到这里他又顿了一下。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大娃儿看到我那样子，吓得钻在床底下直打抖，我把他拉出来告诉他：“你妈也死了，弟弟也死了。总不该全家死绝吧。就看你弟弟的肉，能不能救活你和你奶奶了。”

雷田讲到这里，脸上的肉在抽动，我想他一定想哭，但是泪水好象已经干涸了，那干瘦的眼角也没有掉下泪来。迟疑良久，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第二天，队上的治安就把我找去，我就这样判了无期徒刑，第二年改判为二十年。”

听雷田讲故事的人都知道，这段往事他已经反复讲了好几遍了。好象只有讲出来才能减轻他的罪孽感，减轻他心头的压力。

故事已整整过去三年，有时候他还流露出自己能活到今天的苦恼。至于他的瞎子娘和他的大孩子，现在是否还活在人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而我对这种故事并不陌生，因为那个年代，我听到的类似惨剧真不少。

唐朝末年，黄巢作乱，杀人八百万。河南因旱灾和连年内战发生大饥馑，史书上对他的部将秦宗权曾有“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的记载。已作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倾覆，内战烽起上一段华夏史上的著名悲剧而永志千古了。

而今，在中共历史上，且不说毛泽东在历次运动中嗜杀成性，残害无辜，而在和平年代里，造成这种持续数年的人为大饥馑，演出这一幕幕人吃人的惊心动魄的惨剧。恐怕记载“人相食”的古代史官，都要心惊肉跳。

我不知道，野红苕是不是减缓了一些濒于死亡者的厄运，但是即使上苍有拯救这群可怜生灵的爱心，魔鬼也要变着戏法与之作对。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第二开荒组的两个年轻人，挖到了一颗足有两斤重的草根，草根的芽头上还发出淡绿色的芽苞，但却不像野红苕，芽头上并没有长着细如柳叶的藤蔓。两个人切开一大块用鼻子去嗅嗅，除了像地瓜相似的生土味外，并无其它异味，再用舌头去舔，甜甜的。于是两人便被那诱人的甜味征服，开始分而食之。

由于饥不择食，两个年轻人对那极不正常的闷味，却顾不上怀疑，吃下那个东西后，不到一个小时，到了中午收工时，两个人的肚子便疼起来，回到监舍，便倒在铺上，捧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打滚，那凄惨的叫喊声，比杨治邦还要惨。

根据他们断断续续讲出经过，黄大中判定为误食了一些种叫狼毒的毒根，当即把他们送往医院，结果在医院里强迫两人喝下肥皂水“洗胃”，又使两人呕吐不止，还没到天黑，这两

个年轻人便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开始的时候，场部对非正常死亡还有些关注，后来被如此频繁的死亡弄得十分麻木，对这死去的两个年轻人，张棒棒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我们监舍东侧的那条小溪，春雨以后，溪水上涨，被溪水淹没的两岸，从水中长出了一种青油油的绿草，它的叶子和气息与芹菜很相似，我们管它叫野芹菜。生吃起来味苦，但不像其它的野草那么粗糙难于下咽，有人大胆的吃了以后，并无呕吐拉肚子等中毒症状。

于是，每天到这儿洗手洗脸的人，都要扯一把，蹬在溪边，就着雨后混浊的溪水，掏掉粘在野芹菜叶子上的泥沙，就像兔子吃草一般的嚼食起来。

没几天，那些长着野芹菜的地方，便留下了一片光秃秃的草椿。至于在水中捞到香附子，挖地时挖到甘草，老虎浆，白药、白芍等等，凡是可以吃的野草树根，无一不是拓荒者充饥的食物。

张丑德三令五申地禁止“偷吃生冷”，但无济干事，饥饿的流放者，简直就像一群饿鬼，不放过任何可以入口的食物，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向荒地要食的精神，决不亚于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在品赏这些不知名的草和根时，被状如芋头的半夏麻得舌头发直，说不出话来；被状如野芹菜的毛莨毒得两眼翻白、口吐白沫。这些勇敢的尝食者，有不少因误食毒菌，毒虫而命丧的，笔不胜记。

可惜，生处如此绝境，这些被共产党强化洗脑而麻痹了神经的流放者，却像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反抗施暴者，人们因争夺野红苕而吵架打斗的事，又是经常发生的。

（五）为争“野红苕”

自从我同胡俚发生铺草之争以后，又在偶然中知道了他是卢振华之死的始作俑者，便对他十分憎恶，加上我天性犟脾气，对他这种处处欺侮弱者以讨好队长更感厌恶，使我们成了水火难容的邻居。

我早就知道，我平时经常舒发的不满和牢骚，都成了他讨好张棒棒的告密材料。当我因学老鸦叫而扬名甘洛农场后，我对队部的公开对抗态度，人们反倒给我许多道义上的支持，背着大家向我伸大姆指的人不少，我在大家支持下，当着他的面去羞侮他。

说也奇怪，我的这种对立态度，使他欺善怕恶的奴才秉性居然得以收敛。

有一天，我和他挖两个相邻的南瓜窝，恰好在那两个窝之间，距我的窝点不到一公尺的地方冒出了一根又长又壮实的野红苕苗，我心中早已盘算着只要把我的窝子打大一点，那窝野红苕，当然是我今天的加班粮了。殊不知，大家刚刚上工地，才放下锄头，胡俚抢先去挖那窝野红苕，见他那种霸道气，越看越冒火，这不等于逞强欺悔人吗？

于是，我拿起锄头，以我的窝心为园心画了一个大圈，描准正好把那窝野红苕划入我挖的圈中，我指着圈，用锄头比着他吼道：“你挖自己的窝，为啥抢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胡俚见我怒气冲冲的样子，就停下了手，稍停一会儿后，他却毫不示弱的反击道：“老子挖老子的窝子，关你屁事”说完他继续的挖。我便用锄头，架着他的锄头，两个人迅速地扭成了一团。

我个子虽然比他高，但浮肿的两脚却是虚的，被他一扑，便被压在了他的身下。突然我对准了就在我嘴边的他那肩膀，在一股久积仇恨心理支配下，使出混身力量聚于牙帮，狠狠地朝那肩膀咬下一口。

他被咬以后，痛得松开了手，朝着我头上脸上乱打。我已经感觉到鼻血流了出来，便顺势举起锄头向他劈下。

正在这时，几个同组的人和李干事把我俩架开，两个人扭扯着到了队部，在张棒棒面前，他亮出那被咬伤的肩头，我当然成了输家。

张棒棒以我严重破坏队规的名义，将我用绳子扎了起来，并且当众宣布：“今后谁挖到野红苕，谁都不准私吃，一律充公，交到厨房去。”

张棒棒还趁势挖苦我：“你不是狗吧，怎么会咬人。”近旁的人纷纷议论：都是“狗咬狗”。因为张棒棒这种处理，使我在这次斗殴中，蒙上了非议，我也吃了眼前亏。

第二天，老潘在厕所里悄悄跟我说：“凡事都忌任性。对于像胡俚这样的家伙，最妙的办法就要抓住他的弱点，用他的主人去整他，用不着在小事上同他争高低。”

这话很有道理，胡俚最大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霸道任性，阳奉阴违，因他这个优势而出卖的同难，却又经常对张棒棒背地里骂娘发牢骚，报复的机会总是有的，只是要讲机会。

果然有一天，他因为没有完成挖地的任务，而被张棒棒留在工地上，直到晚上九点钟，才放回来归宿，他心里窝着一肚子气，进到屋里，坐在铺上就破口大骂张丑德，我见机会到了，装作解手，走出监舍立即向张棒棒报告。

第一次在张棒棒面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确实感到很别扭，张棒棒将信将疑的走到我们监舍，正好听见那胡俚的骂声，便不由分说，将他叫到漆黑的院坝里，先是两记耳光，吼道：“你这小子磨洋工，还害得我陪你，你还敢骂政府。”说完便亲自动手，狠狠地捆了他一绳子。

这一次胜利，使我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此后十余年间，我常常利用这种主子打狗的办法，制服了好几个老想在我身上捞油水的败类。

（六）夜“偷”

按照张棒棒的规划，除苗圃以外，我们监舍和队部前方那片平坦的大坝子，全部是蔬菜地。蔬菜地上最先种上小白菜和白萝卜。这些生长期短产量又高的菜，是用来接替日益枯竭的野菜的。在全国粮食定量的情况下，为了不违反国家规定的统购统销政策，又要解除饿死人的危局，大种蔬菜成了风行全国城乡的一种自救措施。

人民公社化政策，迫使农业畸形的发展。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或郊区的市民，对种粮反而没有丝毫积极性。因为那是统购物质，又是定量的东西。种得再多，除了口粮外，其余的全被搜括进官仓之中。中共各级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上大面积的粮食。而农民的精力和肥料，当然会施到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自留地上。

西西卡的张丑德也不例外。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的办法来弥补稀缺的农产品，结果越是统购，物质越是连年奇缺。越是奇缺，越要强化统购。直到油料花生、黄豆等等百姓最常用的食物，几乎在市场上绝迹为止。

监舍的背后和周围，便是一排排南瓜窝，其间也套洒了小白菜种。所有的人畜肥，集中使用在菜蔬地上。南瓜窝的后面，以及周围山地开出来的荒地，才是大面积苞谷和红苕的种植区。那里面施下的，只是一些草皮肥。

谷雨节过后，门前的大片蔬菜地已葱茏一片，长势甚好。屋背后的那些南瓜，也开始牵滕。奇怪的是，那些种在生荒地上的几乎没有施什么肥的苞谷和红苕，也已绿色一片，长势不错。我想，假如这些作物有充足的肥料，再施以认真的管理，那必是一片上好的庄稼。

看来，西西卡并不是什么鸟不生蛋的荒山野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属于天府之国的川西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很适合庄稼的生长。只是在专制帝王时代，由于科学水平的低下，山势险竣，交通不便，所以才长期的处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蛮荒状态。这儿若无暴政的干预和破坏，靠勤劳人民的辛勤劳作，必是天府西部的米粮川。

我上次在三岔路口所遇到的两位年轻彝胞所说的“家家户户有屯粮，牛羊成群衣食足”的农家美景，绝对是他们以前的盛世。就是专制帝王时代也是如此。我们从成都出发时，所说的“牛羊肉当小菜”也并非全是诳语。之所以我们进甘洛时，这儿成了一片荒山，实乃是毛泽东暴政之恶果。

古人言，苛政猛于虎。大跃进三年后，全国大饥馑已成汤镬之祸。在缺粮供应的条件下，一轰而上，驱赶一群饥饿的无辜囚奴，用枪押着，强迫我们来开辟这些被荒废的土地，才造成了我们靠野菜和草根毒虫充饥，挣扎在饥饿中的惨景，造成我们大批饿死。

现在用我们的生命换来的长势诱人的蔬菜，当然会成为饥饿的拓荒者用来充饥的对象。比之草根和蝗虫，小白菜和萝卜才是人吃的东西。

张棒棒早已加强了预防和警戒。下令除了炊事员和蔬菜组的人外，其它任何人不得进入菜地。他还在我们出工必经的道路上，插起一排半人高的竹篱笆。凡是要穿过菜地到南面山坡上耕作的大田组，都让两名武装士兵一前一后的监视和押送。

即使在严密防范和监视下，那些最先长大的小白菜和大萝卜，仍然经常受到“袭击”。靠近路边的菜地，像癞子的头一样，小白菜被一片片扯掉，萝卜地里也留下了一个个被拔去萝卜后的浅坑。

出工时，经过菜地，趁着跟队的士兵在最后面，前面的人就有人用最快的动作跳越过竹篱笆，将早已瞄准好的萝卜拔在手中，再像蚱蜢一样跳回队列中。整个袭击动作，必须在两三

秒钟内完成，如果没有被发现，便将战利品揣于怀中，到工地上再吃。

也有人用衣襟把萝卜的泥揩去，便很快地大嚼起来，一个萝卜下肚，用不了一分钟。为了防止被队列后面的士兵看见，大家相互掩护：当前面有人跳进菜地以后，后面的人会用身体遮住士兵的视线，故意跌倒打闹，以转移监视士兵的注意力。

当蔬菜渐渐长高，人蹲在里面被遮住，对菜地的夜袭行动便开始了。

夜袭菜地，毕竟非常危险，虽然当时还来不及在监舍周围设置高墙和电网，但是每晚都有士兵轮流值夜，蔬菜地当然是看守的重点之一。因为是一片平坝，即使在黑夜，只要电筒光扫过，任何人都无法躲藏。如若夜间被抓到，恐怕就不是几棒棒就能了结的。

即使如此，每有夜雨骤起，狂风大作，或到下半夜人已酣睡之时，我们的舍房里便有人弄回大捆的萝卜来。也有被抓住的，张棒棒便采用五花大绑的方式，来惩罚每一个落到他手中的人。

有一天，大田组的周均在苞谷地里瓣了一个刚刚挂须的嫩苞谷，被张棒棒捉住，张棒棒除命令周均把嫩苞谷连蕊一起嚼进肚里外，还吩咐两名士兵，将他五花大绑。

细麻绳勒进周均皮里三分有余，再将他像拎小鸡一样反背着摧紧，周均连声惨叫，不久痛昏过去。

张棒棒一面嘴里不停喝骂：“我叫你这狗日的吃老子的苞谷！我叫你这帮饿死鬼吃！老子今天整死你也活该。”

暴怒使张棒棒满脸的横肉更加凸起，就像要生吞了周均才解心头之恨似的。人命在他野兽般的眼里，简直如草芥一般。为了一个苞谷，他几乎弄死可怜的周均。那庄稼本是我们这些苦役犯用血汗换来的，却成了他的了，谁如果因为耐不住饥饿，还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

周均就因偷吃了一个嫩苞谷，在黄桷树上被捆吊了个半死，直到半个月后，右手仍是麻木的，不能抓稳筷子。

从此以后，他便沉默寡言了，终于在一个没有月色的黑夜，只身逃跑了。逃走以后，张棒棒对他遗下的破烂行李进行搜查，证明他什么也没有带走。大家无不替这个带着伤残的小伙子耽心，要翻越这丛山竣岭，岂非易事？他这一去，凶多吉少。

果然不出一个星期。张棒棒便在晚上的队前训话时宣布说：“周均逃到了越西河边的吊桥上，被守桥的民兵发现，叫他站住，他非但不听，反而拔腿狂奔，结果他从吊桥上跌进了几十米高的越西河里喂鱼去了。”

不过，张棒棒已没有先前那种幸灾乐祸了。先前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尽管从别的地方抽来一些加以补充，此时只剩下一百个人了。

转眼已是七月上旬，但对于我们，刚过去的四个月，好象过了四十年，那片茂盛的蔬菜地里，长出的白菜、萝卜，也已源源不断的代替了野菜，晚上的粥已改为萝卜稀饭，可我们知

道这是几十条生命换来的。然而流放者的饥饿，并没有多大的减轻。老虎浆野红苕依然是大家觅食的主要对象。

在监房大门前，种植了一片辣椒，不知是这里的气候和土壤特别适宜，还是所种的辣椒种属于高产良种，那片一亩地的辣椒，长势特别旺盛，植株都在一米以上，且枝叶茂盛，结实累累。辣椒本是供给本队驻军和干部们作蔬菜的，长势繁茂的辣椒获得丰收，明显的供过于求了，为了讨好场部，张棒棒下令菜蔬组，摘下首批牛角椒专程给场部送去。

西西卡的夏夜，在带给人们静谧的同时，也随风吹来了果实的清香。每当深夜，当晚风徐徐送来各种庄稼的清香时，对于饿得发慌的人们，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虽然张棒棒狠毒的惩罚镇压着跃跃欲试的囚奴，他们白天找不到机会，便频频在夜间进行夜袭。

随着蔬菜日渐长高，监房前的南瓜藤也覆盖了大地，给夜袭者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于是借晚上起身小解的机会，环顾四下无人，便一个纵步，跨过门前大约一米宽的排水沟。迅速匐下身子，伏地向前爬行。到了菜地篱笆边，便悄悄地抽开一个缺口，然后悄悄地潜入青椒地，借着茂密枝叶的掩蔽，贴着地面继续向纵深爬去，直爬到菜地深处，把头略略上抬，就可以触到肥大的果实。

摘辣椒时，要仰躺着，控制住心的狂跳，然后用两只手轻轻摘下，使之发不出声响来。摘在手中后，再侧耳倾听，确知四下无人后，再翻过身来，背朝天空，伏地大嚼。一边吃一边还要侧耳细听，周围若有脚步声，便要立即停止嚼吃。

等到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取出束在腰间的口袋，将摘下果实迅速装袋，等满载以后，爬出辣椒丛，又要静静侦听。找到原来进园时的篱笆缺口，再悄悄将进来时放在一边的竹子，一根一根插回原处。等四下无人声时，再翻过排水沟，带着战胜品钻进那临时窝棚里自己的窝中。

每次偷袭，至少需一个小时以上，每次偷袭，都会碰到哨兵巡游的电筒。不过每次偷袭成功，足可以扛回供好几天“加餐”了。

监舍背后的那一片苞谷长势十分旺盛。仅仅四十多天，它们已由小苗长到了一人多高，在腰上挂上了刚出须的苞谷娃。

夏天多倾盆大雨，趁着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偷袭的目标便改为更能充饥的嫩苞谷。

进入苞谷地，要比潜入辣椒地困难得多。因为要到达苞谷地，首先必须绕过屋廊，再转过整排监舍的墙角后，绕到监房后面，经过排水沟，越过大约二十米宽没有掩蔽的南瓜地，才能进入那片苞谷地。如此长时间的夜间穿行，碰上穿梭的巡逻兵可能性很大。一般的黑夜，很难安全完成整个的潜越过程。非借雷雨交加和夜幕的双重掩护才行。

然而既是雷雨天，那闪电的时间则无法侧定，每次电光一闪，如同白昼。如若恰好碰上巡逻哨兵，极有可能以逃跑的名义，将你就地击毙，故而十分危险。

好在每逢雷雨，那些巡逻兵一般躲在营房里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怕高山的雷电劈死自己。

他们才不那么死心塌地地“忠于职守”呢。

不过雨夜“偷袭”，雷电是不饶人的，万一击中夜袭人，只好自认倒霉。而且因为过于胆大，久走夜路，必有撞鬼的时候。

有一天夜晚，上半夜还下过一阵雨。到了下半夜三点钟左右，雨住了，月亮也落山了。趁着微微有些昏影的月黑头，住在隔壁的雷田出动了。

雷田刚刚转过墙角，穿越南瓜地的时候，苞谷林中意外的射来了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罩定了他，他还来不及转身，一声吆喝，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拥而上，将他捆翻在泥泞的南瓜地里，几记重拳脚踢，体弱的雷田连哼都没有哼出声，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他被捆翻在黄桷树下，混身都是泥土，要不是他伤痕累累的脸上两个发红的眼睛还在转动，活像一具从泥水中拖出来的死人。

看着他令人心悸的模样，耳朵里就会响起他把自己的孩子打死，并煮肉给瞎眼娘吃的那番令人悲悯的自述。他是那个年代里，遭受空前惨烈灾难的普通农民的典型代表，而他的克勤忍让，是中国农民的普遍质量。

他经常对人说：“我前世一定作了大孽，今生才得如此之报。”如此看来，他对无奈杀子背上新的负罪感。难道苍天真会对他施行这么残酷的惩罚？

大致由于频繁的“夜袭”被张棒棒发觉，以后的夜袭，明显受到了狱方更严厉的戒备和防范。就是在大雨倾盆的夜晚，苞谷地上空会时时射来一束束刺眼的手电筒光，尽管如此，夜袭行动仍未中断过。

人们为了克服饥饿的煎熬，对惨酷的处罚，已变得麻木不仁。

（七）人间地狱

有一次，我依然照着雷雨夜袭的惯例，选择了一个漆黑的雷雨交加的夜晚。当狂风大作天空的闪电刚刚开始时，我就准备好了一条破裤子扎成的大口袋。

第一阵瓢泼大雨狂泻时，我已越过了门前的屋廊，潜到了南瓜地边。顶着茫茫大雨潜行，雨往身上直掼，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借着一阵闪电的余光，我辩认了方向，向着苞谷地猛冲过去，脚上绊到了一根指头粗的瓜藤，几乎将我绊倒，刚刚站隐，突然在蒙蒙大雨中，一道电筒光从远处向我扫来。我赶紧扒在泥浆四溅的南瓜窝中。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头上和背上。我明白，只要我的头不超过那片茂盛的南瓜叶，我就不会被发现。

此时，我的精神被大雨冲刷得亢奋异常。电筒光射过以后，便熄灭了。大地又归于漆黑之中。如注的暴雨和强劲的疾风发出强烈的吼声，时不时有雷暴从头上滚过。我开始慢慢向前挪动身体，却辩别不清从哪里爬进苞谷地了。

在一片电闪中，我重新辩认了方向，等到那电闪刚刚熄灭，我突然站起身来，迅速地穿

过南瓜地，进入了黑压压的苞谷林中。

当我接触到着粗壮的苞谷植株时，紧张的心才稍稍松弛。摸到壮硕的苞谷，兴奋感又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明白，只要向苞谷林的深处前进五米，茂盛的苞谷林就会掩护着我，而不易发现了。借着滂沱大雨，我就可以大胆猎食了。

然而就在这最后的两秒，距目的地大约只有十米远，一束强烈的电筒光，出其不意的拦腰扫来。我急忙扒在雨地上，听得见沉重皮鞋声在不到二十米远的田坎上响了起来。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屏住了呼吸，好险啦。看来，张棒棒已安排人加强了巡逻。

全身被雨水湿透，背上沁出了股股冷汗。还好，那皮鞋声渐渐远去。我没被他们发现。

雨势减弱了，方才那股狂暴的劲头渐渐软了下来。于是我果断地站起身来，向苞谷林的纵深处钻了进去，在雨声和风声的掩护下，我迅速的操作起来。为了不留下痕迹，以免第二天被人发现，每掰下一个苞谷，便撕去它的壳衣，并把撕下的衣壳全部就地埋掉。近处的苞谷已被掰掉了许多，我只能向更纵深的方向前进。

风势虽有所减弱，但雨仍然很大。我顾不得苞谷叶将膀子和脸锯出一条条火辣辣的划伤，时间不允许我在那里了。当我去腰间取出那预先准备好的“口袋”时，我这才发现，“口袋”不知掉到那里去了。四下一片寂黑，我已无法找到来路，当然也无法去找那条“口袋”。连忙把上衣脱下，草草将掰下来的苞谷扎成一捆。等待下一个闪电，好辩明方向往回走。

正在此时，我突然听见监舍的那个方向，稳稳传来人的呐喊声，心中不禁一惊，以为是谁借雨夜外逃被发现了。

看来，回去发生了麻烦，赶紧提着那袋苞谷，拨开刺人的苞谷叶阻拦，向南瓜地方向跑去。正想探头看看究竟监舍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两束强烈的电筒光已将我罩住。只听见雨幕后传来张棒棒喊我名字的声音。

借着电筒光，我看见他正夹着那本点名册站在那里。我心里明白，张棒棒雨夜查房，不见了我，便到我返回的路上来截接了。

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五六个人一齐向我围了过来。不出一分钟，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我抓出了苞谷地。

雨下得越来越大，但雷声渐渐平息。黑暗中，我看不清楚来抓我的人是谁，便被绳子紧紧的勒住。几个人连推带搡，踩着高一脚低一脚的泥浆，踉踉跄跄在雨中向前走去。忽然我听见了那轻脆的溪水声，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惩罚我。

张棒棒因为我给他取了绰号，早已对我恨入骨髓，他早就想找个机会狠狠收拾我一顿。我被喝住，方才捆我的人走到我跟前，将绳子狠狠地抽紧了两下，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立即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慢慢有了一点知觉，疼痛重新控制了我，钻心的痛使我大声的呻吟，却完全不能减缓这种痛感。雨好像已经停了，为了减轻那彻心疼痛，我便横下一条心，将那手

臂猛的向上抬，殊不知，一阵剧痛以后，我又失去了知觉。

第二次醒来时，下弦的月亮已经爬到那杨柳树上。借着月光，辨出我在小溪的位置。勒紧的绳子，已被溪水泡胀，深深的勒进了我的肉里面，双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我大声地吼起来，脸上只感觉一群毒蚊在扑打，彻心的疼痛使我忘记了眼前的一切，我又重新昏了过去。

等到我第三次醒来时，已是早晨，我已躺在那棵黄桷树下了，身边摆着一副绳子，上面沾满泥和血。我努力的抬起头来，才发现我的上半身竟是光着的，两肩上留着两道紫黑色的血印，双手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好像并不属于我的。

我的一身，几乎是从泥浆里爬出来的，稍一动弹，便痛彻心脾。我努力回想我的上半身怎么脱光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昨晚冒雨掰苞谷时，因为口袋丢了，只好脱下衣服当口袋，想起来后，我重新闭上了双眼。

流放者们正在坝子里围着圈喝稀饭，他们不时向我张望，而我却紧团着双眼真不想醒过来，真不想活着回到这比地狱还不堪忍受的西西卡来。

我感到没有力气再活下去，然而到了奈何桥上，牛头马面却堵着我前行的路，让我重新返回，说我阳寿未尽，活罪未够。

张丑德重新游到我的眼前。他真正感到了痛快了，看到平时敢于挖苦他而又无可奈何的“死狗”今天成了他手中的一条“死狗”。于是得意的用那沾着许多人血的青杠棒戳了我一下头。用挖苦的口吻问道:“你不是说辣椒有维生素吗？你不是说维生素可以消肿才偷辣椒的吗？那么还没有长出苞谷米的嫩苞谷也有维生素吗，好吃吗？”

我真不想看他。当时，如果我有力量，我会将我口里的血块吐到他的脸上。我紧紧闭着双眼，只听见他嚎叫道：“老子种的苞谷，全给你们这帮饿鬼偷光了。你们偷呀！偷完了，饿死吧！饿死活该!”

我感到他有点进步了，因为，他多少已经摆脱那“改造和反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风，并且敢于承认我们是饿鬼了。

这使我想起共产党作家所描写的地主、资本家来，他们对于那些穷苦工人和农民，常常就骂“穷鬼，饿死你活该!”张丑德不是酷似他们吗？“饿鬼”才是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对我们所用的恰当称谓。

谁都明白，这苞谷绝不是这张棒棒种出来的。而是我们这群饥饿的奴隶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短短四个月里，就有 40 多名流亡者的尸骨埋在这片土地下面。

所以这些辣椒，白菜，苞谷都带着血腥味！尤其是经他这么一说，倒反而点出这血腥果实里真含有无比毒的毒汁，就因为这毒汁的引诱，使饥饿的拓荒者，再度像我一样遭受摧命之残。

不过这偷却用得不确切，因为“偷”还带着一点人情味，人取不该取的行为才叫偷，而我现在是在面临饿死时，为争生存的行为，何况东西原来就是我们血汗换来的！

试试看，在平常日子里谁会冒着吃枪子危险偷几个苞谷？偷来后还连芯一起嚼下？除那些野地里胆怯的野生动物，像獾子、毛狗才会利用大雨和黑夜的掩护，去偷这种人用劳动换来的农作物。而动物在偷取农作物时，一旦被守地的农民发现是要吃枪子的，所以这叫生存竞争。

在这种大雨天里，被雨淋透的身体随时可能招来天上的雷击，还可能招来巡逻哨兵的枪子，我怎会被这肥头大耳的张棒棒说成是偷？

这一切在他眼里，真把我们当成了偷庄稼的獾子，甚至比獾子还可恶，你听他咬牙切齿的下令：“给我狠狠的揍，狠狠的捆，往死里整！”獾子在偷农作物时吃枪子，是出于农民保护庄稼的行为，尚没那样咬牙切齿痛恨，而我是人哪，是同张棒棒一样的中国人，是生产苞谷，养活张棒棒们的劳动者哪，当我们为活命而冒险时，竟遭到张棒棒惨绝人性的豺狼般撕咬。

我从睡在地上的位置上微微地抬起头来，拼命地睁开眼睛，但眼睛像被胶封住了似的睁不开，脑子里还在滚动着昨夜恐怖的一幕——天上打着炸雷，苞谷地里老管们踏着雨水叭嗒叭嗒的响声，拉动枪栓的响声，吆喝声交杂在一起。天空中一道道的闪电与四面八方射向我的电筒光，紧紧地将我包围。

过了好一会，我终于睁开眼睛，向坝子里望去，衣衫褴褛的人们正蹲在泥水凼的地方端着他们的铁钵，狼吞虎咽地喝稀饭。他们偷偷的用惊恐的眼光朝我身上扫过来，有的还在交耳窍议。

我在这些褴褛人的人群中，看到了罗旭。昨晚那条装苞谷的裤子，便是他从墙里递给我的，本来我们约好一起下手的，大概因为风雨太大，同时他被地边的一束电筒光阻止，他没跟着我下地。现在他看到我这么一个下场，心里也许既难受又侥幸吧。

我从这些交织在我身上的眼光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留在自己身上的紫黑色的血印。

我的四肢已不听使唤，连挪动的一下身体的能力也没有。全身像被肢解了一般，除了自己的头脑一阵阵嗡嗡作响外，手、脚、身体都不知长在什么位置上。眼前又是一阵发黑，我重新昏了过去……

（八）甘洛医院里的饿殍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一张旧木床上了。我的床边放着一个与床同样颜色的旧木柜，上面放着一些药瓶和一个碗，一股药棉酒精的味道扑进我的鼻孔。

我想辩明，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便努力地偏着头四处张望。恍恍惚惚地看到，头顶上灰色的屋顶，以及四周黄色的泥墙。这是一间放着四张小木床的屋子。四张床完全一样，床前各配一个小柜子。除了一张床空着，其余两张床上躺着两个像骷髅一样的病人。如果不是他们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珠在转动，无异于两具殭尸。

此时，他们正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盯着我看，彷佛在说：“唉：这个人终于还是活过来了”！

邻床两位的床头各挂着一块木牌。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那木牌上写着“流汁”两个字。空着的那张木床上铺着棉絮和床单，床单上还沾着斑斑的血迹。是洗不凈了？还是根本没有洗？我想，那张床上兴许刚刚抬下死了的人。

空气显得特别沉闷，光线也特别灰暗。墙上只开着的一个小孔，病房内照明不足。我想挣扎着坐起身来，却全身不听使唤。我努力回忆昏迷之前发生的事，忽然看到我穿的那条满是泥和血的裤子换上了一条满是铺钉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印有“病号”字样的蓝色条纹上衣，手臂上还有两处没有补好的洞。

良久，我的脑子又是一片空白。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旧白大褂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摸着我的“脉”，从木箱里取出温度计，塞进我的嘴中。他又看了看我的伤痕累累的手臂、肩膀、背部的胸部，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的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又一个年轻人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摆着三个小碗盛着豆浆，是我和邻床三个人的早餐，每人一小碗。

到甘洛农场整整七个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豆浆，肚子里便感到非常饥饿。便在那送豆浆的小伙子帮助下，含着一根麦管吸完了那碗豆浆。而我的邻床，却只呷了两口，便喝不下去了。

不一会，那位送豆浆来的小伙子，端着一个盅子，倒走了那两碗剩下的豆浆。我立刻想到两年前在孙家花园监狱医院的情形。“我现在是躺在犯人医院里了么”？我望着那两个殭尸般的人，看到他们想喝豆浆却喝不下去的样子，一定是离死不远了。

果然我是被送到了甘洛农场的医院来了。三天以后，先我进来的两位不知姓名的骷髅架，先后都被抬去了“太平间”。

进入西西卡七个月来，甘洛农场从各个中队陆续因中毒、水肿破了腹水，被各种原因打得半死而送到这里来的人，仅西西卡就有上百人，他们几乎无一生还。我来三天了，仍没有力气说话。就连刚刚抬到太平间的两位病友，都不曾交谈一句。所以，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何方人士？家庭状况怎样？

唉！这儿算是设在甘洛农场的最后一道鬼门关，我是因重伤昏迷而送到了这里来的。因为我失去了任何知觉，所以全无恐怖感。说也奇怪，经过一个星期，我从半昏迷状态渐渐苏醒过来了。

十天后，那被绳子勒伤的地方都结上了疤，四肢也渐渐可以动弹。不但可以坐起身来，还能下铺站立和小步走动。唯有那一夜被毒蚊叮咬的地方，留下了一片片黑色的斑点。

那天晚上，我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一直还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还是失血太多？是因为毒蚊在我的血液里注入了大量的毒液还是身体休克虚脱？那晚上我被毒蚊饱食了一顿，想来我的前辈子，一定杀死过很多很多的蚊子，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凶狠地咬我。

就这样，在内饿外伤的夹攻下，在如此简陋的“护理”条件下，我竟奇迹般的硬挺过来

了。想来，阎王爷翻过我的生死薄，上面定是写着：“此人阳寿未尽，逐出鬼门关。”

两具骷髅被抬进太平间不久，病房里的三个床位上，又填进了三个新来的人。等我神志渐渐清醒，能坐立和说话后，其中一位向我主动说道：“你的伤势不轻啊。”他说：“你就是孔令平吗？这几天医生考你的体温都是 40℃上下。不过看护喂你时，你还能进食，吃了以后又昏睡，现在你好些了吗”？他还告诉我，我被送到这里以后，昏睡了整整五天。

我感到奇怪，我跟他素不相识，他怎会知道我的名字？他指了指挂在我床前的那块硬纸牌，那上面不仅写明“流汁”字样，还写着我的名字。

新来的三个人是从斯足中队送过来的危重病人。这个年代，水肿从脚上开始，向上延伸。一旦过了腹部，肿得透亮的部份便开始破皮。积存在皮下的黄水，便从破皮的地方流出来，带着腥臭。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定了，这就是当年饿死的人死亡的全过程。

这新来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已开始破皮流黄水了。与我说话的那一位姓龙，腹部已肿得透亮，只是还没有破皮。他的行动已非常不便，站起来都很困难，常常坐在床边，脸肿得象胖官。交谈中，他还道出了雅安抢馒头的故事。

原来他也是同一批人中的一员，雅安抢馒头事件中，为首的人物几乎都集中于斯足中队。所以斯足是当时甘洛农场有名的“抗暴”中心。

这位姓龙的人告诉我，他们的队长和干事经常提到孔令平的名字，说：“在西西卡，像孔令平这样的反改造份子，捆起来以后，只会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现在还不是要规规矩矩的听从管教和干事的指挥，最近收敛多了，不敢再耍死狗了。”

斯足的情况与西西卡一样，同难们把坐在工地上“耍死狗”，当成普遍的反抗手段。每天，武装人员都要从监房里把不出工的人硬拖上工地。

场部管教科为了镇压这一潮流的漫延，组织了工作组，照样是用吊打来对付抗工的人们。无奈水肿和饿死的人像瘟疫一样流行，短短七个月中，斯足中队约有一半人到天堂去了。

有一次趁到甘洛农场粮仓运米，一下子就跑了七个人，只抓回了两人，其余五人下落不明。不知是死在深山老林里，还是逃出了虎口……

在我能下床的第三天，从斯足来的邻床也破了腹水。两个病人陆陆续续的抬到了太平间里。剩下的这位姓龙的也奄奄一息，轮到我来给他送水倒尿了。第二天，两个死去的病床上，又抬进来了新的水肿病患者。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上苍对我网开一面，特意垂怜，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后，我已能缓慢的走出病房，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听护理人员介绍，这里原是公社的赤脚医生点，半年前刚建立起来的甘洛农场接收了它的场地，正式更名为甘洛农场医院。

虽叫医院，但除了有些常规的药物，和几十个床铺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病

人在这里，基本上是靠自身的抵抗力自生自灭。

送到这里来的人，大半成为孤魂野鬼。当我在这里住到第十八个晚上，护士喊我的名字，通知我出院，返回西西卡。

我的邻床向我道贺，他向我伸出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向我挥手致别。悲伤的说到：“我还真想有机会活下来，看看这世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握着他的手回答到：“会的，我们一定还会见面，你们多多保重。”可眼里却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九）人间地狱

我出院时，已九月份了。拖着水肿的脚，跟着来接我回西西卡的卢医生，吃力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满山的苞谷已经成熟，我又想起那天在雨夜里，袭击苞谷地的前前后后。

在我眼里，这些将成熟的苞谷，像一个个醮满人血的馒头。这些粮食是我们挨着饿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呀。这些粮食来之不易，每一颗苞谷子中都浸着我们的血泪。

当我走上山岗，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使我浑身打颤。我从重庆监狱流放出来，为渡过甘洛的鬼门关，从孙家花园随身携带的旧毛衣、旧毛裤、棉背心等，原先装在破皮箱里的旧衣服，几乎全在这里换了荞粑吃下肚子里去了。

此时，我身上只裹着一件在孙家花园监狱时发放的旧棉衣，经过流放的千里颠簸和七个月开荒种地，这件旧棉衣早已破烂不堪，变成巾巾挂挂的“棉絮”网。连着它的破布无法御寒，在秋风中同我的身体一道打颤。冬天很快就要来到，该怎么渡过这边寨寒冬？

中午时分，当我转过山坳，我又远远看到了西西卡中队的标志——那棵黄桷树。头脑里不断浮现出八个月所熬过的苦难日子。这是我一生中第几道炼狱？在这道炼狱里，我饱尝饥饿的折磨，饱尝了夺命的苦役，饱尝了张棒棒的青杠棒和绳索，这种摧残在医院才平静了二十天，我又将面对这个魔鬼。

走进以黄桷树为中心的院坝。所不同的是，坝子中间堆着的一大堆从山坡上刚刚收回来的庄稼。坝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是蔬菜组的成员。

经过六个月的“淘汰”，原先二十个成员的蔬菜组，现在只剩下十二个人了。他们在那里把其它组收回来的苞谷、豆荚、荞麦分类隔开，摊在晒坝上。还有几个人，将收回来的苞谷撕去壳衣后，堆在晒场的一角。

看到我跨进了坝子，潘朝元和王大炳便迎着我走过来，关切向我致意，问这问那。

二十几天前，当我刚被两个人放在担架上抬走时，他们都耽心我这一送走，还能不能回来？我看了看四周，张棒棒没在场，值班的老管也站在队部办公室那排房子边上。因为秋收，这几天气氛比我被打伤离开时宽松了许多。

晒场上，选出来的“嫩苞谷”堆在一边，王大炳一把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将两个烧得香喷喷的嫩苞谷塞到我的手里，一面说，张棒棒这几天开恩，下令叫把这些嫩苞谷选出来，晚上

将嫩苞谷子抹下来加在大家的罐罐里。所以，从前天开始，早上和中午，那半罐苞谷粑上升到满罐了。

我还看到，那些收庄稼回来的人们，在倒掉背下来的庄稼后，便走到那堆嫩苞谷堆前，挑几个扔进自己的空背兜里，然后再将它们埋在山上一堆堆沤制草木灰的“火堆”里，等到回转时，再从那火堆中扒出烧好了的“嫩苞谷”。两个月前，这些火堆烧过癞蛤蟆、四脚蛇、老母虫、蚱蜢、野红苕、鸡老壳以及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虫、草根。

人是多么健忘的动物，即使在这种苦难下，在天天与死神打交道的日子里，只要有一丝快乐降临，人们就会把刚才受到的苦难暂时忘却，流放者为眼前的“丰收”，为了几顿蒸满的苞谷粑，就会将愁云驱散，喜笑颜开。

当我想到七个月前我们到西西卡来的一百五十人中，因反抗奴役而逃亡，死在丛山峻岭，因抗拒饥饿和奴役死在恶吏棍棒下，因误食山间的毒虫，毒草而死在这荒谷之中，因水肿封喉死在医院的病榻上，短短七个月中，夺去了六十多个年青的生命，不尽要问，这副“磷绕荒村人似鬼，狐鸣空市草如墙”的图景是谁画的？

想到一个月前，就因夜袭苞谷林我被张棒棒几乎打死，甘洛八个月里发生那么多命债，中共拿什么来偿还？推而究之，在全国毛泽东所欠下几千万无辜者的命债，岂容“始作俑者，宁无后乎”轻轻松松了结？

过了几天，李管教放出消息说，四川省劳改厅已经发下了“红头文件”，由四川省劳改厅专门派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在所辖的劳改队中，进行一次身体大检查，经过检查确认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要集中起来送往气候适宜的地点进行“冬季疗养”。

劳改当局也明白，充军边荒的人中，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到了来年的春天，恐怕就要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留下这批廉价的劳动力供他们驱使呢。

第四节 撤离死亡谷

果然，十月底，从甘洛医院派出一支由四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了西西卡中队。他们由两名刑满就业人员和两名服刑的人组成。同时还带着许多“消肿药”。这些消肿药以土茯苓为主药，伴以大量的谷糠麦麸混合后，搓成的黑色药丸，美其名曰“康复丸”。

当局装着糊涂，好像不明白长期缺乏营养而致水肿被活活饿死的。偏要装模作样把“水肿”当成一种疾病医治。谁都明白，这种药丸顶不上包谷、红苕等杂粮管用。

这一天晚上，趁着给全队水肿病人诊断“肿病”的机会，张棒棒站在全队九十名幸存者面前（以后还陆续从其它地方调入补充进来一些人），大声训话，大谈政府的“人道主义”。他说：“国家这么困难，还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大家治病，你们要好好地感谢政府……”

我看他一身脑满肠肥的样子，竟然还有脸在这里奢谈“人道主义”？

我想起这八个月里被他整死整残的人那惨像，想到他所管的一百五十人，现在仅剩下九

十人，对他只感到恶心。

在这里拓荒仅八个月，拓荒的奴隶就死去了一半，看来这个农场办不下去了。

有消息说，开出来的荒地，要交给当地的军工继续经营下去，而将我们全都调走。又有消息说，云南会理锌矿已到甘洛来接人了。但采矿是有毒的，而且劳动强度大得令人吃不消，中毒后一辈子成残废。还有人说，在那里流放的人，宁可自残手足也不愿被活活折磨致死。

听大家议论纷纷，前途渺茫，我感到越来越可怕。此时又有人讲，距甘洛不远的雷马坪农场，底子厚，有很多的粮食储备。那儿的流放者，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有人却反驳说：那里最近发生过几起劳动力用炸药自残的事件。

又有人说，石棉县的石棉矿，吃得饱，生活最好，可是就不知道要不要犯人去？说那里已全是刑满人员，没有犯人了。总之，大家对大“调动”，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我们经历了甘洛农场的生死炼狱，我想，再难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充其量也就是一堆放在”无产阶级”砧板上任意宰割的肉，听凭当局宰割吧。

从体检小组拿到的体检结果，身高 1.7 米的我，体重仅 34 公斤。水肿缠身和贫血反映的营养缺乏威胁我的生命，至于测出血压、脉搏和最大肺活量，当时对我都不重要。在最下面病史目栏里，“医生”填写了“重症水肿”的字样。

西西卡幸存的九十个人中，除了两名靠大家的血养活的炊事员外，再也找不到不患水肿病的人了。我的身上除了骨头外，再找不到一处可以用两个指头夹住的“肌肉”。靠皮下绷着的水分，我才不致于像僵尸般让人感到惊恐。

经过两天的检查，准确的说经过两天的选择，张丑德从九十人中，先挑出五十个人暂时留驻原地。其余四十多人便以“疗养”的名义，调往其它地方。

在这四十名调走的人中，当初从孙家花园调来的五十个人中，只剩下潘朝元、王大炳、唐元澄等不到二十个人了。

“国庆节”前，我们便收拾了自己残破不堪的行李，仍在红眼睛李干事的监督下，离开了西西卡。半年前，足有一百五十名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人群，而今只剩下这么九十人。五十多条生命，就这样丢弃在这青山之中。我们这四十多名被选出的幸存者，来到了甘洛农场医院集中。等待着乘车前往新的流放地。

第二次重返甘洛农场医院，与上次离开相隔不过一个月，已发生大大的变化。每一间病房里，都住满了从各中队调来的“病员”。病房里到处都架着“三角灶”。各病房里，除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碗筷，以及被熏得漆黑一团的“大铁钵”外，“三角灶”里还留着没有烧尽的柴灰或余火。灶边倒着丢弃的菜根和垃圾，床铺上不是一团烂棉絮，就是在乱草上铺了一床破席子。表示这儿住着人。原先黄色的墙壁上，已被烟熏成黑色。这里不像医院，倒像流浪乞丐借宿的临时窑洞。

当我走到二十天前住过的那间“病房”，先前的病友一个都不见了。于是向一位当时临时

看护的人询问，她告诉我，原来的病号都先后死了。残酷的命运降临在这些苦难人身上，实在是太迅速了。

听李干事讲，从场部通往老母坪的公路已经修通，我们不必徒步爬出这夺魂路了，而可以乘大卡车离开这里。送我们出关的汽车还没有到，须在这里住上几天，等待汽车的到来。

在这里等车的几天，我们没受到严格的管束，能“自由”在甘洛城游走。同来的伙计们明白，就是现在放我们走，也难于徒步爬出老母坪，除非想找死？

大家合计着，拿出一些还没有同彝胞换完的诸如钢笔、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看看这里的居民需不需要，能否同他们交换一点粮食瓜果，以备路上饿了果腹。

四天后，八辆由甘洛运输公司组织的大卡车，载着两百名连路都走不稳的特殊旅客，从甘洛汽车站出发向着西昌驶去。

这一次的大转移，比十个月前从成都至甘洛的大调动，当局已没有那么森严戒备，每个车箱里除了一名身着便衣的干事，坐在驾驶室里没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

当汽车行驶到老母坪时，我们不禁把头伸出蓬布外，想寻找十个月前刚刚到这里那一晚的情景。也许经过的道路已经改变，原先的牛圈没有了。我们已搜索不出那可怕夜晚的情景，只是耳朵里彷佛回响着那台湾人从牛圈里发出的哀告。

现在明白，当时迷茫的去处，原来是一个人间地狱。从老彭开头，在进入这个鬼门关后，陆陆续续死去了那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大半年回忆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西西卡的黄桷树，溪边的毒蚊，张棒棒的毒打，一个个惨死于毒食的面孔，身患水肿的死尸，原来，甘洛的炼狱是这样构成的。带着水肿的残躯便是炼狱的受炼者……

当时死神不止一次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很少想到死的恐怖。今天，在我从那里走出来时，才感到从死神手里挣脱的侥幸！

按照我们汽车行进的方向是南方，按照地理的纬度这儿是亚热带，但是深秋的季节，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汽车一过甘洛地界，我就缩进车厢里，并且把自己的烂棉衣紧紧的裹住自己的身体。

中午在越西吃过午饭，下午六点钟左右，到达了喜德，记不起喜德过夜的那一晚，在监狱转运站，还是临时住进了农村公社的大院里，一天下来已使我感到头昏目眩，辨不清方向，我吃过晚饭匆匆爬上了铺，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汽车继续的向南行驶，渐渐从崇山中穿了出来，一直向下坡滑驰，下午便到了西昌市。我们的“疗养修整地”，距西昌大约二十公里的黄联关。一过西昌，汽车驰上平坦黄土公路上，汽车后面，紧跟着一股股黄烟。树木渐渐稀少，西昌此时已进入旱季，每天都是晴天，但天空灰蒙蒙一片。

公路两旁的大片农田已成灰黄色，在一望无边的田野里，孤零零立着稀稀拉拉的柏树，没有留下一片绿影。坐在车厢里看这片黄土同灰色天空凝在一起，说不出是晚秋的萧瑟，还是

远疆的荒芜。真像寂静的沙漠，不免猜想，要去疗养的地方，未必又是一个新的人间地狱？

（一）“疗养地”

下午五点钟，车队前进的方向，渐渐现出一片隐约的白色建筑物，十几分钟后，八辆卡车在一簇白色的建筑群前停下，我马上联想到南桐的丛林，在车上我环视了这一簇建筑群，它的西面，一栋百公尺长桁架结构的屋顶下，是四面敞开的厂房，两蹲拔地而起足有 20 米高的灰白色烟囱挺拨直立，直指苍穹，在灰色的秋阳下彷佛像两个失意的巨人，站在荒草丛中仰天长叹！在他脚下，是两座巨大的园柱形炉膛。

两幢高炉的厂房中，每一个角落都张着许多巨大蜘蛛网，在秋风中拂动，两台锈蚀不堪的鼓风机罩壳和架子横放在它的旁边，不用介绍便知道，这里分明是当年一轰而上，耗掉无数民脂民力的“小高炉”，如今已被人们遗弃。

散在高炉脚下的破碎的瓦砾和矿石，在告诉人们，当年那些从附近城市招来的民夫们，如何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日夜不停汗流夹背蛮干的“壮景”!

它的东面，便是一圈白色围墙所包围的，两幢围成 U 字形的白壁瓦房。想来，这定是当年昼夜不停的炼钢大军指挥机关的办公室，以及民夫们的宿舍。

最北面那排房子最后几间空着的房子，其中的一间作了临时的“医务室”。我们可以在那里拿到一些医治伤风感冒或拉肚子的常用药物。那儿住着两名“医生”，大约隔三天，就由那里发放由厨房熬制出来“消肿”中草药。

中间并列着的两排平房和北面的一排平房，一共三排整整三十间房间，除两间用作开会用的大间，其余全是每间大约三十平米的“小间”，门上刚用粉笔写着阿拉伯数字，两排通铺分列在门的左右两侧是两排足可以容纳三十多人睡觉的“床”，那上面已铺好了稻草和棕垫。大概用作在这里“疗养”人的宿舍所用。

其实，只要用心去看，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平房，新的高炉，新的设备。只因为一股平地而起的风，把他们吹到了这荒凉的地方，以为可以在这里一厢情愿的炼出钢铁来。后来炼出的又是一堆不能冶炼的“废铁渣”，加上随后的全国大饥荒，才慌慌张张“弃城”而去。

今天这座废弃白色的围城“废物利用”，暂作我们这两百多号生命垂危的流放者的“整修疗养所”。虽然这儿根本谈不上什么“疗养”条件，但对我来说则是入监以来第一次在有“铺”的监舍安寝，我为自己终于熬出了甘洛的鬼门关，再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背着各自的被盖卷，在头发花白的冯队长带领下，进入了这白色围城的大门。迎面的天井里靠门的左侧，放着一台已满身铁锈的破碎机和一些螺丝、铁管之类的东西。从那破碎机壳上的亮铮铮的铭牌上，可断定这是一台几乎没有使用过的“新设备”。

全体下车后，就在第一个 U 形建筑围成的坝子里集合，操陕西口音的冯队长和年龄比他还大的余队长，在集合的队列前作了简短的讲话。将所有的两百多号人编成了十个组，按点名

册列队站好后，便宣布到这里集训、治疗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规”。

内容大致是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同老乡们接触，不准偷窃附近田里的农作物等等，然后按照点名册定好的组分别对照门牌号，搬进各自的“监舍”里。我们把自己的破被盖卷搬进各自的监舍，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安顿好各自的铺位。

天份有缘我和老潘又编在同一个监舍中。我的铺位紧邻的两位，一个叫王华春，捕前原是金堂县的一个公社大队会计，一位货真价实的“农民干部”。另一个叫韦俊伯，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文职人员，两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

王华春从他的行李中取出的东西看，他的家境不错，经过甘洛如此残酷的折磨，还能拿出新的步鞋和衣服，拿出一片片黄灿灿的叶子烟，大大吸引了有烟瘾的人。在甘洛抽烟属于侈奢品，当饥饿被蔬菜填充而稍有饱感时，有烟瘾的人便寻觅极为“稀贵”的烟叶。

还没有看到王华春拿出来的那么大匹金堂叶子烟，当然，王华春决不可能慷慨相赠，每一支烟都用来换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不过，我却是天生的拒烟者，我不但不愿吸食，而且每闻其味都会反感!所以当他坐在铺位上旁若无人的大口大口吸那金堂烟时,都会招到了我的反感。

王华春发现这个矛盾以后，便主动的把他可以换一个罐罐饭的“大炮台”送给我。很耐心的劝我说:“男人不抽烟枉活一辈子!”在他的这种“友善”的攻势下，虽然我谢绝了他的大炮台，但我又不便因此同他吵架，所以每天饭后他要吞云吐雾时，我就跑到外面去或者去附近土地里寻觅花生、洋芋这些食物。

韦俊伯就完全不同了，看得出他生性好静，个子高高的，很少说话，闲下来时，便往他那件补得巴上重巴的万巴衣上，再补上新的巴!我因此而学着他，补巴成为我在黄联关“疗养”期间重要的生活内容。

铺位安顿好以后，冯队长又在院子里高声向大家宣布:“这里冬天寒冷，为了帮助大家过冬，大家可以到附近捡些砖头，在各自监舍的中间土墩上搭烤火灶。过几天，指挥部还专门给大家配些岚碳供冬天烤火取暖。”

在甘洛已把防寒毛衣毛裤、棉絮被子“换”完了。冬天正愁挨冻。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都蜂拥着挤出各房，找的找石灰，拾的拾砖头，还没到天黑，各监舍的中间那土墩上，便搭起了形状各异的“灶”，有的还生起了火。

那位在孙家花园就是冷作工出身的辛志华忙碌起来。第二天，他在院子中间栽了一根铁杵，凭着一把榔头，一把剪刀和一个铁墩一些铁皮，便开张了他的“冷作铺”。他的生意很好，可以说从早到晚就没歇过气！他的周围堆满了各种破洗脸盆，专职改制“大铁钵”，每改一个收取两个罐罐饭的报酬。这些改制的铁钵，曾为在这里临时聚居的“疗养者”，煮过了不知多少米饭、洋芋和红苕。

“围城”中，两圈并列的 U 形平房最南端的一排房子，好像是原来练铁厂的伙食团。那里面有现存的保管室，办公室和供吃饭用的饭堂，厨房的灶台非常气派，里面有供热水的锅炉和供洗菜用的洗池，自来水管等等一应俱全。其规模足可供上千人使用，只是饭堂里面空荡荡

的，原先的桌椅已不知去向。

此时头号灶眼里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七八个炊事员在那里忙绿着。一锅已经煮熟的粥，散发出一阵阵闷人的气味，像是洋芋。

第一天晚上吃的是“洋芋饭”，那些洋芋听说是乔阿农场四中队供给的，数量颇丰，大铁钵可以盛满，可惜有麻口的味道，吃多了便感头闷，细看那洋芋表皮已长了芽，严格说这洋芋含有大量的芽毒素，对人体有很重的毒害作用，拿给人吃是不允许的。

不过，对于刚从甘洛的饿牢中冲出来的人，这些很命贱的囚犯，是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的。有人吃了整整一大钵，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幸好没有发生死人的事。厨房只好调整煮制的方法，改为削皮切片后用水漂一天一夜，才下锅。

（二）稀世珍品

我们周围的农田，全是乔阿农场的耕地，房屋后围墙上堆放着包谷和向日葵的稿杆，正好是我们用来生火和煮东西的燃料。经过半年多甘洛农场的煎熬，我们中几乎每个人都锻练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觅取食物的本领。只消一把锄头，或者一根粗铁丝弯成的铁勾，便可在生荒地里挖出各种可吃的野生树根，今天，附近的这些农田，便是我们加餐的地下仓库。

对这些农田仔细分辨，可以判断出那一块土里种的是红薯，还是花生或者是马铃薯。现在，我们竟在偶然中意外地发现了在这片土地中，埋藏着在市面上都已绝迹多年的东西，岂不令人兴奋？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劲，仅凭着着铲子和自制的铁勾，不知劳累的挖刨着，天黑了还不愿“收工”。

人们求自我生存的力量是那么顽强，这可是一些疗养的病人。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在那灾荒的大跃进年代，宁可躺在地上动也不动，撑着锄把等到天黑收工的人民公社社员们！一群被中共的狱头们斥为好吃懒做的坏份子！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一天下来可以刨到四、五斤甚至七、八斤不等的花生。可以说收获颇丰，当然地里留着这么多的花生，也许是收挖的奴隶们有意留下的。我们把这些收获来的珍品，晒干剥净，充作“补品”，每次煮饭菜时，加进一把。

然而好景不长，没有过几天我们这一群人的“小秋收”行动，被乔阿农场看守这些土地的“红毛犯”盯上了。最开始，一个中年人来吆喝我们，他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喝令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开，否则就对我们不客气！殊不知经过甘洛这场炼狱，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他的恐吓，充其量向他翻翻白眼并不理他。

看看乍呼没起作用，便动手去收那田坎上我们丢在那里的口袋，结果大家群起而攻之，围着他吼道：“你他妈不自己照照镜子，我们挖你们挖过的土，关你什么相干？竟敢抢我们的东西！”他见我们一哄而上，自量寡不敌众，便改了口气向我们解释道：“你们看看，这一片平扬，几里以外都可以看见你们，队长看到了理抹我们不止一次了，说我们故意不把花生挖干净，我们不好交待，所以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再在这里给我添麻烦了。”

我们中有几个人掂掂自己的口袋已觉足够，便甩甩手提着口袋离去了。还有的人继续的在那里刨，并不理会他。那人讨了没趣并不甘心。第二天邀约了另一个人跑到我们的住地向冯队长告状，然而冯老头却不以为然，不置可否。过了两天，那人集中十几个人手持棍棒对我们采取武力驱逐。

为了加强戒备，抽一个人出来站在田坎上放哨。看到对方来势汹汹好及早准备，不过，我们始终不明白，在这些已收完的土里刨几个洋芋、花生，怎么竟惹得那看庄稼的如此嫉妒？答案只有一条：这些人在野外地里埋有私方“粮”，怕我们无意中挖到了他们“过冬”的宝藏。

不知是谁，有一天在西面那两座高炉的炉腔里，发现了一大堆牛马骨头，凭藉风季的干燥，这些骨头表面已呈灰白色，附在它们上面的残肉血丝完全干缩成一些垢物，从表面上可以判断这些骨头是生的。

选出那粗大的筒子骨，用石头敲破，里面的骨髓居然还保持着黄褐色，虽然有些臭味，但既没有发黑也没有生蛆，看样子这些骨头的年限不到半年，因干燥而保存较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到来之前，这儿曾作过牛马屠宰场？还是乔阿农场从别处运来准备烧制后，作来年春耕的肥料？我们不得而知。

倘若在小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令人“恐怖”的遗骨，尤其是那一个个骷髅头角和张牙舞爪的肋骨，我会害怕而远远躲开！没想到今天，我也同大家一道，从那炉膛中选出粗状的筒子骨，洗净砸破后，便丢进大铁钵里“熬练”起来。

经过几小时的“煮”制，那水的表面便起了一层厚厚的油膜。然后取下大铁体冷却一夜，第二天早上，便在那表面上凝出了指头那么厚的“牛油”，虽然带着一点“臭”味，但那可是多年视为珍贵至极的“油”啊！便把它们舀进盅子里，每一顿吃饭时，往那菜里加上那么一点。

到甘洛后，就再也没见过油像什么样子，我们之中除少部份的人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中，也许有那么一小瓶的“油”，便会视为珍贵的“营养品”，一般不会轻易与人分享的。

而像我这种事实上已无家可归的人，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弄到一盅油，虽然这一盅希贵的东西，原来取之于一大堆来历不明的牛骨头。这年头啊，连寻常老百姓家都没得油吃。

听说 1963 年有了一点供应，我们也有了油的享受权。可惜，从来就没见那菜里有过“油”珠，这“油”被弄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也用火车载到万里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去支持那儿的“革命”了呢？

霜降已过，冬天已然降临，微霜初降的早上，我们已冷得瑟瑟打抖，现在才体会到半年前，真不该在甘洛把自己破旧的毛衣和棉被心换了东西吃！不过若不是这些旧毛衣救我们的命，我也许已骨头在甘洛打鼓响了，也罢，且裹着这补得巴上重巴的空心烂棉袄，硬着头皮熬吧？好在现在腹中已没有甘洛那么恐慌。我也早学会了缝补，每拣到一点可以作巴的旧布，我便洗净后，往“棉衣”上面补。

早上起来，披着那件很赃的空心棉袄，伸头从窗子上望去，屋顶上起了薄薄的白霜，便只好缩身在破被盖的包裹中，靠着那灶上的残火取暖，一面补棉衣。

王华春已披衣起床，藉着炉火点燃了他的金堂叶子烟卷，便坐在我的身旁巴塔巴塔地抽个不停，接着便是咳嗽，吐痰。他见我对他的抽烟一脸厌烦，便再次友善的向我递过半截“大炮台”来，一边说：“诺，学着抽烟吧，不抽烟更冷。”我想了一想，准备试一试，看看这烟中兴许会有某种解除忧郁的东西，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宁可用自己的罐罐饭来换烟抽？

于是我这次并不推谢，而是顺手接过来，点燃以后，便试吸起来。“不对，你这样抽永远学不会”，他见我把刚刚吸入口中的烟，立刻吐了出来，便认真的纠正道：“要这样，把烟吸到肚子里去，然后慢慢地从鼻子里喷出来”，他一边教一边示范着，并且从鼻孔中缓缓喷出那股股浓烟，淘然若醉。

按照他的示范，我果然猛然吸了一口，进入了肺腔之中。等我把那吸进肚子里的烟，逼着往鼻腔里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的头昏，眼睛发黑，沤心而感到四肢发凉，差点翻肠兜肚的吐开来。

连忙停止这种可笑的动作，好半天才恢复过来，熄掉了手里的烟。从此以后，我不但没有按他的教法坚持下去，而是断然的谢绝了烟，以至我的一生中，没有这种嗜好。

老韦也坐了起来，按照他的习惯，一声不吭的拿出针线包和那些破布，开始了补棉衣的活，我便同他一起往我那件破棉衣上补上新的破布，一直到早上的洋芋稀饭煮好以后。

（三）“发”棉衣

大约十点钟光景，忽闻大门外人声噪动，大炳兴冲冲的从外面走进来，向大家报告了一个特大好消息，装满了棉被和棉衣的一大卡车已经运到，就在大门外，现在要大家一齐去卸车。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高采烈的穿上衣服，起床跑出监舍，忙碌着把车上的新衣棉全部卸下，搬进了队部的办公室里。

搬完以后，清点总数。结果仅仅只有六十床棉絮六十床被套和七十套棉衣，这对于来这里疗养的二百多病号只够了一个零头。

一场欢喜之后，便是一场忧虑和一场因无法分配而产生的争吵。连带孙家花园算起，这是我进监五年来，第二次遇到监狱方向犯人们发放过冬的棉衣。前次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旧棉衣，唯独这一次倒是新的，可是数量又那么少。

毛泽东时代，苏联饥讽中共给老百姓的布票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犯人有此定量已属不错了。

冯队长把大家集合到院子里，并命令大家将自己所有的衣被统统搬出监房，称：“黄联关第一次卫生大检查”。当大家把自己的家当全部搬到坝子里以后，冯老头和汤干事还专门到各监舍进去彻底的检查，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二百来号人中绝大部份，除一条又破又脏的烂铺盖和千窗百孔的烂棉絮，身上穿的巴上重巴的空心棉衣外，便一无所有了。

面对着这些被无二条，衣无二件比乞丐不如的流放者们，冯老头紧皱着眉头。现在回过头去看甘洛农场的七个月，对谁都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洗劫。

冯老头再没有兴趣去翻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只好无奈的挥挥手，叫大家把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回各监舍。只是再三嘱咐大家，三天内必须将衣服被盖洗净、翻晒，说五天以后再检查大家的清洁卫生。

看来这二百多号人，几乎没有人具备过冬的棉衣、棉被，这么少的东西分给谁都是难事！无可奈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听凭各自的运气来裁决了。

为了填平补缺，尽量做到大家都有份，冯队还专门作了一个规定，凡抽签得中的，其棉衣和被盖任中只能得到一样。这样算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摊上一样，同时还规定凡是得到新的必须把旧东西交回队部，再发给一样没有得到的人，供他们作缝补之用。

就这样，这二百多号病员，在吵吵闹闹中用了三天，才了结了这一场棉衣的发放和分配。抽签的结果，我原来期待能得到一件新的棉衣还是落空。我抽到的是一条棉裤。也罢，除了这条棉裤外，我还分到了一些破棉絮和半床破被单。

按照老韦指点，我用了那半床被单和棉絮裁剪成一件旧棉袄，花了足足三天时间对破布清洗、晒干。除一部份补我的棉衣外，便缝制起我的自制棉袄来。

（四）赌性难改

在我的棉袄正要缝制完毕的那个下午，突然听到院坝里喊声振天，侧耳细听，分明是冯老头的怒喝声，我不禁心中一惊，连忙放下手头正在桁补的棉袄，跨出了监舍门。只见那冯队长满脸胀得通红，站在 3 号监舍的前方，正怒不可遏的向那监舍里喊道：“你们这些畜生，给我滚出来。”

自从到黄联关以来，从他对来这儿的疗养者们所放宽的尺度，以及在可能范围满足这些患病的流放者的生活需要，及至发放棉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对人的起码恻隐心，都能让人体会得出，他是中共监狱管理者中，人性还没有泯灭的人。平时对于乞丐不如的流放者，并没有采取鄙视和轻易侮辱，来这里已一个多月，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盛怒的对待流放者。

不一会，那监舍里依次的走出五个人来，等他们排成一队，面对冯队长站好以后，冯队长怒喝道，“把你们的牌交出来！”五个人相互对视没有人动。“你去！”冯队指着最后出来的那人命令道，那人返回监舍，从里面拿出一付不知从那里弄来的麻将，和一块用来作赌桌用的木板，怯生生地放在冯队的面前。

院子里已站满了人，人们在窃窃私语。

“把你们刚刚领到手的棉衣交出来！”冯队怒喝道，五个人没有动，只是低着头，像一俱俱木偶。这种反映，被冯队认为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在盛怒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从那里操了根青杠扁担执在手中。他虽已五十多岁，头发花百，但具有东北人特有的高大体形，体魄十分健壮，那一双粗实的大手，握着扁担就像一块长戒尺。

“说，你们刚刚领到的棉衣弄到那里去了？把钱交出来，把赌的东西交出来！”冯队怒视着面前的五个人，五个人依然像木偶般站着，谁也没动。只听见冯队一声怒喝，那扬起的扁担

已经重重地打在第一个人的屁股上，那人立即应声倒地，一迭声的喊："我错了！我错了!"但此时冯队的手再也收不住了，连连的向那人打去，直到他在地上打滚，跪地哀求。

"交出来，不交今天就打死你!"冯队怒不可遏。

"我交，我交!"那人带着哭声请求道，冯队停止了手，那人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捂着屁股，踉踉跄跄的回到监舍里，拿出了一把乱七八糟的钱。

"还有!"冯队继续喝令，只见那人用乞怜的眼光看着其它四个人。

"你!"冯队的戒尺指向第二个人，"交出来!"第二个人眼见他的同伙已挨了一顿好打，还是把钱交了出来，不敢迟疑，连忙走进监舍。

"还有你们!"冯队的扁担朝着其余几个挥过去。

"今天谁不交脏，就休怪我不客气!"他的怒吼起了作用，不一会儿坝子的地上便堆着钱、衣物和几小口袋的米。荣老头和汤干事最后走进那屋里搜出了两件新的棉裤和几双鞋。

冯队提着那青杠扁担，在所有参赌人的屁股上各打了五大棍，这才消了气。便收起扁担，将所有的脏物包在那两条新棉裤里，捡起那副牌九，同荣、汤两人一起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临走时宣布，今晚开全体大会。

六十年代，大陆禁赌甚严，然而赌徒并没绝迹，成都市的赌场转成地下，赌资是当时最为紧缺的"粮食"，"副食品"之类的实物。五个现场捉到的赌徒，其中有两个人本身就是因聚赌被抓，判刑的。后来便随着流放，夹在我们之中到了甘洛，以后又同我们一起来到黄联关。

我们这群来自六十年代社会各个角落汇集于此的人，本来就是鸡凰同巢，良莠参杂，甚至还有相当的人，属于中共的迷信追随者和社会垃圾。

（五）周老汉也得坐监

从成份上讲，在黄联关接受"疗养"的人中大半是农民，同他们交谈便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被饥饿逼迫进来的，有的虽戴上反革命帽子，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坐了班房？但是这些本质朴质的农民，只会从他们生存的角度论是非，我们这二百多人中，便有一个从乐山地区来的姓周的农民，当时年龄已近六十，个头矮矮的，但精神挺好，也是我们这些病号中体质最好的一个。

也许因为他本人有些耳聋，说起话来声音宏亮，叨叨不绝，加上他喜欢同人伴嘴，且性格秉直，口快心直，好多年青人常爱逗他玩笑。平时太阳暖烘烘的中午，多数时间都会看到他倚墙而坐，在那里脱去衣服，津津有味地捉虱子，倘若有人挨过去向他挑逗说："老反革命，讲讲你的英雄事迹"，他便会狠狠瞪你一眼，骂一声龟儿子，便侃侃地讲述他的故事：

"五八年那会儿，喊拆了私灶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老子不去，公社的武装民兵到我家要强行拆除我的灶台，老子提起扁担吼道，哪个敢动爷爷的灶王菩萨，老子跟他拼了。"队上的头头那一个不是他的晚辈？加之他世代赤贫，共产党政策对他，又是依靠对象，所以对这种

桀傲不驯的异教徒就不好下手了，公社上上下下只好向他妥协。

人民公社他不参加，他那块土地也不交出来，当大兵团作战，全村老小都走空的时候，他不跟他们加入“革命队伍”，而坚守在他那份没有“入社”的土地上挖土种麦子。

不过，当五九年下半年，全公社都荒芜一片时，唯独他那一片没有入社的资本主义尾巴，却长着青悠悠的麦苗，地里见不到一根杂草，菜园子里也是绿色一片，萝卜、白菜、葱子、蒜苗、样样尽有。为了防止周围的人们偷袭他的领地，他还专门筑起双层的竹篱笆，养了一条狗，悍卫着他的“世外桃园”。

那一年冬天，周围的农民正熬着饿，向他乞讨红苕充饥。

他的这个强硬对抗以及鲜明的对比和示范，迅速的传染给了周围的农民。饥饿的农民纷纷以他为依据，找公社要求退社，退土地，公社书记不得不亲自出马，带着四个民兵来作他的“思想工作”，并拆掉他“领地”的篱笆。

“周老汉，你是佃农出身怎么就忘了共产党解放你的恩情，不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却硬要单干，钻资本主义死胡同？”书记土夹洋词，一本正经地“教育他”。可惜，周老汉回答得硬梆梆的：“老子世代为农，只晓得种庄稼为吃饭，懂不起你那些卖嘴的大道理，你是书记，啷个不长眼看看跟着你们走，眼睁睁要饿饭！”

在周老汉眼里这书记是看他长大的，一向是一个没出息的懒娃子，也不知到党校里学了几天，拣了些陈辞烂调到这里训人，所以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老汉的轻蔑深深的伤害了这位书记，他愠怒的向他吼道：“我天天教育你们，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今天，你这个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就是要毁掉，不然全公社都向你学，我咋向上交待？”

周老汉没有退让，因为在他看来，保卫他的领地等于保卫他一家的生命，于是反唇相讥：“老汉生来就是操锄头的庄稼人，你娘没教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么？你娃子今天少跟我讲这主义那主义，各人去把锄头把捏稳点，老老实实种田，才是你做人的道理，今天莫来捣乱。”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令书记尴尬不已，盛怒之下，向身后的民兵下令：“今天给我拆篱笆，我今天砍你这条资本主义尾巴，看你敢翻天？”

“你敢！今天谁敢动老汉的篱笆，老子喊他脑壳开花！共产党的政策也讲自愿，哪个敢横来！”他手里操着锄头，横栏在篱笆前，直盯盯的瞪着两个民兵。几个年轻人怯生生的后退了，败下阵来。书记狼狈不堪的走了，但是周老汉没有胜利。

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人带着一张逮捕证，以“武力抗拒”和“反社会主义坏份子”的名义，将他戴上手铐押到了县的看守所。生性倔强的周老汉一路大骂不绝。至今每每回顾这些往事，他那紫红的脸上就格外涨得通红。

强劲的共产风终于撕开了共产党“自愿入社”的假面具，在输理的情况下，仍然强横霸道的刮倒了他所圈的竹篱围墙，吹散了他的农舍，他终于啷铛入狱。并不因为他“世代佃农”

的成份，是“革命依靠对象”而幸免。

不过，他的这段在中国土地上的壮举，却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同情，甚至赢得了中共内部的高层人士的同情，那位冯队长也经常的端着凳子，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时时的向他提出一些问题。黄联关的人们，从管教到流放者，都用尊重的眼光看待这位个性倔强而耿直的老汉。

在那个时代，像周老汉这样的穷苦出身，正好做了被压迫而不敢声张的中国亿万农民最质朴的代言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又招惹上谁了呢？

第五章 流放盐源农场

比之在甘洛农场的鬼门关里度日如年的日子，黄联关五个月时间的“疗养”似乎轻松多了，五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1964 年 3 月初，我们这支被当局“修复”的廉价拓荒队，分乘了八辆卡车，离开了黄联关，继续向西南方向四川边界上更远的地方充军！向靠云南边界的盐源彝族自治县前进。

经历了甘洛那道鬼门关的生死搏斗，我们已明白，这种“充军”就是同死神较劲！逃！向哪儿去？中国大陆除无人烟的地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包括这些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户口像严密的铁丝网。加之遍地布满了中共地方党组织交织而成的特务鹰爪。随时都会像抓小鸡似的向逃亡者抓来！

我们这群懦夫，这群不会偷，不会翻墙越壁，不会隐身术，缺乏逃亡生存本领的人，只好顺着押解人员，把生死置之度外，任凭残暴的当局把我们掷向苦海的那一方！

汽车刚过雅砻江铁索吊桥，便沿着锦屏山峭壁陡岩的山谷中行进，过了小高山大约在卫城区域的峡谷中，到达了一个小地名叫骡马堡的地方，骡马堡顾名思义，本是供出入山间的马帮加粮换草，饮水歇息的一个驿站。

像小镇一样的石板街道，便是唯一的闹市区，满街的马粪疙瘩，穿着各异的少数民族，装扮出又一派“异国风情”。不过，对于我来说，生死两茫茫的心境，是无法领略这奇情异景的。

汽车在峡谷傍山而流的溪谷前停了下来，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潺潺的溪水旁，峭壁之下的两排两层楼房，便是我们当天过夜的地方。

大概因为深谷之底的位置，四面的高山挡去了寒风，这时节气温比黄联关暖和多了。宽阔的谷底溪水边，菜地里还可以看到绿色的鲜菜和小草。

我们的目标是盐源农场，这儿是盐源农牧场暂时作场部和医院所在地，我们住的黄色楼房就是医院的病房。我们到这儿来，是进行最后一次的“消肿”治疗，并且作入场前的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大概是甘洛农场的流放者在前一年的大量死亡，触动了四川省劳改主管中枢的神经吧！必竟这是些可以利用来进行任意奴役的奴隶啊！

在这里住了大约十来天，服用从峡谷中采集松叶熬制的苦涩消肿水，和配制的黑色糖丸，未免是当局故作的“人道主义”的玄虚。

在黄联关仅仅因为靠着洋芋和瓜菜，能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五个月便止住了死神与我们猖狂纠缠，再没有发生冒着生命之险的逃亡。

足见，甘洛农场所发生的耍死狗、越狱统统都是中共造成的饥饿和死亡逼出来的。可惜，从重庆、成都为主聚拢来新的流放者中，许多还没有认识这原是专制极权造成的。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在一种惧怕暴政淫威的心理下逆来顺受。中共把他们当成可供役使的劳动力。

经过骡马堡短暂停留后，我们便朝着当局为我们安排的终极目标盐源进发了。三月盐源县的天空，同黄联关相似，万里晴空却始终是灰蒙蒙的。彷佛被一层看不清的雾气充斥着，虽是仲春时节，到处好像还沉睡在冬眠中未曾苏醒。只有那小金河曲曲折折的流水，在这块灰色的土地上静静的流淌。

汽车越过架设在小金河上的石桥，沿着泥巴山的公路缓缓爬行，翻过了夹在两个山包之间的坳口，面前便出现了一片红色荒丘，大山退到了很远的天边。

一片由一个个被雨水冲刷成沟壑像馒头堆成的泥巴山群上，拖拉机翻过来的红色土地，焦渴地仰望着天空。

被开垦的红土地边上，还留着一些灰白色的“荒草地”，唯有沟壑的底部十里一处，远远看去呈黑色的低洼带里，隐约可见几处畜水堰塘，里面关着宛如镜子般大小的一潭潭死水。

一些盘旋在这些泥巴山间的水渠，把这一潭潭的死水连接在一起，一直连通到整个这片土地南端的一座大水库里，不过此时，那水渠里干涸得没有一滴水。

第一节 新的流放地

我们的车就在这堰塘群中最大的一个塘边停了下来。此时大约接近中午，干燥的西北风一阵阵向这里卷来，发出像怪兽般的呜叫。这儿的小地名叫二道沟，我们跳下汽车，面前像在一个沙漠中的一处沼泽地，它上面的“堰塘”，像一弯不足十亩地的“镜片”，死水在那里泛出绿黑的光，面上一层油垢没有盖住一股股泥腥的臭味，从塘底泛向空气中。

隔着那堰塘百米外，是一群红色的瓦房群。前面两个大约三米高的砖柱，像征着“门”，门前站着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士兵。那红瓦房群便是农场的场部！是一个刚从军工手里接过来的新建劳改农场——盐源农牧场。

下车以后，所有的人整队集合。带我们来的卢队长取出点名册，从中点出的一百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沿着向南伸去的支马路继续向前步行。大约走了两里来地，来到一处狭长形的水塘边上。傍着那足有一里长的水塘，又一群红色的瓦房群被一圈已塌垮的短土墙围着。

那些房顶跨塌的地方，四周厚厚的围墙筑得十分坚固，走进中间的那排“楼房”由角钢和园条做成的楼梯，已锈蚀得很历害，人走上去有一种晃动的感觉，不得不加把小心。走进屋里、地板上狼籍一片，从那些甩得乱七八糟的破衣服，烂胶鞋、废纸箱看得到原先驻在这儿军垦的人所用的番号，他们搬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屋角落里还有他们堆放的，没吃完的已经发绿和干瘪的马铃薯。

我们到达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一点钟，在卢队长的指挥下，将那木楼地板打扫一净，并从车上搬下我们的破行囊，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分组将各自铺位铺好以后，卢队长便召集我们全体，在那门形房屋里围成一圈作了“建队”讲话。他高声地喊道：“政府出于人道主义，把你们送去黄联关养得白白胖胖的，现在又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好脱胎换骨，改造自新的场所……”

没有人去听他的政治课，所有到这里来的人，被这片荒凉无比的土地弄得心寒如冰，“这

里真的是鬼不生蛋，拉屎不生蛆的地方”！有人在悄悄的咕哝着。围墙外，呼呼喧嚣的西北风正刮得如痴如狂，所有的人不由裹紧自己身上的烂棉衣，卷缩成一团，埋着头像刺猬一般。

甘洛农场那惨景又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心中了。原先离开黄联关时所抱着的各种各样的希望，已被这荒漠一派和西北风刮得无影无踪，每个人脑海里，只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同死神较量么？

厨房好像已经开过几天伙了，灶头和吃饭的场所收拾得挺干净，灶房边堆着一大堆的煤碳和不远处堆成的一大堆煤灰。“建队”讲话完毕以后，厨房里的洋芋稀饭早已煮好，同我所到过的所有监狱不同的是：打饭一律到领取饭菜的窗前排队去领，所以看不到排着队鱼贯走向桶边，端着大铁钵跟那炊事员的铁瓢上下翻腾的情景了。

好在洋芋粥，比初到甘洛时野菜粥就强多了，好歹那还是可以充饥的食物。虽然那洋芋有些闷人的气息，但吃下去能“稳”住心，不比甘洛那野菜粥令人心潮荒乱的感觉。也罢，无可耐何之下，且看以后又怎么样？

晚上，足有好几百平米大的大房间里，亮着三盏大瓦数的电石灯，对于那么空荡的屋子，显得十分的昏暗。屋外呼啸的西北风狂刮了一天，仍没有明显安静下来的势头。掠过瓦面揪起一阵阵怪叫声令人心寒，身更寒。

我早早地钻进了被窝，伏在那木质的楼板上，静静地听那风声中，隐隐夹着一阵阵远处山狼的哀号，令人心悸！也不知是从那瓦楞边，还是从地板的缝隙处，透进来一股股的冷风，吹得我发慌，便将所有的破棉衣全都堆盖在身上，蒙着头也不知什么时候沉沉地睡去。

记得儿时看电影“大梁山恩仇记”对影片中那些身披黑色毛毡、赤脚、脸黑如锅底的彝族人，颇觉可怕，当时哪里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今身临其境，才知道长年生活在这一带恶劣气候下，为风沙洗尘的同胞们为什么没有洗脸洗脚的习惯。

大半年没有下雨，水在这里非常珍贵，起皴结痂的皮肤难以用水每天洗净。渗入到皮肤中的沙尘洗起来特别的痛，还不如让它们堆积在皮肤上成一层“保护”壳。几年以后于是我们的肤色就如同老彝胞一样，变得又黑又粗糙，摸上去就像带着齿的皮刷，真可称为“脱皮换肉”了。

第二天刚亮，我们就起床了，昨天刮了一下午一晚上的西北风，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了，朝着窗外看去，那灰白的枯草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霜，天气异常寒冷。我们走下铁楼梯，看见围墙门外的塘中结着一层薄薄的浮冰，谁也没去那儿洗脸。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有热水”，我们便涌向厨房。

按照卢队的布置，这第一天全队的任务是打扫清洁，把楼上楼下，屋前房后的所有垃圾，统统集中到不远处正在沤制的火堆里。此时邓志新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却在收集原来的主人丢弃的那些破烂衣服和鞋底，这是为我们的棉衣和烂鞋子作修补用的最佳材料，他们已经收了好大一捆，准备在下午天气暖和时，拿到塘边去洗净凉干。

大概因为气候干燥，这儿不像甘洛满屋霉臭，而是满地的泥沙和厚厚的灰尘，别说扫地，

就是人走路都会把地上的尘土扬起，洒上了水，扫地时仍然是满屋灰尘，令人呛得难受。一到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昨天的西北风又将重新括起，不敢怠慢，所以不顾那灰尘多么呛人，很快把房前屋后打扫一净。

屋外水塘的两侧是两片长长的菜地，那土质就与山坡上拖拉机翻耕出来的土地完全不同了，这大概就是原来驻扎在这里的军工们留下的“遗产”。中间的几大块苗圃中被盖上稻草的地方，早有已住在这儿的“老犯人”从那臭水池塘中挑水为那些苗圃洒水，听他们说那苗圃已洒下了各种蔬菜种子，只等霜期完结，雨季来临将那里面长出的菜秧，移植到那大片的蔬菜地里。

这儿所有农田，已是开垦出来经过种植过的土地。连着二道沟最低的部份是一片宽约五百米，长约两百米的狭长“平”地，今后被规划为大约三百亩的水田，“沟”的两侧则是泥巴山梁，分布着近万亩的，已被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此时，现在，这些红土地里刨到底都刨不出一点水印来。

我们初来时，除了那狭长的“塘”水边，有几棵只剩下枯枝的白扬树干外，再也看不见一处绿色的植物。面对着满目的荒凉，听那下午括起的风声，看着那些被拖拉机翻出的红土地，谁都不会相信，两个月后，雨季到来之际，那茂盛的庄稼会从那地里冒出来。

我们不知道这二道沟地区原来是否有人居过家，但至少，近百年以来这儿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老百姓照例按照人类起源的一般规律，都聚居在小金河边上的梅雨镇，或其它常年有水的地方，否则他们凭什么生存下去？而这些地势高峻的地方，恐怕历来都是这儿的居民们的天然放牧场。

我们全体被分成了五个组，除了一个组每天挑着一挑空粪兜，满山遍野地去捡放牧的牛羊群留在山坡上的粪便外，其余的人，便围在大片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周围，将很薄的“草地”连根带泥的铲起来，再用畚箕和箩篼，把它们在就近的土里堆成一堆，用火焙烧，以作瘦脊的红土地施的底肥，谁也没有去想这样做，将会造成今后什么后果，我们只想到，每人每天必须按队部规定的任务，铲足一立方米的草皮才能收工。

更令人沮丧的是，每天从上午十一点钟便开始括起狂躁的西北风，夹着掠地而起的泥沙，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谁如果迎风而立，急速的气流压迫着你的鼻息使你没办法喘气。而那些随风而起的砂泥，打在你的脸上身上疼痛不已，并且塞满了鼻孔和耳朵。到了中午和下午，风力持续加大，有时强劲的狂风会把人连同挑起来的草皮卷出几公尺以外，然后重重地掼在地上。

然而我们这些没有完成规定任务的奴隶，必须硬顶着这令人窒息的狂风铲草皮，并且迎着狂风一步一颤地挪动脚步，把这些铲起的草皮堆码起来。到了夕阳西斜，风仍没有停止，与风沙搏斗了一天，每个人都像灰黄的泥人，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履，挑起箩篼，畚箕和锄头，趔趄着走回“营地”。

每个人只能排着队到厨房里领取半洗面盆的热水，端到这份热水，先洗眼睛，然后鼻口，耳朵、竭力清除那些贯进鼻腔，眼睛和耳朵里的黄泥砂。用力的从气管里卡出黄褐色的痰。清洗这“脸”后，那水便成了黄汤。然后再用这黄色的泥水去抹掉沾在双手，肩膀、双脚和身上

的泥灰，最后才去冲脚。

日子一久，脸上、手背、脚跟到处都裂开了皴口，血就从那些“皴裂”的地方渗出来，凝结成一点点黑色的干痂！疼痛难忍。用不了多久，脸、手、脚凡是外露在空气里的皮肤便成了黑褚色。

然而，这表皮所受的皮肉之苦，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甘洛炼狱过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唯独只有高强度的体力消耗而带来的饥饿则是最难熬过的。虽然这儿库房里堆积的马铃薯代替了甘洛的野菜，这些马铃薯表皮已发青，人多吃了会头昏甚至呕吐，但对我们来说唯恐嫌少而不能填饱饿壑。

第二节 偷猪食吃的人

就在排队领取饭菜的窗口过道右侧，一间大约八平米的房子里，临时的关着两头肥猪，据说是准备“五一”节宰杀的。猪圈靠过道一侧放着一个三米长的猪食糟，它放置的位置显然是便于喂猪时的方便。那猪食糟中装的是发过酵，酸臭冲鼻的猪食，但其内容是包谷面和洋芋，同我们吃的东西，没有多大差别。

有人便趁着排得长长的打饭队列，遮住了那领饭窗口中炊事员视线的机会，从猪糟中拣出一个一个的洋芋，用水冲洗一下，去掉那难闻的酸臭味，便放进自己的大铁钵里充作补歉！

在所有拣食猪饲料的人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位高度近视的邓自新！经过雅安的抢馒头事件后，在调往甘洛农场时，在斯足渡过了鬼门关前最难熬的时间，和我一同调住黄联关，当时我们很少交谈。只知道他是离开雅安时三个带刑具的人之一，这次有幸同调到盐源农场来，编在这个中队。

不知道他怎么会披着一件，只有甘洛彝族同胞才用的黑色披毡，我们按当地的土著人称这种羊毛质地的披毡叫“插尔互”。戴着 400 度的眼镜，披着又臭又脏的“插耳互”，那邓自新活像一支大乌鸦。

每当排队“打饭”时，这只大乌鸦经常排在队尾，等到排拢那猪糟时，他便用自己的大铁钵在那糟中，将那些剩下的猪食全部舀进了铁钵中。每见此景，我都暗自感叹，在这里流放者和畜牲没有两样，中共把我们变得猪狗不如。

其实仔细想来，这些流放者真比那猪都不如，这里的主人明白，要吃这些睡了吃，吃了睡的“猪”身上的肉，还首先得喂饱它们。至于这些流放者，在牢头眼里向来把我们当作“死两个算一双”，比畜牲还不如的奴隶！

“我宁可在那个猪圈里变猪，最后挨一刀也划算”邓眼镜常常这样自我挖苦自己，当着大家的面，没有任何人反对他。因为，那可不是简单的自我作践！而是当局对我们惨无人道待遇的控诉！正因为这样，不善交际的邓眼镜却获得了不少的同情。

时间一久，邓眼镜在猪糟内舀猪食的事，传到了李管教的耳中。有一天中午，当他正利用他那又黑又脏的“插耳互”遮着别人的视线，蹲在墙角起劲地剥那猪糟里舀出来的洋芋时，

头上猛然地被一根木棍击了一下。他抬起他那深度的眼镜向上看，也不知什么时候，脸色苍白的李管教手里执着一根木棍，带着一脸愠怒，站在他的背后。

邓眼镜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所有吃饭的流放者的目光，一起向那儿集中过去。不一会儿，办公室里传出了“朴、朴”的杖打声。有一记，木棍击中了他的深度眼镜，随着一起清脆的落地声，眼镜落地后，打碎了左面的镜片，还折了一腿。

邓眼镜发出了低沉的抗议声：“我的眼睛，我的眼镜！我没有犯你们哪一个人的私法，你们凭什么私自打人，凭什么打坏我的眼镜？”

回答又是两记沉闷的劈打声。

“你太没道理，我犯法自有国法判我的刑，有过错自有刑具惩罚我，你凭什么私自用刑？”邓眼镜并无惧色的大声叫喊，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振。吃完饭的人没有人离开，已经到了寝室去的人又折转身来，一种无声的集合令，使全队所有人都站在饭堂里，听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对话。

忽然门开了，盛怒的李管教脸色铁青，冲出了办公室，从外面把两名武装士兵叫了进去。

食堂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大家心里为老邓捏着一把汗。邓自新开始还一直怒吼：“法西斯！你们是法西斯！”但是，随之便转为痛苦的呼喊和呻吟，看来平息了几个月的甘洛暴行又恢复了。狱吏们对待手无寸铁的流放者惯用的一套骂、打、捆、杀四部曲外还能有什么新招吗？

晚上没有召开任何会议，经过甘洛以后，不论哪一个“管教”，大概都认为斗争会对顽梗不化的人已失去作用。倒不如捆、打、吊硬来，既简单又解决问题！

劳累了一天，疲劳已极的人们都各自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在暗淡的灯光里切切议论。有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邓自新何苦硬顶？”又有人说：“人到了连喂猪的东西都要抓来吃的地步，还有什么想头？”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却认为：邓自新之所以遭到如此暴打，还不是饥饿招来的？

除了窗外没有停息的风声外，还夹着从楼下传出老邓痛苦的呻吟，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约邓自新已经昏死过去，才听见楼底下有人提着电石灯给他松梆的声音。不一会楼梯响起了脚步声，四个人把老邓抬上楼来，随队的卫生员，提着药箱上来对他进行了诊断，看会不会死人？下半夜他终于醒来。

与他相邻铺的人自动地给他端饭、喂饭、倒尿、倒屎。只要没有管教人员在场，大家都向他问长问短，为他纷纷鸣不平。这是我在孙家花园和看守所里所从来没有见到的。看来，甘洛的炼狱使我们发生了质的变化。

共同的命运和人性的同情，消融了所有调集到这里的流放者之间的矛盾！也消融了他们中相当的人对中共所抱的不切实际幻想！

大约十天以后，手上的伤势还没有痊愈的邓自新，再次被叫到队部办公室。不过，叫他

的是西昌法院的一名审判员。那一天就为一年前雅安抢馒头一案，西昌中级人民法院对邓自新进行了正式的“审讯”。

雅安抢馒头的事，已过了一年，先前的人几乎饿死了一半，现在当局重新审理这椿“未了的案”，由雅安市检察院提起诉讼，西昌法院正式审理。

提审员那一天对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审问。审讯完毕，将钢笔递给他，要他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签字时，忽然，他抬起头来对那人说：”这李管教凭什么打我？捆我？无端的打碎我的眼镜？到现在都没法看清周围的人，我的手如果被他捆爪了，他叫不叫犯法？”

这突如其来的责问，使坐在一旁的李管教顿显尴尬之色。那提审员看着眼前眼睛高度近视的人，也看了一眼坐在旁边面色铁青的李管教，竟然一时语塞。沉默了足足三分钟，才找出一句替同僚解围的问话：“管教人员没有发疯，他们执行的是国家政策，总是你不规矩，否则他为什么要打你，捆你？”李干事得到了解脱恨恨补充道：“是啊，你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家伙，连喂猪的洋芋都要偷吃，你还算不算人？教育你反抗，不打你打谁？”

不料，邓自新没有示弱，大声的回答道：“你们想想，我是人，你们也是人。我抢馒头，是冒着吃枪子的危险，我抓猪食吃，是冒着生病的危险，你们把我逼成这样，还说是对我们进行什么革命人道的改造！就没想想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邓眼镜被提审后，全中队的人向他打听有关西昌法院受理雅安事件的情况。卫生员给他一些胶布，让他很用心地把那片摔成三半的镜片贴成一块，又请来精通钳工的小卫，为那被摔断的“腿”，重新配制了一个用铜丝做成的架子，并将那片镶贴合的镜片装在镜匡中。

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戴着这付修好的眼镜，渡过了漫长的刑期，他说：“他会珍藏他的眼镜，如果能活着熬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一定要拿着这一付镜片，向他的儿女朋友讲述这一段故事。”

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饥饿已成为对我们最大的折磨。苍天并无绝人之路，我们不久就在烧制草皮灰的几块红土地里，发现了经历大半年的旱季风霜，被拖拉机翻过的土胚，很好保护着隐藏在它下面的洋芋，大的有如鸭蛋，小的也有指头般大小，表露在地面土层浅处的，因受到阳光的照射而变得发青，有的已经干瘪。

后来听经营蔬菜地的几位“老军工”介绍，最开始的时候，军人们把马铃薯种子装在拖拉机的播种斗里，靠着拖拉机，将这些种子埋进了被翻耕的土中。以后，雨季来临，这些“种子”便在地里生根、发芽，长出一尺左右的秆来。秋天来临，军人们驾着拖拉机秋耕、秋收。那些藏在地里的果实，随着那红色泥浪抛向地面，那些被铧翻起的泥浪又重新把它们藏在土中。

每天下午，西北风刮得人在风中无法直立时，卢队和李管教一般是不会上山来的，他们把这个跟班的苦差事，交给在这儿驻守的三名士兵，却遭到了拒绝。只好把看守这些流放者并督促完成任务的事，交给了各组的“大组长”，命令他们要按规定的任务收方，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回营地休息。

就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像游击队似的散开，在这些地里寻挖着散落其中的马铃薯。用奋

箕把它们拣起来埋进正在沤制的草皮火堆中，不出一个小时，便可以从那里面刨出烧得香喷喷的洋芋了。而且，这些烧熟的洋芋比伙食团的麻口洋芋新鲜多了。

第三节 古柏行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李管教拿着点名册从我们中点出了三十名“政治犯”出列，命令我们打好背包坐上汽车，调往三十里外的古柏，同行人中就有潘老和大炳，老韦等人。从孙家花园出来，唯独我们四个人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短暂停留的二道沟，调到盐源农牧场的另一个中队——古柏中队。

同二道沟的荒无一树相比，当时的古柏就两样了，整个古柏中队被一片矮小而壮实的柏树林荫，隐蔽在一座石头山脚下。它四周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砖石围墙围住，里面的建筑倚着地形的变化散布在这座石山中。

从最南端的马路尽头，沿着一条竹林小道走去，小道的两旁排列着当地农民的茅屋。顺着小路一直向北，通往那砖石围墙中，开着的一个园形的石门，便是它的进口。走上石门的台阶，进得里面，便是整个古柏中队的所属范围。

进去的右手是一排墙壁隔开了的砖柱平房，这儿便是下雨天供我们吃饭和晚上开会学习的地方，那平房的背后是一排公社的猪圈，每逢雨天我们躲进这儿吃饭时，可以听到那里面传出来的咕咕猪叫声，还伴有一股猪食特有的酸臭味。好在，我们这些处境与猪牛差不多的流放者，并不计较这些。

石门左边，由低向高排列着两排瓦房，紧靠石门的那一排便是厨房和队部的办公室，背后是干部的寝室和家属住地，另一排瓦房是我们的监舍，两排瓦房与石门右面的平房，半围成一片大约一千多平米的小平坝。

循着进来的方向，一直向北穿过那两排瓦房和平坝的尽头，是一个向上的石梯路，走完石梯路向东一拐，便是这石头山的顶部，那上面是一片大约占地一亩多，用三合土打成的平坝，平坝的边上堆着晾晒粮食用的工具。

平坝的南端和东西面，是两排围着它相互垂直的砖结构平房，南端的那一排，保留着墙和门窗，那是堆积粮食的仓库，而东边那一排则只有砖柱没有墙，里面安放着电动机，是雨天收藏未脱粒粮食的场地，靠着南面库房下面的半坡上，便是两排很长的牛马厩棚，里面关着一些很瘦的牛马牲口。

在通道的进口，新建了可供瞭望整个农场的岗哨，其余还来不及按监狱的要求加以改造。

在我们到来之前，那儿已关押了一百多名的流放者，其中最早的几十个人是先于我们一年，大约正是我们去甘洛时，就调到这儿来的“创业者”，他们的穿着和容颜与我们大体相似。虽然已近五月，依然捆着破烂不堪的兰布棉衣，面色黑黄憔悴。

我们在坝子里放下背包后，便有一名个头矮矮的，身板顶壮实的中年人拿着一本名册向我们走来。按照他已排好的名册，我们搬进了各自的编组中，我和大炳编在一个组，组长宣布，

这个组是大田作业组，劳动的任务初定为水田备耕。

在黄联关，我们靠着马铃薯得到了短期补充，现在又来到了这古柏！第一顿晚餐便是干萝卜根煮的稀饭！我们当然没有吃饱，藉着已经黑净的监房，我和大炳靠在自己的铺位上，取出从二道沟带来的烧洋芋，正在悄悄的咀嚼。

（一）炒豆子

突然，从监舍的黑角落里，一点火光隐隐闪现。开始，我们误认为有人在那儿吸烟。不过，那火光却非常大。我还闻到了一股炒豆子的香味，从火光闪现的地方，传过来一阵阵轻微的噼啪响声，那分明是炒包谷或炒豆子的响声。

我和大炳好奇地坐起身来，再仔细地向四周探望，便发现除了刚才那里的火光，还有第二处、第三处，暗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此起彼落地闪现。很清楚，这小小监舍里有人正在炒豆子。我用胳膊碰了一下大炳，轻声说："听到了什么？""炒豆子的声音"！他低声道出了同我判断一样的话。

随即我们便发生了一连串好奇的疑问，进这监舍时并没有看见里面架有炉灶，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烧的燃料是什么？用什么"锅"来炒？炒的豆子又是从那里来的？

"夫碳！"大炳轻声的告诉我！不错，那炒豆子的香味中分明夹着夫碳燃烧的气味，甚至还夹着一股木柴燃烧的烟味。我们不敢动弹，装着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带着点好奇睡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跟着这个组的老犯人，挑着箩篼畚箕走出石门，沿着昨天进来的小路走向工地，我们这个组的任务是撒肥料。驻地周围除蔬菜地，四周便是一片大块的水田，这些水田被纵横交错的田坎分割开来。最宽的几条田坎又长又直，是供拖拉机的机耕道，机耕道两侧开有大约一米宽的水渠。

这时节，水渠里长满了荒草，里面也没有水。除少部份靠近大本营的几块水田被拖拉机翻耕过，其它田里还留着稻椿，自去年雨季结束以后，一直就没有下过雨，田里都裂开一条条两个手指头宽的龟缝。

机耕道上和几条较宽的主田坎上，堆放着一堆堆的草皮灰、牛粪和森林里才可以弄到的松叶和各种腐植物，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那些腐植肥料，用箩兜一挑一挑送到两边的水田中间，再均匀地撒开！

我看见所有老犯人下到水田后，边干活边在田坎边的荒草堆里寻拣着什么东西。怀着好奇心，我也蹲在田坎上细细的看，那里除被割去豆杆而留下的椿头外，并没有什么。但是细心扒开荒草寻觅，便可以看到这些荒草丛中，原来还隐藏着许多花花绿绿的豆子，宛如一些彩色的小石子，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

这是一种矮椿四季豆，这种四季豆不牵藤，也不择土壤，同内地的种在菜园子专作蔬菜用的四季豆不同，种植它们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插杆和中耕管理！

只要在有水份的田边土角，打一个窝，把它们丢在里面，它们自会在土壤里生根发芽，到了秋天便已成熟，在太阳曝晒下，豆荚便自动炸开，并将成熟的豆子重新撒到田坎上钻进草丛，不过它的壳却不像菜用四季豆那么肥嫩可口，那壳比黄豆还坚硬。

我现在终于明白，昨夜那些被炒的豆子原来取之于此！一个人如果工间和中午不休息，边扒开枯草边拣豆，少可以拣到二两，多可拣到三两！足够我们一顿定量的粮食了。

苍天确无绝人之路，与二道沟不同的是，老天爷虽然没有把埋在地里的马铃薯赐给我们，却用干燥的风将前一年藏在田坎、路边、野草丛中的四季豆、黄豆完好不烂地送给了古柏的流放者。不过，得靠自己劳动才能得到。

下午收工回营，我怀着好奇心按昨晚看到的位置，窥察了那里的铺底下，结果果然看到，那里放着用旧洗脸盆改制的“夫碳炉”，里面还装着许多夫碳，只要用火点燃其中的一块，再用气不断地为之“鼓风”，不需五分钟就会燃成红红的大火，便是炒豆子的火源。而夫碳是从厨房或喂猪房的灶眼里，将燃过明火的木柴用水喷熄后得到的，还有的就取之于附近的农家。

怪不得，一到这里的头一天，我便看见在黄联关疗养地，专以改制大铁钵赚罐罐饭为“业余”的辛至华，又重新在院坝里立起了他那根铁棒。现在是改制各种“夫碳炉”了，自然还是老价钱，一个夫碳炉收取两个罐罐饭。

看到这些，我已经明白了，这里流放者中为解饥饿而在“地下”进行的一条龙活动。从拣豆子到生火，炒、煮豆子，倘若，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被人告密，辛至华也休想在院子里公开制作炉子。仅从这一点看，经过甘洛严酷的生死洗礼，这里的流放者清醒多了！

“火”本是人类发明的。从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后，经过了万年的发展，近代取火普遍使用打火机了。然而，这里的一无所有的流放者，别说打火机就是火柴也十分稀贵。他们取火的方法是从石头中，精选出质地十分坚硬略带脆性的石块，再用一柄断镰刀与之擦碰出火星得来。一种用干透的蒿草挫成指头般粗细的“绳”，是引燃这种火花的最佳材料，我们称之为“火绳”。

当年凡盐源地区吸烟的流放者，每人都备有一个专门取火的小布袋，里面装的是几块石头和一截断锉，还有一包用纸包好的“火绳”。当取火时只要将“火绳”的一头贴在火石边上用左手捏紧，右手用那断锉刀像擦火柴一样轻轻一擦，直到那火绳头冒出青烟，再将它吹旺，现出明火。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三皇五帝，将他们尊为华夏的祖先。而今这些经历长期炼狱的苦囚们，还在借用祖宗最原始的方法来求自己的生存！这些祖先大概做梦也没想到，经历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在今天还要记这一笔心酸的历史。

经过流放者像老鼠般的寻觅，埋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角落里的豆子越来越多，且品类也在增加。除了田坎上以外，更多的则藏在堆积豆杆的草树下，马厩里的食槽底，晒场周围，凡在前一年秋收时，这些豆杆经过或堆放过的地上，都会发现藏在那里面的豆子。

这种发现，给下一年收获时的流放者一个启发，在收获时，有意捶打那些豆杆，使它们到处的散在草堆里，等到风季来临以后，慢慢再将它们重新找回来！

有一天我们被派去将堆放在晒场边足有两人多高的豆杆，挑到蔬菜地里烧草木灰，意外发现那草垛下藏着一层厚厚的“杂粮”，有黄豆、四季豆和包谷，这些粮食中央部份因稿杆霉变而烂掉，有的生出了豆芽。而周围部份大多完好，估计是前一年在这儿打场的人故意留下的。

挑豆杆的人丢下了挑草的任务，掏出各自带在身边的口袋，拼命地抢着装。那王华春和秦石头因争抢而打起架来，惊动了岗楼上的士兵，走过来朝每人的胸膛上揍了几枪托，还勒令所有抢豆子的人统统的把口袋里的豆子掏出来，装在一个箩筐里，送进了厨房。

听说那也算成粮食，折合成定量，回到监舍，两人像斗败的公鸡，相互埋怨。

（二）雨季到来的时侯

处于海拔较高的盐源地区，春耕一直要到谷雨以后才姗姗来迟，然而雨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饥慌。五月一过雨季来到，草丛里的豆粒也迅速长出芽来，正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

同二道沟只准在同一时间排队，在食堂窗口上领取饭菜不同，这儿仍沿袭监狱的一般做法：三顿“饭”都由炊事员把饭桶抬到院坝中，开饭时，由值班管理人员清点人数后，才按组排着队走到饭桶边，用大铁钵去接回自己那份牢饭。

随着雨季到来，拖拉机倾巢出动，将原来的干田犁翻、耙平。畜水池的闸门也打开了，从引水渠按着由高到低的顺序，将塘水灌进了犁耙过的大田中。大田组的囚奴便开始重新调整，按照队部的安排，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守着沟渠，一块田，一块田的放水淹田，整糊田坎，拉平机耙不能到达的死角。

于是便没有统一上下班，大田组的人也变成了轮流的三班倒，吃饭时间，暂时取消了集合点名那一套，变成了“流水席”。

趁着这“流水席”的“混乱”，本来就没有吃饱的劳动力很“正常”的出现“混饭”的事，虽然队部“动用”了加班粮，对每个人的定量加上微不足道的二两，却远远不能解决饥饿的威胁，队部有意安排炊事员，指定了一名尤二皮的人专管犯人的饭瓢子。

有一天，大雨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按正常开饭时间吃过晚饭以后，置晚班的人才出发到三号田，换下那儿整整干了一下午的人，换回来的人摘下蓑衣斗笠，洗完脚，天已经漆黑了。当他们拿着大铁钵朝厨房的窗口走去，领取那两瓢包谷粥的晚餐时，秦石头也夹在他们中间，他用一顶破毯帽遮着自己的前额，想趁雨天天黑看不大清楚的机会冒混那两瓢粥，不料他的大铁钵，刚刚伸了过去，就被尤二皮一眼认出。“砰”的一声，那舀饭的铁瓢将石头手中的铁钵砍翻在地。

石头不忍气，在那领饭窗口前骂了几句，尤二皮把手中的瓢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炊事员，立即跑去报告了倪管教，石头被倪干事“请进”我们吃饭的那间屋子里，先就对他煽了两记耳光，跟着从岗楼上叫下了两名士兵，将瘦弱的秦石头夹在中间，一顿拳打脚踢，石头顿时口鼻鲜血长流。

所有监舍里的人都一齐挤出门，站在檐下观看，那因争豆子而同秦石头有过结的王华春，趁机落井下石，站在我们监舍的门口兴高采烈地数落秦石头偷了几次四季豆，混过几次饭吃。

老傅实在听不下去，拍着王华春的肩膀要他回监舍去，王华春却向老傅吼道："你为什么拉我？"我听见老傅悄声地规劝他："别人挨了打，你又何必杀人的下马威！"但是王华春并没有住嘴，依然大声的吼道："你不晓得，这家伙实在太可恶，平时豪强霸占的欺侮人。"

"你和他有仇也不该在这种场合下报复，你的家里有东西寄给你，但是哪一个也不敢说狠话，都挨过整。"老傅暗示对方也挨过老管的皮鞋尖和耳光，两人在监舍里小吵起来。直到被打得脸青鼻肿的石头，带着一身泥巴，走回监舍来。

大约距那以后又过了两个多星期，伙食团的粮食吃完了，轮到我们这个组到盐源县粮食加工厂去背米，王华春悄悄的带着一双从家里寄来的皮鞋，想在半路上卖给附近的老乡换一点钱，却恰恰被这个死对头秦石头发现。

那天出发以后，石头故意的掉在队列的最后面，向带队的童干事告了密，刚到辗米场，童干事便将王华春喊住，问他来背米还带着双皮鞋干什么？王华春支唔半天答不出来，结果皮鞋当场没收。

流放者中，相互因很小的厉害冲突，而借刀杀人相互伤害的事，累见不鲜。

盐源的雨季，一经来到，便会接二连三地下个不停。间歇出现的雨停也是浓云密布，秧田里的秧苗很快长到了一尺多高。大田作业组分成了几个小组，一部份原先有犁耙和整田"技术"的，放水糊田坎，整耙水田；一部份人便蹲在秧田里，扯稻秧。还有一部份人挑着秧头到已经耙平，整好的水田里，将秧头"打"到田里去，其余大部人下田栽秧。

那位因坚持单干的周老汉，可是赤贪的佃农出身，不能用五类份子的大帽子来吓唬他。而况他所讲的句句实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过去的赤贪人家到了栽秧打谷的季节，"老板"也会用好饭好酒招待他们。

年轻人听到周老汉的介绍便明白"栽秧子的酒，打谷子的饭"，是对"苦大仇深"的旧社会的回忆！当然要对比现在那种早晚每顿两瓢稀饭，中午半罐饭这种生活，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反感！虽口中不敢说，但心里却在嘀咕，手里的活也停了下来！学着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章法，用"磨洋工"消极抵抗。

栽秧子的进度始终跟不上计划规定的数量，为了不误农时，所有队部的管教们倾巢出动，他们操着手，三三两两不停地吆喝着水田里的奴隶们，不时的驱赶那些坐在田炊上抽烟休息的人们。

为赶上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每天必须十四小时以上的泡在水田里，干水田里的活不比旱地，泡在水田里的时间越长，肚子也饿得越快，在水田里，每天上午还不到十点钟，肚子就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于是在水田里，人们的话题，怎么也没离开吃饱肚子这个题目。

茫茫黄汤般的水田中，很快地长出一种叶子很像韭菜的水草来，尤其是夹在秧田里，有

的地方一片几乎全是那种水草。连根将他们拔起，便可以拨出一串串付在它根部像蚕豆般大小的块根来。人们告诉我这便是三楞草，它的块根便叫香附子，味甜可以入药，可以生吃。一窝粗状的三楞草，只要用手去那泥里理着根，轻轻的拔干净，附在上面的香附子足有半碗之多。

饥饿的眼睛迅速盯上了这满布在水田中的三楞草上，初赏这褐色香附子，我马上联想到了荸荠，相比下除块头小也老得多，它们的颜色味道，颇为相似。

记得童年时，外婆常常从菜市买回这些表皮暗红，肉嫩可口的蔬菜来，荸荠可以炒肉片也可以当水果吃，脆而细嫩。眼前这些香附子，又勾起了我的回忆，彷佛重现出她老态龙钟眼里透出的爱怜，喃喃说："孩子，荸荠可以预防感冒，你从小营养不良，气管炎很严重，买这些是给你治病的，你可以经常吃。"说着一边把甘草、桑树根、洗干净和荸荠装得满满的一锅在灶上煮起来。

唉，苍天有眼，当着这四野茫茫，腹中空空的可怜流放者面前，您又一次奇迹般的把那么多草根，赐到我们的面前，聊以让我们填充饥饿的肚子。

忽然，一记沉重的巴掌括在我的头上，我猛然一惊，刚才的回忆顿时消失，转过头去，我正好正对着一双幽灵般的眼睛，和那死人般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倪干事悄悄的站在我的背后。

"我已经看你老半天了，你足足有二十分钟没有扯一把秧子。"他阴沉的说，低沉语调令人恐惧，我手里正捏着一把刚刚拔起来的香附子，还没得及想出应对的话，紧接着右手又挨了他重重的一掌，那捏在手中的三楞草，被打落到两米外的水中。我按捺不住，怒目抗争道："你凭什么打人？"

回答我的，是他那强健有力的右手，拧着我破棉袄的衣领，将我从水中像小鸡般提上田坎来，我还没有站稳，便大声吼道："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

水田里所有的眼睛，齐刷刷地都向我们这里集中过来。所有的人停下了手中的活，立在田里看事态的发展。

我的右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顿时满眼金光四溅。那记耳光，将我摔倒在田坎上，身体溅起的泥浆把他的衣裤染成大片的黄色。

此时已经横下心的我，护定了下身，迎着他雨点般的脚尖，在田坎上像一团滚动的泥球，拼命的大骂大喊；"打死人啦，法西斯！"不一会儿走过来一名士兵，用刺刀逼着我从泥泞中站起来，并押着我离开了那里。

我被带回了监舍营地，像个泥人似的站在坝子中央，刚才的冲动降温了，心中打着主意，等待绳捆或一顿毒打，下意识地紧了紧腰中系着的草绳。

那姓倪的铁青着脸走进了办公室。我站在那里，足足两个多小时，并没有人理会我。身上满沾的黄泥，开始干结，一块一块地剥落下来，直到收工。

（三）禁闭前的舌战

晚上，我被喊进了队部办公室。在办公桌后面，发黄的台灯下，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便是这个农场级别最高的特工人员，管教科长邓扬光。我看见他面前放着审迅记录纸和一支笔，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注视着我，沉默两分钟以后，向我发问道："你就是那个在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的孔令平吗？"他眼里透出一种力图控制对方的压迫。

事隔大半年了，第一次见面就向对方重提旧事，说明这位陌生人一直十分关注着我。在狱中被特工人员特别关注，决不是件好事，我没有回答他，心中在猜测今晚不知他又会怎么收拾我？又是片刻的沉默。

接着，他开始过问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漫不经心的听我讲述整个的经过。大约半小时以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印着红头的文件来，我多次见到过，这是一纸判决书。

他阴沉着脸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了你的申诉，并且驳回了你的申诉。现在正式向你宣读。"我听着他那平淡的宣读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早作了申诉失败的打算，只是觉得时间隔得这么久，几乎让我遗忘了。

宣读完毕，他便一本正经的对我进行了常规"教育"："你的罪恶是不小的，我看过你的全部档案，狡辩没有用。我奉劝你丢掉侥幸心重新做人，像你目前这样的情况，处处顶撞干部，不认真的劳动是不行的，你是大学生。响鼓不用重捶！你应当明白党的政策。"

那申诉，已快过去两年了，就是我刚刚从孙家花园的医院，回到监狱反省组时，借写反省材料的机会写出的。当时，经过了一年的看守所关押和一年多的"劳改"，我开始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社会。

失去自由的难受使我渡日如年，饥饿的狱中生活和虐待，让我从幻想的迷雾中，回到我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中。我那种蒙冤的痛苦越易加剧，我内心就越烦燥。我不能对原判采取无可奈何的忍受。而必须按照事实，拒绝这冤枉的十八年徒刑。

现在经历了甘洛这段茹毛吹血的炼狱，眼看与我同龄的人，就冤枉的死在荒野中，像我这样不弄清"原罪"，糊里胡涂的牺牲也太不值了。

最初入狱时提出上诉，确有许多幻想，希望有一天"政府"，能本着事实取消对我的原判，其至于纠正加给我的"右派"罪，还我自由。经过几次申诉，尤其我目睹周围的同难们喊冤者不但没有重新被改判，反而"罪上加罪"，招来更多的痛苦和麻烦！

特别看到现实中，中共之种种无道，"三面红旗"即使造下那么大的灾难，仍不许人直说，更谈不上改正和认错！我的脑海里便由"求饶"，变成对奴役我的"政府"进行反抗！我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从烦躁心态转变到坐穿牢底，最后将我的蒙冤与民族灾难统一起来，将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中。

今天，面对这位监狱的特工头目。我想，不管有用无用，据理力争总可以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虽然侩子手的良知被蒙蔽着，但有时主动进攻！往往可以取得积极的效果。于是扬

起头说道："我犯的什么？是偷？是抢、杀人、放火、强奸、还是组织集团，用抢杆子同你们对着干？你们中的刑法那一条规定，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子女，天生就该判刑受罪？"

邓扬光操着他背熟的教条回答道："你犯的是向党进攻的罪，你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你的反革命本质，你在日记上明目张胆的攻击社会主义和三面红旗，你知不知道这是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犯的罪可比杀人放火还严重！"看来这是一个老手，一个死守毛氏教条的"高手"。

"但是，在划我为右派时，还没有'三面红旗'，我在大鸣大放时并没有说共产党的好坏，对父亲被捕连判决书都不给这种非法行为，胆小到不敢向法院索要这种程度，但是重庆大学和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硬说我替父亲翻案，把右派帽子强加在我和母亲头上，你们才是真的犯了法！"我吼道。邓扬光无可耐何地摆摆手，回答说："那是你们学校的事，我不清楚。"他推诿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攻击三面红旗？"他把话引到眼前的话题上，我紧紧地盯着他说："说到这点，请你听我说完，我说的时候请你不要打断我。"预先约法三章后，我说道："我请你现实的思考，不要按报纸上怎么说。"

"请问 58 年浩浩荡荡的大炼钢铁大军，炼了什么呢？当时建的高炉，今天你见着有几处在冒烟？在荒芜的田园和高炉的废墟之下，破烂不堪的农家茅舍有多少？饿死的百姓有多少？直到今天，老百姓连肚子吃不饱，这又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你们说是天灾，但是天灾这么巧就发生在你们天天唱大跃进之后？你没有思索过吗？你若不是农村出来的人，应当多去问问农民们！你若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那么睁开眼摸着良心自问，这几年哪里有什么全国规模的旱灾？"

"再说，你们不是天天在唱高产丰收和放卫星么？既然粮食成倍在翻，丰收年年有，怎么会弄得连你们也要亲领人马下田种地？你们不是说大跃进三面红旗形势一派大好吗？你们不是说市场繁荣，市场上应有尽有吗？你就没有一点现实的感觉，现在连肥皂草纸都买不到，这不是太假，太骗人了吗？还有，就比方说你穿的这条裤子，也补了巴，这又是怎么搞的呢？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会穷得来一无所有，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不断的滔滔不绝地述说这些浅而易见的道理，列举着天天发生的平凡事实。语气刚硬和不容辩驳，这是五年监狱磨难出的。

邓扬光没有打断我，显然他没有理由也没有信心来否定我。或者，就是在进行思索，这些特工人员内心活动隐蔽得非常深。

"别再说了，你这是把支流和暂时的挫折，当成了主流，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邓扬光终于只有用这种不成理由的话堵我的嘴，但是他这么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力量，邓大人理屈词穷了。

其实，加给我的赫赫罪名，就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同他这种有身份的狱吏交锋我是第一次，结果我判断出，监狱管理者的脑袋是多么空虚，他们无法面对现实，而必在事实面前溃不成军！

真想不到今天晚上我有这么一个表达我的观念，和基本政见的机会。

他摆了摆手说道：“允许你把你的想法写出来，但不准你在犯人中散布。”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叠纸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接过纸，从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发现什么，不过，管他的呢！我都活到这种份上了，写就写吧！只要写真实的东西，我怕什么？

利用每天下午他给我的特许时间，我就在那间阴暗的监舍里。写完了我入狱后第一批论述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的文章，虽然十分的幼稚和肤浅。我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的冤枉和无辜，在当时夏种大忙季节中，允许我每天花半天时间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对我又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我成为场部最受“观注”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邓扬光还指定两个干事，每天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第一次送来人民日报正版上的大幅标题：“评苏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的一份公开信”及其连续报导。一场中共内部的大分裂已经出现，一场国际共运的大分裂正在公开化！。

一个月以后，邓扬光搜去了我所写的全部东西，包括那些写废了的“草稿纸”。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在园形石门进来第一幢平房和我们的这一幢监房之间，大约 1.5 米的空隙地，筑起了一道连接的泥墙。泥墙上开了一个洞，谁也不知道它是作什么用场的。直到它的正面安上了一道仅只有半米宽的木门后，人们议论是不是作堆放杂物的库房？

新的木门安上的二天下午，管教科的陈文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根据场部决定，我的问题要进行隔离反省，并且立即叫我把我的铺盖搬进那间刚刚做成的小屋去。我意识到，这是把我押进了监狱中的监狱，进行禁闭反省。

回到我住的监舍中，老潘和大炳们早已出工，唯一留下的是老傅。我默默的整好我的行李，当时并没有感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我毕竟才二十五岁！既缺乏对中共监狱特工组织的了解，更缺乏对中共上层变化的了解。

不可低估这些下级监狱看守的愚昧，低估他们对他们最高权力者的盲从！因而低估了他们对自己的贫穷饥饿，落后的“忍耐”和麻木无知，在这种基本已失去是非判断能力的人面前，任何对他们的启发都只能唤起他们残酷镇压的欲望，招来了自己的“杀身之祸”，狱中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预想和估计毕竟是一种猜测。同时还不懂中共对待异已份子的狠毒！老傅只是与我默默握了一下手，我便在这位陈管教脚跟脚下，搬进了这狭长的“小监”。

小监大约五个平方，除一张地铺和那窗洞的下面放了一只木桶，木门一关，陡然四壁。唯有那窗孔可以进一点空气和阳光外，几乎等于关在一个铁桶中，我确实低估了中共一贯称作“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仅要在思想上“党同伐异”，而且必须在肉体上消灭敢于抗衡的异已。看来，对我的“禁闭”凶多吉少。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必须在心理上作好“面壁”十八年炼

狱的准备，这一关比在激愤时凭一时冲动所付出的牺牲更难，要熬这一关得凭常人所没有的坚定意志和韧性。

（四）哭

晚上，从田野吹过来的风越过围墙，再经过监舍道道泥墙的阻拦，从那小小黑洞中挤进一点空气，稀释着我这小监里的臭气。打在瓦背上嘀答作响的雨点声摧发我的孤寂和凄凉，白日里邓扬光那冰冷的眼色和无情的讹诈，留在我心头的阴影开始蔓延，在这小屋里变得更浓更沉。

黑夜将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感到我的瘦弱不堪的身体是那么渺小，我拼命地想站立起来，却像被千斤重荷压着无法直立。

我在朦胧中，看到了西西卡门前的那颗古老黄桷树，不知什么时候立在院坝里，在夜雨中瑟瑟有声。

于是郁积在我心中的那口闷气，变成一声长长的呻吟，“哇”的一声，吐到了这夜幕之中，划破了蒙蒙夜雨，“哇！propose！”，黑暗的夜空回应着我，同我的呼声汇成了一泻千里，无法收拢的号淘。“曾觑欷余郁邑兮，衰朕时之不当。揽菇蕙以掩涕亏，露余襟之浪浪”。（离骚）

这是哭声，是一个孩子，一个还没有从母校乳头上断奶孩子的哭声，他在向世人诉说一群暴徒，无缘无故把他从课堂里拉出来，剥夺了学业，毁灭他的理想，断送他的前途和一生！在茫茫政治陷阱中强迫他挨饿、受冻，在鞭子下强迫完成超过体力的奴役！

今夜，他在哭！

这是一个中华子民在昏乱的世道中，眼见无道暴君任意用饥寒交迫来横加他的同胞而发出的控诉；这是一个独醒的战士，为他的同胞们被愚弄而相互残杀发出的怒吼！他对他的同胞们吼道：“你们就这么心安理得在饥寒中盲目的互斗，相互厮杀，果真一点都听不到这个世界前进脚步声了？”

一夜的哭声，一夜的清醒。这是继看守所那一夜痛哭以来又一夜悲哭，从这一夜以后，我的精神又一次的从我被囚困的肉体上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在深沉的夜中走！走！

哭声穿出那小小黑洞，跟着绵绵细雨一次次撞击着监狱的铁壁，哭声扶着深夜的寒风，一阵阵拉开笼罩在监狱上空的蒙蒙雾幕，在那里久久回荡，彷佛在呼唤黎明。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当年的悲哀，我在此刻体会得非常深。

如果我的哭声能摧醒沉睡的人们，我愿长哭不已。

然而，夜深人静，院子里却是静悄悄的，从壁上那个小洞望去，在昏暗的天空中，房顶之上那卷着翘角的瓦楞，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在茫茫夜色中傲立天空中的礁石，我听见夜间迷路的小鸟掠着从瓦楞飞过时，撞在它的上面，被击碎倒地。不由得想到我自己，也似在这恐怖

的夜空里独飞的孤鸟？

远处传来布谷鸟凄惋的叫声应和着我的哭声，我明白失去了自由，牢房中的人远远比不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

（五）第一次绝食

第二天清早，当太阳光束迟疑地从壁上的小孔中，射到我睡的草窝里。院子里一阵杂沓的脚步声，集合开饭，出工的响声一一响过。一会儿，送饭的炊事员端着面上盖着一瓢水煮白菜的罐罐饭，放进那壁上的小孔中便走了。

这年月监狱中的“囚禁者”把罐罐饭当作命根，为了多争一口，可以冒着夺命的危险，换得绳捆索梆，许多人虎口越狱亡命天涯，只求饱食而已。记得在看守所为了这小小罐罐饭，我就赋过许多的打油诗，其中一首不妨录在这里：

“方围之中讲罐罐，饥肠辘辘腹中喊。忽闻铁窗响声起，伸颈挺背踮脚看。黑黑一片箩中藏，罐罐不满渣浮面。一呼牢头递过来，双手捧罐怀中看。细数胡豆一百粒，再掂干菜三两片。狼吞虎咽罐见底，不知味苦还是甜。瓢括指抠舌尖舐，俄顷罐空饥未填。双眼回望牢门处，唯见铁窗不见天。”

然而哭了一夜，此时我的胃里难受至极，什么也不想吃。一直到中午，张世雄送中饭来时，才看到早上送来的罐罐原封原样的放在那窗洞上，没有动过，于是他立在那里，将眼光伸进窗口，悄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吃点药？”

声音里充满耽心和同情，在这种饥饿的情况下，一个人不吃饭一定是生了大病，好端端的健康人只有嫌一罐填不饱肚子的，岂有做这种挨饿的蠢事？我无力向他解释，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回答。

“那么你总得把饭吃了，这年月还要劳动，全靠这点吊命粮，不吃饭，怎么活？”他在窗口上向我喃喃规劝道。

院坝里两个人的声音冲着我，喊道：“嗨！把饭拿进去，这可是你的血呀，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可以拿不吃饭来给自己过不去。”他们劝我催我。但是好一会儿，看我仍没有丝毫的反应，只好叹口气，无奈的走开了。窗口上并排地塞着两个罐罐，几乎塞得黑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

下午邓扬光在洞口上出现了，当他在窗口上看到并列的两罐饭摆在那里，迟疑了一下，然后用他那狐狸般的眼光，从罐罐的夹缝中向屋里搜索。

当他的视线捉住我以后，冷冷的向我问道：“昨晚上你闹什么”？他的话极其藐视，这是他一惯用的心理征服法。我仍然闭着眼睛，一点都不想理他，讨了一个没趣后，他悄悄离去了。

两个罐子就这么并立在窗口上，直到晚上炊事员送来了晚饭，看到那窗台上早上和中午的饭菜纹丝不动原处摆着，而我却仍躺在草堆里面壁而卧。他喊了几声，我没有应，于是他立刻抽转身向队部走去。

不一会儿邓扬光来了，打开了我监门上的锁。里面昏暗，浊气扑鼻。他捂着鼻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傍晚的风吹着我，使我清醒了许多，我在想应对的方法！

“怎么不吃饭？”他见我后劈头问道，我仍然一语不答，甚至连头也没抬一下。

“是想向政府抗议？”他提高了语音，自问自答，分明在向我挑战。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我认为，此刻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态度，能同这种特工说什么呢？说些能触及对方灵魂的话，他必定无动于衷；说些应付他的话，我感到纯属无聊，何况我一夜未眠，又一天没有吃喝，已够疲倦了，倒不如养养神，省得空费口舌，我需要睡觉。

“孔令平，我奉劝你一句，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政府是绝不会被你吓倒的！”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态度冷静。

接着又叨叨的说道：“我对你的教育已经很到位了，你入监以后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了界限，够得上死罪的，但是我们仍然从挽救出发，不惜精力和代价，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今天又让你独自反省，可是你现在要出绝食这样的新花招，表达坚持反动的立场，朝死路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教育不是万能的灵药。不过你要想好，这种机会恐怕不会太多。”

他这番话，这几天我的耳朵里都听起了茧！除了这些话外，他几乎再也说不出什么。

随着他的话一完，办公室里又陷入了一片沉静。但是，我忽然若有所悟！我这个无意识不吃饭的行动，似乎触伤了这刽子手的神经？少年时代上历史课，曾知道狱中被囚禁者，常常以绝食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例如印度的甘地就是用这种方式，抗议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

“绝食”是否藐视当局，表达被囚禁者以“死”抗争的决心？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民主社会，政治犯的权力在这里是没有保障的，绝食斗争未必会对草芥人命的中共起威慑作用。

但是，此刻我除了痛哭，我还真没想出别的更有份量的形式。既然，对方已经在事实上把我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绝食”，仅仅才一天不吃饭，便引起这位邓扬光的关注。那么至少说明，他们对我的不吃饭，至少产生不知怎么处置的效果。好吧！就这么绝食下去，我想！

但是，回过头细细一想，这绝食斗争该怎么进行？有没有程序。比方说，要不要预先向对方发表声明什么的，以表示绝食的原因以及对当局的要求？还有，绝食的期限该定为几天？如果所提的要求全都没有达到，那么可不可以中止绝食转为抗议？同时配合绝食还有没有其它的行动。例如，书面写出申明，或者在身前挂一个牌子写明本次绝食所要达到的目的，绝食是不是只含政府发给的囚粮，可不可以喝水？

这些我都没有弄清楚，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按惯例行事，遭到这个恶棍的奚落？让一场本来严肃的斗争蒙羞。

但是此刻绝食已发生了，来不及弄清它们！暂且，保持沉默吧！沉默既可以观察邓扬光的处理，也是表示对他的藐视。

邓扬光见我一句话都不说，自觉没趣，只好让我回到那小黑笼去。

天色已晚，壁上的小洞还被罐罐饭堵着，我已经看不见那房顶上翘起的瓦楞，只听见布谷鸟凄惋的叫声。不过，我已没有再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现在我最紧要的是清理思路，对待已经开始的绝食斗争！我该向邓扬光提出那些条件？又该用什么方法来告诉对方，也告诉这监狱中同监的难友？暂时我还没有想出来，整整两天一夜没有睡觉，我困极了，不知不觉的合上眼皮。

这一夜，怪梦连翻，我彷佛去了地狱。在地狱的一角上面写着："饿死鬼大殿"，里面看到我在甘洛医院那些形同骷髅的同难！看到了杨治邦，看到了南桐界牌吃毒李子死去的赵大爷，还看到了那南桐山岗上，抬着饿殍埋在山沟里的父老乡亲们，看到西西卡中队被抬到医院里已经穿破腹水的流放者，和埋在西西卡山沟里我不认识的饿殍……

第二天一大早，邓扬光便来到了我的"黑笼"前，当张世雄送饭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吩咐张世雄，将昨天的饭菜全部收回到厨房去，窗台上只剩下当天当顿的罐罐饭。看来昨天晚上这个特工思索了一夜，今天他有备而来了。

看见张世雄把昨天的饭菜统统搜去倒进猪槽里喂猪，我不禁有些后悔。为什么不可以用来送给其它的流放者？他们可是同我一样，此时在水田里捞着香附子的草根在充饥啊！

想到这里，我立即爬到洞口上，朝一个正杠着锄头向大门走去的小伙子招手！"嗨，请你过来！"我乏力的喊道，他立刻走了过来，以为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事。

走进窗口我向他说道："快把这个罐罐饭端去吃了！"他显然对我的这个要求感到吃惊，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快点拿走，再过一会儿你吃不成了"我催促着他。

他终于明白过来，向厨房和队部办公室慌张的看了一眼，便像小偷一样，把那罐罐饭，藏在衣服中朝监舍走去了。

当中午张世雄再来送饭时，才发现窗台上是空的。"你吃了吗？好些了吗？"他一边望着我的囚笼，我明白他是在搜寻早上的那只空罐罐，我没有回答他，我只能这样。他继续向我说"把早上的那个空罐子腾给我吧！"我仍没有回答他，我不但没有力气多说话，也不能告诉他任何他想弄清的问题。

张世雄长出了心眼，便去报告邓扬光了！不一会，房门打开了，张世雄走了进来，在我睡觉的草堆里翻遍了，直到证明，那罐子并没有藏在我这里。

邓扬光向张世雄命令道："从现在开始，你给他送饭一定要注意，不准任何人接近这个小监的窗口，送去的饭如果一小时后他没吃，就给我端到厨房里去。"看来他的上司决定向我针锋相对，决不妥协。

中午时分，大家吃过午饭，见邓扬光守着我的黑笼子，房门大开着，便围了一大堆人，他们带着关切和好奇，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邓扬光回过头去驱散围观者。吼道："有什么看头，所有的人统统都回到各自监舍去，再过一会就要出工了！"队部办公室，所有的队长和干事都

集中在这里，没有人对发生的事发表任何意见，也许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

第二天下午，我已被饥饿折磨得非常难受，觉得好像有无数只小手从胃里伸出来，伸到了我的口中，向我催促着食物。这种感觉其实已好多年了，就像在甘洛见到山坡上任何野菜，都可以捞一把向嘴里塞进去，以填补那十分虚空的胃。而现在是一种说不清的毅力固执地在支撑着我，我只好数着脉搏跳动的次数来挨过这难熬的时光。

眼睛一闭，突然浮现出甘洛西西卡的黄桷树；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我匍伏在泥水中拖着一条裤子去田里搬包谷的情景；张棒棒发狠的毒打，绳捆索绑将我扔在溪边，任由一群毒蚊围着我嗡嗡地叮咬！

我想如果这张棒棒还在的话，看到我今天的样子，定会狠狠的骂道："你死去！死吧！你这种人死一个好一个，死完了老子还可以回家去了，不再守这穷山沟！"

想到这里，我有些后悔了，这监狱的当局哪一个都是不把我们当人的豺狼？我若真因为绝食而死了，也是活该！

"死一个少一个，死两个少一双！"那张棒棒的话又响在我的耳际！若那真的成了事实，还有谁替我申冤，也不会有人替我惋惜。

到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社会支持，就是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同难"们，也未必知道我所付出的斗争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这场临时决定的绝食斗争!难道注定我甘忍几天的饥饿，就毫无结果的收场么？

由于事前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准备，几乎带着一股难以平抑的冤气！我开始想如果邓扬光一直向我施加强硬的压力，那么我该是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到此为止？倘若继续绝食下去，那么何时中止？如果就此而中止绝食,那么我达到了什么结果呢？既然我自己都回答不上几天绝食换来了什么？就未免虎头蛇尾，给人笑炳，实在犯不着此举。

好在我一直处在无言的对抗之中，几天以来我的头脑有些昏了，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在努力回忆"绝食"开始的那一天，是因为什么事而引发的？但我有些想不起来了。

就为了邓扬光的提审和对小监的抗议么？噢，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因倪干事在水田中无缘无故打我而引发的。

后来就是邓扬光宣布法院对我申诉的驳回，难道为了得当局一个清楚的回答，我就被"逼到"了这一步么？好在我这一次的行动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凭咬着牙关表示抗议而已，所以，我可以随时停止下来！

每一次张世雄将送来的罐罐饭拿走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欠疚，低声对我说："如果你想要吃东西，就喊我一声，随叫随到。"

但是，三天来我不愿意也没有惊动过他，三天以后，最令我难忍的是渴，听人说人不吃饭可以活好多天，但没有水，生命会随时中止，我现在必须与渴斗。

第四天早上，小监的木门打开了，邓扬光走了进来，命令我把尿端出去倒掉。我奇怪他是在故意地奚落我，已整整四天水米未粘，他不会不知道尿屎从何而来？但我没有理他，算是一种藐视。

几分种以后，他捏着鼻子叫我跟着他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想，当时我的身上一定很臭。从地上站立起来感到非常吃力，站起身来的一刹那，眼前全是金星，勉强地直起身来稳了稳脚跟，一路上打着偏偏。他反复看了我好几眼，便把张世雄叫来，扶着我走到距我"笼子"只有五十米远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见我进来，毫无表情的摊开了他的笔记本！两个人就这样对我开始了"审讯"，他一边记录一边不时向我投来一瞥！我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与死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突然我的耳鼓里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响了起来，眼前开始发黑，心中一阵沤心，便索性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邓扬光在传唤卫生员的喊声……不知过了多久，我又重新的回到黑笼子中。

中午，张世雄给我端来的不是普通的罐罐饭，而是熬得很清的粥，我闻着那粥的清香。现在就从这里开始，从此以后生活便属于我的了。我端着那盛粥的盅子，想到文天祥，当年于元军囚笼中曾以"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相自厉，现在我们应从他的遗著中体会他当时的浩然正气。

送饭来的张世雄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说，"这几天晚上，犯人的学习变成了讨论我的专题会"，只这么一句，我的心就感到了一种欣慰。

流放者出自本身水平，自会有他们的看法，在这种严刑酷法压力下，他们不敢公开表示对我的同情，甚至还会有各种非议。但我的行动必竟像一石惊浪，打破了这种囚徒生活死一般的寂静，人们好奇也罢，非议也好，同情也罢，都是对我绝食的一种回应，而一改过去无动于衷的麻木。

恢复进食第二天，我的脸部开始出现水肿，身上才感觉到奇痒，脱下衣来拿到窗洞里一看，线逢里长着许多的虱子。我看了看那满地铺着的稻草，那小动物也许是那里面孵化出来的。

在这种非人环境中，那邓扬光平时往往口头大喊大叫讲卫生，其实是担心他们自己的卫生太糟，让他惹病上身。晚上，张世雄送晚饭时叫我将已快一个月从没洗过，生满虱子的破烂衣物全部换下，拿去用"开水"消毒。

这一夜，我重新细细的思考和总结了自己迄今才二十五岁的人生。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是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早已下过的结论，意思是把知识份子的生存基础比着皮，中国的知识份子只是附在某个阶级皮上自生自灭的毛！."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依附其上的知识份子也就要跟着消灭。

然而早被自己的"出身罪"罩住了的我，却完全不理解毛泽东这话的"革命精神"，就比不得那嗅觉十分灵敏的曹英了。当时总觉得他几乎像疯狗一样的乱咬我们这些娃娃，是一般有

良知的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

一无政治兴趣的我，招惹谁了呢？我们就仅仅因为出身的这张“皮”已不存在了，而必须在一场阳谋中连根铲除？我们的致命点是，不能像当时曹英那样，做一条疯狗。

入狱后，几年的炼狱已使我渐渐领悟到了这点，心中常感到无缘的恐怖。因为封建社会那种殊杀九族，正被中共公开宣称：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效仿。

不过现实却没有像他打的如意算盘那样，“赢得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拥护”，毛泽东的骄狂独裁，竟遭到他的国际盟友苏联的反对，也遭到了同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的反对，更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反对。

使他不得不把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屠刀挪开，去对付他新的政敌。但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理论延用到今后，那些他将来需要急于繁殖的毛又该依附到那张皮上？

我因为才换了衣服，身上也没有那样痒，经过一夜休息，情绪开始平稳。

（六）我吃饱了

掐指算来，我已在这“禁闭笼”中关了十天了。估计这些天，古柏周围的水田已经栽完了稻秧，这几天大批已进入薅秧了。我从排队领取罐罐饭的行列中，看到了身材高大的辛志华，此刻，他正端着刚刚拿到手的罐罐，站在饭桶边，请尤二皮给自己换一罐，却遭到了那尤二皮的拒绝，两个人争执起来。

这尤二皮，是从自贡监狱调来的，听说捕前就是一名跑二排的，因强奸案入狱，此人一双眼睛是飘的，但却像老鹰一样尖，尤其是记忆力特好。也许是二排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我们同批从二道沟地区调来的三十人中，仅一周时间，他便能逐一道出我们的姓名。

所以这家伙比甘洛的代昌达还厉害，他掌的那瓢向来长着眼睛，大组长自然就要多“照顾”一点，平时敢于在他的面前争多论少的人，便特别克扣他，为此，打饭时的冲突从没间断过。

每次冲突照例是最凶恶的倪管教出来收场，那人河南口音，平时板着脸从不露出一丝笑容，像是传说中阎王府的判官。讲起话来不紧不慢，使你觉得催命鬼向你发出威逼。听人说，此人曾活活打死两名“逃犯”面不改色。

若尤二皮请出倪判官，“闹”事人便凶多吉少了。我有时怀疑他的心，是否像“冷酷的心”中的主人公被魔鬼偷换了，使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人味。

不消说，对于身材高大的辛志华，罐罐里装的这么小半罐饭，绝对比旁的人更感欠缺，他常常对人说，半罐饭连填牙缝都不够。在黄联关的时候，就将改铁钵赚来的罐罐饭同其它人他打过赌，说他能一口气吞下十个罐罐，结果同他打赌的人是输了。他放怀吞下十罐饭以后，抹了抹嘴巴说了声：“这才差不多。”

我因此对他忍耐饥饿的能力感到惊叹，也不知道如此大食量，是怎样从甘洛的鬼门关里

熬过来的？我同他同批调到这儿后，常常看到他独自在马棚里捡洒在地上的饲料，直到天黑。有一次我打趣的问他，怎么练得“夜光眼”的特异功能？

他便把他摸黑在马槽里拣到的东西，倒在亮处给我看，那是些混杂着草料马粪和泥土的四季豆，端着盆子打来了水将它们沉甸、洗净，滩在破衣服上晾在囚室窗子下。仗着盐源的风大，到了第二天早晨，豆子已经差不多干了！他便小心冀冀地收藏起来，再赶着出工。

这种马嘴夺食的方法，很快传授给了同监舍的其它流放者。不过，当时还没发明用夫碳来弄熟这些野食时，只能生吃这些豆子，一股说不出的闷味和马粪的臭味，对于正常人是断然吃不下去的。

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混着马粪泥土的垃圾越来越少，改铁钵的活也没有人问津了，只剩下水田里的香附子草，辛志华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正当那尤二皮同辛志华，因换罐罐饭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脸色铁青的倪干事柱着一根青杠棒走了过来。

“什么事？”他向尤二皮发问，脸色十分阴沉，话语阴阳怪气，双手将青杠棍背在背后。

“报告倪干事，”尤二皮低声下气喊道：“罐罐的定量每一罐都是一样的，他这个人非要把领到的一罐同我换。”“既然是一样的，我换一罐有什么关系，你不换给我说明你心虚，罐罐有假。”辛大汉不甘示弱，将就尤二皮的话反问道，说着将端着的那半罐饭朝着倪干事的眼前凑了过去，让他来作个公断。

不料，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倪干事挥起了他手中的青杠棍，重重地打在辛志华端罐罐的手腕上。只见那罐罐应声坠地，半罐饭从罐子里滚落在地上。

辛志华正要作出反应，那倪铁脸的青杠棒已像一杆枪一样，直端端的指着他的头，迫使辛志华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在场的人纷纷围了上来。

“集合，辛志华这个组全体集合！”倪铁脸大声命令道：“其它各组都各回各的监房，停止开饭”。三分钟以后，坝子里八个赤着脚，满身泥浆的人，排成一队站在坝子里，端着自己的罐罐饭，有的已经吃完，有的刚刚开始。

“没有吃完的，把罐罐放在一边，全体立正！”倪铁脸下着整队的口令，八双泥脚在他威逼的口令中，按照要求站成了一列。其它的人也都纷纷的退到监房的廊下，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他们。

辛志华排在队列的最左边，他的个子最高，最令人打眼！倪铁脸看了一下他的口令执行效果后，慢步的走到辛大汉的身边，用他那老鹰般的眼光逼视着对方。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打人和捆人的前凑，辛志华感到一股直逼他背心的杀气，做着挨打的准备。

倪铁脸发问道：“你为什么要扭着炊事员换罐罐饭？”

“因为那只有半罐饭，我这么大的个子，那一点粮食我吃不饱”，辛志华直率而倔强地回

答。

经三元宫的人，对狱方有一种反劲，当然，这种情绪原本是当局逼出来的。

“我看你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了。”倪铁脸斩钉截铁的口气里，有一股令对方难以防备的阴险！说完，转身向站在旁边的尤二皮吩咐道：“从下一顿开始，辛志华定量每顿减一半，知道吗？”辛志华眼里闪烁着怒火和无奈，所有在场的其它的人，都用麻木的眼光盯着这个打人从不眨眼的家伙。

在这里，他的话就是王法。尤二皮耸耸肩，脸上露出得胜者的微笑，彷佛倪管教代替他说出了他本人没有说出来的话：“怎么样？辛志华，想用脚趾拗过大腿呀，看你辛志华今后还敢不敢同我傲？”

顺着八人队列的顺序，倪管教的青杠棒从辛志华的身上，移到紧靠着辛志华站着的第二个人身上：“你呢！你说你每顿饭吃饱了吗？”倪铁脸像鹰一样的眼睛逼视着对方。被逼问的人看到辛志华因为在倪铁脸面前，用真话“顶撞”了这刽子手，便扣去了一半囚粮。又看了一眼那地上的半罐饭，何必自讨苦吃呢？

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十分矛盾，既不愿屈服于这倪铁脸的淫威，又不愿效仿前者那样白吃眼前亏，停顿片刻，便无奈的干笑了一下，微微的点了点头。

然而，这勉强的点头，显然没有满足倪铁脸想达到的效果，便大声地冲他喝道：“说，大声的回答，你吃饱了没有？”

被这突如其来的喝声振住。那人一惊，脱口而出：“吃饱了！”声音里充满了被强迫和苦涩！倪铁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才将青杠棍指向了第三个、第四个……依次到第八个。他得意的从嘴角边露出一丝狞笑。

“吃饱了！吃饱了！”二百多流放者在各自的监房里注视着这一幕公开，逼人撒谎的丑剧。那撒谎的声音飘逸在天空，在满院子里荡漾，连那耸立在房顶上的卷曲的瓦楞也惊奇得格格作响！

其实平心想来，这种公开的撒谎哪里是倪铁脸的发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中共的刺刀逼迫下，那广播、报纸等等媒体上每时每刻都在这么做，这位倪铁脸不过活用了这种方法，用来对付在枪杆子下面的流放者们。

原来，强权政治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颠倒黑白，窜改真相的。

倪铁脸得意的笑了，那铁青一块的脸上本来从不见笑容，现在笑起来真令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就像阴司里吃人的鬼。在演完这一幕戏以后，便转过身来对那无可奈何的辛自华辛辣地挖苦道：“怎么样，听清楚了吗？你们全组的人都说吃饱了，唯独只有你一个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在这个劳改队中明目张胆的闹‘粮’，攻击我们的粮食政策和劳改政策。你说，该不该认罚？”

说罢，他哈哈大笑，用得胜者的姿势放浪着，扬长而去。

辛志华真是没想到，今天竟为换一个罐罐饭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弯下了腰从地上拣起那掉在地上，已沾满了泥沙的半罐饭，用手细细抹掉那沾在饭面上的泥沙，朝着那姓倪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

刚刚才从绝食中恢复过来目击整个过程的我，深深为刚才这一幕所触动。心中不断自问道："这位今日得逞的倪铁脸真的胜了这小犯人么？今天他可以任意欺侮被他管辖之下的辛志华。明天，他未必不会被其它人，例如他的上司或者他的同事，用颠倒黑白的手段还治其身？"

推而广之，暴君可以仰仗他的权力整治他的百姓，和不听命的大臣。但是，百姓们可以屈服于一时，就像那屈服于倪铁脸的八个"犯人"一样。但改朝换代时，暴虐者心里便明白这就是长期恶行的结果啊?

然而报复暴行是要等待时机的，最难熬过的便是"等待"了，等待是极为漫长的过程，没有足够的韧性和毅力，很难超度这漫漫等待的时间长河的，不然，为什么说："黑暗的长夜漫漫难熬呢？"

倪铁脸对辛自华的处理决定，就从当晚开始由尤二皮不折不扣执行了，这本是那尤二皮深得队部宠幸的原因。当天晚上，当辛志华的大铁钵伸到龙二皮的大铁瓢下面，他只接到一瓢稀饭。辛自华狠狠瞪着这个"仇人"，咬牙切齿的他，当场真想连钵带粥向这个尤二皮的头猛劈下去！可是他终于没行动。

那尤二皮也早有提防，那根用来抬稀饭桶碗口粗的杠子，紧紧地靠在他的左脚边，准备等辛志华一出手，便立即捞起这个家伙将他就地的打扒在那里。我注意那辛志华一直站在饭桶边，强吞着这口恶气，好半天才缓缓地走开了。

又过了两天，晚饭以后。在监房的那一侧，传来了一阵阵乱哄的人声。听去，好像有人在那里发生了抓扯或打架。按规定，晚饭以后的两个小时是"政治学习"时间。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对政治学习，当成是听当局的假话而感到厌恶。所以，只要没有干事在场主持，流放者一般的都把这段时间用来闭目养神，或调侃、摆龙门阵之用，一般说是顶安静的。

但是，此刻却传来了一种响动，好像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下意识地把头伸向洞口，侧耳倾听。心中想，不会今天又是谁犯了什么禁律而被挨斗了。

果然，不一会那倪铁脸在大田三组的门口，破着嗓子大喊着。大田组的组长正从监舍里端出了一个冒着一股股浓浓烟的破洗脸盆，里面盛着一盆刚刚被泼熄的夫碳，按倪铁脸的指挥，那被端出的夫碳盆放到了院坝中间，正对我小监的窗洞前面。接着看到辛志华端着一个大口盅从屋里走出来，径直走到那冒着浓烟的破洗脸盆地方，放在夫碳盆一堆。

看那盅子沉甸甸的样子，我猜那是满满一盅的马槽里检来的"豆子"。

跟在辛志华后面的，是大田三组另一个组员，拖着一床冒烟的破棉絮，走到了院坝的一边扔在地上，用脚猛踩着那冒烟的地方。我看到这里，心中便猜中了几分，——今天辛志华在监舍里用洗脸盆装上夫碳煮豆子吃的时候，撞了大祸。

（七）辛志华

辛志华站在院坝中间，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倪铁脸操起了他那随身带着的青杠棍子，先在他的身上猛地抽了两下。便走进队部办公室，不一会同那邓扬光一齐从里面走了出来，并没去询问辛志华，而是向驻着卫兵的小岗楼上招了招手。三个彪形大汉提着绳子从岗楼上走了下来，一直走到辛志华的面前，三方将他围在中间，二话不说拳脚左右开弓，将他打扒在地上满口吐血，满地下的滚，当即掏出绳子将他在原地捆了个“四马传蹄”。

不出十分钟，院子里便响彻了他的哀嚎声，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十二点钟。

两个犯人从后院的侧门中，提着一副足有十五公斤的大脚镣走了进来。邓扬光又从办公室里取出了一副内圈带刺的土铐子，院子里响起了一阵铁锤铆接脚镣的捶击声。一名流放者手里撑着一个火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给他上好了全刑具。

我的反省室的木门打开了，在电筒光的照射下，两个人把他夹持着，拖着沉沉的铁镣，让他的身体挤进木门后，便将他像扔死狗一样向着漆黑一团的屋里一掼。只听见他一声叫唤，便连人带着铁镣铐重重地摔在三合土的地上。

我的肩膀被他的手铐子猛击了一下，随后便是那床带着烧焦的烟臭烂棉絮扔了进来，木门重新关上，上了锁。夜才重新归于寂静。

随着他的呻唤声。在寂黑一片的小屋里，我先摸到了他的头，只觉得粘乎乎的，那肯定是血。便站起身来，很吃力的将他扶着，靠着墙壁坐了起来。“怎么样，伤到哪里没有？”我悄声的问他。他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在呻唤。

我估计此刻他惊魂未定，不可以过多的打扰他，所以也就保持着沉默。我已完全没有睡意，他的到来，使我再次明白，关进这小屋里意味着什么？

天色渐渐朦胧，东方开始泛出鱼肚白来，藉着那窗洞里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我吃力地再次调整了他难以动弹的身体，这小屋的总共宽度才 1.5 米，要同时睡下两个人怎么排都难于安置。

费了好半天时间，我才决定两人合成一个铺，好在这是夏天，身上可以不盖被子，便将他那床已烂了一个大洞的烂棉絮铺平在我原来睡的铺位上，用我的被子两人合盖，让他至少能躺下，以减少昨夜所受的创痛。

凭着早晨微弱的光线，我看清楚了他全身的伤况，惨白的脸上和头部到处是青包，那肯定是三个士兵的“杰作”。两臂紫黑色的血印已将他的的破单衣勒得粉碎，粘在那血肉模糊的伤口上。

铁铐铐着的一双手已经浮肿，脚镣铐箍的周围留着黑色的血印，双脚赤足，巨大的铁镣，箍着的脚板也是浮肿的，沾着血污和泥迹，周身全是糊满了黑褐色的泥血交混物。那总体形象，同中共所映电影里，中美合作所中累遭毒刑的死囚犯完全一样。

趁送早饭的机会，我向送饭的炊事员要了一盅冷水，再用从烂棉絮上撕下来的棉花，一

点一点为他悄悄擦洗伤口，还没有轮到清洗他的手脚，那水已成了红黄色的泥血混合液。所幸早上送进来的罐罐饭他的那一罐并没有挖掉一半，这大致因为发生了那么大的事，这辛志华犯有“秋后问斩”的罪。

罐罐并没扣，邓扬光必竟不像倪铁脸为逞一时威风，做明显违背监狱规定的事。接过他的那一罐，我便用筷子一团一团的撬给他吃，我受过绳捆的刑，知道刚刚挨过捆的人松梆以后，双手麻木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拿东西的功能。他吃了一半便摇摇头说：“我吃不下了，余下的你帮我吃完。”

在这种饥饿遍布全国的时候，监狱里犯人扣犯人的饭菜，不仅是一种“普通”现象，特别是对受刑的伤者，为免除继续受到同监犯人的残害，不得已奉献出自己的口中之食，仍是当时大陆监狱中又一种普遍“规矩”。

我知道，这个比我高过半个头的大个子，正因为食不能果腹，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他此刻肯定比我更需要食物补充。

我强迫地喂完了他的那一罐饭以后，还将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一大盅白菜喂给了他一大半。一边劝导他受了伤的身体如果再不吃，恐怕就难以复原了。他默默地吃着，眼里露出了感激的光。

下午，他的情绪好像平稳了许多，便慢慢的地向我讲述了昨晚发生的那椿倒霉事的全部经过。那时节，大田中耕早已开始，大田组的任务主要是薅秧子。中午时分，大家收工回来以后，辛志华正引燃他的夫碳炉，将炉中的夫碳吹得火旺。同时把早上泡好的一大盅四季豆放在炉子上煮的时候。

突然汤队长撞了进来。原来，下班的时候他到田里转了一趟，发现已经中耕过的秧子极为马虎，他认为大家只在水田里边走边吹“龙门阵”，田里的稗子和杂草根本就没有动。这位负责大田组的汤队长也是受人追问！便利用中午时间，专门来到监舍，召开一个“责任追查会”。

汤队长的突然出现，使毫无防备的辛志华吃惊不小。慌忙之中，将自己的被子扯过来，遮在正在沸腾的”锅”上，瞒过了汤队。大家一边开会，那被盖下面的四季豆，却一直在被子下面咕噜咕噜的煮，一直到上班时间，大家走完以后，汤队才最后的离开了监舍。临走时，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回过头去望了一望，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辛志华估计，火已被被子捂熄，便跟着大家下田去了。

殊不知，等到下午大家收工回来，满屋子的浓烟滚滚，那床被子已经烧穿，火苗正往上窜，大家才七手八脚将火扑熄。

“真是冤家路窄，事情遇得这么巧！”辛志华讲完后，重重的叹息道，他自己心中明白，在中共的监狱中纵火烧监的罪名一旦成立，他的命就难保了！更何况这一次偏偏又犯在这倪管教手中，尤其增加了“凶多吉少”的份量。

第四节 在农场小监里

可惜，我们俩只有一天两夜同宿在这个小监内的缘份。第二天清晨，小监的木门打开后我被喊了出去，童干事叫我立即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调往他处。

我会调往何处？立刻回想到五年前，跟着鲁钊从丛林去到南桐看守所。那一次“单独调动”将我从保留学藉的右派学生，升格到十八年徒刑的“反革命囚犯”。么这一次呢？难道也“凶多吉少”，再升格的话，恐怕性命难保了。

我该不该对自己说：“现在暂时只能什么也不去多想呢？”临行时，连与我最好的潘老和大炳看都没看到，便被催促着背着破行李向石门走去。当我离开那坝子时，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朝那小监的“洞口”望去，只见到那里面伸出一双戴着手铐的手来，分明是辛志华在向我作最后的致意。

“我要被弄到哪里去？”在车子上，我一边向两边张望，一边在惴测将到的去处。行车不到两个小时，吉普车在一片红色楼房群前停了下来，楼前两个砖柱，使我记得这分明是二道沟盐源农牧场的场部所在地，当我被童干事叫下车来，我还不相信，这次把我一个人单独重新“押”回到这里来了。

算来从这里调到古柏才四个月，原先那一潭黑色死水的污塘，已为上游水库放出的水冲灌，沿着堰沟，水源源不断流过，这里已变成一弯小溪河，它的水面足有三十米宽，当初的几颗光秃秃的老杨树也已白头转青，那条通向初来时军垦农场的马路两边，狭长灰白的田里，现已是葱茏一片的稻田。

邓扬光夹着一个大皮包，站在那两根砖柱前面，看样子已在那里等候了一段时间了。我提着行李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向着红色的楼群走去，这红色的平房群，分列在一条条石砌成的梯路两旁。我们沿着石梯坎向上走去，走到正中间的那一排右侧，是两列被围在围墙之中最宽大的平房群。走近了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围墙门口站着一名全付武装的士兵，门口的右侧贴着一张白纸，歪歪扭扭的写着：“库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十二个字。

邓扬光向那门卫说了几句话后，我便跟着他跨进小院内。小院由一圈平房围成。它的下方是驻守这儿的士兵营房，它的上方，按地形高出不过一米的石头台阶上才是粮食仓库。粮仓正中的两个房间都上了锁。

在我进到院子来时，左边的房间传出了一阵叮铛的脚镣声，我估计那里面肯定预先关着一个要犯。此时，一定是听见院外有响动声，走到门口处在门缝中张望着我们。

邓扬光又向卫兵嘀咕了几句，那士兵便走进营房取来一串钥匙打开了右边那一间空着的房子。我这时才恍然大悟，这里才是为我专门准备的禁闭室，而古柏的那一个临时夹起来的“小黑洞”，只是将我临时的寄押在那里。我将在这里开始我不知以什么罪名，重新被起诉的新的监狱生活。

我拎着破行李跨进了那刚刚才打开的黑屋。开始进去满眼一片漆黑，只有屋顶的亮瓦缝中透进来的一束微弱光线。亮瓦已被灰尘积垢堆满，透明度极低，听到背后邓扬光悠然传来声

音："孔令平，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这里反省，你必须好好地思过悔改。"

我的瞳孔慢慢的收缩，等到我能看清这屋子里的全貌后，那木门已经关上，并且上了锁。小屋足有十六个平方，比起古柏的那一间，我完全可以独自在里面活动散步。进门靠右手向里的一角里，已经用稻草铺好了一个地铺。彷佛曾经睡过人，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遗物。

四周全是用石灰刷过的泥墙，四个屋角已牵满了蜘蛛网，见人进来它们正在那网上游动。除了正面的那一扇门外，没有任何通空气的窗户，整个屋子尤如一个泥墙围成的桶。屋中央从房顶上吊下来一盏 25 瓦的电灯，整个的"桶"里便空无一物，只有那泥墙上印着几个从瓦缝中漏进来的模糊光圈。

我打开了破背包，将在黄联关一针一针缝起来的一床破棉垫子铺平，已经足足两个晚上为照顾辛自华而没有睡觉，此刻这桶里突然十分幽静，疲劳迅速地拉下了我的眼皮，忘记了中饭还没有吃，便倒在草堆中沉沉的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送饭的人喊醒，刚才进来的门已经打开，一个宽盘脸的中年人，提着一个竹篮已经站在我小屋的门里边，竹篮里放着一个洋瓷大碗和一个盅子，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碗，那里面盛着大半碗的米饭。饭上盖着油煎白菜和红烧茄子。我刚端到手上，那久违的油煎菜香味便扑入鼻中。

唉！除了过年过节，这样的饭菜已与我分别了整整五年之久了。我翻身从地铺里站起来，接过那人手里的饭菜放在地上。此时，从打开的门向外望去，天已黄昏，屋里那悬在梁上的电灯也亮了起来。

送饭人也许看出了我的不安，便说道："这是干部食堂的伙食，今天本来是吃肉的。但是已经打完，下一次再补给你们。"说完，提着篮子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我姓叶，是干部食堂的炊事员。今后你们的饭由我送，你吃过的碗和盅子可以不洗，等我下一顿送饭时再收回去。"

看那装束明明是一个"犯人"。不过讲话的态度和口气十分和蔼，不像我这几年熟悉的红毛犯人，当大门重新关好上了锁以后，我便坐在"坑"边，从地上端起那盅子，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耳边响起"现在暂时什么都别去多想，先恢复身体再说"，这仍是我劝辛志华的话。

那一夜，大概是因为这可口的饭菜，加上连夜的疲劳，我睡得非常香。一夜没有起过夜，若不是送饭人再次将我从梦中叫醒，我还不知道，这已是我在二道沟小监里第二天的"禁闭"生活了。

早饭是稀饭，馒头和油炸花生米。而且，老秦送来来的稀饭，光那米又白又香，用一个小桶装来，足够我饱食一顿。"也许是要杀头前给我们丢一个想头吧！"这么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因为我听说，过去满清时要砍头的犯人，临刑前还要赐给一桌酒席的。不过管不了那么多，究竟是凶是祸，苍天独断了。

我想，这么"养"下去，不出两个月定会催肥的。拉出去枪毙，长得胖一点，政府也顶体面的。要不然，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寒碜："枪毙这么一个骨瘦如柴的囚犯也怪可怜的。"权当

疗养！

快到中午开饭的时候，邓扬光派人为我和隔壁房里的那位，送来了报纸和一叠白纸，并转告了邓科长的指示："你们每天必须在这里认真的反省和学习，过了一段时期还要写出学习的心得和反省交给场部。"送报纸的人走后，门外的院子里便寂静了下来。除了站岗的士兵，间隔着在院子里的三合土坝上，来回踱步的脚步声，什么也听不见。

我躺在铺着谷草的铺上，凝视着在那墙壁上慢慢爬动的"光圈"，心里还在回想在古柏的四个月来所经历的前前后后，思考着那位阴阳怪气的"邓科长"向我提的要求，考虑我今后该怎么应付可能发生的事？

突然我的眼光落到刚才邓扬光派人送来的报纸和白纸上，想起一篇新华社发的当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囚禁杨虎成的报导，国民党当局对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关监时，也让他天天读报的。自我划右以来，尤其是入狱以来我所亲身经历和亲目所睹，狱中的政治犯向来受的是拳打脚踢，绳捆索绑，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翻开送来的报纸，眼下正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公开决裂的白热化阶段，双方都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不惜代价，将多年老百姓不知道的真相抖露出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写下一些文章，表明我的观点，虽知道这些文章都会被当局搜去。

正要聚精会神的运笔，突然我发现我的脚下，一个园滚滚的黑影，向着与隔壁相紧怜反省室的墙角落蹿了过去。房子里黑糊糊的，我被惊了一下。仔细看去，却是一只老鼠，正将身体宿在墙角落里，用它豆一般的眼光盯着我。我挪了一下身，站起来向它他走过去时，它便迅速的在墙角里消失了。

定睛一看，正对墙角正隐藏着一个直径大约四厘米大小的老鼠洞，我好奇地走过去，趴到地上向那洞里窥望，可是什么也看不清楚。顺手从我的铺上捡起一根稻草，顺着那洞通了过去，隐约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一阵脚镣的响声，大约十来分钟以后，那根我通进去的稻草，仍被扔了过来。稻草上还附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本人陈力，你呢？"

原来隔壁的却是当年雅安监狱抢馒头，大闹三元宫的第一号领头人，后来又在甘洛农场斯足分场大闹队部的陈力，久仰他的大名，不期在这里成了我小监的同伴。

从此以后，我们便借这个洞，传递着彼此所知道的消息，也交换着彼此所写的文章。他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二道沟调到古柏去后，二道沟原来在一起的人都已调散，新成立了三个中队。他是两个月以前因为写文章，并大闹农三队，当局说他是修正主义的急先锋，死不改悔的反改造份子，便将他关到这里来隔离反省。看来我和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关进禁闭室来的。

他从洞里递给我的文章讽喻的笔峰十分犀利，目光深远，志向鸿大。尤其是所写的杂文文体流畅而痛快，令我欣佩，他告诉我他的身世和入狱的起因，介绍他的父亲原来是巴蜀中学的老国语教员，在他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自幼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倘若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里，他本该成为针砭社会时弊的好作家，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许多有益的事，而今天，我们都只有被关在黑牢中的命。

处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盐源，一进入九月，旱季便早早来到，每天都是晴天。早晨从六点钟开始，太阳从瓦缝中射进来的光束，投在墙上一定的位置上，便留下了一些小光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光圈便循着各自特定的轨迹，在墙上慢慢地爬动起来，直到晚上太阳下山，他们便从不同的互缝中悄悄溜了出去。每天往复，便成了一个准确的计时器，凭着这些光圈爬在墙上的位置，我可以准确地读出时间。

平时除了门外的卫兵在换班的时候，偶尔将门上的风洞扒开，向里面张望一下，三顿饭的炊事员打开木门成为我们唯一的"客人"。另外，三天一次，将自己的粪便倒进门外摆着的一个粪桶里，可以在门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外，我们几乎同外界割断了联系。

特别是深夜，院子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时，就使我自然的思念起亲人来……在梦境中与亲人们的相聚会。然而我无时无刻都没有忘记我在坐牢，所以在梦中相聚，也总是在牢中相聚，充满了凄惋和恐惧。出现的恶梦，多是与他们诀别，醒来总要惊出一身冷汗。

有一次我梦见我的弟弟被挂在半空中被两个人用铁丝捆绑押送着在云中疾走，身上全是伤痕，却老是看不清楚他的脸。于是我紧紧的追着他，却无法跃过脚下的深沟大壑，呼喊着他的小名，眼睁睁见他消失在云中，便猛然惊醒，醒来横身都是汗水。

想到我被送看守所时，一家老小就数我最精强力壮，本当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怎知道连我自已都糊里糊涂地栽到这牢里来了，也不知道奶奶要哭成什么样子。所以从此以后就断了音信，少些亲人们牵肠挂肚。也不知他们今天落到哪里？他们大概也要在这茫茫的夜中四下环顾！寻找这个"失踪"了的我吧。

痛哉！痛哉！当然，现在既已被监狱中的中共下层狱吏，把我卷进了这十分险恶的旋涡中。不但是右派和反革命，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分子，关在这黑屋子里听候发落。

打最坏的主意，不久我将从这黑屋子里，押出去绑赴处决的刑场，我也无怨无悔。只希望我的同胞知道我是坚定的为反抗暴政而牺牲的勇士。只要我能堂堂正正的死在刽子手的枪口下，总比不明不白像杨治邦那样葬身于千里荒丘之中强，处决我时，我会面对刽子手的屠刀，高喊"历史将替我昭雪！"

小监里的生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悠然渡过，一晃我已在这黑屋子里住了二十天，马上就是十月一日了。

（一）金干事探监

9 月 30 日下午三点钟我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惊起，便放下手中的笔，扒在我木门上，找到一条最宽的门缝向外张望：

一个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大个子，被人从小院的木门里推了进来，踉踉跄跄地倒在院坝的三合土上，从他涨红的脸，和偏偏倒倒的步履看，这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十分潦倒的刑满就业人员。脸上几处伤痕留着血迹，证明他刚挨过打，两个刑释人员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付重重的脚镣跟在后面。

那躺在地上的醉汉一只手在空中乱舞，一面指着那两个提着脚镣的人吼道：

“姓邓的，你要我们一家人去死，我们也不想活，四十块钱，四个人怎么活？怎么活？”

那混浊的吼声十分凄凉！不知他姓甚名谁，因何事关到这里来？两个拿镣的人在卫兵督促下，开始掰开他的两脚，为他脚上上好抱箍后，便用二锤锤击铆钉。那声音一下一下，响彻在这“节日”的上空。

“姓邓的，我和你拼了，你今天不解决，老子就不回去，老子充其量一死！老子也活得不耐烦了，姓邓的，我们一家大小今天就到你家里来吃饭，老子一家饿死了，变饿死鬼还要找你。”

醉汉一个劲在吼，不过声音越来越嘶哑。“四十块钱怎么活！怎么活……”他没有间断的吼着，一直到两脚的抱箍都上好了铆钉，他仍坐在那里，眨着慢慢清醒过来的醉眼不停地吼。

两个就业人员，提着二锤准备离开，却被卫兵喝住，打开了隔壁的那房门，命令两人将他硬架着拖了进去，那沉沉的铁镣在三合土地面上，拖出了一束白色划痕，随着一声沉闷的倒地声，隔壁的门上了锁。

还没等两人走出院坝小门，就听见，一连串咒骂和哭泣声从隔壁迸发出来。并用那刚上好的脚镣，一下下撞击那木门，一直闹到天黑。

天刚擦黑，老叶篮子里送来的饭菜比往常增加了一份，今天“过节”，三个碗里都装得满满的，红烧肉的香味非常诱人。我压低了嗓门问他下午关进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只说了句：“高世清，场部蔬菜组的就业人员”，便不开腔了，我不便多问。

等他送完了饭，刚刚离开小院，那围墙上的木门前又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女人叫门声。

“谁？”守门岗的小子端着冲锋枪，在坝子角落的隐蔽处喊道。一个个子矮小的女人正提着个篮子，在小门门灯下站着敲门，门岗走了过去。

“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

“怎么不认识啦，我来替高世清送点过节的饭菜。”女的回答，语气傲慢随便，好像同那小伙子很熟。

“那里的话，金干事，管教科交待过，关在这里的人任何人都不准私自接近，场部伙食团刚刚才给他们送过饭，不用你操心啦。”卫兵已经认出来人，用缓和的语气拒绝着，然而女人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继续喊道：

“怎么？获得公民权的人，连家属都不许接近？”语气里含着明显的抗议。

“不是那个意思，实在是我不敢违背规定，我们有负责人哪。”卫兵继续地用解释的口气加以拒绝。

“这么说，我就只好在这儿等啰”，女人放下手里提的篮子，看来今天是非见不可了。两

人相持在木门的里外两侧，沉默了一分钟，女人终于发话：

“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就请你向管教科通报一声，就说我给丈夫送过节饭来了。”哨兵进入旁边的小屋里打电话，五分钟以后，昏暗的石梯坎最上方出现了一束直射小门的电筒光，一个人影快步从上面走下来，直到距离小门大约只有五米的石坎上，用电筒直端端地射着守候在那里的女人。

女人毫不示弱，昂起了头，迎着这束挑衅的电筒光大声吼道：“请你懂礼貌一点，用不着用电筒这么射人，又不是不认识。”她早已认出来人便是邓扬光，邓扬光只好收起电筒，把它背在身后，左手叉在腰间，极不耐烦的发问：“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为丈夫送点吃的，明天是国庆节了，邓科长，不可以么？”女人挑衅的口气显然令这位邓科长感到难堪。

“你可以把送来的东西转给卫兵，他们会按你的吩咐去做。”邓扬光压着自己心头正在上冒的火。

“高世清是就业人员，按你们的政策是获得公民权的人，他今天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把他弄到这里来关起？就是逮捕也得出示逮捕证，得拿给我们看，你们什么手续都没有，想把人抓起来就抓起来，这样做，你自己也知道叫什么？请你放明白，我们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女人没有示弱，她那进攻性的口气，咄咄逼人，任何人都会括目相看。

邓扬光显然被逼得恼羞成怒了，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是绝对没有权力来指责政府的，他恐怕也从未受到过这种指责，便高声的喝道：“金梅，我提醒你不要在这里胡闹，这对你没有好处”语气盛气凌人。然而今天这女人显然已经发横，其实她的丈夫已经说出来了，一个没法活下去的家庭，一个被逼得走上绝路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是这位小小狱吏的威胁。于是她提高了嗓门继续回敬他：“你们做事总得按政策吧！逮捕证在那里？就是逮捕了，我们家属还有探亲权。”看来，旗逢对手针锋相对了，不见到自己的丈夫，这女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营房里的几十名士兵，已全部集中在门边。他们是些刚刚入伍的农民，还没见到过这种好戏。小伙子在交头接耳，对于双方的吵架，信守中立。

邓扬光此时已完全被对手激怒，命令道：“卫兵，把她弄走。”两个哨兵，迟疑地把枪交给了其它人，跨出门去拖她。

不料，她敏捷地向右边的石坎一个箭步，跃离开她摆饭盒的地方三公尺远，然后一个骑马椿招式站稳以后准备迎敌，口里却大声喝道：“老娘干革命穿黄马褂的时候，你们还在打横捶呢？谁敢动手”？两个年青小伙子立即退缩下来，邓扬光见状也开始软了下来，想了想，朝那女人问道：“你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无非是给我丈夫送口过节的酒饭，就是我们一家人穷得没饭吃要饿死，也让我们夫妻吃顿团圆饭再去死！”

女人语气里充满了悲伤，在场的士兵们一片寂静！邓扬光无可奈何跨进了小门，走到院子里，将他们一个带中尉军衔的人拉到那放电话的房间里。不一会儿，那中尉军官一个人走了出来，打开木门放那女人提着饭盒跨进了小院。

隔壁的房门打开了，女人提着饭盒走了进去。院子里的军人们也渐渐散去，只有那军官还立在隔壁的房门口。他的身后还围着几个好奇的年青人，他们想知道这一对患难夫妇何以会落到这个地步。

隔壁传来了一股劣质酒的气味，听他俩叨叨的细语，偶尔还夹着一声啼泣，我猜出他俩正对坐而饮！对坐而哭！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已过，女人才在那中尉军官的劝说下，收拾了饭盒怏怏离去，听到那高世清用混浊的声音在独自低吟："自送别，心难舍……凭诵袖拂扬花雪，溪又伴，山又遮，人去也……"

过了三天，高世清从隔壁放了出来，戴着那付脚镣被两名刑释人员带走。大约又过了十天，我的禁闭室，又关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姓张的就业人员。他一进来，我便询问他何以被关到这里面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想走。"

"上哪儿去？"

"去成都或重庆，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我知道，在中国刑满人员的社会地位同犯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毛泽东早在他的阶级成份论中，将一切敢于同他"作对"的势力，统统归结为地、富、反、坏、右、五大类。随着他建立的专制政权，这五大类还将继续扩大，一遇风吹草动，毛泽东心血来潮，五类份子便戴着帽子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挨打、批斗、游街，成为吓唬百姓而被杀的"鸡"。

"就业"和"服刑"其区别仅仅在前者是可以蓄发，选穿蓝色服装以外的衣服；后者光头，蓝服。前者每月廿元钱，自己花钱吃饭，后者用"集体伙食"。算下来前者去掉伙食以后剩余的部份，与后者的零花钱也差不多。

此外前者在允许条件下可以结婚、安家、探亲，后者则什么也没有。不过前者的工资如此低微拿什么去结婚安家？同时就业毫无择业自由，他们如果想自作主张，离开指定的劳动地点，便将受"逃跑"论处，抓回来与犯人"同罪"。

故而就业人员又称为"劳改释放犯"。官方简称为"劳动力"，这叫做："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共就是靠树立这么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才镇住了数亿百姓。

这一次，姓张的小伙子正好与高世清"同案"，他们不仅在一个菜蔬队服役，这次又组成了"逃跑集团"而被关压起来。进小监以后，金梅还来看过他，并送来了一本《红与黑》。

于是他便向我讲述有关高世清的故事——他原是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一名少校军乐指挥，因什么革掉官职和军衔，由成都军事法庭判处了他三年徒刑，在那个年代是说不清的。

他的妻子金梅，原属同他一个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高世清被判刑后送劳改队服刑。深深爱着他的金梅已有了孩子，便从部队文工团复原转业到了高世清所在劳改队，成了一名干

事。那门卫的小青年称她为金干事便由此而来，按中共党纪，金梅必须与高世清离婚，但遭到金梅拒绝。

高世清刑满释放后，金梅的公职也被革去，党藉被开除，成为中共的又一"叛逆"，金梅身份也从干部变为"劳改释放犯"家属。接着又生了一个孩子，从此以后，高世清便成了四口之家的户主。现在两个孩子大的才八岁，小的才四岁。单凭着他每个月仅四十元的工资，要供四张嘴吃饭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当年，就业人员一般是没有条件结婚安家的。

为了弥补家庭的不足，金梅包下了场部干部们的衣服，靠为人浣衣，起早贪黑艰难渡日。不料，就业人员中新近增加了几个家属，也在替人洗衣服，金梅所包的衣服便一天天减少，又禁止去其它地方谋生，一家人经常为子孩子而哭泣争吵。不得已，几次向场部提出困难补助均遭拒绝，理由是:"你的工资是就业人员最高的，有的干部也不过这点钱。"故而与场部屡次发生争执。

在邓扬光眼里金梅是下溅堕落的女人，是革命队伍中的异已份子。既然如此，也当自然的被当成了奴隶，划成五类之列。高世清这一家，就是连孩子在内全家人都饿死了，也是死不足惜。

面对着啼饥号寒的孩子，实在无法再忍下去的高世清和金梅只好打溜的主意，可是还没有跑成，计划便泄露了，高世清一家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连盐源的县城都不准去。

就在这种申请补助不给，请求他去不准，一家人靠那四十元一月的"劳改钱"，生活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十月一日前，他足足喝了一瓶用酒精兑成的白酒，带着醉意藉着酒劲，独自撞进了场部大楼，在通往场长办公室的路上，摇摇晃晃的碰上邓扬光。

邓扬光严厉地训斥他是装疯卖傻，无理取闹。此时高世清酒劲发作心烧如焚，将一腔蓄了不知有多久的怒火，向这位"邓大人"烧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人面兽心，骂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伙不把人当人看的豺狼，还扬言国庆期间全家断了炊，就要上他家去要饭吃，否则，就要和他拼命。

邓扬光见势不对，立即缩回办公大楼里叫来四名卫兵，将他痛打一顿，然后便将他押到了这里。

听到这姓张的年青人讲完高世清一家的这段故事，回想起十月一日前一天见到的情况，我不禁想到高世清和他的妻子金梅，算跟共产党当了几天啦啦队的人，一经被一脚踢开掉进监狱中。照样成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奴隶。

三天后，那姓张的就业人员便被叫了出去，那高世清被带走以后，也再没有回到小监来！小监里又重新剩下了我和陈力两人。

"国庆"过后，我便将我写的第一篇，从墙角的耗子洞里传给了陈力。他的语文底子比我好，传给他看，一方面互通着彼此的观点，一方面也含有请对方斧正的意思，两天后他将我

写的东西传还给了我，并付上了一张纸条。在我的原稿上留下了多处记号，要我自己改正错别字，并作文句上的修改。

字条上的大意写道："入狱多年所见所闻，使我们更加成熟。我相信独裁者最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作控诉的准备，等到天亮的时候向老百姓有一部原原本本毛泽东罪恶的记实，取名"狱中纪实"为好。

可惜，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幸免牢狱中密如梳篦的搜查，狱中所写的东西只好撕掉。

大约十月下旬一天，吃过早饭以后，给我们送报纸和"阅读资料"、纸笔的年轻干事，手里拿着两张套红印刷的人民日报，又一次来到了小监中，他把报纸拿给我以后传达邓扬光的指示，要我们看后写出心得体会交到管教科。

那报纸上印着红色字体的巨幅标题："原子弹爆炸在我国试验成功"。那一天报纸满篇是"全国人民热烈欢呼"，通篇的"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在这一天没有登载其它任何消息，中国可以饿死千万老百姓，而不能没有大规模杀人的原子弹。

我真不知道在饿殍遍野的中国，还有什么前途。

此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只能从自留地里巴望多收些蔬菜，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中共决策层中直到现在还在唱着人民公社万岁，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来一个政治运动，就连眼前这点吊命的慷菜也保不住了。

过了几天，邓扬光亲自来到小监问我，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看法和体会写好了没有？这一次我干脆拒绝了他，我告诉他，因为我无从下笔，所以没有写。心中想道，这么一篇东西，对这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狂，能起什么作用？我只能不写。

又过了几天，曾给我们送来报纸的那位年轻管教干事，拿了一卷纸，第四次来到小院，卫兵打开了两个小监房门，我俩被叫了出来，站在院坝里面对着他，看他满脸严肃打开那纸卷，原来是一张划着两处红勾的，西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布告：两名继续进行反革活动的"死顽分子"被处以枪决。

他笔挺地站在那里，好像在宣读圣旨，那时正逢中午，我们在风中足足站了半个小时，被风吹得全身冰凉，心中明白这是当局对我们的警告。

宣读完毕，他又发给了我们白纸，要我们写出两个月反省的小结，我最后仍决定"交白卷"。

风季已经到来，每到中午以后，呼啸的西北风掠过互背，令人心寒也心烦。尤其是监舍木门与地隔着两厘米宽的缝，掠地而起的干风一股股地从那里把院里的泥沙括了进来。

有一天趁送饭之际，我向开门的卫兵说这个难处，那卫兵倒顶和善，好像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当即找来了两件破军衣，要我用来塞在那缝中，这么做，风沙倒是钻不进来，就是屋里变得更黑了。

第五节 羊圈里的斗争

眼看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早晨，老叶送饭来时，我看到了对面那排房顶上已开始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霜。十一月中旬一个早上，卫兵打开房门后，吩咐我们吃过早饭将各自的行李捆好，听候转到另外的地方去。

上午九点多钟，陈力戴着几公斤重的铁镣，我提着两个人的行李包一前一后地走出了那小院的木门。站在石梯上，朝下望去，小溪的流水已经消失，那情景又恢复到我们刚到来时的样子，只是小溪水面上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冰。

出了场部大门，我们走上一条大约一米宽的田坎上，缓缓向着对面大约距离两百米远，一排在泥山脚下的平房走去。走完田坎尽头，我们才看到一条很宽的堰沟，横隔在那平房的前面。

此时那堰沟中已没有一滴水，由沙石冲积成的沟底非常坚硬，走过堰沟，是一排由四间屋子并列而成的平房，背后山的前面还有一段半截围墙，平房前面还有一个大约二十平米的土坝子，坝子里洒着许多羊粪疙瘩，留着羊蹄的脚印。

屋子里虽已打扫，但能闻出一股很浓的羊膻气，看来这是一个刚刚腾出来的羊圈。

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最左面两间屋的木门，我被指定搬进靠最左边上的那一间，陈力则搬进了我右边隔壁那间。屋角的一角已铺着一层厚厚的谷草，这里比仓库那小屋更大一点，靠门这边墙上留着一扇宽大的窗户，所以显得比那里宽敞、明亮，可以依凭那窗口，向外遥望面前那片刚走过来的场部蔬菜地，比那仓库的“小监”有了一片开阔视野，只是比原先那小屋更冷。

我打开了破棉垫子和破被盖，将我那口破皮箱安置在“床前”，上面放着邓扬光送来的报纸和纸。环顾了一下四周，泥墙上照样印着从瓦缝里射进来的小园光斑，只是它的位置与原来那黑屋子不同，我需要经过两天的识别，重新建立起计时的标准。宽大的屋子可以容我在这里转圈、跑步、活动身体。

第二天上午，门外人声喧闹，我从铺上站起来，隔着窗子向外望去，只见八名就业人员抬着一个巨大的绿色哨棚，从对面的场部沿那条我们走过来的田坎，喊着号子向我们这儿搬来。

哨棚到位后，安放在距我这间“监舍”右侧，大约五米远的前方的堰沟边上。从此以后，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由驻军派出专门看守我俩的士兵，就坐在那哨棚里站岗，煞似森严。

真的，我俩何德何能，值得场部为我们专派“守护”的卫兵？怕我们身上的瘟疫扩散感染他人？还是怕人心被我们所影响？此种装腔作势，岂不抬高了我俩的身价？可惜，这儿是羊圈而不是封闭的软禁“桶子间”。不过，我们并不计较，因为从甘洛开始，与牛羊共圈本是我们受到的待遇。

我们刚迁入这“羊圈反省室”一个月以后，一天上午八点左右，我正按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扒在窗口上作深呼吸运动，忽然看到就在我们走过来的田坎上，六、七个就业人员，正打

着一些破烂的橱柜之类的家具，朝着我们这里走来。相距大约三十米处，我已经辨认出，来的人竟是高世清和他的一家。金梅与他一前一后抬着一张大床，后面还跌跌撞撞的跟着两个端小木凳子的孩子。

真想不到我们小监，右面空着的那两间屋子，原是给这一家子准备的。天哪，这不真有点像中共自己的小说“红岩”里所描写的小萝卜头一家么？我正在思索着，那些搬家的人已经走到门前堰沟边上，经过哨棚时，高世清拿着一张纸交给了“哨兵”。然后六个就业人员，七手八脚的把那些破家具，搬进了还空着的那两间“羊圈”里，我们还真成了“邻居”。

（一）可怜的孩子

高世清在那一次大闹场部受到什么处罚？他的脚镣是什么时候下的，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但是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这一家人全家都搬到了“禁闭室”“虎穴”中，与我们随时可能处以极刑的人搬到了一起，那肯定是被当局认定是“全家犯法”的就业人员尖子了。

十月一日前的那天下午，金梅来禁闭室探望她的丈夫时，因为天色已晚，我在门缝中并没有看清她的面容，现在终于看明白了，这是一个年龄已过四十，身材矮小的女人，满布皱纹的脸上和点点雀斑，已经刻下了她所遭遇的不幸和多年累积的幸劳，人长得并不漂亮。

自从她们全家搬来后，我便天天看到她，每天下午都从场部那边背回一背沉甸甸洗干净了的衣服，晾在她刚刚架在门前两排晾衣绳上，等到一下午的太阳和风将这些衣服吹干以后，她才收好折好，又装进背兜，在傍晚的余辉中将那些衣服又背过田坎，送到对面场部去。

每当看着她那负重的矮小背影的那一刻，我绝不敢同国庆节那天下午，面对邓扬光那翻语出惊人的金干事联系在一起，尤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女郎。

对邓扬光来说，是为了怕他们像瘟疫般影响驯顺的农场就业奴隶们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不过大人姑且该受“反省”，但两个幼小的孩子又招惹上了谁呢？

从那天以后，每天我都能从窗子的铁栏后，看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坐在河边的泥土堆上晒太阳。大女孩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兰花旧棉袄，上面打满了花花绿绿的补丁，而小男孩穿的是一件又长又大的红棉袄，也许是他的姐姐穿过的，上面的补丁几乎将那原先的底色遮盖完了。那脚上穿的却是补了又补的破布鞋，他的脚趾头还露在外面，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得通红。

看来那金梅为了两个孩子不受冻，也不知在灯下一针一线补孩子们的衣服和鞋，熬过多少夜。

以后每到太阳将坝子里积下的霜溶化后，我就看到小男孩跟在大女孩的后面，从屋里走出来，在他们每天选定的地方坐下来晒太阳取暖。

那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岁，而那男孩大约只有六岁，两个菜色的小脸上看不到一丝正常孩子应有的红润，缩着那冻得像红萝卜头的手指揣在怀中，呆呆地望着他们面前的羊圈，不时还向那岗哨，以及那转悠的哨兵投去困惑而有些害怕的眼光，真像一对没有长大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婆。

每当早上，老叶提着竹篮给我们送饭，两个孩子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竹篮，当老叶从篮子里取出盛着饭的盅子和菜碗递给我们时，那两双灰色的眼睛就会随着我们接在手里的饭菜紧盯不舍。

看着两个孩子的样子，令我感到心碎。有几次，我情不自禁地从铁窗里伸出手来招呼他们，他们却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并不理我。

直到有一次老叶送来馒头稀饭，我拿着馒头向他们伸手递过去，那小男孩便从土墩上站起来，歪歪倒倒的向我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接过馒头，便怯生生的跑了回去，坐在他的姐姐身边。

两个孩子分食那个馒头的镜头至今还保存在我脑子里。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该是有孩子的人了，如果我身陷在高世清的境地，看到我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穷而落到这般地步，我又怎么想呢？

（二）寒月悲歌

盐源的十二月，白天每天都是万里晴空，但是一到中午以后，那飞沙走石的西北风，就把太阳带给这儿一上午的温暖全部卷走，一入夜晚，寒气逼人。

在皓月当空，夜明星稀的晚上，明月撒下那股沁人心脾的美景，却因荒郊野岭让人感到格外冷，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吟颂苏武牧羊，或正气歌，然而今天晚上，就在这明月摧人暇想之夜，羊圈的那一头，传来了一曲幽扬凄惋的小提琴声，那是高世清在拉琴。

我早就闻听那高世清在战旗文工团，担任乐队指挥之前就是该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此时那琴弦中溢出来的分明是一曲黄水谣，不过，面对着这冰冷的月光下，那哀怨的琴声里，舒发出来的却是他流放他乡的哀怨，是对他遭遇的绵绵恨意，和他对这个囚禁他地狱的控诉。

我和陈力都从自己的草窝里爬起来，倚靠在那铁栏下，沐浴着那寒月透进来的银光，静静地用心和着他的琴声低低吟唱着："流浪……流浪……"，眼前好像又出现了我们这一群从重庆到甘洛；又从甘洛到黄联关；从黄联关到盐源，提着破烂的行囊疲惫不堪，被枪押着踉踉跄跄的人群。

心潮被琴声拔得乱乱的，想喊，想引亢高歌，可歌从何来？

中华民族在异族蹂躏下，多少同胞背井离乡，出生入死才拼出了一个抗日胜利的和平环境，没想到炮火连天的内战，搅乱了老百姓修养生息的梦，中华民族到了我们这一代，怎么就生出这媚外的国贼对内逞强的枭雄？

一百年在颠沛流离中做恶梦，而今又遭受枭雄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新灾乱，我们这一群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挣扎在这荒山野岭中新一群的流浪者？甚至于比流浪者更不如的奴隶群么？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想着想着，我的泪水流下了腮边，这正是："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林则徐当年禁烟被贬，作歌一曲

谓："送我凉州浃日程，自驱薄笨短辕轻。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吟似《北征》，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在昏庸的满清末朝，他自觉无力抗衡群丑，而今我辈，就简直像菜板上的肉被人任意的宰割。

有时候想到绝处，痛感生不如死，然而黄遵宪有诗云："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好一个留付松阴后辈看，我们这些被暴政流放到这里来的政治犯，无国可报，无君可忠，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段抵制独裁暴政的斗争，如实写下来，能"留付松阴后辈看"，就是我们平生最大的告慰了。

我正挥泪沉思，突然一声轻脆明亮的女高音，划破那个被琴声撩破的悲凉夜幕，听那歌声悠扬圆润，那嗓音的功力，远非三年五载可以练成。现在可是在用她的心在唱，用血在泣诉，用自己悲惨的遭遇，唤醒那些在这夜中正酣睡的人们，那歌声让我立刻想到她背衣服，不，是背一背重有千斤的生活重枷啊？

此时此刻，我彷佛看到那弱小的身躯，牵着她两个可怜的孩子，正翻过那泥泞的小河翻进了小金河，翻进了长江……

那歌声像声声啼血的夜鸟向人展示破碎不堪的巢！那歌中浸进了她心里滴出的血，使听者不得不正视她的苦难，正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无人倾诉的悲伤。

琴声和歌声，把这荒凉羊圈的夜搅得膨湃起来，岗哨里的士兵停下了他那踢踏作响的脚步声，在月光下注足聆听，周围的荒野断垣立着耳朵，风也凝滞没有响声，好像不愿打乱这寒夜歌声带给周围的共鸣。

我听见隔壁隐隐传来了抽泣声，我也抑制不住自己，把大滴的泪珠洒落在窗檐下的泥墙上，大声朗读秋瑾的《满江红》："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未路当磨折"。这才是我内心的回音，一直到很晚，天上开始下霜以后。

我真想这琴声和歌声穿过那面前的空坝，传到对面的监舍里，使更多的心灵为之共振。它可以融化这高墙深狱中的杀机！可惜今夜在这里的听者，除了我和陈力便只有哨兵。可是，我恰恰没有估计到，羊圈里的音乐竟传到了三百米外的场部去了。

没几天，邓扬光带着一名军官两名士兵，向我们这里赶来，他们在哨棚里向值班的卫兵不知吩咐什么以后，那戴着大尉军衔的军官，走到我和陈力的窗前，带着警告的语气说，隔壁住着的高世清和金梅一家人非常反动，你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而扰乱了你们的反省。

我和陈力听后哈哈大笑，使那个神气活现的军官顿时陷入了尴尬，停了一会儿彷佛才回过神来，带着怒意训道："你们笑什么"？

我解释道："我们又不是普通人受什么他人影响？你们已把我们俩当成了最富有传染力的病菌，而把我们与大监的犯人相隔离，还加上特别的警卫人员替我们站岗，我们招惹谁啦，值得你们如此特别的关照，而隔壁的邻居，是还保持着公民权的就业人员，说影响恐怕洽洽相反

才对。”

陈力在隔壁也应和着，“我们同你们的卫兵相处得虽说一般，可从来没看到谁影响谁，平时你们纪律很严，我们可没有跟任何人讲话，隔壁关的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谁都是和平共处的。”说完他大笑起来，弄得那位大尉反而很难堪。

四个人重新回到了哨棚，也不知道商量了什么，便悻悻的离去了。老邓的来访恰恰好证明：“就业人员”在他们这些牢头们眼里，永远都没有获得“新生”的那一天。因为关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群被压迫的奴隶若要说影响，受得最深的，恐怕是对那些站岗的年轻士兵们。他们从农家或工人家里走到这里来，本身还很单纯，难道他们对被弄得穷困潦倒的中国一点不反感？几曲琴声几首歌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就是那邓科长也会心惊肉跳，化解他的成见触动他的人性？现在他跑到这里来替谁发警告呢？

君不闻当年韩信，月下一曲楚箫就瓦解了项羽十万江东雄兵么？难道这动人心弦的歌声不等于告诉人们，他们平时在广播喇叭之中，所无法听到的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伤心事么？

（三）学生兵

这一天，我正坐在草窝里，合掌闭目，凝神打坐。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功课。一来为了练练气功，舒一下一夜的浊气， 二来是养成安静思考的习惯。突然听见，铁栅窗上传来一声问话：“年轻人，做什么呢？”

我微微睁开眼睛抬头望去，觉得脸挺熟的，脑子里细细寻思，猛然想起来，那不是曾在对面仓库里的反省室里，给我找来破衣服塞门隙的那一个学生兵吗？在仓库那边，墙上没有现在这样“敞开”的窗，很难找到彼此说话的机会，现在谁当班，谁都可以走到窗前来同我们攀谈。

我斜看了他一下，看他满面孩子气的脸上并无敌意，年纪大约才二十出头，怎么反而称我为“年轻人”？我没有理他，然而他却并没有生气，他的上司，或邓扬光曾向他们打过招呼，所以对我的冷谈并不感到意外，见我仍闭目禅坐，便在门口坝子里转了两圈又回到了我的窗下，开口喊道，“喂，想出来活动一下身体么？”声音里仍带着友善。

“想又怎么样？你敢放我们出来晒太阳么？”陈力在隔壁发话了，话中带刺。

“好的，你们出来吧，这屋子里怪霉气的，出来晒晒太阳，透透风有利于身体健康。”我们平时被这些卫兵们打惯了骂惯了，我们的敌意是自然形成的。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抱着良知是可以被启发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即便是对刽子手，原来被蒙蔽的良知是可以经过启发而改变的。更何况这些涉事很浅的年轻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边说边从哨棚中取来了开门的钥匙，打开了我们的房门，一边还说：“如果你们的被子受了潮，那么趁这个机会拿到坝子里见见太阳也好。”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钥匙退到哨棚里去了。

我和陈力缓缓地走出门口，迎着久违的太阳，眼前有些发黑，一边揉着眼睛，定好神后，

选中了一段断墙的两块墙脚石，并排坐在那上面。

那时，还没有起风，高原的冬天，万里无云，在柔和的阳光下，我感到温暖而舒适，回过头去看房子的那一头，金梅家的两个大人已经为忙生活而去场部了。两个孩子还没出来，整个羊圈周围只有我们三个人。

年青人放下钥匙从岗棚里出来，走到我们面前，选了一块石头，面对着我们坐了下来。他先问了我们俩是什么“犯罪”？我们说自己是右派，升级进监来的。他也毫不介意的介绍了自己，他说：“我姓钟，入伍之前是成都的一名中学生。”

他向我们介绍说：“我们那个学校有几个老师也是右派份子，他们是全校教得最好的老师，就是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接着他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还记得他老是担心，“三年自然灾害”今后还会不会再发生？为什么苏联这么快就同我们国家翻脸了？还要向我们逼债？原子弹在我国都已经发射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周边的小国家还要反华？

看来这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从这些问题中知道，他并不相信他的部队和上司灌输给他的东西。

中共宣传机器，每天放发出假话连篇的宣传品，对不动脑筋的人才会起麻醉作用，只要稍肯动脑筋，想一想看到的事实与宣传牛头不对马嘴，便明白了。当然也有死心踏地干蠢事的，那也只能是一部份人。

于是我们俩滔滔不绝的讲大饥荒，讲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我们亲身的经历讲自然灾害纯粹是胡乱指挥的结果。讲原子弹在我国这么贫弱的条件下，不但老百姓不欢迎，就连苏联也不支持。

可惜我们当时同全国百姓一样，被闭目塞听所苦，讲不出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台湾的发展情况，未免在讲大陆的落后时缺乏对比和说服力。

他听得津津有味，当我们痛斥毛泽东的罪恶时他居然没有反对，取了默认的态度，把头转向场部方向，深深的陷入思考之中，两个小时的晒太阳在我们的探讨中很快过去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西北风呼呼的吹起来，也不知道金梅的两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坐在隔我们大约五十公尺之外盯着我们。

当送饭的老叶熟悉的身影，稳稳从对面的田坎上向我们走过来时，跟在他后面是换班的岗哨，我们才站起身来，各自回到自己的监舍中，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把坐在对面的两个孩子叫了过来，把给我们送来的饭菜匀了一些给他们，特别是那小男孩，当我抚摸着他的小脑瓜时，我才看到他很久没有剃过头了，我喃喃的说：“可怜的孩子。”

从那以后，凡是这个小伙子值班时，我们就会被放出来放风，甚至于我们还品赏他从食堂带来的烤馒头和烤山芋，在我们坦诚的交谈中，看得出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他已经把我们当作了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在中共制造人为仇视而禁锁的中国大地上，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歌声和交流变得友好相处，羊圈反省室里发生的一切证明，“人性”并没有被阶级斗争的毒液所闷死，金梅同卫兵们处得非常的融洽，有时她还专门提前背回洗好的衣服，为这些小伙子唱他们喜欢听的歌，而这些士兵们也常常给两个孩子带些馒头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

羊圈里发生的这一切立刻引起了邓扬光的警惕，并且很快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几天后在邓扬光亲自督促下，金梅一家被迁出羊圈。临走那一天，因为受到严密的监视，彼此都没有表达惜别的机会，唯独那六岁的小男孩在走上通向场部那条田坎时，还不断的回头向着我们俩的窗口张望。

彷佛他在想，这短短二十多天来那关在黑屋子里的叔叔是谁，那情景兴许已刻在他稚嫩大脑中一辈子也忘不了。托苍天安排，这短短的日子里，缘份已将他们哀怨琴声和歌声，深深凝在这孤屋断墙中，也牢牢地扎进了我们的心里。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红岂终极。”高世清和金梅一家是我蹲小监第一次碰到的就业人员一家，原来常听说刑满以后，与犯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却没有接触和体验过。听那曾同我关在一起的张姓就业人员讲，那金梅原是农场里的一个小干事，就因执意不与高世清离婚，便招来了同我们为伍的下场，连孩子也不放过。

而孩子们可知，如果这个残暴的世道不变，即使他们长大了，也会因父母亲的“成份”而受累终生。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共内部分裂的内在原因之一，在这个不讲信义不讲忠孝的政党里，所有的成员不都是面合心离的？

1965 年初，当金梅的一家刚从羊圈迁出后，没过几天，门前的岗哨上也另换了一帮人马，那位姓钟的学生兵也从此再没有见过他，开始我和陈力还没有介意卫兵换了人，照例进行我们每天都已相沿成习的作息：早上起来练练功，然后是看报、写作，就是入夜以后羊圈里一片死寂，不但再听不见琴声和歌声就连说话声也少了。

（四）三星阉匠

自从卫兵换防以后，新来的人是些年纪较大的士兵，不像以前让我们出来放风，我们每次说话都要遭到他们的训斥！同我们过去接触的老管一样，个个板着脸，两个眼睛随时都流露出敌意。

换防后的第三天，我正按照往常的习惯，隔着墙大声问陈力一句成语的典故时，一名佩戴上士军衔的中年人，幽幽出现在我的窗前，那人满脸横肉，一双眯逢的细眼，嵌在胖胖的面庞上，下巴还长着一颗令人很讨厌的黑痣，当他的目光碰到我的眼睛后，便用安岳土话嚷道：“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关在小监里还敢隔着墙说话，想找死哇！”他那小眼里露着凶光，胖脸上显得十分轻蔑。

经验告诉我，对这样的人初次见面决不可示软，否则今后他会不断得寸进尺找麻烦，迟疑了一会儿，隔壁的陈力已经发了话，他说：“人长着嘴本来就是吃饭说话两件事，我们可不像你长着嘴只晓得捅饭。”

那卫兵立刻走到他的窗子面前骂道："什么野物，敢在老子面前撒野！你这个龟儿子，你这个王七加一蛋竟敢跟老子顶嘴！"安岳土话夹着很重的卷舌音，使他原本的凶像很疯狂，我立即站起身来拖着他的把子向他对答道："喂，嘴巴放干净一点，你跟谁充老子呢？我们可没得罪你，你凭什么骂人？"但是他毫不示弱，使出一付泼妇骂街的本事骂道：

"我看你这龟儿子，妈生你就变孬种。人还没有变全还跟老子伴嘴。"看来这人是个农村骂架的好手，一面骂一面又朝我的窗下走过来。

"我看你长得够肥的，要过年了吧，够秤了！"陈力在隔壁同他对骂，对于这样的人除了挖苦奚落，没有其它的语言同他对话。

"混蛋，你敢洗刷老子，你不认认老子是谁？"脑羞成怒已使他说走了嘴。他向陈力亮着他肩章上的三颗五角星，其实我们早已看清了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班长。论年纪来讲，只有戴着他的三颗泡泡守到退役了。

三颗泡泡在安岳的穷山沟里够威风，可以吓唬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我看到了，你领子上不就别着三颗泡泡的领章么？三星阉匠！怎么样，好不好你还是一阉匠，回农村还可以替人阉猪儿，找顿饭吃也不枉在部队里混那么多年。"陈力在隔壁狠狠挖苦着他。

"对了，三星阉匠。"我跟着确认道。

"你这小子敢再说一遍，你他妈的臭鸡蛋撞石头，撞破了不如一泡屎。"他气急败坏，语无伦次，骂不绝口。

为了挑逗这个家伙，我从铺上站起身来，隔着窗栏一字一板的大声嘲骂道："你那颈圈上三个泡泡，该挨刀了。"陈力在隔壁哈哈大笑。

肉脸气得直跳脚，但因为没有找到开房门的钥匙，只好用手里自动步枪的枪托，朝着我监舍的木门狠狠的砸了几下，用拳头在我的窗口直幌。我们对他这种令人发笑的歇斯底里又回以笑声。

讨了如此的没趣，上士喘着气回哨岗里去了。我们可并没有把这场对骂记在心上，而是把它当作彼此间为了争各自面子的一场游戏，也是为了保住我们所争来的自由权利对粗暴干涉者的回敬。

对于无知的暴徒，你越软弱，他就越要欺负你，这是我们同这些人相处中，摸索到对方的脾气。

不过，我们还真没想到如此一翻对骂，竟被这位心胸狭隘的安岳乡巴佬，当成了一场必欲报复的奇耻大辱。过了几天，他不知从哪里端了两盆锯木面来，用一些纸引燃几分钟后，便沃成了一盆滚滚的浓烟。就在那燃着烟火的锯木面上面，撒上了两包"药粉"，并用扇子去煽那锯木面喷出的滚滚浓烟。等到形成了黄白色的烟雾后，便将我和陈力的门口一处放了一盆，再用扇子将那滚滚黄烟从门缝里煽进来。

一股六六六粉浓烟迅速弥漫了小屋，这残忍而愚蠢的家伙，竟来了这么一出"毒气"战，

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屋里没水，也没任何可以用来从门缝里泼出去扑熄两盆毒烟的泥沙。浓烈的六六六毒烟呛得我直咳嗽。看来这蠢猪是想把我们毒死在里面！我们开始大声的怒斥："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放毒气了！"

法西斯用毒气弹去残杀妇女儿童，都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两个被关在禁闭室里的"囚犯"。这手他是不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我们的怒吼丝毫没有阻止住他那双罪恶的手，相反他反倒越煽越起劲。在他发狂的挥着扇子时，屋子里的毒烟越来越浓。

我们只好向对面的场部方向大声呼救："杀人啦！杀人啦！法西斯杀人拉！"我们的喊声和滚滚浓烟，首先惊动了正在那田坎两侧劳动的就业人员，没到五分钟，场部的那面，一位戴上尉肩章的军官从田坎上跑步而来。三星阉将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慌慌张张把两个盆子端到断墙外用泥沙盖住。

当他们的上司匆匆赶到时，两间屋子里呛人的六六六粉浓烟开始向窗外散出，毒气盆已经熄灭"不见了"。上尉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的下级此时正垂着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边咳边向他诉说刚才发生的事一声没吭。"六六六的盆子哪里去了？"上尉朝他喊道。

他迟疑的走到断墙外，把藏在哪里的两个盆子端了出来，依然地木然垂着头站在一旁，不时用眼睛去看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上司。

也许他压根都没有想到他刚才所干蠢事的后果。只挖空心思，想用这种办法来制裁伤了他自尊心的两名囚犯，并以此炫耀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革命性，没想到几天前我们那场对骂，以这么一种结果收场！

呜呼！中国人之愚昧可恨，可见一般。这么一个普通的士兵脱下军装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竟埋藏着以残杀自己同胞为乐趣的劣根。这种劣根，我们已经在所经历的大大小小斗争会上体验过好多次了。

正是中国人由于愚昧而相互残杀的劣根性，才使毛泽东可以轻易加以利用，并煽起大规模内战的民族潜因了。然而，这个逞强逞能的上士，此时在他上司面前已威风扫地，呆呆站在那里，活象条夹尾巴狗。

从此以后三星上士便消失了，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

（五）粪泼岗哨

在三星上士，从我们的窗前消失了一周以后，一个满脸雀斑的中士替代原来的上士，在岗哨中充当"头"的角色。从交接班时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他是场部驻军的伙食班班长，有一口很纯的自贡口音。也许他的上司在他来之前，曾因他的前任事件向他作过交代，这位看上去同样自负的人在上班时，一直用铁青的脸色保持与我们的距离，从来不在我们窗下逗留，也不同我们说一句话。

这样也好，虽不象金梅一家还在时，那一段老管们与我们融洽相处的日子，但能保持河

水不犯井水，也落得安静些，我们可有我们的事要干。

那时间，场部为驻军所需的蔬菜，专门在场部蔬菜地的旁边，划了一片菜地给他们，还把田坎旁的一个粪坑划归他们使用，这位中士原来可能是个菜农，他来后，便在原来金梅住家的那一头放了一挑粪桶，规定送饭的老叶，我们屋里的屎尿不准随意乱倒，在每晚送饭时必须倒进他准备好的粪桶里。

在他来之前，我们平时的屎尿全倒在那断墙旁边，不知由谁种的核桃树下。经过一个冬天浇灌，过了春节后，那两棵一人高的树上已长出绿叶。

门前堰沟两边去年插下的柳枝也吐出了嫩绿的芽，下过两场春雨后，风渐渐减弱，天气渐渐开始暖和。

我们对中士兴出来的规矩倒也没有什么非议，种菜需肥这可以理解。只是因为陈力戴着脚镣行走不便，现在每天倒尿的桶比原来远得多，两个房间倒尿桶的工作便由我一人承担我也乐意，反正每天我也找着机会活动身体，藉此透透空气放放风，何乐而不为。

只是偶尔不慎倒洒在地上时，被那中士看到便会板着脸骂我"寄生虫"，使我颇为反感，但我没有同他计较。三五天以后，积粪的桶便装得满满的，开始他安排了一个刚刚入伍的士兵，将那挑粪水挑到两百米外的自留粪坑中倒掉，再把腾空的桶送回原处。

自从羊圈这面，士兵与我们之间，产生了先前那姓钟的学生兵与我们交往的事情后，趁着驻军换防机会，邓扬光收回了我们禁闭室由卫兵保管的钥匙，把它交给了送饭的炊事员老叶。

所以平时，这些士兵是进不了我们门的。那三星上士本欲破门而进，将我两痛打一顿，皆因进不了门而想出用毒气惩罚我们的主意。

现在这位雀斑打着利用我们两个劳动力的主意，也因没有钥匙而未能如愿，有一天下午五点钟，老叶就已送来了晚饭，当房门打开以后，那雀斑从老叶的手里将钥匙要了过去，老叶不敢违抗，只是向他关照说："管教科交代过，任何人要小监的钥匙，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允许。"那中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我会跟你们的邓科长说的。"

当我们吃完饭以后，中士不但没有锁上房门，还把我们俩叫了出来，指着那墙头已经装得满满的粪桶，命令我俩抬到对面的粪坑里去。我倒不要紧，可戴着十斤重镣的陈力就难了，我俩都已经整整半年多没有劳动，脚也是虚幌的，抬着这么满满一桶粪水，加上那粪桶上所系的是一股单调的棕绳，抬起来桶在中央晃动，使我俩一前一后无法同步。

还没有抬出 10 公尺，那桶里好像有两条大鱼在翻腾，溅出的粪水幌了我们一身。尤其是陈力，越抬越觉不对劲，将那桶粪水抬到距哨棚大约五米的地方，停下脚叫放下扁担，站在那里不走了。

那雀斑把脸一抹，眼里射出凶光，口里一迭声的叫骂道："狗日的劳改犯人，吃了睡，睡了吃，不劳动，老子今天就要强迫你抬！"说着，他手里端的自动步枪枪尖刺着我的腰部，陈力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吼道："我没有义务替你劳动，你要我劳动叫人把我的脚镣下了，不然我

怎么抬？”雀斑又将脸转向陈力，刺刀尖挑着他肩头。“今天老子要你抬，否则老子要你吃枪子！”说着，果然的往枪膛处上了弹夹，枪口对着陈力，眼看又要发生一场意想外的冲突了。

我同陈力交换了一下眼色，慢腾腾地将那一桶屎尿抬了起来，陈力将他的脚镣，猛烈的拉动，打在岗棚前的石板上哗哗作响。雀斑以为他逞威得势，发出一阵胜利的吆喝：“走！”

刚刚抬到哨棚边敞开棚门的前方，突然间，陈力身子一侧，一个踉跄整个身体带着那桶绳，向那岗棚门口倒去。我顺着这势头，也朝那方向倒去。一刹那，那桶粪水藉着我俩的合力，不偏不倚的全部泼进了哨棚中，把棚中的坐椅，防寒大衣，彻底浇洗了一个透！棚里一片恶臭。

这出其不意的行动使雀斑惊呆了，五秒钟后，他才回过神来，尖叫着，跳到附近的那片菜地里，捡起墙角下盆子大的土胚，向我的头上猛砸，我的头上一热，感到已被土胚打中的地方血流了出来。于是把身子缩成一团，一边大声喊着：“打！你打，我跟你拼了。”一边打着滚，往他站的地方滚去。

雀斑被这种与之拼命的动作惊呆了，迅速的捡起从肩上滑下来的自动步枪，朝着天上扣动了扳机，一梭五发子弹凌空而起。一面又飞速地从断墙角跳开，躲避我滚扑而来的身体。

我顺势坐起身来，指着他痛骂不已，陈力却在那岗哨旁哈哈大笑，这时雀斑已站出与我们十米远处，手里的自动步枪对准着我们，一面在抖沾在他衣服上的大粪。一面又不时回头向场部的方向张望。看得出，他正准备谁来收拾这狼狈不堪的现场。

清脆的枪声立刻惊动了二百米外的场部营房。邓扬光和一位上尉，一名士兵正急匆匆地从田坎上向这边走来。

大约一分钟以后三个人赶到，一身是泥的我，头上流着血还坐在地上呻唤，陈力叉着腰在那儿朝着雀斑冷笑，雀斑此时当初的威风顿然消失，从岗哨棚中溢出来的尿水还在不断地流，那片被粪水污染的地方泛出一股股奇臭。上尉见到此情景捂着鼻子，哭笑不得。他的部下连连发生如此荒唐事，令他十分难堪。

邓扬光皱着眉头，悄悄地问那雀斑：“钥匙你怎么拿到手的？”

我站起身来，膝盖刚才在地上翻滚时擦破了皮。脸上除了被那土胚击中，耳边擦出血留着伤痕外，身上其它地方还没有伤着。一面拍打满身的泥土，狠狠地向那雀斑瞪了一眼，便慢腾腾地走回我那监舍去。

四个人在窗外说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话，隐隐的听得出，争执得很凶。只听见那邓扬光压着嗓子喊到：“幸好还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否则这责任谁负得起？”当换岗的士兵来到时，四个人才慢慢地离开那里，那雀斑跟在最后，低着头。

不一会，四个人的身影便消失在田坎上的夜幕之中，场部那个方向传来了电影话筒里放出的音乐声，电影也开映了。

一场激烈的风波，总算平息了，从此以后，那雀斑也从羊圈的岗哨中消失了，我们每天的粪便，依归倒在那两棵核桃树下。

（六）挨打

雨季刚刚来临的一个下午，天刮着大风，乌云满布，天色也越来越黑，看样子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此时当天值班的一个身材很矮的中士，像幽灵般的站在陈力窗下。

陈力正聚精会神地匍匐在铺上，将刚刚捕捉到的一点灵感写在纸上，所以根本没注意到那窗下还扒着一个人。那扒在铁窗下的中士大概因为天色太暗，并没有看清陈力在干什么，眯着眼看了老半天，于是将手中步枪的刺刀在窗条上碰得乒乓作响，大声向里面命令道：

“写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陈力突然被这大声喝令声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十分恼恨这家伙无原无故打断了他的思维，回答道：“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把我所写的东西拿给你看。”

中士被他的这句轻慢的回答振怒了：“我要你拿出来，你就得拿出来，不然我要你吃枪子！”他怒吼道，这种拒绝是习惯于欺压囚犯的人绝对无法接受的，陈力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闭目静待，也不答腔，好像窗外并没有人站在那里。

对他的这种藐视，中士的脸气得铁青，一只手握着枪柄，将那枪膛里的弹匣子弄得啪啪作响，但最终还是不敢发作，狞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十分钟以后，老叶一手拿着一把雨伞，一手提着饭篮子，匆匆的送饭来了。

陈力那屋子的小门打开了，当陈力从老叶手里刚刚接过饭盅，还没等老叶返身出来，那矮子已经闪身而入，用他的步枪刺刀顶着陈力的背，连推带搡地将他逼到羊圈前的断墙土堆上，并从岗棚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棕绳。

捆人是这些枪杆子惩罚不驯者的常用刑罚，我们对换防以来这批军人的反抗态度，积下怨恨，对方随时都想找岔子寻机报复。

他把陈力叫到坝子里，开始用绳子抽打陈力，陈力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老叶见状，立即收起了空篮，提着雨伞匆匆离去了。而我正扒在窗口上，心里为陈力担心，灰暗的天空开始打下豆粒般的雨点，溅在那十斤重的铁镣上铮铮作响。

中士将绳子套在陈力的肩上，我见此景按耐不住大声吼道：“老管要杀人啦，老管要杀人啦！”中士也许没有想到，与此无关的我会如此的声援，加上倾盆的大雨已经如瀑布般狂泻下来，便放开了陈力，转身一个剪步，射进我的房子里，做了一个快速的擒拿动作，将我掀翻在地。

接着他那双拳头向我的胸部腰部雨点般落下，我立即将身体缩成一团，任随他拳脚相加。足足挨了五分钟的打，腰已经不能动弹，那矮子好象已经打累了，喘着气，放开我，走出屋去。

陈力并没有走开，他仍站在雨坝中，全力的扯着嗓子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虽然这吼声在澎湃的大雨中被湮灭得模糊不清，那矮子却从哨棚里将雨衣披好，准备再次向陈力动手。

忽然黑糊糊的田坎上茫茫的雨雾中，向这儿射过来两束雪亮的电筒光，隐约听得清楚杂

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邓扬光和老管的上尉指导员出现了，中士停了手，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是腰杆直不起来，嘴里觉得一股股血腥臭，头上已经打起了几处青包。等到小监的门上了锁，窗外渐渐没了人声，我才用破棉絮擦干自己身上的泥污，挣扎着爬回自己的草窝。

这一次我受伤不轻，第二天送饭的老叶，还为我带来场部蔬菜组的就业卫生员为我作了检查，包扎了伤口。还好，腰部只是比较严重的扭伤，我躺在床上一连五天，头上的青包慢慢的消退了，腰杆也能曲伸，直到至今，每遇天气变化都还常常发作，一场暴打又象暴风雨般的过去了。

在反省室里，日常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站岗的哨兵，这些文化层次极低，受过特种的训练，在大监里养成了对一般犯人呼来喝去，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已成习惯，我们对他们坚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态度，在不断的较量中，使他们原先的盛气凌人的架子得以收敛。我们难免要挨打，但依仗着这点斗争，保护了我们人格的尊严，争来了较为宽松的生活权利。

我们可以在监舍中跑步，练气功，隔着墙壁和陈力大声交谈，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甚至于隔着墙唱歌猜迷语，遇到像自贡中士和岳池上士的无理之徒，让他们尝尽被奚落的滋味。几次冲突后，他们自认为对我们这两个人多管闲事，除了自讨没趣，什么也不会得到。

我们在羊圈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生活秩序，影响到我今后一生，使我们懂得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靠自己用斗争来换得，当然，这要符合社会公理，一个人只有始终代表着正义，那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后来，当我们出了禁闭室到了大监里，才听说，我俩在小监里的这段生活，竟在流放者中广为传播，甚至传得非常离奇，有人说，我们在小监中与老管们对打，老管们用枪打我们，反而子弹弹了回去，使打人的人还受了伤住进了西昌医院。还说我们俩是国外派来的间谍，有人看见小监里经常有女人出入，便是共产党用美人计来掏我们的口供，等等。

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在小监里整整一年半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同狱吏们抗争，我们这些平凡的故事，没有任何传奇之处，我们能在特种监视下，有歌声，有说笑，有练功打坐，给我们吃干部伙食等等，既有当局的政治目的，也许还有中共内部矛盾在起作用，当年全国大灾荒的严重后果，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中共上层的分裂，已日益显露。

苍天保佑着我们，其中我们凭着人性，道义和良知这些人类永恒的力量，使我们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很难说清 1964 年，农场的当权者，把我和陈力关在这里，与普通流放者完全隔离反省的真实用意。

既然中共已经分裂，毛泽东的阴谋受到很大“竭制”，我们也在 1965 年 9 月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反省，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究，悄然从小监里放了出来。

后来听说，当时在我们进小监时，农场管教科上报过我们的“死刑”材料，然而农场的第一把手在批示这个材料时，却说：“这两个人还年轻，又是知识分子，本质上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根据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为主的政策，仍应坚持对他们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以达到使

他们回心转意重新做人的目的。”

放我们出小监的那一天，下掉了陈力脚上的脚镣。在干部伙食的催养下加上我平时条理性很强的生活规律，我的体重增加到 70 公斤，这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迫害也罢、保护也罢，对个人并不重要。

第六节 第二次绝食

1965 年 9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收拾好自己的破烂行李，跟着邓扬光搬到了紧靠着场部的基建三中队。这是一个刚刚新建的，以关押青年刑事犯为主体的中队，设有机械组和基建组两大组，集中了具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

基建组有从事制造砖瓦的、有从事建设房屋的、有从事木工的，机械组主要是拖拉机耕作、保养、维修，我们所住的羊圈从此空着，一年以后，在这一面山坡上建立的农六队，又将这里当成了真正的羊圈。

就在到基三队来之前，邓扬光一副严肃的面孔向我们宣布说："经过你们一年多的反省，你们应当体会到政府对你们施行的人道主义教育：反省期间给你们毛主席著作；给你们报纸看；让你们了解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想来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反动观点有所认识。现在我们又把你们放回大监，给你们重新在劳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机会，希望你们珍惜这个机会，重新做起。现在，你们应当对这一年多反省作一个小小的自我总结，将你们通过反省的收获写出来，特别要重点批判修正主义观点。"

我和陈力听到这翻话只是相对一笑，倒是怀疑这位貌似正统，外表严肃的监狱管教头，将我们写的那么多"材料"弄到哪里去了？我们可没有共产党作风，专以装糊涂胡弄人为能事，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在小监中，我们所写的与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难道还不明白吗？

当然在这黑白颠倒的年代，欺骗己成普遍原则，我们俩只好用沉默不答来回答这位管教。他明明知道我们不会写什么"反省"，又拿什么来胡弄他的上司？

基建三中队当时的编制一共 160 人，我同陈力分别编在两个作业组中，因为已经有一年没有劳动，走起路来有一种虚弱的感觉，尤其是陈力，下掉那沉重的脚镣后，好几天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像一个袋鼠。

当时我所到的小组，正在修补通往古柏和白鸟两个分场的马路，早出晚归全靠步行，而我根本无法跟上，所以仍然在监舍看报。

大约十天以后，管教干事童某把我们叫去，说为了体现政府的人道主义和"感化"政策。规定从明天起，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反省学习。

由于我无法跟队去修路，所以安排给我的任务是给基三队所管辖的砖瓦厂"收方"，每天我要清点在那里劳动的每个人所打砖坯的数目，以及烧制熄火后出炉砖瓦的数目，并写在一本专来记载的本子上。

基建三队的成员多半是关过少管所的孩子们，在饥饿年代里，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上过学，因饥饿而去偷窃，甚至于为了几个馒头而去杀人的就有一半以上。但是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良知并没有泯灭。求知欲和追求真善美的人格秉性，依然存活在他们身上。

在强烈的求知欲下，他们把熟记水浒和三国演义的陈力当成不可多得的良师。经常的聚集在他的身边听他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一章一回地讲倒“宋江怒杀阎婆惜”，说宋江如何上了梁山；从“桃园豪杰三结义”讲到“七星坛诸葛亮祭东风”说赤壁大战。

这些故事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其实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他们也从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知道过一些片段，但并不知故事的来龙去脉。从他们听故事的专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把我们当成五体投地的师长。经常围聚着陈力直到深夜十二点以后，不愿散去。

我们渐渐把故事拉向近代，转到他们很少听过的谭嗣同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让他们明白，自由平等是人类美好的追求，并不是毛泽东污蔑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渐渐把他们的兴趣和话题，集中到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在我们启发下，他们坦露出他们心灵中的空白。例如他们始终没有去想，也从没有弄明白，今天和平建设环境，搞得连饭都吃不起，原因在那里？岂是‘天灾’‘苏修’可推诿？中国今天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他们为什么从小就没有读书？为什么糊里糊涂就进了少管所？这些长期被中共的欺骗愚弄得一无所知的人们，开始明白一直没弄清的问题。

当他们向我们询问小监里的种种传闻时，我们告诉他们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子，干下对人民血腥镇压的种种事实；他们心中许多人因此而茅塞顿开，例如孙明权以后还在抗拒暴力斗争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

然而，就在陈力故事会的人群中也有头脑糊涂，对当局抱着幻想的人，陈力的故事会很快被嗅觉灵敏的场部管教科所注意，邓扬光再次亲临基三队，当面警告陈力叫他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执迷不悟，在犯人中继续“放毒”，声称政府的教育和挽救，不要被错误认为“软弱可欺”；我们的言行一笔一笔的记录在余干事那本记录本上，我们终于惹来了新的麻烦。

九月下旬的一天，余管教亲自主持了陈力所在小组对陈力的批判会，会上余管教翻开他那本记录本，有时间有地点的列数自我俩进入基三队的一个月时间里，在犯人中散布的种种“反动”言论。

可是这一次批判会完全出乎主持人的意外，陈力用辛辣的语言单刀直入挖苦了他：“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么？余干事，你为什么老爱用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骗人呢？老百姓面临饥寒交迫还成天喊形势大好？你不觉得食不果腹的境地里，不敢说真话是可悲的吗？你自己已经麻木不仁了，还要强迫别人俯首听命，这不是甘当奴才么？”会场报以哄堂大笑。

懊恼成怒的余管教终于撕下了“感化”教育的面纱，当场宣布，对陈力重新带上手铐，并从即日开始，全天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由于我在收砖坯时虚报，在窑上与陈力相互呼应，攻击共产党政策。故而取消我的收方资格，同样从即日起全天体力劳动。

九月三十日为了抗议这种野蛮的暴力压服，我们早上拒绝起床，拒绝领食囚饭。这一次我总结了上次古柏绝食的经验，预先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队部答应停止批斗会，停止刑具，停止对我们强迫性劳役。

我们心中十分明白，采用“绝食”这种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反抗迫害的政治斗争手段，是不适合于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制”主义的。这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局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处在一群对我们十分友好和支持的青年中，因而是可以产生感染，扩大影响的。

中午，邓扬光来了，他可能是因为同我在古柏的较量中，自认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挫败我们的诀窍。他板着脸走进了监舍，一大群年青人围在屋里，正同我们俩交谈。

进来后，他要大家统统离开，然而大家要看这位头号管教，怎么处置这两个顽固不化的份子？围在房里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邓扬光大声问道：“你们俩吃不吃？”我俩不屑回答他这种多余的问题。

邓扬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皱着眉头，现出十分的不满意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带着那余管教边说边走了进来，那口气分明是在指责余管教。余管教没有吭声，但一脸的不高兴，一走进来便怒气冲冲地指挥两个小组长，将我的铺位，搬到隔壁木工组的监舍里，接着又把陈力的铺位搬到一间保管室里。

这么一搬所有围观的人便散去了，一直折腾到下午一点多钟，所有六名年纪稍长的老木工都被叫了出去，屋里只剩下邓大人、老叶和我。

然后向我宣布政策：“我们执行政府的人道主义，从现在开始，每顿的饭菜都按时地给你送来，如果你不吃，那么到了下一顿，便将上一顿没吃的端走，只留下当顿的，你吃不吃是你的事。”

说毕又转身向老叶交代道：“你按时送饭，只有送饭来时才能开锁，送完饭便将房门锁上，”说完后还补充了一句：“他们俩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我和陈力联合的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同上次在古柏那次孤军奋战相比，我踏实多了。我知道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俩虽相隔一方，心中对这次绝食能否争取到三个基本要求？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人们的支撑鼓舞着我，监狱方也有明显的分歧。

这是又一次毅力和意志的考验，可以说每一分钟都在受刑，这是饥渴和生命的搏斗，尤其是第四天以后，因为没有水喝，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喉咙里已经打不过转。灵与肉在拼搏，每一秒钟都要靠意志来克服饥渴的难受！

正好，天忽然下起雨来，这也许是十月盐源的最后一次大雨。我挣扎着站起身来，爬在窗子上，凝望着灰色的天空，于是，我颤抖着拿起了盅子，将手伸出那铁条窗框，伸向那窗前屋檐滴下的雨水，这可是天赐的自然水。而不是统治者送来的水，为了坚持下去，我喝下了这发黄的屋檐水。

我真没想到，我竟然熬过整整十一天这么长时间！心里虽然已经很慌乱，但脑子里依然

十分清醒，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在等待着场部对我们所提要求的最后回答。我的窗下几乎天天塞满了人，他们常常被余管教驱走，驱散了，余管教转个背又来了，他们关切地看着昏睡在床上的我，彼此悄悄地议论。

第十一天下午，农场的最高行政长官高德胜终于露面了。

两名壮实的少年犯把我从床上架起来，跟着余干事，轮流背着我，踩过刚被雨水浸泡的泥泞操场，到了场部那熟悉的石梯坎，我被背上了石梯坎最高处那排平房，背进了“场长办公室”。

坐在我对面的皮沙发上五十多岁的书记兼场长，瘦长的个子，面容苍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尊容。在他的旁边坐着矮胖的陈文仲，今天邓扬光不在。进去时我被扶到高书记对面的椅子上，陈文仲死死盯着奄奄一息的我。

等我坐好以后，高书记开始发话：“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有什么想法？改造嘛，不怕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思想，不是消灭人的肉体，这是党的一贯政策，今天你可说说现在的思想，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他操着一口鼻音很浓的陕北口音，语气柔和。

因为久积的敌意，我筑起了一道心理上预设的防线。略微停顿了一下，他继续慢慢地说下去：“当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但是你必须清楚你的身份，所以你不能无理取闹，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同时，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你必须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修正自己的错误。”

看来，这位农场的最高元首，一直都十分关注我们。听得出，他细细地读过我们在小监中所写的东西，同时说话很谨慎，留着充分的余地。

一名工作人员，给我递上一盅浓茶。陈文仲示意要我喝水，他们当然清楚我的身体状况，我摇了摇头，因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我不可能接受对方任何的食品，包括送来的茶水。更何况还有一个陈力，我们必须采取同一行动，即使恢复吃东西。

我明白，面前的这位农场最高长官，要我说出这次绝食的要求。

“好吧！首先我认为我和陈力都没有错，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不能接受变相殴打的斗争会，陈力也不该因此而带手铐。”我说话非常吃力，我自己都能听见我说话的喘气声。

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刚从小监出来，脚是软的，不可能马上参加小组劳动。我们的条件就是在绝食前以书面形式写下的三条，我相信高书记不仅知道，现在要我复述出来，好给个答复对吧，我的话只有这些了。”

又停顿了五分钟，陈文仲发话了：“孔令平，首先，我们并没有对你们进行殴打，谁也没有布置召开你们的斗争会，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乱说乱动，特别是明目张胆地攻击三面红旗和大好形势。余干事开会批判你们没有错，目的还是帮助你们改正错误的认识，就像我们干部谁如果有错误，我们还不是照样要批评帮助，至于有人在批判会上动手打你们，那是错误

的，我们从来就禁止这么做，否则怎么叫思想改造以理服人？”

他这一翻侃侃论述，很严密。可以说实际上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但没有认错，这乃是中共的“原则”。

“至于刑具嘛，我们可以下掉，刑具本来就是对犯人超越常态的越轨行为一种防范手段，只要你们不再公开放毒，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给谁戴刑具；关于劳动的问题，首先你们是犯人，结束反省，参加劳动是必须执行的，由于开始劳动有些困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会合理安排的。”

陈文仲的这段宣布，是照已经起草好，经过周密思考和讨论才作的决定，既答应我们的条件，也是替他们打圆场下台阶。

“不过也应该讲道理，大学生嘛，有理性，不要一味的任性。生命是可贵的，不应当用生命开玩笑，所以你们应当正常生活，不吃饭怎么行？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才是他今天要表达的最后意思。

说完这翻话他注视着我，我想，当时的我的样子一定像死人一样可怕！

我被刚才背我来的两个小伙子背回基三队，随后两个小伙子又将陈力背到场部去。

晚上，余干事亲自跟着老叶为我送来了特地熬制的白稀饭，一直守着我直到看我吃完后方才离去。一盅稀饭刚刚下肚，没过半小时，腹中便咕咕直叫，接着便是水泻般的腹泻。刚刚喝下去的稀饭穿肠而过。看来似乎一点都没被身体吸收，反而我的身体就像虚脱般的，大脑似乎已经失去指挥能力，全身轻飘飘的。

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如此整整折腾了一晚上，直到天亮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照例是稀饭，不过里面加进了糖，这一次喝下就不象昨天。身体渐渐的感到暖和，用手触摸自己的脚，已能感觉出那冰冷的脚心。

第三天，前天送我去场部的两个小伙子又奉命要将我背到场部去。但是，我已经能起床慢慢走路，便柱着一根竹竿，在他们的搀扶下，由余干事跟着，再次来到场长办公室。

同前一次的坐位完全一样，我的对面除了这位高书记就是陈文仲。不过，在我们的对话开始之前，陈文仲打开了一个放在他面前的绿色文件夹，待我坐定以后，一边向我提问，依次的记录下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出身和原判罪名，刑期。我知道这乃是一种常规的“预审”。

看来，场部是把我们这次绝食斗争，当成了一个案子来“审理”了，也许还兼有对我几次申诉的答复，所以，我在心里揣度这位高书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完成这一套程序记录后，陈文仲要我当着高书记的面，畅诉自己的观点。特别还强调要我“不加保留，和盘托出向党交心”。

我十分厌恶这“交心”二字。这仍是中共的职业党棍们一种时髦的用语，划右派时，正因为这“交心”而使多少幼稚的学生“蒙冤”!

我看了一眼这位脸色苍白，已上了岁数的高书记，虽然也在猜测对方的意图，但是我已经没有学生时代那种惶恐不安，抱着请求宽恕的“幼稚”了。既然已在我的文章和大会发言中，公开讲了中国老百姓所不敢说的。今天当着这位场部的第一负责人，反而缄口和隐瞒，只能表明自己的胆怯和虚弱！所以，我当然要说，不过因为身体极为虚弱，提不起精神来，我的说话中气不足，语音低沉，显得疲惫不堪，中间不时因气换不上，几次停顿。

（一）攻心

首先，我表达了我的冤枉，学生时代的我，并不符合右派份子六条标准之任中一条，在我幼稚的学生头脑中压根就没想过推翻共产党。接着，便按照我的经历，从下乡一直讲到现在的全部过程，重点讲对“三面红旗”的切身体会，列数中国的灾难现状，痛斥“阶级斗争”的残酷，痛斥中共公开欺骗百姓的愚民政策。

这位农场的第一把手没有打断我的话，从他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的动作，看得出他在紧张的思索着。听到我对毛泽东指名点姓的痛骂非但不加制止，甚至连一点反感的表情也没有。因为我所说的是事实，是平时人们不敢说出的真心话，陈文仲也没有作记录，而是聚精会神听我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讲完我的话。

当我说完以后，停顿了十分钟，陈文仲好象在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慢腾腾地说出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我要告诉你，你若用小说《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精神来对付共产党就大错特错了，你要知道共产党就是搞这一套的，我们知道该怎样对付你，你们不会得逞的。倒不如从现在开始，放弃你们的反动立场，才会有你们的出路。”

听到这位特工头目说出如此令我费解的话，首先，他用他们供奉在神圣信仰神殿里最完美的化身，同我们这种任由他们捆打侮辱的阶下囚并提，令我吃惊。难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供奉的偶像是相似的？也许吧，我们提出的民主思想原是共通的。

可我们算什么呢？平心而论我们的反抗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只是被冤枉的普通人，我们曾对统治者存在若干的幻想，而决无那么“高尚”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当人间的救世主。我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被人解救，还我自由和清白而已，难道共产党信仰神殿里的尊神也不过如此“平庸”么？

不过从他的话里，倒听出了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抬举”，如果，我们的行为果真在他们心目中到达了他们尊重的地步，那倒是要实实在在地洞察他们的内心。其实，承认我们所说的是真话！承认我们代表着真理！只是在“强权”压迫下不好公开这么说，却在无意中露出了自己的内心。

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真有那“永贯长虹”的共产主义。

可惜，他们全错了，错在用抽象的、虚幻的，也是反人性的信仰来玩阶级斗争的游戏。说得真实一点，共产主义庙堂里供奉的所有神像，都是些凡夫俗子，有的简直就是人间魔鬼，而决没有大义凛然的神。

此外，这陈文仲的知识未免太贫乏了，中华民族中敢于蔑视敌人，为捍卫正义和人类尊严而视死如归的精英还少么？投江殉国的屈原，詈贼不绝，咬破舌头以鲜血溅贼的颜杲卿，身陷敌营慷慨就义的文天祥，一门忠烈精忠报国的岳飞，至于血战沙场壮志殉国的爱国志士更是比比皆是，为抗日捐躯的名将，就有两百多位，就连中共统治下英勇反抗，杀身成仁的也不在少数。

仅我们这小小农场后来产生出来的刘顺森、张锡锟、陈力等，虽然鲜为世人所知，但他们难道不是为反抗独裁，反对暴政而慷慨献身的英雄么？难道他们的名字不是中华民族流芳万古的楷模么？这是虚幻不实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同高书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长谈结束了，我无法估计出这样坦诚的交谈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想假如他对我们的观点表示赞同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那个结论，还适不适用于他？如果他从内心上很是同情我们，甚至根本就已经一鼻孔出气了，那么他这个二万五千里走下来的红小鬼又将依附在哪一张皮上呢？

“斗争会”当然是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大约因为我俩使基三队的余干事与管教科带来的麻烦，毕竟这个队里有大量从少管所调来的少年犯，这些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心服口服的成了我们的学生了，所以没过几天，我们俩便从这里调到紧邻的农业一中队去。

为了分化我们俩，陈力再度关进了那个中队的反省室，而我暂时的分到了这个中队的第一小组，随组劳动。但暂时不记任务，那时已过了元旦，正是农闲时节，劳改队中农闲时正是躯赶流放者兴修各种堰沟、水渠和蓄水坝的时间。

第一天出工，一大清早农一队的全体劳动力便冒着寒霜，整队向距离五里以外的一号水坝工地开进，按照农场的规定，这年冬天二道沟地区附近的农业中队，担负着给所属中队地区供水的二号坝，加高加厚的任务。

迈过农三队的那个大弯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前年，我们刚从黄联关来到这里的情景。而今，那四周围已经筑起了围墙，围墙前就是我们通向水库的这条初具形态的“公路”。我一连几次的环顾这里，心中想着在猪槽里抓洋芋吃的邓自新还在不在？想到当年风沙满天，我们铲草皮烧洋芋的往事。

绕过农三队，我们已看到了横亘在二道沟两侧，截断了上游流水的库坝，是二道沟的最高点，盐源的雨要到五月才来到，春耕所需要的水，都依仗着这水库里的积水来灌溉。

现在，就在这条待加高加厚的库坝上，南侧两台挖土机和三台推土机，正穿梭着将坝的南坡山上的泥土往大坝上填。两侧的泥巴山梁以及坡坝上一千多名挖土打夯的劳动力正在取土，平整，准备加高的坝基。

算来，我已快两年没有参加劳动，劳改队里都在每人头上划了“硬任务”。农一队的劳动

力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新犯，他们的劳动力都很强。而且为了赶在刮风以前，就能完成全天的任务，所以一上了工地便会紧张地干起活来，这同基建三中队的少年犯们有很大的不同。

那时节，听说内地的农业收成已有相当复苏。农村已经普遍的回到三自一包的状态。从大家收到的包裹中寄来的东西中多半是腊肉，花生之类，是我们在监狱中多年都没有看到的。然而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依然的每个月三十斤口粮，每顿端在劳动力手里的还是半罐饭和一瓢见不到油星的水煮罗卜。

这些来自农家的子弟，都亲身经历过“三年灾荒”，他们对少年时代吃草根树皮的日子记忆忧新。每个人都明白，是当年人民公社犯的过！只因为在监狱中一坛死水的政治空气下没有说出而已。我经常给他们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灾难是政治的原因。只要毛泽东统治继续一天，老百姓的苦日子就会持续一天。

（二）祷告

眼看 1966 年的春节快到了，监舍里的人们都会围在一起，议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过年，农村中，自古以来普通的农家都不会亏待这个节日，早早就要从猪圈里牵出早已准备好的过年猪来，整个春节从小年夜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十五日，讲究的农家都要祭祀祖先，请财神和农神灶神到家，保佑全家在新年里平安，就是杀不起猪的再穷的人也会从亲戚家，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买些猪肉，鸡鸭在祖先面前磕头祈祷。

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正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怎么样都有一刻欢聚热闹的时光，现在，经过人民公社的剥夺，家里能杀得起猪过年的人已经不多，但无论如何这年三十的团聚和丰盛的年夜饭总是免不了的。

现在，这些身陷牢笼的农民，都只有把团聚的梦放到年三十晚上去做。

在监狱中，我已习惯了冷冷清清的独自思念家人。今年的春节是我跨出小监以来，能同许多人在一起共度年三十的第一次。

春节前几天，人们一有空都会围着炊事员打听今年的春节供应，这两年比饥荒年有些改善，按照当时城镇居民的供应，犯人每人都有二两的猪肉可盼！可是这里的老犯人告诉我，自从建队以来的半年中只吃过一次肉，时间久了，劳动力们虽然晚上做梦都会梦见吃肉，可早已养成了不吃肉的习惯，元旦的时候，事务长就宣布，因为供应每人只有二两，不如过春节时加在一起，大家吃得痛快一点。

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大家少不了围着炊事员打听，得知今年春节每人有三两肉供应，加上上次元旦的二两，足足半斤了，按说办个农村里常见的土八碗席也就够了。

消息传开，凭添了几分过年的气氛，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还算着这半斤肉如果切成回锅肉，那起码也会吃到镍币那么厚的回锅肉二十片之多？然而，在这种猪肉比山珍海味都稀贵的年代，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分足了分量？不但队部的库房因“鼠耗”而打折扣，还会不会发生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过五一节，像代昌达那样，把肉偷来埋在煤堆里这样的事？这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这儿的厨房可不像西西卡四面敞开还选了“监厨”，在司务长当众过称后将肉送入锅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炊事员做了什么手脚。

过年那天厨房就事先贴出“告示”，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厨房的大门紧闭着。

除夕的那天上午，没有上水库，所有的人集中在菜地施了一次肥，下午钟管教吩咐各班组按所划区域“打扫清洁”，扫除完毕，便关上铁门，人们在院子里便被禁止外出，于是几个人便端出了小桌，摆上棋盘和扑克在那里玩，有些人在水槽洗衣服。

农一队从甘洛农场一起调来的人除钟平波和何建，我就没有相熟的人了。

钟平波是雅安抢馒头的几个主要参加人之一，他指了指南边那个往常堆放农具的小屋，打听陈力的情况。

我向他索问从甘洛农场带到这儿来的那些书，于是走进他的监舍里取来一本“巴黎圣母院”，那书面已经磨得很烂，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丢，惟独这些书是我们的珍爱，监狱里保存一本书是太不容易的事。

看看已经到了五点钟，几个鼻子最尖的年轻人，在院坝里向大家大声宣布今晚的节目是回锅肉，而且扮着鬼脸嗅着从厨房门缝中飘出来的肉香分子。

早已盯着厨房大门各组当天分肉的值星，已将分肉的菜盆洗净，只等大厨房领取饭菜的窗口打开，便端着盆子去完成这最精彩的节目。因为听说每个人的肉平均足有半斤，一个组有七八斤肉，生怕一盆子装不完，所以都准备了两个。

五点半钟，厨房的窗口终于打开了，炊事班长站在那窗口大声向坝子里宣布，各组先把盆子贴上组别，便将它们递进去，说是一次性把肉分完，等分完了肉，各值星把肉端到所划定的圈子里，再依次排轮子到窗口领取罐罐饭和“油煎菜”。

可是，当回锅肉刚刚分光，各值班员端到自己的盆子以后，便有人在窗口下吼道：“怎么搞的，本组二十个人，每人半斤，足有十斤肉，光肉切碎成片后就可以装满一盆子了，可现在，那菜盆里看到的全是地瓜片，大半盆就装完了！”他这一吼马上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那炊事员心里有鬼，只是当作什么也没听见，躲进厨房关上了门。

等到大家将自己得到的那一份端在手里，细细数着碗里的肉片，坝子里沸沸扬扬地吵开了。记得我那一次所端的那份，除了六点肉外全是地瓜片，地瓜片与肉在不经意看时颇为相似，炊事员真是精于以假乱真那一套！可是还是被久未见肉的人当场截穿了。

有人端着拿在手里的那一罐，看看别人拿的是不是都一样？经过一翻比较后，便端起了自己的那一罐到队部办公室去找值班的钟管教，数着地瓜片里的肉给他看，钟管教只好走到坝子中间，装出很关心的样子，去看那些来告状人端给他的罐子。

突然，他在第三组的监房门口停下了脚步，在那门口处，钟平波正在门口用木箱子垒成了一个高高的“台桌”，“台桌”正面的木板上正对着坝子，贴着一张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毛泽东画像，画像左边，竖着一支用松明子点燃的“灯”，台桌的上面，放着他领到的那地瓜肉

片和一罐菜饭。

只见那钟平波布置好以后，不慌不忙的看看钟干事正注视着他，便隔着门前的阳沟朝着那肉和画像，跪下连连磕头！一边大声的喊道："毛主席啊！托你老人家的福啊；今年过三十吃年夜饭，我才吃上你老人家赏给我的三片肉呀！毛主席呀！托你的福呀；没你老人家我怕要饿死街头了。"

边喊边转过身去，冲着那钟管教喊道："你们还管不管，是哪一个偷肉的也偷个合适，大年三十的，名义给我们有半斤猪肉，结果只有这三片肉。"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穿起碗里面的三片肉在那姓钟的面前直幌，一面又念叨着："毛主席，你可亲眼看到了吧，这大年三十的，我们就只吃了三片肉过个年哪。"

说话间，那垒起来的木箱子不知道受到什么震动，向着天井方向倾翻过去，随着一声落地的响声，那放在木箱上的油汤，跟着那盛菜的铁钵不偏不倚地泼在毛泽东那张画像上，弄了他一脸的菜和油。

此时那个组的组长，一面拉着钟平波劝他冷静，一语双关的说"有啥问题你向管教干事反映。"

天色已经黑下来，被包围的钟干事已被院子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明明是在咒骂监狱，咒骂共产党。陷在重围里的钟管教除了声嘶力竭地想用吼叫镇住大家，但他已经黔驴伎穷，农一队的坝子里闹得像翻了天似的。

大约十分钟以后，救火队队长邓扬光，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两名干事，急冲冲的赶到了这里。

叫开门以后，两个干事拿着话筒向围在坝子里的人喊话。农一队的人本来都是些老实的农民，一见带枪的人进入坝子，很快就被话筒里的喊话所镇住，纷纷回到自己的监舍中，站在监舍的门里面，向坝子里张望好奇的望着事情会怎样的收场？半个小时以后，钟平波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院子里也渐渐的平息下来。

直到十点钟光井，关押陈力的那间是屋子被打开了，钟平波也被关进了反省室。一年以后，就是 1967 文革发动以后的第二个春天，他就为这件事和雅安监狱的"前账"被判加刑五年，在加刑中说他出身农民，中专学历。

就在那一次加刑大会上，他面对着在场的万名流放者，铿锵有力的回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又过了十五年到了 1979 年，我听说他获得平反，只可惜，我们相隔几十里地，自从我们离开农一队后，就再没见过面。

第七节 农六队

春节过了没几天，一个早上，我被一个身披风衣、身材修长、年纪大约三十岁，比其它狱吏来，外表显得文静的中年人唤出了农一队。带上我的破烂行李，跟着他来到了隔着二道沟，仅一沟相望的农业六中队。

这是座刚刚修好的监狱。如果从天空向下俯瞰，整个横贯南北的二道沟，便像夹在东西两边起伏不迭的泥巴群峰之间。农六队就位于这群峰西面中段的一个山头上，不过从农一队向这里看去，却看不出这里隐蔽着一个新建的，专门关押重刑“反革命”犯的中队。

如果把这个隐藏六队的山头，看成一个面东而立的巨人头，那么这巨人头的后脑勺被削平的地方便是农六队的建筑群，留下了这人头面朝二道沟的山坡，使人想象到这是人头的“脸”，农六队就将这张脸隐藏在这个小山头的背后，似乎农六队的造型师一开始就要借这张脸，来掩盖今后在这里发生的血腥罪恶吧！我们从羊圈小监出来，经过基三队和农一队足足四个月时间，却没有发现这里隔沟而建的建筑群已悄悄动工。

当然更不会料到，我未来的十三年青春年华会埋葬在这里。

我在“风衣”的带领下进入这片建筑群时，监狱的围墙还没有筑，这片建筑群的南北和东西方向都超过一百米以上，周围是靠西南北三排土墙平房，与东面那“脸”后部削出的最高足有十米的土坎围成的，围在中间几乎是方形的坝子，足足有五千平米以上，这便是农六队的雏型。

我被“风衣”带到时，坝子里静悄悄的，除了几个人在东北角上修筑未修好的围墙，坝子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的积土。坝子中央没有一个人，我在坝子里等了大约半小时，等到“风衣”从队部办公室办了交接手续后，便在他的指定下将自己的破行李，搬进了北面那排监舍靠西的第一间监舍里，监舍也像农一队一样，通铺上铺着稻草，四方的土墙围成一个口袋屋，光线十分的昏暗，从铺草中散发出一股霉气。

那铺上已住着几个人，此刻他们上班去了，我在铺上放下了自己的行李后就走出监舍门。

靠西边的那一排房子一共十五间，靠北面的那一排，也就是我搬进去的那一排也是十五间，靠南边那一面，中间一道宽八米高六米的两扇铁门上，是一个宽大的岗楼，铁门西侧是一排用作厨房、食堂、保管室的砖墙房子，铁门的东侧是一排用砖头砌成的屋子，是管教人员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寝室。那山头未被削去的“脸”，高十米的土墩上又修筑了一个岗楼，这岗楼的后面就是了望二道沟而修的砖瓦结构的驻军营房，两面两座岗楼中，架着两个巨大的探照灯和两排供机枪用的洞，虎视着下面的整个平坝和监房。

中午时光，工地上收工回来的人陆续到了坝子里，我老远就认出了邓小祝和刘顺森，他们最近才从古柏调到这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除雅安监狱的一段经历，在甘洛基本上分在斯足和西西卡两地，后来在黄联关调古柏时，因为我不久就进了小监，所以同监相处的日子很短。

一见面，回忆这一年多，如像在另一个地方游历了一圈，他们在大监里常听到我和陈力的故事。只是他们听到的不免失真，现在看到我身体长得好好的，都说我因祸得福，并祝贺我健康的回到大家身边。大家又纷纷问起陈力的下落。

农六队现在暂时只有六十几个人，据他们介绍，这里按规划是要集中两百人的编制，全农场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都要集中在这里。并且还告诉我，今天将我带到这里来的风衣叫李培连。

暂时大家的劳动依然是积肥备耕，除留下了几个人继续修筑围墙，其余的人在附近山梁上铲沤草皮灰，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劳役，将带来严重的水土流蚀。给长江流域带来新的灾难，不过这个损失比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整个农六队的坝子还没平整，推土机留下的大量积土没有清除，临时担任中队长的荣老头，将这些平坝子的劳动分摊给几个组，用石灰画出了各组的包干区域，下午收工回来后，驱使大家以“义务劳动”名义继续在坝子里运土挖土，一直干到天黑。

（一）抗工

这几年，囚粮一粒没增加，各个中队只有靠自己种的蔬菜和洋芋，一直维持着每顿半罐饭、一瓢菜的半饥半饱日子。像农六队这种刚刚新成立的队，保管室里没有积存的菜，所吃的那点“老梭边”，还是靠临近的农业中队调剂来的，当年甘洛农场的饥饿顽症好象盯着我们。

大量的体力消耗和营养差缺，无异于慢性死亡，山梁上刚刚开垦出来的红色处女地，不象初来农三队土里有未挖尽的洋芋可找。！也不像古柏有马厩里撒落的四季豆可检。就是逃亡还得翻越东，西两面的大山，因逃亡而冻死饿死在大山上的尸骨随处可见。

我们中相当的人都是从甘洛农场的鬼门关撞过来的，看到这几天“水肿病”在开始蔓延，大家便有了思想准备，与其屈从于皮鞭，接受高强度的劳动而耗尽体力死去，还不如公开抗拒劳动保存自己的体力，当然集体的罢工在监狱这种条件下是要讲策略的，大家必须齐心，拧成一股绳，有了甘洛农场的斗争经验，集体抗工便悄然爆发了。

有一天早上，六组的王士其没有起床，他躺在铺上喊肚子疼。那天正碰上荣老头值班，当六组的组长清点人数时，跑到他面前向他报告，王士奇和罗家文两个人称病没有起床。大值星冯俊白也向他报告说：“昨天下午两个人收工回来就在喊肚子痛，义务劳动也没参加。”

荣老头闻报面带愠色，原本就红光满面的脸变得更加红了，追问道：

“什么病，那么怪，医生看过没有？”随即高声传唤唐启荣的名字。唐启荣从监舍最后的临时医务室跑出来，按照荣老头的命令进了第六监舍，那里面，还在传出阵阵呻吟声。

过了一会，唐启荣向荣队长报告：“两个人不发烧。”监狱规定，为了鉴别劳动力是否真有毛病，一律用烤体温的办法来测试。六监舍门口几十个人围观荣老头，看他怎么处置王、罗二人？荣老头已经集合好准备出工的队伍，听唐启荣这么说便厉声喊道：“叫他们赶快出工，今天的任务要完成了才能收工，冯俊伯，你给我下午量方的时候管紧一点。”

在他的催促下，围观者开始向岗楼的哨兵报告人数，列队走出了那两扇大铁门。等到人们都已离开坝子，荣老头便拄着他的拐杖，一瘸一跛地走向六号监舍的门口。冯俊伯跟在他的后面，他的心里最明白两人是怎么一回事？但表面上装着讨好的样子劝道：“你老人家，腿不方便，最好还是不要进监舍了。”

荣老头用眼睛向他瞪了一下，没好气吼道：“你们这些组长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下午三点钟我上坡检查，你们那工地上一个人都不见，还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等会儿，你跟我一起

去，看看你们十来个人积了五天的草皮，叫你吃下去，你都可以吃下去，今天倒好，索性两个人都病了，连工都不出了。”

说完，便进了那监房，房子黑洞洞的，罗家文睡在第三个铺位上，他正用被子将头死死的蒙着，王士奇睡在最里面的位置上，正侧着身子在叫唤。荣老头走到罗家文面前，用手中的拐杖去挑他盖在身上的被子，却桃不动。一怒之下便狠狠地朝他身上抽了一拐杖，可惜他毕竟装的假脚，比不上张棒棒那河南佬强壮有力。用力抽下去的拐杖碰在王士奇身上却弹了回来，那反作用力反而使他的身子连晃了两下。

“卫兵，卫兵！”他向岗楼上吼道。岗楼上没有马上回应他，于是他拄着拐杖一跛一颠的走到坝子中间去，大声的吼道：“卫兵听到了没有？”岗哨上探出了一个头回答道：“都去场部操练了，这里只留下两个值班的。”

“两个人也给我下来，准备两根绳子，到六号监舍去，把两个睡在床上装病的给我捆起来，押到工地去。”他断断续续地吼道，声音因震怒而颤抖嘶哑，本来就很红的脸变成了紫色，那握着的拐杖，不停的朝地上笃着，笃起了一串的泥洞。岗哨上没有回应他，他站了一会，无可奈何的向铁门走去，不一会门里走出钟干事和余干事来，两个人手里提着棕绳，经直向六号监房走来。

站在门口的唐启荣赶忙向王士奇喊道：“余干事来了，还不赶快起来，免得皮肉痛苦。”说完便悄悄地躲进医务室里去了。冯俊伯站在监舍门口迎着两个管教，尴尬的陪笑道：“两人在穿衣服了，我一定督促他们上工地。”

当两个干事人走到六号房门时，罗家文已经站在铺前，穿上了厚厚的破棉衣，一边捂着肚子还在不停的呻唤，看那样子确实疼得厉害，王士奇也站在罗家文的身后，一边用大毛巾捆在头上，高声的呻唤着头疼，两个拿着绳子的人看到这般摸样，显出一种鄙夷的神色。

那一脸雀斑的钟干事吼道：“装得挺像！”那姓余的向屋里四面张望着狡猾地追问道：“人说外伤看得见，内病吃不得饭。你们今天早上吃了饭吗？”罗家文回答道：“没有。”姓余的紧紧追问：“那么饭到哪里去了？”冯俊伯马上界面道：“别人帮拿的也知道谁拿去了。”

姓余的怒吼道：“少给我耍花招，滚，给我立即上工地去。”

钟花脸手里拿着绳子在王士奇的眼前晃道：“你们两个今天就是死也也要死到工地上去。”转过身来向门口的冯俊伯命令道：“冯俊伯，人交给你，你负责把他们押到工地上去，告诉你们，听清楚了，他俩那一个敢拒绝劳动，立即回来向我报告，我捆你时不要告饶！”说完转头走了出去。

折腾到这个时候已快十点了，两个人披着烂棉袄，头上缠着破布，像得了重病的病人，拖着似千斤重的脚步，在冯俊伯的监督下向岗哨报告以后，出了大铁门，缓缓向四号梁子走去。

四号梁子上一片由拖拉机翻出来的处女地，像一个光秃的山包上顶着的一片红土，四周大约三十米宽的环行草地包围着它，活像一个秃头巨人头的四周围留着一圈乱头发一样，六组一共十六号劳动力便在这圈草皮上劳动。

荣老头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带着泥的草皮铲起来，再运到那刚刚开垦的土地上，隔着一定距离堆码起来烧制成草皮灰。三个人从远处望去，那四号梁子分明只有五六个人在劳动。

当冯俊伯带着两个病号走到时，邓自新说道："怎么样？没有稳住，还是被赶了出来？"那王士奇把自己的头上包的破布扯了下来，坐在地上苦笑道："还差点挨了绳子，那钟麻子凶得很。"文廷才却在一旁界面道："怕什么，今天他真的捆了你，明天我来，我就不相信那荣老头，钟麻子捆得服六队的两百号人？"

"对，大家想想看，甘洛农场死那么多人，还不是因为那些怕挨捆的胆小鬼拼命的去挣表现，结果那些死的人那一个不是肿得像水大棒一样。""对，我们干得越多，越死得早，大家一条心，看那个钟麻子把我们咋个办？"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冯俊伯看了看工地上的人问道："时间恐怕差不多该换班了"，接着又说道："你们每个人干什么都要把稳一点，只要不出事，摆平了，少找麻烦怎么都行，你们也替我想一下，组长不好当啊！"说完便朝左面的山沟里走去。

这盐源二道沟，两面山包上，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山梁之间深沟两侧，分布着许多像人工挖出的地洞，这些凹进地里的泥洞上，都有可遮雨的"帽檐"，大的泥洞可以钻进六七个人，小的也可以藏住两三个人，人藏在里面可以望见外面，而洞外的人，除了正面对着洞口，任何其它的方向都不会察觉洞里隐蔽着人。

风季到来时，我们就仰仗这些老天赐给我们的洞穴，在下午狂风大作时，用以躲避狂风对我们的摧残，那时，在"争生存"这一点上，各组的成员保持着空前的一致，连组长们也在内。

大家达成协议，下午大风起后，便将一个大组划成两个小组，一个组的人在工地坚持"顶风"，另一组便在洞里休息，两个小时一轮换，如此做法，主要是蒙队部的眼睛。倘若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远远的向山梁上无论那一个工地望去，都可以看到那儿始终有人在劳动。

大家藉此保住体内的热能尽可能不被狂风吹走。为了使洞里保温，大家还从牛棚边的草树上，弄了些稻草将洞里的地面上铺好，人还可以在上面睡觉，不过饥饿的时候，人是难以入眠的。年事高的国民党军官，脱了产，白天不出工地，就在洞里专门给大家讲"三国演义"。

冯俊伯和文廷才走下左面的山沟，走进第一个泥洞时，只听见徐伯威正在讲，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洞中正响着他的声音："袁绍攻打许昌不克，见曹操放弃了白马镇，引兵延津渡口，摆出渡河架势，袁绍不识此计，率主力西进阻止曹操渡河，不料曹操虚晃一枪，亲领一支轻骑兵奇袭白马，包围了袁军驻守白马的大将颜良，关云长力斩颜良于乱军之中，白马之围遂解。"

这徐老头原是范绍增手下的一名少将参军，成都人，被捕前还在四川大学哲学系教过"尼采"课，颇有些资历。加上狱中平时忍字当头，常常给管教们介绍些当年老成都的佚事，颇得队部管教们的好感，不管是当兵的还是狱吏们如何飞扬跋扈，他都能装出一付笑脸唯唯诺诺，

使人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入狱后他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干些收方，清点人数或看棚之类的“轻活”，连许多一贯靠汇报情况讨队长欢心的组长，都很羡慕他。

冯俊伯走进山洞，便对徐老头笑到：“讲话费精神，你老人家也该歇歇嘴了。”一面把自己装开水的大盅子递了过去。洞里的人知道，到了换班的时候了，便都站了起来陆陆续续的走出洞去，一直到换进来躲风的人，重新将洞子填满。徐伯威喝了水，等大家落坐以后，故事又重新开始。

王士奇装肚子疼的做法迅速的传染给了四组，过了两天四组的组长在早上出工时，向荣老头报告说：“昨晚本组又病倒了三个人现在还躺在床上喊肚子痛。”没料到这一次，荣老头并没有发火，只是瞪了他一眼，口里却嘀咕道：“什么肚子痛，分明是肚子没填饱”旁边的张清富补了一句：“还是荣队长英明。”

狱吏们能够承认饥饿，向流放者作一点“宽容”，比起甘洛农场和古柏的管教们动不动就穷凶极恶的驱打流放者，也算是一种“转变”。

渐渐的，整组的人便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偷偷地从大风肆虐的工地上溜了回来，倦缩在各自的监房里。除非荣老头查房查到了，用他的拐杖吆喝着将偷偷回来的人重新赶上山去，或者叫他们在院子里清除那些积土。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风实在太大，刮得人透不过气来，几乎全队的人都回到了监舍。荣老头在坝子里一面吼着，一面挨着监房把人都赶下铺来追上山去。

当荣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跛的走了出去，屋里就剩下了我和徐伯威两人。徐伯威走到监舍门口，向外望了望，确认门外的过道上已经没有人时，才把监门轻轻掩上，走到我的旁边，神秘的问道：“你看过最近的参考消息吗？莫斯科和北京都闹翻了，赫鲁晓夫最近在戴维营点着毛泽东数落他！”

我摇了摇头，望着这个平时行为说话都十分谨慎的老头，从来没有露过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的话，今天居然道出内心里还有一个隐藏的世界。

只见他在自己铺位的草堆里翻找着什么，不一会便从乱草中拿出了几张已折得很旧的小报，并向我严肃地说道：“这是我从队长办公室里带出来的，你看后不要再传给其它人，直接还到我手里。”

参考消息，是中共的内部读物，但毕竟不同于普通报纸，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上面摘登着世界各大通讯社所发出消息的摘要，其眼界比国内其它报纸宽得多，有时候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可供分析思考的见闻来，所以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弄到手的读物之一，并没有这徐老那样的神秘和少见。

于是我将报纸接过手，一面向他点头说：“放心，我看了马上就还给你。”当我接过报纸刚打开，他又将身子靠近我，附在耳朵旁说道：“陈力是我们在成都监狱里的老朋友了，我来

场就听说你和陈力关在小监里，其实，你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中共早输掉了民心，他们不会长久的，最近你们还听说到什么好消息吗？”

我望着他那微泛红光的脸，心想又是一个将内心埋藏很深，用韬晦对付共产党的人。从此，我们变得亲近起来。

（二）思想改造试验田

逃工抗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荣老头将中队所属的八名干事全部分摊给每一组，上下班都由分摊到组的干事领队，并且负责守在工地上进行监督。

同时，通知岗楼上的驻军，派更多的巡逻士兵加强查房，一但发现有无故逃工的立即拉到院坝里罚站。但是，这并没有减少逃工的势头，负责领队的干事不会在工地上挨风吹，岗楼上的驻军也未必按他的布置去做。

有一次，被荣老头抓了一个全组不出工的“典型”，老头子亲自招集会议，把全组人喊到院坝，坐在那里开会“找原因”。其实是让逃工者狠狠被风吹刮着，以示惩罚。

全组人裹着加得厚厚的棉衣，个个将头缩在棉衣里，任凭老头子狂怒的吼却无人理睬他，一直坐到晚上九点钟，整整几个小时，一无收获的散会。六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犯人，一直维持着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直到三月份，陈力也从农一队的小监放出来，押到了这个中队。

李培连当天晚上，主持了中队建队以来第一次十分“正规”的点名仪式，他拿出厚厚的点名册对全队二百多号人进行了编组，我和陈力连同本农场十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历史反革命”，集中的编成了一个小组，他自任为这个小组的“指导员”。

第二天全队停工一天，按照他编的点名册，将全队的人按他所编的组重新调整了监舍。下午，其它的组出工后，却把的我同陈力以及新编组的成员留下来，他从队部办公室端了一张靠背木凳，坐在监舍中间，主持了第一次学习会。

“我姓李，李培连，从现在开始，按照管教科的决定，将你们编成了一个试点学习组，由我负责你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造。”

“这个队已经成立一个多月了，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你们都是投入改造多年的老犯人了。我看，思想上还有很多问题，当然，劳动是改造的手段，但光有劳动是不够的，我们共产党人向来以改造人的思想作我们的宗旨，思想没有改造好，劳动也不会收到积极的效果，所以从现在起，我就在这个组做‘试验田’，想促进一下诸位在坐的思想改造。”

坐在我旁边的陈力低声说道：“不知道当局又在耍什么花招？”

这两年，我经历了古柏，二道沟小监反省室，基三队、农一队，绝食斗争就达两次，与管教科可谓面对面的斗争。看来今天这位指导员与粗俗的狱吏相比，确有些异样，是中共对我们这些人变换什么手段，还是政治气候的变化，我们暂时难以预料。

“我看这人未必不是更加阴险和狡猾的人。”陈力从鼻子里哼道。

李培连好象已经察觉出我们在议论他，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说：“你们这个组一共十三人，暂时由周学祝担任学习组长，因为现在还处在备耕农闲时间，下午风大，加之，你们的年龄大多都已五十岁以上的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一段时间上午继续出工，下午则留在监舍里组织阅读和讨论。

学习的材料是‘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的有关文章，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方法是边读文件边对照，联系国内形势和本人的思想实际，谈谈你们的认识，允许并希望大家能各抒已见，讲不同的看法。”

学习便这样开始了，我们这个组除了我和陈力外，其它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在公众场合亮相的“狗”们，例如朱国骥、王德权这些都是共产党刀下留人从狗洞中逃生过来的人，为共产党的强权折服，也想从监狱的狗洞里再爬出去。所以这几年一直扮演劳改积极分子角色。

其余的例如李克由、徐柏威、卓元民、母建武等人，对于自己成为共产党阶下囚，蒙不杀之恩已吓了一大跳，但看到共产党强奸民意的种种劣迹，心存介蒂。人到屋檐下除了当顺民，几个泥鳅还能翻大浪？所以在这种“不满”和“无为”两种情绪支配下取了壁上观态度。

这种人会在良知支配下，趋向我们，所以对他们也只能取和睦相处的态度。而花费口舌和精力去对付周学祝，王德权，朱国骥这类人，要改变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当然学习过程中免不了激烈的争论，李培连究竟想看什么？他努力想作出一点“思想改造”的业绩呢，还是在接受上峰的旨意？带有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色彩？所以，我和陈力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猜测，带着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参加了这场学习。

果然，学习从开头到结束，就是以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的唇枪舌战而进行着。第一天的上午，就按李培连的布置由周学祝宣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小时的诵读，大家倒也聚精会神，我看了看徐伯威，他肯定在想李培连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其实，共产党的派别，一定会在最后表现出来。

周学祝宣读完毕，朱国骥首先发言，这个已经快六十的人，重复着中共的老腔调，从满清末年列强瓜分，讲到日本入侵，他甚至于讲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讲自己上军校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讲自己的认识和痛悔，最后以原子弹的爆炸讲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说“中华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站起来!”

他讲话时，唾沫横飞，给人一种激动的感觉。彷佛忘了这么多年来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或者是他被中共的强权吓怕了，他一点不敢接触四年内战七年革命给老百姓带来比牲畜不如的生活。

听他讲完，陈力再也忍不住了，他列举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后，说道：“倘若，中

共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是在‘革命’成功十五年来一个接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运动；是老百姓衣不御寒，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那么老百姓为之捐躯的革命战争还有什么必要？尤其是人们连话都不敢说，否则就要挨打，坐牢，那么中国人谁站起来了？至于原子弹，难道不是老百姓用大量血汗被强迫驮起的战神么？”

接着陈力发言，我补充道：“一个对民族负责的政党，一个对子民负责的领袖，不在于他的口头承诺，而应当对他的行动的后果负责，产生了今天这种后果，老百姓还在继续为这种后果不断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不愿立即调整自己的政策，表现后悔，反而杀气腾腾把这一切上推老天，外推苏联，内怪反革命作乱，继续用罪恶掩盖今天更大的罪恶，这样的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清算!”

争论如火如荼的进行下去，李培连一言不发，在思考还是想借我们这俩张嘴，来宣传他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至于像徐伯威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听得来非常起劲,因为我们所讲的可是他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实话。

学习的第二节课，开头仍是由周学祝宣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九年前我在校园里第一次听到传达这个讲话时，完全弄不清讲话人的真实动机，当时欧洲发生的匈牙利事变和波兰独立工会，已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我们这些幼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还蒙在鼓里。

对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会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学生们所接触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欧美口号，没有几个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包含的内容。政治课每天向我们灌输的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美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可悲的是，谁也不知道今天苏联究竟怎么了，当时我们已听到了史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给俄国带来的灾难。

然而，无论是恐怖还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后的社会主义结果所纠正，野心家的狰狞嘴脸也在轮番的“实践”中暴露无疑，曾被欺骗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轻知识群体立即分化，一部分变成了疯狂的专制主义的伥鬼，一部分则变成了专制压抑下的反抗者。就连邓拓，吴唅这些共产党的才子们，也会从大鸣大放时期的“左派”积极份子，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将。

就以我们面前这位正在主持我们这次学习的，原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李培连，当年曾充做该校的右派学生的屠夫，当今重新学习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他会情不自禁的说道：“这几年确实出现了灾难，许多人饿死了，人民心头压抑的话不敢说。”

看来，李培连比朱国骥，周学祝之流真实多了，这是他从中共的上层得来的解脱，他说“极左的思潮在共产党内占据了上风，革命嘛总有左右摇摆的时候，主流还是好的”这一翻话的言不由衷，会在今后实践中继续得到证实。

“所以，我主张这次学习，大家要讲真话，只有说真话，才能接触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谈到思想改造。”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恼，还是敢于去触“文字状”的禁区，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于是他在这次学习上提出了三个让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该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

经济困难和饥荒，这些阴暗面是十个指头里一个指头的问题，还是该根本否定三面红旗？第二，中国眼下的困难是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难免的过程？第三，压制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不讲民主施以霸道？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了，李培连多少有一点讲理的成份，而讲理是独裁主义绝对忌讳的“禁区”。

不过，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泽东的天真，李培连倘若还保存人的基本良知，总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在中国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原来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所以当争论继续下去，越使他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学习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们相信中共宣传没有欺骗，也不可能让我们在监狱中，在他主持下变成公开批判毛泽东的讲坛。

有一次争议达到高峰时，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陈力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我看我们这种小组讨论得不出什么结果，除非我们大家都遵守一个规则，也是我们这许多年来实际的法则：‘强权便是真理’，否则我们谁都不会相信，中国发生灾难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实陈力点出这一点，才是中国政治的症结，在这个世道里要么屈服于强权的淫威，中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要么就当盲人瞎子，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才对。

对这个结论，李培连坚决加以反对，他列举了哥白尼和布鲁诺，以此来证明牺牲于强权的人并不承认强权就代表真理，其实强权是不是真理的问题，是同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并存于人脑之中的复杂而奥秘的东西，监狱中的狱吏们也不能在内心世界里逃避善与恶的较量。

如此看来这次学习是李培连们，试图用一种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来替代绳捆索梆的棒棒主义。

在这个尝试中，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来替自己信仰上出现的危机解脱，试图证明毛泽东也承认人的理性和感化。不过，他会在更多的人生实践中明白，在专制主义狂的字典里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独裁的狂人是无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独裁者只相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

到此时，李培连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北京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置他的理性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阴谋。虽然这位在九年前曾充当“右派”学生的杀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理性没有扎根在专制主义的皮上。

第八节 参观

正当我们的学习刚进入辩论高潮，1966 年 3 月下旬，农场接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通知，要所属的所有劳改单位按照规定的比例，挑选代表，去成都参观由公安厅所组织的“形势教育”专题活动。

参观的内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当时正在青羊宫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全国巡回展览”和“全国三新产品成果展览”。

中共建政以来，曾组织过几次在押战犯到社会上参观，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加速对他们的洗脑，并藉此来向国际社会显示他们“劳改”的人道主义，以改变孤立的国际处境。

不过这一次参观，是在国家经历了一次和平时期的空前灾难，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刚刚“复苏”之际，想借犯人之口，来“歌颂”被国内外普遍谴责的“三面红旗”，带有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这种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劳动厅分配的名额，盐源牧场派赴本次参观的总名额共二十二名。场部分给六队的名额占了三人。而李培连又从他举办的这个改造思想为主的“试验田”中指派了两个人，一个朱国骥，一个便是我，朱国骥是选出来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当然是“实验田”里要进行“攻坚”的人物。

选择我们俩一起参观学习，“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顾，有一种“效果”上对比的考虑，也是加强监督，及时收集反映的一种手段。

（一）刘顺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连选中了刘顺森。1963 年从重庆监狱调往甘洛途中，我们在雅安监狱抢馒头事件中相识，但一直分在两处，彼此还没有朝夕相处的机会。这一次相聚，我有机会详细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工人，用共产党的话说，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就因少年时代读到苏共第十九大上，赫鲁晓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中，少年敏锐的他，恰对中共产生相反的认识。

后来他又从姐姐在重庆市青年团机关工作的便利，得到了当时从来没公开的党内“机密”材料，更深的认识了中共内部的虚假和残暴。加上 1958 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对知识份子无理的摧残，以及粮食定量的灾难性结果，与陈力可谓同一类型的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叛逆。

1957 年，仅十五岁的他，因为在街上散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传单，涉及当时中共在粮食问题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认定散发反革命传单，被抓进了重庆市少管所。

李培连评价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这次在两百人中选中了他参加成都的学习，足见管教科对他的重视！

三月十三日，按照场部的通知，全农场选出来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前学习，我们三个人带上换洗衣服和毛巾，跟着钟管教再次来到农一队。

离开这里只有两个月，钟平波除夕之夜在这片坝子里的精彩表演，彷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同他交谈，我和刘顺森商量后，决定趁此机会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诚。

自从黄联关调到西昌，钟平波一直就在农一队，这因为他的刑期较短，而我和刘顺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讲了一些分别后的见闻，讲到对这次参观的看法，他态度非常冷淡，

说农一队近三百号人仅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一个平时负责出工集合的大组长，用他的话说：“这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什么意思。”并且说最近从成都来的人，讲到内地情况，老百姓依然穿补巴衣，半饥半饱渡日，所以没有什么可看的。

参观集中的当天晚上，偏偏赶上停电，全场一片漆黑。派出去监督大家的干事一个也没有到，负责这次带队的管教科股长庞玉笃，显得十分紧张，他担心摸黑跑了人就负不了那责。所以赶紧吩咐农一队的余管教，将二十二个人集中在干部会议室，点起了蜡烛，组织了参观第一次点名和座谈。

庞玉笃拿出点名册，点过名以后便叫大家坐谈对这次参观学习的体会，参观还没有开始，“体会”又从何说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农场近万人之中，中了这难得的头采，明摆着要大家对场部进行一翻感激零涕的吹拍，对本来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宠若惊，这本就是预料中的事。

坐谈会一开始，朱国骥迫不及待的放了头炮，接着，依次都表了态。说些不辜负之类的奉承话。惟独只有我和刘顺森以及古柏来的代表，始终缄口沉默，因为讲违心话，实在有悖于这么多年的亲身体验，事实的伤痕实在太深了。这恐怕决不是一两次参观所能抚平的。本来沉默表示我们的反对已经是很策略，何必在这参观前夕去扫了这位庞玉笃的兴？

可偏偏他指明点姓的要我讲讲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便从容的说道：“首先声明，对参观这件事，我本来就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也不会说感恩戴德的话，只是希望我在参观中看到的事实，能与报纸上的宣传相一致就好了。”

那庞股长早就习惯了我这种不冷不热的反调，倒是朱国骥却认为，我应该体会到这是管教科对我的关怀。真没想到，在农六队的较劲他还觉得不过瘾，现在居然到了这里还要纠缠我玩。“感恩戴德”显然被他理解为我对他的挖苦。

不过，事实很快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冷淡是对的，按照这二十二个代表估计，管教科会对我们出去参观学习的人，生活应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这短短的几天参观中，不会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这几天内让代表们不受约束，晚上可以住几天旅馆什么的，以显示政府对我们的宽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庞股长便将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个组，每个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干事跟班，出发前首先就向我们宣布本次参观的纪律，规定参观期间禁止单独行动，有事要离开组必须经本组管教干事同意，否则擅自行动则以逃跑论处。看来我们仍要在枪杆子监督下完成“参观任务”。

庞股长宣布的出行纪律，反映出对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欢天喜地的个别“代表”被泼了当头一盆冷水，第一天发言原先激动的情绪已经熄灭。

至于生活，庞股长继续宣布道：“在队上定量的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原先打算吃几天饱饭的人失望的看着他。散会后，看看时间还早，有钱的人都一齐朝场部走去，在小卖部买了许多饼干，干粮之类的东西带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辆带棚的卡车，在另一辆吉普车里载着五名管教干事押送下，卡车向成都进发了。车行途中，大家没有说笑，开始集中那天的新鲜气氛，被庞股长宣布的“纪律”和森严的守备彻底破坏了。就连情绪最亢奋的朱国骥也搭拉着脑袋，在拥挤的车里一言不发。

当然庞玉笃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参观者们在想什么，他们向来是奉命办事，最大的忌讳便是有人从他们的手底下跑掉。

于是，刘顺森开始向朱国骥取笑道：“别垂头丧气的，你当了上万犯人的代表够体面的？”对方报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停车吃午饭，这是我们到盐源来第一次进馆子。原先已听说三自一包以后，农业开始有点复苏，进饭店再不象原来那样，除了交纳粮票和配给一瓢连油星都看不见的牛皮菜外，便只有凭粮票才能买到的“高级饼子”。今天这一顿吃的是包谷面与米绊在一起的“干饭”，三个盘子里装的虽然都是些青菜萝卜之类的东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两饭，装了一个“冒儿头”，吃下有饱感。

能体面的坐在饭馆里，同干事们异桌同餐，使朱国骥又笑逐颜开起来，吃完饭上车以后，大家还猜今晚西昌会不会住旅馆，因为饭馆都准“代表”们用食，为了体现“参观”的特殊需要，住旅馆又怎会成一件难事？古柏来的两个年轻“代表”还大谈“自然灾害”时期的旅馆，是凭户口和“票证”去住的，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下午的旅途显然活跃了许多。

可是，当我们到达西昌时，敞篷卡车却径直的开到了西昌看守所门外，那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光景，天色尚早，几个年轻人苦苦要求庞股长允许他们能“集体”去西昌街道上“参观”。并说了一大堆为更好完成本次学习任务的好话。

可是这位庞股长毫不犹豫地将我们赶进了那监狱的铁门里。还向西昌监狱的守门值班干事交代了总人数，“交差”完毕后，吉普车开走了。

我们这二十二个盐源来的囚犯，排好了队，由那接收我们的干事带领着钻进了黑洞洞的铁门，来到两间显然是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监房里，那里面扑来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桶盛满尿的罐子敞开放在屋角落里，地上铺着草，看样子是关押犯人腾出来的监舍。

在车上讨论得兴高采烈的小伙子不开腔了，“旅馆”岂是我们住的？等待我们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这样的带臭味的牢房。还好，不一会炊事员给我们挑来了菜稀饭和二十二个碗，大家喝了稀饭便倒在那草铺上睡去，半夜里彷佛听到隔壁监舍里传来的镣铐声，咒诅声。

第二天的行程，几乎重复着第一天的样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过了相似的一夜，几个年轻人做的“旅游”梦彻底破灭了，如果此时庞玉笃再要组织“代表们”谈“参观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实在，就不会有人发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义发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达雅安时，天色已经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宫，进入雅安城以后，我便从汽车后面开的棚窗口，下意识的张望，想重新的回顾一下三年前抢馒头的地方，却没想到汽车在雅安城里，拐弯抹角的把我们送到一处高大建筑的铁钎门外停了下来，我们将头探出

车棚张望，只见铁门旁边的门灯下面，挂着醒目的招牌“雅安砖瓦厂”。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铁门紧闭，庞股长一边打着门，一边向黑压压的大楼里喊了好一阵子，才走出一个老头，他一面走来，一面在揉着惺忪的睡眼，当庞管教隔着钎子门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亮出证件，他才慢腾腾的打开了大门。

汽车开了进去，在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庞股长带着命令的口气，要看守人赶快通知值班干部，守门人回答说：“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办公大楼里没有一个人。”一边说一边还埋怨说：“为什么你们来前不早一点通知？现在上那儿去找人？”

庞股长只好指着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向老头说道：“就打开你们的会议室什么的过一夜，明天还往成都赶路。”商量了好一会，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宽大的屋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长椅，看来今天我们只好将就在这儿“和衣而眠”了。

住处找到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又走出大门，叫开了近旁一个小饭馆，店伙计为我们重新捅开了已经封好的炉子，在那里每人吃了一碗面。

当我们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间里，庞股长照例把我们交给了守门人，便离开那里，开着车另找住处去了。

我们被锁在办公大楼里，打开那屋子的窗户，庭院里将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进来，我从窗向外望去，依凭着月黑头，可以分辨出那走廊边黑压压一片的灌木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第二天，已经八点钟了，所有的二十二个人已经醒来，将就着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来水龙头，取出毛巾洗了脸。走出那屋子，其余房门都上了锁。便走出这栋大楼的门，沿着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两侧是花圃，里面栽满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从这里传出的。玫瑰的花藤覆盖了四周的墙角，整个环境倒十分幽静，院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开门的老头却没有看见，而昨晚进来的大门上一把大锁静静的吊在那里，看样子那老头还在睡觉，这老家伙也真贪睡，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门口的那口大钟，已经是九点了。

“组长们”没有一个露脸，倘若此时，有人乘机不告而别，这庞股长的约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们感到难受的是，昨晚填进肚里的那碗小面实在不抵事，胃里空空的直叫，本无散步兴趣，但是，干巴巴在大门上等，还不如走走。

于是我和刘顺森信步沿着那灌木夹着的过道向里走去。两排平房中一排被变电室占去，空着的另一排好像是车库，上了锁，四周的围墙很高，上面架着电网，估计这里原来可能是规划作犯人监舍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这么做。从墙头上望去，大约两三里远是砖瓦厂的烟囱，原来真正的砖厂并不在这里。

耐着性子，我们一直等到十点钟，依然没有一个人来，彷佛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遗忘了似的。几个年轻人早以按奈不住，扒在钎子门的铁条上朝外面大喊“开门”，嘴里咕噜着牢骚

和怪话，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便相约着合着拍子，一齐合声大喊！附近楼房里的老百姓，惊奇的打开家门朝这里张望。

看看挂在办公室楼里的时钟已经十一点钟了，人们在墙角找到了一些砖头，不知谁还找来了一根铁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气冲冲的刘顺森对准那钎子门上的铁锁砸去，门被砸得乒乓作响。

一个人影在大门外出现了，几分钟后，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了铁钎子门外，二十二张嘴开始向警察陈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是到成都参观的代表，昨晚把我们关在这里，饭也没吃，现在快到中午了，还不见带队的人来。还说："如果我们趁大楼里没人，把所有办公室偷个精光，你们上那儿去找人？"警察们正在商量怎么办，庞股长的吉普车在这个时候开到了。

大门外也围了一大群人，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庞股长下车后，故作惊讶的问道："昨晚我已经跟他们的队长在电话上联系好了的，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人来？"又问道："昨晚开门的那个老头呢？"围观人群中的一个老太太发话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见的。"

刘顺森按不住喊道："这些国家干部，吃饱了肚子，平时什么事都不干，星期天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连自己的办公室和正事都不干了，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可是饿着肚子被关到这个时候。"那庞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着钎子门呵责道："你一个犯人骂谁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吵闹撬门"？

围观的老百姓又一阵乱哄哄的议论，听得出他们对这个官僚的横蛮态度颇不以为然。砖瓦厂的队长终于出现了，他提着一大串钥匙，从老百姓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费了好一阵劲才把门打开，看样子那锁也不知道被那块砖头砸中，锁心变形了。

铁门打开了，庞玉笃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重新叫到昨晚过宿的房子里，关上了门，一迭声吼着，要刘顺森明确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认今天带头喧闹砸锁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而刘顺森据理力争说，这明明是庞股长一手造成的，大家无凭白故饿着肚子被关了半天，如发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人唇枪舌战地在屋子里干开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静地听他们吵架，他们中也许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这备受打骂的犯人，敢同管教干事们如此顶嘴。

谁不耐烦地吼道："我们都整整饿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先把饭给我们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响应，争吵才得停止。我们被叫到砖瓦厂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饭，这一顿与盐源农场一样，吃的是罐罐饭。

下午，庞玉笃从整力量，由五个组长压堂子，正式的召开了对刘顺森的批判斗争会。会上庞玉笃重申这次参观的"纪律"，强调大家不要以为出来参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里，任何时候只有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份，绝对禁止我们的反抗。

不由分说，当场就以"聚众闹监"的名义，给刘顺森带上了手铐。还说因为念及刘顺森年轻，考虑到参观期间从轻发落。

这可是当年我们看到战犯们参观所绝对看不到的场面，大家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始末，内心再次受到了震动，就连朱国骥都一言不发了，我在临出发前的一翻话，果然的言中了。

我们在砖瓦厂就这样多滞留了一天，这天晚上那砖瓦厂的队长总算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派人送来了二十二床被盖，西昌三月底确实相当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说是冻了一晚上，先前还在唱赞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齐的骂起娘来。

这天晚上我和刘顺森搬了两张长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边聊着三元宫抢馒头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围拢来津津有味的听着，忽然，刘顺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铐，从长椅上站起来用那手铐敲击着凳子的靠背，润润喉咙引亢高歌起来，仿叶挺“黑牢诗”自编歌辞唱道：

“带铐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盼天明，拂晓待鸡鸣。”唱罢，声音里带着哽咽，满屋子里的人都鸦雀无声，也许触井生情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带着沉重的枷锁，行进在这漫漫流放地的长夜之中？到了这个时候，参观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开心的。

（二）带着手铐参观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车时，庞玉笃总算给刘顺森下了手铐，这原因当然是给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总不能押着一个戴手铐的人来参加这堂堂皇皇的参观学习吧！

下午四点钟左右，汽车经过新津后沿着平直宽阔的公路宾士起来。同车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乡，便开始相互指点着窗外，讨论这一带的地名和小吃习俗，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

川西平原的阳春季节，比之盐源大不相同，春分已过，平坦的农田已点点翠绿，这正是栽秧季节，农夫们在田里栽插的镜头，迅速唤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农村里所见的印象，潜意识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决不希望那灾难岁月的农村继续演绎下去，即使毛泽东还没有垮台。因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难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么？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六点多钟，我们的车终于驰进了宁夏街监狱，与三年前充军甘洛离开时相比较，阴暗的牢房，碉楼，老天井和狭窄的过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比三年前，现在监狱范围扩大了，可以来回散步和活动，不像上一次戒备森严的整天关在牢房里不敢出来。

这一次我能独自出入监房，走出狭窄的过道，走进右前方的操场，还可以从那里转过墙角走到很大的广场中。那儿搭着戏台，是提供文艺演出和开监狱大会的地方，我默默看着那宽大的戏台，心中想，多少人从那上面下来以后，便被送上了杀场，或送去流放。

两天以后，各地的人员陆续来齐，监舍里已住满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围着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谈互通各劳改队的情况，气氛颇为热闹。

在过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场中，聚集满了到会的参观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奇异，装扮特殊的少数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来到这里他们都穿得异常鲜艳，还为大家传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例如“吃饭”怎么讲，“你好”“再见”“走路”等等简单的词

汇，吃饭时拿出他们带来的特备粘粑奶茶。为大家表演“吃抓饭”，宁夏街一时变成了中华各大民族的监狱。

我本想同他们交流，看看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多少残暴的血腥压迫，中共统治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安宁过，要他们驯服的接受毛泽东那一套“社会主义改造”，必会遭遇反抗。这几个“代表”兴许就经历过被称作“平定叛乱”事变，会向我们提供真实的内幕，了解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的“霸道”。可惜，一来语言不通，二来到处都是当局的耳目，还别说交谈，便是同他们接触久了都会受到干预。

搬着指头入监已过去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中，我们吞下了灾难的最坏苦果，经历了那么多饥寒交迫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已远不是七年前的学生时代，可以被假象所蒙骗。我会带着七年炼狱中已成熟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进行有效的“参观”，我会躲避不应发生的麻烦，我会抓住给我的这种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的机会，得到真实可靠的东西。

第三天，全体参加本次活动的上千名代表，在广场上集合，本次参观的组织者宣布，参观学习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个参观活动预计在一周内完成，整个参观人员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头进行。

我们这个大组，第一天重点参观春熙路的商场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筑；第二天参观新建起来的文化宫，以及骡马市的市场和商场；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宫参观正在那里展出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五十五面红旗巡回展览；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园，参观那里展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工业成果展览；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组讨论和学习，总结各人参观心得和体会。

庞玉笃欢迎大家投稿写文章，同时宣布参观期间七天内，每晚都会在广场放映电影或成都监狱演出队排练的文艺节目汇演。

整个参观都让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到达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车排着队列有次序进行，允许在市面上自由行动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们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们交谈，四天的参观无非是让我们看看，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可惜，事物总是存在两面的，用之过滥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于农业学大寨，则是一窍不通农业生产的毛泽东，坚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来掩盖推行三面红旗的惨败，为三年的饥荒和灾难辩解，也是夺回那“三自一包”占领的“农村失地”。至于三新展览恐怕只能作“形势大好的陪衬。”

我们就这样坐着公共汽车，从位于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宁夏街出发了。同六年前我到孙家花园从囚车里掠视灾荒的那种萧条相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场确有些起色：商店里有了货物；肉店里也挂着猪肉；菜市的摊位上摆着各种蔬菜和副食；食店门口不再有长长队列排着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揽着客人们用餐。

不过，要讲“繁荣”却绝对不够格，堂堂四川省府，连整齐的街道和高耸的楼房都拿不

出来。就以肉店里挂着的大大小小肉块来说吧，老百姓只能凭着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价买到。若要吃“计划”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贫穷的市民所能买得起的，当代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是在无产阶级暴政压迫下养成的。靠老百姓节衣缩食换来的市场“繁荣”，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时“繁荣”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相对三面红旗时代，可以说今天比那时“繁荣”，但是能将时间的长河纵向延伸而比较么？“旧社会”有这么穷吗？如果同“黑暗无比”的旧社会都不敢比，能说“繁荣”么？再比方说，同国外比得么？被中共称为“水深火热”的台湾，就无法作比了，那里除了时时传来炮声，老百姓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馋猫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来的诱人香味。或者在挂满西服的商店玻橱中，对身上那一套临行时，场部统一发放的新的劳改服自感猥琐，如此“繁荣”倒是凑合了几个年轻的“代表”，他们用家里寄来的钱，买了许多的“蛋黄酥”和“鲜花饼”，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包里，准备拿回去美美欣赏几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这种对农民松梆换来的，是牢牢控制着统治大权的老魔头，颇不以为然的，因为这盛世带走了他经营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有朝一日老魔头元气恢复以后，会不会像一阵风一样，卷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荣，重新回到过去？

使我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展览。我是学生，生来就有一种尊重事实的习惯，毛泽东真拿出一套崭新的政策，以公有制为基础，开拓出一条比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的农业之路，那么，我们又何妨不尊重事实，同全国人民一道山呼“毛泽东万岁”呢？

然而在这么大的全国灾难面前，这位自称的“革命导师”，为什么不能为老百姓纠正自己的错误呢？

我们参观农业展览的那天，天气特别好，又逢春暖花开的季节，据说，每年在这里都举办花会，惟独大跃进那几年却停办了。我想当年除了大家一窝峰的去炼铁，炼纲，放卫星而无力举办外，恐怕因为农业受到重创，花木也无源了？

我们穿过布满花卉的走廊，夹在市民行列中进到展览大厅，正厅里挂着新闻图片，摆着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伟”模型，其中当然有大寨大队虎头沟的改造远景，另一个大厅里则存放着一些良种种子和禾苗的标本，以及农业器械，农药之类，据说也来自大寨展览的五十五个典型。

举办展览的说明人，声嘶力竭为毛泽东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唱赞歌，那音调和音色都绝对与当年大练钢铁的开始曲一模一样，惨痛的经历倒使我担忧这些抽象的图片和模型，除了为惨败的三面红旗招魂外，几乎没看到一点解救饥贫的中国农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只好用“假、大、空”三个字来概括这些图片和模型。

（三）稍加统计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专门带去了笔记本，趁解说人员说教的时间，快速简单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红旗的全部“业绩”，一股灵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翻实实在在的核算，这是毛泽东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谁也没有去算算一个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树木，而最后练了几吨铁？谁也说不出一块实验田里投了多少工？费了多少种子和人力，耽误了多少农时？而第二年又收获了几许？这种简单的经济核算本属国家的基本依据，却被毛泽东黑着脸给禁止了。

因此，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年，人们在“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下干了多少蠢事？是因为没有人想建没需要核算，还是人们不敢算这些账？揭毛泽东的底？所以在这场大灾难中，竟无人拿出一份有数据，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劝阻蛮干，速速悬崖勒马。

是因为大家头脑发热，被毛泽东的气壮如牛“气魄”弄糊涂而没有想到，还是有人想到却不敢为之？尤其在庐山上，那些从朦胧中醒来的开国元老们，早知终没有逃脱囚死狱中的悲惨命运，倒不如在庐山会议上，抛出足有说服力的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揭底，就是牺牲了也会名垂千古。

于是，我从五十五面大寨红旗的典型中，选择了一个用简单数字加减法就得出结论的例子——河南安阳县宅北小屯公社，南滚龙沟大队的“事迹”，图片介绍这个大队在党支部“带领下”，选择二庄生产队一条田坎，费了两个冬天时间，投入八千个劳动力，动用两千土石方，筑起一条长 90 米高差 9 米的石坎，将一快平时只能种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块面积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们不妨把当时最廉价的农村劳力，每个工零点五元计算；并以一元钱一土石方，最廉价的投入来算，为了这二分八厘地，这个生产队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后假设改造后每年按亩产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当时粮价每斤 0.06 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 250 斤粮食，除去当年人口、肥料、种子的投入，每年从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会超过八元。

这就是说假设这快田经改造后，风调雨顺，年年获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 8 元要补偿耗掉的 6 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时间。

而七百五十年以后会是怎样呢？不妨让我们回顾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国的年代吗？环看华夏，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这种简单的垒石结构，有几个保存着？像这种民间的垒石结构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风化和风雨冲刷，便已是“古绩”了，这同毛泽东当年一轰而上的士高炉群有什么两样？而大跃进中轰轰烈烈上马的社会主义业绩，到今天没过八年，所剩几何？

三年灾难，数千万同胞饿死这惨痛的教训还不够么？毛泽东在指挥他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时，真是没有把为之打江山而牺牲的农民兄弟的死活，当成一回事，硬要把他们引向那个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获的，无止境的劳役之灾中，让他们备受饥饿死亡的痛苦？看来，眼前这点靠“三自一包”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使民不聊生局面暂趋缓和

的局面，竟反而成为他积蓄力量阴谋组织一场，打倒敢于同他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的“党内走资派”的本钱！

独裁欲正酝酿着，一场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阴谋，使经济上暂时的复苏，面临着销声匿迹的结局，农业学大寨明显的同三自一包相对阵，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将发生的社会危机，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于是我便写下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这是我留在盐源农场管教科，在文革开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说服力的文章。这一篇当年曾搅动西昌地区的“反动文章”，就是我对这次参观学习最精彩的总结。

1966 年 4 月初，正当报纸上起劲的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将北京城里，中共内部的“思想交锋”极为浓烈的火药味，从报纸上洒向了全国。

可惜被长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数中华苍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结束了九天的“参观学习”，我们从成都回到了盐源农场。

从成都回归盐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变脸，料峭的春寒使我们因少带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盐源农场，农场管教科再次组织了参加本次参观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农一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观后”的总结学习。

庞玉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势”写成“发言稿”，交他审核修改后，轮回地在农场所属的古柏，北鸟和二道沟三个分场进行分队传达，藉以教育一直对形势抱怀疑态度的一万名农场流放者。

刘顺森因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来早被庞玉笃划在宣讲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适，提前离开参观小组，回到了六队。

六队的“学习组”全体成员，以空前热情围着我们，询问成都之行的前前后后。一言难尽的我只能平淡的讲述了一路的经过，当说到刘顺森还为被铁门砸锁而挨了手铐的事以后，老头子们都沉默了。

陈力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朱国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回来了？我向他讲了详细的经过，特别向他说：“我写了《从南滚龙沟这个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后，他问我留下了原稿了吗？我说留下也没有用，经常都要大搜查的还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随时都可以写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坝里碰上了李培连，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想来庞玉笃已经向他讲了我在参观中的表现，只问了我一句“回来了？”通知我吃完饭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第九节 杨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办公室看书，见我进去以后，并不马上说话。我盯着他那张阴沉的脸想猜

出此刻他准备向我说些什么？凭我的直觉已经感觉到我这次参观有违他的初衷。一个“学习班”推荐出去的人，写出与当局完全相反的东西，等于给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处于一个彷徨的时期，他应当认真的读一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也许他就会明白是非曲直不决定于口舌之辩。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为虎作伥，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会违背人的认识普遍规律，李培连也肯定一样。

如此静默了几分钟，他慢慢地抬起眼来，似乎文不对题地问道：“三国志想来你是看过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瞒兵退斜谷’这一章不？”我一时的被他这个出其不意的问话感到不解，竭力回忆起我在初中读过的三国志，只记得曹操失了汉中退守阳平关，在斜谷界口被蜀军围困，其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便摇了摇头。于是他不紧不慢的把这段故事细细的讲来：

曹操与刘备率军战于阳平关斜谷界口，由于粮草被张飞所劫，遇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军耻笑，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是夜，疱官给他送来了一碗鸡汤，曹操看到碗中的鸡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敦请示今夜军号，曹操随口回答“鸡肋。”敦出帐传令全军，今晚以鸡肋为口令。

行军主薄杨修见传此令，便教随军将士打点行装，准备回程。敦不解而询问杨修，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承相进退不得，正思考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故出此军令，所以还是早打点行装，以免临行仓促。”

夏侯敦闻言置信，正在令军士收拾行装，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烦巡视军营，见夏侯敦军内如此行动便召敦问原由，敦答：“这是主薄杨修解破今夜军令，知道主公已无心恋战，不日就会撤退，不如早作准备啊！”

曹操想起杨修恃才放旷，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儿子面前，点破他的内心机密，早怀忌恨素有杀他的心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借口，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斩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马超魏延大败，中了一箭几乎丧了命，这才想起杨修的话，悔不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杀了道出真话的杨修，才有如此败局。遂下令收杨修尸体，厚葬，并传令班师，带着箭伤回到了洛阳。

杨修因屡次识破奸诈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后召来杀身之祸的故事，本来就是了解三国志的人所共知的，罗贯中是否怀有警示后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论，但出在今天社会上，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层层封锁，隔墙有耳的监狱这种险恶之极的环境中，李培连几乎是坦言了他的观点，用历史的典故来告戒一个备受监狱狱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杨修式聪明外露的人物并不重要，但这种坦露内心，作为一个狱吏确实难能可贵。他这不等于在告诉我，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上，我们原本是一样的。向我讲杨修的故事，仅仅表明他对我“赤膊上阵”的担忧。

中共党内派斗已演化为公开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那一个派

别的成员都会严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页，否则随时会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辨子，引来杀身之祸。到这个时候我明白，他组织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真费了一翻苦心。他确认，只要还没有失去人性和良知，处在不同社会层次上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向恶势力作斗争。

“我看了你这次去成都参观所写的东西，”李培连挑明了今天把我找来的用意。“不过，我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才最能洞察现实，若大的中国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见识广的人恐怕并不少，他们今天都在沉默和静观，没有像你那样锋芒毕露，这些人可并不是你能用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许在这种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的博斗之中，一味靠勇气和牺牲是不够的，但是何以证明这种“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为内心虚弱所进行的辩护？观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无大志，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而后者是不讲时机一味蛮干的莽夫，随时可能成为“铁拳”下的齑粉！

但是，我听得出来，我们对毛泽东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线”的认识还有相当的差距！对这位比一般的狱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讲出我对将发生变化的看法：

“毛泽东当然不会只是普通玩弄路线斗争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开国之时为了稳固自己今后君临天下作准备，你大概不会忘记他早期所作的‘沁园春《雪》’吧！那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古代君王无人能同他相比的宿愿。”

“他想把中国拉回到一个独裁的帝王时代。他的‘社会主义’既是他认定的王命，违背这王命等于让他从皇帝的地位退下来，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个渺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的人岂能不采用开国元勋所使用的技俩，他们哪一个不在开国后对开国元勋们大开杀戒啊？刘邦杀异性姓王，李世民玄武门杀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后，竞会认为他的大臣们一个都不可信。”

“就连忠心不二，通达阴阳的刘伯温都只能回青田隐居，对胡丞相以‘叛国谋反’罪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你想一想，刘少奇像不像胡帷庸啊！”

“难道毛泽东所有发动的运动，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为自己黄袍加身作准备么？但是时代必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条，遇到了严酷现实的否定。他必须从这个死胡同里慢慢的拨出腿来，却遭逢了国内，国际那么多的谴责和压力？”

“要他退出历史舞台的声浪，迫使他为保住独裁政权重新组织人马，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的缘固了，这也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时代。更何况他所主张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把中国带到了贫穷和野蛮境地，他已经孤注一掷，走上了消灭一切反对派的绝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就因为统治阶级过份的残暴，才逼出了农民造反，‘皇天当变’来的么？当然，这可能是渐进的过程，共产党或者放弃它们独

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来就是老百姓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观潮派，由谁来改变这种苦痛的现状？”

“现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让人民不再沉默的义士，即使这些义士有些人会牺牲自己，但他们能换来民众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对于我这翻议论他默默地听完后，没有反驳也没有赞同，我们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我清楚，对于像他这种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人，是不会轻易的表示对我见解的认同的。但是我想总有一天，生活的实践会修正他原来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须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获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种胜利。

可惜，这一次便是我们之间在狱中的最后一次思想交流。

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思考中，才渐渐认识了中共的，与李培连不同的是，我是从对自己所遭遇的无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开始的，而李培连却是从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异类。当年反右派运动，我是被无端受整的学生，而他当年却是雅安农学院对右派学生进行残害的打手。在三面红旗的振憾下，我也未曾想到过毛泽东真是一个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类的外衣，以及恶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若我这一晚上给他讲的这一翻道理，拿到 1958 年去向他讲，说不定，我不但不能点拨他的盲区，还可能为他“邀功”请赏提供材料。今天我这样讲，会不会对他的心灵起着启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会的。

直到今天，毛的遗毒还在被他的继承人死抱着不愿清算，给人深深的担忧。我是因为我有一种从切身的痛苦中，产生出铲除他遗毒的深切愿望，来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我把这当成我义不容辞的天职。

（上集完）

中 集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5 月，我们在成都参观前后，中共内部的“宫廷”较量，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拉开了序幕。毛准备多时，利用青年学生的盲目轻信，将全国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正在转嫁给“资产阶级司令部”!

不识其阴计的彭真们果然上当，抛出了《二月提纲》，并且掀起了二月镇反运动！当然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一些往这个运动中钻的毛孩子们，轻易上当，充当毛泽东发动的宫庭政变枪手，就在预料中了。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在边远的盐源小城同全国一样，盐源农场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派往各所属的劳改中队。

这些工作组显然并没有弄清楚“二月提纲”骨子里要卖什么药，只凭他们的本能，跟着党中央的决定走。按照他们对中共运动的理解，照例是抓一批反革命向中央交差。

六队是农牧场重点关押反革命份子的中队，派赴的“社教工作组”阵营特别庞大，由五名科级干部组成！

六月初正是农场栽种的农忙季节，为了“保证”学习，场部规定下午五点钟便按时收工。收工回来后，组织我们学习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文革”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全队集中收听了播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后，便以“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题，组织了全队人员的分组讨论。

然而这些年，备受折磨害怕中共那套“放长线钓大鱼”欺骗的农六队流放者，大家都以沉默来回答。第一天的分组讨论，会场上冷了场。

已经失去了民心，甚至失掉了中共党心的毛泽东。由于独裁本性使他不可能吸取教训，退位禅让。相反的，从 1959 年卢山会议开始，到 1964 年，经过了将近五年的准备，一个反对党内反对派的阴谋终于抛了出来。

《五一六》通知已经摊牌，李培连十天以前的那翻讲话还响在我的耳际。虽然我的心里堵得慌，几次想痛斥文化大革命的险恶动机，可是又觉得应当再观察一下，到口边的话被我吞了回去。

第一节 宫庭政变——我对文革的看法

第二天场部派出的工作组，再次作了动员，讲到了这次“文革”的“伟大”意义，重申这次运动与以往任何学习都不同！宣布了会场三大承诺：

畅所欲言，各舒已见；对于在开会时公开发表的意见不抓辫子，不作记录；保证不作秋后算账。农场的社教工作组组长，政工处蒯处长，见全场依然同前一天一样冷清，便指名点姓要我和陈力分别在两个组进行“发言”，并向我们提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保证。

这几年承蒙共产党的“教育”，让我明白，毛泽东发动的每一个运动都预先把“革命”对象作了界定，不管你对运动持何种“态度”，只要被划为挨“整”范畴，是一定逃不掉的，

（一）激辩

我清楚的看到，本次运动挨打的对象是中共内一批对三面红旗不满的人，其中不乏“海瑞”式的“直臣”，他们并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但必竟在当时较能体察民情，深知毛那套理论带给大陆的灾难，尽管这些人压迫过我们，与我们本无共同点！但为推翻独裁势力，仍有必要同他们联合。何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想到这里，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向蒯处长提出要求“我的发言不作记录，不负法律责任。”

在得到他的点头应许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发言：

“首先，《五一六》通知中一个提法值得在场的人认真思考。”我的开场白吸引了在场两百号人的注意力，全场鸦雀无声。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名字叫人民共和国，毛主席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比以往资产阶级共和国更进步更民主的国家吗？这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共领导人不是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吗？何尝有培养接班人一说？那是只有在封建时代皇帝废立太子时，才可以说，自己在培养继位人。而在培养继位人中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才是封建宫庭之争。现在这样说等于承认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皇上的专政，许诺给人民的民主权力全是假话!”

“挂共产主义的羊头，卖一贫如洗的狗肉的北京领导人，面对年年欠收，到处饿死人的局面，却偏要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逼着老百姓赞三面红旗好，这不是指鹿为马么？”

坐在我对面的周学祝举起了手，可惜，蒯处长没有理会他。

于是我接着将历史追溯到九年以前，从 57 年毛泽东打压知识份子，封人之口的反右运动，讲到“三面红旗”；从人民公社和社教运动，讲瞎指挥下的一场浩劫；从放卫星到大寨运动，讲违背社会正常的运行规律带来全国大幅欠收；从大炼钢铁讲强征民间劳力，炼得一堆废铁，劳命伤财。结果造成大饥荒，饿殍遍野，国家元气大伤。

“老百姓最初怀着模糊不清的希望，以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会给他们带来共产主义的繁荣，半信半疑地跟着他的部署走！炼钢炼铁，成立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

“结果疲惫不堪的农民从原先的穷困走到了饥饿和死亡！于是大家才明白毛泽东不是神人，他只不过像‘燕山夜话里’，用一个鸡蛋的家当落地破碎的泡影，哄了大陆老百姓。”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走到了连他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无法相信的绝境中，走到了共产党领导核心都无法维持统一的1966年。因此，任何有现实感的人都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排斥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发起的宫庭政变!”

我斩钉截铁的为我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发言作了结论。

也许，“宫庭政变”这么一说在当时确实语出惊人，令主持会场者出乎意外，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提出了一个他们没有想到，也不敢想的问题，让他们开了窍。使他们“发聋振聩”了。

突然，坐在我对面的周学祝霍地站起身来，向蒯主任递了一个谄媚的眼色说：“我认为孔令平借学习会在公开宣扬三家村言论，应该给予批判，还要让他自己消毒!”

周学祝这人因背是驼的，我们叫他周驼背。李培连因为此人也是右派，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平常很擅打“小报告”，所以指定他任我们这个特殊学习班的组长。看来，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学习，对他这种找机会都想从狗洞中爬出高墙的人，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现在他也许看到，他面前又是一个很好的“立功赎罪”的机会，岂能放过?

被人猛然提醒，蒯主任显得局促，一面应和道：“对，大家要对孔令平这种借学习讨论，进行放毒的言行加以批判。”

但是，我却不动声色的坐在那里，提醒蒯主任在我发言前所许诺的条件。周驼背见我坐着不动，便走过来拽我站起来，一边说：

“毛主席说的凡是毒草就要批判，你今天明明用报纸上正在批判的话在这里放毒，哪有不消毒的。”

我并不示弱，顺着他来拉我手的力量轻轻一送，便将他送出了两米外，跌倒在地上。

被这出奇不意的一搡所恼怒。周驼背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拼命的狂喊：“反改造打人啦！反改造打人啦!”并再次向我扑过来。顿时我们俩扭成一团，会场中立即哄闹起来，蒯主任连忙叫人将我们拉开。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邓扬光从围墙的拐角处冒了出来，自从李培连接手农六队的管教工作后，他便从六队消逝了几个月。今天突然露面，想必与工作组的派驻有关，说不定他便是工作组的总指挥。

他走到我面前，我才发现他的手上提着一付手铐，身后还跟着两名武装士兵。没问任何话，我便被那两个士兵按倒在地，反剪着双臂，戴上了一付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土手铐。看来，他早已准备好了。

陈力和刘顺森们一齐发出怒吼声：“还讲理吗？动不动就打人!”

邓扬光将身子转向陈力，冷冷的说道：“你少嚣张一点，我们对你们这样顽固不化的份子，有的是办法。”

今天的邓扬光把他在古柏的那凶恶的面孔从显出来。在他的指挥下，我和陈力被两名士兵连推带搡地关进了东北那一排，靠岗楼下最角落里的两间房间，那里当时是用来堆放粮种的临时仓库。

我和陈力骂不绝口，直到被重重地掼在那屋里，锁上大门以后，工作组驱散了围观的流放者。

（二）夜深沉

天色完全黑净，沸腾的院坝慢慢静下来。

仓库里寂黑一片，蚊子发出的嗡嗡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好像无数轰鸣的飞机在看不见的地方朝我们攻击！向着我的脸上、颈上乱扑乱咬！我只能用嘴吹着气，不停地地驱散它们！

从方才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后，凭感觉我此刻正背靠在一条装满包谷的麻袋上，由于身体的压迫，反铐的双臂被压得又酸又麻，努力想站起身来，双手被手铐箍着的手腕，因手臂的运动而剧烈刺痛，一点也搭不上力。

此时，我才感觉出手腕被箍的颈部，那过小的铁箍内圈“利刺”扎进了肌肉里，稍一动弹那些刺便会在肉里搅动，令我挖心般的疼痛，不禁骂了一声：“好歹毒的邓扬光！”

凭藉腰力慢慢地移了一下身体的位置，靠腿的力量慢慢站起身来，藉着面前铁窗纤子缝泛进来微弱的光，我辨清了门的方位，便挪动脚步，朝着窗口方向挪去。

我移近那铁栏的窗子面前，向对面的队部办公室的房顶望去，在那房顶与我们的房檐之间，我看见了那一片很窄的夜空。星星在那里眨着眼睛，而院坝里却是寂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侧耳听去，除了蚊群的轰鸣，四下悄无人声，便用脚去踢那木门，想弄明白，此时，在院坝里巡逻的哨兵躲在那一个角落里，但院里没有任何回应。

隔壁的房间传来了相同的踢门声，这是陈力给我的回应！此刻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彷佛唯独只有我们俩才没有睡意。越是如此的清醒，越感到时光在黑夜中停滞一般。

静谧的夜，像一尊巨大的石头压迫着我的心，使我闷得发慌。想到刚刚发生的一切，眼看北京城一场政变风暴已经来临。中共上层酝酿已久的大分裂，终于演为激烈的内讧公开化了。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就像埋藏在地底积郁很久的火山岩浆，终要冲出岩层喷发了！此刻正经历着火山爆发前地壳的沉默时段。

可惜，令我郁闷的是，为什么偏偏毛泽东靠了一群孩子先发制人占了上风？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吃尽毛泽东苦头的人民会不会勇敢站起来，在中共对垒的两军之中起决定作用呢？

我对着那长夜天空长吁了一口气。然而当我想起刚刚发生在这院坝里的一切！那张牙舞爪的周学祝，那变脸的邓扬光，以及那手足无措的蒯处长，便深深感到偏僻的流放地，还是那么的黑暗和复杂。

心中闷得发慌，便背过反铐的双手，挺着胸，贴在铁栏上面，放开了喉咙，朝着院子里

高声吼道："为毛泽东卖命的农民弟兄们：你们这几年尝尽了饥饿和灾难，还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三面红旗给你们带来的么？"这一声是对那些在岗楼上的士兵们喊出的，因为他们绝大部份都是农家子弟。

"不要再发狂的斗下去了，这几年还斗得不够么？阶级斗争，给你们斗出什么来？除了饥饿和灾难，你们得到了什么共产主义果实？""你们想想，你们的领导人都同毛泽东闹翻了，连他们都不相信毛泽东的欺骗宣传，你们信么？"这是对这些干部们喊的，又是对看不清形势的沉默的中国人喊的。

我相信在这深沉的黑夜里他们会静静反思，静静权衡，恢复被蒙蔽的理智。

"天快亮了！文化大革命是宫庭政变！连你们的领导们都看清楚了的，你们还看不清吗？你们该清醒的站在哪一方，"

我大声吼道："天快亮了！天快亮了！"那喊声一迭迭的在院坝里回响。

这喊声是对专制魔王的诅咒！这喊声像惊雷，振得整个院子嘎嘎直响，振得沉睡的人们蓦然惊醒！

这喊声是沉默了好多年，数千万地下的饿鬼发出的呐喊，这喊声如此的凄厉，如此振撼人心。

静夜适合于人们招回失去的良知。沉默除了证明他们的心虚外，在我看来不会有其它的原因。

除了蚊虫的轰鸣，没有任何回应，然而我不相信此时的邓扬光呼呼大睡没有听见；我更不相信，距我咫尺的哨兵没有听见；他们之所以沉默，不正是在对我的呐喊进行思考么？

人到了这个地步，便没了畏惧。没有坚定的必胜信念作后盾，就不可能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第二天的清早，当开饭的时候，大田组的组长，曾当过派出所长的王家祥，把饭端到离我窗口不到五米的土墩子上，频频向我致意，他一再把他的大拇指翘向天空，并且大声地笑吟："天明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接着是王大炳，刘顺森，周志他们都用不同的手势，向我致意。

经过一夜的呐喊，虽然很累，但全无睡意，头脑异常的清醒。而那反铐着的双手，最初的疼痛似乎已经麻木了。奇怪的是无论是站岗的老管还是管教干事，竟没有一个人干涉我。

吃过早饭，大家出工以后，打开我的房门，为我解下手铐的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年青管教干事。当他解下我的手铐，只是皱着眉头，望着我那红肿得像馒头的手，没有说话，便转身走出了院坝。

不一会拿来了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碘酒。一边自言自语着什么，一边眯着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慢慢地为我擦着两个血淋淋的手腕，最后他又拿起已经下下来的手铐，揍在眼前

细细地观察着，再提着那有刺的铐子走了出去，换了一付大手铐并将我改成前铐。什么也没说。

好像昨晚他压根就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也没有听到我的喊声一样。

装糊涂原本就是解脱无奈的最好办法，这年月谁又没看到中国的灾难，谁又看得清将来会是怎样的呢？所以还是对我这种态度鲜明的人保持装糊涂为好。

到此时，蚊虫已经飞去，我才感到又困又累，便就地捡了一几张麻袋铺在地上，倒在地上呼呼地睡去。

一周以后，这个新来的管教何庆云便将我下了手铐，并且从那间临时仓库中放了出来，回到我原来那个组里。

随后，何庆云将李培连组建的学习组解散了，我被编入了蔬菜组。指定周驼背专门对我监督。唯独陈力却依然关在仓库里。

两个月以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之际，他被押解到盐源县城看守所，直到四年以后在那里牺牲。

不久《十六条》公布了。

《十六条》只字不提全国老百姓最迫切的生存问题；而是利用各级地方官吏曾在二月中镇压学生的机会，定下大民主的基调；向走资派夺权，是决定中国命运压倒一切的任务。又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年轻学生们吹响向镇压他们的走资派夺权的号令。鼓动他们砸碎"资产阶级"教育的桎梏，冲出学校，并号召他们在全国进行大窜联。

他命令将全国大大小小的仓库打开，将这几年全国老百姓节衣缩食的血汗储备，分发给他们。

甚至不惜将军械库打开，怂恿他们为"夺权"而武斗！这些从学校放出来的孩子们在权欲的支配下，以保卫毛主席为旗号，戴上"红卫兵"的袖套，肆无忌惮的对社会进行公开掠夺、杀人放火。

藉助他的亲信和特务，利用学生们对中共统治各级当权派的仇恨，摇身一变装成了学生们敬仰的领袖。将自己抬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宝座，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公检法也暂时全部瘫痪。

当时我同刘顺森等人讨论到红卫兵现象时，他说道："你看现在的中国红卫兵像不像法兰西大革命时，波旁王朝路易·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组织起来的十二党人保卫王朝的那一段历史？"

我答道："岂止如此，红卫兵对社会的破坏，远远超过了由流氓地痞组织起的十二月党人，一个独裁狂人为挽回民心，会在民主潮流的历史条件下，使用"大民主"这种手段。它的灾难要过若干年后才会显露，不过纵有再多的阴谋，最终还是逃不过对他罪恶清算那一天。"

任何一个社会在变化的"临产时期"都会有"阵痛"出现。这真是"夏桀之常违兮，乃

道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一场空前的民族内战和浩劫，就这样开始！

不要以为公检法的瘫痪，使中共对我们狱中的迫害稍会放松，要知道这种瘫痪是毛泽东夺权的需要，只要毛泽东还稳坐在皇位上，对于按他的旨意而划的五类，歧视和镇压只能更加剧，只有幼稚的红卫兵们为表白对“红太阳”的忠心，拉出可怜的黑五类来“杀鸡给猴看”。

（三）最后一点“理性”

李培连苦心设计的理性“感化”时期结束了，农六队疯狂的军人逞威，肆意打人的年代开始了。虽然现实的荒唐，绝对不能为他的感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实中充满了欺骗，但总还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毛泽东竟然连这也丝毫不能容忍，他需要吹捧他的奴才，而不是有思想的人。

不久，李培连本人落入狱中，生活的实践会纠正他原先的幻想。面对着这个更疯狂年代的到来，我感到当局已无理可讲，就只好等着客观的辨证过程将它演变到“彼岸”去了。

我们耽心在这种时代消亡过程里，弄不好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的惨祸将降临我们身上。李培连劝我静静观察的意见被我采纳了。

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过去同当局正面交锋的态度，保持一种沉默，我的沉默，被高德胜注意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我沉默了足足八个月以后，高德胜在六队主持了最后一次全农场管教工作会议，并指定我为中心发言人。

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全场各中队的主管干事以及管教科的全体成员，共三十余人在六队召开。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高的用意，究竟是想借我的口说出他不敢说的话，还是想证明他主张的感化教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如何，我只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我的想法。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专业的管教干事们来讲自己的思想，我表现出了一种费解和怀疑。但是我仍本着一惯的态度，讲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是一场毛泽东为铲除政治上的异已，而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同八个月前的发言几乎没有任何两样，虽然我明白，现在谁公开反对红太阳，红卫兵可以把你当场打死。

我没有去看主持会场的人有什么反映，因为一个人的信念一旦成熟后，会不顾一切的坚持下去。

人们终有一天会从狂热中静下来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的前前后后，他们终要认识所干的蠢事，原来都是受了毛的怂恿。等到他们认识这一点时，大致历史才开始用实事求是来评价。

我那一次的讲话足足用了一个小时，会场里很安静，没有人反对我的话，叫我中途反省，那比我在大学时的批判会文明多了。

但是，只要我还没有被逼感到我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冷静的思考是我能够接受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更好的适应生存的需要。

不过这不可能说，我在接受强加给我的改造。因为首先，我认为强加在我身上的罪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要寄望于我会放弃我已经形成的观点，因为谁都承认，认识来源于客观的存在。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有一天，新调六队任中队长的郭川小到蔬菜组的菜棚子里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说，高书记将去五七干部校学习了，在去学习之前想特别的找我谈最后一次话。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紧靠蔬菜地的小河边杨柳林中，他穿着一身麻色的中山装，看样子很苍老，也很焦虑。我明白他的官早被罢了，革了一辈子的命到头来，马上就要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心情也许比我们还沉重，但是作为并不知他底细的“犯人”，我不可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所讲的全都写在纸上了，从小监到现在，也有两年多的时间，想来他都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什么人，会一辈子记在心中。

正在接受审查的他，把我找来，一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牵挂。郭川小是他当年的警卫员，要不是他，我们恐怕这次见面都很困难。

那次谈话只问了我现在生活得怎样？关照我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便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摇晃着他老迈的身姿，消失在田坎的尽头。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但我看到在他这种还保存着良知的中共干部身上，我的话起到了振憾的作用。我深信他必会在“文革”的炼狱中，彻底的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彻底扔掉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幻想，甚至背叛那个追随多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三节 文化的浩劫——人权的厄运

1968 年这一年 4 月 21 日的晚上，我戴着铐子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白天激动的余波在静夜中又喧沸起来，我真想同刘顺森，或者张锡锟倾诉我的内心，但是我无法接近他们，听见那睡在我前面的周学祝所发出的鼾声，我便轻轻地坐起身来，这一天正是阴历的三月下旬，满天浓云，院子里很黑。

我想到院坝里走走，但那是决不允许的，何况我戴着手铐，岗楼上的哨兵是要干涉的，弄得不好还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我此刻想到“这大监还不如小监，倘如此刻我还在小监中，无论是粮库还是羊圈，我严可以起身在屋里徘徊，调整一下自己的神经。因为今天，对我来说，可算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当着万名流放者在审判台上“宣誓”，可不是一时痛快搏取他们对我精神上的一句称赞话那么简单！

回想三十年我的人生历程，还不满二十岁被蒙蒙幢幢圈成了“右派”，中国人讲名份！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

“右派”这顶我根本就戴不住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实际上是用歧视，饥饿和劳狱压迫我稚嫩的神经，扭曲、扭曲再扭曲。

过渡的刺激使我神经失常，过渡的失望使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我就这么为反抗个人的

不幸，苦苦挣扎到今天。当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百姓的苦难，才在我无知和虚幻的头脑中，扎下了对暴君仇恨的根。

然而："决策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这便是我今天在审判台上表达的意愿，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一直被扭曲的神经才得以恢复！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戴在我头上沉重的大帽子被我甩掉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再那么压抑，三十岁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钻死角的灾难

"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一发表，本该由毛所戴的叛徒、内奸、卖国贼罪名统统都戴在刘少奇的头上。等待着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五类份子"又要增丁添口了。

那些正被划为走资派的人，为了逃避厄运，表现自己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忠诚，更以"极左"面孔对我们进行疯狂的虐待。

新的场部领导派出了工作组坐镇农六队，制定了批斗计划，将六队"顽固不化"的反改造份子进行了排队，准备一个一个的推上斗争会收拾。

这样的批判斗争，从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至今也有十三年的历史，掌握斗争会的老当权派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斗垮一个被推上批斗席上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足以使被斗者精神互解的"钢鞭"，将被斗者行为中可以引起公愤的东西无限夸大，不惜无中生有的捏造。

例如：过去管过财务的，可以以帐目不清为突破口逼他承认自己贪污；爱占小便宜的尽可以归入偷盗；个性强，爱与别人逞强打架、必可以说他是"流氓"；有男女亲密迹象的，更可以无中生有的说成"通奸"等等。

但是对于监狱长期关押的我们，什么都扯不上，于是只好在"语言"和"思想"上做文章，被斗者语言稍有不慎，便会被无限上纲，扣上"对社会主义或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或"对伟大领袖造谣诬蔑"之类的大帽子。

当然，像我这样，不用他人戴帽自己就会承认的极端顽劣份子，便会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帝修反的应声虫"之类套上，最后只有用"死路一条"来结论了。

然而，经念得不灵，敲木鱼的人会厌烦，有时斗争会反被斗争者抢了理，数落起老百姓的苦难，共产党宣传尽说假话之类的时候，甚至主持会议的还要借被斗争者之口，趁机大发牢骚，使斗争会越来越开不下去。最后，变成了参加会的人胡诌瞎扯的龙门阵会。

自从"毛主席语录"问世以后，组织斗争会时根本就不讲什么事实。主持人都学会用毛主席怎么说就给被斗争者定了匡匡。偶然出现那被斗者，据理力争，那么要使斗争会取得胜利结果，还必须仰仗操纵会议的打手班子。

文革一开始斗争会，无不以语录开始，打手退神光，演出一出一出的丑剧。

四月二十一日，场部宣判大会以后，盐源农场的气氛一天紧似一天，首先是岗哨上的卫兵“加强防范”，列出许多新的规定，晚上解小便上厕所，只要一跨出监门必须呼喊报告。如果报告声音太小，被认为没有喊，轻则被老管们叫到岗楼下面罚站，重则哨兵从岗楼上下来人，一顿的毒打。

进出大门，必须先立正呼喊报告，得到岗楼兵允许后才准开步，否则便要被院子里的巡逻哨兵拦住又是一顿打！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氛围下，盐源农牧场批斗牛鬼蛇神的斗争会，便从农六队开始了。

（二）“算总帐”

九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吃过早饭以后，队长徐世奎和管教何庆云从出工的队列中叫了八个人出列：

红炉房的铁匠吴兴全曾当过邓锡候警察的成都地头蛇；木工邓世权，一个在成都码头拜过袍哥红旗管事的老痞子；当过国民党军队上校作战参谋，去成都参观的朱国骥；曾任过原国民政府雅安城防司令的上校司令官王德全；曾是解放军西藏军区当过上尉军需官，因投敌“判国”而受到成都军事法庭判刑二十年的马文华；以及周学祝，冯俊伯，代朝谋这些在六队有代表性的“红毛犯人”。

他们判刑前身份各异，“罪名”也不相同，但想从狗洞里爬出去，获得减刑的渴望却是一样的，为减刑而不惜踩在其它犯人的肩上，满肚整人的坏水都一样。

被叫出列以后，他们开了足足一上午的会，到中午我们收工回来时，都还没有从队部办公室里出来。

吃过午饭以后，何庆云满脸严肃的向全队宣布，下午不出工，全队学习，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去，先将我的手铐上成反铐。我正猜测不知又要对我作何处理，何庆云已经告诉我：“今天下午召开你的斗争会，反省这么久，也该把污蔑毛主席的言行及攻击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放的毒，统统地消了。”

自 1962 年我在孙家花园反省室里挨斗争以来，斗争会日渐少了，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这些斗争会无法开下去，比如说三年前在甘洛张棒棒组织的斗争会，几乎变成了快要饿死的流放者的诉苦会。

近来，所采取的手段变成李培连所贯彻的“说服为主”，但没理的理怎能说服人？说而不服，反被受教育者反过来说服了。

明明全国弄得来老百姓啼饥号寒，怎可强人接受“形势大好”？即是方法和态度再讲究，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都只能枉费心机！

当然魔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在组织新的阴谋，毛就说，已找到使“社教”运动有效进行新的方法，生养修整已整四年，到他反扑的时机了。

现在，又回到五年前了。对于老参加斗争会的“运动员”，自反右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我知道这样的会早已“程序化”了。

第一步叫“退神光”，先对被斗争者拳打脚踢，辅之以口号，让他先胆寒几分，失去控制！接着便是在颈项上挂上水桶，使被斗者无法将头抬起来，只有埋着头接受批判，名曰：“端正态度”！

第二步才是检举揭发，参加斗争的人站在被斗者面前指夺着被斗者鼻子，一边辱骂，一边戏谑，骂得性起，时不时给被斗者的脸上，头上扇上几耳光，或者几个人围着被斗者像打排球一样把他当演练拳艺的肉耙子。

最后围斗的人玩累了，便让被斗者颈上挂着水桶，弯着腰站在中央，而大家便各自吹着与斗争会完全无关的龙门阵。

我不知道，中外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斗争会”的记载，还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新发明，而专其利的。

总之斗争会是对被斗者人格和身体的一种当众羞侮，因经受不起这种人格羞侮和肉体折磨，文革中死于自杀的人无以数计，除非明白了这层用意，便不会被这种羞侮所击倒。

何庆云通知我以后，斗争会立刻进行，我还有点出其不意。按经验，对付斗争会我要做的事，便是保护自己的前胸不被暴徒们打伤，今天双手铐着，剥夺了我自卫前胸的能力，如果心黑的暴徒当胸给我两拳，打断了肋骨，或伤了胃、脾或下身，纵然不死也成了终生残疾。

马上想到该反穿一件棉被心应战，哪怕是阴历八月，为了防止胸部被打伤，热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仓促上阵。

我从何庆云那里回到寝室正在纳闷，邓自权和吴兴全两条老狗，已经凶神恶煞地跟着我到监舍来，两人连推带搡的把我扭到了一年前关押我的那间临时保管室里，现在那屋里已经腾空。

屋子里已塞满了人，除“主持”会场的何庆云坐在一张从办公室搬来的凳子上，其余的人全都站着，中间大约一米半径的半圆圈，站着从各组选拔出来参加斗争会的打手。

我被邓自权抓进门来便被他猛地一推，踉踉跄跄还没有站稳，就听见那吴兴全雷鸣般的吼声：“把反改造份子孔令平抓出来”，周围的人附会那喊声一齐呐喊，喊声振得屋顶的瓦阁子都在咯咯作响。

我刚站稳身子将头抬起来，冷不防在我身后的冯俊伯和周学祝，一边一记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使我一惊，正要扭过头去向他问理，站在我两边的代朝谋马文华，从左右两侧又给了我两拳，与此同时站在我面前的王德权和朱国骥，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吼道：“你看清了，今天专门就是要打你的嚣张气焰，今天你不老实交待问题，便是自讨苦吃！”

双手背铐的我，即使没有被吊上水桶，在几个打手的包围中，也完全失去了自卫的能力。那吴兴全再次接连不断的呼喊口号，他喊一句，其它的人跟随应和着，声音响得像打雷，接着，拳头雨点似的向我头上落下来。

神光退完，态度“端正”后，何庆云假惺惺地止住了打手们的乱拳，眯缝着他的近视眼睛看着我，他今天既是检查者又是督战官，他要检查所组织的八名打手，是否按预先规定的程序在进行。

周学祝第一个发言，这个周驼背自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开表示以后，便成了何庆云最相信的大组长。成立“特殊学习班”时，由李培连提名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虽常常将我和陈力的言论记录下来，打成“小报告”，但因为李培连主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并没有多去理会这条狗。

那时他装出知识份子的温文尔雅迷惑大家，因为知道我和陈力语言刻薄，打心眼里渺视他，所以表面上对我俩十分谦恭，从不同我们发生任何正面冲突，纵有不同“看法”提出来之前都要声明：“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文革风向徒转，场部“工作组”一进六队，他便灵敏地嗅出了全国的火药味，立即变脸，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当着工作组的一出表演，活画出那种转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能事，加上对我的言行都记录在他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能准确举出说话的时间地点以及原话，这都是何庆云所需要的。

这些材料既是向我“算总帐”的依据，又是他请赏邀功，争取减刑的材料。

“今年 3 月 16 日中午，你在第二监舍门口，拿着人民日报指着那上面的标题，向全监舍的人高喊”这样的世界领袖谁承认”？那标题写着：“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你还说，外国的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愚蠢，中国已经在他的引导下，连饭都没得吃了，现在凭什么拿来害别人？！”

“第二天下午，你在工地上散布现在不是秦始皇时代了，不用霸道统治中国是万万不行的……”

周驼背的钢鞭材料刚刚抖出，那个邓自权便接着喊道：“不许反改造份子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国骥也紧接着眨着他那红肿的眼睛吼道：“孔令平不交待，今天休想过关！”

周围一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虽喊得七零八落，喊得肉嘛，但十几个人关在这不透风的屋子里声音像炸雷，令人头痛，根本也不可能有我申辩和发言的余地，我只好沉默。

“还有”，周学祝拿着他那笔记本继续地念道：“今年四月五日上午在菜蔬地你向王世春说：‘红卫兵是毛泽东手里的洋娃娃，想怎么耍就怎么耍。’你胆敢污蔑红卫兵，就凭这句话把你交给社会上的革命小将，就要把你捶扁，看你长得几个脑袋？”

驼背话音一落，王德权立即补充：“你平时经常的把我们愿意靠拢政府的人说成走狗、打手。今天要你说清楚，谁是走狗？”冯俊伯气呼呼地吼道：“对，今天要你说明白，究竟你是反动派的走狗，还是我们是政府的走狗。”又是一阵口号声。吴兴权扯足了嗓门吼道：“打倒反改造份子的嚣张气焰！”“孔令平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

“说，现在让他说！”代朝谋吼道！“对，要他说！”冯俊伯和周学祝一齐朝我吼道！突然，

我的头上挨了猛的一拳。随即一声："端正他的态度，他不说，就是软抗！不说，就端正态度！"那是周学祝的喊声，这喊声如同号令，拳头从四面八方雨点般向我的头上身上落不来！

为了保护自己毫无屏障的胸部，我不得不将腰弯成 120 度，前胸紧紧贴在我的双膝上，背朝着上方，迎接着拳雨。

突然，有谁对我亮在背上的洋铐子狠狠捏了一下！那铐子立即收紧，里圈的韧口像刀子一般地切入了我的手腕。一阵剧列钻心的疼痛后，我感到一股湿辘辘的血水浸了出来。

"好了，大家停手吧！"头顶上传来何庆云的声音，那声音里对刚才这一幕由他策划的端正态度的开场，十分赞许！我被他从拳雨中"解救"出来，心中明白，为了镇压我的"嚣张气焰"，今天这紧凑的斗争程序中绝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在这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挨打，什么也不说。

反正这样的会以折磨人为目的，直到何庆云向他的"领导"报告说："我们已彻底斗垮了这个顽固家伙，他现在再不敢在小组会上公开攻击文化大革命了。"

（三）第三次绝食斗争

从下午两点到七点，我被整整折磨了五个小时，晚上何庆云打开了我的手铐，那铐子上的血垢已经变黑，他一边故意看我的手臂，腿脚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累累伤痕，头上颈上，更是疼痛不敢触摸，一面还要奚落我，他的幸灾乐祸显然是对自己的诡计一种得意的欣赏，比之一年前，六月二十九日那晚刚来时，第一次打开我的土铐子的脸部表情，有多大的区别！

陈力被关进盐源监狱，刘顺森、邓小祝，潘朝元被严密监视，成为一个个等待批斗对象，使我无法接近他们，谁也不敢接近我，否则被发现后随时可以被哨兵拉到岗楼下付以拳脚，在恐怖气氛中个个只求自保了。

那一晚上我想了很久，最恶劣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不可能对加给我的侮辱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反应，但苦于无人商量，我又一次陷入极度孤立无援之中，已疯狂的暴徒们更不讲理了，如果用绝食来表达我对这场无理斗争的反抗，未必能对何庆云起任何作用。

但是，我只能用这种"最无用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愤怒和反对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当何庆云走来打开我的手铐时，我只向他宣布了我的决定："我抗议昨天下午对我的无理殴打，从今天开始我将绝食，直到你们取消这种残暴无理的打人会为止。"我的第三次绝食斗争就这么开始了。

我开始绝食的第一天，天气阴霾。九月下旬的盐源已是深秋时节，身上少了血液似的，穿着棉衣还感到冷，今天我摸不清还继不继续开我的斗争会，所以，早上起来就作了准备，趁何庆云打开我的铐子后，便赶紧把棉被心反穿着，等待着厄运的进一步降临。

吃过早饭后没有喊我出工，特别将王德权专门留了不来，并由他口传了何管教的三项"指

示”：（1）不准我走出本监舍一步；（2）每顿由他负责给我拿饭菜，但过一个小时不吃，便由他收回厨房，任何人不得偷吃；（3）不准我吃其它的食物和水。

交待完毕便同我一道留在监舍里，此人虽说当过雅安城的上校城防司令，可现在看不出一点威风凛凛的“师座”气派！大概由于十几年的监禁使他身材极瘦，面色腊黄，配以身着千巴万补的棉衣，像干柴棒一样干枯的双脚支撑着干瘦的身体，仅从外表看极像前清时期的乞丐。

平时他的生活极为俭省，凡有吃不完的罐罐饭都舍不得给人，而是留在碗架上，有时放过几天那饭已经酸臭发霉，仍倒进他那铁钵里，拿到烘炉房的炉子里煮开了吃。

不久前的一天，我们蔬菜组为了给苗铺筛一点碳灰，以备过冬菜的保暖施用，在监狱大铁门前那堆伙房里倒出来的碳渣中筛灰，休息时他却跑到附近垃圾堆里去，捡来一大捧又破又臭的破衣服，那是看守们的家属倒出来的东西。周学祝问他，捡那东西干什么？他说：“洗干净了补衣服。”

下班后他果然把这些破烂，拿到自来水龙头冲洗，当时非常缺肥皂，平时洗衣用的是一种叫酸姜草草根泡水，洗净后晾干，就在那件千巴万补的棉衣上，留下这些捡来的花花绿绿的烂布补的巴。

他说进监狱整整十五年了，家里从来没给他寄过一封信，更没有寄过一点吃的东西，全凭苦苦的熬过来的。看到他同我一样的孤身一人，如果不是昨天的斗争会和今天由何庆云指派他来“监督”我，我对他一直抱着恻隐的同情心，可现在，我对他充满了厌恶！

我问他：“你当城防司令那会，看到那些街上的乞丐，比你现在如何？”他尴尬的笑了笑，脸上全是苦涩，在我看来，他活得太可怜！本来可以不管的事，可他却偏偏要做当局的狗，军队中有如此的军官怎能指挥部队克敌制胜？

我忍着全身剧烈疼痛，靠在监舍的墙上，静静凝视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出神。忽然，王德权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和颜悦色向我规劝道：“我们已够苦了，何必还自讨苦吃？”我斜视了他一眼，这个把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我看见了他内心深处，良知被扭曲显示出来的无奈和尴尬。

“听说你在场部以前绝食两次？”他继续问道。关于我绝食的故事，来六队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他又是听谁说的？我十分注意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何必去鸡蛋碰石头呢？比如说你上次绝食留下了什么呢？大家都说你装作不吃饭，暗地里把自己的罐罐饭拿去同基三队的小子们换杂糖吃。”

说到这里，他那瘦削的脸上滑过一丝奸笑，彷佛在揭我的短，见我毫无表情，便接着说下去：“所以我说，玩这些都没用，人不吃饭怎么可以呢？我看你用不着给自己过不去，人到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你我又算什么？我看与其让人奚落还不如吃饭为好！”他说完这番话，两只眼睛试探地盯着我。

对这个猥琐的王德权，用自己可怜的小人肚肠来揣测我倒也罢了，反正他们根本无法理

解我！可恶的是这何庆云竟如此来诋毁和诬蔑我！

这个政权对大批饿死的无辜农民，尚无一点自责和反省，今天在文革非常时期，发生区区一个政治犯绝食，不是自找苦受么？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开始彷徨起来……

晚上，院坝里下着蒙蒙细雨，隔着我所在第二监舍足有五十米远，昨天那间对我拳打脚踢的会场，正传来口号声和打人声，斗争会照开不误！只是今晚的主角变成了蔡先禄。

我这时的心，被斗争会传过来的野蛮嚣叫和痛苦呻吟冲击着，我的绝食斗争，连阻止招开这种野蛮的打人会都不与理会！不是非常悲哀么？但是，我仍然咬着牙关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可不是随意像儿戏那样闹着玩的。我不能坏自己的人格！否则中华儿女对暴力的抗争都成了儿戏，中国人还有什么价值和尊严？

两天、三天，王德权不再同我说话，空闲时间他仍在缝补他的千巴衣，炊事员周玉生把罐罐饭送到我监舍门口，他便接过来放在我的床头，一个小时以后，他又端出去放在门边的窗台上。每天就只做这么一个“动作”，他当然体会不到饥渴每分每秒在撕裂我肉体的痛苦。

我不禁想起两年前在基三队那次我同陈力的联合“绝食”，那时那么多年青人关心我们，不但口头上声援我们，其中确曾有人，用零花钱买来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杂糖，悄悄塞在我和陈力的铺下，直到将我俩分开的那一天才被邓扬光查出搜了去，这王德权听说我们用罐罐饭换杂糖，大概就是指这么一回事。

现在，我却孤身一人，所有同情我的人此时都自身难保，准备迎接不知那一天便轮到自己上台的“斗争会”。

其它的同难们都被这种凶猛的声势慑服，远远地隔着我，连经过窗口前都不敢向里望一眼，最多只会在老远处向我投过来一束同情的眼光。

我虽没看过民主国度里发生绝食的事，但我知道有这种事发生时，政府不但要专门进行调查和调解，对绝食人特别保护，在绝食期间还要对他们强制输液，让他们保持充沛的体力。允许新闻记者采访绝食者，政府对绝食者提出的各种要求给与公开回答！

而今天，在“无产阶级”专制霸道的淫威下，不但将绝食抗议的消息封锁在高墙之内，还要用禁止被囚者在绝食期间喝水，以“彻底”征服一个手无寸铁的抗议者！逼抗议者屈服。

窗外不断地传来高音喇叭的杂讯，那是场部的有线广播站发出来的广播声。除了“夺权”，“夺权”的嚣声乱哄哄一片，一点也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但我知道，那喇叭传出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声。

这几天在中南海，正是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的关健时刻，曾被规定为党员必读，红极一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突然成了一本“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刘少奇此刻正身陷红卫兵的揪斗围攻之中，也许他正处于人生最无奈的悔恨之中。

北京传闻，在揪斗刘少奇的大会上，他对围攻他的红卫兵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你们要违反宪法的规定，剥夺我的人身权，你们这样做是

犯法的。”

可悲的是，这真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历史自会对刘少奇本人作公正的结论。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用“共产党员的修养”来包装自己，充当独裁政治在中国全面实施的吹鼓手，充当寡头政治出谋划策的帮凶，一个用三自一包这样的修补，来延长毛泽东统治的帮闲政客，最后仍落得在独裁营垒中自相倾轧的牺牲品。

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了，封建专制之中是不会产生中国一代民主主义优秀斗士的，刘少奇自不会例外。没有民主主义意识扎根的社会中，是不会产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领袖的。

有趣的是，从当时北京传出来的闹哄哄广播声中，有一则当时“北京五一造反兵团”在中南海上演的一幕“揪刘绝食”斗争戏。在这个组织发表的绝食誓词中，依里哇啦的喊道：“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誓不罢休。”

当然，在这场戏中所提的绝食斗争目标，肯定是要达到的。不过向一个即将沦为囚犯的人采用“绝食”，将他揪出中南海，可谓在中国文革上写下了一则令人作呕的笑话！当时也有这种权欲熏心的人会采用这种绝食斗争形式，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当时有一句出名的咒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么？”刘少奇算老几？他不过是披在毛身上穿厌了的旧衣服！在毛泽东字典里“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废去的傀儡。

不过，被他唆使的五一造反兵团的头们，这种被人愚弄的人可知，今天愚弄天下人，明天也会被他们的最高统帅当成一双穿破的鞋，扔进垃圾桶的下场么？

难怪何庆云们对我的绝食，采取这样的卑劣手法。他们既不明白我们在为什么而斗争？也不会把我们的生死放在心上，还以为我也是同他玩这种“讹诈”的游戏呢！

当然，像何庆云这类人，压根就不存在人性，一个“权”字指挥他的一切！这难道不是“文革”教育他们的吗？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对他多年培养的么？如果当时刘少奇掌权，这些人也会“誓死”保卫刘主席的。

五天以后，饥渴将我击倒在囚铺上，与其说是缺乏营养威胁着我的生命，不如说是水在索我的命，何庆云授权王德权，要他严密监视我严禁我喝水，存心让我“生不如死”。我能不能挺过这关，全凭老天爷了。

窗外飞起雨来，盐源地区十月便要进入风季，在雨季结束以前总要下几天雨。我听见房檐水滴进门前阳沟中的滴答声，雨声诱惑着我将身体移向靠窗子的位置上，把窗子打开把头伸了出去，我多么想它能飘进屋里来，湿润一下干涸如火的嘴唇。

王德权警惕地盯着我，猜测着我打开窗子想干什么？于是把头探出了门外，四下张望着。

那院子里没有一个流放者，只有一个披着雨衣巡逻的士兵，见王德权鬼鬼祟祟的样子，便向他这里走来，向着站在门口四下探望的王德权喝道：“你干什么？”，王德权一惊，立即把

头缩了回来，满脸堆笑现出一付谄媚的样子回答道："我看孔令平打开窗子干什么？"

哨兵板着脸指着他的头冷笑道："老家伙你不要耍花招，以为会骗过我的眼睛。"

王德权平白无故的受了这几句抢白，面子上尴尬极了，心底里一定在骂道，"老子在过去早剥下你的皮。"但他表面上仍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垂着头装出一副可怜相。

那士兵走进屋来四下探望着，见我睡在铺上，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便回头轻蔑的向他喝道，"老实一点，别耍什么鬼花招"，才慢慢出去了。

王德权一脸尴尬，当着我又不敢发作，只是摇了摇头，过了一会便开始继续"劝导"我，重复说些要识时务，不要自讨苦吃的话。我已没有精力去理他，只躺在那里，继续舐着干得冒火的嘴唇。

这一天夜里，我实在无法入睡，饥饿像猫爪一样抓着我的胃，可此刻已被干渴所替代，整个晚上我两眼盯着天花板，一秒一秒地数着：1、2、3、……脑子里全是水！水！

听到房檐水滴在水沟里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了放在床底下的尿盆，不知道那里面还有没有一点残留的尿可喝，便爬起身来探头去看，那床下放着的尿盆干干的连一点水印都没有。我想起来了，绝食头一天屙的尿已被王德权全倒掉了，以后接连已经五天没有屙一点尿了。

我又盯着那铺前的碗架子，不知那上面的碗里有没有留着没倒净的水？我知道，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七天不喝水便会死亡，那大概是因为血液因缺水而凝滞，无法正常循环了吧，何况我还是一个挨打受伤的人。

五天卧床，挨打的地方，青包虽没那么痛了，但伤痕依旧，出血处的血痂已干了巴，我意识到我正向死亡一秒一秒地接近，倒真想一下子昏厥过去，什么不知道，免去了那份难煞的痛苦。

此时我想，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我，好像正经历着一场马拉松的决赛，无时无刻地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倘若我挺不过去，中途使绝食流产，必会被何庆云在斗争会上，沾沾自喜的奚落说："对反动派不能讲人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太宽大无边，这些人嚣张之极，你看现在我们遵循毛主席：'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以及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的教导，他们便规规矩矩的求绕了。"

从今以后，我们将绝对服从高定额的劳动任务，将无条件的被无理的抽打辱骂，不敢反抗，像王德权这样的奴才也会叽笑我："逞什么硬骨头，最后还不是服了拳打脚踢，真是溅骨头。"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必须坚持下去，悍卫人的尊严宁可死！

然而，又反过来想，在这帮失去人性的刽子手面前，用绝食正投合了他们杀人的阴谋呢，即使死了，拖出去埋了不算，照样会被他们以"自弃于人民"相嘲笑，中共统治十七年来，在历次运动中，自杀的人还少吗！

这么多年，无声无息饿死的中国人有几千万！而活人，还不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呼毛主席万岁。死人能损他一根汗毛么？而我如果能活到这个专制崩溃那一天，我不但要做埋葬

这个制度的掘墓人，还会做这监狱暴力虐待的见证人，这可比悄悄去死强过百倍。

于是我那焦渴冒烟的喉咙里，第一次吐出了喊声："王德权给我……水喝。"王德权诧异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揍过来盯着我，样子怪怪的，不知道是在观察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去，还是觉得何庆云的计划终于得逞，我是不是要吃喝了？马上把饭菜送到我的面前，我看见那里面还有菜汤，我重新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我又低声喊道："我要喝水"，这一次他听清楚了，却连连摆手道："啊，对不起，何干事规定不能给你水喝。"他胆怯回答我，既怕违背了主人的规定，又怕我从床上翻身起来，抓住他死去，成了一条他欠下的冤魂孽债。

现在舌头实在是犟住了，说话全是打哆嗦，"水，我……喝水。"我看着窗外的大雨。

说也奇怪，我的每次绝食苍天都在下雨，是他可怜我而在垂泪？还是洒下这甘霖以支持我的勇气？我想上一次绝食时，我就是接的那发黄的屋檐水解渴，使我坚持了整整十一天！

想到这里，我拼命地从床上爬起来，那王德权吃惊地注视着我，等到我踉踉跄跄的从碗架上面取下了一个盅子时，他才明白，慌忙的来抢我捏在手中的盅子，一面发抖的问道："你要干什么？"我直直地盯着他，估计当时那样子，一定非常令人恐惧！但是毫无力气的我，还是被他从我的手上抢走了盅子。

趁他转身放盅子的时候，我突然冲出了门，赤脚站在阴沟里仰着头，那从屋檐上如注般淌下的屋檐水，像甘霖一样的冲刷着我的焦灼的脸，流进了我干涸得裂开了血口的嘴唇。

然而我被王德权叫来的人强行拖进了屋里！被重新按倒在铺上。

五分钟以后何庆云从队部办公室打着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说什么！晚上加派了一个周驼背，两个人守着我！

第六天晚上，唐启荣进来了，按脉、听心，一番诊断后，出去拿了一支针给我打了一针。第七天下午，头脑似乎凉了许多，我被何庆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去。

"怎么样，硬骨头还能撑多久？"他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前，戏谑地开口道。对于面前这人，我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何况，此时我已衰渴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程度，焦渴干裂的嘴唇努了半天，想对他这种卑鄙的手腕提出抗议，想申明，我这叫绝食而不是绝命。

想说"饭是你们给的，为了表达抗议和蔑视，我绝食。但是水是苍天赐的，我没有也不可能绝水。"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反倒是他幸灾乐祸的说，"你不是绝食么，怎么连房檐水都要偷喝？"

对这种无赖已无需再费口舌，重新闭上了双眼。良久，他终于开口劝道："我劝你放明白一点，不要自讨苦吃，要知道我们对你有的是办法，你不过是找活罪受，我劝你不要再去喝屋檐水了，还是吃饭吧，至于你提什么条件，纯属多余，斗争会开不开不由你决定。只要你今后不再乱说乱动，我们也没有发疯，把你整成什么样子，还不是你自己找的，所以，只要你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开你的斗争会，这几天，你没有说话，你的斗争会不是停了么？"

好一个会下台阶的何庆云，好一个狡猾的狐狸。

虽然，我绝食开始提的条件答应了，但也只能适用于我一个人，而且还要用封住我的嘴，作为交换条件。不过，到了这种地步我也不想说任何的话！何况何庆云的承诺，对我也算“小胜”了。我依然闭着眼睛什么话也没说。

“这样吧！你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吃东西还不能吃干的，否则肠胃受不了，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今晚我已安排了炊事员为你特别熬了一锅稀饭，先喝稀饭，把缺的水补充一下，才能开始逐渐进食。”此时他的语言非常软和，好像又恢复到去年六月三十日，第一次他打开我的手铐时那种态度。

我没有说话，眼下这个人可不是高德胜，这时我跟本开不起口，干涩的喉咙好像被粘住了一般。晚上炊事员端了一个小锅走进我的监舍来，何庆云早已守候在那里，屋子里围了好些人，其中有刘顺森还有蔡先禄，他挨得我特别近。

王德全拿着勺凑过了来要喂我，却被我推开了，双手端起那盛稀饭的盅子，却控制不隐，哆嗦发抖，慢慢喝下那盅稀饭。

稀饭下肚，一股暖流迅速地冲贯着我已僵硬的全身，我想，这时候几乎要停止流动的血液，开始重新在我的体内流动了起来。

还没有过半个小时，肚子里叽叽咕咕直叫，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来，一股水像腹泻一样的泻了我一身一床。何庆云起身捏着鼻子走了出去。面对着如此失态，我只能闭着眼睛。

接着又是腹泻，这才真叫对穿对过。比起上一次基三队来，这一次厉害得多，大约是因为严重失水的缘故！

蔡先禄忙着来帮我脱下打脏了的衣服和被褥，顺便在我的枕下扔下了一个小口袋，后来我打开看，那是一包他家送来的葡萄糖，我在心底里默默的感谢这位貌不出众的人，感谢他的善良，他曾经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后每在复活节的那一天，他都要颂读经文，他常说：“愿主清除人们心灵中的罪恶。”

（四）斗争潘朝元

果然，六队的斗争会，并没有因我的绝食抗议而停止。斗争会场已由原来那间临时粮仓搬到了坝子里，还专门停下了生产，有一段时间从上午开始，将被斗争的对象扭送到院坝里临时搭起的台前，整整一天在坝子里斗！其模式、喊的口号、程序与斗争我时一样。

我能起床走动的那几天揪斗的是潘朝元，潘朝元是当时农场中所关注的国民党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农六队年纪最大，在官方看来最有影响的“历史反革命。”他既不屑王德权的下流无耻，又不取张清云的“见风使舵”。

平时一言一行颇有一点“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腰对皇天”的遗风，所以一直受邓扬光的关注！被他列为重点监视的对象。

他平时言行一贯谨慎，遇到任何事都不急着发言，而是慢慢观察。但是一旦出口，必“过经过脉”，切中要害，语言精练，这大概是他的文化素养和长达十七年的牢狱生活，积累起来的，因为他经常利用中共言行的矛盾，散布与政府明显对立的言论，而又不被抓住，所以当局始终把他看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和陈力因发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闹农六队，而遭到禁闭。第二天晚上，工作组仍然继续举行各组讨论会，讨论题目依然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一次蒯处长指名点姓要他发言，开始他一直不愿说话，耐不住蒯处长的一再催促，于是，他便讲出了如下一段见解：

“依我看，党中央根本不可能出现丝毫不统一，这道理很简单，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么？何况他说统一战线是一个法宝，对于非共产党员的人，尚且要团结他们，共同为中国革命而斗争，怎么可能对一起打江山的久经锻炼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是叛徒呢？如果谁这么说，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对共产党的诬蔑就是犯法。”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随便谈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条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他说：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人民都不允许分裂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内部。至于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糊里糊涂的，我们是接受共产党长期教育的，不敢乱说，也不能乱说。”

这一段话讲得那蒯处长在旁连连点头，那周学祝看主持会场的人都在点头赞许，也想唱一段文革颂歌，又觉得这不是时候。

我与他相处，始于我刚刚到孙家花园工厂第一天，有缘使我们至今很少分开过，我了解他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个性，在六队我不止一次听他讲战国时期齐魏争霸中“围魏救赵”的故事。

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评价，他讲出来的就不是中共文革对嬴政统一六国的肯定，而是讲他滥征民工修长城，筑阿房宫，对当年仅两千万人口的国家行督责暴政，对无辜老百姓无端残杀，以为这样可以保住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然而，他在沙丘刚刚归天，陈胜、吴广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刘邦在沛县聚众起义，秦王朝便在人民的反抗中，结束了短短十五年统治。

由于他平日待人宽厚，时时站在长者位置上给周围的人帮助，他年事已高，无论资历和知识都是六队的同难中无人相比的，大家都尊称他为“潘翁”。

他平时作为，被当局在犯人中的耳目收集，何庆云对那“潘翁”称谓十分反感，因此就认定他在六队中处在“坐地使法”和“摇鹅毛扇”的位置，特别受到“关照”。所以继我的斗争会，便把他推上了批斗会的“主席台”上。

不过，他毕竟不像我借“申诉”为屏障，常出怨言。开我的斗争会，我说的话信手掂来，平日抗拒出工顶撞干部“违犯监规”的事，不胜枚举，只消何管教一布置，向打手班子一交待，便立刻可把我抓出来，打骂齐下或刑具交加，或绝食收场，颇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令何管教感到棘手。

可斗争他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言论他并无公开攻击中共的东西，讲他公开抗拒出工，呼喊煽动性的口号，或逃跑就更没有证据，纵然可根据“语录”本的条条给他加罪，但要斗垮他就不容易，所以他的斗争会往往以冷场结束。这次何管教经反复收集，找到三条“钢鞭”要他在批斗会上“老实交待”：

第一条：是根据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要求各地利用文革的大好形势，认真清查在管期间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过去没交待完的余罪。

何庆云进行了排队，认为他极有可能“余罪未清”。因此，在这次“批斗运动”中要他主动交待：解放前夕任金华地区行辕主任期间，杀害共军的余罪。

第二条：根据周学祝的记载，两个月前有一天在开晚饭时，因天下了雨，院坝里地上有点滑，抬饭的炊事员在进入监狱大铁门时不小心滑倒，随着抬饭杠子从他的肩上滑脱，盛着滚烫的稀饭桶倾斜着地，巨大的惯性使饭桶几乎侧翻倾倒。坐在蔬菜组最前面的老潘失声惊叫：“饭桶要倒了。”

被后面的周学祝听成“共产党要倒了”！并加油添醋，说当时潘朝元正在读报，那报纸上正是北京“反二月逆流”的综合报导，他脱口而出这句话，分明别有所指。

这便成了斗争潘朝元的第二大罪状，叫做极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公开诅咒共产党垮台！要他在这次斗争大会上彻底交待。

第三条：也是根据周学祝的笔录，当时根据犯人的食油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菜油，二两猪肉。炊事员为了集中使用这点油，平时按劳改队常规每顿都是无油的水煮菜，每周安排一顿油煎菜，被称为“小牙祭”。

这可是一个月只吃得到四次的油煎菜，所以每逢打小牙祭时，炊事员为了打给每个人的菜尽量公平，所以每瓢菜总要沾点油汤，舀时手中的瓢筛了又筛。

有一次，潘老端着一份刚刚从菜盆里接过油煎洋芋丝，带着诙谐的口吻说：“喏，你们说人参贵，我看那李正祥打菜的样子，真把洋芋丝当成人参须了，哎，人参须，你们说像不像？”

这句话经周学祝一翻制作，变成了在劳改队吃一顿洋芋丝比吃人参还要精贵，实足反映了潘朝元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今天说到这些，你未必相信当时监狱里充满荒唐，狗腿子挖空心思想立功减刑，到何等卑鄙的程度！

经何管教一整理，潘朝元犯有杀解放军隐瞒不交待；在服刑期间攻击党的“人道主义改造”政策；公开诅咒共产党早日倒台，三大罪状，潘老成了隐藏极深，死不接受“改造”的历史反革命份子。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专制实行独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初，民国废弃不用的这种残忍做法，被各级爪牙滥用，其泛滥遍于中国。文革时期姚文元写出《评三家村扎记》，把文字狱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代王朝中在文字上做文章的著名皇上，便是出身微溅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由于忌讳他当和尚的童年，所以对“光”“秃”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朱元璋起事，曾被官军称为贼！做皇帝后，他最忌讳这贼，在官员进表中不能用“则”。

有一次，一位官员上表中有一段文字：“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看后骂道：“生”者僧也，“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是明目张胆说我当过贼。于是，降旨杀头。

毛泽东必竟不像朱元璋这文盲，随意加以附会，但民间有人说“朱毛联手”他便硬说是影射“猪毛”来咒骂他。写他的语录，错一个字而落入死狱者何止一人？朱元障还只限于在官员上表和儒生作文上大造文字狱。

对毛泽东三个字犯了名讳的老百姓受到追查，坐牢的就更“群众”性了。姚文元、康生等人用笔杀人，使著名中共党内秀才邓拓丧命。过去在宫庭里发生的惨绝人寰勾当，经毛泽东的文革写作班子一效仿，便成为遍及国中之灾了。

像盐源这种偏僻的山野之地，周学祝这样的小伥鬼都会根据流放者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的拿到斗争会上作为斗争材料，在全国各地也不知有多少？必竞是近代，杀人也贴告示。

文革期间看到贴出杀人布告，动辄就是一小批，这些布告中，根本不以“法律”为准绳，抓住“犯人”的只言片语，死在伥鬼们制造的冤狱的无以数计。

何庆云扭着要潘朝元交待“余罪”就斗了他三天。那正是我开始绝食以后，斗争会的场地离监舍较远，那几天，我睡在床上听不清楚那里在斗争谁。加上王德权的严格监视，我也无法知道斗争会的全过程。

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就连“潘翁”这个戏称，也被说成反革命份子加的“官号”，用来煽动人心之用，被何庆云一口咬定，斗争会变成了对他的逼供审讯。恐怖气氛，笼罩了农六队，那几天人与人相逢，眼色不对都要拿到斗争会上追究。

还好，“伟大领袖”，因施政上太不得人心，使皇威“一落千丈”。加上共和多年，共产党的信条，已无封建皇权那么大。他的复辟，以及为复辟而恢复的封建时代种种酷刑，施行起来有相当阻力，所以才不至于肆无忌惮校仿古代皇帝的做法。但其玩弄百姓的手段可谓集古今之大成所没有。

（五）王氏膏药

从 1967 年 4 月 27 日，在农三队召开的那次全场宣判大会后，农六队便成立了“严管组”。何庆云将平时认为对政府最不听话，想越狱逃亡的人收进了这个组中，这个组出工时，要集合点数，并由两名武装士兵押解外出，刘顺森，王世春，刘资元，邓小祝等人便是这个组最初的组员。在八月批斗的人中这个组便占了三人，斗争会最后一名运动员便是严管组的王世春。

虽然这个人平时喜欢信口开河，哗众取宠，按其人品和素质不是当局特别关注的重点人物，然而他的一段对毛泽东语录的“评论”，确是别开生面，十分“恶毒”，因此而将他关进了小监，并上报材料至盐源法院，准备以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恶秋后问斩。

事情翻开一年前的老帐，去年十月份在全队疏通堰沟的劳动时，他向身旁的人挑逗性的发问：

“都说毛泽东语录灵验得很，一句顶一万句，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红宝书灵在那里？”大家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为了哗众取宠经常说一些笑话。便有人逗他说：“王世春，你又有什么新发现？不妨说出来我们听听。”他便做了一个鬼脸说道：“红宝书”，可以烧成灰作毛氏膏药，也可以口服，包医百病你们可曾听说？

周围的人都把脸转向他，尖起耳朵听听他说些什么？王世春见大家的注意力已被他吸引过来，便歪歪嘴做了一个令大家发笑的鬼脸开口道：“江湖人士王世春特为大家开出‘宝书一族’药方，供诸君一试，尔等听着：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强身。

你若是害了多年的老哮喘，可以取毛主席语录一本，烧成灰后用水冲服，立马平咳止喘，化痰祛寒，每日早晚服用，十天一疗程即可以断掉病根，此方名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散》。

你若患多年不治之风湿老顽疾，则可将宝书灰调入老白干二两贴于患处，只消一夜，你抬不起的手，直不起的腰，举不动的脚，都会灵活恢复如年青时候一般，此方名曰：《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追风祛湿膏；若不加酒，孕妇则敷在小肚皮上，则可以保胎补血，养阴养血，此方名曰：《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安胎药；小儿用来贴肚脐眼，包管他夜不流尿，不哭不闹，此方又名：《纲举目张》膏！咳！还可贴在你的丹田上专治阳痿，保管你雄风勃起，此方又称：《东风压倒西风》春药，如此良药各位不妨都试用一下。”

当时正值文革初潮，打人风初起，空气已被弄得十分紧张，被他这么一取笑，大家都哈哈大笑不止。“万岁”经典，如此严肃的禁区，竟被他轻松之中奚落无余。在周围一片哄笑声中，被值班员冯俊伯掏出笔记本记录下来，当晚即报告邓扬光。

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注意。事隔一年后，却被何庆云翻了老帐，指示批斗小组将王世春推上了斗争会的“主讲台”。

殊不知，一连三天挨打斗争，王世春便招架不住了，立刻在批斗会上连连认错，希图用告饶的方法使斗争会不再继续下去。他说：“那天发生的事，本来在逗大家乐，并没有想到就此犯下了侮辱伟大领袖的滔天大罪。今后绝不敢胡说八道了。”殊不知他这么一自白，反倒激怒了主持会议的人。

如此精心组织的批斗会，岂容几句认错就可金蝉脱壳？非但没有让他“下去反省，写出检查”了事，反而加大了“火力”。

接连几天的斗争，暴拳已使王世春遍体鳞伤，将他的左脚打瘸，腰部打伤，弯着身子，再也抬不起头来，在拳打脚踢下王世春跪地求饶，声泪俱下的认了“罪”，一面抓屎糊脸把什么“想组织监狱暴动”、“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些根本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屎盆子，都拿来扣在自己头上，还上挖曾祖父那辈，说他的祖先如何如何对共产党刻骨仇恨，把死去一百年的亡灵，也请来在斗争会上陪他挨斗，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污蔑毛主席了。

殊不知一百年前共产党还没有出世，这不明明又让何庆云抓了辫子，把自己越套越紧？

再次的拳打脚踢，逼着他写了一个洋洋五千字的“交待材料”。承认他是六队中最最狡猾的反改造份子，而被戴上刑具下到小监中，听候“秋后问斩”。

直到三年后，林彪事件发作，对“毛主席语录”在犯人中清查时，他才从小监中活着出来。

第四节 牢卒子们的内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盐源农牧场的革命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搓商后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个从西昌军区派来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本场一个取名为“红色造反总部”的头目，叫林高明的人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角色，原来农场的领导几乎全部靠边站。

高德胜消失了。听说，他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骡马堡被关在牛棚里接受“监督”劳动，李培连也在那里。

在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原任西昌劳改大队队长段其丰，亲自为成立大会布置会场。从八月斗争系列会一直没有露过面的邓扬光站立一旁，成了为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讲话时，端茶送水的服务员。

（一）林扯高闹剧登台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几天，那位新上任的革委会副主任林高明，便亲临六队为重刑政治犯作“形势和政策”报告。

这一次，我亲自看到了这位几次交过白卷的农校中专生的“风彩”，也看到了靠边站着等候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段其丰对林主任的恭维。

八点多钟，就在院子里平时开斗争会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邓扬光毕恭毕敬的宣布报告会开始，请场革委会副主任林高明为大家宣读中央文件。

林高明昂着头很神气地从铁门墙角处走出来，坐在段其丰专门给他端来的靠背椅子上，邓扬光为他端来了茶杯。等他入坐后，两个戴着红袖套的年轻人，也从那队部办公室走了出来，并站在林副主任的身旁。

我猜两个青年人，多半是林高明的“保镖”，一身军服，标准的红卫兵打扮，这大概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红卫兵了。

此时，我只能凭外表来判断这三张“陌生”面孔，年轻挺威武的，象在哪儿见过？我突然想到了近代京戏！那打扮不正是临摹舞台上的么？不过，当我再去看看那站在一边的段其丰和邓扬光时，脑海里顿然闪出了三个奇怪的字：“走马灯”。

时隔大约半年，原先的主角变成了跑龙套的，而新主角又换了新演员。

“今天向大家宣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新文件。”林高明拉长了嗓音长声悠悠的宣布报告会开始。这种显示气派的方法又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想了一阵，便立即想到，每天广播里传出来的副统帅就是这个声调？不过，他这么一开讲显得怪别扭的，我的身旁响起了一阵轻微

的笑声。

“在宣读文件之前，让我们打开毛主席著作，先来学习一段毛主席的指示。”林高明顿了一下，坝子里立刻又轰起了一阵笑声，而他却用威严的目光镇压了这笑声。“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是一篇光辉照人的著作，谁又在笑？真讨厌！这些反革命！”他又停了一下，用眼向会场里搜索着。但没有看到是谁，于是便朗声的继续读道：

“农民在村里造反，觉动了绅士们的甜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街谈港议。”

又是一阵哄笑，林高明停顿下来，他暗自想：这也真别扭，平时说顺了的字，怎么同这上面写的字就不同了呢？比方说这绅字怎么是这样写的？酣字怎么写成甜。巷字怎么变成港了呢？大致自己都被弄得莫明其妙，读起来怪拗口的。

所以，也就不好再“镇压”下面的笑声了，只好拗着口继续读下去：“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曹得很……”他突然中止了，觉得特别难读，平时在嘴上背诵的“顺口溜”读起来怎么一下子全走了样？一瞬间会场上再次发出了一阵笑声。

邓扬光慌忙地走过来，附在他耳上轻轻说了几句，显然在提醒他读别字的地方，这使他非常难堪，逗了这些犯人一笑倒也无所谓，需知毛泽东的著作，一字一句是万万改不得也错不得的，就在这些刚刚倒地的走资派中，就有许多人因窜改毛主席语录的。而这些犯人中，恐怕少不了因曲解毛着或撕毁语录而被打被关。

自己不是当着造反派的“同志们”面，一再宣誓不折不扣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么？但是这错别字，如果碰上了关键字一错，就是事关“问罪”的原则问题了，岂不严重？想到这里，面对哄笑不止的会场，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层难看的沮丧。先前开场时那种神气活现的表情顿然消逝了。

然而，这又怪谁呢？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当批判么？不是说越有知识越反动么？不是说最为干净的还是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么？读几个错别字，不正好表现出那很“纯”，很“干净”的劳动人民本色么？劳动人民本来就是大老粗，去他妈的“本本主义”。

想到在学校读书那会儿成天玩耍，师道虽颜面扫地了，苦读正被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早成了过街老鼠。文化大革命来了，拿着红本本搞“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抓出老师喊打倒“臭老九”，那真带劲，自己虽读到中专！还是觉得不学为好，学了既苦，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

而今虽如同文盲，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出了校门，拿着红本本，奔全国，搞串联，背诵着那上面的“经典”，也并不去弄清那上面写了些什么？

“夺权”靠的就是权术和出生成份，今天混到了这种地步，当上了这么大农场的副主任，还不正是靠着在军内的老汉和造反派兄弟们的支持？他脑海里这么一想，又恢复了先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

然而，当官也真不容易。首先，要读从上面转发下来的文件，做报告、写文章可就不像“串联”，“夺权”那么痛快！过去，不顾一切的去抓别人的辫子，就是钻“当权派”不读毛主席书的空子。现在读错了一句毛主席语录都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坐位打了一个掉，方才知道：“其实，读书没有用心还真碰上了今天这种麻烦！”

看来，为解眼下的尴尬局面，只有把手中的那红本本关上，讲自己已经熟悉的行话。

于是，他便将手中的红宝书轻轻的扔在一旁，左手撑着下巴开始用他熟练而粗鲁的口气训话：“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他妈几个老混蛋，老反革命，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看不清今天一派大好形势，硬要鸡蛋碰石头，同伟大共产党对抗！以为自己那条命碰你一下溅你一身蛋黄。”

“听说还有几个大学生，特别嚣张，读了几天臭书便扯高气扬！你们哪一个敢站到这里与我较量一下？老子不把你那扯高气扬的劲头打掉，叫你永远不再扯高气扬，我就不姓林。”

说着便站起身来把他的皮衣向两边撩开，露出了别在腰上的枪套。先前脸上一时泛起的尴尬顿时一扫而空，代之以一副横空出世的“气慨”。

他这一番话中将“扯高气扬”四个字读得特别的响，将十二万分的反感和仇恨都落在对他的奚落和挖苦上。

但是我想笑却笑不出声来了，这小子太狂，扣人帽子用了“成语”“趾高气扬”却没弄清它的本意！同时还将趾字读成了“扯”字！这一字之差便使这成语成了不类不伦！趾！指的是名词和器官，而扯则是动词，而今这中专生竟用来挖苦面前这些衣衫褴褛的囚徒！这味道有多酸却是品不得的。

也罢！既然他喜欢用这个词，并深恶痛绝这种对他藐视和不恭，就用此作了他的“雅号”吧！于是六队给他取了一个方便大家都好称呼的绰号：林扯高。

然而，妮姑坐不稳法台！

林彪事件败落以后，他便从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上迅速跌落下来，并被分配到农六队当一名普通的管教干事。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目睹他怎样借六队的张锡锟“反革命”重案，用无辜者的生命染他的红顶子，让他东山再起，一度又夺回了他失去的权力。

接着又被他的“同志们”重新推下台来，直到九年以后，毛泽东命归黄泉，文革收场，他的政治赌注也跟着全部输光时，还痴迷到进入驻军营房偷取枪枝，逃往耗牛山，扬言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走井岗山的路”，最后以“上山为匪”的罪名被他的“同志们”送进了大牢，这是后话了，本文在以后章节中，还将继续写这个小丑的故事，给读者一个完整交待。

六十年代，疯狂的夺权运动使这些没有灵魂的人渣，在“革命”浪潮中沉浮，出现林高明现象，全国十分普遍。他们是一批独裁者手中的枪手，在被高层玩腻后，便抛在一边，后来带着他们一起殉葬！

他的训话完毕，对摆在他面前的文件看了看，也许意识到像他这种文化程度，万一将文

件中的关健用辞读错，被他的同事们抓住可不得了，因读错语录而被抓进监狱的事，他亲手就办过好几个案子，他明白周围那些想打他主意的人正紧紧盯着他。于是他把它交给了守候在旁的邓扬光。

一贯主持会场的邓扬光正巴望着靠拢造反派组织，从被打倒的泥潭中早些“解脱出来”，见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新上司如此赏识自己，便毕恭毕敬接过“林主任”递给他的文件。他明白这样重要的事派给了自己，已经证明被打倒以来，他向新的权力靠拢了一大步，官复原职是指日可待的事，这叫做革命的“归队”。

可知，他在失去权力的一年中，受过不少的委曲和奚落，像他这种人不可一日无官位的，怪不得他今天态度这样谦卑。

接过文件端坐在方才林主任的位置上，清了清嗓门，他一字一句地宣读：“关于在盐源农牧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当宣读革委会成员名单中读到林高明的名字，邓扬光用一种说不出的目光，向坐在一边的林高明致意。

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表示毛泽东导演的宫廷政变已向政权基层扩展，文革两年了，在夺权中失势的人们正盼着这场“傀儡戏”的收场，这对于置身其外的我们，只冷眼旁观小丑们闹剧，并无任何兴趣。

阎王殿里谁做阎王，小鬼们都是上刀山下油锅的料，“灾害”年代，我们大量死于饥饿，而文革期间又大量死于棍棒和杀场。文字狱肆虐着中华民族！表面看太上皇用一种仇视知识份子的面孔，依靠像林高明这样的连一个文件都读不下去的“文盲”们。

从那次大会以后，林高明开始取代了原来的何庆云，暂时成为六队的主管干事！不过，尼姑坐不了法台，林高明的“主管”官运并不享通，仅仅二年，便又重新被何庆云夺了过去，并由此而演出了一场场笑剧！

我在下面讲述的故事，与官方档案里记载的不同，这些事，反映当时社会关系进一步被扭曲的真象，作为文革的特写，它们更真实的揭示了这个执政党的又一段历史。

其实文革初潮，无论是老当权派，还是跃跃欲拭的夺权派，谁也没有摸清这场宫庭政变的本质和毛泽东布下的游戏规则，大家都直觉到风向陡转的形势，岗哨上和队部这几天异样的变化，没有人给我们传来准确的“内部消息”，须说是一墙之隔，队部那边传来的追杀声和惨叫声，谁也说不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二）“好人”打“好人”

1968 年大约 10 月初的某天晚上，大约九点钟，我们听见隔墙的队部办公室过道上，传出了一阵阵呐喊声和棍棒相击的声音。监狱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我们看到了满脸是血的张事务长，正手提一根被打断的青杠棒，从围墙拐角处闪身而出，向那打开的铁门狂奔着，在他的身后紧紧追赶着四个士兵，狂喊着：“抓住他，抓住他！”一齐跟着张事务长扑向大铁门外，消失在夜

幕之中。

大约五分钟左右，通往场部的那条下坡机耕道方向，传来了几下清脆的枪声。接着，童干事以及新来的高欢，一齐从队部办公室向大监门外跑了出去，何庆云关上了监门，暂时又什么也听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便听见住在养猪场的苏代卓说：“昨晚张事务长被打伤了，现在住在医院里性命难保。”大家议论开了，问炊事员，张事务长什么事得罪了当兵的？他也含含糊糊说不清。

只说六队今年自己喂的过年猪，推说过年要自己杀的，拒绝驻军要一头猪的要求，前几天就在干部小食堂里吵起来了，那些当兵的是“支左”派，谁惹得起？吵架时候，当兵的就扬言要收拾张事务长，叫他小心点。

但是，我们想不到就因此动刀动枪的杀起仗来。当然，当兵的又全是新兵，二十岁左右的人，本来其中大部份都加入过红卫兵，现在又是毛泽东最最信任的支左部队，就凭着手里的枪杆子谁敢违抗他们?

不过，狱吏对囚奴作威作福，并没收敛，因而加大了对关押囚奴的任意打骂。从 68 年的开始，他们重新规定了一套对犯人更苛刻的“报告”制度。

白天出工收工，一律都要向岗哨上“报告”，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谁都不敢动一步，凡是他们认为稍不顺眼或违反了规定的人，都会拉到岗哨下面的“反省圈”里，罚站并被拳打脚踢。有一段时间白天站在那里挨绳子的人几乎天天有，六队垸坝里一时鬼哭神嚎。

当时分管蔬菜组的，是同我们一起从甘洛调来的汤干事，我们早已风闻，他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人员，对于像他这种历史背景的人怎么会被留用于监狱成为一个管理犯人的干部，我一直不清楚。

因为在战场上受伤，他的右眼被打瞎，左脚被打断，平时总是戴着眼镜，走路也是一跛一拐的。大抵正因为与同事相比他自觉矮人三分，所以平时对我们还和气，当时我们因为一直吃不饱，偷吃生萝卜，黄瓜是常有的事，他看见了也要把脸背过去，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平时常帮着菜蔬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对他都非常尊重，不同他顶嘴，也不做使他感到为难的事，只因为他手中的权力太小，事事处处他都要小心翼翼，有几次我因为肚子痛，向他请假去医院看病，他都回绝道：“你去找何干事吧!”

知道他胆子小，我们再没向他请过假，只是偷偷的到医院看病，即使抓住了，也只是说“我自己来的”便与他无关。

然而岗楼上这些当兵的，却一直对他呼来喝去，把他当奴婢在使用，最令他为难的，便是冬天对他们的蔬菜供应!。

一到冬天，严霜和西北风使二道沟地区的菜地里，再不会生长新鲜的蔬菜，农六队大约五亩靠着水塘的菜蔬苗圃地，冬天靠那水塘里积存下的死水，维持着萝卜、大白菜过冬，这些

数量有限的鲜菜靠用碳灰“护兜”，稻草“护顶”，仅能满足几个干部的供应，冬天犯人们吃的，全是夏天晒制的干菜。

按照场部和驻军在建场开始时所订的“协议”，驻军的蔬菜基本上由他们自己生产出来，场部为他们专门划出了一片土质最肥沃的菜蔬地，还向他们提供需要的菜种和菜秧，不过，这些刚刚脱下千巴万补的破衣裳，刚刚辞别“糠菜半年粮”的农家子弟们入伍以后，一穿上崭新的军衣，吃上优质伙食，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忘掉了原先是老儿。

尤其以打砸抢为能事的“中学生”，习惯了拿来享用的习惯，那由场部划给他们那片最肥沃的蔬菜地，经常长满了乱草无人照料。

他们所吃的蔬菜基本上都是从盐源县城，甚至从两百里外的西昌城里用车拖回来的，然而驻军们常嫌菜不够鲜，特别在隆冬季节很少吃到蔬菜时，便向场部摊派，农六队的驻军把手直接伸向枪杆子底下这六队“队部”，于是每年从秋天开始，岗楼上的士兵对“鲜菜”的需求，便成了队部最烦心的事。

那不到一个班的营房驻地，不知有什么不可泄露的东西，平时绝对禁止囚奴们进入的，送鲜菜的活最先指定由守苗圃的夏守愚承担，后来又改为菜蔬组长贺春涛，总之由老管亲自选定的人来完成。

1967 年以后，给营房送菜的差事，全落到了汤干事一人头上。我曾不止一次看见他背上一个小背兜，跛着脚一瘸一拐的爬上那通向岗楼的梯坎，为这些年轻人送菜上去，冬天菜枯，于是他每天都要爬上梯坎，好像是这些士兵的勤务兵。

这些士兵却很以为自得，不管地里已砍不出什么鲜菜，汤干事心中一百个不情愿。但支左时期，场里的科长们，尚且要被挨整，何况他？也只能在背地里咕噜道，“一个个年轻力壮的，不但挑好吃的要，自己吃的菜还要给他们送到手边。”

虽然这么说，在枪杆子下面只好规规矩矩的服从，忍气吞声的承担这个谁也没有指派他的任务，宛如当年日本占领时候的皇协军，强迫维持会的村长，完成交给他们的摊派一样。

守苗圃的犯人叫夏守愚，其穷凶极恶不在周学祝之下，当时六队常住在外守棚子的仅只他一人，为了经营苗圃这个他个人的安乐窝，这个老家伙手段之一，便是千方百计讨好这些横不讲理的兵大爷。为了投这些士兵的好感，他专给他们供平时缺稀的菜。有时候干部食堂都吃不上的菜，而在士兵的“伙食团”里却应有尽有，不但质量好，而且经常不计秤。

为了防止囚奴擅自撞进他的领地，夏守愚专门沿水库，用竹扦做了一圈栏杆，整个苗圃地留着两道小门，一个通向六队，一个通向场部，谁如果擅自进入他的苗圃，公开毁掉他小门的人，都会被老管门押到六队坝子里岗哨下的“反省圈”里，挨他们的鞭打。

有一次快过春节了，因为苗圃地里还留着大约只有三厘地的芫荽和小葱，上面盖着厚厚一层谷草，队部向夏守愚打了招呼：“这点斟料，是留给干部食堂过年的，没有经队部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取用。”

这事很快就被岗哨上的士兵知道了，开始还用命令的口气，摊给汤干事为他们办点小葱和芫荽，汤干事回答说“苗圃里已没有这种菜了，你们不如到西昌采购”，想不到兵大爷自己跑到苗圃地里，很快找到了那片芫荽地，便毫不客气的将仅剩的全部挖净。

汤干事赶来问是怎么回事？那士兵却向汤干事喝斥道：“你不说苗圃什么也没有吗？姓汤的你还是识相点，否则有你好看的。”

那汤干事明知是夏守愚窜通了老管们干的，却并不敢去责问夏守愚，而是朝着挖得乱七八糟的泥土滴咕道：“这那像解放军，简直比土匪都不如。”

这叫一报还一报，枪杆子里出的不仅是政权，更出霸道，狱吏们也有被欺侮的时候。

（三）高欢和童管教

自从六队的斗争会中止以后，“军管时期”到了。

张事务长的挨打，只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幕，自严管组建组以来，新来的高欢因特别对犯人下得了毒手，所以分管了严管组，这人同古柏中队的李铁脸都是北方人，没有其它的本事，就是打人很下得了手。

那时每次严管组收工回来，都有人因各种鸡毛蒜皮的事被他叫出列，站在岗哨下面“反省圈”里，免不了挨他一顿毒打。特别是他那厚厚的军用皮鞋，鞋尖处钉有铁块，被他踢过的人，要青肿几个月才会消。

短短不到一年，在他脚尖下受伤的人，不会少于十人之多，故有外号人称高铁脚，然而，他的铁脚也只能在备受凌辱的流放者身上逞威。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晚上值班点名的正轮到他，按照往常的规定，他应当拿出点名册，一组一组点名，清点人数确已到齐，才可下令解散，各回各的监舍就寝，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值班的人为了省一点事，点名改为各组报数，各值班员只要清点本组人数到齐，便可报告值班干事，由值班干事发令解散。

既然“规矩”经过修改，这高欢自不例外，点名时并没有带点名册，叫各组值班员自已清点人数。

当晚坝子里响过报数声后，中队值班大组长冯俊伯向高欢报告了人数，他解散的命令刚响过，立即从岗楼上射下了一束白炽探照灯，岗哨上传来一声西充口音的大吼：“谁叫你们解散的？”

听到这一声吼，站在灯光下的犯人谁也不敢动，每个人心里明白，在这段时间里，谁如果违抗这些当兵传出来的喝令，就是被打死也只能自认倒霉。

大家静静的观察这高欢如何解决这种尴尬局面，只听见那探照灯的背后另一个人又大声吼道：“姓高的，干啥吃的！晚上点名不带点名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政府的工资就那么好拿吗？你这种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还配称得做管教干事？”那话音听来几乎像打雷，其语气

的尖锐同管教们平时对犯人的训斥几乎一样。

那高欢被岗哨上传下的命令喝住，平时那种对付犯人的威风劲此时不知哪里去了，在探照灯光下站在那里发呆。好一会，喃喃的向岗哨上的哨兵解释道：“以往都是这样清点人数的。”那岗哨上顿时发火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嘴硬，要不要你们管教科长向你说话？”

高欢心里明白，站岗士兵哪有资格来管干事们的事！这不等于爬到我高欢头上拉屎吗？当着这两百号犯人朝我脸上吐口水，我这脸往哪儿搁？

没想到他一点都没有发脾气，而是顺从那士兵的命令，低头一声不吭向大门方向走去，不一会他取来点名册，开始点名。

不过，那点名的声音在颤抖，在枪杆子逼迫下点名，够他铭记一生的。

解散后，大家回到自己的监舍，静静地听那隔墙队部办公室有什么动静。按照我们的估计，平时那么凶狠的高欢，不可能无缘无故受这一肚子气而善罢干休的，他回到队部必会搬出救兵，狠狠地教训那哨兵一顿。

可是我们想错了，当时队部静悄悄的什么反映也没有。

第二天高欢就从六队消失了，再没有露面。为这件事六队曾经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高欢本来就有软处被支左部队抓住，又有人说他去场部告状提出辞呈再也不回六队了，但这种明显的黑吃黑竟被流放者目击，共产党不就讲一个权吗？谁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谁就赢得一切。

严管组的人不少人挨过他的踢，至今还留着伤痕，便齐声咒骂这高铁脚。

从此以后，晚上清点人数的“制度”又换了新程序，除按往常那样站队集合，还要由值班干事按点名册点名完毕，才由值周犯人大组长，向岗哨上报告当晚在监的总人数，等到岗哨上值班的哨兵回答一个“去”后，点名才算完毕。

如果那天碰上的那个哨兵情绪不快乐，存心刁难，在向他报告了人数后，却迟迟的不喊出那个“去”字，那么全体人员，包括当天值班的干事还要傻乎乎站在那里陪那士兵，被人捉弄惯了的流放者，早已对这种捉弄习以为常，然而这不明摆着欺侮到狱吏头上了么？

没过几天，晚上当班的是童干事，六队八名干部中数他最年轻，调来农六队后，同其它干部素无来往，在六队两年多，只知道他下班后别的地方哪儿也不去，常一个人上水库钓鱼，谁要有事找他，在水库上准会找到他。

“文化大革命”闹得沸沸扬扬，唯独他那派都不介入，我们听说，他是场部的一名“消遥派”，自从张事务长发生意外后，六队就把事务长的工作分给他管。

那天晚上他仍按原来的老规矩，晚上学习后，他空着两手走到院坝里，当天值班的代朝谋，口令集合以后，他漫不经心说：“各组清完人就解散吧！”代朝谋犹疑了起来，站出列，悄声把现在点名的规矩向他讲了一遍，但他喊道：“你在讲什么呢？我听不清楚，别哆嗦了，白

天劳动了一天还没有累啊，报数!”

各个组七零八落的报完数，完了，童干事一声解散的口令刚响过，岗楼上果然响起严厉的呵责声，又是那个固执的西充佬，此时带着怒不可遏的语气大喝道：“站住！怎么，规矩不懂么？又要复辟么？”

但是童干事根本不理他，一面向大家摆摆手，一面好像没听见似的，扭头朝监狱的大铁门方向大步往回走。所有的流放者并没有散去，而是站在那里，看看这场神仙仗又会怎么结果，西充佬怎么对付这个“消遥派”。

岗哨上的探照灯立刻打开了，灯光的光芒死死地跟着童干事，“站住！站住!”西充人气急败坏地吼道：“回来，不然老子要开枪了!”童干事停住了脚步，回过头去对着探照灯射出的地方平静回答道：“要干什么？”

“老子要你懂规矩，重新点名!”西充人在上面继续咆哮道。不料，这位平时很少说话的童干事抬起头来，朗声哈哈大笑，只听他说道：“什么玩艺儿，也不照照镜子你算老几？”话音刚落，身体已经走出了墙外的拐角处。

紧接着轻脆的冲锋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对面小监的围墙上，爆起了一股股飞溅的泥灰，探照灯光映出一股青烟，空气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隔着墙办公室那边传来了喧哗的人声，刚从场部调到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军事代表林原喊下了岗哨上那个西充人，那西充人拿着手枪，恶声骂道：“不按规矩办事，老子一枪毙了你，你又把老子怎么样？”

那童干事毫不示弱，回敬道：“量你小子没那个狗胆，我可不是高欢。你小子可是狗拿耗子多事，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你不过是一个普通当兵的，现在敢不敢把你的枪再对着我开一次？”

此时，岗哨上站着所有的哨兵，好像一触便要爆发火并似的。

又过了一会，大铁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看来警方和狱方的高层人员闻讯赶到了，墙外的争吵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依旧是童干事值班，表面上仍同往常一样，就是严管组这一天却没有出工，因为哨兵说他们今天没人带队，严管组乐得休息一天。

晚上清点人数时，童干事还是昨天那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报数的老规矩点完人数以后，便向当天值日的组长周学祝努了努嘴，示意他向岗哨上报告人数。

以后点名就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看来这是双方经过一天一夜的争执达成一个新“默契”，既没按士兵们的规矩办，又表示尊重警方的存在。

只是犯人们多等了几分钟，增加了一道犯人值班组长向岗哨报告的程序，像这种神仙打仗倒霉的总是犯人，但狱警双方这种逞强好胜，弱肉强食的法则在文革期间多次引发武力冲突，

他们本就没有什么统一可言。

我们从这么一点小事上，看到全国引发武斗血案的起因，原来就这么简单。如果那一天童干事和西充人再发展一步，难保不会有一场新的血案在六队演出。

为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需要，全国此时也不知有多少年轻人，因互不相让，殒身在大大小小的武斗战场上。

这段日子里，无论是白天和晚上，我们都常常听见不知何方传来的枪声。

（四）红卫兵“坟”

1968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蔬菜地为刚移栽的菜种地施水时，听见农六队山梁背后，从盐源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枪声越来越近，还没到十点钟，中队长郭川小跑到蔬菜地里传令大家马上收工，回到监舍后，大铁门便被上了锁，在坝子里巡逻的士兵，喝令我们，不得在院坝里闲逛，偷听。

那时，队部办公室静悄悄的，好像干事们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饭时，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到下午三点钟，羊圈方向枪声大作。

自从 4 月，六队连续两个月轮翻批斗会后，我们便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这天下午，我们被哨兵撵回自己的监房后，刘顺森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便按照往常的约定，进了厕所。

今天，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俩选取了两个相邻的蹲位蹲下后，他告诉我：“拣粪的人带回最近北京发生的最新消息，毛泽东与刘少奇火并，刘少奇已被暗杀，杨尚昆已发动了兵变。”他一面说，一面将一卷发黄的纸塞在我的手里，那是不知那一个造反组织散发的传单。

北京发生越来越公开的内讧，我们早有传闻，刘少奇是否被人暗杀，杨尚昆是否因发动兵变而被拘捕，这些并不重要，何况，在我们这种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共产党彻底垮台以前，我们永远都无法弄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何况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有必要吗？

我们最最关心的是，毛泽东的独裁已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的统治和开创的独裁统治，究竟还有多长的寿命？在行将灭亡时，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俩进监狱时，都还二十岁，单纯而又幼稚，入狱不到十年在炼狱中重新认识中共，但我们还不成熟，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单凭一腔热血同专制主义去拼，还远远不够。

曾几何时，监狱里一阵打人风就使一切都变了。现在恐怕像王世春那样公开讲“毛氏膏药”笑话的人没有了，我也不会像去年六月那样在禁闭室里公开吼“天都快亮了！”我们是否应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以修正，否则你我死绝了，这笔中共所欠下的债由谁来清算？

我们都深深陷入了沉默之中。

那天晚上，大监铁门紧紧的关闭着，下午离开这里的干事们好象并没有回来。晚上九点钟，也没有按往常那样，集合点名。只听见岗楼上传出了哨兵的命令，“各组清点人数，回房睡觉，晚上不准出来走动。”表面上看，很平静的夜里，一种说不清的危险不知潜伏在那个角

落里。

大约十二点钟左右，与我们一沟之隔的农一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阵的哀乐，我估计就在附近，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那哀乐是在给武斗中的死者送行，那么那枪声是在为死者致哀了。

哀乐持续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农六队依然闭门不出工。直到下午才看见干部们回来了，他们神情疲惫，衣袖上戴着白花……

几天后，本组派出去拣粪的肖弟良悄悄告诉我，盐源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从西昌开过来的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造反兵团，与盐源地区的保皇组织，在盐源县城里激战了两天两夜，死伤无数。

他看见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盐源县城开出来一支足有七八辆卡车的车队，径直开到了本农场农一队大门口。这时天已黑了，护送卡车队是十几名全副武装戴红袖套的年青人，沿农一队进门处的过道上还布了若干的岗哨，监视着戚黑一片的野外。

车队进入农一队的大门后，从车上卸下了好多用白布裹好的担架，当晚在坝子里用绿色的帆布，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棚帐，并在里面设下了灵台。然后，在森严的戒备下，将这些白色的担架抬进了灵堂里。这些白布裹好的尸首，就是那天在盐源的武斗中“牺牲”的亡灵，灵堂里凑起了哀乐。

从第二天开始，几十名被挑选的就业人员，在武装的红袖笼监视下，就地挖了两个大坑。坑挖好后，那些尸体就被安放在里面，上面垒起了高三米的大坟茓。留下一个坑，大概是供下一批武斗牺牲者用的。已经落成的大坟包周围，插着用铁皮和木牌制作的灵牌和挽联，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姓，和“以血还血”，“讨还血债”之类的标语。

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农一队的大坝子，便被扎红袖笼的年轻人武装看守着，平时不准任何人进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夜晚，那里又一次响起了枪声，一支不知从那里来的红袖笼，夜袭了这处坟地，据说是曾与他们发生武斗的红色造反组织，扬言要“踏平”这个山头，挖出被埋的人，用他们已经腐烂了的尸体，去祭那场血腥战斗中被打死的战友！双方又一次血染了这个山梁。

呜呼，在这种“和平年代”里，究竟有什么血海深仇在双方心中解不开？难道他们连自已被人操纵，都不曾丝毫察觉？难道他们在打着誓死保卫他们领袖的时候，却没有好好想一想，这个领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除了空前的灾难，贪穷、饥饿、同胞相残杀外，什么也没有吗？

而今这些愚昧的死者找不到一处墓穴，他们的亡灵在这荒郊野外徘徊，担惊受怕！

我替这些死去的年轻人悲哀，可知道曾辛辛苦苦抚养他们成人的母亲，闻得他们的儿子竟落到惨死武斗场的下场，会怎么伤心欲绝吗？

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性怎么会泯灭到这种程度？他们那强烈的复仇心怎么会落到与自己相

同命运的同胞身上了呢？这难到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么，它的后果会是怎样呢？

想到这些我感到了恐惧，我一定会在今后的无数夜晚中，做着相似的恶梦！尤其是，我怎么都没想到，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千里之外我的弟弟被造反派无缘无故的害死，我的母亲因此而投塘自杀，我的家正处在毁灭中……

我们曾住过羊圈反省室背后的那山头上，原来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林，我们常常在这里铲草皮积肥。就在这一段时间，场部发了通知，禁止我们在那里出入。后来，每当我们听到从那里播出的哀乐声，便知道，那里又增加了一片新的坟地。近段时间，那里传出的哀乐声隔两天就有一次，场部的干部们真不知犯了什么煞星，怎么在短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死去？

——两年以后，当那山坡靠堰沟的土地上种上了苹果树，我们去那里栽树，有机会再去那里，结果旧貌换了新颜，原来稀稀落落的松林中，生出了几十个新坟墓。

从那些墓碑上的记载，知道这些坟墓的主人都挂着政委、指导员、干事等等头衔、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这些死者虽谈不上那一级官员，但必竟是“高踞”在我们之上的“国家干部”。

墓碑上还记载着他们“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因公殉职的事迹。

可惜这些死去的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在中国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巨大灾难中，充当了可鄙的牺牲品！甚至于其中许多不悟之徒，在武斗被枪杀时还狂呼“保卫毛主席”的口号。

第五节 军事管制——打人狂潮

当然，神仙打仗五类更遭殃，在造反派们对监狱中大大小小当权派实行打倒在地时，又以更穷凶极恶的方式对付高墙之内的“政治犯”，除了用各种借口动辄对我们体罚打骂，还加强了对我们实行精神上的折磨！给人洗脑是执政的共产党对待老百姓，更是对待知识份子的一种精神虐待。

追溯起来，一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学习文件”，文件是什么？文件就是规范人们行动的准则，在没有法律的中国，就是靠“文件”强行规定今后应做些什么，反对什么。

当然洗脑是以专政作后盾的，专政是强行贯彻“文件”的保证，每个运动每个学习，非达到人们接受并认准一个新的规范才罢休。大家所做的高度统一了，便剥夺了社会成员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对产生的后果不会再有异议。

开斗争会、开批判会是一种恐怖的洗脑。文化大革命，人们经历着一种疯狂的“大民主”洗脑，大字报满天飞，鼓噪“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人们唱的是东方红，东风压倒西风。颂的是“大救星”，人们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后，就像被魂被追掉一样，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看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

当我们听到了“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这种耸人听闻的口号时，洗脑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用奇怪和肉麻的感觉，看到红卫兵们狂跳忠字午，“早请示，晚汇报”时，一种新洗

脑运动正疯狂摧残人性。可怕的是红卫兵们，支左士兵们不容许我们在心里面说些反对的话。我们最终没有逃掉，令人呕心的“邪教”礼拜教父的仪式。

毛泽东一面纵容盲从的红卫兵围斗“走资派”，一面就靠杀人和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解脱全国饿死人的大罪大恶。

（一）“请罪”及打人风

就在我们站队的院坝里，东南方向的岗楼下，那里布置了一个早晚请罪台，台上悬挂着一副毛泽东的彩色画像。

按照岗楼上士兵们的规定，每天早上集合开饭和晚上集合安寝时，我们都必需站在那画像前，将头埋下完成向毛悔罪的仪式。

长达五分钟之久，向一个魔鬼画像低下倔强的头，内心是何等憎恶！良知被强力扭曲的难受劲非同一般，这就是知识份子的软弱！屈从是我们的可恶之处。

然而，脚趾母终于没拗过大腿，大家只好服从口令，站齐队列立正，脱帽、低头。然后由值班大组长领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他的颂声刚一落，全体列队回应“我有罪。”并 60 度弯腰。

这时候我和刘顺森，邓小祝等人像木椿一样地立着，嘴巴也封住了，一种莫大的侮辱，使我无法弯腰完成这丧失廉耻的动作。

“啪!”我的后脑勺上挨了重重一把掌。“把腰杆弯下去”！我身后正站着一个满脸盛怒的支左兵，用凶神恶煞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我没有理他，仍昂头站着。“啪!”又是重重一记，这次是用枪托打的。顿时，我满眼金光直冒！随即听到一声断喝：“出列!”我们几个人一齐被叫到岗哨下的那片“反省区”内站着，一直罚站两个小时。

为了应付这种对人的侮辱，每天早晚我都打光头，免得那仪式举行时“脱帽”的尴尬，预先修正我的姿势从集合开始就保持着低头，身体前倾，免去了更为难受的“鞠躬”。尽管如此，我们因没有向那画像鞠躬而累遭拳打脚踢。在毛泽东授意下，士兵们把魔鬼的威风发挥得淋漓尽至。

借着文革淫风，六队的驻军越来越频繁干预狱政，他们一面指责对我们“松懈”，作出许多新的规定，喊“报告”成了打我们经常的借口，也成他们最快乐的事。

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着两件凶器，一根长 1.5 米，头上磨得极锋利的钢长矛，用来专门刺人，一把长一米的青杠剑用来专门打人。

按照新要求，流放者出工收工除必须整队报数外，还要向哨兵报告。哨兵认为队列中有谁没有站好，或报数声太小，即令立即出列，站到岗楼下的反省圈里。因不慎站进那圈里，躲不过一顿青杠剑，打够了才准离开。如果出工的人中有人未到，全组必须站在那里等。

个人进出厨房或外出，要整衣、立正、报告，老管随时以你某一动作没有做好，而把你

弄到反省圈里，修理一顿。

一到晚上一举一动更要小心。晚上是禁止任何人进出“警戒线”的，所谓警戒线是没有范围的，由他们随意划定，围墙边，厕所以外，大门口，到处都是他们指定的警戒线。越出警戒线不但要被打，还有可能吃枪子。

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半夜起夜上厕所，走出监舍门时，必须穿好衣裤，不准打赤膊，不准衣冠不整只穿内裤。然后立正高呼：“报告管理员，犯人某某上厕所”，待到解手完毕，走出厕所必须整好衣裤，高呼：“报告管理员某某犯人解手完毕回组”，又需得到哨兵一个“去”的回应，方能走动。

仅为了解小便，哨兵可以因你衣服未穿好，报告声音太小，未经哨兵答应，或报告用词不当等借口，而受到青杠棒“教育”，挨打的人，每晚上不计其数。

紧张时，晚上院坝里被打惨叫声彻夜不停。发展到翻身都必须喊报告，否则青杠棒侍候。晚饭是稀饭，每次起夜，在跨出监舍门时，就好像跨进了一个夜鬼横行的恐怖世界。

小便胀了却得忍着，实在忍不住了便要先作好准备，从穿衣到向岗哨报告的用词，都要先想好，稍有不慎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带来毒打。

有时为了避免上厕所，将尿撒在预先准备好的便盆中，如果老管们一旦发现或者早上拿到厕所去倒时，被老管抓到了，又是一顿青杠剑。

有一天蔬菜组的王文典上厕所解小便喊报告时，哨兵说他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捏着生殖器，因而被认为是对哨兵的侮辱，当即被叫到反省圈里，三个老管围着他一顿毒打，使他的左脚脱臼，当场昏死过去，后来竟成了残废人！

然而风水也有轮流转的时候，那在斗争会上对同难大打出手的吴铁匠，便撞了一次“鬼”。

这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他从厕所解便出来，正在转墙角的地方，不留神同哨兵几乎撞了一个满怀，那年轻人立即悖然大怒，用手中的梭标指着他的脸逼他退到墙里。没等吴老头站隐，不问缘由，便将那长矛直刺他的左膀，顷刻间，鲜血立即流出，那年轻人连眼都不贬一下，将矛头猛地抽出，血从那矛刺处像泉水一样喷出，浸透了他的袖子。

面色惨白的吴老头蹲在地上，他那一头白发在痛苦抖动，然而这刺刀见了红的士兵还没有息怒，抬起他那装有铁板的军用皮鞋，朝已蹲下的吴老头猛踢，一面还发狠地吼道：“看你这老杂种，还长不长眼？”

周围有人脱口惊呼道：“杀人了！”喊声还没完，那长矛尖又转向了那喊的人，吓得他连忙打住。

五分钟后，士兵扬长而去，卫生员唐启荣慌忙走过来替他脱下棉衣，进行包扎，才看到。那双刃利器正好割断了手臂的动脉血管。

吴兴全被老管刺成重伤，使一段时间被压抑的农六队囚奴，纷纷议论：“这老狗是命中注

定，活该!”“恶人自有恶人收。”

“当犯人的真可怜！那吴老头已无儿无女只是孤身一人了，死了也没人来认尸呢!”人们从不同角度出于复杂的心情，来评论这个在斗争会上像疯狗一样狂喊的“狗腿子”。

吴老头挨刺，对那些鬼迷心窍，想踩在别人身上爬出监狱的人，无疑起着“当头棒喝”的警醒作用。当时队部组织批斗会的“八人小组”，全都挨过打或挨过皮鞋踢，这些士兵在肆虐时才不管那么多呢！“文革”使人的兽性大发作。

这段时间，除了在院坝里因进出大门，夜间解手而弄得鸡飞狗跳外，老管们还“深入”到各监舍去，在那里又摆开了一个“战场”。

夜间查房是老管们的专职，也是这些变态年轻人逞凶作恶的最好时间，“文革”时期有“好人打坏人活该”作护身符，支左部队打死人是不会受到追究的，夜晚肆虐，是这些丧失人性的年轻人发“泄”兽性的最佳机会。

不过，我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变态到这种程度？从他们身上我因此理解了德国和日本士兵，在二战期间发生的法西斯暴行。

然而，不知道因为打人太多，心中发虚，提防被打的人也有抱一命抵一命的拼命心态，夜间突然从身后袭击他们。老管们对夜间流放者们的睡觉作了新的规定!规定睡觉时禁止蒙头；头手必须伸出铺盖外面；禁止在没有喊报告时翻身；禁止在武装巡逻离开监房时坐起身来；禁止在室内跟在巡逻者背后；禁止夜间起身不喊报告；禁止出监舍不喊报告。

兽兵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贴身穿着防弹服，查房时戴着剩下眼睛没有蒙的大口罩，手里握着青杠剑，只要见到蒙头睡着的人，便不问理由也不打招呼，劈头就朝那蒙着的头砍去，因脚露在外面被打的人不计其数。

有一次，因为天气有点冷，蔬菜组的杨家模白天太疲倦。盖的被子在睡着时蒙住了眼睛，被查哨的老管劈头一剑，那一剑正劈在杨家模的鼻梁上。

被猛击惊醒的杨家模立刻惊慌的坐起身来，捂着鲜血直淌的鼻子。打人的士兵，立即退后两步，抽出长矛准备迎敌，借随身携带的电筒，看清杨家模的鼻血涌流不止，才收了长矛离去，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整个监舍被扬家模的惊叫和呻吟惊醒了，大家又不敢坐起身来，眼巴巴的看他用棉花塞住鼻孔，直到天亮了，唐启荣才来，送到医院确诊鼻梁粉碎性骨折。

还有一个大田作业组的人被查哨的老管几乎打瞎眼睛，被打后眼睛流血不止，当时不敢声张，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到医务室看，唐启容看时他的左眼全是血，送到医院检查眼球破裂，成了终身残废。

至于手脚伸在外面被打伤的人就更不计其数，打伤后只在唐启荣那里包扎一下，还得继续一瘸一拐的去出工。

因提心吊胆防脚被打，整夜不得安睡。有的人干脆把被子缝成一个封闭的被筒，睡觉时将脚放进筒中，再用绳子扎紧，再热的时候也不敢露出来。

我们称士兵们这种夜间打人，叫“鬼杀”，鬼杀使文革以来已被弄得恐怖不堪的流放者，更提心吊胆过日子，晚上一度紧张到要小便前起床前就在铺上先喊了报告，等到证明可以不挨打时，才小心翼翼地坐起身来，起了床，站在门口，辨别出门外无人，才向岗楼上喊报告。

文革中，这些打人成性的野兽，晚上变成了一群吃人的毒蝙蝠，在六队这块阴森的地狱里到处乱飞，使我们生活在精神极度紧张之中无以缓和。一夜之间光监舍的报告声就吵得人无法睡觉，毒蝙蝠好像随时都可能出来吃人。

在这些的打人狂中，有一个人因特别下得了手，使我无法忘记，这是一张保持着死人般阴沉的脸，在夜晚就像一个幽魂，他的名字我无从知道，只知道姓卫，每次他值班的晚上总要摆点流血事件才安心。

一到晚上，每到一个监舍，他都不会直接往里撞，而是站在门外，像幽灵般闪着狼一样的眼睛，向屋里细细搜寻，一旦发现目标，他才跨进门，轻轻走过去，一直走到这个目标的面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手中的青杠剑猛的砍下。

这一剑砍下去，伤残甚至性命的后果他是根本不考虑的，他只想从被打人的惊叫呻呤中得到快感。

从他出现以后，晚上寝室里还没有睡着的人，只要听见一种特有的擦着地上轻轻的脚步声，藉着夜色微弱的光，看见那鬼蜮般的影子出现在门口，身上的汗毛就会倒竖起来。

有时，行凶后，看见他走出监舍，却没有想到他却像鬼一样的悄悄站在门外，谁如果这个时候发出咒骂，他立刻要杀回马枪，把刚才被打的人押进岗哨下的反省圈，用更残酷的惩罚对那人“炒回锅肉”，所以即使被打得鲜血淋淋，被打的人还要强咬着牙不吭一声。

我们中不免有人挨打后，对这种暴行叽咕几句，偏偏在这恐怖中一些新的变态鬼蜮，比周学祝、代朝谋更为恶毒。大抵为了向打人的士兵讨好，往往将有人发牢骚的话记在一张白纸上。偷偷的塞给巡逻的士兵，让发牢骚的人接连挨打，使得在紧张挨打之后，连声都不敢吭。

鬼杀和无耻小人的密报，像一把无形的钳，夹着囚奴的喉咙，大气都不敢出。

自从六八年春节时，汤干事因一点元须和葱子，被两个老管炊事员当着流放者的面羞侮以后，队部便将向岗哨上办菜的事交给了蔬菜组的另一个组长贺春涛。那“岗楼重地”向来是不准犯人涉足的。

这贺春涛便用了一副专用的铁勾交给老管们，每天十点钟他在把菜办好以后，用篮子装好便提到那反省圈里，上面的哨兵放下铁勾来将菜提上去。

谁也没想到，这送菜的机会成了贺春涛告密以取悦岗哨的“秘密”渠道，写成的告密纸条放在篮子里，瞒过了大监里流放者的眼睛。使毒蝠准确的知道哪一个犯人，什么时候说了老管们的“坏话”，及时加以打杀。

我因前一年 4 月 21 日加刑会上戴上手铐后，因拒绝写悔过书，便一直戴到第二年的八月份。白天一天的劳累已使我疲惫不堪，晚上还要戴着手铐，被监舍里不停的杖责，呻吟吵得几乎无法入睡，这种折磨越来越使我忍受不住，八月十一日这天夜里，我几乎又是一夜没有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坐在床上愤愤的说："这简直比法西斯集中营还厉害，晚上这么打人还叫我们白天干活不？"

睡在我旁边的陈登也随口接嘴道："现在连晚上翻身都要喊报告了……"既然开了口，打破了好几天的沉默，我便索性说下去："真的，越是忍气吞声，这些当兵的越不把我们当人看。"周围的人都用赞同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没有人再敢接下嘴，他们害怕犯人中的鬼蜮，害怕夜里出没的毒蝙蝠。

殊不知，我这两段话，原封原样的被贺春涛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并且在上午十点钟，随同当天送的菜一齐传递给岗楼上面！

（二）我被打昏的体验

高原八月的夜，虽然时处盛夏，不但不热，反而十分的凉。这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下弦的月亮刚刚从高墙东北方的阁亭上露出脸来，把一缕惨白的光投泻到这高墙中。

东北风呼啸着掠过五号梁子的旷野，越过围墙，刮着监舍房顶的瓦楞发出复杂的怪叫扑进这片空坝中，又由四周围墙反射以后，院子里寒风飒飒，十分寒冷。

此时从黑洞洞的监舍门窗里不时传出的"报告"呼叫，以及断续的被打人发出的呻吟，谁如果站在这阴森森的坝子里定会不寒而悚！然而这正是毒蝙蝠出没的时候……

晚上，因为我戴着手铐，为了便于起夜，我的头是朝着过道方向睡的。承蒙何庆云的关照，我是紧紧挨着周学祝，以便随时都置于政府耳目监视之下，一天的劳累，我已忘却了早上起床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另一侧陈登刚已呼呼大睡了，我也带着极度的疲惫刚刚进入了朦胧中。

突然，我光着的头上被刺刀猛戳了一下！我立即惊醒睁开眼，一道雪亮的电筒光直刺着我的眼睛，我立即闭上眼，随即坐了起来。晃惚中我看见了一个戴着口罩的人，正持着那把铁梭标站在我的床前，在电筒光照射下白得发亮的剑头，正指着我的鼻尖。

"下来!"那人向我命令道，听那声音极像平时打人最厉害的姓卫的年青人，但因为他的声音是从那大口罩后面发出的，听去异常的混浊。我只好顺从他的指令，爬下了"床"。

此时，我从对方特别的冷峻中意识到今夜日子不好过。迅速追索我白天的言行，那句冒犯了这打人狂？是不是因为我早上起床时说的那两句话。

但转而又想，今天白天一天中本组从来没有人同老管接触过，周学祝上下班也一直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而且白天也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事前没有任何预感。

心中正思索着，他那长矛尖在我的脸上晃了一下，下令道："走!"，这动作和发令声使我

感到一股寒气逼来，立即把破棉袄甩在身上披着，作好了即将挨打的准备！便缓缓迈出监舍的门，向院坝里走去。

在静夜中手铐发出轻微的撞击声。惨白的月光投射在我的身上，几颗星星在灰白色的夜幕中眨着狡诈的眼！好像是鬼在狞笑。夜风抖开了我的破棉袄，我感到一股阴惨惨的冷，好像正步入魔鬼出入的地方，牙帮子禁不住打起寒颤来，直到走进那反省圈里。

因为始终没有回头，弄不清刚才把我押送到这儿的年轻人是谁，也弄不清此刻他站在我身后的什么位置上。准备用什么样的凶器，采用什么样的刑罚？如此默默地站着，我试图用耳朵发觉那小子在我的背后在干什么？

我明白，这些人对人用毒刑是很想得出花样的，加上这么一年多来武斗中所见所闻。恐怕历史上所有酷吏使用过的怪刑，都一齐在今天派上用场。今天，我会受什么刑呢？

但是，我站了足足十分钟，却听不见背后任何动静。先前那爬上额头的恐惧开始滑落下来。只是身上特别觉得“冷”。

十分钟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远处向我身后移近。刚才那一股恐惧，又陡然地爬上了我的额头。

为了驱除这种恐怖，我使劲地耸了耸肩，把手铐撞得砰砰作响。一个阴沉的声音终于在距我身后大约五米的地方向我发问了:“孔令平,你知不知道,现在叫你上这儿来是干什么吗？”这一句,我听清楚了,这是摘下了口罩发的本人的原音,这分明是那个打人连眼都不眨的家伙,姓卫！对了，肯定是他。

但是，我还是想不起来，我在哪一点得罪了他？于是平静地回答道：“不知道”同时也在准备挨打。

今天这魔鬼确乎不同于往常，那说打就打，说刺就刺的杀手风度，到现在还没露出一点来。

“嘿！”一声冷笑，“那么好吧！你就想一想，别玩你那硬骨头的一套！老子的刺刀是不认人的。”声音里透着杀气，是想杀我几刀，我的心头一热？听命吧！但究竟又为什么呢？可是刺刀迟迟地没有向我刺来。

难道，他也玩“猫吃老鼠”那一套？为了捉弄已经被猫抓伤的到手猎物，“猫”在最后把耗子撕裂享用前，一定会把那遍体鳞伤的猎物放开，让它跑，甚至还躲在老远的地方，细细欣赏那耗子临死前的垂死挣扎，以尽其乐趣。

经过几次捉放，直到那耗子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消耗尽时，才用脚爪去翻动它！直到猫玩腻了，耗子也气绝身亡再逗不起来以后，才把它吃掉。

如此对峙了三分钟，想到他那手中的长矛，只要一抬手随时便会插入我的身体内，便打了个寒颤。

背后飘来阴森的问："哼，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自己说的话不到一天就忘了？"我已感觉出猫已经完全玩够了，该伸出利爪的时候了。但我感到奇怪，早上监舍里，我和陈登不过两三句话，怎么这么快就传到了这恶鬼耳中了。

那两句话不论是把监狱比作法西斯集中营，还是说老管不把我们当人看，都对他绝不过分。对于失去人性的毒蝙蝠也不会计较别人怎么说他，它们根本没有人性，也没有羞耻心，只要告密者没有另外的添盐加醋，就凭这两句话怎么会陡起杀人的动机来？

想到这里，刚才还笼罩着我心头的恐惧在渐渐的消失，被猫撕裂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

"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平静地回答着，这么回答当然准备着挨打了。只是这一次，那姓卫的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歇斯底里的狂叫，用声势来造他打人的气氛。略略停顿了一分钟，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恶气一字一板说出："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

随着那个"倒"字的脱口而出，我就感到我的身后横扫起了一股疾风，那风向从背后横扫到我的面前，就在我鼻子下方，正对人中的穴位上，挨了十分沉重的一棍。

顿时满眼火星直迸，口中喷出了一股血腥的气味，当即门牙被打断，嘴唇被打烂，满口是血。耳朵里嗡的一声巨响便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可是我入监以来所受到的最利索的处罚，后来每当我想到当时的感觉，便会奇怪的想，吃枪子不过也是这个味道吧。

行凶前用教主的语录给自己的暴行找个理由，这种当时最时髦的作法风靡全国，不知道古今中外的邪教，可否有例在先？

院子里"扑通"一声，随着我的倒地，便一片沉戚。那一瞬间，可以听得见晚风带来十里外小金河边农舍的狗吠声。而那一刻，灰色夜空中，先前眨着鬼眼的星星也失声惊叫起来，慌忙地躲到近旁的一片乌云背后，惨白的月亮也躲进了云端……

如此凝滞了半分钟，那姓卫的家伙终于按捺不住他装出来的冷漠和沉着，一种因为没用恐怖征服对方，以刺激自己杀人兽性所爆发的灵魂失落，猛烈刺激着他，抡起他手中的青杠剑发狂地向我身上乱砍。

院坝里顿时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然而越是如此，越使这头疯狂的野兽发狂，因为砍下的每一棍，就像砍在死物身上，除枯燥的"扑扑"声外，却唯独缺了被砍人的惨号和告饶带给他的刺激和快乐。

十分钟后，大监门的转角处闪出了林原的身影，他的老婆此时正是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的红人，成都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这种身份使他具有号令岗楼上所有军人的力量，上次童干事与军人的僵局，便是由他出面调解的。

此时，他大步地朝我们走来，显然他已经听了许久，知道墙内发生的事，所以他边走，边喝令那姓卫的住手，这疯狂的野兽终于收住了手中的青杠剑。

林原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半分钟，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向菜蔬组所在的二号监房，吩咐彭文学将我从院坝里背进监舍去。回身又到办公室去，拿来了我戴手铐的钥匙，替我解下了那副手铐。

截至今晚为止，那手铐在我的手上足戴了一年另四个月，被我的体温冷暖了整整五百个夜晚，被我的手颈擦得雪亮亮的。

从那一天起，没有经过正式的宣布，再没有给我重新上铐。

唐启荣也提着药箱走来了，人们开始七手八脚的对我“急救”。

大约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光景，我才在大家的抢救下，渐渐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我的第一感觉便是周身像在冰窖中似的寒冷，禁不住牙帮磕出声来。随即感到满口的血腥味，想吐掉那口中的瘀血却使不出力来。感到口腔空荡荡的，用舌一顶，上排的门牙已经没有了，用舌头去舐，刚刚一伸出来，便碰着厚厚的血痂……

我低声地呻唤起来，彭文学忙向我的唇边递来了一匙温开水。我渐渐恢复了记忆，我想起来了，想起几个小时前，我站在岗哨下的反省区内；想起了那姓卫的狰狞的面目，心中明白我遭受到的一切。便想扭动身躯，挣扎着坐起身来，陡然招来一阵剧痛一点也没有遂愿。

不光是头部，还有胸部，双臂，腰杆全身几乎都不听使唤，动到那里，那里便是一阵疼痛。

后来我伤势好转后，清点了全身大小四十几处青痕血印，重点分布在双臂肩部和臀部，真是惨不忍睹！人间的仇隙与友情一样，本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产生的，这种无缘无故的毒打，就是在封建时代也难看见，衙门中当差的差役要杖打囚犯，也要“堂上”大老爷开口。就是关在大牢黑房中用刑，目的在逼出口供，而我挨的这顿打又算什么呢？它只是征服者对奴隶的任意虐待！

老天爷见证这一椿椿血腥事件，记载着这些魔鬼所欠下的笔笔血债，这种无缘无故虐杀无辜，除了当年日本鬼子曾在中华大地上犯过，便只有在今天！

一部份中国人，无端的残杀另一些无辜的中国人，这罪恶该到何年何月才算结束？那些年代，中国无端被残害的冤魂屈鬼，何年何日才能冥目？！

然而祸事还没有结束，在那个年代无辜被打伤的人谁也不敢救助，倘如谁向他伸出救援的手，便是“立场错误”，连救援的手也要被砍断。对我们这些已经摆明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管用的。

我们这些人，经历那么多出生入死，活到现在已很不容易，现在，在这种打杀高潮期间，被这些野兽打伤后，非但不得请假就医，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谁如果批准受伤人留队养伤，那么谁等于自找麻烦，除非权力能压倒元凶。

当时，农六队因晚上呼报告，“不慎”被打伤的，没有一人敢留下来休息的，比如本组的王文典，陈孝虞，邓家训，杨厚模等人都先后挨过打，而且，王文典的脚还被打成脱臼，向汤

干事请假，汤干事不敢准他休息。白天还要被背着上蔬菜地，“你死也死到工地去吧！”汤干事无奈的说。

我这一次受的重伤，幸得林原的干预，总算第二天幸免了“死”在工地的厄运，一直卧床十天，方能起来走动。

然而，在那一段时间里饮食，拉屎、拉尿我都无法自理，口腔上颚被打烂，饭食只能吃“流汁”。我咬着牙关，忍着疼同伤残作斗争，但是，开始几天由谁来给我端水送饭，倒屎倒尿便成了大问题！那姓卫的恶鬼，看见我睡在床上，虽然暂时不便发作，但是随时都在寻找岔子。

从我开始卧床的第一天他便向蔬菜组宣布：“谁要是替孔令平送水喂饭，便要得到相同的下场。”而且放出风来：“像这样顽固抗拒改造的份子，就是死了真是大快人心！”

彭文学告诉我，他听见童干事曾与那姓卫的兵争执过。

童干事说：“你把人打死了，你也脱不到爪！”

卫回答：“毛主席老人家早就说过了：好人打坏人活该，打死两个数一双！”

童干事：“共产党的政策怕不是你说的这样呵！”

卫回答：“现在是阶级斗争非常时期，打死几个阶级敌人是革命的需要！”

童干事只好冷笑而不再答他的腔。

开始，虽然我周围的同难们可以悄悄给我拿饭菜，也可以到那间才搭好的熬药房里煮成稀饭。但是谁也不敢喂我，尤其是谁也不敢替我倒屎尿，因为虽然那姓卫的没看见，内部却有奸细，被姓卫的发现了可不得了。

在这个难堪的时候，潘老站出来了。

我受伤的第二天中午，收工归来，他将他苍老的脸贴在我的额头上轻声问道：“怎么了，没伤着致命处吧？”那天中午的饭菜便是他一口一口喂给我吃的，并且当众向大家宣布：“今后他的生活由我来负责，我这大把年纪了，活也活够了，就是死也没什么，我不相信给一个重伤的人送饭喂饭就犯什么法。”

他是与我共渡过八年患难的长者，在我最感困难的时候，面对凶残的野兽挺身而出，冒着危险保护我更使我倍受感动！在这种精神的鼓厉下，我咬紧牙关，发誓用最快速度恢复身体，倔强地站起来，一定要尽快站起来！

从那天起，每天早起，他便端着我的尿盆，当着哨兵的面穿过屋前廊沿，端进厕所去倒掉。每顿饭食，由他专门替我领，煮成稀饭再小口小口的喂进我的嘴里。一边喂，一边低声的向我讲商纣王挖比干心，把箕子监囚成奴的故事，结果周武王终于在朝歌。讨灭了暴虐的纣王。

晚上蔡先禄来看我，给我送来一小墨水瓶的药酒。我感激地接过他的酒以后，便悄悄地

叫他把耳朵贴在我的嘴边，请他务必将潘老服持我的事向林原报告一声，并请林管教阻止那姓卫的向潘老下毒手。

从此以后，我便在床上先练手，先活动上肢，再对受伤处按摩，加强了腿部和腰的活动能力。三天后，我的手能够拿东西，能够自己端饭吃，口腔里的伤势也很快恢复！

一周以后，我能坐起身来并能左右旋转身体，还能将脚从床上自由放下地。十天以后，我便能下地走路。

正当我可以勉强下地走路以后，一个晚上大约十二点光景，一束强烈的电筒光将我全身射定，我被强光所惊醒，避开那电筒光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想起古柏那位李管教，凡是心肠歹毒的人其脸色都这么惨白，彷佛被魔鬼将他身上的血吸干，变成了一具僵尸鬼。

今天他没有带口罩，他那铁长矛锋利的刃口，已在我的光头“轻轻”点划起来。心中一沉，做了对付新“惩罚”的准备。

然而，这一次他在我头上划了两下便收住了那长矛。

我头上响起他那“鬼魂”一样的命令：“从明天起，白天老子再看到你睡在这里，招呼你的脑袋。”

在当时条件下，即使斗赢他未必光彩。匹夫之勇不可取！为了早日恢复受伤的腰腿，我不能再躺下去了，我必须站起来。因此，明天我决定到工地去。

第二天一早，陈肖虞、肖弟良牵扶着我慢慢走出了大监的铁门。从铁门到菜蔬地三百米远的距离，我们三个人走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菜园地，他们又帮助我在一处静僻的背山坎，在潮湿的泥土上垫了一床蓑衣。那一天天气晴朗，空气特别清新，从此以后，我便坚持天天上山，在大家监护下，渡过了这一段养伤日子。

（三）大搜查

每逢过年过节，令我们最难堪和伤心的事，便是以卫生为名，对我们进行的彻底“大搜查”。

说令我们难堪，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利用休息时间找到的一些另类书籍，为积累知识所作的笔记，若不精心掩藏，就要被何庆云搜索一空，不但为损失珍藏的东西而心痛，弄得不好还要被辱骂和殴打。

大检查那一天，先将我们集中在坝子里，一列士兵站在集合队伍的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大口罩，严严实实封住了脸，以防检查过程中，犯人被窝和床上的臭气或细菌侵入他们的鼻腔，仅留一双鹰眼，监视着院子里每一个接受“搜查”的人。

站队集合以后，宣布检查，由中队长宣布“纪律”：禁止私自出入监舍；禁止来回走动；

禁止藏埋东西；禁止离位；禁止相互交谈；禁止互递物品；凡有藏匿各种违禁物品的，必须立即交出。否则，后果自负。

野兽是以践踏人类的文明为乐事的。“文革”时代，这种搜查便成了见“字”便收的程度。见到我写的，那怕是抄下来的一首古诗，也要拿去。所以我特别憎恶这种抢劫式的大检查。这种突如其来的大搜查，简直是一种公开洗劫。

这种以“检查卫生”为名的搜查，目的是将反抗的火种，消灭在最初的萌芽中。对流放者仅有一点粮票、现金一律没收。发现私刻的公章、介绍信、手抄文件除没收外还要盘问追查。

“文革”时期，非毛氏的一切书刊都一律要被搜去，一律没收。所以，每一次卫生检查，也是对我们的一次精神虐待。

检查开始，我们依次在士兵监视下，抱出各自的行李衣物放在自己的身旁。直到将监舍里要检查的东西搬空。

然后，一批检查人员进入监舍，仔细地翻寻铺草、床板和墙旮旯、壁缝，找到隐藏其中的物品，便丢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箩筐里。

收去的东西，多是一些充饥的土豆、包谷、黄豆、大米等等。也有藏在床板和草堆中的“禁书”。所谓禁书，是指一切非毛着或非马列著作的文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读物。也有平时为削洋芋皮而准备的小刀，或扒找豆粒用的小铁铲之类的“铁器”。

每一次“大检查”，总要从监舍中搜出一大堆东西，并无理没收，我称之为“三光”。

另一批检查人员，依次对站在院坝里的流放者进行全身搜查。并令打开行李，对行李中的物品进行搜寻，搜寻最严密的是衣物、被盖和鞋子。不光要仔细的搜索每一个荷包，还要反复地按捏每一个补丁。从中确实也搜出了不少的粮票和现金，甚至还有缝在补丁里面的各种“证件”和“书信”之类东西。

大检查，蹂躏着我们灰色的心灵。仅仅看那堆放在自己身旁杂乱无章的破烂，看到发黑的血斑油污，都勾起自己悲惨命运的痛苦回忆：哪一天发烧在被盖上流下的汗迹；哪一天被划伤了脚板感染化脓留下的脓血；哪一天因被捆被打留在衣被上的血污，都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细细咀嚼！

我那口已经破烂得无法上锁的皮箱，手提把子早已折断，那里收藏着我的全部家当：里面放着两件旧毛衣，那是十年前母亲密密织成的纪念品，带着母爱留在我身边；几件补上重疤的破衣裤，是我在暗淡的光线下用歪歪扭扭的针线缝补好的护身物。

“焚书”本是毛泽东洗脑的重要举措，抑制知识废拙百家乃“文革”的重要保证。狱中我们的书是平时邓扬光们最关注的，借大搜查机会正好是搜尽这些书的最好机会。对此狱吏们执行得很坚决。

几年来精心珍藏而保存下来的书：一本发黄的唐宋名家词选；三本补了又补的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以及一本残缺不全的吕振宁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可是我们在狱中

的唯一精神食粮。

一些读书笔记，那里面是炼狱中抒发出来的精神伤痛和叹息，一直就是鹰犬们紧密追踪的目标，这些手记和诗文，一次一次被搜去，一批批被焚毁，有心的鹰犬还专门在手记中寻章摘句，寻找在政治上致我于死地的“证据”。

每次大搜查，最令我担心的事，便是我们挖空心思藏匿的那些书以及所写的手记。预测到大检查之前，我预先将它们包扎并藏好，到大检查那一天，身在院坝中，心却挂念着那些书籍笔记的安全，注视着他们打板撬砖、抄铺翻草，生怕那些藏了又藏的“心血”被他们搜走。

为了让它们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硬塞在坚硬的铺板下面，忍受粗暴的挤压，或藏在瓦缝、泥墙缝隙中饱受泥污之苦，甚至被塞在厕所顶上发霉的麦杆中，这些书籍好不容易逃过了几十次搜查而幸存了下来。

“你写这些东西干什么？想变天是不是？”面对这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老管和士兵，只能取沉默和忍受的态度。你可以对这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兽兵鄙视，却无法对这种无理纠缠提出任何抗议。

这些没有人性的政治猎犬，在残酷对我们进行精神虐待中，起着特殊摧残心灵的作用。

现在，看见他们用小刀划开平时我辛辛苦苦缝好的补疤，从中翻出一大堆破棉絮，便感到狱吏在用一双利爪从我身体里取出五脏六腑一样。

这些侮辱性的盘问，在某种意义上胜过审讯，它把我所过的不堪回首的地狱遭遇挑出来，摆在我面前，再次回锅煎熬。

“你的衣服里为什么缝着粮票和人民币？是用来逃跑吧？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跑？”“这袋米是从那里偷来的，你知道这是违犯监规的么？”搜查出来后，他们毫不犹豫丢进旁边的箩筐，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无端暴虐，却不敢反抗。

流放者为了保护好家里寄来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几斤粮票和几块钱，被发现以后，十有八九便被夺走了。还要你承认有逃跑的动机。倘若你因此稍露不满，那么等待你的必是一顿皮鞋脚尖，或两记重重的耳光。每次大搜查，都会演出一幕幕令人心惊肉跳的惨案。

“这是从那里来的？你把它藏起来有何意图？想行凶么？”当他们从被检查人的杂物里搜出一个普通铁钉时，便会如此斥问，叫人如何回答？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带着明显的诬陷和桃衅式的找岔子，对人的伤害有多大？

每次“大检查”等于上了一堂恐怖的现场课，无论狱方如何在宣传机器上吹嘘改造成果，说他们“把鬼变成人”的鬼话，只会让人认识中共的欺骗是多么露骨和无耻。

我们就在自己的一堆破烂不堪的衣物面前，咀嚼过去辛酸的往事。

大搜查是狱吏和兽兵抽动的一条精神皮鞭。在流放者毫无防卫能力的情况下，这条精神皮鞭抽打你，使你的心再次出血。

幸好自从我在大学中精神失常过以后，从此我的神经便麻痹了，在监狱中，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因为见惯不惊而熟视无睹，又因为熟视无睹而精神麻痹。

久而久之，我对“大检查”中打人之类的暴行已司空见惯。我没有毛泽东画像，更无他的像章，倒使我少了挨打的担心。

每次搜查，持续时间至少是五个小时，且往往是虎头蛇尾，一般是从我这种“著名的”政治犯开始。开始时搜查十分过细，一边搜查一边盘问，辅之以打人、斥骂、撕衣拆被。

到十一点钟，对犯人的人身搜查，往往才进行了一半，搜查的人大致因为人困肚饥，便加快了速度，不再像开始那样穷搜猛查。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便草草地结束。使后来接受检查的人才往往侥幸躲过一次“洗劫”。

到了中午时分，在监舍里翻箱倒柜的兽兵，便一个个从屋里钻了出来。一面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摘下口罩。一面抬着他们的战利品——从囚奴身上、行李中以及监舍里搜出来的一切。

而流放者则带着痛惜、饥饿和失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粮票、现金、大米、盐巴、藏书、笔记等，一齐抬进了队部办公室。

紧接着，各组自行回到监舍，收检整理被抄得乱糟糟的“窝”。清扫整理着满地铺草和泥灰，又一阵尘土飞扬。

打扫完毕，也清理完毕，各自暗暗地计算着这一次自己被搜去的东西。有抱怨的，有咒骂的。最后，在无奈之中，将院坝内曝晒了一上午的行李，重新搬回到各自的铺位上，默默无声地坐在铺边发呆。

（四）为一张画像被打得半死

有一次，当大田组搜查到徐世均时，令他打开木箱，老管从木箱下面搜出了一张垫在棋盘下的画报，画报上有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画像。

老管把画报放在那木箱上时，脸上露出了一脸凶狠和狰狞，他向场外招了招手，五个兽兵立即围住了徐世均。

徐世均还是一个一脸稚气的刚满 25 岁的年青人，被捕时还是一个中专的学生。

此时他被五个兽兵包围起来，个个用凶神恶煞的眼睛瞪着他，他已预感到飞来横祸，面色铁青，全身直哆嗦。

大祸临头了，五个人将他围定，发难的兽兵指着那画报，向徐世均厉声质问道：“谁叫你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像来垫棋盘”？

年青人已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傻乎乎地直立在那里，等待五个如狼似虎兽兵的发落。

“揍这狗日的，看他今后还敢不敢毁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一个彪形大汉话音刚落，便是一记黑虎掏心，从背后对徐世均“开拳”。

于是这个可怜的年青人，便象肉排球一样，在五名兽兵的猛击下，来来回回被雨点般的拳脚猛击。听着他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胸膛中似乎已被击碎，流出来的血似乎睹住了候咙，他已经叫喊不出声来了。

没有犯人敢围观，甚至于看一眼都不敢，所有接受检查的流放者，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原位上，偷偷地看一眼露出一种惨不忍睹的恐慌。

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声和"嘭嘭"的拳击声中，徐世均倒在地上，发出低沉而又痛苦的呻吟声。这时候，五个兽兵像恶狼一样将他的五脏六腑从胸腔中抠出来，他已爬不起来了，五条恶狼才暂时歇下手来。

徐世均象死去一般爬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头枕着的地方，被嘴里流出的一大摊鲜血染红。

等到大搜查以后，唐启荣才把徐世均送往医院，医生面对着这个身负数十处严重内外伤的年青人，失去了救活的信心。唐启荣回来后，回答围着他询问的人只有一句话："要看徐世均的命大不大了。"

两个月后，徐世均大难不死，仗着他的年青和苍天垂怜，他居然从死神的魔掌中挺了过来，不过医生说他断了六根肋骨，加上严重的内出血，已成了二级残废。

后来我见到徐世均，他已不象从前那样腰板挺直。而是弯驼着背，面色腊黄。为了一张画报，徐世均付出了终生残废的代价。

（五）打中了

中共监狱的非人处境，一直是逼迫年轻人大量逃亡的原因。在甘洛农场的人都明白，长年的饥饿使人生不如死，逃避饥饿选择越狱的人虽知道，只身徒步跑出四周包围的大山，半途就会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或充作狼群的猎物。仍不断有人去触这张死亡的网。

到了盐源农场，靠各中队种出来蔬菜的补充，减缓了大量死亡，饥饿依然紧随着关押在这里的每一个奴隶，加上虐待和残害，囚奴逃亡也从未间断过。

逃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具备：第一，选择的逃亡路线是否正确，能否避开警方追捕；第二有逃亡过程中对付各种恶劣环境的适应本领，二者不可缺一。

在当时户口管理严密，到处是特务，到处布满了"群众专政"的密网中，千里逃亡谈何容易？所以逃亡者一般都必须"偷"，具备躲开人群生活的能力。

"偷"为老百姓所憎恶，留下了痕迹，也为追捕者提供了线索和目标，加上老百姓都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心存戒惧，能给逃亡者以理解，并提供庇护的人实在太少，所以逃亡者从逃亡开始那一天，便同死神同行了。

逃亡者在最初外逃的几天，几乎毫无例外的要夜行日宿。为了躲开老百姓，多半露宿荒野，以山上的庄稼为食，为逃过追捕，忍受着大苦大难。

我在狱中因适应不了外逃的生存条件，想到即使侥幸逃出了监狱，在这无产阶级专政的

共产党天下，我又能逃向何处？一个人能奈何这个统治吗？

所以我虽对出逃者的勇气和求生存的本领十分钦佩，但一直未能亲自尝试过它的滋味。

原先的农六队靠西那排房子被改为小监后，农六队迁到了院坝北方的那排房子里。反省室将原先的大监舍隔成了十六间单人小监舍，每一间反省室都装上了铁门，门上有特制的可左右滑动的监视窗孔和报警装置，巡逻哨兵，不分昼夜地在反省室前方坝子里来回游曳。

关进这里的人要躲开哨兵的眼睛并要穿越几道围墙，才能越出监狱，即使本领高超的人也难以从这里逃出去。

文革在全国打响后，关进反省室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1968 年以后，反省室的十六个房间一下处于满号状态！关进来的人除了“言论罪”，就是“逃跑罪”占最多。当局因提审地方不够用，反省室变成了收监“预审室”的隔离小监，从这里经草草审讯以后，速判速决。

所以小监里几乎像流水席，走了一批又进来一批，为减少小监房数的不足，有时待审的人就交给严管组边劳动边受审。这一时间，加刑的人数，处死的人数，都达到这个农场的最高峰。

1969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从古柏地区送来了一个“惯逃犯”，据说他原判刑期只有五年，关押还不到两年时间里就跑了十次之多，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本身就是为了偷粮食而入监，纯属于一个求生者。

为了防止他再次逃亡，把他送到了六队来，专门关进了小监 3 号监舍里，但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使他静不下来。

进入 3 号监舍以后，他每天都在盘算着脱身的方法，坐在铺位上抬起头看了看没有做望板的屋顶，从那上面出去本是最理想的，但是那足有六公尺高，没有学过轻功，又没有绳子和可以垫脚的东西，登上六公尺屋顶谈何容易？于是他把眼睛滑向前后两道厚厚的泥土墙上。

反复思考以后，决定选择从小监进门方向墙上开孔的方案。进来之前为了挖洞在布鞋里缝了一根两寸长的铁钉，准备了一个洗脸盆，用来挖山上已成熟的洋芋煮熟充饥。主意打定，从第二天开始了行动。

第二天炊事员送饭时，他脱下了衣服，露出背上那几处被打伤流脓的伤口，恳求炊事员晚上给他一盅子开水，让他洗净疮口的脓血，并从鞋子里取出铁钉，一切准备完毕。

等到到晚上九点钟，只听见查房的老管按照往常的规律，从第一监舍打开门上的风窗，检查并无异常现象以后关上风窗口，再打开第二号监房的风窗，依次把最后的监房查看完毕，听见那哨兵的军靴在三合土上踩着的叭嗒叭嗒声渐渐远去，消失在小监围墙的那道小门上。

他一跃而起，将那盅要来的开水倒在泥墙上，用麻利的动作用铁钉在想好的地方开洞，一边开一边量，不大不小只要能爬出去……

就这样一连三天，一个完全能爬出去的洞已赫然出现在眼前，剩下只等天老爷帮他了。

时值七月下旬，这一天中午天气特别闷热，到了下午六点钟光景，浓云密布了天空，呼呼的狂风大作，到送晚饭时，天色已变得特别黑暗，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天公终于给了他一直盼望的机会。

他最后下了决心，藉着狂风的掩护将自己的被套撕成了许多布条，搓成布绳后将脸盆底朝外的捆在自己背上。

晚上七点钟开始，房顶上响过了一阵急促的雨点声，接着瓢泼的雷阵雨便夹着狂风，将门外的坝子变成一片茫茫的雨雾，天色越来越黑，3 号房这个整装待发的人，正全神贯注的盯着雨中的坝子，藉着那频繁耀眼的雷电光，他躲在门后，从风窗口的小缝里向外张望。

等到今晚值班的绿色雨衣身影，由远而近的走过来，打开风窗向里望了一眼后离去时，他立即跃起身来，利用送饭时送来的最后一盅水，将那一盅水朝那仅只有一个指头就要通穿的凹坑上泼去。五分钟后，便用铁钉打通了足有面盆那么大的洞。

一股强大的雨雾被狂风卷括了进来。使他倒抽了一口凉气，便在雷声掩盖下迅速爬出了洞口，藉着漆黑和茫茫夜雨作掩护，在频繁闪电的引导下，只一分钟便穿过了前面那一片空坝，过了隔墙上的小门，进到大监门旁。

进入队部办公室前的走廊，靠办公室的遮掩，他向岗楼上紧张窥探，现在只要穿过走廊，并穿过那岗哨下面狭窄的弯道，向右一拐便到操场坝了。

一道强烈的闪电以后，雨势开始减小，他不能再等待了，立即起身弯着腰，顺利地穿过了足有三十米长的走廊，虽然在穿越时远处的闪电不断，但那岗哨上大概正在躲雨，或打瞌睡竟没有发现他。

面前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关口，他的心狂跳着。他估计，这雷声完全可以盖住他跑步的响声，帮他跑出那最狭窄的弯道隘口，于是便紧贴墙角重新耸了耸背上的面盆，等待最后逃出鬼门关的那一杀那。

一道耀眼的闪电和一声巨雷响过后，他已分辨出，穿越这拐角隘道口的转角位置和面前的障碍物，就那一杀那间，他蓦地立起身来，向那弯道口冲过去。

就在步入那仅 1.5 米宽的拐道处，他忽然觉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慌忙地用手去摸，想用手感判断出处于转角的位置，已经摸到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背上的洗脸盆，撞在墙角的内侧，发出一声“砰”响。

这声撞击，招来一束电筒光直端端从哨楼上向他头上照定他，同时发出了一声喝令：“谁”？他知道，自己已到了生死关头，退后只能死，死前还要挨一顿毒打，拼命向前冲则还有生的可能。

不再犹豫，使出全身的力气，他向面前的兰球场射了出去，几乎就在同一秒钟，岗楼上的机枪响了，“达达，达达”夹在雷鸣声中，枪声划破了寂黑的夜空。

小伙子一个跟头向前栽去，凭他急速向外扑去的惯性，重重地惯倒在操场上，头部和胸

口顿时冒出一股股血注，他挣扎着站立起来在大雨中连晃了几下，还是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而那头部和胸部流出的血，随着大雨，向前淌了足有十米远，留下了一条殷红殷红的血带！他便扒在那里，背上还背着那面盆，一动也不动了！

紧接着，网哨上传出了一片欢呼声："打中了！打中了！"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这时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钟，雨也渐渐停住了，岗楼上穿着雨衣的军爷们，纷纷从那上面连跑带跳的跑下山头，围着操场里死者尸体的周围，七嘴八舌地在争功。

争论无非谁最先发现逃犯；谁先射电筒喊"站住"；谁扣动机枪的扳机；第几颗子弹击中尸体的那一个窟隆等等。当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在杀害一个普通的求生者，而是一个"革命警惕性"结出的"硕果"。

枪声和欢呼声，使刚刚就寝的我们，估计墙外又发生了一次杀人事件。不过这段时间对枪声听惯了，听到枪声就以为不知是哪一个老管，追杀哪一个看不惯的干事！那场因点名，老管鸣枪威胁童管教的事还没过多久呢！

我们已习惯了"红色恐怖"，当兵这段时间飞扬跋扈把我们当成习武的耙子，稍不留意就要吃青杠棍，所以一到晚上，外面发生再大的事，也不会去看个究竟，装成什么都没听见。

此时除了各监舍靠窗口的人，扒在窗口上向岗哨上遥望外，所有的人都躺在自己铺位上，用耳朵听。

院坝里依然平静，没有一个人影，而那岗楼上所能看到的杂乱的电筒光和老管们七嘴八舌的争论，此外什么也看不清。

（六）赔杀

一个小时后，雨已完全停止，响过频繁查哨和院子里此起彼落的"报告"声后，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天空一片漆黑！大约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左右，一名军爷走进我睡的监舍，将我从迷糊中叫醒。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我又犯了什么？又要受何处份，想该如何应对？便被催着穿好衣服，跟着他走到院子里。

不一会儿，另一名老管从严管组监舍，押着李克嘉向我们走来。

这李克嘉原是兰州大学应用物理学系的学生，在农六队的几名"右派秀才"中，他是唯一的刑事犯。因两次越狱逃亡，所以才被押到这严管队来，加上"逃心未死"，来六队后被编进了"严管组"。

他刚来，我俩并不了解，平时很少交谈，只因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把内心伤痛，凝聚在弦上，加上闲熟的琴技，在二胡声中揉进了哀怨婉约，使我颇受感染。所以每当他坐在走廊里调好琴弦演奏时，我会侧耳聆听，从琴声里听他倾述内心自白。

此刻我和他被押着，经办公室前的长廊，一前一后带到墙外篮球架那躺着尸体的地方，彼此都在猜，又不知哪股祸水发作了？老管用手电筒指挥我们俩，面对尸体，坐在篮球场周围

的石蹬上。

阴暗中响起那姓卫的声音："你们俩是一惯死不悔改的，今天就让你们守在这里，好好看他的下场！你们如果还要对抗，那么你们的下场也会这样！"

那声音阴阳怪气充满了杀气。说完，电筒光熄灭了，此时天还没亮，四周一片漆黑，死者距我们仅只有三米远，一股血腥气朝我们扑来。

四周死一般寂静，我们被黑暗中看不见的眼睛紧盯着，我明白，要我们在这时守尸体，目的在对我们进行精神摧残！这叫陪杀场！

雷雨刚刚掠过的天空，狂风倦走了天上的浓云，几颗星星从云端偷偷窥视这里，奇怪的望着危坐在死人旁的我俩！我的心进入了幻觉：忽然觉得面前那倒在血泊中的，是一个失去魂魄的狐狸。

为挣得自由生存，想回归广袤荒野中的凄息地，从魔鬼笼子里逃出来，逃得如此凄惶，如此苍促，以为黑夜里，雷雨已镇住山野的魔王。却想不到，刚逃出关他的铁笼子，便被魔王的利剑劈倒。

我彷佛看见他的游魂从血腥躯壳中飘然而起，从容向我们告别，说它已自由了，可以回到他亲人聚居的地方，向他们倾诉这些年在地狱中所经历的苦难……

山坡上隐约传来号泣声，大概是死者的亲属，听去分外悲恸？其实这倒好，人终有一死，像这种鼓足勇气痛痛快快赴死，了却多少这地狱的悲哀？

再回过头来，望那夜雾锁着的看不透山头上，岗楼传来谈笑风生，魔鬼们在庆贺他们杀人成功！阿弥陀佛！我垂下眼皮，双手合拢为躺在我面前的这无辜灵魂祈祷。

山谷底的雾气绕着我面前这具尸体，将一股股血腥味，冲着我的鼻孔灌来，使我猛然惊醒，我的幻觉消逝了，在这静谧的篮球场上我感到呕心。

天渐渐发亮，微茫中，白雾从沟底升起，隐约听到五号梁子山头上，传来鸡鸣和狗吠声，而我仍僵硬地坐着，经过三个小时熬夜，我多么想睡一会儿。

高墙里有了响动声，起床的哨声响过后，人声嘈杂起来，两个军爷才将我们叫回监舍去，大家正在在集合，集合后，照例完成每日的"请罪仪式"，请罪完毕，驻军班长站在队列前，神气活现宣布昨夜当场击毙逃犯的战果，并向一切"乱说乱动"的人警告说："谁继续想跑，谁就会遭到同样下场。"

一夜大雨后，今天天气晴朗，我带着没有完全恢复的伤和一夜疲乏，躺在菜蔬地那背坎的蓑衣上，同组的人围着我询问昨夜所见到的情况，我摇头说："天一片寂黑，什么也没看清楚，等到天亮时，只看见那人扑在地上，背上还捆着个洗脸盆，究竟是谁，是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

到十点过钟，从小监倒粪回来的肖弟良才告诉大家，昨夜三号小监靠监门方的墙被挖一

个大洞，才从古柏过来的犯人乘雷雨逃出，并被当场击毙，大家听罢都默默无言。

中午收工回来，路过兰球场时，我还能远远看见躺在原处的那人，经过整整十四个小时，又是热天，在太阳下曝晒了一个上午，从那死者身上飘起来一股血腥气。

中饭后，何庆云把大家集合起来，排成一队走出大铁门，走到篮球场上，全队二百号人以死者为中心，围成一圈。

那死者已由原来扑地倒下状态，翻了一个面，面部，眼角和颈上两处被开花弹拉扯得血肉膜糊煞是吓人。一大群金头苍蝇绕着那尸体嗡嗡直叫，原先血水流过的地方，变成一条黑红色血带，一股股腥臭冲着围观者，令人头昏、呕心。

何庆云在那里高声训话，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的铜墙铁壁，谁要是胆敢逃跑以身触法，必定粉身碎骨之类的话。谁也没去听，现在已无需他再加精神压力，在这恐怖和令人呕心的场景中，大家的神经已紧绷到极点，现在稍不留意就要挨打，谁都把自己当成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恐怖和沉默真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共头子靠枪杆子，使中国大地空前的恐怖，也使中国百姓空前的沉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表示，谁在今天掌着枪杆子，谁就可以操持别人的死生大权，不过需要补充的，恐怕枪杆子里不单出“政权”，还出“压迫”，出“罪恶”!

正此时，果然听见“朴通”一声，队列中有人倒在兰球场上，大家将脸一齐转了过去，见倒地的正是潘老。一夜几乎未眠，加上六旬年纪，平时营养又差，身体本来不好，在太阳曝晒和血腥气双重夹击下他昏倒在地。随即又有两个人两眼发黑，支持不住蹲了下来。一阵骚动后，何庆云才下令回到监房，人们便牵扶起潘老，慢慢回到铁门里去。

晚上学习，何庆云布置各组就昨晚发生的事，进行专题讨论。题目是“你对昨晚发生击毙逃犯的认识是什么？”谁也不想说话，想到眼下所处的恐怖气氛，除了沉默再不该有任何反应。

（七）“狗”也挨打

为了加强“警戒”，队部对去办公室报告的制度作了新规定。凡到队部有事向干部请示时，不但要在院坝里报告老管，得到允许后，还要在转过隔墙进入办公室的走廊下，再呼：“报告某某干事，××请示工作。”等到队部办公室里传出了回应声，才能跨上走廊，进入某一办公室时，还要再呼一道报告，得到办公室内干部的回答后，方能进入。

繁褥重复的报告，曾引起岗楼士兵与干事之间激烈争吵，神仙打仗，犯人遭殃，夹在其中的流放者往往还要受到老管的刁难，因此，一般情况，犯人是不会向队部报告任何情况了。

而向干事们打交道的无非是各组大组长，由于老管门对报告的挑剔和不满，使他们两头为难，在挨过几次训斥后，值班大组长，在报告时心情特别紧张，生怕一不留意而挨骂，挨打。

一天傍晚，周学祝去队长徐世奎那里请示学习，也不知道是出于害怕不敢大声报告呢，还是出于更加诡秘的心理而产生的窃听欲。他先在走廊下怯生生的喊了一声“报告”，就肃立

着静静等待，分明听见办公室有人声，但就是没有回答，他偷偷望了一下岗楼上，怕大声报告受到上面的干涉，又轻轻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依然没有回声。

持续了两分钟，他耐不住了，在没有听到室内传“上来”的回应时，便轻轻走上了走廊。站在徐世奎办公室门外，他正侧耳去听，殊不知里面的徐世奎正好推门而出，看见面前隐约站着一个人，天色昏暗没看清那人是谁，不禁一惊。

“谁？”徐老大厉声发问，“我。”周学祝战战兢兢回答：“队长，我来向你请示今晚学习……”徐老大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立即转为恶怒，向他一拳打去，那驼背像一个皮球滚进了阶檐前的排水沟，脸正好磕在沟坎的三合土上被划伤，血流了出来。

盛怒的徐老大，又向他身上连踹两脚，并将他从沟中像提一个落汤鸡一样提起来，大声吼道：“你胆子不小，偷听什么？”

哨声一响，他令全队集合，一身血污的周学祝，站在队列前，徐老大再次训示：“今后任何人去队部报告，都必须按规定，否则后果自负。”当场以偷听队部为理由，撤消了周学祝蔬菜组组长职务，由马文华担任。

就这样，对我的监督人，由周驼背换成了马文华。此人原是解放军一名驻西藏部队的上尉军官，据说因投敌判国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八年徒刑，其人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不过在靠扰政府争取减刑上，他不会比周学祝逊色。

狼狈不堪的周驼背，从此以后再没有“文革”开始那种“熊劲”，从蔬菜组搬到五组去后，便从“枪手”变成了死狗。他本人左手残疾，大田组的高定额劳动一开始就使他丧了胆，承受高强度的劳役，不完成任务，晚上括风下雨都要呆在山坡上，还要接受大家对他的冷嘲热讽和“夹磨”。

自此以后，我经常看见他总是低着头，发黄的脸上一愁莫展，看到他那付狼狈像，一群人围着奚落他时，我还劝大家不要过分。虽知他狗性难改，但我确实缺乏痛打落水狗精神，几次我见他晚上八点过才回来便劝他慢慢适应。

有一次农忙，我们蔬菜组抽调人参加大春栽插时，他悄悄向我道歉，说过去是一时糊涂，做了许多对不起我的事，希望我原谅他。

严酷的现实会改变一个人，严格说，我自己也是在残酷压迫下，才从一无所知变成今天这样子。我想，一切在文革中陷身的共产党人，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多真挚，对中共抱有多少幻想，都会在受到打击时认识到自己的迷悟，幡然醒悔。

真善美既遭无情的猥亵而泯灭，人和人之间剩下的只有相互的敌意和杀机。以利害维系人和人的扭带，会因利害的冲突而断裂。

因此，“阶级斗争”除教会人奉行阳逢阴违，更使人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处于乱世，因文字狱猖狂，往往压抑自己内心的愤恨，低头当“良民”，避免当局敏感的

话题，防范那些身边的异类。不过，恰恰是当局的残暴，使那些想靠我将他垫出监狱的狗，也在转变。

（八）因报告声“太小”而冻昏的人

地处云贵高原的盐源，就是在夏天，气温一般在 30℃以下，腹中凭白菜萝卜这种粗纤维，皮下脂肪长不起来，身上散发的热能全都被高强度劳动所耗掉。所以，就是在 30℃的“盛夏”季节，也要身着棉衣，以防一阵风吹来惹上感冒。

一件棉衣发下来，便要一年四季顶着穿，加上棉花和棉布的质量又差，穿着棉衣干活，与肉体和农作物的磨擦碰撞加剧了破损。所以一件新棉衣，穿了一年已破损不堪。

按规定，一件新棉衣要穿四年才能领换新的，要维持四年之久，全靠平时一针一线的缝补，在那个条件下，另花钱只够用来买针线，平时一到休息和假日，补棉衣便消耗了我们许多空余时间。

为御寒对那破棉衣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到服役四年，一件棉衣要么已成一堆烂油渣，穿上比乞丐不如。要么就比原来重量超出两倍以上，全用针线拉住的千巴衣，特别在手臂和肩头处，有的地方是由十余层的破布缝叠起来。俗称“棉铠甲”比刘文采地主庄园的展出的展品，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衣着上讲，冬天和夏天的区别，仅仅是夏天可以靠一件“空心棉衣”渡日。而冬天必须靠“棉铠甲”，它样子很古怪，穿上身就变了一个驼背形体，就像一个东鼓西凹的极丑癞蛤蟆。

好在，那种条件下，全不讲衣着美观，图的仅仅是不受凉，不生病这个要求活下去，当时想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地狱，我会在今后写下记实，拿来展现于人，我想自击者，定会非常惊奇我们此时的适应能力。

1969 年冬天，正当文革狂飙肆虐大陆，二道沟农六队也特别冷。到了年底，一连又下了几天雪，元旦刚过，院坝里积雪一尺多深。

这天一大早，大约凌晨五点钟左右，忽然从那雪封的院坝里传来一阵阵踢踢蹋蹋的跑步声。

我闻声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向黑暗的窗外望去，灰蒙蒙的天空里鹅毛般的雪片还在不断地从天上撒落下来，铺盖这银白色的坝子。一阵木板鞋敲打雪地上的朴朴声，正从岗哨下方传来。

藉着银白地面的反光，一个瑟瑟作抖的黑色人影正在坝子中跑动。虽然天还没亮，仍依稀可见此人正穿着一条破单衣，下身穿着一条短裤，脚拖一双木板鞋，正沿着坝子周围艰难的跑步。

一边跑，一边从打战的牙缝中挤出断断续续的哀号：“我错了……我改……”那声音嘶哑、颤抖，伴着那在寒风中不断扑打的破单衣角，发出的“扑、扑”声，听去格外揪心。

“大声一点！”岗楼上传来厉声的命令。“看你今后喊报告还在喉咙里打转不？”岗哨狠狠嘀咕着。

又一个因哨兵判定报告声音太小，而被罚在雪地里光着身子跑的流放者就在眼前，对这种事已见惯不惊的人们，被他的喊声惊醒，到窗口边来看时，也没有多加理会，各自又爬回自己的铺位上睡去了。

然而那颤抖的认错声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含糊。

“嘭”地一声，一声十分沉重的响声，从那结冰的三合土坝发出，那含糊细弱的认错声和木屐敲击雪地的声响顿然中止。

院坝中，他倒下的地方四周一片雪白，唯独在他身下留下了一弯浅浅的殷红，又像是血，又像是他的最后一点体温融化的冰水。

当唐启荣把他背回医务室去时，才认出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来自自贡的农民，那几天还在发烧，他大概不知六中队的“规矩”，现在，总算一切了结了，此时，他那发紫的唇边流出一抹浅红色的白沫，铁青的脸上双目紧闭，呼吸十分微弱，光裸在外的肩膀、手臂、大腿和脚板已呈现紫青色，心脏还在微微搏动。

就为了这莫须有的“喊报告的声音太小”的借口，一个小小哨兵就可以虐杀这个中队的任何一名手无寸铁的囚奴。这便是光天化日之下，无产阶级专政监狱内每天都要发生的惨案！大陆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处处可见可闻。

悲乎，哀乎？然而，惨闻还会接连见到听到。

（九）目睹杀人比赛

监狱本来就够小的，晚上必须龟缩在高墙内，白天不得超越“队界”！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队界”之内“划地为狱”。

流放者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提防自己被无端拉到岗哨之下挨一顿毒打。所以，此时关押在这里的囚奴，希望仅仅是平安渡过劳役的一天。少受些饥寒，少挨些拳脚，每顿端在手里的罐罐份量充足，唯此而已。

1969 年的春节刚刚过去，在大雪刚刚收敛，冰雪初融，大地回春时，蔬菜组由汤干事安排我们在六队驻军营地后坡，面对二道沟的山坡草坪上铲积草皮灰肥！。

因文革狂斗，为了避免可能招来的麻烦，我们的野外作业地点，经过军管会专门划定：下令：“超过他们界定的范围，一切劳动力的安全概不负责。”

有一天吃过早饭，我们带上各自的工具，跟着汤干事来到了六队紧靠二道沟这片草地上。

大约有一年时间没到这里来了，站在高处看着下面的二道沟，透透空气，放松一下这段时间受惊赫的神经。

一年前，对面农一队坝子围墙里垒起的坟堆，灵堂已经不见，坟包已被周围的荒草包围。时隔一年，今年的春节并无人拜祭他们，也没看到看守它们的人，这般荒凉使人不竟想，去年守护他们的战友那里去了？

再把目光转向右侧，稀稀拉拉的松林间隐隐约约的坟茔面前，留下一些白色的花圈还依稀可见，看来他们的家人，在过年时来祭奠过他们。

死者去矣，生者留下悲哀，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早早葬身在这里的儿子、丈夫究竟为什么而死！

“人乞祭余骄‘老公’，穷山野冢只生愁，贤愚千载知谁说，满眼蓬蒿共一丘！”再过若干年后，又该如何评价这些荒丘中的亡灵，和他们的愚蠢？

顺着场部干部的坟场向下看，那排曾经囚禁我和陈力的羊圈，依然保存着，现在已由六队接管。指着这排房子，我向陈孝虞讲起三年前的往事：“诺！那排房的最后两间房子，就曾是高士清和金梅往过的地方，也不知道这家人到那里去了？”我叹了一口气，陈孝虞马上回答道：“我听医院里的人谈起过他们，现在他们住在骡马堡，金梅还照样帮人洗衣服。”

羊圈对着场部的那条田坎，而今已经“改造”，泥巴的田坎上，铺上了整齐的石板。那通向场部方向的尽头，粪坑依然保持着原来那个样子，不过眼下那粪坑里的粪水早已在入冬前被就业人员挑干了，而今那里积着半凼由四面的冰雪溶化后流进去的泥水。

山坡下，场部那片蔬菜地被整得颇规范，四四方方的菜地周围是排灌的水沟，此时被冰雪扎成白头一片，十几名就业人员在中耕去秋种下的越冬蔬菜，为它松土施肥。

场部办公室那边，正播放着广播体操的乐曲，时间已过了十点钟，一个“劳动力”正挑着一挑粪水从场部那面，沿着通往羊圈方向的石板路，一摇一晃的走过来，显然是给刚松过土的白菜椿头施肥的。照这几年种菜积累的经验，开春后，这些菜椿头会发出今年第一批的白菜叶子，用来供场部的干部和驻军。

蔬菜队的刑满人员，成年累月忙碌在田间，但享受他们劳动果实的人，从没有把他们当成人看。

差不多就在同时，一列戴着红袖套的“纠察队”，正顺着羊圈门口那条护沟机耕道，从南边马路上朝着羊圈方向走来。

军管会已成为农场的权力机关，这些戴红袖套的巡逻兵，是从武斗组织红卫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人人善于武斗，在农场作恶称霸，无人敢惹，其凶恶程度比明代锦衣卫东厂有过之而无不及，见所需的无论粮食水果，想拿就拿，谁也不敢阻拦，见着不顺眼的动辄打人，没人敢还手。

六队发生的血案多半出自他们手中，就业人员当面恭称为“军爷”，背后人人都骂他们为鬼子兵，处境低微的刑满释放犯，对这些不肖子孙除了背后几句唾骂，实在奈何他们不得。

同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披一件合法的外衣一样，有时候最凶残的杀手需要光冕

堂皇的面纱，这往往比任何战争更可怕，更防不胜防。

文革对劳动力任意屠杀，已成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进行的事，这在大权在握的军管会政府手中，更加方便更有效率。

军管会帖出“告示”：凡发生与巡逻执勤的士兵正面相撞，或尾随其后在五公尺以内者，巡逻人员可以当场采取“自卫”措施，一切后果均由“违犯者”自负。这等于给肆虐成性的“支左”战士，大开了随意肇事的方便之门，军管会的巡逻人员可以借自卫的借口，击毙任何劳动力后，不负人命责任。

当这个“告示”公布后，便不断发生就业人员在半路上碰到“纠察队”，因回避不及被打伤甚至伤命的事。例如最近北鸟中队的一个就业人员，没有注意到在围墙拐角处与巡逻兵相撞，当场就被击毙。

所以不仅六队的囚奴，因各种各样“不小心”而被罚站和被打，军管时期，当兵的任意虐杀“五类份子”，当时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

眼前，只见那挑着粪的“劳动力”，刚刚走到这一段石板路的中段位置，那队从机耕道上走过来的“纠察队”，正好走到了石板路与机耕道的交叉口，为首那一个士兵好像发现了猎物，把本来挎在肩上的半自动步枪摘下来，端在手里，突然的来了一个右转弯，从机耕道上转到了石板路上，以电影里当年日皇军那种武士道“雄姿”，刺刀指向挑粪人直逼过去。

那人见前方一支“纠察队”正凶猛向自己逼来，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石板路两侧菜田旁都是半米高，两米宽的排灌沟，这些天已被溶化的雪水灌成了泥浆，别说挑着这满挑的粪水，便是空手也难于跨过水沟躲避。

慌乱之下只能掉过头来，挑着粪水往回跑，可是肩上挑的那挑粪水死死地拽着他迈不快步，说时迟那时快，有意向他逼过来的纠察队，紧跟在他的背后相隔越来越近。

那刑满人员摇晃的身躯终于控制不住，担子里的臭粪拨了出来，就在距大粪坑十米处，为首的士兵手里端的步枪枪尖已刺进他的破棉衣中，扎到他的脊背上！由于猛然一惊，那两桶粪水连同扁担便从他肩上滑落下来，飞向路中，重重地摔在石板路上，粪水全部倾倒在两侧的菜蔬地和水沟里，散发着恶臭。

在惯性作用力下，那就业人员失去了平衡，歪歪倒倒的跌倒地上，整个巡逻小队五个人立即围住这个“猎物”。

为首的那士兵用枪尖指着那躺在地上瑟瑟作抖的人，命令他从地上爬起来，并把他一步一步地逼向大粪坑边上，接着命令他转过身去，面对着那个有 3 米深的装着一凼泥水的粪坑。

从山坡上目睹它的经过，使我马上想到一年前用长矛的矛尖，挑穿动脉几乎丧命的吴铁匠。

难道用刺刀在光天化日之下，刺进一个毫无反抗力的人，会激起强烈的刺激感，使这些兵兽性大快么？我的心为这就业人员一阵阵紧缩着！

却见五个士兵不知商量什么后，为首的士兵从怀里摸出了一个跑表，走到那劳动力背后。突然飞起一脚，向他的臀部踢去，同时按动跑表。

顺着那脚风方向，那人面朝着大粪池直直扑进粪坑中，扑通一声，坑里溅起了一股恶腥的水浪，待到这可怜的“活耙子”挣扎着湿辘辘身子站起身来，破棉衣已经浸透，头部和腿上擦出的鲜血立即沁了出来，站在冰冷的齐腰泥水中，整个身体因寒冷和恐怖而哆嗦着直发抖。

然而站在粪坑边，杀劲正旺的“军爷”，立即用刺刀指着他的头，吆喝着逼他沿着坑边上下台阶，一步一滑的爬上岸来，并按刺刀的指挥，重新站在方才扑向粪池的那个位置上，面对着粪坑。

第二个军爷又飞起一脚，像踢一个冬瓜一样第二次把他踢进了粪坑。与此同时，那为首的立即按动跑表，记载着这个活靶从被踢进粪坑，到爬出坑边所经过的时间。

此时，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五个士兵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把这个活靶踢进粪坑所经过的时间最短。

轮到参赛的人。拼命的摧促着挣扎在粪坑里的活耙子，而他因挨了不少刺刀，伤势越来越重，此时的“活耙子”除了一片告饶和哀求呻吟，再没有其它表示。

当那活耙子第二次在刺刀威逼下，从粪坑中爬起来时，血已经浸出了破棉袄，只见他跪地哀告免其一死。然而比赛才进行了两个人怎能中止？于是第三个兵令他第三次站回原先位置上面池而立。随着一脚又是扑通一声，跑表按下，活耙子第三次扑进了粪池。

当这个满头满脸血水和泥巴染红的“冬瓜”，第四次想爬上粪坑边上时，呻吟和哀告声已完全消逝，他再也爬不起来，于是第四个参赛者把他从池中像拎小鸡一样拎上来，还不等他站稳，就飞起了他那杀人的脚！

这一次，坑里在响过扑通声后，随着溅起的泥浆血水就寂然无声了。活耙子面扑在粪池里，任凭第五个杀手，怎样用刺刀截他的头也没有动弹，他就这么泡在泥水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岸上的刽子手们七嘴八舌的争论后，便排好队，挎上自己的枪，嘻笑着扬长而去。在五个杀手身后，扬起了他们起劲的争执声：谁的脚风利索、在这场比赛中谁用的时间最短！

站在山岗上目睹这场屠杀的我，看得身上直冒冷汗。

“纠察队”离开十分钟后，菜蔬队才闪出五六个人来，前瞻后看了好一会儿，七手八脚地把这个血肉模糊的人从坑中抬出来，我们看得很清楚拖上来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紧接着，才从场部开出来一驾马车，几个人连忙把这个活耙子抬上车，送进了医院。

几天以后，场部蔬菜组传来了消息：当天送进医院时，那人已被泥水呛死，身上无一完好的皮肉，肝胆破裂惨不忍睹，并在当天下午就地埋掉。在通知成都死者家属中竟称：“该员暴病而亡”，却隐去了这场活活被踢死的真像。

呜呼！目睹这场惨剧始末的苍天、厚土，你何以没有施展你的神力，阻止这种无缘无故

的凶杀猖行于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

呜呼！这腥风血雨何时才能了结，还这个世界起码的公理和正义？

呜呼！无辜的死难者何以如此软弱，对横遭的暴力不奋力反抗？强横的刽子手就这么失去人性，在虐杀无辜时不受到良知的制约？

呜呼，面对这种公开杀戮的游戏，竟无人敢申张正义，岂不令人沮丧！

呜呼，这阶级斗争扼杀人性，将社会道德摧残殆尽，造成的使整个社会粉碎性危机，将把华夏带到哪里去？

呜呼哀哉！难道从 1958 年以来十余年间数千万饥民为毛泽东三面红旗殉身还不够，还要让这场使公理泯灭，使苍生荼碳的文革，彻底毁灭中华民族不成？

（十）年关在耳

1970 年旧历年三十下午，六队的囚奴们按队部的规定，打扫完了清洁，准备像往年一样，再过一个冷冷清清的春节。这天下午，我洗完了衣服，已是六点钟了，大家正准备着自己的“餐具”，各组值星将分肉的面盆洗了又洗，在分到肉以后，组员们盯着肉盆子。

劳累一年，到了年底，盼吃顿饱饱的年夜饭，但装进自己碗里的仍只有这么几片回锅肉，和四两米的罐罐饭。

家里有人的还可以接到一封洒满亲人相思泪水的家信，若家里已经无人，那就只有守着这顿年夜饭，像钟平波那样，跪地求告于人间的恶魔了。

这时，大监的铁门里两名士兵，押着一个戴破毡帽的囚奴走了进来，人们并没留意在过年的时侯，还有人进农六队来。

自文革以来被抓进这里，关进小监的人随时都有，何况这期间正逢“严打”高潮，几乎隔一天就有人往小监送，加之此刻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盯着分肉，并没有查觉到，大监铁门里又来了“新客”。

带他来的老管刚刚从队部办完了交接手续，交给了小监的看押者。来人被本队的老管押着正向小监的门里走去，从那人戴的破帽子缺口处冒出来几根希希拉拉癞毛知道，来客是一个癞子，身上披的烂棉衣上沾着泥土和斑斑血迹，证明他刚被挨过打。

那时，他的全身发抖，铁青的脸上憔悴的眼光，死死落在那些摆在坝里的“碗”里，那是十分饥饿的眼光。

没走出几步，他忽然向押解兵喊道：“我还没有吃饭，我要吃饭。”并且赖在那里不走了。那老管向他猛推一掌，使他身不由已地向前一个趔趄跪倒在地，叠声哀求道：“我还没有吃饭，我要吃饭……”听到这喊声，我立刻想到前一年被枪杀的刘志和。

在临枪决时，他曾反复不停地在小监里呐喊：“我要吃饭”。这喊声，刘志和的判决书上

是这样写的："该犯恶毒的、以装疯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精神失常，使人失去了正常人具备的防卫能力，癞子在押送者面前的哀求，并没有喊醒士兵的恻隐心，只见那兵将他从地上一把提起，连推带搡的向小监隔向木门处搡。伴着癞子不停的哀求声，他和随带的布包，便被塞进了木门里。

不一会，随着小监铁门关闭的钝响和一阵上锁的声音，那喊声便被两道监门阻隔，听去十分微弱。但仍可清晰地听见他在喊："我饿，我要吃饭……"直到除夕的夜幕罩住了六队的大院。

夜，渐渐地深了，明天便是大年初一，按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今夜该是合家团圆，围在火炉边促膝守岁的时候，虽然 1967 年，刮了一阵破除四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风，但这个古老的民俗并没被毛泽东取消。

过了十二点钟，监舍里的嘈杂渐渐消敛，我和潘老还围在炉火的余烬旁。

静静的夜里，岗楼上猜拳行令狂喊和笑声分外清晰，那擦着瓦楞呼啸掠过的北风，夹着从小监那里传来断续的哀号和乞讨声，也变得十分清晰："我没有吃饭，我要吃饭。"

小监里的哀号和岗楼上的欢笑，在农六队上空交响，组成了一曲无法用音符表达的乐章，可惜，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有几人能听懂这乐章？

就像有人在抚琴而歌，歌词云："黑夜沉沉锁九州岛，除夕之夜唱欢愁。几人高台呼风雨，几人铁窗对枷锁。几人横行霸中原，几人流放在边亭。几人岗楼饮美酒，几人小监啼饥寒。"

"革命"的暴力恰恰选中了在这年关时节，把精神失常的人关进牢房里，让他喊出无法生存下去的呼叫："我没有吃饭，……我要吃饭！"那癞子的喊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他在饥饿中熬过了 1970 年的旧历年底，却没有人去理会他。

第二天天亮时分，小监那面的喊声依然没有停顿，只是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呻吟，而狂欢一夜岗楼上的老管正在沉沉大睡，六队的上空很平静。

初二，初三那小监里叨叨的呻吟仍没有停息，人们说两年前刘志和在同一监舍发出的呻吟声又响起来了，难道那被枪杀的刘志和冤魂不散？

第四天的夜里，也就是大年初三，那癞子的呻吟声，突然变成了呐喊，虽然那呐喊是那么嘶哑和虚弱，但分明含着待发的控诉，我预感到某种凶兆正悄悄地逼临到他的头上。残暴的地狱统治者要维持地狱的平静，不允许在这里破坏他们秩序，但是完全失控的癞子，坚持他的呐喊，好像唯有这样，才能减轻他所受到的痛苦。

果然，这天夜里，小监里响起打开铁门的声音，从墙那面传来了老管盛怒的喝骂声："你这找死的贱骨头，在这里闲得不耐烦了是吧，老子今天就给你退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棒击声，像杀猪匠捶打死猪的那种沉闷的响声。

这阵棒打整整持续了半个小时，果然揍效，喊声终于收敛了，小监的那面暂时又恢复了

平静。但是第二天天亮时分，他痛苦的呐喊声又再度扬起，虽然那声音已相当微弱，听不清他在喊什么，那嘶叫令人不安。

按小监规定，被关押人员每天的屎尿，是由蔬菜组的人挑着粪桶去挑出来的。大家排定了轮子，挨次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天刚好轮到我。

早上起来，我在得到岗哨的许可后，便挑着粪桶跨进通向小监坝子的小门，将粪桶摆在围墙边，坐在墙边静静等候。

值班老管依次地打开了各监舍的铁门，喝令住在里面的禁闭者，将自己的便盆端出来倒进那墙边的粪桶里。当打开关癞子的五号监门时，只听见从里面传出阵阵呻吟，并不见有人出来。

就在这时，我看见四个士兵，每个人手里操着一条一米多长的青杠棒。那青杠棒上，沾满了六队政治犯身上的鲜血，心里一阵紧张。

四人中为首的那人手里还提着一根绳子，从那小监隔墙的木门中走了进去，径直向五号房打开的铁门里走去，不一会儿就看见那癞子的双脚被捆在一起，门外的两个人像拖死猪一样，把他从里面拽出来，一直拖到了坝子中间。

我立即倒抽了一口凉气，眼看一场惨祸又要发生了，想避开，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那癞子的破毡帽在拖出五号监舍时挂在铁门的门坎上，而它的主人已血迹斑斑，简直变成了一具活尸。被两个兵倒拖出来时他还能挣扎，拖到院坝中，还欠了欠身子，好像想坐起来，但没有成功，只软绵绵地躺在地上。

四条汉子将他四面围住，一声喝令，操在手中的青杠棒，雨点般朝那已不成形的活尸上打去。一边吼道：“这可恨可恼的家伙，吵得老子们连年都过不清静。”现在把它当成了出气的活靶子，让这帮凶手尽情解恨。

开始，癞子还能对砍下去的青杠棒抽筋似的微动。如此持续了五分钟，那癞子便对落在他身上的棍棒毫无反映，先前凄惨的喊声，变成一串“呼，呼”的出气声，直到从那口、鼻中喷出的血泡发出扑次、扑次的响声，四条汉子才收住手中的棍棒，向那地上躺着的尸体不屑地唾着口水。

整个小监暂时一片寂静，周围的空气凝结着，凝住了从小监窗洞里射出来的眼光。我木然站在那粪桶边，低着头，面对躺在我面前的尸体暗暗祈祷，如此过了大约十分钟，从小监的隔墙外传来了报告开饭的喊声，已是早上八点钟了。

大监里正在集合，传来点名声和徐世奎的训斥声。

四个老管重新拿来一根绳子，将捆着尸首的绳子接长了一截，倒拽着那已经血肉模糊的身躯，经过小监的木门向着两扇大铁门拖去。在那拖出去的地上，留下了一条癞子染成的血路，只有那顶沾着泥垢和血迹的破毡帽，在 5 号监舍的门槛上，目送着被拖出去的主人。

监门口停着一辆人力板板车，车上摆着一床破草席，被军爷叫来的三名囚奴，七手八脚用破草席将那拖出来的尸体包裹好，只见他死死瞪着眼，似乎不甘心落气，到死没有闭眼，直到用一块布蒙着他的脸，将他甩上了板车上。

上午十点钟光景、三名囚奴拖着这辆装着癞子的“灵车”，翻上了六队山后四号梁子的山路。当我已把从小监挑出来的粪，倒进篮球场外的粪坑，顺着后山坡向四号梁子走去时，正看见那板板车停放在山前选好的一个土弯前，在那里挖一个土坑。

没到中午，又一个受尽暴政摧残，最后被活活打死的无辜生命，连同他无法陈述的冤，一齐埋葬在那里了。

第七章 背负重枷的炼狱

第一节 栽秧和收割

过了谷雨，盐源的气温还保持在 10 度以下，一大早，天蒙蒙亮，我们就被赶进那彻骨冰凉的水田里扯秧，咬着牙一泡就是六个小时，直到中午才站起来舒一下快要折断的脊背，当时只觉得满眼金花四射，将卷起的裤脚放下，去踝关节上捏一把就是一个窝，这是营养不良和劳累的警告。

肚子早已空了。拖着满身泥污的身子爬上田坎，领到半罐包谷粑和一瓢没油的干白菜吃过午饭，便在队长催促下重新回到水田里。直到天黑，辨不出栽下的秧子是否插稳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水田里爬起来。

晚上洗脚以后，看看满脚的伤痕，分不清是划伤还是冻伤，睡在被窝里暖和后满脚奇痒。每当此时，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不知他的生死下落，夜间因恶梦常常哭醒！

栽秧刚完，又奔赴五百亩麦田，抢收已黄熟的麦子。夏收时节，每天保持 12 小时以上的劳动，奴隶们只能用磨洋工减少体力消耗。然而，徐老大和何庆云像驱使牲畜一样，每天天色已漆黑不见五指，还要我们将收下的麦子运回山顶晒场，连夜脱粒。

收割是农活中最耗体力的一种，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种最累的活，不如说徐老大一加再加的劳动定额，使体弱的囚奴难以胜任。

为鞭鞑我们按时完成“抢收、抢栽”任务，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割麦和栽插进度。将每天必须完成的田亩数摊给班组，不完成是不准收工的。

晚上九点钟天已黑净，田野里四下响起了蛙鸣，囚奴心里常说：“当人还不如小青蛙来得自由自在，叫累了就睡觉了。”

收工回来后吃过晚饭，何庆云和徐世奎将没有完成任务的班组，集合在院坝里围成一圈，召开取名为“找原因”的小组会，让劳累一天的囚犯们坐在坝子里吹冷风。

大家被磨疲了，“找原因”也习以为常，反正没法完成高定额的任务，久而久之，一到吃过晚饭，每个人都会将棉被把自已裹成一团，任坝子里冷风狂吹，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徐世奎从办公室走出来，围成圈子的地方已鼾声一片。

后来徐世奎改变策略，下给各组的任务划到个人身上，规定谁先完成任务谁就先回监舍休息，这么一划一时见效，身体较好手脚麻利的年轻人，果然按时完成了。

徐世奎尝到了分开干的甜头，割麦定额也随之一再增加，由开始每人每天四分地追加到一亩地，监狱的高额任务，与酷吏们的残酷压榨追相逼迫我们。

只苦了身体虚弱、手笨脚呆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常在晚上收工时才完成全天一半任务。

徐世奎有了口实，站在田坎上讥讽那些没完成任务的人说："你们看看别人为什么能完成，而你们就偏要拖？这不说明你们一惯软拖硬抗？所以，今天非得完成任务，否则就在田里过夜吧！"

说完，留下徐伯威打着一个灯笼，吩咐他："你在这里守他们，一分一厘的任务都不能少！"说完拍拍屁股走远了，交给徐老头陪着。

经常完不成任务的是身材瘦小的蔡先禄、邓小祝们。天色黑净了，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被留下的人紧一声慢一声的割麦声，他们在豆影般的灯笼光下，向着好像永不到尽头的麦茬发呆。

有一次，蔡先禄实在累得不能睁开眼，就坐在田坎上打瞌睡，这可令田坎上的徐伯威十分着急，开口道："唉！你怎么在这湿漉漉的田坎上睡觉呢，你会得病的，我们也不能等到天亮守通宵啊？"

徐伯威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体弱多病的蔡先禄也是四十出头的人！蔡先禄站起来揉了揉眼睛，望着前方没有边际的麦子绝望的说："这日子我怕难熬到出监狱那天的……"

留在田里的人，经常要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在徐伯威那悠晃的马灯下回到监舍。

收割的奴隶们一上麦地便蹬开双腿，右手紧捏镰刀，集中全部注意力，运足气力，左手顺着谷杆从茬口右边那棵开始捏成一把，依茬口向左边割去，最后将已无法再增加的谷把，放到左侧身后边。

囚奴们像一头牛顺着割倒的麦杆向前冲，汗水从背脊沟里向下淌，一直淌过小腿弯再滴在自己踩过的脚印上，两腿打哆嗦，直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慢慢直起腰杆，扭着那几乎不听使唤的腰，缓缓地站了起来，用捏紧的拳头在背上和腿部轻轻捶击着。

待到恢复一下，不听指挥的两腿站在那里喘过大气后，抬眼看前方的终点还有多远？再回过头去看身后放倒的谷杆向前推进了几米？不敢怠慢，重新蹬开双腿，弯下腰继续着刚才的动作。

从谷杆上抖下来的像细针一般的粉尘，沾到身上与汗水沾在一起，扎进肉中会起一串串的红痱子，先前还感到又痛又痒，后来它们就随着汗水流了下来，变成一条条黑红色的汗垢。

捏着谷杆的左手和捏着镰刀的右手，经常因慌忙赶任务打架，一不小心锋利的刃口滑到手指上，在左手的指头上割出一条伤口，轻则鲜血长流，重则可以截脱一节指头。

不管出现那一种伤情，立刻用右手按着伤口，然后在伤口上撒上自己屙的尿，再从自己的破棉衣上撕下一块布包扎好，以免因感染增加新的痛苦和麻烦。

伤包扎好后，还要继续割下去，一天的任务是不能打折的，决不会因为手被镰刀割伤而休息或减少任务。

由于定额太重，割伤手是经常发生的，每收割一季度，割伤指头的总有十几个人，囚奴

们出现这种伤与毒刑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过度疲劳和大量出汗，出现两眼发黑金星四迸的情况经常发生，轻则呕心，重则昏倒，此时脑门和背上，由原先的热汗变成冷汗，耳朵里像无数轰炸机嗡嗡作响，心里很虚。因心脏承受不了，弄不好会发生虚脱而一命呜呼。

古柏大队就曾发生过这种事，但草芥人命的当局，照例会在死亡原因中批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蹲在田头，顶着烈日，望着头顶上的蓝天，会使人想到“白毛女”的歌词“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这样的日子要到那天才到尽头？杨白劳还有一个女儿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家可归，而我们除狱吏的苛责和侮骂外，还有什么？

农忙时节送到田坎上来口口声声称之为“改善”生活，只不过平时罐子里的包谷巴加厚了两毫米，平时连油星都不见的“奈温”菜，增加了半瓢。不过，累过头的人，因汗水出得太多，反而不感到饿。

每次农忙到来，只有消耗本来极其瘦弱的身体，汗水浸湿了衣衫，冷风一吹便会立刻感冒，晚上发烧了谁管？倒在发霉的铺草上用被盖严严实实盖上，靠发一身汗减轻病痛，第二天还得照样出工。

所以，每次农忙季节一完，都会出现大量病号，许多人就因此而一病不起，到医院再也没有回来，把自己一堆白骨抛在这荒山沟了。

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唯一办法，就只有用自己的包谷巴腾出一半来请人帮忙完成。交换的条件是论田亩计值，每由别人割一分地便出一两包谷巴。

用自己的包谷巴求人完成任务的做法叫“卖血”，为几个包谷巴替人流汗的叫“卖汗”，血汗交易都是当局的重苛逼出来的，这种事在劳改队中是很平常的交易，蔡光禄，邓小祝是经常卖血的人，本来营养就缺，这样作的结果无异加速死亡而已。

记得 1975 年，我从菜蔬组调到大田作业组。第一天参加割麦劳动，一天只完成了定额的一半，却累得我腰杆都直不起来。晚上到了八点多钟，看看天色已完全黑尽，距离规定任务的茬口足有二十米远。

何庆云走到我面前，幸灾乐祸的嘲笑我：“怎么样，我看像你们这种臭知识份子劳动关过不了，到就业队去怎么混过劳改关的？”我没有理会他。第二天便带上棉衣作好提前准备，任务要是再完不成，就只有露宿田间的命！

上午拼命赶，使自己不掉在近旁人五米内，猛然间镰刀滑到左手的小指头上把手指砍去了一截。血像水般的渗了出来，我丢下镰刀，将割下的指头带着没有割断的骨头按在一起，鲜血一个劲往外涌。

这时正碰上值班的郭川小，他走了过来，忙将唐启容叫了过来，将我扶到溪沟对面的农场医院，下午回六队以后，便将我分派到晒场上加入脱粒组的劳动，逃过当年收割这一关。

农一队就发生过，因夏收躲避这种高定额，横下心来，用镰刀将自己左手三个指头砍掉，成了残废偏入老残队。

真是苛役猛于虎，人真是太脆弱了，冤狱中，不知有多少人为高额劳役所逼，死亡或残废的，没人统计。

第二节 挑草

收秋一过，囚奴们酸痛的筋骨，还没有来得及舒展，被汗水浸透的烂衣服还没有洗净，连日熬夜眼眶里充血的血丝，还留在眼圈里，一年一度的挑草热，又以灼人之势向苦役们卷来了。

降雨量本来就少的盐源，一年四季从五月开始到十月结束的雨季，满足不了植物生长所需的水份。大半年时间风沙满天，干渴的野草，在红土地里，窜出很长的根，从很深的地下取回雨季才降下的水，延续草原的生机。

三面红旗人为造成饥荒后，为了解决粮食的恐慌，决策者用他们的权力将黑手伸向这里。拖拉机盲目把原本缺水，艰难生成的自然草原开垦出来，草地被连根翻转，大片的原始牧场变成了大片红色土地。

垦荒不仅把山梁上的草地变成瘦脊的红土地，为了给这些红土地里种下的庄稼“施肥”，又把周边余留的草地连根铲掉，使这里光秃一片。到了冬天，生活在这里的牛羊群，就进了鬼门关，牠们望着光秃秃的红土地发呆。

在这儿生活的牛羊群同备受大跃进之苦的中国百姓一样，也被强迫地接受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间农场饲养的牛羊群，经常莫名其妙地倒在放牧途中。这些倒毙在路边的牲畜，便是给囚奴“改善”伙食的“肉”，这就是在成都初调来时，干部们许诺过的牛羊肉当小菜的依据。

盲目翻耕出来的土地，失去草层为它们保持湿润，干旱和严重缺肥，使播种在它上面的作物长不到半米高，这些土地种上一季，往往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眼巴巴看着把劳动力和机械耕种的投入无畏消耗掉。投入的无代价劳动力，抵不上这种盲目开垦造成的亏损，这种损失对于独裁者，是无动于衷的。

为解决冬季各中队的牛羊群所需的草料，各中队只能向小金河附近的公社农家收购。然而小金河稻谷区，收割的谷草却是有限的，它被农牧场周围的各个农业中队所争枪，价格便一再攀升。由最初的每斤两分钱涨到每斤五分钱，当时的大米才一角二分钱一斤，一斤稻草等于六两谷子，仅这笔开支就足以使亏损的中队负债。

国营农场的经济亏损，在毛泽东时代是很普遍的。

由于各农业中队对谷草的抢购，中队只好从遥远的河谷地带，运回各中队牛羊所需的越冬谷草，马车的运力越来越无法胜任！于是，牲畜越冬草料的需要，便由刚刚从抢收战场上下

来的囚奴们用肩头承接过来。

每年，徐世奎都要从二十里外，垂直高差达两百米的河坝稻谷区，购回二十万斤的谷草以备冬荒！按每人每天运回一百五十斤计算，并动用全队一半劳动力出动，至少也要运半个月。于是，每当秋收完毕，又一个大量消耗我们体力的劳动——挑草，再度落到我们肩上。

从挑草那天开始，六队到河坝地区绵延二十里山间小路上，一条由一百号劳动力挑着大捆的草捆，艰难攀登上山的“壮景”便出现了。

别说挑着体积超过身体两倍的重担，迎风向上挣扎，一个人就是空着手，来回走两趟行程三十里的山路，都得汗流夹背，脚上打起血泡。这每天要完成一百五十斤草的挑运。对于体弱的劳役者，又是一场要付出拼命代价的折磨！

这时雨季刚过，爆烈的风季便接着到来。

早上五点钟，晨星还来不及收净，挑草的人就带着一根扁担两付绳子和一身的酸痛，以及永远无法恢复的疲劳，拔腿在昏暗不清的山间小道上奔跑起来。人们心里着急，因为一到下午西风骤起，挑着那大捆的草爬山就更吃力了。

早上六点钟，河谷的村落刚刚才袅起稀疏炊烟。挑草的队伍便在一片狗吠声中，进入了生产队的晒场。他们顾不上看清周围的环境，急急忙忙从草树上拖下一捆一捆的谷草，用最快的速度捆好草挑子。

赶紧挑着沉甸甸的草担，飞步在田间的石板路上。出得村寨便是曲折、上升的山路，押行的枪杆子向来只站在山颠最高处，向下监视这像蚂蚁般分散在山路上的人点，看他们向上一步步蹬，艰难向上移动无动于衷！

这是一副极其壮观的图画！艺术家也难构思出这幅褴褛衣着的苦役队伍，把它们的任一个段落，摄下来都是控诉和悲歌！

牛啊！牛！你这善良的牲畜，你可知道你咀嚼的每一根草，就是那些累死累活挣扎在半山中的苦役身上挤出的血汗么？

他们太阳穴上，突冒出筷子般粗大的青筋，额上淌下豆粒般的汗珠滴滴跟着他们脚跟，洒落在那羊肠小道上。发红两眼瞪着高高的山颠，待到爬上坳口，太阳才羞涩的露面，用他明亮的眼睛，盯着那曲折山路上，星星点点像蚂蚁向上移动的奴隶们！

登呀上登，咬紧牙关，一步血一涌，一步一喘气！在肩头上一闪一闪的草挑，就像背负着的十字架。草担子在肩上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回左边。磨起血泡了，破皮处流黄水了，再疼也要忍！黄水干过就成厚厚的茧巴！

当脚步登着最陡的石坎，两腿便直打哆嗦，冷汗夹着热汗在背心里流淌，如果气力不支或一阵大风，会把你连草带人卷括下去。

此时，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巴望别人的扶助，挣扎着站起来。回头望望那山脚下，抬

头望望山颠上，两头茫茫，叹口气重新收拾好草捆子，把牙关咬得更紧，吭唷！吭唷！用低沉的呻吟，唱炼狱的歌。

我的手因为几次刑具摧残手指发麻，捆起草来无论如何使劲，老收不紧绳子，加上捆草技术差，碰到草捆大一点，松松的草捆几次撞在前方的坡坎上，便从绳中松脱，加上毫无定向的乱风一吹，散了架的草满山坡都是。

挑回去的草是要过秤的，秤不够任务就没有完成，麻烦事也跟着就来。被迫在路上停下草担，将散掉的草捆重新捆绑，在乱风的干扰下好不容易将草捆好，往肩上一挑，走不了几步又散了。

如此地，散了又捆捆了又散，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我身旁过去，有人第二趟都打转身了，还看我在那老地方，同那堆存心同我过不去的乱草较劲。

气力耗尽了，我干脆停下来想恢复一下体力，再重新捆好草继续上登，但身后已没有其它人了，背后的刺刀顶着我的背，只好胡乱的捆好草捆，硬着头皮拼命追赶！

有时候我真想带一个打火机藏在身上，把那草捆连绳子一火烧掉，但前后都是人，干这样的事未免有些傻，只好将回归的时间一再后延。

下午的风势越来越狂，风吹干了我身上的汗水，刮起来的泥沙重重打在我干瘪的脚杆上，皮肤上皴出了无数细细的裂口，血从那些皴开的裂口里渗出来。

在风口上，风在我草担上增加了百余斤的副压，不但无法前进还要逼着我倒退回去。风还用它的巨掌捂住我的鼻子，压迫我的喉咙，使我张大了口也喘不过气来；风裹着我的双腿，使我无法开步。

于是在狂风中挣扎的我，使我想那越吹越猛的风将我轻飘飘的举起来，飞向云端，飘过无数的山谷，飘进白茫茫的云海，飘向那没有人烟的地方，躲在那里永远结束这炼狱之苦。

这时的心情，这时的风声，会使我谱出一曲乐章，它的名字就叫“风!”

有一次上午，正当我第一趟草挑过那道最窄的隘口时，我碰上了王德。碰上他时，他身上那件破烂背心已被汗水浸透，显出斑斑迹印，面前是刚散架的草捆，他坐在地上望着散落一地的乱草发呆，我见他脸色潮红，不停喘咳，知道他肺结核发作了，出气很臭。

这些年来，六队疯狂的打人风，以及徐世奎对“狗类”的渺视冷落，使许多荣膺“狗”类称号的人都开始沉默。只有他反常的变得更“靠拢”政府，可惜何庆云也好，徐世奎也好，似乎对他平时的告密并无特殊兴趣！眼看他的肺病如此严重，也好像视而不见，照样摊派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一丝一毫都没打过折扣。

此时我见他双眼直直盯着面前停放的草捆，便在旁边停下了我的草担，喃喃自语道：“中国人就像一堆乱草，他们是无法捆在一起的，非要一根绳子才能将他们强迫套住。”

见他注意听我讲话，脸上有一种乞援的请求，心中不免涌上了同情，暗暗叹息：“真是被

炼狱压扁了的人。”走到他面前，默默同他拽着绳子一人一端，不到五分钟就将那草捆重新捆好。

我跟在他的后面，想他被劳役和疾病折磨得如此，还自称“毛泽东思想的信徒，”既如此，在“普天之下莫非党臣”的中共统治时代，相同的信仰为什么没让徐世奎、何庆云对他产生一点恻隐心？却押着他完成这样的劳役？

夜里，北风掠过监舍房顶的瓦楞发出阵阵嚣叫，白天挑草早已累坏的苦囚们都已酣睡，昏暗角落里，传来王德发出阵阵猛烈咳嗽声，他今天天色黑尽了才回到监舍，大概下午的风寒使他病情加重了，他的咳声带着一种不祥之兆。

突然间，一道惨白的电筒光刷了过来，一个几乎被口罩笼住了脸的黄马褂，悄悄停在他的铺位前，王德下意识的坐起身来，却冷不防脚上挨了一棍。他唉哟一声，连忙睡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只听见那电筒向他吼道：“这么晚不睡，看见我又不喊报告，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报告……我咳……我感冒了！”他断断续续的解释，声音非常微弱。听得出来他此刻发烧得厉害，睡在旁边的人，本想替他解释，帮忙喊唐启荣过来看一下，然而想到平时他那种可恨可恶，没人吭声。

第三节 曹季贤“我要回家”

秋收过去，监狱里劳累的奴隶们，田间劳役刚刚结束，又熬过发烧的运草热，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年！

冬天像往常一样，一早起来的白头霜，令人畏缩着手脚，到了中午狂风大作，括在人身上犹如刀割，盐源的老百姓，已躲在炕边红火的老树疙瘩周围取暖了。

但是，在中共监狱里，从不会让囚奴们稍歇下来，冬天历来是当局当作兴修水利的好时节。盘旋在二道沟狭长山沟里的水渠，和分布在下游进入甘海的大小水库，就是二道沟两千名囚奴在冬季开挖出来的。

这些年除了 1967 年大规模武斗停了两年，到 69 年以后，“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又如火如荼卷括起来。

各中队分摊的改田改土工程每年都在增加，挑草任务完成以后，二道沟全长几十公里的排灌堰沟，便从水库出水口开始彻底的清理，农六队担负二道沟最末端的那一段，从靠近梅雨的最低位置开始。

照场部统一规定的作息时间，上午八点钟奴隶们便在荣老头和徐世奎的催促下，带着铁锹、铁镐、扁担、畚箕出得监门，顶着刺骨的风霜，越过五号梁沟谷的河弯，来到清沟现场。

在零下十度严寒中，值班老管把军用毛皮衣领拉到下巴下，除留下一双眼睛和鼻子，将脸颊严严实实的护着，怀中揣着双手，也被皮大衣的袖笼子保护着，脚上厚厚的绒毛皮靴不断在结了冰的田坎上来回跺着，发出踏踏声响。

游动在沟底下的瘦弱的奴隶们，穿着自己千针万线的棉盔甲，脚上套着布胶鞋踩着像刀子般的碎冰层，用铁镐将冻成冰块的泥沙挖松后，再装进撮箕里，甩到高过自己头顶的堰沟坎上。

零下十度的冬天，手脚被沿途的风霜冻僵，一到工地大家便放下工具，四处找寻堆积在田坎上的包谷杆和向日葵稿杆，经过二十几天日晒霜打，已干得用火一点便可熊熊燃烧起来。大家纷纷从田坎和背沟处抱来那些稿杆，用打火石引燃后，团团围住冲天的烈焰取起暖来。

不过，那些枯干稿杆燃起的大火，最多持续不过十分钟，就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一匣火柴一样，眼前并没有出现圣诞节的肥鹅和衣帽就熄灭了，十来分钟留下了一堆灰烬。

徐世奎追着出工的队伍赶上了工地，便将火堆的余烬弄熄，把恋恋不舍离开火堆的奴隶们，驱赶到各自划定的界段上。

山谷中传出铁锹凿开冰层发出的铿锵声，凿到特别硬的冰层会溅出火花，振得人虎口发麻。

徐世奎不停的吆喝着：”你们开工这么晚了，还要磨洋工，我倒不怕你们软拖硬抗，今天划定的任务，非完成不可，完不成晚上打起灯笼火把也要完成，冯俊伯！”他喊着收方员，要他拿着尺子一段段的把每个人的任务划出来。

他的眼光落到一个穿着破烂“黄马褂”的身上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身材壮实，刚刚从南充监狱调来的“新犯”，听说是由军事法庭开庭判决的，名字叫曹季贤，他犯什么“罪”，又为什么偏偏关押到农六队来，我们都不清楚，只听说他为争风吃醋，同他的上司决斗。

从他调到农六队仅三个月时间里，从来不与人交谈，除了偶然长吁一声“放我出去”，才知他并不是哑巴。不过平时从他那呆滞的目光来判断，这人显然又是一个精神上受过猛烈伤害的人。

跟随大家进入山谷后，他便坐在距大家不远处冻得硬梆梆的田坎上，两眼望着银灰色的天，好像他脑海里正翻滚着理不清的冤屈，即使大伙闹烘烘围着火堆取暖的那刻，他仍无动于衷。

蔡先禄向他喊道：“唉：曹军爷，不要再想那些不痛快的事，到这里来先暖和一下手脚。”他好像没听见一样，像一块石头端坐在那里，嘴边又滑过了他自己才听得见的那句咕噜：“放我回家”。

徐世奎向他走过来时，奴隶们已离开了火堆下到沟底，唯独只有他还继续保持原来的姿势，坐在原来的地方，好像有意在用抗工回答徐世奎似的。

这些年来，在高压政策下，依靠绳子和斗争会，以及士兵们的拳打脚踢，加上“杀一小批”的威协，六队一些人的楞角被磨得差不多了，自从 1968 年后，有几年没有人公开的抗拒劳役了。

徐世奎见稳坐原处的曹军爷，低声喝道“曹季贤怎么搞的，大家都开工了你在想什么？今天每人清理沟泥的任务规定是六米，你没听见吗，完不成任务你就要守到深夜也回不去的”。

但是这句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索性把头埋进两大腿之间，看样子天气太冷，他好像在瑟瑟作抖，徐世奎暂时没有理会他，走到渠边去检查那里奴隶们的清渠进度。

五分钟以后，手里柱着拐杖的荣老头走了过来，当他用他的独眼睛看到坐在田坎上的曹季贤时，便用手里的手杖去挑曹季贤身上穿的那旧军装，一面咕噜道，“你听见没有？赶快起来到你划的地段去，今天必需完成规定的任务”。

这荣老头已退休两年，凭着他失去左眼和一条假腿，凭着他打天下的老本，退休后，劳改局安排他专门旅游休假，他到全国各地周游了一年，感到不自在，劳改局又特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留在六队继续管犯人。

看来他认为六队的政治犯归顺了，反正一个孤老头闲着也无聊，闲不惯了，今天他冒着严寒的天气，来清理沟渠的工地上溜达。

一上工地就碰上这个曹军爷。当荣老头的拐杖截着他身上时，仍像一块石头一样，不理会也不吭声，这使荣老头心里好不自在。

隔得最近的余赋见状，从沟里探出头来，低声替他解释说：“他可能病了，昨夜咳了一夜，我们挨着他睡的人都没睡好”。荣老头对自己在犯人面前遭遇不理不睬感到万分恼怒，“有医生证明吗？”语气里分明含着怒意。

为了驱使奴隶们带病出工，各中队给医院打过招呼“非经领导同意，任何医生都无权给犯人开出休息的病假条。”一般犯人即使害了病也必须像健康人完成规定的任务。因病在工地上，临到死亡前才往医院送的人很多。视犯人的生命如草芥，这是劳改队里人道主义惯例。

曹季贤本人既没有想去看病，也不知道在这样险恶环境下如何保护自己，他那失常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单纯而简单的想法：“放我回家。”

可惜，这荣老头不但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管束犯人，他可是六队成立后的首任中队长。

现在他被这个壮实年轻人对他的渺视激怒了，用拐杖敲打着脚下的冰层，吼道：“我看，这家伙是好逸恶劳惯了，这种态度是公开抗拒改造，对这样的人，说服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的声音武断而直率，没有商量的余地。一面抬起头来向坐在高处的值班士兵命令道：“你们下来，把这个犯人拖到沟里去！今天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两个老管无奈的站起来，把毛皮的风帽推到脑后，从原来地方走了下来，他们走到曹季贤的身边，猛然一个擒拿动作，将他按到地上，扒下了他的棉衣、棉裤和胶鞋，任他怎样挣扎反抗，又怎敌得过这些训练有素的监狱看守？

两人从腰里掏出一根随身携带的麻绳，将他的双手反剪过来捆成了一个“苏秦背剑”的

姿势，然后将这个只穿着单衣的人推进了河沟之中，重新回到原来的坐位上。

曹季贤那双赤着的脚，在冰水中迅速变成了紫黑色，两条腿瑟瑟发抖，反叉着的两手被捆的大拇指，沁出了紫红色的血，双肩将他的头扭曲成一个十分奇怪的样子，面如茶色嘴皮发乌，咬紧双唇一声都没有吭出来。

他像一蹲坚硬的化石，僵立在冰水中，时间就这么一秒钟一秒钟的过去，堰沟里的奴隶们都停下手中的活，看曹季贤他那样子，说不出心中的滋味！

突然扑通一声，“化石”终于坚持不住，像被融化了的冰人，直直地倒在沟底的冰水中。

仁慈的荣老头才慢慢地走过来，命令站在曹季贤身旁的两个奴隶先将他捆在大拇指之间的绳子割断，七手八脚地将他架到山坡上，只见他全身青紫，像一条冰冻的活尸。

有人忙抱了谷杆来，就在他身边燃起了火，有人把他被脱下来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在场的人全部围了过来，山头上只听到徐世奎从远处传来的吆喝声，而那位独眼荣老头，在亲自目睹了他一手制造的杰作后，便悄然拄着他的拐杖，从山底下那条小路上走回去，渐渐消失在转弯的地方。

他今天没有料到这曹季贤，竟以不屈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必竟年纪大的人不像杀气正旺的年轻士兵，当年的红卫兵可以血刃对手，用刺刀剖开对方的胸堂而面不改色。

他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囚犯，是一个同他一样穿过黄马褂的人。是他亲口下令让曹季贤几乎冻死！虽然他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罪恶发生忏悔，然而他害怕了，慌慌忙忙的逃离了，这老家伙！

“动工，动工，有什么好看的！”狭长的沟谷里传来了徐世奎声嘶力竭的叫喊，他拼命地驱散在曹季贤周围的围观者，一面命令跟班的卫生员和两名流放者到河对面的医院去取担架。

曹季贤经过火烤烘暖的措施，仍然不省人事的昏迷在工地的田坎上。

“这哪是把我们当人看待，连对待牲畜都不如！”围观的人压低了嗓们愤愤的控诉着，人们心中充满了压抑！“比刘文采地主庄园的水牢里所展出的还要残忍，何况那水牢是藏在地下室里不敢公开露面的”。

“什么改造人，分明就是摧残人，法西斯！”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同声谴责刚才的暴行。

突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喊道：“活该！谁叫这曹季贤穿黄马褂？这年头，当兵的哪一个不是心黑手辣，想来他过去整起人来一点都不会比别人差，我看哪！用不着在他的身上浪费同情心”。

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1970 年初，当他穿着黄马褂，第一次出现在农六队的坝子里，就给这里的奴隶们蒙上一种天然的敌意，那时他成天低着头，好像一只掉进了羊群里的小狗，任何人对他都抱着一种防备。

好奇的人向他提出问题，他一律不与回答。也许人们提出像“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除非牢头们声色俱厉地问他：“你犯什么法？”他答非所问的嘟哝着，重复一句简单的话：“放我回家吧”。

吃饭、起居他也不问别人，有时候竟然傻到用手板心去接自己那一瓢白菜。但从他矮而壮实的身体猜测，他原是一个挺有气力的庄稼人，只因为在入监时受的刺激太深，使他沉浸在半睡眠状态，流放者戏虐的称他叫“曹军爷”。

因为行动迟顿，在六队那个环境下，他没有少挨老管们的拳脚，在狱吏们的眼睛里，被囚在六队的人都是“牛鬼蛇神”，都是他们随意打骂的奴隶。

出工劳动，他总是拖在队伍的最后面，每天加给奴隶们的劳动，尺满称足他也不例外，农六队的囚奴经过长期的磨难归顺了，都会在下地以后忙着赶自己的“任务”。但是，他好像木头人似的，坐在田坎上发呆。

为了他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六队有的是制服他的办法，挑灯夜战免不了他；绳捆索绑，斗争会这些能治服奴隶们的“行之有效”办法，都一一试过了。但他真像一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随你怎么整他，他都会用同样一句话来回答整他的人：“放我回家！”。

这种近乎痴呆的情况，渐渐使何管教和徐世奎感到头疼。因为，一个人压不服，其它的人都会跟着校仿。何庆云有一次向他威胁说：“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我们拿你没办法，六队的刘志和，就是因为‘装疯’，还不是照样把他枪毙了！所以你如果继续下去，就只有自绝于人民！”。

无论那一个国家，决不会对疯子格杀勿论，除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在中共监狱中把犯人不当人看，随意侮辱他们的自尊是家常便饭。一般来说，处在生死线上的“重刑犯”不伤皮肉，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有一次，徐世奎因伤及了这位曹季贤的隐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说：“你曹季贤别装疯，老实告诉你，你干的事是任何人都鄙视的，你趁你妹子从乡下到你那儿探亲，强暴了她使她怀孕，军事法庭判你十年，我看是判轻了，你还继续装疯卖傻，真不知道羞耻”。

本来，徐世奎这么刻薄的挖苦，出于对曹季贤的无奈，没想到他再也沉不住气，大声的抗议道：“你说的是假话，军事法庭那些不是人的家伙，勾结起来，把营长干的事，全都诬在我身上……”接着他带着哭声断断续续地当着在场的人，毫无遮掩的讲了出来。

“那营长才是真正的大流氓，前年我妹子探望我，他把她安置在部队的招待所，那里知道，才住了两个月，我的妹子就怀了孕。妹子还是一个处女，吃了哑巴亏，不敢声张，悄悄私下告诉了我，气冲冲的我找团长揭发这件丑事，不料被团长反诬一口，说妹子房间的钥匙只有一把，平时是保管在我手里的，一口咬定，招待所的人看到我一连几晚上上妹的房里住，把这事硬栽在我的头上。我跑去找师长，师长说这事有损我军名声非同小可，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调查结果还是把这事栽在我头上。我被关进了军法庭禁闭室，受到军管会的刑讯逼供，我就是这样冤冤枉枉到监狱里来了！”

愤怒而失去理智的曹军爷，决定枪杀他的营长，没想到还没进入这营长的房间，就被发觉了，师长毫不客气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倘若这位军爷还有一点骨气，就不该在身受双重羞侮下，依然忍气吞声就范于劳改队，他应该勇敢的站起来抗议军事法庭的诬判。可惜他没这样做，把他抓进监狱后，才听说妹妹堕了胎。

这椿丑闻，以女人的堕胎了结了，证据已经消灭，谁干的“好事”也恐怕只有他的妹妹才知道了。

现在，几乎被冻死在清理堰沟工地上的曹军爷，被三名流放者抬进了医院。最后因为命大，经过医院抢救，他苏醒了过来。可是那两条被冰雪冻得组织坏死的腿，给他留下了终身残迹。

他当时才二十几岁，中国人中蒙受这种类似之冤的人太多，中共的组织机构，毒刑和邪教作弄过多少无辜的苍生啊？

第四节 饥饿逼出来的……

按史书上记载，历史上的水旱灾荒只短期发生在局部地区。但毛泽东统治年代，灾难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饥饿持续的时间几乎是他统治的二十八年！我们就在他统治期间，整整忍受了二十多年的饥饿。

秋冬之季，在牛圈马厩的饲料槽里捡豆子和残余的包谷；用平时穿破补烂省下来的一套单衣或一件棉衣，向周围农民换回一小袋粮食或两斤盐外，就只有在坡上拣地里的包谷洋芋，以补充在饿得发慌时添加。

就是这样节省用换来的一点食物，也为丰衣足食的徐世奎们不容，他明确向岗哨上下令，凡发现奴隶们换来的食物，一律要加以没收。

为了尽可能躲开鹰犬们搜查，我们选择收工的高峰时间，趁大家一拥而进，岗哨不容易发现夹带时收工，在所带工具上想办法，将一小包食物藏在棉铠甲作掩护的背上；或将所带食物藏于粪桶和箩筐里，借这些既臭又脏的农具打掩护，每次带粮食回监舍，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被发觉。

收工站好队，等到哨兵们喊一声“去”后，才安下忐忑的心跳，回到监舍或厕所里哨兵看不到的角落，取出这些东西。但经常仍没有逃过鹰犬的眼睛，每天收工，或多或少在岗哨下面，摆着各式各样搜出来的食物。

后来，奴隶们发现在进入监门之前，靠着厨房的高墙转角处，有一个与厨房相通的角落，于是有人试着，在进入监门之前，就在那墙角处将所带的粮食抛进来，在进得大门后稍等片刻，再以进入厨房打热水的名义，进入那个角落，从那里取出刚抛进来的粮食口袋。

这样做最初成功，但是事久之后这个秘密也被狡猾的徐世奎发现了。于是他便在奴隶下班时，悄悄埋伏在那墙角处，守株待兔的将扔进来的粮食口袋一一截获，毫不客气的没收，扔

进了干部别墅外修的鸡舍兔棚里。

1972 年林彪事件后，中共虐待犯人的暴行，在舆论遣责下，召开了武汉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将严禁逼供信和禁止虐待囚犯的官样文章写成指示，下发给各地的劳改队和监狱。疯狂一时的打人风有所收敛，在生活采取了一些做法，允许监舍可以生火取暖，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开一排灶，专供病号熬药，煎汤之用。

但虐待成性的徐世奎，仍借口奴隶们将公家土里的粮食偷来煮食，经常将奴隶拉到岗哨下面问罪，轻则砸锅毁灶，重则将人拉到在岗哨下面绳捆索绑，奴隶们为反抗饥饿的抗争，一直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囚奴烤火的主要目的，仍是解除饥饿，所以在监舍里一直保持着搭灶生火的习惯。徐世奎命令巡逻士兵对“私煨乱煮”进行取缔后，将监舍中的灶拆除，用绳捆索梆对付“不听话”的人，人们只好另觅新的“厨房”。

监舍尽头的厕所角落，是选定的最佳地点，这里虽然臭气逼人，但一来这可以遮风避雨，且这个地方距离岗楼最远，被长长的监房挡住了老管的视线，不容易为士兵所发觉。

三块石头，支撑着大铁钵，架柴点火十分便利，如果老管来了，三块石头一拆，灶膛的火便迅速熄灭，扫入厕洞几乎不留痕迹。只要在这里作炊者留神，不要让灶里冒出炊烟，把哨兵从岗楼上吸引下来，自可在这里安然炊煮。

从此以后每天下班时，挑回来的箩筐粪桶里，增加了向日葵杆和包谷杆，只要挑进厕所将三块石头架好，把柴禾塞在三块石头下，点火后便扒在地上只管用嘴死劲地向灶膛里“吹气”，待火烧旺后，便可以煮饭了。

当然为了安全，派人在转角的地方盯着坝子和岗楼，见到已被老管查觉，或者何庆云徐世奎的身影闪出大门向厕所扑来，便立即通知蹬在那里烧火的人，迅速扑熄灶里的火种，紧急处理煮在锅里面的粮食，尽量能在他门到来之前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种厕所立灶煑食的游戏带着极大风险，万一让徐世奎们发现，锅灶毁了不说，看看快要煮熟的东西全被倒掉，煮食者被捉到反省圈里，还要对铺位大搜查，把不知经过多少风险才弄到手的充饥物搜去一空，煮食者等待着毒打或绳捆。

经过一翻惊险，当一盆食物，端到煮食者面前，被烟灰呛得通红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几个人顾不得烧火时留在脸上的黑灰，就地围在厕所里，狼吞虎咽的分食着，而将方才的惊险忘得干干净净。

若干年后，当我伏案捉笔时，回忆这点点滴滴的亲身经历，我又一次会深深感到人求生存的本事真是可叹！

如果说在流放者之间有过基本的统一，恐怕只有饥饿时才有过。就连周学祝冯俊伯对于厕所作炊这类事也是不愿干预的。

七十年代后期，沾着收获的季节，当局一方面为了维持高强度劳动定额的顺利贯彻，一

方面处理那些无法进仓的嫩包谷，同甘洛当年情况一样，按三斤折算一斤大米办法，利用晚间大家收割完毕，围在坝子里把这些嫩包谷子从它的胡上抹下来，连夜的在厨房里磨成浆。第二天蒸出来的包谷粑，才有一年中仅有几天的满罐，拿给大家“欢庆丰收”。

秋收后，坝子里堆积着满山遍野收回来的砍皮瓜，砍皮瓜是盐源的土特产，它不择土壤，不求施肥，只要将它的瓜子丢在土里，到雨季到来，便会生根发芽，夏天开花结果，这种瓜长老后，皮是硬壳，故名砍皮瓜，肉质甜中带酸，没有南瓜那么好吃，但它的瓜子却是名贵的白瓜子。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确定中美建交以后，其中签订的商贸协议中，据说中方拿来同美国签约的产品，就有这种白瓜子。听说当时这种用于外贸的瓜子价格高达几十美金一公斤。为了创收“外汇”，盐源农场的书记们也拿这种特产，充作外汇物资去迎合外国人。

春耕时，农场的红土地里，满山遍野丢下这种瓜子，到了秋收后，大量的砍皮瓜，随着收获包谷，一齐收到了各队的坝子里。收割包谷杆一完，大田组便安排几个病号剖瓜取子，剩下的瓜壳本是喂猪的饲料，汤干事叫拿到厨房去充作菜蔬，成了填补流放者饿壑的理想“副食”。

秋收后到冬天这种无油的砍皮瓜，准许流放者多打一瓢。我们过的生活真是连猪都不如，吃饭时，面对上顿下顿的无油砍皮瓜，谁都会叹息：“时逢艰辛，砍皮瓜也用作充饥的上好菜淆，未知后人知道，天荒地老背负苍天，一年流汗，可换回个啥？”

盐源农场开垦出来的红土地，本来都种着洋芋，自从采用在包谷地里套种砍皮瓜后，包谷地里没有挖净掩埋起来的洋芋，到来年春天便会从地下抽出芽来。所以夏日到来，包谷地长满了“野生”的洋芋苗，徐世奎曾三令五申下令粮食地里将洋芋苗铲除，可流放者却偏偏要护着它们。

秋天收割包谷杆时，洋芋早已枯藤。一直要等到拖拉机秋耕时，流放者跟着拖拉机，将深翻出来露出土面的洋芋捡起来，收藏在山洞和草树下，藉着风季来临的干燥天气，完好地保存下来，是来年春荒的贮备之一。

不过收藏这些战利品时，绝对是秘密的，被队部发现或被其它的流放者看见，便会白白的被人拿去。狡兔三窟，在广大的农六队地面上，埋藏这些储备粮的地方遍布山野，收藏得越多，越能抵抗冬春的饥饿。

春天本来是一个万物复生的美丽季节，但恰恰是流放者最难熬过的时间。经过一个冬天，夏天藏在地下的洋芋已基本上吃完。于是就轮到动用自己的衣物和两元零用钱，向附近农家交换。大胆的人还用农具去同农民交易，不过，一经发现是要挨捆挨打的，其罪名当然是破坏生产。

渡过这段“春荒”比甘洛农场好不了多少，为了胜任高强度劳动，流放者的精力，几乎都集中到寻觅食物中去了。

甘洛那不堪生存的历史，虽然已过去整整十年，但饥饿却像魔影般的跟着我们，因偷摘没有成熟的苹果，或在包谷地里偷一个刚刚挂须的包谷，被捆被打的事，依然是囚奴们的家常

便饭。

第五节 暴虐的“罚吃”

中午收工回来，跟在衣衫破烂，疲惫不堪的囚奴列队的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被反捆起来的“越轨者”跟在后面，他的颊上吊着一个糊满泥巴的萝卜或包谷，等队伍进了大门在坝子里站好，那被捆的人照例被叫到反省圈里。

有一次轮到平时沉默寡言的张华富，为了一个刚从土里拔起来得萝卜，被当兵的逮住，扎扎实实挨了一个五花大绑，那“偷”的萝卜就甩在他的身旁。

大家开过饭，他也足足被捆了一个小时，从岗哨上下来的哨兵才将他松绑，并命令他从地上捡起刚才还挂在他身上的萝卜，喝道：“把它嚼来吃了”。张华富傻眼站在那里，没想到挨了一绳子，还要把这个泥萝卜连蔸吃下去。

我在狱中看到老管们的私刑殴打、捆绑、罚站是经常的，但第一次见到连泥带萝卜蔸罚吃的惩罚。张华富迟疑了起来，那士兵便吼起来：“你不是要吃萝卜吗？现在我就看你把它吃下去！”他狞笑着。

在士兵的淫威下，张华富像一头野猪把那萝卜连蔸带泥嚼吞了下去。

囚奴有一种乞丐特有的消化能力，再脏再臭，总之从医学观点，吃下去会生病的东西都会消化掉。士兵瞪着眼睛看他吃完，然后给了他两记耳光，便大摇大摆离去，好像对这种“新刑罚”兑现，对他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我因此从刽子手身上总结出他们有“虐待癖”，用来解释这种反人性现象的内在原因，否则很难说清这些对奴隶的暴虐！

中耕季节，被太阳烘得水汽很闷的包谷林里，藏在高出人头的玉米杆茂盛的枝叶下，要完成任务的奴隶们，忍受包谷叶上抖落下来的粉尘沾在皮肤上的奇痒，忍受像蒸笼般闷热的水气，大汗淋漓的紧张劳作。刚刚才吐出粉红包谷须的包谷，用它魔鬼般的芳香，诱惑着在它旁边为它培土的流放者。

大约十点钟光景，早上的半罐包谷粑早已滑进大肠，空虚的腹中就会发出一种令人难受的饥饿信号。靠我不到五公尺的余波，向四方窥视了一下，看到带枪的士兵们躲在附近的山洞里打扑克，便向他身后的人打了一手势，两人窜进了更密的包谷林中，不出一分钟，便取来五六个一尺多长的包谷。

二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撕开裹在包谷上的绿衣，以麻利的动作迅速地将撕下的包谷壳分散埋在土里，蹲在潮湿的地上取过那乳白色的包谷，立即开始大口嚼起来。

两个人狼吞虎咽的用不超过三分钟的时间，速战速决以后，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坐着休息。那余波儿本是生产队的“惯偷”，其手脚之快是全队少有的，他自己就介绍，说他一夜之间把生产队放养几十只鸭子全部偷完，第二天在离鸭棚五里路的乡场上全部卖掉。

这偷包谷的事，简直是小菜一碟。所以纵然守包谷林的人已多次发现林中的包谷被偷，但从来没有捉住过。

有一次终于被跟踪在后面的何庆云，发现了蛛丝马迹。他在垒兜的包谷土中意外发现了没有遮盖好的包谷壳，跟着那行包谷查去那正是余波薅的那一行，扒开一看，一大堆刚刚从包谷棒子上撕下来的壳立即现了出来。

下班时，两个年轻人被叫出列，三个士兵把两人，扎扎实实的捆了起来，并将那堆从地里捡的包谷壳捆好，吊在他们的胸前，令所有在田间薅好包谷的人统统站到田坎上。

听到远处场部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了下班时才播放的“社会主义好”的轻松乐曲，囚奴肚子早已叽咕吵开了。当兵的押着余波两人走在后方，向山下的六队蠕动，听到当兵的对两个被捆的人发出呵责声：“今天老子要你们两个把这包谷壳全部吞下去。”

我心中不觉一怔，这当兵的不是说着玩的。萝卜荫加泥巴尚可以嚼来咽下，这包谷壳上全身是细针一样的粉末，加上那硬质的壳衣，就是甩给牲畜用来喂马也难于下咽。这不等于要活活地撑死两个小伙子吗？

我真为他们求生而承受毒刑感到痛惜。我更替那些“砸烂旧社会的锁链”站在无辜者头上作威作福，把囚奴当作猪狗不如的“党棍”，感到羞耻。面对着这一群恶棍！我又为自己书生气的软弱感到气愤。此时，我跟着大家，一齐向监狱走去，看看老管们今天又要干出什么虐待人的新花样？

走进铁门，两个被捆得大汗淋漓的年青人，按老规矩站到岗哨下的反省圈里。不一会岗楼上走下两个士兵，松绑后，一大堆绿色的包谷壳从两人身上散落下来。一个士兵向两人下令道：“你们反正是要吃的，我今天就看你们两把这地上的包谷壳全部给我嚼来吃掉，你们知道六队的管理爷这一关是不好过的。”

说着他死死的盯着那撒在一地的包谷壳，一面用枪上的刺刀去刺余波的手，我还以为刚才在工地上两个老管只是在捆人的时候，顺口说说而已，看来他们是当真要看人怎么吃下包谷壳了，心中又是一紧。

余波入狱的时间太短，缺少对监狱中这种非人虐待的应对经验，仗着平时手脚麻利，看到别人受到种种虐待，老以为不会落到自己身上，所以颇不检点，今天是轮到自己了。

两人胆怯地望着站在旁边，端着刺刀虎视他们的士兵，直到两个当兵的眼里直冒凶光，用刺刀在自己身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印，才从地上捡起那包谷壳，无可耐何地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然而嚼了好一阵实在无法吞食下去，用一种哀求的眼光看着那两个士兵。

不料守着他的士兵枪尖扎进了他的肉里，使他猛然一惊，拼命的将包在嘴里的包谷壳狠狠吞下。顿时他翻着白眼，刚刚吞下的包谷壳立刻翻肠兜肚地全部吐了出来，而那执着刺刀的士兵和岗楼上的围观者，报以哈哈大笑！

徐世奎背着手走了过来，看到满脸胀得通红的余波呕吐不止的惨状，只皱皱眉头，颇不

以为然的骂道：“哪一个教你们偷吃生冷，队部对你们天天都在教育，你们就是当成耳边风，看来光凭口说没有用，非得让你们赏赏辣子汤的味道，这叫自作自受，活该！”边说边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

六队的看守们，在对付关押在这里的囚奴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候折磨人的办法，是正常人不敢想的。光这罚吃，曾逼着小监里关押的疯子吃下粪便，硬逼着张华富连泥带荫的咽下萝卜，而今又逼人吞下包谷壳，不知道他们这些暴行，何时才被清算？

他们尽可造下种种天理人心不容的罪孽！在当时这样的事在六队圈子里，却成了侩子手取乐的刺激。而对于我们这些同命运的人因为看多了，而变得麻木不仁……

第八章 嬗变

68 年以后召开的公判大会，再没像 67 年 4 月份的那次公判会那样，还保存法律的一点形式，允许被判刑人陈述自已的意见和要求。

从 66 年到 77 年，“文革”猖厥的十一年中农场每年都要招开好几次规模巨大的“杀人”公判会。每次杀人的人数，多则十几人，少也有三五个。

整个公判会，将被判处的人五花大绑后，先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由武装士兵将他们反捓双手，押上场来已不成人形，让这些被整得生不如死的人跪在台前，以恐吓众多的囚徒。整个会场，充满恐怖至极的气氛，直到公判结束。

然而，从 1977 年开始，毛泽东建立的个人独裁，受到来自人民的普遍抵制，处在四面楚歌中，中共内部的“走资派”不但没有因“文革”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取代了毛的权力，逐渐走到了前台。

杀人正是毛共独裁走投无路的表现……

第一节 杀一小批运动

1969 年的“严打斗争”，是疯狂的文革屠杀达到高潮。盐源农牧场的许多政治犯，在这场残酷的杀人运动中先后被杀。

（一）枪杀陈力

1962 年 3 月，由重庆和成都监狱汇集起来的五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大闹了雅安三元宫监狱，引发著名的四川“监狱抢馒头事件”。在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振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我们的囚粮抢回来！”此人就是陈力。

事件过后，我们这支队伍被调到甘洛，他被押去了斯足中队，我被押到西西卡中队。残酷的炼狱使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在短短十个月中，就有一半埋骨在这里的荒山野岭中。

1964 年 10 月，在经历了生死磨练后，我俩逃出了甘洛的鬼门关，作为幸存者，我们最后在二道沟的“反省室”里相逢了。

在小监里，我俩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反省室里交流了彼此的身世。

1951 年，陈力刚从初中毕业，年仅 16 岁就应征入伍，“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使他在无知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经过两个月训练便跨过鸭绿江，充当了中共的炮灰。

日以继夜的穿插战和急行军，在滚滚浓烟战场上他们徒步穿捙到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

战上甘岭的战斗。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保卫祖国”的宣誓，这一切是战争和炸弹不能讲清楚的。

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陈力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当时人们称之为“最可爱的人”。身负八处重伤的陈力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

经抢救清醒过来以后，陈力睡在离前沿阵地仅两百米的担架上。炮弹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替换下他，他已经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接替他守卫阵地的后续部队，全在炸弹轰炸下成了齑粉。

侥幸存活的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火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冷静下来后，身处异国的他，却在寻思为什么而战？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爬进了他的脑海。

不久韩战结束，他复原回到了重庆。

复原回到重庆后，陈力被安排在位于化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两年中，1955 年，他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的论述，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等文章。他对工厂党委会包揽一切、大权独霸的作风产生了很深的反感。

陈力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被党委书记抓住，上纲上线，残酷斗争，除批斗外，还将其开除。说他们利用公家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

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厂因管理不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在天井里锈烂。设备因没人及时保养，很快变成了废铁，工人的消极情绪在普遍滋长。他同党委书记就企业管理产生了争执。争执多了，两人之间的承见日渐加深，这种承见，很快招来书记对他的挟私报复。

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早期启蒙，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怀疑。陈力在 1957 年的在大鸣大放中，友表他对工厂管理的见解，在鸣放会上斥责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

同时他抛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独立行使管理的办法。

那一次友言，他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右派帽子，从此削掉了他的“官职”，并被开除党籍。

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理想化为灰烬后，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陈力认识了中共是一个是非不明、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

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

紧接着，陈力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荒唐闹剧，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国人民的灾难。生活的经历，使他从对中共的迷惑中清醒了过来。

当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看到了中共的骄横拔扈，看到了中国百姓被奴役和饥寒煎熬的现状，看到了人们连挨饿都不敢直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对中共的敬仰、追随，转变为怀疑和敌视，经过慎密的思考，成为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战士。

1959 年，因为继续的反对工厂党委，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使他的“反革命”日益“升级”。

有一天，有人发现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刻写着“打倒共产党”五个字。监狱管教如临大敌，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字迹鉴定。

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武断认定这一“反动标语”系陈力手迹。

在提审他时，陈力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断然加以否定。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

他说他会公开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蠢事。

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申辩，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的头上。并以此作为铁证，宣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份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监狱后的半年，陈力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 1962 年发配甘洛农场，成为 500 名“流放大军”的一员。

在途径雅安监狱的抢馒头案件中，陈力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

我在西西卡中队同死神较劲，同“张棒棒”肉搏时，陈力也在斯足中队公开的拒绝劳役。我俩因为公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遂被当局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者，是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 年，当我们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陈力却留在二道沟地区。

同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陈力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小监。直到九月，我们合并一处不期而遇。

从此以后，我们俩便成为农场中人人注目的“反改造分子”。并戴上了一顶时髦帽子：“国际修正主义的急先锋”。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直到 1965 年 10 月，当局才将我俩放回到大监中。

1966 年 5 月，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初起时，在农六队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公开为文革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视若禁区，而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对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很大的摧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老鼠在足有 40 厘米厚的泥墙上穿洞。我俩便依靠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信息，而今想来，他的文章记载了监狱的暴行，揭露了中共的虚伪，抨击毛泽东复辟专制主义等等，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其主要内容了。

记得当年在报纸上读到“燕山夜话”的文章时，讽刺高产卫星为“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遮掩真像的“皇帝的新衣”；劝戒主观武断的“领袖”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

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而是直抒胸怀，痛斥毛泽东，斥其祸国殃民，痛快淋漓。

他在狱中写下的五十万字，每一个字都是射向独裁统治的一颗子弹，每篇文章都是一柄直刺独夫民贼的利剑。

记得有一篇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饿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娘。老大娘来到埋葬她年仅十六岁的儿子的墓前哭唱的吊亡诗，情节哀惋凄凉，如泣如诉，我当时边读边流泪。

这些年来，当局强逼老百姓从每月十八斤吊命粮中扣掉两斤，还美其名曰：自愿献给社会主义建设；毛贼忍心看着百姓穿补疤衣、吃观音土，却“无私”施舍为他唱赞歌的国际乞丐霍查希尔之流；他评述 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从饥寒交迫的百姓身上抽出血输给疯狂战麾下的狼群”。

点明，原子弹才是中国的独裁狂用来唬人的“纸老虎”，除了使周边弱小民族不敢对中国的胡作非为表示异议外，无异于“玩火自焚”。

在陈力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残暴、比杨广还昏馈的暴君。是一个连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思想灵活，妙笔生辉。陈力借一个因饥饿求生被置死地的中国人的愤怒控诉，为死于运动的中国数百万冤魂呐喊。淋漓尽致，痛快之极。

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文，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哀，表达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舒发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中国未来的忧虑。这就是陈力的文风。

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无法保留这些东

西。

1966 年 7 月，当何庆云将我从农六队粮食库房的小监，转到大监一个星期后，一辆蓝色吉普车开到了农六队的监狱大门边。陈力被两名警察从临时小监里押了出来。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一只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蓝布包，从容不迫走过农六队前的大坝。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陈力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环顾四周，频频点头致意。与我们一一告别。

当我俩的眼光最后一次碰撞以后，便成了留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褪掉的记忆。他那坦然平静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给我传递着难以割舍的情谊，还暗含着永别的嘱托。

陈力昂首而去了，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一步一顿的坚定步履，走向刑场。为他的信念和正义而献身。陈力一步一顿地走出了农六队的大铁门。大铁门边，留下了陈力永远无法消退的身影。

这么多年来，为了保护我们追求真理的神圣心扉，我们习惯了在棍棒和绳索下同监狱当局对话，习惯了长期伴着镣铐渡过寒冷的冬夜，习惯了在阴暗的小监中写下对独裁者口诛笔伐的檄文。我们不会奢望当局会赐给我们自由，也从不幻想个人的前途。在如此深重的灾难之下，面对当局的种种诱惑，我们只是报以轻鄙一笑。

我们曾为相隔千里、十年不闻音信的亲人倚窗舒怀，也曾为这种发自肺腑的牵挂而吟诵断肠的哀歌。但此时此刻，陡增了一种与难友生死永别的悲伤。

我曾目睹许多与自己生死相许、患难与共的伙伴从容就义，并多次从饮弹刑场的同伴身旁擦身而过，每到此时，都难以控制内心的哀伤！

公判大会会场之惨烈，常使我恶梦连连。血腥的恐怖笼罩着全国。陈力在盐源县城被枪杀，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形，难友多方打听见证人，才大致获知如下一点情况：

1969 年 8 月 21 日，在戒备异常森严的盐源县看守所里第 5 号监舍，一大清早，陈力像往常一样漱洗完毕，然后整整衣着，再将被脚镣擦伤的地方用绑脚布重新包扎好，便正襟危坐在铺满乱草的“床上”闭目养神，静静等候着狱卒来给他打开铁门。

十天以前，在县法院一间秘密的审讯室里，审讯官向他宣布了西昌中级法院对他所作的死刑判决。判决书说他“疯狂地、明目张胆的反对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

审讯官宣读完毕，便把判决书递交给他道：“现在允许你提出最后要求和遗言。同时，请你告诉法庭，你的死刑宣判应当通知你的什么家人？”并宣布给他十天的上诉期限。十天上诉期不提出上诉，便在第十一天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地回答道：“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共产党人手里。”

对于这个宣判，陈力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在他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剩下十天了，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尤其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独夫民贼毛泽东死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变化。

陈力的母亲已经亡故，父亲是巴蜀中学的国文教员。家教自幼熏淘和老父的悉心指点，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流畅犀利的文笔。文革狂飙如火如荼的时期，他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学校的“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朝不保夕。

陈力坚信，他的狱中著述，会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最后十天中，陈力唯一的心愿便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的著作保存完好，以留给后来的人们。

后来这些遗著不知是焚毁了，还是封存在档案中了。同我在狱中的著述一样，至今也不知保存在那里。

八点钟光景，通往小监的铁门被打开，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监舍门上传来了开锁声。监门打开以后，两名押解士兵急速地跨了进来。

陈力从容地从铺位上站起来，两名如狼似虎的士兵已经窜到了他的身边。一左一右，猛然地将他掀翻在地。并且死命地将他的头按到地上，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

一阵强烈的剧痛后，他的嘴巴被撬开，舌头被割去，满口鲜血。原打算在生命最后一刻振臂高呼的想法成了泡影。

陈力拼命的用脚上的脚镣，向按捺他的士兵猛烈的撞去。然而这一切都成徒劳。他被紧紧地压着没有动弹余地。

十分钟以后，陈力被反捆着双臂，由那两名士兵挟出了监舍。那间收拾得很整洁的“监房”，现已乱成一团。

两名士兵挟持着五花大绑的他，走出住了三年多的盐源看守所，将他推上门外停的一辆军用卡车上。在六名士兵簇拥下，他站在车厢的中间。

卡车启动，向盐源县城的主干马路驰去。车头上的大喇叭里传出歇斯底里的嘶叫，这时，陈力满口是血，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耳朵里，突然响起了牺牲在北京西城菜市口谭嗣同，题于狱壁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那视死如归的壮烈场面，已用他的血将要讲的话留给活着的人了……

街道两旁拥挤看热闹的人群，上了年纪的市民并不认识囚车上的人，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

囚车很快地驶出了盐源的街道，随即直奔公判大会会场。

上午十一点钟，在一处高高的山岗上，在一处可以看到山下的小金河蜿蜒流淌的开阔地上，陈力被枪杀在这里。

（2009 年 4 月 10 下午，我们雇车找到陈力被害的刑场，那里已是一片茂密葳蕤的白桦林

地。林下仆倒一块断成两截的水泥石碑，石碑上大书“刑场”两个大字。这次重返盐源，我才从文天华、李禄云、吕洞良等幸存难友的口里知道，陈力被杀害前，已被割掉了舌头。行刑前，行刑的兽兵强摁陈力下跪，但陈力仍然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兽兵遂用刺刀从陈力背后刺穿了陈力的膝弯，再将其杀害。）

陈力被杀害后，我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身陷囹圄，无法与他见面，“献身愿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陈力被杀害后多年时间里，我都没找到他五十万言遗著。

但我发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会将我们这段同狱吏斗争的历史，告诉中国的下一代，请他们知道毛贼东独裁的残忍本性，再不要相信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花言巧语，牢记只有民主才是中国今天所要实现的目标。

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反抗暴虐统治的精神永存！以慰籍他在天英灵。

（二）杀蒋正君和刘志和

同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一样，盐源农牧场接连召开了好几次“杀一小批”的宣判大会。就刑的人有越狱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图越出国境线的人，有斥骂专制魔头的政治犯，也有纯属为了凑数的莫明其妙受害者。

枪杀陈力前一天下午，何庆云和荣老头站在队列前宣布：“全体人员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扫清洁。明天盐源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要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何庆云还特别强调：“从宣判大会开始，直到宣判大会结束，禁止六队的任何人外出。”气氛更加萧杀恐怖。

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了一卡车士兵。不一会，岗哨上面以及周围的围墙上到处都是戴绿色军帽的人头。南边的和西边的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到处都是伸向六队院坝里的黑洞洞的枪口，一进入会场，就能感受到恐怖的杀人气息。

九点钟以后，各中队相继进入农六队的两扇铁门里的指定位置。

“杀一小批”运动以来，这样大规模杀人宣判会，已是第三次了。我和刘顺森、蔡先禄等被当局重点“敲打”的人，安排在紧靠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目的是让我们看清死刑犯临刑前惨不忍睹的每一个细节，以扩大恐怖效果。

当押解待处决犯人的囚车开进了农六队的两扇大铁门时，全场的眼光都朝囚车看去。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里不断传出“安静、安静”的喝令声。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喧哗。

疯狂的“杀一小批”运动，撕下了改造政治犯的遮羞布，仅这一次宣判会，就夺走了八名反抗者的生命。

蒋正君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从娘胎里出来，就属于毛泽东划定的黑五类，是被这个政权永远踩在脚下的人。

他天性软弱，在没有被当局逼上绝路前，他努力地逃避着政治。他微幸逃过了反右派的

打击，然而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他原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雕塑和绘画天赋，在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为他造福，而是最终把他送进了地狱。

大跃进后，书已无法读下去，1960 年的大灾荒中，他背着画板卖艺求生，流浪各地。但是在那个饿殍遍地年代，人们只关心能果腹的食物，谁又有兴趣请他绘画？穷困潦倒中，他打过苦力，拾过破烂。

拾荒中，有一次捡到了几根铜丝，拿到废品收购站时，被怀疑偷盗电线，将他送进收容所收容审查。

收容所里的管教员组织了斗争会，逼他承认捡到的电线是有意的反革命破坏，饥寒交迫的他求生不能，转而求死，横下一条心，破口大骂收容所里的管教人员，于是他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得到一张蹲监八年的判决书。

判刑劳改不久，蒋正君被送到盐源农场。开始，他被编在农二队，当局发现他会画画，让他绘毛泽东人头像。那时文革已进入军管时期，蒋正君自告奋勇雕塑了一个毛泽东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塑成，获得了军管会的赏识。于是将绘制“毛主席在安源”的巨幅油画任务交给了他。

蒋正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绘制成一幅高 3 米宽 2 米巨幅油画，摆在场部办公大楼的前面。

从此各中队都相继请他作画，在军管会特许下，蒋正君背着画板出入各队部，成了一名专业“画师”。他每到一个中队，享受着干部食堂免费就餐的待遇，在食不果腹的年代里，这已是相当丰厚的报酬了。

蒋正君在画画过程中，在各中队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文革派斗中的失败者。他们充满了逃向国外的幻想，认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过上自由富足的生活。

不久，各中队毛泽东塑像告一段落，出乎他的意外，他没有被招回场部，而是重新回到了农二队。蒋正君疑神疑鬼，怀疑他在各中队商量外逃的事情被人检举。

就在这个时候，蒋正君碰到了当年在孙家花园里的两个“老前辈”，请他们分析他被突然召回二队的原因。两个“老前辈”是看守林业队苹果园的，一个在国军中担任过中校军医的黄孝德，一个是任少校副官的陆存虞。从此他和两位老人结为朋友，互通消息。

他在绘画期间积攒了些钱和粮票，因为听说距云南边界上的李弥残部就在附近，便向两人询问那里的情况。有一次两位老人向他画了一张李弥残部所在地域的示意图。没想到这张随手绘制的草图，在“杀一小批”运动中，竟夺去了五条人命。

没出几天，传来了蒋正君逃亡的消息。并说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逃亡队伍。这次盲目出逃，很快就被抓获，军管会硬说两名国军军官是这次投敌判国的黑后台。

于是，一个以蒋正君和黄孝德为首的判国集团的案卷，便报到了西昌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桌上，这一“叛国投敌集团案”的涉案人员达四十余人，在本次宣判大会上拉出去枪杀的达五人之多。

当时，枪杀一批人是不用经过最高法院核准的。直到十一年后，他们自己复查的结果，这个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全是屈打成招罗织出来的大冤案，不过是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瞎吹。但是人头已经落地，事后的“平反”又有多大意义？

另一个被杀的人刘志和，更令人惊叹，当局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也推上了断头台。刘志和捕前原系重庆的一个街道派出所所长。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当过警察，还掩护过中共重庆地区的几个地下党员，他应该属于中共潜伏在国民党警察里的地下人员。

中共夺得政权以后，给了他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官，文革初期的四清运动中，他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们揪出，认定他是一个“隐藏极深”的国民党特务，将他判了十年徒刑。

刘志和入狱后，老婆改嫁跟了他人，三个孩子无人照料流落街头，他经受不了这些精神打击，被逼疯了。从此口中常念念有词，一上工地，便坐在工地上唱歌，见人就傻笑，任凭老管怎么打他和捆他，都没有任何改变，且病情越来越重。

寒冷的冬天里，刘志和将自己的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送给别人补衣服。同病相怜的同难制止他，他除了傻笑外，还将棉絮撕碎抛向天空，说是九天玄女来接他了。

晚上，刘志和裹着烂棉被，冻得瑟瑟发抖。然而毫无人性的老管罚他站在霜雪铺地的坝子里，看他狂喊狂跳以此取乐。

开饭时，刘志和拿过罐罐饭，往里面抓泥沙，再用手抓着连泥带饭的往嘴里塞。何庆云眯缝着近视眼武断地说，刘志和在装疯，用装疯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仇视。并狠狠的对他说：“你真疯的话，为什么还知道排队拿饭？”未经医生鉴定，便把他关进了小监。

刘志和被关进小监后，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他从小监传出来呼喊报告声。到了深夜，听见他高声的吼叫和唱歌。

巡逻的兽兵听得厌烦了，从办公里取来小监门上的钥匙，打开他的监房，给了他一顿暴打。夜半传出的惨叫声十分凄厉。我常常担心，总有一天，刘志和会被活活的打死在小监里。

有一次，老管打开刘志和的监门叫他出来倒屎尿，他突然将手伸进自己屙的屎尿中，抓出来往自己脸上一把一把的糊，一边糊一边还向老管们浪笑说：“抓屎糊脸，抓屎糊脸！”兽兵用枪托拼命的打他，并逼他抓屎吃，只见他一面吃自己的屎，一面浪声大笑。

监狱主管明知刘志和精神失常，不但不对他治疗，反而更加紧了对他的虐待。有一次，一个兽兵用铁丝套在他的颈上，牵着铁丝驱赶着他，好像在耍猴戏。逗得围观的兽兵哈哈大笑。作孽啊！人到了这种地步，还受到这般折磨。

最后残暴的监狱当局竟把刘志和凑成了“杀一小批”的人数，稀里糊涂地把他送上了刑场。以免他再在监狱中叫喊不休，落得个耳根清净。

枪杀刘志和的那天上午，两个戴着大口罩的士兵，像拎一只小鸡，把他拎到行刑判决的位置上。只见他披着一身巾巾挂挂的破布，满身粪迹。所经路上，洒下一路恶臭。

枪决刘志和的死刑材料上认定：他以“长期以装疯作掩护，大闹监狱，肆意诋毁共产党的改造政策，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刘志和站在车上，脸色铁青，拼命地想抬起头来，彷佛要从地狱里扒开一条缝隙透口气似的。为使他临刑前变得安静些。听说给他注射了镇静剂。

只可怜他三个流落街头的孩子，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不？他们若能幸存下来，得知他们的父亲在狱中因思念他们成疯，后来又被惨绝人寰地虐杀，不知道他们将作何感想？

阿弥陀佛！从今往后，六队再也听不见刘志和那凄厉的狂喊乱叫了，再也听不到他三更半夜里的哀嚎了，看守和兽兵总算六根清静了。

在这一批加刑的人中，还有一个人因说话没忌避“毛”字而判刑的。因为他平时说话常说：“你这人得坏了毛病！”“你别毛手毛脚的！”“你这毛脾气”……竟往“伟大领袖”身上扯，成了给他加刑“法办”的依据。

立案者问：“中国字有那么多，什么字不好用？偏要用这个‘毛’字？”“你知不知道‘毛’字是谁的姓吗？这一次念你没有见识，算从轻发落。以后再不注意，就要掉了脑袋。”

五十名被判刑的人到齐，每个赴刑者在两名军警夹持下，五花大绑被推到台前，排成长长的两列。他们早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紧紧捆在他们身上的绳子入肉三分。

手臂和肩头已呈青紫色，不到五分钟，“绳刑”发作，他们便前仰后翻地痛苦挣扎起来。

我坐在会场的最前面，清晰看到他们脸上的痛苦痉挛，清晰听到他们的痛苦呻吟，不敢正视。

主持人紧一声慢一声地宣读着每一个人的判决书，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每宣判完一个判决，高音喇叭里立即响起歇斯底里的口号声。

我只能默默替受难者祷告，盼望尽块结束这场恐怖的酷刑。

陈力被害后，我想在共过患难的同难中寻找他遗留的物品和遗笔，可惜没有收获，直到十年后，我得平反回归重庆，去到化龙桥弹簧钢厂和巴蜀中学，想找到他的旧址，都失败了，被中共封死的大陆只有中共的颂歌，大量血惺的罪恶，被封杀得无影无踪……

第二节 9.13 冲击波

正当史无前例的文革屠杀，在大陆掀起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暴力恐怖时，1969 年 3 月中央广播电台的喇叭里，传来了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珍宝岛的火并消息。在冰天雪地里激战，孙玉国成了新的英雄，冲突表明，中苏两大国的分歧由“嘴仗”，不可避免的升格到“武力格斗”。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阵营正式解体了。

何庆云在组织农六队的政治学习时，面对刘顺森等人提出的问题，掩饰不了他的迷惘和无知，好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给他空虚的脑瓜里垫了底。

陈力被枪杀前，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开幕那一天晚上，我们集合在院坝里，收听开幕式的实况录音，我们对林彪作毛的接班人并不感到意外，至于将这个决定写进修改的党章，没去思考为什么，也不会想它的后果。

独裁者间不可避免的倾轧，在权力争夺中很快暴露出来，仅只隔了两年，毛泽东便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中，上演傀儡大换班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温都尔汗的叛逃经过，只有在中共的档案揭密时才能大白真像，但温都尔汗事件，像地震一样振松了毛泽东的皇位宝座。

毛泽东害死了他的政治盟友，也换来了危机四伏墙倒从人推的报应。长期被他愚民政策锁在闭塞状况下的大陆百姓，就犹如在死一般寂静的夜空里听到了一声惊雷，揭开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铁幕，那里原来掩盖着一些各怀鬼胎政客们，演出的争权夺位丑剧。

中共对老百姓封锁严密，9.13 事发当天，国内的新闻、广播、报刊对这一事件没有报导！似乎北京城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大概经过一阵搓商后，新华社向全国公布这个消息时，按照毛泽东的诏令，全国上下同声谴责和声讨林彪。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从幕后推了出来。

此时林彪形象由副统帅，变成了孔夫子的忠实追随者和门徒。下发的批林批孔文件说他，言必称“克已复礼”；言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由“毛主席的好学生和继承人”变成了怀着鬼胎的封建时代“雅儒”!

当然，毛泽东大权在握，任意评价历史人物，不仅是他的狂妄，更是他一贯独裁的需要。

距 9 月 13 日整整相隔十二天之久，9 月 25 日借国庆节例行的卫生大检查的掩盖，农六队又一次进行了有专项内容的“大搜查”，不过这一次与过去任何一次搜查不同，属于我们在狱中所遇到的最奇怪一次。

上午八点钟，全队进行集合，宣布卫生大检查开始。然后，我们被士兵和管教干事们团团围住，按一般的搜查程序，依次地将各自的行李搬到坝子中，只是感觉气氛与以往那种人为紧张和恐怖有些不同。

轮到我了，两个老管走到我的眼前，先叫我取出“毛主席语录”，这是场部统一下发给每个人人手一册的必读物。

蹬在我面前的那年青士兵，从我手中接过那“红本本”后，翻开了扉页，直截了当的把那篇林彪所写的“再版前言”撕了下来，丢进一个专门准备好的匣子里，同时在他的笔记本上划上一笔，脸上毫无表情。

两个搜查人草草翻了我的行李，整个对我的检查不到五分钟便结束，还不到十一点钟，全队的检查便结束了，抬到队部去的是一箩筐纸片。

以后对 9.13 事件，当局就没有正式的宣布过，我们当时也知道，他们之所以对此事讳莫如深，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惶恐。他们的最高统帅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绝对说不清的。

其实 9.13 事件刚刚暴发，盐源县的农家已从国外的广播里获悉了这个消息，那时在外捡粪的张华富，每天下午，都会在梅雨镇获得一些在国内报纸上得不到的消息。

9 月 25 日大检查中，我们一直都在观察六队的老管们的反映，他们显然早已在几天前进行了专门学习！大检查一完，老管们失去了往常的骄横劲。

令人奇怪的是，那个林副统帅，最高权力眼看就归他了，怎么突然仓皇坐着飞机撞死在温都尔汗？"批林批孔"也好，"克已复礼"也好，在人们心理上此刻投下的全是骗人的疑惑。

林彪事件触动他们去思考：江山如此不太平，就是当一个卖身杀手都会感到无可靠主子可倚，使他们在心理上对残暴发生动摇。

其实中国的专制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极端自私的，人性都没有的杀手，同情友爱心全在"斗争"中泯灭，奢谈"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明摆又是欺人之谈？

郭川小曾是高德胜的贴身警卫，身材高大，他的豪爽和直率，容易沟通我们间的鸿沟。

林彪事件刚刚才过，这天在苗圃我碰到了他，等他按往常那样，捡了一个苗圃用的木架当作小凳坐下后，我向他发问道："郭队长，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有没有在你们学习的'内参'中透露出一些内幕，讲出来，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他眯缝着胖脸上的小眼睛看了一下我，微笑着回答道："我们学习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基本上就是报纸上登载出来的那些东西，对这样的大事，谁也不敢妄加评议。"

在六队郭川小，算是农牧场中最了解我的干部之一，对他少了许多介惧，于是我说道："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几分是真实可信的？还不是毛主席怎么说就照着登，就比方这林彪，一会儿说他是全党全军学习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榜样，是毛主席最信赖的接班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变成叛徒、野心家？"

他依然平静回答我说："你这个人总是爱钻牛角尖，所以吃了不少亏，原因就在你不认输。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你，事事得讲究实际。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的形势下老是同毛主席过不去，行得通吗？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犯人，就是中央的大人物哪一个斗得过他？林彪同他斗，最后还不是自讨苦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大山里？依我看哪！平时不开腔的人并不是蠢人，遇到政治上的问题，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叫大智若愚，没人会说你傻！"

这种装糊涂，恐怕是狱吏的普遍态度。像林彪事件这样的大事连一般的中国人都看得出来，这位下层"狱吏"岂有不懂的？既然懂了而故意装糊涂，是因为怕惹祸上身？

"那么，你当然知道林立果的小舰队，能不能透露一点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共产党有几句是真话？当年林彪肉麻地吹捧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时，这种露骨的假话为什么毛主席就查觉不出来？"

郭川小犹豫起来，为了掩盖自己避免作正面答复的尴尬，他向远处的夏守愚喊道："给我端一根小板凳来。"

等到夏守愚慢慢从棚子里将板凳送过来后。他在冬瓜架下坐好，开始回答："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我现在只考虑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一切不该我思考的问题，我是决不会去想的。"

"当然林彪红极一时，是他的运气！我们跟着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而现在他的阴谋大暴露，我们就说他是一个阴谋家。"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无法知道的，也没任何资料解释这一切，我们就知道他的私心大膨胀，现在不是重新在斗私批修吗？我觉得你也不要再钻牛角尖。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私心杂念太重，林彪这样的事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

他的回答反映了一个中共党员，对共产党的认识。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终于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战场上厮杀的雇用兵！他们只能奉行"随大流"。

"那么在你看来毛泽东选定林彪作'接班人'，是不是把他当成与刘少奇抢夺权力的枪手在使？"我这样的提问是对中共信仰的公开挑战！

然而他回答说："谁也摸不清他的用心，过去他把刘少奇指定为接班人，后来成了水火不容的仇人，还可用庐山会议去解释！而现在又同林彪反目，只能用'权力'争夺来解释。"

"林彪说要抢班夺权，让人看不懂。当然毛泽东不是神人，事事都料得那么准，但他必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说实话，我们何尝没有发生过与你同样的问题，但我知道这是不能乱讲的，我劝你不要老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车到山前必有路，中国有的是能人，用不着你瞎操心。"

看来，对这次有关林彪事件的探讨，郭川小已够坦率了。在经历林彪事件后，中共营垒里的多数人，都从他们对统帅的盲目崇拜中走了出来，郭川小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从小跟随红军从陕北山里打出来，可谓当今的新贵族，但将近三十年的实践，他终于明白他的周围，那些崇奉共产主义的信徒，原来都是些很自私的人。

于是他变成了只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很现实的人，此刻在他的心里不再装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空幻路线斗争，不再有那种拼杀的热情，当然也不会违抗他的领导去做各种危险事，只要尽责，便是他所追求的满足。

讨论到此该告一段落。

我立即把话题转到我们最喜欢的历史故事上面去，因为那无伤大雅，隔阂可以彼此化解。

今天我有意讲起了秦汉交替时期刘邦殊杀异姓王候的故事。我问他："韩信在被杀时，曾仰天高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还有什么其它的意义么？"他眯缝着双眼，彷佛在思考着什么，但他不能讲！

林彪公开叛逃这件事，给这里平时张牙舞抓的老管们，似乎下了一剂猛烈的退火剂，猖

厥一时的打人风收敛了，那套随时可尝老管饱拳的繁锁报告制度，也无声无息的取消了。

打人的魔鬼好像暂时被林彪带到温都尔汗的荒漠上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换防还是调整，原先那批对我们任意施暴的暴徒，不知何时悄悄地离开了这里，六队围墙里的秩序暂时又回到了“文革”以前的样子。每晚的政治学习，再也没有像林扯高那样督促各小组，向学习者提出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

林彪事件以后，流传对中共高层的种种猜测，夹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小道消息，一时十分活跃。处在狱中的奴隶们彷佛看到一线希望，广播里重复播放着“批林批孔”的刮噪，竭力掩盖中共正处在一个断层上的那种尴尬。

“无产阶级专政”铜墙铁壁的神话被打破了。

人们在旧秩序的惯性作用下渐渐复归平静，但魔头不归天，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党专制大势未去，中国是不会出现突破性进步的，当然变化需要时间！

农六队流放者，还要在徐老大和老管淫威下，完成每天十个小时的超强劳役，晚上疲惫不堪的人们，在学习时间仍一如既往，在自己的铺上呼呼大睡，或者点燃自卷的兰花烟，用燥辣的烟云驱散疲劳。

大陆被毛泽东的中共任意践踏已为世界公认，为了求真，在此期间，一位意大利的记者安东尼奥尼，对神秘大陆现状完成了“写真”，他采用实地拍照，再经汇总的方法，将中国大陆的实况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以《中国》，命名了这部新闻记录片。

为了突破中共密探的阻绕，听说他不得不采用照像机代替摄像机，拍摄成片后，为了能完整顺利的通过中国海关，他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批送出大陆。《中国》在国外上映轰动国际影坛，这部记录片拍摄的成功，耗费了这位民主斗士的多少心血啊。

《中国》中有危房相倚的老百姓住所；有破烂校舍；有依桥而立的晾衣竿上晾着破衣烂裳；有在街头争抢臬币的乞丐，这些真实的照片，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蔡先录因此感叹道：“安东尼奥尼，如果能进入中国监狱，他定会把我们挨打挨捆，完不成任务，晚上围坐院坝等等监狱实况摄入他的《中国》”。

张锡锟说：“一个外国人冒着危险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掇下这部真实的作品，一定会永载在中国历史上。”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必然孤立于国际社会中。

第三节 公有奴隶制下的特权阶级

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徐世奎，最懂得他的身份和如何扮演在这种特权群体中的角色。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在中国专制下所规定的许可权范围内，才能取得归于自己的那份待遇。他明白，同历朝历代的传统封建专制的统治者相比，他的地位和财富占有，有特殊的形态。

在他管辖下，分布在三坡夹两沟足有两千亩的旱地，以及谷底的五百亩水稻田，上百头大小牲畜，在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公有财产，但是没有主的财产，是根本不会有的。抽象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是无法运行并保存下去的。

实际上，农六队所有的生产活动的指挥权，基本上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日常安排两百多号劳动力的苦役，决定什么时候从事农耕，什么时间新修水利，什么时候安排通知场部的拖拉机来翻耕土地，什么时候买什么化肥，饲料种子和农药，怎样分配所收的农副产品，蔬菜瓜果，连什么时候把出槽的肥猪送给场部等等全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或直接由他定夺。

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队长，实际上是这个小小农场的主人。

（一）特权

不过，权力形成的过程中不断翻新的运动，使他养成了按规矩办事的习惯，他明白弄得不好，“走资派”的帽子可以随时套在自己头上，丢官不说，还要使他倾家荡产，被人抓住政治上的把柄，抓进监狱使他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必须按中共中央的规定办。他可以任意地奴役和驱使两百多号劳动力，但必须表现他的忠于职守；在政治上，他只要严格管住自己的嘴，从不产生与组织相悖的丁点想法，不说任何有违党中央的话，不做任何规定之外的事，也不超越他的党给他的那份待遇，虽然，他的组织发生最高权力的交替，连他自己都捉摸不定。

在平均主义低工资的标准下，他过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农场的普通员工。1969 年他把老婆孩子以及丈母娘从偏辟农村里迁到这里来，一家四口凭他每月仅四十元钱的工资，过着应有就有的日子。

举一个同样一家四口，工资仅比他少六元一个月的高士清一家作一对比，高士清的一家四口，加上一个能干勤劳的老婆金梅拼命的干活，还不能维持一家人最穷苦的生活，1964 年金梅大闹管教科，是在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被逼着为生存而发生的，便足可勾画出普遍就业人员的穷愁潦倒，金梅带着孩子要上邓扬光家讨饭吃的悲剧，是农场里尽人皆知的事。

然而同样四口之家，同样工资收入的徐世奎，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住着两间一厨的套房，按照国家的标准只收了每月五角钱的像征性的水电房租，房间里装修用的高档木料，油漆得光亮亮的家具，都按场部的内部价格支付。

毛泽东那个全民穷人的年代，特权者的福利待遇是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的。一家人的伙食除了按国家定量的粮食、布匹之外，每天所消费的蔬菜肉类油类统统按内部价格计算，中共这种“内部”价格的供应，是特权的人们才能享受的待遇！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符合商品社会公平交易原则。

我在这里无法列举徐队的所有经济活动，仅仅列举了公开暴露的部份。

至于徐队还要经常在家里款待周围的生产队长和厂部的同事们，吃酒划拳，馈赠亲友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与以报销，虽然六队名义上并不属于他私有，但只要他没有违忤他的组织，

在任期内，可以支配他所管辖下的任何物资。

他可以以工作名义报销额外开支，这些开支根本是他的那点工资无法支付的；他可以从一个队调到另一个队去当队长继续维持着他的权力。

中共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小集团，占有表面属于公有，实际上属于一批人私有的经济，这是毛泽东想建立的初期专制社会经济基础。

每天早上他都站在监狱的大铁门边，看着一个又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作业组，心中马上盘算起每一个组今天的作业地点，检查各组在出工时是否做好了今天劳动的准备，带上该带的工具，种子和化肥。

在铁门边最后送走了蔬菜组的组员，便叫住了从岗楼里出来的夏守愚，问当天驻军要他送什么菜，叮嘱他必须在九点钟准时把菜办好给他们送去。

同时还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菜篮子交给他，要他在办老管的菜时，顺便也带办他家一天所需要的菜蔬。

这夏守愚，之所以一直处在比六队任何囚奴特殊的环境里，就因为他像一条狗一样监视着蔬菜组的犯人，同时他能准确地领会队长交给他的特殊差事。

仅就他给队长家送去的菜，绝对是菜园地最好的品种，价格是由场部规定的，但在数量和品种上都是象征性的开了个数，仅这项每天所消耗的蔬菜，几乎是没花钱就由这夏守愚源源不断供给的。

在目送着夏守愚走后，他习惯的顺脚走下大监铁门前面那条通向一号沟的小道，这是一块二十亩的高产包谷地。最近他便在这块最肥沃的旱地上，种上了一片由他最先重新疆引进的核桃林。

五年前场部林场的果木专家组，在为农场规划今后所发展的果木栽培计划时，根据这里的土壤和地理气候条件，提出了一个培植核桃和板栗的种植计划。

为了取得从来没有在这里种植新品试种依据，林业组提出了小面积试种的计划。颇有心计的徐世奎，主动承接了这个试种的计划：划出一号沟包谷地，组织了专门的试种人员，从场部接回五十颗树苗，从栽插到施肥，治虫剪枝经过了两年时间，这批树苗长到了两米多高，长势很好，到了第三年以后，便正式的封林结果。

自从一号沟栽上这片核桃林后，他每天早上守着大家出工后，都要先在这里转上一转，晚上吃过晚饭后，他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在这里散步。

1972 年，他的核桃林开始结果，这一年秋天五十颗核桃树回报了总共四百斤的核桃，试栽成功后，他便将一号沟的包谷地全部栽上了核桃。在结果时派专人日夜守护，到了九月份临近核桃的收获季节，园子里便增派了一条大狼狗，并向六队的囚奴们宣布，任何人禁止随意进入园区。

收获的时候，整个的打桃、捡桃他都专门派蔬菜一组的人去完成，他自己亲自带着大狼狗，守在从铁门到一号沟的唯一很窄的过路上。直到装满核桃的大箩筐在严密监视下，一箩一箩的运进他指定堆放的队部办公室，并亲自上锁。

核桃从栽树，浇水，中耕管理流过汗水的奴隶们，谁都没有尝过这核桃是什么味。

在那个年代，核桃是在市场上绝迹许多年的滋补品！价值高达每公斤五十元。从此掌握在徐老大手里的每年几千公斤核桃，便被他当成了交际应酬，巴结上级的最好礼品。每年他除了上交场部和送给驻军的一部份外，还用它们打通与六队有一定业务关系的客人。

当然，他还必须注意对六队的干部们一碗水端平，免得因分脏不均，造成他的同事们相互“狗咬狗”。

除了核桃的开发取得成功，大片的苹果树早已成林，在山地上繁衍大片的果林并不容易。

盐源风季特长，在第二年雨季尚未到来时，山上红土地里经过几个月干旱没有一点水份，种的果树苗全靠奴隶们的双肩，将水从低谷的溪沟，一挑一挑翻坡上岭的浇灌，否则将成片干死。

靠水近的果树苗，两年后就开花结果，到夏天长得郁郁葱葱的果树，带给徐世奎丰收的窃喜。于是他将所属的几千棵果树用竹篱围成了果林，每到夏季果子成熟季节，便派人巡回防守。

为防止饥饿的囚奴摘未熟果子充饥，他增加了两头训练有素的恶犬，来回巡守，并宣布严厉的纪律。

从每年六月份结果，到十月份收摘时，果园的竹篱笆上挂着：“闲人严禁入内”的警示牌，规定凡私自超越篱笆偷摘苹果，一切后果自负。但是成天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们那能禁得住？凡捉住偷吃苹果者都要抓到岗楼下进行“反省”，轻则挨打重则挨捆。

八月中旬，果子已渐成黄橙色，每遇大风雨之夜，满地落果，奴隶们就是看见了，也不敢私自偷越那警示牌。那些落果徐世奎都派饲养员专门去捡来喂猪，也不准成天劳累的流放者吃一个！邓自新们又成了新的受罚者。

所以这里长出来的每一个果子都带着血腥味。

从 1969 年开始，六队的果木林就在充满血腥味的环境下，由每年收摘几百斤，达到年产几十吨水平。这些果子是不属于粮食类的三类物资，不必上交场部，全部留给了队长们变卖和“内部调剂”。

徐世奎用来学会建立公共关系，也学会贿赂上级部门。

（二）小秋收

权力在他的手中运用得十分得体，凭他掌握的农产品，在这里换来所需的东西，他虽不是地主、资本家，实际上比一切剥削者更贪婪的进行掠夺。

六队的狱吏，基本是六十年代从部队退役的军人，退役后，头一件事便是从家乡或附近农村中，挑选一个农家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劳改队里扎下根。

五月下旬和九月秋收，忙坏了从农村迁来的狱吏“家眷”。初来六队的家属胆子还很小，捡了地里的一株麦穗，也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看见。

后来跟着徐世奎的媳妇一道下地。那女人说：“看，这些抛洒在地里的庄稼多可惜，我们如果不捡还不是被周围的农民捡去了。”

她们管这种将抛洒地里的庄稼，捡回自己家里的行为叫“小秋收！”一年下来，一个人可以拣到几百斤粮食，比供应的口粮还多！

分到队里担任干事的男人们，跟着徐世奎，学会如何无情驱使奴隶们从早到晚干活；学会了利用各种“狗们”给他们提供各种“情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反改造份子”。更多学会了如何利用本队资源，为老婆孩子们过得更富裕一点创造条件。

当他们看到徐老大不花一分钱，就为自己的小家庭修了“土别墅”，于是利用当年闹地震，场部专门调拨用来修地震棚的材料和资金，紧靠徐老大的“别墅”，新修起一幢幢新的土别墅，比徐老大更气派更适用。

在这些新的土别墅外围，修起了饲养鸡、兔的圈。两口子配合得非常默契，用从地里捡回的粮食，不花一分钱地养起了家禽牲畜。在六十年代被割去的“资本主义”尾巴，到这时，便公开在自己的特权下，迅速长起来了。

至于每天这些小家庭所消耗的蔬菜，那是徐老大按“供给制”规定好了，只要向夏守愚打一声招呼，那人就会将上好的蔬菜，准时的送到各家去，这些菜只是像征性的记了一个斤两。

每年抢收季节，徐世奎用一切办法，驱使瘦弱的奴隶们完成超强度的劳动定额，但奴隶们只将成熟的庄稼砍倒在地，没有割净没有收完的麦穗谷刁到处都是，尤其是借包谷杆隐藏的包谷就更多了。

开始，郭川小把饲养员叫去，跟在收割的大队伍后面，明确规定，捡到的粮食，由各饲料房自行使用。但是饲养员捡这些东西对他们本人没有任何用处，何况同干部家属争抢又何苦？得罪了这些女人等于得罪了这些管自己的干部，于已十分不利。

偏偏徐世奎又将饲养房调来捡麦穗的人，调到晒场上担任粮食收藏的工作。他之所以作这样安排，不无他的私心作祟，收割人抛洒在地里的粮食，是这些队部家属最丰富的小秋收收获啊！

抛洒在地里的粮食，偏又被在附近放牧的老乡们发现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农场收割的地盘上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公社社员，他们背着大箩筐也跟在小秋收的队伍里，与这些干部家属争抢着洒在地上的谷刁，徜被徐老大看见后，便叫值班士兵驱赶这些社员们。

山里人生性粗野，这些年人民公社造成的饥饿逼迫他们！直到七十年代，社员从公社土地上挣得的口粮，长期不敷果腹。生存使他们对政府忍无可忍。

他们把自己的穷苦，部份归罪于来这里开办农场的劳改队，口口声声说盐源农牧场从他们手中占去了他们的土地；山坡上被开垦出来的红土地，使他们失去了放养牲口的天然牧场。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怀着敌意，注视着农场的一举一动。平时，在农场的土地上偷成熟的庄稼，成了极平常的事。现在在收割的土地上，捡一点洒在地里的包谷、穗株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他们对徐世奎的禁令置若罔闻，捡庄稼的农民反而有增无减。有一天徐老大带着人，从捡山的妇女手中没收了她们的背兜。

可是徐老大没有料到，这些被搜去背兜的女人并没离开，而是守在徐老大的归徒必经的过道口，等收工后，趁他只有一个人回队时，十几名妇女便拦住了他的归路，向他索要被"没收"的背兜，她们拿着棍棒，捏着石头块，如果不是看山人及时赶到，徐老大定会遭到她们一顿暴打。

经过这次惊赫，徐老大通过上司，同公社武装部的民兵协商，达成协议，公社的社员们可以捡掉在地里的庄稼，但一定要与六队的收割队保持三十米的距离，跟在队上小秋收队伍后面才被允许，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人生来就想富裕起来，在农场的土地上，狱吏的家属在地里捡到的庄稼，除供给他们喂鸡、养兔所需外，还拿到市场上与农民们交换成粮票寄回他们老家，这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时代的狱头，才有这种得天独厚的额外收入。

这种"小秋收"也给长期关押狱中的男奴隶，一次接触异性的机会，跟在奴隶们身后的干部家属，本来就是一群从农村里来的女人，平时他们被监狱的隔墙所阻，在严密监视下没有和囚奴接触的机会。

被专政划定的界线，使她们同她们男人一样，对这些奴隶保持着冷竣的态度。可是在小秋收"战场"上，这种近距离的收割，完全打破了彼此不知不理的屏障，提供了男人群体与紧跟其后的女人群体有说有笑的交流机会。

本来就已被高额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奴隶们，发现与异性的"交流"，有刺激神经达到消除疲劳的作用，奴隶中本来就有许多刑事份子，他们中不乏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而干部家属的女人中也有敢于打破"封建观念"，举行突围的风情女子，他们在同一块地里，不免眉眼传情发生莞尔一笑的时候。

有时，女人们对向她们有意投来的包谷注视良久，时间久了便有难以克制的冲动，在包谷林中靠茂密的庄稼作掩护，双方第一次牵手，并迅速交换了相约的纸条，使这种久积的感情得到突破，超越在常人眼里很难突破的禁区。

但是男女间这种极令人敏感的突破，最容易被其它的女人查觉。日子久了，麻雀飞过都有影子，扉闻便在女人中传开了，也预示着一场预想不到的灾难悄悄地逼近了牵手者。

在农六队最后几年岁月里，暂时拘禁过几个刑期很短的刑事犯，按照共产党的政策，这些刑事犯法者，仍被当成"内部矛盾"看待。

为了某些利用目的，允许他们能单独出入六队大门，并容许他们在监狱之外过夜。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白净的脸皮和周正的五官，颇受家属们注目。

六队自张事务长被老管们用棍棒打出六队后，接替他的位子是一个姓王的干事，此人因小儿麻痹症成了先天性跛子，偏偏他的妻却是一个性欲很强的女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跛子我不知道，其中定有她难以启齿的原因，她因自己的男人在生理上无法满足自己，在场部家属圈就有各种关于她的蜚言。

王跛子主动请求调来六队，恐怕就含着割断这个女人同场部相好们的联系，平息她各种风言风语的目的。

本来，王跛子可以甩掉这个女人，可是他却偏偏要缠住她，尽管她一再提出离婚，却遭到王跛子的拒绝。在那种条件下，与狱吏的女人私通是要以“破坏”军婚罪名论处的。

调六队没有多久，这女人在秋收中遭遇了同这小白脸的“秋波战”，不久双双坠入情网。

也不知什么时候两人突破禁区，有了秘密的约会！小白脸利用他可以单独行动的机会，两人开始暗中私通，然而麻雀飞过都留影子，何况这女人在场部就有名气，肯定惹人上眼。两人在场部私会的消息，经过家属中那些长舌妇女的传播，祸事终于降到了“小白脸”的头上。

十月间一天中午，小白脸被五花大梆地捆回了六队，并且关进了反省室。送来的那一天他已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据说，当天中午时分在农三队后面的草树中，两人赤身裸体被王跛子在这里来了个“捉奸”拿双。

王跛子找来的帮手，将小白脸痛打了一顿。女人反正已撕破了脸，只受了一顿羞辱。而吃亏的当然是“罪上加罪”的小白脸，好大色胆的囚犯，竟敢动到狱吏的头上来了，肯定不会轻饶！

不过，两类人员中，广为传播这一则“佳话”，沸沸扬扬的人言，首先幸灾乐祸取笑那六根不全的王跛子。若按他先天的残疾本可赢得人们几声同情，但他却属于令人痛恨的狱吏，反而替女人说话的人占了上风！说她是一个敢顶着专政压力，寻求自我解放的女人。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看见过她，有人说她被王瘸子五花大绑的捆回了她的原藉。有人说，她失踪了，八成被王瘸子黑办了。而等待小白脸的是法院的严厉判处。不过这一事件的主人公，在关押囚奴的劳改场所，上演了一幕悲剧。

他们敢于藐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血盆大口，以血的代价唱出他们追求幸福的一曲。值得盐源农场失去一切的人们称赞。

（三）模范共产党员张剑波

1969 年，北乌中队调过来了一名叫张剑波的管教干事，四川内江人，论其长相，一双凶狠的鹰眼和鹰勾鼻子配在一脸横肉的脸上。平时，他脸色铁青，毫无笑颜，给人一种阴险可怕的印象，左眼皮下长着一颗豆粒般的黑痣。平时虚着眼睛看人，这脸印古人所云：“其心不正，其眸睫焉”的老话。

据说原来他是内江法院刑侦处的预审员，因为善于用诡计和毒刑逼供犯人，所以曾被内江法院多次表彰过。并号称模范共产党员，在他的办公室里悬褂着“无产阶级忠忱卫士”的锦旗。

文革时调住西昌，因为他办案有功，特别擅长对付“思想犯”，六队又是全场出名的“反改造份子”集中处。加上在严打运动中突击办案的需要，便专门把他调到六队来。

长期的淫威，使残害无辜的职业杀手，养成一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的吃人野性。

在盐源农场办理集体枪杀蒋正均的反革命集团案中，他初试牛刀，仅从该案人犯的口供，就定下反革命集团结论，挥下屠刀一次就处决了五名“反革命”成员，那一个案子所处理的同案人员达四十余人！他自己就说过：

“上面既然要杀一小批，还有什么手软的。我们办案人员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杀人不杀人，杀多少人，都只能以政治形势的需要决定！至于思想这个罪，不一定要什么证据，藏在人的脑子里谁说得清？有个一两句言论便可以定罪！”

正因为他颇能精通文字狱做办案的主导思想，所以在文革中凡是办不下的案子都请他专门定罪，由于职业需要，渐渐养成习惯，使他丧失了人性，发展到连自己的妻子也成了他杀对象。

到六队来以后，他的作风是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平时并不像何庆云那样抛头露面，唠唠叨叨，与流放者很少交谈，当他的眼睛盯上了你，便在背地调集卷宗。每到这种时候，他便用内江人常用的话：“内江的老招牌，告才晓得！”那么，你就得留神，你的名字已在他的“生死簿”上勾销了。

六队近年来案子中，枪杀陈力、蒋正君等人，都有他提供的预审口供和签署的处决意见，他还审讯过潘朝元、蔡先禄等人，并签署了死刑意见，只是因为在上报到西昌地区中级法院时未被核准，而免去刀下鬼的厄运。

我也是他下过屠刀的人之一，当时杀人真是太容易了，凡是有反革命言论的，具体的说，只要沾着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整理材料上报处决。

他之所以狂批杀人的预审报告，出自他那升官的欲望，以及为满足自己兽欲的追求，只要用一两句话，甚至似是而非的编造，便下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结论，判决死刑的意见也就出来了。

然而杀人太多会造成心理上的极度虚弱，庭审陈力时，陈力怒目极视，严词批驳的态度深深振憾了他，陈力牺牲后使他经常通夜恶梦，梦见陈力，提着他的头来向他讨命债，吓得他无处藏身，惊出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

第二天，他的邻居马干事问他昨夜又梦见了谁？半夜三更的在屋子里怪叫，他却不与回答。神经上的负压，梦境中的恶鬼见多了，使他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在这种扭曲的心态下，

他原来就十分堕落的道德更加堕落，他本来就生性好色，为了解除晚上的失眠，越来越用异性的刺激来解除他的恐惧和烦恼。

在盐源农场，多年有一个女人暗中陪伴他。他对于老家带到农场来的结发前妻感到乏味，由乏味干脆把她送回老家，以免留在身边，“碍手碍脚”。结发老婆回老家后，他就同这个骚女人由暗地转为半公开同居。

张剑波从这个女人的奸宿中，用刺激来减少他的精神压力。但是自从他们变成了半公开同居以后，那女人越来越不满意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虽然张剑波的工资大半归她掌握。

为了公开的名份，她几次催促张剑波与“前妻”离婚，可恨的是，他妻子两个在当地公社颇有势力的弟弟，却坚决反对舅老倌这种陈世美作风，离婚遇到了无法抗拒的阻力，在那个时代，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只要有一方不同意，便会维持原来婚姻。

林彪事件以后，“杀一小批”的严打运动暂时停了下来，以此为专职的张剑波也开始闲起来了，他便借这个机会向盐源农场的管教科请了两个月“探亲假”，心里盘算着怎么来解决他的婚姻烦恼，经过与姘居女人的商量，在他的心中萌生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计划。

在老家的故居，这几年一直寡居的老实巴交的妻子，意外在乡下家中迎接突然归来的丈夫。她虽然已经耳闻她的丈夫在盐源已经同一个野女人私住在一起，但怎么敢去阻止这个凶恶“丈夫”的私情？所以一直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容忍了张剑波。

几次她收到张剑波寄来要她签字的离婚书，但却因两个兄长的反对，只好以不理睬的态度装成什么也没收到。

这次她对他的突然回家，颇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欣喜，心里对他并没有发生怀疑和提防。

回家以后过了几天。有一天张剑波到公社饭堂里买了几样下酒菜，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一瓶精装泸洲大曲，说是农场春节团聚时，发给干部们的，一直留着舍不得吃，这次特地带回家，同久别的妻子共饮。

女人经不住丈夫端着酒杯殷勤相劝，便接过酒来半杯下肚，不出半个时辰酒力发作，那女人感到口舌麻木，腹中绞痛，面如死灰，七窍流血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关于张剑波杀妻属实，但其过程是听来的不能保证没有讹传。）

张剑波见事已得手，连忙取出预先准备好的锄头铁锹，把床搬开就床下连夜挖了一个深坑，将她的尸体推入坑中掩埋，面上还铺了一层石灰，到天亮才收拾完毕。

第二天向邻人放出风声，说她回娘家，已两天没有回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去她的兄弟家“寻找”。

经过一番紧张表演，他自认为可以瞒过这些村里人，最后以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到公社武装部报案了结。

她的两个兄长虽然心里一团疑惑，但因为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去他们姐姐家，里外找寻，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谁也说不准，她是外出遇到意外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失踪。

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失踪，暂被张剑波编造的谎言瞒过去。然而，一个女人为什么在张剑波回来以后失踪，引起了村民们的怀疑。

被妻子阴魂附着的张剑波，怀着惴惴不安回到了盐源。然而内江市的军管会在这个女人的两个兄弟督促下，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将张剑波列为重大嫌疑人。对张剑波平时为人霸道作风十分不满的当地村民，在张剑波回盐源后，自发去她家的房前房后，寻找蛛丝马迹。

有人发现，张剑波家里常有金头苍蝇绕屋不去，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女人床底下有新土痕迹，而且怀疑那新土上面为什么盖有一层生石灰？最后终于从那里挖出了早已腐烂的尸体。恶贯满盈的张剑波，到了死期来临的时侯。

管盐源农牧场军管会，竟在接到内江报来的材料后仍取遮掩态度，要内江当局考虑到张剑波的身份，不要过份张扬，不要造成不良影响。

后来，又把张剑波划在隐藏在共产党内的蜕化变质份子，悄悄把这个"模范"党员办公室里悬挂的"无产阶级忠忱卫士"锦旗摘了下来。拒不介绍这个凶恶的杀人犯的犯罪事实。但内江他的老家，老百姓早已将这起凶杀案沸沸扬扬的"传开了"。

死者的娘家，在祭奠她的会上抚尸恸哭，要求当地政府将张剑波押回内江召开公审大会，并交给她的家属们处理，但却遭到了政府的断然拒绝，虽然张剑波被很快处死，但他的罪行远远没有揭露，民愤远远没有平息。

当局可以因"言论"罪，"思想"罪，把无辜的老百姓拉到斗争会上，一连几天无休止的批斗，却对杀人凶犯保护有加。

中共大小官员凭手中掌握的权力，天天在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受害者犯罪，他们比封建专制的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可以拿着皇上赐给的免死牌，横行乡里，还过，所能免去的也仅仅只有死罪。

而中共的党员干部靠掌握在手中的特权，犯了罪可用降职革官相赎，一般党员还可以用党籍换得豁免。今天，腐败和贪污成风，与这层豁免的保护密切相关。在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充份暴露时，连"检举"他们都要倍加小心。

像张剑波这样的刽子手，所以能大胆毒杀前妻，就是因为这种特权所提供的保护作用，全国像这类似的凶案，也不知有多少没有披露出来？

小秋收中，从这些拾包谷的女人口中，知道这些女人相当多生活得极不幸福，那些平时对犯人虐待成性的狱吏们，养成了他们残暴的习惯，回到家对自己的女人也一样施行暴力。平时把他们当作发泄性欲的奴隶，遇到不顺心的事，便把她们当成随便打骂的"出气筒"。

当然，这些基层狱吏们的家属，毕竟靠自己的男人。在全国还在饥饿的时侯，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她们有吃不完的粮食，还有吃不完的鸡兔肉，她们是一群受人欺侮的"幸运儿"。

盐源农场的各劳改中队，因为全关押的男犯，客观上没有这些干部对被关押者，施行性侵犯的条件。

在就业中队就发生过多次丑闻。就业人员在当时条件下，能娶妻成家的人本来就不多，但那里的管教人员往往利用职务便利，趁就业人员的亲友，姐妹，女儿来队探亲时，发生借安排住宿的机会，趁夜潜入招待所，对她们实行奸污的事。

碰上这样的事情，女方经常吃了哑巴亏，不敢对外张扬，除非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可以说，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使大批的无辜者论为淫威下的奴隶，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无恶不作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专政这个保护伞下面，干着人性沦丧的坏事，当然也埋藏了种种深沉的社会危机。

第四节 十年生死两茫茫

1959 年我被重庆大学强迫扣上右派帽子，无理踢出校门，送往南垌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留在我心坎上除一腔冤屈怨恨外，还有一个对我亲人的牵褂，该如何处理这骨肉分离之痛？

当时我很渺茫，看不清地狱前方何处才是尽头？想到抚养我的老人忍着从心头割肉之痛，我的心便像被刀割般难受。

外婆和弟弟在父亲被捕时，已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重创，接着又是母亲划为右派，这雪上加霜后，现在我又遭入狱大难，当时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们，给他们层层创伤的心上再洒上一把盐。

既是中共菜板上的肉，把我们一家赶尽杀绝，我们就只好忍受这“灭门”之灾的降临！

入狱后把一切可怕的后果埋藏在我的心底，万般无奈中，我只有选择不告而别。十九岁的我要像男子汉一样独立承担一切，但家人将承担怎样的挂欠和伤痛。

剩下的孤儿寡母会不会踏遍千里寻找天涯沦落的我？常使我陷在不知如何处理的两难之中！我只能如此了。

入狱开始的那段岁月里，我往往在夜半睡梦中哭醒。

最后，一个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信念控制了我，当时想，除非我从监狱里沉冤昭雪那一天，我能体体面面的回到亲人中去，绝不会以“带冤”之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主意打定，我就突然消失了。

从此就再没有向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任何关于我的信息。从那以后，我独自任由劳改队发配充军，从一个鬼门关到另一个鬼门关。

算起来，我在狱中渡过这段日子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透过瓦背上挤进来的月光想念他们。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会摆着从厨房端来的饭菜，默默地坐在我

的铺位上，面前摆着四个碗和四双筷子，合着掌，祈求他们在远方平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千里孤飞的失群之鸟，终有回巢的时候，“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鬱鬱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悲歌·乐府

对亲人长年的眷念，像一杯永远无法喝尽的苦水。屈指算来，我已“三十五岁了。先前还是一个稚气的孩子，十五年已变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如果那倚着竹篱，盼我归来的白发外婆还在人间，那么她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有一天，心灵的感应像一股强电流聋击着我，使我强烈地感到一种说不清的预兆，隐约感到这些我日夜萦思梦绕的人都已不在人世。

一种不能再与他们相会的恐惧催促我，我不能再音信杳无的继续下去。否则，我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他们了，那么就算我从这里活着出去，我将要终身负罪，我既对不起日夜盼我归来的老外婆，也对不起艰辛中抚育我的母亲。

（一）寻母

1973 年春节期间，就在这股寻亲思潮的冲击下，我结束了十五年的固执。第一次提笔向母亲写了狱中给她的信，全信仅用了一百多字，因为十五年的变迁，我不知现在我到那里去寻找他们！该怎么去寻找他们?

“妈妈，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仍按十五年前的地址试着写这封信，倘若你能收到它，就请立即回我的信。我这是在四川西南边陲上一个小县城里给你写信，希望这封信能接上我们之间已断了整整十五年的联系。

您的孩子 孔令平 1973 年 2 月于西昌盐源 909 信箱六中队。”

这一百字寄走了我整整十五年对亲人的朝思暮想，也寄走了十五年筑成的自闭，我想这封信她如果不能收到，那么至少告诉我一家人全都亡故，倘若这封信寄到她手里，那么我估计得出，在这个文字狱紧锁，我们间唯一可沟通的窗口上，魔鬼正用怎样的眼睛监视着这些信！这第一封信，必会受鬼蜮们的盘查，嗅出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然而这一百个字，堆积整整十五年的血泪意欲喷溅出来。就宛如一个丢失了母亲整整十五年弃儿的呼喊，在误入地狱的不归路上，寻找归途！寻找她的喊声！

所以我纵有再多的怨恨要倾诉，但委曲和苦都不能露出丝毫，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徒生枝节，不但我这一百多字不能打破关闭了十五年的亲情大门，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这封问亲信，整整过了五十来天，与其说因为她在十五年来从北碚托儿所任教，到目前在一家乡村医院接受监督劳动，需要辗转传递，还不如说，经过了多部门折信检查层层审阅，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医院的门房叫住了母亲，说有一封从西昌寄给她的信。

咋闻西昌来信，她心中一惊，自 1967 年小儿子失踪后，已整整六年，她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从 1966 年文革以来，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托过希望的，她年青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们，突然好像从大陆这片海裳叶上消失了，从此再没人给她写信，使她隐约感到，当年学生时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

那么，现在又是谁从西昌给她寄来了久久盼望的信呢？

当她急忙来到门房，从小张手里接过这一封腊黄的信时，她心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预感，“莫非小儿子方兴有了消息”？当她注意那信封被人折开过好几次，有的地方已经撕破，她也只能坦然相对。

其实自己已没有什么值得当局神经过敏的。这么多年来地处北碚边沿的小镇医院，被强迫监督劳动的母亲，对所受的人身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习以为常。她的家已被查抄过十几次了，“革命”群众搜去了他所有稍稍值钱的物品，连一身像样的防寒棉衣都没有给她留下。

前年就为给自己缝一件御寒棉衣，招来一顿毒打和斗争，使她断绝了生活的念头，那次她烧掉了珍藏三十多年的老照片，并且决心投湖自杀。

然而苍天却安排了她绝处逢生，她被救生还，并在附近农民们的安排下，一个小女孩在她的身边伴她聊渡晚年……

然而此刻他来不及思考得太多，捏在手里的信封上所写收信地址，分明是：北碚机关托儿所，那字迹好熟悉。她的心紧张起来，立刻又去看那信封上所留下寄信人的地址：西昌 909 信箱，邮戳上印着：西昌盐源。这会是谁呢？她连忙拆开了信封，拿着信笺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这称谓使她从一场恶梦中惊醒，从她那昏花眼睛里闪出了一束十几年从末有过的喜悦来，难道是失踪六年的兴儿？兴儿，你在哪里？你真还在人间吗？这么长的时间妈为你流过多少泪？你可把妈想坏了呀……

一股暖流溶进了她身上的每根血管，纵使枯木逢春老树新芽，好比行进在沙漠上快要渴死的探险者，忽然发现了一缕清澈的甘泉；一个深埋在地底下将要绝命的矿工，触到了救援者的手，那惊喜和绝处逢生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千头万绪般钻动在心头！

儿哇，你可知道妈妈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一阵激动的初潮拂过心头后，她又重新在老花眼镜背后去分辨那熟悉的字体，写在那发黄信笺上的就这么短短几句话，信的落款是孔令平。

再翻看那信封的背后写着这孩子嘱咐邮递员的话：“邮递员，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已调往他处，请务必将这封信转到她现在的单位上去。”

现在终于明白了，含愤断绝音信整整十五年的大孩子此刻现身了！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廿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孩子呀，这

么长岁月你到哪里去了呀，你可知道这十五年来，我怎么盼你的音信？然而每次都在黄昏之后，失望的望着街灯。你的外婆哭过不知多少次了，直到她临终还不停喊你的名字呀！而我熬过了多少断肠的长夜，有过万千次祈祷么？

唉！我的孩子呀，你纵有再大的冤屈和难言苦衷，也该托梦向你的妈妈报一个吉凶吧，然而你却一点声息都没有。

在那个时侯，为娘的也身遭劫难，我因禁锢之身又不敢多打听，写信去重大问到你的下落时，他们从不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

从此生死两茫茫，直到今天，你才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向我喊道：妈妈，我在这儿呢！

天哪！这是真的吗，这是我在做梦，还是苍天安排的悲剧呢？如果这是一场悲剧，那么这是多么残酷的悲剧？这整整十五年来，我的泪水都已经哭干了啊！

母亲连忙找来了放大镜，又拿起那个腊黄的信封反复看那邮戳，再一次证实是西昌盐源县发来的，她又拿起信笺……是大孩子的亲笔手迹，一点都没有错啊，十五年了，连这么熟悉的笔迹，竟一时想不起来了。

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唉！真的老了，没用了！她把那腊黄的信，摆在小桌上，好久才回过神来，将那腊黄的信收折好，再将它放在自己的枕下。

此时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孩，正挨着母亲身旁。这就是两年前一位附近农妇送来的‘干女儿’。此时她正瞪着那童贞稚气的眼睛望着她。

她认识方兴哥哥，不过那时她仅只有两岁，只记得他长得很高很瘦，但为什么突然走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回到母亲居住的小屋子来？

一切都怪怪的，小脑筋里盘旋着一连串疑问：妈妈是那么善良，她成天为医院打扫清洁，不像其它人偷奸耍滑，医院把所有的重活和脏活都扔给她，而医院的人为什么总是找岔欺侮她？为什么妈妈在忍受人们欺侮时，总是低着头，好像医院里有一根令她无法解脱的绳子，牢牢捆着她？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这么高兴，她注意老人的一举一动，数着她戴了几次老花眼镜，一会儿取出那腊黄的信封，看看又放回原处，虽然她什么也不懂，但为母亲难得的高兴而高兴。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哥哥，他可是在她还没生下来时，便离家出走的，妈妈从没有讲过的啊！他长得像什么样子？她只能依凭她所见到的方兴哥哥的照片，想一付很大很大的图象。

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听说在重庆大学念书时就离开家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离家这么多年从没回过家呢？今天又怎么知道妈妈在这里？

她那小脑袋瓜里翻滚着一连串的疑问，看妈妈在她布满皱纹的鬓角边扑刷刷流下的泪，心里猜测着，这大哥哥什么时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妈妈不喜欢打断她的思考，就

是问她，她也不会回答你的。

晚饭以后她躺在小床上，盯着妈妈重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腊黄的信，然后戴上她那付老花眼镜，在电灯下面重新细细读起来，彷佛那信写得好长好长，一直就没有读完似的，一边读，一边又在擦着眼泪。

妈妈为什么还在伤心呢？大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她想着想着闭上了眼睛，去了她的梦乡。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告梦见之。梦见在我傍，思觉在他乡。”（乐府）

这一夜是多么寻常的一夜，母亲望着身边已沉沉睡去的小女儿，她没有睡意也无法入睡，他得马上去找回这个失散了十五年的孩子，最好此时，她能插上翅膀，腾空飞去……但望断茫茫华夏，他在那里呢？

想到这里，于是翻身下床，去抽屉里寻找出那本很旧的地图，这还是兴儿的遗物，在方兴出走时她就反复地看那本地图，想从那地图上找到孩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地图上没有一丝孩子出走的痕迹。

现在有了：西昌盐源。在模糊的老花眼镜后面，她终于找倒了那个位于她所在位置西南方向，相距她足有千公里的盐源县。

凭着她的灵感，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崴崴耸山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服刑役，她得马上给她写信。

于是她伏在小桌上，开始提起笔来，但是千头万绪如乱麻股的脑子里，怎么开这封信的头？第一封信中该告诉他什么呢？

手上的那张信纸，柔了又写，写了又柔。

她知道自己和儿子今天的处境都很危险，纵有千言万语，也是万万不能在信上倾泻的，她知道所有信件都要被对方监督的人拆开检查，寻找“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的线索，于是，这封信便这样写道：

“亲爱的平儿：从我收到了你的信后，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重新获得了我心爱的儿子，便全身有劲。热烈地渴望着有一天我们能母子见面，我仔细地翻阅了地图，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边区，离我这里很远很远。但我的一颗心离你是那么的贴近……”

“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于 1958 年下放农村劳动，1959 年又下放工厂车间劳动，1962 年调到蔡家场这家医院，1961 年 11 月 8 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临死那几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死前她一直喊唤着你的名字！”

“弟弟于 1959 年在四十四中毕业，考入重庆电力学校，62 年压缩回家，一直跟着我，64 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落户在我附近的一个社员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处，生活尚好，

文化大革命他瞒着我，于 1967 年 7 月 14 日离开了我，从此音信全无，生死不明。”

“我在这所医院整整十二年了，这所医院离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车不到一小时。规模不大，是综合性医院，附照片一张，你妈妈已经老了，希望你也能给我一张像片，要说的话很多，下次再谈。”

这便是一个在遭到家破人亡后的母亲，同阔别十五年沉沦监狱的唯一儿子写的第一封信，那中间被压仰得喘不过气来的辛酸，只能“领会”。

她知道，要把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诉天涯一角的孩子，又让当局放过它，必得写些中共强迫人们说的“话”。

她微微闭上了眼，想到在中共建国的二十三年中，自己同丈夫，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平常百姓之家，就因丈夫的历史“罪”，不但他本人入狱至今不知生死，母亲在忧愤和潦倒中去世，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在“劳改”，一个生死不明。自己孤伶伶一人被医院的造反派任意践踏侮辱，这究竟是为那门？

而今大孩子居然还在人间，就算一种最大的“快慰”了。唉！这种遭遇岂可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啊？

她重新望了望那张刚刚才写完的信。拿起那破藤椅上的棉垫子靠在小女儿身边躺下，此刻脑海里再次回到十五年前，脑子里全是大儿子的音容。可惜，照片已经完全烧掉了，敞若不是那杨婆婆，自己早成了池塘里的水鬼，这个家就算无声无息在暴政下消失了。

现在想来，杨婆婆的话果然没错，她那时就劝过自己，“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多的是。凭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就不能长着眼睛看看这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那话里可是一种预言，一种普通老百姓在黑暗中的等待，一种希望啊！

她想着想着，脑海子里又呈现出大孩子的样子，活鲜鲜的，宽大而长园的脸旦，白皙的皮肤，从淘气的童年直到中学时代……背着背兜捡二煤炭的身影，晚上伏灯读书的身影，又重新回到眼前。

记得他考上大学离家时，几乎整整一夜同儿子促膝交心，谆谆劝导他：“千万不要去从政，那是一个说不清的危险领域；也千万不要去从事教育，你父亲就是一个活的教训。你选择了工科，有一门专长就是自己一生一世安身立命的本钱了。”这可是父母从动荡的年代里，为躲避暴政总结出的切身体验。

可惜，这样的躲避，依然没有躲过劫难。为什么中共连这么一个勤奋苦读的孩子也不肯放过啊？

想到这里她痛苦地翻了一个身，于是又想到自己同大陆上受残害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自己又招惹谁使她家破人亡？想到这里，她只能打住了，唉！今晚被那些痛苦思绪扰得乱麻一团，总是高兴不起来。

“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

里雁，辞根散作九州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古人的灾难有今天这么沉重么？

渐渐地，她在朦胧中感应到自己的骨肉，正在无数大山相隔的那一面向她呼唤，于是她真的腾空飞起来了，穿越那重峦叠障的山脉，在那雾气缭绕的冯虚之境，她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孩子，他褴褛一身，瘦骨嶙峋。不过那一刻，扑进她怀里的依然是那又长又园像鸡蛋一样白净的脸……

记忆可真是一个怪东西，十五年过去了，处境限涩，音容依旧，就这样母子相逢在梦中，相拥在幻境。醒来时，泪水浸湿了一片枕头和被盖。她望了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儿，替她盖好露出被外的手脚低声叹了一口气。

当这一封信从何庆云的手中交给我时，他那脸上堆着一脸奸诈的笑。

“现在，你总找到精神寄托了吧！你看你的母亲还健在，她可不像你处处同政府对立，你可要好好读读她的来信，不辜负她对你的希望。”他说着，把信交给我。到此时我们母子断绝了十五年的联系，终于接上了，不过十五年前那时，负气天真的想法，已被十五年的折磨彻底纠正，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牵挂的亲人除了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欲哭无泪，断肠天涯。

从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断，因为长期无人照料，饥饿年代死于营养严重不足，而我的可怜的弟弟，真想不到会惨死在造反派的乱枪之下。我又回想起当年小龙坎的夜。我真没有想到我和他共进的那一顿年夜饭，竟是和他共进的最后晚餐。临别时没有遗留下一张照片，我那断肠的追念又向谁表达？

母亲有了下落，我该向她简单讲一下我这几年来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监狱的概况。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所在单位掌权的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无视公民通迅自由的法律规定，把我们的信件私下拆阅，还因为这些小痞子为表现自己的政治嗅觉灵敏，而把信中他们所不认识的字句和不懂的词语，拿来集体“破译”，对信中用到“亡羊补牢”，“扑朔迷离”等辞句，整整研究了一个上午。

他们为此专门找来新华词典，按照那些词的字面解释，一面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点逐一分析，把亡羊补牢说成是我想待机逃出牢房，把“负荆请罪”说成拿起杖棍毁灭罪证，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以后，还要责令母亲作出解释。

可笑的是他们竟会以蔡家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盐源农场的革命委员会写来一封信，要求盐源农场对我严加追查和管教。

在接到母亲下一封回信时，要我写信中不要用成语。

哭笑不得之余，我只好用常人写信的四段式，即称呼、问好、说事、祝身体健康。这大概就是文革对社会改造的一大成果吧！

从那以后，远在千里外的我，算是结束了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孤独，每逢过年过节不

再独唱悲歌。还能同其它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样，收到一小包慈母一针一线缝好，熨上她体温和关爱“礼物”。

她把省吃俭用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儿子身上穿的背心，脚上穿的鞋，洗脸用的毛巾，以及粮票。

我知道在这物质极溃乏的年代，寄来的东西来之不易啊！在那一小块肉，一截香肠，一包水果糖中凝聚了多少深情！

这一年秋收季节，我在山上那些烂在地里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许多白瓜子，把它们洗净晒干，用晚上学习时间，倦缩在屋角落，一颗一颗地剥出它们的仁，再用一块毛巾缝成一个口袋装好，准备找机会带给她。

（二）一包砍皮瓜子

第二年，刚刚刑满的王大炳，回长寿探亲。我便委托他在途经北碚时将瓜仁带给母亲，并拜托他，把母亲生活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1974 年冬天，王大炳在阔别重庆整整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到重庆，并且专程沿途询问，找到了北碚蔡家场东方红人民医院，然而，他还没有进入这家乡村医院的大门，便被传达室里的“门卫”截住了。

“你找谁？”那门卫从黑洞洞的窗口里，向外上下打量着这个农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们有一叫方坚志的吗？我是来给她捎信的。”大炳直言寻找的人。

“你是从那里来的，找她干什么？”门卫死死盯着来人，好象要从来人身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大炳好象一个被盘查的人，一身都感到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就像一个隔世的来者到了一个令他恐惧的环境中，他犹豫了一下，只好将我托他带给母亲的信，一包瓜子仁拿了出来。一面恳求他说：“我是从西昌盐源来的，是方坚志儿子的朋友。这次因为回家探亲，受他的嘱托给他母亲带来一包东西和一封信，拜托你是否能通告一声。”

门卫把信和毛巾包接了过去，掂了又掂，满不在乎回答道：“那么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说罢，转身进去。

不一会，便走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向他喊道：“你要见的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重点监督对象，任何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不能同她单独见面，我已请示了领导，你带来的信和东西，我们可以代她收下，并且转交给她本人，你走吧。”

这闭门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向门内窥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医院么？里面的过道上穿梭着赤脚的普通农民病员。

心中暗暗后悔，如果不去门房打听，径直走了进去，说不定根本没人问他是什么人，今天自己找了麻烦，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看来，今天这么大老远的来，母亲是看不见了。如此

看来，母亲的处境，十分不妙。

当大炳回到盐源，把蔡家医院所见情况告诉了我，顿时对母亲的担忧压在我的心头。她在信中不厌其烦的写道“要听党的话”，恰恰证明她是多么无奈，母亲所受的精神压力，超过生活在枪杆子下面的我。

这一年春节，我照样收到了她寄来的一斤猪肉，并在信中告诉我，我给他带的东西已经收到。一再要求我能将半身的近照寄给她。

在狱中，我们的像片一直由当局摄制。所以，母亲这小小的心愿，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我，还真成了一件大难事。我的身边已有十多年没有保存过一张像片了。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一直在寻找去盐源的机会。

盐源地处云贵川高原，在这个汉、彝、藏、苗等民族杂居的地方，有广阔的牧场，放牧的牛羊群，和过路畜群，撒在这一带草地上的牛羊粪一直被农场各队争抢。徐世奎也不示弱，在春耕栽插完毕后，便派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小组，长期驻外拣粪。

这个小组在马路边租了一间公社的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里面，每天所拣的牛粪便堆积在屋外马路边，等到凑足了可以用解放牌拉上几车的数量后，便临时从场部抽调汽车，再派两个人跟着汽车一起到积肥的地点为汽车装牛粪，当时装粪的人一般指派菜蔬组的人。

（三）照像的见闻

当我和肖弟良接到装粪的“指派”后，在我的衣服包里，把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服翻了出来。

在狱中大家都一样，劳动时穿什么，并不感到衣衫褴褛的羞涩。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光头犯人像，我向陈孝虞借了他的呢帽，就这样，把衣服和帽子包好，匆匆到场部汽车队上了汽车。

汽车开抵目的地大约是上午十点钟了，为了腾出照像时间，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车装满，估计汽车往返至少需两个小时，就抽这段时间，汽车开走后，洗了手脚，换上中山服，我俩便向盐源县城中心走去，这是我来盐源十年来，第一次“自由”上街。

盐源就只有纵横交叉成十字的两条街，那天显得很冷清。因为一心想寻找照相馆，并没有过多留意街上的市容。

不多一会，我们就在一家临街小店门口，看到悬挂在街边的照片剧照。走进去，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起身向我们打招呼。问我照的几寸，便吩咐我在一张长木凳子上坐下，没到五分钟，我的尊容便摄了下来。

开票的是一个老者，他向我询问道：“听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们是临时到这儿来出差的吧？”我含糊应了一句，没有在意他对我们的关注。

像照完了，身上感到发冷，便取随身带的“铠甲”披在身上，没想到那老者立即用一种

异样的眼光盯着我，披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件全身上下，沾满牛粪的吊巾吊挂“体无完肤”的烂油渣。

这些年老百姓虽然也穿得破破烂烂，但毕竟还没有烂到这样程度，加上“铠甲”散发出来的臭气，使那位老者立刻判断出我们的身份。

他当即表示，我所照的像片不能取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和老肖费了足足半小时的口舌，我还掏出了母亲给我的信，向他说明我照相的来由，好说歹说最后店主人答应，要我必须一周内来取像片，不准取走底片。

真想不到“劳改”连自己照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想不到这么一件“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致惹出麻烦来，也罢，比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来，我虽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万巴衣”游一下盐源街头！

便大摇大摆的敞开破“铠甲”，向前走去。只觉得那上面数十块破棉絮和破布条随风飘摆动，扑扑作响，衣服上粪便臭味也随风散发，使我一时获得那济公活佛的潇洒感。

马路渐渐变得干净起来，左手隔马路大约十公尺地方，出现了一排围墙。前面斜放着两个很宽的玻璃厨窗，厨窗上的玻璃剩下几块残片，那里面贴着许多“文章”。

左面厨窗里，彩色的刊头上贴着：“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十个大字，右面厨窗贴着“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八个醒目大字。

厨窗间夹着宽大约十米的水泥过道，是学校校门。校门右侧墙柱上挂着“盐源中学”四个大字的木板校牌。

到盐源整整十年，只听说盐源中学是盐源县唯一一所完中，也是这个县的最高学府。虽经文革血洗，横扫牛鬼蛇神弄得它面目全非，但此时校门很安静，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进出。

校门口的屏风墙挡住了我们向内窥探的视线，正好，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子，从屏风右侧闪身出来。我忙向他问道：“你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么？”他诧异地望着我，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露出一种不知如何回答的神色，便匆匆走进那“屏风”消失了。

我实在想看一下，文革以来学校被红卫兵整治得怎么样了？正想向里面走去，但又自觉不妥，自己这付尊容，冒冒失失往里撞，倘若被红卫兵拦住，找我的麻烦，我该怎么说？于是收住了脚步。

这些年，六队收纳了一些从文革沙场上扫进来的学生“另类”，从他们口里知道，在学校里，上了年纪的教师除逃亡在外不知去向的，留在校内低头苟且渡日的“良民”，其状况并不比五类好。

校园成了革命闯将的习武场，十三四岁的毛孩子，个个都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使枪弄棒的“红小兵”。

我的目光集中到校门两边玻璃厨窗内贴出的“文章”上。这是些字迹潦乱，错别字连篇，

文理不通的杰作。

好半天我才读出，两个厨窗里虽有“坚决把复课闹革命进行到底”的承诺，但许多“纸”上写着“打倒×××小爬虫”，留着文革年代的野蛮味。

好在在“文斗”约束下，只保持着口头上的“杀气”，并没有血迹。

我极想去看看那屏风后面在演“什么戏”，便同肖弟良商量道：“你想进去看看吗？”老肖露出犹豫的面色，忽然屏风后传来一声大喝“干什么的？”那口气显然冲着我们在问。

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年龄比刚才那孩子还要小的孩子。不过，他身着草绿军装，正站在校门中间叉着腰，双眼雄视着我俩，显得幼稚又野蛮。

我原想以交朋友的心态同这些孩子们谈心的，但看到面前这孩子那威风凛凛的样子，使我原先已堆在舌尖上的话，倒了一个拐，全部的吞回肚里去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怎么，不可以参观一下么？同志”。

那小孩居然悖然大怒，挑衅的喊道：“谁是你的同志，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该不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吧！”

糟糕！我们的衣着成了我们身份的标记，在盐源城里，让这些孩子们都能认出来。我和老肖会意地相对一视，此刻我再不想象潇洒的济公，萌生对校园怀旧和好奇心了。

但我们今天招惹谁呢？难道就因为我们的形像也犯了王法？使那男孩用这种口气训斥我们？想到这里，便板起脸，俨然以长辈的口气训斥道：“小朋友，说话要讲礼貌，不要让别人听到像没有受过家教似的。”

那孩子看我们不但没有被他吓走，反而还教训他，立刻更凶恶地吼道：“你们再不走，我就喊人了。”看来，这里是进不去了。

争吵声很快把校园里的学生们吸引过来，屏风后面转出来了五六个脑袋，年龄基本上是十五六岁，一齐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听得他们窃窃私语议论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盐源农场的犯人。”

两个女孩子向男孩嘀咕了一阵，回过身便朝我们喊道：“你们赶快走吧？”老肖拉着我的袖子，暗示着犯不着同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称狠。

面对着这种被人赶出来的尴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悻悻离开了那校门，老肖向我解释：“现在这些孩子，我们惹不起，我们的身份不同，本来今天上街又没向队长报告，出了事还不是由自己负责，何必同这些孩子一般见识。”

学校没看成，反而用阿 Q 精神来安慰自己。一面向着那装牛粪的地方大步走去，任那风吹破棉甲发出的拍拍的响声，一面心里还在消化今天一天的不愉快，咀嚼在像馆里受到的冷遇，和在学校门口的闭门羹。

这一天，我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在这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土上，不但看到它极

其贫穷，更体会了它精神的极度空虚。如此在中共禁锁下封闭的社会，如何去面对一个文明世界敞开的大门？

第五节 我们还不如你们

林彪事件以后，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六队的山梁上那片宽大的洋芋地里，在我们下午收工去杴洋芋的队伍中，加入了一些年龄大约从十五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他们的口音和打扮上判断，这些孩子不是本地农民。

经过我们的接触和交谈才知道，原来这几个人是从眉山和乐山来的中学生，是不久前下放落户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青。其中年龄稍大的，是"大风大浪"中撞荡过来的"老红卫兵"。

不过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孩子看，他们虽在撞荡江湖中沾染了江湖习性，对人对事绝不像当年我们中学时代那种书生气，只是还没有脱掉孩子气，于是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印象。

（一）偶遇

高原地区，下午只要太阳一挨近地平线，出不了半个小时，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下午，我匆忙完成了草皮任务，顶着下午的狂风，躲到山梁低洼的山沟那片平时洋芋长势最好的地里。一为避风，二为了杴洋芋。那天下午运气不错，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杴了足有半撮箕洋芋。

看看太阳已经开始落到三号梁的背后，知道时间不早，便收拾起铲草皮的工具，将杴的洋芋装进了一个小麻布口袋，正准备挑起箩筐往回走。

距我大约三十米远处，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朝我喊道："把你的撮箕给我装一下"，那口吻完全是命令式的，教人听了好不自在。我没有理他，挑起自己的"行头"径直向山坡下走去。

这时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将我拦住，一改刚才那种强行索要的口气，带着稚气和请求的口吻说道："大叔，我忘了带口袋了，杴了这么多洋芋，只好向你借你的撮箕装一下了，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一定准时在这儿把撮箕还给您"。

我看了看他那带着恳求的眼睛，从他那晒得黑黝的脸上淌下的汗珠，和他那件在风里飘拂的破衣见到了他的窘困。再往四周一看，山上已经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夜幕已经渐渐降下了，风还在呼呼的吹。

心中想一个才二十岁的孩子，还在穷山沟里为填饱肚皮忙碌，唤起了我一丝同情心。于是便停下脚步，放下了肩上挑着的扁担，并从箩筐里取出了撮箕向他递了过去，一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听你口音不是本地的社员，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他接过撮箕，迅速把刚才甩得一地的洋芋捡了进去，一面回答道："我叫冷军，原来是眉山中学的学生，毕业两年了，当时满以为中学毕业后可得到一份工作，巴望着学校或用人单位的通知，没想到通知我的街道居委会，要我在三天内到居委会报到，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安排，后来便把我们分到这里来了。"

从他简单的回答里充满了灰色，不同于这个时代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

在监狱里，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接触到，打上“文革”烙印完全崭新的一代，例如沈良玉、潘羽方、孟平等人，他们性格中的自以为是、渺视一切，与我们这些同样在共产党校园里泡出来的浅见自私，胆小怕事，形成鲜明差异。

我曾用心思索过，形成我们之间代沟的原因：恐怕首先要归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那个年代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学生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一直处在被整的社会地位上；而现今的学生又是毛泽东调教的“夺权枪手”。

当然学生因成份不同烙着家庭的印记。黑五类的孩子，处于被歧视的位置上。红五类的孩子，一旦夺权使命完成后，他们将落根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是统治阶级还是和我们一样成为奴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不过这不会影响他们的性格在形成中，被各自特殊的遭遇和条件左右。

所以我决定抓住眼前这个年青人，听听他的自我介绍。便不顾天色已晚，索性放下箩筐坐在地边。一边看他捡洋芋，一面同他聊起天来。

“你住在那个生产队？”我问道。

“梅雨三大队”他回答道。

“是住在生产队长家里还是社员家里，还是同其它一道分来的知青住在一个地方？”我继续问道。

“刚来时分散在农家，后来生产队长说你们还是自己住一处，自己管伙食，公社专门给我们分了一间房子，我们同时分来的人便集中到了一起，自己开伙。”

“你们的口粮是多少？有工资吗？”我问，年轻人摇了摇头，好像回答起来特别困难，我见他已将地上的洋芋捡完，装了整整一撮箕。不过那里面混着许多生了芽和烂掉一半的，便顺手将不能吃的甩掉，随口说道：“这些已经含有毒素不能吃了。”

他显得很难为情的说道：“不怕你见笑，其实我们比你们还不如，你们一天还有三顿饭，我们全靠自己了，工分粮不够吃啊。讲老实话，我们一年之中就没有吃过饱饭，到了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有靠在山坡上打游击过日子了！”他苦笑了一下。

天色已黑下来，他捡起那甩在地头的绿色尼采破棉衣，提着一撮箕洋芋向我点了点头，便朝东北方向的土垄子沿着下坡大步走去。

第二天，他果然守约，准时把我借给他的撮箕送回到昨天相约的地点，与他同来的，还有三个比他年纪更小的孩子，看上去大约都不满二十岁。

第一次打交道就能守约，这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大家杴了洋芋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围坐在土边的石墩上侃起龙门阵来，同他一起来的是同他一道来这里落户的同学们。

“你们知道，我们是犯人，同我们交朋友，你们不怕么？”我看着那最小的孩子问道。可是孩子们回答得很恳切，他们说：“犯人怎么样，其实我们连你们都不如，我们过的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这同冷军昨晚上的话是一样的，也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些“知青”们共同发自内心的哀叹，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青人就背上这沉重的包袱，还在那里去寻找他们的“广阔天地”？

“你们到这儿来当知青，不是说完全根据你们的自愿么？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到这儿来落户？”我问道。

冷军立即回答说：“我们从中学毕业后，是没有大学可升的，中学毕业表示我们的学生生活结束了。那时，如果不沾着亲戚朋友在工厂或政府里工作的光，找份工作比什么都难。总不能老守着在家白吃，街道的居委会三天两头来家里作工作，要我们报名上山下乡，说农村有广阔的天地，我们虽然也知道那是骗人的话，但并不敢反对。后来便硬性下了下农村的通知！”

冷军的话还没有说完，那最小的孩子便界面了：

“居委会的人把农村说得天花乱坠，说这里牛羊肉当小菜，我爸开始还怀疑，他问居委会的人，上山下乡有没有一个年限？一年还是两年期满后回家，分不分配工作？我们做梦都没想把我们弄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一晃过了两年多了，至于回城工作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既然受了骗，为什么不回家呢？现在回到家里为时也不晚啊？”我打断他的话。

“没那么容易了，上这儿来时，我们的户口是跟着我们过来的，现在想迁回去要办户口根本不可能。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户口的黑人，派出所可以随时办你的收容，把我们抓了起来。”冷军恨恨地回答说。

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这些小青年是怎么被骗到这里来，欺骗加户口足以堵塞他们返城的路，这穷乡僻壤，对于再难治的调皮学生，足可以使他们就犯，天真的学生怎么玩得过北京的政治流氓？

“那么你们现在的口粮是多少呢？”四个孩子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开始斗起账来，大致结果是，去年大春，一直到国庆节以后，才开始分粮食。

每人分得的工分粮大约是二百五十斤谷子，这些口粮到了今年五月份早就吃光了，小春分配的口粮，洋芋加麦子每人折合只有九十多斤，还不够偿还向公社已经借来吃空的口粮。所以他们只好出来“打野食”，包括捡农场土地抛洒的粮食，无怪乎他们老是说：“我们还不如你们。”

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每天的定量只有一斤一两，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开支，肯定也是寅吃卯粮，仅仅这么一算账，就把我们间的隔阂全打消了。

原来除了政治上的不同外，实际上处在相同的地狱层里。无非我们戴着一顶令人望而生畏的反革命帽子，行动有枪杆子押着。而这些小青年顶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桂冠，在身不由

己和忍饥挨饿上，颇有同病相怜之处。怪不得他们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于是，我产生了到他们住地作客的想法，便提问道：“你们住在一起吗？”四个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孩子们对我将造访他们“家”表示欢迎。当下告诉了他们住的地方，商定两天后下午四点钟，在他们的院子里相见。

按照约定，我预先准备了一小口袋大米，那天在约定的地点，山坡的农家大院里，冷军已在那里等候我了。

我走近才看清楚，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在我们秋天挑草时必经的路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有缘相逢。

当我跨进大院的门便联想起十五年前，我被放逐到南桐农村中那户姓赵的家中，脑子正回忆往事时，一股猪潲的酸臭夹着霉气扑鼻而来，这与十五年前几乎完全一样。

西厢一间大约十二平米的小屋，便是他们的“家”，农家的猪圈就在他们屋的背后，这又使我联想到起南桐界牌大队那一段集中居住生活。

不过，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当年还差，屋里光线极暗，整个小屋除门以外，在侧面的墙上开了一个 20 厘米见方的小窗孔。

凭着暗淡的光线尚能辩认出，小屋里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两床之间摆着一张旧的小桌子，那上面就是他们四个人“吃饭”和“学习”的地方。

小屋显得十分拥挤，床上乱放着他们的被褥，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被子脏成何等程度。

进门的屋角堆着洋芋，一看便知道，这是从我们三号梁子土里拣来的“口粮”，门口廊沿下，是一个用几块大石垒起的“灶”。

四位主人忙着洗锅淘米，洗洋芋。用堆放在院子背后的苞谷杆，向日葵杆生起了火，半个多小时后，一盆香喷喷的米饭和一锅热腾腾的洋芋，便放上了那张桌子上，没有菜，只用一个土碟子盛着盐和辣椒水，五个人围坐在木板床上，边吃边说着各自的遭遇。

四个人中冷军年龄最大，经历最复杂，那天下午，也主要是听他的故事。

他从读书，讲到当红卫兵；从北上串连中途退回讲到武斗；从破四旧讲到打砸川西一带的寺庙和文物，从肆无忌惮讲到内心的忏悔，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类似的经历我已听过，只是地点时间不同，并不感到特别新鲜。

不知不觉天已黑淨，廊下的炉火早已熄灭，放在小木桌上的盆子里剩下的洋芋全都冷了，我站起身来将堆在盆子边的洋芋皮丢到屋前的土地里，时间已经很晚，我猛然想起，进入六队的那两扇铁门，不知是否关了，进去时，岗哨会不会找麻烦，便连忙起身告辞，匆匆直奔五子梁子而去，耳中还在不断的响起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日子还不如你们”。

从那以后，我们不时在我们的山梁上看到他们为生活而挣扎的身影。

（二）情缘

文革后期，我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种善于舒发心底悲情的乐器，从没有人手把手指点过我，李克嘉编到农六队时，农五队原先占据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监，他入狱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当我们在 1964 年从黄联关押送到这里来的第二年，他才从成都监狱押到这个农场。

1966 年，他从农五队编入六队后，由于累次越狱逃亡，所以名扬盐源农场，成了农场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1968 年夏天，那次在农六队监球场击毙一名从小监逃出来的囚奴，当夜被老管叫出来陪“杀场”的就是我和他。

大约从 67 年开始，每到晚饭之后，他便坐在监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扬的二胡曲子。在我听到的“江河水”演奏中，除了从广播里时不时传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泪下。

其实他演奏的仍然是刘天华的老作品，不过经过他的手，那二胡两根弦里，流出来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滩”，“别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调。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闻者的心坎里，会让人仰空长叹，轻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听得出他所奏出琴声分明在用心与人交流，一曲一调便是心在呕歌，那琴弦上所飞出的，其实是他心的哭声和呐喊！

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能表达内心的乐器。

我想，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也许藉助于这种乐器同人交流来得更容易，更能表达心的声音。

当然，我知道要学会用二胡与人交心，对于像我这种连它的基本指法都不会的人一定很难。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给我，另赠“心领神会，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么也没有教我。

与此同时，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华为我从山上带回几块黄秧木，并请擅长木工的人自制了一把新二胡。

听众告诉我，拉哑胡进步不大，认为既要练习就必须按上卡子把声音抖出来练习。于是我大胆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让我的“杀鸡杀鸭”声接受大家的评议。

农六队的几位“胡琴手”，琴声有别，三个月后，当陈孝虞听到我的琴声后，惊奇的问我道：“还从来没有听你拉过二胡，不料你也会这一门。”还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我微微一笑问道：“能打上等级么？”他说：“不错，只是声调太悲伤太压抑了！”

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对我的夸奖，证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伤，被他听出来了。

只要闻者能听得出那琴声中的悲伤，便证明我这种用琴说话的初衷得到了实现。也唯有

能听出那悲伤的人，便是亲身领受这种处境的同情者。

唯愿从琴弦上抒发出来的压抑，能唤起精神麻痹的人，从昏昏渡日中惊醒。我想连自己的处境都不知悲伤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变这种处境了！

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来之前，蔬菜组被派去毛牛山上为菜地积肥。那里是以松柏为主要树种的原始森林区，成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人放牧的场所。

因为多年积存下来以松叶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粪便，便是我们积肥的主要原料。

进山那一天，我带上的除了被盖衣服，还带上了李克嘉送给我的那把二胡，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原始森林，一个小时后，在密林中的公路旁边，一幢中式大庄园里停下。

这大宅院便是我们暂住的地方，进入大院大门左侧厢房的楼上，爬上楼梯在木楼的地板上铺好了地铺，下午就进了山林。

来到大自然中栖身而居，久被铁窗之下长期闭塞的心灵暂时获释。这儿再也没有报告声和监狱那股恐怖和阴森，时值深秋，那林间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慰抚我心灵长期受到的压仰。

“森林真美！”我大声呼叫着。陈肖虞在远处传来了惊呼，“看，好大的蕈。”他手里正捧着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红白相间的山蕈。我们都围了过去，相互询问，无人能说出它的名称。

继续收索，那在树下和草丛，石壁中藏着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蕈还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华给我们指点那些是无毒的。于是我们边收拢腐植土，顺便的捡回了那些山蕈。

庄园附近的水井里，正好有几个彝族的女孩子在那里取水，水装进一个像坛一样的瓦器中，顶在头上便赤脚踩着山间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同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谈过，但那情景绝对比画上的生动多了。虽然她们头脚甚至脸上都是“花”的，但那绝对是美丽的。

堂屋里升着火。铁锅里煮着一大锅下午捡回的蕈子。我独自爬上楼梯，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调整了一下弦的紧度，轻轻开始拉了一曲“良宵”。朝着木楼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雾已徐徐复盖了远近的松林，渐渐地我陶醉在琴声中，有意让那些飞进密林深处的旋律，召唤那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忽然，在那上来的楼梯口上，半暗的烛光中晃惚地冒上了一个人头来，紧接着从那里传过来一声低声的呼唤“老孔”。

我吃惊地转过脸去，狱中十五年，人们一直呼唤我为“孔老二”，用“老孔”相称的同难实在不多，尤其是这个蔬菜组。“孔老二”的称谓使我同大家很贴近。这“老孔”的称呼，听去却极为熟悉，我很快分辩出来，并且几乎失声惊叫道：“冷军。”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来。在农六队山梁上我已有很久没看到他了，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地方重逢。我丢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紧紧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样，暗淡的烛光下，

只觉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么时候还戴上了眼镜。楼上没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铺上。

入坐后，我发问道："你怎么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其它的几个同学呢？"他开始慢慢地讲出这一年来的变化："原来在一起共患难的四个同学，只有一个得到了城里的招工指标，据说是他父母疏通了县招工办公室里的负责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个人去年冬天合计偷杀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顿打同公社闹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后，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盐源公路局的养护段招工，我报了名，临时工工资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个月剩下四五元另用钱。但生活上比原来在农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讲述一年来的经历。

"这几天我们住的道班正好也在这座大宅院，下午六点钟收工回来，正在弄饭，便看到你们从树林中回来，夜色中看到你，因为光线太暗，我还不敢认，直到吃过晚饭听到楼上的二胡声，循声找来，刚刚爬上楼来，果然是你。"

（三）归宿

他一边讲，一边摸着我放在床上的琴，羡慕的赞道："真没想到你还会拉这么一手好二胡。"听到他这一番相别后的介绍，在昏暗的烛光中，我注视着这位邂逅相逢的"知青"朋友。

临时工是暂时的，每月收入仅这么一点，转瞬间已经二十四岁的人了，到了成家的时候，但，谁又愿意同他同甘共苦？目前条件娶妻安家成了奢望。生活的教育，使他把我们的命运联接在一起了。

在山上停留的仅仅只有两周短暂的时间里，他每天晚饭后都要爬上我所住的楼阁来"杀鸡、杀鸭"的练习二胡。

我告诉他我的体会是琴为心声，不一定要跟着别人的老套子练习，只要学会基本的指法后，便可根据自己的耳朵和感觉拉出好听的旋律来。

两周后，我们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向我辞别。那一天，他送来了一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发给他们的白糖，并且一再的摸着我带上山的那一把二胡，我明白他的心思，当即把这把二胡送给他作为分别的纪念，并在那琴上刻下我的名字。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即 1975 年初，我在农六队的围墙里，读到了一张由当时成都地区某法院盖上了公章的"严打布告"。布告中公布的那一次枪毙的十几名名单中，其中排在第三名的朱红批笔下面，赫然印着"冷军"的名字。我楞住了，天下同名姓的人多的是，这冷军难道真的凑巧是他吗？

于是站在那布告下详细地读起来，当我读到这是一个眉山中学的学生，又介绍他曾落户盐源县梅雨公社落户后，我的眼前活现了他的身影，再去读被枪决的"罪恶事实"，那上面写道：

某年某月某天的一个晚上，他翻进了某农宅，准备偷走那人家放在屋里的一背兜三十多斤苞谷子，当下被主人发觉，阻拦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黑暗中，两人打了起来，老太婆还一面吼着。冷军顺手拣起一根扁担，将阻拦他的老人打倒在地，匆匆抢走了那一背包谷子。

不料那老太婆当即倒地身亡。又一起为抢三十斤苞谷子，赔上一老一少两条人命的悲剧，便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在穷蹇饥饿的毛泽东时代，可说是天天发生着。

不用怀疑冷军翻墙入室，只为了偷一背苞谷，当然是饥寒所迫。而年轻的冷军之所以下手杀人，难道不是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结果么？

在他们身上留着文革"你死我活"的畸形烙印，被长期的中国饥饿现状所逼迫，这冷军为三十斤苞谷子，而早早付出他年轻的生命！

他那杀鸡杀鸭的二胡声，彷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想到"你死我活"这句文革时髦的语言，以及对道德观念的摧残，他会早早丢失年轻的生命吗？

这么一张布告在我读来，怎么也是当代"知识青年"对毛泽东悲惨命运的控诉，我在监狱中萍水相逢的这位"知青"，就这样在地狱大门上跳进万劫不复的火坑中。

后来，在我落实政策以后认识了更多的"知青"朋友，他们命运大致相似，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和老年时回首过去，往往会与我一样，扼腕叹息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而这一代被欺骗的孩子们，无论从道德修养还是知识都是空白，文革把他们变成了满脑子空空的愚民。

真不明白，这追逐独裁复辟的毛魔头，为什么对于无知的青年学生会如此捉弄伤害？难道这种对中国社会毁灭性的破坏出自他的本性？

难道，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像冷军这样无知的青年学生归宿就是死亡吗？

第六节 喋血苹果林

盐源的地理位置，从纬度看应属于亚热带地区，如果不是因为海拨较高，使它形成旱季特长，秋冬风沙大，冬季严寒的高原气候，这里应是气候易人的地方。几年试种苹果和梨子成活率较高，种下的树只要在苗期经过灌溉、培土、中耕后，第二年就可开花结果，就是种在红土坡地上也是如此。

如此年复一年，成活的果林便从山沟里向山上延伸，几年后，各队的周围逐渐变成了果木林。囚奴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劳动改造着这荒漠红土，果木林使原来的红土地变成了片片绿州。

只是在中共暴政之下，这些绿州下面不知埋着囚奴们多少白骨？

二道沟地区的场部，为了专门供应干部和武警的疏菜，将二百多名刑满囚奴，继续留在这里种植蔬菜。被中共称为"刑满释放犯"是身份特殊的"公民"。

1972 年开始，在菜地周围种上了果树。几年后，这些果树长大成林，管理人员在蔬菜地周围用墙圈成了果园。

原先关押我和陈力的那个“仓库”也划在果园圈里，从围墙墙头上日渐冒出来的果树，已覆盖了早先那些红砖建筑群。

从内地引进的一批良种苹果，每到夏季结实累累的果树上，硕大的果实压得碗口粗的树枝躬身垂地，果子的芳香招来一群群蜜蜂。为了防止刑满人员和流放者偷摘果子，苹果成熟后刑满人员，便被禁止踏入那林中。

原先的围墙加高到三米，墙头布着铁丝网，并专门买来凶恶的狼狗。从此果树园子变成了阴森森的禁地，在几次不知情的“小偷”越墙翻入，被狼狗咬得血淋淋的惨案发生后，就绝少有囚奴们进入那园子了。

直属场部的三角洲而今也是绿茵复盖，原先的基三队改为机修厂和木工车间。从成渝两地押来的少年犯进行了改编，大多调往其它中队，留下的修理工和车钳工，成为机修厂的骨干。但他们永远都脱不掉“刑满释放犯”那张皮。

一个叫郭贤的老师傅，有一手好修理和驾驶技术，场部专门为他配了徒弟，既作帮手也作学艺的学生。

郭师傅性格内向，不大说话，对狱中的残酷压迫，都抱着“忍”字当头，熄事宁人的态度，成天埋头修车，开车时极少与人口角争吵。

派给他的徒弟叫孙明权，据郭贤介绍孙的父亲原是一名屠夫，母亲早亡。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被抄，年仅十五岁的孙明权，流落街头成了“黑七类”。后来因饥饿所迫几次行窃被抓住后，少管所判了他三年徒刑，并把他流放到这里，刑满后便安排到机修厂当了郭贤的徒弟。

孙明权性格内向，从小所遭到的厄运，埋下他爆炸性的反抗基因。在盐源农场他饱赏奴役。不过他在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给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积蓄它们，把它们变成引爆后可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在机修厂一晃六年，孙明权已是廿四岁的年青人了。

1974 年的一个秋天傍晚，孙明权吃过晚饭，沿着通向场部的马路，向场部大操场走去，那里今晚放映露天电影。

那时正逢苹果收获季节，马路左手，高高围墙圈着的苹果园，不断向路人散发出果子的香味。

平时路过总要捡一块石头，向那沉甸甸的树杆打去，掉在墙外的果子便是他的狩猎物，但此刻他抬头看时，发现园内的果子刚被下掉，松了包袱的树杆重新挺直了腰，马路上稀稀落落掉了一地黄叶。

这时，跟来了两个小伙子正向场部快步走去，看到孙明权在那里发楞，便向他喊道："孙明权，电影开映了，还站在这里等谁呀？"孙明权没有回答他们。他发现，那扇平时留给刑满人员出入果园的小侧门半掩着，推开门跨了进去。

天色暗淡，茂盛的苹果园静悄悄的。周围果树，果子刚被下完，树下草丛中偶尔还露出半边白而带黄的"落果"。

他扒开草丛拾起一个来看，却是烂掉半边熟透的果子，砸烂被弃的果子东一个西一个藏在草丛里，看样子，因为时间匆忙来不及收拾"战场"。

那侧门大概也是匆忙中忘记了上锁，于是他重新扒着草丛，一边寻找，一边在又大又黄的果子中挑选起来。这里的苹果都称得上"极品"，果实不但香甜而且硕大，大的都在半斤以上。

没花上十分钟，他在草丛里捡了六个"落果"，装进裤包已鼓鼓的装不下了。最后拣的两个拿在手里，正准备从那铁门里离开时，忽然背后果林深处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站住！"

孙明权缩回了脚转身过去，那女人正从黄色大楼的方向向自己走来。他已经认出此人是场部的会计彭××，在所有场部的女"干部"中，这彭某一向以对两类人员刻薄著称，人称"母老虎"。

此时她的脚上正拖着一双拖鞋，好像吃过晚饭后刚洗过澡，上这儿来散步的。

孙明权停下了脚步，心中思量这女人究竟喊自己干什么？

那女人走近他，相距大约五公尺的距离，带着训斥口吻喝道："谁叫你私自到果园来的？知不知道这儿是不准你们进来的。"

孙明权对这种训斥非常反感，这片果园从栽种到管理，他都一手一脚参加了，这女人凭什么不准我进来？

"你们这些贼性不改的家伙进来偷什么？把你偷的苹果全部掏出来放在地上。"女人带着轻蔑和侮辱的口气命令孙明权。

孙明权木然的站在那里，没有听从那女人的命令。面对着这个母老虎，此刻他还真没有想出对付她的办法，如此僵持了五分钟。

"听到没有，把你偷的苹果统统给我拿出来放在地上，你晓得偷一个苹果罚多少钱么？"女人继续泼声吼着。

"我没有偷，园里果子已经下完了，我路过这里在草堆里拣到的烂苹果"。孙明权被逼开始申辩，口气里满含着委曲。

"捡的？你上那儿去捡这么大的苹果？"女人指着他手里拿着的果子尖声呵斥道："还有，你是怎么进来的，从那儿翻的墙？

“后院小门是开着的，我进来时看到苹果已经下完了，才进来捡几个落果。”孙明权一边指着身后的小门，一边将自己手中的苹果向她递了过去，说道：“你看，这果子是摔烂了的。”

“你敢顶嘴，你敢说不是偷的，今天人赃两在，被我抓到你还敢狡赖？”女人暴燥起来，母老虎的威风抖露无余。

面对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孙明权有些激怒了，他站在那里，满面带着怒色一动不动。

那女人伸过手去，抓他衣服中装得账鼓鼓的苹果。眼捷手快的孙明权盯准了那伸向他的手，迅速抓住它轻轻地向右一带，顺着那扑来的势子，母老虎在出其不意中轻飘飘向前扑去，做了一个“狗抢屎”。

前脚向前一个趔趄，后脚上的拖鞋因跟不上她肥胖的身体，被摔在一边。赤脚站起，这可是她没有防备的。

当她站稳，狼狈地立在草地上后，立即发泼地尖声狂吼道：“快抓贼！……你还敢打干部！”气急败坏下，她满脸通红，语无论次，先前的盛气凌人迅速变成了狂怒。

两个干事闻声从办室楼里跑出来，那女人见援兵已到，越发发起横来，一边尖声狂吼：“抓住他，抓住这贼儿子，这家伙狗胆包天了，偷东西还要逞凶打起老娘来了！”一边从地上捡起那只被甩掉的拖鞋，朝孙明权劈头砍去。

孙明权此时像一个石头人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那泼妇用她的鞋在他的脸上括，鼻血立即沁了出来。女人仍不甘心，指挥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把他扭送进了办公大楼。

直到深夜，三个小时的电影散场后，孙明权的师傅郭贤才接到场部的通知，叫他到场部办公大楼去“取”回自己的徒弟。

郭师傅接到孙明权时，他刚被松绑，遍体鳞伤。当着孙明权的面，那女人还着实教训了郭师傅一顿，说他管理不严，徒弟出来偷苹果打干部还不知道。

少年因父母伤害而流落街头所积郁的恨，已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深深埋下火种，他常说，来他家抄家人是一群虎狼，入狱后，非人的炼狱加深了这仇恨。

而今天他因几个落果受到这女人这般侮辱，更使他感到活下的艰难，人们并不知道他内心的痛楚！但他却因性格内向，忍受这新痛旧伤。

彭干事对孙明权侮辱后，他依然和他的师傅一道，每天一大早，驾着推土机到正在修筑的 2 号水库大坝上，直到傍晚才带着疲劳，为开回的拖拉机上油、保养。郭贤没有察觉徒弟在想什么？孙明权挨打的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有一天，孙明权在工间休息时跑到炮工班去，并从那里拿了十个雷管和一包炸药，放到驾驶室里。郭贤只皱了皱眉不解地嘀咕道“”要那玩艺儿干什么？炸鱼么？”孙明权赶紧附合道：“附近一个老乡想到小金河去炸点鱼要的。”

郭贤脸上掠过一丝狐疑，但他清楚这位徒弟的性格，多问了反而自讨没趣，看看徒弟正

在忙着洗抹车身，也就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下去。

距“偷苹果挨打”事件大约两个月，这天下午，孙明权向他的师傅请假：说自己肚子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想到医院开点药，便离开了工地。

大约已五点多锺，已到下班时间，办公大楼里的人开始向大门口走去。孙明权独自一人蹲在大门右面，看见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也开始站起身来朝着左侧的围墙走。他边走边盯着从办公大楼出来的人，那彭干事的身影出现了。

孙明权等到那女人从自己的背后超过后，慢慢转过身来，跟在她后面，走过拐角，迅速赶到她的前面，猛然一转身指着她，大声的吼道：“姓彭的，老子今天要跟你算总账!”

说时迟那时快，孙明权将披着的工作服一掠开，露出穿着背心的身子来，那胸前密密麻麻的捆着十个雷管，颈项上吊着一包炸药，左手捏着导火索，右手摸出打火机!

那女人猛然见到的，竟是两个月前亲自处罚的年青人，面对着他的那一双几乎在燃烧的怒眼，这位平常向来把就业人员当成奴隶，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母老虎，早已魂不附体，心中明白这年轻人要干什么？连“你要干什么？”都没有问出，脸色顿时苍白，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她想喊，但因为突然的恐惧使她喊不出声来，恐怖地盯着年轻人手里的打火机。她知道，自己的性命已拽在小伙子搬动打火机的指头上了，此刻她看清了这个年轻人，这被她骑在头上拉屎拉尿的“下贱胚”!

对方的眼里射出来的那种蔑视自己，仇恨自己的目光不但使她内心在颤抖，而且感到一阵深深的懊悔，虽然这种悔恨只是一瞬即逝的念头。甚至于她想下跪，她想求饶，但是，已经太晚了，此时她所有的注意力，死死盯着那已经点燃的导火线，火向着那雷管燃去……

突然间，她拔腿就跑，然而哆嗦的两腿怎么也抬不起来。

随着她一声尖叫和绝望喊声，轰然一声巨响，在一股强大的气流和火光中，雷管的碎片带着那从孙明权身上撕下来的血和肉，向围墙上，马路上，以及探出墙来的果树枝上，四面八方飞溅而去。

而那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胖女人扑倒在地，周围更远处的行人有的被气浪冲出几步远!强烈的爆炸声淹没了人们的惊叫和喊声!。

十秒种后，硝烟慢慢散去，留在原来那个地方的是孙明权倒在血泊中的残躯：他的胸膛全部炸空，他的五脏六腑带着殷红的血肉，重重地贴在那围墙上，挂在树技上，洒落在马路上……

唯有那顽强的头颅以及那血肉模糊的脸上；那双似乎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倔强大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前方，好像正在检查他的对手是否与他同归于尽!!并向所有目击者，控诉这女人对自己无缘无故的侮辱；倾诉出他长期积郁在胸中的怨恨!!

“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他们把我们欺压得太过份了。”有人在吼。

“只可惜孙明权没有在办公室下手，在那里一条命少说也要赚他几条!”有人在议论。

“死一个换一个，值得，孙明权真男人!”

男人们在人群中向死者翘起了大姆指。称赞孙明权才是真正的汉子，孙明权终于用他年轻的生命作代价，出了他们心头共同的恶气!

女人们发出惊叹和惋惜，称赞着这个平时貌不惊人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这是沉默了十年的盐源农场数千就业人员，第一次表达他们同残暴的狱吏同归于尽的愤怒。

孙明权的名字，一定会记载在盐源地方英雄史册上，为后人所传颂。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对那母老虎发出了齐声的咒骂，在议论中：“遭老天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人也有这样的下场。”是共同的。

三分钟后，场部警铃大作，足有两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跑步进入“出事”现场，他们用刺刀和警棍驱散着围观的人群。顿时，救护车的长鸣，士兵的呵斥，警犬的狂吠，跑步声乱作一团。

邓扬光拿着一个喇叭，声嘶力竭地向围观者吼道：“统统给我回去，这里马上戒严，不回去的统统给我抓起来。”然而，没有几个人理他。他的狂叫被淹没在人们的鼎沸之中了。天空里响起了枪声!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所有周围的马路通道，田坎上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骚乱终于没有发生，邓扬光着实捏了一把汗!

第二天，郭师傅被抓进了小监，发生在场部的这桩惊天惨案迅速的传遍了整个盐源农场，也传遍了盐源县城。

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中国大地上疯狂的“阶级斗争”沉静了片刻，这个农场当兵的打人风暂时收敛了一阵。林扯高也从农六队调回场部，并取消了他的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

不过，在群丒乱舞的年代，倒了一个林彪又接上一个更凶的江青，臭了王力、关锋，又会钻出迟群和梁效来，一群群的打手，一帮帮的小丑，走马灯似的充当着专制主义的厉鬼。中国人已经在二十年里见多了，只要毛泽东那老魔头的灵位“大难不倒”，乱必会继续下去。

独裁者既将遮羞布彻底撕掉，便操起加紧镇压和分化两把屠刀，对稍露头的人民反抗会毫不客气地与以铲除。“严打”运动一个接一个，所谓“思想”罪犯，当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打击对象。

孙明权事件正好猛烈地触动了当时盐源农场当权派们的敏感神经。

孙明权事件的第二天，以“全体党员和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对敢于以身示法进行反革命报复破坏，和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以迎头痛击”的巨幅横幅；伴之以阶级斗

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誓把批林批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时髦大字报，像一层层白色的网，复盖了盐源农场的场部三角洲。各队加强了警戒，打人风再度掀起。

不几天，场部召开了“宣判大会”，孙明权被追判为死刑。郭贤因此株连下狱严刑审讯。一批“言论”犯和越狱犯押上了刑场。各个队都加紧了“搜寻两类人员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侦破、立案”工作。

说也奇怪，在如此凌厉的“红色”恐怖中，从场部又传来新闻，说自孙明权自杀后，凡路过那段马路时，都会听到那贴着他血肉的围墙上，发出一种声音来：倘若是场部的管教人员路过，会听到“恶有恶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的呐喊，并夹着不知从那里括出来的阴风，煞是恐怖；倘若是劳教人员或流放者，那声音会变成“我死而无憾，朋友记住替我报仇。”

这奇怪的传闻活灵活现，又一次轰动了农场。

于是场部的干部便亲自督阵，从蔬菜组抽调了几十个劳动力，用了整整一天，将那墙上和地上的血迹一片一片刮去，然而那很深很深的印迹，就像烙在那围墙和马路上，怎么刮也是殷红的；而那依稀可闻的声音便一直没有断过。过路者在那里可以侧耳聆听……

直到六年后，在我平反获释刚要离开这个农场时，我还特地去那儿向这位可敬的英雄道别，默默谨记他的嘱托!!

第九章 地狱里的火炬

1974 年，林扯高以主管干事的“头衔”，重新回到了农六队，与何庆云一道，对六队的几个重点政治犯进行“严格管理”。

林扯高这一次“卷土重来”，还真有不少“进步”。也许在经过了一阵“折腾”后，他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次回来，他已将过去那种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脸收敛许多。

他集中精力，将矛头对准“思想犯”，想从这里捞到政治资本，实现他卷土重来的野心。他回到农六队后，变得十分阴沉，而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买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这一类想通过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进了网中。戴上一副关心他们前途的假面具，主动找他们谈心，并许诺他们一旦有立功表现，立即整理材料，请功“减刑”。只要他们积极靠拢政府，受奖的可能性会多于马文华、周学祝这一类公开的“狗”。

第一节 打李分站和三代会

林彪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地方上的旧政权已由“革命委员会”接管。而“革委会”却由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组成。

在西昌地区，一个从文革中冲杀出来的群众组织，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个组织，则是由工人、农民和军代表联合组成的“三代会”。两大派别都打着“誓死保卫毛泽东”的旗号，绝对服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令”。

无论两派怎么标榜自己，都不会放弃对“权”的争夺。他们因人事安排、物资分配、事件处理、机构调整等展开激烈的争斗，随时可以“大打出手。”

（一）斗

两大对立派别的紧张对峙，其实都是毛泽东幕后操纵的皮影戏，被愚弄和相互残杀的人们，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全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里，人们不去耕作织造，却在“阶级斗争”的毒焰中，睁大了血红的眼睛，为所谓的“观点”和“路线”，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殊死博斗”，甚至“壮烈”牺牲。夫妇、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会”除继续扩大各自的地盘、继续武斗。盐源大街上出现了装备精良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为了防止对立的派别捣毁宣传车，这些宣传车还装上了钢甲，宣传设备不光是一个高音喇叭和扩音器，还配有印刷机，沿街随印随发各种传单。

传单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击谩骂对方，或揭露对方核心人物的阴私。

以“战地采访”，“红决”，“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隐私”，以招揽群众。

有一阵子，某个国家元首送给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国各地展出。于是各地将这枚芒果奉为“圣物”，由“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载着这枚芒果，一路上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游行。各地派专车组织队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令人作呕的闹剧。

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打李分站”和“三代会”还动用了飞机，从未见过飞机的盐源人，突然听到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钻出茅舍举目仰望。孩子们惊奇的呼叫着：“看飞机！看飞机！”当飞机掠过低空时，从尾巴甩出了一串串传单，凌空而降。

山民在满山遍野搜索这些宣传品，以为是“天书”或神符魔咒，后来，他们接触得多了，也就见惯不惊了。

这些传单也不断出现在农六队的山梁上，经在外居住的同难捡来，传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透过这些传单，获得许多信息。如有关刘结挺、张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庆的种种阴谋等等，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极端荒淫无耻。

不过这些宣传品，不像官方报纸那样经过层层审查，几乎看不到一点真实东西，这些传单上记述着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睹中华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对农六队政治犯有特殊价值。

我们能从中分析出大饥荒后的大陆乱象，以及社会内部酝酿的危机。有助判断这种局面还能支撑多久？

我记得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重庆潘家坪武斗的情况，将参加武斗的派别、学校、学生人数、指挥者、动用的武器种类、双方死亡的人数登载出来。

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雅安激战。看到“战场实况”的照片，彷佛使人亲临了懵懂青少年横尸街头的惨景。

有一份记述某次造反组织在人民商场揪斗“四川王”李井泉的专题报导，为李井泉陪斗的是省长李大章，批斗会现场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红卫兵布置的。坐在批斗会场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老伯。

批斗会开始，红卫兵刚给李井泉戴上高帽子，准备拳脚相加让其“端正态度”时，却惹恼了站在前排的“农民伯伯”，他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成都本是二李经营多年的老巢，站在会场前排的“农民伯伯”原是二李帐下的走狗。当即警告说：“莫看李井泉这几天走麦城，总有一天，”西南王“还得官复原职。到那时候，今天在这里斗过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这话果然有效，“农民伯伯”们立即摆出封建家长的威仪，当场训斥主席台上那几个跃武扬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说话带把子的恶习，辱骂加上唾沫横飞，年轻气盛的红卫兵，岂

能容忍这帮“保皇派”侮辱，喝令把这些“保皇份子”扭出会场，于是升格为拳脚较量。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事前已有了准备，一声口哨，会场周围几百号人立即一齐拥出，双方大打出手，台上台下乱成一团。

这可急坏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连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闹剧还没有收场，急忙从北京“飞”过来的中央文革大员，匆匆赶到出事地点。

二李在混乱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飞脚，脸部也挂了采，惴惴不安连忙恭听北京的仲裁。

这场混战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条罪名，就够这个平时飞扬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着走了。“农民伯伯”虽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写检讨认罪外，他还敢作什么？

装正神，唬恶鬼乃毛魔头一生中最得意伎俩，这是中共在大陆舞台上自相倾轧中产生的长项，用来治国怎不一团糟？

读罢这则颇具嘲弄意味的报导，我和张锡锟相对一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当权派，不过如此！

（二）张锡锟

张锡锟原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他的身世和遭遇与我不同，他上北大的第二年，便碰上了大鸣大放。他讲到谭天荣在北大学生论坛上的演讲，对谭天荣胆识钦佩。但他又为谭天荣感到反感，说他演讲到最后时，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1957 年划定的“右派”根本就不存在，是毛泽东为达到他独裁目的，凭空捏造的“牺牲品”，阴谋被他解嘲为“阳谋”。随意坑害幼稚无知的学生，则证明他为达到独裁，不择手段肆意残害无辜的秉性。以后，一厢情愿发动大跃进，证明他并无治国能力。在造成对国家建设的严重破坏后，还坚持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残酷清党伎俩，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显示他政治上的危机和昏乱！

中共建政后，在史大林操纵下的苛政，害苦了大陆黎民百姓。从毛泽东折腾中，我俩对惨遭蹂躏大陆所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使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学生时代我俩都成了毛泽东的“阳谋”牺牲品，不久进入监狱，他来到农六队，便编在严管组中，成为当局重点监视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于相互隔离和周围告密的耳目众多，所以彼此一直没有深谈的机会。

直到 1967 年 4 月，我在农三队召开的加刑大会上公开声明“决不改变自己政治道路的脚步”后，在了解到我和陈力在小监里的种种事迹，便产生了与我交往的愿望。

1968 年的一系列疯狂的批斗打人会上，他也被列为被批斗的对象。但是他的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当时并未被当局十分“关注”。

陈力牺牲后，我们有一次在厕所里单独相遇，他主动向我倾述衷肠。

他说："早就知道你和陈力的事迹，很钦佩你们的眼光和胆识，大陆十分需要你们，我愿在同狱方展开的斗争中成为你忠实朋友，希望你也把我当成你忠诚的朋友。"

接着说："我想请问你，你与陈力相交多年，有没有保留下他的遗着和遗言？我觉得，今后我们任何人只要活着出去，都有责任找到遇难者的家属，告知烈士的死难经历和他们的遗志。"

他这翻话，使我很感动，在陈力牺牲以后，我终于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心中感觉鼓舞。但我遗憾地回答他：陈力被押送去盐源看守所时，只留下过一篇名叫"评当今秦始皇"的杂文手稿，经过几次监狱里搜查，也被狱方搜去了。现在我没有留下陈力生前的一纸一字。

每一次大搜查，狱方都要将我们所写的只言片纸通通搜光。所以，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下，只能用大脑去保存彼此的言行。

自那次互吐心声后，他曾几次建议，组织狱中的秘密社团。

但我认为中共通过严厉的思想控制，绞杀了所有反对思想，中共特务网络极其严密，使主张民主改革的党派和个人，难于存在。

同全国其它监狱一样，盐源农场所关押的六千多名在押犯人，三千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押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已所剩无几。

大部份"反革命分子"是在饥饿逼迫下的自发反抗者，他们的知识，基本还是中共所灌输的那一套。对自由、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当懵懂，趟若在现在对他们就提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只能使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云。面对组织严密的中共政权，轻视几十年的洗脑，忽视老百姓和我们在认识上的差距，必遭打击。

毛泽东所划定的五类份子，都是人为划定的政治耙子，"五类"群体就像在中共猫爪下的一群耗子，它们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目标，目前不会团结一心形成反抗力量，所以建立组织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没有号召力很强的政治纲领，没有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时，要达到思想的统一，形成组织是相当困难的。弄到不好，不但预期目的不能达到，反而会造成意外的牺牲。

但是，民不聊生是民主革命的催化剂，中共的倒行逆施，客观上给民主运动开辟了前途。目前应集中精力宣传民主思想，揭露独裁政权的反动面目，至于建立组织，要特别谨慎行事！现在我们，一要团结有识之士，二要进行积极的启蒙教育，为中国革命做准备。

林彪事件的巨大震撼，为毛贼东独裁势力敲响了覆灭的丧钟。紧接着，孙明权一声复仇的爆炸声，促进了政治犯在政治上的联合。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争取民主的纲领诞生了。

回顾我们所经历的反抗历程，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1962 年，我们这一群从四川各地流放到边塞的囚奴，一开始就带着反饥饿、反迫害、反奴役的火种。

3 月 15 日三元宫抢馒头事件，是在连说句"我饿"都要遭到批斗的年代发生的，面对刺

刀我们喊出“不准克扣我们的囚粮。”虽然这次反抗是自发的，但它是一次以群体对监狱秩序的否定，也是一次对暴政和枪杆子的挑战。

在“文革”妖风初起、风雨如晦的时候，在农六队的五月之夜，我们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并喊出“天快亮了”的口号。在万马齐喑的沉闷大地上，以一种“以卵击石”的姿态，向独裁者表示对我们的藐视。

五月之夜，对毛泽东专制暴政的公开揭露和抨击，使监狱当局异常恐慌。随后，农六队又刮起了对手无寸铁的囚奴狂暴的打人斗争会，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暂时抑制了反饥饿、反奴役的怒火，但让人们更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质。

反抗的火种已点燃，并以集体抗工、越狱、绝食、等形式与当局展开唇枪舌战的斗争。使那些本来对当局还抱着幻想或犹豫不决的人们，逐渐发生转变，他们中产生了坚定的反暴战士。

第二节 举起反抗的火炬

陈力牺牲后，农六队的囚奴们并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所吓倒，对被暴打的流放者进行慰问，囚奴间一次握手，一口药酒，一次疗伤，一声问侯都带着群体的温暖。人们在反抗毛泽东独裁暴政的旗帜下，越来越团结了。

当时正闹地震，农六队所有的囚奴们便集中住在地震棚里，得到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条件。

管教人员组织的学习，变成了张锡锟等人摆“龙门阵”的场地。在这些龙门阵里，除谈古论今、借古讽今之余，还组织了集体越狱的探讨。

大家已感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同狱吏们干了。组织起来向施暴者进行抵抗，在几个坚定份子中酝酿。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到反暴斗争，要求中坚份子具备机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1975 年秋天，一期由张锡锟、刘顺森、夏光然等人主笔，命名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农六队问世了。

《火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告农六队全体流放者书”。它以回忆的形式，列举了文革十年来在农六队发生的一桩桩暴虐血案。

列举了当局对流放者残酷的折磨奴役的事实，让大家直面自己悲惨的处境，摧醒那些习惯于麻痹、沉默、逆来顺受的人们，呼唤大家团结起来，奋起反抗！

《火炬》以大家亲身经历的饥寒交迫，揭示毛泽东独裁暴政给大陆人民带来的苦难。

《火炬》以狱吏们的残暴为例子，揭穿当局所谓“革命人道主义”的虚伪。一再提醒大家，不要上邓扬光等人花言巧语的当，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

《火炬》以林彪事件为例，说明中共上层不可避免的正在互斗中走向灭亡，曙光正在升起！

《火炬》是农六队的血性男儿在高墙下的振臂高呼，是烈士们在就义时发出的呐喊，是所有被压迫的奴隶郁积在心底的血泪控诉。

《火炬》以“民主必将战胜专制，光明就在眼前”相号召，结束了整个版面。

高举火炬的人们十分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大的可能便是“以卵击石”。他们怀抱着“哪怕燃烧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宁可站着死，不要跪着生。

一张小小的启蒙性刊物，点燃了人们的反抗火种，这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豁出命来的壮举，是推翻专制暴政拯救人民拼死一搏吹响的冲锋号。

伴随着《火炬》的诞生，一场正义与邪恶、罪恶与善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在农六队展开了。

就像电影《大浪淘沙》所描写的那样，在大革命洪流中，人分流成三种：一种是能在混乱中看准光明前景，成为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一种是不辨方向，自愿当了浑浑噩噩的中间份子；第三种是屈服于邪恶势力，最终成为叛徒。

这里所说的叛徒，并不是公开身份的“红毛犯人”。例如马文华，周学祝、代朝谋等，姑且用“胡涂”来概括他们。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至少还保持着一种“坦白”的东西，容易应对，唯有那些平时振振有词的怒斥暴政，声色俱厉的反对毛泽东独裁，反对流放者悲惨处境比任何人都喊得响，对独裁政治抨击最为“激烈”，以搏取同难信任，背地却出卖他人的才是最可怕的伥鬼。

张锡锟低估了叛徒的无耻。这份初生的刊物的首批读者中，就有这种伥鬼。

第三节 犹大们

当满腔热血的勇士刚刚在地狱里举起《火炬》时，一笔出卖他们的肮脏交易，也悄然开始了。在我叙述这个悲剧之前，先介绍一下四个出卖灵魂的叛徒——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黄学全。

陈贤士，时年 26 岁。我并不清楚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只知道他多次因越狱，从其它队弄到六队来的。一来就编入严管组，同张锡锟编在一个组里。

他来六队的最初几天，对当局愤怒和反抗溢于言表。然而，调六队来的人，随时都要准备接受大刑侍候。尤其像陈贤士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虫，老管们自不会轻饶他。他一来六队，尝了几次辣子汤还骂不绝口，颇像一条“反改造”的好汉。

在小组会上他自我介绍说：捕前是重庆某工厂工人，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文革以后，当了造反派的小头目，1971 年在指挥派系戒斗中负了“血债”，后来被“稀里糊涂”判了刑。

用陈贤士自己的话说：“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一直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中杀了几个走资派，本来就是革命的需要。把我抓来判刑，一定是法院的路线错误。”陈贤士的轻狂痴迷，说明毛氏邪教的毒液已浸透了他的骨髓。这种人入狱后，岂能安心熬过炼狱？

林扯高看过他的档案后，便将他收入告密组中。

从那以后，他几次同老管发生冲突，都是林扯高帮他解的围。还给了他一个严管组“组长”的头衔。

有一天晚上，林扯高把陈贤士单独叫到办公室去，简单的问讯以后，便转到正题：“你的出身与一般犯人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是忠于毛主席的，犯了错误弄到监狱来，心里很不服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劳改队里硬抗政府，只能把绳子越套越紧。想尽快的出去的话，还得自己去创造立功的条件。”

林扯高一面说话，一面注意观察陈贤士的表情，看到陈贤士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便继续开导他说：“关在六队的人，都是一些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反革命。他们现在每天都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看你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还是当机立断，与他们划清界线争取立功？”

陈贤士抬起头来，好像若有所悟。林扯高提高了嗓门继续向陈贤士指点迷津：“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你们组的张锡锟等人现在活动频繁。如果你能抓住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证据，及时向我报告，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立功，我可以整理材料上报，给你记功减刑，甚至提前释放”。

听到这里，陈贤士的眼睛亮了。他同林扯高原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只因为打死了人，才关入监狱，此时两人一拍即合。

林扯高随即取出一瓶白酒来。两人满斟共饮，酒劲渐渐上来，林扯高藉着上冲的酒兴，开始发泄出他内心的愤懑来：“老子还真他妈受一帮老保的窝囊气，何庆云算个啥？六队那么多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他都当作耳边风，还要骑在老子的头上说三道四。自己治不了犯人，却想治老子，老子今天干出点名堂来，抓几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让人看看，是我林高明管用，还是你何庆云管用。”

“来，碰个杯，你发现问题后，作好记录，我作好审讯准备。咱俩在农六队抓几个像样的案子出来。看看是我林高明厉害，还是你何庆云厉害。”林扯高端起酒杯向陈贤士的杯子一碰，便一饮而尽。陈贤士只好躬躬敬敬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自从那天晚上两人密谋后，便狼狈为奸，一明一暗，里应外合，撒下了一张罪恶的大“网”。

从此以后，陈贤士便眯缝着他那对贼眼，竖起了长长的耳朵，紧张地盯着这农六队的两百号囚犯，然而，陈贤士始终没有搜寻到《火炬》的痕迹。

伏在墙角里读书写字的夏光然，已多次敏锐地察觉到陈贤士的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并告诉了张锡锟，使陈贤士很快失出了跟踪目标。

陈贤士借生病卧床的机会，偷偷翻查了张锡锟所写的废纸片，全是些唐诗宋词，或是一些从字贴上临摹下来的书法，还有一些“打李分站”散发的“宣传品”。无论陈贤士怎样尖着耳朵窃听，可除了听到半罐包谷粑软硬和白菜咸淡之类的议论外，便一无所获。

刘顺森在地震棚里摆开了评书摊，向围聚的流放者活灵活现的讲演杜月笙与范绍增结下莫逆之交的故事。

对于杜月笙，陈贤士听说过。范绍增是谁？陈贤士把听到的东西向林扯高密报。两个半文盲想了老半天，也闹不清刘顺森讲的是什么暗语？

两个狂妄自负家伙，知识却贫乏得可怜。后来陈贤士继续的去监听刘顺森摆的龙门阵，上海滩，上海滩！刘顺森讲的黄金荣遭绑架，杜月笙结拜戴笠，全是些从来没听过的故事，未免使他失望起来。

于是他又伸出他的长鼻子，在床底下东闻西嗅。那里是一小袋大米之类的东西。就这样，陈贤士紧张搜索了两个星期，依然一无所获。

在林扯高所召集的不定期碰头会上，一无收获的陈贤士，灰溜溜地耷拉着脑袋，这次林扯高对他黑着脸，心里便有些慌张。让陈贤士奇怪的是，办公室里却增添了两个新成员。

一个名叫刘资元，四十多岁，此人平时极少说话，显得城府极深，农六队建立之初，刘资元因策划了几次越狱，事情败露，当局便将他当成重大政治犯关进了严管组，可以算得上“严管组”建立以来的“元老”。

文革以后，刘资元依然“反心”不死，狱方得到检举，证明他多次在狱中煽动他人“闹监”，所以一直被监狱当局认定是“重点监督对象”之一。

文革初期，被推上批斗台上的便有刘资元，理所当然，刘资元也成为陈贤士监督告密的对象。

刘资元平时沉默寡言，在诗画上颇下功夫。一有空就铺开纸砚，细细地临摹颜字贴。陈贤士总觉得他笔下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刘资元也成为陈贤士搜查的重点。

陈贤士意外的搜到刘资元用隶书抄写叶挺的断头诗，便拿来向林扯高告密。想不到，竟碰上刘资元也在坐。

同来开会的另一个人叫王世春，更出乎于他的意料。一来六队，陈贤士便知道王世春是出了名的反改造分子。听说王世春在国民党军队里服过役，“解放”那年，王世春才二十岁。“解放”以后，背着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皮，成为历次运动清算的“历史反革命”。

论出身，准确的说，王世春不过是一个“学生”。在大饥饿年代，收听了台湾的广播，进行过外逃的尝试。案发后，中共对他新老账一起清算，重重地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入狱不久，王世春就结识了文廷才、刘顺森等人，并一起从重庆发配到甘洛。以王世春受尽酷刑折磨的苦难经历，本不会对共产党产生任何的幻想。但王世春的性格软弱，吓破了胆，害了软骨病，被中共享暴力征服。

为博取同难们的开心哄笑，他常迎合大家发表异论。他擅长火上浇油，懂得见风使舵。常策动别人干顶风冒险的事，一旦事态扩大，当局追查，他便马上抽身而去。所以，王世春在

六队得了一个“老蝙蝠”的绰号。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雅安三元宫的“抢馒头”事件，当时站在邓自新后面的王世春，一再怂恿邓自新下手：“别看你平时那么来劲，馒头摆在你面前，你却不敢拿了。”邓自新性格刚烈，在饥饿刺激下，怎经得起王世春的激将法，便第一个去箩筐里抓馒头！

酿成这场骚乱后，追究谁先带头时，王世春却不吭一声。结果几个抢馒头的人都没有逃脱加刑的处理。为首的邓自新加刑 12 年，而在背后怂恿的王世春却安然无恙。

六队成立以后，累次发生逃跑、闹监、顶撞老管、集体怠工事件，都有王世春的影子。但他每次都逃过了追查。嗅觉灵敏的何庆云，发现他常常扮演背后教唆角色。“老蝙蝠”的绰号，就是何庆云所赠。

有一天，何庆云终于抓住了王世春“王氏膏药”的笑话，说将“毛主席语录”烧成灰和酒服下，男人补气壮阳，孕妇保胎安神，包医百病，神奇无比。

王氏膏药的笑话将他推上了 68 年的批斗会上，以“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连续的斗了他一个星期。他在打手的暴打之下，认罪告饶不迭，甚至跪在地上苦苦认错。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世春，还要照常下地劳动，批斗会以后，何庆云一不做二不休，整理他的材料，将他加刑五年，合拼二十年。不但让这个“老蝙蝠”受尽了皮肉之苦，也触及了灵魂。

王世春曾是陈力的“好友”和崇拜者。陈力慷慨就义后，六队院坝里发生的桩桩血案，把王世春吓倒了。在生死抉择的面前，王世春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这次“告密会”上，陈贤士看到，摆在林扯高办公桌上的，是一张被揉得很皱并被撕成几片后再拼贴好的一张纸。

陈贤士迷逢着眼睛盯去，那纸上写的标题是“告农六队全体苦难同胞书”。认得出这是张锡锟的笔迹。陈贤士的心中一惊，他苦苦搜寻的东西，竟被他监视的人提供了出来。

三个人心态各不相同，相互冷冷对视了一下。王世春和刘资元，一个是怕见阳光的老蝙蝠，一个是城府很深的老油子，两人都清楚，此举叫做“出卖难友，认贼作父”，是狱中难友最嫉恨的卑鄙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别想在监狱中平静混下去。两人作出这种叛卖行为，确实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林扯高今年三十岁，从他投入“革命”起，为了追逐权力，整整奋斗拼搏了十年，才坐上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不料风云变幻，林彪事件之后，他马上被人拽了下来。后来经过一段韬晦阴暗的日子，经过一翻奋斗后，才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经过一番的冷落和挫折后，林扯高再也没有初出江湖的盲目高傲和自信。而是面对现实，打算一步一步的做出成绩来，把何庆云赶下台，然后步步高升！

林扯高重回六队以后，便依靠场部的旧势力，把竞争目标对准革委会“准”一把手的何

庆云，对准那个把他踢下来的人，一是报夺权之恨，二是为自己往上爬扫请障碍。林扯高搞出一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来回敬这个“乡巴佬”，把他“打”下去！

现在，林扯高见面前三人一言不发，指着桌上的那张纸严肃地说道：“六队的情况，你们比我清楚。今天拿到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名字叫“火炬”的反革命集团，一直在农六队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

他们把矛头直指我们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号召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起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目前竟然发展到在狱中公开出版反革命刊物的地步。这个极为罕见的案例，说明农六队在过去抓阶级斗争不力。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了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说到这里，林扯高的情绪亢奋起来。陈贤士的积极性也被迅速调动了起来，而刘资元仍像当初那样，脸像一潭死水，不置可否，毫无表情。而王世春则转动着滴溜溜的眼珠子，好像在打什么主意。

停顿了片刻，林扯高继续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已经拿到了重要的证据，这很好，破获农六队多年存在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正在整理材料，给刘资元，王世春记功减刑，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因为农六队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决不可能只是张锡锟一个人，而是涉及到农六队相当一批人。”

三个叛徒中，除了陈贤士听得眉飞色舞外，其它两个人如同蔫茄子一般，一直苦着冷冰冰的脸。

无论是刘资元还是王世春，他们都非常清楚，被他们告密的《火炬》废稿，充其量只是揭露监狱的黑暗罢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连纲领都没有，怎么立案？

然而，自从刘资元和王世春二人被林扯高”招见”以后，农六队本来就绷紧的神经，就更紧张起来。

张锡锟们因遗失了一篇草稿，便注意到有人对自己盯得特别紧，平时上厕所，都有人脚跟脚的跟进来。每一次练书法，都会有一束诡秘的眼光从远处射来。

我素有匍伏在铺位上作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一天下午下雨没有出工。我按照老习惯正在记录尚书《禹贡》篇中大禹治水的记叙。因为古文基础差，资料又来之不易，我除用心的读，一面翻着一本破旧的辞典。

突然何庆云一头撞进了监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我写的笔记本抢去。接着站在监门口细细阅读起来。直到看清楚全是尚书原文的摘引，才将笔记本慢腾腾的还给我。

何庆云的这一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火炬”撰稿人的戒备。但直到此时，张锡锟还不知道失踪的废稿，已经被王世春交到队部去了。

《火炬》就这样在刀尖上诞生了。从创刊号开始，一直在狱中秘密传看。火炬废稿失踪，使张锡锟警觉起来。因为张锡锟等人对刘资元和王世春严加防范，所以林扯高再也没有得到《火炬》的踪迹，但另一只黑手正向它伸了过来！

1973 年，张锡锟的童稚之交黄学全，因为接连越狱被关进了小监。关进小监的第二天晚上，黄学全竟掀开了小监的房顶再次出逃，开了从小监房顶上越狱的先例，也创下了三个月内连续逃亡五次的新记录。他被抓回来以后，免不了一顿毒打，并给他戴上了一副足有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

按照管教科的意见，想借这次“双打运动”把他枪毙以儆效尤算了。

处决黄学全的意见落到林扯高手里。林扯高在查阅黄学全的档案时，发现他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个工人。因为“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被判刑。而这一次抓回来的审讯记录只是逃跑。

林扯高提出，共产党人在处死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时，都要万分慎重，因为这与阶级斗争的教义相抵触，尽管他也知道党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他必竞太嫩，末曾掌握游戏规则，例如对何庆云不知如可下手，才能拔掉这眼中盯。

眼下只能在管教工作上做文章，现在，他决定把黄学全招来问一下，问他既出身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对抗？既然犯了罪，又不安心服刑，而是一而再的带罪潜逃？

但是黄学全却沉默着，好象对于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一样。

“你犯什么罪？”林扯高在明知故问。

“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黄学全回答得很迟钝，也很免强。

“收听敌台”确有其事，但“叛国投敌”他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法院为什么把这个罪名划到自己头上。

文革期间，这种案例极为频繁，林扯高见多了这种案例，他想弄明白这些“罪犯”是怎么想的。于是继续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黄学全再次陷入沉默，对于这种令他极难说清的问题，他一直回避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自己是工厂的电工，半导体刚刚在中国问世时，他对这门技术特别感兴趣，凭着自己的爱好和摸索，居然成了全厂的半导体专家。在厂里，无论那家的收音机坏了，都要找他修理。

既然帮人修理收音机，那么调试电波频率便是一个工作程序，为校正频率，他只好将收音机对准“美国之音”频段上，里面传出来大陆的真实消息，很自然地吸引了他，这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遍假话迥然不同，长久地收听，使他产生奔向自由的幻想，但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岂能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魔掌？

文革一开始，黄学全在“试一试”的支配下，按美国之音提供的通迅地址发出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这封普通信件，竟给他带来了一场横祸。

不久，黄学全便结了婚，蜜月后，忽然有一天，工厂的保卫科接到一张法院的传票。

就这样，黄学全毫无思想准备，就被拘留并被逮捕，接着被稀里糊涂的判了刑，直到他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他才开始后悔起来。

刚判刑不久，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娇妻便提出分手，黄学全十分“着急”，这些后果他并没有想过，不知该如何面对。

入狱开始阶段，黄学全像曹季贤一样，只知道说一句话——“放我回家”。

他是 1968 年才从成都监狱发配到盐源的，因为是“叛国投敌罪”，刑期是十五年，所以很快地将他转到了六队，在这里，黄学全碰到了他在成都的邻居张锡锟。

监狱里的高强度劳役和饥饿折磨，使黄学全无法承受，加上对娇妻的怀念，他最直接的主意便是“逃”出去，日思夜想的娇妻使他心里只有一个“逃”字，彷佛只有逃，才是解脱痛苦的唯一出路。

来六队才三个年头，累计逃亡的次数已达几十次。而每一次的出逃，除了一顿毒打之外，依然没有逃掉劳役和压迫。

黄学全的频繁逃亡，倘若落到任何一个政治犯的头上，早已是身首异处了，在文革中被枪杀的政治犯，逃亡者占很大比例，蒋正君一案，就杀了五个人。每一次“严打”运动，总有几个出逃的反革命犯被杀害。

仅仅因为他的盲目和幼稚，并不带任何政治目的，所以才到今天没有被处死。

黄学全带上重镣后，何庆云一脸阴沉地警告他，“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宽大无边，你已经逃了二十多次了，我看只有一颗“花生米”，才能解决你“的确凉思想”。(所谓”花生米”，这里特指子弹。因为子弹与花生米颜色和大小相近，中国民间常把子弹俗称为花生米。所谓“的确凉思想”，是指在追捕逃犯过程中，双方快速奔跑，产生很大的风力，使人感到凉爽，故名“的确凉思想”。)

黄学全被林扯高叫去，心中不免感到紧张：“这一次是要杀我么？是杀我前的问话么？”

黄学全进了林扯高的办公室，林扯高突然问道：“你同张锡锟是邻居吗？”

对于这个与处死他毫不相干的提问，黄学全淡淡的回答“是”后，就一叠声的哀求道：“我不想死，我还年轻，我希望政府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悔改……”

林扯高看破他内心的紧张所在，告诉了他一个惊人决定：“经队部过研究决定，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从明天开始，下掉你的脚镣，把你放到严管二组去劳动，若再逃跑，你的死期就到了。若有立功的表现，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表现，对你宽大处理，甚至于释放你。所以你的命运，就在你一念之间，完全由你自己掌握。”

黄全学眼睛一亮，这是他这段时间里日夜盼望的东西。但他随即便陷入了沉思，一想到那漫长刑期，沉重的苦役……这十五年怎么熬过去?

林扯高继续说：“六队的情况非常复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锡锟正在出版一个‘火炬’地下刊物，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甚至于拿到证据，我包你减刑，你明白么”?

黄学全睁大了眼睛，既惊喜又疑虑，他简直不敢相信那对准自己脑袋的枪口，就这么轻

轻地挪开了，但隋即明白，林扯高所说的出路，是要出卖他人才能换到，且要出卖在街巷里一起长大的张锡锟。

张锡锟虽比黄学全年长几岁，但两人从小亲密无间，加上两人的母亲又十分要好，两家一直是和睦相处的要好邻居。自从两人身陷囹圄后，两个老姐妹便“同病相怜”、相依相伴相安慰了。黄学全来不及细想，起身走出林扯高办公室，当他跨出林扯高的办公室时，才感到脚镣下得并不轻松，如果真那样做了，下掉了脚镣，却换上了一副沉重的良心枷锁。

那天晚上，黄学全一直在小监里苦苦思索，久久不能入睡，第二遍查房后，他索性坐了起来……长时间的靠墙坐着，门外的查哨人也再不像过去那样横蛮干涉他。

第二天一大早，沈官科便在一名士兵的押解下，拿着宰子和二锤来为他打开十五公斤重的脚镣，重镣去掉后，双脚显得轻飘飘的。他跟着林扯高走进了严管二组，陈贤士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

三个月前，黄学全便是从这个组逃跑的，抓回来那天，陈贤士用自己腰间的皮带，像抽打牲畜一样足足抽了他几十下，至今在他的肩上还留着那次皮带抽打的血印，他狠狠地瞪了陈贤士一眼。

从小监出来，黄学全心情并不轻松。他不知道是坚持“逃”呢？还是听林扯高的“忠告”，从此收心？并按照林扯高给他指明的道路去走？他整天心事重重。

敏感的张锡锟已经注意到黄学全心绪“不佳”。可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黄学全已对他构成了严重的生命威胁。

为了帮助这个儿时的小伙伴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张锡锟想把火炬传递给他，让他看清当局的黑暗和自己该争取的前途，但是夏光然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夏光然认为，火炬刚刚问世，种种迹像表明，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所以目前的读者必需是对当局不抱丝毫幻想的人。而黄学全本人思想极不成熟，他的“惯逃”纯碎属于个人瞎撞，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且平时与火炬成员说不到一块。

同时狱方不明不白地去掉他的脚镣，还把他从小监释放出来，其中必有蹊跷，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应当慎重，等到把情况模清楚，证明他是可以团结和信赖的人以后，再向他传阅也不迟。

可惜，张锡锟并没有听取夏光然的忠告。

为了火炬在传阅中出现变故和意外时迅速切断联系，以保护火炬成员的安全，大家规定，火炬的传阅必须“单线”进行，接读火炬的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火炬”送回给他的人，而不能私自另传。

当张锡锟从菜蔬组收回“火炬”以后，便郑重地当面传给了黄学全，并且约定第二天必须亲自还给他。

黄学全没有想到，《火炬》竟轻而易举地落到了自己手里，第二天早上，黄学全蹲在厕所里偷偷地读完这份地下刊物后，反而犹豫起来。

首先，黄学全不明白这份“材料”有什么特殊价值，里面所讲的都是真话。同时想到张锡锟是自己的童稚好友，对张的人品才华颇为敬重，出卖一个好人，在良心上过意不去。何况这林扯高是行骗惯了的人，即便交给他，未必会兑现他的“减刑”承诺。

但黄学全转而又想，机会到了自己手上，白白放过，岂不可惜？林扯高既已讲明了条件，总可以试试，想来想去，黄学全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蹲在厕所里面紧张思考起来。

张锡锟可是给自己规定了时间，他必需立即作出决断。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刘资元突然地撞了进来，黄学全对于平时极少说话，为人阴沉的刘资元，也是十分敬佩的，他常看到刘资元在怂恿其它年轻人同管教人员顶撞时，而自己不露声色，现在遇到这事不妨向他讨教。

于是黄学全把“火炬”递给了刘资元，并悄声问他怎么办？正在这时，坝子里正在催促出工，刘资元便接过“火炬”藏进衣兜，两人匆匆离开了厕所。

刘资元读完这份刊物后，如获至宝。苦苦跟踪几个月的“火炬”，竟然这么轻松就拿到了手，那上面登载的，至少是四个人写的文章，但每一篇文章都没有落上作者的名字，全是一个人的手迹，他知道是张锡锟的手迹，刘资元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己已经走出了第一走，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了。

他本想立即把它交给林扯高，但迅速又改变了主意，手里这份“火炬”同前面那篇撕碎了的“告六队全体同难书”，只能提供张锡锟一个人的证据，而林扯高的意图是以张锡锟为缺口，挖出潜藏在农六队中的“反革命集团”，单凭这份“火炬”，不但达不到这个要求，还会打草惊蛇，让已经获得的线索全部断掉。

刘资元主意拿定，迅速回到监舍，将“火炬”塞还给黄学全，并嘱他必须按照张锡锟规定的时间将火炬归还给他。

林扯高极为赞赏刘资元的“放长线钓大鱼”处理方法：“现在，火炬已经露面，当务之急是抓住其它撰稿人，务必一网打尽。”

林扯高召集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和黄学全一起碰头，极力夸奖了刘资元和黄学全，盛赞刘资元的“机智”。一面向他们交待要做的几件事：除了火炬的撰写人外，还要弄清传递者，弄清组织纲领，千方百计抓一个“现场”，缴获全部证据。

一张由败类们拉开的网，就这样不露声色的向张锡锟们围了过来，然而，拉网的几条狗却各怀鬼胎。

陈贤士无疑是积极性是最高的一个，可惜他却是个低能儿。本案已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林扯高的记录中，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但由于林扯高的偏爱，却将整个任务交给了他。其中包括对刘资元和王世春的“监督”。

而刘资元最看不起陈贤士，对他参予进来极为反感。

王世春是最了解张锡锟底细的人，对林扯高尚且看不起，也决不会把陈贤士放在眼里。他凭直觉知道，“火炬”在哪些人中传阅，不过，那只是猜测，并无证据。所以他不愿向陈贤士透露，甚至不愿向林扯高透露。

黄学全是四个人中最懵懂的一个，事前无任何蓄谋，事后也不知道怎样干。仅凭林扯高莫明其妙的宽大保住了性命，又在无意之中轻易的得到了“火炬”，可又失之交臂。因拿不定主意而传给他人，黄学全还来不及品出“立功”的价值，“头功”却被刘资元夺去了。

因为与张锡锟童稚的友情，黄学全是最容易从张锡锟的口里掏出“火炬”成员的人。但对陈贤士一直抱着深深的敌意，不想在这肮赃的交易中与他“合作”，偏偏林扯高却规定他必须服从陈贤士的调遣。黄学全与王世春也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

四个犹大在破获“火炬”重案中，处在奇怪的关系中！

陈贤士身上揣着一个笔记本，成天盯着张锡锟，用心的记下同他来往的其它人员，记下接触的地点和时间，张锡锟几次进厕所，他便尾随跟进去，想现场抓证据，都落了空。

严管组出工，一路上都有枪杆子押着，所以，若要传递《火炬》，一般都是在厕所进行。

出工以后，张锡锟的铺位被秘密的搜查了好几次，收获都等于零，连原先已经浮出水面的刊物，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四节 11.8 斗智斗勇

1974 年 11 月 8 日上午，这一天正是星期天，天空中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天气特别寒冷。吃过早饭以后，所有的流放者都卷缩在各自的铺位上，拿出针线缝补自己的破烂棉衣。院坝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走动，陈贤士此时正拿着一本“红旗”杂志，坐在靠窗的铺位上假装看书，将自己的脸虚掩着，一双贼眼却盯着院坝里。

九点钟光景，严管一组的周志出现在二组的门口，他向坐在中间位置的张锡锟递了一个眼色，张锡锟正在铺位上抄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似乎并没有理会他。

周志慢慢地离开了门口，向厕所方向缓缓地走去。约莫一刻钟以后，张锡锟才慢腾腾地爬下了床，若无其事向厕所走去。

看到张锡锟这一行动，陈贤士迅速向黄学全发出了暗号，黄学全跟着走进了厕所。此时，暗角的蔡先禄也迅速地下了铺位，怪声怪气呼喊报告向张锡锟警告。陈贤士却先下了床，径直向队部办公室走去。

（一）被抓

这一天，周志将《火炬》看完，按张锡锟的规定，准备在厕所当面归还。正当周志取出“火炬”交还张锡锟时，黄学全已跨进厕所。张锡锟正将火炬和一卷捡回来的“传单”往棉衣里塞，见黄学全进来，迟疑了一会。直到听见蔡先禄高声呼喊报告的声音，便觉得情况不对。

周志在厕所转角连忙将头探出厕所外，看见院子里林扯高正疾步向厕所走来，失声叫道："不好"，便立即返身同张锡锟一道，拼命的将火炬撕成碎片，并往嘴里塞。

厕所外已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林扯高已飞步跨入厕所。此时，黄学全已站了起来，阻止正在吞嚼"火炬"纸片的张锡锟。两个人立即扭作一团。

一场灵魂的搏斗终于打响了。

跑进厕所的林扯高狂喊一声，向张锡锟扑去。顿时，厕所里的林扯高，陈贤士、黄学全同张锡锟、周志五个人扭打在一起。一方是拼命的撕碎和销毁"火炬"，一方则拼命的从张锡锟和周志的手里去抢夺塞向嘴里的碎片。

此时，岗哨上的警铃大作，何庆云带着两名士兵迅速赶到，并且封锁了厕所，院坝内站满了流放者。一些人试图靠近厕所，但被武装的士兵制止。

两分钟以后，周志被反捆着押出了厕所。随后，何庆云同另一名士兵将张锡锟押了出来，陈贤士和黄学全跟在后面。何庆云一面厉声驱散围观的流放者，一面押着张锡锟向铁门走去。

围观者个个神情紧张，都在轻声议论。唯独刘资元和王世春，却站在严管二组的监舍门口叉着腰，远远地站在那里。

何庆云向岗楼上招呼，不一会，驻守六队的全体武装士兵拥进了院坝。不到五分钟，所有的流放者都被赶进了各自的监舍，六队宣布戒严。

林扯高独自一人蹲在厕所里，将从张锡锟和周志手里抢下的火炬碎片，放在厕所角落的三合土地上一片一片地拼揍着，并且拿着一把火钳，将掉落在粪便坑里的碎片纸一片一片夹起来，与放在墙角的火炬残片拼接一起。最后，把从周志手里夺下的散落一地的造反派传单收集在一起，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照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摄下了照片。

与此同时，何庆云正用电话向场部紧急报告，邓扬光立即"指示"：场部管教科近三十名干事随后赶到农六队，要求何庆云严密封锁，不准任何人离开现场，并由何庆云调动六队所有的警力，密切的监视那些列为重点的人员，防止他们销毁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十点钟光景，六队办公室挤满了从场部匆匆赶来的管教人员，林扯高指手划脚地将所有赶来六队的人员分成几个组，每个组配一名本队干事。

然后，精神抖擞地在院坝里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音，指挥六队的全体流放者按组别排成八个纵队。

何庆云则背着手，脸色阴沉地向大家宣布立即进行"大检查"，并宣布了"五禁止"的检查纪律：禁止任何人离开坐位走动；禁止上厕所；禁止相互传递东西和撕毁纸条；禁止交头接耳；禁止东张西望以目传情。

岗楼上的士兵架起了四挺机关枪，整个坝子里的气氛紧张万分，使本来感到寒冷的空气更加显得寒冷，所有流放者被恐怖气氛压迫着，连头都不敢抬。

近三十名由管教和武装人员所组成的搜查队，戴着大口罩站在各组的队前，并按照各组排列的次序，检查每个囚奴的行李。

在队部开具的黑名单中，我属于“火炬”集团的重大嫌疑犯之一，一名从场部调来的管教人员同何庆云对我进行了“重点”搜查。

搜查开始前，我还在蔬菜一组，两个人脚跟脚地跟着我进到监舍，先命令我将所有的行李抱到院坝里，然后命令我将铺位上全部的铺草搬到门外一个角落。

当着他们的面，命我将所有的铺草翻开，直到证明草里面并没有藏任何东西后，再叫我把床板折下来。

两个人翻来覆去地查看那上面有没有挖的“洞”，再搬开每一个床架的隼头，看看那里面是否塞有纸片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墙上搜索每一条缝隙，一直搜寻到房顶，再搜索到瓦楞。

最后又爬下床铺仔细地用手电筒查看床底下的泥土，一边敲打一切可疑的地方，好象寻找那下面埋着什么似的，仅对我铺位的检查，整整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长期没有打扫的床铺下面，灰尘和霉气令人窒息，他们带着大口罩，逼我按他们的要求操作，直到确实搜不出任何可疑的东西后，才将我押到院坝里的破烂行李面前，命令我就地盘腿而坐，不准东张西望！

接着两个人开始了对这一堆破烂的“解剖”：用剪刀剪开我的破皮箱，折开每一个夹层和每一条缝隙，包括皮箱上已经不能锁上的“锁”和提手把，直到证明破皮箱里什么也不曾藏匿，才将它扔到了一边。

我看着到那口跟随着我南奔北撞了十五年的伴侣就此彻底解体，心里便涌起了十七年前我提着它走上车站的那一幕，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接着，他们搜寻从箱子里倒出来的破烂，将我的笔记本和所有的纸条全都丢进了一个盆子里，然后，打开我的破棉褥和那床足有十斤重的被盖，用剪刀剪开我那床破棉垫。

那是我在劳动之余，千针万线将一些从破棉被上撕下来的破棉花和破布镶拼缝合而成的，折开那些线缝，便是一堆又烂又脏的破棉花。两个人对那里面的每一个棉疙瘩捏了又捏，直到确认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时才罢手。

拆完了棉褥，又用同样的方法拆被子，折完被子上的几十个补巴以后，便将里面的棉絮翻过来，又对里面的棉花疙瘩捏了又捏。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从上午十点搜查到晚上八点钟，整整折腾了十个多小时，还在继续搜查，没个停歇的样子。

夜幕笼罩了六队的上空，岗哨上打开探照灯，探照灯像两条火龙，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院坝里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我的位置上几乎全是些碎布片和破棉花，我的唯一财产，便是那些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书，以及笔记，信件全部的丢进了盆子里。

搜查完毕后，何庆云才叫我站起来，并脱下了我身上的那件棉衣，那棉衣足有十余斤重，那是由几十块破布以补钉联成一体的，样子极丑，但却解决了我过冬的大问题。而今场部来的干事却不由分说，拿起剪刀便对我这件冬天的护身宝一阵解体。

那天晚上很冷，呼出的气在夜空中凝成白雾，我穿着单衣瑟瑟发抖，牙齿禁不住咯咯打颤，在惨白的探照灯光下，我被剥得精光，只穿着一条内裤，实在没有查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后，便叫我脱下内裤弯着腰，还掰开我的屁股，直到证实里面没有夹带为止。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被这么彻底的搜查，但我已冷得发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抵抗寒冷上，内心里却燃烧着一股怒火，多次向何庆云提出抗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处罚人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场部那人瞪了我一眼，将一件检查过的棉背心扔给我披在身上。

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我胸中燃烧的那股怒火，我真会被冻死的，有几次我拼命的咬着咯咯作抖的牙帮，竟将嘴皮咬破，从口里渗出血来。

搜查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十一点钟，才将囚奴们全部赶进了各自的监舍，张锡锟则被关进了小监，从此就再没有出来过。而我从菜蔬组搬到了严管二组，睡在张锡锟原来的铺位上。

面对这场搜查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朝那口跟随着我十八年的破皮箱瞥了一眼，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怒火中燃烧。

扔掉破皮箱后，我只好用一块破布包好我随身的换洗衣服，便静静坐在铺上。被盖和垫褥都成了碎片，我无法睡觉，周身好像从冰窖中爬出来一样，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

此时，估计大约是凌晨两点钟了，心中挂念着张锡锟，虽然他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但我为他感到万分痛惜。

他同陈力一样，来不及留下一点值得记念的东西给我，而我自己稍有不慎，在这个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随时都会招来同样的结局。

坝子里的探照灯一直亮了一个通宵，除了听那瓦背上阵阵呼啸的北风，就是院子里老管查哨的马靴声。

（二）奋起自卫

我在室内发黄的灯光下，裹着那床已撕破了的被盖统，倦缩着坐在那里，细细回忆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

像今天这种无理搜查，我们本可理直气壮向当局提出抗议，但大家被空前的恐怖气氛懵住了大脑，"火炬"的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没有人对此表示抗议。

今天狱方什么也没有搜查到，估计他们不会善罢罢休。

林扯高经如此严密的搜查，竟没有从我们身上搜出"火炬"的一字一纸的"证据"，想到这里，身上感到稍稍暖和了些，头脑也开始清醒过来。

现在，我不能对他们的疯狂搜查和无理侮辱表现忍让，我要给林扯高和何庆云留下心中有愧的感觉，我必须对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作出反应。

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高声的向坝子里喊道：“我冷，给我棉衣”。那声音在寂静无声的六队院坝中格外响亮，像炸雷掠过夜空。

不知是太疲倦，还是因为刽子手的心虚，哨兵对我的呼喊并没有答理。就像九年前文革开始那个晚上一样。

我又一次猛烈的吼叫起来，这一次在大门处亮起了一束手电筒光，何庆云拿着一件撕破了的棉衣走到我面前，扔在我的身边，一面恶狠狠地威胁道：“孔令平，你规矩点。这不是 1966 年了，你放明白点。”

我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唇相责：“你凭什么撕我的棉衣和被子，那是政府给我的人道主义，你撕烂了它们就不管了，装作不知道。”我用这样的口气责问他，把他们精心营造的恐怖气氛给冲破了。

我知道此刻全监舍的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听着我的抗议。此刻我对狱方的大声抗议，是何庆云没有想到的，本来撕毁衣服被子就是盲目的，在六队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何庆云和林扯高又有矛盾，林扯高虚张声势，等于是对何庆云主持管教的全盘否定。

何庆云面对这个局面，大概在心中暗想：六队这些年来的成绩并不是你林扯高一笔能抹杀得了的，而林扯高不但没有把孔令平这样的主犯吓倒，反而还藉此攻击起我们来了，我看你林扯高怎么收场？

表面上他压低了嗓门喝道：“现在夜深人静，我不同你计较，你也该清醒一点，自会有人叫你吃辣子汤的。”说完抽身向大门口走去。

我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紧紧追问道：“你们凭什么把我同张锡锟硬扯在一起？凭什么把我送进严管组？是看到我这几年沉默了？于是你们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了？你们不是正在贯彻武汉公安工作会议的严禁打骂犯人、严禁逼供信的规定么？今天搜查所造成的，完全是林扯高一手操纵的”。

这一声怒责，凭我直觉判断，何庆云完全能听得出我话外之音，听得出矛头所指。在派性上，何林两派一直势如水火。在这个矛盾中，我要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向何庆云的大声责问，是给火炬撰稿人和传阅者一济镇静剂，我告诉他们，统治者内部存在着分岐，他们十分虚弱，他们的矛盾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千万不要因为张锡锟和周志被关进小监而泄气动摇，千万不要因为几个败类的丑恶表演而看不清形势。

另外，还想告诉大家，林扯高今天其实一无所获，本来就有矛盾的队部，就像一群疯狗，在没有咬到人时候，他们会自相撕咬起来，现在应当分析形势，采取相应措施，而不是惊慌失措。

何庆云不吭一声地匆匆结束了这场“嘴斗”，快步地走向院坝，迅速地消失在大监铁门边。

我在昏暗中穿上他刚刚送来的那件棉衣，比我那件千疤万补的“铠甲”暖和多了，寒冷的威胁减缓后，心中似乎踏实了些。

秩序又恢复平静，前一天晚上所造成的恐怖气氛，迅速消逝了。农六队在第二天的出工时，恢复了以往的嘈杂和说笑。

第二天早上出工，我跟着严管组，双手空空地到了改土工地上，因为我没有工具，便给装满泥土的板板车帮助启动和倒土。只是昨夜一夜未眠，到了下午眼皮重得像挂着铁锤，很想打瞌睡。

此时何庆云顺着田坎走过来，本不想理他，可他偏偏盯上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既没有拿锄头挖土，又没有往板板车上装土，便问道：“你怎么不动？”神情很冷漠。

“你没看见车子还没有打倒转么？”我也以冷冷的回答。

“你的工具呢？”

“在蔬菜组。”

“为什么不带来？”

“粪桶，粪瓢，扁担，这儿用得上么？”我叽笑地回答。

所有严管组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注视着我，我心中明白，此时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囚奴中产生影响。带班的士兵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沉默了几年以后，我又有楞有角地再现当年的锋芒了。

何庆云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并不希望昨天的突击搜查，找出“火炬”的组织纲领和名单这类证据，但他对几个最头痛、也是下过“苦功”的反改造“尖子”心中无底，不敢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膛保证，也不敢在管教科的面前与林扯高公开的争论。

大搜查没有搜到任何证剧，使林扯高落空，却使何庆云心中暗暗窃喜。即使遇见我如此轻蔑的向他发泄不满，他也不计较。

林扯高的确是大失所望，费了足足半年时间，本想一举在六队捞一网大鱼，结果除了张锡锟，还是张锡锟，现场抓住的人只多了一个周志，虽说逮了一个传递“火炬”的现场，但周志又有什么用，充其量是个外围成员，被重点怀疑的火炬其它成员，一个也没有抓到。有关反革命的组织证据、纲领和名单，一个也没有找出来。

仅凭一张“火炬”刊物和几张“反倒底”的传单，仍然不能对这个团伙案子定性，所以林扯高正盘算如何撬开这些人的嘴，供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倘若将所有的“嫌疑人”统统关进小监，又怎么应付庆何云的冷言嘲笑？

张锡锟被关进小监的第二天，便被林扯高从六队小监转移到林业队旁一处新修的秘密监禁所。那里有围墙铁丝网，那里的工作人员不再是犯人和刑满人员，而是一批不知从那里招来的工人。

林扯高对六队的保密工作十分怀疑，生怕继续关在六队，让小监与大监通气。他需要在严格分割的情况下，获得被审者自相矛盾的口供，从而找到突破口，得到意外的审讯效果。

从此，张锡锟与农六队的政治犯断绝了一切联系，西昌地区法院和四川省高等法院组织了专案班子，专门审理“火炬”案，但是因为所拿到的仅仅是张锡锟和周志两人传递的一份手抄刊物，以及陈贤士和刘资元们提供的似是而非的证言，显然证据的不足，必然引起对于口供的“认定”和“反认定”的争执。

好在林扯高和何庆云之间势同水火，可以变成我们反驳林扯高的有利条件。这是一场斗智斗勇斗的较量，我们中的任何人在被审迅时的语言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

（三）闯险

在这场斗智斗勇斗决心的较量中，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所有火炬的成员都明白，营救他人等于营救自己，六队的政治犯们越来越成熟了。

一天晚上，何庆云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文革将近十年了，何庆云虽每年都有几次将我召到他办公室里，但以前大多是单个对谈，内容多半是我与管教方面发生的冲突，或发生像林彪这样的政治事件后，或严打运动中询问我对形势的看法等等，这次却不同以往。

一走进何庆云的办公室，何庆云的身旁坐着两名陌生男子。两名男子脸上很严肃，我猜他们是张锡锟专案组的人，两名陌生男子，一个作记录，另一个像是这次预审的头儿。

我平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等候对方的提问。我知道，何庆云在表面上是陪审人，实际上是这场戏的主唱。

我与何庆云长期打交道，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底细，我知道何庆云对林扯高闹出的这个“反革命集团案”很不服气，所以有意的给我留下替“火炬”抗诉的空间，何况这几天我已多次主动出击，在指责林扯高乱来和捕风捉影时，何庆云表面上制止，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却在鼓励我放胆抨击，一吐为快。

我也知道中共的预审过程，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不凭事实一贯是先入为主下结论，然后再编造口供使之与结论相符，所以冤案特别多。

但这次正是在文革进入尾声时候，何况武汉工作会议上有“重证据，严禁逼供信”的最高指示，多多少少对先入为主的瞎乍乎有所抑制。

提问之前，何庆云伏在办公桌上抄写什么东西，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我怎么也觉得他在装模作样。

连日来，我在工地上抓住他缺乏证据，以及很不正常的大搜查，撕棉衣被褥等等站不脚的做法，主动进攻。我明白何庆云此刻在高等法院的专案组面前，可说对火炬案一筹莫展。三分钟冷场以后，主审官按常规提问姓名籍贯后，便直裁了当的向我提问道：

“今天就火炬一案正式提审你，你不要兜圈子，而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本想反驳他，申明自己与火炬没有任何的瓜葛，有理由拒绝回答。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且静静听他怎么说。

“首先，你要老实交待你所知道有关火炬的全部情况，你要立争主动交待，我们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立即反问道：“你凭什么说我知道火炬的来龙去脉？并且要我交待些什么？”

“你别装蒜，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和检举材料，证明你就是火炬的成员，现在是要你主动交待。你要知道，抗拒是没有出路的。”

何庆云在一旁冷笑着，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明白他心里想的恰恰相反。

提审人接着说：“要你交代‘火炬’反革命组织成员和组织名称行动纲领，难道你们自己干的事，还要我们来提醒吗？”

“怪不得何干事经常搜我的东西，现在大概已经死心了吧，你所得到的检举是一些捕风提影的东西，我知道你们完全可以据此下结论，既如此又何必来问我？”我坚定的回答道。

提审员被我这么一驳卡住了，办公室里，两分钟的沉默后，好象今天的审问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了，于是改换了问题：“你看过‘火炬’吗？”主审官的提问，显然在迂回出击。

“如果说没看过，你们已根据林管教放出的空气说，农六队至少有大半的人都看过它。我当然是在你们已经认定的人中了，就算我如实回答说我一无所知，你们也不会相信。但是我觉得我们无须争论谁是否读过‘火炬’”。

“你们不是说‘火炬’满篇都是造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那么你们可不可以把它公开的拿出来批判？也让我见识见识？就像你们经常在你们的报纸上刊出反动文章供大家批判那样。如果它只是批评你们，那么你们应当清楚，这与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推翻政府、号召暴动是两回事，我想你们应当分清批评你们与组织反革命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区别，这是不可以任意定性的。据我知道，‘火炬’中还有你们散发的传单，有这种荒谬的反革命组织么？”

我的这番驳斥，颇令西昌派来的预审员感到吃惊，也许在他们接触监狱中的政治犯中，很少能够击中要害，把揭露当局的性质与他们的指控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也明白，所“拿获”的证据，充其量是对中共黑暗统治的揭发，是一份传单！它极有可能是个人的行为，甚至是个人的写作，由此而断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只有草木皆兵、神经过敏的人才会这么做。

这使我想起了蒲世光以“非团员呼声编辑部”写的一张大字报，就被认定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中共的基层官员，连法律的基本界定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亮出自己的底牌，反映了它的极端无理蛮横和无知。

他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我已经斩钉截铁地驳斥了他们下的“集团”结论，因此，追究其它的诸如由谁起草？怎么传看等等已没有意义了，继续审问下去，完全是多余的。对我的

预审就这样草草结束。

接着刘顺森，夏光然、陈容康、邓自新几个被他们认定的重点“火炬”份子，也经历了这种相似的“预审”。由于有我的反驳给整个案子理出了头绪，法院的瞎乍乎只能一无所获。

林扯高想通过预审获得“反革命”集团材料算是徒劳了，六队杀气腾腾的形势被挡住了。

第五节 火炬战士，无愧当今的英雄

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林业队特别小监里的张锡锟和周志的安危了，尤其是张锡锟的危险处境，又处在严密隔离下。中共最容易在他身上使出哄骗和恐吓的手段，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当年他们对蒋正君的“反革命集团案”的罗织，就是利用了这种手段，株连了几十人，编造出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但是我们深信张锡锟有着非凡的人格，他所抱定的不惜为真理壮烈牺牲的宗旨，令人敬仰。但我们为不能营救他而深深自责，我们深信他能战胜当局的讹诈。

林扯高不甘心，于 1975 年 3 月，又把刘顺森和夏光然关进了六队的小监中。

然而，当局煞费苦心的隔离，并没有切断张锡锟和农六队的战友们的联系，还不到半个月，林业队的人便从特别小监的工作人员那里，弄清楚了张锡锟他们的生活处境。

林业队里传来的消息说，张锡锟和周志虽然被严格隔离关押，但还没有给他们上刑具，每天都有高等法院的人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的攻心战。他们的伙食由场部干部食堂送去，这使我联想到十一年前我和陈力被关在场部小监的情景。

（一）回答审问

处境最危险的是张锡锟！在大陆狱中“组织反革命集团，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组织罪名一旦成立，为首者必面临处决的结局。

当局在十一月八日这天，既没抓到任何证据，除那张在厕所里截获的刊物，法院要定罪的证据一个也没有。现在对张锡锟的认定只能靠张锡锟本人和我们的口供，所以张锡锟被抓进特殊小监的那一刻起，他的口供决定了他的生死，也决定着其它火炬成员的生死。

不久，从林业队传出了有关张锡锟的一段审讯经过：

预审员：“现在，再一次向你交待政策，从你手中现场拿获的‘火炬’是你的手抄本，从你们所出的刊物证明你们有相当的组织能力。这个刊物上所登载的文章，文风和内容决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由几个人写的，你也知道狱中组织反革命宣传难逃一死，但是我们仍抱着治病救人的改造目的。如果你能在事实面前很快交待出你们的同伙，我们仍可根据‘坦白从宽，将功补罪’的政策，减轻你的责任，甚至于可以免除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应当仔细地想一想。”

张锡锟：“我已经反复向你们讲清楚了，你们搜去的‘火炬’属于我个人的行为，我想你们的技术鉴定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们已彻底把六队翻了一个底朝天了，难道还不相信自己搜查结果吗？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应当节外生枝，至于你说我不甘心灭亡也好，说我蠢蠢欲动也

罢，这些话我已经听你们说了几十年了。难道饥民们起来造反，要你们下台，也是反动阶级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吗？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被你们划为被消灭阶级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什么？我是一个学生，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被你们诬蔑的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当然权力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今天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对我要打要杀。但是你们怎能杀掉你们自己所造就的、反对你们的老百姓？我们认识上既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我们永远都无法说到一处去。至于你们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那也是你们的主观认定。要我招供出你们想象中的反革命组织，那是你们的一厢情愿。我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我是不会在你们认定的供词上画押的。"

这一席话，令预审员惊心动魄。

预审员："那么，我想问你，在你们的'火炬'中，哪些文章是其它人写的，比方说那些是刘顺森写的，那些是孔令平写的。我们掌握了充份证据，这些人是你的同伙，你帮他们隐瞒也是瞒不住的"。

预审员在用认定的方法，迫使张锡锟交待，这是中共贯用的手法：口供代替证据，推理代替事实。他想逼迫张锡锟招供"集团"的成员。

张锡锟仍然从容回答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们不屈于你们的压迫和淫威，敢于说真话，你们都可以怀疑。这么多年来，哪一个中国老百姓没有挨过饿受过冻？你们编造的美好谎言还少吗？"

"这么多年来，你们为了欺骗百姓，吹嘘什么农业大丰收，捏造高产卫星，强迫善良的农民在人民公社吃草根树皮，让他们全家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和工人连哄带骗去建造小高炉，炼出一堆堆毫无用处的铁疙瘩。还吹嘘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最后让他们落得连遮风避雨的家都没有。"

"你们效仿秦始皇在全国大兴冤狱，把老百姓为你们打下的江山，变成了无人敢说话的人间地狱。你们逼迫善良百姓忍饥挨饿还嫌不够，还要逼迫他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驱使他们备战备荒。"

"我们为你们把全国搞得饿殍遍野，还把这种恶果上推给老天、下推给苏联感到可耻。你们让盲目无知的青少年在文革沙场上喋血殒命，为了疯狂的梦想造的孽，千秋万代都不会忘记。"

"神州大地已被你们搞成了人间地狱，你们的罪恶昭昭，何需我去书写。就是我写出来，也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叫'罄竹难书'。文革中你们逼迫我们在毛泽东的像前请罪，你们的人'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我只觉得可笑。"

"至于你说到刘顺森、孔令平，肯定你们还会怀疑其它什么人，可以说农六队中二百多号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在心底里不痛恨你们。只是摄于你们的酷刑和棍棒，才忍受着你们的作威作福。你们硬把所有反对专制的人，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扯在一起，那只是你们的胡说

编造。果真这样，你们不是变成极少数的孤立份子了么？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反革命是极少数么？”

“刘顺森孔令平他们都是我狱中的好友，同你们所论断的‘反革命组织’是两回事，我们根本无须成立什么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我们认为在监狱中这种反抗你们的行动，是无须什么纲领来约束的，你也不要枉费心机了。”

预审员提出的问题，招来了张锡锟的严辞反驳，他们反而在张锡锟面前变成了受审者。在这个视死如归的人面前，已经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得到新的口供，审讯记录上是什么也记不上去了。

当然，张锡锟真是一条令人佩服的硬汉子。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办案人员没有弄清楚也无法回答的，一个小小办案人员，既然缺乏证据，也只能照事实来作结论了。他继续问道：

“好吧，看来你是顽固抗拒了，不过其它的人未必同你一样，他们自会交待问题，现在留给你更多的时间，好好反省，直到你想通了，再来交待吧？现在你要交待‘火炬’的另一些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写‘火炬’的？一共你写了几篇文章？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有谁看过你的‘火炬’？你在狱中是怎么传递‘火炬’的？……”

这里完全可以引用当年共产党曾说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把中国民主运动的星星之火，烧毁毛泽东所建造地狱的星星之火。

审讯就这么持续下去，1974 年 12 月开始，火炬案的审理一直持续了整整 8 个月。六队似乎重新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我也从严管组调到了大田组。

曾一度关进小监的刘顺森和夏光然，也从小监里放了出来。除了周志和张锡锟一直关在林业队，并从那里不时传来有关他们如何同审讯员相对峙的英勇故事。这些故事全是由管理特别小监的工作人员传过来的。

张锡锟以他伟大的人格，征服着一直看守他的人们。这些工人在讲到张锡锟时，个个翘起大指姆。而我们最清楚，如果不是他的英雄气概压住了刽子手们的嚣张气焰，六队此时还要被林扯高搞得鸡飞狗跳。

这时西昌地区大闹地震，谣言纷传，我们仍然住在地震棚里，相聚在一起收集全国的政治形势，冷静地考虑我们的对策。火炬不能再出版下去了。但从地狱里举起的火炬，却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灵。

四个叛徒中，最满意的当数陈贤士了。他的刑期本来只判了五年，在狱中不知不觉的混过了三年，林扯高提出提前释放的申请获得批准，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二）会场上

1975 年 8 月，由西昌地区法院签署的对张锡锟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中，判处张锡锟死刑，立即执行。以同案主犯，判处周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当局对政治上稍露反对锋芒的人所采取从重从快的严厉打击，是毛泽东独裁暴政的唯一手段。因为火炬传递的不慎，使张锡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可敬可叹的是，张锡锟毅然的用自己的身体切断了“火炬”同其它成员的联系。六月西昌中级人民法院专案组的组长向张锡锟作了最后一次提审。

专案组长问：“我们已根据西昌检察院对你在狱中组织反革命集团、出版反革命刊物的起诉，经过八个月的侦查，在查明事实真像以后，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将对你作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处理，并报最高法院批准。但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们仍从挽救你的立场出发，希望你能彻底地交待出你们的组织和同伙。这对你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能交待出‘火炬’集团的其它成员，我们仍可以根据党的立功受奖的原则，对你重新量刑处理，我们甚至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选择坦白交待的道路，不但可以免你一死，甚至可以考虑对你的特别处理。给你选择的时间只有三天，希望你慎重考虑。现在请你回答，你是否愿意考虑交待？”

对方已经黔驴技穷了。对张锡锟采取的最后诱惑也失败了。在张锡锟的面前，始终摆着一条出卖他人以求自己苟话的路。然而，获得了超然精神力量的张锡锟，冷笑面对魔鬼的诱惑，拒决走这条路。

他坦然回答道：“要讲我的同伙，全国六亿人民都反抗你们的暴政，他们都是我的同伙。你们胡说自由民主世界是人间地狱，而你们却在中国大量的杀人，把中国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但是被你们杀的人越多，这个政权就灭亡得越快。至于讲赦免，我毫不客气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这个权力。只有人民才有赦免你们的罪恶的权利。我很乐意无愧的死去，同被你们无故杀害的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是正义的。我坚信人民是会纪念我的。因为我是在反抗独裁、反抗你们的暴政而牺牲的。我不但可以告慰我自己，也可以告慰六亿同胞。不管你们今天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现在所讲的话是正确的！”

这掷地有声的铁骨诤言，便是张锡锟牺牲前的最后宣言。

这次最后审问后，张锡琨被锤上了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审讯者在布告上所划的红勾，反映了他们软化和欺骗政策的失败。

1975 年 8 月 25 日，当局最后向这位始终没有屈服的战士，宣布死刑判决后。并定于次日在本农场执行枪决，问他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四小时还有什么话要讲？

张锡锟仍然淡淡的冷笑了一下，然而这冷笑中，却带着一丝遗憾，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接着，张锡锟便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留下了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立刻传遍整个盐源农牧场中的上万名流放者和刑满人员。

“这二十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你们在罪恶的政策和独裁专制的制度下，废民主，杀无辜，失民心，破坏建设，一步步走向衰亡，并看着你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然而，我十分遗憾的是，我没有活着看到你们最后灭亡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就要到来了，当那天到来时，中国一定前进了一大步，那一天我会同谭嗣同在天堂里同人民一道分享民主革命的成功！”小监的工作人员，用动情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外传递了这位民主斗士最后预言。

那时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看守们在果园里为他挑选了一盘又大又黄的苹果，为他特别清洗了临刑就义的衣装！

1975年8月26日，农六队的流放者在凌晨六点就被摧促起床。为了制造一个恐怖的气氛，何庆云在集合队伍前，宣布了今日公判大会的纪律：

“不准带凳子，不准带纸笔，开会时必须端坐在指定的位置上，脸朝前方，不准相互交谈，不准移动坐位，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在会议过程中离位解小便，不准与其它队的人员相互打招呼交谈”。

何庆云宣布完毕，阴沉着脸打招乎：“整个会场今天都有巡查的警察，谁违犯，谁被武装捉到，招来的麻烦后果自负。”出发前，何庆云还命令各组的组长对参会者进行了一次搜身，发现所带的纸笔通通搜去。

八月底的盐源，按以往的季节，已进入风季。然而这一天却特别的反常。满天乌云密布，让人特别的沉闷。我望了望那浓云覆盖的灰色天空，觉得心里特别的压抑难受。我不知道，天要下雨还是要哭泣？不是说苍天有情么？

会场被整整两个排的士兵包围着，我们进入会场时，便看到那些隐藏在围墙外的绿军帽严阵以待，主席台后面高约1.5米的矮墙上，架着机关枪。

墙头上绿军帽下像狼一般凶狠的眼睛，盯着坝子里已进入会场的赤手空拳的人，就像防备某一个人振臂一呼，其余的人便会像洪水般朝主席台方向压过去，劫了法场似的。

在主席台两侧的露天看台上，是数百名来自各中队的队长、干事们，因为他们都是狱中的老油子，明白所关押的犯人都是一群被压得服服帖帖的奴隶。此时倒轻松随便，显得满不在乎。

能容下万名人的会场，被横竖交叉的石灰线划分成许多的方块。列队进入方块的各队囚奴，要规规矩矩的囚禁在里面，不得丝毫越界。

主持今天大会的是场部革命委员会杨主任。坐在杨主任身边的，是西昌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杨主任不时从麦克风中传出埋怨声，责备各队的队长没按他的指令预先进入方阵内，不时地传出他起立整队的号令声，直到十点钟光景，才安定下来。经他这么一弄，原先十分压抑的气氛，缓解了许多，人们开始乱哄哄的交谈。

宣判大会开始，杨主任故作镇静严肃的起立，左手挥动着早已准备好的红本本，念着预先选定的公判会常用的经文，宣布大会纪律！

他讲话刚刚落音，主席台两侧走上来两名全武装的士兵，发出一阵厉声喝叱。短墙后面立刻回应出一迭杀声。这使人联想到专制时代公堂两侧峙立的差役，以木棒击地，齐声吼出“威……”的吼声。

就在这阵阵逼人的沉闷气氛下，一阵歇歇停停的雨点打在会场中，接着便将一场大雨狂泻下来。

矮墙上二十多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着台下，枪口好像随时会因会场哄乱而喷出火舌来。三合土坝子里，近万名盘腿危坐的人们，虽被大雨浇淋，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会场内近万双眼睛盯着主席台两侧的各队狱吏们，他们在大雨猛砸下，有的人东张西望，向可以遮雨的走廊跑去，有人正在张开事先带在身边的雨伞，却被矮墙后面的虎贲们叱住，使得这些想溜的人尴尬的缩回到原处。灰溜溜的收下了刚刚打开的雨伞，便用手帕，或脱下外衣，顶在头上。

我在台下正襟危坐，双目微闭，索性顺势地脱下了帽子，任凭豆大的雨点从光头上淋遍全身，雨水顺着衣服和裤子在双膝盘拢的交叉处，流到了三合土地下，彷佛是上苍在流泪，替冤死的人们作亡魂超度的祈祷。

忽然厕所方向传来了一阵骚动，有人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吼叫，只见几名全付武装的士兵正用木棍，驱赶着围在厕所周围的奴隶们，警棍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身上，发出一阵阵朴朴声，有人捂着沁出血的头在躲避着警棍，但没有人叫喊。

看台上的各队看守，有的正在向自己管理的囚犯队列张望，有的便从看台上走了下来，混乱持续了十几分钟后，厕所周围的人被强行驱散，大雨也开始收住了阵脚，杨主任才走到主席台前，抬头望了望渐渐散去的乌云，麦克风重新嘈杂起来。

他一声令下，一群虎贲两人揪一个，将 30 多名犯人像饿虎朴羊似的推到了主席台前，每一个被押上来的人遍休鳞伤，满脸是血。

当时惯例，被宣判者都在短墙后面被暴打一顿，并紧紧的捆绑以后，才推到主席台前，此种惨绝人寰的酷刑虐待，我们早就见惯了，被处决前还要被糟踏成这样，全是做给活着的奴隶看的，在这群惨不忍睹的队列中的第一名，便是张锡锟。

分别十个月了，此刻见到了他除了满脸是血，五花大梆外，还见他喉咙在艰难地抽动，他有一腔溶着热血的话要当庭一吐，或是想振臂一呼，向台下的奴隶们喊出准备好了的嘱托，但他说不出话来，因不能呐喊而挣扎着。

就在这一瞬间，全场一片哑然。唯有我和一切火炬成员，正强摁着心中涌动的怒火。抬起了头，正面迎视着张锡锟的目光。

就在这时，我看到主席台上左侧何庆云却低低地埋下了头，何庆云正坐在张锡锟的背后，看得出他一脸惭愧，关于他内心的想法，我早有耳闻，传说他的妻子最近经常向他唠叨："世情险恶，少做一点缺德事为妙"，怪不得近一年来，他常显得沉默寡言。

在审讯中，张锡锟视死如归的精神，强烈震撼着他的心，使他意识到自己双手已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在心理上解除了武装，何况动荡不安的社会，难说今后是谁持掌大权。

奇怪的是，今天主席台上，却不见林扯高，他可是杀害张锡锟的直接凶手。今天，林扯高本该高高坐在首席位置上，他该不是怕直面张锡锟吧！

在杨主任的一声口令下，接着是喇叭里播放出一阵声嘶力竭的口号声。这时，一群带枪的兽兵押下了那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一阵沉闷的枪声响过之后，喇叭里又传出一阵口号声！

细雨滴在我的脸上，正好同涌出的泪水顺颊而下。此时，我像一个禅定的菩萨，将手中摘下的帽子紧紧地捏着，捏出水来！

（三）从你身旁走过

我记不起广场中的方阵怎样在杨主任的吆喝声中起立，又怎样鱼贯着走出那农七队大铁栅门，我记不起自己怎样在枪口严密监视下踏上马路，只记得距铁门约五十米远的马路右侧，排列着今天枪杀的八具尸体。张锡锟头朝下方，背着那块临刑的铁插牌，斜躺在路边白桦树下的土堆上。

这样的展示，嫌公判大会上把临刑者死前折磨得血肉模糊还不够恐怖。故意将这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放在路边，在我们经过时重新体验一遍。

为了记念，我边走边数着路边的白桦树，从路边第一颗树开始数到第七棵树下，我清楚地看到，张锡锟脸上淌下的两道浓浓血痕。他双目紧闭，显示出舍弃一切的坚毅，脸上布满对灾难深重民众深深忧伤！！而他那微微张开的嘴，彷佛还在讲述他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嘱托。

我在枪口监视下，一步一鞠躬从你的身旁走过。口中叨念着：

“安息吧！张锡锟，我亲爱的战友！我将牢牢铭记你的嘱托！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彻底埋葬这个罪恶的专制制度奋斗不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要把你的光辉彰明世界；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让你的灵魂复活！”

第六节 上苍对犹大的惩罚

四个犹大是陈贤士、刘资元、王世春、黄学全。

在林扯高主持下，为四个人整理的减刑材料报到了场部，但是除了给四个人改善了一下环境外，他们并没有捡到什么骨头。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四个叛徒立即受到了上苍的惩罚。

张锡锟被关进特种林业队小监后，黄学全便从严管组调了出来，同我一起分到大田二组中：刘资元据说老毛病犯了，正在申请保外就医；至于王世春调出严管组后，牢骚话也跟着多了起来，大致因为他想要的东西落空，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早知如此，他真不该上林扯高的贼船，成了六队人人喊打的犬类。

四人中最满意的当数陈贤士，他的刑期本来只有五年，在狱中不知不觉已混过了三年。1975 年 5 月，他便背上了行李，神气活现的跨出六队的大门，到场部机修组报到。

去年，因孙明权复仇爆炸株连的郭贤，因“证据不足”，从小监里放出，重新回到机修厂，刚从六队调来的陈贤士，被安排当了郭贤的徒弟。

1975 年 6 月，陈贤士仗着他的年轻和流氓本领，上班不到两个月，便同一个就业人员的未婚妻厮混上了。

9 月底，离张锡锟被害还不到两个月，场部派郭贤驾驶一辆轮式拖拉机来给农六队两百亩冬小麦地翻耕。

（一）陈贤士

早上八点，郭贤按时将拖拉机开到农六队大门前，拿着派工条独自到六队办公室去办手续。车上留着陈贤士。自从他离开六队几个月来，陈贤士还是第一次重回故地。

他跷着二朗腿，得意洋洋地斜躺在副驾驶室的坐垫上，并不时地用一双贼溜溜眼睛盯着从六队走出来的流放者。

前一天夜里，同女人厮混熬过通宵的陈贤士，感到特别的疲倦，但这是他“体面”走出来的地方，所以仍强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昔日一起劳动人们的羡慕眼光和询问。

但是从铁门里不断涌出的人从他身旁经过，大都对他投以冷冰冰的目光，没有人理睬他，就像他不存在一样，有的还偷偷议论着什么，对他指指戳戳。

以往秋耕时，场部派来的拖拉机手，向来被当成“贵宾”接待。今天受到人们的冷遇使他感到尴尬和恼怒。

正在没精打采的时候，突然有人挑着一担萝筐向他走来，一迭声的向他招呼。原来是黄学全，一个同他狼狈为奸共过“事”的犹大，“嗨！你倒好，混到跟拖拉机这个美差了，怎么样？”

黄学全朝他招呼道，那口气里说不清是挖苦，是嫉妒，还是羡慕。陈贤士从坐椅上微微地欠身坐起，不管怎么，毕竟有人跟他打招呼了，实在是来之不易。

陈贤士答讪着回应道：“哪里哪里，黄大爷，你也混得满不错，今天去上肥吧？”他故意的这样问，藉以抬高自己，排遣一下刚才受到的冷落。

可旁边的代朝谋却向黄学全吼道：“嗨，别在这里废话了，那边的工具还没有拿完，大家都等着你呢”。

代朝谋本来就是组长，一样受过林扯高的眷顾，只不过没有任何功劳，连骨头都没捞到一块，必然对拖着一块大肥肉的狗产生嫉妒，狗狗相争本是天性。

陈贤士朝着这两个渐渐远去的背影狠狠地唾了一口，便闭上了眼睛养神，心里重新回想起昨晚的好事。

吃过早饭，郭贤驾着拖拉机到了麦田，陈贤士下了车，找了一个僻静的背风田坎，躺在蓑衣垫上沉入了梦乡。

等陈贤士从迷糊中醒来，已是十一点半钟了。他翻身爬起来朝麦田方向望去，只见郭贤

师傅正将拖拉机开回来，在机耕道上颠簸着，郭师傅在干田里打了一上午的滚，已是满身泥灰，他熄火下车，陈贤士走过去，为刚刚熄灭的拖拉机灌注黄油，检查松动的铧口螺丝。

半个小时以后，陈贤士重新坐在副驾驶的铁椅上面。郭贤开着车子，翻过田坎沿着机耕道缓缓地向晒场上爬去，这样安闲的日子，可是他昧心整人换来的，不禁从心底承认自己实在交了“好运”。

拖拉机在经过水渠的弯道前，唐启荣背着药箱也上了车，他把药箱放在副驾驶座位的后面，便站在陈贤士身后，搭乘便车上晒场去。

拖拉机转过架在堰沟上的过道，郭贤轰大油门往上方驶去，车轮在一个暴露在木桥桥面的水管接头上啃了一下，整个拖拉机颠动的瞬间，陈贤士随着车身的跳动，像一个皮球直端端的从副驾驶坐位上，头朝下地栽了下去。

等郭师傅急煞车时，拖拉机带着惯性，从跌在地上的陈贤士身上压了过去。郭贤同唐启荣都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

车停下后，唐启荣翻身跳下拖拉机。只见陈贤士正躺在拖拉机左后轮后面，抱着头痛苦的抽搐痉挛着，脸色由灰色变成铁青。

从麦田里下班路过的人围了过来，见陈贤士正发狂的用双手向天空中乱抓，一把抓住了唐启荣的裤脚。唐启荣尖着嗓子叫人把晒场上的门板抬了下来，准备将陈贤士抬到一河之隔的场部医院去。

但是围观者七嘴八舌议论着，谁也没有动，大家反而传出责骂声：“看他今天小人得势的样子，谁去抬他？”“张锡锟的阴魂不散，现在找上他了。”……

这时有人喊住刚刚从城里回来的马车，彭文学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已七手八脚把陈贤士抬上了马车。唯有唐启荣尖声阻止道：“他不能坐马车，要人慢慢地抬到医院去。”可是没有人理他，却摧促着彭文学：“赶快走啊”。

彭文学会意，抽动了马鞭，那马儿便放开四蹄，在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上，朝着三号梁子上狂奔起来。

绕过五号梁再经过油库弯，到场部医院足有十里路远，彭文学心中明白，陈贤士经过一路颠簸，在路上就要过奈何桥的。

马车狂奔着，五分钟后，当马车冲上三号梁的最高处并绕过油库湾时，彭文学回过头去望了一下车上的病人，只见他已一动不动地扒在马车板上。于是彭文学停下车，走到他的面前用手去触陈贤士的鼻孔，已没一丝的气。再将他翻过身来去看他的瞳孔，证实他已经死去了。彭文学长吁了一口气，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继续抽动马鞭朝医院奔去。

一个罪恶的灵魂终于进入了地狱，当他的尸体在医院的大门御下来时，在那里等待的唐启荣并没有责怪彭文学，而是喃喃的说，“车上三个人，要说最危险的，是站在副驾驶后的我。而坐在椅子上的陈贤士，却偏偏栽了下去。这不是张锡锟的冤魂找上他了么？”

陈贤士从拖拉机上栽下来身亡的消息，在六队迅速传开，也在场部附近的几个中队传开了。

陈贤士虽然因叛卖告密得到提前释放，得意扬扬的进了场部拖拉机组。妄形之下，姿意胡来，夺人妻，干着丧尽天理的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但他却万万没料到，天理不容，张锡锟被杀害不到两个月，鬼使神差让他葬身在拖拉机的车轮之下。

马太福音中对犹大的结局是这样写的："……犹大看见耶稣，已被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来，向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那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犹大临死时，还有一种抱愧和自责。而这陈贤士是连抱愧之心都没有。

毛泽东思想熏陶出来的人，根本就不会悔过，他只好进入地狱，让地狱的大火来煎熬这肮脏的灵魂吧。

在陈贤士调往拖拉机组差不多同时，刘资元也从严管组调进了蔬菜组，这种调整，显然是林扯高对他的"奖励"，也是林扯高的许诺。

（二）刘资元

四个犹大中，刘资元是最接近火炬的人，与其说他反对火炬的观点，不如说他被当局的恐怖所吓倒，当他明白张锡锟正在出版火炬时，他知道杀头的危险正向火炬成员逼近。由于刘资元内心深处十分轻鄙林扯高，但不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有铁着心用自己的脑袋甘愿为真理献身的英雄人物。刘资元虽然对毛泽东的黑暗统治不满，但对今后的政治局势却一片模糊。

文革初期，因为他的牢骚，成为六队批斗的重点人物，张锡锟一度把他当成在六队的知心朋友之一，可惜张锡锟却忽略了刘资元素质上的缺陷，此人是一个自私、心胸狭隘、缺乏服从真理的人。

他的懦夫天性占据了上风，在与张锡锟的交往中，刘资元越来越感到，同张锡锟接近，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经过了无数次思考，他决定与张锡锟和火炬成员划清界限，以求自保。

现在，当刘资元以出卖"火炬"公开亮相后，原先能同他讲几句话的人，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有些人眼里还射出蔑视的目光，一些人站在远处，戳着他的脊梁骨窃窃咒骂，他深深感到孤独和无助。

这种心理上的痛苦，是他没有估计到的，就像为三十个金币而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一旦肮脏的交易成功后，那冥冥之中的正气，便天天折磨着他。使他原本就虚弱的内心，更加脆弱。不过他的灵魂已经堕落，但他仍看不起粗俗的林扯高，更看不起下流的陈贤士。

自从张锡锟被害后，林扯高曾对刘资元许下的减刑和提前释放的诺言，像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空话，再没有被提起过。

刘资元过去犯过头痛病，最近越来越加剧了，开始时，他还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但

头痛一天天加重，每到深夜都会发作，而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好几次到场部医院就诊，医生似乎猜准了他的内心活动，嘱“”病由心起，只有把心情放松，注意调养，自会痊愈”，但他服了镇静药后，始终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益加重。

有时候从梦中痛醒，连呼“张锡锟”。他醒来说，梦见张锡锟一脸是血，站在他的窗下，正向他喊道：“还我头来!”于是惊得一身虚汗，头痛骤起，夜不能寐。

当陈贤士堕车身亡后，六队便纷纷传言，说张锡锟的英魂不散，要不然还不不到两个月，便从冥界伸出手来，拉陈贤士去陪命，还说刘资元的头痛病，定是张锡锟不甘心，第二个赔命的人就是他了。

刘资元听到人们的纷纷议论，心中更加发毛，有时头痛发作，他跪在床前喃喃祷告。何庆云听说后，向他说道：“刘资元，把你从严管组调到菜蔬组，本是政府人道主义的挽救，你可不要时冷时热。”

张锡锟被害后，他就再没看到过林扯高，本来可以把林扯高当成一把保护伞，现在去找谁来兑现提前释放的许诺？

日趋加重的精神压力，终于使刘资元在一个早上倒床不起，何庆云还警告他：“别用装死狗的办法来要挟政府”，后来同意让他到医院作一个彻底的检查。

医院对刘资元的怪病也感到无可奈何，正好有一个从西昌刚调来的医生，在对他诊断后说，他患了一种名字挺古怪的精神病。也不知是这位医生在卖弄医术，还是真有其病。刘资元便是以“头风病”收进了农场的医院。

“三国演义”中曹孟德患过这种古怪的毛病。说华佗曾为承相治过这种病，不过要开颅取瘤，这引起了奸雄的大忌，华佗因此丧命，看来这头风病确有其病了。

刘资元住院后，“头风病”日趋恶化，常常从晚上十一点至次日早上，通宵达旦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有人说，这是张锡锟的幽灵来找他了，又有人说他是为了保外就医故意装出来的，谁都说不清楚刘资元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

医院地处二道沟的最下游地段，从两个大水库放出的水，经过几十公里蜿蜒曲折的堰沟流入这里的总渠，然后再经过总渠注入甘海河，再流到小金河中。

经过二道沟流放者持续十年的艰苦劳役，医院附近的稻田，已是农场的主要稻米生产基地之一。

医院距总渠仅五十米，为了取水的方便，医院就在总渠旁边修建了一个面积 20 平方米、深为 5 米的大水井。每天清景五点钟左右，医院的炊事员便要早早起床，打着电筒到这个储水井挑水煮饭。

1976 年的春节，初五的一天早晨，刮了一夜的西北风，终于开始安静下来，挑水的炊事员打着电筒来到井边，放下水桶后，对着冻僵了的手指连连哈气。

挑水的炊事员觉得奇怪，今天医院二楼的病房静悄悄的，没有听见刘资元疯狂的痛苦呼喊。等到手指头稍稍暖和可以动弹以后，他便提着水桶砸开薄冰，向井中投去。

说来奇怪，水桶砸破了冰层后，却像搁在什么东西上面并不下沉，于是，炊事员用力将水桶按下取水，可是好像有一种软绵绵的东西托住了水桶，怎么也按不下去，待他再次的用力一提一按时，突然，水中冒出了一大堆黑糊糊的东西，在天色还没全亮的时侯，难以分辩究竟是什么东西。

于是那炊事员索性把两个桶都提了上来，从衣兜里取出电筒朝那堆东西照去，但看不清楚，好像是一件泡在水里的棉衣，他嘀咕道："谁把烂棉衣扔到这里，缺德。"

于是把电筒再移近仔细一看，不看则罢，一看周身的汗毛顿时倒竖起来，原来棉衣领口处分明是一颗人头，头发还在冰水中散开，脸面朝下。

炊事员一惊，丢了魂似的扔下扁担，拔腿向厨房狂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有人跳水啦！"

十分钟以后，两个看守医院的门卫便同他一起来到出事地点，三个人用扁担和抓勾还是无法打捞上来，后来又去医院叫了几个值班的医护人员，靠两根绳子，七手八脚把那具尸体拽了上来，此时天已大亮，捞上来的大胖脸，面朝着天，脸肿得活像一只吹胀了的死猪，一时无法辩认出究竟是谁。

各病房立刻清点人数，唯独不见了二楼四病房的刘资元。翻找他的遗物，留下的是一大堆写满字的纸：隶书、楷书、不见任何遗书之类的东西。

有人说："一定是张锡锟的冤魂夜夜与他争理，最后把他引到这里结束了生命"。有的说："一定是头痛得无法忍耐，想到这个自我解脱的办法"。还有的说"这是天老爷的惩罚，天理难容啊"。正因为他不可饶恕的罪恶，上帝在把他打入地狱前，活活地用头疼来折磨他，使他也体验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

一个罪恶的灵魂，就这样丢下了这具丑陋的躯壳，下到地狱中去了，同病房的人再也不会被他彻夜的大呼小叫吵得无法入睡了，没有人同情他，也不知他的家在那里，不知当局是否派人通知了他的家属。

当天便将他草草埋了，仍葬在六队的五号梁子上，那儿是奴隶们的"公墓"。

（三）黄学全

在出卖张锡锟的四名"犹大"当中，要数黄学全在何庆云心中的印象最坏，那是因为他累次的逃跑，创下了农六队逃跑的最高记录，也成了全农场的最高记录。

黄学全每次外逃，何庆云都要到场部管教科登记。在申请追捕组的追捕令时，何庆云照例会受到场部管教科的批评，最少也要受到埋怨："你是怎么搞的嘛，你也太大意了，抓回来才几天，怎么又跑了？"

1976 年，当黄母获悉黄学全有立功表现，六队正在整理他的材料，一种炽热的希望使她欣喜若狂。她向所有的亲戚拉债，在那种副食品靠票证供应的年头，通过走后门拉关系，弄出很多的高级饼子、炒面、猪油，每月装在大桶里，给她的宝贝儿子寄来。

六队的流放者，看到黄学全家里按月给他寄来了这么多狱中稀缺的副食，都以为他的家里是当今的哪一级权贵，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黄母砸锅卖铁倾家荡产筹集来的。黄学全本人未必清楚在这些千里寄来的东西里，藏着他母亲从身上挤出来的血和泪。

在大田组的日子里，黄学全除自己暴饮暴食尽情“享受”母亲的血汗外，还用所余的东西请人帮他完成每天的任务，以逃避挑灯夜战的惩罚。用高级饼子收买其它的劳动力，又招致了组长的妒忌，常常借口他的任务完成质量太差，给黄学全小鞋穿，难免晚上“找原因”这种逼迫，又促使他窥测逃亡的机会。

当然对这个不孝不仁的人，老天爷并没有饶恕他。

正在窥探逃亡的机会时，不知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便感到肠胃不适，奇怪的饥饿感，使他暴饮暴食，而毫无节制的饮食，使他的腹痛一天天加剧起来。

半个月以后，黄学全发现排出的粪便是黑色的。唐启荣告诉他，可能是胃出血。要他在饮食上注意节制。为确诊自己的病，黄学全专门请了假去医院检查化验。化验的结果证实是肠胃出血。

由于病理上带来的恐惧，加速了黄学全最后一次的逃亡。从医院出来的当天下午，他乘四下无人的机会，仓皇的向梅雨方向逃去，可还没有逃到梅雨时，就被唐启荣察觉，立即派人去追，结果在梅雨的山沟里截住了他，只见那时他正蹲在地上，胃疼使他脸上沁出了豆粒般的汗珠，脸色惨白。

带回六队后，终于倒床，他日夜打定主意的逃亡计划被迫中止。

然而全组的人却纷纷议论，说他纯粹是自已饮食无度，家里寄来的东西太多，造成他死吃烂胀的结果。

徐世奎也公开指责他，还将家里寄来的营养品扣下，不再发给他。平时看不惯他的同组人，无不火上加油，代朝谋摆出自己的威风，还催促着已经倒床不起的黄学全出工。

那时，按队部规定，凡是未被医院收住的人，一律要出工。黄学全真的被代朝谋押到了工地上，听任同组人冷言冷语的讥讽，然而不出几天，黄学全在工地上开始吐血。

那是 1976 年夏天，距刘资元在医院自杀刚好半年，唐启荣因此把他送进了医院。

这一次，医院对黄学全进行了确诊，认定他患有晚期胃癌，并预计他最多只能活一个月，医院对他开了先例，向他母亲发了病危通知书。

接到病危通知书的黄母，怀着不安的心情匆匆从成都南下，千里迢迢的奔向盐源。

无需去责备黄母为不孝儿子所付出的一切。因为伟大的母爱是人类的共性，尽管不肖子

辜负了自己的母亲，而母亲对儿子的爱，却永远是无私的。

黄母到了盐源农场医院的病床旁，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儿子。她知道癌是绝症，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是一路哭一路泪来到盐源的。出于母爱的天性，她已做了一个母亲可以做到的一切，悲痛之余，她才知道张锡锟的遇害，以及独生儿子的极不光彩行为。

原来张黄两家的母亲，素来都以姐妹相称，交往十分的亲密。

第二天，她匆匆赶到盐源县城，买了一大捆香烛纸钱，打听到埋葬张锡锟的墓地就在五号梁子上，便特别的找了一个人领路，陪同她一起来到埋葬张锡锟的坟前，默默摆开了香蜡，摆上特意选好的几个大苹果，一包花生米和一包切好的腊肉，放在准备好的三个盘子里，便开始在那坟前闭目，口中念念有词。深深鞠躬，请求张锡锟原谅她不忠不孝的独苗苗。

而今两个孩子，一个已埋在面前的土堆里，一个还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她彷佛听到两个孩子儿时嘻笑声，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大声地向着那灰色的苍穹悲嚎起来："锡锟哪，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死得冤！死得冤哪！我对不起你啊。黄儿对不起你啊，您就看在我这个孤老婆子的面子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喊着，喊着，她已经跪倒在埋葬张锡锟的土包前面。一面用她那苍老的手抚摸着那坟堆上的黄土，一面向坟包连连叩头。

天边突然响起了惊雷，狂风徒起，浓云已从四面八方的聚拢过来了。"走吧！黄妈妈，天要下雨了，再不走，就……"那带路人带着伤感，催促着这个近似疯狂的老女人离开。

老泪纵横的黄母抬起头，在带路人的牵扶下，一步一颤地离开了五号梁子。

然而，黄母不管怎么的哀求，不管怎么的表白，都已经迟了。一个星期以后，她那娇生惯养大逆不道的独生子，终于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儿子死了，黄母希望能把这个宝贝儿子的遗体运回成都，但遭到了场部的拒绝。

根据场部的规定，凡是服刑期未满的流放者死后，必须就地埋葬。无论黄母怎样苦苦哀求，当局还是在黄学全死去的第二天把他装上了一个简陋的"棺木"，由四个人抬着，送上了五号梁子，同张锡锟相隔了一个小山头埋下。

安葬的那一天，黄母跌跌撞撞来到几天前才来过的地方，上得山来，寻觅张锡锟那坟包，在她昏花的眼睛中，她惊奇看到几天前亲手摆的三个盘子和香蜡不见了。在那里，分明罢着一束刚刚从田野采来的弄得十分整齐的十样棉花！

张锡锟牺牲后仅一年，出卖他的三个犹大，相继带着罪恶去了地狱，这决不是巧合。

天地间自有一股正气潜藏，它通过惩恶扬善来显示自己的威严。

（四）王世春

出卖张锡锟的四个人中，还剩下了一个王世春。

1979 年我获平反回到重庆时，他被调往农二队，林扯高对他的“许诺”本来就是一个欺哄，一会儿说答应给他记功，一会儿说答应给他减刑。

王世春当然明白，共产党是一群连自己都要欺骗的人，更何况是对他这种“老牌”的历史反革命。他算是四个人中最早忏悔的一个。

农二队过来的人说，王世春已经在流放者中公开认错，忏悔，请求大家原谅他！并说他常常梦见张锡锟，说他等待着上苍的惩罚，原先那套哗众取宠的表演也消失了，默默地过着平淡的“囚奴”生活。

直到 1983 年，据在重庆的冯俊伯讲，他已经满头白发，背也驼了。当局给他一顶“刑满释放”的帽子回到重庆后，原想依附于三个已成了家的女儿，没想到亲生的女儿一个也不接纳他。

无奈下，便用刑满释放后领取的几千元安置费，在上清寺附近的小巷子里摆了一个书摊，以出租小人书为生，晚上就卷缩在一间只盖石棉瓦的小楼阁里，渡着他的余生。

据周围的居民讲，白天，王世春在小人书摊前，还向一群租书的大人孩子们讲述他“宝书药方”那一段故事“……嘿，用这膏药贴在小儿的肚脐眼上，叫他不哭不闹”。围观的人们报以哈哈大笑。这大概是在他的炼狱中，最值得引以自豪的故事。

但是那一段出卖张锡锟的故事，他永远也不敢再提起。

当时有市民问他：“嘿！老头，你那两下子怎么不去朝天门做点江湖郎中生意？”

大约在重庆生活了两年，王世春也感到无颜去同盐源农场里的人见面叙旧，孟平曾碰见他，并告诉他我的地址，要他来找我叙叙旧，但是他一直没敢来。

我肯定不会去找他，一来没有时间，二来不值得。直到他死，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摆书摊，只听说他死后三天，街坊邻居因多日没有见他出来摆书摊，才撞开他的小门，只见他直挺挺躺在一张破床上已死去多日了，身上只裹着一床破被盖！

第十章 “文革”尾声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治国论，是以暴力和欺骗两手为出发点的，他对黑五类、右派无缘无故的残害，正是建立在人心可以用暴力扭曲，用欺骗麻痹的，中共所谓“改造”便是交替使用暴力和欺骗两手，以达到奴役人的目的，可惜时间长了，无论当局如何玩弄手腕，丝毫没能改变我们的反抗。

文革开始后，陈力便从农六队押赴盐源县监狱隔离反省，无奈的中共准备用“处决”来镇压一切反抗力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1969年8月21日陈力终于被杀。

枪杀陈力，证明当局的“改造”政策已失败。他们无法使陈力屈服，但他们不甘心失败，想继续在我的身上捞一把，以体现他们的洗脑“改造”术。

管教科仍将我留在蔬菜组内，从事无定额的劳动，定期找我个别谈话，允许我“畅所欲言”，以体现他们的“感化教育”。抓住我同农六队其它政治犯认识差异，有意的扩大矛盾，制造隔阂。

从1968年至1974年的六年间，我没有挨过捆绑和殴打，算是体现他们改造我的“苦心”。

1968年，在文革最猖狂的年代，在我以绝食抵制对我的无理批斗殴打后，何庆云主张对我施行“高压强制为主，兼以怀柔为辅”的政策，把我当成“思想改造”的试验田。

他们期待着，那怕我在口头上认了“罪”，遵守劳改制度，讲他们所灌输的话，便是他们对政治犯“改造”的一大政绩。认为通过我能影响一大批人。

但是，我向他明确表态说：我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必要认罪，而不认罪，就谈不上“改造”，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主张是反人民、反民主、反人性的东西，怎能说服我？

每次我与何庆云正面交锋时，往往是以“改造”我开始，却以他被我反驳为结束。

1974年“火炬案件”发生，特别是他们处决张锡锟时，他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精神，给刽子手巨大的心理震撼，使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彻底失去了信心，其实改造是欺骗和奴役的代名词，奴役是靠暴力进行的。

所以，徐世奎当着全中队的面，气急败坏地说我是“只配用钉锤锤的‘核桃’”，并且公开警告我“张锡锟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打杀是狱吏们最后的最简单的手段！

“文革”九年来种种倒行逆施，证明毛泽东的欺骗已尽失人心。革命委员会频繁的人事变动，武斗的升级，各种谣言的鹊起，民间盛传的有关江山易色的谣传，乱世之末的征兆，纷纷表现出来。

预言家说毛牛山上有神人显灵，说中共天下拆开一个共字，便是二十八年。又说毛泽东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印证着他的天下只有二十八年的寿命，这是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毛泽东

已走完了他的称帝路。

第一节 变脸

在 11.8 搜查“火炬”扑空后，面对着我提出的抗议，恼羞成怒的何庆云，将我调出了蔬菜组。我明白当局将采用更强硬的措施替代“说教”。

当然，他们更希望从我身上搜出有关“火炬”的证据，可惜一无所获。处决张锡锟，更进一步证明对“顽固不化”的份子，改造必告失败。所以他们撕破了脸，想用高强度劳役，逼使就范。

我被调入大田组以后，属于劳动力最差的人，所以每到春耕和秋收，我常常是晚上坐在坝子里“找原因”的常客。

（一）报复的挨捆

1975 年夏天某日，中耕包谷时，我们在四号梁包谷地里除草施肥，天气异常闷热，在茂密的包谷林中密不透风，奴隶们挥汗如雨忙着完成规定的任务。

那天早上起来，我就感到头闷，带着一种中暑的感觉。我想自调出蔬菜组后，要加倍领受何庆云的报复，所以我没有请病假，希望熬过几小时病症自行解除，殊不知，到工地不久，便满眼金星，头昏胸闷想呕吐，眼前一片黑，我便倒在茬口上。

旁边的人忙于完成自己的任务，并没有发现我，等他们排上第二个茬口时，正好何庆云检查已经薅过的包谷，钻进包谷林里，才发现躺在地上的我。

他阴沉着脸问道：“你看所有的人都快薅完第二行了，只有你一个人躺在这里睡大觉，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我明白，他所说的老毛病就是指“耍死狗”。

从甘洛开始，我便是以“耍死狗”闻名全场，何庆云估计我从菜蔬组调出来后会“旧病复发”，他鼻子里哼着冷气，阴阳怪气地说道：“这么多年，我们苦口婆心地给你讲道理，长期等待你转变，安排你无定额的蔬菜劳动，你却不识相。看来对你还是要来硬的”。

我依然躺在那里没有理他，他见我如此藐视他，火冒三丈，踢了我几脚，便走出了包谷地。

中暑的感觉越来越严重，头昏沉沉的，感觉发高烧了。

不一会儿何庆云便带着两个士兵来“请”我了。两个士兵没有说话，将我拖出包谷地，在何庆云的授意下，将我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后将我捆了起来。

捆好后，抓住绳子，反背在他的肩上狠狠催紧。顿时，我感到骨头快散架了，呼吸急促，一阵剧痛后，那士兵还不罢休，将勒紧的我双脚凌空，整个身体旋转起来，顿时我的跨关节像撕裂了一样。

当他将我从他的肩上放到地上时，我已无法站立，从士兵的背上滑跌下来，一动不动的

睡在潮湿的地上。

收工时，我像昏死了一样，几个人抬着我进了铁监门放在六队大坝子中，松梆以后，我被人扶进了监舍，唐启荣诊断，说我跨关节脱臼。

我被弄成跨关节脱臼，只允许我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何庆云亲自命令代朝谋将我押到工地上去，“就是死也给我死到工地上”，他吼道。

蔡先禄和王文典害怕我再吃“眼前亏”，悄悄地向我说，“反正医生开了假条，你的任务是不算的，与其在监舍里继续被节外生枝的找麻烦，倒不如到工地上去休息、晒晒太阳、换换空气，总比呆在监舍里强。”

我就由他们搀扶着上了四号梁子，躺在带来的一床棕蓑衣上，无可奈何的被迫出工了。

从此以后，我就带着韧带拉伤的伤痛，每到阴雨季节，左跨关节都会隐隐作疼，有时严重得要藉手仗支撑着才能走动，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这次受刑。

（二）“特赦”

1976 年 4 月 5 日，北京城爆发了毛泽东生前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反独裁、反专制的学生运动。预示着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进入癌症晚期。

1 月 8 日周恩来去世，从广播中传出的衰乐中，已能隐隐约约听到反对中国一人独裁的呐喊声，天安门上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月五日一声惊雷，压抑民众向全世界吹响了“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昏星暗月，红日当头已显难。妲已想统赤县，自称武则天。长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在人间”的号角。

将江青公开比作妲已，毛泽东理所当然就是暴虐无比的纣王了。

为了对付两百个赤手空拳的祭扫哀师，独裁者竟出动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正规军，三千名公安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毛泽东已经感到自己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中苏两大国为争夺老大地位而剑拔弩张，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创造了条件。1972 年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一个新历史进程。

根据上海公报的有关条款，1975 年中共颁布了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特赦令，对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实行大赦。

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役摧残和公开杀戮，当年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已所剩无几。幸存下来的人，也垂垂老矣。已年届六十五岁的潘朝元，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熬过了二十多年的炼狱，在 1975 年“国庆节”前，离开了盐源农场，回到了重庆。

我的跨关节韧带受伤刚刚康复，特地利用了一个下午的空闲，赶到场部去拜望他。

我找到那里时，他们都在休息，我见他们全部睡在地铺上。五十多个被遣送人员，大部

份我都认识。其中有一半是要回重庆的。年龄最小的也五十岁了。虽然已脱下了平时褴褛的劳改服，换上了统一缝制的制服，表面上似乎精神了许多，但那强打起来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二十年炼狱的伤痕。他们所经历的岁月，早已刻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了。

他们出狱后，还能活几年？中共对他们进行长期洗脑，已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政治上的哑巴，晚景凄凉。

无产阶级专政却还要在他们身上大做“人道主义”文章，中共宣传机器像当年特赦战犯，在报纸上接连登载他们的报导和照片，掩盖他们身上炼狱留下的伤痕和血腥气。

那天下午，我同潘朝元、徐伯威、张清云会面，坐在“街心花园”的石凳上促膝谈心。原想好好畅述一番，可惜我们四人落座后，是谈十五年来的狱中苦难？还是回忆铁窗里伤心历程？风风雨雨岂是几句话所能畅述的。

若讲眼下的政局，从珍宝岛冲突到尼克松访华，将这二十年的事件窜在一起，在这里能畅谈么？何况老头子们的楞角早已被炼狱磨钝了。

于是我们只好默默对视，相对无言，静数对方额上的皱纹。

默默无言许久，我便问起回归的日程安排，潘朝元简单的追述着相别了二十多年妻儿的下落，我拿出预先准备的笔记本，请他留下重庆最先落脚的地址。

潘老告诉我回重庆以后，暂时留住在大女儿家中，还不知重庆方面的“统战部门”如何安顿他？

徐伯威则告诉我，他回成都，也暂落脚大女儿家，他的条件比潘朝元似乎好一些，成都市的参事室已向他发来了邀请函，请他写一点回忆录和孙子兵法注释之类的东西。

在潘老返回重庆后的一个月后，我就接到了他发来的第一封信。说他在距菜元坝不远的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站柜台，每月薪水 40 元。

看来中共将他们奴役了大半辈子，还要靠自已用劳动来换取极低微的报酬以飨晚年，这大概就叫共产党“改造人成为自食其力者”的结果吧！

张清云也来了信，他写得十分耐人寻味。介绍成都地区的生活水平，说小菜已是 20 分一斤，而猪肉是 300 分一斤。张清云在信中虽没有直言一路陡涨的生活费用，却把每月 40 元收入的拮据状况作了陈述，可谓曲笔通幽。

我给潘老写的回信中，只是嘱他抽空去看看我北碚蔡家场的母亲，他果然就在第二年抽空去了一趟蔡家场。

潘老是我在狱中所遇到相处最久的长辈，1960 年，我在入狱时就认识了他，1963 年初，我俩同批发配凉山的甘洛农场，一同渡过了甘洛的鬼门关，又一同从甘洛送到西昌盐源，彼此成为狱中的生死之交，他正直的品格铭刻在我的心中。

（三）苛刑

1974 年初，我们正在筹划“火炬”时，李克嘉从地震棚里越狱潜逃了，他的出逃，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身材魁梧，擅长野外生存，只要逃出去，抓捕就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六队，他一直没有脱离过严管组，这第二次逃亡，立即引起了监狱当局的重视。

出逃第二天，场部成立了陈文仲为组长的追捕小组，向西昌及四川境内发了通缉令，各公路要道、水路、桥梁都发了他的近照，设卡严查，重点捉拿。

但是半年过去了，李克嘉却没有任何消息，好像他逃出了当局布下的“天罗地网”。

这一年夏天，又发生了黄学全从小监屋顶越狱潜逃的事件。一连跑了两个要犯，六队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因为林扯高和何庆云积怨很深，互斗的结果，气出在在押奴隶身上，一度因林彪事件而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打人风潮也在六队坝子里重新掀起，黄学全不久被抓回，并根据林扯高的提议，把他从小监放到大监，以赦免他的死刑为条件，要他告密“火炬”。

75 年 12 月，出逃近两年的李克嘉，也被场部的追捕组带回了六队。

那时，正是北风凛冽、严霜覆盖的季节，我们身穿特制的棉铠甲仍冷得瑟瑟作抖。刚刚吃过早饭，便看到追捕组两个成员将李克嘉从大铁门外押了进来。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李克嘉，就像是一头被乱枪打得全身窟隆，再用铁丝捆起来的的野兽。真不知他是怎样熬过这酷刑的？在凛冽的寒风中，李克嘉赤裸的双臂几乎呈紫色，上身只披着一件大红背心，而他的手臂和肘腕被两根粗铁丝缠裹着，深深陷进了肉里，手腕上还铐着一副铁铐，膝关节部位又被粗铁丝缠锁着，脚上套着双蓝色布面胶鞋，虽没上脚镣，却比上脚镣更难开步。

这些年来，凡被捉回的“逃亡者”，照例是被“修理”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好像不用这种残酷手段，就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

李克嘉押回当天，就在“反省”圈里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寒冷的天气，使他瑟瑟发抖。

到了中午，大家收工回来后，何庆云才叫唐启荣和一个铁匠为他剪断已嵌入肉中的粗铁丝。

剪下的铁丝带着发紫的肉，每剪一段他都发出一阵痛苦的喊叫，何庆云想用这种惨不忍睹的现場，来恐吓六队的逃亡者，但我看来，这又是一份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好的控诉。

李克嘉被抓回，人们对抓捕他议论纷纷，有人说，在郑州抓捕他时，追捕的人冲进李克嘉藏身的地方，遭到了他赤手空拳的拒捕，终因寡不敌众，他被越来越多的民兵和公安制服。然后就像捆野兽一样，用铁丝捆了起来。

也有人说，李克嘉被抓到以后，在押送的路途上挣脱手铐，还打伤了押送者，再次逃掉。被当地民兵包围捉住以后，恼怒的追捕者，便不用手铐，而用铁丝把他捆了回来。

这天晚上点名集合时，正逢林扯高值班，他夹着那本深绿色的点名册，还没开始点名，就扯开嗓子喊道："你们已经看到了，顽固不化决心与人民为敌的李克嘉，现在被抓回来了。你们不是说李克嘉都已经跑了一年多了，恐怕再也抓不到他了吗？

今天，你们也亲眼看到了他的下场，谁也不要再心存侥幸，想逃脱人民的法网。李克嘉今天的下场，再次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段'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正确。六队还有人反心不死，也只有死路一条。"

林扯高挥舞拳头，神气活现，好像六队囚奴们的命运都攥在他的手心里。

听林址高眉飞色舞的训话，在文革已接近尾声时，六队接着发生张锡錕事件，现在又亲眼目睹李克嘉被弄成这样，感到刽子手已经疯狂，会不会来一次垂死前的大屠杀？大家都在思考怎样渡过这段时光？六队的气氛非常紧张。

李克嘉被关进反省室，曾风闻他将同张锡錕一道押赴刑场，准备"秋后问斩"。但过了几个月以后，1976 年 4 月初，出人意外他却从小监里放了出来，而且没有重新关进严管组中，而被编入大田二组。

当人们盘问他出逃的动机时，他拒绝回答，好奇的人们于是猜测，他有一些没人知道的隐情，北京城里暴发的"四五"运动，是不是与他有某种联系？

大约在四月底，因为天安门事件，引发了监狱当局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借五一"大检查"名义，六队进行了继 74 年 11 月 8 日大搜查以来又一次彻底搜查。主要搜查我们从报上摘抄下来的天安门诗作。

（四）四个洋芋人

盐源盛产洋芋，十几年来，我们利用"工余"时间在地里翻捡这些"加班粮"，从没人想到用它来进行艺术造型，然而李克嘉却用洋芋来造型人体。

他先用小刀将洋芋刻出了头和身子，再雕出眼睛、鼻子、面颊、嘴和耳朵，还用了彩笔勾画了眉毛和头发。在身上画上彩色的衣服，最后将洋芋人的下端切平，四个小巧玲珑栩栩如生的人体艺术雕塑，被他摆到他的木箱子上。

更为奇特的是，四个洋芋人中的一个，画上了齐肩的长发。三男一女四个洋芋娃，摆在李克嘉的箱子上看着李克嘉。

这一年，"5.1"大检查时，检查人命令李克嘉抬出木箱，他按照检查人指定的地点，将木箱连同四个洋芋人，一起搬了出来，放在检查人的面前。

四个洋芋雕塑人像，一下子吸引了林扯高的注意力。林扯高瞪大了眼睛，直接走到李克嘉的位置上，站在四个洋芋人面前仔细端详审视，然后指着四个洋芋人，一脸严肃地责问李克

嘉：

“这是什么？”

“洋芋”李克嘉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我是问你，你把四个洋芋做成了什么？”林扯高厉声的呵斥着。既不愿意当众点穿哑迷，也不想在李克嘉面前示弱。

“人体造型”李克嘉很随便的态度被林扯高理解成对他的渺视，在林扯高看来，四个洋芋娃，是一起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四个洋芋娃，正好击中了林扯高心中的鬼胎。

这些年来，经历了狱中文字狱的长期迫害，知道当局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动不动对囚奴一顿毒打。

三年前的徐世均，就因用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包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不过，李克嘉没有丝毫惊慌，反而嘲弄了对方，使林扯高十分狼狈。

“你别装蒜，李克嘉，你是大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臭知识份子，向来喜欢用暗语、影射之类的手法散布你们的反动观点。你今天必须向我交待清楚，这四个洋芋人你指的是谁？你雕这四个小人的目的是什么？”林扯高直点正题，逼问李克嘉。

李克嘉依然平静的回答道：“我可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好玩，闲着没事，随便雕雕，怎么？犯了那条法？”语气里显出明显的讽刺。

林扯高的火气上升：“混蛋，我这是在问你！你做的四个人究竟是影射的谁？别给我装蒜。今天不交待清楚，有你的好果子吃”。

两个人的对话看似玄虚，当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和分裂，到了文革晚期，毛泽东已无力继续控制局势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巫蛊之术。民间对于奈何不得的敌人和仇家，往往请来巫师，仿造对方的形象，扎成一个草人或布娃娃，并在草人或布娃娃的身上写上仇人的名字及生庚年月，然后施以“法术”，用咒语，火烧，溺水、针刺等方法来诅咒仇家。据说如此作法，可以使之心神不宁，或发狂生病，甚至于遭到横祸。

巫蛊之术传播很广，我只是听到过这方面的故事和传说，并没在生活中看到这种把戏真见效，小时候看到小伙伴玩过这种游戏：扎了一个小布人，说是某个欺负过他的人，然后用手比作枪，对准小布人，嘴里发出叭叭叭的枪声。

共产党执政以来，严厉取缔了宗教和民间信仰。巫师道长的咒语和法术早已绝迹。怎么到了今天，林扯高会把李克嘉的洋芋人当成了巫蛊之术，相信这李克嘉在监房中作法，来发泄对当今的不满？

林扯高平时一惯疯疯扯扯，六队流放者确实没把他放在眼里，但张锡锟一案以后，却给我们上了一课。断不可小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照样能用毛泽东那套整人方法，把我们送

上断头台。

此刻，林扯高看着四个洋芋人，脸上露出一股阴森森的杀气。李克嘉已经感到了一场杀身之祸正在向他逼来，所以沉默不语，静静地观察。

“李克嘉你说说，不多不少，你只做了四个洋芋人。又不多不少，只有一个女人。你别装糊涂，你究竟藉此来影射谁，咒骂谁？你是聪明人，你知道，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算是自由公民，弄得不好也要杀头的，何况你是个犯人？”

林扯高几乎将四个洋芋人的性质点穿了。院坝里的人们，即使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也被他点醒了，便将眼光一起扫射了过来。

制作这四个洋芋人，纯粹出于李克嘉的艺术欣赏？还是另有所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经林扯高这么一“认定”，只消将“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罪名按在李克嘉的头上，那么李克嘉的生死簿，就攥在林扯高的手里了。

此刻的李克嘉已完全明白，他的四个小洋芋人，已把他推向了“绝境”。

李克嘉被再次关进了小监，而且情况比上次从郑州抓回来严重得多，除了套上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外，还加上手铐。

四个小洋芋人被当成了“罪证”，被林扯高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特制公文箱里。随即，比张锡琨更残酷的刑讯加到他的头上。李克嘉无意中，成了林扯高往上爬的踮脚石。

然而，李克嘉在小监关了五个月后，便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政治气候陡然骤变，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因此获得了提前释放。

（五）特大喜讯

就在紧张追捕刘顺森等三人的同时，9 月 9 日下午，我正在猪圈里淘猪粪，突然听到场部的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共把这首词曲当成丧歌。每当中央广播电台里反复播送这首丧歌，人们便知道中共的某位要人一命呜呼了。

由于连日广播都有毛泽东健康情况的公告，我猜想这哀乐便是宣告毛魔命归黄泉了。正挑着猪粪向场部方向走去，却被兴冲冲的陈孝虞叫住。

走近以后，陈孝虞附着我的耳朵告诉我：“特大的喜讯，老头子驾崩了！”因为特别的兴奋，两人紧紧拥抱，我情不自禁的满脸热泪。

我俩放下手中的工具和粪桶，快步向六队正面那个小山头上跑去，想在那里听听从广播里传来的更多消息，然而那高音喇叭里除了一遍一遍播送的《蝶恋花》，便是冗长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讣告，此外，就听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

我首先想到毛泽东归天，象征他的专制皇权结束了，我相信，天怒人怨的毛家皇朝解体，比之历史上任何暴政来得更快。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欠血债，仅他提出大跃进的三年中饿死的人，（由于中共有意涂抹严密封锁，至今没有一个精确数据），仅四川一省，后来廖伯康说至少 1300 万。和平年代饿殍遍地，冤狱国中，白骨成山！

同时疯狂地扩军备战，畸形发展核武器，想把中国带进万劫不复的核战大灾难中！至于说到他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工农业生产等等领域的蹂躏破坏，用“馨竹难书”都难以概括。

毛泽东独裁解体后，是出现一个新的专制主义政权呢？还是顺应世界潮流进入一个民主时代？这虽难以预见，但可以肯定，魔王挖空心思为保住其专制帝国永不变色的梦想，以文革彻底失败作了绝笔。

现在，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这场空前大灾难，已载入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不过，他在廿八年的经营中，所建立的专制制度，机构盘根错节，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独裁并不就此结束，中国社会还要经过一个长期痛苦的改造时期，才能从专制深渊中走出来。

我还估计，毛泽东归天，一段时间因争夺权力，难免亲毛嫡系与“走资派”的火并，一时虽然难预计这场火并的结局。但在世界民主大潮流冲击下，东方专制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已经不远，最起码地说，无论他们打什么旗号，皇帝已经不能再登上历史舞台了。甚至终生任职这种人类历史最落后的政治制度，也要在中国消失了。

那天晚上，何庆云臂戴黑纱，扎着小白花，组织六队的全体囚徒坐在坝子里，喇叭里广播喇叭一再回放这一“特大喜讯”。农六队所有囚奴，心里压抑喜悦相互传递着，悄声议论。

在中共这辆专制列车上，刘少奇被弄死了，林彪叛逃身亡，江青无驾驶大局的能力，最后毛死前匆匆忙忙拉了一个华国峰，给他定下了“按既定方针办”而闭上了眼睛，他这种做法又能延续多久呢？

毛泽东灵堂里鬼气弥漫。看得出前去吊唁的人们，各怀鬼胎，都在磨刀霍霍，双方在身后藏着一把利刃，企图一剑击倒对方，夺取政权一剑再定乾坤，结束这场权力争夺的恶战？

第二天，与队部办公室相隔的那垛墙上，何庆云将老魔头的三尺像框挂在上面。算是临时布置的“灵堂”。

八点多钟，何庆云宣布全队不出工，将全队人员列队集合，参加“向毛泽东遗体告别”的追掉大会。队列拉开，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公尺的间隔，他宣布，开会期间不准任何人交头接耳和喧哗，专等广播喇叭里传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的那一刻。

主持仪式的华国锋宣布告别仪式开始，广播喇叭里一片肃穆，三鞠躬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嘤嘤的哭声。

而在农六队的坝子里，却传出了一片清脆的耳光声。这是农六队的囚禁者在刺刀逼迫下，发生的一场“送瘟神”最后一次“悔罪仪式”。队列深处，传来了一声声诅咒。

“你在念什么”？一个兽兵，一面朝那些不愿低头的脑后勺上劈着响亮的耳光，一面追问从队列中发出的声音，但是谁也没有吭声。

站在前面位置上的邓自新回过头去的时候，立即被卫兵走过去抓住：“你看什么？”邓自新回答道：“舒展一下颈子，已经受不啦。”那名卫兵无法反驳，却朝着邓自新劈下一掌。邓自新立刻反抗起来：“我犯了什么法？那有在追掉会上还打人的？”然而卫兵并不回答他，又是重重的劈下一掌。

我昂着头站在那里，结果我的颈项上也被重重的劈了一掌，队列虽然还维持着原来的队形，却激起阵阵喧哗，庄严肃穆的气氛一扫而光。

只有何庆云端立在队列前方，如丧考妣，对身边发生的骚动喧哗装做没有察觉，只是呆立垂头，三鞠躬做得虔诚恭敬。

魔头升天了，经过魔头几十年的经营，此刻虽已没有任何公开反对他的势力。但此时此刻，统治者在更疯狂的争夺权力，会对反抗者施以更残酷更疯狂的镇压。灾难也许将延续一段时间。

毛魔头归天的时候，正值刘顺森从农六队越狱的四天之后，重庆市的警备区接到了盐源发过来关于刘顺森出逃的通辑令，文革中，接到这类“边关”发来的紧急通辑令，负责捕捉逃犯的人都禁不住要骂娘，骂那些劳改官员都是一群饭桶，拿了国家俸禄，连几个赤手空拳的犯人都看不住，还要别人去擦屁股。

其实，盐源监狱方自己都弄不清楚刘顺森、孟平、杨汉群三人的准确出逃路线和目标。

近一年来，四川省劳改厅所属的各监狱，发给重庆地区要求协助拘捕归案的案子有增无减，当时，仅盐源农场管教科的挡案柜里，就摆着几十个没有归案的逃犯档案，这种现象似乎更说明了政治气候的变化，酝酿着某种动荡。

就在毛魔头归天这个时候，刘顺森三人正坐在一辆从雅安开往成都的班车上。

第二节 疯狂的油库湾

1976 年 9 月，909 狱方正驱使二道沟的奴隶集中在油库湾，召开一个“奋战一百天、改造油库湾”的誓师动员大会。

油库湾因盐源农牧场油库所在地而得名，站在它最高处，向西俯瞰可以看到小金河从盐源县城外缓缓流过，回过身来，一条长 500 多米，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就叫油库弯，它是一条顶部平均宽度大约 50 米，而它的底部则被冲刷成宽度 100 米的山沟。

（一）监狱学“大寨”

所谓改造油库湾，就是把这条因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用流放者肩挑背磨填成一湾梯田，并在这湾梯田一侧的山腰上，修出一条宽八公尺的公路，成为由盐源农牧场进入盐源县的通道，设计者把它描绘得十分壮观。

根据测算，整个工程的土石方量大约一百万方。如此浩大的工程，要求集中在这里的 1000 名囚奴一百天内完成，这就是说，每人每天要完成十立方的挖土和搬运的工作，当时挖方的定额是两立方，就是要求现今上油库弯的囚奴完成正常情况的五倍工作。

平时喜欢画漫画的陈容康，在地上用石头作笔，画了一个天平。天平一头吊着一个瘦骨嶙峋的流放者，手上端着一灌三两的包谷巴，另一头是一座大山，大山将人高高举起，悬在天空中，无法下来……

毛泽东晚年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想掩盖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惨败，然而他是用新的罪恶来掩盖先前的恶果。他把全国大饥荒归罪于老天后，想出驱使农民，劳命伤财的改土改田，美其名曰“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大寨精神”。

中共农村的基层组织，以每年完成改田改土的工作量作为政绩考核，年复一年，原来土地表层的沃土，被“大寨田”埋入地下，形成贫脊的瘦土，加上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积极性完全丧失，土地歉收日益加剧。

而每年在这些农田建设的大军中，也不知多少农民，累死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而压在农村最底层的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更是受害最惨烈的群体。

老魔头升天后，阴魂不散，继续残害人民，下层官僚继续奉行不顾劳动者死活的大寨精神，油库弯的改造便是其中一例。

经过十年文革，农六队反抗迫害的力量遭受了残酷摧残，像陈力、张锡锟等优秀份子，纷纷惨遭杀害。其它的人，像邓自新、陈蓉康、陈孝虞、赖开明、王文典等，经过长期的黑审、斗争、绳捆、镣铐、殴打的折磨，磨钝了棱角和锋芒。

油库弯改造工程打响后，我们在枪杆子押送下，在油库湾工地上，再次承受暴政的蹂躏。

工程的第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我们便肩扛工具，推着板板车，向工地进发。

进入工地，藉着灯光，我看到：两面是黑压压的山头，入口处，就像是一扇进入地狱的大门。

工地上还亮着电灯，高音喇叭里“东风压倒西风”的狂叫，向我们压来，好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疯狂的大跃进，麻木而无所谓。

广播里播放着“鸟儿问答”，陈容康走到我面前，低声向我问道：“这首词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发表的？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摇摇头。对着这地狱的入口打着寒颤，天气特别冷。

不一会，徐世奎来了，冯俊伯紧跟在他的后面，两个人用皮尺在荒山坡上比划了一番以后，便在要挖地方划出了第一根石灰线。接着，徐世奎站在土坡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油库弯工程正式开工，今后，由冯俊伯负责把每天要完成的作业线划出来，必须完成才能收工。冯俊伯所耽误时间算半个工。”听到他这一命令，所有的流放者都搭拉着脑袋。

“画地为牢”，邓自新嘀咕道。

大家心中明白，这是一条在当天绝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线”。就为这条线，可以牺牲工地上苦役犯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为这条线，可以抽干他们的血汗；为这条线，还不知道谁会被埋骨于黑幽幽山沟中，毛泽东最得意的军事化管理，再次搬到苦役犯身上，任务像军令一样，以不可违抗的形式，压迫着每一个人。

陈蓉康还在兴味浓烈地吟诵着那首诗：“炮火连天，弹痕遍野。”他背诵着：“怎么得了，啊呀我要飞跃……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读着读着，突然骂道：“这也叫诗么？流氓！流氓诗”他叹着气，愤愤然对着广播声传来的地方呸着口水。

黄占帮推了他一把：“干活吧！什么天地翻覆，现在是泥土翻飞，要你腿杆跑断，筋骨压弯，汗水流完，那才叫放屁。别听了，干活吧。”

陈蓉康拿起了畚箕和锄头，开始上起土来。

“唉：中国人真可怜，霸王在城头上饮酒作乐，奴隶们在阵前拼力厮杀。什么天地翻覆，外国人哪里晓得，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过土豆红烧牛肉了。”他一面发出低沉的叹息，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呻吟。

奴隶毕竟还是奴隶，尽管意识到必需反抗压迫，但是十几年的挨斗挨打和折磨，磨掉了我们中青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变成了驯服的劳动机器。

改田改土是我们每到冬天都要从事的苦役，它的工序极为简单：挖土，上土和运土。按照实作经验，运输距离在二十米以内，一个人挖土，可以供应三个人上土和一个人推车，每个作业组大致由五人组成。

现在为了不让任何人闲着，五人作业小组，就配备两台板板车。

推车人将满载的车推出去倒掉同时，还停着一辆空车供人继续上土，等第二车中的土上满了，推土手刚好将空车拉回来，再将已装满土的车推出去，满负荷运转没有停歇的时间!!

照这种安排，平均每人每天可完成的最高土方量不会超过三方。而面前的那道白线，是按照每人十二方土的工作量划出来的，纵然将劳动时间延长一倍，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四天工作量迈过这条线。

然而，奴隶们依然埋着头，默默的干活，推车的把装满泥土的重车推出去倒掉后，就赶紧把空车拉回来，利用下一车还没有装满的机会，才可以喘上一口气，上土的则利用装好了一车泥土以后，空车还没有拉回来，或者挖土供不上时，才可歇一口气。

无论是那一个环节落后了，就会马上听到站在高处的徐世奎喝骂声。

他的喝骂声像一条皮鞭，一下—下的抽打在我们身上。这大概就是长年累月习以为常的规距，就像耕田的牛，驾辕的马，在皮鞭抽打下，每每因惊恐而无奈前进一样。

随着时间一刻刻过去，挖土的茬口在一点点推进，而推土手推出倒在沟谷的红土，一寸一寸的向沟中延伸，倒出去的红土被车轮辗压着，变成了一条条渐渐伸长的带子。

早上起来，无论天气有多冷，只要开工，不出五分钟，就要脱下披在身上的棉“铠甲”，光着身子迎着寒风，挥汗如雨。汗水滴在那一条条被车轮辗出的带上，泛着红光。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寒霜融化，西北风却从山坡的高处刮下来，乱风常常把泥沙括进我们的眼中，使我们睁不开眼睛。

好在眼睛有一种排泥沙的能力，剧痛一阵，挤出黄色的眼泪，可以恢复视力，实在不行，用衣服揩一下，继续赶，否则，自己工作的茬口拉在后面，徐世奎又会站在高处叫骂了。

“催命鬼!”黄占邦朝着徐世奎站的地方恨恨地说，一面帮杨家模搬开被泥沙糊住的眼睛，猛吹他紧闭的泪眼。

“换一下吧!”推土手把空车推回来，喘着粗气喊道。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一边甩着酸痛的膀子。

“亏你说得出来，杨厚模眼睛都要瞎了，你还换他去推土”？黄占邦打抱不平的喊道。

“那么你试试，这千斤的重车谁能推上一整天？”胡亚东涨红了脸，不停的甩着膀子。看样子他真的吃不消了，他快已五十岁的人了，入狱已十几年，大跃进年代，他还只有三十出头，大跃进的折磨夺走了他的壮年。

陈明九接过他手上的车把喊道：“条条蛇都咬人，谁叫你滚到这个烂泥坑里来呢。”说着摇摇晃晃将满满一车泥巴推了出去，胡亚东不敢怠慢，拿起锄头上土，蹲在一旁的杨厚模一边还在流泪，一边站起身来继续上土……

紧张的劳动，使人忘记了时间，早上吃的半罐包谷粑早已化成了屎，进大肠了。但汗水流多了，反让人不感到饥饿，过度的体力消耗，使人全身乏力，体力不支，上泥时，因端不上车，而洒落在地上；推土时，推着推着就眼睛发黑。

苦役犯大量出汗，而又缺乏盐水补充，稍一停歇，冷风一吹，就伤风感冒，六队的工地上，第一天就有十几个人得了感冒，头痛耳鸣，但谁也不敢歇息片刻。

中午时分，彭文学驾着马车，把午饭和水送到了工地上，奴隶们歇下来，用自己的破衣服擦了擦满是泥土的手和满身的汗水，便向马车围了过去，每个人手上端着饭盅，围着马车上卸下来的水桶，一大盅水下肚，汗水便如注逼了出来。

整整一上午的超强劳动，胃酸大量消耗掉，胃口极差，拿着罐罐饭，对着它发呆。今天罐罐饭比起以往增加了一截，菜也是平时一周才能吃到的炒洋芋片，算是对劳动者拼命的一点回报，然而可恶的西北风，恶作剧地把泥沙刮进灌灌中，彷佛催促囚奴们快吃。

吃过饭还不到十分钟，山坡上值班的老管就催大家动工，他们坐在荒坡上面，不像往常那样有哨棚可以躲避风沙，便想早点收工。

代朝谋爬上山坡，看了看一上午的“战绩”，一上午的拼命，荏口只前进到全天任务的十分之一，于是向站在荏口前的人吼道，“队部是下了决心的，今天划的白线不挖完，是绝不会收工的，下午不抓紧完成，就只好在工地上睡觉了”。人们都瞪着他。

“反正就这么一把老骨头了，充其量就丢在这深山沟里算了。”蔡先碌喃喃地嘀咕着。

高原的深秋，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早上八点钟，太阳才从毛牛山口露出脸来，照着这片红土地，照着这群又黑又瘦的苦役犯，为他们那过渡劳累而叹息，除了徐世奎的叱骂，没有人安慰他们。

单调的镐头挖土声与车轮前进的声音混在一起，劳累至极的人们，挨到下午七点钟，太阳悄悄跌进了西山坡后面休息去了，但工地上的囚奴还在灯光下挥汗如雨。

彭文学赶着马车把晚饭送上工地的时候，星星已悄悄的爬上了天空。大跃进的噩梦整整过去十八年了，它那不眠之夜又复活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劳累了一整天的奴隶，早已困乏不堪。很想就地倒在泥土上，闭上疲倦的眼睛。但不远处发出了一阵粗暴的催促声，当兵的已换了执勤的人，新值班的老管，正摧促想闭上眼睛的人。

十几年来，农场的房屋，道路，农田，水库，都是我们亲手创造，可是暴戾成性的狱吏们，丝毫也不会爱惜这些创造财富的奴隶，他们对我们使用的语言从来就是绳索和棍棒。在暴戾成性的狱吏摧残下，奴隶们大量死亡。然而这一切，被捂得严严实实，不为世人所知，这样的苦役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像人一样生活？

开工第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从早晨到深夜，不停地叫嚷着：“不须放屁”。幸运的是，今晚随着喇叭安静下来后，工地上的电灯跟着熄灭，工地上一片漆黑，这真是老天救人于危难，在土地上的各中队，被迫收工回营。六队也不例外，我们在漆黑里摸着收拾好工具，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黑洞洞的监房。

第一天，我们从早上六点干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整整十九个小时。留给我们睡觉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就这样干，徐世奎宣布，我们“欠下”三分二的任务没有完成。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当疲倦已极的奴隶们还在酣睡中，广播喇叭又叽哩哇啦吼叫起来。睁开惺忪睡眼的人们，又在枪杆子押送下，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工地，耳朵里塞着“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的吼声。

陈蓉康在我后面骂道：“人都快要死了，还喊给谁听？”

从此以后，工地上那条催命的白线，一天天往山坡上爬。中间的沟被填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深。挖土的荏口也一天天在升高……

（二）神仙土下

挖土也改变了方法：在荏口下方挖空一条槽，使荏口上几十吨的泥土虚悬在凹槽上，再在虚悬的泥块上面，将钢钎插进放土的缝里，用力一撬，使整块土方垮塌下来。

这种取土方法被称为“神仙土”，比之一锄一锄的挖就快多了，但是因为泥层的松紧度不一样，掌握得不好，基脚槽口挖过了头，泥土还没等到钢钎撬动它，便自动垮塌下来，伤及下面没有防备的人。

有些土质较硬的神仙土，基脚挖好以后，无论钢钎怎么撬动，那空悬的土方却老放不下来，使急于抢任务的人们在下面干着急。

然而这种带有人身伤亡危险的挖土方法，却是囚奴们采用的最常用方法。皮鞭下的高额任务，使奴隶们无法顾及自身的安全！

随着茬口一米一米向前推进，茬口高度也一点点升高，一个工段经过两周挖土，茬口的高度都会在两米高程左右。从旁边去看，要放的泥土便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妖怪，张开血盆大口，好像随时都要将脚下的奴隶吞进肚子里去。

当神仙土快要垮下前，它会移动自己几吨重的身躯，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挖土手就凭藉自己的经验和特别敏感的耳朵，捕捉到这种“神仙”发出的信号，向它下面上土和拉车的人报警，大喝一声“来了”。

所有在危险区里的人，凭着这一喊声，便立刻向四方弹射出去。紧接着一声闷响，几十吨泥土，卷着强大的气浪垮塌下来，扬起巨大的烟尘。

神仙土下面的奴隶们，若发觉垮塌的时间过迟，或风声破坏了“神仙”发出的危险信号，或听到的信号太弱，都会造成悲剧。

偏偏每天上午一过十点，强劲的西北风呼啸而来，好像是专门为那神仙打掩护似的。每次狂风大作时，挖土的人什么也听不见，就只好凭经验和直觉来判断。往往神仙借狂风的掩护，施展着它的神威。

工地上因放神仙土而伤人的悲剧，像魔鬼一样缠绕着大家。尤其是那些本身就体弱，过于劳累的人。

蔡先禄，这位身材瘦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小老头，一位厚道和善却又显得有些迂腐的中学教员，常常固执地与人争辩，他却是大家公认的善良好人。

在油库湾的工地上，看他推着平板车运土，一车满载的泥土超过他体重十倍，堆过了他的头顶。从旁看，与其说他在推车，不如说他用瘦弱的身体在同它拼命。

每一车的启动，他都要把脖颈伸得特别长，胀得通红的脸上青筋暴突。他已把最后气力使出来了，可那千斤重车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想走，到了这个程度，旁边上土的人都会帮他推一把。车子启动后，见他摇晃着全身，踉跄前进。

不知哪一股力量支撑着他，他一车又一车的堆土，每天要把近百吨的泥土推出去倒掉。工地上经常可以听见他低沉的哼唱：“我们折断腰，儿孙筋骨瘦”！当年杨白劳所唱的悲歌，而今出自他口，伴以他低沉浑厚的男低音，变得很凄怆悲凉，听了让人想哭。

“蔡总统的歌声太悲了！别再唱这老掉牙的歌了，换一曲吧。”陈蓉康非议道。

蔡先禄并没有理他，继续的吟唱这两句歌辞。寒冷的空气中他的牙在咯咯作响，喘着粗气，但歌声没有停。

“样板戏不嫌老，唱样板戏！蔡老师”。邓自新在邻近组里向这边喊道。

蔡先禄瞪了他一眼：“要么你唱来听听!”

“好的!”邓自新回应道：“你们可听好了，这几天广播在喊什么？听清楚了：‘久有帝王志，重上万岁堂！千里来寻旧窝窝，皇宫变了样。到处警卫密探，还有刺刀守卫’，你们听清楚了没有？”邓眼镜来劲了。

他用的喜儿的曲调，唱起来别有风味。工地上顿时活跃了起来。“莺歌燕舞，莺歌燕舞，你们看黄占邦才叫莺歌燕舞呢”。

经邓自新一指，大家抬眼看到站在高高的坎上放土的黄占邦。他身上那件棉铠甲，早已撕成了无数的碎片，在大风中飘扬飞舞着。

上油库湾工地以来，每天二十小时的劳役，哪有时间对破损的万疤衣进行缝补？每人身上穿的棉铠甲，都变成了几十条的巾巾挂在身上，被大风一吹，就成了四处飞扬开的乱毛，这装束，人们相互看惯了，倒也不觉奇怪。但陌生人看到，必然心惊：一个个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陈容康苦笑一声，长声悠悠地跟着那广播员的声音唱道：“好一个换了人间，好一派莺歌燕舞”。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工地，锤击声、挖土声，已经淹埋了这广播传过来的“歌声”。这些衣衫破烂筋疲力尽的奴隶，确实是毛泽东统治下“到处莺歌燕舞”的生动写照。

“不需放屁，啊呀！我要飞跃!”刚刚把车拉回来的蔡先禄，朝着广播喇叭的方向唾了一口吐沫骂道：“什么狗屁诗，广播员还一本正经的朗读这下三烂的东西，不感到羞耻！？”

“唉！你可别小看哪！‘先上九天揽星星，再回河里捉王八’，这可是你想都想不出来的绝句!”邓自新又向蔡先禄喊道。

蔡先禄原来是国文教员，他听邓自新添上这么一句，界面道：“对，让我想想，该怎么改，明天上工地来，读给你们听，怎么样？”

“你别唱‘儿孙筋骨瘦’了，别老是苦自己，改一首唱唱吧!”邓自新在隔壁工段喊道。

流放者讨论广播里传来的毛诗新作时，忘却了旷日的疲劳。就在他们的注意力被广播里传来故作呻吟的“诗歌”所分散时，死神却已悄悄地站到那神仙土坎上了。

当蔡先禄口里唱着：“哎呀：我要飞跃……不需放屁”，一面运足了气力双手抬起那满载泥土的板板车，弓身向前启动时，突然站在高处的黄占邦惊慌地喊道：“来了”！大家还来不及

抬头，只觉一股阴风从山坡上疾扑下来，足有三米多高的神仙土像一堵建筑物崩塌，一堆很大的泥土夹着呼啸声，扑了下来。大家立即向四面空地飞弹开去。

蔡先禄却夹在平板车两车把手之间，躲闪不及，随着一声巨响，倒下的泥石流重重地压在平板车上，压断了车把，压在他瘦弱的身躯上。

整个的现场，像中了一颗开花炮弹，烟尘四起！同蔡先禄拌嘴的邓自新，从邻近的地上失声惊呼："哎呀！老蔡遭了，快救老蔡啊。"

人们在灰尘中向平板车扑去，所有在工地的人都自动放下手中的活，围拢来拼命用手扒开压在蔡先禄身上的泥土。邓自新和黄占邦一面刨土，一边指挥赶来救援的人。

足足花了十分钟，人们才从平板车下把蔡先禄抢救出来。只见他奄奄一息，脸色铁青。抹去他脸上沾着汗水的泥浆，那心脏还在跳动，只是双目紧闭。

邓自新把蔡先禄抱在怀里，焦急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用手试着他的鼻息。

"掐他的仁中穴，作人工呼吸！"周围的人出着各种主意。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抢救中过了一会儿，蔡先禄的嘴巴开始蠕动，一股鲜血从嘴角渗了出来，接着眼珠子在紧闭的眼皮下动了一下，脉搏开始加快，鼻中也呼出一口气来。他那几分钟前的笑容，还挂在嘴角上。

唐启荣背着药包从下面的"田"里跑了上来："赶快要马车，谁跑回队部去叫？"大家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徐世奎倒背着手走了过来，他脸色冷谈无情，显得十分不耐烦，他一面吆喝着围在这里的人群："关你们什么事？还不各就各位，你们的任务就这么拖吧！"他吼叫着，人们纷纷的散开。

看到蔡先禄奄奄一息，徐世奎口里不停的嘀咕道："叫你们小心一点，你们就是不听。"把事故责任推在受伤人的身上，这就是中共下层人员对"奴隶"惯用的手段。

唐启荣找到了一架留在工地上的凉板，指挥着黄占邦，邓自新等人抬着蔡先禄向场部医院奔去。

自从上油库湾工地以来，矮小而体弱的蔡先禄，同死神擦肩而过的险事已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前两天，在他推车倒土时，因为拉不住平板车车把，他和车一同翻下足有二十米深的沟底，幸好人和车一起翻下沟底时，平板车滚落在一边，避免了重车压在他的身上，但滚下来的泥石压着他，在他身上留下数处伤痕。

当黄占邦等人七手八脚的把他从沟底拉起来时，徐世奎却在上面吼道："赶快把车拉上来，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思想开小差。"

平板车被拉了上来，徐世奎并不理会已数处受伤的蔡先禄，而是令人立即检查那辆平板车摔坏了没有，一面催促大家马上动工。

有人建议，跌伤的蔡先禄回监舍去休息一下，上点药。可是徐世奎却恶狠狠地吼道："我

不怕你们装怪相，今天完不成任务，你们就给我在工地上守一夜”。

大家早已习惯了牢头对待奴隶的冷酷，蔡先禄坐在地上，用破布擦着手上和脚上的血，他的两膝盖已经青肿，黄占邦主动接过他拉的车，示意他坐在地上歇一会儿。然而生性倔强的蔡先禄，却从地上站起来，从黄的手上夺过车把，一瘸一拐的继续推。冲着徐世奎喊道：“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自己的任务赖给大家！”

由于过度疲劳，死神随时在窥视我们，现在当我看到蔡先禄被人抬走时，走过去揪开盖在他头上的破衣服，看着他紧闭的双目和嘴角上一抹鲜血，不知是不是最后一瞥？心里怎不涌起惜别之情，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想着这些年来他的侠肝义胆。每次有人挨斗挨打受伤，都可以看到他拿出自己珍藏的白药精和药酒之类的东西，一次次为伤者送去自己的慰藉，让对方感受这难得的真情，看他一次次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切和温暖。

后来，蔡先禄虽然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但腰部成了终身残疾。

由于六队的工地上连续出现两起骨折的工伤事故，场部派驻工地总指挥在我们工地上开了一个会。徐世奎蛮横的一口咬定蔡先禄受重伤，纯属他个人的疏忽大意，立即引起了奴隶们的非议。

随着工期的推进，奴隶们工作的时间越拖越长，刚开工的一段时间，按场部规定，外线用电最迟不得超过凌晨一点钟，拉闸以后，荒沟里一片漆黑，徐世奎无可奈何的收工。

因关灯影响任务完成，第二天，徐世奎自可搪塞指挥部。完不成的任务，便上交给了路灯值班室。所以晚上熄灯时间也一再延长。

即便这样，徐世奎亲自划定的白线，从来没有完成过。

凌晨时分，疲惫不堪的奴隶们归去的时候，已是微霜初覆，北斗星也西坠在牦牛山上。到了油库湾规定完成的最后几天，奴隶们为了节约往返耽搁，干脆就在寒霜纷飞的时候，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卧，蜷缩在自己的棉铠甲下呼呼大睡，彷佛经过一场战争，这里横七坚八的躺着许多尸体……

有一天，我被红色的光带照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手里提着的车把，突然沉重了好几倍，使我无法提起来，眼皮也象吊着两只沉重的铁蛋。忽然觉得眼前火星纷飞，心里发慌，反胃呕吐，一股冷汗从背心中窜出来。两条腿怎么也不听大脑指挥，面前那条暗红色的光带彷佛升了起来，伸向远方，伸向黑暗的星空！

过了好久，我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最初感到奇怪，我怎会躺在泥土中？看着那架停在旁边的板板车，我才慢慢想起，我是昏过去了，睁开眼睛，又合了上去，我奇怪身上什么时候结下了霜。更奇怪这么冷的天，我还没有冻死？只觉得浑身疼痛，无力站起身来。

周围怎么这样安静？微微的侧头四下张望，才在晨光中辨别出与我同组的伙计们。我暗自在想，这么冷的天，这么厚的霜，该不会又有人冻死在这里？努力回忆昨天的情景，农三队

又死了一个奴隶，不清楚是冻死还是累死的。

工程进入最后收尾时期，工地上每天都有人昏倒，医院的病房已暴满。

其实如果让那些劳累死去的人，吃饱喝足美美的睡上几天，便可以自动复原的。

没有人统计，短短三个月，有几人累死在工地上。几人被砸成手脚残废，毛泽东的接班人接过“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的衣钵，随时都把这种野蛮的桎梏重新套在中国百姓的头上。

1977 年初，油库湾工程“如期完成”。当我们离开这令人咒诅的工地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种疯狂的运动？

人类社会已经建入电子时代。而中国的劳动者，还被“大寨精神”愚弄着，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拼着性命，去完成愚公移山的拓荒蠢事？这是毛泽东驾驭中共奴役百姓的一贯作风。也是一大罪过！！

工程完工的最后一天，下午六点钟，被摧残得不像人形的队伍，身穿比任何时候更巾巾挂挂的棉铠甲，肩扛劳动工具，拖着平板车，踏着隆冬时节下过的一场大雪，翻过三号梁子时，当场就昏倒了两人。他们在雪地里等待着唐启荣回六队叫来马车，将他们送去了医院，后来这两个人再也没有回到六队。

让人伤感的是，再也听不到蔡先禄和邓自新的一问一答，蔡先禄唱的“儿孙筋骨瘦，老人折断腰”彷佛还响在耳际，邓自新改编的：“久有帝王志，重上万岁堂！千里来寻旧窝窝，皇宫变了样。到处警卫密探，还有刺刀守卫。”至今没忘。

以后的几个月里，水肿病再度蔓延，我想，人是何等脆弱的动物，苛政暴行一加码，人道主义丢得无影无踪，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全成了梦呓和昏话。

后来，当农场的领导领着上级前来视察，在公路上指手划脚的吹嘘他们政绩时，却不讲这些“政绩”是奴隶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再过几年，山洪暴发，几十分钟，大水就会冲垮这些泥质田坎，连那又直又平的公路一起冲毁，重现一个荒凉的山沟！

我不知道，这样的工程有没有经过勘察？还是仅凭他们的好大喜功，来迎合一曲“莺歌燕舞”的学大寨狂想？

毛泽东年代，人民浪费在这种瞎指挥下的“建设”真是太多了！太冤了！数以亿计的民夫和像我们这样的囚奴，就为这些“宏图伟略”的实现葬身荒沟！两千两百年后，秦始皇复活了！

从油库湾撤下来后，我们关心刘顺森的下落。也许他们会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原来能打听的线索，几乎全部中断了，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很担心。

第三节 寻找光明

1969 年，毛泽东清除刘少奇的阴谋顺利结束。在四月份召集了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接班人的身份，写进了新的党章，演完了这场戏以后，毛泽东总算解除了多年的心腹大患，国内

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

但就在这一年，因珍宝岛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已剑拔弩张，毛泽东号召备战备荒，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对苏的战争准备上。

1970 年初，云南通海发生大地震，接到报告后，皇上忙令新华社会封锁消息。不但不组织抢救，还拒绝国际救援组织的人道救助，只对灾区运去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枚毛泽东的像章，可怜几十万通海同胞，连呼救声都被禁止传出，便活活地活埋于地下了。

（一）地震棚里

当时，距通海并不太远的盐源，除了感到了大地在摇动外，并不知道通海老百姓所遭受的灾难。

忙于争权夺利的中共各级官僚，只要灾难没有降临他们的头上，依然故我，对毛皇上备战备荒的指令穷于应付的各级政府，哪里还有精力组织灾后救援？

六年后，唐山被大地震夷为平地，使数十万人丧生。这一次大地震发生在北京附近，远比通海惨烈，北京受到强烈震撼，中共才如梦方醒，立即向全国地震区发布统一号令，震区城乡以竹木为骨架，草席作围墙，帆布和塑料薄膜作房顶，一窝风地搭起了“地震棚”。

地震棚顶就像纸一样，大风一吹就会掀去，无法遮风避雨，至于建立预测地震的设施，防止灾难的种种措施，那是吼给百姓听的瞎咋呼，并无实际行动。

戒备森严的监狱也不例外，只要围墙足以保证犯人不趁机越狱逃脱，盐源农场也驱使奴隶盖上了地震棚，并将我们赶进了地震棚中，将原来的监房统统上了锁。规定没有经过队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打开监房自由出入。

从此以后，所有犯人除开饭外，仍按老规距在坝子里站队集合，工余时间大多都卷缩在地震棚里。

地震棚内用一些破草席分隔成了许多“房间”。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互通的大帐棚。雨季期间，没有大风破坏，还可勉强应付，到了风季，狂风大作，整个蓬顶就像会被掀掉。

简陋的地震棚，等于将全队人员集中于一个大监房中，倒方便了大家互通信息。流放者各自将白天所获得的信息，到了晚上传送到地震棚的所有角落，每天，分散在各组的火炬成员，将收集到的情况交流后，立即传给大家。

1976 年“4.5”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两大派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在这种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形势下，监狱方面也加强了戒备，院坝里的武装执勤，由原来的一人增加为三人。院墙外的巡逻频次几乎增加了一倍。

林扯高被停职反省后，林何之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权力斗争，何庆云重新执掌了农六队的管教大权，但从盐源县传来的各种“谣言”，却使何庆云越来越担心，中共上层的分裂，使他失去了安全感。

他怀疑所依附的“当权派”，能否确保局势渡过这段动荡时期？他的内心既没有底，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在场部子弟小学当老师的老婆，几乎天天在他的耳边吹枕头风，要他在这种政局不稳时期，做事不要太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等。

当时，流传在盐源老百姓的谣言空前活跃：例如“红天已暗，白日正显”；“夜观星象，东北方紫微星为黑气所蔽”；“东方定有一异人收拾毛氏江山”；又说“当今政府犯了地煞，故地震不断，几年内必有血光之灾降落神洲，到时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表面上看，这是一些毫无根据的民间谣言，其实正反映了民间渴求毛泽东专制及早灭亡的心愿，渴求一个民主政府上台，以解人民于倒悬。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正是各种谣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时候，例如东汉末年太平道，就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濒临死亡边缘的农民，往往藉助一些宗教传说来号召和组织人民起义。

今天，处在封闭状态的大陆，与封建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民也像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相似，藉助迷信和谣言反映他们的要求。在盐源这种十分落后的地区，现在出现大量谣言就不奇怪了。

当时，正是各种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的时候，由于中共对国境外的反共活动一向戒备森严，更由于中共的反渗透措施，中国的民主运动几乎没能与境外接触。

而国内的地下组织，基本上是一些由中共内部分化出来的政治上的反毛派，他们立足于夺权以反毛泽东独裁外，并没有形成民主建国的政治纲领，但是，形势正要求国内的反独裁力量联合起来，没有统一目标、行动纲领、组织方式等，就不能反抗表面仍然十分强大的独裁势力。

六队的政治犯，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谋求向外界寻找出路。当时我们寻找的是反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地下组织。

为了分散当局和士兵的注意力，刘顺森在地震棚的中心地带摆了一张小桌子，捡了一块楠竹片当作惊堂木，开讲评书。他以在少年时代积累的丰富历史知识，用他天才的智慧和出色口才，借古讽今，那时，他讲的是姚雪艮撰写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红莲教”。

每天晚上，在刘顺森的评书桌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听众，在人群后面，还经常站着当班的巡逻士兵，这些士兵与其说受人指派来监视刘顺森，不如说被他精湛说书所吸引来听故事，听讲的人筑起的人墙，成了火炬成员交换情况，分析形势的最好掩护。

（二）逃亡

火炬成员交换了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后认为，中共独裁势力和“走资派”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四五”运动的信号表明，北京城里因权力倾轧而酿成的全面内战随时都会爆发。

在这个时候，被关押的政治犯，随时都可能遭到统治者的毒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这种情况出现前早作打算。

所以，应该有人越狱，去寻找那些处于地下、并有相当民众基础的民主组织。

根据大家收集到的情况，决定派人去重庆寻找活动频繁的“人民党”，对于这个组织，当时只是耳闻，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在狱中，我们不可能知道详细情况，一致决定，由刘顺森同熟知重庆的孟平和杨汉群一同越狱，去完成这极其危险的使命。

在这以前，农场的流放者，经历过无数次逃亡，但这些逃亡，仅抱着个人目的，而没有某种政治目标，这次是农牧场建场来，第一次为寻找地下组织的探险行动。

1970 年，蒋正君为首的那次大逃亡，就因为缺乏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估计错误，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最后，很快被破获，几十个人都成了当局无情打击的对象，当场被处决的人就有五人，留下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

火炬战士们把平时省吃俭用每月仅两块零用钱聚集起来，交给了刘顺森作为路费，大家同刘顺森商定好出逃路线，研究出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

预定逃亡前，铁匠房的沈官科和蒋真富，利用全天在铁匠房的机会，先将一个木梯子预先送进三号监房，计划借夜幕的掩护，利用恶劣的天气，来掩护出逃第一步的成功。

九月初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家正在地震棚里“读报”，蒋真富在小解时，用钢丝钳迅速下掉了三号监舍的门锁，预先藏在厕所里已整装待发的刘顺森三人立即跟出，迅速地进入三号监房。五分钟后，在厕所里的皮天明，从容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将下掉的锁重新锁上，以麻痹巡逻哨兵查哨，不致于马上发现刘顺森等出逃的痕迹。

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皮天明回到地震棚以后，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火炬战友都舒了一口气。

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藉着风雨声和夜幕的掩护，将预先放在三号房里的梯子抬到上铺去，很快架上了房顶的横梁，杨汉群第一个爬上去，利索地揭开了房顶的瓦片。

瓦片揭开，狂风卷着大雨向他头上灌压下来，三人各自扎好紧身的小包袱，顶着大雨，迅速登上了房顶，顺着瓦沟匍匐着向下方的屋檐爬去。

突然，岗哨上的探照灯打开了，强烈的光束射穿白茫茫的雨雾，从房顶慢慢地横扫过来，三人紧贴在瓦沟中，借屋顶的掩护，等探照灯光从身子上方扫过去。两分钟以后，探照灯熄灭，整个的房顶又重新淹没在雨夜之中。

三人侧耳静听，岗哨上并没有任何动静，屋檐下的围墙通道里也没有巡逻兵。便迅速地从屋檐上跃起，跳在围墙与监房间的过道上，很快找到预先埋藏在那里的铁锹，用它在墙上挖开一个洞，三个人爬出洞口，来到围墙外的那片包谷地里，在大雨中直起腰来，检查了一下随身携带的小包，互相拉了拉手，庆贺越狱计划的第一步顺利完成。

三人站在大雨中猛吸着新鲜空气，这是他们入狱来第一次站在墙外呼吸“自由”的空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再回头望了望那耸立在大雨中高高的围墙，判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立即蹿进了茂密的包谷林中。十分钟以后从这片包谷土里出来，踏着松软的泥土，走上三号梁子的弯弯梯田。

三人不敢逗留，顺着出工的机耕小道，迅速越过二号梁顶。身后隐约传来地震蓬中的嘈杂人声，判断是学习完清点人数的时候了。

他们知道，自己的“失踪”，已为留在监舍里的人掩蔽过去，放心地沿着山梁上的机耕道走去，找到平时洗手洗脚的山水凼，在那里清洗了满身的污泥，立即顺着马路直奔盐源县城，当他们看到了盐源县城的轮廓时，大雨也停上了。

三人敞开被大雨湿透的衣服，藉着下半夜吹来的凉爽晚风，吹干了衣服。又辩了辩方向，直奔预先联系好的县城郊区一家院子，天还没亮，登上卡车离开了盐源。

（三）追踪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当农六队的囚奴们从地震棚里出来时，严管二组的组长樊有才才发现刘顺森失踪。他不敢迟疑，立即去队部报告。

他明白昨晚例行查房时，还在稀里糊途报告全部到齐，仅此一点，他就负有“谎报人数，掩护外逃”的责任，经过紧张思索，向队部谎报说，刘顺森于黎明时分失踪。

正当樊有才向何庆云报告刘顺森失踪时，严管一组的冯俊伯也气急败坏的跑来报告说，他们组跑了孟平和杨汉群，说刘顺森大概是在大家都熟睡时逃走的。

但哨兵却向何庆云报告，说三号监舍房顶揭开了瓦，室内发现架在屋顶的楼梯；监狱围墙也被打了一个大洞……根据脚印判断，大约是在大雨开始时出逃的，有些脚印已被雨水冲掉……这与冯俊伯和樊有才两个奴才所报告的情况完全不同。

“火炬案”爆发后，林扯高虚张声势，企图把何庆云多年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但严密搜查后，却一无所获。结案时，已被抓住的“火炬”线索，像一把无法抓牢的短发一样滑掉了，倒使何庆云缓了一口气。

为了证明自己在六队的工作成绩，在场部，何庆云赌咒发誓，拍着胸口保证：“六队绝不可能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反革命集团’，也没有可能与社会上的任何‘反革命组织’存在过联系，张锡锟等人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写出什么‘火炬’刊物，充其量不过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在队部严密监视下，组织集团，既不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

张锡锟被处决后，六队短期相对“平稳”，“火炬”似乎随之熄灭了。

现在，何庆云听到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越狱的报告后，使他感觉问题远比估计的严重。

对火炬重大嫌疑人刘顺森突然出逃，何庆云又该怎样向场部交待呢？特别令人气恼的是，

这件事情发生前，居然没有一个人向他报告过一点迹象，当刘顺森等人跑了足足八个小时以后才跑来报告，还隐瞒了真像。

何庆云猛拍桌子，对冯俊伯和樊有才厉声训斥：“你们监督到那里去了？不但事前没有任何报告，就连逃跑初的实情也是假的，你们是不是同刘顺森串通好了，来欺骗政府？如果一旦证实你们欺骗政府，决不轻饶。”

眼下的事件证明，原以为已熄灭的“火炬”，又在六队燃烧起来了，何庆云不得不对张锡锟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正气所镇慑，叹服“火炬”的顽强。

张锡锟啊张锡锟，你一个文弱书生，你的精神和灵魂力量，竟是这样坚强！张锡锟啊张锡锟！你宁愿一人独担罪名，从容走向刑场，也不招供任何一个同伙，这太可怕了！

想到这些，何庆云不禁心惊肉跳。

这个可怕的“火炬”啊，他们不露一丝证据，证明他们比以往更成熟，更严密，逃亡前经过了周密策划，现在许多细节，突然的摆在何庆云这个老牌特工的面前，使他感到十分棘手。

三号监舍的房门是谁打开的？以后又是谁锁上的？梯子是什么时候拿进去的？又是谁拿进去的？昨夜点名是谁在点名时虚报人数？“火炬”有多少人？预先又怎么商定的？出逃的目标是什么？会不会与外界的某一组织和政治集团有联系？是怎样联系的？

一连串的问题困挠着何庆云，而他原先确实是过于自信了。

夜深了，何庆云头脑中仍然是一团乱麻，他怀着重重心事，辗转反侧。这些天来，老婆反复地向他唠叨，劝他看清形势，不要把坏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还说如果中共政局发生变化，他何庆云未必不会被清算，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丢下她和孩子怎么办？

老婆的话语虽属“妇人”之见，却触到了他的灵魂深处的隐痛，是继续追查下去？还是就此收手？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出逃的第二天，农六队出奇的平静，静得让人担心。好像大事就会出现。我们都在为刘顺森、孟平和杨汉群三人祈祷，估计他们已经在这么长时间，走出了当局布在西昌地界的第一道封锁网，如果行动顺利，一天一夜的功夫，可以到达石棉的地界了。

但在这种平静下，更需要大家警惕，并密切注视队部的反应。不仅可以从中判断刘顺森等人行动的成败，更要警惕何庆云耍花招，多年的经验证明，何庆云比林扯高狡猾得多。

晚上集合点名，何庆云拿着点名册，仍像往常一样的清点了人数，随即很平静的样子讲了话，他说：“昨天晚上的几个亡命徒，趁着雷雨的机会跑了，六队跑人已不是一次两次了，黄学全还敢在小监里掀开房顶逃跑呢？李克嘉那么厉害，最终还不是落网了。所以队部一点都不担心，用不了三两个月，短则十天半月，三个人就会伏法。”

接着，他话锋一转，口气强硬地警告道：“现在社会上有些谣言，这不足为奇，阶级斗争

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中的极少数人，不要以为一点谣言，便天下大乱了，因而跃跃欲试，刘顺森便是其中的一个，实话告诉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是永远不会垮的，像刘顺森这样敢于向铁墙上硬碰的人，到头来都要像张锡锟那样，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这一套陈词滥调，我们听得多了，早已不起作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藉以掩盖他心里的紧张而已。点完名解散以后，何庆云便把樊有才叫到了办公室。他是何庆云最近指派的严管二组组长。

现在何庆云对“火炬”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他与林扯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不得不承认，利用奴才监视“火炬”的方法是正确的。他放弃了对火炬份子采用说服教育的“陈腐”做法。

经过多年考查证明，像冯俊伯、周学祝这类人，已变得十分油滑，往往阳奉阴违，在需要时，表面上助威呐喊，而对记功减刑的空口许诺不再相信，尤其看到陈贤士等人的下场后，更趋于明哲保身，并不想把坏事做绝。于是，在何庆云的心里，已失去了利用价值。

而樊有才是一个刑期只有十年的刑事犯人，初来六队，并没有接触“火炬”，也没有什么政治观点，这样的人，盲从性极大，极容易被狱方许以小利加以利用。

此人长着一双三角吊眼，一双转动得特快的老鼠眼睛，给人一“”十五贯”中娄阿鼠的形象。就凭这种脸型，就知道此人心术不正，适合用作鹰犬，所以何庆云把樊有才当成咬住“火炬”踪迹的如意人选。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樊有才对这种地狱般的煎熬，高强度的苦役，以及半饥半饱的猪狗食，使他筋骨散架，度日如年。这种生活，才过去两年。还有漫长八年，怎么熬？

何庆云把樊有才叫进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在刘顺森逃跑的当天晚上毫无察觉？是不是把队部交给他的任务当成了耳边风？昨夜为什么没有按部队布置在地震棚集中学习？声色俱厉质问樊有才，说队部多次向他敲了警钟，说刘顺森的评书中必有名堂，要他注意刘顺森借说书搞什么活动，但是他却没有放在心里。

接着何庆云便一连串的提问：昨晚狂风大作时有那些人离开了地震棚？是去厕所解手还是干其它的事？刘顺森是什么时候了离开地震棚的？三号监房里的楼梯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三号监舍的门锁是谁预先下掉的？

樊有才本来对刘顺森这次逃跑的事一无所知，事后怀着鬼胎千方百计撒谎，掩盖清点人数时的失察。充当了刘顺森逃跑的掩护人，现在，他似乎有些后悔。

自从何庆云叫他重点监视刘顺森后，他只把注意力放在刘顺森写什么、传什么、传给那些人上面，却没有注意到刘顺森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作好了出逃准备，比如说刘顺森出逃的路线，路资的筹集，出逃的目的，可能的去向等等，樊有才实在是一无所知。

至于何庆云问到樊有才当晚二组在清点人数时，是谁在冒名答应？樊有才几乎没有丝毫察觉，并且直到他们出逃十个小时以后才发觉。

看到樊有才紧张困惑的表情，何庆云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他。

其实樊有才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自从他被何庆云委派接替陈贤士的角色以来，目睹对“张锡锟案件”告密立功的人都先后暴死，六队陡起的张锡锟英魂不散的传言，猛烈冲着他，在充当何庆云密探的几个月里，有人用“做坏事要遭报应”来警告他。虽然他向何庆云报告过，但何庆云只是好言安慰而已。

何庆云的好言安慰并不能解除樊有才的心理压力，古人云：“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苍天报应”论多少制约着他。

当天晚上，何庆云对樊有才进行一番教育后，接着就是更进一步的许诺。

在强烈诱惑的驱使下，樊有才从何庆云办公室出来以后，便陷入紧张的思索之中。

第二天中午，樊有才便去找冯俊伯。对前天夜雨前后离开地震棚的人进行逐一排查。最后定下了八个人。除了刘顺森三人在逃，还剩下五个人。当然不等于说开锁、上锁、打掩护的人一定就是这几个人。也不排除其它人的可能性。

第二天，樊有才和冯俊伯便将提供的八人黑名单，摆到何庆云的办公桌上。何庆云根据两人提供的情报，最后将重点调整为三个人。怀疑他们是给刘顺森逃亡的策应者，作为重点监视和审问的对象。

第四节 强弩之末的猖狂唤醒皮天明

从油库弯撤下来的第二个月，1977 年的春节后，有一天早上，何庆云宣布上午延后出工两个小时。

（一）刘顺森不幸捕回

等待出工的奴隶们，被叫回到各自的监舍中，眼睛盯着大监的铁门外。十点钟左右，三个戴着刑具的流放者，在四个带枪老管的押解下，在铁门前露面。

我惊得差一点喊出声来，原来三人正是我们日夜悬念的刘顺森、孟平、杨汉群。他们出现时，刘顺森走在最前面，上身穿着黑色的灯芯绒上衣，手上戴着手铐，苍白的脸上留着一路的风尘，但并没有丧气，彷佛在思考着自己的失误。

孟平和杨汉群反捆着双臂，紧跟在刘顺森的身后，他们三人从大门进来后，并没在坝子里停留，而是径直关进了对面的小监中。

从他们出逃至今，还不到半年时间。一种不祥的结局，正在向我们袭来。

在何庆云脸上，流露出一种得意的冷笑。他不像林扯高那样虚张声势，他要对付的是有“经验”的反改造老手。

当局在破获蒋正君集团案中尝到了甜头，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抓回来的三个人，以摸清出逃时的掩护者，和火炬的悬疑内情。

第三天，刘顺森便被单独送到盐源看守所，以便对这次逃亡，进行分隔审理。各个击破是他们破案惯用的绝招。

根据陈力的先例，我立即预感到刘顺森凶多吉少。

三人被抓回的当天晚上，何庆云在集合点名时，阴险的警告六队的火炬份子，他说："刘顺森的逃跑，涉及六队的一大批人，在出逃当晚为他打掩护的人就有好几个，现在这些人赶快站出来坦白交待，凡是主动交待出问题的，可以从轻发落，如果属于他人交待出来的，后果自负。"

他一边讲，一边用他鹰隼一样的眼光一扫视着大家，好像在捕捉猎物。

其实，早在刘顺森出发的第二天，何庆云便根据樊友才所提供的黑名单，一直没有放松对掩护者的追查，令他感到奇怪的是，黑名单中的人，并不是他平时最关注的火炬份子。其中相当一部份是入监不久的年青小伙子，这使他意识到，"火炬"的影响在扩大。

按照樊友才提供的情况，何庆云最终将目光收缩在三个人身上，这就是皮天明、赖开明和蒋真富，其中以皮天明为重点。

皮天明是两年前从古柏逃跑而送到这里来的年青人，根据樊友才报告的情况，有人曾看到刘顺森出逃前几天，皮天明曾将楼梯抬到熬药灶的旁边。

根据这个线索，皮天明最先受到何庆云的提审。

何庆云说："麻雀飞过都留着影子，你不要以为你做得秘密，就可以蒙混过去，你好好交待吧！"当即遭到了皮天明理直气状的否定："那梯子是大家用来晾衣服的，谁都用过它，搬来搬去，全看哪儿晾衣服合适，怎么能因为我搬过梯子，就一口咬定我参与了帮助刘顺森逃跑？"

皮天明的回答，使何庆云难以继续追究他，同时皮天明来六队才一年多，火炬的黑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谈不上是火炬的追随者，更谈不上是火炬成员。

按照何庆云的判断，干这件事的人，应当另有其人。

尽管如此，何庆云并没有否定樊友才提供的情况。他觉得六队的全体政治犯，都会成为火炬追随者，这让他感到既可怕又担心。

"火炬"果然像一个可怕的幽灵，不但没有随着张锡锟的处决而消失，反而在六队到处游荡，刘顺森虽然被抓回来了，但他外逃的目标、任务和组织关系，至今一无所获。

（二）二胡情谊

皮天明押到六队，是 1975 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那天他身穿一件花格子衬衫，衣服上沾着很多泥巴，手臂上留着两道被绳索勒过的黑印，脸上还有伤痕。

他才二十来岁。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在两弯浓黑的眉毛下，瞪着一双倔强的大眼睛里，闪烁着不甘受人侮辱的刚烈性格。看到他的样子，便联想到我自己，我也是这个年纪来到盐源

农牧场，至今已是三十九岁的中年人了。

皮天明随身携带的破烂行李上，插着一把断了一截龙头褪色的旧二胡。一身装束，很像一个走江湖的落魄艺人，脚上穿着一双旧皮鞋，前面已经裂开了口，从裂口中露出脚的大姆指。

那天值班的钟花脸，将皮天明带到严管二组的门口，并把当时的陈贤士喊出来，要陈贤士安排皮天明的铺位。没过几天，我们才知道他叫皮天明，是从林业队逃跑抓回来的“犯人”。捕前是重庆一所中学的学生。

他们的可塑性极强，当他们一旦了解世界后，就会与自己贫穷处境作对比，从不成熟开始，发展成毛泽东的坚定反抗者，场部拖拉机组的孙明权就是一个例子，皮天明又是另一个典型。

他初到六队正“火炬”案发的时侯，他亲眼目睹张锡锟案的处理经过，张锡锟视死如归的人格魅力，使他深深折服。当他受到刘顺森的影响后便开始认识社会黑暗的原因，很快成为火炬的追随者，从初入监狱时的“逃”变成“反抗”。

自我学拉二胡后，耳朵里常回荡着母亲当年演奏的《二泉映月》，而今我在铁窗下演奏它，便用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我不懂乐理，人们评及我拉的二胡说：“你在琴中哭泣”。

我深信音乐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垓下一战，汉军的竹箫楚歌，吹散数十万楚兵，可见音乐能表达语言无法表达的感情，即使在文革最疯狂的时期，连生性暴戾的士兵，听到李克嘉演奏二胡时，也会闻琴而静，没对拉琴粗暴干涉。

工余时间，他迷上了二胡。从二胡中所表达的内心独白，沟通了囚奴们的心灵。靠二胡我结识了李克嘉，后来又邂逅冷军，现在又碰到皮天明。

有一天，我正在独自调整二胡的音调，一曲“良宵”还刚刚开头，便见皮天明站在我的床头看。我停下了弓，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

他称我老师，很大方的向我请教二胡弓法。想到皮天明初到六队时他带着一把二胡，那身江湖艺人装束，理应对它了如指掌，怎么会来向我请教弓法？在六队，当二胡老师非李克嘉莫属，我哪敢被人称作“老师”？。

我连忙挪动了一下身体，请他坐下向他说：“我是初学的，拉得不好，不敢妄自为师，还请你指教”。

皮天明摇了摇头，显出他的天真，说道：“你别误会，我根本就不会拉二胡，但听到你和李克嘉的琴声，我几次都想拜你们为师，极想学会这门乐器，可是李克嘉送进小监了，所以我只能拜你为师了。”

那时因四个洋芋人，李克嘉第三次关进小监。

我好奇的反问他：“我看到你才到六队带着二胡，我以为六队又增加了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呢。”

“唉！说来话长，那是一件纪念品，我从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便一直带着它，这是一位我在中学时代铁哥们的遗物，”皮天明回答我，眼睛变得灰暗起来。接着向我讲了一段有关那把二胡的故事：

“他比我大三岁，那时，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我就是从他那里才知道‘二泉映月’的，听他演奏这首曲子，常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有一天下午，我在他的寝室里听他演奏二胡，天色渐渐黑下来，突然听得校门口人声鼎沸，来了一群与我们观点敌对的造反队员，个个手里操着大刀，我们还没看清楚他们的脸，他们就已杀奔我们的寝室来了，那时重庆武斗正在高潮中。”

“三个大汉见到我们，不由分说便朝我们俩乱砍乱杀，我俩还来不及夺门而逃，寝室的灯也熄了，黑暗中，只听到他惨叫一声，就扑在我的身上，我只觉得血从他的身上流到我的身上，听见寝室里有人在乱翻，我在他身下不敢动弹，只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都被收拾了，快走吧’！

“我在黑暗中等了几分钟，听听四下没有动静，便挪开压在我身上的哥们，黑暗中只觉得他浑身是血，已经说不出话来，摸他的鼻子，还有一点气，便赶紧摸着黑，连背带爬的把他背到了附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死了。”

“我回到学校，找到了他丢在那里的二胡，想昨晚的可怕经过，若不是他压在我的身上用生命保护了我，我恐怕也不在人间了，我拿起二胡一看，龙头被折断了，就将这把二胡留作我永生纪念品吧，便把它带回家，收藏起来。

“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下午，我们集合了更多的同学，向昨夜袭击我们的组织发起了大规模反击，我在那次反击中，怀着满腔怒火，只想替已经死去的哥们复仇，进入阵地拼刺刀，我见人就砍，自己也多处负伤，那时我才十五岁”

皮天明停顿了一会，好像还陷在往事中，“没几天，警备区清查那次血斗的凶手，我就被抓了进来，临出家门时，我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这一把沾着哥身上血迹的二胡。”

“文革”中像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把被折断龙头的二胡，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今，当我面对皮天明的请教，反而让我为难起来，弓法和指法，我是讲不出来的，想了半天，我只能用“练”来回答求教者：“凭着你的听觉，用你的心去指挥你的两手，反复修正，以求达到手和心的一致。除了‘心领神会’之外，我确实讲不出多少奥妙。”

于是皮天明回到他的监舍，取出了那“纪念品”，坐在我的对面，跟着我调好音调，紧了紧二胡的弦把，便开始拉起来。

初学二胡的人，包括我在内，最怕初拉出来的杀鸡杀鸭声遭人耻笑，所以总是把卡子取掉，依依呀呀的先拉给自己听，一面修正自己的弓法和指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哑练”，达到可以让人听的程度后，才敢将卡子安上。开始时拉弓的手极轻，发出很低的声音，绝不敢放肆，以招致闻者的非议。

然而皮天明则完全不同，一开始，便将卡子安得高高的，拉弓的手，下得极重，共鸣箱飞出的声音，就像一头公牛在昂首高叫，对别人的耻笑，甚至干涉，他全都不予理会。

我从他不怕耻笑专注而勇敢的态度，看出他极强的个性。看到他聚精会神的正襟危坐在那里，不觉暗自惊叹：一个理直气壮不护短的人，坦诚到连自己的失误都不加掩盖的程度，表明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而没有任何虚伪加以掩饰。

也正是这勇敢和专注，才是最快学好一门乐器的捷径，他说，这可是他那忘年之交的哥们生前告诉他的。但是，皮天明这种毫不加掩饰的真诚，却被鬼蜮之徒所伤害，失足于他们布下的陷井中!!

从此以后，每当奴隶们收工回来走到六队的围墙外，就可以听见皮天明十分刺耳的“杀鸡杀鸭”二胡声。但是，即便满院子充满他憋脚的琴声，总比打骂呻吟声好听得多。

看他的拉琴姿势，并不拘泥，坐累了，就跪在铺位上，凝神聚气十分虔诚，开始还有人对他的琴艺评讽讥笑，时间久了，开初讨厌他琴声的人们也渐渐听惯了，没有人对他再加嘲讽，反而还有夸奖他的琴技进步很快。

于是，我对皮天明的坦诚、勇敢、执着的性格产生了好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的内心，我常主动找他聊天拉家常，渐渐地，从他对身世的介绍中，我发现了他那双倔强的大眼睛里，包藏着一眶人间的辛酸：

他的父亲是早先银行里的一名普通职员，他出生于 1954 年，五岁就失去了生母，因为家庭贫寒，继母很不喜欢他这个前母留下来的孩子，自从继母生下弟弟后，什么家务事都要他做。

文革开始那年，皮天明才十二岁，父亲去世不久，继母带着才满四岁的弟弟，离开了家。从此他拉过板车，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后来在一次打群架中，结识了他的哥们。

文革武斗中。皮天明的哥们被打死，他奋起复仇，落入监狱。年仅十五岁的皮天明，落到以少管所为家的地步。

在大陆这个大监狱里，人们的悲剧太多，人们遗忘的事情也多，在这个人口太多的国家，像皮天明这样渺小的生命，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这些被文化大革命遗弃的渺小生命，被少管所收留，在少管所里，他饱尝了拳头和虐待，监狱像一个消化弱者的垃圾箱，消化了他们弱小的生命。

“我发誓，我要毁掉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也在所不惜。”皮天明在介绍完自己的身世后，一字一板的说道。从他那倔强的眼里，使我看到了又一个孙明权式英雄影子。

我作为“反右”的牺牲品，而皮天明则是“文革”牺牲品。虽然年龄相差整整十六岁，但仍有共同之处，黑暗的社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经过练教二胡，我们的心距离越来越贴近了。

（三）掩护

皮天明调来六队时，张锡锟刚牺牲。他十分尊敬张锡锟，听到“火炬”的前前后后，他伸出大姆指说：“无怪乎那么多人都钦佩张锡锟。他虽然死了，但死得值。他才配得上顶天立地的好汉！”

他十分崇敬刘顺森，用心听他讲解历史，很快成了他狱中的新“哥们”。这不光因为他们先后在重庆“少管所”关押过，刘顺森的正气以及他渊博的知识，让皮天明的眼界日益开阔，从而把刘顺森当成了良师益友。

刘顺森在作越狱的准备时，曾征求过皮天明的意见，因为他是在文革武斗白热化时才离开重庆，比我们离开重庆要迟得多，更加熟知文革变化以后的重庆。

皮天明在得知刘顺森将到重庆去，拿出了自己身上的十五块钱，并且表示愿意为刘顺森出逃作掩护。

出逃的那天晚上，皮天明潜入厕所中，预先下掉 3 号监舍的门锁，当三个人成功的进入 3 号监房后，又由铁工房的另一名铁匠将锁锁上。六个人配合得很顺利，使专门盯梢的樊友才，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刘顺森抓了回来，根据樊友才的告密，何庆云为缩小怀疑圈，最后锁定在皮天明身上。因此何庆云把皮天明再次叫到队部去，作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教后，随即叫樊友才立即调整皮天明和赖开明两人睡铺的位置,将皮天明的铺位调到紧靠着樊友才的位置上。

并在小组上宣布，从即日起，皮天明、赖开明两人不得单独行动。无论是上厕所，洗衣服，到医务室拿药，都必须事先通知樊友才。此外，还作了一条特殊规定，原先由全组人轮流扛全组农具的任务，从即日起由二人包干。

从此，何庆云每晚都要把樊友才叫去，听取他对两人的反应。特别强调要他搜集皮天明、赖开明两人同其它人接触的情况。何庆云还想在他们身上发现隐藏的线索！

在下班扛工具的时候，皮天明遭到了押队的枪杆子几次暴打。樊友才对他的歧视性的规定和老管们的暴力，使皮天明压抑着怒火。血气方刚的皮天明，立即作出强烈的反抗。

1977 年 4 月，以“反革命越狱集团”立案的“刘顺森专案”，上报西昌法院正式预审。西昌地区派出的专案小组，在盐源县和六队两处监狱中同时开审。

越狱集团的成员首先被定为皮天明和赖开明。何庆云想从两个年青人身上牵出更多的人。为了放长线，暂时没有把二人关进小监。

皮天明被队部传讯。当他坐在那张被审人专用的小板凳上时，他双眉紧锁，目光却炯炯有神地盯着面前的预审人员。

皮天明虽然第一次登上重案犯的坐位上，但态度冷静。

预审人员问到：“你是何时何地参与了刘顺森反革命集团逃跑计划策划的？”皮天明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道：“你们既然都早已认定了，干吗还来问我？”

两个预审人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失望地问道：“你知道在你们的逃跑计划中，本次逃往的目的地是什么吗？”沉默！

“你在这次逃跑中所分担的任务是什么？”

皮天明重复着他已经回答的话：“不知道。”

看来，靠这样的审讯一无所获，审讯者同何庆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何庆云对皮天明说：“我们对你作的交待，已算仁至义尽了。你应当明白，抗拒从严的后果。”

于是，预审的开场白又回复到政策交待第一步，在上级法院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能，使何庆云感到十分羞愧。

对于樊友才的步步相逼，皮天明开始都默默地忍受下来，他来六队时，最瞧不起这条癞皮狗。铺位调整后，他从来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同樊友才讲话，会污染自己的嘴巴。

每天下班后，皮天明照例端坐在他的床前拉二胡。他用这种表面上的若无其事，来隐藏内心的痛苦挣扎。

随着对刘顺森的审问加紧进行，樊友才对皮天明盯得更紧，也更猖狂。除了继续在劳动上对皮天明施加压力，还当着皮天明的面，幸灾乐祸说“现在刘顺森已被立案，案子马上就要水落实出，刘顺森的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谁掩护过他，少说也得摊上一个无期徒刑。现在有人不但不悔改交待，还要抗拒，大概是嫌自己的刑期短没有过瘾，真想弄个无期徒刑，守着吃一辈子牢饭吧。”

当夜深人静时，他抚着隐隐作痛的伤疤，回顾他走过的这二十六年的人生之路，好像走得太久太累，他感到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与其无端遭受着樊友才这只疯狗的撕咬，不如一拼了之。

然而没人察觉出他即将爆发的怒火！白天，他仍显得那么平静，即使在工地上挨了打，回到监舍，也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拿起他那破二胡用力的拉着，借那乐器声，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这是一场爆炸到来之前的潜伏期，他那琴声中好像是一种对于亲人的祈愿，也好像是万马奔腾般的内心在怒吼，好像牽挂着远方的亲人……每天清晨起来，他的眼里残留着泪痕。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看到他将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被痛苦深深折磨，我只能暗暗地为他感到难过。

（四）怒劈狗腿子

出工的时候，樊友才不断对皮天明怒喝。呵责皮天明动作迟缓，磨磨蹭蹭。

当大家已站好队列报数的时候，皮天明还在捆全组人的锄头。

当樊友才再次向他吼叫时，皮天明狠狠地瞪了这条老狗一眼，看着樊友才洋洋得意的样子，一股热血冲上了皮天明的脑门。

杀！杀死这条狗！杀死这条为虎作伥的家伙，铲除这个污物，伸张那被压抑得太屈辱的心灵，有时用杀戮对付狗腿子迫于奋而自卫。

正因为这样，当舞台上的武松杀死西门庆时，换得观众的是掌声和喝采。这段时间里，皮天明的二胡拉出万马奔腾的声音，我听出那琴弦里飞出来的决心，不禁心中一怔，但那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第二天清早，他以修锄头为名，向木工邓世全借了一把磨得锋利的斧头，趁大家不留意，便在早上出工时顺手放在门边的角落里。位置正好正对着樊友才的铺位，当门打开时，斧头被遮住，而当门关上时，顺手一操就可以捏在手里。这是他想了又想作出的决定，对累累咬伤他的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时候到了。

1977 年 5 月的盐源，这天时值初夏农忙时节，太阳特别的大，天空没有一丝的云。

中午，刚刚从工地上收工回来，大家等着开饭，樊友才端着一盆水坐在铺前弯下腰去，正冲洗那颗沾着汗水的秃头，这时，皮天明从监舍里缓缓地向门口走出来。

突然，皮天明把门关上，从墙角边操起了那把利斧，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对准樊友才那水淋淋的光脑袋挥起斧头，朝着那脑门猛砍下去！

樊友才听到关门声，抬起那秃头，正与那利刃迎了个正着，那一瞬间，一股血带着白花花的脑浆从樊友才的秃头里飞溅出来，直扑在门板上，墙上和床头上，一股血腥的气味飞向监舍的所有角落！

樊友才“啊”了一声，便倒在床上，血像打碎了开水瓶一样，染红了他的铺。

而此时的皮天明，眼球几乎要瞪出大眼眶，举起斧头向正在上铺吓得缩成一团的王维松喝道：“听着，你这条癞皮狗，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肮脏事，今天本要用你们两条命抵我一条命，看在你家有老父，姑且饶你一命，记住，今后不得作恶，否则就是这条老狗的下场！”

王维松，这个向樊友才提供皮天明掩护刘顺森出逃的人，此时吓得魂不附体，缩在墙角瑟瑟发抖，面如土色，大气不敢出。

这突如其来的事发生后，全监舍的人惊得雅雀无声，大部份人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皮天明。紧闭的门被皮天明把守着，亲历这场恐怖事件的人，还来不及作出反映，一时间，整个监舍静寂无声！

皮天明手执斧头，冷冷的看着那在血泊中挣扎的樊友才，持续了两分钟，微微一笑，猛然地捏紧了手中的利斧，毫不犹豫的对准了自己的脑门心砍去。

鲜红的血向那门上飞溅开去，在那上面划上了斑斑印记，这时他才打开了大门，摇摇晃

晃的跨出门坎，便跌倒在门前的水沟边。

被人扶起来的皮天明突然清醒了过来，他挣脱了扶他的手，独自踉踉跄跄地从水沟边爬起来，走到院子中间，面对着在坝子里的囚奴盘腿坐下，鲜血已染红了他的上半身，在阳光下显得特别的红！

老管们面对他这种行动，一个个呆若木鸡，看着他盘腿坐好后，大声地唱起歌来！他唱的歌辞是："天地有正气，杂然付流形……"歌声同他的琴一样，开朗激昂，正是他心地光明的自然流露，还增添了一股视死如归的气慨。歌声冲决了牢房的铁门，冲破了封锁六队多年的沉寂。

听见他的歌声，我才领悟到，无论是平时拉的二胡，还是此刻唱出的歌，都是他对这人间地狱的控诉，在皮天明这短短二十六年人生中，罪恶的人间使他清醒，他既然没有力量砸烂这个罪恶的世界，就除掉一个恶鬼吧，现在就藉着歌声走向解脱。

告慰他短短二十六年人生，最有意义就是做了一件除恶的义举。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我用心聆听他的歌声里所要表达的最后嘱托。

人们这时才从恶梦中惊醒，过道上的人一阵惊叫，监舍里的所有人闻声涌到了二号监舍的门口。有喊报告的，有唤唐启荣的，有喊抢救的，顿时乱成一团。

沈官科大着胆子，从监舍里一跃而出。从倒在血泊里的皮天明手中夺下他还紧握着的利斧。有人向岗哨上尖叫道："杀人啦"。

所有狱中难友全都自动集合在院坝里，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神情肃穆，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眼前这一幕。

皮天明在六队找到了同他心心相印的兄弟，他对刘顺森的出逃抱着极大的期望，现在他的兄长被抓回来了，等待刘顺森的凶多吉少，偏偏像樊友才这样的人，还想踩在他的身上立功求赦。

哨楼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显然在发出某种指令。

此时，正是收工的时间，刚刚回来的流放者不断涌进大门，院坝里的人越来越多。何庆云、徐世奎和老管全都来到了现场，老管们都下了岗楼。唐启荣正指挥着几个严管组的人把樊友才扶上了急驰而来的马车，也把皮天明扶了起来，鲜血染红了监舍的门口和水沟。

新来的中队长余胖子，同何庆云，徐世奎和钟花脸一语不发的站在往日点名集合的台前，余胖子张开大嘴，露出发黄的大牙，傻乎乎地看着皮天明发愣。

过了好一阵子，余胖子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吩咐唐启荣和几名组长，把樊友才从血泊中抬到医院去。

皮天明因为大量出血和过份的刺激，昏迷了过去。他侧歪着身子，倒在自己盘腿唱歌的

地方。太阳照着皮天明，好像在他的身后布着一圈金光闪闪的光环！

那天集合开饭，大家默默地吃饭，没有人说话，也不知道口中的滋味。人们似乎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回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有人在悄悄议论着什么，也有人担心皮天明的安危。

半个小时以后，唐启荣从小监走出来，并向队部办公室走去，半个小时后，才将樊友才送去医院抢救，从农场医院传来消息：两个生命垂危的人，都急需血浆。

中午饭后，人们看到皮天明被几个人扶着关进了小监，聚在坝子里的人，才开始散去。

余胖子得到场部指令，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樊友才，因为陈贤士的死已在就业人员中闹得拂拂扬扬，如果樊友才成为第二个陈贤士，那么今后还有谁敢公开靠拢政府？至于皮天明也要救活，让他押赴刑场充当“反面教员”。

在下午出工时，余胖子在全中队征求自愿的献血者，报酬是为献血者每人发给十斤粮票。当余胖子向六队的流放者征求献血者时，当天下午就有三十多人报名愿为皮天明输血，而申请为樊友才输血的，只有两名组长碍于队部的淫威而勉强报了名。

大约三点钟，医院专门组成的抢救小组，带着输血用的血袋和鉴别血型的设备赶到了六队，他们被限制在小监那阴暗潮湿的房间，对已经昏迷的皮天明进行了“抢救”。

医生看到皮天明昏睡在稻草垫起来的囚铺上，于是对这种恶劣的卫生条件提出抗议，说他们无法在这么肮脏的地方救活这个生命垂危的受伤者，但两个最先献血者，早已躺在皮天明的身边了。

邓扬光守在场部管教科，表面上装得十分冷静，但内心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孙明权与彭干事同归于尽的事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这些年轻的“反革命”，不同于一直坚持用非暴力手段与他们斗争的老一辈犯人。

文革中捶练出来的年轻人，奉行以暴易暴的手段，而所有的狱吏，可不愿牺牲于亡命者的手下，这正是邓扬光所不敢面对的“人性危机”。

所以文革以后，他们的残暴相对的抑制着，而把施暴的事转交给年轻的老管们。刽子手到了这时，内心的虚弱才充分流露出来。

晚上集合点名时，余胖子一再鼓吹政府的人道主义，把他们对皮天明出于政治目的的施救吹嘘得天花乱坠，队列中立即响起了各种议论，油库湾那近似夺命的劳累还没有完全恢复，皮天明被樊友才步步紧逼的前前后后，都是大家亲眼目睹的，还好意思拿人道主义往脸上贴金？

给皮天明输血的人何尝不明白，救活皮天明，就是让他在刑场上去死，但出于人类同情的本能，不希望看到他因失血而死，皮天明的冲天义举激发了人们朴素的感情。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两个医生忙碌着，不停的为樊友才测血压和脉博，一口袋血浆高高的悬在他身边的铁架上，樊友才躺在病床上，他的头部进行了消毒处理，迸出脑浆的地方，

蒙盖着一层白色的纱布，医生们明白，就是手术成功，大难不死，樊友才也是一个白痴。

可惜，尽管所有的措施都用尽了，下午六点钟，只见樊有才在病床上痉挛了一阵，随即脸色变青，呼吸弱得像一丝快断的线，心脏也渐渐停止了跳动，他没有挺过这最后的一夜，死神牵着他下了地狱。

而皮天明却在肮脏的四号小监活了过来。

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故事，一时成为盐源农牧场各中队最热门的话题，人们谈论皮天明时，总要联系他可怜的家世和遭遇，就连那个逃过死劫的王维松，也以敬佩的心情向人们介绍皮天明的家人，他本是皮天明的邻居。

人们谈到他拉琴，都交口称赞他的毅力和意志，他的一言一行，成为六队人们敬仰的偶像，大家敬仰皮天明的义举，赞扬他除了一条害人虫。

三个月以后，西昌法院以“反革命报复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又是一个苹果成熟的季节。1977 年 7 月 27 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上午九点钟，我们正在监狱大门口前的垃圾堆中筛碳灰。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鸣着警笛，驶过小木桥，朝着六队的公路急驰而来，停在大铁监门外。

四个身穿白色警察服的人从卡车上跳下来，手里提着一副手铐走进了铁监门，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清脆的脚镣声，皮天明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铁栅门中。

那天，皮天明穿着蓝色的劳改服，手上戴着手铐，脚上还拖着一副十五公斤重的死囚镣。在他苍白的脸上和额头上，留着两条长长疤痕，使人想起了三个多月前他盘腿而坐的那一幕，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依然那么屈强、自信，显出他永远都不会被征服的心灵。

四名警察跟在他身后，皮天明出了大门，略一停顿，抬眼环看了一下四周，眼光迅速扫向正在垃圾堆中筛碳灰的我们，于是嘴角边涌起了一丝微笑，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过头挺起胸脯，拖着脚镣向那辆卡车一步一步移去，铁镣在他脚下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所有筛垃圾灰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向着皮天明的背影伫目而望，看到他的身影渐渐远去，脚镣发出的撞击声也渐渐远去！

（五）永别了，二十年后再见

皮天明明白，他就义的时刻到了，他用坚定的步子向他的归宿走去，虽然他的肉体将永远拥抱着这荒凉的边漠，但他的灵魂在升腾。

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的怯懦和哀怨，只有慷慨就义前那种苍凉和悲壮，正如他坦诚率真的男子汉性情！

他的喊声，仿如洪钟大吕，撞击着山谷中这死沉沉的地狱，也好像一个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巨人猛然惊醒，发出仰天长啸，他的喊声犹如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浪，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所有的目击者心潮起伏，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此时，我心中涌起一曲送别的悲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与壮士的这个最后的照面，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突然的想起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我发誓要毁掉这吃人的垃圾箱，即使我去死，绝不后悔。”

十五公斤重的铁镣拖在他身后，发出有节凑的响声。他走到了汽车边，四个警察两个人在上面拉，两个人在下面举，将他连同铁镣一齐举上了车箱。随着一声脚镣撞击车箱板的响声，他已经站在那卡车上了。他转过身来，脸朝着我们，高高的举起那带铐的双手向我们再次拱手致意。

“永别了，难友们！别了，二十年后再见！”

后来有人十分忏悔地回顾道：看着樊友才欺负皮天明，扛起全组人的工具，一路跌跌撞撞，却没有帮帮他，甚至看到皮天明遭受老管的皮鞋脚尖时，也无动于衷，对皮天明拉二胡也横加干涉……倘若时间可以倒流，一定要用自己的一切来弥补这些过失！

汽车启动缓慢地向前驶去，皮天明还在向我们招手……

汽车驰过了路边浓荫履盖的苹果园，正是早熟苹果成熟的时候。从绿叶中露出一个个微红的果实，吐出一阵阵诱人的芳香。

“给我摘个苹果吃！”皮天明向着自制服说。

汽车停下了，两个自制服埋头钻进了密林。不一会捧着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向皮天明递去。

皮天明接过苹果，毫不犹豫的大口嚼了起来。他毕竟才二十六岁，生活才刚刚开始。生活的甜头他没有来得及品尝，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突然听到距我三米远的陈孝虞的抽泣声。这最后的生离死别时，我们才感到与他两年多的相处太过短暂，才感到与他血肉相连，难舍难分。

我远远的伫立在垃圾堆前，一直泪眼蒙蒙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大口吞嚼苹果的样子，忍不住泪水往下流淌，一滴一滴的滴在脚前的泥土中！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耳朵里总是回荡着他拉二胡的声音，脑海里回旋着他那开朗的音容笑貌：“你教我拉二胡吧！”他真诚地请求我，“音乐是心灵的语言，随心所欲吧！”我这样回答他。

记得有一次，他坦率地问到我，人的一生该追求怎样一种理想？我含糊地回答他：“你还年轻，怎么在一生中选择自己奋斗的目标，只能用心去考察就是了。”

想到他的决定，未免匆忙，不声不响，没同任何人商量，暗暗下定了决心，令人心疼，也令人钦佩！

三个月前，他盘腿危坐在院坝中间，血流满面，引亢高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响在我的耳中！“永别了，二十年后再见！”这摧人泪下的告别，使我无法入眠。

第二天，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钟，盐源农牧场的全体流放者，再次被押解到农七队的那片大坝子里。走进这个坝子，就有一股血醒气扑面而来。

盐源农牧场的狱吏们在这里留下了多少血迹？那围墙后面的草坪上，一个个敢于反抗迫害的奴隶，就在这里纷纷倒下，然而反抗却前仆后继，一次比一次更为壮烈。现在又一位喋血英雄，就要在这里从容就义。

进入会场，四周的墙上照例布置着黑洞洞的枪口，各队带队来的干部们，三五成群的在那长长的廊沿下，各侃各的龙门阵，会场里闹轰轰的。

大会一开始，依然杀气腾腾地把将被枪杀的人扭上主席台前，受刑者依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四人帮”虽已粉碎了大半年了，可毛泽东的衣钵几乎被全盘继承下来，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中国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所不同的是，主持会场的人，却换成了盐源县法院的院长，他口吃的讲话，少了些文革时期的杀气。

这段曲折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杀人还将继续下去。

厕所的一角，夏光然找到了农二队的当年同皮天明同案处理的张磊。两人便蹲在那里悄悄地交谈着：

“知道皮天明家在那里吗？”夏光然问。

“好像在渔洞，我和皮天明本来并不认识，只是在一次抢砸一个百货商店时，结成了一伙，那一次，实际是两个造反组织联合干的。”

夏光然思考了一下，继续问道：“农二队还有其它人知道皮天明吗”？

张磊思索着回答道：“倒是有几个，但他们知不知道皮天明的家就很难说了。”

夏光然拜托张磊一旦打听到皮天明的下落，一定通知一下六队捡牛粪的邓洪元。

火炬成员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尖刀上与统治者作拼死的斗争，随时都可能遭到杀害。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每一个火炬的成员，都有义务弄清楚他的家人和地址，收拾好牺牲者的遗物。一旦有机会，将死难者的事迹告诉他的亲人们。

在监狱中，我们虽然没有组织纲领和规章，但是生死相依的情谊，比任何组织章程更使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惜皮天明案来得太突然，事前也没有预先同其它人商量，更没向任何人托付他的后事。

在毛泽东时代的监狱中，稀里糊途被冤枉整死的人太多，若不是生前的好友为之代劳，许多人就算不明不白死去，也无人知晓。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人入狱，诛连全家，加剧了骨肉分离的悲剧。

就在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当天，就有细心的火炬成员为他保存了他带到六队的那口破皮箱和那把他一直痴心演练的二胡，暂时收藏在邓洪元那里。

如果遗弃他的继母和兄弟还在重庆，在得知皮天明壮烈牺牲后，能为他点一束香，也算让他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后来，我回到重庆以后，专门两次去渔洞寻找刘顺森和皮天明的家，望着街上的行人，我茫然四顾，刘顺森留下的地址早已人去屋毁，至于皮天明，更像是无根的树了。

当年这一血案早已埋入地下，所有的当事人先后的离开了人世，对于寻找他们的家人，我始终没能如愿。

第五节 变态刽子手林扯高最后下场

十年前，林扯高刚跨出农校大门，就来到盐源农牧场，筹建“八一五红色造反兵团”。在小伙计们簇拥下，他在场部掀起了造反风暴，围剿走资派，爬上盐源农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宝座，掌握着近万名囚犯和“刑满释放犯”的生杀实权，可谓势焰熏天。

但是，林扯高用打砸抢开劈出来的仕途，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曲折道路。在六队，他陷入了同老保份子何庆云等人的难以调和的较量中，以他盲目崇信、直线思维的简单头脑，哪是久居官场“老保”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林扯高不但没有制服对手，反而被对手一脚踢了下来，被削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只挂了一个一般干事的职务。

自从 75 年 12 月李克嘉被抓回以后，已有半年没见到林扯高了。传说他被派去学习，又传说因为他“老子”被审查，他也受到追究。

林扯高的沉浮，一直是我们观测政治风云变幻的风向标，1976 年五一节前，林扯高神气活现地突然出现在六队，参加了这次大检查。

（一）冤魂找上他

一连串的挫折打击，使林扯高的锐气磨灭了，也动摇了他的自信。

自从张锡锟被害后，林扯高莫明其妙地感到紧张，他开始恶梦连连，并常常从恶梦中惊醒，醒来总是大汗淋漓，惊悸异常，却又说不清梦中的究竟。

有一段时间，因为恶梦，林扯高对夜晚特别感到恐惧，入夜不久刚刚人静，便感到窗外有异物闪过，原来风吹门窗令他心惊肉跳，因此在自己寝室的窗子外加上铁栅。

一到晚间，林扯高便将窗子紧闭，为了不被恐惧控制，每晚都要吞服安乃静。但这种措施也只起暂时的作用，时间一久，安乃静也失去效力。因为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便感到烦躁和疲惫。他开始大量的喝酒，并趁着酒兴，摔盘砸碗，以此来舒发内心的郁闷。

六队的干部本来就对他的骄横跋扈看不顺眼，对他浅薄无知而狂妄十分反感。此时更对

他冷潮热讽，挖苦揶揄反正没好脸色给他看。他从厂革委副主住位子上摔下来后，不但失去了权力，且变成了人见人厌的老厌物。

我想，使林扯高内心异常烦躁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他内心深处的邪恶权欲，是他失去权力的失落感。

就在陈贤士被摔下身亡那个秋收季节，林扯高莫明其妙的产生了一股学开拖拉机的劲头。按照他的身份，他本可以向场部提出申请，到场部正式举办的拖拉机驾驶班学习三个月，领取正式的驾驶执照后，才正式驾驶拖拉机。

但是驾驶班的负责人却是他仇视的老保份子，林扯高不愿放下架子去恳求对方，而是霸王硬上弓，看中了每年都要到六队翻地的郭贤师傅。

郭贤在徒弟孙明权复仇自爆的余波还没有平息，接着又遭遇陈贤士堕车身亡事故，本来就胆小怕事的他，就更加小心翼翼了，他比任何人都早出车晚收班，以此来消弥监狱当局加给他的精神压力。

有一天，郭贤来六队翻耕的时候，被林扯高拦住去路……林扯高抢上了郭贤的车，命令郭贤教他开拖拉机。

面对这位红极一时的革委会红人，郭师傅左右为难。按场部的明确规定，驾驶者若是就业人员，不得任意接纳学徒，更何况眼前这人，是全场闻名的造反派头目，倘若再次发生陈贤士这类“意外”事故，那么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一生就完了。但是郭贤又不敢公开拒绝他，弄得不好，自己就讨打了，无可奈何的郭师傅，只好让林扯高坐在副驾驶的坐位上。

说也奇怪，这位平时野性十足的造反悍将，自从跟郭师傅学开拖拉机以后，便变得虚心起来，每天拦住郭师傅驾驶的拖拉机，坐在副驾驶坐位上，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郭贤的每一个动作，不厌其烦的请教，并不理会郭贤流露出来的讨厌。每天耕完地，林扯高还帮郭师傅打扫油腻的车身，加注黄油。

郭贤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他随时都在提防这个“徒弟”给他带来意外的麻烦，郭贤知道，林扯高性如虎狼，什么时候不如意，便会把自己往死里整，顺了他吧，出了事故自己担当不起。所以抱着敬神鬼而远之的态度，想甩掉他的纠缠。

于是郭师傅趁在小食堂吃饭的机会，向何庆云报告了这件事。何庆云婉言劝阻了这个派斗对手，然而他把何庆云的劝阻当成耳边风。

每天翻耕土地时，林扯高照样坐上拖拉机，渐渐地，他强迫郭师傅让出驾驶座，喧宾夺主的坐在郭师傅的位置上，并命令郭贤坐在一边指正自己的操作。林扯高第一次启动拖拉机时，因为油门与离合器配合掌握不好，拖拉机立即熄火。

老式拖拉机的柴油发动机，要用一根绳子拉动飞轮，以带动启动马达，再迅速的调整气门点火，这是一套麻烦的启动操作，林扯高哪里掌握得了？好不容易启动了，仅控制油门跟上启动的动作，已累得郭贤师傅满头大汗。遇到转弯时，踩油门不及时，跟着又熄火了，于是重

新启动。

一个上午，就被这种启动－熄火－再启动折腾过去了，郭贤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拖拉机还在原地打转，地没有翻耕出几分。

按照场部规定，就算是正式报名学习驾驶的学员，刚学会驾驶，是不准在农田里操作的，谁担当得起误了农时的责任？怕惹事端的郭贤，只好忍气吞声的伺候好这位新徒弟，提心吊胆地担心他操作不当打坏了零件，受到追究。

翻耕任务被耽误，负责秋耕秋种进度的徐世奎跑了过来，向林扯高喊道："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但蹲在车轮旁边的林扯高，忙着再次启动，并没有答理徐世奎。

徐世奎被林扯高这种轻慢无理激怒，冲着他吼道，"谁教你来瞎折腾的？你今天的岗位在哪里？快给我走开。"

林扯高受到这种近乎挑衅的指责，站起身来，对着对方怒目园睁："我要干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划!"林扯高一边恨恨回击，一边卷起袖子，以一种打架的习惯动作来响应徐世奎。

何庆云在不远处看到这个情形，便走了过来，仗着有徐世奎撑腰，改变了好言相劝的态度。向林扯高厉声的申斥道："你讲不讲理，场部有规定，没有驾驶证的人是不准开车的。何况你是一个干部，生产任务这么忙，你却在这里胡闹，已经折腾大半天了，拖拉机还在原地打转，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面对着六队的两位土霸王的夹击，林扯高发起横来，"你们这些铁杆老保，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还死死抱着守旧的老黄历，死心踏地的当保皇派，处处同我们作对"。林扯高用造反行话来回答。

他们的争吵，吸引了抢播春小麦的几十个"劳动力"的围观。大家停下手中的话，看看六队的"神仙"怎么打仗?

徐世奎火起，便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一把抓着林扯高，把他扯上田坎怒斥道："你给我滚。"

（二）"上马"和"下马"

林扯高不甘示弱，一边从徐老大的手上挣脱出来，一面继续吼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近指示我们，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又叫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们和我们革命群众的根本分水岭，便是对待革命群众的革命态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干还是不干，是上马还是下马，路线斗争搞了那么多年，天天在教育你们，为什么你们老是听不进去，死心踏地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反对我们革命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上马？看来继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多么必要"。林扯高吼叫着，不断捏紧拳头，在徐老大面前晃。

站在一边的何庆云，看着围在周围的几十号囚奴，十分难堪，呆若木鸡。何庆云这种表情，显然助长了林扯高的气焰，他继续用教训的口气喝道："上马，还是下马，是当前革命派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水领，你们自己不干，还硬把我们拉下马，我们是绝对不会屈服

的”。

这一段当时毛泽东的口头禅，不管帽子合适不合适，就像魔咒一样，套在对方的脖子上，使对方瞠目结舌，败下阵来。

徐老大没趣的悄然离开了，何庆云面被对方的帽子扣过来，也心虚起来。

在那个年代，辞令越左越吃香，不管“左”得是否合理，也不管“左”得如何可笑，尽管何庆云知道林扯高不过想过一番驾驶瘾，哪里谈得上什么“革命”、“上马”？但他尴尬的站在那里，任由这个狂徒重新启动拖拉机，得意洋洋的把拖拉机开动起来。

郭贤看到自己搬来的救兵也没能制止住“徒弟”，只好站在那里，看着林扯高驾驶着突突冒着浓烟拖拉机，在大田里挣扎前进。

目睹这场闹剧，我心想，平时对犯人一凶二恶的徐世奎和何庆云，原来也是一副贱骨头，林扯高用毛泽东这条鞭子一抽打在他们身上，就像抽打在一个温顺的牲畜身上一样，立刻使他们老实起来，不觉感到好笑。

正遐想间，突然看到林扯高驾驶的拖拉机在尽头转弯时，拖在后面的铧口深深的扎进了田坎中，拖拉机连连冒出黑烟，发出刺耳的吼叫，把田坎啃出了一个缺口，拖拉机被巨大的阻力拦住，在两块田坎中间熄了火。

这出洋相，立即点燃了何庆云已被泼熄的怒火，他觉得这个家伙的“革命”咒语，等于当着众多犯人的面，重重煽了他一记耳光。使何庆云怒气发作，一个箭步，蹿到熄了火的拖拉机面前，冲着束手无策的林扯高怒声喝斥道：“你给老子滚下来，再这么胡闹下去，老子就对你不客气了！”

说着，便伸手拽住林扯高的衣领，一把将林扯高从驾驶坐位上拽了下来，两个人立刻扭成一团！

几十个种麦子的囚奴，闻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这是在六队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两个管教在田里进行精彩的相朴表演。

格斗表明，看似统一的队部，早已是貌合神离，现在终于连表面那块遮羞布也撕掉，将争强斗狠的真面目暴露在囚奴们的面前。

围观者抱着看戏的心情，唯恐有一方败下阵来，中断了这场好戏。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对这两个作威作福的家伙敢怒不敢言，不管谁被打伤谁，都替自己出了心头的恶气。

本想离开现场的徐世奎，这时也停下脚步，看到两人扭成一团，并不置可否乐得看热闹，他虽对林扯高十分厌恶，但对何庆云也没什么好感，两个狱吏发生火并，徐世奎站在哪一方都不妥当。狱吏间相互谈不上友谊和信任，也不会有拔刀相助那点江湖义气。

站在高处的老管，更是抱着袖手旁观看热闹的心态，前些年武斗高潮中，他们听从军管

会指划与狱吏疯狂厮杀，互有伤亡，仇恨还留在他们的心里。

两个人在泥地里滚成一团，使出平生气力，都想把对方压倒在身下，狠揍对方一顿。从年龄上看，林扯高占着年轻的优势，但从力量上看，二人不分上下，两个人在泥土中翻滚着，谁也没有占着绝对优势。

正在酣战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荣老头看到这边人声喧哗，便从田次上柱着拐仗走了过来，等到他到人群中，看清是林扯高与何庆云正打得难解难分，便挤进人群中，喝住了两个满身是泥的人，眨着他的独眼，冲两人喊道："你们都给我停下，到场部去解决"。

两个没有分出胜负的斗鸡，松开了对方，拍打着满身泥土，抚摸着各自的皮肉伤，一前一后的到场部评理去了，荣老头边走边嘀咕："真不象话，在犯人面前大打出手，影响都不顾了"。

奇怪的是，第二天，林扯高依然出现在郭贤开来的拖拉机上，林扯高格外得意，何庆云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连理都不想理他。

今天的任务是翻耕山梁上大面积红土地，所以改用了宽犁铧，拖拉机也由输式拖拉机换成大马力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

翻犁到中午，郭贤检查了一下油箱，发现柴油已所剩不多。

午饭过程中，郭贤还没放下碗，这位刚学会发动、踩油门基本操作的"新学徒"，迫不及待的甩开郭贤，独自爬上拖拉机，开往油库加油去了。

等到郭贤闻声从食堂赶出来，拖拉机已经开出几十米远了，郭贤连忙跑进队部办公室去报告徐世奎。

（三）好险！

开车刚上瘾的林扯高，精神抖擞的驾驶着那台履带拖拉机，沿着通往场部的机耕道向那座必经的木桥上驰去。

在接近木桥时，林扯高减低了油门，放缓了速度，可那方向杆，却不知怎么搞的，不听使唤起来，眼看拖拉机已越来越驶近木桥，但拖拉机却明显的偏向桥身右边。林扯高急忙向左打方向杆，力图使拖拉机从木桥中间驶过去，但拖拉机却完全违背他的意愿，偏偏越来越向右边驶去，径直向桥右侧的河床冲下去。

林扯高万分惊慌，手忙脚乱，急刹车的踏板也不知那儿去了，右脚乱踏了一阵，也没找着，眼看整个车身已伸出了右边桥墩，悬伸在空中，若再前进一米，拖拉机的重心就要移出桥墩，林扯高就与拖拉机一道堕下十米深的河沟，首创盐源农场的特大新闻："林高明同志以身殉职"了。

不过，阎王爷的生死薄还没他的大名，被吓得冷汗直冒的林扯高，慌乱之中，终于踏中了紧急制动踏板，拖拉机排烟管吐出一口黑烟后发动机停止了轰鸣。整个拖拉机嘎然站立在右

边的桥墩上，前半部的履带凌空悬出桥墩外，煞似一头跃起的怪兽立在桥边。

“好险！”这时，闻讯赶到的徐老大一行人失声惊叫了起来，大家围着悬在桥墩上的拖拉机散开，七言八语的议论开了。

一分多锺以后，吓傻了的林扯高才回过神来，他从驾驶仓里慢慢伸出头来，虽然强装镇定，却没有掩饰住险些丧命的惊恐，脸也变得煞白。一声不吭的下了车，坐在刚下过雨的泥泞路边，像泄了气的皮球，喘着粗气。

徐老大叉着腰，忍着一腔怒火，并没有理他，一个劲催促代朝谋赶快到场部报告，请他们赶紧派一台拖拉机来，将这个停在桥墩上的怪兽，从悬崖边拖回来。

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故，像一瓢当头冷水，泼熄了林扯高心头的狂躁之火，使他一度的陷入了沉默。紧接着，发生李克嘉被抓回以及洋芋人案件，又使林扯高像打了鸡血一样，重新振作了起来。

为了审理“洋芋人案件”，林扯高经常在深更夜半提讯李克嘉，故意的让他亢奋的吼叫声传到坝子里，好像是为了挽回面子、重新树立他的威信似的。

可惜的是，紧接着毛泽东一命呜呼和“四人帮”被捉；紧接着，李克嘉又被放出小监；再接着，又是场部处理他无照驾驶，险些车毁人亡的严重违纪事件。

当然在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决定着林扯高沉浮的，是中国政治气候的骤然变化，他的沉浮，几乎是毛泽东独裁政治变化的睛雨表。

因为无证开车险些车毁人亡事件，场部“革命委员会”专门的通知了他已退役的父亲，并当着他父亲的面，撤消了他管教干事职务，责成他停职反省。

林扯高被停职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便请假回到老家探亲。

照理说，在那乱世年代，无官一身轻，对他这种文化层次极低、又无专门技能、长期沾着政治红光的人，是一次极好的隐退机会，或回家当农民，拿起锄头耕耘自己田园，或复员到工厂，当一个普通工人，过自食其力的的日子。

然而这位林扯高，既不服“四面树敌”的处境，更不知道“乱邦不入”的道理，在盲目尊崇毛泽东的愚味信仰下，他并不甘心接连的挫折。

在权力争斗“场”中，林扯高的内心失意和烦躁，找不到喧泄管道，加上平时结怨众多，敌手难免对他施以落井下石的报复，使他空虚的神经更受严重刺激，越发失去了常态。

（四）家庭“革命”

回家期间，他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好好反省一下连栽跟斗的原因，反而像得了神经病似的，老是找岔子同老婆过不去，轻则怒斥她目光太短浅，小市民习气太重；重则拳脚相加，一边打，一边还振振有词说：“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

对老婆施暴之外，又对他仅六岁的儿子也看不顺眼，稍不听话，便会抓住孩子的头发往墙上撞，用他那双习惯打人的手，在孩子身上施虐。

周围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隔着窗户劝阻林扯高，林扯高却吼道："那个敢干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就是找死。"

母子俩平静生活被他搅得恐怖不安，过了几天，老婆因为受不了这种虐待，趁他不备，收拾东西，牵着孩子回了娘家。

那知道妻子对林扯高的忍让和逃避，反而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妻子出走的第二天，林扯高怒气冲冲地追到老丈人家，血口喷人，诬赖妻子行为不端，要追究她的奸情等等。

林扯高不顾老丈人的阻拦，一把抓住妻子，将她拖回了家。

当天晚上，林扯高便将妻子捆在木床上，像审讯犯人一样，要她老实交待，还抽出腰间的皮带，狠狠地抽打她。

林扯高六岁的儿子眼见母亲被父亲虐待，抱着他的大腿，苦苦哀求，但已失去了人性和理智的林扯高，反而将这个只有六岁的孩子，捆在办公桌上。

可怜母子俩嚎淘大哭，哭声惊动了居委会，才出面邀约了几个老大爷老太太，敲开了他的家门，把母子俩放下来。

就在这天夜里，疲倦不堪的林扯高酣声大作，母子俩乘机逃出了魔窟。

等到林扯高一觉醒来，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开始有一点后悔，但他上那里去找回他的妻和孩子？

当林扯高沮丧的回到了农六队时，隐瞒了失去妻儿的悲剧，那时我们正苦战在油库湾工地上，林扯高在工地上露面时，他那一贯冷竣无情的脸，他那动不动就念着语录盛气凌人地训斥流放者的作风，突然收敛起来。

我们当时虽不知道他探亲回家发生的"暴力革命"，但却知道他因无证驾驶闯祸，受到场部的处分，成了"准犯人"，成了没有什么权力的一般干部。我们只是对他抱着敬神鬼而远之的态度，并没有把他当成"落水狗"来"痛打"。

林扯高回六队的第一天带班，便在我们这个组挖方的工地上，选了一个高处的位置，面朝我们盘腿而坐。沉默很久，也没人答理他，许久，开口的第一句话，便特别实在："唉，你们一天要干多少小时才能完成任务？"距他最近的陈明九顺口回答他："二十小时都完不成。"接着补充说，"起码要七十二小时才能完成。"

林扯高听后，便在那里认真的推算起来。最后像发现什么秘密似的惊讶问道："那不是要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才能完成吗？蔡先禄答腔道："是呀，林干事，你看队部下达的任务，不是存心让我们不睡觉，要我们的命嘛？"

这话使他若有所悟，平时队部给囚犯们下达任务时，他向来就没把流放者当人，否则，

拿什么向上级邀功？。

他呆呆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此时已是飞沙走石的冬季，他望着在狂风中挣扎的囚奴，像第一次亲身感觉到他们苦难似的，于是又问道："队部都没有给你们加班粮么？"

陈明九一半带着挖苦的口气回答他："林干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场部有规定，深夜加班要过十二点，我们才能吃到三两苞谷粑。"

面对着这一群皮肤晒得黝黑的苦力，林扯高也许体会到了，他即使遭受了再大的不快，但比起这些苦囚来说，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残酷的现实能触动他的良知吗？

他从坐的地方站起身来，在这狂风呼啸的黄沙中，一路扫视着这片忙乱的工地，最后将目光停留在工地那幅巨大横幅标语上："抓革命，促生产，奋战一百天，坚决拿下油库弯的改土任务"，便一面摇头，一面喃喃自语"文革流产了"，一面从坐的土堆上走开了。

身后却传来蔡先禄的喊声："林干事，帮我们反映一下，这样干，我们还活不活？"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凌晨四点钟光景，当疲惫不堪的囚奴踏着开始下霜的泥土从工地归来时，距离六队大铁门三百米远的山坡上，便听见从岗哨棚里传来了一迭棍棒打人声和追赶呐喊声，有人被棒棍击打，发出沉闷的"朴朴"声和呻吟声。

陈蓉康低声的咕噜道："不晓得哪个挨了！"他前面的杨云斗却随口应道："真的被打死了，倒还痛快了，再不受这种折磨了。"

队伍里没有人响应，细细听去，夹在那杂沓脚步声中，竟是鼾声。几天几夜几乎没有睡觉了，站着和走路都想睡觉，这时正值下半夜，风声已收敛，鼾声听得十分的清楚……

（五）打死你这烂贼

前面的囚奴已经走到了六队的大门口，我突然看到，两名士兵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持青杠剑，正在紧紧追打林扯高。

只见林扯高双手抱头，在士兵追赶下，正在队部走廊里来回逃窜，追打的人却边追边喊："打死你这烂贼，打死你这烂贼！"

林扯高躲避不及，身上连中数棒，正拼命绕着走廊的柱头抱头鼠窜，企图向外逃走。却被篮球场通道口两道手电筒光罩住，于是一前一后四个人，四根青杠剑将他围在中间。

正在林扯高将挨上一顿痛打时，操场外突然传来徐世奎的喊声："天还没亮，林高明又在闹什么？"倘若没有徐世奎给林扯高解围，他难逃一顿痛打，四条汉子将手中的青杠剑撑在地上，七言八语地围着他骂开了。

一个人手里举着一只猪蹄向他劈头掼去，并大骂道："林高明这个烂贼，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了，天不亮就跑到老子厨房来偷肉，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老子看你进来贼眉贼眼的样子，就晓得你在心里想什么，你他妈的真不是人。"

另一个接着吼道：“你总是到厨房来偷东西，上星期天我给班长留的半只卤鸭子，你进来一趟，就不见了，害得我还遭到事务长批评，说！是不是你偷的？”

“你别装蒜，这段日子，只要你到我们厨房来，就要丢东西，不是油瓶子，就是佐料罐，今天现场逮住你，说！你偷了几次？别给他啰嗦，到他寝室去搜。”

四个人当着徐世奎的面，一面数落着林扯高一桩桩劣迹，一面推推搡搡逼他开了寝室的门。果然，从林扯高寝室里搜出来的腊肉香肠、鸡腿菜油、佐料等应有尽有，其中可以立即辨认出来的，便是从老管厨房里盛佐料的罐子……林扯高在赃物的面前，带着脸上的血迹，只好低头不语，任凭责骂。

其实，老管对林扯高“顺手牵羊”癖好早已察觉，第一次抓获时，从他荷包里扯出了一条刚刚酥好的鱼，炊事员并没有过份声张他当着别人出的丑，林连连赔小心和认错，事情也就当成开了个小玩笑算了。

那知那林扯高失去了控制，像染上了毒瘾，三番五次去老管厨房看炊事员做菜，看见了，便要“尝一尝”，或顺手牵羊。

掌勺的厨师想戏弄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有一次，炊事员冷眼瞄着林扯高下手去抓盘子里的熟兔肉时，便取出锅里烧得滚烫的油勺，向他的手打去。滚烫的油在他那只手上烙下了几块黑疤，算是对他的小偷丑事留下了记号。

从那以后，炊事班长便向徐世奎打了招呼，禁止林扯高再去他们的厨房。

但这一次夜半行窃，被老管逮了个正着，不但遭到一场棒打，并因此闹得沸沸扬扬，使林扯高“扬名”全农场。自此以后，他的丑闻不径而走，他的绰号也由林扯高变为“林疯儿”和“林偷儿”了。所有的人对他都刮目相看，都把他看作是精神失常的疯子。

林扯高混到了这个地步，可谓颜面丧尽，“革命”的遮羞布扯破后，便赤条条地裸露出一个贪婪无耻的无赖真身来！随着那些小偷小摸来的东西一件件从他的寝室搜出，这位文革初期锋芒毕露的革命闯将，便彻底现出了他的原形。

回看林扯高十年文革生涯，他在六队所演出的一幕幕闹剧：无论是抓反革命典型人物，还是破获反革命集团；不管是组织血腥批斗会，还是罗织杀人材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暴露出他对流放者的丧心病狂的迫害心理，无不说明他的内心凶残。

至于林扯高跟何庆云的明争暗斗，与场长们的夺权较量，无不反映出他善观中共上层的政治风云而投机钻营的秉性，他所干的一桩桩事，都记载着他的无赖本性。

他中毛氏邪教的毒太深，以为照着魔头的教义行事，纵不能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也可出人头地，称霸一方。这种趁乱打劫的举动，在当时很常见，文革初期的“革命闯将”，大都属于害了这种病的人。到了文革后期，这些人奋斗十年却一无所获时，便在信仰危机中堕落了。

林偷儿终于越来越狂了，有一次，他从油库弯的工地上往回走，绕道去场部。当他经过林业队卖苹果的开票处时，看到一名就业人员家属，将一背兜苹果放在开票处约二十米远的石

坎上，他一看路上无人，便迅速地蹲下身子，背上苹果，拔腿就跑。

开票的老太太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头一看，见自己那背兜苹果被人背着，已经跑出十几米远了，便顾不得开票，慌忙追了上去，一面追一面叫喊抓贼。

林扯高听见身后有人在喊，便撒腿狂奔起来，当他跑出了一百多米远，看看已到了场部蔬菜组的地界，正要往六队的弯道上跑，却偏偏被蔬菜地里赶过来的四五个“劳改释放犯”拦住了去路。

其中一个高个夺下他背的背兜，其余的几个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动起拳脚来。对他左右开弓，给了他一顿饱拳。

他们大部都是附近几个中队的刑满释放人员，大家议论纷纷，一时传为笑话，传遍了整个盐源农场。

林扯高偷窃上瘾，已到寡廉鲜耻的地步了，他很快从农六队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年，就在这里他主持了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办典礼，并在这里整治过被他划为“走资派”的人，农场书记高德胜，以及六队的李培连，都曾在这个学习班挨过打，受过刑，想不到今天，他也被另一批掌权者“请君入瓮”了。

随着清算“四人帮”深入进行，地方上开始清理“四种人”仍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达到清算的目的，翻云覆雨，波谲云诡，只不过，玩人和被玩的人换了一下位置，整个的文革便是一场人玩人的大悲剧。

不！这场悲剧应当追溯得更远，几乎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的起家。毛泽东一直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导演着人玩人的悲剧，像林扯高这样的悲剧人物比比皆是。一个平时对“囚奴”们作威作福的特工人员，至此已被完全阿 Q 化了。

毛泽东把林扯高变成了争夺权位的鬼魅，一度成为决定全农场囚奴命运的主角，后来在权力角逐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中了毛氏邪教之毒的人，大致都同他一样，一旦中邪，就没有人性，不认父母，不认妻儿，在他的眼里，除了斗争、整人，所剩的是极为浅薄的损人利已。到了捞不到稻草时，便成了见东西就偷的人渣。

（六）重上井岗山

1979 年，我获平反回到重庆后，听到传来有关林扯高新的消息。

这年冬天，毛牛山冰雪封山后的一天，天还未亮，一个人影正向山上疾步攀登，他的手里提着一支左轮手枪，这个人衣着单薄，脸色铁青，一边向上急步小跑，一边还不断地警惕地回头张望身后的动静。

这时，这冰封的荒山早已没了人影，大雪早已淹没了原来的马路，原始森林已被大雪压得如同一床大得无比的棉絮，如果大山深处没有人接应，那么他多半只有冻死或饿死在山巅上，然而他却坚定的向山峰登去。

林扯高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听到传言，说毛牛山上就有王洪文组织的武装部队，又听说一大批"决心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的人，都拿起了武器集中到山上，决心再走井岗山之路，这梦呓般的鬼话，他也信以为真。

于是林扯高打定了主意，在一个早上，天还没亮，他便从学习班翻墙进入部队营房，偷偷蹿到了一个他平时很熟的连长寝室，偷走了他的手枪和一匣子弹，然后，大摇大摆的从营房大门走了出来。

当值班的卫兵盘问他时，他只回答说到马路上跑一跑，锻炼锻炼身体，说着就装出晨跑锻炼身体的样子瞒过卫兵后，便迅速的取道农七队，径直向直通毛牛山的公路飞奔，朝着那白茫茫的山上奔去。

一小时以后，被偷了手枪的连长发觉自己的枪支不见时，便四处寻找，问及营房站岗的卫兵有没有外人在早上进出时，卫兵才告诉了他一大早林扯高从里面出来过。

连长马上意识到危险的事就要发生了，连忙召了两名士兵带上了枪枝，匆匆忙忙向农七队追来，到了农七队再从那里的守门人处，证实一大早林扯高的确经过这里，独自向毛牛山方向走去了。

三个人直扑毛牛山追赶林扯高，一个多小时以后，追赶的三个人终于看到了茫茫白雪之中的林扯高身影，紧接着便是包围、喊话，茫茫大山中响起了稀疏的枪声。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工农起义军的枪声，而是抓捕林扯高和林扯高拒捕发出的枪声，枪声断断续续的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林扯高偷来的子弹已经打光了，终于被三个军人制服，束手就擒。

林扯高被押回农牧场以后，在审讯中，他除了对偷枪上山的经过供认不讳外，却拒绝"认罪"，等到法庭最后将一张判处他二十年徒刑的宣判书递给他时，他公开的撕了那份判决书说："判决书上称他'上山为匪'是对他的诬蔑，上毛牛山，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上井岗山之路。"

第二年，又听到另一种传说。说林扯高在干部学习班上，公开的散发"传单"，号召在学习班学习的成员集体突围，冲出牢笼，再上井岗山打游击，因此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活动，组织挑动人上山为匪……被叛二十年徒刑。

两种传说都说，林扯高要"重上井岗山"组织武装起义，然后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真是"风水轮流转，祸福本无常"。

毛泽东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却反过来把他的嫡系传人关进了大牢。

有人说，张锡锟牺牲以后，英魂不散，先后捉了陈贤士，黄学全，刘资元等三个犹大去，最后还把林扯高的魂魄摄了去。

第六节 最后牺牲的“火炬”烈士

随着北京城里专制魔头命归黄泉，阎王殿里为争夺最高权力的火并也激烈地爆发出来。中共掌握兵权的军中将领，一举将毛泽东的嫡系传人“四人帮”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帝王梦，嘎然破灭：他的铁杆亲信们成了赔葬品，其余的爪牙也树倒猢狲散，丢下“反帝反修”大旗，跟随新主子追逐“人民币”去了。

才登上统治舞台的华国锋和其它头目们，面对毛泽东丢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为了展现他们强权的力量，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场疯狂的杀人运动，历史再次留下了专制主义的血腥罪行！

当时，发生了闻名全国张志新案，张志新案件很多内幕被重重遮盖着，后来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只说是毛远新干的。在张志新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先对她进行轮奸，再割断了她的喉管，再予以虐杀。

在盐源县法院处决了皮天明以后，西昌高等法院便加紧了对刘顺森“反革命越狱集团”的审理。

皮天明斧劈樊友才的案件，使邓扬光增加了更多的疑团，他们没有预料到火炬的影响扩散得那么宽，新增加的孟平、皮天明、杨汉群，是他们所没有料到的人物，这些年轻人都拒绝交待关于火炬的其它成员情况。

（一）滥杀

邓扬光本想沿着火炬的线索，找到六队反革命组织纲领、成员名单、活动计划、与社会上的联系等情况。但审讯了几个月，因毫无进展，只好以逃跑的幕后策划者名义，将夏光然、赖开明，陈蓉康等人关进小监。

徐世奎在六队的二百号人面前恶狠狠地威胁道：“你们不要以为共产党出了‘四人帮’，就天下大乱了，你们总是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时机已到，可以组织越狱，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蠢蠢欲动，但是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这些人不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不会甘心的！”

那段时间，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审讯班子，对五个人轮番的突审。对夏光然、赖开明和陈容康威胁说：“如不交待，将要算总账。”

因为“火炬”是对他们这么多年来的罪恶的揭露和控诉，不除掉这个记载他们罪恶的幽灵，令他们寝食难安，火矩幽灵一直徘徊在盐源农牧场。

大开杀戒的屠刀，借着在全国掀起新一轮杀人运动，再次向我们头上高高举起。我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审理重点之一。只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没有被关进小监。

蔬菜组的一名神经极不正常的残疾人刘开云，就因为说了几句对宋庆龄的疯话，就被关进了小监，后来竟被牵出去枪决。

刘开云因何判刑我不知道。但他来到六队时左手因受刑致残，他与人们说话时语无论次，根本无法交谈沟通，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而这种精神病的病因，则来源于中共的暴政虐待和恐怖高压。

刘开云因为左手残废，队部将他安排在菜蔬组，平时就让他一个人牵着一头种牛放牧，他放牛时，老朝着那头牛唠叨着胡话，并常发出嘿嘿的傻笑，几个无聊的年轻人常常戏弄他，可他一点也不介意，每天可以听到他在小溪边语无伦次的唠叨，但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没想到，九月二十七日盐源县城的公判大会上，刘开云竟与刘顺森一道，被处死刑。宣判他的罪行是："疯狂的诬蔑和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所谓"疯狂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刘开云曾说过，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曾与宋庆龄睡过觉。

刘开云与我年龄相当，抗战胜利时才八岁。一个不足八岁的童稚，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纯属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据此，竟对一个无辜的精神病人实施枪杀。

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多起对精神病人被处极刑或虐杀的案子，仅六队，就有 1969 年的刘志和，还有 1974 年大年初四被活活打死在小监里的"癞子"。他们身受双重残害，神经失常，得不到应有的人道主义治疗抚慰，反而遭到肉体上的消灭。

更何况精神病人口出狂言，言辞荒诞，刘开云被枪杀，实属中共伤天害理。

不久，我在工地上受到徐世奎多次警告："你还在为你的右派进行翻案，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有给你两颗花生米，你才肯罢休，你已表演得够充分了，只有叫你永远喊不出声的时候，你才会安静下来。"

事过几十年了，他那咬牙切齿的杀气，仍令我记忆犹新。

对于这种杀气腾腾的警告，我经历过多次，心中有数，估计我又一次被申报了死刑材料，理由便是多次"无理申诉。"

申冤，被当成"死不改悔"，成共产党杀人的理由，出身"黑五类"要杀，疯子要杀，说话犯忌要杀！反对暴政主张民主更要杀！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沉冤深似海！

（二）为少年精英送行

1977 年 9 月 27 日清晨五点钟，天还是黑糊糊的一片，六队的大铁门就打开了。前一天晚上由何庆云亲自点名挑出的五十名流放者整队后，在八名荷枪实弹士兵的押解下，走出农六队，步行二十里，去参加盐源县城召开的"公判"大会。

在这五十人中，"火炬"的嫌疑人占了一半，十几年来，何庆云费尽心机，都没使这些人回心转意，现在他让我们眼睁睁看自己的同伴被杀害。这种侩子手震撼我们心灵经常用的手段，我们称之为"陪杀场"。

五十名"陪杀场"的队伍走在昏暗的路上，山路上本来就坑坑洼洼，加上前几天下了今

年的最后一场雨，水凼遍地，泥泞难行，此时天还没有亮，脚踏着碎石或淤泥，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好几次几乎摔倒。

因为下过雨，又时值深秋，我感到特别寒冷，想到刘顺森今天与我们永别，五更的寒意，重重包围了我。

我抖了抖身体，清醒了一下头脑，这种"陪杀场"，我经历得太多，但是我深信这倒行逆施，不可能持续下去，否则，人类就被邪恶征服，人类将面临灭亡。

走在路上，耳里响起了刘顺森最爱吟唱的牢歌："戴枷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盼天明，拂晓待鸡鸣！"我们曾一起在牢房里合唱这首歌；唱着它，我们送走了多少热血志士饮弹刑场；唱着它，在恐怖暴行中举起火炬，照亮了黑暗的地狱。

追逐"火炬"燃起的希望，我们一同渡过了六千多日日夜夜，共同熬过了苦难。此时此刻，让我再为你低吟这首牢歌，讲述你的故事：

刘顺森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姐姐是中共重庆市团委的一名官员，是当时"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本可以藉此平步青云，混一个新贵的位置。

然而，天质聪颖勤奋好学的刘顺森，为了追求"真"，看明白独裁者的真身，选择了一条反叛之路，这是一条被打击、被专政、并注定献出一生的"绝路"。他同中共权贵的姐姐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直到被逐出家门。

1955 年，他就在同学中发表讲话："你们读到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吗？铁托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主张不能过早实行农业合作化，否则，其结果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你们想想，现在就对农民实行统购统销，必然扼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

老师听到后，既惊奇又害怕，在家访时，忧心冲冲对刘顺森姐姐讲："你们家有一些社会上没有的数据，告诉你弟弟，看了以后，千万不要在同学中讲，否则会被看成反革命教唆犯，惹出是非来，非同小可"。

刘顺森听后，却据理力争说："内部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人民？人家的预言是根据当今社会的真实作出的，用不着几年，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没过四年，大饥荒果然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中心，1955 年，大专院校正在大张旗鼓进行反胡风集团运动，正在沙坪坝一所中学就读的刘顺森，气愤的说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他们在暴力下不敢讲自己的思想，口被封住了，胡风只说了点学术界的怪现象，就被打成反革命！今后谁敢说共产党半个不字？"

校长听到后，再次找他姐姐说："你该管管你弟弟啦，经常发表一些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总有一天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到时悔之晚矣！"

气急败坏的姐姐动手打了刘顺森，并说，"你是刘家的不孝子孙"。将他赶出了家门。

刘顺森毅然的离家出走，父母老泪纵横地把他送到姨父家，那年，刘顺森年仅十五岁。

1957 年，刘顺森刚刚跨进高中的门坎，就带着同班的同学，将反对“党委专断”的大字报刷到了街上，在那张大字报上，刘顺森公开抨击了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人民没有自由，各级共产党组织包揽了大小事务，是歪风邪气的避风港。

嗅觉灵敏的街道干部，拿着撕下来的大字报找到了他姐姐，姐姐没好气的说，我已经没有这个弟弟了，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于是在反右后期，刘顺森被送到少年管制所，并且再也没有出来过，实际上成了一个少年“右派”。

勤奋好学的刘顺森，一头扎进少管所的图书室，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如同进入了知识的宝库，在少管所造纸厂里的故纸堆里，找到了不少一般人不感兴趣的数据，有从市委那里送来的苏共二十大内部文件；有供中共中级干部参阅上面盖有“密”字的内部数据，时值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他同许多中国挣扎在饥饿中的老百姓一样，亲身体验了他曾大胆预言的灾难成为现实，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和思考，想从书本上找到灾难的原因。结果，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巨大的错谬，并破天荒的提出造成中国灾难的原因是中国的迷信和个人独裁。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需要防止野心家用“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来阉割民主。同时他认真阅读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四书五经无所不读。花这样大的功夫苦苦阅读和思考，对于一个不满二十岁的中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他是中国思想界涌现出来的早慧天才。

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是绝不容许这种青年涌现出来的，毛泽东只希望他的御用文人鹦鹉学舌地用马克思的只言词组来欺蒙民众，而不允许他们独立思考。

刘顺森最终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近代的最大独裁者，并痛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这注定了他以后漫长的监狱生活。

由于博览群书，刘顺森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使当时只会背诵毛泽东语录的共产党狱吏们，不敢在他面前搬弄他们的老祖宗经典。在许多场合下，因为他无情的纠正这些管教所“引用”马列原著，而弄得对方十分难堪，丑态百出。

在同何庆云一场关于农民地位和状况的争论中，刘顺森当即向在坐的人们背诵“资本论”中论证农民的大段原文，然后侃侃而谈：

“马克思从来没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他说小农经济是发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农民却是一个最可怜的阶层，在中共打天下的时候，农民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却没有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三面红旗的试验中，农民大批的饿死在人民公社的茅庐中，至今还在饥饿在线挣扎。侈谈共产主义不是很可笑吗？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亿万农民的理想，仅仅还是吃饱肚子，这仅是人生存的本能要求，

而不是空洞许诺的共产主义!”

“中国农民是中共施行共产主义牺牲品”。刘顺森的这段话，尖锐的讽刺了这个“管教”。

唉！纵然刘顺森是对的，但他应当明白，他的命运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自古以来为真理而牺牲的人虽不少，但在这个谎言充斥的时代，说真话的人，是要冒杀头的危险啊。

刘顺森博览群书，精通典藉，他从《道德经》到《天演论》，从斯多葛学派到马赫，纵横弛骋在先哲们的哲学园地里，使动不动拿着红本本训人的狱吏们自惭形秽。

在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刘顺森虽然衣衫褴褛，鹑衣百结，且遭受饥寒和奴役，面色苍白，严重贫血。然而，他的精神是富有的，面对粗野横蛮的士兵，面对如狼似虎的狱吏，他横眉冷对，从内心深处藐视他们。

三元宫有他的吼声，在甘洛农场斯足分场垦荒时，他组织了几十个水肿病人，持续了一个月的集体抗工，甘洛的鬼门关前，他聚集全队数十名生命垂危的人，拦住四川省劳改厅派下检查“工作”的警车，控告管教随意打人和克扣囚粮。

到盐源以后，刘顺森与我们相处的十三年岁月中，他几次在批斗自己的大会上据理力争，让主持会场的人只好万分尴尬地收场。

1966年的春天，我俩被“推荐”去参观成都的“农业学大寨展览”，我们利用这一次机会，更多的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出发前，他用辛辣的讽刺，对朱国骥之流的阿谀奉承下了一副“醒脑汤”。

参观队伍才出发，庞玉笃便撕下人道主义的伪装，不顾刘顺森是参观代表的身份，竟恼羞成怒给刘顺森戴上手铐，刘顺森在激奋之下，自谱曲自填词，吟出了黑牢歌——带枷长街行有力截穿了管教科的伪善面孔。

当有人在遭到无缘无故的辱骂和毒打时，会听到刘顺森的抗议嘘声，然后帮助那些被打伤的同难，渡过受伤后的难熬日子。

刘顺森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已不畏强暴的形象上的。长期的监狱折磨，使文质彬彬的刘顺森变得“粗犷”起来，他的肉体上留着刽子手的累累鞭痕。

刘顺森酷爱古代典籍。当时的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和“语录”外，几乎搜光销毁了所有读物。一经搜出，便目为“四旧”，予以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刘顺森却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他珍爱的书籍，甚至不惜与狱吏和兽兵争抢，一本“诗经”，一本掉了几篇的“论语译注”，一本霉迹斑斑的吕振宇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一套范文澜偏写的“中国通史”。

监狱当局搜去了刘顺森所写下的每一张纸片，并被付之一炬，使这位文史天才没有任何遗着留下，凭着他超凡的记忆力和聪颖睿智，他常常站在狱中的讲台上，给周围的难友传授知识，传播正义良知。

在流放者的眼里，刘顺森不仅是一部活的四库全书，更是一本百问不厌的活字典。像当年陈力一样，他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大群渴求知识的年轻人。

在盐源农场十三年的漫漫黑夜中，刘顺森是难友们公认的良师益友。

何庆云只好虚张声势板起脸说："你别放肆，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刘顺森用二战后期对希特勒几次密谋暗杀故事作对比，来说明世界上的任何独裁者必然败亡的下场。他说："国内经济继续恶化，纵使毛泽东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用更大暴力清除异己，却并不能挽回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不久，在刘顺森的倡议下，六队举起了反抗的"火炬"。记载在盐源农牧场反抗专制暴政的闪光一页上。

张锡锟从容就义以后，刘顺森继续高举"火炬"，怀着探求光明、追求民主的赤子之心，带着孟平和杨汉群，在难友的掩护下，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囹圄，直奔重庆。去寻找反抗暴政的地下组织！

可惜，他们三人就像穿梭于魔底纹下的小鱼，不幸误触魔网，而没有逃脱被抓回的厄运！

（三）县里招开的公判大会

叭的一声，我的右脚重重拌着一块石头。因为用力过猛，大姆指的指甲被踢破，血从那里沁了出来，痛得钻心，使我猛然从沉思和回忆中痛醒过来。

看看拉沓的队伍已经绕过了四号梁的垭口，东方也渐渐地呈现出一片鱼肚白来，在昏暗的晨光中，山下的盐源县城的轮廓已在薄雾中显露了出来，我忍着钻心的疼痛，跛着脚跟在队伍中下了山岗。

八点左右，我们这支"陪杀场"的队伍，已经到了距县城仅一公里的小金河上的石桥上，天上没有云彩，太阳从山后冒了出来，就像离地仅三尺高似的，早晨的盐源县城，空气凝固，一丝风也没有，昨夜的寒气，还没有退去。

街道上仍然残留着猪牛羊屎的痕迹。虽然被人打扫过的，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仍散发出一股膻臭味，体现出边荒小城的粗犷。

今天的盐源县城，如临大敌，从石桥开始，戴着红袖套的荷枪实弹的民兵，每隔 20 米，就站着一人。他们瞪着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注视着这支"陪杀场"的队伍经过。

刚刚跨入盐源县城，一幅"坚决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份子"的红色标语，横跨大街，我们从这副巨大的标语下走过。

马路两旁参差不齐的泥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标语，字体就像是小学生写的："坚持两个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办事，我放心！"；"团结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等，跟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样。几张"打倒四人帮"，"粉碎王、张、江、姚的反革命夺权阴谋"的旧标语，被撕去一半，在风中抖动，哗哗作响。

再往前走了十分钟，马路上的人群惭惭的密集起来，一群头裹大白布的当地人，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几个身穿黑红相杂衣裙的彝族妇女，不停地朝我们指指戳戳。

我们要到达的最终地点，是县城中心的一片大坝。大坝由各式建筑物四面包围组成，可以容纳数千人集会，六条宽度不同的巷道，从坝子的中心向四周辐射出来，中间留着许多被雨水积成的泥凼和土堆，残留着许多菜叶和猪粪，看样子，这里平时是盐源的集贸市场。

大坝被几条粗大而醒目的石灰线分割成了十几个方格，坝子东面楼房墙下，砌着一个高出地面一米的三合土坪台，坪台上方，撑着一幅十米长的红色横幅，上书“公判大会”的字样，坪台前已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营造出一种杀人的气氛，这便是今天大会的主席台。

我们进入会场时，何庆云同一个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握手寒暄后，随后领着我们走进紧靠主席台前的第一个方格内，看来我们算是来得早的人了，八名“保镖”留在圈外，喝令我们席地而坐。

二十多年来，对于这种杀人大会，我已记不得参加过好多次了，每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我都感到灰暗和伤心，要好些天才恢复，尤其是看到我的战友一个个在大会上与我决别，心中更痛苦难熬，今天，我还第一次到盐源县城“陪杀场”。

也许是昨夜几乎彻夜未眠，加上今天早上又起得特别早，又走了那么多山路，我感到特别困倦。脑子里很乱，刚刚坐在地上，便觉得眼前火花四溅，我闭上双目，好一会儿，便觉得右脚指头特别痛，脱下那只黑色血痂粘在一起的鞋，从破棉衣上扯下一块棉花，默默地擦去伤口四周的血污和泥沙，再用破布包扎起来。

渐渐地，盐源农牧场其它劳改中队的人员陆陆续续进入会场。他们在带队人的指挥下，将广场前面的白色方格一个个的填满。我回头看去，一片灰蒙蒙的人头大约有八百人左右，广场四周的方格内，还空空如野。“陪杀场”的主角，仍然是盐源农牧场的流放者。

过了不久，坝子周围的六条巷口渐渐的挤满了人群，这是些头顶大白盘、穿着补疤衣的当地农民，他们是被公社组织来“受教育”的？还是自动跑来“看热闹”的？我不得而知，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翘首向我们张望。相互交头接耳，使会场很嘈杂。

（四）赔杀场的“五类”

到了九点钟左右，北面巷道的深处传来了一阵阵吆喝声，不一会儿，一群形象沮丧、面色腊黄的人，在民兵吆喝和押解下挤了进来。

为首是一个柱着竹棍的一瘸一跛、头发花白的老者。身上那件满是补丁的衣服上，沾满了油腻。他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一个镜框是用白色的胶布贴好的，另一边干脆只留着半片镜片，他胸前悬挂着一尺见方的木牌，上面用红笔写着“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份子。”从他这身打扮便可看出，他忍受着长年的斗争折磨，有人说他是原盐源县委书记，也有人说他是办公室主任。

紧跟在老者后面是一个长须白髯的老人，他穿着一件补疤迭补疤的中式长衫，颇有点古风装束，我估计他是一个老教书先生，他的脸上倒还干净，但表情木然，看不出忧愁和哀伤，脖子上吊着一块大木牌写着“国民党特务”。可从他那副寒酸像来看，很难将他同电影里的“特务”联系在一起。

再后面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嘴里正不停地自言自语叨唠着什么，两只手不时向空中挥舞，好像在发表演说，也像一个乐队的指挥。她的衣服已被撕成布条，在风中飞舞摆动，有的地方还露出皮肉来，腊黄的脸上带着一种久经折磨而精神失常状态，她的胸前吊的牌子上写着“地主婆×××”，走起路来时，胸前干瘪的乳房摆来摆去。

“地主婆”身后，是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乱蓬蓬的，却被剃去了一半，半边白、半边黑。我知道那叫阴阳头，在那个年代，是专门用来侮辱被批斗者的，以此迫使他们低头认罪，他在队列中始终没有抬头，胸前挂着一块白牌，没有任何字。

在最前面的四名颇具特色的“演员”后面，依次跟着大约五十多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群，他们的脸色灰暗，毫无血色。

队伍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男孩。那孩子赤着脚，穿着一条像刷把一样的裤子，他的身上虽然没有挂木牌，但他瘦削的脸蛋上，已经不存在孩子的稚气和童真，只透露出一脸茫然和恐惧，让人看了特感同情。

最后入场的，是由两个年过六旬的小脚老太婆领头的人群。照样是衣衫褴褛，补疤累累，两个老太婆一摇一晃的进场，显出一副急欲前行却无法快步的样子。

跟在老太婆身后是几十名衰弱不堪的“病号”，两个套着红袖套的民兵在后面大声驱赶喝叱，但老太婆好像担心被石块绊倒再也爬不起来似的，战战悚悚仍然走不快。

靠西南面的巷道里，也挤出来了一支队伍，大约也有五六十人，胸前也挂着牌子，他们是盐源公社的五类份子代表，那些人的衣着更破烂，样子更像当地的农民。

靠北面的巷道里挤出来的，是盐源各乡镇的被管制份子和五类份子代表。他们衣着褴褛，面容憔悴，看得出这些“代表”平时除了忍受极度贫困外，还要受到民兵和积极份子加给他们的压迫。

他们被押来，是接受教育，还是跟我们一样“陪杀场”？

来参加“陪杀场”的“五类”，有好几百人。一个几万人的小县城，就有这么多黑五类，可见社会被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当坝子里所有白色方框被填满后，已快十一点钟了，白线方框以外的地方，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白头帕，“白头帕”与“方框”之间，被几十名民兵站岗阻隔，切成了一条间隔大约一米宽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便是人为划定的专政和被专政的界线。

不过，随着会议的进行，这条分界线很快便被拥挤的人群破坏，被专政者，很快同当地人挤成一体。

一米高的主席台上，坐着七八个主持会议的人，台前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台上台下，倒是界线分明，各自身份也分明。

看看方格填满，大约过了半小时，主席台中央，端坐在那里的一位矮个中年人，手里端着话筒，用嘶哑的声音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今天的杀人大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是免去了全场起立和读毛主度语录的程序，主持人简短的讲了今天大会的宗旨后，便一声令下：“将罪犯押上来！”麦克风里传出了沸腾的口号声，会场上并没人喊口号，声音原来是早就灌制好的录音带上播放出来的。

此时，四十多名腰配短枪的警察，每两人押一个，以几乎以百米赛跑冲刺的速度，将二十多名赴刑者推到主席台前。

全场顿时哑然，我的心也阵阵紧缩，在光天化日下，当着盐源县城的父老乡亲的面，对临刑前的受刑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殴打的酷刑，正在赤裸裸展示着。

二十多名受刑者，每个人被绳子紧紧捆绑，血流满面，不成人形。死刑之前还要承受一次死去活来的折磨，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的现场“教育”，这种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挑衅，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我抬起头来，在三十几张血脸中搜索着刘顺森。当我终于从他的姿势判别出他来时，心狂跳起来，回想去年 9 月，我在他逃离魔窟前的一天下午，同他道别，嘱他一路珍重，一路平安，却没想到，那一次道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同张锡锟、陈力一样，此刻刘顺森正被两个虎贲反剪着双手，按倒在前台，将他的头几乎按到地上，在绳索捆扎下，他无法伸直脖子，没有抬起头来，看得出他用全部毅力强忍着痛苦。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大义凛然。并不像相邻赴刑者那样前抑后翻。

我深知刘顺森的个性，他不愿让难友看到他满脸是血，增加难友们永诀的痛苦，既然绳锁喉颈无法喊出壮烈的呼声，还不如干脆就保持沉默。

后来我才听难友介绍，刘顺森被枪杀前，被盐源农牧场医院的周延阳注射了哑针（估计是强力麻醉类药物），使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自古以来，为名节和理想而慷慨就义者，无不抱着“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精神，刘顺森同张锡锟一样，在审讯中痛斥大陆的独裁专制，留下了“金瓯已缺总须补，为民牺牲敢惜身”的誓言。

好一个“金瓯已缺总须补，为民牺牲敢惜身”的慷慨遗言，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叮嘱。

在刑讯时，他平静回答刽子手：“你要问我的同党么？我可以直言告诉你们，六亿中国人民都是我的同党，你们可以杀我，却无法扑灭人民对你们倒行逆施的愤怒。你们可以消灭我，却无法抹去你们犯下的累累罪恶。”

刘顺森在就义前所写的绝命诗，和他写下的许多天才论述，全部被刽子手搜去，他的遭遇证明，根正苗红的出身，只要反对中共的倒行逆施，同样要遭到格杀勿论。

刘顺森等人被押下主席台良久，隐约从远处传来枪声，坐在广场后面看热闹的“白头帕”躁动了起来，我听见传来了嘤嘤的哭声。赴刑者中定有他们的亲属在其中。在我心中，又填了一笔中共对我们所欠的血债，此刻我只能把这一笔笔血债，深深地埋心底，直到几十年后写在这本书中。更等待清算中共独裁那天的到来。

（五）血的祭奠

四十年前，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我在外婆的怀抱里，逃出鬼子的铁蹄。我们这一代饱经苦难的人们，一直在心灵深处发问：为什么日本人肆无忌惮的欺侮我们？那是因为黑暗的独裁统治使国家贫弱，那时为反抗异民族入侵而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抗战胜利后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民主建国。

大陆在中共挟持下倒退到黑暗年代，我们这些饱经苦难的人，应该告诉今天的年轻人，我们是如何在“革命”的说教中，换来了饥饿和贫穷，换来了奴役和折磨，换来了血腥的屠杀！大陆已被中共“沦陷”，从恶梦中醒来的中华儿女当改“抗日救国”为“抗共救国”才对！

当我神思恍惚中走出会场时，我木然地随着队伍押出盐源小城。

这么多年来，我亲自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为追求真理、为挽救国家和民族而壮烈牺牲的战友，他们的形象活跃在我记忆里。

我的耳边又响着他们郑重嘱咐：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一定要把这段苦难经历告诉世人！并为这段历史作证！

可是，我们所期待的那场暴风雨却迟迟未来。我们低估了大陆独裁势力的顽固性，低估了专制制度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势能；低估了中国容忍暴政的“宽宏大量”；低估了中国人在长期暴力威胁下无知的程度。

毛泽东死后，并没有被焚尸扬灰。他的像反而还挂在天安门城头，遗体也被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供一大群愚昧的民众顶礼膜拜。

“始作佣者，其无后乎”。虽然毛泽东的嫡系传人被一个个投进了监狱，虽然“凡是”派不得不让位于邓小平，然而历史好像仍停滞着，迈不出大步。

而“改革开放”，独裁衣钵依旧，并以一党专政替代了原先的一人专政。中国人民所期待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实现。中国人民的迟顿，使新的执政者赢得了对独裁政体修补时间。大陆步入了一个无冕皇帝的集体专制时代！

天气太闷热了，该有一场席卷这片污浊、野蛮的暴风雨降临，以冲刷这片满是罪恶的土地。虽然我们曾预言过，只要毛泽东这个恶魔命归黄泉，他所开辟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帝业，会随着他一道葬身在历史的沉渣中。

我们期待到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会隆重祭奠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皮天明等人。只要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长存下去，代表人类进步的民主潮流，一定会冲跨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堤坝。

我相信，我所记载的先烈事迹，终将成为中华儿女反抗专制暴政的一段史诗，定会为后代传颂！

第十一章 中共后集权时代

在结束毛魔王二十八年的血腥统治时，因为铲除了所有还在萌芽中的反抗力量，使取代中共的力量并未形成，人民被迫容忍了现状。然而历史还是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 年 10 月 6 日，经过十年“文革”，被毛泽东视为洪水猛兽、并一直踩在脚下、必欲置之死地的“走资派”宫廷政变成功。

二十八年暴政，毛贼使人民处于饥饿贫穷的状态，所有生活资料，包括必不可缺的粮食、布匹、油盐、燃料等等，都要“凭票供应”，更不要奢谈住房和交通了。当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所造成的迷信、恐怖和愚昧渐渐消失时，人们才开始回到了现实中。

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狂热的阶级斗争，他们选择了缓和矛盾却不实行民主的机会主义策略。把政权当作掌握他们手中的法宝，不愿归还。他们一面声称不可能将取得的政权拱手让人，同时希望在取代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条件下，出现一个集体掌权时期，实行和平改良。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出现的。

1978 年，刚刚掌权的“走资派”，抓紧推进两大改革：

第一，为了缓和已处在“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首先要找回万民被毛夺走的饭碗，解放被冻死的农业，他们的救世良方便是“三自一包”。

第二，调整被毛泽东弄得极其紧张的社会结构，解放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的中共各级旧官吏，使这些人成为掌控国家机器的新主人，以清除“文革”扶植起来的“造反派”。（这种换汤不换药，大大阻碍了社会民主的进程。）

同时为了收揽民心，将毛泽东圈定的庞大的“五类份子”来了个一风吹，其中也包括对 1957 年无辜受冤害的右派进行平反。

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时间，似乎有一种万象更新的新气象。

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充满了近百年来遭受列强瓜分的耻辱感。使我们从小就把“振兴中华、立志报国”当成公认的价值观。在经历日本入侵，国破家亡的刺激后，“爱国”便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原则。不管是谁，也不管带什么政治色彩，立志报国是第一原则。可惜我们并没意识到，为窃得政权的毛共已将大片领土出卖给了苏联了！

当我被莫须有扣上右派帽子时，我表现出的惊慌失措和诚惶诚恐，至今都令我感到羞耻，面对无理剥夺我读书的权力，我只是伤心落泪和万分痛苦，而不去思考灾难的原因，在大学求学的我在政治上什么都不懂。

连番的批斗会上，我不但没有理直气壮抗议这种阴谋迫害，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申辩解释，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

但是，我越是辩解，就越使迫害升级，我的申辩不但没有获得饶恕，反而使我变成“死不改悔的极右份子”。

第一节 风向陡转？

严酷的事实纠正了我的幼稚，毛泽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倒行逆施，使我认识到中共宣传的东西全在骗人，所以我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恰恰是共产党的倒行逆施。

经过长达二十三年的地狱炼狱，我把自身的苦难同中国的灾难结合起来，狱中的斗争，使我越坚定了反对独裁的信念，于是，我开始了真正的“脱胎换骨”，开始了精神和灵魂上的新生，成了一个执着的反专制战士。

二十年来，我不断为自己的冤狱据理力争，从入狱那一天起，到 1979 年获平反，整整二十年，持续申诉百余次。

一方面揭示那个年代冤海无边，同时也巧妙保护了自己。同独裁专制作斗争的过程，就是我伸冤与抗争相交织的过程，而我的伸冤过程，就是我揭露共产党的血腥、暴戾、腐败的过程。

1978 年，母亲带着欣喜来信告诉我，她已获得平反，这一年平反冤假错案，像一阵热风，熔化着毛泽东几十年冰封的专制地狱，许多呻吟于地狱的冤魂，遍布全国各阶层的“五类”，走出了地狱。

我拿定主意，要借这股“平反风”洗刷冤情，正大光明从地狱的大门走出去，同时决意将二十年狱中所见所闻，以及囚奴们长期的苦役折磨，烈士流血牺牲的桩桩事实公诸于世，传给我们的后代。

偏僻的盐源，像冰封大地里阳光照不到的死角。这里的冰雪迟迟难以溶化，909 狱方对平反“冤假错案”似乎没有任何反应，“落实政策”既没有宣传，又没见有多少人改判获释。

到了这个时候，我同母亲的来往信件，照例都要被拆开检查，我还得用隐讳苦涩的语言，同检查者对话，既要说出二十年冤狱对我的摧残，又要表达含冤二十年上告无门的悲哀，为了能将信寄给母亲，要说多少言不由衷的假话？

事实将会证明，解除长期冤狱，还要经历痛苦而曲折的过程。

何庆云和徐世奎，压根就没把六队二百多号流放者当人看，今天却要为最反动的家伙“平反”，心理上怎能接受？他们害怕这些人获得平反，对自己不利。

还在一年以前，在枪杀刘顺森和刘开云时，徐世奎还恶狠狠地警告那些“不认罪伏法的反改造份子，是“自寻死路”。今天风向陡转，要为右派平反了，他能接受吗？这种变天又不翻天的把戏，着实令人困惑。

唯独那位平时爱说些风凉话的“逍遥份子”马大炮，却不时从场部，甚至从成都带回一

些从未听过的新鲜见闻。

然而毛泽东归天已两年，报纸上虽然一阵阵吹平反的风，可在华国锋两个“凡是”铁幕下，对制造冤狱的鬼蜮们既没有撤职处理，又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中共把所有罪过，由一个替罪羊江青背着。

这使我明白，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否定自己。一党独裁下，就是改良都难以推行！“平反”就更难，眼看平反冤假错案与“伟光正”要撞车了。

（一）清沟听闻

经过十几年的修建，二道沟上游最高处修起两个大水库。并在水库与各下游各中队间，修建了绵延几十公里的环山沟渠，依靠这些沟渠，将水库的水引进了几百亩水稻田里。这些水渠像曲折的腰带，盘绕在水库以下山头的山腰间。

夏天因山洪暴发，从四周光秃秃山包上冲刷下来的泥砂，淤塞了这些水渠，所以来年春播前，各中队都要抽出劳力清理这些环山沟渠。

监督这些劳动力的狱吏和士兵，在水渠上方找一个便于监视的地方，围起一个临时哨棚，居高临下的监视着清沟工作。

每一年的清理淤泥，按参加清沟的人头划成了几十段，劳动任务落实到人头，并规定几天时间内完成。

正巧这一次我被划在哨棚下面那一段，这天，我正在沟里除淤泥时，突然从头顶上飘下来两个人的对话声：

“这些天递上来的申诉状，占了全队一半，听说荣山茶厂的反革命犯都放了三分之一了，搞来搞去，搞了这么多年，我们管的都是些冤枉事”。这是何庆云的声音。

听到这话，我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以免弄出响声中断了他们的对话，我想从他们的谈话，获得有关落实政策的消息，于是我索性停下来侧耳细听。

“上面不是说了嘛，过去抓人和判决是对的，今天给他们平反也是对的。反正你我只能跟着政策走，法院也真是扯蛋，把那么多不该抓的人抓到我们监狱来，找我们的麻烦。”这是徐世奎的话，带着明显的埋怨。

“话也不能那么说，就拿张锡锟的案子，是你和我亲自整的材料，经过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审理，管教科几十号人都讨论通过的，前天就听西昌中级法院的人说，要重新调查这个案子。”何庆云说。

“就是嘛，这种案子若在两年前拖着不办，肯定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路线作怪，谁反对枪毙张锡锟，至少就落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今天倒好，还不到三年，又要你重新审理，说是错案，如果谁顶着不办，又说你抗拒政策，对抗中央。古柏的老康就是一个例子，职务都被撤了，还挂起来反省。我真搞不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怎么才算对”。徐世奎困惑的语气里，

含着抵触。

“搞成这样，都怪那个林高明，他一到六队，天天大呼小叫，说六队的反革命份子要翻天，天天把我们当右倾夹起来整。今天倒好，他夹起尾巴走了，烂摊子却丢给我们来收拾”。何庆云素来与林扯高不和，现在林扯高倒霉了，何庆云当然不会放过说风凉话的机会。

“我是准备好，六队把人放完了，你我都回家杠锄头去。”徐老大在作后一步的打算了，这些年来，徐世奎在六队占山为王，老婆孩子也生活得安逸富足。

他当然清楚，他的一家是寄生在六队两百号奴隶身上的，犯人没有了，他这个家也就该搬走了。

何庆云倒显得豁达些：“路线斗争就是这个样子，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说过，在中国出修正主义随时都是可能的……”他的话突然中断了，他知道不能再说下去，否则就是“反党”了。

“李培连不但获得平反，还升了官，你我都写过他的材料，他若在农牧场不好相处啊!”徐老大触及到具体问题了，因此，他打定主意，“走为上计”。

我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侧耳聆听，这可是将近二十年来，难得听到的话。这翻内心自白，才是整人者内心的真话，二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听假话套话，能听到他们肺腑之言，倒是机会难得。

我抬头向哨蓬望去，只见徐何二人同“带班”的两名士兵正盘腿坐地。

士兵的思想毕竟单纯，在“支左”时，他们只知道用青杠剑砍人打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只知道执行命令捆人，他们在“支左”中猖狂打人，他们本是泥腿子出身，在毛泽东的大跃进中，曾经尝过野菜或观音土的滋味。

入伍后扬眉吐气，过着饭饱肉足的生活，便心干情愿被人当枪使，决不去侈想生活之外的事，无产阶级专政少不了这样毫无头脑的“枪”，也少不了像徐世奎，何庆云这样的“枪手”。

（二）高德胜的死讯

清理水渠的劳动刚刚结束，郭川小又调回了六队，替代了已经年老的荣老头。

郭川小调来以后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队部办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后，便低声问我：“你知道高德胜书记的下落吗？”我感到他的问题好突兀，摇了摇头。

他停了一下，便告诉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惨，是被造反派们斗争，打断了左侧的全部肋骨，并把他关在骡马堡附近的水碾房里，又不给他医治，结果打断的骨头穿破了皮，伤口化浓感染而死。

死的那几天，他在小屋子里成天喊叫，很凄惨，但没人敢理他。也不准家属去看望，还说他死不认罪，死有余辜。

他还说："文革初期，造反派斗争高书记时，其中有一条罪状便是坦护你和陈力"。

这么多年共产党的残酷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上法家提倡严刑竣法，毛效法商鞅、李斯，使他得了一个暴君美名，对不听使唤的人决不会手软。

听郭川小讲完后，我俩低下了头，一时沉默不语。掐指算来，他死去快一年了。说到这里，郭川小望望我，进一步补充道：

"你和陈力被管教科申报了两次死刑。但是高书记说'这两个人出身学生，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挽救的，共产党人强调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灭他的肉体，何况，这两人在犯人中影响很大，改造好了，一定会带动一大片，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转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胜这个调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来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确有高书记极力保护的一份功德。

关于高书记，我确曾听过他的种种传闻，文革后，1966 年冬天，我与他在六队的蔬菜地边见了最后一面，当时见他穿着布鞋，脸色苍白。记得那一次见面，他简单询问了我的近况，说了几句"认清前途"的话，便匆匆离去。

从此，高德胜和李培连便从二道沟"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我被申报死刑的说法，我早已耳闻，但何以又免了这死刑？却一直懵然，这次听到郭川小的话，我的脑海里再度重现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队的绝食，并在 1964 年的国庆节前，我与高德胜的第一次对话，那是一次思想交锋，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气，一定深深地触动了他。

这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是他们自吹的铁板一块，恰恰相反，由于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内部正在熔化分裂，惨无人道的对待高德胜，一定是效仿了中央高层中对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手法。

想到这里，我问郭川小："他的家属还在吗？"

"在，还在骡马堡，这些年来，因为高德胜的问题，家属也被整得很惨。"

这一席对话，使我们间的距离拉得很近，我们相对沉默，我在心里祈祷着亡灵。大约五分钟后，我抬起头来，对郭川小说："我想，该写一份悼念高书记的信，以表达我对他的哀思，请你转交给他的家属"，他点了点头。

对于高德胜所加入和维护的党，我没有任何好感，但对于高德胜这样的党员，我认为他是中共队伍里没有丧失人性的一员。

在复杂的社会中，一个人误入某种政治组织，误信某种信仰，本不足为奇，曾迷信于邪教的人，并不等于邪教头，相反，应当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一时执迷，干过坏事的人，有一天大彻大悟帮助我们，这样的人，应视为我们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谈到深夜。他询问了我最近收到母亲的来信没有，问到母亲的身体和近况。我告诉他，母亲已经摘去右派帽子，并在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平反政策的问题。最后，郭三小宣布，从明天起，我被编入杂务组。

杂务组是一个由农六队的木工、铁匠、饲养人员和机修人员混合编成的小组。我的任务是跟着来六队翻耕土地的拖拉机，帮他们打铧和保养拖拉机，这样一来，平时，我可以满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组里列队报数，集体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队的监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着来六队耕地的拖拉机，坐在后面的铧口上操纵升降铧口的盘子，我的“师傅”是东方红拖拉机司机李进。

为耕地打铧，这可是一个极苦的差使，这时风季还没有结束，经过一个冬天干旱，山梁上干透了的土地，在铧口和履带的翻动下，掀起一股股红褐色的“浓烟”，然后被肆虐的西北风卷起来，裹缠着整架铧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见方向，呼不出气来。每天，只要一开铧，用不了半个小时，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红尘裹成一个灰人，头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层涂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头的，洗脸洗头并不麻烦，只是吸进肺里的大量泥灰，七窍之中堵满了泥沙，严重损害我的健康。

用李进的话说，“这那里是人干的话？”但我很乐意的接受了，因为即使打铧时苦不堪言，但我获得了久未有过的活动空间。

从此以后，我结束了站队集合、报数出工，连小解都要呼喊报告的那种生活，结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呵责、毒打的提心吊胆地狱生活。

（三）狱中“自由”

到杂务组后，我能单独的进出监舍，还可以去场部子弟校的阅览室，在那里读到装订成册的“参考消息”，过去，我在垃圾堆中偶尔捡到一张，便如获至宝，虽说“参考消息”属于中共特意筛选出来的内部读物，毕竟比假话连翩的人民日报有了些新内容。

同时我还可以去其它队约会同难朋友，从他们那里直接得到平时无法听到的消息。晚上七点以后，我可以去场部的任何一个中队看露天电影，去当地老乡家里作客、买米和买肉，不再担心徐世奎躲在大门内侧，突然向我袭击。

我可以去农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去和他们交朋友，去打听“平反”的有关消息和政策。可以去场部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在晚上十一点钟回到监舍就寝就行，姑且把这种生活叫做“自由”吧。

自由是太可贵了，冤狱剥夺了她整整二十多年了！经历漫长的岁月，我才获得这份“自

由”，并且是以为拖拉机打铧这种苦役作代价换来的。

开初那几天，深夜从场部归来，路过苹果园，闻到那沁人心脾的苹果芳香，我真想变成一只栖息在树下的蟋蟀，再也不要回到那阴森森的牢房里去，无怪乎哲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郭川小的妻子姓廖，是场部一名仓库保管理员，许多年来，她对我们的处境流露出同情，我们管他叫廖老师。

为了避嫌，她在表面上对我们保持着严格的界线，而显得冷漠，但每遇到流放者被处罚的时候，她都会通过丈夫替当事人解围，在监狱这种严酷氛围中，已是难能可贵了。

自我被调到杂务组后，有时也可以去干部食堂吃饭，便时常与廖老师照面，有一天，她在球场外碰着我，硬是拉我一起去她家吃午饭，我不好推辞。去队长家做客，对我来说，是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未免感到拘束。

进屋以后，桌上已摆好饭菜。郭川小从厨房里拿出一瓶酒，斟满了一杯送到我的面前，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接过酒杯只呷了一口，他拉扯了一阵闲话，便道出他的本意，说他的两个孩子，女儿初中毕业准备报考中师，儿子也小学毕业准备考中学，两个孩子在场部的子弟校读书成绩平平，希望我能给他们两个孩子补补课，能让他们顺利的考上学校。

我沉吟片刻后回答：“我的学业已整整荒废二十多年了，中学课程虽然用过功，但这么久了难免遗忘，需要先对现在的中小学教材熟习一下，然后什么时候补课，也需要向杂务组长彭文学打个招呼。”

郭川小闻言，抽身从里屋拿出三本书来，那是他女儿正在学习的语文、数学、政治和印刷的讲义，他一边递给我一边说：“关于补课的时间，就在每天下午，杂务组嘛，回头我向彭文学说一声。”

给中队长儿女补课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每天下午，我准时的来到郭川小家里，经初步摸底，郭川小女儿的功课相当于小学生。而他的儿子则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这便是文革的重大成果。

好在廖老师平时对孩子管束甚严，成积并不是最差的，经过我的辅导，孩子们进步很快，但我没有把握，经过短期复习便可以考取学校！为了给孩子们补课寻找辅导资料，我便到农牧场子弟校图书馆借一些升学考试的复习资料。

从场部走过来时，我一路都在回忆这里的旧貌，慢慢判断出这儿正是当年的基建三中队所在地。

十五年前，当我从西昌黄联关押来二道沟时，正值冬天，当时场部几排红砖房子的前面，就只有一湾狭长的水沟。

沟里的水黑黝黝的，很像是城市里的下水道，冬天的干风，刮走了这片红土里所有的水

份，唯独在这里还保存着这一凼“黑水”。

十几年来，但各水库中浸下的地下水，汇集成了一条宽约二十米的小溪流，囚奴们又在河沟两岸种上了树苗，几年后成了一条绿色走廊。

与这条绿色走廊形成的同时，在当年的基三队旁边，建起了许多简陋工棚，成了就业人员的主要住宅区。住宅群的主人在工棚前修筑了石板小路，形成了一条“小街”，农场场部周围苹果林中间，现在已建成场部子弟校的校舍。

一道围墙，将就业人员的工棚隔在外面。许多年没来过了，今天算故地重游。

学校最角落的地方，是图书馆和阅览室，我刚刚走进过道，便碰见了来这儿不久的魏朋万。他原是昭通地区的中学教师，平时沉默寡言，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他身材矮小，加上眼睛近视，才四十多岁，便显得特别苍老。

在六队时，他经常完不成任务。每到农忙时节，他成了“挑灯夜战”的常客，好在他特能忍耐，一直逆来顺受，十五年劳役，咬着牙，默默忍受着无端的侮辱。从没见过他顶撞过干部和卫兵。

子弟校迁到这里后，魏朋万接到了场部人事处的调令，安排到这个学校当国文教员。调令下达那一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工资由原来的每月二十元增加到三十五元。觉得福从天降，大抵是因为他历来逆来顺受老实听话赢得了农场的好感，但根本原因是因为学校师资奇缺。

现在他几年前铁青的脸色，已带上红润，与他在六队时成天哭丧着脸可谓“判若两人”。握手寒暄后，魏朋万便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小叙，我才得知这所子弟校原来是从骡马堡迁来的，文革期间，原来的老教师关的关、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虽然老教师都与公检法沾亲带故，依然没有逃掉文革的劫难。

连李培连这位响当当的马列主义专家，尚不能免却牢狱之灾，像高德胜这样从雪山草地上爬过来的人，尚且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教师们岂能自保？

（四）就业员的窝棚区

从学校教学楼向下望去，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便是就业人员的窝棚家属区，呈现在窗户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绵瓦、牛毛毡和木板钉在一起的窝棚屋顶。

看到这些破烂的屋顶，使人联想到抗战时期重庆临江门码头下，傍山而建的贫民窟，想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淑贞，拖着一老一小吟唱“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今居住在这里的囚奴们，已唱不出这样的歌了。

那些在监狱中熬掉了十几年青春年华的男子汉，就在这里燃烧着生命的余烬。男人难免有七情六欲，也想找个女人成家，但每月仅有二十块钱的劳释人员，到那里去寻找共渡“寒窑”一起过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便是这些就业人员的自我调侃。

就业人员中相貌英俊的勤劳小伙子，就连场部的干部家属，都会盯着不转眼的，却很少正常的女子，愿意落嫁到这些鸽子棚里来。

虽然如此，这些鸽子棚中的女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嫁进来的女子或是“黑五类”；或是穷得为几斤粮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丑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遗弃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万的话题，很快转到这些鸽子棚里的“居民”身上，就业人员中良莠不齐，层次悬殊，其中不少陈贤士之类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这样的老实巴交大好人。

女人们品性各异，有纯朴天真的山里妹，也有卖惯了皮肉，擅长算计别人的野鸡；有为几斤粮票就可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杀的女人。

贫病交困，文革对社会伦理的极大摧残，在这些密布的鸽棚里，天天都会发生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争风吃醋的奇传绯闻。总之，在这片绿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实的悲剧。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满后，便留在场部养猪场喂猪，他几次托人带信叫我过去一叙，我调到杂务组以后，得知他从长寿老家接来一个农村姑娘，并计划在 1979 年春节结婚。

多年来，王大炳对我的热心帮助，我一直都铭记于心，听到他将成婚，我决定抽时间去向他表示祝贺，拿出两年积畜的零用钱，去盐源县城买了一床提花毛毯，作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

79 年元旦后的一天，我沿着堰沟边的小路一路寻去。

他的“新房”，原是农一队的菜棚子，经过改造，小屋的泥巴墙已刷过石灰水，大门也是新钉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户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约三十平方的三合土小坝子，打扫得挺洁净，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晒在牛毛毡上，会使屋里变成蒸笼。即便如此，对一个刑满人员来说，已是来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门前敲门，大门应声而开，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姑娘迎了出来，她身穿一件兰花旧棉袄，虽补了几块疤，但洗得很干净，脚上穿一双红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后面，还垂着一对乌黑的辫子，很缅腆的瓜子脸上，左眼带着浅浅的疤痕，显得比右眼小。见有客人来了，礼貌的请客人进屋。

我跨进门时，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见我进来，起身热情地招呼我。我扫视了一下这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泥墙“新房”，地下是刚刚打成的三合土，门左面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两床大红的被子，木床挡头的木架上，摆着自制的木箱。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灶旁的葵花杆，也堆放得整整齐齐。

靠床的墙上贴着一个大红的喜字，而床头的上方则贴着一张红色的双子图，女主人说，那是娘家专门从长寿县里买来的，表示娘家人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传统祝福。

我把带来的礼物放在木箱上，顺手接过大炳给我递过来的木凳，在园桌旁坐下，谈话自

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来自长寿县白鹤公社，父母双亡，有两个兄弟，都是当地农民。本应谈及她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联姻始未，包括婚姻介绍人。但她开口便将她家的粮食收成账，娓娓道来，打破了拘谨。

她说她一家四口，1978 年分得黄谷 450 斤，包谷 300 余斤，红苕 800 斤（折合口粮 200 斤）。收打的胡豆、麦子、豌豆之类统统折合口粮总计 150 斤，如此合计起来，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粮 1100 斤。四个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为一切家庭副业全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极度稀缺，这点口粮全用来填肚皮也只够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国家的棉花征购任务才能领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征购任务后才能领到；除过年过节，平时见不到猪肉；菜里是从不放油的。她讲这些时，如数家珍，全然忘记了拘谨缅腆。

虽然我对这些情况早已知道，但听她一一数来，仍让我感到惊心，再次证实农民仍处于饥寒贫苦的悲惨状态，这大抵是她愿意远嫁盐源，并跟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就业人员一起过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诉我，她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还很少有听见鸡鸣狗吠。说到这里，她还讲了一个她小姨养鸡的故事——

“小姨怀孕了，农村习惯，坐月子要杀几只老母鸡补补身子，但整个生产队已看不到鸡的影子，不知她从那里弄了几只小鸡来喂，又怕生产队知道，便把鸡用木箱装起来，关在猪圈顶上面喂。但是圈起来喂是要粮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种上了红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鸡长到半斤重左右，却被公社当书记的舅舅知道了，说是资本主义尾巴，逼着小姨杀了小鸡，砸了鸡笼。”

“她被逼无奈，只好把五只小鸡全部杀掉，当时舍不得吃，便熏好后挂在房梁上，想等到生孩子后吃，没想到被黄鼠狼叼了去，为这件事，小姨还伤心的哭了一场。”

当时的农民到了后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粮食渡荒，于是公社便成了压在当地农民头上的债主，而农民成了公社的债务人。实际上，这个“国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书记组成，在这个奇特的奴隶社会里，农民成了公社的奴隶，哪能当家作主人？

我从王大炳家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他一直陪着我走在铺满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气逼人的夜里，风已渐渐平息，从苹果园中吹过来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畅，只是在河边黑洞洞丛林深处，却隐藏着时隐时现的诡异。

近年来，新近释放来的许多文革闯将，习惯了打砸抢，把文革的畸形也带进了这鸽子棚贫民区中来，一个人单独在夜半穿过那片密林，常会遇到蒙面“好汉”的行劫。

流放者本来赤贫，谁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对突然窜出来的“蒙面人”还把一把尖刀

顶着自己，在惊恐之中，任凭对方将兜内仅有的几块钱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表抹去，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就业者们相约来到管教科投诉，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按常理讲，这狼牙府岂容抢劫？可抢劫案频发，偏偏没有抓到一个，于是一到了晚上十点以后，便很少有人单独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从那里路过，也要邀约上三、五成群结伴以壮胆。

以后当我回到重庆，更体会到在大陆，那柄对准“政治犯”的刺刀，却对刑事犯完全无能，对刑事犯罪这种放纵，使正常秩序难以维持，人们敢于公开拦路抢劫，却不敢公开反对独裁和伸张正义。

王大炳打着电筒，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俩刚刚转过蔬菜队与农三队交界的岔路口，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呻唤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我俩停下脚步，警觉起来，大炳打亮了电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电筒光下，距我俩大约二十米远处，两个人影扭在一起，跌跌冲冲地向我们走来，一股熏人的劣质酒精气味向我们扑来。

定睛看清，原来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着那个喝得已经烂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里还在不断嘟哝着“酒话”，看到这情景，我俩才感到松了口气。

大炳说，那女人的名字叫银枝，是鸽子窝棚里的头号新闻人物，传说她原藉绵阳，为生活所迫，当过“王大姐”，而被关押“劳动管教”，就地服了两年刑。获释后，被基三队的一个小伙子接到这里来安了家，但不久，小伙子暴病身亡，银枝从操旧业，成了鸽子棚区争相追逐的对象。

那女人胖胖的脸上布满了雀斑，一个大而扁沓的鼻子几乎是贴在麻脸上的，一对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华君武笔下的漫画人物，但她才三十出头，脸蛋虽丑，身材却很匀称性感，加之以颇讲究衣着，善于打情骂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来了周围更多的男人。

为她而争风吃醋的事情频频传出，她既成了窝棚区里的谈资，也成为了周围几个犯人中队的“新闻”，她虽受到许多人的指指戳戳，但也得到不少人的呵护，银枝的日子过得并不困难，她可以同任何男人相好，只要她乐意。

此时，她见我们俩站在那里站着不动，便向我们喊道：“过来帮帮忙，把他送回去。”我们便走上去，把那醉倒的汉子扶了起来。

于是，银枝接过大炳手中的电筒在前面带路，我们俩扶着他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场部蔬菜组的集体宿舍。

送回了那醉汉，我们俩才重新往农六队走，我想，这鸽子棚决不是大炳这样的老实夫妻久居之地，所以劝他在完婚后，应尽快想办法回到长寿老家去。

这年的五月份，大炳申请返回长寿原藉的报告获准，他迅速办了离场手续，回到他的故乡去当农民去了。

这一天，他专门备了一架马车，拉上所有的行李和媳妇，离开了这消磨掉他二十年青春年华的魔窟，虽然迎接他的另一个天地绝不是“福地”。

（五）再逢李培连

一天，马大炮站在六队坝子里的土墩子上，高声向坝子里吼道：“李培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昨天他的老婆坐着场部派去的吉普车去骡马堡接他出来，不久，场部还要专门为他召开平反大会。嘿！嘿!”这马大炮在故意向我们播“小广播”。

我早耳闻李培连被划为走资派的“黑干将”了，后来又听说他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前听他讲杨修故事的情景还在眼前，不料，如此谨小慎微的共产党秀才，也难逃牢狱之灾。

林扯高夺权，李培连坐监；林扯高发疯，现在李培连又官复原职。这原因在那里？监狱的看守们困惑了，什么时侯毛泽东的铁杆，才能悟出这一切原是被“阶级斗争”所戏弄？

几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怪圈里跳舞，演出一场又一场自己捉弄自己的丑剧。

好像不杀人就抖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淫威，“文革”以来贯例，每年国庆节前后，当局都要召开相当规模的公判杀人大会，“文革”高潮的几年，每次讲杀一小批，动辄是十几二十多人。

中共说不这样，贫下中农就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结果在毛共统治下饿殍遍野，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1978 年 10 月前夕，盐源免去了这一年的“公判大会”，909 各中队还免去了以“检查卫生”为名的大搜查，过去常对“反革命”敲打和恐吓的话，也收藏了起来。六队多年绷得极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一下。不过，二十多年受够欺压的囚奴们，反而感到疑虑，生怕这又是一次“阳谋”？

这一年“国庆”期间，在农一队的大坝里，与以往只放映几个“样板戏”大不相同，连续放了两天露天电影。影片十分新颖，头一天晚上是鲍国安主演的“隋炀帝”。第二天晚上放映的竟是再三受到批判的大毒草“桃花扇”。

文革中“借古讽今”这顶帽子，压死了多少知名艺人？说国民党时代艺人是任人玩弄的玩物，曾几何时，这些被“解放”的“玩物”，竟在中共控制的舞台上纷纷罹难。连玩物都不是，变成了一群罪不容诛的奴隶。

毛泽东只允许他们鹦鹉学舌唱颂歌，歌功颂德，山呼万岁。可这些人偏偏要借古讽今，恶毒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武断说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恨在心，所以必须“改造”“消灭”。“文革”中大批艺人惨遭斗争抄家，本人被逼投河上吊，古装戏因此销声匿迹。

今晚旧戏在银幕上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隋炀帝”仍属新剧，不再是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样板戏罢了。

在演出“隋炀帝”的这天晚上，我在农一队的露天电影场上，与整整十一年没见面的李培连夫妇相遇。

那天下午七点钟，我们吃过晚饭以后，便整队向对面的农一队出发。当我们的队伍刚刚跨进大坝子围墙的大门时，便在围墙外的草坪上看见了周丽萍。

1965 年，受高德胜委托，李培连调到农六队，对重刑的政治犯实行“感化”教育的试点，我和陈力便是这个试验田的“试验品”。

听说 1967 年底，李培连被打成“5.16”份子，不久就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住进了“牛棚”。

当年革命委员会曾逼迫周丽萍同李培连离婚，却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于是她的命运便像金梅那样，被解除公职，带着未满十岁的女儿，到北鸟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熬过了十年。

想不到今天，竟在这里不期而遇，她看见我以后，立即向我打招呼，十一年不见，苦难在她的脸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剪得短短的。在夜色朦胧中，周丽萍已鬓发斑白，完全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婆了。

当我走近她，正要询问李培连的下落，周丽萍却向我伸出手来。

二十多年来，我们同所有管教人员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沟壑。管教人员视我们为可以随意侮辱的贱人，而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失去人性的豺狼，彼此之间，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除了冷眼和敌意，便是警惕和小心。

记得 1966 年一次学习会上，李培连说：“我和你们仅仅是认识上的区别，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改造你们的观点，所以不应该把这种关系变成人格上的等级和界线。”这种与毛泽东所主张完全相悖的说法，也许是他的一厢情愿，也许是他的欺骗，谁知他内心怎么想？

“文革”终于使李培连夫妇跨过了与我们间的鸿沟，此时，回过头去看看这条刚刚跨过的鸿沟，便会明白这不过是毛泽东所布下人与人间的陷阱而已，否则人与人间怎会互斗，怎会互相残杀？

周丽萍扭过头去向马路上招手，我顺着她招手的方向望去，离我五十公尺左右，一个穿着灰色长褂的人正从夜幕中向我们走来。这便是十一年前这个农场管教科的才子，被认为全农场理论水平最高的李培连。

在暮色中，我细细打量他。此时此刻，他与十一年前风流倜傥迥然两样，脸已变得苍老凝重，颧骨高高突起，额头和两鬓已布下很深的皱纹，鬓边两缕白发在微风中颤动。十一年前那种自信和锋芒荡然无存，换上了一抹抑郁和失望，特别是他那件打着补丁的中式长褂，与他十一年前西式风衣显现出的潇洒外表，已迥然两人。

十年来，李培连丢掉了西方的派头，而返古到华夏古装。看来十一年的监禁生活，少不了毒打、刑具和折磨。五七干校也好，牛棚也罢，关禁闭反省也好，反正是坐牢，磨去了他原先的楞角和“威风”，冲净了他笃守的共产主义信仰。

这十年中，他实际上已沦为阶下囚，真正到了他说的“我和你们仅仅只是认识上的区别”的境界。而他善良的妻子和女儿，也因他的诛连，渡过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生活本身使李培连亲身体会到，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可不是用杨修的故事取回避而躲得开的。

时间倒转回去二十年，李培连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是“新中国”稀缺的第一批法官。那时他还没有踏进法院的门坎，而是分配到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

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李培连充当了围剿“右派”的刽子手，参与并制造了当时轰动全国的雅安农学院反革命案件。使得上百名雅安农学院年幼无知的学生和一些天真的老教授沦为反革命份子，陷身囹圄，许多人含冤死去。

这个浪潮过去后，紧接着便是大跃进。在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凯歌声中，大陆上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大饥馑。作为知识份子，李培连也许在灾难面前开始反思，也开始有所醒悟。

不久，他便从学校调到盐源农场。很快成为高德胜所倚重的人。

他在翻阅了我和陈力等人的档案以后，从 65 年开始，便鼓吹对农六队“最顽抗”的反改造份子推行“感化”教育，可能是他对雅安农学院所犯罪恶一点内心忏悔或补过吧。

在当时险恶政治氛围下，李培连敢于公开向我讲杨修之死，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其实在当时，中共内同他相类似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代表人物当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了，1958 年，吴晗是最先向右派发难的打手，章罗联盟的帽子，就是吴晗给章伯均和罗隆基扣上的，殊不知事隔八年，他却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先祭了“文革”的血旗！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李培连，恐怕已经“尝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了吧，他一定还记得跟我讲杨修故事这件事。多年以来他奉行明哲保身态度，结果同样难逃厄运，身陷囹圄。说明对独裁者取忍让和顺从，换不来独裁者的怜悯。

李培连向我走过来，并伸出了手，这十年遭遇，突破了我们之间的界线，我握着他的手觉得非常粗糙，感觉到他的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十一年前的旧事，我们都记忆犹新，想当年那些激烈的争论，以及我不顾后果坦言直陈的话，一定对他产生过震憾。否则，他也不会用杨修之死来暗示我要我学会保护自己了。

我们互道了“你好”后，就语塞了，双方心里纵有千言万语，在这种大庭广众下，一时难以畅述。此时，电影也开映了，我们三人从就业人员的队伍中弄到一条长板凳，就在大片就业人员和犯人的座位后面，安放了座位，静静观看那银幕上闪动的画面。

中国历史长河中，数以百计的帝皇匆匆而过，唯独其中的暴君，在民间广为流传，首屈一指当数秦始皇，再就是隋炀帝了。

公元 604 年扬广登上帝位，他用文帝积累的民力和财富挥霍无度，修行宫，凿运河，眩耀国力，穷侈极欲，武力侵略，用百万人民的生命来满足他骄奢欲望和扩张野心。

炀帝在位十四年间，黄河流域的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最终逼出了农民大起义，他也死于叛将之手。

李世民说他“废行德治，竭天下民力于一己侈奢”。魏征说他“穷天下之物为自己独享”。隋炀帝对内肆无忌惮，搜括民财，修建行宫，刚愎拒谏，阴险多疑，曾扬言谁向他进谏，即便当时不杀他，以后一定要杀掉他。

银幕上再现了当年老百姓生灵涂炭的一幕又一幕，使人联想到当今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破坏，隋炀帝还远远不及。

我和李培连一边看电影，一边低声议论，我们谈到 1957 年开始的文字狱，从他的沉默中，我已感到触及到他的痛处。人无论如何无奈，充当别人的枪手总会感到难堪。

于是我绕开话题，谈到文革，他依然像从前那样深藏不露，但禁不住我的追问。他说：“这是一场剿灭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灾难，也更排斥西方先进文化和伦理。讲忠孝信义是封建的糟粕，讲平等自由博爱是资产阶级面纱，殊不知没有道德规范的人，便成了赤裸裸的野兽。”

当我说到中国这二十八年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被野心家利用推行个人独裁的遮羞布。因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独裁复辟时期，他点头同意。并指着银幕上的杨广，狠狠地说“坏在他的身上”。

如此看来，那些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实践后，恐怕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了，这可是无数人用性命换的教训啊。

但愿这种认识，将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起作用。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他摇摇头说：“暂时什么也没有干，在家等待组织的安排。”语气中显示他的灰色和低调，像他这种误上共产党贼船的，年过半白，才发现少年壮志成灰的人，在中共内恐怕为数不少！

电影放完了，李培连仍陷在深深沉思中，银幕上的兵荒马乱以及宇文化及用利剑直逼杨广胸膛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阵阵余波，我相信也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反思，这种“借古讽今”的电影，能提醒台下的观众吗？文化人的苦心大概就显示在这里了。

从坝子走出来，我们就此分手，直到 1979 年我获得平反出狱，再也没有碰到他们夫妇。听人说，他已调往其它的单位，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单位，是高升了？还是另调了？但我看，李培连在今后中共的政权下，混碗饭吃倒不成问题，但要想实现他的一番抱负，恐怕就困难了。

因为，在中共的奴役统治下，不是用人才，而是用奴才。奴颜媚骨、厚颜无耻、蝇营狗苟的奴才是独裁统治所需，而有责任心、有社会担当能力、有良知和骨气的人，迟早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死敌。

（六）山沟里的平反

1978 年下半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潮，终于涌进了盐源农牧场，涌进了这堵围得像铁桶般 909 的下水道中。

近三十年来，全国有数以千计的像 909 这样的集中营，在这些“下水道”里，关押着大量的服刑者和就业人员，其中属于“政治犯”的人数，占有相当大比例，在盐源农牧场中，政治犯约占 1/3 强。

因莫须有罪名，受到刑罚、折磨、饥饿、枪杀而冤死的人数，全国不会低于数百万。由于承受不了精神折磨和非人虐待而自杀的人，可说比比皆是。

在历次运动中，当局在对受害者宣判时，往往以“恶毒攻击”，“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企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等想当然的罪名，不但毫无法律依据，而且不按法律程序，以“党的政策”和执法人的好恶来定夺。

所以，毛统治时期，狱中关押的“反革命”犯，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因“不认罪”而死于狱中者，难以计数。

在农六队这个魔窟中，徐世奎和何庆云习惯了使人“认罪服法”。只要谁公开说自己没有罪，或者写上诉材料偷偷寄出，一经发现，都要严查到底。轻则斗争，重则加刑，甚至于处死。

陈力、张锡锟、刘顺森这些被当局杀害的“反改造份子”，那一个不是为反抗冤狱而惨遭杀害的？

专制时代，骂皇帝，甚至影射攻击皇帝都是死罪，而今对毛泽东稍有不敬的言辞，也要粉身碎骨。有了中共公开提倡，小人们挟私报仇，抓住仇家对当今统治不满的言论置之死地。阶级斗争的三昧毒火，封死了申冤的门，进监的反革命份子，就别想正大光明走出牢门。

1978 年，邓小平执政，不愿去触动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不愿搬掉实行改良的绊脚石，而是利用原来的各级官吏来“拨乱反正”，工作岂有不受阻挠之理？

平反冤假错案，本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第一步，却受到旧政府衙门的重重阻碍。那有自己否定自己的道理？要翻夹私报仇的冤案，比登天还难。

所以平反并不像以往整人运动那样雷厉风行，而是被中共各级官吏软磨硬拖顶着不办。被平反的人，依然要夹着尾巴过日子，他们在落实政策办事机构的门外排起长长的队伍，像乞讨施舍的乞丐。

1978 年夏天，第一个登门为农六队平反的是从德阳法院来的人，他们对德阳监狱的管教干事蒋平富进行了悄悄甄别，蒋出狱的那一天，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家还以为他是正常调动，

调到了另一个中队去了呢。

接着是对曹季贤，李克嘉等人平反出狱，才开始了有点平反冤假错案的动静。

开始获得平反的人，原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家中有父兄在朝为官的人，当他们被“外调人员”传讯后，回到监舍，才把自己平反的消息传给了狱中其它难友，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感染了六队所有的“反革命犯”。

一时间，写申诉的人，一传百，何庆云们最忌讳的情况终于发生了，一向挥舞着“认罪伏法”大棒的徐世奎也沉默了，平时穷凶极恶的恶吏，被迫改变盛气凌人的态度。一面用“我们是执行单位”的盾牌，应付受冤人的责问，背地里想如何赖掉该负的责任。

关在六队的人，有很多是农村抓来的，写不出诉状，便来找我代笔，从 1978 年 6 月开始到 1979 年初，半年时间里，找我写申诉材料的有二十多人，每到收工或星期天，我抬出一张破桌子，在院坝里摆开书案。

在六队多年，同监人是不准交谈彼此案情的，否则，便要在大会上批斗，故一室相处多年，彼此并不知道所涉案情，到了请我写申诉状的时候，才把他们的隐情和盘托出，使我对毛泽东时代各阶层状况有更全面了解。

农六队一直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死敌的集中地。其实这个被视为反革命重刑队关押的人，绝大部份，原来都是一些很单纯的受冤者。

他们中除了不小心误撞毛泽东所设禁区外，就是被饥饿逼上梁山的本分农民，这些冤案冤情其实很简单：

有因为污损了一张毛泽东人头像，被判刑的廖某；

有因为替机关写标语，将毛主席万岁写成毛主席一岁的陈某；

有在杀过年猪时随口说了一句“猪毛算什么东西”，便被仇家诬告，说这是指桑骂槐的咒骂领袖，被判刑的；

有因忍不住说了句林彪一脸奸相的杨某；

有因为在 1959 年发现妻子与民兵队长通奸，而大骂武装部的向某；

有在 1959 年打开生产队粮食保管室，任社员一抢而空的牟某；

1959 年在万县发生的公社社员哄抢粮食事件。被称为“武装暴动”而判刑的王某（后来某作家以此为原型写成了小说《犯人李钟桐的故事》）。

……

这些冤案主人公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但他们的案情可编成毛泽东冤案录，是这一时期官逼民反的大曝光。

这一个个案件的主人公，许多是陷身文字狱的普通市民，被长期没为奴隶；更多是朴实憨厚的农民，仅为生存身陷囹圄。

六队开始平反后，何庆云的心情非常复杂，眼看过去被踩在脚下的反革命一个个获得平反从大铁门走出去，感到尴尬又担心，过去做的许多违背良心的坏事，令他心虚。在这段时间里，何庆云口中虽然将“认罪服法”改成“有错必纠”，表面服从党中央新政策。

眼看那么多冤假错案被推翻，他担心现在一风吹的案子，到今后又说犯了“路线错误”，被重新否定怎么办？所以对平反工作采取一拖再拖。

暴力不仅扭曲了受冤人，同时也扭曲了这些专政基础的打手们，以我在本文中所介绍的张剑波、林扯高、张丑德、邓扬光、庞玉笃、何庆云、徐世奎等人，他们都被荒谬阶级仇恨毒化成失去人性的打手！他们从不去想想被害人的冤枉怎样痛苦；现在几十年过去，如果他们中还有人活着，不知是否找到了毛泽东这毒根，在总结一生时有所渐愧而悔悟？

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共产党整个施政纲领全错了。同时建政不建法律，在执法中没有共同认可的标准为依据，留给执行人随意变通的空间。所以对处于弱势的百姓凭好恶任加冤害，无法无天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恰当概括。

（七）李大汉

我因腿被狗咬伤卧床的那几天，李克嘉平反获释的消息，在六队引发了一阵热议。

李克嘉也是有一定“名气”的反改造份子。十几年前，他是唯一的以“刑事犯”的名义而被长期关押在“反革命队”的大学生，在六队的十四年中，他从来没有谈到过因何入狱，想来兴许有一段不愿公开的隐私。

许多年来，李克嘉以抗暴闻名农场，他的身高一米八，体质强壮，得了一个“李大汉”的绰号，也因为身强体健，营养消耗量特别大，所以他对每顿仅只有半罐的包谷粑产生的不满也更强烈。

他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反抗饥饿的故事，收获马铃薯时，凭着他的身强力壮，可以在半路上拦住满载回队的马车，把成筐的洋芋从车上卸下，埋藏在山沟里，以备冬天饥饿时果腹。收获包谷时，他曾将整整一板车的包谷，神不知鬼不觉的交给老乡，在收获完毕后，再去那里取回。

然而久走夜路必有撞鬼的时候，老管岗楼下面的反省圈里，经常可以见到身躯高大的李克嘉挨捆挨打，日子久了，徐老大和何庆云便干脆把他分到严管组去，用枪杆子押着上下班。

然而，即使如此，李克嘉仍然将大包的包谷子装进口袋带进监舍，他那件厚棉衣里，里层缝了一条贴身的大口袋，那口袋里装十斤包谷也看不出来，他便靠这件特制的大铠甲，将地里能够掳获的“进口货”混过岗楼检查。却又经常被带班的老管识破，只要看到那岗哨下的反省区中有李克嘉的身影，便会见到他身边被撕下的“口袋”，以及从那面掏出来的包谷，剥光那棉铠甲后，便对他非捆即打。并当着他的面，将那件铠甲撕得粉碎。

然而，刚撕毁一个包，过不了几天，他又会再缝一个包背在背上，他为果腹，可谓百折不挠。

为了逃脱饥饿的折磨，李克嘉越狱了，他逃跑次数不多，但动作惊险。两年前，他从成都火车站月台上带着手铐，飞车越窗而走。回来时，竟被用钢丝捆着手臂，其形状之惨实在罕见。

然而，李克嘉与“火炬战士们”不同。我们不大交流对于独裁政治的看法。1976 年因为四个洋芋人，他几乎被林扯高置于死地，这个洋芋人事件，是纯粹巧合，还是知到共产党权力争夺的内幕？我不得而知，也没有交流过。

但是，一场反“四人帮”的傀儡戏，却使他因祸得福，那次被关进小监不久，便从小监里放出来，紧接着获得平反，这里面一些情节，使人猜测他与中共有无人知道的关系和隐情。

现在，李克嘉就要出狱了，他是六队最先获释的“反改造”尖子，离开六队那天，人们向他祝贺。在他启程返回云南大理老家时，临行前，取出了一本珍藏了十几年的“乐府诗选”送给我。

他珍藏的这本书，得以保存至今，可谓珍贵之极，算是十四年朝夕相处的记念。

我打开它，上面题有（赠别）五律一首：“来时风萧萧，别去正花朝，并辔多殒命！遗谐意应高，文明天地久，大业永不凋，四化更新日，诗书念我曹”。这么多年来，赤手空拳同兽警们的斗争，使我难以忘怀。

相别后，我听人说他去大理投奔他当省委书记的大哥，并担任过县文教局长的职务。以后他还参加过市长的竞选，他期望的“四化更新日，大业永不凋”，将遭遇什么结果？我自有看法，加上我们政治追求不同，以后就断绝了联系。

2009 年 4 月上旬，我返盐源会见幸存难友时，难友们对他嗤之以鼻。

据难友说，陈龙富于 1985 年逃亡路过云南找到李克嘉，本希望得到他一点帮助，但李克嘉不但不念昔日难友之情，反而先隐住陈，然后偷偷向公安局报案，并领警察来捉他。幸好陈龙富及时发觉逃脱，才免遭李克嘉暗算。这种出卖昔日难友的行为，使他成为大家心中不耻的小人，这是后话。

这年五月雨季来临时，有一天郭川小把我叫到队部去，说队部决定：从今天起派我出去看守五号梁上的包谷。按六队规矩，凡单独外居的差使，不是政府信任的人，便是将刑满释放的人，这种差事是何庆云、徐世奎决不交给我的，我预感到，我出狱的时间已临近了。

郭川小通知我后，便催我赶快回监收检行李，当天就搬到看守棚去。

（八）劳改队的狗也伤人

1979 年的四月的一天，我到林业队去。田井陌托人带来“口信”，说他回重庆时，专程去北碚看望了我母亲，说她现在已平反，生活好多了，盼我早日回家，还给我带来二十斤粮票和

一些副食，要我去他那儿取回。

第二天中午，我趁拖拉机在四号梁子耕地的时间，翻过山梁去了林业队。

当我翻过山坳进入油库弯时，踏着两年前拼着性命造出来的大寨田坎，脑海里重现那幕令我不堪回忆的图景。

修筑堤面宽度达 1.5 公尺，最大高差 30 米，长 100 多米，俨然一个小型水库的拦洪坝。然而这“坝”仅是一块干田的田坎，为了这“政绩”，我们被驱使曾每天 16 小时苦战。农场的“官”哪里把我们当人在用？

那年冬天的夺命苦战油库湾主体工程虽已完毕，但这项工程所带来恶果，很快显示出来。

经过两年雨季洪水冲刷，梯田两侧的排洪道，已塞满了泥沙，洪水越过沟渠，灌入田中。用泥土堆积起来的田坎，在洪水浸泡下纷纷跨塌。落差最大的七号田，已被冲出了几段缺口。所以这两年，雨季一过，只有派人对缺口进行“修补”。

此时正是初春时节，基建队正在用混凝土重新安装排洪涵洞。

中午时分，修补田坎的就业人员都已下班回队吃饭，田坎上散乱堆放着工具。当我漫不经心地从那里经过时，忽觉身后一声响动，一股冷风从身后向我袭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就觉得左小腿肚子上被猛烈地叮咬了一下。

我回转身去，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灰色大狼狗，正恶狠狠瞪着我，两排锋利的尖牙上还衔着从我棉裤上撕咬下来带血的棉花。那畜牲两腿前扒后蹬，一副跃跃欲向我扑过来的姿势，如果不是那铁链的约束，我不知会受它多猛的袭击。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左小腿，棉裤已被这牲畜撕破，血顺着裤脚流到了脚跟。一股怒火从我胸中燃起，心想我已被人欺侮了二十多年，今天这畜生也来吃我一口？便忘记了疼痛，顺手从地上操起一条青岗木扁担，朝这条牲畜劈头盖脑的砍了过去，那畜生的背上头上和腿上已连连被我击中。

那畜生出乎意外的受到猛烈反扑完全被震住，慌忙掉过头去，抱头鼠窜，那穷凶极恶的吠叫，变成一迭声凄厉的告饶声。最后卷缩着身子，将头埋进了凉棚的席子下面，发出一长串凄厉的哀嚎，任我在它的屁股和背上猛打。

听到大狼狗连声哀嚎，田坎那一端，三个人没命的向我跑来，边跑边喊：“打不得，打不得”。我认得是场部蔬菜组看棚子的人，等到他们跑到，我才收住扁担。那年长的喘着粗气向我喊道：“别打了，这狗是李队长花两千元买回来照看苹果园的，今天把它借来，让它看一下工具。你若把它打死了，我们可赔不起。”其它两人死死地抓着我的扁担。

我狠狠瞪了三个人一眼，看了看那只把头死死埋在席子里的牲畜，它身上几处已渗出了血。便扔了扁担，弯下腰卷起那被狗咬伤的左腿裤脚管。血已渗了半边裤腿，在揭开的地方小腿肚中间，露出一个血肉模糊酒杯口那么大的伤口，血从伤口处不停地往外涌。

三个就业人员蹲下身子，一面看我的伤口，露出不知是同情还是畏惧的眼光，并连连摧促着我赶快去医院做手术。

从那儿到医院少说也有三里地，我看了一下伤口，思量了一下，头也不回大步地沿着那条通往场部的大路走去。血顺着我的小腿流到了后脚跟，又一滴一滴地洒在我走过的马路上。所有过路的人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当我匆匆跨进场部蔬菜组的大门，蔡干事从里面迎了出来。他看我这副尊容，显出惊奇的样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坐下以后，向他简单的讲了刚刚发生的事，并说明来意，请他把蔬菜组的马车借给我，把我送到医院去。

他看了看我的伤口，说蔬菜组的所有马车今天一早都被派到城里拉化肥，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只好派两个人，用板板车把我送到医院去。说完，要我坐下稍等一下。

五分钟以后，我便坐在板板车上，由两个人拖着向医院走去。

进入场部大楼大门附近，已是下午一点钟了，不知因为刚才失血过多，还是打狗消耗了大量体力，我的肚子特饿。

从怀里摸出三两粮票和一块钱，交给两位拉车的人，请他们到场部食堂弄点饭给我吃。他们接过我的饭票，不一会儿便端来了一大碗。板板车周围聚满了即将上班的就业人员，他们向我问长问短。

这时，刚调到场部蔬菜组的杨厚模走过来，向我喊道：“你要出狱”了。

我不解地问：“何以见得？”

他一本正经的说：“狗都在撵你，便是预兆。这劳改饭你吃了快二十年了吧。总算被你熬出头了”。说着，板板车重新启动，一路上碰到不少熟人，都说被狗咬伤是一种吉兆。

这一天，非但没有到田井陌那里去取回母亲带给我的东西，反而伤成这个样被人用车拉到医院去。但我对这条伤人的恶犬，已重重教训了它一顿，打得它连连哀嚎，出了一口恶气。一路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祝福，使我的心情感到舒畅。

车到农一队门口，适逢抽水房的李相华从那里经过。他看了我的伤势，说他这就回队通知郭队长，请他下午派马车到医院来接我回队。

下午两点钟，板板车将我拉到了医院，在两位拉车人的协助下，我被送进了手术室。值班的医生看着我那么大的伤口，又看我几乎毫无反应的表情，便马上为我消了毒，剪去已经被咬翻的那些皮肉，打了破伤风针。

为我动手术的医生问我打不打麻药针？我摇了摇头。逢合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从此以后，在我的左小腿肚子上，留下了一道足有八厘米长的疤痕。

下午五点钟，彭文学奉命驾着马车来接我，回到六队后自己走进监舍，直到这天深夜，原先被兴奋所抑制的痛感才开始发作，这一夜，我辗转未眠，痛彻心扉。耳朵里响彻着杨厚模

的叫声："狗都在赶你了，该回家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该回家了，牢底坐穿了，人也到中年了。我生命最灿烂的时光，都被冤狱无端消耗掉了。未来的岁月，前途未卜，吉凶难料。疼痛直到天明，一夜无眠。

因为腿伤，郭川小特别批准了我卧床休息。在狱中二十年，因这么一点伤，竟破例卧床休息，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一周卧床，配以吃药消炎，伤口没有发生炎症和异常。

闲来无事，便想起了给母亲写信，信上虽然说我被狗咬，但笔触却很轻松，二十年的苦难磨出来的人，被狗咬了这么一口，实在算不了多大的事。

殊不知这轻松的一笔，却急坏了千里之外的母亲。正巧与她同看此信的还有一个名叫邹银双的女医士，本是北碚防疫站的一名干部，巡回下乡，驻在蔡家场医院。在她得知我被狗咬以后，专门去防疫站为我配制了狂犬病的疫苗，用航空寄来。只是那药寄达盐源时，我早已拆线痊愈，并下地劳动了。

接着，母亲在第二封信里，除询问我的伤情，还付有邹银双的照片。母亲来信介绍她今年二十六岁，一直还未出嫁，因为同情母亲的遭遇，在蔡家医院便认母亲作了干娘。她读过我寄给母亲的那些信件后，不但羡慕我的文才，也同情我的遭遇，并暗示母亲，愿意等我回到重庆。

那一封信提醒了我的婚姻，这本是人生大事，而今像我这样的四十开外的老童子，恋爱已被冤狱埋葬。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处在生死未卜中，忘却了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每天只盼着有一口饱饭吃，不挨饿，不受人侮辱！哪有条件去妄想女人？。我凝视着那张像片，她会成为我未来的妻子么？于是我对那相片长叹一声：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时多？去时朝云无觅处。"

后来，每当我看到这张像片，便想到在母亲的身边竟有一个女人等着我，便感到心跳脸红。

第二节 看守庄稼

这些年来，不知是老百姓特别饿，还是特别穷。农民们从阶级斗争的紧张关系回归现实时，释放出一种追求物资的暴发力。

农场周围的老百姓一直对拿着枪杆子，强迫他们的农场头们怀着敌意。偷农牧场地里成熟的庄稼成了—股风，开始时，是个人在夜间的行为，守庄稼的人一般都在白天，任务是防止附近老乡放牧牛羊群时，因无人管束而伤害庄稼。

白天值班的人说，一片片刚种的马铃薯晚上被人"挖去"，由个别人的小偷，渐渐发展到大批人的奇袭，有一天夜里就挖掉十亩地的洋芋种，从足迹看，至少也有二十个人来过。

面对老百姓的行动，只好加强防范，晚上，每个山头增派两个人驻守，发现有人立即吹哨警报，这种消极的防范，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因此使老乡不来夜袭，所以新增了巡逻队，我便是指派的巡逻人之一。

（一）首次外宿

得到指派后，我回到监舍，收拾行李。周围的人都围着我询问，是不是被释放回家了？哪一天动身？当他们知道我被派出去守庄稼时，都劝我，不要去招惹老乡，以免引祸上身。说这里的老乡极野蛮，晚上出来偷庄稼都带着刀子和棒棍，对于阻拦的人，轻则棍棒相加，重则刀劈斧砍。

但凭我对老乡们的了解，虽个别人性情凶悍，但绝大部分是山区农民，他们对统治者恨，但又无可奈何，对“犯人”经过了解，越来越同情了。

下午两点钟，我背上了被盖卷，端着面盆和碗具，暂别了我的难友们。

十八年了，我第一次在山坡上单独住宿。与我同时派去看庄稼的还有老吴，他提着一盏油灯，我们收拾好那庄稼棚中的凉板和稻草，天也渐渐黑下来。

当夕阳滑向西边的地平线时，漫漫的雾气从山底下升上来，渗入到那黄昏夜空中。此时，若站在山梁上向西看，牧羊人被夕阳染得特别红，在他们鞭子指挥下，牛羊群转过山坳，渐渐地隐匿在山后面。我和老吴直到天色黑尽，田野里草虫争鸣才回到小屋。

第一个夜晚，蚊鸣四起，我和老吴回到屋里，将白天采来的青蒿架在包谷杆上，熏出浓浓的青烟，顿时安静了许多。

这一夜躺在坑上，精神特别兴奋。侧身去看从门口映进来的晴朗夜空，繁星点点，又将我带回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知何时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我赶快爬起身来，沿门前那条二十米宽的过道开始跑步，享用这清晨新鲜的空气。

太阳还没有露面，那东边牛毛山下青灰色山峦中，早行的牧羊人，已在山坳唱起了悠扬的山歌。不一会儿那牛群羊队，一个一个从山间闪身出来，这诗情画意在内地是见不到的。

由于我长期生活在六队高墙内，一直都没有机会接触和认识周围的农民，特别是经常来到六队地界的牧民们。守庄稼后，我很快同这些牧羊人认识并建立了友情，他们是上了年岁的老妇人和十二、三岁的孩子。

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代，能同大人们一道放羊的，不是生产队长的孩子，便是会计的孩子。大人划着界线，但孩子们却不以为然。

同孩子们交谈，知道他们只读过小学一二年级便辍学了，我记得他们中最小的年仅十岁，他能够非常自如的跃上牛背，骑在牛背上做着各种动作。他们对村里大人们发生的吵嘴打架从不隐瞒的告诉我，只是因年岁太小，还弄不清楚那段岁月中“人民公社”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我看山中，有缘认识了两位老大娘，一位姓刘，那是去年秋耕，我和李进驾着拖拉机在北坡的荞子地认识的。

六队收割荞子，地里照例是撒得遍地都是，队部的家属对它们不感兴趣，如若是流放者去捡，就只能拿去作饲料，若要是谁拿去吃，被何庆云们抓住，那就是自找麻烦。所以，那些荞子都烂在地里。

这个秘密，被那位刘大娘发现，于是在拖拉机正要翻耕的地里，她便来了一个“小秋收”，殊不知中午时，她背着背兜，翻过山梁时，被看山的“抓住”，硬说她是偷的，不准她背回去，双方僵持着，满山都是骂架声。

正在这个时候，我和李进走过去，替她证明确实是地里捡的，才使她得以脱身。两天以后，当我们在另一个山梁上耕地时，老远就看见她在地边向我们招手，待我们停下拖拉机，便见她提着一个口袋向我们走来，口袋里装的是一块羊肉。不容我们的推辞，说什么也要让我们收下。最后我们只好掏出身上的三块钱才收了她的“礼”。

这一次我守庄稼棚，第一天便见到她和另一个大娘，正向我们的小棚子走过来，走到跟前，我从棚子里出来向她们打招呼，让她俩走进棚子里。她向她的同伴介绍道，“这是小孔，开拖拉机的。”又指着她的同伴说：“这是詹大娘，梅雨六队的，我的邻居。”

两位老人年龄都已六十开外，与我母亲相当，只是山里人，劳动成了习惯，所以身板很结实，那詹大娘，右眼正在发炎，经常眼泪滴答，她说山里人穷，没钱去盐源看眼睛。

她俩放牧的羊群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从此以后，她俩便是小棚里的“常客”。在山上，整天守候着牛羊群，加上这些牲畜又必须在有草有水的地方，从早到晚是不会回家的，中午的饭菜便在前一天准备好，用特备的罐子装好，装进帆布包，到了中午打开挎包，就地撇两根树条当筷子，席地而坐，便吃起来。

山里人长年如此，并不在乎饭菜的冷热，饭后也不喝水。在我们看山前，两位老人中午从来没吃过热饭，喝过一口热开水。

山坡上除积水凼中的雨水，要喝干净水是没有的。我和老吴是趁去伙食团打饭时，用盅子接一盅水到山上洗脸洗脚，山上多的是前一年留下的包谷杆，只消三个石头一架，自制的铁钵便是锅，喝开水热饭菜还是很方便。

我们来后，这棚子也成了她俩中午热饭喝水的地方，我们彼此一天一天更熟悉了。从那以后，她俩每天都要带点牛羊肉来，表示我们为他们提供生活上便利的谢意，中午“共进午餐”的时间，也是我们拉家常的时间。

詹大妈眨着流泪的左眼试探问我：“你为什么会到里面去的”？我明白她的困惑，她们所听到的宣传，把我们描述成什么样的恶魔我们并不在乎，这年头中共的颠倒黑白已成习惯，所以尽管我们被说得如此可怕，相信的人并不多。

但是事情的真像，对于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却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面对她的提问，

我只淡淡一笑，随口说，农村里五类中，反革命排第四位，问道："你们村的反革命难道都是杀人犯么？"她摇了摇头，这样类比，使她明白，我们是些受苦人。

"你今年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人吗"？詹大妈继续发问。

"四十二岁了，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也同你一样大年纪。"听我这么回答，詹大妈叹了一口气。她的大儿子是梅雨六队的队长，今年已四十岁了，算是我的同龄人。

"你进那里面究竟是为什么，你判了几年？"她重复地问我，显然想知道我的身世和底细，但是，怎么告诉这位面善的老人呢？说自己是反对政府她们会有什么反映，惊异，恐慌还是同情？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她们会理解吗？说自己被监狱看守无缘无固欺压，她们能相信么？

想了一会，告诉她："我是一个右派！刑期是二十年，已经坐了十九年了。"两个老人听了顿时一惊，面前这人怎么在监狱里关了十九年？那定是很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就是拿枪造反？尤其她俩想不到，我入狱时才二十二岁，惊讶的问道"啊呀！你怎么二十二岁就进监牢了？"这口气对我这个文弱人这么年轻，在监狱中关押了这么久很惋惜！

从那以后，两位老人一有机会就要问我，年纪青青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的勾当？不满足她们的好奇心，是不会罢休的。

有一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就坐在西山坡，面向梅雨镇，我向她们讲述了二十二年前的故事：我如何在大学读书，学校如何的大鸣大放，我因为什么而被划成右派，以后，又如何去农村劳动考查，如何不服，又如何被处十八年徒刑，又如何反对三面红旗加刑为二十年。

当我讲到当年的饥饿，唤起了她们的共鸣，梅雨公社也一样的树皮草根都吃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得了水肿没法救，詹大妈的老人就是那时候死的，埋在梅雨的山脚下。于是两个老人不断地叹息，不断的安慰我，说我命太苦，唠叨着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她们告诉我，在这二道沟和梅雨镇间方圆几十里地，几百户人家中除了两个高中"秀才"，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不识字的村民对"秀才"的仰慕，虽经文革浩劫，也一直没有改变，供在堂位正中的灵位上，"天、地、君、师"从未移过！

随着交往的加深，詹大妈在我的同意下，把两个正在小学读书的孙子，带到我的棚子来，那天，她要两个孙子为我行了拜师礼，对我说道："我们乡里人就盼一个有文化的人，让他们跟你多识几个字。"从那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在我的庄稼棚里便多了阵阵孩子朗朗的读书声。我乐意这样做，不独以此来表达对老人的关怀和谢意，也以此来消除我和老吴的寂寞。

两个孩子大的在梅雨公社办的带帽中学读书，小的在公社小学读二年级，大妈告诉我，他们没有老师，教他们上课的是村里的会计，每天上两节课，有时候会计有事，整天就放假，他们只好在家割牛草，喂猪。大孩子已十三岁，连小学课本上的字都认不完。

詹大妈给我送来的"束修"之礼，是我多年没见过的核桃和蜂糖，我只有拿出平时省下来的零花钱，偷偷塞在她的帆布包里，可是第二天就退还了我，这使我明白，她们发自对孩子

们的母爱。

看山守庄稼的这段日子，母亲几乎每十天给我写一封信，来信告诉我说，她的问题已经获得改正，右派帽子不是“摘掉”而是“吹掉”的，并说她正在跑重庆大学，每一次都把重大对问题的复函夹在信里给我寄来，我知道这些信洒着她的汗水，那时我还不知道乘坐重庆市的公共汽车有多么打挤。

出山后，生活渐渐走了正规，每天上午绕着放牧牛羊的跑道上小跑，活动四肢，兼有检查所辖八百亩包谷地有无异常情况，便与老吴轮流着回队取饭菜，下午六点到晚上八点钟，为两个孩子补习，直到夜色朦胧，送走两个孩子，我便去沟边取水，洗脸洗脚，有时借浩月当空，对着一轮明月，我坐在棚子前的青石板上，取出二胡拉起“苏武牧羊”来。

幽扬的二胡声常带我到埋于山岗前的张锡锟、皮天明“坟前”。其实那里并没有坟，残暴的当局是想把他们彻底的消灭掉，不留痕迹，但怎么都无法消除烈士们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伟大形象？

恰好，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是张锡锟遇难三周年的日子。原先火炬的成员，陈蓉康邓自新已分别回了家，其它战友已经云散。这天我又去了那里，我站在他们葬身的乱石包前，向那里行了三鞠躬，并将一柱香插入乱石中，默默对着苍天，天地若有情，怎么允许这些英雄从中华民族中抹掉？我想天地中正气永存，中华民主事业永存，火炬精神也将永存。

守山的日子，比之在监舍小组中，确是轻松多了。包谷没有成熟的那一个多月里，我还常常在夜间去场部看电影，有时和两个孩子一齐去。一个月后，那包谷的植株长到两米高，茂盛的包谷林，密不通风，已背了半尺长的娃娃，挂着淡红色的须。

记得当年才到这里时，这五号梁种的荞子植株不到半尺高，秋收时连投下的种子都收不回来。后来，利用毛牛山上运回的腐植土，配以化肥，种下包谷的年产量逐年升高，红土地也变成黑色，原来过去土地荒成了红土，变成“鬼不生蛋”，仍是“人祸”造成的。

徐世奎对我在山上的“劳动”似乎永远都不会放心，经常在中午，大家休息时出来查哨，说现在包谷已是怀胎时节，必需须加强守护，对我和老吴明确规定中午时节，我们必需在包谷地里看守。

为防止他在中午突袭检查，所以中午我们不会呆在看守棚里，而是披着一床蓑衣，钻进茂密的包谷林将蓑衣垫在地上睡午觉。

有时，我在包谷林中睡着了，被詹大妈发现，她责备我说：“睡在潮湿的包谷林里会受凉生病，也会得风湿，老来会得大病，如果你今后回家，你妈看你一身是病，会很伤心的。”

我口头上虽然答应改正，但中午时间太长，在包谷地“午休”实在是无奈的事。

有一天，我在去农二队那条小路上不远处，在包谷林里铺上蓑衣开始睡觉，不觉进入了梦乡。晃惚中听到两个过路人的讲话声，那声音很熟，我被惊醒，侧起身来透过包谷叶缝向外望去，原来是农二队的两个干部，正坐在距我藏身处十公尺的路旁歇脚，其中一个是农二队的

中队长，人称夏麻子的。另一个便是农二队的王事务长。在包谷叶的庇藏之下，路过的二位并没有查觉出我。

只听见那夏麻子正大声嘎嘎的吼道："政治犯都要平反了，这是今天的政策，你没见吗？老邓上台了，中央组织部换人了，胡耀邦当组织部长了，他说全国各地落实政策进度太慢了。你没看到吗？过去只要说错了话进监的统统都要放。"

那王事务长界面道："我就不相信，难道过去抓的反革命都是好人，造成冤假错案都是党的政策失误？"，听去，他在发牢骚。

夏麻子就比他高明，他回答道："这叫政治路线，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路线，连邓小平都几乎成了中国反革命的总头子，今天却是邓小平掌权了，又变成邓小平路线。过去不抓人是错误的，今天不马上放人同样是错误的，这叫路线斗争的需要，懂吗？"

夏麻子这番开导却招来了王干事的泄气话："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你我不如趁早收拾行李回家当农民去。"这担心同徐世奎一模一样。

两个人说到这里，便站起身来拍拍屁股，径直沿着放牧大道向场部走去，我也从地上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目送他们走下山坡，消失在转弯的地方。

（二）夜袭

连日天晴，五号梁上的包谷，已由一片葱绿变成橙黄。庄稼渐熟了，收割季节也越临近，越接近收割时候，我们越感到紧张。一个月前老乡们对洋芋的兴趣，现在加倍转向这片长势良好的包谷。靠路边的一圈包谷已经稀稀拉拉，被人光顾得差不多了。

我们对于老乡的兴趣是理解的，人民公社使他们一无所有，农民对粮食的紧张比市民更甚。他们偷劳改队的庄稼与我们实在毫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犯不着拿命去同这些带"武器"的农民较量，能够做到监守不盗已非常不错。

为避免口舌之争，我们将那搬掉包谷留下的光杆一一砍掉，为彻底消灭痕迹，我和老吴还点火把它们烧掉。刘大妈问我们抓到过偷包谷的人没有？我只笑了笑答道："抓了又怎样，不抓又怎样？"话已讲到这里，我便把前天中午发生的事，向他们一五一十讲出来。

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老吴就注意到四五个妇女背着打猪草的背兜，从梅雨偏东的方向钻进了包谷地。直到中午时分，一个妇女，背着满满一背沉甸甸的"猪草"，从那包谷林里钻出来。估计她在地里已潜伏多时，想到中午时分，我们回队拿饭时，才走出包谷林。

老吴却一直注意这几个人的动向，见这女人慌慌张张钻出包谷林，便追了上去，拦下了她的背兜，将那"草"哗拉一声倒在地上。一背去了壳的黄橙橙的包谷倒了一地。可万没想到那女人立即要起横来，反诬一口说老吴对她动手动脚的。

此时包谷林里埋伏的其它几个"伙伴"，一齐从包谷林里涌了出来，将老吴包围起来，刚才那女人仗着人多势众，反而把老吴揪住，要把他弄到公社大队的武装部去。其它的人扬言，要把老吴捆起来。

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说，这些包谷地原来就是梅雨三队的土地，地里长着牧草，是大家放牛羊的地方。而今你们来了，拖拉机翻了地，就连地边的草皮也被铲完。冬天牛羊没有草吃过不了冬，全是劳改队造成的。

我们今天在地里掰几个包谷是应该的。你们还倒我们的包谷，没收我们的背兜，当真认为我们好欺不是，叫你们队长来，我们也不怕。

我听他们的七言八语，正寻思如何解脱老吴的困境，郭队长已带着五六个人闻声赶来。那一群妇女见来了那么多人，毕竟还是心虚，一个一个都溜走了，唯独剩下刚才倒掉包谷的那女人，她说包谷也不要了，只要把背兜还给她。

我从地上拾起那空背兜，递给了那女人。那女人接过家伙，飞也似地跑下山去，追上她的同伙们。

我刚把故事讲完，跟着詹大妈一起放牧的小男孩从外面走了进来，神情十分神秘地附在我的耳边告诉我说："今晚梅雨三队的人集体出动，要来几十个人全都操短刀和木棒，你要小心"。

这孩子从不说假话，一群武装的农民，就要在今晚光顾包谷地突击抢收了，这些缺吃少穿的农民，把怨恨发泄在自称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身上，虽然来者气势汹汹，但他们怎能改变处于弱势群体状态？我们是奴隶，本与我们毫不相干，自可跳出圈外。

明知今晚要生事，为了自身安全，今夜不在棚中睡觉，或去詹大妈家，或就那一个山沟野壑蹬一夜，任村民们自便。但郭川小那里怎么交待？况且逃未必是上策，弄得不好，农民反而不会饶过，想到自己处在被人吃的地位，在这复杂的情况下不好处理。

中午去伙房拿饭时，我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川小。

那一夜，正逢六月下旬，一轮残月在晚上十点钟才爬上东边山头上，月光映着这片广阔的山梁，静静地，没有风，虽盛夏却很凉爽。沟壑中一米多高的青蒿草丛中，争艳山丘的十样棉花，在月光中，黑耸耸一丛一丛令人感到迷惑。

好像，那最深的草丛中不知什么时候，已藏伏着手提短棍的夜袭者，他们仗着这些草花的掩护窥视我们，准备在我们没有提防时蹿出来，将巡逻人打昏在地扑向包谷地……

郭队长派来近二十名增援者，每人都带着短棒和面盆，天黑前，就已聚在我和老吴的棚子里。大家讨论怎样对付今晚的"武装冲突"，意见一致，今夜只能虚张声势：一面不断游走，一面敲打竹筒面盆，使整个山上都有声音，告诉那些暗藏的偷袭者："这里今夜有大队人马看守，你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叮嘱大家，短棒是用来防身的，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动手。即使发现了偷盗的人抓到了赃物，最好倒掉他们偷的包谷，劝他们回去。

守夜者按照商订好的办法，当夜幕已将山头封住时，一迭声的喊声和口哨划破了道道山梁。二十几个人编成六个小组，从不同地点轮翻呼喊对面山头上的人，有意的怪叫和大笑，还

有人长声幽幽的唱着山歌，好像整个山头上都是看露天电影归来的人。

然而必尽劳累了一天，精力渐渐不支，随着夜渐渐深沉，山头上的人声也渐渐地稀疏下去，有的喊着喊着却传来了鼾声。

就在各山头渐渐“静”下来的时候，危险也正一步步的从山沟中涌了上来。

此时郭川小带着五六个小伙子，从四号梁那边吆喝着朝这里走来。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条青杠扁担和一支电筒，将那些已睡着的守山者重新唤醒。老吴故意向郭川小那方向询问已是几点了？对方回答已是凌晨两点钟了，分明提醒夜袭人：时间不早了，回家睡觉吧。

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突然听到靠梅雨方向的山沟传来了吼声，接着离我大约只有二十多公尺远处响起了急促的跑步声。没想到，如此层层设防，偷袭者还是潜入了包谷林，那里面传出掰包谷的响声。

守夜者惊动了，十几支手电筒同时射向那个方向，包谷林中哗拉一声响，一支背背兜的人马从里面撞出来，朦胧中黑压压一片。我同几个人跟着向那个方向跑去，一脚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交，爬起来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一尺多长的玉米棒，打开电筒一路照去，那路上稀稀拉拉到处都是。

看来偷的人心很虚，只顾逃跑却把刚刚到手的战利品丢了一地。我们把他们赶出了六队地界，郭川小便鸣哨收兵，一路上将洒在路上的包谷捡起来，送到晒场上去。

没过多久，东方已呈现鱼肚白。一场夜袭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对付过去了，一晚上没有睡觉，虽然嗓子喊哑了，但终于没有出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夜也和平渡过了，正当郭川小集合大家，布置白天休息和劳动时，突然代朝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队部门口靠核桃林那半边坡上的包谷昨晚被盗。郭川小闻讯，脸色一沉，没想到昨晚的夜袭者竟玩起声东击西的计谋来，见五号梁子防守严密难于下手，便将大队人马游击到队部门口下手了。

连忙率众赶到三号梁子。大家还没有走拢，便看到那地里杆倒叶垂狼藉一片。顺着那坡地向油库弯那条路走去，在坡边的一个深岩坎下，留下了一大堆夜袭者撕下的包谷壳，估计那数量至少几千个，面对这堆包谷壳郭川小直摇头。

大家回到六队坝子里已是八点钟了，他临时作出决定，早上出工除蔬菜组留下少许办菜的人，其余人全部投入突击抢收，这一年的秋收“就这样提前了。同往年一样，在大队掰包谷的流放者后面，照例跟着“小秋收”的干部家属，而一夜没合眼的守山者，只给了不到四小时的睡眠时间。

昨夜表明，别看这边远山区的农民，不乏组织能力极强的人，干脆今晚改变战术，用埋伏静听的办法，守株待兔。发现异常后立即相互通知，集中人力以对付来袭者。除了五号梁子的包谷地，其余的人，一旦有动静便立即打口哨，以集合各路“人马”。

大家分了组，按郭川小布的点埋伏下来。这一夜虽是阴天，但山上依然朦胧可见。

大家静静等候，11 点钟过了，老吴急急地向我们走来，一面压低嗓门向我们喊道：“听见

没有，靠农二队那只角有响动。”大家屏住呼吸伏地细听，果然那边传来了轻微的劈帕声，大家一齐向那方向奔去，那起初微弱的声音越来越清楚。

就在距我们不远处，包谷林深处传来由掰包谷和脚步声混合而成的声音，少说也有几十个人，眼下就要同这些夜袭者“短兵”相接。大家都在思考：怎么同这么多夜袭者交手？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明白，夜袭人为防止被人逮住，腰间都别有武器。几天前农二队还发生过守庄稼的就业人员，被强袭者用镰刀砍伤的事。谁也不愿冒险，正僵持着，一片火光向这里游来，郭川小率领一支巡逻队五分钟以后，同我们会合。

面前这片包谷林，顿时被火光照得通明，大家藉着这股力量，齐声发喊向包谷林中围了过去。里面的夜袭者惊慌起来，哗啦哗啦的从包谷林纵深处向外“撤”，火光中看得清楚那些冲出“重围”的，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全副武装的强盗，其中大半是头缠白布的妇女。

只见她们一手提着背兜，一手用力拔开阻止她们前进的包谷杆。当她们从包谷林纵深突出，到达地边的小路后，便向山沟方向奔去，那些刚刚掰下没有撕去壳衣的包谷，撒在山坡上到处都是。

刚刚追过第一道山沟，却被一阵迎面打来的石头堵截回来，唯独两名中年妇女，被郭川小们拦住生俘。守夜人将她们围住，不知道因为害怕还是在火光下怕被人认出，她们把头埋得很深，围在头上的大白布帕，将她们的脸遮得很严实，只有她们身上已很破烂的补巴衣，在刚才突围中被包谷杆撕成了几大片。

其中一个脚上穿着很旧的布鞋，也不知被那一根埋在地里的包谷棒，扯断了鞋绊，只好拖着鞋站在那里，使她显得别扭而又可怜。这山里的农妇，因为穷，平时下地干活是从不穿鞋的，今晚出来夜袭，把只在家里上坑时才穿的“当家鞋”也穿上了。

就这么打扮的两位被俘者，手腕里斜挎着两个大背兜，背兜里只剩下了几个包谷。我藉着火光注意去看，她俩的腰间确实挎着镰刀，但却并没有棍子和其它凶器。看来这是两个典型的农家妇女，与“暴徒”完全是两码事。

她俩站在火光下，一句话都不说，也不抬头，围观的人七嘴八舌说起来。郭川小向她们问道：“你们是那一个生产队的？”对方没有回答也没有动，好像木头人一样，“你们偷六队的庄稼有几次了，今晚来了多少人？”对方只是略微的抬了抬头，依然绝口不答。

“你们是哑巴呀！”老吴插嘴道。“你们这些人，平时小偷惯了，今晚你们抢劳改队便是抢国家，抢国家是犯法的，要劳改的啊！”

也不知道两个女人是被吓着了，还是压根就反感，仰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能脱身？依然不说话。“好了！你们两个自己说，今晚的事该怎么处份你们？”郭川小继续的追问着。此时两个女人才微微挪动了那白帕巾，露出一直藏匿的脸，嘟哝着：

“今晚怎么这么倒霉？包谷没偷着，衣服都撕破了，鞋也弄坏了，二十几个人都跑脱了，就剩我们俩了，唉！都怪那鞋子不争气。”，拖着鞋的女人狠狠把那双鞋！脱下来向背兜里一掼，

把几个还剩在里面的包谷全都抖在那里。

"队长，我们这是头一次，就放过我们吧！"她俩微弱的声音，将自己心里的虚弱暴露无遗！

"抓住你就是第一次，没有抓住的就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现在把你们带到我们那里面去，关在小监里，再通知你们的队长，明天取人。"郭川小吓唬这两个乡下女人，他一边说，一边还在笑。

然而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却当起真来。连忙喊道，"队长，我们真是头一次，就放过我们吧！"喊声里一片恳切。

此时那些驱追夜袭人的守夜队员都纷纷回来了，残月从偏西方向的厚厚云层里钻了出来，时间大约已是凌晨两点了。郭川小向两个女人正色道："这一次念你们是第一次被我抓住，且放了你们，但背兜必需没收，下次您们如果再来，被我抓到就没有那么便宜了，起码要把你们关几天禁闭，你们听见没有？"

两个女人听说放她们走，拔腿要走，但随后便回过身来，去拿自己的背兜，被喝住。老吴把那个脱了鞋的女人的鞋从背兜里甩给了她，两人才捡起了鞋，依依不舍怏怏离去。

自从同集体夜袭人面对面的较量后，我们先前对他们的恐惧，顿时化解。这些来夜袭的"小偷"，根本就不是一群全付武装的"亡命徒"，而是一群普通的农民。

他们之所以变得有点"打家劫舍"的野味，实在是被二十多年半饥半饱，缺食少穿的生活逼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不幸，并知道反抗，这就很不容易了，算是他们二十八年来的一大"进步"!

尤其是他们已会用古来兵法之常用计谋，昨夜的声东击西，今夜的接应撤退，都说明他们反抗的成熟。

一部"水浒"，虽没有概括今天，却更包含了今天，中国历史上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哪个不是被官府和暴政逼出来的？这些夜袭人使我领受到当年梁山泊打家劫舍的味道。

后来每当我看到从那茂盛的十样花丛中，突然钻出几个背大背兜的身影，便很自觉地走开，对这样的衣衫褴褛者应当也必须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从此整个的五号梁山坡便显得十分的平静。

第三节 "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青富专门从队部到山上来通知我，说重庆来了专案的外调人员，要我立即回队接受"提审"。一面悄悄对我说："平反有着了，是重庆大学来的人。"

我带着难以说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换了一件干净的"劳改服"，向山梁走去。一路上，那提审的说法一直在我心中搅动，那法院颠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对法庭充满愤恨，怎容得它再来以"提审"重述旧事？

但我马上明白，我将同虎狼对话，文字狱的余悸还笼罩着周围，稍不留意会惹上新的麻烦。随即想到“提审”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方若故意装成不了解案情，让我重述旧事，我能不能压抑内心的厌恶？面对这无法可依的“法庭”，我该如何与之抗争？

若仅仅因政治需要，我这种情节简单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还仅仅在条文上作些修改？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以“诬害”一词抗诉重庆法院。

但是，我马上想，张青富告诉我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在要什么把戏？难道重庆大学是制造我冤案的元凶？

（一）复查人的丑恶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读书时陷入右派的前前后后，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传营造出一个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形象，迷惑统治着人们，广播、电影、大小开会，街头宣传，学校教育，把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说得天花乱堕，几乎不容我产生对共产党的怀疑。当然更不能把英明伟大的共产党组织，想成冤枉我的凶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斗争会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对这种莫须有的冤情不敢公开反对，没想到这种天真的驯服，正好是共产党的阳谋家们，想要达到冤枉人并封人口的需要。

两年以后，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丛林练铁厂，亲身经历了毛氏三面红旗，以后又在南桐看守所，亲身体会到全国人民的灾难，从而醒悟到这种“阳谋”的毒辣时，我已被钉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时我与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样，想过轻生。

我身旁的受难者一个个饿的饿死了，牺的牺牲了，我从他们的身旁走过来，走过了漫长二十年炼狱，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谋的，武装到牙齿的魔鬼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回想我在空虚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骗局中，从一个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带来的灾难中从无知走到成熟。并痛下决心同这个吃人的制度抗争到底！

托苍天保佑，我是仅存下来的幸存者之一，我总算看清魔鬼正由强大走向灭亡。

罪这字，在寺院里，是布道主侍用作诲人的常用语，儿时进得佛堂，往往方丈见面带凶相的不善之徒，便双手合什连连颂念“罪过、罪过”，但并不知道这“罪”所指什么。

长大了，念书以后，随着知识的增长，蒙蒙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劝人修行的戒律，后来读到佛门十戒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始接触先知们静坐打禅和思过悔罪的方法。这同中共法庭所讲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使对中共，学生时代，我也从未冒犯过它。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罪！

想着想着，六队的两扇铁门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调整了思路，从容地向何庆云办公室走去。

当我跨进门时，何庆云站起身来，向我指着那办公桌前为审问专备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长了脸，冷冷地向那办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温习了一道刚刚想过的对答词。

何庆云神情木然的坐在左侧的靠背椅上，办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门”，满屋香烟镣绕，看样子，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会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头发已经花百，大约六十开外，鹰鼻上面一双凶悍的眼睛正注视着刚刚进来的我。年青的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我想这大概就是重大来的外调人员了。

两分钟沉默以后，那年老者灭了烟蒂开始“提讯”。

“我们是重庆大学保卫科的，”老头不紧不慢的开了场：“受校党委委托，专程从重庆坐飞机来对你 1960 年‘反动日记’一案重新复查。”老头停顿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种凶光，接着说：

“首先，你要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历来奉行有错必纠，有错必改的方针，我们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坏人，这次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次证明党的光明正大，你要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同时也是给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把当年有关本案的情况如实的向我们提供。”

果然，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种由学校出面进行复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才会这样做。难道我的案件，当年是由校党委提供线索和事实，只不过报到重庆法院去完清一个法律手续？如此看来，法律不过是中共各级地方组织玩弄的戏法，难怪说中共无法无天。

现在，面对刑期执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诉了那么多次，累遭“强行剥夺上诉权”，累遭批判斗争后，这老头再来“纠错”，并说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么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枪杀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这老头子今天在这里胡扯么？冤案已成事实，还说什么有错必纠？玩弄掩耳盗铃的把戏，恐怕只有邓小平这类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几乎被弄死的“走资派”，才想得出来！

他们怕政权跨台，执政党易位，失去统治的宝座？又怕毛泽东的死党真的继承“正统”，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厄运，才想出这缓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尴尬，也得让我们这些受害者，忍受这种不伦不类的把戏，高喊“有错必纠，有冤必改”来掩盖过去所造的罪逆。

当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监督，玩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们议论，邓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这里，我看了看坐在审讯位置上的老头，共产党也亏了这些通晓变通的基层老官僚。

当年就是这些官僚，奉旨把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实行焚书坑儒，而今又靠他们把这么多的血债一笔抹掉，还要二十年死里逃生的人，向冤案制造者磕头谢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诉，凭什么把这些向重庆市法院申递的状子，向重大保卫处复述一道？这不是捉弄人么？所以我一向认为法院就是毛泽东玩弄的木偶。

而我现在领会二十年前诸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有着多深刻的真知灼见。我那时还没有理解这个小和尚在向老和尚进言时，已看透了毛泽东，共产党。

面对这个老滑头，而不是面对重庆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绝一个学校保卫处所提出的问题。原先准备好义正严词的控词需要调整。

但转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学校党委，而学校的党委是奉党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没有我被划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来没有找学校，便是深深知道这个皮球在中共的脚下从学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闹笑话，做完全无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学校了，所以我立即问道，“请问学校也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么？我不希望在这个程序不明的情况下，回答与本案无关的组织提出的问题。”

我的回答，引起那位做记录的“书记员”特别的惊鄂：他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来长时间的注视着我，老头也好像被问住了，何庆云也无话可答，复查问案陷于僵局。

其实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国老百姓公开宣称了的，不过这个党一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谁来代表？说工人或农民那才真是弥天大谎。现在看到，左右共产党的，原来是几个中共中央的头。它是那样的少，简直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过去二十八年的执政党就是毛泽东党。

不过党这个名词在字典里并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为实现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在中国“结党营私”，可以概括为皇帝控制的大臣们操纵全国大局的集团。它从来就是小得可怜的。

其实有关描述党的名词几乎全是贬意，什么朋党之争，党同代异都是表述争权夺利的名词，至于狐群狗党，党棍，党祸更是老百姓用来骂人的。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酿成的冤狱中，政局动荡的阉党，例如明朝的魏忠贤，就留下了杀害忠良的千载骂名。

同其它人一样，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斗争会上时，那种失魂落魄，至今想来真是羞愧难当。

当我糊里湖涂的跟着同学们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像父亲时，我是绝不会意识到我正充当了他攫取皇冠的拥护者。后来又强迫我们充当了他的牺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戏后，我的内心满是忏悔和痛恨。

毛泽东当年将我划为右派，邓小平在二十年后又为我平反，统统都是为建立中共一党专

制的政治需要，在这种翻云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无奈。

眼下为了早日出狱，我也只能装聋作哑。不过，要我跪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面对老头子的提问和要求，强忍着内心的反感，还是把当年我干的荒唐故事从述了一遍。

那老头子悠然的抽着烟，把口里吐出的圆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对于我所讲的荒唐往事，并不感到丝毫兴趣。这种故事，在当年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中真是太多了。

戏，演了二十年，我几经生死，总算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我从他那老奸巨滑的眼里看到他正打着主意。他装出替我昭雪的那张面孔是多么虚伪，其实他正打着从我身上捞取好处的算盘，对我心里滴下的血，除冷笑和藐视外，不会产生任何同情。

大老远从重庆坐飞机到盐源来，总不能空手而归！

“噢！对了，证据”老头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装的为难，告诉我说，收集证据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请你把那两封从南桐寄给重庆大学的信，详细加以交待，最好你能向我们提供这些信件的邮局的收据。”

这又一次在触我心中的伤疤，当年我向我称为母亲的学校党委，表白自己绝无对她的“反心”，为加重自己的诚意，用大学生向党交心的时髦形式。这两封血书，同当年许多年轻人的交心书一样，除了证明我心理上的失态，能说明什么呢？同时谁还记得这段思维混乱中的细节？

何况，整整二十三年，我经历农村，看守所，监狱，流放等几个场所，历经数以百计的大搜身大检查，连原来的判决书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将两张邮件的收据保存下来？我意识到这个老头在故意的耍弄我，以获得卑鄙的惬意。

于是我摇摇头回答说，“时间已过了二十年，我已无法想起当年我干了些什么，至于邮件的收据我完全没有印象，现在要我拿出这些证据岂不是强人所难？难道因为拿不出邮局的收据，就可以改变事情的真像吗？”

我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这老头没有吭声，那坐在一旁的何庆云也明白那么多封申诉信，他肯定拆开看过的。

我现在只有悔恨当年的无知，对重大党委毫无防备，我真相信这个组织就是我的“母亲”，可没有想到，它毫不犹豫的给了我二十年牢狱之灾！

可是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闷声问道：“那么你现在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从南桐丛林煤矿的集中地，在你的铺位上搜出来的那本日记，是从那年那月开始的，都写了些什么？”

这又一次扎到了我的痛处，这本日记作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据，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还保存在法院的档案中。现在，我已不屑再去回忆当年为摆脱痛苦，挖空心思伪造出

来的东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复说清，我已脱胎换骨，我已从乞求宽恕中认清了中共！认识了自己，这是我从炼狱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既然已经明白了，面对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党棍，我心里燃起的是一把怒火！于是怒声回答道："你们既然什么都掌握了，还问我干什么？难道这一切重大党委没有责任吗？"

这一声责问使老头收敛了，他不再像开初时那样盛气凌人，他既不能用施舍恩惠来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脸。嘀咕着说："我办了这么多右派案子，头一次看到你这样恶劣的态度。"最后匆匆收场道："好吧；给你一点时间，把今天提讯中所有的问题，仔细的思索一下，并写出材料来。"

老头子结束了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老头，对他故意挖伤疤的提问，我已经最大克制了。既然是为我昭雪，我本应站在原告立场，聘请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但情况绝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要我现在装扮出一个被整后，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质问却使他吃惊，我因此想到其它获平反的右派同学委曲求人的处境!世道没有变，当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执掌平反大权的人!

他身边那位书记员停下了记录，按照老头吩附，从皮夹里取出了一叠白纸递给了我。

怀着一肚子苦涩，我走出了那办公室。对这种戏谑的平反，我毫无快乐的感觉。因为，坐了二十年牢我现在已将牢底坐穿，才来"平反"！天下那有这等无理的"衙门"，这等荒唐的事？

走出铁门便碰上王文典和肖弟良，他俩倒是怀着美好的祝福，询问提审的经过。我苦笑着感谢他们的关心。

（二）第一次到詹大妈家

下午詹大妈和刘大妈又来庄稼棚了，她们俩最关心我落实政策的"结论"。我心里因为有疙瘩，不愿向他们提到郑老头演的戏，因为这两个善良的老人是不会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实像他们这些劳苦的民众，几十年来，又何赏不是在中共摆下的筵席上，任统治者的筷子，挑来挑去的吃呢？

当我回到庄稼棚，詹大妈在门口坐着，她已经听到老吴说重大来人的事，见我走上山来起身迎着我，告诉我，下午六点钟，一定要到她的家里去，她有事告诉我。

过去她和刘大妈曾几次邀请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当地人的习俗，凡是去人家里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着手去。我穷犯人一个，用什么去作第一次见面的礼物？而且，去人家那里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会因此而十分尴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来人整整三个小时"提审"，弄得心情极为烦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

一趟，散散心兴许会冲掉刚才的不快。

同时想到在这儿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还没有像像样样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对他们的风俗人情所知甚少，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我卷铺盖回重庆，这种一无所知还是一种遗憾。想到这里，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点以后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样，下午七点钟各组已收工完毕。山梁上静悄悄的，除了有一两个拣粪的人影在四号梁子晃动外，看不到一个流放者。此时两个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饭包，呼唤着各自的畜群，沿着那条老路缓缓而归了。

夏天的盐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点钟夜幕开始降临。此时距天黑足足还有一个小时，我向老吴打过招呼，便跟在詹大妈放牧羊群的后面，缓缓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妈开始询问今天白天，重庆来人“提审”的情况。因为我实在不想再谈“提审”事，有意问她的小孙子今天那里去了？

忽然她试探性的向我说道：“你也快脱法了，苦日子也熬出头了，人也四十二了，该马上成家了。”

真的，爱情、恋爱、婚姻，这人生中一个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长的二十多年冤狱给埋掉了，至于爱情和性的欲望，也在这段与死神和魔鬼的搏斗中无意忽略了。实我何尝没有渴求一个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边？！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残酷的处境化成瞬间幻影消失掉了！

母亲给我寄来那张邹银双的照片，一直就夹在我的笔记本中，说不清是什么感情，有时候，想到自己危险的处境反倒觉得独自一人更好，因为一人而无牵无挂，就是在我一朝面对死神时，也少却了后顾的忧虑，心中反而平静。

不过，现在我该如何回答身旁这位老人的关爱呢？倘如说：“大娘你就别管了，我不会结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沉默静候着她往下要说的话，果然她开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脱法以后就在我们梅雨镇安个家，我替你介绍一个对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办到，听她这口气大约已经为这件事筹划多时了。“哪！我们公社的农机站里，我的一个侄女在那里当工人，今年才二十七岁，我看你们挺般配。”

我实在没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为我当红娘来着。心里不免掠过了一阵紧张。

像还没扎根的水面浮萍，当时我对今后的前途还没有定准，何况母亲在重庆眼巴巴地等着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在这瑞安家！

面对老人的一番好意，我无法生硬的拒绝，只好说道：“还早着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法，脱法以后干什么，弄不好会连累别人的。”

但是她却很认真说："我那侄女儿，人虽然有点胖，但是体力极好，人也能干，今天我已经将她约到我的家里，你们见见面。"她这番热心很难拒绝。

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将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弯里的大大小小被绿茵环抱的村落，在暮色中升起了袅袅青烟。走过草坪，沿着一条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庄的地界了，这地方，我们每年挑草都来过。

她把两个一同放牧的孩子叫过来，吩咐他们继续向前，把羊关进公社的羊圈后，一定要上锁。

关照完毕领着我向一条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树覆盖着，十分的凉爽，几只蜜蜂嗡嗡作鸣，平添了矮墙茅舍里的安静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没能烧着它。

大约快九点钟了，天色已经很黑，经过的园子里传来挖土的声音和人声。詹大妈告诉过我，现在土地包产到户了，家家户户都起早贪黑的。

如此走过了十几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墙和一幅柳条编的小门前停了下来，詹大妈向门里边呼唤着她的两个小孙子，两个孩子蹦跳着从里面跑出来，一见他们的奶奶把老师请来了，立刻迎上来打开柳条门，很有礼貌的喊了一声："老师，请进屋里坐。"

我跨进柳门，只听见一阵阵蜜蜂的朝王声，那大约只有三尺宽的屋檐下，整齐放着六、七个蜂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正戴着用白纱布做的防蜂帽，在一个蜂桶里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妈送给我的蜂蜜，都是自家采集的。

从柳条门到"堂屋"，大约十五米长的石板小路两旁，长着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进大门进入堂屋，迎面就是一个留着草木灰的火炕。这是山区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设施，每逢夏天，落雨后天气很冷，主人引燃火炕里的树根疙瘩，一家人围着火炕取暖烘干被打湿的衣服。

"神龛"上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堂屋中间除了一张木方桌和四条长板凳外，屋角里放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农具和几个老树根，川西地区的贫苦人家大致都是这样。

詹大妈进门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这时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从里屋走了出来，大妈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当生产队长的大儿子，我每天上课所教的两个孩子便是他的儿子。

大妈把儿子叫到一边，在他的耳边吩咐了几句话后，他便出门去了。两个孩子正在里屋完成他们的作业，大妈也去灶房里弄饭去了。

我跨进了孩子做作业的房间，那屋子里除了一个粮食柜，两张古式的木床和旧木柜外就再无别的家俱了。看来这位平时为人慷慨的大妈家里实在很贫寒。在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家人能有几间土瓦房和自留宅园，赚一个温饱，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这时天色黑尽，采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纱，脱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进来，去灶房换下詹大妈。大妈便端着刚泡开的一杯茶，走进了堂屋递给我，介绍说："乡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种

的。”我恭敬的端在手里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农村的热门话，她说，土地包下来后，今年她在承包土里收的包谷，比往年从公社分的粮食增加了两倍，现在一家人的口粮不愁了，还可以用来喂猪。说着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去参观她家新修的猪圈。里面喂着一大一小的两个猪。

她指着那大架子猪说，今年的过年猪有了，到时候杀过年猪时，你无论如何都要来吃我们的“刨汤猪”。紧靠猪圈，是用竹篾围成的鸡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喂几十个鸡。

看来农民没有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里得到温饱，这些年农民们总算吃尽了苦头，这个大救星带给他们灾荒饥饿的苦果，到头来还得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自己的勤劳才得解脱。

詹老大出门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不过他并没有请来詹大妈要他去请的客人，说：“今晚农机站不凑巧，临时加班，预先没同人家约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说罢便从怀里摸出了一张两寸照片递给了我，说是姨妹托他将照片带给我，当时盐源的相馆还没有彩色照片，我接过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标准的村姑打扮，穿着白色印花的衬衫，胖胖的脸蛋旁垂着两根又粗又短的黑辫子，脚旁放着一个花篮，背井和画面并不十分协调，但她那种青春活力的气息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光彩。

“怎么样？大娘随即向我发问道，我用点头和微笑来表达我的模棱两可，那决不是因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脱离生活太久了，在我重新回到生活中来时，那种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种身不由已的感觉。

正是“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可怜鬓发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张耒）

大妈已将丰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从 1962 年我从重庆监狱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几次在甘洛，黄联关用衣服换粮食，应邀到农家正式作客还是第一次。

同詹大妈一家围着方桌共进晚餐时，我像一颗干渴多年的老树，沐浴着这个温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岁了，来到这个家庭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对着面前的菜淆出神。细心的詹大妈观察到我的哀伤，不断为我夹菜，用宽慰话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点钟才离开詹大妈家，我的两个学生打着电筒一直把我送到五号山梁子六队的地界上。我踏着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藉着下弦月洒下的银光，独自回到了我的庄稼棚里，老吴也刚从农场场部看完电影归来，大约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回重庆后，我以怎样的身份踏入社会：五类？准五类？获平反者，还是被政策施舍的人？社会会以怎样的方式接纳我？我又怎样立足在现实中？在陌生中怎么找到自巳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詹大妈的话和她的关怀又一次重现眼前，母亲寄来的那张照片，以及大妈拿给我的照片

一齐都闪在我的脑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监狱里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突然摆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对，要我选择。

然而，我不能在当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这算是我对命运的抗争吧！上午那老头“审案”的对话，老头的戏谑和官腔令我厌恶，那口气里的施舍和恩赐令我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变并没发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样的环境中，使我对即将踏入的地方产生疑虑，那不是鲜花布满的美好世界，兴许又是一个隐约的陷井。对前景茫茫未知的担忧油然涌向我的心头。

（三）飞起来吃人

几天后，队长再次派张清富来庄稼棚里喊我回队部“传讯”，这次是重大专案组的复审，也是终审。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讯的主角没有在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预审中的书记员。

“我姓崔，是重庆大学保卫处的。”年青人自我介绍道，口气很和蔼，“这次重大保卫处专程派郑老师和我来这里是对您的右派，和 1960 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调查审理。为了弄清几个关键的疑点，上次请您写的材料写好了吗？”

估计他才从政法学院毕业，对共产党那套还不熟悉，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昨天写好，应付郑老头的“待查材料”交给他。

他将材料接过手，看了两遍便夹在一个卷宗里放进了公文包。沉吟片刻，又问了一些当年反右派的细节，以及丛林集中地另外的几名同学。最后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后就结束了整个的“复审”。

其实连这次“复查”都完全多余，事情摆了二十年，不会变质，一切都看“共产党”怎么作弄我了！

重庆大学的调案人员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并不知道。离最后一次问案大约五天后的中午，我从看庄稼的棚子回伙食团取饭时，胖胖的马事务长站在篮球场坝子中间，高声把我叫住，一边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诺，这是你们学校那个姓郑的老头临走时托我转交给你的。”

马事务长向来讲话声如洪钟，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马大炮。当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那封信时，听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闹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闹翻了，不过不是邓爷爷，你一辈子都难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心中一愣，这郑老头何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公务”呢？难道还有什么要用“书面的审问”才可以弄清的吗？

我拿过信，并没有扯开它便转身离去。

“噢，还有”马大炮继续站在那里向我喊道：“那姓郑的再三关照，要你回重庆后，先要到重大保卫处去一趟，因为，关于你落实政策的事全由他们负责，他们要向你交待有关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难道这里面装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于是把信揣在怀中，快步的提着饭篮子沿着小路向山梁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顾不上吃饭，便急忙把信拆开读了起来：“孔令平同学”那信笺上抬头的称呼，已与我相违了二十三年!。

继续往下读去：“这次我们专程从千里外来到西昌盐源为你落实政策，通过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终于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问题。”

读到这里，一种感激的冲动涌上了我的心头，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对那郑老头产生不出任何的“报恩”情来。他的信与他的提审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继续地往下读：

“现在我们已完成任务回重庆了，因为听说西昌一带盛产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顺路带些回去，但因为从重庆来的时候走得太急，带的钱不够，现在随身携带的钱只够作回去的路费，经与你们马事务长商量，请他能为我代购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钱，他答应暂时为我垫一下，我回重庆设法给他寄来，请你在回重庆时能顺便将这些东西带回，在重大保卫处面交给我。”落款处写着郑树勋的大名，时间是 1979 年 7 月。

读完此信，心中一沉，刚读信时冒出来的感激之情，顿时被后面这段文字像一盆脏水泼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审时，他那施舍和盛气凌人，使我呕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一班龊龃堂构相承。”封建时代，权臣弄权，使朝纲败坏，恶吏猖厥，冤狱丛生。往往贪官污吏藉着冤狱的涂毒，对无辜者趁人之危敲诈勒索，“竹杠好敲受冤人。”“衙门八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连普通狱卒也用得滚瓜烂熟。

清朝末年，冤狱泛滥，近百年中国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厥的冤狱和腐败的吏治是一种摧化剂。

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氏二十八年统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没的各种沉渣，以空前速度重新泛起，其数量之多，情节之荒唐，比前清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类”、“光明磊落”、“革命”、“有错必纠”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说不上来的丑恶!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统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样掩盖独裁专制的地狱黑幕!而我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个地狱的全过程，临到收场时，还要亲身领受一下，共产专制的恶吏“敲诈勒索”是怎么回事？虽然演员的扮相太令人呕心。

其实这郑老头说来也够愚蠢，勒索的东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黄金白银绫罗绸段，竞是区区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价值之低微创勒索之“记录”! 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马大炮虽与郑老头“同朝为官”，可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为郑老头去垫钱购买？郑老头的真实意图从这封信里已一目了然，对他初审时的一本正经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败的慈禧时期，这索贿的事一经老佛爷查到，“怪责下来”，也要对索贿人依律严办的，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于贪财妄命到连后果都不顾的。

索贿也得讲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属，摆设陷阱，使受害人就范而巧取之。决犯不着为三十斤山货留给被索者以书面把柄。

要么这郑老头实在配不上官场老手，要么索贿已成“无产阶级”专政合法之风，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过这种煞似小流氓对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这种重刑犯头上，也太轻视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这种当局视为顽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给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审理，真是对我莫大的藐视。原判如此粗俗已够闹笑话，复判又如此儿戏，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死亡大半，还要对其幸存者任意猥亵，只有在中共独裁统治下才会发生！！

好在当局严密封锁着新闻媒体，使得像这样的丑闻被死死捂住，否则就凭这大量官场腐败拿来公开曝光，这个政府早已是千夫所指，难以维持下去了。唉！新闻封锁对于保护中国黑暗的专制统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习惯了忍耐，对于残暴和腐败的中共各级官吏，既已认识清楚，中共的严刑竣法会在监狱中轻易打死疯子，像刘康云、刘志和等因说胡话可以拉出来枪毙，甚至像那癞子可以关起来乱棒打死，在我头脑里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难以忘怀。

至于官员走后门，公开索贿行贿，因媒体被严加封锁，所知甚少，现在总算亲身经历到了。

向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犯索贿，在现今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这郑老头所以公开索贿，仍因官场腐败到了无可顾忌的程度了。

可我还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因为平反回重庆后，我首先得找工作，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今后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还不凭这老滑头签字的“鉴定”意见？倘若顺他的意愿，安排一个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补上这三十斤山货，算得了什么？

怪不得当时回校落实政策的同学都带着“贡品”，先拜“落实政策”的菩萨。敞若在这个问题上不通窍，慢待了菩萨，意味在新生活开始，就给自己今后设下了坎坷，难道我二十多年还没受够么？

这么一想真还不敢得罪这郑爷，想我死里逃生撞过了重重牢狱关，今天自己的命运还操纵在这郑老头手里？不禁悲从心来。

要不干脆先发制人，把这封信往上交，告倒这老恶棍，从他的手里夺回今后命运的操纵权，兴许是上策，但转而一想，我的旧案子还没翻过来，现在政策还没落实，反把落实政策的人告了一状，这连环状子又怎么了结？

何况现在我所依凭的，仅是郑树勋托马大炮带给我的信，这封信并不足以证明郑老头勒索的证据，这种共产党内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无实据”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说假话和谄媚为能事的官场中，那有断奇案的清官生存余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积重难返，真告官又搬不倒，岂不是引火自

焚？当然我凭着这二十年练出来的“横劲”也不怕谁了，但必竟已过四十岁，还有多少精力能在诉讼里打一辈子滚？

不过细算三十斤山货，在那个年代都属一类统购物资，市场上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论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计，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买到，核桃也差不多就这个价，三十斤山货备齐非一千元人民币。

对每个月仅两元钱的赤贫奴隶，则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揍足，也许落实政策会领到一笔安家费，就用这笔安家的款子全用来买郑树勋所索要的“见面礼”，带上这沉重的三十斤，远涉千余公里，乘了汽车换火车，就把狱中的破衣烂裳和被盖全扔掉，还不知怎样将它们运回重庆，当面交给郑老头！

想到这里，便对这个面目狞狰的郑老头子好生痛恨。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天亮了，还没有想出一个应对的良策，思来想去，不如把这封马大炮交给我的信，又奉还给他看，看他读后，有什么高招？

马大炮必竟是中共狱吏圈子里的人，兴许能说清这信里的内幕，拿得出一个比较周密的应对方法。

于是一大早我便去队部找他，那时他正在食堂里用早餐，从我手里接过那信笺读罢便淡淡一笑。边摇着头叹息道：“这帮人也够厉害的，飞起来吃人，吃人还不吐骨头。”

这真是局内人看局内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机关这种勾当，他已见惯不惊了，“飞起来吃人”可谓对公检法真实的写照，不但吃人不吐骨头，而且连骨头毛发都要吃净，我被他们关起来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侥幸生还，还嫌没吃够，追着还要再咬我一口。

马干事既如此评价，我便说道，“马干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烂裳一无所有，那里拿得出这笔钱来进贡？再说回重庆交通不便，路又那么远，要我驮三十斤货回重庆，不是要我的命么？那重庆来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该怎么办？”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来在厨房前的坝子里来回踱了两圈，回到屋里向我说道：“你只当不知道这封信，信没有直接交给你，而是交给我的，回重庆照样去看他，因为你今后的工作要他经手安排，所以你千万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见到他时，他什么也没问就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倘若他真要问你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没有接到我转给你的信，明白吗？”

看来只有装糊涂了，有时处理棘手的事，还真是“难得糊涂”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于这姓郑的在我今后的工作上作什么手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我即将出狱时，遇到对肮脏行为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的第一例。像我这种直性子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

后来我才明白社会上这种事太多了。见死不救，见人被抢劫或遭侮辱而装聋作瞎，见邪恶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统治下的一种社会风气。

虽然如此，但郑老头这封信，却在我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我面对着即将开始的生活，

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在中共统治下，未来是一个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会，是的，我被从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来，又被装进另一盘子里，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运注定我这辈子是被人吃的命。

第四节 如此恢复自由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钟，当我回厨房取早饭时，在铁门边童干事叫住了我，说“接场部通知，要你上午九点钟去办公大楼管教科办公室，有重要的事向你宣布”。

掐指算来，从 64 年黄联关到盐源至今，我已在这里渡过了十六个年头了。苏武牧羊十八载，而我虽不能自比苏武，但不屈不挠同当局抗争却有共同的地方。

十五年来，到管教科办公室仅只有两次，第一次便是 64 年九月，我从古柏押过来那天进过那里，随即被邓扬光带进了临时反省室。在那里同陈力一道渡过一年多小监生活；第二次，便是 65 年十月十日，我和陈力进行联合绝食斗争，高德胜派人把我背到了这里。

两次来这里都记载着难忘的事件，甚至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次我心中明白，平反雷声响过多时，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但是经过这么长的反复观察，看到郑树勋对冤案当事人的“恩赐”付带勒索，看到狱方那种稳若泰山的样子，预感到未来远不乐观。

所以此刻我毫无兴奋之感。反而平静地思考这邓扬光如何来见我？我如何来应对这根打了我十六年的党棍。

吃过早饭，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延着那条通向场部的小路缓缓向那里走去。过了小木桥，绕过就业人员的窝棚区，走到圈着苹果园的围墙，使我想起了孙明权。那围墙已经粉刷过好几遍了，可怎么也刷不掉那隐约的血痕。

深藏在果林中的黄色办公大楼，已重新拆建，淹没在邻近十几幢四层楼房中。那里兴建的场部食堂，学校，商场围成了一个小小的城堡。走到场部的大门却是又一番世界，原先是“河滩”的地方，已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商业街。

还记得，今年五月送大炳回原藉时来过这里，那时两个推土机正在平地基，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平出来是干什么的。

想不到短短半年，这里便完全建成了另一个世界，刚刚铺好的三合土街道两旁，新建起了好几幢一楼一底瓦房，领先形成的一些店铺已开始营业。

我缓缓走过小街，看清那些刚开张小店的主人，似曾相识，他们都是多年与我同难的流放人，只是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当我跨进黄楼里的管教科办公室大门时，壁上的时钟指着十点钟，我到农场十五年里是第三次跨进来，虽然从形式上讲，我将获得同邓扬光相平等的身份，但我明白，此刻我还是他菜板上的肉。

但我有一种没被征服的奴隶重新站起来的自强感，至少心理上我是强者，我在路上想了一大堆与他见面时奉送他的话，请他们把中央文件拿给我看，并一条一款算好我的损失该怎么补来？

从道义讲，邓扬光和多年使尽惨无人道手段的狱吏们，就是跪在我们面前，任我们唾骂也不过份！当然，我明白这些毛泽东起用的恶棍，不过是一些毫无灵魂的工具，昨天准备在绞刑架上处决我们，今天却可以若无其事的向我解释他们当时的无奈！

心里正准备见到邓扬光如何讲话时，一些年青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些人我从来没见过，心里掠过一层疑虑，好象过去那些打骂我的人全都回避起来，换上另一批新面孔。

邓扬光没有现身，这使我原先准备好的那些话，只好暂放一边。

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我跟着他跨进了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这次落实政策的人。他招呼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后，询问了我一些生活的近况，然后在他面前的一叠文件中翻找了一阵，从里面拿出一份来递给我，一面对我说道：

“你 1967 年加刑两年的案件，经我场管教科上报后，又经盐源县法院复查，根据现在政策，对你重新进行了改正判决，这就是改判书，请你过目并签字。”

我接过那张纸，这是一份由盐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编号为盐刑复（79）第 100 号，其全文如下：

“被告孔令平，男，现年 41 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份，江苏盐城县人，大学文化程度。六〇年六月因反革命罪经重庆市南桐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67 年又因反革命罪经盐源县人民法院加刑两年，合并原判共执行二十年，孔犯对加刑两年并无异议，但根据党的政策（而不是法律——作者），我院仍对其加刑两年的主要事实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孔犯在改造期中，以写书面汇报和改造总结的形式，向政府公开阐述他个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观点和认识的大量文章材料，不是出于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材料中有的认识是对的，有的认识属严重政治性错误，是教育问题不应成为反革命罪行，给与加刑处理。现重新裁定如下：一，撤消盐源县人民法院（67）刑法字第三十九之判决，二，宣告无罪。

盐源县人民法院 1979 年 9 月 25 日

看了这一纸判决，使我想到十三年前，我在农三队宣判的万人大会上，公开声明的情节，邓扬光气急败坏当场为我上了反铐。

从此开始，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十三年中，不顾多么危险，向毛泽东独裁拼死一搏。我们举起了反抗迫害的“火炬”，我们中最优秀的战友倒下了，但我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冤狱垮了，中共自己否定了自己！

对我个人，面对这一纸判决，面对相同的事实，所作的两个裁然相反结论，这种由同一个法院出具的认定和否定的结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经不起我一驳，说法院是被人捏在手中

的玩具，确是恰如其份，现将原文抄录于后，也一并公诸在此：

盐源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9）法刑字第 39 号文

公诉机关：盐源彝族自治县人民检查院被告人孔令平，男、现年 29 岁，家庭出身伪官史（错字），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现押盐源农牧场劳改：上列被告，因反革命一案经本院审理查明：

孔令平，于 1957 年整风之机，猖狂进攻被划为右派，58 年送农村监督劳动，又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1960 年 8 月经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待刑十八年。判刑后，仍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一贯拒不认罪，多次无理申诉，66 年 6 月 30 日在犯人中恶毒诬蔑毛主席著作，漫骂我们伟大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又 66 年 6 月在学习会上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文化大革命，并经常恶毒的诬蔑我社会主义制度，蓄意攻击我三面红旗"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同时还煽动闹监，呼喊反动口号，辱骂我干部、武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查孔令平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一贯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敌视我党和政府，攻击诬蔑我伟大领袖，攻击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审理中孔犯供认不讳，本院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加强对罪犯的改造，依法与以惩处，特判决如下：

对孔令平加判有期徒刑二年，合并原判为二十年，刑期自 1960 年 3 月 12 日起至 1980 年 3 月 11 日此，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付本，上诉于西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刘延仁，书记员刁灿明

1966 年 4 月 18 日

判决书错别字连篇，这原是文革的文风，不足奇怪，暂且不说。毛泽东在世，因攻击他的祸国殃民政策，而惨遭冤狱者千千万万，甚至因一句话，一张画像，一张标语的笔误而犯了忌讳，遭害者比比皆是，我不过是其中一例。

不过他死后，中共后继者对罹难者只走了一个"平反"过场，毛泽东说是"路线斗争"，邓小平说是"有错必纠"，捉鬼放鬼拿百姓作牺牲品，拿百姓生命当"政治需要"，玩给百姓看！这里除暴露独裁者草菅人命；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外，还说明它没有任何政见，既无信仰和理想，也无法律和信义！真是无法无天。

对我个人，从 1966 年 4 月 18 日加刑到 1979 年 9 月 25 日的平反，中间经历了十四年，对同一事件作两个裁然不同的结论，其根据不是法律，而是"党的政策"，而政策是谁当权，谁就说了算数，虽总体上都一脉相承。例如无论宣判还是平反，一律称被害人为"孔犯"，这种独裁专权目无法纪的政体，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中共独裁政权若不改变，暴政就会重新卷土重来。

眼下能告慰幸存者的，无非是我们等到了把牢底座穿的时候，我们今后可以不戴"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在刑满以后得到一个公民的称谓罢了。

加刑会上我当着一万人的面公开表态，“自从我选定我的政治道路后，我从来没有回过头，今后也不会回头。”那是同专制复辟决斗到底的决心。

若按“恶毒攻讦诬蔑毛主席著作……同时还煽动闹监，呼喊反动口号，辱骂我干部和武器，反革命气炎极为嚣张”，在那时已够判死刑的标准。

毛泽东开创了中共一党独裁。代替法律定罪的是一大堆由政策制定的帽子，扣上这些帽子就定下死罪。四人帮被打倒，给他们戴上的帽子依然毫无法律依剧，这些毫无公认的条款，邓小平只换了一个说法，说那是极左。

现在对我的“重新裁定”中用：“该犯主观上并没有××云云。”不过在玩弄词藻而已，中共依然保持“无法无天”。所以就是平反我仍将被人摆弄，距离光明正大，依法论处的到来，还有一大段距离。

但无论怎么说，我的反抗换来“重新裁定”，证明历史向前进了一步。最重要的是，踩在最底层的五类份子帽子一风吹了。由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作国家生活的最高原则，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毛泽东顽固推行阶级斗争的祸国方针被取消了。

当我将这一张“平反书”析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那年青人嘱咐我本月下旬，就来管教科办理离场手续。这么说来，我几天之后就可以踏上回归重庆的路了，而按我原判十八年的徒刑，我已超过了服刑时间，我的监狱生涯在中共建政三十周年才结束了。

阿弥陀佛，我在回到重庆后，还将领到第二张获得重庆法院的“改正”通知书，以及重庆大学的改正右派、“恢复学藉”两张“纸”。虽然这些通知书如同废纸，除了证明为了政治需要，中共对一个无辜学生无缘无故作弄外，还能说明什么？可惜今天我却没有看到当年宣判我的原凶，使我准备好的话没有喧泄的机会。

从黄楼出来回归的路上，碰到的就业人员向我争相询问。

其实这半年来，相继都有人获释，但我的获释特别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多年来是这里同当局“以孵击石”的代表，处于绝对弱势的我，曾在毛泽东最显赫时代被数次被申报死刑。现在能站立起来走出监狱，无论对狱方还是对我的同难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我的同难们会从我的平反看到政治气候变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心中长期沉淀下来的畏惧消弥了；对暴力压迫缺乏必胜信心的人，都会坚定他们反抗压迫的信念。当然我能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这么快随着他的归天，结束了他所开创的暴政时代！是我最高兴的。

但我不是胜利者而只是幸存者，中国今后的路还长。

那天晚上，我在棚子里久不能寐，回想起陈力、张锡锟、皮天明就埋葬在四号梁子上面朝二道沟的悬岩边。在守庄稼这段日子，我常去那里凭吊他们，至于刘顺森的遗骨还不知道留在盐源城下的那个地方？

今天我只能坐在四号梁的山包上静听风的呼啸，好像在聆听他们从天堂喊出的声音，他们被犹大出卖，今天真正复活了。

他们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这个边荒农场的一万名流放者的心中，他们的傲骨使我想起戊戌变法的谭嗣同，临刑前在前清阴暗的牢房里，隽刻出流传百世的不朽诗篇："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刻又响在我的耳际。

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靠个人的力量扭转乾坤，所有为民主事业而斗争的人不仅凭的是："海枯石烂乾坤灭，无为瓦全宁玉折"的勇力，更需要对世界潮流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念。

想到 1966 年 4 月 18 日加刑以后的十三年中，死神天天在我的身边转悠，从我的身边拖走了最有骨气的同难：那时压根就没想到，会由中共同一法庭来对这些判决进行推翻、为我和牺牲的人们一一进行平反。

中共内部的分裂，显示出了它灭亡的第一步，张锡锟临牺牲的预言，仅仅三年就开始实现。他说："我看到你们的衰亡，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你们的灭亡！"

如果说眼下我们得到平反表示中国专制力量向民主势力"让步"，那是因为毛泽东做得太反动，太不得人心，连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平反仅仅是缓和一下国内太激烈的矛盾，也是为今后开始以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作铺垫，为挽救濒临破产，国库空虚的国民经济注射强心针而已。

令人担忧的是人民还处在沉睡中，需知中国社会全靠人民去推动和改变。而人民在沉重的灾难下中保持安份守已的状态，中国的自救何时成功？毛泽东长期对舆论封锁使老百姓不敢想，不敢说，老百姓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变得老迈古板，便是中国的绝症。

眼下这种自上而下的纠正冤假错案，却不能撕开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铁幕下的种种黑暗，甚至于还产生像郑树勋这种公开以施舍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向平反者索取贿赂的怪事，岂不令人担心？！

如果无辜者在冤狱中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不问其原因；如果几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不被清算；执政党在国家大政方针上继续出卖民族利益，那么这独裁的毒瘤，会在中国的肌体上生长，并在一定条件下恶化。

新的野心家操纵国家权力，换上了新的外衣。而旧病复发时，再出现一次社会的动乱并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我们二十多年坐监，岂不冤枉？人民这么多年吃的苦岂不是白吃了么？

第五节 在盐源的最后两天

想到两天后，我将要离开这里，便想同多年共患难的人们叙别。只可惜，当年发配来的人，这些年来牺牲的牺牲，他调的他调。同他们中已故的人只能在坟上"话别"了。

听说赖开明还在副业队，还听说高自新和金梅也在那里，而且副业队距离我们不到十里，来去两小时，同时，在从副业队转回时，可以去医院，然后去农一队看看那里还有哪些故交，

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便去副业队。

副业队刚刚成立两年，原先这儿是利用牛羊皮毛作原料，专门制作皮革制品的一个手工工场。从南充监狱调来的人中，有相当部份是做皮鞋和皮衣的工人，而今成为这里的技术骨干，后来将各农业中队和基建队的残疾人调来进行了充实，建成了这个中队。

这一天早晨八点钟出发，九点钟到了这里。新建的围墙里面树林繁茂，进门口的几棵大黄桷树，绿茵把它遮盖得十分凉爽。这儿靠梅雨镇，颇有些山清水秀的风味。

里面已建成了两个车间，一个皮鞋车间，那里面阴暗潮湿，一股浓烈的香樵水气味朴鼻而来，几十名就业人员，忙着排料、制楦、下底、缝扎、上漆；另一个车间是皮衣车间，里面十几台缝纫机上堆着满满的成衣或半成品。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专供两个车间用料的鞣制场。

走进皮鞋车间，我很快就认出了从六队调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十五年前从南充监狱经过死缓改判后调来的。我与他们多年相处，知道他们的底细，这些人在进监前，是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多半因饥饿逼上了杀人之路。

当年他们由死缓改判后，因为刑期都是二十年的“重刑犯”，来时便编到六队。到六队后逐渐认识陷他们于绝境的是谁？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一）走狗忏悔

十几年来，从南充改判来的人因为俯首为奴，被认为是放心的劳动力，所以刑期未满为充实副业队，便调到这里成为第一批副业队的劳力骨干。

见我走进来，他们都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同我握手问好。最里面的地方站起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从我身上捞取了资本，获得提前释放的马文华。

十年前，周学祝因涉嫌偷听队部开会，当场被徐世奎宣布取消值班员，重新指派他接替周学祝，搬到周的铺位上，成了我的紧邻和新的专职“监督人”。

记得他从南充监狱调来六队时，操一口很浓的广东话，带着口吃，身穿黄马褂。知道他原是共产党员，在部队是一名上尉军官，后来被西藏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以无期徒刑，如果他真看清了中共内部黑暗，毅然投奔光明，我们会刮目相看，以礼相待。

可没想到他一到六队后，原形毕露，在斗争会上充当何庆云组织的打手班子，在各种场合下充当维持会的会长，经常听到他训斥被老管打得遍体鳞伤的奴隶。自从何庆云选中他睡在我身边，我平时的一言一行就很快的传到何庆云耳中。

有一次在出工时，一本他遗忘在铺上的“告密记事本”被我无意中拾到，那上面一条一款记载着我的“反改造”言行，时间地点和人证。

这种特务动作，在六队并不常见，因为残酷的役使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使流放者基本上与六队管教人员抱敌对心态，“告密”一直被认为是最无耻的行为。像陈贤士这样的出名人物，也是抓着重大线索告密，不屑对牢骚话作记录的。

那次在农六队召开对蒋正君等的死刑宣判会上，邓扬光宣布对他减刑八年，到 1975 年便提前释放了。是不是还有原判对他量刑上过重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监狱中的“政治犯”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我想，他若早知进了劳改队才后悔，何必当初走到“叛国”绝境去？

记得中学时代，从课文、小说、电影所看到的，被称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简直完美无缺，严然圣者的形象。几乎所有描写与“国民党匪徒”的智斗，周旋而不昧，或在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而不屈，“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慨曾使我“感动不已”，所以对“共产党员”产生过“敬仰”。

然而被神化的形象与生活中真实的党员一比较，他们的自私狭隘，勾心斗角，玩弄权术为平常百姓所不耻，从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极为反感。到了狱中，见到无论是邓扬光、何庆云、还是张丑德、张剑波、林扯高等等的“改造者”，还是沦为犯人的陈贤士和马文华，都让我认识“共产党”员究竟是怎样一批人？

与马文华已四年不见了，现在刚一见面，过去积郁在心中的鄙视，立即爬上了我的脸，刚要把身子转过去，他那满堆笑容的广东脸已迎上来，热情的把手伸给了我。

一代怪才李宗吾，以其名著“厚黑学”曾名噪中国处世讲坛。他宣扬一种治世良方，说一个人若想事业有成，在待人接物上必须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他的扬扬百万字论述，就是把“脸厚、心黑”作为人的修养目标。

能做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便是进入了处世的最高境界，不过市俗中平常百姓，能为某种事业的成功，变脸于瞬间，处险恶的世事应付自如，能够心不跳的人并不多。

此乃在舞台上成功的必备条件，装腔作势，心里早有了主意，等到别人相信对方的善意时，其实他心里却恨得你咬牙切齿，有了整治你的计谋，想把你一口吞掉。你能斗得赢他么？像我这样的两个回合三句话没讲完，便把真东西抖了出来，那有不输之理？

此刻面对他的笑脸和胖胖的手，我还来不及思考该如何对阵时，自己的手已被对方紧紧攥住，身不由己被他拦进了他的宿舍里。这一举动立刻让我想起六年前在斗争会上，他那狞狰的脸和那本密密麻麻的“告密记事”。

不禁想，难道我这有力的肩头将他提前垫出了劳改队还嫌不够，今天又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身子边往里挪，心里却起了警惕。但转而一想，今天我的身上，恐怕再没有他所需要记功的材料。倒是相反，该我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奚落他了，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心里很快平静下去，而且有了自己的主张，且看看他今天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于是我微微一笑，跨了进去坐到他的床上。

这是一间大约十平米的小屋，里面摆了四张上下铺的铁床，一共住着八个刑满人员。

屋里亮着发黄的电灯，使人感到昏暗而压抑。一股因潮湿而泛起的霉气迎面而来，这住房比场部蔬菜队还要差。副业队是就业队之一，他们的劳动生活条件与犯人队相比较，除了不受老管一举一动的管束，并不见得有多大差别。

“宾、主”坐定，不一会工夫，他双手捧着一盅泡得很浓的下关沱茶，热情向我说：“几年不见了，今天你是稀客，你还从来没有到这儿来过，我正好昨天刚从盐源托人买了几斤新鲜羊肉，刚炖好，看在我们多年的交情，今天一定要请你喝酒。”

这种异常热情中有没有其它的意思？我还没有查觉出来。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怎好以冷冰冰的面孔，回答对方的盛情？好在从六队调来的人都知道过去的事。

马文华在这里依然是组长，大家对他的“阴阳面孔”并不陌生，也不会有人查觉出我对他的尴尬。

这时已是大约十一点钟了，他忙着去伙食团端刚煮好的羊肉，并且拿来了两瓶白酒。于是我站起来响应他的“盛情”，走出门外招呼所有原在六队的人都进来，并且特别叫人请来了赖开明。

不一会十来个人围在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小桌上摆着羊肉和酒，大家端起各自的酒杯，闻那酒是用酒精兑水而成的，酒劲很足。

于是我站起身来对着大家笑了笑，说道：我因为今天没有准备，本该由我带酒来请大家吃一个告别饭，现在不好意思，就借马组长的酒献给大伙，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心。”说完端起酒来与大家一饮而尽。

我不会喝酒，喝了那口就停杯了，他却自斟自饮，酒过三巡，红云开始布上了他那微胖的脸，话也叨唠不绝起来。“真的，真没想到，你现在比我强。”他喃喃的说着，把手里的酒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便向自己的嘴里灌了下去。

“你比我强多了，我都知道了，你现在已经平反了，熬出头了，自由了，你的前途无量，我真该好好地祝福你，而我可不如你，我还是一个劳改释放犯，刑满了又怎样，提前释放又怎样？还得规规矩矩，到哪里去还得请假，不批准还得上班，老婆孩子也不会来了。”

他说话断断续续不愿结束，看来有醉意了，这很好，醉后心情也释放了，醉后方能吐出积沤在心中的真言。他站起身来摇摇晃晃，但双手却紧紧抱着那盛白酒的碗，双眼发红。

“你醉了”，黄大力站起身来，用手按着他那端着酒碗的手，想阻止他不要再喝下去了。但是他却将黄大力推开，摇晃了几下身体，恢复平稳后，又给自己斟满了一碗酒，对在坐的人吼道：

“你们知道吗，前年我回汕头老家，老婆改嫁了，儿子也不认我了，我告诉他们：老子提前释放了，可那臭娘们竟说什么，‘你这辈子就休想脱掉劳改释放犯的皮，如果跟了你这种人一辈子受人岐视，一辈子倒霉。’你们评评理，老子五十多岁了，活了一辈子到头来成了一条无妻无子的老光棍……”

酒的力量也够神，他的这翻自白，非借酒精之力是不能倾泻出来的。

所有在场的没有人说话，都在静静地听他自我介绍："真的，我真是一个糊涂虫，年青时候，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当兵了，还当军官，那娘们整整比我大五岁，明明是她勾引我，闹翻了我不干了，就一口咬我同强巴头人的女人勾在一起，所以军事法庭说我同叛匪相窜通，真他妈的怎么会闹成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栽在女人的手里，……反正说不清了，老子也反了"

他已经满嘴酒精气，说话断断续续，联系不成整体，一双手在空中猛划着，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康巴叛乱"战场，又好像他正同他的上司拼命，"唉，我真糊涂，你说我是文化程度不高还是怎么回事，其实，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是真心的，想不到这辈子竟栽在臭婊子手里……"

我看着这个醉熏熏的家伙，从他断断续续吐出来的酒话中，我似乎弄明白了他的底细，这是一个"兵"，一个头脑简单的工具，他哪里知道，当年康巴叛乱的真像，他也许至今还不明白，女人使他走上绝路，他刚才酒话中所提到的，兴许就是诱他走到今天的人吧？

看来他并没有读过"厚黑学"，也没有那种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的本领，说穿了，他不过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无赖。

"你要原谅我……"他那发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别人骂我说，我是踩在你身上提前释放的，这不是宣判大会上公开的事吗？我知道，你恨我，我那时目光只有那么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别与我一般见识……"

醉后吐真言，看来一个人最痛苦的事，便是回忆这一生做的亏心事，这是在良心发现和处境悲惨的双重刺激下，才会发生的，他同林扯高本属同类人，这种人该死后下地狱。

我望着他，一边想在中国，就出多了这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人格的怪物，他们愚昧、轻率、唯我至上。那简单的头脑，恰恰是当代专制复辟狂最好利用的枪。

直到今天他脑子里还摆脱不了忠于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谁把他们带到绝路上去，只好带着他那花岗石头脑，去见他崇拜的神了，而他那种损人的本能，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做坏事，并且永远不会有幡然悔悟的时候。

今天他之所以在我面前吐出真情，是因为他一直想置于死地的人，居然从狱中获得了平反，想到当年被他踩在脚下的顽石，居然会堂堂皇皇无罪出狱了，而他还是一个刑满释放的老光棍，这内心深处的不平衡，才是刚才那番自白的原因。

这算我行将出狱时偶逢的奇事之一。这种当着大家面的公开道歉，说明专制主义的崇拜者是一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暴力扭曲他们的灵魂，而当暴力消失时，便一片茫然，"追悔"是失足者常有的感情，记下这段故事，告诫那些思想糊途的人！

（二）拜别难友

在盐源的最后几天里，我本打算多会几位有共同经历的朋友，小结一下我们所共同经历的岁月，留下他们的地址，以便今后联系。可没安排听马文华的胡扯。偏偏这一段孽缘未尽，被他纠缠了两个多时辰。下午一点钟我才摆脱他的纠缠，同赖开明出得皮鞋车间。

在大门口正好碰到整整十四年没再见到的高世清、金梅夫妇，两人头发已经花白，高世清穿着灰色西装，金梅穿着皮衣，手里提着手提包，与十四年前，场部粮库禁闭室所见到的他们相比，已完全两样。后来在羊圈里听见他们的琴声和歌声，可从未面对面交谈过，甚至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然而我们成了好朋友。

“一切会重新开始”金梅满脸灿烂的说，她很自信，她是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完全剪掉的人。可这一剪，就使她从年轻状态，一夜间变成了白发婆娑的老太婆了。

我想起十四年前两个穿着破烂不堪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在羊圈前的田坎上望着自己的母亲，背着重叠叠的一背衣物，沿那条小路向场部走去，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姐弟俩还活着，现在已是妙龄少女和小青年了，但当时看见他俩匆匆离去我没问。

我们挥手道别时，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在归途中去农一队和医院，然后再返回林业队，在那里去取托田井伯为我制作的木箱。

那时还没有包装口袋，又没钱去买皮箱，我在监狱中的破衣烂裳可以丢掉，但节省下来的两套“新衣”和一套棉衣，我仍想随身带走，世隔二十年了，出去后每人每年定量的布票，衣着一定不宽裕。

过了医院便是农一队，想起十五年前我们在洋芋土里寻找散落洋芋的情景，那时满目黄沙，一弯死水，两岸红土地，真不知这路该怎么走才到它的尽头？

就像一个由命远牵着的盲人，耳边响着凄厉的呼声：“来吧！牺牲和鲜血伴你同行！从这里走过去兴许有你一线生机，一切听命吧我的孩子！”

整整十五年中，在我们中诞生了陈力，张锡锟、刘顺森这样的英雄！在黑暗中举起火炬，从百年来民主斗士的手中，接过了反独裁争民主的大旗，至今我们仍可以感觉出这面大旗在上空招展！他们的肉体就安息在这里，他们的灵魂需要祭奠。

当我将离去时，必须同他们一一道别!！将他们生平留下的话写在纸上，表示我至诚的祈祷……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独自向农七队走去，盐源的九月已是深秋时节，路旁一耸耸荒草中，十样棉花迎风怒放，风季悄然临近了。

那一天，天气阴沉却没有下雨的迹象，沿着大路的农七队地界里，没有看到一个流放者。我沿路走来，从路边采来一大束盛开的十样锦花。

农七队围墙后面的荒草坝子里，张锡锟和皮天明就倒在那里！由农场执行枪杀的人，除

了农六队的公判大会外，基本上是在这里就义的。

今天，五年过去了，那些路边的白杨已高耸入云，像一座座记念碑！此时我脑海里已涌现出当年饮弹后，倒竖在路边张锡锟苍白的脸。一面走，一面数着白杨树的棵数，数到第七棵树下，站在那里向西方深深鞠了三躬，并把采来的十样锦花端端正正放到那棵树下。

默祷大约五分钟后，睁开眼，回过身去，才发现十来个跨着书包的学生，奇怪向我看着，他们中有干部的孩子，也有就业人员的孩子，他们不解于我当时那古怪的动作，好奇我何以朝路边的白杨树礼拜？

他们不知刚刚过去年代的黑暗！那草坪，是洒着许多人鲜血的刑场，张锡锟、皮天明便在这里饮弹牺牲，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就义？暂时我无法用几句话同他们沟通。

我站在那里同他们对视着没有说话，也许这种对视引起他们的窃窃耳语。

距离七队的围墙大约百米的地方，此时我听见那山坡处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声。远处，三台推土机正在那里将小山丘推平，而那填土的地方正是三年前烈士的喋血处，如今正被一堆堆红土淹没！

我向那里走去，登上一垛还没有推平的小土包，面对着推土机，我站稳了脚，眼睛向那红浪翻腾的地方搜索，想寻到烈士们被抢杀的位置，但那却是枉然。

不竟悲从心来，我举起手，振臂呼喊着他们的名字，一面将手中的十样锦花向那红土撒去，期望那花瓣引导我去辩认英灵们的血迹，然而七彩花辨四散着随风飘零，忽东忽西，久久在空中徘徊，似乎不愿随便落在那里。

倘若有一天，人们为记念这些伟大的英雄，想寻找枪杀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子孙上那儿去找他们的遗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想到他们成了葬身在这里的孤魂野鬼，我的心能平静么？

一路走来，到了油库弯，沿左侧的公路，走上最上面那块“大寨田”，我的眼前再次呈现出两年前，我们在徐世奎驱赶下，在这里连续三个月挑灯夜战，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体会大寨精神。

此刻我又彷佛听到那满山谷锄头和号子声，看到蔡先绿矮小的身躯，吃力推着那十倍于他体重的板板车，哼着那杨白劳低沉的哀歌向前艰难的走。

我想哪一天，任人烹宰的奴隶们站起来？

走到三号梁的最高处，站在通向盐源的山隘口，透过被狂风搅得混浊的白雾向下看，山下那曲折迂回的小金河像蛇一样，盘绕在盐源城下。十五年来灰暗的盐源好象一个少见阳光的小城。我瞪大眼睛，寻找那山头，看见了紧挨县城中心的一个小白点，认得那是盐源公判大会会场，陈力、刘顺森就是在那里就义的。

我失声高喊：你们牺牲在那一处呀，在我离开盐源城的那天，我该到那片山头，那一块

石头前，来与你们告别，致我的哀思！？

从二号梁回到我住的庄稼棚，屋里聚着向我告别的人，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的疲倦，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大家取出笔记本，叫我签名留念，我取出了笔本记下在坐的人通讯地址，想回到重庆后，有机会给他们写信。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也是我离开二道沟倒数第二天，我便按原计划一大清早去了五号梁子的乱石堆前，下面白茫茫的一片，这是二道沟的最后一段，那高高耸立的乱石堆中，安葬着张锡锟。

四年前黄学全的妈妈曾在这里祭拜他，想恳求他能饶恕她的独儿，老妇人不明白，带罪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赦免。当时因为搞不清张锡锟遗骨在那一块石头下面，便选了一块最大的乱石，那里留下她焚香的灰烬。

九年前，陈力的遗体也葬于四号梁上，我也一直没弄清他的遗骨准确的位置。

此时，我从怀中取出写好的悼词，当我燃起那张纸，朝着满目荒凉的山岗行了三个礼，口中念道："我将要离开你们了，如果你们在天有灵，那么请助我将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段故事，写给世人，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原因，让历史不要重演独裁复活的悲剧。"

大地在那一刻特别的静，好像在同我一起向我的难友们告别……

（三）陈文仲和邓扬光

九月十三日，按照上次场部管教科的通知，我去那里办理最后的离场手续，这一次接待我的是曾把我比作"红岩"人物的陈文仲，当我跨进办公室，我们两人的眼光突然碰到一起，他立即埋下头去，而我原来准备给邓扬光的那些话也被压了回去。

自从 65 年在高书记主持下，我们那场辩论后，迄今我们整整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但我明白，他对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对手是太了解了，用他的行话来总结，"一个实足的无法挽救的花岗岩脑瓜"。

然而，十四年过去了，管教科不但没能把我改造过来，反而对这花岗石奴隶"纠正冤案"，不管他此刻内心是否另有想法，他都得首先向对方宣读："宣告无罪"的结论。

他今天该用什么来讲"形势大好"这句话，处在他的位置上，说过去共产党是对和错，都难下结论，心里却疑云满怖，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了？毛泽东一死怎么就全变了？不是说，修正主义复活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吗？既然预见到了，也采取了措施，怎么一个多月，这红色江山就易帜了？

当然过去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布全国大局，所以他死后，别人也可以随心所欲的推翻他的那一套，摆布他统治的江山。

陈文仲此刻，只能对一切都不表态，对面前这个要他亲自办理离场手续的人，缄口不提往事为好。他是政法学院的科班生，潜意识中的良知，使他既不能在我这里自讨没趣，又不敢

有违于他所代表的政府，除了以办事员的身份去宣布今天的政策，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就是中共政策的“灵活性”，这比按法律条款论是非，随心所欲多了。

这里不存在使他感到为难的地方，他仍须理直气壮坐在“法官”位子上，宣布说，“你过去的案件是错判了，现在与以纠正”。

于是他从他的文件夹中抽出一张纸来说：“过去是极左路线作祟，在当时形势下法庭作出的判决是对的，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改正过去的判决也是对的，你签字吧！”。

倘若改判人向中共提出赔偿损失，那么他会从抽屉里抽出两把刀来，一曰：你不要不知好歹。如果邓爷爷不给你平反，你还能翻大浪不成？你还不乖乖继续坐牢？一曰：向前看，你不是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不看看国家主席也是受迫害致死的么？这叫做历史造成的，向前看吧！

前一种说法，自有一种施舍者的味道，那郑树勋不是占了这一成，才敢在平反人头上括一笔浮财么？理由是说不清的，红吃黑也罢，极左路线也好，在制服对方后，还补上一句：“我忠告你，好好吸取教训，后半生就夹起尾巴做人吧”。麻辣俱全，被“平反”的人还得忍气吞声“感激零涕”。

然而这辣味对我这种“花岗石”的家伙能接受吗？可知我是被他当作是华子良式的人物，软硬不吃。弄得不好这种私下敲的竹杠，不但不能让对方就范，还要打到自己身上。受害人肚子里这么多年来的这把火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又是侩子手，又是为虎作张的乱骂一通，岂非自讨没趣？

看来在今天这种时候，必须及时变脸，唱红脸唱白脸反正戏已经演完，别不识时务！大道理可以讲，气可以顺，讲赔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绝对不能拿平时对犯人的脸给对方看。那郑老头因为不了解孔令平是提着头玩命的家伙，所以才做了那蠢事！

于是他轻轻咳了一声，做了一个让我就坐的手势，脸上也堆起了一朵似笑非笑的云彩，停顿半分钟，照已准备好的台词继续朗读下去：“根据中央政策文件的规定，在对你的问题经复查改判后应回到重庆，由重庆法院对你作进一步的结论并安置”。

念完后又停顿了半分钟，也没看我一眼，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回重庆的“路条”和户口登记的介绍信，说道：“这路条是你沿路买车票和住宿旅馆的证明，搞丢了在路上遇到麻烦自己负责。

与户口登记介绍信夹在一起的，是今年年底前你所“享有”的“粮票”“布票”和“油票”，这些都是全国通用的票证。”

“目前你的身份仍是刑满释放人员，因此，平反两年所补发给你的工资，按就业人员月工资每月 23 元，扣去伙食、衣服费用十四元，每月应补发给你九元工资，一年另七个月所得的“补发工资”是一百七十元（折合二十美金），另外按同一标准发给了你十个月工资（计 230

元）作为回乡生活费，再加上回重庆的路费总共八百元”。

轻轻松松的一句：“宣告无罪”加上八百元的钞票，就是中共政权对一个无知无辜的青年学生，进行长达二十三年残酷压榨和奴役后，给予“平反昭雪”的全部体现！这种凭共产党决策者揉面团的“政策”把戏，没有人的尊严，有的是强权下的蛮不讲理！有的是弱肉强食！

怪不得那陈文仲除了照本宣科的读，再也无法讲。因为这是没有理讲，也没有脸面对受害者讲的呀。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以反对剥削为口号的中共党人，是怎样在阶级斗争借口下，对受害者进行压榨的。榨干了他们的血以后，还要拎着这些受害者的脖子喝道：“姑念极左路线对你错判，免你死在监狱中，还不快快向邓爷爷谢恩！”。

那可不假，在中国再大的中共头面人物也给弄得死无葬身之处，刘少奇、陶铸、贺龙！数不胜数，“阶级斗争”的牺牲者是很悲惨的！

但是我们招惹谁了呀？凭什么要把我们这些老百姓押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剥夺最基本权利，在饥寒交迫和皮鞭抽打下，在九死一生中奴役二十年？我们这二十年创造的价值和损失可以用八百元人民币来补偿么？中共对无辜者的残害能用“路线斗争”极左思潮“扩大化”来搪塞么？最令人可笑的向被害者说：“向前看”，便将一切都一笔勾消了。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在喊出“中国，我的祖国”时，是因为我们要受这个国家的保护。否则还叫什么祖国呀，我们凭什么平白无故遭受共产党加害？既然已经加害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被害者，有资格向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喊道：

“我们是一群生在中国却没有祖国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正义和人道来保护的受害幸存者，期待着你们救救我们，期望你们谴责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谴责这世界中最专制蛮横的政府。支持我们向这个党讨回无端剥夺的生命权!!”

像这样的执政政府，有什么脸向世界人民表白自己的伟、光、正？这同绑架的匪徒有什么区别？我真想声泪俱下的哭诉这二十三年来所受的人身折磨，并以原告的身份向国际法庭控告当事人。

然而，我到哪里去寻找这正义的法庭？在这二十多年间，无辜死去的人成千上万，我又算什么？今天在这魔窟中，在一个把人当作草芥的年代，能活着从监狱里出去，已是万分幸运了。

我看他从皮包里取出那钱，本想抓起那钱向他脸上掷去。当时倘若我真这样做了，他充其量只笑一笑，拿出那套地痞绝招，将散落一地的钱一张张捡起来，再拿到他的上司那儿讨好说：

“这平反真是狗坐轿子，拿钱放人居然不知好歹，对这些花岗石脑袋只配用子弹敲破它们，这才是毛主席教导的。”

何况今天我图了一时痛快，能对这专制政府损一根毫毛么？倒不如现实一点，权且收下

这钱，以后再细细算账不迟。

不过，当年劳改厅的头头们像绑架那样，用卡车像押送牲畜一样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今天我还得用这笔钱去买车票，住旅店，自己回重庆。

于是我压着心头的怒火，从他手里接过那叠钞票，有意在他眼前掂了掂，报以冷笑，连同那放在桌上的路条、票证和户口证明，一齐塞进了我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

正要转身离去，这时从门外过道里传来了邓扬光的喊声："老陈，那古柏的人，你处理了没有？没什么好向他解释的，告诉他，我们是执行机关，他有什么意见，去找原判单位，我们无权决定……"

当他一脚踏进门来时，与我撞了个面对面，没想到他现在才现身，更没想到一直想敲破我这颗花岗岩脑袋的人，今天摇身一变，成了盐源农牧场落实政策工作组组长。

想我十五年来，在这盐源农牧场，他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将我送进古柏反省室的是他；把我送进二道沟小监的是他；在农六队指示打手对我轮翻批斗的是他；几次指挥破坏我的绝食斗争的是他；主持加刑的是他；今天导演这出平反戏的又是他！

好深的缘份！过了今天我也许就见不着他了，他的躲避是出于心亏，还是害怕且不管他，我不明白的是，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又何必这么追着我苦苦折磨摧残？如果他没有读过我的申诉，了解我的冤曲，冲着职业而无可耐何，倒是可以把这账算在"极左路线"上，但是他是全都了解的人！

这么多年来整了农场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不感到良心有愧么？管教科所报那么多死刑材料，难道他不心惊肉跳么？而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后，究竟得了多大的好处？升了多大的官？

人性在他是死灭了，他是一具活僵尸。

我拦住了他，喊道："邓科长，我们打了十五年交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总不至于现在还躲着我，是不好意思还是内心有愧？"

他见我话中全是刺，尴尬回答："你的案子自会有人负责办理，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办理你案子的人说。"一面说，一面绕开我向办公楼深处走去，我回过身拦着他喊道："你不是在这么多年一直把我当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么？你们枪毙了那么多人了，你问心有愧么？"

也不知道是我这几句话逼得他回不过神来，所以急于要退出这种场合，还是因为他果真忙于处理其它的事，他只在最里面的办公室，拿了一叠像档案之类的东西，便慌慌忙忙出门向楼下走去，只说了一句，"我没有功夫和你瞎扯"，便匆匆下楼去了，等我追了上去时，已经不知道他向那一条路逃循了。

（四）离开二道沟

于是我拎着我的帆布包下了黄色大楼，向四号梁子大步走去，心中计算着时间。从感情上讲，在监狱这口盘剥我整整二十年的活棺材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呆，路条既已拿到，我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时值九月下旬，磨盘山已开始下雪封山，这几天去西昌的班车车票已相当不好买，每天只开一班公共汽车。要一大早到公共汽车站排队买，什么时候车票售完，什么时候开车，不能预售。

无论如何我都要赶在九月底以前回到重庆。

从黄楼出来时，已是中午时分，心中盘算，今晚只好在盐源再过一夜，明天赶一个大早，尽早到盐源车站去买明天的车票。为了能在明天早上到达盐源汽车站，也为了同两位关心我的大妈最后叙别，所以我决定今晚就到詹大妈家住一夜。

主意打定，我从管教科出来后，去五号梁子取了我收拾好的行李，将我的旧棉衣和劳改服捆成一个包，准备留给詹大妈，山里人布票特别紧缺，平时注意到詹大妈一有空闲便补衣服，将我穿过的旧衣服送给她一定能派上用处。

我将换洗衣服和母亲寄来的毛衣装进木箱里，箱子底下放着五百元钱，这是我服刑二十三年的全部资产，经过“文革”大乱，加上这么多年来，老百姓缺吃少穿，小偷也十分猖厥。回程路上万一所揣的钱被扒了去，我就只好沿途乞讨回家了。

下午三点钟，我道别了六队相处十几年的同难们，挑着两个小木箱，跨出了六队那大铁门。沿着五号梁子向梅雨方向奔去，当我登上它的最高点时，我回过身来，向那隔着我已一里远，隐没在半山中的六队围墙望去！想当初来时，我没想到会在这里渡过我一生最宝贵的十六年，也没有想到今天中共会用平反名义使我获释。

低头向下俯视，望那六队，好高的泥墙好阴沉的牢房！那深壑之下埋葬了多少人的怨恨，连同他们的白骨啊？侥幸我还逃脱了虎口。现在以“自由”人身份，向这人间地狱望别，好像才从一场二十年的恶梦中醒来，惊险之至！

然而光阴蹉跎，一晃已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变成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只是人到中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想起武训传中的记载，十五岁的武训去张举人家扛长工，整天被奴役苛待，牛马不如的干活，却不发给工钱，直到三年后，他满以为张武举应当补上这笔血汗钱，没想到在他去张举人那里结账时，这个秀才抱出一本假账来，硬说武训的工资早已支付完了！等武训傻张着嘴申辩时，却被张家的奴才打了一顿，并且逐出张府。

对比武训来，我还没有被打出“劳改队”，至于张举人拿给武七的那账本，我确是真的得到了，不过那时间可不是三年，而是整整二十三年！

我回到重庆北碚，两年后，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六号文件，我起草了一份索要在这里十五

年劳役，起码该补工资的信，寄给四川省劳改局，请他们转给这个农场，指名点姓寄给了农场管教科，结果这个农场却给我回了这么一封信，现在全文抄录下来：

孔令平，你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提出："要求重新补原来工资的问题"。你当时在我场"改造"那是犯人，哪有什么工资级别？更无从谈起补发原来工资的问题，当时你的原判还没全部推翻，就是全部平反需要补发工资也只能找原判法院，执行单位不承担补发工资的，当时你在文革期间被加刑两年（实际服刑一年另八个月）后经盐源县法院裁定宣告无罪，我们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按当时就业人员的工资标准补发了你的工资这是正确的毫无异议的。其次，要求发给数量足够的安家费，这是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要对一个"劳改释放犯"发给足够的安家费用的规定，你这种要求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我们根据上级规定发给你安置费，生活费和路费这是符合政策精神的。

盐源农牧场管教科 1982 年元月 5 日

武训因不识字为张武举白干了三年，最后被痛打一顿逐出张府，从而痛惜自己不识字，萌生行乞举义学的念头。而我也只能在这里记下这笔"无产阶级专政"对我欠下的工钱。

和武训一样，我同样是一个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受害者，所不同的，当时的满清政府还大大赞扬武训的义学精神，光绪皇帝准许武训穿黄马褂，并颁发了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兼作牌坊的横额。

统治者的满人尚能知道扶持教育赢取民心，郭英华说："武训死后……乡民送者数万，悲哀得未曾有过，人一生能有此报，足矣！"

而我呢？

第六节 再见！盐源的老妈妈

九月十四日下午五点钟，我就到了梅雨的山脚下，挑着行李沿石板小道往下走去，转过几道弯就到了詹大妈的柴门前，隔着篱笆向里看，与两个月前第一次来时不同的，堂屋大门外，用竹篱笆围成的三合土院坝里，铺着一层还没有晒干的谷子和一堆包谷。四周堆着像小山头一样的包谷杆，几只密蜂从墙头上飞出，嗡嗡的绕着那些稿杆不知寻找什么。

詹大妈和两个小孙子，正在晒坝上收拾没有脱粒干净的包谷棒，她的大儿子和媳妇正在园子里挖土，赶着种上越冬的蔬菜全家人都在忙碌着。竟管他们并不富俗，但田园的乐趣和温馨却笼罩着这个家，令人不由得生出一种羡慕来。

我在门外放下行李挑，轻轻地推那柴门，可是那伏在屋檐边的小狗却蹿了出来，站在坝子里对着我汪汪的叫个不停。

两个孩子立即回过头来，认出是他们的老师来了，一边喊，一边跑过来开门，争先恐后把我的行李担子拎进了堂屋里。

詹大妈站起身来，笑咪咪地朝我走来，一面牵着我的手走进堂屋。正在挖地的詹老大夫妇也丢下锄头跟了进来。就连那条狗也直甩尾巴向我表示欢迎。

被这盛情的迎接所包围，我立即感到了家的温馨，忘却了白天在场部管教科所留下的不愉快，堂屋里正烧着树疙瘩，我在炉火边的长凳上坐下来。

“手续办完了吧？”詹大妈问道，一边坐下，一边给我端来一杯水，两个孩子靠着我坐下，大妈接着叹了口气说：“要你们这些从重庆来的大学生留下来是不行了，现在总算好了，我说嘛，好人总有好报！”

她快乐的唠叨着：“这下马上可以看到你的老母亲了！唉，你妈怕六十多岁了吧，这些年怕头发都等白了哟”，我望着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体会着天下慈母的心。

真的，妈妈大概接到我将回重庆的信了吧，也许她正在遥远的蔡家场搬着指头数着儿子的归期了！

“在这里住几天吧，你这一回重庆，恐怕就再难回到这儿来了，今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呢”詹大妈的挽留充满着惜别的伤感，然而我早定好了明天要到达西昌的计划，所以没有回答她。

大妈起身到灶房去了，两个孩子揍在我身边，不断向我提出许多天真的问题：“从盐源到重庆有多远？坐车一天能到么？”“重庆也像盐源街上那么热闹么？”“重庆也像这里有牛有羊么？有草场么？”“重庆也有那么多土地种洋芋和包谷吗？”

我却默默计算：从盐源到西昌，过了金河到达骡马堡，出了骡马堡还要翻越小高山、磨盘山，还不知山上飞雪没有？马路是否已经封冻，明天一早在公共汽车站买得到去西昌的车票吗？倘如买不到，是在盐源留宿一夜第二天再走，还是改趁运货的卡车？

“讲一个故事吧，老师！”孩子们请求道。

这是我最后给他们讲故事了，所以得讲一个有意义的，好让若干年后，孩子们长大成人时，回忆起故事，明白其中的寓意，也回忆这位重庆来的老师，和他们相处的日日夜夜。

“好吧，我就讲一个古代的阿拉伯童话，名字叫国王山努亚和他的‘一千零一夜’”。我开始为孩子们讲起来，两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知道盐源山里的孩子，特别是经过文革荒废的孩子，暴政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使他们一贫如洗，更剥夺了他们求知的权利。

照说已是初中生了，但他们还未听到过阿拉伯的故事。所以向他们讲这个故事时，我还要介绍故事的来源。从他们倾听的面部表情里，我能体会出他们是多么渴望知识啊。

“在很古很古以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萨桑的国家。传说萨桑王国的国王山努亚非常残暴，每天要在国内民间，从老百姓家里强迫他们交出一个女孩子和他成亲。但是，过一夜后，等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便要杀掉这个女子，第二天又要在国内再招一个女子，过一夜后，第二天鸡叫以后，又要将她杀掉。如此重复了三年，国王杀掉了国家里一千多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讲到这里看了一下两个孩子、大孩子张大了嘴巴，显得十分惊讶！小儿子干脆把他的小手扒在我的腿上一声不吭。

“萨桑国的老百姓在这种威胁下，为了拯救自己亲生的女儿，纷纷带着女儿逃命他乡，眼看萨桑王国已经没有年轻女子可供他的要求了。于是国王向宰相命令道，“如果宰相完不成任务，那么就要抓他的两个女儿进宫”。

“这一天晚上，宰相愁眉苦脸的上朝归来，大女儿桑鲁卓一再追问父亲为什么这样的悲伤？宰相向自己的女儿把国王要他征召民女的事说一了遍。女儿却自告奋勇，向父亲讲了她的主意。”

“第二天宰相无奈，只好顺着女儿，亲手把她交给了国王，哭着同她告别。但是女儿却笑着安慰了自己的老父亲，并要他明天上早朝的时候在宫里来听取她的消息。”

晚上桑鲁卓在宫中掌灯的时候就向国王讲了第一个精采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鸡叫，故事还没有讲完，听得入神的国王想听桑鲁卓继续讲完这个故事，终于第一次免去了处死她的计划。

第二天，宰相上朝时果然一早来打探女儿的下落，当他得知女儿昨夜并没有死去，一块石头才从心上放了下来。

第二天机智的桑鲁卓又用新的故事从掌灯时开始讲，讲到第二天鸡叫。故事又剩下一个尾巴，国王再次免去处死他的决定。就这样桑鲁卓整整的向国王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使国王最后决定不再杀死她。

从此改掉了他残暴的习惯，并且吩府宫中的文官，把桑鲁卓所讲的故事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便成了留传至今的阿拉伯童话。

我的故事讲完，两个孩子还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中，久久回味着故事里的情节……

天黑下来了，詹大妈的大儿子已经忙完了“自留地里”的活，收了工具，进屋里摆开了桌子。不一会，詹大妈把一盆香喷喷的包谷汤元端上了桌子，今天她特别的做了几个菜，端出了平时从来不上饭桌的豆腐肉。詹老大还取出了从梅雨场上买回来的高梁白酒，全家人都为我送行。

大妈不再提他侄女的事，她知道那已是不可能的了。谈话中最多的还是我回重庆以后怎么找工作和安家，她唠叨着：“你看，你已经四十二岁了，前半辈子给监狱泡蚀了，回家以后头等的大事就是赶快找一个贤惠的姑娘把家安好，等有了孩子，别忘了把你们的照片寄给大妈看。”

吃过饭，她又亲自陪我一同去刘大娘家里去了，刘家同詹大妈只隔了几家人，我也是第一次上她家，也是最后来同她老人家告别。

在盐源前后整整十五年中，监狱将我同老百姓完全割断了，两位老人是我最后在六队交识的乡亲，算是缘份，也是留给我对这里的纪念。这两年多来得到她们的照应和教诲，给我留

下深深的印象。

回重庆后，我按照詹大妈给我的地址，立即给他们写信，还将我和母亲合照的像片寄给了她们，不久也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和她们各自的“全家福”。

回到詹家，已是晚上十二点钟，时间虽然是阴历七月下旬，但天气已非常冷，一轮下弦月在树丛之中为我们照路，野地里已是夏虫啾啾。寒风吹动着树影婆娑，虽然寒气很重，但我心里充满了两个老人给我的温暖。

当我和詹大妈推开那个竹柳混编的小门，进得园子里，詹老大一直还坐在门槛上等我们，两个孩子已经熟睡。

他见我们回来立起身来，按照他母亲的吩咐已为我准备好了床和被盖，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铺位，我被安排在与他同塌而眠！

当我睡上了那床，只觉得床面凸兀不平，伸手去摸那床扳竟是柳条编的，睡上去柳条之间相互摩擦，呷呷作响，而且我感出每联结两根柳条的地方，就是一个又硬又凸的疙瘩，顶在身上就像赤身睡在干柴堆上似的，如“卧薪”一般。睡不大一会儿便觉得混身顶得疼痛难忍，不断的翻身又怕惊着了睡在另一侧的男主人，只好强忍着。

不大一会听见詹老大已鼾声大作，知道一天劳累了，到此时怎么也会酣睡，而我实在没有办法入睡，便悄悄地坐起身来，不仅为詹家的穷苦深深感触。相形比较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睡这床对我竟如卧薪一般，可山里人苦惯了习以为常。

我坐在床边，望着那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一边想到二十二年前我从学校被押送到南桐赵家湾，接受“农民”监督劳动的第一夜，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月夜，只是南桐的五月，气候可比盐源的九月份热得多，那蚊虫四起的情景宛如昨日。

不过那赵家的床，却不是这样难睡，那赵家的家境也如这詹家一样，只是那时吃的粮食，却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而紧张得连民兵队长也在所辖区的公社包谷地里，半夜去偷烧包谷吃。那提心吊胆的景况至今犹如昨天，现在过去了整整二十二年，仍宛如前天。

农民终于靠三自一包有了一点可供填饱饥肠的粮食，其它的依然是那么穷苦，在我刚下农村时，受到共产党蛊惑宣传，那赵家父子对我们多少都有点“监视”的敌意。

但恰恰是生活实践告诉和教育了他们，这二十二年来，我曾经接触和认识了那么多贫苦的农民，他们从怀疑我们到同情我们，就如这詹大妈的一家，虽然他们本身还没有认识到陷他们这么多年于饥寒交迫是谁？但他们已经从自身的苦头中体验到这个暴政了！

堂屋的正中已经将毛泽东的画像取下来，供上了祖祖辈辈的天地灵位便是信仰的转变。信仰来源于生活，靠硬灌怎么能树立？当我想到在农六队看守庄稼的最后几夜，看到当地农民夜袭包谷的那番猛劲，我便感到，陈胜吴广的马蹄声已经在这片过份衰老的民族土地上响了起来，我为民心的叛逆而高兴，又为我们国家的明天而担忧。

因为赶早要去盐源车站买票，何况一夜几乎没有睡着，听到鸡叫两遍，我便熬不住起床，

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那时月亮已经偏西，北斗星还挂在天边，时间不到五点钟。

詹大妈大约也是一夜没有睡好，此时她已经起床，生了灶火为我热好了昨天晚上的包谷汤元。詹老大和大嫂也被惊醒了，我忙示意不要惊动孩子们，便匆匆地吃了“早饭”桃着行李，走出了柴门。

临走时，我向詹大妈手心里塞了把钱，那理由也同给刘大妈的理由一样，临行匆匆已经来不及给她老人家买东西留作记念，让他自己捡喜欢的去买吧。至于包里面的衣物，确实是因为这年头布票太稀贵了，留给小孙子们缝缝补补还用得着，她收下了那包衣服，给她的钱却坚决不收，她说，你留下的旧衣服那已足够留着记念，至于钱，你领到的也不多，回重庆要路费，回去后安家还要用，就留着自己用吧。

一面提出一个沉甸的口袋，一边说，我也没啥好送你的，这是一点自家采集的蜂糖，你带回重庆，给你老母亲尝一尝。

我没有推托，收下了老人的一片心，趁她把我送给她的衣包拿进屋的时候，赶紧把钱押在那闹钟下面。

挑着的担子却被詹老大抢去了，只好拎着包赶了出去。大妈和詹老大就在黎明朦胧之中一直将我送到小河的桥边。

我一再请他们回去时，蓦然在晨曦之中看见那银白头发下受过伤的眼眶里含着一汪眼泪，不禁心中一酸，情不自禁地也掉下泪来。

一边握着她那粗糙的手，用脸挨了挨她那花白的头，便从詹老大的肩上接过我的行李，挥手向他们告别，转身向桥上走去。

当我走出一百米远再回过身来，还见她仍屹立在桥头上向我挥手。唐人有诗云，“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

到盐源城里天已大亮，看了看时间，已是七点钟了，以前我有几次经过这座小城，但都是坐在汽车上或出外劳动，或被押着去刑场。

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来县城实地走在街上，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了给阔别十五年，刚刚才接上联系的老母亲照一张照片寄回去。那已是六年前借了来盐源县城上牛粪的机会，那一天，除了在像馆照了像，还参观了它的最高学府，直到现在我仍清淅的回忆得起那学校门口的布告厨窗。

那时盐源小城除了纵贯东西南北的几条大街外，便是错杂排列的矮小平房和分割小城的小巷，大街上摊着一堆堆猪尿牛粪，大街上不时有铃声悠悠的马队，穿着很脏的马帮。却没注意车站，更不清楚车站在哪里？

第二次便是两年前，在这里被押着来赔刘顺森杀场的日子，那一天是我一生中，心情最痛苦的日子。回忆那地方，想不起我眼前的景物是些什么？

挑着行李我一路问去，很快找到了车站，我才发现这是几排很旧的房子，候车室里的墙上泥土已剥落下来。七点钟，买票的窗口还没有打开，前面已经站好了五六个等着买票的人。

我排好队，便向站在我前面的一位本地居民打听，平时召开宣判大会的“中心广场”。那人望着我说，县里还没有修好专供开会的中心广场，只在一个交叉的路口上划了白线，他指着那交叉路口的方向。

不大一会，卖车票的小窗口打开了，我买到车票后，问好开车的时间。那售票员回答说，“至少还要过两个小时才发车”。便将行李一并寄放在寄存处，独自一人向着交叉路口的方向走去，一面不断的询问马路两旁的商店里的店员：“平时召开公判大会的地点该怎么走？”一直问到那块方圆大约十亩地的开公判会的地方，定睛一看这里那是什么广场？而是几幢房子用它们的外墙围成的一片空地。

前年枪杀刘顺森的公判大会会场，是用红布将几幢楼墙围成了一圈。当年几个通街口的过道，显然是这些房群之间没有封闭的巷道。

看到这些“巷道”，我立刻在眼前浮现出那天“公判大会”被民兵押着陪杀场的几队五类份子队伍，时间才过了两年，我就从一个陪杀场的极端反革命份子，变成了“准公民”，提前释放了。

我慢地走上当年布置主席台的土丘上面，面朝着整个“广场”俯身去寻找我当年埋头默哀的地方，眼前顿时浮现了那些赴刑人惨遭杀害前五花大绑，被打得泥血满面，遍体鳞伤的赴刑者。

刘顺森低着头一声不吭的站在前排，他脸色苍白，青筋突暴，以最大的毅力控制自己始终不发一声。

我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感到一阵昏眩，连忙蹲下身子，坐在地上歇息片刻，才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向着台下当年烈士们挺身就义的刑场走去。

站定后，毕恭毕敬的行了三个礼，再一直走向临街的几家店铺打听，前年公判大会枪毙的人埋到哪里去了？

他们张大了眼睛，很奇怪地看着我说：“凡是盐源开公判大会枪毙的人都埋在西面的松林坡下，怎么知道你找的人是那一个坟？”我便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望去，远看有一片松林的小丘陵，丘陵上的一些小土包隐约可见，长着荒草。

我便加快步子向那里走近一看，那些被雨水冲刷的地方留下了泥水的痕迹，什么也分不清楚了，散乱的荒草中有几处烧成灰的纸钱残烬，不知是谁给谁留下的。

一阵悲潮涌上我的心头，想当年反抗毛泽东独裁死于“非命的”民主斗士们，牺牲得如此之惨，被媒体禁杀了消息，使他们消失得无声无息，而今无影无踪了！想到这里，我面对着那荒山乱石堆肃立着。朝着那土山坡再次三鞠躬。我想苍天如果有眼，我写的他们狱中的英雄事迹，终有向黎民公开的一天！

当我回到车站时，正赶上班车将要启动，售票员在那里剪票，并大声地催促那些去西昌的旅客快快上车。

我连忙从行李寄存处取了我的行李上了车，知道今天要翻小高山和磨盘山，便打开了帆布的手提包取出了预先就准备好的棉衣。汽车隆隆开出了车站，我从车窗里向着渐渐退到身后去的小城，投去最后告别的一瞥。

现在，我要踏上东归的里程了，对着车窗玻璃中满脸皱纹的我，那脸唯一保存的是屈强和愤怒，其中也许有一种希望。耳听隆隆车声夹着风声，随着急速驶向远方的农田，盐源县城越来越小，我不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中集完

下 集

第一章 恶梦刚醒

恶梦醒来，猛然一惊，不知身处那里？刚从地狱出来，我该到那里去？啊！该回家了，回家本是同久别亲人团聚的旅程；是同父母亲人久别后的第一次拥抱；而我首先要向他们倾诉在地狱中险些丧身的经过。

灾难无缘无故降临给刚刚才 19 岁的我，我被丢进了地狱整整二十三年。在地狱里，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回忆。

从少年时代起，大陆就被苏俄控制，今天我们居住的这片海棠叶，无缘无故的碎裂成几大片，这哪是我的祖国？我的家？生活的故土破碎成这样，大家都在反思，为什么过去的梦碎得这么惨？

我们家本来人丁不旺，小小的五口之家，以教书为业，教书匠本与世无争。我的父毌终生辛勤育人。却没想到，被口口声声以解放人民，建立繁荣富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

1948 年正是中华民国国难当头，怀着对三民主义的忠诚，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我的父亲辞去杭州师范校长职务，毅然应顾毓秀先生之请，去南京接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之职。

就因此，三年后，他首先进了中共的大牢，从此音信杳无。当局向我们全家封锁了他的消息，连判决书都不给。

直到 1984 年，经我反复追查，才从四川省劳改厅证实，他已于 1956 年 3 月 6 日在劳改营中死亡。

从那以后，和平年代里我们的家，就在中共沦陷区里惴惴渡日，在黑五类的泥坑中净扎，在“阶级斗争”大火中燃烧。

我失去了抚育我长大成人的外婆；我再也听不到她讲述炮火连天的南京城里，我在国难中降生。少年时代她驼着背同母亲一起挣扎在大风大浪中，艰难的带着我和弟弟长大。

二十三年前竹篱门前，她用苍白的鬓发吻别我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她的生离死别！

我的弟弟生性软弱，从小就負着“黑崽子”的重枷，饱受社会的欺侮。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三年前我和他在小龙坎的“团聚”，更没料到那次团聚又成我们的生离死别。

“文革”夺走了我唯一的兄弟，母亲因经不住这个打击和造反派的凌辱，烧去了仅存多年的老照片，准备跳水自杀。

今天，离家整整二十三年了，原先的家已被中共消灭，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母亲，她几经生死，而今不知如何？我现在正在回到她身边的归途上。

她能重新振作,同我一起再建我们的家么？我们能重新恢复过去的一切么？从 1949 年起，在“无产阶级专政”暴力下，枪杆子逼着我做乌托邦的恶梦。

现在恶梦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到处还听得见啼饥号寒声，城市像经历战乱，满目疮痍。

“共产主义”给大陆留下一场欺骗。现在每当阴雨夜晚，无数冤魂都会在夜空中发出索命的喊声令人闻之心惊。该牺牲的牺牲了，该得到的却没得到！

但是，对中华民族造下那么大的破坏，而中共好像并无反悔，反到若无其事的又在津津乐道宣扬“四个现代化”的胡诌了！当我艰难的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时，他们对我们悲惨的过去，并无丝毫同情。

尤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惨痛的现实中，怎么还无人发出重新振作的疾呼？为什么受压迫者至今还不敢喊出：“还我同胞的血！还我们百年来用生命争取的民主自由！”

难道恐布还没解除？恶梦还缠着大多数人？

旧梦既碎，我们的未来需要新的梦想。但是做新梦得讲新追求，中华民族追求什么？礼，义，廉，耻。然而大陆有么？今天的大陆人没有廉耻，更无礼义，梦都不知从何做起，大陆仍在沦陷中？原来我们都受骗了！

我已四十二岁，二十三年来，在狱中向中国独裁势力拼死斗争中，与我一起充军边荒的挚友们，多被中共杀害，苍天将我幸存下来，我该怎样不负牺牲人们在天之灵的瞩托？不负中华民族的重托？

所以首先我该把这二十多年狱中所经历的都写出来，期望大家读后摆脱恶梦的缠绕，警醒过来！

第一节 归程

汽车在黄沙滚滚的公路上颠簸，這情景与当年我们从黄联关到盐源时并无两样。不过那时是 64 年初春，而今已是 79 年深秋，风沙丝毫改变它的顽劣脾气，任性的吹到今年的夏初。夹着砂石的风沙打在脸上很痛。

到了骡马堡已是下午一点钟了，在路旁的食店里匆匆吃了中午饭便上路，下午便是翻越小高山这段全程中最艰险的一段。

汽车挂上一档，吃力的向山上爬，气温也越来越冷，我把预先准备好的棉衣从提包里取出来穿在身上。

渐渐的，路面开始变硬，汽车的轮胎在翻越几段隘口时开始打滑。现在从车窗里向前上方望去，在那白雾缭绕之处，隐隐现出白雪皑皑的山头，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之感。

司机把车停在山腰间的枯草坪上，从驾驶室的坐垫下面取出了预先准备好的“铁脚码”，套在汽车的轮胎上，沿着越来越窄的曲折山路蜿蜒爬进。

偶尔在山隘口或转弯的地方，出现一些屋顶很尖的茅草屋，看不清楚那屋里是否住着人，我想那一定是平时护路的道班偶尔歇脚的地方。大雪封山时，他们都离开了。

雪景渐浓，松树上挂着一串串的棒冰子，这景色是住在平地上的人们所难以看到的，也是我几次经过这里时没看到的，因为以往都是被枪押着，蹲在被雨逢严严实实封住的卡车车厢里，无法揪起蓬布去观看雪景。

现在坐在公共汽车里，从车窗回首下望那些尖尖的茅屋，像是在一片雪景上依偎在松树林的小风帽，很像我童年时喜欢的贺年片景像。

不过此时，在我脑海里给这景色着上了森严可怕的背景，那寒气逼人的松树，个个都像手中端枪的老管，它们站在马路两边，好像在监视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辆喘着大气的汽车，咄咄逼视着车里的每一个旅客。

无怪乎在我被监禁这里的十五年中，我们中因忍受不住这监狱非人折磨，冒死逃亡成功的甚是廖廖，就算是一路逃掉鹰犬追捕，在进入大山后，也难以翻越这丛山竣岭。饿死和冻死在这大山里的逃亡者不计其数，大山里留着他们的骸骨。当年选中盐源作监押的禁地，构思堪称奸诈。

汽车还没有爬完最高峰，天色已暮色苍茫，但山巅却成一片银白色的海洋，我的身上此时越发的感到寒冷，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此时想起从盐源出发前准备好的馒头和水壶，庆幸那水壶里的水还没有结冰，便从衣包里取出，揭开盖子，一口馒头，一口水，边吃边喝起来。

向下滑行的速度慚慚加快，两旁的雪景也渐渐消失，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便到了山底平地，此时天已黑净，车已驶近黄联关，气温也回升到原来的温度。

我伏在车窗上，想借那夜色月光，找到十五年前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但是两旁稀稀拉拉的平房中，却没有看见那兀立的烟囱了。问左右的乘客，知不知道这里原先的高炉群？他们说那早已拆掉。

人世苍桑，二十年前一轰而起的怪物，早就埋在荒草丛中了。

然而这一页历史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脑海里，毛泽东肆无忌惮拿中国百姓作试验，役使他们，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暴君。当年许给老百姓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白白折腾几十年，饿死，整死几千万老百姓，中国人几代人的血汗变成一堆黄土，中国的百姓怎不潦倒？

汽车在茫茫夜色中向西昌急驰，道路也越来越平坦整直，路旁的建筑群也越来越高大，越密集，整齐排列的路灯一直伸向远处，一座繁星点点的城市在地平线上距我们越来越近。

那天边天幕烧成了半边红色，与十五年前我们刚到黄联关时，黄沙茫茫的景象大不相同，文革十年，恐怕也只有在这里大大变了样。

汽车驰抵城区，马路边巨幅的石刻语录碑上，赫然现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就是当年朱洪武的座右铭么？只是这"不称霸"真有些招摇撞骗。这里便是被一代"导师"所定的导弹发射基地。西昌因而成了中国西部军事重镇。

在盐源这几年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常常见到头顶上兰空深处，一缕灰白色的烟云划天而过，接着便会从牦牛山上，传来一阵隐隐惊雷般的闷响，文革大乱年代，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曾奉旨在此，苦心经营多年。

在当时崩溃的中国经济沙摊上，兀立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尤如在骨瘦磷峋的劣马上驭着一个全付铠甲的战神。独裁者从极度贫弱的国民经济母体，挤出带血的奶，三十年灌养这尊全付铁甲的战神。

汽车在强烈的灯光和电孤光交相辉映下，驰进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工地，这儿正在修建一个巨大的火车交换台站和站前设施。从车窗里我望见了那凌空跃起，盘旋左右的立交桥。

汽车驶过了这段工地后停了下来。火车站的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借着这如同白昼的灯光，我很快找到了车站旅馆，跨进了服务员为我安排的房间，壁上的钟已指着零点整。

墙外还闪着电孤光以及隆隆响声，我此时已疲倦至极，无心观赏，抓紧时间洗脸洗脚，很快躺上床，带着旅程第一天的疲乏，迅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从床上醒来已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车站购买当天去石棉的班车票。洗漱完结，跨出门外，望天空却是一个上好的晴天，昨晚旅途的风寒已经消失。买到车票后，循着昨晚原路，再次看这建设工地。现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太阳光下泛着一片银灰色，显得冷峻和杀气。

八点半钟，我已挑上了行李坐上了开往石棉的班车，这一天的行程，比之前一天已大不相同，气候特别暖和，不但棉衣穿不上了，就是穿夹衣都还有些热，公路两旁的田野上人们正忙着秋收秋种，气氛已不同于十五年前。

那时的农民，被牢牢钉死在人民公社的圈地上。饥寒交迫的人们，无力整治自己的家园，任田园荒芜，荒草丛生，比之任何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更凄凉。而北京的御用笔杆子还狂叫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曾狂热拥戴过毛泽东，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连篇谬论的邓小平，等毛归天后，断然"篡位"，取毛氏所钦定的后继人而代之，第一刀便割掉了那套在六亿农民颈上的绞索——人民公社。

这本是"民以食为天"的治国安民的基本出路，既谈不上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由此而迈入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传说，北京为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时，愤怒的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曾去怀仁堂请愿，要求他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举动，将装在水晶棺中的这个魔头，挖出来放进炼钢炉中焚尸扬灰，却遭到邓氏的拒绝，他说："三七开吧，谁人孰能无过？我看他七分功绩

三分过失”。

一捶定下了和盘接过专制政体的衣钵。毛泽东反了多年的儒家忠孝节义的“文化大革命”，丝毫没有反掉这个小伙计头脑中的“正统”观念，也许小伙计懂得这层道理：叛逆，叛逆，终将祸及自身！

汽车进入铁索桥，那傍桥而立的广场依然如故，只是那原先的露天看台已经封闭改成了一个游乐中心，那里还依稀可闻其间传出来打麻将的哗哗声，在这儿就业安家的“刑满释放犯”就此留滞在这里。当年中共靠枪杆强迫留下来刑满人员，今天成了从内地来的“移民”，那里成了新移民区。

投宿石棉一夜后，翌日一大早，整个石棉城还倦缩在灰蒙蒙的月光下，我就登上了开往雅安的班车，开始了我回归的第三天里程。

我对雅安记忆所以深刻，是因为在流放边荒整整十七年中，留下过值得我记念的历程，这里有三元宫，砖瓦厂它们曾留下我们的反抗印迹。

眼前雅安城在青依江的环抱中无比秀丽，在宽畅湖心荡漾的游艇，点缀着湖面，这画景虽不能与西子湖比美，身临其境仍有一种淘醉之感。但因为二十二年在黑牢中渡过，在我生活中烙下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忽然间听见一迭声“叮叮当”的清脆敲击声，远处一个汉子桃着一付箩筐，一边敲着刀块朝我走来，这是四川传统卖麻糖的叫卖声，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听见这呼卖声了，记得十三年前我去成都参观中就讲过一段观感，我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沿街叫卖的民间小吃，就证明我们国家被卡死的经济开始复苏了”。

这话听来有些粗俗，但细细想来，独裁者借对资本主义的砍杀，一并砍杀了人民求生的所有出路，独裁倒是建立了，但人民求生计的毛孔却被堵死了，他哪管老百姓的生存呀！

我向小贩招手，他走过来，我便掏出了两块钱买了半斤，找到了一个石凳坐下吃起来。

迎着凉爽的秋风，看着马路上结伴相依的男女和牵着孩子的老人，在街心盛开的菊花丛中散步，这是多美的人间啊？为什么独裁狂，给老百姓留下这么长时间可怕的痛苦，为什么他这么仇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

于是我想“魔鬼可以使美丽的城市沦为地狱”。

沿途问道，找到雅安监狱的大门，1962 年 3 月 13 日，三元宫被枪押送的流放者，用胸瞠抵着枪口在牢笼里喊出：“我们饥饿，我们要吃饭”，并且在全付武器的警察枪口下，赤手空拳一哄而抢。

这反抗暴虐的星星之火，从一开始就带进了刚刚建立的甘洛农场，它越烧越旺，持续十余年，当年带头抢馒头，吟唱带镣长街行的人，接着又高举起了“火炬”，他们一个个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这又多么悲壮。

毛认准了强迫农民在集体经济中，才能使独裁政治长治久安。

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八年历程，大陆中国人为之付出了不低于六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毛泽东那套强奸民意的东西，再无法施行下去，才不得不改头换面。

当然，民主事业的成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路，还很遥远。

独裁和民主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困扰大陆的人们，“四个坚持”像一把高悬的利剑，随时都会落在被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化人士头上。仿佛离了这套，他们就坐不稳江山了。

“改革开放”今成中共的权宜之计，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回归之路，在连续四天更换的客车车轮下飞逝过去，当我座在飞驰在川西平坝上的汽车里时，我被那笔直的柏油马路和两旁高耸入云的杨树，以及一望无边的良田所吸引。这块沃土上的农家，比起盐源来是桃园了。

然而即是天府之国，又怎经得起豺狼般统治者的几翻蹂躏？记得 1963 年初我们从成都发配甘洛时，路经此地仍是一片荒凉！

车进入市区，入夜的成都市上空，被轻逸的歌声所环抱，这又与当年满城“红灯记”、“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的腾腾杀气不同了，“好一朵茉莉花”，那柔美动人的歌声从那些刚建好的水泥方格里飘逸出来。

这一夜，我便在西城区找了一家旅舍住下，按照我归程的计划，路经成都，我首先要拜访张锡锟的母亲，这要先去寻找住在西城区大菜市的陈容康。

陈家和张锡锟是邻居，但是这么长时间了，张家已经搬迁，究竟搬到那一家？却没留下确切地址。

陈容康前一年回成都后，给我来信，说他已找到了张家，但并没有写地址，而是留下了他自己的地址。所以我来成都先要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再由他带我去张锡锟家。

（一）陈容康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后，我从旅店房东那里问明了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径，便直奔那里。一钻进菜市街，其“热闹”程度与十三年前来成都参观时差不多，商店里存放的干鲜货比之六十年代丰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样的狭窄，那样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样的旧，那样的黑，甚至可以说比之当年参观时更脏更臭。

共产党的老套，逢假节日或有人参观检查，预先就要向被参观地方打招呼，清洁做了又做，检查复了又复，直到某个地方官员点了头才可让参观者进入，所以即使骨子里又穷又烂，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会主义的面子”，现在距“国庆”还有好几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过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路，那巷子里到处堆积腐烂的菜根、菜叶，那道旁的阴沟里流着黑幽幽的污水，散发出令人呕心的臭气，虽已时值深秋，天气也有点冷，但爬在那些烂菜

摊上的苍蝇却挺忙碌，一群群挥之不去。

我埋着头在巷子里几乎穿了半个时辰，忽然我在一个岔道口上，看到了一个背朝着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乱的头发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脚步来看他，他的面前放着一个酸臭熏天的潲水桶，他正用他双手，拂打着蜂拥在潲水四周的苍蝇，一边伸出一只拖着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潲水桶里摸着，摸着，摸出了半个泡得胀胀的馒头，他的眼光一亮，便将它狠狠地送到嘴里，好像在同四周的苍蝇争抢一样。

这一瞬间，立刻使我想起了从潲水里捞洋芋的邓自新，二十年中共的监狱真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同时也才让我们看清了中共。

我从他身边走过，深深叹了口气，不过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时在那潲水桶里，并没有向我伸出手来。

按着门牌的号数，找到了陈容康的门牌时，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头向里面望去，那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

正当我跨进去时，陈容康刚好从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我们已分别两年了，但他还是那个老样，瘦瘦清矍的脸上戴着深度的眼镜。我刚刚跨进大院他便认出了我，迎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大院左侧最里面的一间小屋，一面问我何时从盐源动身的，打算到那里去，今后干什么？

我回答他说，农场只给了我加刑两年的“平反”通知书，要等回重大后再看重庆法院怎么来收这场二十年冤狱戏？

拉开一方用白布做的门帘，他将我引进了小屋，屋里大白天开着电灯。像这样四壁没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开灯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里靠门的角落，一位大约与我的母亲年纪相似的花白头发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缝纫机上补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个补丁了，不用介绍，我便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向她行了一个礼。

我环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约十五平方，正中放着一张旧式的八仙桌，两张小床以桌为对称中心，安放在那里。左侧墙边靠缝纫机是一个三开大立柜，右侧屋角一块打满布丁的兰布将屋隔出一角，里面放着煤油炉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这母子俩吃喝拉撒全在小屋里。不过房子虽小却收拾得挺干净，因为摆设的家俱只有那么几件，所以小屋里并不拥挤。只是那临街烂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蝇却从那门缝处偷偷地窜进来。

陈伯母告诉我，她原来在一家街道办的被服厂上班，陈容康回家后，为让陈容康顶她的班，她已退休，并告诉我，她的退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元，陈容康刚顶班，工资每月二十四元，母子俩将就着这间小屋，相依为命的住下了。

我问道：这大院里住的人都同她一个单位吗？她点了点头说道，成都最打挤的就是住房，这周围几十家人除了她和陈容康外，哪一家都住着三个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侧那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孩子，还不是挤着没办法，屋里安了两张大床外，家俱几乎只好全放在过道上，为此与邻居经常争吵不休。

陈伯母一边同我们聊天，一边又从“厨房”里取出一个大瓷盆，走出屋上街买早点去了。

我问陈容康离开农场时管教科对他作的结论是什么？他淡然一笑说“刑满释放犯，虽然名称很怪，总算让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满人员中的幸运儿了。”

我又问他：“四十出头的年纪了，总不能继续打一辈子光棍。”他摇着头，指着这小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妈妈的工资只够吃饭，还别想吃好的，那来的钱娶老婆？再说即便有人愿意嫁给我，又那来的房子住？暂时我是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心里为我们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毁了我们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还处于最底层，留着人生的基本问题不得解决，难道我们真的被压在最底层翻不了身，成了社会无人疼爱的弃儿？

接着他询问还有多少人留在农六队，问到陈孝虞、邓洪元、夏光然、邓自新等人的近况。我告诉他，他们都先后去了北鸟，有的回家了，暂时还没有联系。

正谈话间，他的母亲端着一大盆白糕走了进来，拿出三个碗从厨房里取出热水瓶，在三个碗里倒上了开水，三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陈伯母介绍他十几年的生活往事，占着离菜市场近，常能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时陈容康哥哥也跟着他母亲住在这棚屋里，小孙子才几岁，每顿吃饭时吵着要吃干饭，全家人为了保证孩子每顿单独蒸一小碗饭，剩下的粮食，三个大人就把它搅在菜羹里吃。

全国老百姓照样都得熬社会主义苦汁。现在不管怎么样，早晨还能有白糕吃，总比以前好。

她唠叨起来，“比以前好”这种满足感，想起来真可爱，中国百姓的忍耐力可说实在太强，只要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来，就很满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种土壤么？中国人为什么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那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那里去了？

第二节 访张锡锟的家

下午，我们告别了陈伯母。由陈容康带路，走出菜市场向西城市中心解放中路走去。

他边走边告诉我，有关张錫锟的未婚妻在成都遇难的情况。张锡锟被捕后，她也在成都被捕，一直关押在成都监狱，后来两人同期在两地遇难。

身心已遭受严重摧残的张母，因闻得两人双双遇难，便昏了过去，从此得了老年痴呆症。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提到张锡锟三个字，她会立刻抱住他，呼着张锡锟的小名，没有人能劝阻得

了。

所以他的大哥，便拒绝一切登门寻找张锡锟的人。即使有人去他家作客，他都有言在先，千万不要当着老人面，再提到这个令母亲伤心欲绝的名字。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在一片水泥楼群里找到了张家的门牌号 1268。登上五楼，陈容康扣开了那扇紧闭的大门。

一个戴着眼境，头发花白的男子走了出来，当他看到老陈带来一个陌生人时，皱着眉头，并没把我们让进里屋，而是从门里闪身出来，向老陈问道，“今天有什么事吗？”当老陈介绍了我，说明来意并向我介绍，他便是张锡锟的大哥。

关于他我早已听说，1957 在成都一家报社工作的他，因为如实报导了大鸣大放的校园动态，便说他鼓吹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成为成都新闻界极右份子，送去劳教。最近他才刚“落实政策”，得以继续回报社工作，这里的房子也是才还给他们的老房。

我们握手之后，他叮嘱我，因为母亲的健康状况，不要当她的面提张锡锟，张锡锟这样一对恋人双双被害于同一天确实很少，毛泽东对柔弱知识份子的残暴，在人类历史上都少见，称毛皇上是法西斯头子一点不过份。

经过提醒，我有了思想准备，张大哥才轻轻推开房门，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里显得空荡荡的。这当然是“革命群众”的功劳，像这样的家庭不知经过几次洗劫，早已一无所有。

临窗的一张木凳子上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目呆滞地望着窗外的兰天，我想那便是张锡锟的老母了，身边还坐着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手里正织着毛衣，我猜那便是张锡锟经常提到的小妹了。

看着我们进来，老人并没有抬眼看我们，而是一直死死地盯着窗外的天空，好像她正在寻觅那隐藏在天幕上的什么，张大哥向他的妹妹使了一个眼色，那女人便收拾起了手中织毛衣的针线，一手携扶着老母进里屋去了。

大哥将老母进去的房门轻轻关上，我们三个人落坐，开始时一种压抑使大家静默了几分钟，我知道，先于我来到这里的，已有过几批盐源农场的刑满人员。所以，对于张锡锟牺牲的前前后后，似乎没有再多说的了。

坐在椅子上木然的我，心里不禁自问道：“这便是张锡锟的家么？二十三年前是什么样子？有过欢乐和团聚吗？那时，这位张大哥就没有结婚安家么？还有这位小妹也没有出嫁么？

母亲的样子就不用再提，二十三年中几经苦难怎样重新回到这个家？这里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张大哥似乎从我的眼神里查觉到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开始用低沉的语调讲他的母亲，“这几年来她一直是这样独自发呆，有时傻笑，张锡锟和他未婚妻被杀害后，对她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继续介绍说："母亲原来也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为了抚养我们三兄妹，辞掉了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我们三兄妹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这都与她的教育分不开。1957 年，我们兄弟两被划为右派后，家就被粉碎。父亲不久死去，剩下一个小妹，也被街道上强迫弄到农村去，从此便剩下了母亲孤身一人。"

"有一天街道居委会的人对她说：'你的娃儿都是反革命，这是你教育的结果，你有责任也应当悔罪，所以要真改造自己，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能白白的把你这种人喂着。从明天起你要自食其力，不然国家发给居民的口粮，你就得不成了。'"

"为了生存，从此她便在居民委员会的强派下，替人带孩子，扫街道，替百货公司拉板板车。凡是别人不愿干的事都派给她干，周围的小市民用冷眼对待她，她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只是忍气吞声的干活，否则她就拿不到'糊口'的粮票和生活费。"

"那时被拉去斗争，戴高帽游街的事是家常便饭，还叫她每一个月要写思想改造的报告交到段上去。"大哥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清理脑子里被刻得乱糟糟的伤痕。

"被人欺侮还不准还嘴，这就是群众专政。小妹从下放的农村里跑回来和那居委会主任讲道理。结果反被哄了出来，说她扰乱社会秩序要拘留她。"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街道居委会的指使下，红卫兵四次抄了她的家。将我多年珍藏的字画拿走了，说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要没收。他们一来砸锅，砸碗，母亲看着这群强盗不敢说话。

过了不出半个月，第二批红卫兵又来了，将家里几件父亲遗留下的衣服全拿走，还逼母亲交出我没有带走的日记和信件。

第三次红卫兵把家里的家俱全部搬走了，只给她留下一张小木床。第四次，红卫兵说你这个反革命老婆子，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便将她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又脏又黑的小屋子里。并向她宣布，不准她同任何人接触，不准她的女儿回来看她"。

"后来那街道的主任通知她，她二儿的女朋友，因为猖狂反对毛主席将被枪毙，要她去看，她像犯人一样被押进公判大会的会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媳妇饮弹刑场。回来后，便再也不讲话，只有每到傍晚独自倚在那黑洞洞的门口，盼着那些不归的孩子们，残酷的现实将她终于逼成了这样！"

客厅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出声，大家都陷入了悲哀和沉思，好一会儿，大哥才继续的往下讲，"我是去年落实政策的，二弟他们俩竟然永远不归了，托邓爷爷的福，回成都后，我回了报社，不久二妹也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大难不死的人，想不到还有团聚的一天。"

"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便去找母亲她老人家，原来的房子不在了，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一个胡同里的那间小黑屋。走进去，便是一般难闻的臭气，她呆呆地坐在小床上，看到了我竟然白着眼，好像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她仍然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她满头的白发，衰老不堪，屋子里

的臭味便是她撒在身上的屎尿，她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

说到这里，大哥的眼睛红润了，停顿了好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们的老屋已经拆掉，按政策的规定，补给了我一套报社家属的旧住宅。搬家那天，她死活不走，也不说话，几个人只好把她抬到这里来。

现在经过大半年的医治，她的神志才慢慢恢复，知道吃饭，解便。但是从此以后像白痴一样。医生说，她得的是老年性痴呆症。叫我说，这便是被他们逼成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原带着一种内心的敬佩，想来安慰一下这位英雄母亲。原先准备了一肚子的话，竟被眼前听到的这残酷故事，全压回到肚子里去了。我知道大哥只是简单的讲了他的母亲，至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妹子，大致都有各自不堪回首的往事。

面对着痴呆的母亲，面对着这对强忍内心巨痛的兄妹，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此时，我才明白，何以在我还没有跨进门来时，大哥便走出门来打招呼！

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人，所以才坦然面对所有不幸。

大哥的话一完，客厅里又陷入了沉默，对于我们三个经历了“阶级斗争”风暴摧几十年的人，更多的恐怕是思考!!

过了好一阵，话题转到“落实政策”上来，我们都是过来人，关于平反，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这仅仅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存在对过去的检讨和悔意。他的报社给他一套旧房，作为没收原来住宅的补偿已是天大恩赐了。

当我将要告别时，我才从我的跨包里取出了一付“松柏图”，那是我离开盐源之前托人上盐源县城买好的，上面有我写的题词：“张锡锟难友永垂不朽。”现在仿佛只有借这幅画来讲述我今天无法讲出的话。

将它送给大哥以后，我们便起身告辞。出得门来，走到楼下，夜幕已悄然降临。沿着通向外面的马路，我走出几十步外，猛然回首，抬头朝刚才的阳台望去，见那上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不知何时悄然地伫立在那窗口下面，我明白那是她十年的惯例。

这是二十多年的心头伤，每当黄昏时分，失去儿子的母亲，仍在翘首盼着孩子的归来。联想到此时此刻，我的母亲也会在蔡家医院的窗口下，倚窗遥望着我的归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我的母亲比起张锡锟的母亲，也许算幸运的，她必竟还没有逼成老年性痴呆症，她必竟活到了自己失去的儿子归来时刻。

回到旅舍已是晚上十点钟了，这一夜又失眠了，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马上就浮现出今天下午的情景，张妈妈那一头白发，满脸憔悴，倚靠在窗子下面，形容呆滞地望着我。

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就见她拄着拐仗向我走来，走到我跟前突然开口道：“你看见我的老二了吗？他在那儿，你能带我去吗？”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乍然醒来，才晚上十二点钟，便坐起身来想着可怜天下的慈母，可

怜我们不幸一代的母亲，其实她们比我们还要不幸，除了承担社会的歧视欺侮外，还要承担对孩子挖心般的牵挂。

坐在床上越来越亢奋，便索性起了床，打开成都市的地图，按照我原先的计划，拜望张锡錕家已经完成，若要拜访成都的旧友，一来时间仓促，来日方长。二来住在成都市区除了陈容康和张锡锟外，其它人的地址我还没记载，所以准备天亮就去火车站买回重庆的车票。

当我走向火车月台时，心情说不出的感慨。二十年前，我经过这座城市，从重庆弹子石监狱押到了凉山甘洛，而今我又从这里提着简陋的行囊从回渝城，想到当年同时押赴西行的人，现在所剩无几。我的眼前浮着那些当年枪押的无辜年青人的身影，和太平间里水肿的同难，我们究竟是为了那一椿，要遭遇这场不明不白的残害？

按理讲“右派”是中共内部的划分，自从中共建立之日起，因争“听谁的”？内斗从没间断，美其名曰“路线斗争”，特别是毛泽东登位，在他不可告人的动机下，这个斗争日渐残酷野蛮扩大。

毛把党内的权力斗争延伸到全社会，1957 年的“反右”斗争便从共产党内延伸到全体知识份子。使当时毫无政治倾向的青年学生，也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现在中共仍在为这场罪恶辩解，用“扩大化”替毛诡辩。其实完全无知的学生，才是被整得最惨的政治牺牲品，他们被糊里糊途扯进这场是非之争，接着又面对中共在“三面红旗”的恣意胡来。

保持良知的人，为反抗暴虐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唱出了一曲曲抗暴壮歌。其实他们并无涉足中共权力争夺的想法。

然而今天，对他们行苦役二十三年，连起码的工资都被无理剥夺，对他们善后处理草率应付，证明中共是一个残暴成性，极不负责任的党。如果它不放弃追求专制独裁，还政于民，难说不会再出现“反右派”相类似的惨祸。

我已年过四十，体弱多病的残身上刻着好多好多的伤痕，现在踏上归程时，还得重新开拓自己的生活，寻找还十分漠糊的生活起点。

当我上了火车找到了自己的坐位，对那车窗玻璃映出来又黑又瘦的脸发呆，我十分清楚知道，我的青春年华伴着灾难永远埋在遥远大山那一侧了。

从这一点上说，我和那些牺牲葬身在那里的难友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我是在回家，那么今天我只是去同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重逢。

第三节 被暴政摧毁的“家”再组合后

当火车缓缓开动时，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将我疲惫的神经松驰下来，我拉开车窗，任疾风吹拂我的头。远处田野在茫茫暮色中越来越模糊，我好像身不由已的飘了起来，飘离火车，在茫茫一片中，漫无目的向前游去。

乍然间来到一处白雾茫茫的森林之中，从那望不见的深处，传来了一阵老女人呜咽声，循声奔去，渐渐地从白雾缭绕中见到一处隐约的茅草房，那哭声便是从那茅草房里面传出来的，便好奇的推门而进，才看到半昏的屋里，一个白发满头的老太太，背朝着门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哭泣。

我正踌躇着站在门口不知所措，不料她却已经转过头来，然而她那披头散发，老泪纵横的样子，使我无法在暗淡之中看清她的脸。正傍徨时，她却站了起来，向我扑过来，并喊道："儿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你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害得我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

我连忙接过她伸向我的手仔细地端望，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而那脸颊右侧的额头上一个米粒般大小的黑痣，是我母亲的标志。看那面容苍老得比我当年的外婆还苍老，尤其是那双被泪水和眼屎粘成的眼睛同外婆几乎没有两样，真没想到这二十三年竟把她变了这般样子。

认定后，我在她面前扑通一声跪倒，连连磕头，喊道："不孝儿让老母如此折磨，望母亲赐罪"。那老人忙用颤抖的双手，扶我站起来。想不到同母亲一别二十三年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相逢，正拥抱着相泣，哭声震动旷野。

忽然门外有人大喝道："好大胆的孔令平，我们抓你好多天了，今天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你在这里同你顽固不化的母亲在一起，你这家伙二十年来从无反悔的念头，今天竟敢私自越狱，还不赶快同我们一起回盐源伏法？"

我闻声赶紧回过身去，认得来人正是六队的何庆云和邓扬光两人，正想开口反驳，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套在我的手颈上了，我被两个凶恶的狱吏拉扯着走出茅屋，拼命地挣扎着。

此时回头去望，那老母和茅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叫了一声，猛然醒来，却是南柯恶梦。

我坐旁的车窗已被邻近坐位上的旅客关上，车厢里电灯倒很亮，肚子里感到饥饿。正好装满晚餐的小车被服务员推了过来。我买了一口袋的白面馒头和一包榨菜，就车上的开水吃起了晚餐。

邻近的几位看样子好像是出差的，见他们已经取出一个折叠好的小木板，打开以后，是一张一米见方的牌桌。架在两排座椅的中间后，取出一包麻将倒在那小桌上，希里哗拉的打起了麻将。

车厢里附近坐位上的几个人都围上来。一时间吆喝声、搓麻将的声音混成一片，我心中感到厌烦。于是独自起身，走到本节车厢后面的坐位上去。

大难过去，原来的家人大多已失散亡故，被破坏的家根本无法修复。生还的人们便在相似命运的人中，力求重新组合成一个新家。

离开盐源前母亲来信，要我回重庆时，回到北碚前，先去九龙坡区的李家沱我的"妹妹"家里住两天，再由她安排回到北碚蔡家场。

所以我到重庆下火车没有在菜元坝，而是提前在九龙坡车站下车。说来，这是母亲又一段伤心事：

1972 年，孤苦无告的母亲因缝制过冬的棉衣，被蔡家医院的“革命群众”诬为偷了医院的棉花和布，斗争了一场，还挨了一顿毒打，本来就因失去仅有的小儿子，已万念俱灰的母亲，在挨打的当晚去蔡家的一口池塘自杀，被医院一位职工的母亲救阻。

第二天附近一家名叫胡德明的农村妇女，因可怜母亲的遭遇，将自己仅七岁的女儿抱给了她认作义女，后来还为母亲物色了一个老伴，善良的蔡家场农民为母亲作此安排，既可相伴母亲的晚年，又可以在被人欺侮时，有一个保护她的人。

小女儿的生父，因信奉一贯道，而被下狱劳改，刑满后便一直在德阳九五工厂就业，另一个与他同一工厂的就业人员钟治渊，曾是母亲在抗战时期办学的二十五兵工厂的一个学工，原本就认识母亲。

有一次两人一齐到了蔡家场，经过胡德明的介绍和撮合，1975 年母亲与钟治渊结成老伴，钟老伯的女儿黄雪梅，当时就在李家沱的重庆国棉六厂做挡纱工，于是商定好，我回重庆后，先去雪梅家里，以认同一个重新组成的家。

按照母亲的安排，当火车过了小南海以后，缓缓驰抵九龙坡时，我怀着陌生而怅惘的心情，挑着行李下了车，踏上了这片陌生的“故土”。

李家沱与南坪相隔不远，1949 年，父亲就任中央政校重庆分校校长时，我们就住在南温泉，虽然李家沱仅隔南泉不到十里地，但因当年居住短暂，我从来没到李家沱街上去过，没有一点它的印象。

下车时大约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寂黑一片之中，一时还找不到身处的位置。正站在那码头的铁门出口处张望，突然从下面传来了一声机动拖驳的长鸣，一阵从那个方向吹来的江风提醒了我，正前方便是嘉陵江出长江的交口处。

定睛看去，在澎湃的江水声中，点点灯光和朔江而上的机动船正在夜色中穿梭，而刚才同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大约十几个人，都朝着左前方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往下走，已经距江面五十多米了，听见有人在喊，“快！轮渡靠岸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挑起行李，急忙跟着往下跑。同这些“同路人”一同登上了开往对岸的轮渡。

站在轮渡的甲板上，天将黎明的夜风，吹得我十分的清醒和舒适，听着船底拍击江水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在这条江上坐船，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是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每次进城，上午下到中渡口的渡口，登上轮渡，朔嘉陵江而上到朝天门。下午再顺江而下回校，想不到就此以后的二十四年，我竟连轮渡都没有看到过。

轮渡靠岸，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沿着石梯，登上了河边菜市，此时天已朦胧，早起的小贩早已忙碌开了，我询问了去李家沱正街的路。

等我挑起行李走过菜市，再穿过几条宽阔而静静的大街，按照“妹妹”来信中的地址找

到她的“家”时，天已放亮。

在一幢四层楼旁的面前，我向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守夜执勤的老伯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黄雪梅的住户？那老大爷立刻知道我是“远方”来客。他十分热情地帮我卸下肩上的担子，一手提着其中的一头，将我带进走廊里第三间房前，敲响主人的房门，里面的主人好像也早有准备，从里面迎了出来。

我打量着迎出门来的两位，个子矮矮的大约二十多岁的女主人，想来便是我的异姓“妹妹”黄雪梅，而那位年纪不出三十的男主人，一定是我的异姓“妹夫”李修平了。

主人的住房仅仅只有二十平米，他们的孩子还在梦乡中没有醒来，看看壁上的挂钟才六点过一刻。

“早就知道你回来的消息，就是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不然怎么也应当到车站去接你的，”李修平接过我手里提着的行李，那语气像对自己久别的大哥那样。“妹妹”连忙走了出去，从过道对面的“公用厨房”里端来了一杯热茶。

“本是昨晚八点的车票，原来估计到重庆应是早上，没想到半夜就到了，惊吵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解释说，话里的歉意是真的，因为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对我完全是陌生的。

“妹妹”和“妹夫”招呼我坐下以后，“妹夫”说道：“今天先洗一个热水澡，去去一路上的风寒，再好好地睡一觉，你来这里，这就是你的家，一切都随便一点。”

他感到了我的局促，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厨房。“妹妹”也跟着走了出去。夫妻俩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露出毫不相识的隔膜。对我这个二十年从没感受家庭温馨的流放回归者，送来了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屋里只剩下了我和床上还在熟睡的孩子。

我细细的看了看这间仅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大柜，一个靠窗的办室桌已够拥挤，这便是当年住房相当“宽裕”的三口之家。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他大约只有五岁。但是今晚难道我也住在这儿么？心中一阵纳闷。

目光顺着那床的挡头，向上移去，那上面挂着一张七寸的黑白“全家福”照片，其中便有我日夜思念的母亲，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就是我的未来家庭的成员？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浮上了心头。

正陷入沉思，“妹夫”走了进来，一大桶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已放在过道一侧，一间只有三平米的洗澡间里了。

“妹妹”从街上端回了油条和豆浆，孩子也从梦中醒来，见了我并不显出陌生。她一边为他穿衣服，一边向孩子说，“舅舅是大学生，知识可渊博呢！今后呀！你要好好跟舅舅学文化学知识，将来也是大学生。”

此时！我才感到了一阵尴尬，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这个“外甥”带一件玩具或是衣物之类的见面礼呢？唉！从进了这个屋子的第一秒钟开始，说话、坐、喝茶、同孩子交谈，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是我生平以来的第一次。

“妹夫”告诉我，“妹妹”在重棉六厂上班，这房子就是六厂的家属房，而他自己在区政府的食堂里当炊事员。

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他们对于我的热情不但是因为同情，还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羡慕，其实他们从没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看。

我在“妹夫”的安排下，睡上了屋里那张唯一的床，他提着菜蓝子上街了，临走时，将那临街窗户的窗帘放了下来。

这一觉，我睡得很香，什么时候叫醒我起来吃的中饭我都记不得了，下午又继续的睡，直到五点钟，算是把接连几个夜晚失欠的瞌睡全补上了。

“妹妹”带着她的儿子已经回来，吃晚饭的时候，“妹夫”告诉我，他的老父亲就在这条街的下半段，开了一家裁缝铺，说父亲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当了一辈子的裁缝，论手艺算是附近最好的，远近的人都找他裁缝新衣，所以他的铺子生意不错。

上个月母亲拿来了几段料子，请他给我打两套合身的中山服，只因估量的尺寸不一定合我的身，所以一直还没动剪刀。现在，正赶上我人来了，正好去量一下，于是我在他的陪同下到了他父亲开的裁缝铺去。

他的父亲五十多岁，一看便知道是一个熟练的裁缝，他指着我身上穿的兰布衣服（那本是用劳改服改制的）说：“现在不兴再穿这种土兰布了，把新衣服尽快给你打好，你也体体面面的穿着回北碚”。

量完我的衣服尺寸，我们告辞他回到“妹妹”家的路上，我就想，总不能和他们一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过夜。所以一路留神看看有没有旅馆，但是所经过的路上竟没有一个旅馆。

进屋时我才看到，在靠窗户那一块唯一的空地板上，铺好了一个地铺。“妹夫”宣布我和孩子今晚睡床上，他们俩口子睡地铺。

这种反客为主的安排使我更加难堪，我执意要去寻找旅馆，说已经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怎么能为了我搅乱他们正常生活？

夫妻二人坚决反对说，既是一家人就不应分彼此。还说我把他们当外人看，再说重庆市住房本来就很紧张，一家人中兄弟俩都结了婚，就因没有房子，而住在一间屋里的也是常有的事。同时这么晚了，上那儿去找旅馆投宿？

争论了好久，最后达成协议，“妹妹”一人睡地铺，理由是她的年龄最小。人虽然睡下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直都在不安。真没想到我这个来客，给别人平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回家”的第一站就够拘束了，加之白天睡得太久，我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针毯上般难受，

翻了几回身仍毫无睡意，我实在不愿再这样窘迫了，打定主意，明天，我就动身回北碚。

下半夜我一直都在侧耳细听，窗下马路上有没有人起身走动，好不容易听见有人推着小车沿路扫街的声音，我便悄悄地坐起身来，穿好衣服，正向窗下伸手去取行李，却被中间的地铺隔着。我看了看和衣睡在那里的“妹妹”，正踟躇间，“妹夫”已经醒来。

他睡眼惺忪的问我怎么这样早就起床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我想赶早班公共汽车回北碚去了。他听说我要走，连忙坐起身来，说：“妈妈交待了的，要你在这里住几天，说什么也要等给你制的衣服打好了以后，换了衣服再回去，再说到北碚要换几次车，你一个人是找不到该怎么走的，今天你要走，我连假都没有请，谁来送你呀？”

他这一嚷，吵醒了睡在地上的“妹妹”，两个人一齐阻拦我今天回北碚。我这刚跨进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患上了“边缘症”。哪能那么容易溶入一个陌生的新家庭？现在只好忍受这种拘束和窘迫，服从主人的安排，暂时住几天了。

三天后，我终于换上了“姻伯”为我赶制好的新中山服，“妹夫”专门的请了一天假，由他陪同我一起从李家沱回北碚了。按照我来的路线，重新坐轮渡返回江的北岸，到九龙坡车站乘坐去沙坪坝的客车。

廿多年过去了，客车经过小龙坎时，那狭窄的街道还是那样，只是当年我住的医院已经不在，我竭力搜索着那里，寻找当年我和弟弟“团年”那家饭馆，但是我却没有找到，也再看不见他那憨厚的脸和瘦高身影了，一股悲哀再次猛烈地掠过了我的心头。

当车过杨公桥时，我又想起了当年刚考进重庆大学的那一段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我从学校回家经常是穿着草鞋步行走路。记得那时早上五点就起床赶路，整整要走十个小时，途经的地方全是农村村落，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回到北碚。一双新草鞋就在这长途归途中穿破了底。

当汽车经过双碑时，我把头紧紧贴在车窗上，这是我童蒙时代的摇篮，詹家溪！我曾在这里顽皮，那儿有我童年的美丽回忆。

记得妈妈有时到沙坪坝去了，我就向外婆说，今天该我好好玩一天了，便到附近包谷地里取下那红红绿绿刚发出来的包谷须，用饭粒贴在嘴上，手里舞着过年去磁器口买的大刀，装成戏台上的杨家将，在院子里同几个同龄的孩子们“杀仗”。

詹家溪小学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老样子？高自强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我感到她比我的母亲还严厉，记得她常常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后来我才明白它的意思。唉！不知道她现在还在那里么？她还健在么？

我从车窗里望见了那远处的松林坡，那山上也是我常常独去的地方，睡在松树底下，静静聆听江风吹打松树激起的涛声，有一种我自己才听得懂的大山语言，像诗。天晴的时候，我又最喜欢到山顶的花园里去，睡在花丛下面，静静的欣赏绕着花朵繁忙采蜜的蜜蜂鸣叫。

童年美丽的画面，被二十三年地狱的恶梦，挤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里，突然碎成了几片。只是没能消灭的天真无邪片断，此刻又渐渐恢复过来！

想到再过一会儿，我便要见到整整分别了二十二年朝思暮想的老母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涌向心头。妈妈就是在这里，经历她中年时期最悲惨的十八年炼狱！

在这里她经历了她老年丧子之痛，直到痛不欲生，投塘自杀！

当汽车缓缓爬上山岗，在横贯蔡家的交叉路口停下来时，惶恐占据了我，这是一座乡场，一座中国大地上普通的，在当时又是那么贫穷边僻的乡场。

那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街道的两旁，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两排高矮不同的泥夹竹墙结构的平房。

我和李修平走在街心，从路人的眼光里带着陌生，我想大概因为我看上去又黑又瘦的缘故。

距场口两百公尺，机耕道左侧宽约二十米的石台阶后面，立着一排两层的楼房，中间是双扇的大门，大门的右侧悬挂的白添木板上写着："北碚蔡家镇人民医院"九个大字。

双扇大门的前面，站着三个穿白大褂医生模样的人，冷冷地看着我们走进医院大门，并不答理。我跟在李修平的身后，径直朝着门内的楼梯走去，上了二楼向右拐进了过道的第三个房间面前，才停下了脚步。

李修平轻轻地去敲那门，那门是虚掩着的，一敲门，门就打开了，屋里并没有人。他拧着行李跨了进去，一面告诉我："到了，妈妈就住在这里"。

我跨了进去，将行李放在中间那床的前面，李修平说，妈妈就睡在这里，说完他走了出去。

第四节 同母亲重逢

我一个人留在屋里，这是一间二十平米的病房，屋里放着三张病床，每个床头都安放着一张旧办公桌，桌上放着煤油炉和装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床下和两侧都堆放着纸箱，木盒等物。

整个房间便以这三张床为中心，三分整个房间。每一张床之间留着很窄的过道，仅只能一人通过。虽没有布帘隔开，但一看就明白这里住着三位单身职工。

耳朵里响起了雪梅的话："在重庆地区像我们这层楼一家人占了一间房子住，是最好的人家了……。"我终于明白，何以母亲要我在"妹妹"家多住几天的原因。

看来母亲受了二十二年罪，共产党给她"平反"了，却连自己安家立身以渡晚年的立椎之地都没有。

在我回来之前，为了安置我，恐怕不知向她的"组织上"费了好多口舌？最后仍只有无奈何的在这个集体宿舍里，迎接我的归来。

我再次环视了我的"家"，我今后的路要从这里作起点吗？

十分钟后，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和讲话声，李修平回来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我立刻回想到我离开她时的脸貌，没想到二十三年后她已苍老得那样！但我仍能根据轮廓认出，那便是我二十三年来魂牵梦萦的老母亲。

她与当年抚着我的头，依依惜别的老外婆，真是一模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背也变驼了。

当我们母子的眼光第一次接触的那一瞬间，我便被一股上涌的血堵住了胸口，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走上前抱住了那花白的头，亲吻那满布皱纹的额头，当我的胸前已沾满了母亲的泪水，当血液猛地冲开了被堵塞的心窦，这二十三年有多少的经历要讲，有多少哀怨要诉，有多少泪要流啊！

而妈妈却一个劲地用她那干瘪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背，伫立良久才喃喃地说出："这下好了，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我看着桌上的闹钟，已经快 12 点了，忙把话题岔开，故意发问道："妈妈，中午了，该做饭了！"妈妈才松开了手，擦了擦老泪纵横的脸，去那床边纸盒里取出一块肉来，李修平接过手，到盥洗室里洗净，大家忙着生火炒菜，从伙食团打回米饭，三个人围着那张办公桌，吃我回到母亲身边第一餐"团圆饭"。

我们正吃饭，两位与母亲同室的医生，端着饭盒子走了进来，母亲向我介绍了她的同房，与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那一位，家住北碚街上。另一位比母亲年轻的医生住在沙坪坝。看来在这间屋里，无家可归的就只有母亲一人了。

从六八年弟弟出走后，整整十多年，她就这样孤苦伶仃，守在这人间地狱里！从现在开始，我的到来成了她新生活的开始。

午饭以后，李修平回李家沱去了，他晚上还要上班，母亲一再向他道谢，并且说，过年时一定到李家沱团年。

我被新任的医院党支部书记王光明，安置在楼下一间病房临时住下，距我住的那房间不到 10 米，巷道的尽头，就是停尸房，我并没有去看整个医院还有没有其它空着的房间。

初来乍到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有一个窝暂能住下，懒得去同医院的"领导"发生磨擦，何况二十三年挫磨已使我习惯了忍让。

二十三年来，我也不知同多少死人打过堆，自己一半也是从阴间里走出来的，自以为一身正气，不怕夜半鬼来抓我。

现在回想，那医院的党支部够体现"落实政策"!

（一）相亲

儿子长大成人后，传统的中国母亲，恐怕没有比关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当 1973 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后，一直没有忽视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对象。

但那个年代，凡沾上黑五类的，就等于染上了永生医不好的绝症，准备着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辈子受人歧视。

所以好人家的女儿，自愿接受一个“黑五类”，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实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这畸形的“阶级斗争”社会中，却藏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从我给母亲的通信说起。

1973 年我和母亲整整十五年音信渺无，一旦接上通信联系，我对亲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曲，会自然流露到这些信件之中，乍读起来有的像无韵诗。可偏偏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医院造反派的头过目，这些经过文革铸造出来的近乎文盲的宝贝，是连普通的抒情语言都读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抠打母亲的刘巴，却像发现了“密码”似的，以为又是表现她的阶级敏锐性的好机会，便将我的信拿到他们学习会上公开朗读。要大家讨论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参加学习的人中，有一位从北碚卫生防疫站来蔡家医院蹲点的医士，名叫邹双银的姑娘，却被这些内容新颖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讨论会中解释那些被刘宣树说成“隐语”的典故，例如亡羊补牢一词被刘宣树说成，我想杀了羊子从牢房里逃出来。

散会后，邹双银私下向我母亲索要这些信，这位才二十三岁，还守在闺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一了个机会向母亲表露了她的内心，并认母亲作干妈。表示愿意等我到刑满以后。

母亲闻讯大喜，即刻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并且在那封信里附上了她的照片。后来当我的“平反”开始进行时，我被场部蔬菜组的恶犬咬伤，她闻讯后，为我配制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挂号为我寄到盐源。

我回到北碚时，邹双银已调回了北碚防疫站。当时没有电话，母亲把我回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她，一周后，她回了母亲的信，约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见面，地点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亲打开了她放在床头的纸箱子，从里面取出了专门为我织好的新毛衣，新毛裤，以及一双才买的新皮鞋。可是当我穿上这些新装时，衣袖和裤脚都短一截，妈妈感慨地摇摇头说，“在我的脑子里，你还是那么小。”

是呀！我被划为右派离开家的时候才十九岁，一个稚气的孩子便被“反右”的恶浪从她身边卷走了，而今过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记忆里的那个孩子，怎么能同现今站在面前的，从狱中滚打出来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妇可不是闹玩的，人家是医士，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一副寒酸像，出现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两套从李家沱带来的中山服，勉强的可遮盖里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两个码子，穿上脚实在夹得开不起步，还不如自己脚上那双从千里路走回来的蓝色解放鞋，既来得轻便，又舒适。

妈妈要马上去街上买一双，却遭到了我坚决的反对，我的理由是，对方只讲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内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于是在母亲的督促和省视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这双解放鞋却被我固执地保留下来。

穿着一新，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强地点了点头。

星期天早上八点钟，我和母亲在蔡家场那十字路口，上了去北碚的汽车，九点钟我们准时按照小邹指定的地点等她。三分钟后，一个穿着十分讲究的姑娘，从市区的方向向我们走来。

母亲连忙迎了上去，我也立即认出，这便是母亲寄给我相片的那一位。

只见她身着一套灰白色的新西装，经过了特别的熨烫，白色的大翻领衬衣外面打着一条黑色的领带，头发也是刚刚烫洗过的，微微的蜷曲，却黑得发亮，脚上穿着一双擦得油亮的黑皮鞋，手臂上挎着一个白色皮包，还没有走近，就将一股清香的香水味向我送来。

这身打扮，当时要算是讲究的白领人士了，与我身着灰色中山服脚蹬蓝色解放鞋，皮肤黝黑显得土里土气的装扮相比，很不配称。

我很苯拙的放下两手，不自在的脸上推起了笑容，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笑得极不自然，简直可以说是装出来的。

一阵局促的压力之下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看着对方笑吟吟的样子，见对方已将手伸向我，我才木然的将放在身边两只僵硬的手伸了过去，握了握她肥胖而白嫩的手，便慌忙收了回来。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看到我第一眼是什么表情，还好母亲已经拉着她的手，朝着通向市区的那条路走去。我才像解了围似的，放下被弄得紧绷绷的身架，跟在她俩的后面，简直就像是一个跟班的仆人。

但是几分钟后，我那在狱中多年形成的自信，超然和独傲，很快矫正了我最初颇有些狼狈的局促，心里却还在不断的埋怨自己，亏你还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猛士，怎么见着一个女人便输掉了应有的男子威严和阳刚？不是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么？今天怎么会变得如此？

于是我挺起了腰杆，将那方才僵硬的手背在背后，若无其事的显示自己是在同“朋友”一起逛大街。可惜，我们依然没有讲话，我也依然没有走上前去同她并肩而行，只是默默地跟着她俩的后面，想着该用什么问话来试探对方。

医学方面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问话，至于文学历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的开口。于是，我们最初相见的瞬间，给对方留下了致命的印象，直到两个月后，母亲才告诉我说，小邹当时就坦然地问母亲：“他怎么是这个形象，又黑、又瘦、又老，连话都讲不出来？好像监狱把他关傻了一样！”

唉！早知我的形象那么糟糕，怎么也不会匆忙跟着母亲到这儿来出洋相。

我们沿着中山路，母亲和她走进了百货商店，我却毫无兴趣的站在商店门口等了足足十五分钟，当她们俩出来时，我和她又对视了一下，我能感觉出，她那眼光里含着一种挑剔，我

原先准备好的话和天真好奇的发问，不知为什么全都咽了回去!。

我终于鼓起勇气发问道："防疫站隔这儿有多远？""噢，大约一里多路"她回答得很随便，而且让人无法把话接下去，我的这句打破僵局的主动，被她简短的回话挡住了。

看着她仍挽着母亲，按照原路重新折了回来，我仍然傻呼呼地跟在后面。回到了开始约会的菜市口，看看时间已快十二点了，母亲选了一家临街的饭馆点了几个菜，三个人共进午餐，我瞅着堂倌还没有把菜端上来的空挡，第二次鼓起勇气试图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防疫站工作忙吧!"我第二次主动发问。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还好"，接下去又是沉默。

就这样，经过我两次努力，想打开同她对话的话匣子，却没有成功。接下来，只好闭上嘴默默无言的坐在那里，直到母亲张罗着堂倌把菜端上来，各自闷着头把饭吃完。

吃完饭后，她便起身告辞，说她下午还要值班，便提着她的手提包离去了。我出狱后的第一次"约会"就这么尴尬的结束了，以后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直到母亲讲出了小邹见到我第一面的印象。

看样子，头次见面便改变了她四年前的初衷，不过母亲告诉我，小邹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是拒绝还是维持，还是待观察，这给母亲始留下一线希望。

所以她一再催促我打主动战，但我明白，我们这个经过"阶级斗争"冲洗过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那种美丽的故事了。

何况我并不具备才子的条件，对方也绝非佳人。不过，我这种形象，难道不是冤狱造成的么？对方因同情心还是因我在书信中那点文才产生的感情，有四年的等待已不容易，虽然这四年的等待因对方的又黑、又瘦、又老的外表而告吹了，这本是二十三年改造的功力所要达到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把我变成了鬼，又能怨谁？

既然对方是那么脆弱，我又何苦免强挽回？

所以我不想再给她写信，我们之间的玫瑰预约便这么告吹了，但第一次约会，我面对"爱情"这一当头棒，是对我自信的打击。我必需直面二十三年冤狱带给我的婚姻难关，并且预伏着后半生建立家庭的坎坷不幸。

（二）范小妹

然而，生活竟这样玄妙莫测，没有几天，母亲在七年前认的干女儿，范萍和她的弟弟范山，一起来了，范萍那时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姑娘，正在附近的二十四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而范山还只有十三岁，在蔡家小学读五年级。

范萍既是母亲认的干女儿，而且是她在最沦落时结下的母子情缘，我理应称呼她为妹妹，当时我俩相差整整二十六岁，便称她为小妹妹。我们初次见面那天，她穿着洁白的毛衣，裤子虽然打过补丁但很干净，特别是她少女的腼腆，带着特有的矜持。比起邹银双来更多了素补和

诚实。

进门时她手里提着一个竹蓝，里面装着莴笋和萝卜，进屋后，将它放在母亲平时作炊的小桌下面，站起身来喊了一声大哥，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第一次见面，我心里很紧张，虽然，我当时已四十二岁，什么风雨世面都经历过，唯独二十几年与女性完全隔离，见到她，同她说话十分的口讷。

范山手里提着一个竹子编的笆篓，里面的虾子活崩乱跳，撞得那笆篓朋朋直响。看来这姐弟俩对母亲的生活习性和爱吃什么很熟悉。母亲一生中喜欢吃鱼虾，当时市场上是买不到鱼类食物的，那怕这种小鱼虾也与市绝缘。

他们告诉我，姐弟俩平时经常在池塘、田边、摸到鱼虾便把它们关在竹篓里，放在塘里养起来，等到积累到一定数量，便给妈妈送来了。

这姐弟俩的出现，顿时给本来显得冷清的“集体宿舍”增加了许多活力。弟弟催着姐姐快去拿盆子来放些水，说再迟一点，竹篓里的小鱼虾们都会“渴死”的，两人忙碌起来。

妈妈见两个孩子，满脸堆笑的问“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呀，妈妈呢？”小妹笑着回答：“哥哥没有回来时，妈叫我陪在你身边，现在哥哥回来了，我们就不好来了。”

妈妈回答说：“这几天你们没来，还怪想你们的，如果再不来我就要到乡下来找你妈了。”

范山抢着回答：“这几天猪儿有点病，妈妈忙着煎药喂猪，所以一时没空，这会儿她还在场口抓药，她叫我们先来这，一会儿她就会来的。”

正说着楼下一迭声的已经喊了起来。随着一阵咚咚上楼的脚走声，一位比母亲年轻，精干的农家妇女已经出现在楼梯口了。

从她那黑黝的皮肤和满脸皱纹，看得出这是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是苦了一辈子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穿着一身兰布的棉衣，脚上是青布布鞋，一进门来便一迭声的向母亲道歉，叨叨的说道：“大姐呀！我早就该来了，听说哥哥回来了，那天都想来看看哥”。

母亲连忙牵着她的手，给她端了一杯早又准备好的茶。胡妈笑咪咪地说道，“大姐呀！你真好福气，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又是大学生，身体又结实，现在落实政策以后，政府一定会安排一个好工作。今后呀，你总算有靠头了。

转过身来向我说道：“哥呀！这些年你妈没有少吃苦，医院里的那些没良心的欺你妈是右派，人又老实，又是一个人，净拿脏活、重活给她干。还常常无缘无故的打她骂她，我们蔡家场的农民个个都替你妈打抱不平。他们越欺侮你妈，我就偏要认你妈为干亲家。”

接着讲道：“每次过年过节，我们杀了过年猪，就要给她留一块肉，打了糍粑也要给她留一块糍粑，总之，我们有啥吃的，她也有。”

“有一次我正提着一块肉，在大门口就碰到了刘宣树，她正颜厉色的警告我说：‘你们老是与右派份子划不清界线，如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没收你送给她的东西。’我马上反对说：

‘你搞清楚点，我是贫农，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侮的，你如果敢没收我的东西，我就要你好看’”。

“她看到我态度如此硬，便连忙改口说：‘我不是对你，我们的上级有规定，对方坚志这样的阶级敌人，就是要严加看管’。我回答她：‘我们当农民的，才不管你那一套，我们只知道医院的人欺侮一个老太婆太过份。’”

听她介绍，知道这是一个心直口快，心地善良的农家妇女。在她的内心里有一杆公平秤，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正义感，她不迷信谁家的宣传，她是凭她的直觉来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三）汪秃子

从盐源回到重庆时，只带回 1980 年的粮票和布票，到蔡家后，才明白城里的居民什么都要凭票才能买到，不光购买粮、油、布，就连买肥皂、盐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须品，都要票证去买，母亲特制了一个专门存放票证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带钱外，还必须从那里取出要买东西的票证。

铁托早把票证比作套在中国老百姓颈上的三根绞绳之一，真是一针见血。所有的票证都要靠户口薄领取，这就是说，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便不能生存。户口便是“党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亲身边，除了粮票布票，其它所有票证都是母亲的。我还没来得及上蔡家派出所办理户口。为生活所迫，上户口的事，刻不容缓了。

当我取出盐源农牧场开具的上户口证明和介绍信交给母亲时，她皱着眉头，那介绍信上，关于我的身份写的是“刑满释放人员”。理由是开介绍信时，重庆法院并没有对我的原判进行平反，而在年龄栏中写着 41 岁。

邹银双的婚约告吹后，在母亲心上结下了一个无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着介绍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 42 改为 38，改过后，又仔细地戴着老花眼镜审视了许久，满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户口薄来，告诉我，她今天专门请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户口。

看样子她的心情不错，儿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边了，今天总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个名字的户口后面，添上了儿子的户口。从此以后这里便不是一个人，而是两口之家了，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头发，便起身同我一齐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侧的一个门庭阴森的院子里。

一提到派出所，我会想起少年时代，去朝阳派出所递申请助学金报告时，那陈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褪的伤疤。

后来，经历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狱磨难，对于派出所这种衙门，一直把它当成欺压善良百姓的阎王府。

走进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坐在外面的两张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着警服，态度傲慢。当我们俩走进去后，那女的白了我们一眼。

母亲是这里的“常客”，过去她每进来一次，便如小鬼进了阎王殿，不是交“思想汇报”挨训斥，便是接受游街的决定，或是“交待问题”。

现在虽“平反”了，但骨子里那种小鬼见阎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余悸。我感觉得到她进来后，态度十分拘谨。拿着户口登记簿和盐源开的介绍信，走进靠里面的那张办公桌，那里便是蔡家场人人畏惧的汪秃子。

这姓汪的家伙，我刚回来几天就认识了。

回来的第三天，我上街买菜，那天正逢赶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间，看见那里围着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化子模样的跛子，正拦着一个身着民警服的胖胖秃头中年人，要他开一张残废证明。

从围观赶集农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队一个曾被划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里面的汪所长。几年前这汪所长组织了一次五类份子的“游街批斗”，在游街时，将这个“乞丐”的左腿打断，从此丧失劳动力，生活无着，变成了乞丐。

后来民政局为了整顿市容，收容了全区所有的“叫化子”，对这人说：“只要有当年组织批斗会的人开一张残废证明，便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基本口粮。”

於是乞丐鼓起勇气在大街上将汪所长拦住，请他给一条活路。

不料那汪秃子，不但不给他开证明，而且，一把将他推在集市街边的污水坑中，弄得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简直像一个鬼，然后扬长而去。

我目睹这人欺人的一幕，一种本能的憎恶，徒然从心里升起。询问同我一起目睹这一幕的医院门房小张，他告诉我：“这汪秃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个预审员，曾利用职务，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红吃黑，才从北碚法院贬到蔡家场接了这户藉的差事。”

旧性依然不改的他，掌着辖区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对“五类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亲当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对象，想起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长，我的儿子从盐源回来了，今天费你的神给他上一下户口”。母亲怯生生的向他开口道，一面把户口簿摆到他的办公室桌上。而那汪秃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报纸并不答理。

我向他坐位上方的墙上看去，那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不禁想到旧时衙门，升堂的中间都挂有“明镜高悬”的大匾，但从来是黑暗无比，贿赂重重。而今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向来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遮丑牌。

户口既管着一个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上户口的人就仗此，成为被上户口者生存的决定者。想到这里，我的眼光，又从那墙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来，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圆脸上，

我才发现，那鼻子周围也有同陈大麻子一样的麻子，心里对他那种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满了憎恶。

二十多年来，我在监狱中天天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的欺软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了解，并且学会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但是尽管我的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恶感，仍觉得还不到发作的时候。

如此忍耐了几分钟，见他仍在那里看报，依然没有理会母亲，直到母亲再次请求后，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报纸，爱理不理的将母亲放在办公桌上的户口簿挪到面前，慢慢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懒洋洋地取出钢笔，头都不抬的发问：“姓名？”那介绍信上明明写着的，他却不屑一看。

我被他这种挑衅性的态度激怒了，母亲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连忙使了一个眼色，低声下气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别？”“男”。

“年龄？”“38 岁”。这一次那汪秃子才抬起头来打量着我，我苍老的面容，使他奸诈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拿到对方短处的诡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绍信细细地看起来，母亲改动的笔迹被他识破了，他奸笑着得意的站起身来，用一种逼视的目光对着我：“这年龄是你改过的吗？”我对他这突袭一时还没准备，母亲已慌忙接过话来：“没有，没有的事”。

然而他这种多年培养的，抓到猎物便穷追不舍的猎犬本领，使他精神抖擞起来，从他办公桌上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你还敢替你的儿子狡辩，这明明是涂改了的笔迹，还不马上老实交待？”

看来这家伙是训练有素的，对于处在压迫阶层的五类也是欺压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话”对阶级敌人是用惯了的，不会走样。

尽管五类的说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里，我们娘俩，一贯只能是被他训斥，被他呼来喝去的奴隶。

此时我的一股无名恶气直冲脑门，终于按捺不住，走到母亲的前面，恶狠狠向他吼道：“改了个岁数怎么啦，你要做什么？”

这种以恶对恶的战术，便是炼狱中培养出来的，在监狱中对张棒棒，徐世奎，何庆云这般恶吏我使用过，对于麻脸中士，三星阉将，我也使他们难堪过，虽然我这种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许多眼前亏。

那汪秃子，对这一招，感到吃惊，因为他一时没对答上来，对母亲的盛气凌人态度，一时没找到該如何应对。

呆滞了一分钟后，他立刻从自己的椅子上跳起来：“你这劳改释放犯，看来是没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开顶撞？”他的脸涨得通红，向我扑来，摆出“阶级斗争”操熟了的打手架势，指

着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齐站起来，将我围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铐子或绳索之类的东西，像收拾犯人那样将我压下去。

母亲见这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怕我因为冲动而吃亏，慌忙地拦着我，要我不要说话，并且用身体护着我。我明白越是闹到这个地步，越不可退让。

“怎么？要动手打人哪？还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帮那一套不是？”我厉声的地喝道，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姓汪的退缩了，重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见这句话奏效，便连珠炮似的反击道：“姓汪的，你放明白点，今天我是来落实政策的，你还公然的称我是劳改释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你们这一帮子人软拖硬抗，顶着不办，今天又不为什么，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势，老实诉告你，不是四人帮的天下了！也不是你们这些人为所欲为的时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动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办公室去说个所以然。”

汪秃子被我这番怒斥弄哑了，一时还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对答不上来了。母亲见势，马上打圆场，向汪秃子解释道：“我儿子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你别同他一般见识。”

殊不知这反倒助长了秃子的势头，他一迭声喊道：

“你们母子俩既是落实政策，就应当模范的遵守政府法规，户口是国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窜改户口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知识份子比我们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讲，就凭你们窜改户口这一条就够刑事拘留的条件，今天，你这户口就拿不走了，等我们查清以后再作处理。”

我不知道户口管理有没有规定，对于涂改年龄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但我心里只想到绝不能向这仗势欺人的狗退让或认错，便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一边喊道，“别理他，看他把我怎么着。”一边拉着妈妈的手向门外走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阴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亲先前的那阵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丧的一路上叹气。户口没有上，到惹出这场麻烦是她万没有想到的。后悔自己考虑不周到，但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番苦心？

我只好劝慰她：“我们又不是伪造户口，更改年龄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继续找麻烦，我们一样生着一只嘴，谅他也做不了什么”。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场在汪秃子这样的恶棍把持下，母亲当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卫处的郑树勋那张奸诈的脸时，我的心里一阵阵在发冷。

等待沉清冤狱的人，命运却操持在这帮虎狼般恶吏的手中，前途岂可乐观？看样子我们这一群刚脱离虎口的羊羔，又将掉进狼群的包围中。

我接着马上要回重大，了结未了的旧案，可我拿什么去见郑老头？

马大炮的主意本出于无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吨的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当我空手前去时，我作好的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今天这汪秃子那种像要吃人的态度，使我压根没对前途有什么乐观。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饭吃，便是共产党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围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个普通百姓所起码具备的人格吗？

按照郑树勋离开盐源农牧场的约定，我在回到重庆后的一周内就要回重大保卫处去报到，他这个“约定”属于私人规定，还是对落实政策人员的一种规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从盐源回到重庆的时间并没有卡定，而且何时从盐源动身也没有说死。更主要因为我实在为难于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庆后，我迟迟没有到重庆大学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过，年底即将来临，我总不能过着不工作也没有工资的失业日子。虽然母亲说，我回来后，她的工资已经恢复到每月七十多元，养话我没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她身边，是否工作暂时并不是十分迫切的。但我耐不住了，于是决定十一月底，无论如何都得回重庆大学去。

第二章 落实政策的马拉松

如果因为母亲赐给了我生命，要感恩于她的生养之恩；那么我求学的学校赐给了我生命的内涵，不但铸造了我的灵魂，还教会我知识和适应社会的本领，所以理应称为母校。

学子与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对母亲的感情，在离开这块我曾居住过、生活过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后，重返这里，也有一种怀旧之情。

可惜，这种感情却因这场人祸蒙上耻辱，蒙上了绵绵的恨！

虽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来源于中共统治阶级的一小撮，来源于毛泽东，但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应该有起码做人的良心，有起码的判断能力和是非标准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头的毛泽东，竟用他想出来的“六条标准”支配着他们，把当年这场荒唐运动搞成一场令人胆寒的炼狱！使数万无辜学子伤身於荒野边陲！

令人惊叹的是，毛泽东怎么想得出把学校变成人咬人的场所？让品性卑劣者变成狗，向毫无防备的学子恣意残害，报复，取乐？

现在，当年整人的打手们藏到那里去了？是心亏理虚躲了起来，还是像狗一样藏在暗处，等待再爬起来反咬一口的时机？

回校的一路上，头脑里不断发生奇怪的问题……

第一节 回校

从北碚坐车到沙坪坝，下车后步行向重庆大学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旧。记得刚刚入学时，我在这条街道上买过文具、参考书、理过发、吃过饭。

还记得离大校门不远，有一家餐馆，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绝。我那时觉得这是我吃过的做得最棒、价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经过那里，我有意觅寻，却不见了当年那餐馆，沿街的理发店文具店也改作其它店铺了。

当我走到那两块刻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离开它的那一幕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们从这个地方，被押上大卡车送到南桐矿区去“强制劳动改造”，那一天在风雨和太阳交叉作用下，风雨操场锣鼓喧天“欢送上山下乡干部”。

全校游行队伍，使我们这几十个被“开除”的异类，徒添了歧视。

今天，二十三年过去了，我刚从地狱里走出来，满脸带着过早刻下的皱纹走进校门，循着回忆的引导先去沿江马路，当年那儿曾是我被斗得昏头转向后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呼天喊地，在绝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学院的石头房子还是老样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弹，同样也抗住了“文革”的枪炮！再往前走，化学实验大楼还是那庙宇式构造，只在那辽阔的中间地带，添了几座楼房。

在当年饶家院古老的建筑前面，我看见门口悬挂着：“重庆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牌子。不过，此时，我不想马上就进去，因为我还没有弄明白，在经历了这“脱胎换骨”后，来这里干什么？

是向他们去诉说自己想都没想到的灾难，给我安抚么？是拾掇那些被破坏的幻梦，向人们呈诉满腹的忧伤？还是去见一个连一无所有的穷犯人都想再榨点油水的郑树勋？是去认错、求饶，以可怜来换取下半生的安稳？

为弄清楚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还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当年在这里曾留下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场我个人的灾难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母校的过失，还是当年被整的同学、教师的过错？是我们的过错还是专制主义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在饶家院旁徘徊后，便向着松林坡大礼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过去，原先就已破旧的礼堂还在那里，只是当年挂在那些松树干上满贴的大字报，交心书和血书却无影无踪了。

追溯这儿的狂热，便能了解学生是一个可塑性多么巨大的群体。

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他们具有何等可爱而又何等可怕的双重性。

他们可以呼喊民主的声音；又可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

创造美好未来，同毁灭正义和科学，同时都可以为之！就看谁在操纵他们。所以这是好事坏事都可做出來的群体，当年共产党对学生的操纵使校园里陷阱满布，现在想来还使我不寒而悚！

再往前走便是学生食堂了，我们当年在这里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时，却不知道“阳谋”的含意！那些当年张贴大鸣大放的专栏早已不知何处？而今只留得一片荒凉，隐约可听见当年在这里的争论和叹息。

转过弯道便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我在当年住过的地方呆呆站了好了一会儿，仰头上望，还清楚的记得曹英们是在那一间屋子里组织的轮番批斗会，将被划成右派的人斗得昏头转向、精神失常。

当年曹英威逼我的声音犹存耳际，我就是在这里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掉进了“伟大”中国共产党所布下的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我就在这里把自己痴迷的个人幻想，变成一场二十三年地狱里的炼狱。

转过身去，便是图书馆后背山底一角，我们当年这群心灵惶恐的孩子们，曾拖着犁耙挣扎在刚刚被新鲜粪水泡灌的水田里，干牛的活，脱人的皮，从此，地狱的烈火就在我身边燃烧起来。

就这样的一路寻来，当年在我求学的这个摇篮里，除了歧视虐待什么也没有！同学间的那种天伦的感情，全被当年乱舞的群魔扼杀了。

现在，我要重新认识这个曾生活过的地方，重新了解那个时代校园里的主人，再认识这

个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团，除整人和对社会的破坏，它有光明的一面吗？

如果说我在这故地重游，拾到了当年没有发生，现今已改变了的东西，又产生一个最大的疑问：当年整我们的人现今有几分省悟？他们怎么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样？毛泽东还没倒，围着他的猢孙们就散了？

重大保卫处仍在原来的老地方。不知为什么，一进入那保卫处的小院我就感到压抑。说实话，若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绝不会主动去跨这个门槛的。

走进大门，在过道上，我向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询问郑树勋是哪个办公室？他指了指走廊尽头倒数过来的第二间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好了几种不同情况的应对，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门。

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四个月前在盐源"提讯"我的人。不过此时白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审案"的凶像。

一见是我，他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入座，还谦礼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暄一路辛苦之类的客套话，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我警觉起来，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心里却在惴度对方要耍什么花招？

此刻我忽然对空手而来感到难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进门就打开提包，按照三个月前他开出的那张货单，将"贿物"一点点地数给他，恐怕对方会关上房门，在喜形于色的同时，会对我的安置有一场讨价还价的口舌。

他一定会说出几个紧缺人才的单位，说那里的规模如何，工作条件如何，工资待遇如何，建议我到那里去上班。我也会提出诸如住房，奖金等等的要求，甚至还会请他帮忙，回重大工作。

虽然这是我花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方所说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许就有了一个可以摸进去的后门。

但是，一旦我进了他的圈套，今后还会不会没完没了发生新的勒索？现在我偏偏不屑此举，采取了马大炮的建议，此刻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只听凭命运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后，我便从帆布挎包里，将盐源农场加刑的平反判决和介绍信取了出来，我留意到他紧盯着那挎包，从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一种不能明言的难堪掠过了他的嘴唇，他接过信看了两遍，想开口问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过了一阵，他绕着弯子问道："我这次到盐源专门为办你的案子出差时，走得匆忙，有些想在盐源顺便办的事忘记了，就连自己的路费都没有带够，多亏你们那个队的马司务长照顾，临行时，还给我补足了买飞机票的钱。回来后，我给他寄去了，你回来时，他没有向你说什么吗？"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脸，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脸厚功底，便立即按马大炮的嘱咐，很诚恳的傻乎乎地摇着头。

到此时，他才明白，过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奏效，并得到好处的手段，却在我这里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对我宣布：“关于你的右派问题，是由我校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办的，至于你60 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经过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了，我已将调查材料和结论转给了他们，你只能去找他们！”

如此看来，要我到这里来，纯属是这郑树勋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为无论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或去中级人民法院，都无需来这里转一个弯！而平反以后工作的具体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卫处所能决定得了的。

于是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没有按他开出的三十斤见面清单，费尽心机去一一备齐，再路远迢迢的带到这里来当面交给他。

但是，转而一想，重大保卫处必竟是我平反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具体的落实者。其它环节，还不都要根据郑老头的最先意见办理？这个意见有多大份量我一无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样做才不失误，我还没有主见。

“诺，现在我就带你到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们负责的。”沉默几分钟以后，郑老头一面把我刚才交给他的材料还给了我，我下意识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里想着，我的到来肯定让他大失所望，便跟着他走出了保卫处，向饶家院走去。

党委办公楼，学生时代一向被我们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机关，它决定着我们今后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也就决定着今后一生的命运。入学三年，我就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生怕在这里被问住，节外生枝的自找麻烦。

我被郑老头带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屋子里，进了屋，按照室内的办公桌判断，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的人员足有二十余人。

每一个办公桌之间间隔的地方放着凳子，大概专供来访者和正在等待结论人的座位，所有办公桌上都堆满了各种卷宗。

听说自去年开始，这儿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来访者，他们都是等待或办理各种甄别手续的人。所以，这两年来，这儿成了重庆大学最忙碌的地方。

后来重大党委书记高书记告诉我：“解放三十年来，这么一个总员工不到四千人的学校，就有四千人先后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社教、文革运动中挨整，现在平反了，问题一下子全都摆了出来，党委的压力一下了增加了几倍！”

我不禁想到，运动一来，为了政治的需要，把学校这种培养人才的摇篮，变成了按政治需要制造人整人的监牢，现在，又因新的需要将抓进来的“鬼”放出来。这忙碌的党委在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说中共对文化的摧残，对教育的亵渎，在这里证据齐备。

郑树勋把我引到办公室中间的一张桌前，那桌后坐着的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女士，像是从系里抽出来的老师，交待了几句便独自离开办公室下楼去了。

从她年龄上判断，当年也是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学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内幕，完

成“纠错”吗？

等我坐下后，她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式两份登记表来，在上面填写上编号后递给我，一面向我发问道：“你就是机造六零七班的学生孔令平吗？”我确认以后，她便吩咐我用钢笔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过那表一看，表的名称是“重庆大学落实政策人员申请表”。心中对这“申请”一词颇反感，暗想道：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捉弄够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么会要我们填上“申请”的字样？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动“申请”，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该表首栏中，首先要填写：“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

二十多年间，我的申诉不下百次，却没有人理会我，反而在各种场合下威胁我，说我在为反革命言行狡辩，该罪加一等。想到这里，我望了一下面前这位女士，心中的气想借此向她发泄。

想起当年曹英们组织的批斗小组，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学生，使出那么卑鄙手段，按他们事前编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觉，捏造马开先与我见不得人的“丑闻”，并要我在精神错乱时认招；把“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种种屎盆子统统扣在我头上。

现在，是要我将这些完全莫须有的罪名重新罗列一遍？还是恢复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纵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气得以释放，但自我接触郑树勋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给平反留下被称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将当年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重新认可并对冤屈制造的元凶表示“谢恩”，我岂能就范？

过去无缘无故，而遭迫害的无辜者何止千万，但有志以自己遭遇的冤害留下亲身经历，告诫后来者的却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溅始作俑者一抹污渍。我要做专制暴政的见证人，犯不着为一栏的填写感到困惑。

想到这里，我便在这一栏中写下了两个字“出身”。这样，既如实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说明当年相当多的人仅因家庭出身被划成“右派”的，这既吻合毛氏初衷。同时执行平反者也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长时间的停在“当年划右的主要依据”这一栏内。

正好，邻近办公桌上几个廿多岁的年轻人围了过来，他们多少带着点好奇心向我询问二十三年前发生的事，从年龄上判断，当年他们还没有出生！看看他们脸上挂着天真，想到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反右”经过，兴许会有利于他们手头正在办理的案件尽快落实。

我在追述往事时特别提到了马开先，讲完了这些过程，我希望他们能帮助我找到马开先，

因为重大党委一直拒绝告诉她的下落。

正在这个时候郑树勋回到了办公室来，他吩咐戴眼镜的女教师，取出预先早已打印好的“重庆大学机械系党委办公室”签发的“红头文件”，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经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反复查核，报经党委批准，现在对你在1957年划为右派份子的处理作出了改正，这是改正通知书。”

我从她手上接过那份“红头文件”那上面这么写着：

“查1960届，机造七班学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风期间，曾出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动机，对党的政策提出过一些意见和看法，在这些意见中由于受当时社会右派思潮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但仍属于教育问题，不应当以此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依据划为右派份子，现在为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特予以改正，对他本人恢复被开除的学藉”

所有“改正”通知书都千篇一律这样写的。

中共用这轻描淡写的套话了结“冤案”怪轻松的！西方人讲人权，中共视为无稽之谈！既然当时是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当受教育！怎么处置都说得过去，充其量是“处置”不当，中共何错之有？

只可惜，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对无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着“平反冤假错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诳骗人，我怎会同意？

不料那郑树勋却从一旁插上话来：“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他那胖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他也许真以为，二十三年的炼狱已把我们全都变成了随人戏捏的火巴蛋，今天面对这样的“改正结论”会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脸一沉，煽风点火的说：“你这个人认识上就是爱钻牛角尖，吃了几十年的亏还不见大改，你想想这次平反，校党委下了多大的决心，排除了多少干扰？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又体现了对犯错误同学极大关怀和人道主义，来之不易啊！你还不快向系的党组织表示感谢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那戴眼镜的女士送去谄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着说道：“这二十多年多亏我年轻命大，还没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过，今天我是来拿平反通知书的，你们不是‘纠错’么？如果我还保持着人的羞耻心，我为什么下贱到向害我的人认错的地步？”

由于激动，我猛然的站了起来。

此时我的脸一定是铁青的，捏着：“恢复学藉通知书”的手颤抖着。

那戴眼镜的女士看见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将它撕掉，连忙从我的手里将“通知书”夺了过去，连连说“现在这通知书还不能发给你，只给你看看并让你签上意见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们才能给你。”

还告诉我，重大经过一年的调集档案，核实材料工作已结束，现在已申报重庆中级人民法院，今后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实政策”只好空手而归了，我站起来看到郑树勋正在那里赫赫奸笑。由于我缺乏冷静没能按捺对他的憎恨，不顾一切同这“恶棍”撕破了脸！提着手提包，出门下楼，愤愤的走出那圆形的石拱门！走出党委办公楼，忘了怎么走出校门赶公共汽车了。

在车上，满脑子还在翻腾在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医院整整两个小时后，心中仍未平静。钻进了楼下我那间停尸房前的临时住处，往床上一躺，什么话也不想说。

母亲见我从重大回来情绪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间里，轻轻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只是摇头，并没有回答她。那晚上，我连饭都没吃就睡觉了。

第二节 衙门口前的“上访者”

经重大以及那汪秃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对落实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反而还要提防着这些心存诡意的鬼蜮，玩弄各种伎俩、设下种种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统治者任意揉捏的面团，我们这些初生之犊，糊里糊涂坐监，现在又被莫明其妙平反，各级衙门在捏这个面团时，是决不会考虑受害人二十多年伤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卫，便从我的行李中，将马大炮转交给我的，郑树勋那封勒索信翻了出来，就灯下写了一封给孙起孟的信，告诉他承蒙他的关照，我才得已回到母亲身边。并且把郑树勋这封信一并寄去！

过了几天，情绪慢慢稳定，重大方面既已答复我以后去催促重庆法院，只有了结我 1960 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并得到至今还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户口薄，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粮票、布票、油票。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庆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天十点钟，我才到了位于南纪门的重庆法院门口，如果我不是必须从这里领到我今后的“活口”。我是宁死也不愿上这阎王殿来的。

它高高耸立在半山之上，俨然以掌握生杀大权藐视着在他下面的重庆老百姓！我走到门房门口，一个披绿色军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绍信，我说：“我是来催办落实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绍信吗”？

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这是对犯人进行审理宣判的机关，不允许谁向里面乱窜，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来，那也应当持你们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说明你的身份以及事由。你一无所有的往里面钻，找哪一个处室，找谁都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向里面通报啊！”

此话有理，上次在重大，我为什么就没有想起开一张介绍信？

在学校和法院两个机关，如何呈递公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回想当初南桐法院由谁审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明示过。

糊里糊涂的在供辞上签字划押，被办案人当成面团，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几乎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谁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轻时代的我简直是一个迷路羔羊。向预审人员预先放置的阳谋套子里钻，等到残酷的监牢使我猛省时，我已经被关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中了。二十年里我想从这个阳谋的圈套里退出来，是多么不容易！

想到这里，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学校和原来的案情，向那守门人作了一个简单介绍。他听后拿起电话筒一连拨打了几个部门，回答都说，对我的案件他们不知道。我无可奈何的向那高耸在几十个石梯上的“阎王殿”望了一眼。

他见我一脸的焦虑，便建议我最好到市委办公大楼的信访办公室去了解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案件该通过什么渠道来问？

我就这样，在这道衙门面前，被守门人理直气壮的踢了出来。

也罢，去市委见识见识，看看落实政策的门坎里大小衙门水有多么深？

当我到达七星岗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在附近的小面馆里胡乱地吃了一碗面，就来到了市委正门。两个全付武装的军警把我拦住，我心中暗忖：这里才是重庆老百姓的真正阎王府。

我还是二十三年前来过，二十三年前，为了向当时的市委呈诉情况，便将我在大鸣大放期间，与母亲的全部通信，送到这里来。

我哪里知道，这对于阳谋来说，划成右派本不需要什么证据，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深深痛悔当年我的天真和糊途！

两个兵将我挡在传达室里，那里面值班的老头告诉我，专管平反冤假错案，是统战部下设的“信访”办公室。并指着那距正门两百公尺的一个小巷，说沿小巷进去便是信访接待办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还好，这一次总算没有碰到什么盘查和障碍，进了里面，办公大楼的门却紧闭着，它的面前一条大约五十米长的走廊中，长条凳子上早已排坐着二十多个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在等待那两扇紧闭的大门打开。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还不到一点钟，按照机关办公在下午两点钟的常规，还足有一个多小时，便问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说她是今天早晨七点钟就来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等轮到她，已经到下班时间，只好继续再等两个钟头，等到下午再说。

我望着这些候在走廊里，排着轮子等候接待的人，他们大多上了年纪，为了“信访”不

惜饿着肚子在等。

看着长长的队列我开始踌躇起来，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说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几个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将排在这里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归，不如趁早离开。

但是路远迢迢从北碚到这里，空手而归未免遗憾。既然来了，且看看情况再作决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两位老人，一位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满脸皱纹年过六旬的独臂老头子，从他们满脸的愁容和疲倦神态看，像经过一场战争后，等候在市政厅门外，排着长队等着抚恤的死难者家属。我听见那独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倾诉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警察，干我们这一行的，兵荒马乱年代为一家人生活，谁又完全没一点靠山？那段历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待了。那时我只是个小小水上警察，无非是干了点水上揖私，船到码头作些检查之类的事。凭我熟悉水路、精通技术，当了几十年的水手！那算什么特务？”

“文革一来，新来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当警察的事重新翻出来，逼我承认解放前当过特务，把我送到学习班里关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儿子不认我。”

“我说：‘你们对我的历史已经查了多次，现在还要我无中生有乱招一通，是什么居心？’那当官的说我顽抗，开除了我的工职，把我送去劳教。”

“在劳教所里，一面对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认当过特务，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给我医，直到我的伤口化脓烂了长了蛆，才送劳改医院。医生说：‘送来晚了，只有截肢还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这样废了一只。”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说着将那空荡荡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拣了起来让大家看，继续说道：

“上个月航运办公室的人跑到劳教场，说要落实我的政策，现在查明我确实没参加过特务组织，所以要恢复我的政治名誉。但这十年来家没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残废人，儿子也不愿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们说，我不能空得个平反的名份等死，给我一间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长说：‘你已经退休，给你退休工资就够了，你一定要回长航现在能干什么，何况现职的人都还没有房住，我又拿什么给你？’他们打残了我，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谁来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说到这里他呜咽着哭了起来。

大家听着，没有人开腔。在座的人哪一个都有一本心酸账，像他这样的受害者在中国这个年代处处都是。有谁来管这些被历次运动弄残了的老年人？

当年因执行单位对各种受害人草率处理，今天，这些受冤者，不辞万里行乞，赴北京上

访，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没有人去统计这个冤孽深重的数字！……

看着他那样子，我又联想到我的母亲，她也同样因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单位所抛弃。至今还留在蔡家医院，受那里欺侮过他的人呵斥，虐待。

心中还在翻腾，又听见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接着开始口念叨起来：

“我就这么一个独儿啊……”

她第一句话，便使我联想到鲁迅笔下，“故乡”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刚满五岁的儿子被山里的狼叨去以后，逢人便要诉说的话！虽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苍老得多。而且从她那身打满补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惨。

且听她说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儿单位，八一五的头头！硬说他是‘老保’，还捏造说他过去还参加过啥子七星党，便把他抓起来关进黑屋子里！我听到后，人都吓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啦，我跪在那个姓曹的面前，请他看在我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贵手，饶他一码！没想到，我那脾气刚烈的儿子却从关他的黑屋子里逃了出来，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继续说：“我看到他，叫他赶快跑，哪里晓得，他却去找那个姓曹的“算账”。当场还打了起来。那姓曹的当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儿抓了起来，硬把他说成反革命行凶报复，抓进了监狱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劳改。从此以后，我儿就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托邓爷爷的福，我儿写信回来说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该回来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边又没得其它人，跑这个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们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儿呀！你又为啥呀？真的老娘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收尸的都没得……”

边说她嘤嘤的哭出声来。然而在场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好像麻木一般。人间的涂毒，有时比野兽更残暴，夺去她儿子的不是狼，而是与儿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们，从没想过，二十多年那么多冤案牵及到多少个家庭？这成了久积的社会肿瘤，平反多成过场，使这肿瘤越来越大！

今天坐在长廊里的二十几个“代表”，就同全国千千万万的冤狱受害者一样，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亲属，彼此间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话，当然更谈不上同仇敌忾了。

若以个人身份，跑到共产党本市的最高衙门来求解脱和赦免，“平反”必定流产，路遥远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着，长廊里一阵骚动，看我的手表已是下午两点半了，“唔！迟到了”我下意识的喊了出来。可那两个年轻人却丝毫没有显露出一点内疚，而是一脸的傲慢，大摇大摆地从这二十几个上了年纪人面前穿过。

偏偏求访者中有几个低三下四，向两个从他们面前过去的人点头哈腰。好像自己原是来乞讨似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来施舍什么一样。

当办公室的大门打开后，长廊里等候了几小时的人群全都向门边涌去，只听见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断地嚷道："喂！排轮子，不要乱，按次序，不要乱。"

好一阵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队，不过已不是坐着而是站立着。

我看见刚来办公的年轻人不紧不慢的放下公文包，取过了自己的茶杯，走到里面泡了茶才坐下，从为首大约五十岁的女人手中接过递过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叙说自己的丈夫、儿子和被抄家的经历。好像一个溺水已久的人几经沉浮后，才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还没等她叙说完毕，那年轻人便显得不耐烦了，不屑的说："后面的人还多！你把话说简短一点"。一面打开材料，没去听她的哀哀呈诉。看完材料，拿出登记表，截断了对方的述说，一问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写了信访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及事由等等。

写完后便向求访者说："你这个案子应去找××法院"。那女人马上说："我已经跑了十几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实政策以来我等了两年了，这案子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那接待人并不理她，拖长了嗓音喊道："下一个！"

我看见她那带着深深不满的表情，迟迟不愿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到这个时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个小时了，中午还没有吃饭，原想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可惜这里仍把她当成皮球，踢回她不愿再去的法院衙门。

我深深同情她的饥饿疲惫，只见她在那里闷了几分钟，无奈的站起来。那一瞬间，她刚刚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后面的上访者占据了。于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叙诉，将女人送出了办公室的大门。

第二个上访者，几乎重复着他前面那人的过程：唠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说应当去找××机关，所不同的，这个上访者提出请信访办开一张"介绍信！"

可接待人以讥嘲的口吻回答他："我凭什么给你开介绍信？凭你的材料，凭你的口述？我们信访办公室对你的情况在没有确证时，根本无法下结论，所以你只能找基层，他们既负责你的案子，他们才了解你的情况。"

结果，在求访者反复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写了一个曾于某年某月某日，来过市委信访办的证明，塞在信访人的手中。

看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明白，连这种重庆市最高的衙门，依然的同其它单位一样，将这些可怜的上访者当成皮球，从这里踢出去！

明白这种结局，我便不想再在这里挨那年青人一脚，便提着我的帆布书包，决然出列，向那圆形的石门走去，自动的被"踢"了出来！

第三节 草菅人命的中级法院

比起上次去重大的“上访”，这一次简直就是徒劳而返！官场在办理“平反”时就有这样的艰难！平反的漫漫历程就这样拖下去！这对于上了年岁的人可是一件最残酷事啊！

回来后第二天正是星期六晚上，同母亲同室而住的郑医生和丁医生都回家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们母子俩。点起煤油炉，煮好面条，母亲知道我两次上访的过程，见我闷闷不乐，便述说起为落实我的政策，她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的马拉松“上访”过程：

“我去重庆大学，正是去年的大热天，我一连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叫我等！那时天太热，为了防暑每次中午我就吃一牙西瓜。

几个年轻人看见我这么大的岁数了，动了恻隐之心，劝我不要再跑了，说中了暑倒在马路上就麻烦了，有问题只要写封信来就够了。我去南桐法院前后跑了六次！最后一次，我在下汽车时摔倒了，还是被好心的路人将我扶到医院去，幸好还没出大事。

那法院的一个老吴过去也是右派，悄悄的告诉我说，现在办事就是这样，当事人再急办事人绝不会急，一直等到上面来了文件，‘火候’到了，再大的案子也一风吹。他劝我不要再跑，跑出病来还不是自己吃亏”。

听到母亲的这段话，我心里非常不安，当时我急着早日出狱，没有为她的安全多想，万一她真的在这种马拉松长赛中倒在路上，那可是我一生都无法原谅的罪过！她可是这世上我仅有的亲人了。

现在这样，连肥皂票都要占她的，我怎不惭愧，所以明知在中共官衙里跑，变成皮球被人踢来踢去，我还得硬着头皮被人去踢！

我的平反，果然拖到了 1979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医院书记通知我：下午重庆法院打来电话，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去重庆法院刑事侦察二处领取判决通知书。

拖到一年最后一天，官僚机关的办案够拖沓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来到重庆法院，走上那台阶，走进办公室，一个姓丁的年青人接待了我，并把一张纸递给我，这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桐看守所，一个中年人把一张同样大小的纸，递给了我。

我就这样被两个办案人，在监牢里残酷地戏弄了整整二十年，这种残酷游戏真是绝古今之未有！

我沉住气一言不发的从那小伙子手里接过这张纸，坐在那木凳子上阅读起来：标题：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60）刑上申字第 58 号。全文如下：

申诉人：孔令平，男，现年 42 岁，江苏盐城县人，大学文化。原系重庆大学学生，一九六〇年八月因反革命罪被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 69 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孔不服提出上诉，经我院（60）刑上字第 58 号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原判，本人

不服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孔令平自一九五七年五月至一九六〇年一月，先后书写的日记诗词，没有扩散，并作过交待，在此期间还向我党政机关投递信件等，均不构成反革命罪，原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应与纠正，本院特判决如下：一、彻消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 69 号刑事判决书，和我院（60）刑字第 58 号刑事判决书。二、宣告孔令平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得上诉。

1979 年 12 月 30 日

好一个草菅人命的"判决"。就这样，从 1960 年至 1979 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死劫难，被重庆法院轻松的用三百多字划上了句号！

就这样，我，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中共"革命"运动中，被任意蹂躏和摧残达二十多年之久，待我们奴隶不如。"反革命"一词，像一个面团一样，在他们的手里捏来捏去，玩着："有"，"没有"的词眼，将法律猥亵得比儿戏都不如！

我愤怒喊道："整整二十年你们睡醒了不是？在狱中一开始我就一再申明这是一个假案，你们全不理会，二十年来我写的申诉百余封，你们装聋作哑，今天若不是上面有政策，你们还会蒙下去，你们那像办案的机关？"

那姓丁的漠然看着我，一脸无奈，他知道自已也是一个任人使用的枪手。面对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心中万丈怒火又怎么发泄？

1619 年，美国一位叫詹姆斯顿的白人，从荷兰奴隶贩子手中买下了二十个非州黑人，带回美国充当奴隶，从此开始了美国黑奴的历史，他们的吃苦耐劳和繁衍，使他们渐渐充当了美国建设的主力，到 1770 年黑人已超过 75 万人，其中奴隶占 70 万。

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深入人心，1860 年林肯任美国总统，于 1864 年发布解放奴隶宣言，黑人为争取社会平等进行了百余年可歌可泣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牧师马丁•路德•金提出的，黑人民权斗争。196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明确：美国国内的公共设施实行种族歧视，被视为犯法。

在中国，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实行变相奴隶制，把人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中国倒退了几百年，今天这种遗毒远没彻底肃清，我们这些黑五类，应向马丁学习，发动中国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牢牢记住：在中共统治下我们的权力只能靠自已去争，天下要靠自已去闯。

此时的我，不是当年如羔羊般的驯顺者了！就在那小伙子要我签字的那张纸上，我留下了："本人对本案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力。"十四个字。

第四节 区统战部的官架子

这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两个月的户口薄，今天也由医院的王书记送来了，不过母亲补充说："蔡家派出所对王光明讲，要你写一个检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别理他。"在我的眼里，这是一群骑在百姓头上的政治痞子，现在同他们多

说一句话，都有损我的自尊！

然而，1980 年的元旦，对于我们母子俩，必竟是渡过二十三年劫难，死里逃生后重逢的第一个元旦，可惜，妈妈当年想得太绝，将原先的遗照全部烧掉了，现在只有在头脑里留着他们的遗像，寄托对他们的记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块猪肉和糍粑！我们忙碌到晚上十点钟！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将在春节才吃的团年饭，提前到了 197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就在我那间临时房间中摆下像征性祭品！一缕香烟迎接我的父亲、外婆和弟弟“回家”团年。

我为他们盛上了饭，摆上了酒，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默默忏悔我对他们的不孝！特别是我挚爱的父亲，他是我们全家中最早进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过，我就带着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盐源县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和重庆大学关于我右派的改正书，到北碚区委统战部要求他们根据政策，安排我一个“对口”的工作，并处理我的“善后事宜”。

统战部长姓贺，用一付不冷不热的面孔接待我，给人官气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这种人既不会对被害人以同情，更不会考虑被害人的困难给予应有的解决。他看过我递给他的“平反”文件后，叫我去楼下的“接待办公室”去找吴庆华。

这吴庆华头发花白，大约五十多岁。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打量着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递给我！我接过表格一看，那是两张“落实政策人员登记表”，中共的统治，唯独这种文牍式的档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细密，凡涉及人事调动，不管跑那一个衙门，毫无例外的拿出这种标题不同、内容一样的表格来。

回重庆仅三个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这种表格。

当他看完了我给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写的表格后，问道：“你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吗？你也知道的，根据中央及省委文件的精神和规定，落实你的政策是由我们区统战部负责的。不过，我们的权力和范围有限，所以，希望你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对待我们对你的安置。”

吴老头明白贯彻共产党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预先给我打一针预防针。我正等着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风一转，先行发问道：“先说说，你想干什么工作？”

在毛泽东暴政时期，向国家输送建设人才的大学已纷纷关门，几十年来技术人员的枯竭，连中共的上层官员也惊呼“人才难得，人才贵宝”。所以我不但不应成为统战部难以安排的包袱，简直是用人单位力争的“缺货”。然而，这位吴老头向我推荐了北碚区属的几个街道工厂。

国营厂和集体厂，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这又是中共领导下的怪象：国营、部属大工厂的工人，优于地方国营企业里的工人；省级企业又比市级企业优越；市级企业又比县级优越；县级又优于街道工业。当工人也要分贵溅，讲运气。

工人被划分出等级，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的“分别对待”，在资金，设备原材料十分匮

乏的条件下，先满足直属中央的大企业；然后层层降格。轮到那些处在最底层的街道工业，不但生产举步维艰，工人们连最低工资收入都难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虑将我安置到北碚境内的北碚机械厂或是红岩机械厂？”我请求道，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在求职时当然要选择，这两个厂说不上好，只是比较正规一点，生活待遇也相对稳定一点。

“啊！那可不行，这些工厂是市属的单位，我们区委是没有权力向这些单位安置人员的。”吴老头斩钉截铁的回答。

“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中，没有规定我们的就业安置非由区一级来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个单位处理仍由那个单位安置的规定”，我竭力忍耐着，既要揭对方在诳骗我，又不好同他争执，因为这是我来找他们。

吴老头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重庆大学，偏偏要跑到这里来？”对方果然耍赖了，我明白，“平反”的门坎之外，还有“寻找”工作的门坎！对于我们这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小鬼，在共产党的衙门下要想顺利生活下去，还不知道要爬多少门坎？！

我看了看面前这个老家伙，又联想到郑树勋。我想离开盐源时，就该听从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样，将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贡品一斤不少的从盐源带回来，也许现在我不至于在这里犯难。

可我仍书生气实足，满以为只要获得“自由”，在这个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会中，哪有求不到职业的道理？

沉静片刻，吴老头终于又拿出另一个办法，改口说道：“区属的企业你既不愿意去，那么你去中学教书怎么样？”吴老头的这个建议倒真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不过，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须知，1966 年为了摧毁政敌，学生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别动队！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邓小平，下自官复原职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个没有尝过“红卫兵”的拳头？刚从别人踏着的“一只脚”下爬起来的中共“新”当权派，没忘记当年红卫兵的厉害。

对待多年“丧失”理智的学生，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还是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可不是简单动用警察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这些被毛泽东调教多年的造反“小将”们，一旦被毛泽东余孽所号召，造起反来是绝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课堂约束学生的老师，一时的“奇缺”起来！我在盐源时便知道，为了筹集农场子弟小学的师资，不仅从管教人员中抽人，还从就业人员中过去教过书的人（例如魏朋万）叫去当老师。

蔡家场的几所学校中将教师子女以“顶替”名义，请去滥竽充数登上讲台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社会风气既已被毛泽东破坏到这种程度，将老师当作最低贱“臭老九”的遗风依旧！教师不但在待遇上低于当时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依然受到学生

任意侮骂，甚至家长可以到学校替孩子呵责老师！好像老师是他们雇佣来的保姆。

对于我个人，“老师”这个职业，却有一层与别人所不同的隐痛！我的父母原来都是忠厚老实的“老师”，他们曾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国新文化做过贡献，结果，父亲惨死囹圄，母亲遭受右派横祸。双亲之痛使我发誓，决不重走父母的老路。报考大学，绝不填师范，出了校门再不回头走进校门。

中共不能宽容“教书匠”，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痕没有愈合。想不到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要我去接受这个我早已不愿干的工作，于是我十分果断拒绝了吴老头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

第一次初访区委统战部就这样无果而归了，带着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亲听完我去区委落实工作的经过后却说道：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你是清楚的，既然统战部的意见要你去教书，你不妨考虑一下。重庆市第二十四中学，就在蔡家，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有高中部、初中部，离这里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个时间去那所学校看看，也好作准备。”

我看着她那多年生活重负压驼了的背，面对那张满布皱纹的脸，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来了，当然是盼他常伴身边，再不离开。可是她怎么就忘了在中共统治下为办教育，不但使她耗尽了毕生精力，还使她饱受了二十几年的苦难？

对她的劝告，真不知怎么对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从小就叫我不要走教书这条路吗？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该由重大落实善后处理，看看他们拿什么主意？

第五节 第二次回重大

1980 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车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谁呢？本来，我的案子既已由重庆法院改判，那么按程序理应去法院落实我的人身赔偿和善后处理，我这一趟该去市中级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单枪匹马的能去找法院评理么？那里有关于冤假错案的处置规定吗？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只有独裁者政策，却无法律可依的地方，执政者可以随心所欲的颁布政策整人，以后，新的人上台又兴另一套政策；在这种不与人民约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约束的独裁统治下，有评理的衙门吗？！

于是我便想到当年负责处理我们右派的人事处主任宋殿宾来。听母亲说他因为爱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过很大冲击，坐过牢，扫过厕所，有过与我们相似的经历，兴许他会良心发现，现在会作出与当年完全不同的处理。

于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学校传达室询问宋殿宾的住所。那门房告诉我，他在文革时离开了学校，现在在杨家坪的市卫生学校任党委书记。我要寻找的当事人还没有“官复原职”。

但是，我既又一次来重大，总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门人的指点，在大校门右方的一排两层楼住宅中，找到老校长金锡如的家。

学生时代，除全校性大会上在主席台上见过他，后来在 1959 年的五一节，在南桐丛林小学听他宣讲摘帽政策外，我还从没对他进行任何私人拜访。

此次来访又没预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里准备好了见面怎么开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楼楼梯。

他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扣了一下门，不一会儿，从右侧的卧室里面走出一个背略微驼，个子高高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见到我便问道："找谁？"我从他沙哑的北方口音和长形的脸上唤起了当年的回忆，这便是中国著名的动力专家，名噪中外的金锡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学校长住得如此简陋，家里也没有一个负责通报的保姆或秘书，疑惑地向他问道："金校长在家吗？"他取下眼镜，仔细端详了我好一阵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么？"看得出他正竭力回忆面前站着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数以万计的学生中，一时无法搜索到我这"倒霉"学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报了姓名后，便跨进了客厅。客厅的面积大约十来平米，靠窗的平柜上堆着厚薄头精装书，放得很乱，好像主人刚刚查阅过资料，没来得及收拾。两张單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茶几已经很旧，茶几上堆着纸笔，零乱放着。墙上挂着的几幅对联上满佈了灰尘，两扇通卧室的门关闭着，里屋静悄悄的，不知道住着多少人。

当我在沙发上落坐，开门见山的将我的经历和来意讲出后，他的脸上显得十分碍难，恐怕像落实政策这一类问题，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来打扰过他，因为这种事，实在与他毫无相干。

1959 年他带领学校到丛林煤矿"慰问"下放干部工作组，仅仅是受党委的指派，履行公务而已。今天事隔二十年，对于当年反右和现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过问，对突如其来我的造访，简直不知所措。

听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对学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脱勾了，据我所知，你的问题应当由重大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的。"停顿几秒后，他又说道："关于你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嘛，我现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托，筹划在凉山地区办一所职工大学，正需师资，你不妨再过半年与我联系！"

听到他这话，我对他的善意指点表示感谢，但对他的推荐我已来不及考虑了。当我站起身来，突然从左面的那间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男孩哭声。

他连忙去开那门，里面的床上正睡着一个形体残缺的，大约已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来这便是他最小的儿子，刚才因为睡着了将尿撒在床上，醒来不见"保姆"，而发出啼哭声。他赶紧去替孩子更换衣裤和床单。

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围腰，好像正忙碌着家务。不好过多纠缠他，便起身告辞。

看到这位闻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庆大学的老校长现状如此，便知道十几年文革将知识份子怎样作践！不过，此时显然不是细说详谈的时侯，匆匆告辞，结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的拜访……

走出金校长的“家”，看表已是十一点半钟，走出校门，在门口的面摊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时去拜望钱主任正合时宜。记得 1957 年校园里鸣放刚刚开始，我曾为了劝止马开先离校而陪她一起去过他家。

当时他住在后校门松林坡的专家别墅里，而今二十三年过去了，他是否还住在原处？便去门房询问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他们告诉我，他现在住在滨江马路的家属区。

在一幢底层低出马路的四层楼房里，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从松林坡的别墅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文革的“功劳”，只是不知道当年他受了怎样的冲击？

沿着滨江马路，在一处石梯下面走到底楼，叩响一扇木门后，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她在门口拦住了我说：“钱老师正在午休，没有要紧的事最好不要打扰他，你有什么事吗？”她打量着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钱夫人了。于是我说：“我是钱主任五十年代的学生，自我离校后二十多年没有回过母校，今天因为路过重庆，特地来探望他的。”

她听说后，将我让进了门里。这是一间大约只有 8 平米的小书房，那窗子正好开在马路的下面，这同当年他那个松林坡别墅的小会客厅实在无法相比。

屋子里面，书柜已将小书房占去了一大半。临窗下面，安放了一个课桌和一张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台灯，桌面玻璃下面的许多旧照片，都使人想象出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那玻璃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想来是河风将窗子上方马路上的灰尘，随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诉我：“钱老师因患脑血栓多年，记忆已完全丧失，现在行动不便，基本上像一个痴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想会见他的人。”

听到她这个介绍，我又环顾了一下这间狭小简陋的小书房，想开口向女主人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松林坡搬到这儿来的？但马上转念一想，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经历，何苦去勾起她对不愉快往事的回忆呢？

正在此时，里屋的门打开了，一个一头花发的老人扭曲着身子，拄着拐杖，趔趄的出现在门槛上。女主人见到他，赶紧跑过去将他扶住，我也没有顾及自己作客的身份，走过去帮着她将他扶上里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时，我才注意看这位当年风采绰约的钱主任，而今枯槁的脸比那金校长还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劲地比划着，好像竭力想说出积郁在心里的话，却始终不能说出口来，脸因激动而歪斜发红，看到这凄惨的形状我好不难受。

问到了张可治老师，他可是当年与黄锡凯先生齐名的中国著名机械理论家、重大机械系的台柱子教师！不料，女主人却告诉我一段想都想不到的往事：

文革期间，有一天下午，机械系的几十个学生，将他带到团结广场升旗台后面，那片高出地面两公尺的草坪上开批斗会。大家在七嘴八舌以后，几个恶作剧的学生便强迫他爬在地上学狗叫！还拿着一条教鞭，命令他学狗在草地上爬着转圈子。

围观学生嘻嘻哈哈，忽然一个学生说他屁股翘得太高，是翘尾巴，不问清红皂白，一记耳光，将他那 600 度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上。

可怜这张教授教书把眼睛弄成了高度近视，眼镜一被打掉他便成了“瞎子”，急得他爬在地上满地的摸，团团转，越发逗得围斗他的学生们哈哈大笑。

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张老师的眼镜也不知被谁藏到哪里去了，他还在那草地上一味瞎摸。围观的学生却一哄而散去食堂吃饭了，只留这睁眼瞎子还在那里乱爬乱摸！不知不觉他爬到了那草坪台的边上，从那两公尺高的崖边，一失足，头朝下跌了下去，当即一命呜呼！

文革时我早已离校！对文革中校园里种种暴行，虽有所耳闻，却没有亲自体会过。

今天，我本意想向往日的师长们，为我指点求职的门路。没想到，却从他们身上上了文革一课。亲身经历文革浩劫的钱教授，刚才表现出的想说又不能说的那份痛楚，不知写下来没有？有多少人像季羡林写牛棚杂记的回忆录？现在他只能仰着花白的头仰天向苍天倾诉了。

当我拜别钱老师，走在通往后校门那滨江马路上时，我再次回想起当年我在这里徘徊的情景！带着几重伤感重游故地，很想见见久违的故友，寻访一下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共渡右派煎熬的同学。

便折转身来向着民主湖方向走去，因为我听说，当年从广元坝生还的右派，现住在我们求学时的男生第二宿舍。

当我走近这座已破旧的“学生宿舍”时，那熟悉的门窗再次唤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追忆。故地重游如像恶梦，仿佛又听见那窗户里面传出的口号声，夹杂着隐隐哭泣声。我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看得分明，那窗户里此时飘出来的是一缕缕白色的蒸气。

大楼的侧门，当年宿舍朱红漆门已变成黑色，两头上楼的楼梯被乱七八糟的桌椅杂物堆满封死。只是过道依旧，从打开的门里望去，原先每间只有十二平米的房间，隔墙已被拆掉，现在变成了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改作了住家户。

走进楼来，见过道上排着一式的炉子，过道中间放着盛潲水的桶，潲水的酸臭与炉中溢出的煤气相混合，令人特感难受。这里成了二十三年后，保下自己一条命，获平反回校的当年右派同学的家。

我在中间的楼梯口上，碰到的第一个当年难友，便是当时地质系四年级的王智山，因为他是调干带薪读书的学生，是当年我们这七十几名极右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今天他已五十多岁了。

1960 年春天至今已整二十年，当年赴南桐一起劳改的七十六名“右派”至今剩下生还的不到二十人。

这二十年的炼狱对任何人都是“脱胎换骨”的，何况这张不经老的脸皮？如果这些分别了二十年，当年共患难的同学乍然相逢于路上，肯定会被当作不相识的路人而失之交臂。

幸好在这里，在一个明知故友的故地，所以即便是脸皮已皱成了疙瘩，但只要“匡架”尚能识别，一定还会惊诧的认出来！

此时他正从过道中间的的楼梯口上走下来。手里拿着布袋，看样子是要上街去买米，当我们面对面相碰，目光相接良久，他的眼里便泛出了惊诧的光，失声喊道：“孔……孔令平”，接着便紧紧握我的手，拉着我重新上楼，将我“迎”进了他的“家”。

过道里的煤气，使“家”的环境很糟，但无论如何这“窝”比起南桐煤矿或广元坝的集中营来，便有“天壤”之别！这里至少可以自炊自煮，有一个妻子厮守，在身心困乏的时候，可以休养补充。

王智山的爱人看上去挺老实，像北方的中年农妇。我在他那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入坐，没多问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却先谈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渡过的拉板板车，运坑木、烧焦碳，偷红苕的令人心酸往事，因为那虽然苦不堪言，却是烙在我们心上共同的伤痕，这些伤痕是无法褪去的。

他告诉我六〇年我被捕入狱后，丛林沟所剩下的右派师生除少数的回校复学，其余留下继续改造的四十多人被押往广元坝农场，在那里继续充当名义上不叫劳改的劳改犯。

集中在广元坝的几个老师因抗不住饥饿和高强度劳动，先后死在那里。所以到了 1978 年原先七十六个发配南桐的师生，只剩下二十多人出了鬼门关。

我从王智山家里出来后，又去隔壁的江明远家和附近的王泽庸家。

在江明远家，正巧陈兴国跑来了，这陈兴国是当年“杨治邦投敌叛国”案的检举人，在当时的“右派”圈子里，留下了“出卖”同学的恶名，不久前杨治邦投敌叛国案得到平反。使我立即联想到因吃毒蕈死于甘洛的杨治邦，便把他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1957 年的“右派”无论从素质，政治见解，都是一些被毛泽东生拉活扯充作“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同共产党“平分天下，轮流坐桩”了。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向党进攻，全是毛泽东的捏造。

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充其量对中共的霸道进行了批评，绝大部份对中共存有幻想，在这个“群体”中，经过共产党炼狱后才开始分化，相当部份人抛弃了幻想，坚决反对毛泽东独裁，成为民主的自觉追随者，其中最优秀的人物，在反抗暴力斗争中光荣献身，例如陈力、张锡锟和刘顺森，是我们的骄傲！

当大家七嘴八舌谈到雷继尧的时候，讲到他在丛林甘当王怀寿的耳目时，大家发出一片嘘声，连陈兴国都指责他干的缺德事。十八年后，他因在教职工中非法集资第二次进了监狱。

算老天长眼给他应有的恶报。

以求职为目的，我第二次回重大，对老校长、老系主任、老右派同学的拜访，虽没有解决我当时的问题，却意外听到“文革”中社会上和学校发生的真情实况。

第六节 政治需要

母亲为了摆脱蔡家场这被人践踏的处境，争取按中共文件所规定的条款重回托儿所。八零年元旦刚过，她便亲自去北碚将她准备了好久的“礼物”，送到北碚托儿所去。

这天我见她一个人坐在屋里一声不吭。便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摇摇头，老半天才叹气告诉我上午去托儿所的经过。

蛮不讲理，毫无同情心的托儿所领导，以母亲年龄大，即将退休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她辛辛苦苦制作的教具和伏灯写成的教材被拒收。

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时候，就因为她生性倔犟，虽身受歧视，但对无德无才的团支部书记却常流露看不起的情绪。今天又不肖於逢迎拍马，不善于“走后门”，教育局的“领导”无视她的正当请求。

小小一个区教育局，和它管辖下的托儿所，便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当官的绝不会根据母亲制作的几件玩具和撰写的几本教材，在工作条件、生活起居、住房、待遇等等方面按中共平反冤案的规定，给她起码的安置。

这事发生后不几天，临近春节的一天上午，医院党支书王光明，走到我住的那房里来，向我说：“有两个教育局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找你谈一件事。”我心里很诧异、区教育局与我素无关系，我既不认识它的任何职工，也没想过要找他们谈母亲的事，他们找我又干什么呢？

进入王光明的办公室，我见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瘦瘦的大约五十开外，另一个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两人等我坐好后，那位老头开门见山的说：“你已经回来四个月了，统战部已将重庆法院和重庆大学对你的平反材料给我们寄来了，我们今天是代表区委专门来对你的工作进行落实的。”

他一面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士进，是区教育局的政工股干部。”

此时，我心里已经完全明白，听那姓罗的叨叨不绝的讲教育与四化关系的大道理，颂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老师是一件光荣的职业等等后。最后说出教育局的人事决定：将我安排到二十四中当教师。

他说：“你的母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冤屈，好不容易将你盼回来了，你回到北碚蔡家场同母亲团聚，体现了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你们母子俩期盼了好多年的，我们根据区委统战部的意见，周密考虑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听他左一个“照顾”，右一个“团聚”，使人肉麻，我本想就母亲的落实政策，要去教育局找他们的，没想到他们自己跑上门来，这些人一肚子坏水，母亲在这里受了二十年折磨还不

够，现在打起我的主意来了。

“我的母亲花了那么长时间制作了幼儿的教具，编写了你们正紧缺的幼儿教材，跑到教育局来向你们苦口婆心讲情，要求你们能按政策规定，调回教育局；再说她现在年事已高，这蔡家场交通极不方便，这个医院员工长期欺侮她。

你们不但不考虑有关规定，也不顾及她的困难，反而以她将退休而拒绝她的要求。现在你又跑到这里来，猫哭耗子，想把我们母子俩永远栓在这偏僻的乡镇上。我老实告诉你，这个二十四中我是不会去的！”

我一口气把对方的真实意图当场戳穿！好像出了一口恶气。

当面戳穿了假面具，来人自已也觉欺人太盛，心里欠疚，屋子里暂时沉默了。正在这个时候，母亲从外面走进来。

那罗士进必竟是政工干部，明知自己亏了理，满脸堆笑的向母亲说：

“你和儿子，受了不少委曲，我们都理解，但是托儿所安置你也有相当困难，现在住房是所有安置单位最感紧张的事，他们不想本单位多一个快退休的人。落实政策中你们有气，还可以向我们身上出，我们又去向谁发泄？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所以大家还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才能解决问题。”。

我望着他，知道他不过是奉命办事的办事人员，我也没有必要找他出气。沉默片刻，他便向母亲说：

“你老人家还是劝劝你的儿子，总不能老是赌气。再说，拒绝区委的安排，老是呆在家里不工作，也对你们没有好处。如果你儿子现在愿意到二十四中报到，我建议工资可以从一月份开始拿。现在中学就差这样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至于你对这样落实还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再行调整。”

我们送走了罗士进后，回到母亲的寝室。我再次望着放在母亲床前那一纸箱的儿童教具出神，母亲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我们母子到了今天这个时候，还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焦虑。

（一）老秦

第二天，正巧来了一个病人，上到二楼来，口称是来找母亲的。看他满脸的胡须，头发蓬乱，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补丁的棉衣，很脏。母亲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绍这个“病人”的历史和遭遇，这是一个同母亲有过相似命运，共过患难的蔡家“黑五类”成员。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亲曾经一起在北碚炼铁厂接受“强制劳动改造”，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原藉是蔡家地区土生土长的人。

1957 年曾是北碚区农贸公司的一个“干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风不慎，反右时被扣上没

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双重帽子，同母亲遭遇相似，凡倒霉事都有他的份：运动一来，当“主席”，运动一过，便充作廉价劳动力。

北碚铁厂解散后，他先于母亲调到蔡家供销社，接受“监督劳动”，当搬运工。

1971 年，他在表兄帮助下，讨了一个家住镇供销社不远，蔡家的残废农村姑娘为妻。因为他必须一大早起来为供销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后赶回家忙自留地，实在受不了，便主动放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

他今年五十多岁，看上去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常常伤心的说：“每天在地里劳动，分不清洒在地里是汗水还是泪水，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这么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风里雨里挣扎到今天，除一个茅草屋，连床好棉絮都没有，两个孩子大的只有七岁，没钱上学辍学在家，打一点猪草，小的才五岁。妻子是一个残疾人，除了喂猪便什么都不能做。那个年代农民的日子比搬运工还苦，家里靠他一人赚的工分，不够四口人的基本口粮，平时开支是拿不出一分钱的。

1978 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销社给他一纸“纠正右派”的通知书外，公职却没有恢复，也没有工作和工资，于是他拿着文件跑重庆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样排在长长上访的队列中。

时间花了两年，除了跑路给他留下几千元车费的借债，给他头发增加几处斑白外，一无所获。

中共北碚区委统战部冷冷的回答他：“当年你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组织上开除了你的工职，所以不存在恢复工职的问题。”

供销社的党委书记翻着白眼对他说：“你自己要辞职，我们有组织规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那我们就只好请示上级怎么处理吧？”从此以后，他要再上访，都只得一个简单的回答：“回去等着吧！”

时间就在漫长的等待中过了一年又一年，眼看两个孩子因穷无法上学，妻病不得治疗！除我的母亲在他来医院看病时给他一点接济，很少有人理他。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用心观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画‘受难者’中将头伸向苍天的老农。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们更惨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来和离去，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全国处处一样，到处都会碰到这些落难者。

所有获得平反的人，都吃尽毛泽东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施舍，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实到具体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岂会超出共产党的恩赐？也不会让受害者摆脱当奴隶的命。

老秦走后，母亲劝我说：“我看，你就不要固执了，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样收拾你。横加一个抗拒组织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烦了”。

接连几天，我心里被落实工作的烦恼搅成一团乱麻，压抑的心情需要释放，便将自己关在我所住的那间病房里，从墙上取下那把从盐源带回来的二胡，独奏起来。

空山鸟语，空山鸟语，我可是连小鸟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里，我们只是一群关在笼中的小鸟而已……

正在这时，护士小陈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粮店领过年的花生和糯米。"这提醒我，回重庆的第一个春节悄然而至了。

第三章 一段教书的日子

按照中国民俗，腊月二十九是祭祖的日子，明天就是这个日子。不过，文革时期，民俗被诬为封建残余而一扫光了。今天，母亲同宿舍的人都已回家过年，整个楼里冷清清的，只剩下几个病人和我们娘俩，尽管比在狱中好，但仍感到孤零零的，心中正怀念死去的亲人，中午胡妈来了。

小妹仍像上次那样，提着竹篮跟在她的后面。见面以后，妈妈像待孩子那样，忙拉着小妹给押岁钱，一边问：弟弟怎么没有来？

胡妈回答说，“他们的爹还没到家，范山去火车站接人去了，抽这个时间，把给你们留的过年货送过来。”

说着，从小妹手里接过篮子，取出准备好了的腊肉和汤圆面，并说，“明晚团年饭，干脆你们娘俩到我家，同老头子一块吃。”

母亲答应，倘如老钟也回来了，我们初三来乡下，母女俩便告辞回家。

第一节 走人户

第二天除夕，钟治渊没有回来，因为我和母亲在四川没有其它亲人，所以就把范家当作自己的家。按民俗我和妈妈初三去了范家。

这患难结下的干亲家，住在莲花大队中部一个土山岗上，距医院两里地。在山冈的垭口，泥墙围成的瓦房群里半隐在竹林之中。

门外是一口大约两亩多地的池塘。我想，范山姐弟两为母亲送来的小鱼，多半就出在这池塘里了。

当我和母亲在山垭口露头时，范大叔正在房边的自留地里办菜，看到我们走来，连忙向院子里喊道：“山，干妈来了！”胡妈闻声从围墙的门里走了出来，她栓着围腰，正在喂猪。我看见她走到门边的刹那，小妹紧跟在她身后，但她并没有跟着母亲走出门来，而是闪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我们走上垭口，范大叔迎着我们走来，当我们走近他，伸出手去的时候，他局促地搓了搓满手的污泥，口里歉声的说道：“脏！脏！”。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老人，虽年过花甲，但那矫健的步履顶有精神。

听母亲说他因为“解放”前当过一贯道点传师，所以“解放”后不久就被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刑满后一直留在劳改队，监狱把他的耳朵弄聋了，平时不大与人交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一个“刑满释放犯”。

可是从他那朴实憨厚的老农型脸上，实在无法同中共宣传中，对“一贯害人道”所宣传的阴险狡诈嘴脸联系起来。

我和母亲在胡妈和范大叔的陪同下，跨进门坎，一股农村特有的猪潲酸臭扑鼻而来，门里的左面猪圈里睡着两个刚刚从集市买回来的仔猪。

胡妈走进里屋，忙着洗手，并从碗柜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汤圆面，和芝麻花生拌的“心子”，放在临窗的木桌上搓着汤圆。这屋子既是他们的灶房也是他们的饭堂，柴火就占了整个房间的 1/4，灶边堆着从后山坡竹林捡回来的竹叶，乡下人的节俭，恐怕世界其它国家都少有。

小妹忙着将堆在里院的柴火捡了几根进来，用柴刀劈开，然后划上火柴将已经放进炉膛里的乱叶败草点燃，并且向灶上的铁锅里掺水。做完这些便坐在柴灶口外的小凳上，给炉膛里不断的添加那些树叶。

我突然从那炉膛里射出来的红红火光中，看到她那张充满青春少女的脸，那是一张很美的脸！

不一会铁锅里的水烧开了，胡妈将搓好的汤圆下锅时，妈妈连忙招手说：“刚吃了早饭不久，就不要煮那么多了。”胡妈笑道：“过去你到我这里来，我也没东西招待你。今天，我们柜子里有的是粮食，哥哥今天又是第一次到我们乡下作客，你们都不要见外，今天这汤圆一定要吃够。”

说着取过一个大碗将已经浮起来的汤圆舀了一大碗，吩咐小妹递给我。

我连忙起身道谢，一边说：“我哪吃得了这么啊！”范大叔却笑道：“乡下人没什么招待你们的，汤圆吃够，你不要见外。”说着自己拿起一个大碗满盛了一碗，坐在我对面与我对吃起来。

这可是二十三年来头一次，范大叔的直率和真诚，胡妈的热情，小妹略带羞涩的拘谨，都浓浓洋溢着农家的天伦之乐，让我和母亲溶化在中间，分享他们的快乐。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当然是“昔不如今”，这可不是共产党报纸上像宣传“旧中国”那样，向老百姓“灌输”的，实在因为昨天的饥饿在农民心中留下的伤痕太深，所以自然而然的谈昔今对比。

胡妈指着厢房里的两个用竹席围成的粮囤，告诉我，去年一年土地包产到户以后，三个人的土地足足收了四千斤粮食，几乎是过去公社集体生产时所分得口粮的三倍多。她说到这些不禁叹了一口气说：“过去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今后希望政策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农村人有口饱饭吃就知足了。”

说到范大叔的工资，都花到范萍姐弟俩读书上了，经济上很紧。她说：“我就因为没有读过书，所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了一辈子。城里人不种庄稼照样有口粮吃，乡里人累死累活种地，只图填饱肚子，这吃亏就因为没文化。所以，今天我们把家庭所有收入都花在两个娃娃读书上了。”

说到这里她又千叮万嘱的唠叨开了：“哥呀！你是大学生，你的文化了不起呀！范萍是你妹妹，正在二十四中初中三年级，明年升高中，正在关键时刻，今后呀，就拜托你多多费心帮

助她，让她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考个中师什么的；有个出头的日子，不要像她娘那样，当一辈子睁眼瞎，守一辈子穷山沟……”

吃罢午饭后，母亲提议，胡妈和小妹同我们一道去作坊沟，向当年救助过她的老朋友拜年。

母亲介绍说，这作坊沟在二十年前是蔡家场“赤脚医生”点，蔡家医院成立之初，便将这里暂作临时的门诊室，为解决吃水困难，医院院长决定自己打井，当时母亲刚从北碚来这里接受医院的监督改造。

医院给她的工作，除当时全院谁都不愿干的清洁工：烧锅炉、消毒、打扫院内院外，一天下来已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强迫她加班掘井。给她每天划定的加班任务不完成不准睡觉。

强迫劳役很快摧垮了她本来十分虚弱的身体。时值隆冬，我的弟弟在黄桷坪电力学校读书没回来。有一天大清早，住在附近的田大妈起来打水煮早饭，就看见打霜的地里，打井工地上躺着一个人。

她忙走过去一看，认得是医院的那个最受人欺侮的方老太婆，见她躺在那冰冻土地上已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便高声呼唤她的大儿子，赶快把母亲背到她家里的床上。

田大伯连忙把屋中间的火盆加了一个树疙瘩，烧了一盅姜汤，一边用火暖和她冻僵的身体，用姜汤灌进她的嘴里。好一会儿，母亲才慢慢醒过来。

母亲晕倒在井边的事已过去十五年了，从那时留下了善根。

后来母亲每提此事，都夸田大伯大妈的为人，说：“要不是田家老两口，她恐怕就冻死在作坊沟的打井工地上了。”从此，母亲就认了这个异姓“姐姐”。凡是过年过节，一有机会她都要到这里来作客、拜谢恩人。

今天是第一次带着我给田家拜年来了。

田家的宅院，四周用葡萄架和竹扦子围起来一片土坝子，干打垒土筑墙，瓦房后面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当我们一行四人从马路上走到那通向院子的田坎时，一只小黄狗汪汪的向主人报了信。

屋里的主人，一位花白头发，大约六十多岁的大娘走了出来，一见是我们，飞快地迎上来，一把拉着妈妈的双手连连的喊“拜年！拜年！”听母亲说她比母亲大两岁，但那矫健的动作显得比母亲年轻。

这一天天气晴朗，葡萄老藤上已开始有了芽苞，我深深吸着田园新鲜的空气。母亲从提包里取出了两件衣服来，这是她在蔡家百货店，专门给田大伯大娘买的过年礼。

我们围坐在葡萄架下，大妈打开话匣，叨叨述着往事：

她说：“当时医院那个叫刘巴的多次向我说，方坚志是坏人，贫下中农不要被她的表面可怜样所蒙蔽。可我告诉她说：‘你们年轻人还是积点德，你们也是要老的，欺侮一个孤苦伶仃

的老人要不得。’后来那女人还向我们大队书记说我同情右派，书记问我，我却回答他：‘他们也讲个天地良心！那老方平时又没招谁惹谁，凭什么欺侮人家？’”

亲人相聚，无话不说，看看太阳西斜，我们起身告辞，结束了一整天“走人户”之行。临别时，田大伯嘱我：“你妈那些年吃了不少苦，你今天回来了，一定要守在她身边，不要像你弟弟，到今天也不知道那里去了。”

说到弟弟，当年从电力校毕业被下放农村，开始就在这里落户，至今田大伯的儿子还保存着弟弟当年使用过的农具，这么十几年了，弟弟下落不明，每提到他，母亲都很伤心。

第二节 二十四中学

大年初五的上午，医院开始上班，母亲在挂号室里刚刚打开挂号室小窗口，窗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向母亲询问道：“请问孔令平老师在吗？”母亲抬起头来，诧异地盯着他俩；两人面孔很熟悉，只是一时记不起是谁来。

心中暗自寻思；儿子到蔡家场才四个月，哪里相识的年青朋友？便发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找孔令平有什么事吗？”那女青年回答道：“我们是二十四中的教师，今天奉校领导的委托，专门来找他商量工作的。”

我在王书记安排的“招待房”里，接待了两位二十四中的来客。来人主动自我介绍，男的叫李兴全，女的叫韩泽红，两人都是数学教师，上学期放寒假之前，数学教研组组长周兴在安排下一学期的课时分配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按教育局的“命令”，二十四中初中部增招了两个班，却没有增派相应的教师。增加的课时，硬分摊到原有老师的头上，当时老师们的课时负担已大大超过规定，加上教师们的抵制，学校教务处只好用减少学生周课时的办法来解决。

结果这事不知是哪位学生家长向区教育局反映了，二十四中的领导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所以，从下学期开始，只有将所缺课的课时分摊给任课老师，数学老师每人平均每周增加了四个课时。

小韩老师哭丧着脸诉苦道：“经过这么一加，我每周就要承担 32 课时的工作，也就是说，每天要在讲台上足足站五个课时以上，几乎天天都要上联堂课。在课堂上一站就是一上午，我们女同志最怕连站一上午，上学期我就发生二十四中学过上了一上午课，走下讲台昏倒在教室门口的事。”

“算算看，每天上五小时的课，加上备课、改作业，每天都要保持十二小时的工作量。这哪里是在教书，简直在拼命！我们年轻人可不想早死，如果下学期真要强行加课，我就只有请长假一条路可走了。”

教研组长周兴只好请何校长来解决。这何希廉因作风霸道，闻名蔡家地区，人称活阎王。后来大概因为文革中被冲击过，坐了九年“牛棚”，打掉了他的霸气。四人帮被打倒，他官复了原职，总算领了些教训，说话做事收敛些。

当周兴把他请进数学教研室时，他满脸堆笑，带着他多年难改的奸笑向大家说："大家的辛苦我是知道的！对我校缺乏数学老师的事，我向区教育局多次反映了，但现在教师正缺，教育局也苦于无人，加课时的事，实在希望大家能谅解。"

说到这里他眯逢着眼睛，带着讨好的口气说："不过，最近教育局告诉我，一个家在蔡家场的落实政策人员，原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1957 年被划为右派，现在正等落实政策，就在蔡家场，他母亲在蔡家医院，你们都认得。如果你们哪一个能把他说来顶你们的数学课，那么，我就答应：谁说服他就减少谁周课时五小时，你们看怎么样？"

被超课时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老师，谁不想有人来分担一下过重的负担？何希廉今天把招人进校，用减少课程的条件交给了任课的老师。何校长反右时整过不少的老师，被整的老师心有隐痛，现在，凡是他出面去请老教师，都会以年事已高相拒绝，迫使他想出用老师去请老师的绝招。两个年轻人也清楚，但无奈事已至此，经过全教研室讨论，便公推了两个年轻人到医院来试探一下。

我听了他们讲的故事，两个年轻人眼睛里那请求援助的眼神，马上联想起重大一行时，那钱企范的爱人所讲的故事，想到被毛泽东摧残的臭老九可怜状态，也想到那些同样被害的骄横一时，一无所学的年轻孩子们的可悲。我可以置当局的硬派软骗于不屑一顾，但我却不能无视这些被害师生的请求。

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劝告，心中一直被搅得很烦。当然教师也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只因为这些年累受摧残，地位低微，待遇菲薄，才无人问津。为使我的生活尽快走上正规，结束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老在谋职上空费时间。既如此，不妨去二十四中当一段时间老师，在我熟悉情况后，再另作他图，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两个年轻人的请求。

小韩老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教育局都无能为力的事，他俩竟没有花上十分钟就轻而易举的敲定了。感到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下子便得到了减轻，连连向我表示感谢。我把他俩送出医院的大门时，他们一再的和我握手道别，李兴全还叮嘱我，生怕我变卦。

第二天他们又高高兴兴地给我拜年来了，这一次他们从自己的"书包"里取出了一包两斤重的白糖说："学校领导委托他俩给我拜个晚年，这白糖是学校春节发给全校教职员工每人一份的过年货。"

说着又从书包里取出一本高中一年级的数学教科书，和一本数学参考资料以及两个备课本、一支钢笔。周兴正等着消息，一听说我已经答应任课，当即便安排了工作。由于我初上讲台，还有一个熟悉过程，暂时把高中一年级一二班的数学课交给了我，周课时总共十六节。

我申明："我没有上过课，怕不能胜任"。李兴全却说："你别谦虚了，像你们这样五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正紧缺着呢！怎么说你比那些文革期间鬼混出来的师范生，强上百倍。"我就这样，在脱离了数学课本二十五年之久，因流放而荒废了二十三年学业的老学生，未经师资培训，出狱后一步就跨上了"高级中学"的讲台上。

好在，我在中学求学中数学和物理基础很扎实，加上在盐源时，为郭川小的两个小子补

习功课，尤其是我对工作一贯很强的责行心，不会“误人子弟”，把教书仅当作只拿薪水的手段。

下午范小妹和弟弟来了，提着的菜篮子里装着一篮子鸡蛋，那是胡妈平时积攒下来的。

当她听到我要去二十四中教数学时，高兴极了，当下就跑回家将书包提来，她已初中三年级了，她说：“数学和物理从没听懂过，一上课，课堂里乱哄哄的，大家各讲各的话，老师也不干涉。老师是顶班的，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搞懂，讲起来让大家坐飞机，眼看初中就要毕业，这么下去，还能学到什么呢”？

经她这么一讲，我想起每次胡妈的嘱托，便答应专门为她从初一的课程开始补习，这样我也好熟悉整个初中的数学和物理教材。从那天开始，她每天都带着书包和一颗渴求知识的心，到我所住的病房里同我一起做作业。

学校开学前两天，按校方通知，我去二十四中报到，行政办公室的总务主任办理了我的入校手续，并在靠学校北端的松林坡教师宿舍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

第二天，我便正式搬到了二十四中学的教员宿舍。在边僻蔡家场，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息窝。

虽说地处边僻，但校园却是满不错的，足足有五万平米的校区被浓浓的绿茵覆盖，周围被农田所包围，东面临着一个高耸的悬岩，山下便是从北碚通往重庆的公路。

一幢四层的教学行政办公楼位于中央，两幢三层的教师宿舍楼分别位于南北两侧，掩藏在丛林中，加上学校前方大约八千平米的操场，整个学校相当大，抗战时期，这儿原是国民党驻军建立的一所军需学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将这里改成一所国立中学，取名战国时期燕国的贤士乐毅。其中含寓着培育求贤的宗旨！

真的，它的优美的环境自畜着一种陶冶学生情操的魅力，那山林的气息，又含着隐居求读的气氛，这真是一处难得的求学圣地。

可惜，这样圣洁美丽的校园，却被中共糟踏了。

在风雨吹打之下，早先军校的建筑黄色的粉壁从泥墙上剥落，房梁被白蚁蛀空，连同泥墙倒塌成一堆堆废墟，不知什么时候建的教学楼，像无人管理，窗槛破损、桌椅残缺。那片宽阔的操场上长满了一人多深的茅草，好像一片荒芜的草地无人清整，校舍中的石板通道上长满了青苔。

走进教学大楼，二楼开始是初中的教室，一大群孩子在整个的教学楼里狂奔乱吼，不时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响声，和桌椅倒地发出的沉闷冲击声，令人心神不宁。上课的铃声响过后，大楼里传来的杂响仍没有间断，一直要等到十分钟以后，走廊里才惭惭的安静下来。

我在第一天并没有课时，教研组的周兴，建议我去听一下高一年级三班的刘老师所上的

数学课。

高一年级的教室基本上在三楼，那走廊上的秩序比二楼稍好一点，当我走进刘老师正在上课的四班教室时，顿时被乱哄哄的课堂弄得头脑发胀。

只见那五十开外的刘老师在讲台上，声嘶力竭的叫喊！不时的还在用手里的教鞭，拍打着黑板，可是无济于事。

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讲的讲话，互相打闹，调笑不停。有的往前面座位上的学生背上，贴上一张画着乌龟的纸，引起后面学生的哗然大笑！还有两个女生在合拍唱歌！这哪里是课堂！简直就是顽童的游乐场！

我深深为讲台上上了年岁的刘老师感到难过！想他苦心备了一晚上的课，全给这些不懂事的少年践踏了。

一堂课下来，刘老师的授课技巧我是一点没学到，脑子里却想着，明天我上高一年级二班的课，第一个动作该是整顿这游乐场般的课堂秩序。

晚上，当我想到白天所看到的乱哄哄的课堂秩序后，无心备课，便聚在李兴全的宿舍里，同隔壁几位老师一起聊天，那话题从简单的身世介绍开始，接触到学校现状，大家无不为纷乱的教学秩序而烦恼。

唯独只有李宏老师，最无所谓。他是接他父亲班来教化学的，他的父亲曾在文革时被赶出校，最后死在忧郁之中。他说，他决不会像父亲那么死心眼，上课时，学生不听，干脆便停下课来给他们讲故事。

“反正学校的任务就是管着这些孩子不出校门，不到外面惹事就好！”他无所谓的说，只有对文革遗风无可奈何的人，才用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对付学生，这倒合符统治者的要求，当然，这不是教书育人的态度。

在文革中这所学校并没有逃掉厄运，原先一位资格最老的数学老师罗某，在 1968 年因忍受不了学生们的打骂，在王家大院里悬梁自尽……

晚上十点钟左右，聚在一起的老师们已散去，各回各的宿舍。我独自走下楼来，心情极不舒畅。

自己冤狱半生几乎丧命，在监中我自比“奴隶”，“平反”并未沉清是非，冤屈旧账远未了结。而今“命运”还操在他人手上。我对在这种边远学校，管束顽劣少年的差事，心中愤愤不平。

想着想着，便独自向那棵教学大楼门口最大的老槐树走去。听学生们说它已有百年历史，是这里百年变迁的见证人。

一边走，脑海里还在不断涌现白天所看到闹哄哄的课堂。听那百年老树在寒风中瑟瑟作响，似乎正在述说那渐渐远去的故事。

想到在狱中那么苦的环境中，仍以读书为乐事。那可真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当年，为了保存一本书不被鹰犬搜去毁掉，我曾绞尽脑汁藏书于瓦砾、草垛，拼着命来保护那被当局蹂躏的知识！

却没想到，生在如此优美环境下，如今的孩子们竟视知识为粪土，视读书为蠢事！毛泽东你的罪恶滔天！

第三节 在课堂上

今天是我上课的第一天，为了建立良好的上课秩序，一上课堂便与全班同学约法三章：课堂上不许喧哗；不许看小说，做与本课无关的事；所布置的作业必须完成。

这个班的四十名学生，果然被我特殊的上课风格和严肃态度所震慑，没有出现我在刘老师课堂上所见到的喧哗吵闹，这使我相信孩子必竟是可塑的，只要教师作风严厉，对事认真，没有政治流氓的干扰，文革搅乱的学风仍是可以扭转的。

怕只怕执政者的顽劣，视教育如敝履，教育只当成粉饰社会一团糟的遮羞布，以此糊弄世界。用"教育兴国"欺骗百姓，用改善教育环境和教师地位的空话来欺骗社会。今天只要看看教学设备的简陋，教师素质的低下，教师地位的卑下，便知道中国教育事业今天难以康复。

上第二堂课，按照教学大纲上的安排，仍是复习初中的数学：解一元二次方程，按照寒假备课时准备的题目，写在黑板上准备叫两名学生上黑板来做，其余的在黑板下面做，然后就黑板所做的订正评讲，指出常常容易错解的地方。

于是我在点名册上随便叫了一个周云的学生，可连喊了两遍却没有答应，我向教室里环视了一下，发问道："周云同学来了吗？"全班的人一齐把头扭向了后面，那里有人发出了顽皮的笑声。

迟疑了好一阵，一个坐在最后排坐位上，个头高高的男生，满不在乎的站了起来，既不答应，也不走上黑板。

这时，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的一个脸蛋圆圆的男生，傻里傻气的说道："老师，他是哑巴！"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我听出这笑声中哗众取宠的味道。厉声的向他喝道："我没问你，你多嘴什么？"

哄笑的课堂嘎然静下来，那孩子没料到这位刚来二十四中教学楼的老师竟当堂给了他一个没趣，不甘示弱的向那站起来的男生嘻皮笑脸的吼道："周二娃，你有本事不站起来！"这一挑逗，那周云果然扑通一声坐了下来，课堂上又是一阵笑声。

没想到这才第二堂课我便遇上了难堪，我看出那坐在第三排的圆脸孩子，一定是这个班的最有影响的调皮生，如若不坚决回击这种公开挑衅，今后，我就休想在一个较为安静的课堂上讲课。

于是毫不犹豫的喝令他站到讲台前面来，课堂的气氛顿时又静下来。

估计按过去的惯例，恐怕没有老师对这调皮生的挑衅回击过。那圆脸的孩子也许没料到，这种在平时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的“小玩笑”，会遭到如此严厉的制止。这种出乎意料的处置，他被怔住，乖乖的从坐位上站了起来，态度虽然仍那样傲慢，但必竟不敢对抗，站到黑板跟前后，课堂又恢复了安静。

课堂里所有的孩子正在注视老师的态度，窥探老师的水平，这时会因处置不当掀起轩然大波。抓住这个肃穆两分钟的气氛，我开口说道：

“你们想过没有，是谁让你们在这里读书的么？你们想过没有，此时此刻，你们的爹妈正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挥汗劳动吗？他们省下了辛苦挣来的口粮，将卖猪、喂鸡的钱，省吃俭用舍不得花，却积攒起来给你们缴学费让你们读书，容易吗？难道他们把你们送到这里来，是让你们在这里上课做游戏，顶撞老师，调皮捣蛋吗？”

我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扫过那站在黑板面前学生时，我看见了他脸上多少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沮丧，我的态度在他身上发生了抑制作用。

于是接着说：“如果你们的家长同意你们到学校来鬼混，那我想，何必到学校来自寻约束呢？如果你们已不愿读书，你们完全可以不进课堂，在课堂外不是自由得多么？何必坐在课堂上自讨苦吃？”

课堂一片沉默，看样子，我的话，至少给仍在蒙里蒙懵的少年们一个思考！我坚信，如果我能恢复这些孩子们的理智，便能有效的整顿课堂秩序！

“如果你们不是到学校来鬼混的，还真想学到一点文化知识，今后也还有一点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那么，我还要告诫你们，古人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们不可以跟着那些混日子的人鬼混，你们还年轻，正是少壮时期，从现在起就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如果你们要荒废自己的学业，到头来会很后悔，不但辜负了你们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我继续的说下去，我注意到有人在用心的记着笔记，有的把眼睛盯着我，从他们眼神里可以看到他们接受了我的话！

下课以后，我把两个学生喊到办公室里，询问了两人情况。那圆脸的孩子叫杨福他说他的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除了有一个表哥考进大学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读书混出个明堂的。

反而他的小叔和堂兄是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但做生意发了财，还有一个叔伯长兄，帮人开汽车挺阔气，也没读过书。所以他得出结论，读书实在是傻瓜干的事，与其有时间浪费在读书上，不如去学做生意。这就是他的“人生经验。”

当我问他：“那你又为什么要来上学呢？”他说：“那是爸妈逼他的，像我们这样的蹩脚学校，一学年下来，没有一个考得上大学，最后还是回农村”。读是这个命！不读也是这个命！所以他便选择了不读书。

我实在没有理由来反驳他，但我听到了几乎所有学生都这么说！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次偶然中，在北碚街上看到灯塔建筑公司所打一则广告，上面竟写着：总经理杨福先生，我才好奇的打听到，这当年的调皮蛋，竟然现在成了拥有千万资金的建筑老板，并拥有两处别墅和小轿车，这就是残酷的生活！看来，在这个社会中，教师简直是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当我问到周云时，他很直率地告诉我，除了他同意杨福的观点外，他现在没有值得担忧的。他父亲就是附近蚕种场场长，他早已安排了儿子的工作，说好了，中学毕业，就任蚕种场办公室秘书兼小车司机，所以到学校来读书，只是为了拿一个高中毕业文凭。

他说："我会开车，现在最吃香的就是开车的。"他说的完全是实话，当时一个穷教书的，无论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无法同一个汽车司机相比。我这才明白，他所以在课堂上对我装哑巴，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起讲课的我。

在他的人生中根本就没有"求知"，求理想这种想法，有幸于他父亲的权位既给他的前途打了包票，他还有什么"理想"可以追求呢？这种社会里产生的特权阶层，压根就把教育当成一种装饰。

他中学毕业后，我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但听到学生们讲到他在蚕种场开小车，而且，看见在他的小车上，经常有年轻的女孩子坐在上面与他打笑调情。

后来我在教育某些孩子时，他们会用周云的例子反驳我说，"什么读书，前途光明，再用功也顶不上像周云那样有一个好父亲。"

这使我无话回答。

呜呼！中共提倡人为的阶级划分，因黑五类而受践踏，因红五类而成新贵，已现端倪矣！今天，出身好而平步青云的"太子党"，应运而生！看来，真正懵懂的不是这些孩子而是我了。

呜呼！教育照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岂不被徒有一张空文凭，实际上是文盲的群体所充塞？何况中共的老德性，吹牛撒谎已是习惯。只苦了"教育"这头饱受摧残的老牛，又套上了"四个现代化"的枷锁，拖着"实用主义"这沉重的破车。

当世界的知识每年按等比级数在猛烈增长时，中国教育肯定也是"突飞猛进"增长。例如大学生每年增长的数量中，定会把相当大比例"文盲""科盲"泡沫般充数。所以在中共专制主义领导下，振兴教育是绝对的空话！

第四节 天下靠自已去争

听田大妈和胡德明向我介绍，在我还没有回来之前，母亲在这所医院受够了这所医院品格下流的员工欺侮。这不仅是中共划分五类实行"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丑陋中国人最恶劣的品性——欺弱畏强。

我的母亲个性并不软弱，但她是一个多年从事教育，有相当函养的人，怎能同满口脏话，作风横蛮的造反天棒相对？加上她多年失去儿子和亲人，孤身一个老太婆，又怎经得起无产阶级专政野蛮的压力？所以，从旁人眼里看，她是太软弱太可怜了。

我刚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熟谙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性多有沦丧，弱肉强食这种动物低劣的品性尤为显着。所以我常常满身芒刺保护母亲，医院的下三滥们都畏我三分，母亲在我的保护下才相安无事。

就是那些对母亲一贯欺侮的人也一改老态度，表面上至少是客客气气的。

去二十四上课之初，既要复习数学知识，写教材，加上忙于整顿教学秩序，所以一连就有两周没有回家。好在，我的努力立刻收到了好评。学生们的家长已有口风，传言二十四中来了一个大学教授，教书颇为内行，课堂上清风雅静，既有此评，算是对我的鼓励。

天气日渐暖和，带在身边的衣物已到了换季的时候，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没有课的上午，八点钟为拿几件夹衣回了一趟医院。

我刚跨进医院的大门，便被医院后院里传出一阵女人的呵斥声惊住，那声音尖声吼道："方坚志，我身上没有钱，今天伙食团的菜你自己去买！"

那命令的口气令我震惊，这女人名叫何玉，医院伙食团的炊事员，今年才二十岁，顶老汉班来的。大致因为从小受文革风气的习染，不但好吃懒做，工作极不负责，唯独长着一张尖刻的臭嘴，擅长泼妇骂街。

我来医院这半年多，便经常听见她同院内的病人争吵。所以无论是医院的职工还是病人对她颇有微词，给赠了一个"小刁妇"的雅号！

今天听她刚才的这么一喊，使我首先感到刺耳的是，她用轻蔑的口气直呼其名，吆喝年龄比她大三倍的老人！何况买菜是医院伙食团定在炊事员份内的事，怎么现在命令起挂号室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去做？

倘若这事发生在几年前，母亲尚被全院职工监督劳动的时候，这种年青人对母亲呼奴使婢的口气倒也听惯了！而今，六十三岁的母亲虽入过中共的另册，但也是中共为她平了反，怎么还被呼喝？

于是我停住刚刚上楼的脚步，此时那何玉并没有看到我，还在一个劲的狂喊："方坚志，我先给你说好，今天中午没有菜吃是你不去买造成的，如果大家要骂就骂你！"

这一天正逢赶集，来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我看看挂号室里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她，这小刁妇明明是喊给医院职工听的，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职工劝阻这蛮不讲理的女人。

今天我只好亲自杀杀这刁蛮女人的歪风了，否则母亲在这所医院休想安渡晚年。主意打定，便向后院走去。正在歇斯底里吼叫的她，没料到这时我会突然出现，见我满面怒容向她走来，预感到不妙，嘎然停止了叫嚷。

"买菜明明是你的事，你有什么资格去叫一个老太太代你去做？"我劈头责问她，语气充满了怒气！她一时答不上话，顿时感到难堪极点，赶紧折回身，缩回厨房去了。

但她马上觉得当着这么多围观的人，就这么缩头，一声不吭也太输面子，何况她所呼喝的是大家呼喝惯了的右派老太婆。别人能呼喝，为什么她就不能？于是便使出家庭妇女骂街的本事，吼道："吓！你管得着吗？医院的事关你屁相干，你管得着吗"？

我立即窜上台阶进了厨房，向她喝道："你搞清楚点，今天不是你横行霸道的时候了，你这种不明道理，不懂礼貌，没有家庭教养的人，就得好好地管教你！"说着抓住她的手怒喝道："你今天非得当着大家说清楚，这买菜究竟是谁的事？"她见我气势汹汹，生怕挨打，终于不敢吭声了。

正在这时，王明从院里钻了出来，走进厨房便问道："你们吵什么？在他眼里，我和母亲向来只能埋头干活，规规矩矩做奴隶，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今天哪来这种"嚣张"气焰？

便向我正色道："你是知识份子，是知书达理的人，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同我院的炊事员在厨房大吵大闹，当着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像打人的样子，未免有失你的身份。"

他的话为本已理亏，无言以对的何玉壮了胆。立刻大声的说："书记，你看他好凶，凭啥要他来管我们医院的事？又凭啥来教训我。"

围观的人喧哗起来，七嘴八舌各有评议，二楼窗口上也探出许多身子来。看来，医院职工这种蛮不讲理，对母亲任意呵斥欺侮，根子还在这书记身上。对付这些凶恶的下层官吏，还不能凭吵骂，当着这么多围观者只能讲理！

于是我把脸转向他问道："你是医院的头，请问，我的母亲究竟现在干什么工作？"这王书记将问就答的说："这个，我们已根据政策，为她平了反，恢复了干部职务，现在是医院的出纳兼挂号。组织上把经济大权都交给了她，足见对她的信任，她本人表示组织上对她的安排很满意，不信，你问问她。"

我又追问道："那么请问伙食团买菜的工作该由谁做？"这意外的追问使他没有转过弯来，脱口回答道："那当然是炊事员的事！"，

"既是你安排给炊事员的事，你的炊事员无理的把份内工作，像呼奴使婢一样叫一个年龄长她三倍的老人去做，这像不像话？"

围观者骤然间哄闹起来，喊道："不像话，那小刁妇一贯不像话！"我指着挂号室高声喊道："大家请看看，今天赶场，那么多的人看病，这何玉却要喊别人做本该由她自己做的事这叫什么？"

大家的视线集中到门口的挂号处，那儿还排着一排长长的队列，围观者又是一阵哄闹！一阵对何玉的呵责！

那王支书见到这种形势，已极不利医院方，连忙向何玉喊道："小何！你为什么叫方老师去买菜？"何玉见众怒难犯，畏怯的说道："没有把钱交给我，我拿什么买？"

"你没看见她忙着吗？你为什么不去向她取钱？还在这儿喊什么？"那女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从地上拣起刚被她扔到院子里的背兜，上挂号室取款买菜去了。

王明打发那女人走后，看看院子里围观的附人渐渐散去，便向我不冷不热的说道："你看，医院的职工都是很听话的，有什么事，不要动不动和他们吵，你也是当老师的，更要注意影响。"

我看着他那张圆滑的脸冷笑道："医院这种随便欺侮老人的作风，本是你们医院的传统。今天要不是碰上我，那何玉非逼着我的母亲去买菜！"

中午下班后，母亲回到寝室摇头叹息道："历来就是如此，在你回来之前，炊事员到我的办室来，动不动就把菜背兜往我面前一掼。那时，我只有忍气吞声驼着背兜去买菜，有时耽搁了时间还要挨骂！"

第五节 对母亲的歧视

母亲受到的多年歧视和压迫，至今还在继续蹂躏她的心，她怎么能安心在这个医院呆下去？几次三番请求调出这个医院，其实只想图一个清静的晚年，够可怜了！但是她仍像一个叫化子那样，被政策落实单位一次又一次的当成皮球踢来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母亲便积极筹划能在蔡家医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邹银双的婚事告吹以后，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关心的事。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虽被冤狱夺走了青春和恋爱的黄金岁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亲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

眼下医院正在原来两层楼的基础上加高一层，以解决职工的住房要求，两年前，这个扩建工程开始实施时，也是母亲改正右派落实政策之始，党支部书记，曾指着加高楼层的图纸向母亲保证说：

"我们医院像你这样身兼数职，又要挂号，又要作出纳，又要负责全院工作的报表，真是难得，我们缺不了你，现在按工龄排，你的工龄也是没人能同你相比的，这一次分房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政策上，你当之无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着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听书记的甜言，她盘算今后的新家规划，心想能在身前了却这椿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对她多年的歧视依然存在。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老百姓普遍没有休养生息的窝。近年来靠恢复农民单干，老百姓肚子在逐惭填饱后，安家的"窝"便空前紧张起来。

农民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还有一个可供遮风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住房的匮乏堪称为世界之最，据当年重庆市统计，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积平均不到 1 平米。

一个三口之家有一间 10 平米的小屋已相当不错。几世同堂共挤一间或几家挤住在集体宿舍，中间用布遮挡一下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毛泽东淫政下，城市里的"吉普赛"人，长期在政治运动中耗尽自己的精力，没有国家的投资和计划谁都不敢在"国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己的"窝"。

毛泽东驾崩，中共新的统治者，提出拨乱反正口号，庶民们为了争这些破房烂屋，发生

打架斗殴、杀人纵火事件层出不穷。

尽管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国企职工分配住房的条例，规定单位分房按职工工龄进行打分，再按分数高低排队分房。

但这个条例一到各级基层党组织手里，便彻底变样！掌握住房分配大权的基层党棍们，运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权，或公开窜通，或暗地交易，他们现在又成了抢住房争待遇的强手。

一幢住房从刚刚开始平地基开始，一场围绕分房排队的争夺战就明里暗里展开了。这种争夺战是世界上罕见的中国特产，准确说这是共产主义牛皮吹破后，赤贫者如梦初醒的争抢。

这种蛮不讲理，手长心黑之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风要一直延续到专制政体彻底解体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后，便成立由支部书记“挂帅”的分房小组，按照本单位中势力大小和利害关系制定分房办法。

按小组成员意见塞进“贡献大小、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业务水平、职务高低”的条款。以体现小组成员利益的打分办法。任何单位所执行的分房条例，与国务院规定按工龄打分的办法根本是两回事！

共产党一贯有“保密”的规定，凡是党的政策、会议决议，老百姓是不能过问的。这一条被分房领导小组利用得很好，他们把本该由职工讨论决定的分房条例，和打分办法当成了党的“绝密决定”。

胆小的医院职工，事前没有人探问分房条例，就由医院的领导和掌红吃黑的职工在“暗箱”中，任意塞进有利于自己的私货。

按照当时流行的规矩，蔡家医院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为组长的分房领导小组，然而，分房条例却迟迟没有公布，蔡家医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满了诡秘，四十几名职工预先都不知道分房办法是怎样制定的。

分房时，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即使是错误的也成了既成事实，这样的单位，奉行欺善怕恶这个处世法则，成了无可救药的现象。

然而，老实巴交的母亲，吃了二十多年的亏，还在轻信王明给她灌的“迷魂汤”，认为许给她优先照顾的保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容怀疑，虽然她一辈子都在受共产党的骗。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诉母亲，王明是骗你的，但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相信了王书记的许诺！

她搬着指头算，四十多名参加分房的职工中，工龄在二十年以上的仅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层楼一共建了二十间房间，第一梯队的五个人每人占两间房还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厕所旁边，一个有起码人性的人，不会做出再剥夺她正当分房权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实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办法仍然没有公布。提前几天，她已在原来住的三人房间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装衣服的纸箱子和破烂捆好，一心一意等着搬进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个像模像样的“家”。

因为我从未见识过分房子的事，不知道这分房中，有那么多的诡计，也从来没有见过分房条例和分房程序，不会想到掌权者在那里面塞进那么多暗算。

加上我刚刚才接手高中的数学教学任务，连日正在加班加点的熟悉教材，对于母亲分房的事情并未充分关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亲告诉我，下周星期三医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来搬东西时，我才问母亲：“搬进哪一套房子？”她摇摇头说：“还没有公布呢。”

星期三上午我请了假，当我跨进医院大门时，便听见楼上人声嘈杂，一股股的灰尘从楼梯口上直灌下来。我捂着嘴连忙奔上二楼，只见那医院职工的家属们正忙着往三楼搬东西。忙跨进母亲原先住的那间“病房”时，只看见屋子已是空的，满地的废纸破布、空瓶，人却不见了。

母亲的纸箱和木床已经搬走了。不是说要等我回来搬的吗？我正感到诧异，急忙又抽身向三楼跑去，炊事员秦国秀的两个儿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楼去。过道上到处都塞满了纸箱、坛坛罐罐。

好不容易挤上去，在一个屋里找到了母亲。只见她正坐在那堆搬上来的横七竖八纸箱面前发呆。我环顾了那屋子，只有东北方向那垛墙上留一个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过道，平时因为要过人所以根本没有打开。

所以，只要进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气，不见阳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亲的身边向她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木然的看着我，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分房过程”。

原来，直到昨天下午，这就是当年蔡家医院分给母亲的住房分房领导小组的人，才把每个职工这次分配住房的决定，张贴在楼下的布告栏里，母亲这才知道，这王书记花言巧语向她许诺让她满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辈子的“家”，竟是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

这位道貌岸然的王书记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反倒是分房小组的人向母亲发出最后通谍，必须在明天之内将所占的病房腾出来。

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着共产党给她带来那么多灾难，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骗，为共产党作了半辈子奴隶，受了大半辈子的欺侮，至今还在受人欺侮不觉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还想等儿子回来后，再与医院交涉，所以迟迟未搬动。谁知，早上刚刚上班，护理室的四名护士和传达室的小张，五个人奉命一齐拥入母亲住的那间病房，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制止，便将她打了的背包、纸箱全部搬进三楼“分配”给她的那间屋子里。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这样被连哄带逼地搬进了分配给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后，她逝世时都再没有给她一间遮风避雨的房子，使她临终抱恨而去！

我听到她这么一说，便走了出去，对整个楼层巡视了一遍，整个楼层的十套二十间住房都已被占据。位于西南面的两套两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龄未满八年的院长李德富、会计许晓龙占据。另一套则已堆满了家什，是给即将赴任的副院长留的。

所有通风好，光线也好的的房子，全被医院里大小"干部"们抢占一光。

直到此时，医院领导们为策划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并隐瞒一年的私分方案，终于才公开！以王明、李德富为首的分房小组，完全没有按工龄分房的原则，而是利用职权将本该由大家公开评分的房子私自瓜分了。

对老百姓公开掠夺和霸道、欺骗仍是中共执政的贯伎。我们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惯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幌子下，干的对善良百姓的公开抢掠。眼前发生的只是一个小小乡村医院，在住房分配时所表现的强盗行为。

当然，这种既要抢人又不准被抢者出声的作法，早就被我领教，并预先告诫母亲，然而我却没想到人心会那么坏！！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这种被骗，被辱的愤怒，冲上楼去，找王明讨公道。行政办公室里，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里。不时把头抬起来，从窗子里窥视着楼上的动静显得心虚，见我满面怒容的冲了进来，心中早已明白，便从坐椅上站了起来。

"你们医院这一次分房子是根据什么办法？"我一进屋并没有向他打招呼，觉得没向他大吵大闹已是很客气的了。

面对我的责问他自感心虚，他参加工作才七年，在医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时就抢在母亲的前头，必竟有点说不过去，不敢像王明那样说什么"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事，你们家属无权过问"的蛮不讲理的话。

"你是讲你母亲分的住房吧！"他沉住气，有准备的回答道；"她的工龄是全院最高的这不假，我们已对她进行了特殊的照顾。分给她的房子，不当西晒，不受风寒，还是整个楼层里面积最大的一间。"

睁眼说瞎话是党棍们的擅长，决不会因此脸红。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这么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换吧！你们把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口袋屋，光线和空气最差的房间逼她搬进去住，你们还有人性和良心吗？再说，我也回来了，你们凭什么把她放在单身职工的档次。你们不怕她上统战部去告你们吗？"

我憋足了一肚子气提出："所有的人统统从所占的住房搬出来，直到弄明白了以后再来重新分配。这是最起码的办法。否则，我们不会答应的。"

李德富自觉理亏，心里很虚，怕我指责身为一院之长，竟公开抢夺老职工住房，当着全院职工不好交待！正陷于尴尬语塞时，王书记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李德富看到来了解围人，便退到自己办公室去了。

王明听到我的责问，板着面孔回答道："你凭什么推翻分房小组集体确定的分房方案，你又凭什么说我们按单身职工的标准对待你母亲？本院的职工像游再郁，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们都只分了一间，你也不想想全院这么多人，人人都要分房，这点房子怎么够分配？现在已经优先解决了你母亲的房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看来他早有准备，想继续维护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职工的权利和公道在他的眼里，一直就有杆他自认为必须维护的"秤"，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这杆秤称出来的。分房必须昧良心，这就是他悟出来的"党性"。

他刚才列举的肖信芳是一个才廿多岁，才参加工作的护士，按工龄分配怎么也轮不上她，就因为她是中共党员，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销社供职，仗着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与六十岁的母亲争房。

王明给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亲的隔壁，并与母亲共享仅三平方米的"厨房"。这蔡家医院当时仅只有五名共产党员，除王明本人而外，其余四人全都分了房子，这些人全是工龄不满十年的"年轻人"，按正常的工龄排队，他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这住房紧缺条件下，与工作一辈子的母亲争夺。

我问道："我想向你们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凭什么不按国务院按工龄长短排队分房的规定，兑现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分房条例，供每一个分房的人评分，并预先张榜公布？"我提高嗓门，因为我注意到门外被我们的争吵声吸引，围拢的是全体住院病人和全院的护士。

在这种场合下不争是非曲直，不仅在这一次分房母亲受欺侮，今后她恐怕仍会处在抬不起头的地位。

上一次因为伙食团买菜，我已经同这个一手遮天的人物较亮了一次，我不会放过这一次，我知道母亲的处境是要靠"争"才能改变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这么多围观者的场合，败在一个刚刚刑满的劳改释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么说都要扫地了。所以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以势压人"，故意挑拨说："分配住房不仅要凭工龄，还要根据家庭人口的数目，你母亲就一人要占两间住房，全院的职工也不服。"

这真是睁眼强辞夺理，母亲的老伴钟治渊在德阳，退休后要回蔡家场安居的。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实。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难道也要被他抹去么？何况我已四十二了，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亲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况，当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声声要照顾我们母子团聚，没有住房，"团聚"的许诺岂非空话！？

当我一连串的揭穿“落实政策”的假面具后，王明居然说：“你的住房应由二十四中解决”，理由是我是那所学校的员工。

看样子，像母亲这样老实忠厚的人，岂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至于教育局对我的骗人鬼话，我压根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知道，要争取较为宽松的条件，除了靠自己斗争，不会从天上掉下馅饼来。而王明眼看我当着这么多人面，被一个过去踩在脚下的右派指责，怎不恼羞成怒？于是使出党棍蛮不讲理的本领，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干预本院的内部事务，有话也轮不到你在这里责问我们。”他声嘶力竭叉着腰，狂怒已使他不顾一切！我看到这是一个同派出所汪秃子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种人表面凶狠可怕，心却是虚的。

在政治上未占优势时，除欺哄、赫诈别无他法。尤其对死缠他们针锋相对的人更没了招数，不甘示弱的我也拍着桌子，回敬道：“你瞒着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违背政策的规定，我可以去区委告你。”

这一逼，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接连拍着桌子吼道：“出去，滚出去！”几名年青的医护人员在李德富的带领下，一边劝着，一边推着我，将我拦出了办公室的门外。门“乓”的一声关上了，这时门外过道上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有的围着我，纷纷诉说蔡家医院过去欺侮母亲的事。

我走到后院的天井里当着上百名围观者，朝着办公室的那扇窗子扯开了嗓门，痛痛快快地声声斥责着。这不是骂，蔡家方圆十里地，谁人不知道这蔡家医院对我的母亲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来的歧视和虐待？现在是当着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亲控诉她十几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机会。

此时，我听见了办公室传出来大声吼叫电话的喊声，那王明拿起话筒正声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吗，请你们马上派人来一下蔡家医院，这里有人正在闹事”。

那喊声分明是喊给我听的，眼看着“阶级斗争”喊不应了，斗争会也不开了，往日欺压五类份子那套办法没用了，今天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于警察了。越是想到他还在用昔日对付我们的一贯手段——捆绑，打骂来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劲地吼开了。

此时楼上搬家的人，纷纷探出头向下张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电话故意吓唬我们，还是那姓汪的自从在户口薄上讨了个没趣，对王明报来医院刚刚发生的事，袖手旁观了。

我站在天井里整整数落了几个小时，仍未见一个民兵，或警察之类的人走进医院“维持秩序”。直到我的母亲走下楼来，劝我回屋去时，我才慢慢离开那里，院子里围观的人才渐渐散去。

我被母亲劝进她的“新屋”，但气还没有消，当即我就主张把母亲的东西搬回她原来住的那间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闹大一点，最好闹到市卫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亲为

落实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当要求通通捅出来，看看这区委和区卫生局该如何处理？看看这蔡家医院仗势欺人的作风该助长呢，还是该遏制？

但是，善良胆小的母亲却依然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她说“忍着吧，不就是为了一间房子吗，退后一步自然宽，能住下就算了，我们总会看到这些人遭报应的时候。”

在母亲看来，这天下是共产党的，那里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母亲这种忍让使医院的人，在她生前继续欺侮她，以后几次加工资升级都尽量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连一个养老终生的窝都没有!!

中国人的“忍”可谓一种传统美德，劝告的人编了忍字的歌诀，写成警语字幅，张贴在家家户户门口的墙上，我向来认为这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用委曲来求眼前的平安，则终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场合，是反对专制主义在策略上的一种需要，但无原则的忍，就变成向统治者的妥协。

相安勿燥，有时恰恰是中国专制主义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华民族，受发达国家民主思潮的冲击已快两百年历史，然而专制主义政体还在中国大陆上岿然不动，其原因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扎根于被压迫民众所积沃“忍”的土里太深。

毛泽东统治二十八年间，中国人民屈从冤狱和惨无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来；在独裁者制造的遍地饿殍中，宁可忍受啃树皮草根，茹毛饮血的生活，不敢奋起反抗，还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传下“忍”的遗训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样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对中共的奴役，在语言上表达愤怒外，也只能适可而止，今天我除了还是忍气吞声与母亲挤着，“团聚”在口袋屋里外，还能搬石头打天么？

我不幸的眼看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忍受特权阶层剥削，眼看他们贪污，荒淫无耻，穷凶极恶骑在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忍受着道德沦丧所造成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眼看贿赂猖狂，盗贼丛生，赌、毒、嫖的毒害而无所作为。

中国的专制狂和中国人的忍让，相辅相成危害着这个古老民族。

忍者诚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烦，却因此牺牲了公理，牺牲了老百姓保护自己的人权护身符。

忍者助长了掌权者的猖狂，不忍者会因奋起反抗而遭到独裁者的屠杀，所以才会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传世名言。

现在我悟出了横扫四旧的毛泽东，把忠孝仁义批得体无完肤，却对这“忍”的名句格言却没触及的原因。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各家把炉子一起提到那仅一公尺宽的走廊里逞威，顿时浓烟夹着

令人窒息的煤气，便会从各家的门缝里窜进屋去。因为没有出气的窗口而留在屋里弥漫盘旋，常常呛得母亲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着被迫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生子。

倒是与我们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亲的忍，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两家人共享的厨房，基本上被她的锅、盆、碗占据，她的丈夫用供销社的车，成天来往于蔡家镇所辖的基层政府之间。物资局仓库，农机站及至武装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间屋子里几乎天天宾朋满坐，热闹非凡。

晚上九点一过，楼下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后，不一会，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后，上楼后便挤进那屋子里，少不了两件事：搓麻将，喝酒。那三平米的厨房顿时烟火滚滚，在油烟夹煤气之中，一盘盘的炒菜端进那小屋去，顿时猜拳行令之声响震整个医院大楼。

吃饱喝足后，便在香烟燎绕之中，铺开了麻将桌，希里划拉的总要闹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亲被闹得无法睡觉，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药。

第二天起身打开房门，本想买一点豆浆之类的早点，可那走廓里，却满地堆了空酒瓶和没洗的油锅，菜盘以及鱼、鸭、鸡的骨头。

至于厨房更是堆得连脚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别想进厨房。小心翼翼的把这些杯盘端开一个刚刚插得下脚的小空间，走进去，将自己的小煤油炉好不容易从厨房的角落里清出来，躲进自己那口袋屋里，放在那个没有丢掉的小方桌上，点燃了火，重新过着在二楼病房里自炊自食的独居生活。

那厨房已被她完全霸占，母亲组建一个小家的美梦，终于破灭了。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我的身体很虚弱，稍不经意咳嗽感冒是经常的事。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后，我摸索出规律的生活习惯，因为那里树木茂盛，空气特别好，每天清早六点钟按时起床，接着便围着操场，坚持两千米的长跑。

晚上保持着一个独自静静思考和回忆的习惯。准备着写出我一生的经历，用事实抨击黑暗统治。我和母亲在落实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在客观上起着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上实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泽东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尸扬灰遭到拒绝。对中共欺压我们的种种霸道，只好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这种远离闹市的偏僻环境，给我提供了回忆和思考往事的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忍的空间，我开始实现早已定下的计划，写了许多回忆片断，为我今后长篇记实的撰写，作了准备。

第六节 我的初恋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后，婚姻便成了我个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结婚首先要恋爱。在封建时代，那时中国人在男女授受不亲和旧礼教的束缚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来决定。看孔雀东南飞，梁山泊与祝英台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戏中悲剧人物往往触动我。

不过，导演我的悲剧，正是当年抨击封建制度的中国共产党。

大学里那段因反右斗争酿成的冤魂恋，成了我刚刚踏上人生的一场噩梦，我知道当年演出这种悲剧的人远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杀，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着走上不归路。

但是我没有死，生命从冤狱中延续下来，婚姻和爱情也延续了下去，直到今天。由于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使我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和悲哀。

1979 年，42 岁的我回到蔡家场，冤狱好像决定我此生只能接一个老婆回家过日子。

同邹银双那场“见面散”的戏演完后，结婚对我只留下延续后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强，硬要把快死去的爱情拽回来，老天又把一段孽缘赐给了我……

中共统治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为巩固它的统治，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人为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上都比城市的贫民更苦，城里的一个职工再穷，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块钱的工资，就是没有工作，吃粮按居民供应也有“保障”。

农民起早摸黑，还得自己挣口粮，常年劳累不得温饱，形成中国社会的最穷困的阶层。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统治者，关押不服从其统治的“五类”份子“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把相当一批人下放农村，作运动的惩罚，独裁统治有意制造并扩大了城乡差距。

恶毒的是，为了防止饥寒交迫的农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权机关加强了户口管理，一旦发现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劳教，其生活条件的恶劣甚至比劳改更差。

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这种人为差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公开等级，农村人要落户城市，除了严格的审批还要交高额的户口费。

农村女孩子为了摆脱又累又苦的农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剧层出不穷。这样的家庭没有爱情基础，说穿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买卖婚姻，是中共制造的社会不公平产物。

1980 年我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每月 150 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贫困的农村中，我和母亲算是蔡家地区的“富人”。

加上当年国营单位的职工老来退休后，直系的后代有顶替父母岗位的规定，我的母亲眼看就要退休，谁能成为她的儿媳，便有可能获得进这家医院工作的机会。所以我的条件，对蔡家场的贫民和农村女姓，是有诱惑力的。

当时向我母亲提亲的人并不少，只是她们中属于街道居民的，都是伤偶或离异的二婚嫂，而且都带有孩子，在计划生育年代，要和她们再生一个孩子是不可能的。

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要么在外地已经有了男友，要么是十八岁以下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少女，到了法定结婚年龄难说不会变卦，更主要的是，这种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的婚姻，无异于买卖婚姻而暗藏悲剧。

在我的心目中，未来的伴侣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同时应当不妨碍我的写作，所以对伴侣的选择有了要求，可是冤狱注定我今后建立的家，会出现许多不幸。

（一）“片断”的第二个读者

我写完第一本“片断”时，第一个读者就是我的母亲，她在读完后，老泪纵横，并在篇末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话：“看了我的孩子这本用血和泪写成的片断，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页一页再现其间，我的心也随之振动”。

这期间范小妹已经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仍留读二十四中，因为她已经长大，不便再寄居母亲那里，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远，只能寄宿学校，晚上上自习时，她常到我的宿舍里补习功课，久而久之她对我晚上的写作引起了关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问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还在写东西，看你写东西的样子，好像什么都忘了，心里也很伤心的样子，有时边写边流泪，你在写什么呀？能给我看一下吗？”

小妹在我母亲身边生活多年，对母亲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农家，对农民的处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使她萌生了对现实的反感。虽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领域尤如一张白纸。

我想我写的片断，会有助于年仅十六岁带着探索来认识社会的她，所以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诉她，我写的“片断”是中共绝对忌讳的，所以我暂时还没有拿给任何外人看，请她看后不要向任何人张扬。

她便在我的办公桌上翻开了这些“片断”，她是继我母亲的第二名读者。读着读着很快她由好奇变得严肃，渐渐双眉紧锁，看得出她的内心已进入我所描述的境界。两小时过去了，我已将第二天的课备好，她仍在专心读着并不愿释手。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说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从梦境里初醒，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断里的情节。

好一会，她才抬起头来，眼里绽出一阵很奇特的光，是一种极为柔和的光，我曾接触过这样的眼光，低下头，轻轻地说道：“你写得真好，像诗，像歌！我差一点都要哭了！”说时，她又抬起头来，这一次那眼里分明噙着晶莹的泪。

我情不自禁伸出双手，轻轻地楼着她那札着小辨的头，一面掏出手绢，为她擦去已经夺眶而出的泪，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暖流在窜动，她把头靠在我的手臂上，静静的听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后，她见到我总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偶尔两人的眼睛在课堂上碰到一起，她总会低下头去。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时到我的宿舍里告诉我说，“姐姐病了，请你向他们的班主任请一个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没有课，吃过午饭，便专程去了她家。

从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个多小时，穿过正街和通向广场的一段机耕道，途中全是田间阡陌小路。今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同母亲一起到过她家，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单独去她家。时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节。

绕过她家门口那池塘，见围墙上的小门半掩着，走近小门，我在那门上扣了两下，里面并没有人应，于是便轻轻推开门，走过猪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里堆满了晒干的包谷杆，我向通向里院的小门望去，院子里堆满了包谷棒，胡妈正在忙碌着。

再向里屋望去，里面一共三间卧室。最里面的一间，放着一张古式的大木床和粮食的围囤。靠着外面的两间小屋，各放着一张小床，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极陈旧的木柜，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没有粉刷的泥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已剥落下来吊在那里。范小妹正面墙而卧，我进屋时她并没察觉。

抬头望去，春节时吊在屋梁上的熏腊肉已经没有了，这比我在盐源时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里去，看来，胡妈辛勤一生将五个儿女拉扯大，却落得一贫如洗，这便是当年中国普遍的农家。

我的单独作客，是胡妈没有料到的，见了我，比春节那一次还要热情，连忙招呼我坐下，并马上走进里屋，取出一只装着白糖的瓶子，给我泡了一碗糖开水。当时，白糖“凭票”供应，农村里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贵，糖开水是农家用来招待贵客的“饮料”。

小妹被母亲的动作和人声所惊醒，翻过身来已查觉到是我来了，便坐起身来。我走进了她的房间，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额头，果然很烫，便从衣兜里取出带来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亲正忙着烧火弄饭，说一定要我吃了饭再回学校。

屋里只留下了我们俩，看她脸色青黄，头发逢松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时睁大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朴质的羞涩。我轻声地问道：“头疼吗？”她点了点头，问道：“哥，你这么忙还过来……”

我端着那盛糖开水的碗，拿着感冒药，递给她叫她吞下。因为穷，乡里的人偶感风寒，极少找医生开药，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了。

吞下药片，我便教她躺下，给她盖好被子，轻声说道“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发身汗，就会好的”。她顺从地躺下，两只大眼睛却盯着我，好像有一种难以启口的话从那眼里向我传递。

不知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还是人们称作的“情”在作用，我弯下腰，亲了亲她那发烫的额头，那一瞬间就像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身上流进了她的体内。

她紧闭着眼睛，体验着那种感觉。

为了让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间，去帮胡妈弄晚饭去了。

吃过晚饭，已下午六点钟，我便起身告辞。临行前嘱咐胡妈："发烧病人胃口不好，熬点粥给她吃，我拿来的药一定要按时服下"。说完，便站起身来，向里屋望了望，没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见我要走，便走出屋来一定要送我，说："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带你走上面那堰沟铺的石板路。"

见她已不像刚才我来时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显然是刚才吞下的药力发挥了作用。床前已换下了一大堆衣服，必竟年轻，出了汗，烧也就退了。她一边说，一边梳扎逢乱的头发，重新扎好了小辨。

"不行，你还在发烧，就是烧刚退也不能敞风，否则病情要反复发作的！"我反对道。然而她却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额头上，我感到那带着汗迹的额头确实已经凉下来了。

她固执的说："我在床上已经躺了一整天了，现在全身的骨头节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动一下身体。"见她执意要送我，我推迟不过，便嘱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妈拿出了一件夹衣给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门，天色已经暗下去，但没有风，于是她走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一前一后的出了木门，转过一个弯，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铺成的堰沟小道。

走出不远，小道伸进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进密林中，我们俩便被包围在绿色的竹林中。夏未的黄昏，竹林里蒸发出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是我俩第一次在野外单独相处，好像进入了一个只有我俩的二人世界。

我听得见走在前面，仅一步之隔她那心脏里发出的跳动声。

我忽然觉得，如果此时，她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会立刻将她紧紧地拥抱在我的怀里，那种我原先以为永远都不会再属于我的爱情，突然奇迹般的降临给了我。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离，我们双方都在用理智约束着自己，因为她太年轻了，一个高中学生，年仅十六岁。而我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师和义兄，中国古老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强烈的制约作用，我们都应当自重……

我俩穿出竹林走出堰沟，前面便是蔡家广场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还来不及向她叮咛，"等病好了以后，再来上学"。她便已经站在沟上，向我挥了挥手，扭过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笼罩的竹林中了……

不过，感情像一头脱缰的小马驹，冲击着理性的约束，带着与范小妹初恋的感情，我向母亲表示过，我要娶她为妻，但是受到了母亲的反对。

（二）逆缘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职员工中，与母亲有过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语组的

王基敏老师和已经退休的郑修老师，与母亲交往最密，虽然处在两个单位，但处在同一蔡家地区。

过去，“公社”开批斗会便将她们聚在一起游街，批斗，加上两位老师常到医院看病，亲眼见到医院职工对母亲的欺侮，同病相怜，结下了患难之情。我到二十四中后，她俩又是我的邻居，除了常常给我烧开水、弄饭，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还常向我介绍，当年蔡家场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两位老师最关心我的便是婚姻，她俩比谁都替我的婚姻着急，主张找一个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师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对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师名叫徐乐生的，正为他的表姐寻找对象。他的表姐叫刘启建，在蔡家地区的卫东中学任语文教员，年龄比我小七岁，已经离异，但无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区的中学教师在二十四集中学习，王基敏和徐乐生便商议，将这位刘老师介绍给我，在那次活动结束的当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刘启建就在徐乐生的房间第一次相见。

她中等个子，五官也还端正，据说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发生的辛酸经历，受过“劳教”，并与前夫离异。

第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与人交谈有意无意流露一种不顺眼东西，讲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爱翻白眼，两手还在空中舞动，以帮助她表现出某种“造反”的意态，那挥手说话间，不时叉腰的动作，像从当年的红司令那里学来的。

这种动作，大大伤害了她那女姓应有的风韵。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杀害，我对文革的狂热深感痛恨，从她身上折射的那种阴影，除让我反感还凭添了一层防范的隔膜。我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把她拒之门外了，我完全没有与对方恋爱的初衷。

所以，当王基敏问起我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我只是笑了笑，把这个初次相见的印像埋在心里，并没有说出口。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处来取一些语文教参书，王、郑两位热心的老大姐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当起义务红娘。把我们单独地关在她表弟的房间里，我们两作了第一次交谈，我们不仅各自介绍了自己的“遭遇”，还介绍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亲刘学理，年轻时就读于国民党成都军校。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川东峡防局行政长官卢作孚，曾聘他担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长兼城防长官。1949 年 9 月中共军队占领重庆，身居北碚区城防长官的刘学理开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刘学理也成了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

不过未到五年，这些本想侥幸自保的人们，一个个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房屋被没收，家被洗劫，刘学理被划为反革命份子，受到三年的监督劳动管制，沦为无产阶级政权下一

个赤贫的黑五类。

刘学理五个子女中，刘启建是老三，自从父亲被管制，她才七岁就要带弟妹。稍大一点，便在垃圾堆里拣二煤炭，拾破烂，没少受邻人和同学们的歧视，但她却因天性的软弱，从不敢对加给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使她没能考上大学，但却幸运的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她二十四岁时，被西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姓王的讲师看中，虽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几岁，并抛弃了他的前妻。结婚使她得到一种新的虚荣，做大学讲师又是党员的妻子，使她感到社会地位膨胀了。

据她自已讲，为了装扮自己体面的家，她不顾工薪条件，追求高档的家俱和摆设，宁可负债，向她的学生家长借钱，向兄弟姊妹借钱。

借的钱越来越多，背上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为了躲债，她不得不欺骗上门讨债的债主，学会了向债主施以小利来减缓债务压力，并趁文革期间，学校财务的无政府状态，将学生交来的学费挪用还债。

于是债主的公愤和无产阶级高压的专政，毫不手软的将“诈骗”和“贪污”的双重罪名，扣在她头上，就因为大约几千元的债务和几千元的挪用，她被关进了西山坪劳动教养营，由当时北碚军管会处以三年的劳动教养。

而那位王姓讲师，在判处她劳动教养的宣判大会上，向法院起诉离婚。结果姓王的讲师抛弃了她。

三年劳教期满，她回到老父亲的身边，在她再三恳求下，教育局把她发配到离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这所学校，“继续”当她的老师，那可是一所无人愿意去的学校。

我们谈完，已是七点钟了，吃过晚饭后，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轮上弦月已悬在半空中。她执意要回卫东中学，说明天还要上课。郑修并不劝阻，只是建议我一定要护送她，王基敏叮咛道，“灯塔那一带地势荒凉，文革期间公路上夜间行劫抢人的事累有发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学校去”。

经过一下午的交谈，我对她还没有任何好感，我们虽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对于中共的专制政权，她的认识却与我完全不同，由于相似命运而产生的同情，并没有让我对她发生爱怜。但耽误到这么晚，也是为了我，我总不能眼巴巴看着她一个人摸黑冒险去走那山路。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蔡家场，沿着通向灯塔的马路上走去，两旁齐人高的包谷林里黑笋笋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边预先埋伏的不速之客，会突然从那里蹿出来，用刀和棍棒比着我俩，心便仆通仆通地跳了起来，彼此都紧张的窥测着茂密的包谷林并不说话。

我紧握着一根打狗棒，走到灯塔乡的十字路口看看手表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月亮已经开始偏西，光线渐渐暗下来。

当我们走上到卫东中学那段山坡小道时，突然一只山耗子，从路边的草丛蹿出，从我脚下窜过，惊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摇晃起来，好像要跌进田里，两手一张便拽住了我的手，为了替她壮胆，我也就紧拉着她的手，走过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牵手，是我划成右派后整整二十四年来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当时处在紧张之中，我却什也没有感觉出来，只觉得背上泛出一阵阵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预先准备好的电筒，依靠它，边用棍子驱赶着藏在草丛中的毒蛇。最后总算到达了沉沉静睡的学校大门。

校门口的两条狗向我们狂叫起来，狗的吠叫惊醒了守校的工人，当木门打开时，我们总算舒了一口气，将她送到了校门内已完成了我的任务。

于是我转身告辞，然而她却坚决不允。来开门的校工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女工，两个人一齐劝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为太晚了，周围荒山野地，即使没有盗贼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说此去蔡家十里路，少说也要走两三小时，何必冒此危险走夜路。在两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变回返的主意，跨进了校门。

这里地处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条件还要差，这就是给曾劳教过的刘启建一个安置！比那供销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总算还有一口饭吃。若不是现在“教师”奇缺，在这种谁都不愿来的边远学校急需补充，恐怕她连这么一口饭都没得吃的。

在入过另册，从地上爬起来的“五类”中，刘启建算幸运的。

学校很小，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两米高的围墙围着一群泥木结构的瓦房，院中两棵大黄桷树，显得非常的清静。

她忙着把我请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里收拾得挺干净，在一张桌子上阵列着一个煤油炉，满桌堆着蛋、米、酱油、和盐糖之类的东西，她在同那位开门的工友商量一阵后，走进寝室，点燃了煤油炉，安上了锅，倒了许多油。

我说别去弄了，天已经这么晚了何况我也不饿，但是她并不听我的，一面说：“在王老师那里，我根本就没吃，她弄的那菜连油都不放怎么吃？”听到她的话，一时答不上话来，只好默默的看着她弄“饭”，只见她在碗里，打了整整八个鸡蛋，然后往已经烧烫的油锅里倒。

八个鸡蛋，我还真没看到过这种吃法，那年月虽已经什么都能买到，鸡蛋也并不算贵，但必竟还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个油煎荷包蛋也够出手大方的。

没出十分钟，两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着四个黄澄澄的荷包蛋，将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时我一点都没胃口，又不好推迟！于是顺手拿起一个小碗，夹过一个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这女人不像一个受过苦的人。

吃过面条已是下晚两点半钟，距天亮充其量还有三个小时，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门的校工那里住了。

当我钻进那白纱纹帐里，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向我扑鼻，好像乡巴佬初进了大家闺秀的闺阁，迷迷糊糊地一点都没有睡着。

脑子有些紊乱，好像缺乏条理。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初识的女人半夜结伴同行，并且寄宿在她的床上，这肯定因为东方人的习惯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别说这种没有爱上对方的情况，就是已经热恋而没有结婚，也不允许发生这种性突破，脑子里很奇怪，自问是不是这就是大陆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对她那种洒脱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还没有确定任何关系，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点钟，天已拂晓，我忙着起身，一夜几乎没睡，头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马上赶回蔡家场，在母亲那里睡上一天。

刘启建已经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热情，忙着给我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并忙着去煮豆浆，不过事前已说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点钟，还是独自走出校门，临别时她一再叮咛我，下周星期六再到卫东中学来相聚。

当我匆匆忙忙急步赶回蔡家医院时，已是上午九点钟了。平时按照惯例，周末我都是回母亲那儿住的，昨晚一夜没归，自然引起她的追问，我便把昨晚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母亲很不以为然的说道："没见过这种女孩子，初次见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连忙解释，那确是因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独自回来确实不安全。她只是嘱咐道，下个星期天千万不要再去了！我点头答应了母亲。说心里话，刘启建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位置，当时我心理真爱着小范。

自古以来被活活折散的情侣，总是归于"无缘"。一声天意难违的悲叹，也不知结束过多少恩爱情人的生命，其实认真思索每一个悲剧的后面，必有一双导演悲剧的黑手。

"梁山泊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这些名戏也不知赚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泪，然而并不因一曲梁祝，随蝴蝶翩舞，使现实中新的梁祝不再发生。

尽管"朱丽叶与罗密欧"以愤怒的控诉，痛斥中世纪贵族们带给人们世仇的灾难。贵族们用相互拼杀，来继续世仇，甚至酋长的亲生儿女，也不能不为种族仇隙双双殉情。

而我们这个社会，残酷的"阶级斗争"，与中世纪专制的野蛮相仿，难道反右运动残酷地粉碎了我和马开先的初恋，同中世纪的故事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当年因为阶级出身而被强行拆散的恋人还少么？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难道不是这场残酷阶级斗争悲剧的延伸么？偏偏老天在将一个圣洁少女赐给我时，当我们真心相爱，却受到市俗的阻挠。于是我爱情的第二幕悲剧，便毫不留情的降临给我。

后来在好心的王基敏，郑修以及其它老师的撮合下，我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屈服于市俗压力，狠心地割舍了同小妹的初恋，身不由己的带着伤感，同意和刘启建结婚。

毛泽东时代，这种悲剧太多，两个受害者，因缺乏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蒙里蒙懂建起的家，充满吵架，这样的不幸岂止我一人。

残酷的事实证明，两个不相爱的人结成的家，不仅双方是痛苦的，最后必然破裂，我的晚年注定了鳏居，而受害最大的莫过于孩子…….

结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几个菜，请了热心我们这婚事的王老师和郑修，买了一些糖果，吃饭以后去蔡家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就这样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悄悄的我们就在母亲那间小屋子里渡过了新婚的第一夜。

后来刘启建逢人便说，我和妈妈太吝惜，一千块钱就打发了一椿婚事，想起来确实寒酸。我和母亲平反后，靠自己这点工资白手起家已经不容易，再说，我对这场婚事充满了无耐。

范小妹我几乎没有和她往来，今天突然听到我结婚的事，一定心里很痛苦，而她的倩影、笑声却萦绕在我的耳际。

果然，结婚还没有一个星期，我们就为在那里住，发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见，我们三人都应当住在蔡家医院，我不可能因结婚而抛下母亲不管。平时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单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个人往那里聚？

三人住在一间口袋屋中，安上两张床，且不说挤，没有活动空间，拉屎拉尿怎么说都极不方便。何况，婆媳同住一屋，本来就有悖于中国民间规矩！

三个人既不愿挤在一间屋里，刘启建重新恢复了她的习惯：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亲团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样，星期六便回蔡家医院与母亲团聚。

分居成了我同刘启建“蜜月”期的奇怪现象，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就出现破裂的危机。这难道不是这小小医院党支部的坏心眼造成的么？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结出的苦果么？

第四章 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1982 年春天，母亲正为“落实政策”而心烦时，接到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信，孙起孟告知妈妈，她的来信已转给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请他们协助解决母亲落实政策的善后事宜。

第一节 刘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医院的门卫突然来说：“方老师，楼下有一个姓刘的来找你，他坐的是一辆面包车，看样子好像是市里的干部。”

母亲跟着走下楼去，来人大约六十多岁，身着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此时正站在大门边上，面部极为和善。

母亲打量着他，在脑子里竭力思索着，对面前站着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过去，一面询问道：“您找我吗，请问有什么事吗？”那人立即谦和的向母亲自我介绍说：“啊，我姓刘，在农业局工作，请问您就是方老师吗”？母亲诧异地点了点头。

此时那停放在大门石阶下那辆面包车司机，从车里伸出头来，高声的喊道：“这是我们的刘局长！”母亲终于恍然大悟，连忙说道：“啊！刘局长，刘老先生，刘昆水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了，北京的孙老师给我来信中介绍您的，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请吧，请楼上坐！”

对方回应道：“唔，不敢当的，我今天是因为到北碚农业局检查工作，顺路来看看您的，孙老师嘱咐过我了，要我尽可能地照应您。”他一面上楼，一面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站在楼梯口迎视着他。回重庆以来，这是我见到第一位市里的局长。那外表似乎在那里见到过，或是在什么小说里读到过的，但我却说不上来。

上得二楼，面对本已很狭的过道两旁，杂乱地堆着破纸箱，烂木头和煤炭，他皱起眉头好像在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当走进母亲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丝眼镜，迷逢着眼睛，露出一种走进贫民窟洞的那种酸涩感，小心翼翼跨进了门，屋里的浊气，使他下意识地捂着嘴巴。

走到紧紧关着的窗子下面，重新戴上了眼镜，试图去打开那窗户。正好，许小龙的母亲从那窗前走过，使他缩回了伸出的手。

接着他又回过身，反复扫视着这间被两张床铺占去，只剩下一条过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亲并没有介意来人在观察什么，热情的张罗着请客人坐在床铺上，然后从厨房里端出刚刚泡好的花茶，向蔡家场十字路口他递了过去。那刘局长忙站起身来，谦恭地接过茶杯答道：“唔，别客气了，方老师，孙老师接连给我来了两封信，托我关照您的，我也因为工作忙没能抽出身来。”他第二次重复了来意。

接着问："最近医院工资改革了吧，他们给你加了几级？"眼里露出一种关怀的眼光。

"唔，工资吗，按调资文件规定，像我这种二十年从没有升过一级的人，应当在本次连升三级，但是医院调资小组的人说，我的工资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说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动员我自动的拿出一级来，照顾那些业务上的骨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最后上报时，我只升了两级。"母亲回答他。

刘局长听到这里，不停地皱着眉头，中国人怕硬欺弱已是风气，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处都一样，今天他已看到这个医院不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资上对母亲的欺侮，他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平时母亲是怎么忍受周围人对她崎视的。

"孙先生要我能帮助你，调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环境。"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民建虽说是民主党派之一，却连调动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已就此向区统战部联系了好几次，他们说眼下没有好的去处。"

"我看这样吧，民建重庆市委已报教育部核准，准备在今年暑假后办一所财经学校，中国要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这所学校里增设一个以培养幼儿师资为目标的专业，由你出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怎么样？"

刘局长的坦白和开门见山，显示了他对民建全国主要领导人孙起孟尽责尽心了。母亲的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离开这野蛮无理，欺侮她，伤害她的蔡家医院，总算盼到了。

这不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卫生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名正言顺解决的，而是由中共的一个小"伙计"以私人交情的办法解决。中共对如此不光彩的解决，连看都不屑一看。不过对于母亲来说，问题总算解决了。母亲早在抗战时就创办过中学，一个教育部门的老前辈，被中共践踏成这样！现在他仗着民主建国会帮助，才逃出眼前这人间地狱！

"这样吧，你尽快地办理退修手续，争取暑假就到工商联来准备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财经学校发挥晚年的余热吧！"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告辞道："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能再多给你说什么了，好在今后来日方长，到重庆以后慢慢地说吧。"

我看着两位老人缓缓下楼的身影，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面包车上，热烈地握手道别后，还站在那里目送那车消失在场口转弯处。

我心里一面替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狱，也替母亲担忧，她已经六十五岁了，要单独地在市中区独自开辟一个天地，她能胜任吗？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这种落实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来明正言顺加以解决？而是想出在一个与幼儿教育毫不相干的财经学校，办一个师资培养班的办法来解决？

六月份暑假到来，母亲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办理了一切手续，打点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装成了两个大包，在我亲自陪送下离开了蔡家医院。当我们顾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

轮车，离开医院大门时，除几个与母亲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护士外，没有人知道母亲上哪儿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场口的汽车站向三溪口行去，母亲连头也没有回。

从 1961 年，她被强行在这所医院接受“监督劳动”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视，在她身上沉淀的伤痕怎么也无法消褪。

我们到达市区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工商联接待室里走出了四个中年人，将母亲的行李接到一个欧式三合院里，母亲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楼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为母亲搬行李，介绍工商联的情况。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联的伙食团长，刘局长特别吩咐他对母亲的生活起居进行关照，今后有什么事只需喊一声小李就行了。

母亲从这位小伙子的朴实语言和憨厚的态度中，感到在蔡家医院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亲切。

今天对年过六十五的母亲，有一种背境离乡的伤感，但很快被周围和睦的人际关系所冲淡。从今以后，也许有一段较为舒心的生活，记载在她夕阳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节 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又为建立统治秩序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和劳动条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里一个职工再穷，每月好歹有几十元工资，吃粮按城市居民供应也有保障。农民起早摸黑，常年劳累不得温饱，成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阶层。

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为毛泽东关押，奴役“五类份子”的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把被整的人“下放农村”以示惩戒。

文革以后，到 1988 年十年光景，从二十四中学校毕业的高中学生，累计三千多人，考上大学仅只有十余人，在 1982 年到 1985 年连续四年中竟没有一个升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混了几年以后回到农村去，只消一两年便把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并变成农民。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2 年，范小妹在这所学校里“混毕业”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学中最勤奋的一个。

但是无论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亲寄多大希望，我对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级的两百多学生一样，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孙山，她只好回到莲花大队的家，同她所有同学一样，接受回家当农民的命运。

随着毕业，原先的理想变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里又怎么解决生活的压力？她偷偷地哭过，我明白，她那白纸般的心灵难以渡过面临的历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条充满文革留下来的欺骗、抢劫、危机四伏的路。摆在她道路上的荆棘是她难以预料的，也是她的父母

和我难以预计的

她的母亲和范大伯商量后，决定让她高中毕业，到德阳九五汽车厂去学一门手艺。范大伯是该厂的退休职工，按照“政策规定”就业人员没有让子女“顶班”的条件，这又是一种偏见和岐视。

她将离开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学校来，恳求我让她带走我写完的两本片断。我体会得出，那片断带在她的身边，就意味着我在她的身边，她说片断上所有的句子，都会在远行的途中，响在她的耳际。

就这样，她像一个在大松树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怀着惴惴不安踏上了远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点钟，天还麻麻亮，在牛奶场的大门口，她的母亲提着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场去火车站送奶的卡车，当她俯身在车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书包时，我看见她的眼圈红肿，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珠，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卡车缓缓地开动起来，她站在车尾，一再招手，一边抹泪，一直到消逝在转弯处的茫茫晨雾之中。

一周以后，也就是 6 月 7 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写道：“平哥你好，现在，我独自一人到了德阳，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昏目眩，想到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就痛，我没考上学校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现在，我真有点后悔，想到我还是不该离开你们，我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

第一封信的到来，使我陷入了一连串迷惑之中，她为什么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为什么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难道这些话隐含着一种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没有落下地址，读这封信越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儿呢？

七月中旬学校刚放假，母亲和我、刘启建便坐火车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车到德阳并在黄许车站下车。

德阳九五汽车厂前身，是重庆新建劳动工厂一部份，迁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宝成铁路旁，同盐源农牧场一样，就业队是就地满刑的“劳改释放犯”充实的，就业人员一方面继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这儿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骗子、杀人越货的强盗和妓女。管理它的监狱管教，多半是货真价实的无赖和恶棍。

它的东边靠着黄许车站，川西平原的灵气，使这里风景宜人，然而同大陆美丽的土地一样，秀丽的山水掩盖不了这片土地的罪恶。到了九五厂，我们很快见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亲，听她的哭诉，短短两个月的经历，在她稚嫩的心灵上扎下了无数的毒刺。

出来几个月一无所获的回去，撞荡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灭，还要重新回到那破屋里听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准备着像母亲那样，在分给她的土地上劳碌一生，留在黄诉镇上吧，又怎么能应付周围人群无休止的骚扰？

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无数同她一样的农村少女，在向城市游离的过程中经历幻想破灭，痛苦徘徊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她们经过生活的摔打，因处在弱势，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和良知。一些人变成了城市的妓女，贩毒的牺牲者，诈骗新的参入者。

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市井故事。虽然他们都知道，毁灭别人的人自己必将被毁灭的道理，然而他们在毁灭别人的同时，并不愿接受自己也被毁灭的严酷现实。

不过，范萍就幸运多了，我告诉她，目前地处农村的学校严重缺少师资，估计十几年内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就在蔡家的几所边远学校都在请代课老师，工资虽不高，但也够一个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钻研，肯吃苦，走上讲台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她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愿为她提供铺导。

建议她暂时到边远的学校代课，再看今后的情况来寻觅新的就业机会，总比在社会上瞎撞强多了。经过我这么建议，她决定跟着我们回蔡家场去。

从成都返回重庆，在母亲那里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将她送回她母亲身边，母女相逢酸辣苦涩自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这一段初闯社会的经历给她多深影响，她虽没说，但从以后她一直避讳提起这段遭遇知道，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消弥的伤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场后她安下心来，听从我的意见，就在附近的中小学代课，虽然代课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够她个人糊口了。

第三节 峨眉游

当我们从黄许坐上回归成都的火车时，三天来在这里碰到的种种不愉快终于结束，解救范小妹的成功，虽可以告慰我，但她回到重庆是逃出了一个罪恶深渊，还是失去了一个求职的机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等今后下结论。

我们在回归重庆之前，按照原订计划，便是游览川西坝子的名刹古寺。

记得我们在抗州居住的三年里，随父母游于西湖，我特别喜欢天竺、灵荫两座宝寺。现在还能想起每当我走进那林荫覆盖的寺前小路，就被随风吹来的香烟和隐约的颂经声所吸引，仿佛已进入了一个神灵居住的仙境。

走进大雄宝殿，一股天地灵气会使我肃然起敬，不由自主双膝便跪在那高大威严的如来尊者脚下，清理自己浮燥妄动的心。次数多了，灵荫寺的老主持便认识了我们。

有一次，他抚摸着我的头，对母亲说，“阿弥陀佛，这小施主人面善，我观他与佛有缘，他有善根哪！好自尊重吧。需知，从善者得善，无缘者舍之，全凭自己的造化了！”当时我睁大了眼睛，揣摸他话中的意思。

外婆是常年吃素的，在她开导下，我常用零花钱去周济沿街行乞的残废人。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回想在狱中逃过几次杀身大劫，便以为是佛的救助。我自悟此生苦

不堪言，归结于种有恶因。所以在我的内心恶念有一念之差，干过蠢事后，都必在事后加以忏悔。友人劝我在大难后，看破红尘，从此遁入空门，求得解脱。

只因畏惧修行之孤单，于是虽有从佛的意愿，却仍徘徊空门之外。不过我是报应论的信徒，所以我在佛祖面前坦露心扉不敢隐瞒，抱定万事随缘的意念。

游历名胜，阅览中华千古文化仍国人之共同心愿，总想亲身体验暴政对我中华文明之破坏。所以在菲薄工资中省积了两年，以供旅行路资和生活所需。

同行四人中，各怀着不同的心情难以叙说。母亲抱定求孙的宗旨最是虔诚，刘启建心里在想什么她没有吭声，范小妹在经历了这场历时两个月，初逢社会的惊吓正在反思，所以很少说话。四个人复杂矛盾心理作用下，使这次旅游带着说不清的味道。

乘车从成都出发，抵灌县后，中午时分，我们在县城一家小饭馆里吃过午饭，便徒步从灌县城向青城山攀登。

时值盛暑，我们沿着石板路，一阶一阶向上走去。幽静的小道两旁浓密的林荫之中，蝉声缠绵，像唱不完的迎宾曲，起劲为游人鼓劲。到了长生宫，参天的大树已将酷暑挡在幽径的外面，气候十分凉爽。

三十年来母亲是第一次出远门，必竟年纪大了，能够徒步十里已很不容易。怀着新鲜感，她一路上询问所到处的小地名，以及这些地名的由来，说明她对美好生活仍怀着渴望的激情。

将到天师洞，那盖定集仙桥的浓荫，使古道特别幽暗起来，空气变得压抑，彷佛许多的精灵聚集在桥洞中，把世间的仇杀、冤恨，统统挤到桥的入端处，我相信有意上得此山求清静的香客们，会从这里找到新的灵感来。

如果有在政坛上咤叱过风云的政客，或在战场上显过战功的老将，双手沾着他人鲜血的人，一定会在桥下的淙淙流水中，洗净身上的血污。

人生骄傲和失意者，当回忆自己一生所造下的孽债，在此领悟万事皆虚仰天长叹之余，所剩下的只有在玄虚的妙境之中，生出悔恨二字来。

我看见那些长跪在天师灵麾下的，不但有善男善女们，还有面带凶相，似有过嗜血经历的顽凶。那凶恶的毒魈，口吐毒雾在用权欲，财欲迷窍着人的良知时，将丑恶不断洒向他们。

当我们快进青城山的山门，在夕阳的斜照下，仰视上清宫闱的苍穹，俯身去拾掇那些刻在石碑上的经文时，我的心被古代的圣灵洗涤。在巨大的香炉面前，凝视那一缕直冲太极之颠的香烟，我的心熔解在那袅袅直上的青烟中。

天地渐暗，太虚之中，万物伏地，唯有瑟瑟作响的晚风，给人清凉的爽意，四周是那么肃穆。突然间，一记宏亮的钟声，使那些圣灵脚下山谷里，还在胡撞乱荡的恶鬼，也心惊胆战规规矩矩，伏听天尊讲那惩恶扬善的训戒。

当夜，我们就求宿在上清宫玉皇尊者的脚下。

第二天天刚拂晓，西边山脚下刚现鱼肚白，我们用过寺庙的斋食，四个人缓缓下得山来。走出数百米外，我还在一步一回首，从不同的远近再次仰看太虚之巅，一再聆听从那上清宫里传出山来的隐隐钟声。

此时我感到遗憾的是，忘记了带上笔记本，没有记下那隽刻在石碑上的碑文，但我一路还在咀嚼昨夜青城山顶元始天尊的布道。

从灌县县城出发，绕着环山路蜿蜒十余里，去二郎庙。公元前 256 年正秦始皇统一六国，举兵韩赵之际，蜀郡郡守李冰率领蜀地百姓，深沟作渠，低滩围堰，分洪成功。原来这蜀地，雨季淋淫，水患横溢；日出骄阳，千里干旱的地方，从此旱涝保收。

川西平原十三个县，从此成为天府宝地，两千多年涓涓流水不断地灌溉着这千顷良田，长年使这里的大地披着碧绿的盛装，一年四季五谷丰登。

二郎庙前蜿蜒的山路上，老百姓和游人沿路供着不绝的香火，李冰父子的塑像目光炯炯，二千年凝视着眼前这都江堰，好像在讲天经地脉，又像关照着他脚下的子孙。一路上进香的善男善女络绎不绝，他们所供奉的香火是中华民族居安思源的寄托。

他们雪亮的眼睛里有一杆称评人间善恶的公平秤，他们绝不会忘记给他们创造幸福的先人，也不会忘记给他们带来灾祸的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所造下的罪恶，他们都铭刻在心间，谨记着这历史。

九江东去，佛法西来，我们乘车南行，傍晚到了乐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来到凌云寺前那百丈巨佛的脚下。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初建于唐玄宗年代，直到唐德宗才修成，历数十年之久。

当我从大佛脚下，凝视三江口，向外望去，江水浩浩荡荡。岷江、青依江、大渡河三种颜色不同的河水汇聚在此，合成一体，清浊分明，其景甚壮。

传说当年三江在这里初汇，恶风凶悍，浊浪排空，常将航行到此的船只无端的冲去触礁，沉没江底的木船无数。

当年有真人骑兽而过，对当地的父母官说：“此水怪出没作怪所致，欲止此怪，须面三江而建一如来尊者的石雕巨像，以作镇怪宝物。”说毕，当江一指，一尊巨石，傍山而出，遂驱兽而去。

当地父老乡亲向真人焚香跪拜，便以此石为本，大规模的修凿从此而始，前后凡经九十年，大佛雕成，佛高 71 米，比世界最大的阿富汗佛还高出 11 米。建成以后，果然跑哮不安的三江汇口从此风平浪静。

如来的石像，为航行在他脚下的船夫纤者保驾护航，从此水怪再也没有肆虐过往船只。

于是，人们从悬岩绝壁上，下到石佛的脚下，沿着佛身两侧和对面的山路凿出石梯小道。最宽的地方也只能容两人上下，并沿着石梯小路，在岩壁修出数百小石洞，其中雕供着上千尊小石佛，其工精美。

唐代佛教盛兴，天子的兄弟玄奘曾出西域西游取经，吴承恩所撰西游记，将神和魔怪写成身份各异的故事。这乐山大佛成了遗留至今的盛唐古迹。

可惜那时这些小小偶像，既没被当作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以保护，却在一夜之间，被毛泽东指挥的“千钧棒”统统捣毁。为了树他的皇权竟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信仰，可以在一时兴起，而毁掉千年文化，连这些小佛像也未幸免。

我牵着母亲沿着那石梯缓缓向上登去，此时我才看到在我身边山崖上的小石像，竟找不到一处完整的，我立刻回想到在盐源的洋芋地里，相遇的冷军当年讲的革命行动中一个细节，红卫兵破四旧的疯狂，使小石佛无头缺肢，这些残骸现在依然很凄凉地立在这里，诉说当年毛泽东的恶行。

毛武断的说宗教是虚妄的，其实剥开幻想的外壳，宗教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善恶主张，还反映了他们对罪恶的一种扬弃。古时的工匠，能在悬岩绝壁上刻画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像，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千变万化。

坐落在凌云山顶的一片宽阔的石板平台上，东坡搂就立足在这里，据看守人介绍，苏东坡生前的大量诗文真迹，都珍藏在楼中的“文苑之华”里面。文革把这里当成横扫封资修的重点。东坡先生生前的手迹被洗劫焚毁，至今许多散失的文物已去向不明，东坡楼受到空前破坏。

这次亲眼看到那些已空荡荡的文苑书柜，便对过去口口声声标榜，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党棍恶吏穷凶极恶脸嘴，看得更清。

再行五里，便是乌龙寺了，据说这是乐山地区最大的佛家寺庙，当我们向它走近，就被那些隐没在密林之中的梵院寺庙，和远远传来的香烟和肃穆气氛所慑住。进入山门前的小道，进香的香客背着香袋锦囊，双手就已经合十，精神渐入佛境，络释不绝进得山门，四大金刚威严的守护着山门口，再向里是维陀护法。弥勒在大雄宝殿门口挺着大肚子，笑迎八方来客。

进入大雄宝殿，十八尊罗汉于过道两侧依次排列，其像貌迥异，佛经中对它们都有过详细的解述，这些形状怪异的尊者，维护着殿堂里的庄严和清净。千罗万幛中，那大雄宝殿的最高位置上，至高无上的阿弥陀佛威严的高倨其上。

少年时代，中共教科书，将佛教同其它宗教，一道归并于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将佛教徒，说成是一群靠鬼话来蒙骗百姓的寄生阶层。中共利用执政的权力，强迫僧侣还俗，将寺庙的田园宅地荒废了，捣毁了。使那些“泥菩萨”陷入了几十年灭顶之灾。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又怎样呢？共产党的整个统治在无神论的天地里，为所欲为，因果没有轮回，善恶没有报应，精神上失去约束的人，借口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把人性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道德说成是虚伪的。于是人类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宗教文化全被毁灭。人和人之间赤裸裸仇视外，便一无所有了！

而今人们才开始反思，开始顿悟，思想家们终于明白剥夺了别人，其实也就剥夺了自己。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宗教信仰，实在是社会道德的一种补充。既不能破坏，也无法破坏。

广大农民把这些年所受到的灾难，归之于得罪了天地众神，于是在民间，那些为防止灾祸的天地君亲师牌位重新供奉了出来，最终还是召回了曾被社会摈弃的神。相反，共产党的信仰危机却出现了。尽管中共目前仍然想用霸道的方法，让人们接受他们的那一套，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我之所以笃信因果报应，根本上因为我是一个受压迫的弱者，监狱中所受残酷的压迫启迪了我，往往我用命中注定来解释所遭的恶果，更容易解释我面临的厄运。生活树立起来的信仰是不能用唯物主义来替代的，中国大多数从毛泽东暴政下过来的人，大抵都会有这种切身的体验。

此刻我被那高大阿弥陀佛的庄严所折服，从他那身后的灵光中受到启迪，真诚地忏悔我一生中的罪过，心中杂念也收敛起来。

汽车到达峨眉山脚的报国寺已是中午时分，在那里的餐馆里用过中午饭，从报国寺乘车抵达清音阁，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清音阁底谷的泉水清凉宜人。从清音阁沿着陡峭险峻的山路通向云雾重重的金顶，一般年轻人只消一天时间。然而我却要携着老母亲一步步艰辛地向上攀登，至少也要花三倍的时间。

我们决定歇脚，在这里留宿一夜养足精力，准备第二天攀登。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同在这里过夜的游人一道，开始了第一天的登山旅程。在导游的指点下，我们这一支向着白龙洞方向前进。山间小道走起来很崎岖，但另有一种乐趣，每过一处的寺庙，不论大小，我都会虔诚的礼拜，让缭绕的香烟把我包围。

到达洗象池，金顶距我们已经不远。天色已晚，住在洗象池的大客房里，准备明天一早，登上峨眉山巅看难得一见的“日出”和“佛光”。

这夜正逢我四十五岁，三个人将我围在客房中，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刘启建还专门的买了一瓶精装的文君酒，四个人都不喝酒，只是登山三天来大家都感到腰酸背疼，借酒驱散高山的凉气和疲劳，每个人斟了半杯酒，酒一下肚，心里热辣辣的，似乎有了醉意，为了第二天登金顶，大家早早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赶看日出，我们在早上五点钟便起身向峨眉山之巅进发，因为光线暗淡，走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我看到母亲走路特别的艰难，问到她才告诉我她脚上打起了泡。

这么长陡坡中，她能在我的搀扶下，一步步登上山来已不容易，此时一来怕天黑道路不平，在她精力不济时跌倒，二来也赶个早，别因她步履艰难，延误了观日出的时间。就在洗象池外，我为她雇了一个专门背旅客的“背夫”，我仍怕背夫因天色未明出事，便紧紧跟在后面，叮嘱小范和刘启建尽快跟上。

六点半钟，我们终于登上了天下名秀峨眉山之巅的“金顶”。

平目望去，一轮红日在云海中喷薄而出，整个山头已被朝霞染红，如蒸汽如棉花的白雾，

已经退到脚下，将下面的人世与我们隔开。

金顶海拔 3100 公尺，西望天府平原，北瞪贡呷山脉，当红日一出，顿时气清云朗，一目望去，穷极宇宙。只那白雾阻断的千沟万壑，好像仍不能看破。

忽而，一片白云从南边急速涌来，顿时四周茫茫四裹，咫尺之内朦朦胧胧。一会儿从北面扫过来一阵轻风，将白云卷去，好像谁一声号令，先前的白雾渐渐退去，再细看那兀立的群峰，青翠碧绿，一个个稳稳地站立在在沟壑深处。

当山脚下的雾渐渐退去，就留得几朵游浮于山峰之间的彩云，若那云头上站立的是仙人，告诉人们，今天群仙又要在这里聚首，那朵朵白云上下巅动像是神仙在嗟商。快乐无过于那些无拘无束的神仙们，他们今天的聚会是巧合，还是预先有约？

此时我睡在宽阔的草坪上，一如睡在软绵绵的云端。好想纵身跃进那浩翰的云海中，去洗洗这二十多年地狱留下的积垢，再学学那些快活自由的神仙，超脱自己，让我的心不再积郁和忧虑。

仰视蓝天，品味着无穷天籁的奥秘后，我俯身去抚摩那突兀而立的山崖，被那些附在悬崖壁上的山花吸引。红的，白的，黄的，星星点点地分布各处，一丛一丛到处都是。她们向朝圣者招手致意，在山壁上发出清脆的笑声，平添着绝处的生机，令人收敛对绝壁的恐怖。

就在那静得可怕，连山禽走兽都无法攀登的绝处，她们也会在那里吟唱山歌。这些大山里的天使，敢在悬岩绝壁上与万神共进野餐，这是那些在温室中芳香迷人的玖瑰，永远不可及的！她们自由屹立在山岗上，留芳在天地中。

再往下滑移，我的目光便停留在那崎岖小路上义务的布施者，那是些为进山拜佛的人铺路修桥佛家俗家弟子。他们在自己铺路的两端，摆着对求过者布施的木匣，那上面写清了铺路化缘人的姓名。

我明白了那山间的小路，原出自他们的一铺一垫，那上面留着他们的汗水和虔诚。看到他们从远处背来的一石一土，我深深为他们的努力触动：只有迈过艰难历程的人，才更加珍惜平坦大道，他们除了用对佛的虔诚去感动那些同样虔诚的布施者，相互间全凭信仰的力量在沟通。

再看那一路上的朝香者，有瞎了眼的，有断了腿的，有失去双臂和已经耄耋的老人，结伴着趔趄在那险恶的山路上。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是他们的信仰，又是他们对虚妄者的归劝！他们之中必经历过人生苦海，来领受佛的劝勉，求得一个善果。

至于那一路上花花绿绿的少男少女们，匆匆而过，是不会理解的。他们同我少年时代一样，在没有受过生活的煎熬时，是不会领悟佛所指点的迷津。

忽然一个背着游人的背架，在那崎岖小道上慢慢地蠕动，一位力夫，皮肤黑黝，满身泥汗，双颧突出，青筋暴突，汗水像雨注倾泻着他的小腿，向上蹬的双脚也不知在这悬岩山间打

过多少颤，那背架上的游人，那些走到这里欲上不能的游人，就靠着他的“铁背”“铜腰”，得以饱览金顶的风采，而一家人的生活便靠他这种卖命的下苦力挣来的钱。

我知道这里没有人比他更苦，需知他脚上的任何闪失，都会让他滚下万丈悬岩粉身碎骨，那背架上背的老人或残废倒不说了，竟然也有的打扇卖俏的公子哥儿和打扮妖艳的少妇，他们那配进入这灵山佛境？如果佛有灵气，会怎样的处置这种人间的不平？我不知道但我相信。

我们在金顶照像，游览，流连往返，直到下午四点钟，一团白雾将它团团笼罩，看样子像要下雨的样子，我才扶着母亲向山下回归。我们从十八拐下行，天色将黑，我们无心赏玩遍山的猴群，终于赶在天黑之前进入白龙洞。

第二天我们回到清音阁，从报国寺乘车回成都的时候，我们这次历时八天的峨眉山之旅，便告完结。

八天留给我们的除了疲劳，便是心理上的寄托，我笔记本里夹着的野山花，便是我最好的纪念。有时候，我真把自己也当成了在这险峻人世中的野山花，然而我心灵的透白还不能像野山花那样的公开，我的片断，我的回忆录，便是我透明心灵的呐喊，但它们也只能掩藏着，否则我就连这一点空间也要失去。

逗留成都期间我想趁此再访故友，1979 年我回重庆后，一直陷于“落实政策”的奔波，有空把精力放到“片断”的撰写，竟没同陈容康和张锡琨大哥保持经常联系。此时当我再寻西城大菜市，那儿正在拆迁，老陈的窝棚不知搬到那里去了。问到解放中路 1268 号，干脆就没找到这个地方。于是从此断了同他们的联系。

我到成都前后四次，第二次是十六年前，即一九六六年春天，被盐源农场的狱吏们“押着”来成都“参观”，既要无端的残害百性，又要让受害人唱颂歌，这便是近代专制主义的丑恶心理。那次成都展出的全国五十二面大寨红旗巡回展出的图片，就是在花会期间在青羊宫里展出的。

然而在这次参观中我回答当局的是一篇：“从南滚龙沟这面红旗看大寨精神”，令盐源农场的管教当局瞠目结舌，我将“大寨精神”与“大跃进”联系起来，得出“劳命伤财”的结论。因为文章的全部依据均出自毛氏自己拿出来自吹的东西。

而今往事过去，故地重游，当我寻找当年参观大寨图片的展厅，却没有找到。问到青羊宫里的游客他们都摇头，中共已对这“大寨”绝口不提了！遗憾没有清算，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去杜甫草堂，这里已经培修。当年诗人穷居恶卧的故居，记述着一个傲骨清风的伟大作家到了晚年拮据渡日，终老他乡的经过，不禁令后人为之伤怀。诗人当年的心怀，今人又有几个具有这种情愫？后人将宋的陆游和黄庭坚共祠一堂于此，号称三圣堂，以表达后人对伟大宗师的缅怀和敬仰。

历史对于那些敢于抗拒独裁统治的作家，几乎安排了同样悲凉的一生。这使正直的作家难以保持文坛的神圣。随时俗，无聊文人多的是，有的是统治者奸佞的吹鼓手，有的以迎合市

俗们庸俗的口味。将一些污浊的垃圾充塞书刊，纯粹不以触动统治利益而苟活。

然而，历史又将那些伟大的作家供奉在文坛正位上，使后人永远纪念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文学专门家。这证明人心追求光明，正义依然是社会的主流。

武侯祠，我是第一次来拜谒，提到它，我总是同那篇伟大的唐诗联想在一起："承相祠堂何处寻，绵官城外陌生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代奇才诸葛亮辅蜀汉后主，以三分天下平息大乱，得到一个休整社会的"三国"时期。

近代的一些政治家包括赵紫阳也曾在这里抄录下一些史家的名文匾录，我想人心向往和平民主这种共同的追求一定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从七月二十日，我和母亲、刘启建三个人在菜元坝乘火车到成都，到八月十日回到重庆，整整二十天的成都、峨眉之旅便结束了。

行程的回眸，所见一幕幕交织在我的心头，错综复杂，尤其是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时期破坏的痕迹，当年我们在监狱中备受独裁统治的煎熬，而我的国家却在暴政中被蹂躏，大陆至今仍那么贫穷，不正是独裁的杰作么？

当火车载着我们四个人回到重庆带着不同心情一齐回归！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心情舒畅的再重游峨眉，看到她变得灿烂美丽？

母亲仍暂住市工商联的招待所，距火车站仅仅只有一里之隔，我们决定暂时在母亲的住处休息几天。

她到重庆财经学校已有一年多了，靠刘昆水先生支持以及周围那些与她有过相似遭遇的同事帮助，她开办的幼儿师资班已经招了两届学员，这些人毕业后充任了工商联在市内所办的各地幼儿园的老师，受到好评，解决了当时奇缺幼儿师资。

由于母亲心情比过去开朗得多，她的面容红润，身体健康得多了。她每每讲到李重生夫妇对她的照应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告诉我说，四个月前她得了一次急性肠炎，腹泻不止，人也几乎虚脱，全仗重生把她背上背下，送附近医院抢救治疗，才使危险过去，几天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由母亲作媒，重生娶了媳妇。我们在工商联短短暂停的几天，就得到他们夫妇俩热情的照应。母亲每谈到这段晚年的流浪生涯，她都显出一种幸福感。可见在蔡家场的二十多年间，蔡家医院的"造反派"对她的伤害有多深。

"四人帮"跨台，邓小平粉墨登场，为清除毛泽东死党的政治需要，借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各民主党派许以相互监督，共存共荣的诺言。

使已进入棺材的各民主党派有了还魂的机会，保持这些党派的名称并在政府的席位上占着一个头衔，例如各级政府机构中保持一个"副县长""副市长"的职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都给一个副职。

但这一打一拉，因为出手太重，实际上早使小伙计怀上了鬼胎。言行那敢违背坐在主席

位置上的大哥？那曾在建立民主党派初期有过的为民请命的阳刚之气早以殆尽,实足变成了专制主义黑幕的遮羞布。

第四节 第二次落实政策

像我这种既不沾亲带故，又没有重礼相赠的书呆子，要想毛遂自荐正大光明讲我的学历和专长，那就准碰软钉子，若靠我的骑术我就一辈子也找不到马的，好在我心里明白，我的调动除靠上级硬压是没有别法了。

1949 年父亲将我们全家寄住北碚后，我们全家就从此时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狱里经历了长长的炼狱，1962 年外祖母在饥饿焦虑中去世，已戴着右派枷锁的母亲，在当局强迫下带着十八岁的弟弟，悽悽惶惶从北碚街上“流放”到偏僻的蔡家场。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直到 1984 年我们这个重新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从蔡家场从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

1984 年 7 月我还守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的考堂里，从报上得知市里由重庆人事局牵头，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才交流会”，我决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专程去了重庆大学，我因获悉，当年划我们为右派的朱批人，宋殿宾已“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位宋书记在文革时期，因妻子张大珍被划地主份子，撤去卫校党委书记一职，并交农村监督劳动。

中共重庆市委，责令他在爱人和党藉间选择，这位宋殿宾因不忍抛弃爱妻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拒绝党委离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号走资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职务，还将他贬到卫校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派给他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从此整整十三年，在厕所边将孩子拉扯大，自己也亲自尝到了共产党整人运动的滋味，对当年无缘无故由他朱批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右派们，才产生恻隐之心。

当 1978 年母亲找到重庆卫校，请他为我当年冤情作证时，他便写了材料，使重大落实我的政策时，减少了不少麻烦。

1983 年春天，母亲在重庆财经学校工作仅一年半后，刘昆水创办的财经学校因为经费上的困难，决定裁减最初设置的专业。

工商联的头头，对母亲长住招待所也表示了异议，说母亲占用的是工商联用来招揽客商的经营性客房，从来没有住过本单位的职工。刘昆水和母亲商量结果，母亲决定辞去财经学校的工作，于五月份重新回到蔡家场。

刘昆水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专门用配给他的黑色伏尔加轿车，送母亲回北碚，并亲去北碚区委统战部，请求他们考虑在北碚为母亲安排一个工作和住所。

蔡家场本来就是一个偏僻的小村镇，八十年代初，在横贯小镇的马路上只有几架由农家装的手扶式来回奔跑，充作小镇的运输车，虽然它那令人耳聋的巨响和浓浓的黑色废气令人烦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废气排出的浊气中，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习以为常了，手扶式成了镇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沟通蔡家场和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破旧不堪，虽说从蔡家场到北碚的车票仅仅只有一角二分钱，但穷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着来，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险都要挤上车，他们把命看得很贱。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资局的几辆绿色解放牌，以及灯塔乡的八四五厂过路的东风牌卡车，蔡家那十字马路上很少看到小轿车之类的“洋车”。

当母亲乘坐的轿车，从场口向蔡家医院缓缓驶近时，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心底里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里的那一个重要官员来视察了，万万没想到车里面坐的，竟是过去被医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轿车在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母亲从车门里走出来时，正好王明站在门口，他一直迷缝着眼睛注视着从场口向医院缓缓开来的这辆轿车，心里产生着各种猜想，却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专门送母亲回来的车。

车停稳后，从车门里走下我的母亲时，这位王书记用笑脸向母亲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挂号室里的小曹和药房里的小李，要两个年轻人赶快去提从车上御下来的两包行李，医院里的护士都出来迎接，一时热闹得很。

我接到母亲回到蔡家医院的消息，从二十四中赶回医院时，母亲的房间里聚着小陈、小周和王书记。王书记正在吹捧母亲在落实政策以后，如何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当着母亲的面说道：“自从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个工作，挂号、出纳和伙食采买，现在是交给三个年轻人在管，要他们任中兼一点工作都不干，而且还干不好，上个月出纳就错了三百元钱，这么一对比，才显示你老人家才是我们医院的老黄牛了。”

两个年青人不高兴的看了他一眼，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对母亲另眼相看，是因刘昆水的关系，还是经过对比的确改变了他原来的偏见？但想起两年前他在母亲分房时的那付脸嘴，对比现在，使我产生一阵阵呕心。

据他本人介绍他的母亲过去是要饭的，当孩子的他，常跟母亲拿着打狗棒沿街行乞，看来他真的“根正苗红”，是共产党的真正依靠对像。可是为迎合我们，常把攻击共产党挂在口上。

不过我心里倒是生了警惕，大陆人生活在这种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以随便附会他，以免在莫明其妙时从遭“祸从口出”之难。

当时北碚区政府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北碚地方志，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修史小组。从图书馆和文化馆抽人收集材料，母亲就被定为修史工作组成员，在编写工作地腾出一间小屋供母亲

临时居住。后来她又在卫生界朋友的帮助下，长期居住北碚，摆脱了蔡家医院这个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间地狱。

“骑马找马”是刘老教给我的方法，但要调出蔡家的路，还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统战部去了几趟，我说我的母亲既然已经到了北碚，那么当初将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统战部的老吴却说：“你看吧，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和权限范围之内，有那个现存的单位空着位子来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单位吧！

1981 年，宋殿宾回到重庆大学“官复原职”，他的夫人也调到了重庆大学，只因我在二十四中，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我回到重庆大学，讲明重庆市人才交流的几个要求，请重大党委为我进一步落实政策时，才找到宋殿宾。他当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长张文澄。

同我们一起划为右派份子的张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团委书记，1978 年获平反后，1981 年接任重大党委书记。按宋殿宾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张文澄时，他正被任职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且正在办移交手续。

张文澄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副书记高某，对我重新落实政策，一方面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由他们出面对我的工作重新安排，不过市委宣传部说他们没有办法强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厂，建议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区确定一家最满意并愿意接纳我的单位，再由他们出面调动。

我本人是学机械的，能够吸收我的对口厂，在北碚地区恐怕便是地处区中区的重庆农用汽车厂了。凑巧这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彭季灰的爱人周生碧，正是当年母亲工作的北碚托儿所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此人正是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负责人。

后来的二十余年间，除了我和我母亲被划为强迫劳动的“专政”对象，剩下一个七旬的外祖母和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弟弟，都因黑五类，受尽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过去了，冥府带走了我可怜的老外婆和稚气的弟弟。

现在我的母亲找到这位周生碧，请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荐接纳我进入这家工厂时，在良心发现下，当即表示接受母亲的委托。

就这样，我在张文澄，宋殿宾的帮助下，重大校方重新做了对我个人的改正决定，除换掉了 1979 年发给我的肄业证，补发了重庆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确定了以 1958 年开始计算我的工龄，还专门加了一级工资。

当我一手拿着张文澄给重庆市教育局长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后，责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复，到重庆农用汽车制造厂，换得了由该厂厂长亲自签署的调动令，我的调动就在短短一个月内办妥！

（二）搬离蔡家场

我很明白，对我个人的落实政策的进展之快，全因毛泽东淫政之下共产党的分化，没有对宋殿宾的十三年惩罚；没有张文澄再次复职；没有孙起孟和刘昆水这些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

民主党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发现，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凭什么说调动就调动了？我算“右派”中与命运抗争的一个特例。

工厂的劳动人事部门虽有许多调进调出的事。但工厂管理者并没有引进人才的热情！自从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后，超编制的企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求调人首先要得到本单位头头的点头。其依据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厂长指令，根据从后门涌进来的亲朋关系，掌权者进行着权力交易的平衡。

求调人若没有很硬的“臂膀”，在调动时，必须准备给工厂人事部门送上一份满意的礼物。一切摆平以后才能谈调动！至于调进的人，是否合乎工厂发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会摆在第一位。

所以，没有关系的人要调进一个企业，提着调令和档案来人事科，科长会坐在太师椅上接过介绍信，连看都不看就塞进了抽屉，不屑的回答你：“等领导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若急着问：“要等多久？”那科长必会冷冷的答道：“办事得有个过程，这工厂又不是为你办的。”

当我提着档案袋到重庆农用专汽制造厂到厂长办公室报到时，接待我的党委办公室周主任，接过介绍信后，满脸堆笑，热情表示对我欢迎。他说：“新上任的厂长李友正缺得力的帮手，只是眼下工厂还相当困难，所以不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请我暂时克服一下。只要工厂一有起色，什么问题都好说。”

据说这位周主任原来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李厂长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区委的组织部长。我一来就碰上了这种与地方亲上加亲的裙带关系，知道这本是中共基层组织多年形成的关系网，同这些多年吃党饭的人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以我为人耿直的秉性难于适应，所以还是对他们取回避为上策！

所以我从进厂的第一天开始，就像孙悟空撞进了玉皇大帝的蟠桃会一样，应付着眼花缭乱的新环境，适应它，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由于农用汽车厂没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刘启建商量好，暂住在天生桥她的父亲的旧房子里。

我们的家便于 1984 年 8 月底搬离了蔡家场，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后，只剩下母亲和我，费尽周折，我们才重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们举家迁到北碚不久，接到刘昆水先生寄来的信，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里的老师转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再度重复我骑马找马的老生长谈。

母亲在北碚区参加的编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当年在北碚炼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考查的患难之交，原卫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长李秀贞在卫生局申办了一个为病人就诊的门诊，取名缙云咨询门诊。

母亲在李秀贞的邀请下，参加了这个门诊所的组建，并在正式挂牌营业时，担任门诊的挂号和财务工作。这个门诊集中了北碚地区有相当名气的老医生，他们除了医术，还保持着较

良好的医德，所以，求诊者门庭若市。

第五节 卢文南

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亲在下班回家的归途中，与一个拖着板板车，穿着褴褛的中年人邂逅相遇，当那名汉子走到母亲身边，突然把板板车停了下来，并且呼喊“妈妈”时，她才认出对方来。

原来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电力学校的同学，名叫卢文南。他的母亲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与我的母亲在北碚练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1962 年母亲从炼铁厂调到蔡家医院时，她仍留在北碚炼铁厂。

卢文南与我的弟弟在电力学校毕业后，两人同时下放蔡家农村，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算得上黑崽患难之交，只是卢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当 1967 年弟弟贸然离开蔡家场时，卢文南却因害怕没有跟着去，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弟弟一去不返，卢文南随即也离开了蔡家场，从此以后，两个孩子便与我的母亲失去了联系。

现在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他，顶着一顶破草帽，遮着那张冷得铁青的脸，瘦削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作抖。认出他时母亲几乎惊叫了起来，蔡家一别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看到这孩子了，而今见到他如此狼狈，不但十分可怜他，还勾起她对失踪多年小儿子的思念。

弟弟失踪当天，母亲曾到他们住的那间小茅屋里找到他，问起弟弟去向，卢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个被人遗弃的乞丐儿，心中好不心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车停在路边，牵着他的手问他妈妈现在那里？

文南只是摇头，好像有许多苦水堵在心里不能吐出，母亲牵的那手正在发抖。看看时间，已近六点，天正黑下来，便在附近面馆里给他叫了两碗杂酱面，一面仍不停地询问他住在哪里、母亲的近况以及他现在如何谋生？

卢文南在那面馆的长板凳上坐定，两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态使母亲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向他提问，他依然一声不吭。等到两碗面端上小木桌，他并不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他那饿极的样子，母亲心里想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定现在也像他一样，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个城市哪条街口？

第一碗面已经下肚，文南脸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点红晕，精神似乎也恢复了一些，才慢慢地讲话：他的母亲已于前年死于肺癌，当母亲撇下儿子而去时，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便是几十年来母子相依为命，所住文星湾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几十年来没有变化，那里是北碚区的贫民窟。留给文南的两间破瓦房还是解放前他父亲购置的遗产，那时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当雇员。

“解放”以后，共产党以他的父亲历史罪抓捕了他，那时文南仅只有八岁。后来母亲好不容易通过民政部门，谋到了一个在西师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工作，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

没想到 1957 年他的母亲被划成了右派，从此更大的灾难便降临到他们娘俩头上。

把两碗面吃完，卢文南继续讲自己的遭遇：母亲获得西师平反后，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图书馆工作，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给她办了退休手续，每个月发给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俩就靠这点退休金维持着活命。

卢文南多次去找电力学校和街道，要求给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们说你是一个弱智，什么都不能做。母亲多方托人，始终求职无门。

后来妈妈单位工资改革了，物价也跟着飞涨，几次退休人员增加的工资抵不上猛涨的物价。1982 年基本生活物价涨了两倍，而她的那点退休月工资却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母亲终于病倒，因缺钱上医院，只找了小巷里的游医抓了点草药，聊以应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时，已经难以起床，医生诊断说她得了肺癌。

母亲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求一条生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由儿子搀扶着到街道办事处，请他们可怜他们母子两的悲惨命运，无论如何在她死前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职业，以求谋生，哪怕是扫大街，或拉板车当苦力，只要有口饭吃怎么都行。

在那个年代里，街道办事处之类的中共下层机关，如果没有特殊的人际关系，又无靠山可傍，就凭那一贫如洗的脸嘴，谁会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憨厚的卢文南依然眼巴巴守着家门口，望着过路行人发呆。

带着垂危的病体，母亲最后一次到区委统战部去，请他们为孩子安排一个工作。

统战部的官员说："你现在提出来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实政策的范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儿子的具体困难，我们仍在考虑怎么来解决，你还是回去等着，一面静静养病，一面等一段时间，今后还是由街道的办事处来具体解决吧！"

于是把"球"重新踢回街道办事处，这么一踢，不但无助于文南困难的解决，还得罪了街道的头头。

等到卢文南再度找街道办事处时，那街道办事处的老头昂着头，鼻子里哼着冷气，冷笑道："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还想跑到上面去告状，老实告诉你，万丈高楼平地起，象你这样的问题，还得靠基层。"

按照下乡知青返城的有关规定，当年他也该由街道或民政部门在城里安排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他就没有塔上返城知青的车，从蔡家回来便是一个无业游民，在贫民窟中，混到四十岁了，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打着光棍的卢文南，眼看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却无钱无力将她送进医院。最后几天，守在西师的卫生所里看着她闭上了眼睛。同他一起办理丧事的是他住在合川县的一个姑妈。

母亲草草安葬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还有十个月的退休金作她的安葬费，他悄悄的把

他母亲的骨灰，安葬在松林坡的一棵大树下，就守着那大树，痴痴地过了三天三夜，他希望与死去的母亲，这么永远相倚的陪伴着。

母亲去世后，卢文南失去了生活来源。姑妈帮助他领出了所有的抚恤金，叫他去河边的码头做点小生意，开始他早出晚归，挑着萝匡做点河边菜贩子打出来另卖的小菜生意，不料他因为人呆板，不善于观察行情，小菜却卖不出去烂掉了，把本也亏了，只好另觅生路。

看他形同乞丐的样子，产生了恻隐之心的一位紧邻老大爷，给他找了一架破旧的板板车。每天他便拖着车替附近的商店里运点货得一点报酬，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每逢自己生活过不下去，几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都要跑到埋葬他母亲的大松树底下，默默在那里哭泣。

他讲到这里，伤心地哭了起来，天已黑了，街上的路灯早亮了，看见他精神振作了一点，估计是两碗面的效果，母亲还要给他再下一碗时，他却摆摆手！依然呆呆的坐在那长凳子上面，望着沉沉黑下来的天空发呆。

两个母亲遭遇如此酷似，成了她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

如此又沉默了一段时间，母亲关切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不料这一问却猛扎了他那根埋得很深的神经，他忽的从木凳上站了起来，好像在用力挣脱钳着他喉咙的无形铁钳。眼睛里闪出一股怒火，闷声地喊道："反正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用我的一条命去换他们的两条命，也赚个对本，值得了。"

听得出这是郁积在他内心酝酿了很久的打算，带着以命抵命的决心，用砸碎这吃人世界的最后一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他要同归于尽的是谁？是街道办事处欺他太甚的"头"，还是在他脑海里无时不在浮动的魔鬼？然而他咬着牙再不吭声了。

母亲心里明白，越是沉默，这孩子就越处在"风萧萧兮，易水寒"之中。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年代，就不知有多少被欺凌的弱者，积蓄着仇恨，随时都会被引爆！！抢劫、杀人中有多少出自悲伤？社会没有引起关注！是故意漠视这些现象，还是社会有意回避这些？

现在母亲完全相信，这个小时候性格内向，从不多话的人，并不是一无感觉的痴呆。那心里可是郁积了随时可能让人粉身碎骨的一团复仇怒火。既毁灭自己，也消灭对方。

为了拯救这孩子，她想扑灭它。想到这个孩子的危险和可怕，连连叮嘱他看在他母亲在天之灵份上，千万不可造次，一定冷静处理，何况天无绝人之路，总有一天他会得到母亲的保佑！

临分手时，母亲打开皮包取出五十元钱塞进了他的衣袋，并且把我们住的地址抄给了他，关照他，今后如果遇到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到天生桥来找我们，叮嘱他坚强地活下去，看看这个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听罢母亲这一段叙述，感到对这个以强权欺凌弱者的社会，光同情卢文南的遭遇，是无济于事的，今天连在报纸上公开为之呼喊不平的自由都没有，这种不平何以消弥？

像街道办事处的头们的恶棍，谁又能动他一根毫毛？就是他们做出贩毒，聚赌、窝匪藏

盗，逼良为娼这些危害公众的事尚且无可奈何，何况像卢文南这种只能归错于“落实政策”不力的悲剧！就更难解决了。

我自然想起了刘昆水老先生，一来，他本人有过类似的遭遇，对卢文南现在的处境不可能无动于衷；二来他身居重庆市的要职，作为“父母官”请他为一个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害者的遗孤作主，向民政部门反映，促使北碚地方官，给卢文南安排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虽然这两三年来，我个人请他帮助，另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被他用“骑马找马”搪塞了毫无结果，但像卢文南这种需人救命的事，他该不至于拒绝。

出于这种估计，于是便提起笔来，为这件事专门的向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两周以后，便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上说，他正在开政协会，工作极忙，所以只在会议的空歇时间抽出时间，回答我给他提出的问题。

我想他能认真阅读我的信，并及时答复，是中共各级组织不可能办到的。

怀着一种敬意细细读信，那信的前半段讲共产党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级管理的原则，接着便说他个人无权越级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于连自己的子女，他也从来不为他们安排做什么。

在申明他本人权限后，点出像卢文南这样的情况，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们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具体条件来处理。

读到这里我心头纳闷起来，这刘昆水的清官原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有违中共政策的难题，要他破例“违背”中共“组织原则”，作一椿好事，竟关上了门，怪难为他的。

其实眼下无论那一级中共官员利用关系胡来的事还少么？难道他没有看清当前官场的腐败？他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那自有巴结他的下级妥善代劳，但对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卢文南，他怎么也不能推卸仗义执言的天责！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连道德正义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脑儿丢掉么？

需知卢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贪官衙门口的一个乞丐，被挡了出来。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爷，过去也曾经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国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畴被努尔哈赤所俘，关在满人的天牢里说过的一句话：

“汉人在危难相共时是一条龙，而当共同的危难消失后，就是一盘散沙”。

想到这里，心潮阵阵上涌，便提起笔给这位先生写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这位无辜的受害者再次呐喊，呼唤正义和良知，并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聪明的刘老先生当然读得出这辛辣的指责实际上包含了他本人。

尤其是信的结尾，还从当时正在流行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录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吟唱的歌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作为晚辈，我绝无指责长辈的恶习，更何况一个已为中共入过另册的人，我更要小心讲话。

何况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市，我们就这么一位在我们身处逆境中，给我们多少帮助过的市一级政府官员，更不愿随意伤害了他。

然而，我还是这样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里。这大概是二十年炼狱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种横眉冷对当权者的东西，使我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力。一笔泻下，觉得自己心中被压抑的折皱得到舒展，而不顾及后果了。

母亲在得知这件事后，曾责怪过我：首先因为造成卢文南目前这种困境的必竟与刘昆水毫无关系！对罪魁祸首无可奈何，却去责怪一个同情我们的人，必竟是非颠倒了。

再说刘老先生是受孙起孟先生所托，看在师生之谊上，对母亲给了力所能及的照应，这在当时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已算是尽心尽力了。现在反倒为卢文南的事，被无端指责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失礼了。

何况明知他虽挂着官牌，却并无任何实权，对卢文南这样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产党的脸色办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伙计的软弱，所以不该对这位善良老人横如指责。

刘老先生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回信，我们之间将近三年的通迅友谊，就这么结束了，也许他是真正生气了，也许他理解我的心情，不愿与我一般见识，主动停止这种争论。

我至今回想起来，给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话，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当作执政党的伙计来要求罢了。

过了几天母亲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给他的信中指责当官不为民作主的话，忠告我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可以满身长刺去恣意刺伤他人。也罢，话不投机半句多，想刘老作为长辈大可不必这么小气，过于拘谨的做人活得够累。

我虽穷，住的是破瓦寒窑，天天奔波劳累。但却不为五斗米折腰，见人矮一头，能时时保住心中这块自由的福田。而他当他的官，进出轿车，住别墅，但心里未必舒坦。

后来在 1989 年天安门民运中，集中表现了“小伙计”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难堪。当然，在这个时代，刘老绝对是一个好人，一个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于卢文南，后来碰到了缙云门诊的那些老医生们，当母亲向李秀英等人介绍了他的遭遇，门诊部便从门诊收入中揍了点钱，卢文南就在大家的资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货生意，在满街玲琅满目的摊位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维持着自己的清贫生活。

第五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上集里我已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真象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到，劳改队是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的远东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苏联推行“国家所有”，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与独裁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效仿苏联，在中国建立一个适应高度独裁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便是中共国有制的由来。

同苏联一样，毛施行“国有制”二十八年，不但无法超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连本国老百性的吃穿都解决不了，数千万中国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白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作为基础的经济，最终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这一集里，我回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局。邓部份顺应客观规律，舍弃“共产主义大锅饭”，知道“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但是这一过程依然保存了“独裁”衣钵，它走向了另一极端。

本来，现在大陆社会中与公有制并存的民营企业，以其各方面的优越，令人信服证明，代表私有制的民营经济优于独裁专制的国有制。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将共产党骑虎难下的“公有制”变成统治者的“私人占有制”，这与自由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共主张的“私有”，是窃取权力者少数人的私有，带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质。它恰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这样来认识邓氏的改革开放，才可从“中国特色”的现象中，透视这种新的奇形怪状体制产生的尖锐矛盾，这是一种用“中国特色”包装的统治集团占有制。它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自由经济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发源于竞争，没有竞争，私有制只能萎缩。事实告诉中国的权力握有者中国可以实现的进程应当是：先从取消专制制度开始，才有“改革开放”的实施，俄国已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改革又怎样呢？

下面我客观地把这个转型过程记载下来，并预测它的未来。让我以亲身经历看看这个过程，看看它的后果吧。

第一节 进入工厂

在进入重庆农用汽车厂之前，除听到这家工厂不景气的传闻，对那门上挂着的大牌，门卫森严的表象究竟是怎么一个内幕，我一无所知。只因我当初要求调进这家工厂时，在统战部几次碰壁后对它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进这家工厂，原是去劳动人事科报到的。当我走进那黄色的办公大楼，找到劳人科，并从那位劳动人事科长手里接过“履历表”填写时，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调动纠纷。

当事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正哭丧着脸纠缠着这位科长。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区法院的民事庭庭长的侄女，她本在河对面玻璃器皿厂当一名玻璃制品的磨花工。因为家住北碚市中区，嫌每天赶轮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着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区的工厂中为她安置一个工作。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好几位职工是法院的家属，这位庭长也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金工车间正准备向外招聘两名万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电话托了当时任厂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老同学。

对方立即找人事科长商量，将两个准备从外面调进的磨工名额让了一个出来，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发了调令。

像这种法院利用国有企业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极为平常。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人拿的是国家发的工资，调进人不过是在国家付的工资名额中多造一个，工资虽薄却是铁饭碗。由于交通便利，所以谁都削尖了头往这里钻。

再说满足法院提出的要求，还可以巴结政府的权力部门。因此调进来的人再没用，工厂再人满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这种调动大家给取了个名，称做：“走后门”，成交双方叫：“关系户”。

而我在劳人科偶然碰到这位女士，却发生了一点小小曲折。当她被金工车间的李主任带到万能磨床上时，她终于说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从来没有见过庞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么开动这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怎么来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将她退回给劳动人事科。然而一切调动手续已经办完，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位“关系户”已成了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职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与生产库房商量，那儿可是一个容纳闲人的最佳场所。不过生产库的编制总共十二人，现在由于各种后门户，容纳了整整三十个人，主任说既然早就超编，再加一个也无妨。

大陆上的“走后门”配以各种形式的贿赂，成为这一时期国企的主要人事原则，也成为国企管理者贪污的来源。国有企业驭着人员雍肿的包袱，在商品经济来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负荷成了国企倒闭的原因之一。

我填写好履历表交给这崔科长后，他通知我说：“党委办公室的周主任，请你去一趟。”并且将市人才交流办公室的表交给我带上，悄悄告诉我说，这周主任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见面，他告诉我，李厂长为将我调入这家工厂，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连续跑了许多次。李厂长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进厂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听这话，心想到了一个新环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适应，可惜该怎么改，我却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

从党委办公室出来，今天还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很难调进来的工厂，究竟如何的卢山真面目？

站在工厂大门口，我仔细辩认了工厂的位置，认出这儿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级求学的实验中学所在地，算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实验中学搬到毛背沱与兼善中学合并，改名为重庆第十三中学。

现在工厂大门还依稀看到当年实验中学的旧貌，这几年随着城区改建，云泉路和云天路半围了整个厂区。

厂房十分破旧！中心地带的山包上立着一幢黄色大楼，大概是抗战时留下的历史遗物！黄色大楼下方整个厂房分布在四周，全是泥夹墙结构，因长年雨水浸蚀变成危房，很像一些戴着灰色破毡帽的苦力，匍伏在四周。

厂房之间按照天然地形，弯弯曲曲宽窄不等的过道上，散乱的停放着仿苏制吉斯卡车，有的车身已生满了锈，这是当年取名为北泉牌的农用汽车。

几幢厂房黑漆的铁门敞开着，从那黑漆铁门走进去，暗淡的光线中机油和霉气的气味迎面扑来，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冲压车间光线比较明亮，有几台像样的冲床和油压机，其余的车间，冷作、工具、金加工、装配几乎都是五十年代的旧设备，在暗淡的灯光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断断续续发出尖锐的金属切削声。

走进一个车间，工人们躲在黑角落里吹牛，打牌，只有车间办公室和技术组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看了看手表已十一点钟，距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走出车间，转过厂区，沿过道朝工厂大门走出。

从围墙外的马路向市中区方向走，过了云天路右转，朝车站方向去便是云泉路，围墙外的房屋渐渐多起来，不过那些房屋破烂不堪，过去从这里路过，并没有留意。

今天带着了解工厂的目的，我才仔细看清楚，那房屋像是当年抗战难民筑起来的贫民窟，有些墙体已经垮塌，房顶上铺着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这里的主人在风雨交加时，最提心吊胆的便是整个房子会在风雨中垮下来。好在这些鸽子棚背靠在工厂的围墙外，相互依靠着免得被平地的大风卷走。

走进一处门窗像样的窝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询问，她回答道："这一片烂屋子都是农用汽车厂的职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说的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工厂，职工们竟住在这些破棚子里渡日，一丝后悔的念头拂过了我的脑海。

当初离开二十四中时，老师们都说我这下终于摆脱了二十四中那穷地方，调到这么一个市属单位，好比从糠兜跳进了米兜，现在看来这里除了在地理位置占着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

蔡家场的烂泥路外，并无其它优势！

其实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现在暂住天生桥刘启建父亲的家里，那住房也是危房。半边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湿，平时屋里散发着霉气，一到雨天，整个脚下就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别说孩子，连我常住下去也会受不了。

我是阶级斗争战场上活出命来的难民，能寻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总工办就在底楼，从正门走进过道的最尽头，我被带进那间排着六张办公桌的屋里。这时因为没到上班时间，办公室里面还没有人。

五分钟后，总工程师王重夹着一个皮包来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庆大学先我们三年毕业的校友。

在总工程师室丢下皮包后，他便来我们办公室安排了我的坐位，并带我领了一套绘图仪器。

当人到齐后，王重介绍了办公室其它五个座位上的人。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和统计全厂各车间的技术革新。

第一天上班，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报纸，我却忙碌着收拾那些刚领到的东西。打开抽屉，把领的那些资料和笔记本，绘图仪器放进去，便打开资料看起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除了翻动报纸的声音，便是喝水声，谁也没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靠窗子坐在第一个座位上，年龄已五十岁多岁的女人，开始说话："也不知道云泉路那两幢的房子方案出来了没有？这一次大家要盯紧一点，不要让总务科再像上次那样塞了私货……"她喃喃自言自语。

坐在她后面那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脸上长着络腮胡的男子接了嘴："总务科上周就把这次分房的方案订好的，只是那姓冯的还迟迟不予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么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名单了，我是盯着了，我几轮都被挤掉了，就看这一次有没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说道，全办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龄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么退休以前再也没有我的份了。"原先办公室的安静顿时被热烈的讨论代替。

大家讨论的就是我昨天所见云泉路上两幢新建的楼房，从大家的讨论知道那两幢房子只修了五层楼，一共才四十套。全厂一千多号人，盼了快两年了，现在就眼巴巴盯着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紧张？如果按照工龄排队，这办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谁手长、关系好了。

我听了很久，已听出他们谈论的无非是：有分房资格的老职工双眼紧盯着总务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资格不被意外的关系户挤掉；没有分房资格，便会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地挤掉那些已排上号的老职工。

估计自己分新房无望的人，就把眼睛盯着那些将要腾出来的旧房上，以各种理由来调整自己原本太挤太潮湿，太恶劣的住房。

总之各自打着小算盘，至于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住烂房子，怎么才能让大家都住好房子，却无人提到。

想到这里，我回过头重新看了看办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论年纪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其余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学学历，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深度，对问题的态度一点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听那在临窗坐位上，脸上长满络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嗓门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这个工厂怕没有几个敢跟我比的，现在一家三辈六口人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烂棚子里，几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关系户占去了，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里去住。"

那最先引发讨论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这厂来足足干了十八个年头了，如今娃儿都长大成人了，一家五口还挤在那牛毛毡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独独落实最后一榜时，我的名字却被刷掉，这次再刷掉，我绝对要问个凭什么？"

她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轻女士，喊道："你们晓不晓得李友的那个小舅子冯西，这一回排的分房人员中就有他的名字。"这话像点了一把火似的，点燃了整个办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冯西当分房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才来工厂几年？他凭什么上了榜？大家盯紧点，这一次如果他冯西分到房子，我们到李友家去闹。"络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络腮胡压低嗓门说道；"轻声点，隔墙有耳。"

她指了指对面的那间晒图室，然后转过身朝那年轻女士问道："刘茜。你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轻女士被这么一追问心里老大不高兴，闷声回答道："你不信等后天张了榜就明白了。"

络腮胡却并不理会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愤愤的吼道："真他妈缺德，这么大的工厂，一千多职工一大半就住在烂棚子里，苦苦等了许多年，眼睁睁地看到这两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家伙，还想拿去照顾他的小舅子。"

说到这里，坐在后面的两位，嘟哝着说："这个厂啊，连当一个班组长都会利用手里头的那点'权'，往私人腰包捞，李友当厂长了，正该他捞的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闪过一个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声，办公室刚才热烈的讨论便突然的轧板。果然门口走进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便是对面晒图室的描图员，走进来问道："你们有谁有图或资料要描，要抄的？"没有人理会她，于是她便走出门去。

我后面的那位告诉我："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总工办专门当耳目的。"

这李友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学以后又走着很顺的路，遭遇与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后，又在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么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后门"的各种是非中，成了众矢之的？

我既进了这家工厂，也希望工厂兴旺，真如大家所说这种状态，别说等三年五载，就恐怕一辈子也别想“天下寒士皆欢颜了。”

便想把听到和看到的与他本人交换看法，让他明白面临的诸多不利，希望他能赶紧调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风，把工厂组织得像样一点，迅速改变目前这种一盘散沙状况。

李友住在云泉路上一个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两幢五层楼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寝室和客厅厕所，算是当时这家工厂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个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表距下午上班的时间还足有两小时，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进三合院的门口，问清他住在进门左手那幢楼的四楼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门却一直没人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家，后悔当初来时该在办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于空跑一趟。

缓缓地走下楼来，在二楼楼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职工，向他询问李友下班后回家没有？对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没看见，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见他的母亲上楼，刚才他的大妹还来过。

于是我又折转身重新去敲那闭着的门，仍没有动静，我又继续敲下去，反复三五次，那门手终于摇动了，门轻轻的开了一条不到一公分的细缝。

“你找谁？”那声音是从那门逢中挤出来的，听去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我找李厂长，我是新来的，是李友的老同学，”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别扭，怎么明明屋里有人，敲了这么久的门才来答应？这种无礼的“神秘”使我颇有看法。门里面有了响声，好像是悄悄的对话，又过了一分钟那门才慢慢打开了。“请进吧”，黑屋里传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朝门洞里望去，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刚举步，“噢，请换拖鞋”那女人在洞里发令道，我接过了递过来的拖鞋换上，跨进了门，门重新在我的身后被关上。随即，“啪”的一声电灯打开了。

一间略微讲究的客厅呈现在我眼前，抬头望去，那两边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心中正思考这位老同学，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关在寓所里？

客厅里正对大门的长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一位头发已经全白的老太太，紧靠着她身边坐着一个约十五岁的男孩，旁边还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年龄上判断，眼前四个人没有李友。

刚才开门发话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四十岁上下。此时，她很有礼貌的指着右侧一个单人沙发说了声“请坐”。

没见李友，我心里又生了疑惑，难道这位老同学今天中午没回家？我见过不同层次的人，

以这种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侦探小说里有过描述，虽然很尴尬，却又充满好奇。

于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绍道："是这样的，我是刚刚从蔡家场一所中学调来的，想找李厂长随便聊聊，他在家吗？"

话音刚落，只见左侧的寝室门帘动了一下，一个戴着黑边宽镜框眼镜的中年男子，闪身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却是冷冷的，缺乏热情，也许因为我是空着手来的，有违市俗规矩。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谈，一面解释道："真对不起，不知道是你来了，所以迟迟没有开门，你不知道这家工厂有多烦人，这几天就为了两幢刚刚修好的职工宿舍分配给大家，全厂闹得乌烟瘴气，这几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觉，只要我在家就有人来找，全家鸡犬不宁。"

我打量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人变到这种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属于人性本能的东西，不知为啥丢失了。他边说，边从茶几上的水果盘里取出一个梨子递在我的手上，继续解释道，"我被缠得没法，只好将妹妹请来，对付这些成天缠我的人，凡在休息时间来找我的，一律说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进来的那位女士点了点头，算是自我介绍了。随即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绍说，这是他的母亲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办公室议论的冯西大概就是他了，接着主人又询问道："听舅舅说，你安排在总工办，手续办完了吗？"我迟顿了一分钟，刚才我进门前，所存下的映像还在回映，一时脑子里还在那黑洞的房门口徘徊。

更主要是，儿时的同学相隔这么久，不管现在的身份如何，同学之谊总该放在相见的第一位，因为童年的情谊最能唤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别，初次相逢且不说多么惊喜，也不会板着面孔，摆出上级对下级的那付臭架子来。

心里面的这点隔阂，已将我来之前准备好的话吞了回去，一面口中应付着他说道："噢！手续已办完了，并且上了两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吗？我们工厂目前最紧张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暂时只好在天生桥的老丈人家挤着住了。"

话说到这里，便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似的，很为今天空手而来，感尴尬，这些年中国人到别人家里是不兴空着手的，更何况是刚进厂的人到厂长这里来，本来抱着看见老同学既聊家常，再将两天来所见所闻婉转讲出来，结果见面竟弄得这么僵。

看到对方大概因为心绪烦燥，再去说些他所不愿听的话，弄得对方反而不高兴，而适得其反。

那沙发上坐着的人盯着我，更感到浑身不自在，如此尴尬了几分钟，我便起身告辞，他

也没有任何挽留的话，站起身来，关照道：

“老同学了，今后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么情况我们常常通气，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也尽管直说，凡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去办。”

客套话一边说，一边去开房门，最后叮嘱我说：“以后你如果要来，在预先没有通知我时，就要按约定的暗号敲门，暗号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记住了吧。”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眼镜框里透出一种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点了点头，便出得门外，穿上自己的鞋赶紧离开……

刚走完那楼梯，见两个气冲冲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紧闭的门走去，然后使劲地敲那房门，可那门静悄悄的一动也没动，直到来人没趣的走开。

我下了楼梯，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刚才所见到的厂长，感到今天实在不该空手到来，自觉唐突，对这位千余职工的头，怪僻的神秘颇感不安，预感到今后，怕难以同他相处，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阵失望。

我们一家从蔡家场迁居北碚以后，刘启建还暂留在卫东中学，我和母亲以及两岁的儿子，暂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亲和老岳父都已是年过七旬的人，母亲又在缙云咨询门诊上班早出晚归，不到两岁的儿子只好托邻居刘大妈带。

可是不久，刘大妈的外孙出世，本想请母亲出面送去北碚机关托儿所全托，但看看不到两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于心不忍。再说，托儿所也不可能在学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经过与本厂托儿所商量，暂时把儿子送到那里去上日托班，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五点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儿子喂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驭在肩上去上班。

从天生桥住地到工厂相距两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车，但是上下班那趁车的拥挤实在骇人，公共汽车一来，等在站上的乘客，并不排队，而是一拥而上争着抢坐位，挤上车以后，坐着的都是精强力壮的年轻人，别说我这种抱着孩子的人，就是单身年龄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车被拥挤人群推倒跌伤。

同时趁着挤车的混乱，扒手十分猖厥，像我这种经历二十年监狱见过许多窃贼的人，也会在挤公共汽车时，遭到洗劫。

第一次从蔡家到北碚来，身上带的三十元钱被扒一空，还是向驾驶员说了许多好话，才免交了车费。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上车时只带着一元钱的车费，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钱都会被扒去。

偷扒成风，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穷，无业游民生活无着。二是文革遗风，道德沦丧，抢劫杀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抢”既成为执政者认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会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国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乱世，对文革业以形成的社会陋习已经习惯，加上处于弱势状态，

事不关已别自找麻烦，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态度，即使对众目睽睽下的行凶抢掠也视而不见。

挤公共汽车，既有受伤和被扒两大危险，加上住地到工厂不过两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凑那坐车的热闹。

每天一清早让儿子喝过了牛奶，自己一边啃馒头，挟着帆布的工作包，驭着儿子，冒着清晨的寒雾，匆匆地走上公路，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再匆匆赶往黄色大楼。

时值初冬，每天早上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热汗。好在我劳动惯了，权作早上锻炼身体，开始时还觉得太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形成习惯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下午五点半钟下班，我又到托儿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驭在肩上，当然回家就没有上班那么紧张，抓着儿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边还问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儿歌，跳了什么舞？搬着指头数数能数到几？有时还教他背唐诗，在我的肩上响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那日子虽很累，但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朝夕相伴，换来的天伦之乐让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儿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传染了，喉咙和脸肿得胖官似的，晚上还发烧，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哄他，给他讲故事，唱儿歌直到睡着。

那一周我几乎整夜没睡觉，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撑着，终于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盐源时，得了病还要被抽打赶上山去，便无所谓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炉子打牛奶，然后驭着孩子，冒着寒雾，急急的往工厂托儿所赶。

有时路上碰到同厂的职工，逗着我驭在肩上的儿子，有意无意地向我发问，“老孔！这是你的孙子吧。”其实儿子也好，孙子也罢，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给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带来，我都认。

第二节 闹嚷嚷的达标

1984 年，重庆农用汽车厂正处在发财的时候。不过在那汽车特别缺的年代，只要有生产许可证，装上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再装上一个车身，再蹩脚的汽车都能卖钱赚钱的。

刚从饥饿中活出来的农民，从三自一包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基本上解决吃的问题以后，便把眼光转向城市里挣钱的“副业”。跨出家门的农民盯上了在马路上来回奔跑的汽车，十分羡慕坐在驾驶室把鼻子翘上了天的司机。

挤在手扶拖拉机上冒着翻车危险的农民，梦想自己有一辆普通卡车跑运输，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挤进中国第一代的万元户。

然而要走这条致富的路，可不比养鸡养鸭投入饲料的小本买卖容易，他们手头至少得有几万元买车的钱，这对刚刚吃饱饭的农民，好似海市蜃楼。

正好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发农用汽车制造厂旧地后改为专汽厂放了低息贷款，凡持有地方政府的证明，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贷到他们所需的钱，那些做着“运输”发财梦的农民，终于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排着长队在国家银行贷到款的农民，匆匆背着钱袋，挤到有卡车出售的工厂或商场，农用汽车厂平时十分冷清的销售部窗口下，很快排起了长长队列，过去很少人问津的农用车，一时变成了紧俏货，车库里停放的车早已售完，那停放在车间过道上，遍体锈蚀的将报废的车被争抢着。

有一天，我见一个背着钱包的农民，正将一个上了车正在发动的人从车上拉下来，并大声喊道：“这车我已交了预付款，是我要的。”那被拉下的人跳下车后，气势汹汹向对方吼道：“我刚才交了钱，是这位大哥叫我提这辆车，你凭什么拦我？”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站着的发车员。两个人互不相让，抓扯着，像公鸡打斗似的直着脖子。

这时那发车员走了过来说道：“我可得给你们说清楚，谁要我不管，这车交给你们发得动，开得走，成色虽然旧了点，可是你们自己争着要的，今后出了问题别找岔子，说什么质量不好要退车的话，我一概不认”!

那已拿到车钥匙的农民，连忙从他那刚才装钱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包精装的“大前门”来，向发车员递过去：“大哥，你说那儿的话，这车我是要定了，现钱现付，整整六万元，你是开了票的，现在冒出这个人来，你给评评理。”

发车员接过香烟，对着那抢车的农民吼道：“谁收你的预付款，我可没听说，你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发车员的裁判，看来是那包大前门的作用。

“不，大哥我上个星期就来了，就怕到款提不到车，专门找段科长预约好的，就是这台车，你不信段科长还在办公室可以当面对质。”抢车的农民摸出了打火机，打起了火，向那嘴上刁着大前门的人递过去，还想竭力的挽回败局。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过道上平时排列着的车已经腾空，地面上留下了几摊机油和从车身上剥落下来的铁锈，再看看这台两人争抢的车，蓝色的漆已经发白，底盘上的黑漆已经锈蚀，少说也是在露天存放了一年的。这样的车开上路，没有人能保证它不抛锚，再碰上这些初学驾驶的黄司机，今后难保不会扯皮。

“算了吧，这车已是人家的了，你还是另外再卖一台吧，段科长既与你有约在前，他一定会安排的，说不定你买的比这台车好得多。”中间人最后作了裁定，抢车的农民只好提着胀鼓鼓的钱包，向着销售科办公室走去。

看来农民抢购卡车的热浪正在这家工厂盘旋，随着这股抢购风，原来只值五万元的农用车，一路价格节节攀升。仅销售科公开亮出的牌价，以增收购置费，手续费，附加费等名目，两个月就上涨到七万一台。

有的农民刚刚才从库房接过手的车，便会有人以高出买车人两千元的买价，从他的手中把车接过去。有人盯上了这汽车转手买卖的生意，一辆车转手之间便可以赚到两三千元。这年

代，以“万元”作致富的标准，转手之间不费一点气力便能成万元户，可谓小暴发户！

李友可是交了好运气，汽车的紧缺，为汽车制造厂创造了比其它机械加工厂优越得多的条件，在他上任时碰到了这机会，如果指挥和组织生产不失误，这家工厂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改变亏损局面，由一个职工住烂窝棚的穷厂变成名符其实，人人羡慕的富厂，可李友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对本厂生产的汽车颁发“汽车供应券”，这本来就是从共和国的票证学来的，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发供应券是大陆的常规。

然后在厂长常务会议上作出决定，以对外联系业务的需要为名，为他和负责销售工作的副厂长每人提供了几张汽车供应券。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其它副厂长的反对，“状”告到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那里，为了摆平这件事，李友决定给每个厂级干部也发几张汽车券。

厂长们暂时搁平了，却将刚刚卸任不久的厂长殷某的红眼病引发了，于是他一面暗示李友，要求重新“分赃”，一面指示他的儿子殷老大，到每个厂长那里，私下以每张附加价格收买这些汽车券。

在殷老大软硬兼施之下，给厂长发的汽车券被他收买了一大半。胆大包天的殷大公子，将这些收来的汽车券加价，在离厂门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出卖给那些排在队列后面，又急于求购的农民。

一张汽车券，在殷老大转手之间，便凭空赚了几千元。一个倒卖汽车券的黑市交易市场，就这样在工厂大门的侧面公开的营业了。

这段时间，中国已形成了专门从事倒卖为业的特权阶层，并且还形成了一个以这种官方为背景的倒卖市场。掌握了物资的特权阶层使倒卖合法化。老百姓给这种一经转手，就得到巨额利润的“爷”，专门起名为“倒爷”。

经这些倒爷之手，控制着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控制着国计民生。

开始，倒爷成立公司，经政府批准正式做起了生意，凡百姓紧缺的日用品，大米、食油，甚至肥皂火柴，后来发展到成吨的钢材，汽车、彩电，那生意越做越大，公司也越来越大。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先决条：“批条”。

“批条”只能由各级官吏开，大倒爷靠大官得到大买卖批条，小倒爷靠芝麻官得到小买卖批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靠了这种不受大众监督的政体，成了贪污的温床，“倒爷”们的乐园!!

这一时期，对于汽车彩电等等国内紧俏物资的倒卖，已成了“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原始积累。像殷公子做点北泉汽车票的小买卖，确是小巫见大巫，消息证明，到了1985年已有军队替走私货护航保驾，保驾的走私货已由百货发展到枪械、毒品且发展趋势惊人。

面对十分严重的投机，贪污，腐化堕落，中共各级政府不时抓几个替罪羊，在向全国的小倒爷们打招呼的“宣判”大会上，真正的大倒爷便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们依然架子实足的在电视节目上，振振有辞的作着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摘几顶奴才的花翎顶戴给百姓做做样子。

在这样的大好时机下，老同学召开了厂长会议，我们办公室的王主任开会回来传达说，企业要立即进入三级“达标”验收，现在全厂人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这个中心工作。从那时起工厂的广播里天天宣传这个中心工作。

所谓“达标”是指工厂在管理水平，生产能力，职工素质，利润指标达到国家对企业三级的要求。

达了标的企业在国家货款，更新设备，职工宿舍申报和增加工资，奖金发放上有诸多好处。而本厂这种萎縻不振，工人们干活磨洋工；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和吹龙门阵，都必须在达标运动中统统克服。

在奖金的刺激下，在一再讲明三级“达标”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鼓动下，一场我从未见识的“运动”，便在工厂沸沸腾腾开展起来。

总工办在这次“达标”运动中是全厂核心组织之一，大家忙碌的搬出过去制定的工厂管理条例，在市机械局派出的临时工作小组指导下，按当时市机械局认可的江北机械厂的管理“本本”，进行“整改”：抄写他们的工厂方针，从管理部门的设置以及职能的确定，到各种原始记录的存单和报表，无不连夜连晚的进行腾写，印制。

最困难的是，必须赶紧补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原始记录和报表，例如，设备利用率，原材料消耗率，工时利用率，以及成本核算的原始数据原来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让验收工作组在验收时，可以根据这些“原始记录”，来核实工厂是盈利还是亏损。

根据原材料和配件的质量文件和制造过程的现场记录，检验报告来证实生产出来的都是名符其实的合格品。在几天内凭空仿造江北机械厂的蓝本，伪造记录和单据，便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

这本是中共执政的法宝，毛泽东就是用欺骗和伪造愚弄百姓整整二十八年。

邓小平讲“实事求是”是讲他继任的是一个烂摊子，用一穷二白，以否定毛泽东的形势大好。但是为了愚弄民众，这欺骗作假的传家宝却一直没有丢掉。政府部门如此对付国际舆论和老百姓，企事业单位如此来应付政府，相沿成习，不用怕“一经查出，国法不容”。

只是所有的记录，单据发票，文件要前后一致，有名有据，这编假伪造的工作量就不小了，为了保证在规定的“验收”时间内按时拿出来，厂长办公会议作了硬性规定，凡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这些“假”证据的，一律扣除奖金。

于是，所有的职能部门从经营办公室，到车间负责统计的人员，动用了所有的人手，加班加点赶制这些“验收”依据。这段时间，办公室里平时喝茶吹牛的现象收敛了，连工会，党

委办公室，这些平时闲得无聊的部门，也被组织起来成为“督战队”，不分白天黑夜参加了这场“战斗”。

整整忙碌二十多天，各办公室常常终夜灯火通明，一般的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这可苦了我这个既当爹又当妈，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人，除了白天加快了接送孩子的脚步，晚上加班时，我只有临时的把孩子托咐给隔壁的刘大妈。好心的刘大妈也乐意帮这个忙，靠了他才解了我二十多天的加班之忧。

正当全厂准备迎接达标的验收准备工作正酣之际。有一天晚上，大约已是一点钟了，突然从总务科传来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听去像有人在打架，又像有人偷东西被人抓获。

不到半小时，一段头号新闻便在黄色大楼里传开了。下去的人在总务科的办公室门口看见，三个老工人正在抓打着厂长的小舅子，有人在厨房里找到了一根绳子，准备将他就地捆扎起来。而办公室的灯光下面，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看热闹的年青人，一眼就认出了那分明是财务科的核算员。

一个小时后，值班的纪委书记，叫开了三合院李友的宅门，将这个丑闻告诉了他，并且讲黄色大楼已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总工办，要求当场将二人扭送到派出所。李友不得不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将舅子撤职，并将他开除工职留厂查看，至于那女人只能严办了。

第二天下午，全厂职工大会在农汽厂后院大坝召开，老同学在会上痛骂小舅子在全厂验收定级的关键时刻，做出这等破坏验收工作的蠢事，并将对二人处理决定，当众宣布。第二天以厂长办公室名义，向各职能部门和车间发出印刷好的处理决定，以示他秉公执法的决心。

正愁闷之际，机械局来了电话，通知他，工厂验收工作组，决定在国庆节后，进厂验收。

“国庆”节刚过，厂办工作人员身着清一色笔挺的西服，站在工厂的大门边，振耳的鞭炮声，迎接着几辆从云泉路上徐徐开来的轿车，大门左侧立着一块足有两米高的巨幅标语上写道：“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同志光临我厂指导工作”。

正对大门的黄色大楼房檐下挂着二十多米长的红幅，上面写着：“全厂职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和饱满热情，迎接我厂达标验收的顺利完成。”

销售公司的门口仍排着长队，但已经增设了几间接待室，买车的用户可以在那里休息洽谈价格，并签订合同，办理提车手续。工厂门前的那个“黑市”被厂的保卫临时驱散，不知到那里去“暗箱”操作了。

黄色大楼已打扫干净，粉刷一新。会议室重新换上了新的办公用具，各车间的泥墙上都被“整容”，用石灰水重新粉刷，雪白的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所有的办公室都把各自的职能条规，框在镜框中挂上了墙。

所有的车间大门、过道、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墙上和刚刚添置的玻璃灯箱里，贴上各种工种的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安全条例。

三级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验收的评分怎么打？怎样演完这场验收戏？这对于刚刚进厂的我全都一无所知，而且我敢说凭我的直觉，就是这家工厂的大半老职工也绝对弄不明白。

大家担心塞给验收组的那些赶制和伪造出来的“资料”，会不会被明眼人识破？使二十多天来的辛劳功亏一篑？

大家心里明白，工厂依然是一个月前的那个设备陈旧，管理涣散，编制超员，工人消沉，产品低劣的老样子。只是老叫化子临时的换上了一套新装而已，它的本体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三级”所规定的那些标准。

工厂所以出现短期的兴旺，纯粹是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促成的，与报表上、资料上显示的数据、记录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验收工作组嘛，都是些经过局里挑选的处理“假材料”的好手，他们对企业上演这种假戏非常熟悉。何况那些手册，报表、摆得清清楚楚，验收的标准又统统上了墙，那是气氛极好的舞台。

余下来就只要厂级领导工作“做到家”就行了，经过厂长工作会议研究，验收开始的那一天，厂级领导全体出动，隆重接待验收评定小组的全体人员，安排最好的宾馆和最好的伙食。对于娱乐，验收过程中，都分派了小姐相陪。加上对验收组成员，准备了一份不薄的“红包”，三级达标万无一失。

验收工作组进厂的第一天下午，老同学主持了一个场面热烈的欢迎会，当时还没有摄相机，厂部的五部照像机和广播室的录音机全部出动，第二天便从广播里传出了李厂长主持欢迎的致词，那声音高亢而乐观：“工厂近两年来，由于形成了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他介绍着自己的工厂，但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同所有副厂长的貌合神离的实况，这种关系成因于制度，他们不必为工厂的生死而过虑。所以从名义上讲，他们与工厂的头是“平起平座”的。动辄可以指责企业的“法人”，但又决对无权控制他们，貌合神离便是工厂中必然的厂群关系。

那李友继续在喇叭里喊道：在领导班子，实干苦干和务实精神的带动下，全厂一千三百职工拧成一股绳，扎扎实实推行了工厂方针和基础工作，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力促进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连串八股式的废话，见于报纸，闻于广播，实在是浪费听众的时间。

接着是编了一大堆谎话：“我们的职工每天都满负荷工作……今年迄今为止已装车八百台，预计年内将突破一千台大关……在年产量达到五千辆的能力时我们会把上级验收组的领导们，再请来为我们厂验收二级达标。我们一定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李友的结束语激动而有力，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王主任说：她看见他那时对着麦克风的脸通红通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带着微微的颤抖，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说他在公开的撒谎，其实也不全是，例如职工们满负荷工作，加班到深夜就讲的这两个月来的实情。

不过，这加班所干的事是决不能公开的。工厂年产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核实过，估计也是事实，就是说今年这横财到来时也才出车一千台。按正常的利润，每生产一台车三千元，每个职工每人平均只有 0.7 台，年收入 2000 元，平均每月 150 元，有什么好炫耀的？

可惜即使这样容易的计算，也没有人去算过，靠正常收入来算，今年工厂的利润总共不到三十万，何来两百万的利税？这一点，银行也是容易计算的，然而两百万的收入肯定是胜券在握，否则老同学也不会在那里吹大牛。

至于老同学最后的豪情壮语，纯属自我欺骗。然而国家向农民的贷款能坚持多久？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有多少工厂都会挤到农用卡车的生产行列？农用汽车厂的内部管理竟如此空虚，空虚的管理能把这种高利润支持多久？老同学难道没有想过吗？

我一边听李友的演讲，一方面暗自为他捏一把汗，他果真在玩着自欺欺人的勾当，须知古人言“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尽青山卖，不用人间造孽钱。”然而今天“吹嘘”又是中共习以为常的作风。想想它的开国宗师当年如何在贫弱的中国土地上，向世界吹嘘实现了共产主义？

欢迎会开完，第二天验收组的成员在厂部指定人员的陪同下，忙着在各职能部门和车间翻阅那些“资料”，抽本厂人员询问，核对有关的记录、照片、报表，整整忙碌了三天，基本的分数都打出来了，李厂长又雇了豪华旅游车，安排验收组所有工作人员去大足、统井等附近的旅游景点“放松”了三天。

一周以后，验收组圆满完成了这次验收工作，只等几天以后，由机械局正式根据评分结果发文，认定农用汽车制造厂经过“严格”的企业达标验收，正式成为市级合格的三级企业，工厂也升级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李友为此，召开了全厂“达标暨欢送市验收工作团”的大会，厂门口响了半个小时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机械局的局长将企业正式命名为市三级企业的证书交给了李友。随后，李友驱皇冠轿车跟在市达标验收组的轿车后面，开出了工厂的大门，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紧张”的验收闹剧。

然而，在这两个月里越演越烈的工厂内部矛盾，在工作组刚刚离开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第二天，李友以总结达标为名，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了厂务会议，他一开始就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公布了这次达标中各职能部门的扣分值。

总工程师下管的六个部门除总公办外还有设计科，工艺科，检验科，计量科，资料室，本来就是达标检查的重点，需要应付检查而伪造的图纸，工艺文件和质量记录数量最大，因图纸工艺文件的错误和不当最多，所以扣分多本是正常的。再说总工是厂长最得力的助手，李友对他应更多加帮助才对。

然而小舅子的丑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加上平时矛盾日积，使李友借验收小结机会，当着全厂所有职能部门训斥王重疏于职守，说总公办人浮于事，超编超员，无事可做。说王重千方百计把厂里的漂亮女孩子调进描图室，并且说他几次路过总公办时，都看到王重同描图员摸

摸打打。

当着全厂中干的羞辱，使王重恼羞成怒，当即拍桌而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整个办公大楼为之一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向机械局告状。

王李二人的矛盾，已经表面化。老同学利用自己的权利派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描图室的用心，是人人共知的，李友为紧俏的农用车设制车券；并以“便于工作”为名为自己私分汽车券的事，被王重联合其它副厂长成功的将到嘴的肉拖了出来，使李友心中结下一个大疙瘩。

当然，厂级的头们何止王、李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日常工作摊派，安置“后门”，形成自己的小山头。在收买和刺探对手的隐私，各有自己的亲信，八名厂干八仙过海，对工厂巧取豪夺，早已不存在开诚布公了。

老同学在向验收组，吹嘘工厂“拥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实在令知情者闻之嗤鼻。

第二天老同学将我叫到了他家中，询问王重在验收达标过程中有哪些言论？我说什么也没听见，老同学脸色很不好，我是绝对不愿意夹在两人中间当一方的枪使，古人有戒：“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想到在两人间，难以应对这种无聊内讧，第二天我便主动向王重请求调离总工办，到金工车间干点实事。得到王总同意后，便递呈了请调报告。于是，我便以一名普通技术员的身份调到了车间，脱离了总工办这个是非场所。

走进金工车间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墙上张贴的那些应付验收的东西已经撤去，打扫干净的地面，重新是铁屑、垃圾满地，那刚刚粉刷的墙壁，又被霉气和废机油所污染，失去了光泽。

九点钟，我在车间主任陪同下，走到技术室门口，只见那左边的钳台上围着三四十个工人。一个中等个儿胖胖的中年人，正站在一米多高的钳台上，眉飞色舞的向围听的人“公布”刚从财务科透出来的“快讯”。

“昨天下午，财务科又给机械局开了五万元支票，财务科说，那是李友答应的验收咨询费，嘿！这些机械局当官的，工厂亏损的那一段时间，鬼都看不见一个，这几天，工厂的大门都要遭这些人挤爆了，你们数过没有，验收那天，工作组开来的轿车就是五辆，他们刚下车，李友就点头哈腰把他们接到泉外楼宾馆，中午在缙云餐厅开宴会，喝得醉熏熏的，晚上还要请跳舞，你们算算看，旅游、吃喝、加上红包，这些龟儿子，又从我们身上括了几万块走？”

经他这么一煽，人群议论纷纷，有人说：“机械局已经许下的，这次企业达标，李厂长年终就要分到一万元奖金”。有人说：“这次达标验收的最后一天，李厂长，在小车子里一次就塞给带队每人三千元……。”

当他发现张主任在听，胖胖的中年人解嘲的喊道“张主任，这次验收你分了几千？向大家坦白坦白。”那张主任笑了笑说道，“陈左派你在这里乱说，总有一天要遭李厂长炒你的鱿鱼。”

然而那胖子却越说越起劲，继续用大喉咙压倒大家的声音说：“昨天早晨，税务局的所长

带了两个税官来，说工厂前几年亏损，免交了税钱，今年盈利得把这些老账还清。李友怕他这一搅，会最后影响达标的结论，赶快把那所长请到泉外楼去，也不知悄悄塞了好多包袱才摆平。

殊不知那税官刚走，银行又来找李友，要他把去年欠交的利息一并交清，李友又赶快应付银行。这两件事还没有办完，那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的记者，又在厂长公室等他，说要采访他。我看哪，采访这个宝器还不如来采访我陈左派，那李友上台几天，洋相出尽了，小舅子又不给他争气。”围听者哗哗大笑。

我忽然想到这几天销售科的紧张状态，他们因为缺货脱销。一再向生产科和车间催促生产进度，便下意识向装配后轿工段望去：

车间大门左边的落地车床前面，堆着一大堆制动鼓，工人还在那里悠然的抽烟。三台磨床和五台铣床的周围全被堆积满地的毛胚另件阻塞着。两名女工，好像在那里打毛线，前方排列的二十台 C614 和 C612 车床，只有几个床开亮了电灯，那里面堆积着杂乱的工件。

再往里看，三台摇臂钻床前面除了堆积的毛胚也没见一个人影。而车间最深处两台满身油污的坐标镗床前，则由堆成小山一样的差速器壳堆得难以插足。

在微弱灯光下，机床似乎因为年事已高又很累，静静的躺着不愿意启动。车间的左边一排钻床旁边堆满了制动器、后轿轴等等另件，点着灯却不见几个人影。一看上班的人几乎大半集中在胖左派所站的钳台周围。

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钟了，张主任催道：“喂，上班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该动得了，还围在这里吹什么牛？”人群才开始慢慢的离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嘟哝着：“急什么？反正只有那么几个钱，这几天天天加班……”另一个附和道，“是呀！干活的是干活的，捞钱的是捞钱的，不管你干出多少来，赚的钱还不知道流到哪个的腰包里去了？”

一个女工，拉着他的伙伴催促道：“周燕，你还不快把你的床子赶快调好，昨天你整整一天停了机，一个制动鼓销子也没有车出来，钳工等着要装的，今天你再车不出来，这个月的奖金，全要被取消了。”

那被摧的女工却吼道：“你别装积极，前天晚上加班你跑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又去那皇冠舞厅找那姓何的，小心我告诉你老公剥你的皮。”于是两个嘻哈打笑地拉扯起来，向车间左边那排车床走去。

原先暗淡的车间，开始亮起来，几台铣床开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工人们慢慢地回到自己的车床前，或钳台上去，一天的工作算是启动了。我回过头去看看技术室前面的钳桌上，那刚刚口若悬河发布“快讯”的胖子，还坐在钳桌上同几个老工人继续在讲这个月的奖金分配。

看到这样松散的工厂，又一次使我后悔，但这年头，到那个单位，那一个地方还不都一样？看今后怎么发展吧？于是提起装着绘图仪器和记录本的帆布包，随着张主任一起跨进了技术室。

那屋子里光线极暗，迎面一股霉气向我们扑来，仗着那办公桌台灯我看清了，屋里放着

三张办公桌，里面的墙和门对着的地方，两张办公室桌前已坐着两个人。只有左面墙边的办公桌是空着的。

我们进去时门对面的那一位转过身来，张主任向我介绍说，他叫黄祥老师傅，看上去他的个子很矮，但非常结实，年纪与我相近，在总工办就听到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由技工提拔起来的技术员，颇有实干精神，是我今后长期合作的伙计。而另一位姓张，原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技术员。

张主任出去以后，我在剩下的那张办公桌上放下帆布包，打开抽屉，三个又肥又大的蟑螂在里面乱窜。抽屉也生霉了，我一边从屋外打了一盆水，洗擦着生了霉的办公桌，将帆布包里的绘图仪器，一边往里放，一边担心的说，这些仪器和书会不会今后霉坏，或被虫蛀咬？

黄师付向我介绍说：这屋子是靠山修的，与地下室差不多，已二十多年历史，修房子时我才进厂，每到下雨那墙上就渗出水来，当时正是灾荒年间，国家没有钱，在车间旁边傍山塔个砖柱棚临时用着。

我又抬起头来看，屋顶盖的石棉瓦，有几处已经破裂，看得见那里漏出来的光缝，于是我指着那光缝问道："下雨天不漏雨么？"老黄回答道：

"这石棉瓦，早已老化，后勤科的维修工也不知来了多少次，他们说那石棉瓦是整块式的，要换就得整个屋顶都换，只好将就着，等到工厂挣了钱，把车间重新拆掉，可惜，建新车间的话，已二十多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工厂一直穷得连厂里的环厂道路都修不起。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看到新的车间在这里重新站起来。"

他说时声音里很悲观，这可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工厂前途的估量。

"工厂今年赚了那么多钱，李厂长不是提了一个工厂技术改造的方案么，改造各个车间可是这个方案的第一内容。"我说道。

然而黄师傅却说："你别相信他的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拆了车间又搬到那里去？何况这钱赚到那里去了？李友这个人，我已同他相处多年，他能干得出什么好事？除了安置他的亲亲戚戚他还能干出什么来？"黄师傅介绍的李友为人和业务能力，大致与总工办所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然而，福星高照，1984 年农用汽车制造厂当年实现了 100 万利税，不仅顺利达到国家对三级企业这个指标，为李友涂上了一圈光环，在全国普遍的经营不振，亏损严重的国营企业中，鹤立鸡群的脱颖而出，荣登四川省 1984 年度四个盈利大户的光荣榜，李友碰上了最得意的时光……。

那些正为国营企业的困境，弄得市政府的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记者便抓住了这个典型，频频来厂采访，大量报导农用汽车厂的"事迹"，以及不知道怎么拍出来的照片，把这家工厂吹得上了天，不但突破了重庆范围，还突破了四川省的范围，好名好利的李友岂可放过这人生一世，只此一回的风光时日？

他频频地和蔼可亲接待着所有来访的记者，李友的巨幅照片见诸重庆日报，四川日报以及经济日报报端。而他的长篇论述，在经济日报的显着版面登载，农用汽车制造厂 1984 年底醉熏熏地蹒跚在农民抢购汽车的春风中，而李友却驾着这抢购的春风，名利双收。

然而，正当这位四川企业的明星每天出入各种招待会，酒醉半酣同来访者，上级和政府官员合影留念时，全厂几乎所有的职工，从“财务快讯”中知道，工厂每天都把发横财得来的钱，通过李厂长等“领导”的手，大把大把的塞给那些对工厂毫无贡献，甚至是些与工厂毫不相干人的口袋里。

那被奖金激起的兴奋，迅速地化成牢骚和唾骂，人们指着这段时间进出厂门的小轿车骂道，又是一个“吸血鬼”来吸我们的血了。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大家说工厂是厂长的，这太荒唐，因为工厂真是厂长的，他能将自己的钱随便乱撒么？他能对工厂混乱的管理置若网闻吗？他能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么？

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分配是使职工怠堕的温床，是千真万确的！表现之一便是职工借各种渠道从生产工人向着科室和库房管理“挤”。

偷懒的工人被管理者督促时，反唇相讥的回敬道：“你再积极也只是个工头，你有本事去叫那些坐着小轿车，吃得嘴角流油的人干活吗？”更恶毒的人当即咒骂道，“你看你那熊样，只会欺侮我们这些穷工人，在当官的面前你自己照照自己，还不如一条狗。”

被骂的人只能张口结舌，久而久之，车间主任也讲，“得过且过，何必多得罪人自讨没趣，”无论生产任务有多急，每天早上必延至九点半才开动，平时断断续续地劳作，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那怕工厂再好的效益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便是大陆中国的国有制企业。

正当农汽厂销售正旺，产品脱销，十二月底，总装车间却传来了停工待料的消息，因为缺车轮钢圈，看看已经装好的底盘却上不了轮子，底盘因此中断供货，总装车间停产。黄色大楼的生产调度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管生产的副厂长在生产会议上责问经营厂长，说道：“你怎么连汽车走俏，汽车零件也会跟着走俏这点常识都不懂？为什么不理生产科第三季度提前预报的采购计划，造成这种缺钢圈的事情发生？”

经营厂长面对生产厂长的怒容，明白在目前状况下停工待料，就像行军打仗断了粮草一样严重，他会因此被扣奖金，甚至降职撤职。

所以连忙解释说：“因为对零件涨价因素估计不足。其中涨得最快的是轮辋，与今年年初相比价格涨了一倍，如果在五月份按生产科所报计划采购，那么，资金投入就会大大超出预算。李厂长预先就打过招呼，凡是超出的资金必须经过他批准，所以我们把采购轮辋压了下来，请示李厂长的结果。”

“他指示说：‘到今年年底还有好几个月，估计年底时价格会回落，等到十一月份再买不迟’。这么一决定，轮辋就没有按生产科的计划采购，殊不知等到十一月，轮辋非但没有降价反倒来了个缺货，再高的价也买不到了。”

一般说，责任追到法人身上就告终止，李友又是走红人物，日理万机情有可原。何况这“估计”谁又能算得那么准？

生产会议兜着圈子整整吵了一天，毫无结果，责任者一个也没有找到。所有参与生产、供货、技术各部门都可用恰当的理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工厂是为自己在生产，那么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办法克服这种事发生。

生产会议最后只能责成供应科，赶快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抢购，过年也不许休息。商场如打仗，对于瞬息万变的供应市场，谁又能料到农汽厂会因一个另件，而眼看千载难逢的大好赚钱机会白白丢掉。

过细想来，这位连汽车紧俏时该多多备货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老同学，怎么配带领这千余职工在商海里去拼杀？他是否知道在自由竞争之下，商机都抓不住的人只有淘汰出局？

眼看那些提着钱袋，焦急等在销售科窗口下的农民，听到几天内无车供应的消息，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带着失望匆匆散去。

他们可等不起，私人贷款的利息并不会因为买不到车而免付。春节时期运输黄金时节，他们巴望买到一辆货车，拿来搞运客运货，把赚的钱尽快抵偿这笔“贷款”，于是背上钱袋连夜起程到省外抢购卡车去了。

这位老同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还比上了这些普通农民。农用汽车制造厂在脱销情形下，因缺汽车轮胎钢圈，元旦将要到来的时候放假三天。

在农汽厂有史以来的“大好形势”下，每个人只领到五十元的过节费，却要拿五十万去贿赂钢圈厂的厂长！

李友被钢圈的事扰得心烦意燥，但看到他的巨幅照片仍照登在重庆晚报上，在那画面上，他微笑着向全市全区拜年，代表农用汽车长恭祝大家 1985 年元旦快乐发财，心里便心安理得下来。我却对他笑容可掬的照片发愣，难道他真失去了自知之明，不明白他所管的这家“明星”企业多么混乱和虚弱吗？

1984 年在热闹和争吵中过去，鞭炮声迎来了新的更加热闹的 1985 年，按传统的中国民俗，旧历腊月三十才是一年的年底。元旦过后，年关在耳，所有职工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年末奖金的分配。

没有几天，劳人科关于 1984 年末奖金分配的红头文件，下发到车间和科室，党委书记马兵根据机械局颁发的文件精神称：“要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作法。”所设的奖项和每个奖项的金额规定，奖金按发放的系数“拉开距离”。

如果现有工人领到的系数为 1，那么凡属厂级干部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几个副厂长奖金系数规定为 4，中层干部及车间主任系数为 3，技术人员和一般干部和工人中的班组长为 2，第一线的工人为 1.5，勤杂工为 0.8。

厂长的奖金是工人的四倍！但马兵还嫌不够，接着又抛出一个各部门负责人，兑现承包合同办法，对于完成任务的厂长，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发给额外的承包奖。这样一来，厂级的头头们可从 1984 年年末分配中得到六千元的奖金，车间主任也不低于三千元，而工人只分得三百元，于是这距离在年终奖上就拉开了足足 20 倍。

同时他还抛出一个名额占全体职工的 5%的“先进”指标。被评上先进的人当年工资增加一个序号。奖金分配、承包兑现、评选先进三大年终分配办法，颇费了马书记一翻心机！这敏感的分配方案，以职代会的名义，由劳人科正式发布。

胖左派迅速站到工厂门口，当着做工族们吼到：“工厂是工人的，厂头们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劳动，还要借开会出差公费旅游，吃吃喝喝全是我们工人的血汗，而工人们成天埋头在车间里干活，到头来一年辛苦，我们挣到的奖金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这叫飞起来吃人，这里还讲不讲理？”

劳人科办公室为年末奖金分配闹得乌烟瘴气，可惜再怎么闹，奖金的分配仍按红头文件规定条文执行，工人们也只有吵吵架，充其量说些：“老子干得再多，还不是替别人干。”“老子巴不得停产，大家都不要得那钱。”磨洋工，上班迟迟不动工，提前下班，懒懒散散。

别以为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声讨这些“吸血虫”。工人们发发牢骚是可以的，遇到具体的利益冲突，照样可以自相厮杀。这都是文革的遗风!!

马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那百分之五的先进推举，自然成了工人间相互指责的导火线，因为这 5%的先进是与当年工资升级挂起勾来的，工人们在提名上相互攀比，车间到处是推选“先进”的争吵声……宁可使生产停下来。没有选上的人说：“让评上先进的人去做。”

这样闹了几个月。在大锅清水汤长期泡惯了的国营企业职工们，本就习惯于低工资这种“平均”所营造的宁静，现在被马兵们扰乱了。

权利在手的工厂经营者，在中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差距”的掩护下，故意放纵贪污。掌权而不受监督的中共，使工厂管理者腐化！他们羡慕资本家的富有。认为富裕是人当然的追求，不必追究怎么致富。然而，靠权力致富这种共产主义效颦，恰恰成了公开的掠夺。

按照工厂的规定，进厂不满一年的职工，奖金是要“打折”的，但我在车间主任那里还是领到了三百元的年终奖。我才进厂，还不知道同人比较，但这笔奖金是我在学校几年所得奖金的总和，加上进厂五个月发的月度奖总共五百元，够买一台“福日”彩电了，邻居们羡慕我走了好运，调进了一个“好单位”。

年三十的那天下午，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中碰到了李友。又碰上厂办的黄色伏尔加轿车从左面公路上开来，我远远看到那辆车就在李友身边停下，满面红光的马兵精神抖擞地从车厢里走了下来。

他身着黄色皮大衣，提着装有保险锁的高级提包。一下车便迎着李友向他伸出的手紧紧相握。在一片“辛苦了”的客套话声中，两人互道问好并拜了年。

马兵是奉厂务会议决定，专程派往南京汽车制造厂乞讨钢圈底盘的“钦差大臣”，今天上午才赶回来过年。只见马、李二人肩并肩向厂门走去，那马兵还不停将嘴凑到李友耳边，好象密告不容他人听见的秘密信息。我的心中又是一阵纳闷。这么紧急的采购件竟没有带上采购部门的人同行，令人疑心。

与马兵几乎同时外出的工厂生活厂长肖足，据说是为筹集即将动工的油漆车间的厂房，和已经批下来的三幢职工大楼的木料，专程去西双版纳等地采购木料的。

油漆车间的技术改造是李友在验收达标时，向市验收工作组和上级主管局提出来的。他要求工厂今年实现盈利的三百万全部留在工厂，作为他上任提出来对工厂实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

为了在主管局换得信任，他曾起草了工厂技术改造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改造油漆车间、冲压车间、金工车间、冷作车间和总装车间等八个技术改造项目。

这个夸夸其谈的技改方案，当时曾赢得重庆市主管局的喝彩。由于这个计划，李友被提名上了四川省 1984 年度的四大明星企业厂长的光荣榜。在四化口号下，有多少赵拓应运而出啊！

我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当时最时髦的假大空产物。因为以后的实践证明，计划提出既没有市场需要为根据，更没有工厂所能承担的物资、资金为依据，单凭一个突然因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而暴富怎么可能实现？

至于李友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是用农汽厂发横财的机会赢得中共当局的好感，还是另有图头，自会在不久之后暴露。不管怎么说，1984 年工厂发横财挣来的 350 万盈利，全部留给了工厂作 1985 年技术改造资金投入。

根据 1985 年度李友技术改造规划的第一项目——改造油漆车间，老同学趁热打铁，启动了重庆市的媒体在各种报纸和广播瞎吹，说这是迄今为止，前处理容量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除尘效果在全川最好的一个车间。在油漆车间掩护下，新的职工宿舍大楼同时启动……

三幢职工宿舍，各七层，共 78 套住房，其中二楼三楼全是“工程师住宅”，共十八套。每套建筑面积近 100 平方，每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厕，是当时北碚地区的厂长们都没有住到的最豪华住宅。

竣工后，搬进去住的第一户人家当然是李友，当我和工人们一样，还在为遮风避雨的陋屋发愁，老同学却嫌那三合院的两室一厅欠气派。他打的这个算盘，可比马兵在奖金分配上的主意高明多了。

三幢大楼预计投入百万，然而破绽还是被基建科的杨科长识破了，他说：“按照李友提供的三幢住宅的房屋设计要求，这一百万恐怕只够修一幢大楼。”

与此同时，去云南采集木材的肖副厂长，被人发现，买回来的近二十个立方的木料，运回北碚时并没有在大白天正大光明的返回本厂，而是深更半夜，开进了天生桥附近的一个竹木社坝子里卸下了。过了两天，又派车到那里向竹木社“购回”。

这种奇怪的过程立即被胖左派抓住，他们私下从竹木社采购人员口中证实，两天后从竹木社买回工厂的木料，价格竟然高出了云南价格的两成！这种倒卖使他把五万元捞进了自己的腰包。

闻到这猫腻味，胖左派并不甘心，再深入的向竹木社打听，由运木料的司机证实，在购木料期间，利用派去运木料的卡车，从途中的威远铁厂将几十吨生铁运到重庆倒卖给铁作社，估计从中至少又获利五万元。

问题迅速传到了工厂纪律检查委员会罗书记那里。那罗书记竟然不作调查取证，而是将这件事全部的抖给了肖副本人：“有人反映你在云南运木料时，与竹木社勾结，经过竹木社的倒卖，从中牟利，请你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案情发展，我都是听说的，不想在这本书中占据篇幅，只想说罗书记正式的提讯冉某，冉某被追急了，最后凶相毕露说：“我劝你还是知趣点，不要再追了，追下去这个工厂所有厂长书记没有一个脱得了手。”罗书记自觉棘手，他明白不能再追下去，案子在他手里便不了了之告了终结。

那时倒手买卖已经在国内成为风潮，大官大倒，小官小倒，正名曰：“做生意”，搞活经济，似乎于经济发展有利。倒的钱也不知道滚出多少利，最后都落进了中国特色倒爷们的腰包。

社会主义先富起来的“阶层”，便从这些手段中一步步累积起来。倒得不好，暴露了，受到查处（以后叫双规），充其量只是一个撤职查办的行政处分，何况倒爷们互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久传来消息，说某地银行负责人，因收不回向农民发放的贷款而受到追究，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又遇到了问题。银行不可能向农民持续发放这种难以保证收回的“风险投资”，农用卡车也不可能长期由几家农用汽车厂“独家”生产。

然而在诸多不利条件下，最不该因缺件而影响生产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因为轮胎钢圈迟迟不到位，在短期的发财季节里，八五年一月份的产量仅仅只有十八台，二月份装车实际上只完成了十二台，三月份也只完成了三十台，三个月装车总和不及正常情况下一个月生产量的一半。

黄师傅气愤的说：“这点产量，别说是发奖金，恐怕供一千人喝水都不够。”

然而，人生一世几回才逢得风光的机会？该出风头的时候还得抓紧机会。春节刚过，全厂便抽出一天，整队到油漆生产线的工地上，那天正好起了大雾，布置在工地周围的彩旗在大雾中隐隐拂扬，党政工团敲锣打鼓的捧场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群记者，背着照相机在大雾和彩旗中穿梭！

今天选了个黄道吉日，定为给油漆车间奠基剪彩的好日子。李友态度严肃的主持了这个仪式，他发表了工厂未来四年中美好的规划，他的演说依然那么富于词令和感情。四面的照相机照例又对准了他，发出一阵喀嚓喀嚓的响声……

可惜，光阴并不饶人，农用车走俏的大好时光，也是老同学踌躇满志的岁月，像箭一般倏忽而过。到了四月份，所缺的钢圈和其它总成的供应源源不断的跟上，生产也开始恢复正常时，唯独排在销售科办公室窗下等候“提车”的队列却悄然的消失了。

有人说是农忙季节来了，买车的农民要赶着回家种粮食、插秧。有人说是我厂生产卡车的质量常出问题，所以买车的人都跑到其它生产厂家去了，农用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由脱销变为滞销。

但是，既是“明星”厂长，岂甘束手无策？更不可能露出半点慌张，为了挽回即将到来的危局，他必须摆出一付胸有成竹、稳扎稳打的样子。于是他立即在销售公司召集了紧急工作会议，短短的开场白以后，便从皮包里取出了一大扎的材料，打开后，摊在与会者的面前。

那是些用户一大堆关于质量投诉的复印件，以及几十封用户的检举信。那上面指名点姓告发销售科的工作人员如何无礼地谩骂顾客，如何变着花样逼着用户掏钱请他们进高级餐馆，送高级香烟和高档名酒，以至于钱。

厂办秘书小吴一边读着这些信，李友两眼盯着这些在汽车走俏时，动辄就在顾客面前甩牌子的“骄子们”的反映。今天他是来抓替罪羊的；李友把滞销的第一板子打在销售公司的段经理身上。小吴刚刚把选择出来的信读完，老同学故作愤怒，责令销售公司经理老段对这些用户来信作一个交待。

然而老于事故的段经理，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抓来的替罪羊。工厂短期暴发时厂长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谁才该负这个后果责任他心明肚亮。那时，厂长吃饱喝足名利双收。现在工厂走下坡路，却要他不明白的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当然不会听人作弄。

他不紧不慢从夹子里取出一叠三包服务的记录和用户来信，从容地朗读起来，那上面不仅记录着用户刚刚才接手的新车子，在路上就发生诸如刹车蹄片没有调整好，使制动抱死，刹车失灵；因为线路接错，而使全车线路烧坏线；因汽缸油路不通，而使发动机活塞卡死；等等。

大家一听都明白，这些问题是装车件的质量低劣，供应质量保证体系没有建立的原因。

于是整个会议将责任从销售公司转移到产品质量。段经理把滞销的原因归结为产品质量的低劣，以及生产部门和质量部门和供应科的失职。

然而供货厂家和检验科长又在会议上出示了检查报告和记录，证明各种质量问题早已记录在案，并且上面批着“不准进厂”的检验记录，只是因为脱销和缺货，由李友在不合格的判决书上签上，“此批放行，下不为例”的批示。

问题又重新追回到李友身上，厂长主持的厂长会议就这样玩着踢皮球的游戏，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踢到下午三点钟，整个会议室被香烟的浓烟包围着。所有部门负责人，都起劲把球

从自己门口踢到其它部门，谁都不承担责任，谁都对挽回滞销的颓局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

像这样的扯皮工作会，十年一贯如此。我看见老同学在香烟的浓雾中显得焦头烂额，工厂发财时风头出尽，如像过雨云烟般晃然而去？他曾在半年前听到的后果，竟这么快降临了。他看着面前正在猛踢足球的人，那一个没在工厂发横财时没沾过光？而现在又有谁能替他分忧？

他脑子里浮现着满坝的“兰地毯”，库房堆积着数千万元的另部件积压，面对财务科长哭丧脸，第一次感到给全厂职工发工资的担子这么沉？他在考虑怎样从明星厂长的位子上体面退下来了！

反过来一想，亏损出现使他混不下去，充其量将他另调个地方，重新东山再起。于是他又松了口气，现在该思考如何找客观原因体面的退下来了。

于是，他从浓浓的香烟烟雾中抬起头来，打起精神作了小结，在对各部门各打二十大板后，发出了一道责令限期整顿的指令。

然而他回避了因轮胎钢圈缺货造成的停产。也不提各部门的头们如何用公款吃喝玩乐，对于汽车券的倒卖和肖副倒卖材料只字不提，对马兵过年前提走的五十万就像没发生一样，他知道，提及这些眼下很敏感的问题会引火烧身。会议毫无结果散去。

正当农用汽车制造厂开始亏损滑坡之际，一个由马兵签发的劳动人事科〈关于 1985 年度农用汽车厂调整工资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在全厂下发。按照当时机械工业部有关企业职工调整工资的条款规定，企业只有在当年获取利润以后，才可以按照所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

由于连年亏损，农用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升过工资了，据黄师傅告诉我说，北碚市民有一段时间曾评说，在菜市场上为两角钱一斤的毛毛菜，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的都是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物价飞涨而没有效益的农汽厂职工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工资升级上面。

牢牢掌握工厂管理大权的马兵们，不顾工人们的反对，下发了由他亲手制定的 1985 年工资升级办法。

这个办法把全厂职工按岗位和业绩划分了四个等级，厂级领导和对工厂有“特别贡献”的人列为第一等，可以在本次调资中晋升七个“半级”；中层干部和有工程师相当职称的列为第二等，在本次调资中可以升五个“半级”；第一线工人列为第三等，本次可以升四个“半级”；勤杂工、清洁工、库管人员列为第四等，本次晋升三个“半级”；同时规定凡是无故旷工，不服从分配，有过违法行为受过拘押的将视情节减少升级的数目。

老同学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得很漂亮，他说，现在是在企业获得大盈利后的丰收季节，也是大家分享劳动成果的季节。

而工人们则一针见血的说：“掌权的人那一个不是在任职期内往自己的腰包捞钱？暗地里

要捞，走后门，倒买倒卖，收回扣，权钱交易花样百出！公开的更要捞，奖金要多占，住房要多占，升工资要多升，否则一个人当了几年厂长，不明不白的“富”起来了，今后查起来也有个依据。

中央既有政策，所以在利益上，职位越高心也越黑。以经营副厂长李德为例，他的妻子是财务科长，女儿是工会干事，女婿是总装车间工段长，在本次调资中，全家共增加了二十二个半级，而工人中的生产骨干在本次调资中只增了四个半级。两种家庭，经过这么一调资，增加的工资就悬殊了五倍。

工厂的贫富分化过程大抵正反映了全国的两极分化过程：仰仗权力而富有，无权无势则贫穷。不义之财是脸厚心黑得到的，然而恰恰也加速了这种制度的解体。

一场争夺升级的大战又一次被点燃了。能运用关系与权力挂钩的，则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能讲关系的就凭吵骂和拳头来挟持各级调资领导小组。科室之间，车间之间，人与人之间几乎都放下工作，互不相让的打“争级战”。

这种白热化的争夺，一直延续了两个月。在吵架语言的流利和用辞的刻薄方面，我素来以为四川人堪称全国之冠，这骂街尤其是城市平民家庭妇女的“长项”，这是一种以使对方当众出丑所产生的威慑力，压迫对方让步的方法。

我所在的车间计划员王某和库管员周某便是全厂闻名的吵架能手，两个人就凭着一双利眼和揭人阴私的利嘴，使车间里的人谁也不敢轻视她们，就连车间主任在争执时，都要让她们三分。论年纪她们还都只有三十来岁，一个车工，一个钳工，正是生产第一线干活的“骨干”，但是，在全厂“向第二线转移”的热潮之下，她们就凭着自己的泼辣，向张主任提出安排二线工作的要求。

开始，这位车间主任对两位泼嘴提出的要求采取缄默的态度，结果被王，周二人抓住私下安排过车床在夜间干私活的几次“违章”事件，一阵冷言风语，迫使这位主任对她们策略一下。许诺了两人从钳工班和车工班退下来，一个安排去做“计划”工作，另一个则安排为车间的工具库管理员。

国有企业的职工对于调资的认真，远远超过对工作的认真。因为工资级别决定了一个人长期的收入水平，一次调整和升级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十几年不会遇到。邓小平时代开始，工资经常调整，但是因为过去留下来的穷困使升级特别敏感，工厂的调资向来采取平均主义。

几年前工具车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一个工人的病假超过了工厂的规定，在调资时少调了一级。

虽然这一级区区只有四块钱，但那工人却以“一辈子”为借口，提着砖头去找主任评理，当场用这块砖头，猛击对方的头部，当即昏死过去。工人被拘留，他的家属就到这位主任家里坐着要饭吃，吓得这位主任在外躲了一个月，后来就辞去主任的工作不干了。

马兵四级划分的办法保证了厂各级管理层的利益，他心中十分明白，因为生产工人最苦，因不满而发生的越规行为也最多，所以他指令把调资的总金额划到部门，矛盾因而下交。崔科

长自然明白马兵的意图，金工车间在得到劳人科所划的升级方案以后，不敢怠慢，便将分到的名额又摊给了班组。

车间对所分到的级别落实到人头时，对照文件算的级别与劳人科调拨的级别差了两个级，与劳人科再次核对，问题恰恰出在两位新近才从第一线下来的女工身上，工厂管理在编制上极为混乱，计划员本归于干部的名额，但若从工人转岗时，两个人既不属于干部编制，又不属于一线定额工人。她们只好委曲于少升一级了！

两人找车间主任说："工厂已有三年没有调资了，这三年里两年零十个月都是在第一线干。现在才干了这么一个多月的库管，怎么在确定升级时，把她们当成了勤杂工？"车间明知公开照搬调资方案，一定会大闹一场！于是，把他们向劳人科一推，要她们直接去找劳人科理论。

两人商量好了，就去找劳人科崔科长，崔科长明白两人的来意，还没有等她们开口，就把马兵关于这次调资定级的办法拿给她俩看，王秀根本就不去看那文件，吼道："那马兵从西双版内转业回来才几年，就想欺侮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职工了，他在这次评级中升了七个半级，而我们才升了两个半级，你把马兵叫出来，我们评评理。

黄色大楼里两张利嘴尤如两挺机关枪，整个楼里回荡着女人的尖声叫骂，所有的办公室都打开了窗口，伸着头向劳人科指指夺夺，骂声随处可闻，劳人科处在责骂包围之中。

马兵挺知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李友打了一个电话，请李友帮忙调停。李友劝说两个女工回去，条件是立即给二车间增补两个半级。

两个女将得胜班师，临走出黄楼还大骂崔科长，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可是没有一个星期，车间的张主任被解聘。但为了怕战火再持续下去，张虽被解聘，但本次调整工资还是保留了他原来加的级。

升级的风波刚刚在金工车间平息下去，却在工具和总装车间重新点燃，工具车间一位姓黎的女工平时因为爱跳舞，住在单身宿舍经常深夜不归，白天睡懒觉，迟到旷工多了，这黎小姐该被取消升级资格，不过车间主任知道这女孩不是好吃的果子，没敢全部取消她的升级资格，只留下了一个半级指标。

殊不知黎女士将这件事与她相好的男舞伴通了气，没过几天，车间主任在上加班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围在小巷里痛打了一顿，幸好没有被捅刀子，只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家里睡了整整十天。

厂部报了派出所，可是那凶手却一个没抓到，从此以后，这位车间主任，只好自认晦气，再不敢行夜路，对以后的奖金再也不敢克扣工人了。

总装车间一位女工，因病假超过了工厂规定的时间，这次被取消了升级的资格，结果她想绝了，喝农药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当即送医院抢救，等她从昏迷中醒过来，对丈夫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为她报仇。主任听说，慌忙赶到医院陪小心。

中国人的胆子像一根橡皮筋，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十分脆弱。为升半级工资，

可以拼命，而真正要拼命时，偏偏退缩了。马书记一个调资办法弄得全厂鸡飞狗跳！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所谓按“贡献”和“业绩”拉大差距的原则，本就可以随意解释，谁掌权，谁都会站在确保自已利益的立场上。

对比起来，在“收获”中抢得最高明，抢得最快，也抢得最隐蔽的，莫过于我的老同学，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趁工厂发横财机会，捞到一套 100 平方的高档住宅。

工程师住宅楼的兴建，是李友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来的，当设计人按照这位厂长的意图绘制了设计图以后，财务处曾根据这个设计方案预测十二套工程师楼层，耗资之大，相当于整个住宅投资的三分之一，职工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工程师楼，主张增加户数，减少投入。

然而，李友心中十分明白，错过这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再也不会得到了。所以，他再次利用权力，武断做主，批准了工程师住宅楼的设计方案，并从原先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硬拨出钱来，并令颇有“倒”爷经验的生活厂长肖副，全权负责三幢职工大楼的建筑工程。

继油漆车间动工后仅一个月，云泉路上的三幢住宅大楼便开始了平填地基。

胖左派再次发表“快讯”，说肖副在确定住宅承包商时，从承包商手中得到了三套红豆木家具的回扣，他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套，也给李友留下一套，不过，当时在舆论作用下他没敢接受，等到房子分到手，人们才发现，那套家具已放在他的客厅里了。

用工程师的称号，修的工程师大楼，主意是李友出的。大楼一修好，骂声便跟随着他走麦城而雀起。

就在八四年下半年至八五年上半年，农汽厂走运发财的好日子，也成了“后门”最拥挤的时间，由李友带头，工厂各级“领导”都争着把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子女，巧寻借口拼命往工厂里“塞”。这些人没有任何调动手续，就只要厂长们点头，都可以从劳动人事科进入这家“肥得流油”的工厂。

仅我在的金工车间，在这段时间内招入的“工人”就有几十人。这些“工人”进工厂后，又被陆陆续续调往各办公室、后勤部门以及库房。“后门”现象既已成为工厂常见现象，习以为常，连胖左派的“快讯”中似乎都忘记了这件事。因此，这家千人编员的工厂不到半年便增员为一千三百人！

改革开放年代初期的企业，由政府机关任命管理者，在阶级斗争年代，穷得没房住，现在他们发现真正需要的原来是房子，票子和儿子！于是他们便附在刚刚有一点血液流动的工厂血脉上，拼命贪婪的吸血。

在所能伸及的范围里，用手中的“权”唯恐不及，伸出去的手唯恐不达。在这个中共惩戒贪官的办法仅限于“党内警告”的年代，正是中共大小官吏抓紧进行原始积累的大好时机。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绿灯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利用掌权的机会，从上到下的贪污。中共各地官吏无不如此，国有企业更是如此。邓小平为权力致富大开绿灯。

到了 1986 年以后，中共上层才迫于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对喽罗们杀鸡给猴子看。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案子的处理，在报纸上大张旗鼓的给以公布，以收受贿赂三万元，判处余铁民无期徒刑。其实三万元是当时高层官员的一笔数目极小的“外快”，三百万、三千万又算得了什么！

到了十八年后，即 2004 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2004 年 1~11 月全国抓出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子共 36509 件，涉案四万多人，增长之快数量惊人，仅仅披露的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1996 年竟在办公室里用批示文件的形式一次就吞了 1100 万公款。

仅据 1993 年全国纪律监察机关向全国公布的数据，九十年代，共有三万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因贪污贿赂受到查处。从 1990 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种涉及高层的案件 110 万件，立案 50 多万件。

以我所在这么一个千人工厂，掌权的管理者没有不捞的，上面所记仅一年所见所闻，这种制度下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不过在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底层企业中，虱子们所吸的血常常面临枯竭的危险。充满贪污而脆弱的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总是逆着那些做着横财梦的虱子们的意愿，使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串串的泡影。

正当这家工厂厂长们为升工资和营建职工大楼闹得乌烟瘴气时，85 年 8 月，经营办公室便向厂长们传递当月亏损的报表。报表显示，因滞销而造成材料和部件在库房的积压已突破了两千万，而且当月已呈现了十六万的亏损。

李友在得到这个报表后，马上赶到经营办公室，向全厂职工宣布已经找到了扭转亏损的办法。相信眼前出现的这点小困难，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克服。可惜，那些由一辆辆卡车编织起来的蓝色地毯，每天都在将工厂亏损和积压的噩耗，无声地告诉给全厂职工。

正是：“……枉费了意悬半安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第三节 遭逢绝境的农汽厂

仅仅保持了半年旺销的农用车，由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在国家取消了向农民贷款后变成了滞销货。到了年底，停放在工厂范围里已装好的卡车已超过了五百辆，成了无人问津的积压货，地域本来不大的工厂实在停不下，还租用了厂外的场地。

密切关注本厂经营情况的银行，早已向工厂的财务科提出了“质询”，认为农用汽车制造厂再不打破滞销局面，继续的盲目投入，无疑会造成更多的积压，工厂像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只好停止注入资金。

老同学已明白，自己已经骑在狂奔的虎背上。农汽厂像一个陷入赌场的赌棍，发够横财后，随之而来的是狂输。卖不掉的农用车仅仅因为资金冻死，工厂就要承担可观的利息，为了减少亏损，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停止生产。

但这样一来，工人领不到工资，一千多人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工人们首先会到市政府请愿，愤怒的工人会砸他的家，一切后果都要发生，当然也包括要到手的豪宅全都只好泡汤。

虽然他大不了被撤职或调一个工作，但他经营的一翻事业，和利益全都没了。这个时候他如坐针毡，他给农业局打电话，给各个在几个月前热销的农机公司经理打电话，想办法打开销路。然而，那些热销时的酒肉朋友居然不接他的电话，有些连人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胖左派的"快讯"却因此发得更勤，把工厂的亏损及时的向大家公布。从 85 年年底开始，农汽厂的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银行首先将准备为职工调整工资的专用储备金冻结了，理由很简单，上级有明文规定，处于亏损期间的企业是不能调升工资的，于是吵吵嚷嚷的调资终于没能实施，这是虱子们始料未及的。

现在，眼看大祸正在迫近，工程师大楼却抓紧进度，尽量提前竣工成为李友最关注的事。

工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了，他们自发地组成了以曾元为首的调查小组，收集证据，写成了马兵、肖足等人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列举伙同倒卖钢材、木料，收受建筑承包商贿赂，以及公款旅游，吃喝玩乐的十大"罪状"，并以联名上访的形式将这个材料送交市委。

在老黄介绍下，各车间准备到市府上访的工人们找到了我。

我进这家工厂才一年光景，情况并不很熟悉，加上来厂时李友的友好表态，我一时还不好同他闹对立，但我已经凭着我一年多的观察，获得了这家工厂一个轮廓的概念。在老黄介绍下，我把大家提供的情况整理出来，写成上告材料。

然而，接到这个材料的市委信访办经过了一翻"认真"研究，认为现在否定半年前还在报刊上发表"治厂经验"的"明星厂长"，实在有点自己掴自己的耳光，何况，全国的工厂像农汽厂类似的多如牛毛。

现在最好把这些收到的"检举材料"原本的交给马兵他们，由他们自己来"正确处理"吧！这叫依靠基层！是中共又一法宝，否则全市上千个企业工厂，哪一个没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事？主管局这几个人处理得下来么？

我所代笔的材料，没有逃出所有寄到上级机关的上告信所共同遵守的轨迹，一个月后便回到了马兵的办公桌上。看到这封材料竟是出自我的笔迹，老同学和马兵感到十分意外。进厂一年半来，由于我的沉默，所以李友和马兵几乎将我遗忘。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材料令他们震怒不已。

倘在毛泽东时代，投寄这类材料的，是五类家庭出身或本人就是五类分子，那么轻则把投信人叫到办公室里训斥一通，指责对方无中生有；重者召开批判大会，把写材料的人抓到斗争会上斗到低头认罪"当众消毒"为止，甚至根据材料摘章引句，申报专政机关立案侦察。

倘若是普通职工联名上告的材料，则由基层党组织逐个调查。凡档案中有污点的人，立即传唤，给以警告。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也要按组织程序，不能越级突然袭击。"党

天下”之下，基本上不会有告发组织的材料越级寄到上级部门去。

现在形势变了，党内分裂变成公开，腐败也一天天暴露，五类没有了，批斗会也不开了。

有一天，母亲从北碚区府带回了她的好友，北碚九三学社负责人倪尔云写给我的一封长信，那信上对我才从蔡家乡下调进这个厂才一年光景，就同厂领导唱反调表示担忧，她提到了我伤痛的廿年牢狱。

不久，马兵正式在他办公室里向我“摊牌”。那一天，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志，党办主任王珍及金工车间书记幸才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到这个“阵营”，我立即想到我在当年反右斗争会的场面。

他轻轻咳了一声缓和着紧张的气氛，然后慢慢地说：“你是本厂的职工又是干部，你应当熟悉干部应当遵守的组织纪律，我们厂的确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今天专门抽这么一个时间，想听听你对工厂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我瞅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由市里退回的这份材料，平静的回答道：“我向市里写的那份材料，是受托于工厂部分老工人的意见，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你提出来。但是我认为既然是上告材料，那么上级部门有义务替我保守秘密，派人作认真调查。”

“现在既没有认真调查，又原封不动把材料转了下来，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清楚。至于我所写的这些材料虽不可能绝对正确，但那上面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我可以对它们真实性负责，但你们也应当对你们的行为负责。”

旁听的人面面相觑，是啊，谁又能保证上告信上所举的不会有错？马兵严肃的脸上迅速换成了笑脸，开始紧张而严肃的气氛缓和下来：“哪儿的话，老孔，我们是想同你交换一下看问题的方法。”

马兵满脸假笑：“我认为你看问题阴暗面多了一点，主流却被你忽略了。比方说：工厂今年的产值和产量都是建厂以来最高的，油漆的技改工程已经开始，车身面漆的起泡和质量会得到根本的改观，职工的住房楼也是我厂建厂以来从没有过的。工厂的一穷二白面貌一天天在改观，看问题不要老看阴暗面。”

不看主流而看支流，这正是中共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我们的主要理论武器。可惜，当年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污蔑”不幸被言中，在二十年铁的事实面前，后来中共给我们平反，正好证明了这点。于是我抬起头来回答道：

“既然你说看问题应当看主流，我就来谈谈这个主流吧！你如果是尊重事实的，那么去年这个时候达标升级整套东西是不是假的？当然，你会说这是为了应付升级，不得不这么做。那么工厂靠一时的机遇，把汽车涨价说成是领导的‘业绩’，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算天时地利盈得了一个能使企业发展的机遇，而工厂的领导却不赶快加强基础工作，在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上下功夫，却忙着在毫无贡献的条件下搞升级方案，厂级干部不论其贡献，就凭职务拿高过工人十几倍的奖金和升级，问心无愧吗？平时你们有谁踏踏实实考查过生产怎

么在运行？有谁在认真的关心技术改进，却在大报小报上吹嘘工厂如何提高了产品质量是不是又是假的？”

我停顿了一下，看看马兵今天招来的人不但没有反感，还露出赞同的眼光，便继续往下说：“内部的混乱几乎无人过问，如果你硬要否定这些，说我写的材料只看阴暗面，对工厂的成绩肆意诋毁，现在工厂每月已经产生了十几万的亏损，从整个趋势看，工厂的亏损已不可逆转，一旦工厂亏损超过了破产的警戒线，工厂是要破产的。”

“到了工厂无可挽回的时候，恐怕全厂一千多职工便要打你的扁担，你的职务未必能保住，到时候不但你的升级和住房保不得住，恐怕更可怕的后果都会发生。现在不是追究我所写的材料是不是诬蔑，而应当把这些工人们反映的材料，当成警钟严肃的加以对待，采取措施来挽救工厂了。”

“同时我还要建议你，你最好公开的把你批示的调资方案宣布作废，并主动将自己在这次调资中所升的七半个级，还给工厂，向工人们认个错，也许还能盈得人心，有助于启动大家一起止住已相当严竣的亏损势态。”

我的话完结，办公室里沉默了，马兵沉默了，不管他对我向市里投书材料有多么的反感和憎恶，今天他本想达到制止我的目的，现在也觉得考虑不周。他的沉思反应出他的尴尬。他原先精心安排的，“公开审问”以求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只好到此收场。

工厂的不景气却无情地撩拨着这一千多职工，他们再也没有像半年前那样，拿着比工资还多两倍的奖金，到市场上去称烧腊打白酒。而是重新回到一年前那穷样子，同挑担进城的菜农争分论两。贫困激发了他们去市府上告的劲头。

然而我一点都没有因此心中感到舒畅，相反的，焦虑笼罩着我，我所争取进来的工厂，完全不是当初大家所羡慕的“米兜”，工厂的底子那么薄，现在又眼看着它朝着破产的轨道猛滑下去，年近五旬的我，恐怕要借助于“落实政策”再跳一次槽就不容易了。

何况我明白在这片国土上，大家都在穷窝里过，想寻找世外桃园是没有的，特别是我年近五旬还寄人篱下，若要想从天生桥那又霉又黑的危房中，搬进高楼大厦恐怕就再干上十年八载，等到我已经退休时都未必如愿。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胖左派发布的厂部“经营快讯”已把工厂累计亏损六十万的噩耗向全厂职工公布了。各个车间又一次提前放假，关心工厂前途的中老年职工，到工厂来每天打听情况。当他们走到工厂后面看到这一天天拔地而起的工程师大楼，不免又一翻强烈指责，他们对这工程师大楼是竭力反对的。

面对职工的反对，李友笑着回答道：“眼看工厂富起来了，今后还要不断的建房，而建造新房的档次，只会一年比一年更高，到那时，难道低档次的房子还要拆掉重建么？”在他的力争之下，建房便保留了原来的较高档次的建房标准，建房预测资金的不足从油漆车间的资金去挪用。

由于资金枯竭，油漆车间已完全停建。现在工程师大楼已经矗立在地面上，李友面对的

除了骂声和争吵什么也没有。这一次，胖左派站出来大骂马兵和李友，说他们哪还像是工厂领导，简直就像一群蛀虫。

工程师楼已接近峻工，老同学十分清楚，全厂一千三百双眼睛都盯着这五十六套新住宅的分配。除了这五十六套新宅分配，还会带来五十六家迁居人所住旧房的再分配，这可是一件随时都会带给他烦恼和不安的头等大事。

在他的幕僚策划下，仍以劳人科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全厂颁发了一个“关于六号七号楼的分配方案”，为稳住全厂主要技术骨干，让他们在分房中站到自已这边来，这个方案明确，凡工厂里有工程师称号的十二个人，都会分到一套“工程师住宅”。

这一次，李友算是聪明一点，不再将自己的亲友拉出来充当分房领导组的成员，而是将分房领导小组的权力，交给了素与他貌合神离的副厂长王泉，条件是许给他本次分房权。这等于将分房的矛盾，全部转嫁到他的身上。

从十一月份开始，一场分房的明争暗斗，就在李友与王泉为一方与全厂一千多户职工之间，勃然掀动了。每天分房领导小组办公室门刚打开，等待的人拥进来以后，便是一片吵架声。王泉虽然得了一套意外的住宅，但是他必须承受精神上的高压和对付各种质问。

老职工在子女的陪同下，向他倾诉成古八十年的住房辛酸；中年职工逼着他出示本厂分房办法的政策依据，列数邻近厂矿是怎么来分配住房的；鲁莽的年青人用拳头和石块警告他看着办。

他一时成了全厂的磨心，又是李友最恭顺的奴才。可惜唯一能依托的李友却用阴阳怪气的态度使他为难。

老同学这些天是格外的小心，晚上从不出门，白天走过墙边或屋檐下都要警惕的东张西望，害怕随时都有一块飞石从不知那个地方向他的头上飞来。

人活到这个份上才体会到当厂长的悲哀，这时他时时从心里咒骂一年前把他捧成明星的政府官员和别有用心的记者。

十二月初，当整个住房已经粉刷和外部装修，完全可以住人的时候，四十八套新房的分配名单以及五十六套旧房的“再分配”名单，在办公室大楼下面的公布栏中贴出了第三榜，在围观者的一片咒骂和怨声中，王泉在办公室里，突然得到后勤科的报告，说有三家住宅，房门已经被下了锁。

三户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搬了进去。他闻报不敢怠慢，立刻电话通知了李友，电话的这一头气急败坏，而电话的那一头却冷静如常。也许李友早料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明知而故作镇静。

两分钟后，保卫科长率领两名保安，赶到了抢搬地点，然而面对抢占户的一家老小，谁也不敢动手！李厂长的指令是将抢占户拉出来，将他们的东西甩到马路上去，但是那一家在工厂都有三亲四戚，师兄师弟。保安们谁都不是傻瓜，甘心为李厂长当枪手使。

在王泉亲临现场的督阵下，只有软硬兼施，一边劝说，一边动手将搬进去人家的家俱一件一件的又搬回原来住的窝棚里，许诺在旧房子的调配中，给他们增加旧房的面积。

正当大家为分房而拼杀之际，农用汽车厂的亏损却像下坡滚去的雪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到了这一年年底工厂累计亏损已逾百万大关，去年同期那种高奖金和名目繁多奖项的热闹局面，已经消失。工厂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奖金，为了过年，老同学七拼八揍每人发了三十元钱的过年费。

在年底召开的工作总结会议上，曾科长以质问口气要书记和厂长就工厂在本年度工厂规划实施情况，向全厂职工作一个交待。还就新建的职工住房大楼的建设和分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专门进行“审查”的建议。

经过他的“点火”，到会的人纷纷向老同学责问起来，工作总结会变成了牢骚指责会，使老同学感到十分狼狈，一年前他在全厂年会上的自我陶醉已变成了沮丧。除夕的茶话会也取消了，只在食堂里进行了冷清的“聚餐”。

为了防止意外，老同学像偷东西似的赶在除夕前一天，顾用几个捧捧，最先将自己的家从三合院里，搬进了他筹划整整一年的工程师大楼。搬完后他才独自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客厅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平安乔迁。

这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丧家之犬的悲哀，他真的没想到他的好景竟转瞬即逝了，剩下来的残局该怎么收拾，心中没有把握。也罢，充其量工厂垮了，自己再调一个单位的想法又浮上脑际。无论如何，住房总算到手了。夜已深了，心里特别的闷，信手推开临街的窗子。

黑夜中，他似乎听到楼下过道上脚步急促，意识到又有谁连夜在搬家，定睛再看，朦胧的路灯下，王泉和老婆，两个儿子也像是做贼一样的将家俱朝刚刚分到手的房子里搬。他鄙视的向下淬了一口唾沫骂道，“贼儿子，全是贼！”

1985 年底，五十六户人家忙着搬家，在第一轮竞争中没有分到房子的职工，继续地围住分房领导小组的几个头，一面吵骂着，一面等到旧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占了房子便学着李友躲起来了，当然，无论是李友还是王泉，在工厂那一个角落都会听到满街对他们的责骂。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门关紧，只当什么都没听见。三十晚上，围炉吃年饭的农汽厂职工没有几家没在诅咒，他们把无钱过年，无房可迁的罪过。一股脑儿地倾泻给老同学，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着农汽厂的同僚们。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自回到重庆，没有比此时更冷的冬天了，当时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没有老同学的福气，也不存在他那种有了房子还要图更好房子的贪婪侈望，看到工厂如此糟，我只求一间干燥一点的旧房子便心满意足了。同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相比，我可是连旧房都没有一间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满霉气的危房里，望着头顶上那已经折断，随时都可能垮塌下来的房梁，眼前浮现出全厂争夺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乱劲，想到倘如在这一次旧房大调整中，再不争得一间旧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头了。

何况我的这位老同学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宣称，本次分房向知识分子倾斜。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理由到分房领导小组去，请他们在旧房调整中给我考虑一间旧房。得到王泉的答复令我感到宽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按规定处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满意。"

可惜，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答复，夹杂着奸意。十天以后，在公布旧房调整名单时，满有把握的我竟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开始我还不相信我的眼睛，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没有我的名字。周围的工人看见我焦急的样子，有人给我打抱不平，他们都因为亲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驭着儿子上班的那种狼狈像。

于是我第二次跨进了分房领导小组的大门，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风头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劳人科的崔科长，听到我的责问以后，他翻着白眼回答道，"你进厂时不是亲自写过不要住房吗？怎么，亲笔的诺言不算数？"

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问题是老同学和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为。否则这崔科长怎么歪曲我进厂时的本意？甚至还专门查了我进厂时的档案。我回答他："当时由于李友说，暂时没有住房给你，等以后有条件时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放弃住房作为进厂先决条件的承诺，永远不能曲解为在工厂有房时，我也不要。"

"我一个落实政策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工厂有房时不给我，是承心给我为难吧？再说，你可以把我进厂时填写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吗？"

这么一逼，"吹"科长开始那轻蔑态度收敛了，推说道："我也是执行上面的意思，至于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来公开的，那可是在你进厂随调的档案里存放的。"看来我给市委写的信，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什么叫"收拾人"，什么叫软打整。比起不动声色的老同学，比起年轻气盛的马兵，我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事情既已经弄到这一步，我就只能迎战了。于是我准备立即进城去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找张文澄。

但又一想，落实政策我已经麻烦过他了，他当时毫不犹豫的给我开介绍信，给我调动开绿灯。现在又接而连三地为我个人的住房，再去找他，于情理上显得过份，虽然同是右派，我不能为个人问题再给他出难题，何况我们素无交往，仅凭都是同一运动的受害者这点同病相怜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踌躇起来。

想到已经和老同学闹翻，我给市委写的检举材料还捏在马兵手里，倒不如把脸撕破，用二车间那王、周两位女将的办法，兴许还可以奏效。何况在住房问题上我是无房者，再不力争，我可是真要露宿街头了。而老同学却是高档房的利益占有者，我撕破脸闹起来他肯定会心虚。

我决定去找他，然而一连几天老同学好象驾了土遁，从农用汽车厂消失了。每天办公室里见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铁门，没有丝毫回应，邻居说"李厂长从那铁门的猫眼上就可看清来人，看来他躲起来了。"

我不得不写了一封挂号信，交到了重庆市政府，一个月以后，区政协主席张××亲自来到了农汽厂，对厂里的住房分配进行"专题调查"。预先他就给厂工会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到

我的住房，希望他们妥善的处理。张主席的到厂触动了工厂的神经，出来挡驾的是工会主席向云。

向云在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张主席，并向他介始了一名至今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一个老工人，以此证明工厂确实没有房子分给我，这位老工人一家人分居两处这个真相，却被向云隐瞒了，中共党员没有其它能奈，唯有这种编假说谎个个都是能手。

既已惊动了上级，又有张主席的调查，老同学知道情势不妙，迅速转舵，指示党委副书记施安出面，将离厂两公里以外，地处文星湾熊家院的危房群中，一名后勤杂工腾出来的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危房打发给了我。

当我不久在厂门口见到这位老同学时，他故作惊讶的说“啊呀老同学，你的住房我们早就考虑了，工具车间主任本次分到新房后，腾出来的两间砖结构的房子，就是专门安排给你的呀。都怪那王泉太不会办事，这家人搬出来空出来的房子却没有上锁，便给另一个工人钻了空子，擅自搬了进去。”

“我还为这事专门追查了王泉，现在那占了房子的工人，也赶不出来了，没办法我们为你的住房，专门开了办公会，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决定把文星湾蒋老工人搬出来的房子，安排给你暂时住下，施书记给你落实好了吗？”

我望着他那假惺惺的样子，实在是太令人呕心了，要说他低能，可在玩弄两面三刀和整人的戏法，却不能同他相比的。但事已至此，心中在忿忿说，都就怪我自己瞎了眼，怎么会钻到你当厂长的这家工厂来！

同这样的小人生气真是犯不着。他见我没有任何反映，假惺惺地说：“这几天分房子真太乱，文星湾那房子如果已经腾出来了，那么你要赶快搬进去否则再被人占去，就不好办了。”说毕他嘴角边流露出得意的奸笑。他真还以为这样收拾我，泄了他那卑鄙报复的私愤。

为我个人住房在厂里搅起的风波，曾科长找到了我，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文星湾的破房子是农汽厂的职工都不愿搬进去的，除离厂远，上下班不方便外，那房子是一间漆黑的口袋屋，白天没了电灯，就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年久失修，每逢刮风下雨，多年的扬尘会像细雾一样弥漫整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分房条例中有一条没有公开的“内部规定”，凡有私房的，或厂里所属住房在主城区外的，一律没有分配新住房的资格，文星湾属于主城区外，所以我只要搬进去了，今后再不要想参加工厂新房的再分配。

我不禁赞叹这位追求虚名，见利忘义，治理工厂毫无能力的老同学，将中共斗争的这一套两面三刀，借刀杀人的鬼把戏操练得如此纯熟！为了报复这一个“异类”，竟在住房的分配上玩弄了这么多心机！

人心叵测，什么事凡不涉及自己切身的少说为佳！但秉直的我永远都改不掉我的老脾气。粉刷一通，第三天便搬入了“新居”。

在那里整整住了三个冬夏，那时我已半百年纪，从搬进去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三岁的儿子，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被我从被窝中叫醒，匆忙的吃了早点就将他驭在我的肩上，步行两公里，将他送到托儿所后，我又步行到工厂上班。

由于匆匆赶路，完成这种“苦力”后，我常常汗流浃背，再加上居住条件恶劣，原先监狱受到折磨，身体本来就多病，所以我三天两头的感冒、拉肚。命运折磨着我。

就这样，我的孩子在我的肩上渡过了整整四年的童年，直到七岁他上小学，我们才重新搬了家，结束这段扛着孩子，早上“晨练”的生活。

好在，文星湾的老宅院里虽穷陋，但邻居却十分的和睦敦厚，隔着天井，对面住的几家人都是重庆棉纺五厂的退休工人。

当他们目睹我的困难，孩子那么小，我的年纪又那么大，上班那么远，请不起保姆，实在照应不过来，有时家里没人的时候，又正碰上托儿所里放假，孩子没人照应，他们会主动的义务照看我们的孩子。

晾在天井里的衣服，下雨了，他们会帮助我们把衣服收回来，上街买菜顺便给我们带些回来，这些细小的事表现出来的关照都深深打动我的心，让我牢牢记着这些善良的邻居。

那时，我们的住房靠近嘉陵江边，我和孩子经常在星期天去河边，捉蝌蚪和小鱼，当春天到来时，我教孩子做风筝，去宽敞的河边去放，我的心回归到童年中去。

中国民众的人性和互助，虽经中共摧残变得冷酷，但在老百姓中她依然温暖着每一个人，住在文星湾那破旧的大宅院里，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对面的刘爷爷和胖胖的刘婆婆，像亲人一样，关照我们并温暖我们的心。“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那时生活虽苦却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而住进工程师宅的李友窃喜后，马上就陷在矛盾之中，他的住楼是在缺资金情况下靠挪用油漆车间的专款建立起来的，遇到贪婪的肖某，马虎的工程质量很快显现了出来。

新宅搬进去两个月后，赶上第一波春雨，雨水毫不客气地从墙壁的裂缝中，渗进李友的客厅里。雨水浸进了厨房，那从墙上浸出来的黄水流进了他的天燃气灶台，他把后勤科负责施工的人叫来责问，那人指着肖足住的地方说他心太黑，吃的回扣太狠。

那施工员承认，地板和糊墙用的水泥全是次品。不过李友也只好背着肖某骂娘，当着肖的面还不敢吭声。

继 85 年亏损一百万之后，农用汽车厂从 1986 年开始，便以每月三十万亏损的不可逆转的颓势，向破产绝境“大滑坡”。当然农汽厂是同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一个，但却是当时全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缩影。

国有企业相继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纷纷倒闭，中共把“工厂破产法”向全社会公开宣布，被中共奉为决不放弃的公有制禁区被打破了，我在的厂不到两年时间便从全川盈利大户，变成 1986 年四川省名列第三位亏损大户。

工人们的上访，使市政府不得不关注这个被他们捧红的“明星”企业。机械局组成调查组到厂调查时，问到他们私吞工厂的稳私，大家缄口不言，使局里派来的人莫衷一是。李友是他们瞎吹出来的明星，而今怎么自圆其说？调查组只好勒令李友限期整改，止住亏损势头，否则只好对他“组织”追究了。

不过李友并不是没看到今天这种结局，他也不是束手待毙的窝囊废，在他任厂长时，供应 130 底盘的南京汽车联合公司，看准他的虚荣心，除在上任时特邀他参加南联公司的年会，还特别将他的名字写在董事会常任理事的名单上，在私人利益和个人虚荣心诱惑下，李友同南汽的接触一直在秘密中进行着。

南联公司为实现在西南建立销售和组装基地的计划，以便打开西南市场，打算在重庆建立一家南联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当时重庆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一直拒绝将农用汽车厂变成南联集团的子公司。

眼下看农用车滞销，日趋严峻的亏损，加快了李友依靠南联的步伐，他向重庆市政府建议，认为如能投靠一家大企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策。

南联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便带着进一步接收这家工厂的决定，来到了重庆。当南京的客人刚刚走下飞机场，迎接“贵宾”的是李友和马兵。

南京的贵宾一走，李友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振作了许多。他随即召开一系列的生产会议和经营会议，向与会者宣传目前在市场竞争中，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金困难农汽车厂很难存活，只有寻找与有实力的大企业合并，才能活下去。

正当他焦虑万状之际，却收到了南京汽车公司董事会发来的请贴，要他参加 1987 年度的董事会新年团拜。他豁然心中一亮，明白这是一次将农汽厂归并为南联汽车联合公司的一个绝好机会。他决定利用工厂法人的机会，抓住这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借南联的资金和力量解脱捆在他身上的绳索。

并入南联后，几百万亏损一笔勾销，工厂也可以引入南汽的品种和其它专用车技术。经过一夜紧张的思考，他终于破釜沉舟，准备迎接一场“地震”。弄得不好，他会因此而下台并受到处份，弄得好，他会因此而解脱。

第二天他便从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长办公室去，说他去市里开会。便独自一人在家里正式的向机械局某局长，起草了一份进入南联的绝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把工厂亏损的原因归结为工厂缺乏技术设备的落后。

现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向国内有实力的大公司敞开大门，走联合的道路。否则很难依靠自己落后的车型和技术走出困境。

同时，他拿出几天前起草的向上级的报告，写到工厂亏损的人为原因时，将责任全部转嫁给马兵和肖某两人身上。这两个人原是他上台时，由上级安排在他身边协助他的台柱子，在农汽厂发横财时，许多捞私利的鬼主意都出自他们，因此成为他最好的密友。现在眼看厄运已至，他只能分道扬镳了。

但这种在背后下刀的做法，终于点燃了一场内战……，李友写完报告立即进城到机械局，交给局办公室秘书，随接去了机场。

正当李友同南汽的主人碰杯互致 1987 年新年快乐时，他却接到了机械局发给他的加急电报，催令他立即返回工厂，李厂长敏感到“招回令”中，某种不祥已经发生了。当他趁坐的飞机在江北机场着陆后，提着行李走出机场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往常在机场停车场里场部派出的皇冠车。

这已使他不安起来，在机场电话厅里他接通了厂部办公室的电话，厂长秘书回答他，小车已经派出去另有任务，所以只好委曲他自己坐公共汽车回来了。

在汽车上他的思绪非常复杂，到北碚下车时，他想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有人来接他并预报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匆匆步行回厂。跨进工厂的大门门卫只朝他点了点头，好象并不知道他刚刚出远门归来……

匆匆走进办公大楼，平时见到他毕恭毕敬的厂办主任不知那里去了，这才发现整个办公大楼里，除了过道上平时做清结的临时工外，一个人都没有。进得办公室忙去翻日历，今天是星期二不可能放假，他们都上那儿去了呢？

正踌躇间，办公室桌上的那架电话铃响了，接过话筒原来正是办公室主任打给他的，叫他半小时以后，立即到厂部大礼堂开会。

他的心中一惊，仿佛他的办公室已四面布控，墙上全是窃听器和摄像的镜头监视着他一举一动，暗觉奇怪，那些平时仰仗着他开后门进厂的亲戚朋友，和受过他的小恩小惠的人们，都到那里去了呢？谁把这里发生的情况通告他一声，也好让他有一个准备。

看看墙上挂的那张中国地图，在大陆那张海棠叶上，重庆相距南京那么近。

拿起电话筒想向南京方面挂一个电话，却没有打通，这才想起临去南京时，他已将长途电话上了锁，忙去皮包里翻找钥匙，但转而一想，事情还没弄清，向对方告诉什么呢？就是发生农汽厂已把他就地免职，这个南联分司难道还能塔救他不成？

看来现在只能乖乖的按别人给他布下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了，于是便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向大礼堂方向走去。

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那个平时对他千依百顺的厂长办公室主任，正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忙着张罗，主席台上机械局的高局长和曹书记已坐在主席台正中，几个副厂长坐在两旁，连马兵也坐在上面。心中已觉查自己陷入了陷阱，可惜为时太晚，硬着头皮向前台走去，那办公室主任从左侧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招呼着将他安排在台下落座。

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所要面对的现实：主席台上已没有他的坐位，他已被免职了。在无数双含着敌意和渺视的目光逼视下坐落，把头埋得低低的。

会议开始，气氛严肃。主持会场的厂办秘书宣布全厂起立，唱国歌。他从坐位上站起来，两腿僵硬发直，依然保持着低垂头的那种反省姿势，有点像站在高高的悬岩上失足滑落下去的

感觉。心中一阵紧张，也不知怎么坐下来的。

耳朵却紧张听那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机械局曹书记不紧不慢的宣布道：

“今天我代表机械局向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全体干部和党员宣布机械局 1987 年第 1 号文件“关于农用汽车厂的任免决定”。……李友听得非常真确那 1 号文的第一条就是将他就地免职，却一字都没有提到他另调其它岗位的内容，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概因为预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耳朵里发着嗡嗡的长鸣。尤其是使他痛心的是全场雀跃，欢呼声中夹杂着十分熟悉的咒骂声，有人喊道：

“要李友回答他把工厂搞得了资不抵债了，工厂关门了，我们的饭碗找谁去？”；“不能就这么一个免职让他便宜地下台”；“你不是在一年前还许下那么多大话，今天要你回答我们，我们这些普通职工拿你怎么处置？”

人们愤怒的吼声使他无地自容。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两年前自己被人抬得高高的，现在他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阵阵的心慌，喉咙里一阵发痒，猛咳一声，咳出来的竟是一口血。他终于彻底地崩溃了，瘫在座椅上。当他的家人闻讯，将他扶出会场时，他的耳朵里分明还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他喊道：“李友，别装熊，拿出你上报纸的威风来，别像臭狗屎”。那分明是总工程师的声音。

从“政敌”嘴里说这样的话，本不奇怪，而今听去是那么挖心的痛。他想回答他：“你身为厂领导，难道出现这个局面你没有一点责任么？”但他实在没有气力说出来。

在家人的掺扶下，他不知怎样跨进五号楼他家的那扇铁门。“家”倒是挺气派的，今天就连那套肖副送来的红木家具也擦得发亮。当着众人受羞辱的那种感觉坐在家里的太师椅上，变成了一连串的焦虑，两年来体验的“横财”，会不会受审计部门和纪检部门的清查和追究？

一会儿又在想，今后去工厂上班到那一个部门报到？千万别弄到总工办或技术部门，那些人都知道他的底，自己随时都是别人踏的对象。

当他的妻子催促他赶快换一件衣服去医院时，他才猛然想起，刚才才咳过血，心里一阵害怕，好象死神就在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向他窥视，觉得喉咙里痒痒的，好象又有一口血要咳出来……

正当他被两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侄儿扶着走下五号楼的大门时，猛然听见三楼的窗口鞭炮声大作，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只见那窗口正对着的阳台上，吊着一长串正在乒乒乓乓炸响的鞭炮，那旁边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字联，上书“送瘟神”三个大字，那分明是××工程师干的事。

这人素来看不起自己，这次分房给了他一套自己一样的住宅，意在安抚和收买，谁知道他并没有感谢李友的恩惠，反而认为，李友不过是借工程师们的名来拉拢他。所以在自己最窘迫时“落井下石”了，心中一恨，喉咙一痒，又咳出一口血来。

此时他才觉得虚弱得很，对人们这种公开的羞辱除了只有“忍”以外，连反唇相讥的力量都没有。

这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黄，一载赴黄泉。”

关于对农汽厂人事任免的决定中，红头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机械局一名姓孙的处长，同时还任命总工办的副总工程师王桂林为常务副厂长。

党委书记马兵虽被免职，却调到重庆市汽车公司担任那里的党委书记，肖副刚被调到北碚区乡镇企业局但任了副局长，两人明里撤职实际上是升级了。尤其是肖副，在乡镇企业局捞油水的机会更多了。

李友，则因为向上级参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坏了“行规”，才落得替罪羊的处境。若不是他在市委里的姐姐，说不定会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谁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弃了南联的计划，老老实实接受上级的保护，还不是照样同其它人一样，异地发财？而今他气得吐血，担惊受怕成为全厂笑料，是谁造成的啊！也许他真是被新闻界，捧得昏了头。

其实在国有体制下哪有独闯天下的奇才，靠吹棒邓小平而发的全国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终以诈骗外汇罪沦于武汉监狱。自吹创业的天才，在中共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过是为一定政治目的炮制出来的玩偶。

玩偶是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他们独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于中共皮上的气泡，像幻影一样出现于瞬间，又消失在刹那。

不过，被这种“政策”作弄得最惨的，还是农汽厂一千多普通职工，按照银行接到的指令，亏损的农用汽车厂的亏损额，早已超过了倒闭的警戒线，工厂已领不到职工的基本工资，只能按每月领取几十元的“救济金”。据银行说，李友为了不准在他任职时就停产，结果积压的农用车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

胖左派站在黄色大楼最高的石梯坎上对着全厂摇头哀号道：“完了，农汽厂完了，我们也完了，工厂死了，我们就此等着流落街头”。接着又指着黄色大楼大骂道：“你们这群败家子，工厂赚了几个钱，你们自己吃花不算，还要请客送礼，巴结记者，现在几个钱被你们吃完了，你们却像蝗虫一样飞走了。”

机械局新任命的“领导”丝毫没有阻档亏损下滑的能力，陷在厂后坡荒草泥泞中的农用车，依然静静的躺在那里锈烂，大家在唾骂李友出了一口恶气以后，不得不重新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在厂的生产经营会议上，个子矮矮的孙厂长像菩萨一样，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那王桂林却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呱呱空喊着强化产品管理的空话。销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开的会争吵一阵，毫无结果的散会了，车间照样死气沉沉金工车间联系了渝洲汽车厂，为他们加工车身覆盖件和非标……。

过年时，由于农汽厂不断有人上访市政府，他们怕年关之际，被逼的工人会在春节期间上街闹事，为稳住危机四伏的国内形势，维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升平的政治气氛，市政府悄悄向银行指示，农汽厂的职工总算领导到了 1986 年底所未发的工资。

然而 1987 年春节一过，工厂又是两个月未领到工人的吊命钱。当工人们围着新来厂长向他索要维持生计的基本工资时，这位上级派来的厂长兼书记竟然喊道："你们向我要，我向谁要？有种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带着你们抢银行去"。

第二天，黄色大楼的正门上，贴出了一幅打油"对联"，上联是"桂林贫（凭）嘴一付画（话）"下联是："要抢银行找有余"，横批"左右无路"，那分明是写王桂林和孙有余的"无能"。

农汽厂在一团死水中挣扎，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来，公开说："这是市政府的小人们搞的阴谋，如果南京集团兼并了我们，恐怕也不致于落到今天连饭都没有吃的地步"。

曾元领着几个老工人去找刚刚赴任的市委书记肖秧了……

第四节 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闹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宁，新官上任三把火，肖秧亲自过问此事。一个"明星"企业才一年多就走到破产绝路，新闻界一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肖秧批示，令机械局派出工作组弄清情况，采取措施，务必与以解决。1987 年 5 月，接到批示的机械局，组织了以副局长为组长，市汽车公司生产科长，李伦为副组长的"扭亏帮促小组"进驻本厂。

当中国商品经济的大潮，第一次冲击苟延残喘的封闭式国有企业大门，使毫无生命力的大锅饭企业遭遇与农汽厂相似厄运时，中共基层中，一些从事国企管理多年的"才子们"，从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国企的病。他们想崭露头角，一舒多年被压抑的身心。

纷纷倒闭的国有企业，给了他们一试身手的机会，因为他们相对超脱了那过时的僵死思维方式，敢于试探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方法，成为第一批转型时期草创性企业家，登上了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舞台"。

例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史玉柱，以及张树新和她的赢海威，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动力；成名成家。毛泽东禁了一辈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 1.88 米的李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动他勇于挽回这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绝境企业的动力，是他从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中感到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他决定抓住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至于他是否洞察国企致命之处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后极权时期依然紧紧依靠国家权力的控制，使权力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便是贪污，行贿滋生的原因。这种交易出现李友这样的怪胎，权力捧着他上台，并指挥着这个傀儡演出一出又一出的丑剧。

在企业毫无根基的条件下，用“假”报表，假数据换一顶上等级的假桂冠，利用农汽厂短时间的发财，让这个木偶一再登上媒体和广告的舞台，为行将就木的国有制唱赞歌。最后在企业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时，便将这个被他们捧上舞台的是明星“宠儿”重重的扔进垃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颗被中共牵着走的虚荣心。机缘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变成垃圾，它失败的全部过程被旁观的李伦窥测清楚了。

李伦清楚地看准了，中共体制下的企业管理和官本位之间，许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这种漏洞百出，凭一人决断的体制可以牵着它走，成为一时，一地资产聚敛的源头。

这同蒙在鼓里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虽然挽救这么一个看似没有希望的企业困难重重，前途渺芒，但是只要牵牛鼻子，这种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这种成功的奥秘是当时以上管下，绝对服从的官僚体制还没弄清的。

刚刚开始“摸情况”的李伦，每天夹着一个日记本，开始了他那种意志和体力的马拉松运动，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爱发牢骚，被工厂领导视为“捣蛋”的胖左派们，他想这些人总有独到之见。

同他们中的年长者交朋友，称他们为挽救工厂难得的“智囊团”！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当厂长，该先从那些事着手？”“家”由这些平常一贯唱反调的人来当，“策”自会出现。他认真的倾听着每一个新颖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在笔记本上，编成了一幅治厂蓝图。

古希腊伟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出一条路，让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走到他们的前面去”。怀才不遇的李伦当时看准了农汽厂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们为他让路。所以他得到了一次崭露才华的机会。

我同李伦的初交开始于同车间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从 1985 年十二月马兵因我向市委写的信，同我的那场舌战开始。那一次舌战，使我成了整个农汽厂领导班子的“眼中盯”。其实我进厂两个月便要求下车间的举动已向他们表示，我对工厂的权力争夺毫无兴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写信，一方面是工人群众的推动，也因为工厂搞得这样糟，别说住房连工资都发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然而当我捅了马、李的马蜂窝后，我受到了诸多的威胁，不但在分配住房时给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压制，受到歧视。

论学历和工龄，还是能力，早就该得到工程师技术职称的我，进农汽厂已三年，每年年终，由技术部门和劳人科向机械局上报职称名单中，从来就没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只读了三年，不具备本科毕业的水平，何况以后因劳改而荒废学业多年。

但是我自调入这家工厂，便在车间埋头苦干，自修完了汽车制造的大学专业课程，很快恢复了被中共荒废的学业，亲自设计和制作了许多简易的夹具和模具，成为当时全厂百十名技术员制作工艺装备最多的一个。

正当李友被免职，陈桂林主持工厂的技术生产指挥时，发生了一起价值大约八万元的铸胚报废事件：因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错位，五千件钢板弹簧后支架的翻砂铸胚的翻孔位

置错误。倘若仍按原来的加工路线选择粗基准时，眼看将导致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负责胚件供应的生产科老张，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现场和我商量，他提出这批胚件，更改粗基准的加工工艺建议。我经过实地测量同意了张师傅的意见，工艺科的人竟说我不知收了铸造厂多少回扣，在生产科填报的回用单上大笔一挥将这批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当然报废的是工厂的铸胚，损失是工厂的，与我无关。但迂腐的我却认为眼下工厂正在亏损，毫无道理的将这批可以使用的铸胚报废回炉，等于往亏损上雪上加霜，问题吵到了陈桂林那里，那陈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报废了的东西谁使用出了问题，便由谁负责，我看，干脆报废算了，损失一点不伤害人，何乐而不为。"

我不甘心这种不负责的处理，中午自己动了刨床，想用事实来证明这是一批不该报废的铸胚，没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机的工人发现以后，骂我是一条厂长的看家狗，工厂到了这个时候已无是非可言。

既然对是非没有了判别的标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上班呢？便向车间主任递了一个请假两个星期的假条，回到家里，晚上面对床上睡着的孩子独自发呆，工厂陷入破产绝境，今后该怎么办？我现在才感到出狱后第一次面对生活的压力。现在我再去找市里面的哪一位当官的都没有用了。

另调一个单位，调那里？我已五十岁了，效益好的单位接受我么？正为难之际，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我所住的文星湾三合院的门口，他戴着一付宽边眼镜，一边向院子里的人打听我的住处。

正在猜测来人是谁，他已向我的屋子走来。跨进院子大门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双大手，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是一个刚刚才从扭亏工作组正式转为重庆农用汽车厂的职工"。

我很诧异的的握着他的手，猜测来人的意图。握手以后，他便四面环顾，打量着我那陋屋的门口和院子的整个环境，说道："我是在后勤科查到你住在这里，你写的假条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条，使我对你产生了了解的兴趣，我想就从你身上开始摸一下工厂员工的想法"。

他一边说一边跨进我们的屋里，继续说道："你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几道拐的深卷子里，过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的。"

当我把他让进那黑屋子里，他的头却碰在那门栋上，一面接过我拿给他的凳子，四壁环视后，连声说道，"委曲你了，一个老工程技术人员竟住在这种烂房子里，太委曲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说客套话，便回答道："唉，你还是第一个走访我这个穷技术员的人了，单凭这点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大约已是六点钟，我们坐在黑屋子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开始了第一次谈心。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笔记本，一边交谈一边作记录。从我的身世讲到平反，讲到如何进厂，最后

讲到李友的失误。一直谈到深夜，因为谈得十分融洽，时间很快过去，我送他回厂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 年 3 月农汽厂在行政大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取名“扭亏”动员大会。为了显示“危机感”，扭亏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亮出了政府对农汽厂发的“黄牌”警告。其实破产，这本属于商品竞争的残酷事实，无须谁来“警告”。

致农汽厂今天这种状态的，是中共庞大的官僚机器。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国有制。

工厂破产后，还摆出主人的姿势鞭打工厂的全体员工，这不仅是戏剧性的，也是残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着李友这个木偶玩弄够了的政府，现在要捧出第二个木偶来了!。

然而，被中共恐吓惯了的农汽厂职工们，听到这种严峻的警告时，全都蹇眉沉思，将一年来的谩骂和争吵收敛起来。工厂一旦关门，一千多赖以生存的职工及他们的家属，都会被抛向街头，这对吃惯国有大锅饭的穷职工怎么才能挣到生活的饭碗？产生了最大的忧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中共害了工人群众。

李伦被大会正式任命为“扭亏组长”，第一次主持了全厂工作大会，当他提出用“自愿兵”精神“生产自救”的口号，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里？用这些战争的语言来唤醒谁呢？由于生活逼迫农汽厂的职工天天都在上访，他们所盼的，关健在带领这些职工的领头人怎么办？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招待所，是一排占地大约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岁了，总共二十来间房间，平时白天走廊里也要亮着路灯，否则一进去便是漆黑一片。由于背山而筑特别潮湿阴暗，房间里一到下雨天，地上总是泛潮，下段墙上的石灰层因霉变而剥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黄泥墙。

贫困至极的农汽厂职工的住宅就是那种档次，当然也没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来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里面住的，是配套厂家派驻本厂的修理工，外地招来的钣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来客，是由厂长办公室和供应科长专门安排在泉外楼，或其它较高级的宾馆。

李伦接厂长后，厂办主任为他在泉外楼安排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李伦找到了这位主任说，“工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我还住那么高档的宾馆不符合志愿兵作风，请你把房间退掉吧！”

于是他住进了厂招待所的 5 号房间，我第一次造访他，便在那房间里，房间被刚刚粉刷，显得比平时亮堂。靠门边摆着的一张床上，一半推着足有两尺多高的书藉和文件，靠窗一张课桌上，放着他的吃饭盅和洗漱用具，两个翻折凳用来接待来访者，一盏台灯立在课桌上，这便是他的全套办公和生活用品。

经这么一布置，那 12 平方米的小屋还算“宽裕”，自从他搬进这间小屋那天以后，这间屋子里经常灯光通明，有时候通宵达旦。就在这小小课桌上，这小小陋室内却酝酿了一场创业方案，赢来这家工厂未来七年的一段辉煌。

农用汽车厂的饭堂位于工厂中心地带的盆地中，那儿的竹泥夹墙，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风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风雨袭击，那饭堂中也如露天一样平地来风。里面原先还安着的几张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时被人搬走。单身职工在厨房的窗口上接过饭菜便席地蹲下，趁热尽快把它们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饭堂的角落里突然增加了这个很打眼的高个子，因为身材高大，蹲下显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员连忙把总务科的办公凳子给他送来，他看着那红漆办公凳，笑了一下指着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说道："人家蹲着能吃，为什么我就非要坐着吃？"

这一谢绝反倒引发了就餐人一阵议论："唉！这种鬼地方，连科长都不会在这里吃饭，从没想到过厂长会光临的。"一个矮过子工人忿忿说："那些败家子，把厂败了一拍屁股走了，谁来管你穷工人在那里吃饭的小事。"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回应道："这地方当官的，除吃团年饭，就没见他们来过。"

后来，他在大会上常提这事，说一个连职工吃饭都不关心的人，怎配当厂长？

然而，被中共骗够了的工人，特别是经历文革后，对这种表面一套内心一套的两面话早已听厌，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轻易相信，至于他心中真想在这个被前任搞得一踏糊途的工厂，干出点让工厂翻身的事，还要拭目一看。

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四个坚持喊得很响，工人们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因余悸而不敢坦露。随着时间推移，耳闻目濡对中共渐渐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无论那一级官员，小到科长，业务主办都公开用公款吃喝，奢侈渐成风气。原先在恐怖压力下不敢伸张的人们，公开咒骂共产党了。

对李伦初入工厂的调查之风议论道："还不知上面给了他多大的好处，一旦亏损扭转过来，工厂成了他的摇钱树。定把自己的腰包捞满才卸任？"似乎只有这种评价，才符合当今的时代和人心。人心在这个年代里，被着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干事业也好，做样子也罢，这位高个子的豁达健谈和平易近人，逐渐产生魅力，市场观念被他灌输给每个职工，他指着刚刚才从"一碗水"买来的越野车说，按照目前市场，能产生较高利润的不是那些已经很陈旧的农用车，有市场要求的是国家的公用车，是大小官僚们所寻求的小车。

他造访了从 1985 年到 1987 年独占川内汽车鳌头的成都客车厂，这个厂就是靠开发越野车，三年成了全国首届一指的利税大户。

而适应于小批生产的手工制作模式，正好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型汽车制造厂。投资不大，见效快，这在当时叫做汽车制造业打"短、频、快"的方针。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员的出行追求"气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浅的中共"关税保护"政策，将外国发达国家的小车挡在国门之外的机会。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败，对机关采购人员高额回扣的引诱，使李伦心中已经对农用汽车厂形成了快步扭亏的方案。这是政治经济学和营销学根本就找不到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特有

的市场：政府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去买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的汽车品种，附带着中饱采购者私囊的畸形市场。

产品结构调整的方针确定后，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厂生产品种定下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专用车的各归口部门，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应酬能力，赢得这些部门的领导层的赞赏。为了打开这些部门采购汽车的胃口，从银行货款中抽出钱给对方经办人以“丰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些部门来回奔跑，获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订货合同。

市场打开后又回过头来，向当时扼着农汽厂脖子的银行、税务局、工商部门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这些部门有着大量的空隙和水份，只要经过某掌权政府官员的点头和批示，可以动用无息的扭亏专用款。

欠税也可以挂起来，享受三年免税甚至更长时间的优待。这样一来，过去一年多来，像滚雪球一样的“前账”可以不与追究。

于是农用汽车厂在李友时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职工的工资暂时按照原来的标准发够，而不再按市里对资不抵债企业的职工只发生活费，全厂的浮动人心平稳下来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农汽厂的“绑”，很快在李伦努力下一一松开。这家工厂赢得比较轻松的起步条件！

在做政府部门的工作时，各衙门口中对于小到门房的看门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时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厂是晚上十二点钟了，他一脸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侮人格的话，还在脑子里反嚼，但是为了实现他想干的事业，他必须有一般人都不屑为的阿 Q 精神。

为迎合各个政府口子里的大小官员，他把这套经营方略浓缩成“上靠、外联、内团”的六字方针。三方面中上靠为首，他说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钻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针写在办公室里的写字台前，写在联营办公室里，写在农汽厂最醒目的地方。

这六字方针浓缩了邓小平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经济建设中没有理论只有‘政策’，因此随意性极大，谁有权谁说了算，用贿赂说了算的人风糜官场。当然要拿产品出来的工厂，对内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摆着用户所需的，在马路上飞驰的汽车，要战胜同种企业的竞争，在外观和性能上，在同样的手工制作的条件下，必需“略胜一筹”。

竞争毫不讲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工厂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须不停地改造原来已经显得陈旧了的车身和底盘结构。工厂在调整了产品结构以后，跟上的是不断的质量更新，这是农汽厂原来那种老牛拖破车的步伐是无法想象的。

钟师傅必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负责越野车的时候，就已经思考了一个保质保量的施工方案，对所有的施工细节都考虑好，所以他说的话带有权威性。按照他的建议，李伦召集了所有参加者的现场施工会议，初步将现场工序分为四个组；一个制作车身的组合件；一个是负责车身分块的焊接组合；一个组专门负责车门的制作和焊合；另一个组是负责车门的安装。

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都要跟着施工的工人，一方面应证图纸正确性，一面组织现场的施工，绘制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并且根据施工发现的问题及时的修正图纸和采取补救措施。

被穷困和失业困绕的农汽厂职工，一种“玩命”精神贯穿在李伦煽动性词令中！现场会几乎通宵，边做边议，一个个解决开发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从此，试制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为了给加班试制的人加班时醒脑，他吩咐厨房每晚十二点送来酸辣面，疲劳和困倦被强烈的酸竦味驱散了。

古人云，“年少鸡鸣才就寝，老来枕上待鸡鸣，转头三十余年梦，不道消磨无数声。”他说：“回看少年时光今已半百还一事无成，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只有再来一次鸡鸣就寝了。”他用隶书写成的杜旬鹤的名句：“少年辛苦终生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压在他的办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 年的夏天，在工具车间前面的空坝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钣金临时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这里，灯光和焊孤光交织着送走了一个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从来没有打断过这里的夜战。

第一台客车和第一台越野汽车相继问世，当鏖战了整整一个月，脸色苍白的志愿兵们，欢呼本厂建厂以来第一代独立制作的换代产品诞生时，胖左派也不禁为之惊叹：“李伦的两刷子农汽厂起死回生有望了。”

样车的第一个顾主、公安部装备处的处长趁飞机专程从北京赶来，认为在当时农汽厂的简陋条件下，仅靠手工制作，短短一个月内开发出两个品种实在不容易。他认为虽然第一台样车问题百出，但一股拼命精神是国营厂职工所缺的。就凭这精神，专用车就有了希望，当下签订了两百台的订货合同。

在一千多职工工资低微，人心焕散，既无模具又缺焊装条件下开始，第一台样车就像学画的孩子用心描出，远远看去整个越野车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经不起走近了细看。

细看车的外观，车壳的外表并不对称。车上腰线像蚯蚓起伏不直，车的平整度仅用钢尺比划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间相差了十几毫米，找来经验丰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这种差距需 20 毫米厚的腻子灰。门与门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个毫米以上。

门是锁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锁上，那么就打不开了。车身上相邻部位不相吻合，留着很宽的缝隙。摇窗机就更糟了，装上去以后，是不能摇动的，勉强的摇动，那么内衬的防水胶条不是挤在一堆，就是脱落。

那负责冷作的钟师傅，围着车反复细看琢磨！也低声的叹气道：“这样的车，拿去交给用户，别人怎么会要？我看干脆重新来过。”

然而很懂得“士气可鼓不可泄”，“凡用赏者贵信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的道理。李伦专门召开了样车的评议会。

几十个由设计、工艺、和工人组成的评议小组，围着车身数落着这个样车一百多条的不

足，他叫技术员作了详细的记录，一方面他布置了下一轮制作的整改条款。另一方面，召集党政工联席会议，作出“特别嘉状令”对于样车的主要制作人和技术人员实行嘉奖。并且令样车披红戴绿的绕工厂一周。

在会上他说：“我们必需对这种拼命精神加以激厉，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在冷嘲热讽中死亡。你们知道这两个样车虽然带着许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厂有史以来自己制作的换代型越野车，这是我们厂的产品方向，也是我们活出来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大张旗鼓表彰宣传的理由。”

在会下他还说：“我曾经把一句巴顿将军的话当成了座右铭：没有不好的战士，只有蹩脚的将军。”他的这种热情评价，曾被人当作攻击他的政治把柄，这对中共僵死的官僚体制是一种叛逆。

嘉奖令颁发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奖的志愿者说：“今后你们就是新车型的基本施工骨干，你们手中决定是着农用汽车厂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数落样车的毛病，规定出，车身的平整度，门锁，风窗摇机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说到这些致命的毛病显得特别激动，他说：

“这样的产品拿给用户岂有不骂娘的？为什么国营企业多了干不好事的公子哥儿？临到工厂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再耍这种公子哥儿气了！”

其实工人们的隋性容易改变，最难的，也是最怠堕的是这架由党委，工会行政组成的庞大管理机器，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副厂长在内的十一个在上级卵翼下的天之娇子。面对商品大海里将淘汰的工厂，这些人从来没去钻研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难怪，上级规定他们的职责，就是“指导”并掌握企业政治方向的。说白了，就是贯彻中共统治利益的。扭亏开始，为扭亏而开的办公会，他们指手划脚的乱说一通，让干事的人毕恭毕敬的听他们训示。

会议不客气的把具体的任务分派给他们，并限定他们完成的时间，写在会议纪要上，作为会后执行会议决议的书面依据。于是平时惯于用鞭子抽打别人的人，在扭亏非常时期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李伦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亏损的危局逼迫他们，他们只有悄悄背着厂长向委任他们的主管局数落李伦，说他凌驾于党委之上，是严重违反组织的行为。于是李伦处在领导班子的冷弹伏击圈子中，古人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扭亏虽然打响了，可他感觉自己处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中了。

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夹击”会越来越厉害。他既然没有能力搬掉这些绊脚石，就只能听命小人们的夹击。在他的事业顺利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业稍有失利，他便会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种围歼。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潜藏着危险，改革开放预设了事业者葬身的坟墓。

在引进外藉技工的问题上，便爆发了他同反对者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当第一个批量越野车将近完工后，他亲自同我一道检查了这些“产品”。结果发现，制作样车出现的几个主要毛病仍然没有改观。连续的跟班观察，使他体会到国有企业，习染多年的旧习，牢牢缠着工

厂。他看到工人们并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作祟。

“干不干，一月一百半”这是工人的口头禅。“亏损又怎么样，国家还能不拿饭钱给我们？扭亏又怎样，再卖命工资卡上不会给你升一分钱。工资是政策规定死了的东西，扭不扭亏还不都一样。”年纪稍长的工人这么说。“工厂条件就这么差，哪能保证出好车呀！”年轻的工人总是这样替自己的粗制滥造作辩护：

“李厂长，一个月就只发这么一双手套，我们的手都要冒烟了，眼睛天天流泪，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我们也是人，要不李厂长你也来同我们一道玩两下。”调皮工人的挑衅使他无话可说，他看了看蹬在那里磨磨蹬蹬的工人心里别说有多么焦急。

当他回到办公室看到保定汽车厂为他寄来的“太空”车照片时，想到别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好的车身？于是他千里迢迢亲赴保定汽车厂实地考查，考查结果告诉他，保定汽车厂从浙江引进了一批钣金工和油漆工在那里“大显身手”。他们拿的是计件报酬，做一台车得一台车的工钱，要想多拿钱回家，只有靠自己尽量多干活干好活，否则解雇走人。

于是他从那里以高报酬招聘了几名浙江工人，经过实地的操作，从农村里出来经过几年严酷训练摔打的“雇用”工人，无论在技术水平和吃苦耐劳，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厂工人无法企及的。

在党政工联席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引进外藉工人的主张。同时将那些只会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极情绪的人，就地“挂”起来送劳人科“待业培训”，待业期只发给生活费。他的建议一出口，联席会便“沉默”了，既不热烈同意也没有反对意见。

可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简陋食堂，他按平时的规矩，中午去吃饭时，那里已围了一大圈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见到他以后，人们七嘴八舌向他发问，“你准备把工人送到劳人科去究竟怎么处置？”“谁给你的权力把本厂的工人的饭碗拿给外厂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钱给外厂的人，他们给你分了几成的回扣？”叫声越来越高，责骂越来越难听。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谩骂和声讨后，晚上，他独自睡在床上反思，难道，党政工联席会上，有这种号召力极强的与他貌合神离的“领导”背地与他作对？他们是谁呢？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把这个本来只需厂长取舍的人事任用权，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职代会召开讨论表决，引进外藉人虽勉强“通过”。但引进来的人报酬，却要与本厂工人拉平。而对本厂子弟送劳人科“挂”起来培训的意见，则被全体与会者否定了。吸引外藉工人的“高报酬”既被取消，应聘来的外藉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伦第一次尝到凭他的直觉和需要办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进外藉人就要搁浅，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几个到他住所来“聊天”的“智囊团”成员交谈，把这个问题提交他们讨论。有人向他竭力主张推行计件工资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这本身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合理办法，可以留住从保定召来的工人，他立刻采纳。外藉工人算留下了。

经过一年努力，到了 1989 年底，产品结构终于改变过来，原来生产的农用车交给了大集

体去做，主厂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车和小客车的投入。过道上停塞的农用车开始渐渐疏减，年底由财务科公布连续两年的亏损终于止住。

然而财务科放出空气，说这全是把工厂亏损的利息挂起来不计的结果，如果过去亏损仍然算在工厂的头上，那么到了 1988 年年底，依然亏损上千万。

李伦有何德能，还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伦心中明白，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要彻底改变这家工厂的面貌，要让农汽厂在政府部门购置专用车的潮流中“存活”下来，还要付出很大努力。

专用车生产已成定局，根据他的提议，农用汽车厂正式更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不知内情的媒体，各大报社的记者们，又在中共负责宣传产品的官员指派下，重新来专汽厂对李伦个人进行专访，并且像两年前捧杀李友的老方法，对李伦进行吹捧，要他讲一年多来止住亏损的治厂经验。

不过李伦必竟比李友聪明得多了，他知道记者的宣传，不过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何况虽然第一仗他打赢了，工厂要真正站起来走出困境，还有一段极其艰难的路。

但是他必竟是“事业家”，他同他的几个“左右手”商议以后，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厂所有工种推行计件工资，用按劳动件数付酬替代计时工资。

此外还用划小核算单位到班组，来迫使工厂的每一个库房，每一个班组建立成本意识。同时还要破除工厂的原来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为厂兴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厂管理层的素质。用建立第三产业消化那些平时不做工，专门发布“快讯”的人员……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着当时邓小平的“体制改革”为依据，他准备一试自己的“身手”。

第五节 李伦的两手

正当他为这家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开刀时，他的同僚们无不权巧取豪夺，使自己囊中的票子，儿子，房子在任职期间三丰收。没有机会巧取豪夺的人，也会本着得过且过，能捞就捞的态度，捞不到也不会拼命，能维持工厂不死不活就是好厂长了。

老天满足了这位大个子的期望，在 1988 年平过以后，1989 年经营决算告诉他，工厂当年实现了四十万元的利润，连续亏损几年以后第一次盈利，对他不能不算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

这一天恰逢工厂建厂三十周年大庆，为了庆祝这一大捷，也为下一步盈利创造精神上的条件，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厂庆游行。游行队列从厂门源源不断列队而出，穿过云天路、中山路，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据了北碚的主要街道，然后绕道人民路返回。

他兴高采烈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不断领着队列的拉拉队喊口号，唱着由他编词的厂歌。殊不知职工们并没有积极响应他，游行队伍在从人民路回归的路上就自动散去。

当他兴致勃勃在工厂后门迎接归来的队伍时，却剩下稀稀拉拉的少数人。领队人说各有

各的家，有的要回去弄饭，有的要照应孩子。

中午大家散去时他一再给大家打招呼，下午按往常一样上班。

下午三点钟，他独自站在黄楼最高处临窗向下眺望，这时秋风倦刮着梧桐残叶，满地都是。也许因为自己的妻儿一个也没在自己身边，一种莫明的孤独和悲哀在心头油然升了起来。……游园会虽然进行了，但参加的人极少，工人们并不理解他的巴顿式激情。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便站在厂大门口了，为了组织和整顿这支亏损“溃军”，他曾三令五申整顿迟到旷工现象，规定凡上班迟到早退者一律由门岗登记，当天在黑板上公布。

恰好这一天八点半钟了，上班时间已过，还有人稀稀拉拉从街上窜进厂门来。他阴沉着脸责问门岗，为什么不对迟到者进行登记？那门卫却用藐视的口气回答他：“你身为一厂之长，站在这里却奈何迟到者不得，我一个小小门岗能管谁呀？”这回答激怒了他，当即把劳人科科长叫来，把顶嘴的门岗撤了。

当场他拦住了一个刚刚来上班的年轻人，问他知不知道工厂劳动纪律的新规定？可那年轻人傻乎乎回答道：“我不认识你，你管谁的闲事，那么宽？”一大堆围观者哄然大笑，还替这年青人辩解说：“他是新来的”，令他感得孤单无助。

过了几天，党委办公室电话通知他，说市机械局党委要他到局里去一趟。晚上回来时，他的脸上黑沉沉的，看来不知又受到上级的什么“规劝”。

晚上，我在他的卧室里与他单独交谈时，他拿出一份复印的手写文稿，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封面上的标题是“创业者忧思录”副标题写道：“活着难道比死去更烦恼？”并签上他的名字。

这么快就止住了工厂习惯性的亏损，还实现了略有盈利的惊人成绩，上上下下都有很好评语，本应使他高兴，怎么反而使这位创业者如此悲叹起来？

回到家里，对这篇文章细细拜读。现不妨摘抄于后，以飨读者：

“……创业者的孤独往往比常人更深重，创业者活的极苦，最累者无非心扉宇宙里的重重重压，……积郁下的苦恼，使人到了无话可说，也就到了苦闷的低谷。是因为不堪重负才华发早生，在热望中的失望才形容憔悴？……

所幸人生一世也不一概心如止水，也有心扉的一角在欢笑，在爱和恨。其间也有万夫莫敌的暴发力。如此来到烦恼的人生，应作些有益于人类的事，于是有了春波荡漾，才有极端的物我两忘，才有无我的奉献，才有公而忘私弃家不顾之举，才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愚人之称。”

这开头语说他极痛极苦，虽没有说出苦在何处，痛出何因，宛如受委曲的孩子受人欺侮而又无法说清欺他的人是谁一样，对比他的行动与心情似不相符。我想创业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在大业初成时所向披靡，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的磨钝，磨钝的过程就是一个痛苦过程吧。

不过大个子的人生价值和善恶标准，细想起来却含糊不清，含糊的人生价值观和朴素的

人性爱憎，并不容易恰当的配合默契。但内心的悲哀，没用虚假的东西来掩盖，以欺人之谈蒙骗世人和社会，说明他良知尚存，向人倾泻内心，令人可亲可爱，这一篇他用了很大篇幅呼唤着理解。

呼唤理解，其实就是呼唤人性，在今天，理解的稀缺，正是人性泯灭的表现。不过，难道李伦真不明白，人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中共几十年摧残而泯灭殆尽了么？他看问题的浅近，使他行动发生盲目，每遇受挫折而产生的悲哀，成了他"得不偿失"的兴叹！再往下看：

"怪物，一个飘忽不定，却与人类的存在同时出现的黑色怪物，我们不知道其称谓，姑以阿 Y 呼之，创业者足迹所到之处，阿 Y 都漂然而至，形影相随，阿 Y 毕生追逐创业者，不置死地难以后快，此属命定，姑妄看之。"

"创业者立誓舍弃一切，参与挽救破产企业，阿 Y 却说，这些人另有所图，不然哪有的这么傻？"

全文以阿 Y 的十六种非议来揭示"守旧势力"的阻绕，以自己推行"新措施"所处的尴尬来描述创业者的艰辛，最后以这样的一段话作全文的结尾："所不安者只是哀怜造血者的血色反而苍白，补天者的天职累遭诋毁而已，专汽人啊，专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似比愚公移山还难，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个子以他的理想主义设想了专汽文化，以最常见社会主义文化表现，来描述阿 Y 的种种非议，在常人看来似乎是无病呻吟，唤不起他想唤起的人性同情。专汽文化是他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在现实中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在我看来他讴歌并需要建立的东西，早就被市俗的不伦不类，例如懒散、自私、欺诈弄得来面目全非了。

因为人们还没有理解，怎谈得上接受？连接受都不存在，继承和发扬就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对日常老百姓的挣钱吃饭，这种普通行为硬套上某某文化就简直是多此一举。

他的专汽精神，好像有一种口号标语的毛病，经不起挫折，因一个员工和他顶嘴而产生那么多的感慨。所以他的拼搏让人难以理解，恶意者把它当成另有所图的障眼法，说他像演戏一样。说他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然而就比如一场恶战摆在统帅面前，他必须想出让人冲锋向前的激励口号，例如"不攻下某高地决不收兵"、"与阵地共存亡"、"誓死血战到底"之类！除了万不得已的杀身成仁，那也是名垂千古死也值得的。

不过，按照中国国情，他的事业注定成功不了，他的悲哀注定在他的性格之中，被人无法理解，只好任人肆意歪曲了。中共腐败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产生哀叹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不过，从这种矛盾百出之中，他能总结出一套专汽文化，确是他才华的表现，虽然他对各种阿 Y 无可耐何，但他终于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把各种类型的人捆在一起，驾驭他们。

让他平时最看不起的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也听从他的指挥，当然他也同样付出了耐心，容忍他们的装腔作势。

有时还必须用最腐败甚至为人不齿的手段，去迎合政府里一个决定工厂存亡的小吏所提出来的要求。总之戏台上要求演员的一切，他都必须具备并要得体的表演出来，同时还要将自己的人格一齐加以扭曲，而扭曲自己做不愿干的事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虽然他并不承认。然而旁观者亲，若要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

他只有在十分冷静的反思后才能写出“创业者忧思录”这种内心独白，那独白中的空虚，正好反映出他的盲目性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他自己不能回答的，也许这正是他被统治力量利用之所在。

当然，就像一个学生寒窗十载，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优良成绩，得到一张从事某种事业的毕业证书，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变成了中国的富有者。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告退后，利用同市里的关系和自己开创专用汽车厂的名声，经过几年努力，从经营外国进口的组装车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在商海中升级，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上百万资产，经营一个以房产开发和旅游休闲的中型农场。

但是，当年正在为他个人事业打基石的时候，他必须对工厂作出贡献：在经营上打开销售渠道后，必须打开生产不出产品这个瓶口，他清楚打开这个瓶口，首先要砸烂低工资的“铁饭碗”。然而真要砸烂这个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铁饭碗，却并不容易。

习惯计时工资，混天日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公们，对“计件工资”历来采取抵制，得过且过的工厂管理人员，被推到了这个矛盾焦点上，他们在办公室泡茶过日的安闲日子被破坏，并且还要面对习惯势力控制的工人们。

“忙”和“风险”使他们对李伦产生反感，工时定额的不公，使定额偏低的工作无人去做，强制性的分配使工厂管理层与工人发生直接对立。

于是生产任务受着那些定额偏低的工作阻碍，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瓶口”，工时定额的压力使劳动者自然趋向于只图数量不管质量这种惯性，而质量又往往成为用户最为敏感的东西，人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工时分配不均的矛盾，夹杂着老厂自然形成的亲朋戚友关系网带，人与人之间这种，“权”“钱”“关系”的复杂角逐，令他举步维艰。

计件工资施行以后，使本厂职工中留在生产岗位上的“第一线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稍有“关系”的凭着父母亲友的帮助，拼命钻向无定额的岗位。这同官方公布，中国吃皇粮人数在国有企业中要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相当。

而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填补了这些空虚的劳动岗位，工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雇佣工，各类非工时人员充斥了各个办公室和库房，除了相互扯皮发生“内耗”消磨掉工厂活力外，难以再发挥他所希望的“志愿兵”精神。

一张报纸一杯白开水渡日这种现象，使他试图用一次一次“岗位培训”，“待岗”来精减那些人浮于事的办公室和车间。结果又伤到了工厂里层层交错的关系网，而招致了“党”“工”两大巨头的反对，于是三驾马驾辕的工厂中枢中。只得靠他那高大的身材强制大家一齐行动，使他事必恭亲，劳累至极。

计件工资总算在他的竭力主张下，排除重重障碍推行起来。然而推行计件工资的直接后果，便是粗制滥造，为产品质量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扯皮多得令人心烦。

每次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李伦便亲自和我一起召集现场质量分析会。一辆汽车从原材料进厂到总装成一台成品，从底盘组装到车身制作，从油漆到总装深入调查，事故的责任绝难准确判断。

李伦把事故的处理权交给了我，使我感到就像捏着一个烧红的炭园。最难的是，事故的责任究竞落实到谁？每次质量会都会招来无穷的扯皮。

若对每一个环节不熟悉，对事故不配，成千个工步，问题出在那一个环节？

于是我成了工厂的磨心，产品的质量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它必须奉行真正的“人性”。这与奉行毛泽东的假、大、空是无法并存的。

不过，在专制统治最后解体之前，独裁者所奉行的文化没有被公开批判之前，“人性”的解放还在艰难中挣扎，处处受到排挤和压抑。

一位署名周炎来的作者，在厂长办公室出刊的“每日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孔令平精神”的讨论文章，目的在排除传统观念的阻力。不过作者似乎把他所写的对象写得太悲观，悲观得有些过了头。文中把“孔令平精神”说得那么孤立无援，比成衔石填海的精卫鸟。但我明白，这就是李伦领唱的歌。

这就是他提倡的专汽文化所赋予丰富人性的底蕴。当他在中华大地上这么一个小小角落里，为挽救一家早该淘汰，即将伴着旧体制殉葬的企业拼搏奉献时，人们花费在精神上的折腾要比耗费的体力多的多。

1990 年下半年，借助于李伦对我的“关怀”，我终于从当年工人都不愿去住的文星湾的破旧四合院中，搬到了离工厂大约只有两百米的菜市街。虽然是新居，入室仍要弯腰，口袋式的小屋依然阴暗潮湿，地处菜市，环境复杂而肮脏。

但新居离厂近了，孩子的读书以及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用不着再背着他上下班。加上烧的是天然气，避免无烟煤的污染和毒气。

当时工厂新的职工住宅还正在平地基，职工住房依然是那么紧张，大部分职工仍挤在陋室破屋之中，所以我只有知足的余地，知足者常乐。看来，我们的窘困将随着李伦的成功而成为过去。

在搬进菜市街的新居之前，我向后勤科要了几袋水泥，将潮湿的地面重新铺垫过，几张牛毛毡将破烂的瓦面重新遮盖。幸好，我习惯了用自己双手改善自己的寒窑。在这陋屋的顶上

留着一处通气的天窗，口袋屋便是凭借着它流通空气！每当夜深时间，天上下起绵绵细雨，经风一吹，便从那天窗处浸下雨滴来。

黑色的雨滴打进我迷朦的梦中，打在我的脸颊上很是难受，仿佛秋雨也要借着黑夜给我奚落，如像一个高踞在豪华大厦中的权贵，向我的脸上吐着唾沫，心中一阵恶心。惊醒后，我很快联想到白天，因为车身焊接不良同冷作车间的主任争论不休，或者为错装了真空助力器，而将工人训斥一顿！

便觉得那份“认真”劲确有点唐吉柯德。便自叹何必争此你强我弱，因此招来诸公们“打倒孔令平”的喊声！的确是自找麻烦了。

顾影自怜，我已经年过五旬，被专制独裁折磨了大半身的残躯，还蜷缩在这“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觅盖瓦，风里倚围栏”的陋屋之中，想到这里，我会独自悄然坐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发呆。

侧耳听妻正在打着雷鸣般的呼噜，孩子那显得焦躁不安的翻身，他那掀开的被子掉下床来的响声，使我悄悄站起身来，摸索着在漆黑里悄悄进里屋给他盖好，再深深亲吻他的脸蛋，好象唯有这种爱才在我的心中熨上了欢乐。凝眸良久，再回到我那被雨水浸得潮润沾手的床上，蒙头而睡……。

所幸人有睡眠，睡眠伴着忘却使那积郁在心头的悲凉，连同白日沉积下来的劳累在沉睡中消散。大抵因为这黑屋太不能遮风蔽雨，我在这段时间夜里常做恶梦，经常回到那盐源农六队的高墙内。把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从我大脑中太深太深的沟纹里重新翻印出来：

因为偷拔了一个萝卜，当兵的用枪尖逼着我连荫带泥一起嚼到肚里；因顶撞那张棒棒，我被捆在大黄桷树下学老鸦叫！仿佛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似的。唉！我们这不幸的一辈人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受噩梦干扰就很幸运的了。

在中共刻意的扶持下，李伦的事业蒸蒸日上，随着亏损的扭转，专汽厂从1990年开始，利润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强烈的商战意识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厂成员公开称为克己奉公的志愿兵，攻坚闯关的敢死队。他的口号是“进攻”，唯有进攻，工厂才有生存的空间；唯有进攻我们才会获得进入国际汽车工业的机遇。

他还用其它人几倍的精力，晚上开会运筹必至十二点过，他说晚上十二点钟属于正常的工作时间，因为“人在此时头脑最清醒”。刚刚在会上做出的决定才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就已经站在工厂大门口，向每天早上参加碰头会的副厂长或者主管干部们，询问他们对昨晚布置工作制定贯彻的计划。

商机意识正是国有企业的那些不知产权归属，上级指派的厂长们所缺乏的东西。专汽厂凭借着这点，脱颖而出了！

久而久之，他成了工厂的一部动力机，不过这动力并不出自国营企业，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虽然他在各种场合都以党政工集体的名义，并称为志愿兵和敢死队精神。然而他比谁都明白，他的事业心并不会感染工厂里由上级部门指派的原班人马，这正是他在忧思录之中所发出

的种种悲叹的原因。

他“自诩”的党政工领导班子，是一块只能应对上级的招牌。不管他在玩傀儡戏也好，或者他常常发牢骚说是挟着他们一起前进也罢，他在完成各项扭亏部署时只能满头大汗，疲惫不堪！不过由于他个人能力，使这个厂很快扭转了亏损，实现了李友规划了几年的改变产品结构梦想，便是事实。

市政府卸下了一个多年都有工人去找他们麻烦的包袱。所以，不管他怎么搞，机械局的领导对他怎么另有看法，但宣传的媒体仍竭力的吹捧他，他在工厂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人们管他叫“天牌”。便可以证明他在这家工厂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继承人来延续他的事业，因为这些是国有企业无法产生的。

1991 年 5 月，重庆市政府组织了一次有关汽车的赴美考察学习。由重庆市各个主要汽车制造厂长们参加，预计学习两个月，他成了这个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工人们戏称“天牌”要出国两个月，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反映出他的独柱支撑的局面。那时，新开发出来的越野车卖点正好。临行时他关照五一期间虽放假，但生产不能停，总装、油漆和车身制作按照轮班休息的原则，照常上班。

扭亏以来，每逢假节日都要应生产部门需要，指定检验人员现场跟班，检验科于是便没有了星期天，这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星期天的工作，是这段时间国营企业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也养成了习惯，就是大年初一我都要去车间巡查一下，以便协调发生的临时需要。

4 月 30 日，李伦由厂办派的专车送到机场，正巧这一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一直下到五月一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撑了一把伞，从菜市街向工厂的后门走去，到了办公室，雨停了，我放下雨伞，径直向总装配车间走去。

今天与往常的“节日”显得不同，除了厂后面新的办公大楼还在忙碌着扫尾工程，整个厂区静悄悄的，连通往车身制作的过道也不见人影。“天牌”不在，小鬼偷闲了。今天是国家规定的大假，别说八点钟没人上班，就是全天无人上班也是正常现象。

当我穿过通往总装车间的过道，向总装车间的大门走去时，我突然奇怪的看到，大股流水正从那十米宽的车间铁门门槛上向外翻涌，并且顺着那天桥过道的两侧，像瀑布似的直泻而下。

“不好！总装车间里面怎么会关着这么多的‘雨水’？难道总装车间屋顶漏雨么？”我被那大股的流水惊呆了。顾不得大水的阻拦，脱了雨鞋，挽起裤脚，踩着齐脚背的积水顺着那天桥过道，向大铁门淌去。

总装车间的大门紧闭，门锁锁在大铁门的铁栅上。我走到铁门前，扒在铁栅上向里张望，只见沿着车间外廊上长六十米的生产线旁，均布的五个洗手槽上，水正从四十个水龙头向水槽里猛灌着。然后从灌满的水槽里翻过槽壁，向车间的地面上直泻。整个车间的地面已经积着大约有一公分厚的积水，满地漂浮着包装零部件的塑料袋子和泡沫块。

当我的眼光扫向车间中部三个通下一层库房的升降运输口时，车间地面的积水，正朝三个洞口向着下面大库房猛泻而下。我急忙侧着身，扶在天桥的铁栏杆上向下望去，下层库房的铁门门槛上也如这总装车间一样，昏黄的浊水从纤子门缝里涌出来，溢过二层楼的天桥过道，翻进了最底层的冷作焊接车间。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北碚水厂的自来水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洗劫”了我厂总装车间，零部件总库和冷作车间。

总装车间被水淹没的损失，比起下面的总库房里面淹没的损失还算次要，总库房里堆积的价值上亿的配件和物资，平时都要保持严格的通风和防潮的措施，以确保防锈防霉。现在这些物资全泡在浩浩黄汤之中。

底层冷作车间配置的电动工具、焊机开关都泡在水里，构成了人身触电的巨大危险。想到这严重的后果，我抬起头，向四下张望，在过道上没见到一个人。

看来昨天晚上，夜巡值班的门卫和巡视警没有人来过这里，情况使我顾不上多思索，我急忙三步并作两步赤着脚，顾不上穿鞋便向办公室跑去。抓起电话，先向李伦的第一助手，常务副厂长陈增“报警”。

“嘟嘟”！那电话响铃响了十余下之后，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了他睡意惺忪的回问：“谁？”他大概才从床上爬起来，问话语气很弱！我向他报告了总装车间大楼、总库房、以及冷作车间全部遭淹的情况。

可我还没有讲完，电话的那一端就被不耐烦的语气打断：“别大惊小怪的好不好？情况不要讲的那么严重、那么夸张好不好？”

陈增早在我进厂之初，一次去医务室看病的机会，我便认识了此人。那时我在二车间，上班看病本来就不合工厂规定，心想赶紧看完病，好回车间上班。医生桌前已排着三个人，陈增正好排在我的前面。轮到他，啰里啰嗦向医生讲了足足二十分钟的“病情”，其中拉扯了许多与病无关的闲话。

好不容易看他接过医生开的处方，不料门外涌进他的爱人、女儿和女婿，插着轮子依次问诊。我只好耐心等着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看完，看看手表，足足耽误了一个多小时，一家人才离去。

李伦担任厂长后，大概被陈增表面冷静的表象所蒙蔽。在向云推荐下当了常务副厂长。殊不知这陈增上任才一年，便私自窜通劳人科管工资的刘丰，在年终呈报工资报表时，篡改了自己的工资档案，私自晋升了一级。可惜，事情很快被察觉，陈增受到了李伦的严厉训斥。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陈增同销售公司总经理老婆私通的丑闻。为了替这个钢班子遮丑，李伦暂时还将他留在常务副厂长位置上，向全厂职工封锁了他的斑斑劣迹。不过，尽管他表面装得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尽管他熟悉上层领导的脾气，而将这种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可卑的行为已使他暴露无遗。

现在，听到他这种无理、无责任心的回答，我可绝对不示弱，语气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向着话筒吼道："你是常务副厂长，李厂长刚走，工厂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怕不好交代，现在灾情严重，现场又没有人，你必须立刻到现场排除灾情！"我几乎在用命令的口吻向他吼叫，说完将电话重重地摔在电话坐机上。

我第二次重返库房时，库管的总负责人肖芳正踩着积水，打开库房大门，那积水从门中汹涌而出。整个库房已经汪洋一片。大股的水还在从升降机运输口中直泻而下，进入库房的水柱正好冲在装着零件的纸箱上，打得劈啪作响。库房里的配件像落汤鸡似的呆呆地伫立在黄澄色的污水中呻吟。

望着那从上面灌注下来的水注，我想现在第一件事是打开总装车间大门，立即关掉还在继续狂泻的几十个水龙头。便朝楼上冲去，此时，值班的保卫人员已闻声出现。正从侧面的栏杆上爬进车间的侧窗，翻进了第一个窗口。两分钟以后自来水的龙头一一关掉，车间和库房开始缓缓的退水。

半个小时后，陈增和卢瑞到达现场。库房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正在用桶和碗将库房的积水向大门方向向外拂！看他们的样子狼狈失措。我在门口喊了一声："赶快把淹没电器的纸箱抢出来，不要堵在一个口子上打拥堂！"我这么一吼，其实是代替了陈增在指挥救灾。而他直起腰来白了我一眼，并没有理会我。

想到刚才他在电话中那轻蔑口气，便不屑挤进去，免得他又认为我在贪功邀赏了。转身，绕过盘道向楼底走去，那楼底满地已汪洋一片，库房的积水渗过预制板的缝隙，还在不断地泻到排列在车间中的铁皮车身上。

而焊接的电插板好几个都泡在水中，发出噼啪的火花，从浙江招来的冷作工在水中工作了。看到这情形，我想他们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便冲他们喊道："不要命了么？马上关掉电闸，暂停工作！"电闸关上了，车间里静寂一片。地上的积水在寂静中向四周溢去，从库房上面漏下来的水也渐渐减少。

十点钟，整个总装大楼的水算是退去了，太阳也从浓浓的云层中伸出她火红的头。总装车间和焊装车间暂停工作，打扫积水，清理配件。唯有总库房的库管工们正忙碌着将沾了水的内饰和坐椅以及装着电器的纸箱，往库房外的运输过道上搬，让它们照照太阳透透气。

陈增们已经离开，一场抢救水灾的事故平静下来。我望着那些堆在运输过道两侧的水淋淋的纸箱，心中暗忖损失少说也有几十万，造成水灾的直接责任人总装车间的负责人，是否受到追究，我不知道，也不打算追究这些李友的骄子。

只是在这一周周末的生产调度会上听他声明说："4 月 30 号上午水厂就停了水，我们车间没有接到任何停水通知。那天下午休息，除了几个加班的工人都没有上班，这些水龙头一定是工人忘了关上，晚上什么时候来的水没人知道，因为第二天是五一节放假休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再没人回过车间……"

经他这么一说，水淹总装车间的责任，应由与专汽厂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水厂来承担，而

与本厂和他本人不相干。经他这么一讲，坐在会议室主持人位置上的陈增未作任可追究。

我坐在会场中间，心中想到李伦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熬更守夜所挣来的这份家业，还没等到结果就呈现解体的征兆了。他刚一转身，放假不休息的规矩便守不住了；车间主任的责任制也不执行了；工人都再不轮流加班；库房管理制度乃至警卫人员的职责全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好象迅速回到工厂原来的状态。

由此想到他的忧思录，想到这家工厂从亏损的泥潭中爬出来的日日夜夜。

李伦既是一个匆匆而去的过客，他的努力，他的心血无非只换来了一个“天牌”的美名。

这陈增原是中共很称意的代表人。还有那参加会议的王惠书记，向云主席，他们在这个缺“天牌”压阵的事故责任交待会上，无一不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如此看来，对李伦的事业只能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因为这是国有企业！大家迟早要散伙的。

两个月后，李伦从美国归来，当他在向全体中干和党员干部的传达会上，讲到美国企业的职工对工作岗位那尽职的态度，还在为他的事业培养人的素质时，我注意到，全体与会者对五一期间发生的这一重大事故只字不提。

我当时想，他的钢班子铁队伍在向他隐瞒此事呢，还是他那志愿兵领导班子对此事达成了什么默契？或者就有一种无形力量在牵制李伦，使最亲近他的人抱识时务者必缄默的态度？只要没人问起，千万别提此事！

又过了三个月，李伦应我的邀请作为朋友，光临我刚刚住下的菜市街新居，“查看”我的陋室时，我才在吃饭时试探地向他发问：“五一节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他圆睁着惊诧的眼睛，带着一种没头没脑的疑惑，奇怪地问道：“五一节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没听说？”

听他这么回答我心中便有了底，打趣地替他解嘲：“你别故作不知，发生这么大的事，你的得力助手不可能不与你商量处理办法。”他越听越奇怪，放下碗摘下了眼镜，严肃追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才将五一节水淹总装大楼的事向他叙述了一遍。

从他那惊愕的眼神里证明，对此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边听边站起身来，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此刻他有些激怒了。按常规，发生这样的事情李伦刚去美国当天陈增就应该通知他，可是事情竟然过去了整整五个月，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汇报。可见他同这个厂的亲和度究竟有多大？

人若缺了感情的支撑，单凭单方面的事业心，再大的热情也是要熄灭的。为止住他正在亢奋的情绪，我说道：“对这件事你先冷静下来，最好不妨先单独了解一下库房人员和总装车间的工人，把经过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当然你也许最想不通的是，你最信任的人这次是一手遮天地向你隐瞒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李伦已经深深地陷入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中。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这段我离厂的时间，还有人督促财务科查壁山坐椅厂的帐目。”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李伦接任厂长的第二年，因为资金匮乏，开发新车品所需要

配件一时采取从配套厂家赊购的办法，讨回来装车的东西多有残次品，几家沙发厂送来的坐椅，不仅做工粗糙，颜色和款式的配套上也难于一致。

这使他萌发了建立一个由劳动服务公司管理的坐椅厂想法，由本厂职工自己生产坐椅。结果被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否决，理由是自己做出来的成本高，未必比买现成的坐椅划算。这时候家在壁山县农村的孙镛找上门来，从自己家的农家茅舍中办起了坐椅厂，取名重庆专用汽车坐椅分厂，专门为我厂的车配套。

几年后随着本厂的日益兴旺，孙镛的坐椅厂也越办越大，由农村茅舍搬进了壁山县城。三年内发展成为拥有资产百万、厂房二十亩的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厂里反对李伦的势力有了“把柄”，说他用国家给专用汽车厂的专项贷款，暗中挪用给壁山坐椅厂，并成为这家私营企业最大的“私人股东”，每年都要从那里分得几十万红利。

因为先前两件丑事，受李伦严厉训斥之后，对李伦怀着私仇的陈增，早就把眼睛盯住了壁山坐椅厂……李伦出国两个月的学习时间，给了陈增一次难得的好机会，经过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惠的默许，他调集了财务科的两名办事员和有关坐椅厂全部帐目，进行了秘密清查。

结果，出乎陈的意外，他在查帐中并没有找到李伦挪款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伦年终分红的任何收据之类的凭证。

李伦从美国归来回厂以后，财务科长将陈增组织查帐的事情告诉了李伦，在李伦追问下，陈增将这件事情归结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所要求，并说清查帐目，还这些代表一个说法也是一件好事，查账已经惹恼了李伦，现在又听到水淹车库的事，无异于火上浇油。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他终于揭开了五一水淹总装大楼的事故。在严厉的斥责了责任者对这次事故的失职行为后，宣布免去陈增常务副厂长的职务。但因为陈增与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在机械局有相当影响力的后台支撑，所以，在免去他原来职务后，仍给他封了一个中层干部头衔。

在行政职务上降了一级，但工资津贴年终奖金并不少拿。

陈增却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直到了四年后，李伦“病退”，陈增死灰复燃，重新窃取了工厂的常务厂长职务。并对李伦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几乎使这个高个子中箭殒身。

在扭亏致富的春风中，李伦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钢班子”，其内部不可调和的斗争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帷幕。

这原本就是共产党内的党风决定的。不论李伦在专汽厂有什么抱负和追求，也不论他个人的素质如何出类拔萃，他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他都必须面对这种无法摆脱的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伦终于成功地在四面埋伏的危机中完成了他的“专汽的大业”。从1989 年开始，工厂每年的赢利以几何级数在增加，不出五年，工厂实现累积利润达 2.5 个亿，奠定了他事业的物质基础。

第六节 我为一榻安身处而争

1989 年下半年，专汽厂已在李伦领导下摆脱亏损，总共七百套职工住宅的修建蓝图，就在李伦的亲自审阅后，摆到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议事上来。这七百套住宅几乎使在厂职工每人一套，是历年兴修住宅总和的六倍！他们分别以 9 号楼、10 号楼、11 号楼分期分批的在奔月路、云泉路和云天路边耸立起来。

在它们竣工以后，专汽的职工们将永远告别三代同住一间房、一家人拥挤在阴暗潮湿的"灰色"贫民窟时代。实现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豪迈诺言，告别那"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忙盖瓦，风里倚围栏"的日子终于才到来。

这才是李伦留给专汽厂三千员工最有价值的记念，也是对我的"忘我"工作最好的回报！这才是"孔令平精神不死"的最终目的！不然，救工厂干什么呢？

1991 年底，第一幢共 75 套住宅的 9 号楼在月亮田正式竣工。我因为所住的菜市街已被房屋开发公司征用，住在那里的全部居民房马上都要拆掉，所以面临着搬迁的紧迫形势。满以为根据工厂的分房条例，无论谁玩什么花招，我都可以排在分房队列的最前面，住进 9 号楼不会再有什么意外。

可我临到在分配 9 号楼之前，想都不会想到，在向云把持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抛出一个新的"分房方案"。在原来的"进厂届满五年才有资格排队"的规定后，加进了"以进厂的年限进行计分，并按这个分数进行排队"的条款。

理由是只有厂龄才算对工厂作了贡献。在厂的年限越长对工厂贡献越大，应当越有资格享受工厂的福利。

按照这个逻辑，比起那些在厂几十年的老病号，坐吃大锅饭的懒汉，我的贡献微乎其微。能分给一个栖身住地已是工厂赏脸，要分房子请站在后面。

按照这个修正办法对原先名次重新进行调整，我被排到了三百名以后去了，不但 9 号楼没我的份，就是 10 号楼建成，我也排在最后几名。我不知道这个一贯捉弄人的恶棍，是对付我呢，还是给李伦看？我尤其不能理解李伦为什么还让这个恶棍主持这次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分配？

其实这已不是李友抢机会给自己修工程师楼的年代了，在那个年代，好多职工为盼望能住上一套两间的住宅，硬是等到头发都白了；

在那个年代，为了搞乱分房次序，沾着权的人，以花样百出的理由，千方百计地在分房条例中塞进有利于自己的条款；

在那个年代，就为了一个分房排队的前后，可以与同事争得打破头，千方百计把别人挤出分房的队列。蔡家医院收拾母亲那一套，重新浮在我的脑子里。

那向云和他的老婆占了两套住宅还不满足，还偏偏利用工会主席的权力，来捉弄他心中不满的人，令人愤怒；这世道人心怎么变得如此之坏？

比着工厂破烂的过去，讲今天辉煌的业绩，李伦这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欣赏，既中伤了机械局的老前辈，老上级们，又刺痛了像向云这样的痞子。用进厂工龄算成绩，其实是对李伦的又一种否定！别看这混混在公开场合下将李伦捧在天上，他对这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嫉妒和仇恨。

不过眼前却大不相同了，眼看着工厂四周新房子一幢幢建了起来，房子的质量也越做越好，好房子还在后面，何必去挤着争？本来我大可不必在名次排前排后计较，更不屑同王惠、向云为代表的小人一般见识，但是对向云的流氓地痞本性，敢于同他作对的我，应该让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

赶上菜市街的拆迁！北碚城建指挥部贴出来的告示，要求所有的拆迁户都必须在当年年底之前搬离现场。否则推土机进场，不搬出的住户后果自负。我处在 9 号楼搬不进去，10 号楼又还没有建好的两难境地。

在城建局最后通牒面前，我只有再去找工厂总务处，请他们在分配完 9 号楼腾出来的旧房里，为我家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当我走进后勤办公室找陈涛的时候，他却向我亮出了厂工会关于安排职工临时宿舍的“书面通知”。

那上面写道：“由于进入新房的住户所腾出的旧房已安排完毕，对以后要求住临时房的职工，一律停止安排。”

“通知”上的落款，又是向云。真是寻衅者路窄，每每我最迫切需要解决住房时，都是这个向云同我过不去，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仇恨，使他像鬼似的缠着我？

奉行整人的共产党人，其用心之黑，整人之不择手段，我足足领教了四十年。整人不因别人错不错，凡是看不顺眼的，整倒别人以为快意。整倒了别人还要踏上一脚，这本是中共头子毛泽东的座右铭，也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原则，“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嘛！挨了这么多年的整，我也摸熟了共产党员的德性。

欺善怕恶是他们的共性，对付向云这样的下三滥，只好使出对付地痞流氓的办法，就比如我曾在监狱对付监狱官吏和找麻烦的“狗们”；对付郑树勋；对付过蔡家场的那个汪户籍；对付二十四中校长何希濂，以及蔡家医院的书记王光明等等。中共统治的天下遍地都是咬人的狗，狗性不能以人性理解。

有几次我都想将向云拦在厂大门口，当着工人的面臭骂他一顿，以泄心中的愤懑，但反而又一想，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来因为我现在在工厂所处地位已不同于一般职工，二来，尚有孔令平精神的美誉，动辄使出那泼辣办法，有损李伦的面子，他已两次亲自过问我的住房了。我不能为羞辱一个无赖而伤了李伦。

所以对这个流氓我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眼下我周围的邻居已纷纷他迁，城建局的推土机，已经蹲在我们那最后几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随时都像要“铲平”那里！

傍晚时，我在外经办的过道上与向云对面撞过，听说他在安排迎接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来厂视察工作的副主席。便上前拦着他的路，冷笑道：“要不要我来替你向全总汇报一下你的成

绩呀？”他见我横眉怒视，语气逼人，话中有刺，立即虚了胆，不敢迎战，垂下眼皮，一语不说，绕开了我走了过去。

他刚进去，门里出来了李伦的秘书小杨，他一面劝我说：“年纪大的人不要动怒，发火伤肝，对身体损害最大。”一面将我拉到一边低声向我说道：“李厂长正在召开迎接全国总工会来厂视察的准备会议，里面还有重庆两家报社的记者，你就是有再大的意见也要忍耐一下，等视察完结后怎么都好说。”

余怒未消的我，恨恨地指着外经办说到：“这老混蛋欺人太甚”。接着便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向云三番两次阻挠我正当参加分房的经过。

正在这个时候，通向厂后门的石阶上，突然冒出了我母亲的身影，她在刘启建的搀扶下亲自来找李伦了，眼看我们马上就要露宿街头，她实在不能再等了。

李伦已经闻声在门口迎接了她俩，并且将她搀扶进去，连连声明：“我们的工作做的差，劳烦你老人家了。”

第二天陈涛电话通知我，要我下午两点钟左右去后勤办公室，参加由李厂长亲自主持的关于我的住房问题的会议，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是本次分房的领导小组组长向云，副组长王惠，要我准备一下。

与其说这是一次彻底解决我六年之久的分房资格纠纷，还不如说我当着李伦的面，揭穿这一对暧昧男女长期搞的阴谋。早在六年前，因为我向市里反映了本厂的情况，李友故意通过他俩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我在进厂之初就写过不要住房的承诺，把故意不分给我房子，曲解为我自己为了进厂而不要住房。

从此以后，每次厂内职工的分房都没我的份。

这一次我要从头到尾彻底的捅烂这个阴谋！逼着对方在交不出我写的不要住房的承诺书时，痛快地将他们长期非法剥夺职工权利的阴谋公布在全厂职工面前，逼迫他们承认这是他们卑都的打击报复。

主意打定，下午两点钟，我准时来到了后勤办公室。

当李伦宣布会议开始以后，我便单刀直入追问道：“在我厂房屋调整中，是王书记和向主席说我在进厂时，曾书面承诺来厂不要住房的书面保证，现在，请你们二位当着李厂长的面，把我所写的这个书面保证亮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逼问，几乎是二人所没料到的。

其实，在档案中塞私材料是中共整人的常见惯例。当年在大学生中为了划某同学为右派份子，就曾经在窃取被害人的一句话或一段日记，经过“无限上纲”臆造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使好多人含冤几十年，无缘无故死在冤狱中。

当时很多人就提到“黑档案”应与本人见面，后来平反当局诡称这些整人的冤档已销毁。

然而现在，我有理由认为专汽厂的党工，又在使用这一下流的办法继续整人。现在面对我的追问，老奸巨滑的向云，回避正面回答，连忙重申他在李友掌权时，就主张将文星湾旧房解决我住房的旧事。

于是我不紧不慢地把老事翻了出来，从向云在六年前隐瞒真相，回答区政协主席张文新的来访，讲到分配八号住宅他那蛮横态度；从 85 年的分房条例，讲到眼前分房条例许多条款的变动，揭看向云的煞费苦心……

“一个工会主席理应在我厂扭转亏损的重大转折时刻，做一点有利于全厂员工团结的工作。例如把工厂暂时的困难向职工们经常解释，让他们树立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经常深入到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向他们问寒问暖，解决具体困难；对职工中发生的家庭矛盾及时解决，以免闹到厂里干扰扭亏大事等等”。

“可是作为工会主席你干了哪些实际工作呢？几年来我还从来没听到。”

“举几个例子，总工办的瞿工，老母亲因重病向工会借钱，你执意不给；逼着他只好到医院去卖血；厂里面的交通车坏了一停就是半年；职工食堂里为了单身职工有一个吃饭不被风吹雨打的场所，伙食团找你批一点牛毛毡你就整整拖了一年……这种事真是太多了”。

“就以我的分房资格，明明是被你们有意剥夺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忙，你说，你脑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我们就真是愚纯极点的人，任你把我们当猴耍？”

我怒斥这个一向盛气凌人的工会头，使他像一只失了神的木鸡！呆呆地坐在那里，也许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进一步收拾我的阴谋，但我却并不怕；几十年我同这些鬼蜮斗，不但练出了胆，还练出了智。

我把话讲完，李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位仁兄的自信被无情的事实动摇了。他并没有能力挟着党、政、工一齐，率领全厂的自愿兵。他那“团结一致”的钢班子依然同中共下层的普通官僚一样，摄于他在工人中的威信，玩着两面三刀，对他采取阳奉阴违罢了！

此时他抬起那显得疲惫和烦躁的眼睛，望着两位“助手”发问道：“那么，你们看，孔令平的住房该怎么解决？”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同两位工厂的最高头目当面交锋的。因为只有这种交锋才会把平时里二人的阴谋揭穿。

两个木鸡在他追问下一言不发，陈涛终于开口了。他建议道：“根据工厂职代会的决定，九号楼留有七套由厂长处理的住房，我建议李厂长可以动用这个处理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么处理既不提过去的事，又解决了我眼下的困难，也给两个人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以免“伤了”领导班子装出来一致那点面子，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此时，两人表面不说，肚子里还不知要什么花花肠子，同这样的人共事够累。

在这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到来的时刻，我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这个果实的，真正觉得问心无愧啊！看看我们周围的厂，垮的垮了，有的维持着倒死不活的状态！专汽厂没有这几年李伦带领我们拼搏，能在今天分到住房吗？

所以，我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特殊照顾，我说“今天，我是要讨回党委和工会长期剥夺我正当的分房权，他们应予公开认错。然后，按纠正错误的名义解决我的住房。这才令人心服”。

不料，我刚一说完，那原先打算沉默的王惠，像被针扎了似的立刻跳起来叫道：“这怎么行？党所作的处理，也是组织的决定，是不存在纠错的。”

死不认错，整人后不准别人申冤，这又是中共的传统作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若不是被打倒过的邓小平，胡耀邦替毛泽东制造的冤案收场，谁会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平反？小小工厂党委副书记不认错是当然的事。

第三天，《重庆专用汽车厂关于奖励分房》的条例，由厂长办公室签署的红头文件，下发到专汽厂的所有科室和车间。受奖的七人中，我排名居第一位，虽然仍是一种变通的方法，却是创下了这家工厂的首例：我已五十五岁了，才第一次以获奖的形式分到了属于我的住房。

然而，若不是全厂员工，在李伦领导下创下这段业绩，我的住房恐怕还遥遥无期呢！不过，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工，像我这样的年龄，甚至比我年纪更大的，在毛泽东疯狂作乱下，没有自己住房的人家还多的是呢！偌大的中国大地上，“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1992 年 8 月，我终于在城市规划指挥部的通令紧逼之下，在推土机隆隆的催促声中，雇了一台长安车，匆匆将我的家从菜市街，那四面废墟的包围中搬离出来，搬进了阳光充足的，专汽厂九号宿舍一套三居室中。结束了我屈身霉而潮湿的贫民窟历史，当年我已 55 岁。

我坐在客厅里感慨万端，尽管我并不心服这种以厂长名义的奖励，但我想，农汽厂继续烂下去，难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在哪一个街边屋角？至于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中，我又哪里同向云们去争“公正”啊！

第七节 专汽大业的破灭

专汽厂能在短时间里“振作”起来，是因为它遇到了面临破产的危机。破产后，一千名职工及其家属总共三千余人拥上街头向政府要饭吃，是对中共政府一个不安。在这种时候碰到官场腐败沾染较少的，又有很强运筹能力的李伦，以他拼命的精神和敏锐的天赋，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专汽大业”。

一千三百多专汽职工看到了工厂短暂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头不用为几分钱的菜钱同农民们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又可以在街头粗声说话。然而，那些多年“指导”这家工厂的上级机关，却增长了日渐膨胀的嫉妒心。至于那新闻版头上，猎取专汽厂新闻的小报记者，又重新围了上来。

“暴发户”是机械局的领导们对李伦的看法，他们从来不会掉过头去看看过去，思考之所以有这种隔世之变的原因。

他们没有体会到大资本家李嘉诚、霍英东们当时是怎么创业的？而老是站在中共这个相互猜疑的，带着嫉妒心和这个政党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创造事业的人。当然，

大资本家创业是为了他的家族集团，而李伦也是为了他今后的事业前景！虽然，这里埋伏着李伦事业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可悲的是，李伦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还没有洞察这个政局的能力，还一味沉醉在一群为他捧场的“敢死队”迷魂阵中。当时就有人向他提醒过：“你在那个工厂干了那么一番事业，一定要伤害一部分与你貌合神离的人，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对朋友的忠言逆耳时，只是一笑了之，而且夸下海口说：“谁能否定我这些年所创下的业绩？我一年就可以赚回过去的十个农用汽车厂，谁敢污蔑我，他就也上台试试！”

但是，最后终于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当年人民公社豢养一批不做事的公社书记和社长们一样，国有企业养着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厂的厂长书记们。他们担心的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存亡，他们只知道执行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奴才般贯彻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的指示，时下他们只认钱和权。

专汽厂自 1987 年，换了一个将工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李伦，就能实现每年 1 千万等差盈利，成为重庆市（也是全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佼佼者。虽然专用汽车厂的上级对李伦的桀骜不驯很不以为然，但前有李友、孙余等人都一个个败下阵来，所以对李伦的傲慢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他任期七年的时间，前四年用来弥补他的前任 480 万亏损，从 1991 年工厂亏损已提前扭转时，新的办公大楼落成，新的总装大楼，新的焊装生产线陆续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车间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余套职工宿舍先后竣工，专汽的职工们搬进了新居。

在办公大楼的左侧升旗台边，留下了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碑上，他亲自醮着创业的酸甜苦辣，将他的深情，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里，那碑文叫扭亏记念碑，上书道：

“公元一九八八年工厂亏损四百八十万……是时，悲叹之声随处可闻，凄凉之景到处可见，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后经三载，夏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彻底翻身，余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至 1991 年春提前九个月向世人宣告，重庆专汽重新站起来了……环顾乾坤，古往今来，适者生存，当今之世竞争激烈，改革为先。饱受亏损之苦的专汽人立下海誓，决不重演亏损历史……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为后者诫，特立此碑。”

七年前这家资不抵债的农用汽车制造厂，现在已变成一个拥有固定资产 2.5 个亿的大厂，形成了拥有越野和公共汽车两大类别，五十多个品种，年产值超过五个亿的重庆市汽车生产大型企业，成为政法、公安、农业、卫生环保、邮政等二十多个政府部门指定的专用汽车生产基地。

在云泉路和云天路的交叉区，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毡帽，已经在原先荒凉的土地上耸立起一片崭新的厂房。位于中央地带的黄色办公楼，已从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长满荒草，停放蓝色农用车的场地上，一幢占地六千平米的八层办公楼，拔地而起。

在办公大楼的东面，一排五层楼房共两百套带有浴室和空调的客房，以及与之配套的锅炉房和餐厅，取名北泉宾馆的豪华招待所，以它的妩媚迎接着到这儿来作客的八方宾客，永远结束了李伦所住的阴暗潮湿小屋，以及端着饭碗蹲墙角的寒碜日子。

回过头回忆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片沉寂了几千年的八万多平米的土地上，从荒凉的状态发生的变脸。在惊讶之余自然会想到这里换了一届又一届的厂长和书记，怎么就没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点改变它面貌的创业？

好像这里就等着这位 1.88 米的大个子到来后，才开始改换它的旧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计名利，无声劳动的建设者们，才十分清楚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93 年春天在持续七年的日夜奋战之后，在一次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会议中，他昏倒在会场上，当会议的工作人员把他从昏倒的椅子上扶起来时，才发现一层厚厚的坐垫已经浸透了他的鲜血——因为脱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个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贴身的工作人员，抹着眼泪将他抬送到重庆医学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连躺在病床上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一如既往的通过他的秘书，关心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专汽大业”。

1995 年 4 月重庆市政府对他个人进行了特别的奖励，他的名字载入了当时山城创业的企业家——山城之星的光荣榜。并且一次性的向他发给了十万元的奖金。颁奖时，他表示为表彰和鼓励为专汽厂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们，他决定将这笔奖金捐献出来，成立北泉汽车集团的科技发明奖励基金。

当时党委书记王惠、工会主席向云曾代表党政工领导集团在病榻前发表了“极其动人”的讲话，王惠称李伦为专汽事业之父。录像的镜头摄下了她流泪激动的片断，当场决定由党政治处摄制，取名为“逆流奋进”的长篇记实纪录片，记载专汽厂在他的领导下如何克服困难，扭亏为盈的七年历程。

这部纪录片的开场便是李伦在任职时临危受命的录音讲话，以及他亲自参与编写的专汽厂歌。当我看到王出现在镜头，注意到她几次摘下眼镜擦去流在眼角的眼泪时，我虽有一种不适的呕心，但还是半信半疑了她。

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然而，正当人们议论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侯。忽然有一天他从病榻上醒来，感到自己其实是干了一件自命轰轰烈烈的蠢事，他突然感到生命已不能支持他继续完成他的宿愿。

然而，就像一曲美妙的乐曲突然弦断了一样，李伦在专汽厂开辟的事业，就此中断了。

1996 年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党政工召开了全厂的职工大会，决定成立北泉汽车集团公司，并同时成立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这一夜，李伦带着初愈的病体到厂主持了最后一次“交权”大会，在作了长篇的工作讲话后，便宣布了他的工作交待，接任他担任厂长的是原汽车公司的一名生产处处长王洼。

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十一点钟。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李伦不知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心理上的障碍，坐在主席台上，灯光映着他苍白的脸。

散会后，他不像往常一样被一大群人簇拥，而是独自一人走出办公大楼，坐上在那里等候他的车匆匆离去。我当时只听说“升任”北泉集团公司总裁的李伦，在专汽厂某个办公室里继续在策划他的集团公司大计。

换班就这么戏剧性的完成了，李伦再也没有回到专汽厂来。所谓北泉集团公司，也从来没有挂牌，专用汽车厂一段“辉煌”的创业，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了。没有后继者继承他事业，专汽厂像一个断层出现在他任职七年后的一瞬。谁也不会像他那样拼命，换取这个厂从未出现过的辉煌。

令李伦没想到的，两个月后他的儿子李嘉，因套购北泉汽车组装进口汽车的合格证，被检察院刑事拘留。那个被一度贬为外经办主任的陈增，重新由王洼聘为常务副厂长，纪录片“逆风奋进”停拍，这一切厄运好像早就等着这时到来。

李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根本没认清，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有才能的人没有掌权者作后台是休想干成任何事的!！专汽大业的成功，只说明中共一部份人的主张，没有认识这点，怎不到头一事无成？

一个以王惠为主任，刘贵为组长的审计组宣布成立，那审计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办公大楼五楼党委办公室对面，开始了对李伦在职期间的财务大审计，审计组放出风声，说李伦在离任时至少卷走了数百万公款。她举着一把检举信，声称审计室将拿出一个令全厂职工都满意的结论报告大家。

这种说法，挺合乎中共改革时期企业法人的一般逻辑，所以颇能盅惑人心。现实过程应当这样：一个在任职期间一无能力的人，把一个企业搞得一榻糊涂后，也要捞足自己的腰包。

有权就捞，过期作废，是邓小平中共管理下国营工厂的通行法则，有人把这时期的工厂管理者比喻成一群蝗虫，蝗虫飞来飞去，吃完地里庄稼，留得荒凉一片。李伦既把厂搞富了，也有条件捞了，收获一把也是应该的，要不然，他的儿子也趁他离任机会，连走私车合格证也要捞几十张？

但是专汽厂的一部份职工们却替李伦打抱不平了，黄师傅说：“贪财的人不可能把这个厂从死地里救活。再说，李伦就是拿了一笔钱走，他也应该，一份贡献一份回报。这些年来他把我们这个厂救活过来，工厂赢了那么多，他得一点也是天经地义的，反正总比吃光了庄稼再飞到他处的蝗虫好多了”。

而另一部分人，像陈增以及曾在李伦从严治厂的刀口挨了宰的人们，别有用心的鼓动职工联名写信上告机械局，要求彻底清查李伦任职期间的所有账目。

李伦被一群小人当成落井下石的罪人。

中共这种令人寒心的官场格斗，那王惠令人作呕的变脸，就会想到今天人心不古。中共

统治令人感到道德处在败坏的末日！中共的党员有几个不是当面是人，背地是鬼的呀！君不见那毛泽东是怎样对付刘少奇们就明白了。先师楷模沿袭至今，成了中共的党风！

靠走私进入大陆的小轿车经过倒卖，每车可以赚到二十万人民币。官僚集团为了控制这种轿车的分配，严格卡住这些走私黑货的合格证，掌权者利用发放合格证也能跻进中共“中产阶层”!

为支持李伦日野生产线所需资金投入，肖秧曾给李伦特批了走私车经营权，以政府名义给每台组装进口的小车，以每台二十万，向专汽厂输入了“资本”。这比之由市政府调拨三个亿，简单又快捷。三个亿相当于 1500 台进口车的组装权，每一台组装车充其量只消两个人装两天就成功了。

李伦退休后，正是进口车组装进入高潮。重庆市大小官倒们像一群苍蝇，盯着这转眼就可赚二十万暴利机会展开了争夺。他退休以后，进口车的发放权力落到了王洼的手里，正儿八经的做起倒卖合格证生意来了。这比六年前殷大公子在工厂门口倒买农用车卷，大进了一步。

1996 年初，王洼批给成都的经销主任陈平，一次性出售的合格证就有一百张。这个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让李嘉知道的，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已成为北泉车经销商的李嘉，从陈平手里一次性买下了三十张组装车的合格证。

然而，因为暴利太赫人，很快中共派出专人查封和清理走私车。陈平因此而被公安局传讯。于是李嘉从陈平手里买下三十张合格证这件事，便成了殊连李伦贪污的“证据”。在这铁证之下，李伦便由众口称颂的创业功臣，一夜之间降为受到追查的“准阶下囚”……

人在剧烈的运动中头脑发热容易盲目冲动，有时会犯很大的错误却不查觉。等到激情过去，静下来反省已经过去的事，有时就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极其荒唐需要修正，甚至发现基本方向全错，误入了迷途，必须调整方向。

李伦在中共特权者阶层利益分配的倾轧中落魄，改革开放时，财权归属不定的状态下，这种掠取最后必表现为夺权斗争，夺权使他昔日的辉煌归于消亡。所以他大可不必把个人的失意，归于某些职工不讲良心，普通的专汽职工除了听命摆布外，充其量也是一些发发牢骚的受难者。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库中，记载并论述经济的文典显得不足，十三经传了几千年，无非都是围绕统治这个题目，以仁义礼信为“宗”，礼乐官爵遵守的制度都没有摆脱社会关系这个总纲。这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封建主宰时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统治阶级只关注社会的治和乱。

当辛亥革命给中国输入建设国家的民主大纲时，却被北方输入的共产主义所截断。三民主义被蒙上了反动资产阶级的不白之冤，被赶到大海一个孤岛上去了。在大陆所施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裁统治下的封闭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吃尽了苦头以后，才重新将中国历史拉回到市场经济的起点上。不过这种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最终滑向何方，大家可拭目以待。

从李伦手中接过专汽总厂厂长位子的王洼，摘取了我们奋战七年辛辛苦苦换来的劳动硕

果，他不仅享受了前任为他创造的条件，还享受了一家富裕大厂法人的荣誉和利益。低能而贪婪的他，很快将工厂管理大权交给野心勃勃的陈增，在陈增的操纵下勾结向云，王惠这帮专汽厂“旧臣”，把持了工厂的大权。

好端端的北泉厂，在内斗中两年不到，就失掉原有的盈利惯势，到了 1996 年重新转盈为亏；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亏损了五百万，陈增为了怕露了马脚而失宠。用假报库存物资，虚报基建投资来掩盖实际已发生的亏损。

机械局的头们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口袋里塞着王洼在年底送来的“慰问金”，他们的桌子上，摆着仍然显示专汽赢利的报表。欺哄行贿，是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厂长们都会的伎俩，在种种肮脏交易的狗肉上，还要挂“学邯郸精神，力创第一流”的羊头。

1996 年 5 月我正式提前内退，结束了我对这家工厂所作十二年贡献。时年 58 岁，此时我的儿子才 14 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为了筹集今后给孩子求学的学费，也为了积蓄一点晚年的生活补充，我走上了打工的生涯。

离开专汽厂偶有回厂的时间每次回到车间，工人们都围着我问长问短，曾在品质处当副处长的肖森告诉我：

“自从你走以后，原来制定的质量法规全部取消，产品的质量实际上无人管束。购车业主，将出故障的车开到工厂大门堵死。他们拿着事故鉴定找厂长交涉，吓得王洼躲在办公大楼里不敢出来。堵门的司机们呐喊示威，久而久之，专汽厂的老用户，都一个个离开了这家工厂，售出的车辆每年大幅度减少，而售后服务忙碌得团团转。”

他还告诉我最近开往新疆的十台车，因为制动不灵，电器等毛病，不但用户不要了，反而叫专汽厂自己开回来，这么发生的往返路费，修理费就上了好几万。说完以后，便沮丧的摇头说：“今年亏损预计已超过千万，我看，工厂是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工厂经营办公室办理我的退休手续，碰到了戎露，她正在办公桌上翻阅一大叠我当年起草的，而后又被陈增打入冷宫的质量管理文件，她见到了我，好似见了久别的师长。连忙请我坐下，端上一杯开水后，问我离厂后在那里工作，还询问李伦现在在干什么？说大家都希望我们再次回厂。

我回答道“世上并无救世主，李伦也好，王洼也好，只要心存事业，都能振兴工厂。”说着顺手翻了翻桌上堆放的文件发问道：“近来工厂的经营状况还好吧！”她摇摇头说；“自从你走后，产品质量基本上就没人管。

她还告诉我：“因为工厂重新出现了亏损，市机械局最近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审计了陈增，没几天陈增也下台了。王洼眼看着车库里积压了几百辆车卖不出去，一面召开厂务会，决定重新翻印过去你所起草的管理办法，和质量考核的经济责任制，由总师办整理后，重新颁发执行，并令总工程师督行。”

听到她的介绍，我心里很平静，六十岁了，深刻体会“天命”不可违抗，陈增以为人意可对抗客观规律，为拔除眼中钉而废了全质办，从此专汽厂再也不会出死心眼的孔老二！当年

唯一想得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名，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当挣得的房屋和待遇而已。

现在我们的退休金可求温饱，住房也有了，我们还图什么虚名？何况接替李伦的是一些肖小。李伦所提倡的敢死队精神，成了笑话！现在还有谁像李伦那样傻干啊？面对戎露期盼的眼光，我只有笑而不答，这正是："一曲新辞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陈增因免职引发专汽厂的一片谴责，两年后，王惠也灰溜溜退休了，当人们用解嘲的口气问她"李伦的问题，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给全厂职工一个满意的答复？"时，她只好苦笑而不能回答。

而那个被撤了职的李小兵，在王惠退休时向她家打了电话，恭喜她终于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了，愿她不要再像任职时瞎整人了。听到这公开的奚落，她也只能当成一瓢泼向她的污水。这真是"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人何必争高低！任何是非曲直自会得到公论。

从 1995 年王洼接替李伦后，专汽厂重新被亏损缠住，1998 年，卢瑞接替专汽厂后，2003 年亏损已达一个亿！1990 年李伦在"扭亏纪念碑中刻下的誓言，终于变成一代创业者留下的一厢情愿！一个从亏损开始创下三个多亿的大型国有企业，由重庆市政府坐东，以五千万的"跳楼价"，出卖给了重庆市一家私人摩邦立帆集团。重庆专用汽车厂在这块土地上挣扎苟延，直到消失。

卢瑞这个纨绔子弟，便在中共市政府庇护下，靠"贱卖"这个大型工厂的昧心回报，换来老板尹三的嘉奖，在力帆公司谋到了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拿着年薪十万的报酬。进出有轿车，有豪宅，过着老板生活。

而贱买专汽厂的尹三，根本就不想在这块土地上，继承专汽厂有过的雄风。从卢瑞手中以五千万买下这片黄金宝地后，便迫不及待向北碚区政府以四个亿的价格，准备将它们抛售给北碚房地产公司。

可惜，这私下的买卖尚未成交，就遭两千专汽职工群起反对，纷纷上告市政府，迫使尹三暂时没能得逞！当然这都是中共某当权者背后在捣鬼。

经过卢瑞的穿梭，条件谈妥，专汽厂"改制"闹剧于 2003 年拉开序幕。所谓"改制"便是处理原国有制的职工，其退休部份已交给"社保"，有一口饿不死的饭吃。没退休的抛向社会。

于是以人员超编为借口，重庆市政府以七百元一年的低价，买断了最后七百人的工龄，当然，在面临生存危机时，被解聘者可以奋起反抗。可惜中国人的丑陋，使他们像一盘散沙，不能团结一致，只好凄凄惶惶各奔生存之路。

这使我联想到中世纪时期，英国的农场主为了获取暴利的目的，将世代依附土地的农民驱逐出他们耕作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变成种植草场的牧场。因为他们看到在土地上圈养羊群所得的利润，远远高于农奴们种植粮食。便演出了一段羊吃人的历史悲剧，史称"圈地运动"。

被逐出工厂的职工们，猛然由“主人”地位，跌进了出卖劳力的深坑。专汽总厂的职工从此流落街头。

我的一个邻居，谭某因家庭经济拮据，夫妻离婚，如果不是李伦当年为她的父亲留下一套房子，她将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流落街头。

专汽厂只短短存活了十年，李伦为此所付的一番心血便告消失，他立的扭亏纪念碑被后继者卢瑞推倒打碎，成为行人脚下的碎石。写在大门立柱上的志愿兵敢死队精神，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想到当年没日没夜的“拼命”，就在我的心头涌起对这种傻劲的羞耻回忆。现在只有李伦时代留下的八百套住宅，才在这些住房里栖身的职工心坎里，留下一点纪念！

问到失去工厂的几百名职工，为什么被卢瑞这么轻而易举的卖掉？

需知，李伦创业时，同样的地盘上依靠一千三百名职工，在这里建起了专用汽车厂。并创下了每年盈利四千万的成绩，就可以明白，人多并不是企业衰落的理由，其实卢瑞只是中共“改制”新花招的小小枪手，毛泽东从干爸史大林那里搬来的国有制行不通了，又变了一个花样，吃苦头的还不是工人！！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我所在的重庆专用汽车厂现任厂长李安林，被人在办公室里暗杀的事件。

那一天，他的妻子在晚上十一点钟见她的丈夫迟迟未归，当天下午又没有打一个电话回家，以为他手机没有电了，于是从家里带着充电器，到他的办公室里找他。一上丈夫办公的二楼，整个楼层黑压压的一片，静悄悄的。

打开过道的路灯，走到丈夫办公室的门口，见门是虚掩的，黑压压的屋里没有任何声音，顺手打开室内的照明灯，眼前出现的场景使她顿时吓蒙了。

她看见她的丈夫倒在他的办公室沙发前，地上的血已呈黑色，身体已显得僵硬。看来，已死去半天了，连忙战战惊惊地喊醒楼下值班室里的值班保安，据保安说他是下午六点钟来接班的，并没有发现楼上有异常响动，立即打电话通知了“110”，李安林身上被砍十一刀。

李安林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十一幢家属楼，人们议论纷纷。

李安林被杀第二天早晨，便有人告诉了我，与我们这幢八号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专汽厂大门边的露天广场里，正在搭造死者的灵堂。

自从 97 年我退休以后，至今整整八年了，前几年还偶尔去总装车间去一趟，多是受买车的朋友所托，要我选一下他们所要的车，近四五年，我已完全不进厂了，严格的遵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风闻王洼继任专汽厂厂长以后的种种无能，也是当了耳边风。

后来与我同是这七套奖售房的得主，搬了三户出去，其中两家搬进了在云泉路口，新建的一幢每户占地两百平米的楼层式“豪华”住宅。我感到奇怪，有了住房本该满足，缘何想好

还要好，占了一套又一套？

残酷的事实摆在专汽职工的面前，自从李伦离任以后，任何由官方指定的人没有人让它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从王洼、陈增、到卢瑞仅花了五年，三个亿的资产，便被继任者亏光了。

短短十年的专汽大业就这样谢幕了!!

第六章 如此霸占民宅

从八七年开始，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也包括了毛泽东时代在“清匪反霸”、“土改分地”、和“镇压反革命”中被无理强占的私人住宅的清退。

当年相当数量的受害者，被无缘无故扣上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遭受屠杀，幸免于死的被带上五类份子帽子，遭受了几十年的身心摧残。

遭整者家里一点可怜积蓄被抢去，尤其是赖以遮风避雨的住房被强占，还要延及他们的儿女受到牵连，其涉及人数之广，受害人之无辜，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毛泽东自己就不打自招供认，“革命对象占人口的 10%”，这样算来，祸及人数至少也有六千万。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二十九年间，五类份子绝大多数已弃尸荒野。所余的幸存者到 1979 年已不多，这些幸存者中还有相当部份，是“解放军”兵临城下就已缴械投降，束手献城的“起义投诚”人员。

有人说中共原本是山里的土匪，土匪以抢劫起家，土匪当了政，将原先政府的制度废除，抓一顶“革命”帽子戴在自已头上，成立“革命政府”但骨子里仍是土匪，老百姓的房子，几亩薄田，一点女人用的戒子耳环，都在“没收”名义下抢去。

1979 年当时中共组织部和国务院，曾对私营企业改造中，和起义投诚的国民党人员私宅，作了一个清查并作出发还的政策性规定，以文件形式下发给各级政府！一个清退霸占房地产的工作，便在中共统战政策的鼓噪下开展了。

然而，这比右派落实政策还要马拉松，其中借口政策界限不清，借口没有钱和种种对清退对象所作的限制，使最后体现政策得以归还的人数微乎其微。被北碚区政府列入清查的人数仅只有十余户。

尤其是在政策贯彻过程中累累受到干扰，使政策落实备受阻挠。所以受害的人骂道：“中共真是活抢人的土匪！”

我的老岳丈刘学理便是其中一员，他的住宅被中共抢占去四十年，最后仍未归还。直到 1991 年，高龄九十的他，抱着被人抢占家园的终身遗恨含恨九泉。

他曾任北碚城的民政局长，当时的北碚属于卢作孚管辖下，山峡防务局的一个重镇。刘学理只是跟随卢作孚先生的一名普通地方官吏：民政局长兼任北碚保安部队司令。

抗战时期，保安部队算成国民党正规军编制，刘学理被授了一个上校军衔。1949 年 10 月刘邓大军进军重庆，二野下属的十二军没费一枪一弹便和平地占领了这座城市，率军欢迎共军入城的刘学理，也就成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人员。

十二军入城后，刘学理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家中五个孩子还小，他要自谋生计。当他怯生生的到军管会去求职时，他的身份一下子从率军起义的城防司令，变成了被军管会召去思想

改造的学员，入了反革命另册。他本人被判管制。

唯一的积蓄是 1946 年在上海路购置的一幢四百平米的私宅，被一直觊觎着它的北碚工商联合会看中，并于 1952 年用军管会签署的命令加以“征用”。

在枪杆子押送下，他只好同妻子一起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家，哭哭啼啼迁居到北碚天生桥偏僻郊区一所破房子中，一住便是三十年。

同大陆上成千成万计的五类份子一样，在共产党暴虐的历次运动中，被街道居委会欺凌，年过半百的他，当过街段下力的搬运，挑凉水的力夫，为豆腐坊商店磨豆腐的伙计。为了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做别人不愿干的活，忍辱负重，把一腔怨恨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刘启建每提到她的童年，都会伤心的说，她八岁时就要背比她小五岁的小妹妹，捡二煤炭和木工房里砍下来的木屑时被狗咬过；每天她同姐姐抬着一捅水，走两里路送到父亲做工的豆腐坊……

直到 1982 年，中共才按照上级文件给刘学理平反，取消了管制，并以起义投诚人员身份得到一张平反证书。

毛泽东咽气后，民间响起的怨恨声一直在沸腾。在为无数冤魂平反的同时，归还被强占的民宅也提了出来，这本来就是一件压了三十年的事。被霸占当事人的房地产契约，和当年军管会所发出的“征用”通知，都写得明明白白。

1984 年，中共中央有关清退过去历次运动中被强占民宅的政策公布后，刘学理正式向北碚区政府提出归还上海路房产的要求，他同北碚区同时被没收的几十户人家，开始了向中共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私宅的长期马拉松交涉。

中共的任何“革命”借口，都无法掩盖无理强占民宅的恶名，其实无需经过调查核实。只要有诚意，全国这种种霸占民宅的恶劣行为，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全部清退。

但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向来按他们的需要出发，难以光明正大的纠正错误。加上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以“头”为本，并没有什么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原则可遵循。今天一些人发出的政令，明天另一些人就可不认账。而且共产党“左”风盛行，朝令夕改，在清退民宅问题上，便有几个前后矛盾的决定。

例如先前的文件说对强占的民宅一律退还，后来又有了一个补充规定，把土改中没收的地主房产和反动会道门带有封建性的房子，排除在清退之外。后来又加上了凡有剥削性质的民宅都不与清退一条，这样一来范围越来越小。

中共政策的执行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把这事结束在一连串“上级批示”的推诿之中。对这种有附加条款的软指标，慢慢就变成根本无法兑现的零指标，以各种借口将被强占的民宅继续地霸占下去。

在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共的谴责所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向国际社会做点样子。中共除了

对有影响的国民党上级军官，以及有统战关系的人士，给以归还外，其它被强占的民宅根本就没有动。

看不清中共骨子里面的东西，心存侥幸的绝大多数被掠夺者，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备齐了各种证明房子的材料，等在统战部和民政局的信访处，一等就是几年，最后除了白白等下去，没有任何结果！

然而，已经八十高龄的刘学理老人已经等不及了，自 1983 年老伴死后，他天天都在搬着指头算自己还能活几年？被人占去他的老宅，是他晚年最不能咽下去的一口恶气。他要趁着这剩下的一口气，要回这被人抢去的家园，给五个亲生的儿女一个明明白白交待，否则他就是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

这一天，他手捧着“人民政府”发给他的，那张盖着政府大印彻消管制的“平反”通知书，在小儿媳妇和孙子们的掺扶下走到区政府去。

在信访接待办公室等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等到下班。一个中年男子向他说：“你不要在这里等了，我们要下班了，你回去还是准备好自己的有关房屋的所有资料，说明房屋所在地、占地面积以及何年何月购买，以及房地契的复印件，还要写明，何年何月那个机关签发的没收令，因什么理由没收等等……”

当刘老从怀中掏出已经带来的材料时，那中年男子还算耐心的坐下来翻了翻，说：“现在办公楼的人都下班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再按我向你说的范围重新整理，备好所有的资料再来吧。”

整整等了一天，陪伴他的孩子们都已离去，老人连衙门里管事的官都没见到，便在这里花了第一天的上访。“解放前”他为官十几年，没想到中共的官架子这么大。他无奈的喊了唯一没离开的小儿媳妇，没趣回到天生桥的家中。

当我听到他在信访办公室受到的冷落，便自告奋勇由我陪他去。

按照我的经验，中共这种官僚体制对这种找上门去的告状，非经长期多方力争不可。北碚地方的衙门叫不开，就把材料转发给重庆市，依次向四川省政府直到中央国务院呈送。

刘老把当年的房地契找了出来，由他亲笔重新起草了一份有关上海路住宅被没收的材料，经我删改后，复印多份准备逐级投递。

由我陪同刘老伯去区政府信访办，向接待人出具了有关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材料后，刘老伯又被接待人支到北碚区房屋管理局。

北碚房管局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那里的负责人，她在看了我们的材料以后说：“你们的问题属于天生房管所经办，你们还是去那里找他们吧！”我又陪同老人到天生房管所，看来谁都不知道经管的办事衙门在那里？

一番口舌后，天生房管所的办事员，终于收了刘学理写的材料，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接到了有关北碚区给各所发的需要清退房产花名册，但是具体怎办还要等到市房管局的通

知，你们还要回去等一段时间，如果有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事情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刘老伯回家又等了半个月，可是仍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老伯终于焦急的又一次在我的陪同下，又访天生房管所。

然而这一次他们回答说：“你们交来的材料已交到了市房管局了，有关这次房屋归还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上面没有批示我们无法操作，这里有一个经费问题，没钱拿什么给占房户？发还给你们还缺乏具体的规定，所以你们最好去催一下市房管局。”

又将老人踢到市房管局去了，我想我在落实政策时，就被当成球在几个衙门里踢来踢去，那被踢的滋味真让人难受。按着心里的一团火，我吼道：“你们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球踢来踢去讲良心吗？现在天气又热，你们不感到这么做太过份了么？”

但是他无奈的摊开手说道：“你们也知道，现在办事真的很难，天生房管所变不出房子来，拿什么还给你们？”接着说了一大堆的安慰话，给了一个使上访者不完全失望的话，他说：“这件事老大伯尽可以放心，反正中央有政策，房子归还只是一个迟早的事，你们总有熬出头的一天。”

事情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了，老汉总还盼到了一线“希望”，受骗了一辈子他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政策上。

时间就这样，在刘学理告别人生的最后几年，白白的等下去。然而越是在中共的衙门门坎上打坐，越使这位老人感到不明不白被人抢去的住房，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羞侮。

他多次在假日里，请我们一道去看他的那幢住宅，唠唠叨叨不断讲当年被赶到天生桥那揪心的痛。他不能再等下去，他不能将这个羞侮带到冥间去。除加快了他去房管局催办的频次，由每月去一次，增加到每周去一次。每次徒劳无功的空返，又增加他新的一份怨怒记进了他写的材料中。

有一次我们又去天生房管所，这次接待的是一个女人，老人怒道：“你们办事怎么这么拖拉，你们要的材料都写清了，你们一次又一次要我重写。你们欺我老是不是，你们这种工作态度我会写信到上面去告你们，我就不信真理会被你们践踏掉了。”然而那女人却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跟你讲过，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我们是普通办事员，没有权处理你的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统统都转了上去，等上面批示怎么办。我们也想早一点落实你老人家的住房，免得你天天跑，够累的，我们也够麻烦的。我们要你写补充材料也是上面的意思，请你不要找我吵好不好？”

这话里有办事人员的苦衷，但也许又是她故意的编造，或是授意的编造。气急败坏的老人，只有柱着他的木头拐仗在那信访办的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以示抗议和愤怒。他还能把她做什么呢？他只好等……直到感觉自己再无力继续呆在那里，才悻悻的离去。

为了解除这件事对老人的烦忧，我还亲自陪同他两次夜访区长陈超。陈区长夫妇是我母

亲苏州的小同乡，多年在北碚与我母亲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门岗的盘问和阻拦。但由于这层关系我有幸得了进出的机会，加上刘学理本来就是北碚区统战名人，当时市政协的副主席卢子英的旧友，说什么也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但是，在态度谦和的陈超那里，除得到与天生房管所办事人员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无所获，不过他答应将在区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为此，还留下了刘学理带去的上访材料。

作为一区之长，他照样不敢违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于不敢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上级批复和中央文件妄加评论。不过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产必须同地主和封建财产相区别。

1979 年，彼此以炮轰来对话的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告台湾同胞书”有几分诚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长期封锁的大陆百姓，知道海峡对面早已进入了富裕社会。

五年后首批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被故乡的家人和邻居当成贵客。各种过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湾亲朋关系，到此时才慢慢公开。

最开始，这种带着离乱伤感的相见，是在中共统战官员的陪同和监视之下进行的，有了这层监听，纵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难以畅诉，那真的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双行。”

1987 年我还在文星湾时，第一次见到台湾归来的客人与亲人团聚的场景。来人姓陈，大约五旬开外，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一位 1948 年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亲弟弟，但弟弟已满脸皱纹，看上去比他苍老十岁以上，宛如一个贫苦老农。

主客相对，淡淡相视。哥哥首先向弟弟询问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讲 1960 年，双亲先后得了“水肿病”相继去世。一个妹妹因没饭吃而跟了一个城里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弟弟讲这些伤心事却好像一点都没有动容的表情，像数落着普通的家事。

大陆老百姓对毛泽东带给他们的灾难麻木了，饿死被当作正常死亡。然而从旁听来，陈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战祸还要凄惨。

陈家大哥从台湾归来，召来了一大群邻居，尤其是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们怀着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泽东宣传为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人，究竟是什么样子？陈老哥在弟弟这里住了五天，回去时来看他的侄儿侄女每人都给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数量不等的人民币，在穷极的中国农民眼里，一百元人民币在当时农村中相当于一个人一年收入了。

1988 年，刘启建的隔房三哥刘信，从高雄随“大陆观光团”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刘学理的祖籍。刘信父母早亡。当年家境贫寒的刘信三兄弟，便拜给了大伯父刘学理，从小就得大伯父的资助得以早年去军校深造。刘信军校毕业就去了台湾，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几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刘信归来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计议了好久，决定他回来后，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

拜祖坟，最后才回到北碚作一个礼节性的拜访。但听到刘信归来的刘启建五兄妹，在刘学理的指示下与刘信三兄弟一共八个家庭，想借统战关系由刘信出面向北碚区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归还。

刘信来访一个月前，刘启建的长兄联合了北碚区其它十四家卢作孚旧部，联合向中共重庆市委进行了请愿，要求归还当年被没收的房屋，托区长将请愿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递。紧接着他又将请求归还上诲路私房的申诉，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

采取这么一系列行动后，终于有了回应，天生桥房管所正式通知联名请愿的十四户房主，约定了时间在北碚房管局的会议厅里，向他们作正式答复。

给刘学理的答复附有当年军管会没收上海路住房时，一个没头没脑的通知，那上面写着军管会以地主产业加以“征用”。

这个用词含混的通知，成了区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据，至少变成了有争议的房产。因为“征用”不是没收，这上海路民宅还有一线归还的希望！！但这个通知将上海路房产划成地主产业，就不能归还了。

当场老人向宣读文件的人申辩，说他少年就离开合川本家出外求学，后来的户口以及各种证件都把他的出身写成学生。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为地主产业从何说起？然而答复的人说，他不知道过去的底细也无权去过问，只能宣布文件，并按上级文件执行。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就凭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随意制定和解释的，对老百姓可以任意戏弄的。激动不安的刘学理回家后，就关于当年的房屋划为地主财产的消息，电话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证明这栋楼的主人，属于什么出身，就可澄清当年军管会所作的结论！

所以关照刘中柱在老汉出生的故乡，开一张关于自己出身和经历的证明。并加盖合川政府的钢印，叮嘱他办完证明后请他派人专程送到北碚来。

看来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归属，争个谁是谁非了。

按照刘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将他所需要的证明开好，并且派他的侄孙专程送到北碚。刘老伯在接到这张证明后，立即复印了好几份，拿着复印件再度上访天生桥房管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望着那盖满了红大印的纸淡然一笑，他这种基层办事人员，虽然不一定能准确洞察出中共各项政策的背景和底线，但他从实践中很懂得落实中共政策该怎么来对付这个老头。

近来接触到老百姓要求归还被政府占去的房产店铺的“案子”太多了，不管这些要求是否该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没有明确指示时，最好的态度是采取不置可否应付了事。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究竟怎么错的。

张所长回答道：“我一定会把你的材料转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会立即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回去等着吧。”既不表态，也不得罪上访者，“回去等着”四个字，成了落实政策年代里，向上访者最权威、最准确、最不担风险、也最不负责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刘老伯还能等多久？然而，除了无可奈何而外，对这样的回答他连反对的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刘信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赴大陆探亲。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挂了回国观光团副团长的头衔，加盖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刘信兄弟俩与刘启建五姊妹，在刘学理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讨论会。

刘老伯当场拍板，若在刘信交涉下房子归还后，便立即将旧宅进行改建，楼下做成铺面和库房，专供刘信主持的台商独资的中药材营业厅；而楼上修成几层，分给兄弟七个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刘中柱的积极性首先调动了起来，当时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县委管理财经的副书记，在家庭会议上，刘中柱表示他的儿女们一定会根据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产尽快归还。

出于政策和统战的规定，北碚区政府办公室的赵秘书，代表北碚区政府，在区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接待了刘信和他的刘大伯。

宾主坐定闲话不多，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有备而来的刘信，引证了一大堆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条款，盛赞了中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关于清退房产的政策。接着便谈到了台湾政府中公务员的“办事效率”。

在台湾执行公务时，不但严格依据规定得十分详尽的法律条款，而且还必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执法，否则所有的公民都有权根据公务员法，对执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办的行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处分。

在这种主题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讲这些话，赵秘书就是再笨也听得出来，这是刘信借台湾来责问和讽刺北碚区政府，在落实他伯父的房屋归还上，使尽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俩，使这个纠纷久拖不决。

当然台湾讲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兴的是中共一党规定的政策，法津是不变并可监督执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这位赵秘书心里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陆才会有这种本应法律解决的问题却由中共“政策”管着，甚至还用与归还无关的问题来搪塞，一拖五年不解决。

所以他听到这种指责，依然面不改色，从容的给刘信和刘大伯的答复依然是“回去耐心等”这五个字。

“接待”就这样无结果的收了场，还不如我们到陈区长的家里作私访来得积极。在归途上，刘信很感叹中共这种无法无天现状，认为中国不健全法制，会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在这种环境之下什么事也办不好。

可惜，开放的中国，还有一条主权不容外部干涉的闭门羹，这给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一

个不论怎么胡来，都可以对外界的批评置若罔闻的保护伞，至于大陆上的老百姓因长期暴政驯服而麻木了，这种条件只会助长官僚作风！他感叹地说：“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无所谓执法”。

刘老伯发往中央统战部各衙门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 1989 年 6 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突然收紧。

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刘学理等十几名请求落实房屋归还的联名上告，被公安机关明令“下不为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为归还自己的家而窜门，写请愿书，上了年纪的老头们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长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

1990 年，重庆市政府建设局，奉命对上海路的平民住宅进行了全面的拆修改建，强令那一带的居民搬离久住的家园。刘老伯听到他那被霸占去了四十年的家，将被政府拆除修成商品房和店铺出售。便请儿子和媳妇孙子牵着他，带上照像机，一同去了他那暮年魂牵梦萦的地方。

他的家已被一排高大的木栅隔断，正在工人们拆毁的烟尘中倒塌。城建局的工作人员带着红色纠察的袖套在外面游弋，不时的发出吆喝声，不准任何人靠近它们。同一大群围观的市民们站在远处，刘老伯的两眼发直，他明白这一拆，原先属于自己的证据就会全部被毁掉，今后再提起归还他的家，就更难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叫孩子们将他家的遗貌，尽量地拍摄下来。……

良久，孩子们摧他回去时，他还直痴痴的站在那里，半天他才吐出一句话：“我要告，我要告你们，非法的霸占我的家，我要告你们像强盗一样，拆毁我的家……”

站在一旁的大儿子劝阻道：“没有用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小老百姓往那告？法院还不是共产党的法院？难道会站在你这边来，反对同一个共产党的房管局和市城建局吗？”

他胀红了脸，那种受羞辱，但又不屈服的表情重新浮上了他的脸，无奈的被孩子们牵着他往回走。突然背后响起轰的一声，全家人回过头去，见他们的“家”终于倒塌在一团泥灰夹杂的气浪之中，仿佛在那里向他们扬手告别……。

唯有小儿媳还不服气，她拿了拍下的照片和 1944 年那张房地契，再度去天生房管所评理，见那经手办理清退的张所长理直气壮的责问：“房管局为什么在城建局拆毁刘家的私宅时，竟连通知都不通知一下房主？”

质问他知不知道“这幢房子还在打官司，这样单方面的拆毁会发生什么恶果么？市政府给我们的答复叫我们等，你们居然在房产归属都没有结论的前提下，私自拆除这所民宅，你们可知这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吗？”

可是那张所长丝毫不动声色，只朝着气势汹汹的小兰冷笑，虽然嘴上没吐出一个字，心里却在暗暗的嘲笑道：“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朝我装熊发狠没有用，有本事的去找没收你房子的共产党闹呀！”

小兰见对方并不回答，以为自己占了理，便借势向对方提出一个“补偿的办法”，说道：“你们既然奉命拆了房子，也知道这片房子中有刘家的一席之地，那么修好新房后，也该按我

家的房地面积如数补给我们，否则，我们会一直都要找你们的。”

这种请求一点都不苛刻，但是那房管所所长，心中暗暗的笑道：“只要共产党的天下还在，你们家要求清退房产只能是一场梦。谁教你们的房子当年被中共占去，那已成了不可改变的死案了”。为了不得罪这个拨辣的女人，他淡淡的冷笑道：“只要政策有这个规定，我们肯定照办。”

然而，天不绝人，小儿子刘才所在天燃气公司，效益特好，那几年有条件为职工建起了三幢生活大楼。无房可住的刘才分得了三室一厅，他的父亲也随着他搬离开了那个又潮又黑的天生桥危房，搬进了新分的房子中。

在新居房中，刘老伯开始慢慢的形成了有规律的作息，每天他把门外送来的鲜牛奶煮好，喝下以后，就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

然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都习惯的站在阳台上朝东边上海路的方向贮立良久，他还在牵挂着他的故居。

两年后，上海路的新建的大楼群已经竣工了，其中就有他旧居的那一块地方，他不愿去看他的旧居！因为这会触发他四十年前携儿带女在军管会的押解下，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天生桥那段伤心的往事。

这四十年来，他像乞丐一样的日子已深深留在他记忆里了……

1991 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小兰像往常那样，早上七点钟起来，打开门将送来的牛奶拿进了厨房，却没有听到老人屋里的响动声，也没有听到老人轻轻移向厨房的脚步声和打开天然气灶煮牛奶的声音。

直到上午八点多钟，她从街上买菜回来，厨房灶头上今天清晨端进来的奶，还放在那里，而刘老伯的房间还紧紧的关闭着，他放下菜篮子心中疑惑地去推老人的房门，门却关得很紧，里面没有人应。她还怀疑老人是不是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所以把头探出阳台，四下张望却不见人影。她重新去推老人住的房门，确实怎么也打不开，带着疑惑只好去忙碌中午饭了。

直到刘启才下班归来，小兰问他看到爹了吗？刘启才不解的问：“发生什么事了吗？”小兰指了指灶头上放着的瓶牛奶和老人的房门说：“一上午都没见爹，他那房门关得太紧好像上了门闩，无论怎么喊里面没有人应。”

刘启才闻言连忙去敲那房门，里面没有人应，推那房门重重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抵着，使足气力猛力一推，只听见扑通一声门闩断处，刘大伯倒在那门里面，两眼却直直的瞪着煞是吓人。刘启才连忙把自己的父亲抱住，已是满身冰凉，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了。

从他倒下的地方和姿势判断，老人跪在门里面，面朝门溘然长逝的……

大家伤心的办理老人后事时，纷纷议论，上海路被人抢占的住宅没有收回来，对老人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那份被强盗抢去家园的羞耻心，一直耿耿于怀，加速了他的亡故。君不见对这件事直到临终时，老人跪朝着苍天，还在倾诉他的愤怒和伤心，而上海路的家至今都没有

归还给他……

第七章 暴政扭曲下人性的畸变

出于立党为私的目的，中共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把持下，将独裁这根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绞绳，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他说批判毛“将会犯历史性大错”，现在“改革开放”施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贪官污吏，贫富悬殊，畸形的社会反而明目张胆的为毛泽东招魂。

毛的幽灵正在召唤与他相似的野心家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这片土地，演出第二次井岗山、第二次清匪反霸、第二次“反右”、第二次文革，因为毛的暴政恶果被邓包庇着，原封不动没受任何清算，这是多么危险！

毛泽东为独裁目的，是他对中国人人性的扭曲。

记得，刚进重大，正逢基层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我们系高年级一位女生在竞选系人民代表时，曾发表竞选演说，宣布与地主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并在一份声明上签字。

为个人前途公开断亲情的做法，曾成为许多同学竟相学习的榜样，特别在一场触及“灵魂”的反右以后，校园里爆发了一场向党交心的热潮……

“革命嘛”，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谁又甘愿站在挨打一边呢？

第一节 右派

毛泽东把大陆的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倘若你被划成了黑五类，便永远矮人一头，充当奴隶。若再要反抗，必入另册，押进监狱。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指这种整人的章法，死死卡着每个人的脖子，令人只好被他牵着鼻子跟他走。

对人的“划分”，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中异民族的统治者那里学来的，元朝就把人按民族划分为四等人，最低的叫南人，是毫无人身权的奴隶，毛共最恶毒的，是把被践踏者反诬为剥削者，不惜一切扭曲他们。

当年“右派”，本身是毛泽东为建立独裁统治而抓出来的牺牲品，在五类中排名第五，他们中多数并没有认识自己已被划成“南人”，其中的学生更是一张白纸。在毛泽东时代，如不对中共下有毒药的宣传进行抵制，不但受愚弄，而且会在长期被压迫环境中，变得自私、虚假。

所以并不因为右派是一个被残害的无辜群体，而把他们不加区分加以肯定，把他们误作社会的精英，其实他们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只不过在经历了一场人为的劫难后，重新认识了中共，也重新认识了自已。

随着右派维权斗争的开展，右派们的许多未曾公开的行为也日益暴露，当我读到宋永毅先生：“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后，知道这“右派”被社会误解，它决不是什么先知的精英，事实上他们中出现叛徒，干出不齿于人的勾当并不值得宋先生发指。

看待右派必需从两方面：一方面它遭受残害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群体；另方面又是一群鱼

龙混杂，对他们必需分别评价。

逆“反右”而抗的人，以行动证明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毛泽东倒行逆施中醒悟，在反抗中无畏的牺牲了，他们的名字应当刻在记念碑上，让后代永远记住他们，永远做学习的楷模。

我的父母原来都是教书匠，自从我的父亲被捕后，原先自持从未参加任何党派，有一大批“进步”同学撑腰的母亲，不得不折腰做人。思想汇报，成了必尊制度。每当在政治学习会上，主持人朗读报纸，读到“阶级敌人决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定要蠢蠢欲动”时，向她扫过一眼，都会使她低下头来，像芒刺在背，令她痛苦不堪。

那年月能向谁说清？在家中也无法向老母说清，更无法向两个年幼的孩子们表露，唯有在半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

为了解除这种压迫，也为了自己的老母亲和两孩子的生承，她不得不向“组织”上表示：划清与反革命丈夫的界线，她要求离婚。人性终于屈从中共的政治压力，使她的人格变形了。

同时也强烈影响着我幼弱的心灵，为了摆脱父亲的压力，我选择了那位竟选时对父亲“一刀两断”女同学相似的做法。可是，没有超过屈服极限的压力一旦减少，发生的弹性变形就要“恢复”。父亲入狱后他的音容笑貌，每时浮现在我的梦境中。

母亲的记忆里查觉不出父亲的狰狞可憎，“反革命”帽子戴在这么一个勤勤垦垦从事教育耕耘者的头上，怎么也不近情，同时中共不是向他有过“交待清楚”，许以“安排工作”的承诺吗？怎么会自食其言，突然又把他抓进了监狱？

后来，当大鸣大放出现时，压力好像在瞬间减轻了，畸变的人性立即恢复，可是她刚向“组织”上提出“政策”执行有无偏差时，便成了我家第一个“阳谋”的牺牲品；而刚刚长大的我，便成了我们家“阳谋”的第二个牺牲品。

扭曲人性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事，在斗争会上，猝不及防的我，稚嫩的神经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精神失去了常态。今天回想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发疯，投河或上吊？毛泽东罪不容赦!!

庆幸的是我还没有丢失人性，变成连我自己都无法辩认的伥鬼！也没有因此而自杀，消失。而是继续扭曲着自己，大声为自己的冤枉辩解。

投入监狱后，原先复学的幻想彻底破灭，饥寒交迫和奴隶般的生活，使我从幻觉中惊醒。当我看清了屈服我的魔鬼怎样使我的国家，使无辜的老百姓在饥饿和苦难中挣扎，我猛然醒来，不再屈服于压力，渐渐的我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变成了一粒反对独裁的响当当铜豌豆。

直起身来，同一切反抗暴政的人们一道，向这魔鬼拼死一搏。

毛泽东扭曲人性，除奉行政治挂帅，频繁进行“改造世界观”的洗脑运动，同时肆无忌惮的制造冤案。追朔历史，从延安整风已有大规模整人的经验，冤死的人何止王实昧一人？依靠史大林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靠整人登上独裁宝坐，成了令人人恐惧的共产皇帝。

在整整二十年的“劳改”岁月里，狱吏们执着皮鞭抽打我们。奴役我们似乎是统治者本性，尚可理解。最奇怪的是与我们遭遇相同的人中，也会出现一群“靠拢政府”的“狗”，有时他们比管教更厉害，仗着熟悉奴隶生活的内情，掌握着管教们也没法掌握的秘密，对我们有很大“杀伤力”。

在我的《血纪》中描写胡俚、周学祝、马文华、刘知远等人占了很大篇幅，虽然他们干的骯脏事，无法用人的正常行为解释，不能简单用“狗”的称谓泄恨。他们的行为归结原因，都是被暴政扭曲的结果，暴政彻底毁灭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变成了不齿人类的臭狗屎。

右派中即使共过患难的人，也照样有骗子，你诺不信，那就听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1992 年 9 月的一天，一位长住我厂的江淮汽车厂从事售后服务的李师傅，手里拿着一张名片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上周去九宫庙的八桥客车厂进行售后服务时，该厂总经理问到了你，我告诉他你的情况后，他便拿出他的名片，拜托我回北碚来交给你，还嘱我最近请你去他们厂一访”。

我细看那名片上写的是毛贯益总经理。

自从 1959 年南桐丛林一别至今已 33 年，也不知他在何方，现在突然出现在不远处与我干同一行道。带着好奇心，我在一个星期天去到他的工厂，几次交谈后，我才知道袁如从美国回国，答应投资五万美元，支持他在大渡口区办了一个旅行车改装厂。后来她与毛交往中，察觉此人能力低微，大陆也决非投资场所，最终合作中断。

第二次拜访他时，他就向我伸手借钱，我是一个靠工资糊口，两袖清风的穷光蛋，虽近年工厂有较大盈利，但我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我的孩子正读高中，正处在花钱之际，就只有母亲在落实政策时，中共扣了她二十年工资，退还给她两万元，这笔钱被我存下来，以作她养老之用。

他听到后，一再要求将这笔钱暂借给他，帮他渡过难关，答应有钱后立即归还，花言巧语说了一大堆好话，毫无心计的我推托不下，借钱时说好这笔钱是母亲的，归还我时折成美元。

从此，他当着一齐划右的同学称赞说：“在所有同学中只有孔令平才真心帮助他，拿出他仅有的积畜不吝相助。”我听后只感到肉麻。1996 年他还要我陪他去李伦家借钱，幸好被李伦识破拒绝。

后来我才知道受发财梦支配的他，经营两年来，不仅赔光了当年袁最初的投入，外加大渡口国债服务部贷款六十万及市乡镇企业局五十五万元，并到处向过去的难友们伸手，用支持他办企业的名义大施骗贷。

等我识破他向我伸出肮脏的行骗之手，已经晚了，就这样，我对他同难之情换回一场骗局，将我母亲带有血泪的两万元养老金骗去。

与此同时他大肆在受难者中举贷，受他之骗的例如难友之女彭萱十五万元，陈先菊九十老母二万元，难友蒋伯林（律师）帮他免费法律服务还倒借别人一万元，直到现在也没还。

1995 年我接到夏光然电话，说他生活无着，要我为他寻找一个打工场地，能夜宿吃饭就满足了。为老夏沦落市井深感不安，想到在老毛厂里安排一个看门值班的工作他不会拒绝。于是打电话求他出于同是天下沦落人给以相助。

想不到口头称我恩人的“毛总”在电活上冷冷回答我：“我这里不是社会慈善机关，安置任何人都要经大家同意，何况工厂如此困难，你怎不顾我的难处”。

看他产品落后，设备简陋，资金奇缺，管理混乱，知道他断无能力继续发展下去，从 1996 年开始，我竭力劝他解散工厂。同时我也好从这家没有希望的公司抽出我借给他的钱，为孩子升学作准备。

为了帮助他摆脱自已陷进去的泥坑，我动员本厂的销售人员帮忙卖掉他积压多年的老车，联系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接受他们的九龙牌新型车，把他当成一个同难来帮，殊不知他八方借钱，全国旅行到处行骗。

2003 年我因头部跌成脑出血，需动大手术，要他还我的钱做手术时，他竞矢口否认他私人借了我的钱，此时我才看到他出具的借条竟是以八桥公司名义开的，而八桥公司早在他被关押前一年就关门了。

2007 年在我的孩子追问下，他仍以八桥公司的名义信誓旦旦说他决不欠来生债，2008 年我获悉他的私宅十分富丽，大家支持我申告法院解决。

区区两万元就蒙昧了良知，玩尽心机，令我都羞于启齿。

没想到母亲晚年被毛贯益狠狠咬了一口！毛贯益欠我母亲的两万元就被他癞过去了！

“金钱至上”和“精神至上”本来都是反人性的两个极端，它产生于专制主义的总根源中，这肯定是立志行乞以“教育救穷人，教育强民族”为已任的武训，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

当年一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年青学生，为“阶级斗争”需要，沦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这些受害者中由于本质决定，泛起一些渣滓有什么奇怪？

所以对“右派”的成份，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描述，这对即将到来对“反右”彻底平反有重要的意义：

（1）整个“右派”纯属毛为建立中共专制独裁，对受害人的诬蔑，“反右”是一次对民主的无耻背叛，他所定下的“六条标准”对中华民族带来政治，经济的破坏必需彻底清算。这巳是大家的共识。

（2）照理说“右派”指共产党内的划分，矛头本应指向共产党内，但为了把打击面扩大，毛泽东把出身定为“右派”的重要标准，产生了“五类”这个“奴隶”阶层，从此中国老百姓人人禁言，媒体禁声。

（3）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型，一类“共产党原型”，包括了共产党共青团内，和民主党派的下层和文化教育界知识份子，他们有一定政治主张；与中共具有先天联系；

另一类便是按家庭出身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另类”，他们在面临“讨伐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几乎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意识，是一群纯粹无辜的无知者，他们人数最多，这些“初生牛犊”在认识毛泽东的诡计后产生的冤恨很朴素。

（4）紧接着反右，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完全是一场违反经济规律违背民意的好大喜功瞎折腾，对这场灾难，首先起来反对的，恰恰是“初生牛犊”们，他们的许多人对中共没有任何顾忌，反抗最坚决。他们中出现了为追求真实，向暴虐的中共进行坚决的反抗，这就是林昭，陈力，张锡锟等人能以身同专制制度搏击的原因，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它才值得歌颂，这些英烈应同谭嗣同，秋瑾一起记载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中。

（5）由于无知，他们中出现的败类并不足奇。至于右派中出现的“告密”、“出卖”、“损人利己”等等现象，只能归罪于毛泽东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人性疯狂的扭曲，使传统“礼义廉耻”失去了约束。

五七右派是暴政扭曲的知识群体，四百多万知识份子长期处在屈辱中，是中华民族的羞耻，它在中国大陆留下了：“谁反对独裁就遭厄运”。这才是使中国长期不能崛起的原因。

第二节 几个常见社会现象

毛泽东建立了“档案”制度，个人档案必须严查三代，上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要按阶级成份严格登记。成份在档案中跟随一个人一生，本人的工作安排，职务升降都要以此为依据。它像紧箍绳，捆得人不敢动弹。

（一）“假”像猖行

在中共统治下，因人为的划界，并以“阶级斗争”所毒化，人与人间的行为，再无传统的道德所约束。

许诺给全中国民众的“共产主义”天堂，原来比哄骗都不如，饥寒交迫的民众谁都不敢说真话，因为有武装的警察监视。我在古柏记载的辛志华那段“吃饱了”的故事，在毛时代可说遍地都是，还不准人说出来，否则李管教的绳捆索绑有几个受得住？

从此人们对中共赤裸裸的欺骗只好铭记胸中。改革年代这种造假公开泛滥，社会主义既是假的，说假话，做假事成为上上下下的通则，毛泽东以身作则，叫做：说不来假话便成不了大事，李宗吾找到了毛泽东这绝配的搭当，可以说说假话办假事便成了这时代“官”“民”的通则。

报纸上媒体上承然是假的，戏当然全假，工农业计划，国家的指标没可信的，文教卫生全是假的，有段时间媒体揭了假文凭，人们声色俱厉的谴责考试中雇枪手代劳作弊，抓了几个卖考卷的考官，其中大言不惭为之辩解的人会公开指证说：“你没看到连官都可以买到，何必对我手里几张考卷看得那么真？”

由假衍生出来的是“骗”，发达国家为保障正常生产活动，讲质量管理，但遇到了中国假货害市，监督部门一经发现，只好公开退货或焚烧，用的日用品还不危及人体，若是吃的可就

小心："千万不能实中国生产的食品"。

假酒假烟只害嗜好者，倘若是米、面、油和喂养婴儿的奶粉中，渗杂有害婴儿的化学物质，可与谋杀同罪的，权贵们当然会在无毒无公害的供应站买，唯有可怜的中国平民百姓只有靠提高自身的免毒能力了。

其实每个人只要勇于说真话，直揭事物的假象，撕下这欺世骗民的伪装，就会清算毛泽东的罪恶。

在同一地球上远隔大洋，出现令人羡慕的美国。在美州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联军司令华盛顿，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在美国铲除奴隶制后，立即还政于民，经过两百多年，美国人建起了繁荣昌盛的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而在中国，一群从山里出来的"绿林人士"在北方熊的支持下，利用日寇侵华，在沦陷区八年扩地为王，夺得全国政权。从此共产主义加独裁统治，使中国陷入另一绝境。

暴力是同欺骗同时横行的社会恶象，人们交往不懂礼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早被"阶级斗争"践踏无遗，连中学生讲不清"礼、义、廉、耻"，忠孝节义既已"批倒批臭"，代之以骂娘对话，拳头裁断是非，这便是毛泽东遗留在我们几代人身上，难以洗净的污渍。

毛泽东说政治是灵魂，是指导一切的核心，把人性放在绞架上受刑，把人人平等，把礼义廉耻统统列为封资修，他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份子，是一批由特殊材料铸成的。

经他这种神化，中共党员变成了没有人性，无需制约的统治者。

改革年代，邓小平只管能刺激生产的"猫"，中共对社会道德从来只有践踏，人们不顾一切的追逐金钱，有权的利用手中那点权，不顾一切，见钱眼开，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办事的手段，在这种冷酷的社会里"见义勇为"成了傻瓜信条，所以才会有路见行凶打劫的事再不会拔刀相助的义士。

中华民族遭到这番浩劫，真正变成了一盘散沙，敞若再有一次凶狠的武士道武装起来的强寇侵入，恐怕蒋中正复生，也难以"地无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人人皆有抗战守土的天职"相号召，组织起民众，再写一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诗篇了！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是毛早年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随着中共"武力"统一全国至今，已整整统治中国六十，好端端的家被破坏无遗。父不父，子不子，社会乱成一团，几十年毛氏独断专行，不顾老百姓死活，不但弄得百姓啼饥号寒，饿殍遍野，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园里，好像来了恶鬼，百花凋谢了。

中国人为搬动这块巨石，也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

随便打开最近的报纸，择其中几段摘抄于后，值得说的，这只是冰山一角：

河南驻马店平与县一个名叫黄勇的人，当兵出身，使用一种被称为神奇木马的"游戏"，从2001年经三年时间共残杀青年中学生十七人，直到2003年才被一个未杀死的青年检举告破；

另一杀人魔杨枝芽，报载说他从 2001 年在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共作案 26 起，杀 67 人，重伤 10 人，强奸 23 人，他采用灭门屠杀，杀死全家后又杀另一家，多少无辜百姓就白白死在他屠刀下，直到三年后才告破；

一个拾荒者陈能杀死的十人，全是与他一样的拾荒者，遇害者的尸体全被肢解。这些杀人者没有同谋，没有高智商的作案手段，没有武林的真功夫，就这样杀人如无人之境，国家法律和公安机关形同虚设，一百多条生命就轻轻松松死在这么三个低级刽子手手中，令人闻之耸然。

与以上案同时见报的还有四川南川县的符文生案；

四川万洲的杨天勇案；公安部通辑的李天佑案；河北石家庄爆炸案……

2004 年 5 月两个杀手马勇、段智勇在广东某职业招待所以招聘为名，将 12 名单身求职的女青年杀死；

2003 年 12 月 28 日，鞍山一出租车司机用绳子勒死一回家的女服务生；

河南省汝州市，杀人凶手严明一次杀人 9 名；

2004 年 2 月 23 日昆明大学马加爵杀死 4 名学生；

2004 年 11 月 11 日马汉庆，在武汉和鸟鲁木齐所干的四起抢劫案，造成 5 死 6 伤；2005 年沈阳王强，自 2000 年五年作案 34 起，残杀 45 人，强奸 10 人，被捕时公然说："若不是抓住我，还要继续干"；2005 年河南沈长银、沈长平先后协迫四个坐台女一起作案，先后杀死 11 名坐台女，肢解并食用尸体的器官……

以上血迹斑斑的案例，是近年来零星摘下报上登载的消息，残缺不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恶性作案罪犯全是四十岁以下，其中多数是部队转业兵，有相当避侦能力，不由令人想到"解放军"成了罪犯学校，社会被恐怖笼罩着。使人想到一党专制的共产党，已成为孳生暴力犯罪的土壤！！

除了以上报纸上的，平时社会上还经常传来各种恐怖杀人事件，就以我居住的小城，去年西师校园教工宿舍传出入室抢劫杀人不久；又传辽宁路某小区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下水道经常发现被害尸体；去外县的长途公交车上经常传出有人持刀抢劫的凶讯。

至于孩子们上学路上发生的杀伤、斗殴案；校园里的吸毒贩毒更是不计其数！！社会治安如此坏，完全归罪于执政党本身的腐败，前文巳列数中共党内的腐败，"无官不贪"的帽子戴在今日中共头上真是恰如其份。

这么腐败的执政党，怎么不使人民怨声载道，怎么敢实行民主选举？这样的政府，除了强化警察外是没有任何办法来维持的，当然，不顺应民心的中共不得不被推着前进，只不过执政者不得不提心吊胆！

冤狱是中共执政最大的恶政，本文通篇都在控诉冤狱，这不仅是我的个人不幸，而且是

全社会的灾难，其根产生于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要当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制造全国大冤狱，目的是排除异己，扫清称朕的障碍。他所亲手建起来的专政机器，上至最高司法机关，下到地方法院检察机关无一不行霸道，缺监督，只要有上级的保护伞，瞒天过海，毫无顾忌。立案办案明知不对，能骗的绝对要骗。如此旺法，怎不冤狱遍国中？

大陆经中共统治六十年，欺骗和假话扼杀了纯扑的民风，以诚信为本的市场经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共自己就是欺骗老百姓的祸首，假货充斥了市场，衣食住行所有国计民生里，以骗为纲，含毒的食品岂止烟酒，连毒米，毒肉，毒菜使老百姓缺了健康的保证，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频传致人于死的药物器械。

人走在大路上，会耽心脚下马路蹋陷，天上会突然降下致命的堕物，经济越发展，人的安全感却在降低，大家想过没有，这怪现象的原因何在？

不过，说也奇怪，被中共诬害为邪教的法轮功，竟以“真、善、忍”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性，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得淋尽至，最近“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赢得轰动效应，不但场场暴满，赚尽世界各国观众的感激之泪，真正为中华民族艺术争光舔彩。

一个备受中共践踏残害的团体，一些被中共弃如敝履的中华子民，为什么在自由的国度里，能发出这般异彩？这不是很值得大家深思吗？

（二）红卫兵遗毒

人性复苏一个重要表现是 1959 年卢山会议的召开，一品大吏彭德怀敢于犯颜皇上，显示毛皇上的独裁受到中共上层的反对，中共发生了裂变。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独裁受到中共上层孤立以后的疯狂报复，他想用年轻不懂事的孩子们为他火中取栗，重新坐回已经坐不稳的帝位，当年幼稚的孩子们被他那套政治挂帅的毒液麻醉，人性再次遭扭曲。

我在狱中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新闻记录片，很为那组成“红色海洋”的红卫兵感到难过，他们既不知道外部世界已进步到电子时代，人民享受自由民主，享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成果，享有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享有人权作为人最高权力的保障。

这些被中共欺骗，不能正视自己奴隶地位的人，不但不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反而捧着一张毛泽东开出的路条：“沿途吃饭住宿不要钱，坐车招手上”，“威风凛凛”的打着红旗到北京朝圣去了，若问他们，“你们上北京去，向伟大领袖要什么？”他们一定说：“去看望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

人性被毛泽东的暴政扭曲，在毛泽东主义邪教教唆下，红卫兵干下打砸抢抄抓，还要把枪对准生养自己的父母，对准与自己无怨无仇的“五类份子”，这些五类已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毛泽东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残渣余逆，是随时要爬起来骑在人民头上最危险的“敌人”。

红卫兵被毛氏邪教控制，干出对无辜者断手臂，割舌头，挖眼睛的暴行直到若干年后进

行忏悔，但那有什么用啊？根据最近的揭秘，毛皇上已在他临终前几年眼睛已瞎，中国就在一个瞎老头独裁把持下，怎不出现暗无天日的黑暗时段？这是一段中国人值得好好反思的历史!!

我的弟弟被造反派无端杀害，就因为他是“黑崽子”，凶手知不知道，他们残害的是一个无知的孩子，他们杀了他，曾使他的母亲，一个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一个被无端划为右派的人痛不欲生，并产生自杀这种悲剧后果吗？凶手做人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那里去了啊？

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毛泽东扔下经济崩溃，人民啼饥号寒的烂摊子，本当痛定思痛彻底抛弃独裁政治，开创一个民主新纪元。可惜，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功过三七开对这位乱世枭雄“盖棺论定”。他的腐尸装在水晶棺里，原封不动保存“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一党专制”的政体，掩盖毛对人性扭曲的滔天大罪。

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的全部“错误”，在于放弃了经济建设。如果埋头经济和物质的生产，对以往罪恶处以“无为之治”，而对专制独裁给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则以“向前看”一笔抹掉。

至于那个社会积累的民怨沸腾，冤狱遍中国，则以“路线”的左倾而不究既往。对它形成的伤害，不与认真清算，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惨重被坏闭口不言，对道德论丧，似乎只要用轻描淡写的“五讲四美”的空口号，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文革后期的余毒依然流毒于社会，并在新的条件下更加恶化!!

（三）冤狱继续泛滥

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大陆上正气无法抬头，毛泽东时代，冤狱猖狂泛滥的重要表现是文字狱，然而文字狱之根，是从独裁政体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邓小平保留独裁，也埋下冤狱的毒根!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混乱和冤狱可以推给“四人帮”，那么毛都死了几十年，深感文革大乱的邓小平怎么治乱？又治了些什么呢？

实在瞞不过了，才在媒体上曝了出来。下面又举几个报载，并以冤狱为例，略窥一般：

2005 年 4 月全国公开披露，湖北一普通农民佘祥林，十几年前因杀妻被公安机关定为杀人犯，公检法机关不顾当事人一再申冤，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处以死刑缓刑两年已成铁案。那知十余年后其妻活着回乡，冤案始告大白；

同一时期披露，湖南麻城当地屠夫滕兴善，起因 1987 年锦江河边发现六块女姓碎尸，被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留居当地的贵州女青年石小荣，并将滕于次年执行枪决。五年以后，石小荣返回贵州，才供认被枪杀的人根本就不认识她；

同期，另一个因强奸杀人被判死刑的聂树斌，被杀十年后，真的杀人犯王树全归案才使聂树斌‘平反’；

2002 年 7 月 12 日，唐山市南堡开发区住户郭其夫妇，在家中被杀成重伤，唐山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明久，在刑讯逼供下招供此案系他所为，直到 2004 年 11 月 26 日真凶现

身，李才得以出狱。

冤狱不断乃中共一大弊政，民间的上访，就是申冤。中共不得不惊呼：“人死而不能复生，判处死刑应慎重……”并收紧死刑的复审制度。对可用事实认定的刑事案，用“复审”加以制约，却不能排除整个中共党风坏死、制度不全的作用造成冤狱丛生。毛泽东发明“思想罪”，所谓“颠覆政权”“破坏稳定”则是陷人民于恐怖，扼杀民主意识，助长冤狱的罪魁。

现在揭示的历史证明，早在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已欠下了屡屡血债，直到今天建国六十年冤狱伴随一党专制长期存在！令人触目心惊的杀人案频频发生，冤案不断，足以说明暴政猖狂地扭曲人性，蒙昧社会良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良心黑透的打砸抢罪犯，依靠共产党内仍占据领导地位的后台，和自身变色龙那套拍马屁逢迎的能事，摇身一变成了大贪污，大倒爷，大投机商的“师爷”。这些人像癌细胞一样，潜藏在社会的肌体中。一旦条件和机会形成，必会恶性发作。

那时新的阴谋家，重新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夺取最高权力，再演一次文革之类的大浩劫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建设得无论多好，“国力”恢复到什么程度，都将毁于一场新的内乱!!经历过去的灾难的人们，不能不对此深怀忧虑!!

中国封建的帝王，可以伪称“君权神授”的愚民意识，规定出“王者沐浴五步者死”“王者入葬从陪三千”。在这种特权者吃人的社会里，中国黎民苍生对专制主义的容忍，远远超过了对异族入侵的容忍。

毛泽东死后，被诬陷的成百万右派，只将他们头上强扣的帽子一风吹，这种平反显示中共是一个没有章法的组织，谁在台上，谁说了算。

被毛泽东扭曲的邓小平，因人格的缺陷，使他根本不可能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抹掉中共历史上这可耻的一页。

到今天为止，中共既没有勇气承担该负的历史责任，更不可能为受害者彻底洗雪冤情。所以他们只好禁谈过去，把这一页可耻的过去遮掩过去。

跨入二十一世纪，中共日渐腐败，社会财富集中在窃取权力者之手，旧恨末平又添新冤，人民的上访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更趋尖锐，为了保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找了一个“维持隐定”的理由，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一遇假节日或让他们感到内愧的记念日，尤其对群众游行，必大批出动武警，生怕走上街头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

这样一伙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团伙，那有资格代表人民执政？

第三节 人性的复苏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在他任职期间，只是从教育者的良知出发，从国家在抗战胜利后需要安定，需要建设出发，做了一点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却被中共认定是反革命，以破坏学潮治罪，才四十多岁便庾死中共狱中。屈死他一人还没消中共之恨，将他全家几乎赶尽杀绝，家破人亡。

然而，被暴力扭曲的人性却在复苏，1985 年，一直不敢讲真话的母亲终于向法院递交了替父亲申冤的诉状，虽然她知道，父亲已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六年了，她的申诉是一份对知识份子迫害的抗议书。但是，重庆法院仍维持着当年军事法庭的判决，重复着加给他的“罪名”。

老百姓追求人性复苏，是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意主流。在这一期间，一位台湾的女作家琼瑶所写的《还珠格格》传入了大陆。

这个故事选择皇宫为背景，皇宫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大本营。《还珠格格》剧描写了一个千里寻父的女孩把“人性”带到这里，描述一群追求自由的男女，怎么在重重包围中战胜专制主义这头怪兽，歌颂了“自我牺牲”、个性解放、追求自由这个主题。

《还珠格格》热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民众对丧失多年人性回归的盼望，当“阶级斗争”把中国大陆弄得兄弟、父母可以反目成仇，把人性践踏成荒漠一片时，只有回归的人性才滋润中国人心，唤起人们对生活和爱的渴求和希望。

几年来《还珠格格》剧不但家喻户晓，老百姓交口赞誉，它赚尽了中国百姓的热泪，它反映了中国大陆人心所向。

人们会发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大陆十几亿人口，竟没有产生一个像琼瑶的作家？大陆的中国作家真的没有那种反映人民心声的热情吗？

只要看看中国的影坛，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电视莹屏，那上面老歌反复，电视剧不是古人登台就是战火涂炭，加上时髦口号，和俗不可耐的对话。

专制特权封住了作家的喉咙，中国有那么多近代的历史事件：从戊戌维新，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抗日血战；台湾民主政体的建成这些大幕的题材，够好多历史家、文学家撰写，够好多艺术家表演，够好多中国的观众从中受到教育启发。

中共血腥统治六十年，民主同独裁搏斗的可歌可泣故事，千千万万。如果说中国需要民主主义启蒙的素材，那么这些都是最丰富的素材。然而它们却被中国的独裁势力紧锁着，埋於地下，使它们无法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独裁势力是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

1957 年的受难者地狱二十三年，受尽折磨，大半都折磨死去，埋骨於流放荒野。今天逼得他们在风烛残年，守在中共的衙门口讨要二十三年工资。在中共眼里“右派”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掀不起任何风浪的人群。

但是 1957 年的“反右”是大陆历史上的大事，当年骄横跋扈的毛贼撕下他的伪装。三面红旗的惨败，毛贼东不仅完全丧失人心，在大陆失去统率一切的地位，邓小平能窜其位，重打锣鼓再开张，证明中共已无可挽回走下坡路了。

充军边荒的人中产生陈力，张锡锟，刘顺森这样的中华精英，在黑暗中举起了“火炬”，引领人们反抗暴力冒死无惧。这些人用生命证明在暴政下，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精神永存。他们的人性在反抗暴力中闪耀，他们的精神是右派的骄傲，传扬他们就是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血纪》告诉人们，反抗暴政才能保持自巳的人性。

今天大陆上在中共压迫下的民众，普遍呼出人性复苏的声音，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暴力的普遍扬弃，古人教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把老百姓当奴隶使唤的中共顽固派，总有受到民众惩处的那天！

“以事实为依据，以史为鉴”向来是中国史学家共同遵守的准则，中国古代为了秉笔直书，有多少史官宁可杀身。

然而中共统治下的史学工作者，有多少能继承这一传统？

这使我又想起了1972年，中共邀请访问大陆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基朗•安东尼奥尼，曾冒着所获资料被没收，甚至人身扣押的危险，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摄下反映大陆当年实况的照片，回国后整理成新闻纪录片《中国》，并在世界上传播，让世界知道被恐怖神秘隐藏的中国大陆真实情况。

一个信奉民主的外国人，尚能通过沿街的乞丐，武汉长江大桥头的贫民窟，表达对陷於灾难的大陆百姓以深切同情，对带来灾难的中国独裁者以声讨。

而大陆的史学家，依然对这种罪恶噤若寒蝉。这难道不是独裁专制扼杀人性的又一结果么？

第八章 风云满布的年代

第一节 山雨欲来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控制下，社会从阶级斗争“内战”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和平”转变，客观上国家和庶民得到一次修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塘塞世人，是不能掩饰少数人霸占社会财富的不义的。这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财富私有和残酷剥削，需要独裁的政治制度来保护，这是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衣钵的原因。靠特权占有的私人财富与自由资本靠竞争占有完全是两回事。

推行农业的“改革”不是什么新发明，只是农民和平要回了被毛泽东抢去的饭碗，从饥饿桎梏中挣脱出来。解散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不提了，对五类这种类似中世纪的奴隶制度一风吹掉，有它进步一面。却不让人们批判毛泽东反动的独裁主义核心，而是改头换面继承它，就是它的反动一面。

用裁军一百万，向世界证明中共需要和平的诚意。这得到了世界的好评，美国全球性权威刊物《时代》周刊，邓小平被誉为 86 年世界风云人物，出现在该杂志封面上。

不过，邓小平用“向前看”掩盖毛泽东滔天大罪，暴露了自私顽固的本性。

“不谈过去”，以回避中共背叛民主，抹掉历次运动对无辜老百姓所欠的血债；用反对自由主义泛滥，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不准人民对它进行批判；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掩盖统治者占有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达到保留共产党的特权，便是中共后极权时代的目的。

但是昨天刚发生的事能忘记吗？中共怎么尽干这种掩耳盗铃的事？邓先生“不谈过去”难道能抹去毛泽东的罪恶吗？老百姓不是失聪的傻瓜，他们之所以顺着中共说瞎话，实在是怕满街带枪的卫巫。

今天权力是特权聚敛的保证，它造就了中国新的官僚阶级。毛泽东所造成的物资匮乏和强权秩序，加上道德文化被摧残，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欺诈、贪污、腐败，“改良”充满了权力与金钱勾结造成的两极分化。构成了畸形改革开放社会的特征！

百姓只好怒目相对，却不能在新闻报刊上公开仗义执言。中共在言论上的封锁，暴露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本性！

然而一部份对世界不了解，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包括过去的权力拥有者，而今天失去权力的人；一些没有认真思索造成社会今天这么坏的原因，因而一齐来搅昏是非的人，让人们陷入到另一个误区。

1986 年的一天，我因公出差去重庆市中区，早上七点钟登上了一辆川运二十二队的中客汽车。刚刚跨进车厢，就看见司机台前档风玻璃的后面醒目位置上，挂着一张足有八寸的毛泽东头像，那头像在风中摇晃，依然十分得意。这段时间说来也怪，全国一股风，汽车的驾驶台

前都挂这玩艺儿。

据说交通事故太多，就因为他在阴间作祟，挂了它可以免车祸之灾。

这时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头发花白，教师模样的老人，指着那悬空的彩色挂照，向司机发问道："挂上这么大像片，不挡你的视线么？"那司机却笑了笑回答说："没关系！人人都说他老人家生前是恶神，要不然那时贪官都不敢猖狂？现在他死了，贪官污吏便成了灾，挂他的像就是请他老人家回来杀杀这些贪官。"

那老师显然对这位司机的回答不以为然，再问他："照你这么说，还是过去的好啰？"那司机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显然是经历过文革风暴的过来人，见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说：

"照我看都不好，毛老头当权吃不饱，说句话都提心吊胆，大家都过的苦日子，又不敢吭声，活像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来；现在呢，饭倒是有得吃了，可是贪官太多，苛捐杂税太多，失业也多，反正老百姓倒霉。"

这是一段老百姓内心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无可奈何的评价，可惜老百姓不明白中共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它的唯我独尊，党章就自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能受任何约束的"神"，毛泽东所有运动目的都是"造神"。

我在专汽厂任检验科长，手下有一名年已五十上下叫雷昌的检验工，常常有意无意的对当今中共的腐败忿愤不已，他常说"现在这些当官的要在过去早就抓起来关监或杀头了，所以还是毛泽东那一套镇得住人。"

当我问他过去那么多人遭整，那么多人饿死，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吃饭靠粮票这种日子，你认为也好么？回答是："我也不是说毛泽东好，我是说今天不搞阶级斗争了，贪官污吏实在太不象样了。"我又问他："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比较，你拥护那一种？"他盯着我的眼睛，神秘的默不作答。

那雷昌就住在我的隔壁，他的老婆所在企业倒闭，失业在家，平时最关心的就是粮、油、肥皂之类的供应和价格。菜油取消油票的那天，她便借了钱买了一大桶的菜油屯起，以为油票取消后油价会翻番上涨。

她排在油店门口长长的求购者队伍中，抢着去买菜油。

除了菜油，还有肥皂、牙膏、草纸等等极为普通的日用品，在这涨价的风潮中，老百姓把所有钱都换了日常用品和消耗品，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躲过那币值贬值之灾。

雷家的钱全变成了几百斤菜油，那菜油可不能放得太久，充其量一年以后，油就变质了，如果再拿到市场上去卖，别人一闻就走得远远的。

抢购风潮时期，大量的假货劣质货，尤其是食用油、米、面粉，霉变的东西经过"处理"后购进老百姓的家，直到过一段时间才发现。雷家就为了自己消受变质的菜油，夫妻两没少吵过架。

我在前面介绍了我所在的厂李友，马兵、肖副等人的故事。在 84 年工厂靠农用汽车短期走俏时期，一个普通的提车员都知道利用手中这点摊派权，向急欲购车的农民伸手，表明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了何种程度？上行下效，沾着权的边，能够不贪的反而成了怪物，往往还要遭人讥讽说成是大傻瓜一个。

无官不贪已不够概括这个执政党，应当说，“无权不贪”更切近描绘这个政府，邓小平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无权不贪这个潜规则，贪官的泛滥却要社会消化，但社会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现实告诉我们，腐败根源于专制之中。这一时期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又怎样呢？独裁的中共政权向来对政权内部的丑闻讳莫如深。

我没有专门收集中共各级政府腐败的资料，在这里仅仅根据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所载，摘下 1985-1987 年中共公诸的几个材料：

中共对海南区党委书记雷宇 1988 年给了党内警告，这种以“家法”处置的老传统实在是欺人欺世，中共岂能以私党的规矩替代国法？

事实证明，用轻描淡写的党纪处理，已无法抑制中共的腐败，腐败的恶性膨胀使中共整个的烂掉。于是被迫使出他们一贯认为最有效的老章法，借高压和运动杀人，将个别人当作整个统治的替罪羊。

1986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对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利用职权收受三万元贿赂被处无期徒刑。事实上同一时期中共官员贪污上百万的案子相当普遍，对余铁民案的严处，正好暴露中共党内腐败已相当严重。

1985 年福建查获的邓国桢案，诈骗、走私、套汇、倒卖、行贿金额达两亿，到 2004 年，中共官方公布当年 11 月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的大案共三万六千余件，人数四万二千余人，比 2003 年增加五倍。

1987 年 3 月 2 日江西省南昌人民检察院，对江西省长倪献策循私舞弊和包庇走私受贿等罪起诉，判处他两年徒刑，成为邓小平向“刑不下大夫”开刀的信号，这是为了“神化”这种不得人心的政治需要，造成共产党“伟大”、“清廉”的假像。

像这位倪省长级别的贪官不是一个，而是一批，就其漫延趋势，将是整个统治集团。估且不论倪献策是否因与“中央”政见相左，而身陷囹圄，这一时期贪污者的官职及贪污金额和手段，都是中外历史上贪官们望尘莫及的，其中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公安检察人员，办案人员所发生的“犯罪”。

震惊全国公安系统大案，云南普耳县刑警大队长乔跃忠从 1985 年开始贩毒，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直到十年后才披露出来。

中共官方报纸不得不惊呼“毒品，暴力凶杀与黑社会联合在一起，产生严重刑事案件，听任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贪风日盛显示独裁专制正走向崩溃。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已无法遮掩已入膏肓的腐败了，对外开放期间一开眼界和胸怀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剧烈的社会斗争中，产生了民族危亡感。毛泽东独裁在知识份子烙下切肤之痛，使他们亲身领受党天下的专横霸道，虽然他们对中共的暴虐心怀余悸。

但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首先从学校开始了！

1986 年 12 月正在进行人民代表选举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们，组织竞选论坛，活跃在整个校园里。

12 月 1 日校园里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首先向人民代表这个橡皮图章宣战，号召选民越出中共提名的框框，在选票上写上自己拥护的人。约有四千名学生呼喊，“打倒封建独裁”的口号上街游行，并冲击中共安徽省委。

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政治反对腐败。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陆续出现一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字报。

其实这些要求在三十年前的学生大鸣大放中已提到了，只是毛泽东当即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扼杀了学生刚刚提出的正当民主要求，从而导致了更惨烈的后果：大陆陷入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约五千万老百姓饿死。

我们的工厂距西南师范学院仅一路之隔，早晨锻炼身体时，我常去西师的风雨球场，经过该校的大礼堂，顺便看那时学生们贴出的大学报。在礼堂旁的玻璃橱窗张贴栏内，学生们设计的《民主园地》已一改过去的东西，代之以宣传民主自由的启蒙文章。

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共死硬份子，不能不对这种山雨欲来的形势担心。

邓小平连忙在北京发难，他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赵紫阳喊道：“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的领导态度（执行独裁）不坚决，这是近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思潮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话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与民主为敌的中共顽固代表者，在它的统治时期，没有一刻放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泛滥的杀手锏，这是中共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最核心精髓。

第二，共产党执政期间，党内斗争和分化势不可免，靠近民意的改良派与坚持独裁的顽固派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直到独裁统治的势力完全退出执政舞台。

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经过的政治运动，使我们亲眼看到并牢记，一批又一批的“异已份子”，在两条路线殊死博斗中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当邓小平祭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使我们马上看到毛泽东独裁魔影在大陆上的再现！

皇冠与法典二者不可兼得，中国的韦斯巴芗，曾高唱过法制替代人制的邓小平，到了危及其独裁统治的时候，坚决地选择了皇冠。

延续几年的“反对精神污染”，就是保持“四个坚持”的洗脑惯例，就是保卫独裁统治的新格局。

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亮出来后，等于在指示各级中共党政组织，要按过去对待右派的手段，来收拾争取民主和法制的学生。看来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民主势力，中共要采取极端行动了。

1986 年 12 月由他亲自点名，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敢于主持正义，为民请命，疾言中共贪官劣迹的几位领袖人物的中共党藉，1986 年 3 月开始在上海、南京出动军警，以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向初萌的学生运动挥起了屠刀，学潮暂时被中共暴力压了下去。

1987 年 1 月 2 日，胡耀邦在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咄咄逼迫下，请求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中共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在素有独裁经验的中共顽固派面前的软弱，反映出中国民主力量的软弱。

这使中国当时倾向民主主义知识份子感到愤怒，对于在中国统治三十年间，血债累累，已经民心殆尽的中共专制主义，仍能照常执行其统冶职能这个怪现象，引发了思想界的思索和争论。

从伤痕文学开始，到苦恋一书出版，受到了中共文痞们的清剿。探讨中国民心，继“丑陋的中国人”之后的代表作，莫过于 1988 年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电视片“河殇”。

说河殇是一部探索中国文化尴尬状态的政论评说片，那么在我看，由中共主要喉舌中央电视台来播送，至少反映了中共上层的分歧。

正因为这些意见是分歧的，使它一改老传统。“河殇”列举颠狂的大跃进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为世人所共感的反面材料，哀叹在中国失去了一次选择自由民主的机会。并证明，毛泽东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欺骗性。

其实“河殇”的伤感，何偿不是每个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人们共同的伤感？正因为这样，它有强烈的感染力，以致于当局在《人民的报》《光明日报》等中共把持的刊物上，对“河殇”的文化围剿也只能风声大雨点小。

中共上层领导，已经越来越明显分裂成顽固保守派和主张和平改革深入的民主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中，民主向专制主义发动的思想交锋，为思想启蒙开路。

第二节 六四，大陆民众在怒吼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含愤去世，一场学生运动终于爆发，学生们对胡耀邦因反对党内腐败主张民主，而被戴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撤去总书记职务感到愤怒。他们悼念胡耀邦，反映了日渐成熟的民主要求。

（一）在北京

4 月 22 日，四万名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将他们酝酿已久的要求公诸社会。这些要求仅仅是：（1）中共中央应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2）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过处份和批评的人平反。

这两个要求丝毫没有推翻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成份，同时这也是中共自己制定和颁布的宪法所容许的。

下面仅就我当时从媒体上摘下的报导，对这场运动作一个不完整的描述：

运动一开始，游行的学生举着“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的小旗。

当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旨意刊载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使我想到三十二年前，毛泽东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这是为什么”？

（顺便要说，三十二年前这道格杀令，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不仅把屠刀对准了无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恶毒的把奴隶社会镇压社会的那套方法，应用到当今社会。）

5 月 4 日新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中共分岐公诸于众，学生们受到鼓舞。

5 月 5 日以后，学生们再度走向大街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高自联”。

5 月 13 日，“高自联”在北京发动了一场历时七天，3000 人参加的绝食请愿，大批的市民拥向街头，声援学生。中共统治下的一部份警察，为学生的和平请愿和绝食运动所感动，开始倒向学生一边。

5 月 17 日惊慌失措的顽固派，通过李鹏操纵的国务院宣布：从 5 月 20 日开始，对北京地区部份实行戒严，并且在戒严令中宣布，所有反对政府的行为都属于非法。

这些消息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学生运动，只是中共内部的较为进步的民主派，向坚持独裁顽固派的斗争，是符合于中共自己提出来的“改革”纲领的，它反映出社会对财富集累的不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可悲的是几十年被中共暴政压扁了的中国百姓们，还没有人公开喊出打倒这个腐败的政府时，言论和思想，已被中共密布的特务封杀得万口缄默。现在，学生冲出了禁锁的校门，走上北京街头、一泄积郁在心头多年的愤怒。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的口号。工人在街头为学生组织募捐，有的把赖以为生的冰棍箱，糖水摊推到了学生中间，把冰棍，糖水葫芦递给学生们。

北京市民已不像前清那些盘着大辫，穿着长衫的“老北京”，望着谭嗣同喋血长安街头暗然神伤。更不像三十年前看洪水猛兽般的“红卫兵”，愁得只好皱眉头。

几十年中共暴力的淫威在人民心灵上的折皱，第一次被展平。

时间正好倒转两百年，1789 年 4 月 27 日，巴黎的市民高呼着“消灭财主”，“消灭剥削”

的口号，簇拥着向巴士底狱前进，他们高举自由宣言，掀起了欧州民主主义大革命。

然而这股人类争民主的热风整整刮了一百年，才远涉重洋登上了华夏这块封建冻土，让北京市民第一次向世界对话！！

清廷的皇室在国土分裂，民族危机深重时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努力，光绪皇帝尚有实施民主的戊戌变法行动。

然而世界上产生了新专制主义的中共，连光绪皇帝不如。

历史在俄国和在中国同时应证了，新的披着革命外衣的专制主义，比满清王室更凶恶的虎视着民主力量。

然而民主仍然战胜了新的专制主义，经济这个最活的社会原动力，是任何独裁势力不能征服的。

于是，距法兰西大革命爆发刚刚两百年，1989 年北京发生的事变再次雄辩证明，民主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顽强的同专制主义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十分虚弱，中国民主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无论从运动所受的阻力和运动的动力看，当年民主力量占着相对的优势。

而今天，“六四”是在中共统治相当强大，人民又因长期中共的暴力禁锁，自身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背景下，由人民自发的发动起来的。

一句名言“刽子手只有在真理的面前才会感到虚弱而颤抖。”被应证着。能对振憾人心的提问置若惘闻吗？能对反对腐败振臂高呼“拯救祖国”的孩子们开枪么？能在这种洪流面前心不惊，肉不跳，胆不怯么？

就连中共最顽固的候舌，人民日报的编辑队列，花白头发的老人披着“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条幅，今天也要公开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这些七十高龄的人记得他们的前任，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蒙昧良知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最后落得被彻职批斗自杀的结局而悲愤。

在学生和市民的声势浩大游行队伍支持下，中共改良派。与中共独裁势力，一天天发展到怒目相持的地步。

由毛泽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独裁统治，已在民心振撼下，迅速呈现解体。继胡耀邦而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比邓小平对“共产主义”的叛逆走得更远。

中共党内的这种分化，是他们对学生运动犹豫不决的原因！

良知和残酷的现实，民心的强烈振憾，使赵紫阳流泪。

共产党理论上的矛盾，猛烈冲击着统治集团。

于是他呼吁：关怀、理解、克制和对话！

5 月 17 日，北京各界民众一百万，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口号，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秩序井然。

即将回归的香港市民举行了持续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反对回归到中共的暴政统治之下，他们清楚此刻申援北京等于伸援自己的明天。全世界人民同声声讨北京的专制暴行，反对中共把专制主义带给香港的人民！

学生们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前，树起了自由女神像。表示民主和自由是中国年轻一代知识份子的信念，这同一味追求专制的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举动向世界宣布他们同北京政权决裂！

然而，中共专制的淫威依然僵而不死。

游行的队伍里，有人在焦虑呼喊："当心，中共的政权机器是一具杀人不眨眼的绞肉机"。几十年内它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尽管它已丧失人心，但只要它的统治还在，在面临其生存受到威胁时，它会以百倍疯狂杀人。

有人则说："不要使社会失控和动荡，不要给老百姓带来苦难，中国不能再乱，社会需要安定。"

有人在劝阻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要注意语言上的分寸，以免激怒枪杆子，给这次运动带来灾难的后果。

然而，四十年的屈辱，第一次伸直了腰，学生们摇动他们手心里的小旗，上面写着："反对腐败和专制"，大学生们为民族的前途担忧，义无反顾的用正义和理智为自己开路，用赤诚感动道路两旁年长的一辈。

布满苍桑的父老们一脸警惕，俨然以孩子们保护者姿态出现，他们准备这些孩子受到伤害时，用自已的身体保护他们。

（二）在我周围

北碚这坐位于重庆偏北的小城，因为集中了重庆市两所著名的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以及市一师等专科学校和几十所中学，所以被称为重庆市北部文化中心，这段时期比较集中反映了重庆市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使我沐浴了这场运动的洗礼：

4 月 22 日北京四万名师生上街游行开始时，北碚两大院校学生也结队走向了街头，开始时，他们只是散发来自北京的信息和资料，宣传北京市的学生向中共当局提出的各种要求，并将巨幅海报张贴在人民会堂前。

这个一向被北碚区中共区委用来宣传的中心，现在被学生们用作学运的讲台。人民会堂门前成了北碚老百姓了解时事的窗口，学生们除了在那里摘抄海外各大媒体对中共丑闻的报导，还散发学生和市民们反抗中共的传单。

每天下午七点钟，两院的学生都要上街进行游行，在街上同其它学校的同学会合成浩浩

荡荡的队伍，沿着环城路一面举着小旗向市民演讲，一面呼喊口号，直到深夜才从街头陆续散去。

每到这时我都要挤进市民的人群中，去聆听他们所呼出的每一口号，同他们交流共同的感受，我的思绪和呼吸被同学们调动着。

有时候我的母亲和我一起，当我问她，当年国民党时代是否见到过这种群情激愤的游行场面？她那昏花眼睛里陷入了半个世纪的回忆，点点头，叹息道："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气势磅礴的队伍。"

我看到两名学生举着，"镇压爱国运动就是犯罪"的横幅标语走在最前面。后面的数千名学生呼喊口号用坚定的步伐紧跟着，他们神情凝重。

我的母亲和朋友们一面向他们欢呼，一面怯生生的劝告我；"不要轻易卷到游行队伍中，因为你是再经不起燃烧了。"

上了年纪，被专制折磨伤痕太深的老人们，怀着激动和忧虑混合一起的复杂心情，他们被中共欺骗了一辈子，奴役了一辈子，他们的性格被中共几十年的高压压扁了，难以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了。

我看见一个头发苍苍的老太太，跟在孩子的身后，擅抖的呼唤着："你还小，不知道中共的霸道，小心呀我的孙子回来呀！"好像灾难是游行人们激怒了统治者造成的。

但是，我回答他们："我的学生时代是够听话、够软弱的，而我们的遭遇却是最惨的，我们在皮鞭下忍受饥饿和酷刑，我的同难壮烈牺牲，难道这不是因为我们忍让屈辱而造成的么？"

沉默了几十年的学生，在中共专制下失去理想和自由的中国学生们，怎能放弃争取重新生活的斗争？

那时每天早晨上班和中午回家的时候，我都要特意绕道去人民会堂前，阅读学生们新贴出来的大字报，接受学生们的宣传教育。

虽然，大街的两侧高楼中，潜伏着一些训练有素的怪物，它一直在窥视着游行的队午，在那黑洞洞窗口后面，把摄像机对准经过的游行学生，将他们此时此地的作为，全部摄入镜头。准备这场"动乱"平息后，进行清算和镇压的依据。

5 月 23 日，北京城雷雨交加，寒风袭击了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示威的绝食者，数百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孩子，终于在饥饿和风暴中昏倒了，同伴们迅速地救助受难者，这里响起了悲壮乐曲，远远超过了鲁迅笔下的刘和珍时代。

消息传来，北碚的学生立即在傍晚举起了醒目的标语，走上了街头，万众一心表达声援！那标语上写着："妈妈我饿，但我们吃不下！"

迎着这悲愤的标语，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是稚嫩的孩子们向祖国母亲的哭诉，这更是游行队列中发出令人惊醒的呐喊，目睹这一幕，侩子手被震憾了，退却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狱中的三次绝食，尤其是 1967 年文革野蛮的批斗中，我一个在狱中长期反抗迫害的无辜者，以绝食这种文明方式抗议文革残害，竟成当局摧残的借口！当时所有在我身边的同难们，目睹我受到的摧残，除了下泪谁都不敢对我表示同情和声援，支持我的仅仅是我对野兽暴行的愤怒。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我数着一秒一秒的熬。为了戏谑我，他们居然剥夺我喝雨水的权利，这样的斗争等于让野兽笑看我活活饿死。

他们幸灾乐祸说，绝食而死又怎么样？狱方充其量向人宣布，又少了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当年被打死、饿死、和冻死的人，引不起他们内心的颤抖，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

今天的绝食者们，在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反反复复动荡，认识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欺骗？什么叫专制？什么叫复辟？今天已不是二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孤军奋战的时侯。

“是的，我饿”，六十年代的孩子们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张铁生虚无枷锁封闭的年代。奶娘干瘪的乳头上，已挤不出五千年文化的乳汁，而是无知和野蛮的毒液。孩子们哭喊着挣扎着，而无情的“奶娘”却向他吼道：

“忘记你的祖先那些封、资、修的东西，你现在要学会吞食用斗争和战火炼成的铁丸。你应当从此脱胎换骨，学会用阶级斗争征服你的父老兄弟，长大后，除了事奉那至高无上的教主，呼喊毛泽东万岁，什么都要抛掉。因为从你降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只能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练成专制主义的打手，永远成为张铁生类型的狂人”。

哦，妈妈！这样的精神粮食我怎能下咽？

（三）今天和昨天

天旋地转，老魔头的幽灵归天，继承他的鬼魅像烟云散去，先天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们在新的课堂里，手捧着发给他们的新教材，从书包里装进自然数学课本。

读吧，读啊，文凭热在召唤着我们：中学、中专、大专……可惜就在那凭文凭才能晋升的热潮中，有几个亮出的“文凭”是真才实学的？在这么大群的小学生，中学生中有几个能进入大学门坎？大学成了无数求读者可望不可登的境界，毕业变成了失业。

在城市里，穷人的孩子因为无钱上学，只有排在待业的行列中等候有钱人的雇佣，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做苦力。而在贫困山区里的孩子，蹲在危房的教室里，一边听老师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边听那教室的房梁被风吹得摇摇欲堕的响声，担心它何时会跨下来。

于是那些在政府权力保护下顺利上攀的佼佼者，便向那些学校大门外的大批学生们发出嘲笑：你们这些愚蠢的苦读学生们再有天大的苦功夫，能值上我那有权有势的父母么？

在拥有权力的大款们的乐园里，读书求知变成一种天大的傻事。一个善于周旋于政府和富人间的富仔，要比一个老实巴交的求学者“精明”百倍。

这贫富悬殊的现实在教会你懂得，今天这里绝没有求知者的安乐园。

这样的书我怎能读下去？妈呀，我饿，我渴望知识，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课本里再多的科学知识都毫无用处，靠它们赚不到钱，解决不了我的生存。在这个社会里，我除了被迫学会对权势顺从和依附，奉献自己。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这里不需要知识，有的是欺骗，有的是对良知一刀一刀的切割。

妈妈，好心的妈别劝我麻醉自己的神经，蒙蔽自己的眼睛，坐在摆着人肉筵席的席前，看着富人啃同胞的骨头，跟着也醮着弱者的血和泪去吃那馒头。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在这筵席上吃掉。

所以妈妈呀！我好饿好饿，但我怎能安心坐下来“读书”，去同吃人者同桌享那有毒的“盛宴”。

1989 年 4 月的春天，对我来说是我四十年来经历的最温暖的春天。

四十年来压在我身上的这沉重的专制巨石下，我像一颗羸弱的小草，将根深深扎进了巨石下的泥土中，在盘石的缝隙里顽强地向上生长，我看到我的同类一颗一颗地因为缺乏养分和水，缺乏阳光而爬在泥层某一个断层里枯死掉。

四十年来此时此刻，我第一次强烈地体验到我们民族觉醒的生命力，我紧紧地贴着这支游行队伍，体验它溢出的热流溶贯我的全身。

四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在大街上贪婪呼吸充满了民主气味的新鲜空气。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我看见西师的一队学生捧着募捐箱向我走来时，我忙从口袋里取出了一百元钱投向那箱口，一个女孩走到我的面前恭敬举起一个签名本，要我在那上面留下我的姓名。

我笑道：“不用问我的名姓。”说着举笔在那本子上写下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六四运动的心意”，我那时已经被一种虔诚支配着，这些天来我感谢孩子们给我上了令我感动的一课。

不料我的旁边却传出一个声音，低声说道：“他们拿这些募来的钱上馆子大吃大喝。”我立刻警觉起来，大声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中伤，这种冒生命危险的街头募捐，谁愿意？

坚持中共专制独裁的核心人物和他们的狗腿子，正用疯狂的仇眼来看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他们认为专制倒台了，自已的特权消失，他们会失去抢来的一切，此时正全神贯注的寻找破坏学潮的机会，这些人像曹英一样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四）屠杀

一个多月来，北京部队在市民们的阻碍下，一直屯兵城外“无法进城”，而城内的部队拒绝镇压的密令，他们不仅因为受到爱国学生们的感染，而且已经感到在北京市民面前“众怒难犯”了。

外电报导，三十八军军长被青年的军官们软禁，拒绝镇压爱国同胞，他们不愿当历史的

罪人，并成为这座城市里人民的死敌，所以喊道：“我们是打仗的，而不是打人来的”。

北京的父老们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挺身而出，横卧街头，用身体作路障，六，七十岁的老人流着眼泪劝说这些还不明真像的部队。

在中共的辞典里，民主是特权的最大敌人，“动乱”不是指社会秩序的破坏，人民生命涂炭，而是指独裁专制受到了全体人民的反对，处在不稳之中。

中共建国以来，凡是出现威胁他们统治的任何迹象，甚至于出现不与独裁者相一致的言论，都会被斥为“反党”和“反革命”，并以“动乱”诛讨之，镇压之。十年前，魏京生就是在西单墙，刷了几张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就抓去蹲了整整七年大牢。

其实，自称人民大救星的这个政党，恰恰是陷社会于动乱和灾难的元凶祸首，在高压政策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过程，过去许多人没有认清或不敢直言的事实，今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共识。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比当时北洋军阀奸诈得多，残暴得多的新的暴力集团，他们所付出的艰苦，曲折，和努力是当年的刘和珍们无可比拟的。

就在同一时刻，天安门城楼下有人用鸡蛋裹着颜料向天安门城楼上那张中共政权的奠基人，混世魔王毛泽东的挂像掷去，这个行动证明，队伍中有人把中国灾难的元凶点了出来。

凡是年过四十以上的人都知道，只有彻底的将毛批臭，让它现出专制魔王的真身，中国社会问题才算真正点到了要害。如果这个举动能得到游行基本队伍的响应，针锋相对的提出打倒毛泽东，打倒独裁的口号，树起民主革命的旗帜，那么它将奏响向现代专制讨伐的战鼓。

恰恰相反，在队伍中却有人对此喝倒采，一帮夹在游行中“支持”学生运动反对社会“混乱”的人，对邓小平存在着另一种见解；旧的毛泽东党羽专横跋扈的天堂失去了，他们想用学生的力量来恢复毛氏独裁的旧秩序，所以怎么也不能容忍，把运动的矛头直指他们的祖师爷。

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喻东岳被抓，并处以无期徒刑。

这足以说明邓小平集团的改革开放，一点都没有放弃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说明学生运动的头头们认识和步调极不协调，运动并没有升华到它所应有的历史高度。没弄清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是暴政的根本原因，还是产生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陷在姓资姓社这种可笑的争论中。

毛泽东的嫡系们，也反对腐败和官倒，但他们是非颠倒的把腐败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为了让过去毛泽东专制主义再度复辟，拼命的叫嚣只有老魔头才能将贪污腐败收拾干净这种谬论，严重干扰了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使它最终向独裁势力屈膝。

专制的寡头，终于端出毛泽东的衣钵，大声惊呼这一是场反革命的动乱。他们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撤去了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动乱。”疯狂喊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历史在这个决定性时刻，毛泽东复活了！

六月二日，屯兵北京城下的勤王部队待命入城。BBC 台立即播报了这支部队的底细：这是一支以少数民族为基本骨干，没有文化素养，不了解学生运动内情和底细的虎狼之师。

六月三日残暴的中共当局，终于为专制集团的利益孤注一掷，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命令这支虎狼之师用坦克开路，以摧毁一个月来北京市民筑起的工事和路障。受命镇压的部队从驾驶仓里，用机枪扫射那些横卧街头进行阻拦的老百姓。中共的专制寡头血洗了北京城！

赤手空拳的学生纷纷倒在血泊中，在这种情况下的市民和学生用胳膊和棍棒，血战坦克。一时间到处血肉横飞，哭喊声声振环宇，一场在中共导演下空前惨烈的血腥镇压，在全世人民的面前公演了！

连日来因为绝食而虚弱不堪的学生们，高自联的指挥者已来不及从自由村撤退，有的饮弹坦克履带和机枪子弹之下，有的带着伤、流着血，还在继续指挥着从人民记念碑前撤下的大学生们继续后撤。

六月盛暑的北京，血流成河，横尸街头。一切“克制”、“爱护”和伪善的许诺，一切“解放人类”最美妙的颂词，被他们吃人杀人的行动，当着全世界拆穿无遗！全世界的卫星上，自带的录像设备，记录下这一段中共统治老巢中发生的血淋淋历史。

它们拍下了北京的市民和学生倒在坦克的履带下的经过；它们拍下了履带碾过自由村里的帐棚留下一条条长长的血带！

当时，北京的大学生们已经没有后退的路，他们除了用肉体阻挡着坦克的前进，一批一批倒下去的人们，又在愤怒和泪水在鲜血中奋起。他们拣起了铁棍向疯狂的军警们还击，把那些最猖狂的屠夫，悬吊在立交桥上，用火烧死这些畜牲，以表达他们对屠夫的仇恨！

北京城在火海和呐喊中挣扎！这番同胞相残的实景，比当年北京城里任何被镇压的学生运动，更惨烈!!

就连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带着哭泣的悲声，把这件中华民族最羞耻的消息向世界播报！他们感到良知在受折磨，从而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愿。那里发生了枪战，大学生们冲向电台，四百名学生倒在机枪的扫射之下。士兵冲进了播音室，那里传来了最后的枪击声，电视莹屏消声敛光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腥罪恶的日子，这个罪恶是继土改时的清匪反霸屠杀地主富农和“反革命份子”；继文化大革命由中共挑起的红卫兵武斗，文革期间从严从重的杀一小批，又一次对人民大开杀戒，特别是，它发生在当权中共的眼皮底下，动用了阵地攻坚的坦克，令人格外震惊。

历史记载中共屠杀无辜者之多，罗织罪名之奇，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杀人后把血迹和真像一盖，便由他们编造谎言任意篡改历史，向来是毛泽东的老章法！事后这些中国土地上血淋淋的故事，被紧闭的国门封锁了。

然而，科学进步了，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六四血案，通过卫星转播，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目击了这场大屠杀的真像。

它非常鲜明的记载着中共专制王权的狰狞面目，也记载了邓小平的改良是多么伪善虚假！由此足以证明，只要中共仍在坚持共产党一党独裁，中国的社会不可能得以根本改变。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成千的爱国青年，在一天内饮弹天安门城下。与北京几乎同步，上海、天津、广州、兰州、成都相继演出了军警对人民的血腥暴行。传闻当时摄制的底片揍起来足有万里长城长。

我虽没有亲眼看到坦克碾过自由村的画面，但我们围听 BBC 台的报导，面对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权的公开践踏毛骨悚然。

根据卫星录相显示，北京发生的是，一个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动用坦克机枪，大规模屠杀和平抗议的人民，若问那里的人民在干什么？回答是，“他们在反对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猖狂的官倒。”

于是各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支持本国政府向这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政府发出制裁通谍。海外华侨目睹卫视转播的中共暴行，愤怒的组织起来冲击中国的驻外使馆。

香港、澳门、台湾的民众组织了大规模的烛光游行，声援还在坦克履带下呻吟的学生。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从悍卫人的尊严出发，同声向北京这个反人类的政府发出声讨和谴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这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那天晚上，收音机响着外台的新闻报导。我含着眼泪走出了那漆黑的小屋。

这一夜，我目睹着这座小城发生的一切——灰朦朦的夜空下，街上的人流如潮，沿着大街，头戴白花摇着白色布带的学生们，向区政府结集，呐喊声滚动在夜空，今天他们已经一反往日安静有序的状态，队伍里嚎啕的哭喊声此起彼伏，眼眶里沁着带血的泪呐喊着：

“侩子手放下屠刀！”“绞死镇压学生的侩子手！”“以血还血！”

他们向小城的百姓喊道：“凭什么要杀我们的兄弟姊妹？”“今天北京学生的噩运将降临在我们头上！我们正等待着明天，我们将被驱出校门，被押着去边塞充军，因为中共早已证明凡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动乱”的，那么已同这个政府结下了不共戴天大仇！我们今天除了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别无他路！”

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悲壮的心声，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不垂泪？！

我站在十字街头，看着一队学生，为首的头缠白巾，身穿白服，腰系黑带，拿着高音喇叭，向围观的市民读着 BBC 发出的最新报导，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他的眼睛已经红肿，一遍又一遍地向围观如潮水般的百姓喊着，仿佛此刻他带领着人们置身在天安门前，历史正在苦难中迈过这血醒的一天！！

游行者向北碚的父老乡亲们喊道！“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坚持专制的中共当权者，已

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纵容贪官污吏的绝境，现在又举起屠刀，你们可要看清！国人啊！同胞啊！赶快醒来，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求生呀”！

触景生情，我的脑海却检索着三十年前的亲身经历：

三十一年前也像在这十字街头，灯光拖着我跌跌撞撞的身影，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周围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和标语，校园里到处是批斗会的喧嚣，年仅二十岁的我，一个在“红色校园”里长大，既无涉世经验，更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孩子”，却被同班同学围在教室里揪斗。

先前的羞辱感以及对生活追求的热情，已完全被恐怖和疲劳取代。

“为什么会这样？”潜意识发出了反抗信号，却被四天四夜连续批斗消融得干干净净。我蒙胧的认识到我之所以被戴上右派帽子，哪里是因为家庭出身？我单纯到向这个“党”去解释，我与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关系，却没有动脑筋问：“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两位从事教育的人，他们对社会犯了什么罪？”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和消化这些莫明其妙的罪名时，那些年龄与我相同的同班同学，却向我投射轻蔑的眼光，狂喊着：“休想蒙混过关”。

在极度需要睡眠的条件下，曹英这个恶棍要我交待永远无法说清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机！”要我戴上国民党遗少，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承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充当帮凶，梦想从中共手中夺取“失去的天堂”！

那时我只有哭，我怕！我怕将我从此赶出大学求学的课堂；我怕，我不敢想象我会从此落入囚犯的行列；我只好乞求！我乞求共产党的饶恕，在我的脑海里除了设想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外，我是无法解释并面对这一切的！

然而，当我匍伏着向它乞求时，我听到魔鬼奸诈的狞笑声，“要你充当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哪，懂吗？！”

我被送到荒野的深山和农村去参加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的劳役，去体会大炼钢铁的苦役，去领受饥饿奴役。

这时候我的一位“老师”才告诉我什么叫玩弄政治权术，并且帮助我悟出了“阶级斗争”的真正“用意！”我才开始明白，已经被毛泽东推入社会最底层的我，原是专制狼爪下的一只小小绵羊。这里面既没有“误会”更不需要“解释”，我渐渐看清楚这毛泽东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一心为当皇帝挑逗百姓自相残害以取乐的魔鬼。

残酷的炼狱使我们的幻想终于破灭，经过二十多年漫长的时间，我懂得我们青年时代，被暴政剥夺了求知的追求，尤其使我明白，我必须面对掉进地狱的现实，抛掉麻醉自己的幻觉，最后认识到在独裁统治下，读书是没有前途的。

学者教授纵有满腹经纶，不照样同我们一样，戴上右派的帽子忍受着饥寒交迫，在皮鞭

下，歪歪倒倒的在水田里种试验田；去深山野谷中挖铁矿，肩挑背磨从山里运出来；在山林里充当扛坑木的苦力；在烟尘弥漫的土高炉中呼吸有毒的空气炼成一堆一堆废铁！!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猛然清醒，我们“接受改造”的过程是一场冤狱里的炼狱，我们的同难成批成批饿死累死在荒心野岭中。当魔鬼将我们这些清白无暇的学生推到炼狱之中，就成了我们觉悟的开端，所以苦难拯救了我的灵魂！

今天，中共的后继者仍在回避它的过去！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要我们忘掉过去的历史？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三十年来所见中共所作所为，剥开画皮，让所有的国民都明白，他们怎样制造饥饿，还要逼着快饿死的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又怎样制造武斗，让无知到学生们相互拼杀；他们又怎样让孩子们为了“统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去死，到死时自己腹中空空，衣不蔽体。

今天，专制主义旧病复发了！中共的独裁再次向和平人民举起屠刀！!

（五）历史会记住这天

忽然，我的眼睛一亮，就在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在那幢最高的建筑屋上，垂挂下一幅巨大的大字报，醒目的写道：“我们是几个老共产党员，当初我们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幼稚盲目的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幻想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

“想不到这个党执政几十年使我们饱赏了一切苦难，几十年来我们盲目的执行着它的政策，结果一个国家反而被弄得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我们同老百姓一样，尝到它对国家建设的破坏和对文化毁灭”。

“到了今天贪污成风，民怨沸腾。当我们看到它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时，我们的心颤抖了，今天我们深深为作这样政党的一员而感到羞耻，所以我们今天向全体市民公开宣布，我们集体的退出这个政党。”

落款的地方写明，北碚邮政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并签上了他们的名字。

看来中共是该回到被告位子上，接受全民审判的时候了！!

记得罗曼罗兰的名言：“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热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这张大字报表达了当年几个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迷信共产党的宣传而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事实无情的纠正他们初衷的盲从，而毅然的宣告退出这个政党。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一天我同李伦去重庆单独出差的机会，讨论到六四运动，他的表情十分沮丧，叹息道：“在我的一生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恐怕要算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中共党员对中共领导倒行逆施的这种认识，代表这个党的基本群众的共同认识。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靠着邪教，欺骗而夺得江山的共产党现正从强大走向灭亡。

老天保佑我，能亲眼看到它衰亡的过程，灭亡的结局看来是天天临近了。

如果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皮天明等等，当年为反对毛泽东专制而殉难的烈士们在天有灵，他们会对此而感到欣慰含笑九泉的。

如果他们有兴趣，不妨在这个夜晚，附在普通的三口之家的窗下听他们与电视机是怎么对话的——

电视机："学生们阻拦交通。"妻子立即反问道，"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怎么会到马路上去阻拦交通，这真是太离谱了。"

电视机："学生们的行动妨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丈夫接口道："静坐在广场上的学生们招惹谁了，他们又不是到工厂矿山去闹事，这个罪名简直'莫须有'。"

电视机继续说道，"暴徒们围攻民警，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女主人回答："这就更奇怪了，赤手空拳的学生怎么会对拿枪杆子的士兵动手，这不是找死吗？"

男主人接口道，"军队向和平的示威者开火，杀人太多了，激起了民愤，才有市民的自卫行动，不然学生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对解放军动手脚的呀。"

这时候，小女儿从里屋里探出头来，报告说："爸、妈 BBC 台最新消息，联合国正通过要制裁中国的决议。我在学校里学不下去了，大家都说书没法读，这个昏庸腐败的政府那天垮了，我才回校读书去。

电视机里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导"平定"天安门事件的真像：

"一部份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极少数人制造谣言，煽动一些人设置路障，阻碍军车，抢夺军用物资，焚毁军车，杀害解放军战士，他们还打算第二天，（即六月四日）造成更大的暴乱事态，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熄反革命叛乱……在戒严部队进入市区的过程中，一伙暴徒大搞打砸抢，抢走枪支弹药、杀害、绑架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部队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六月五日清晨戒严部队全部到位，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这就是中共的喉舌报导的天安门流血的全过程，然而中共当局忘掉了高悬在中天的天地良知，忘掉了地球卫星已拍下了整个事态的全部过程，并将这些真实的录像公布于全世界，如实地报导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按中共的说法，手无寸铁的，已被绝食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学生，忽然变成全付武装，青面僚牙的魔鬼，也不知从那里暴发出的巨大魔力，焚军车、抢枪戒、杀士兵。按照这个说法驾着坦克的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不得不"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可惜，今天的科学技术对信息的传播能力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可以任由毛泽东封锁和窜改历史了。

"有消息说，北京发生的焚烧军车的事是军人自己干的。"如果确实如此，中共今天也堕落像当年日本野兽进占沪沟桥的故伎从演。还有消息说，北京"六四"事件之前，执行戒严任

务的军队接到上峰密令，“对一切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是可以从执行屠杀任务的军人那肆无忌惮的疯狂证实的。

如果没有上面的密令，加上封官许愿的刺激，面对同胞，军队也难以发挥出如此疯狂的兽性。

人类有时简直比动物凶残百倍，因为他们有掩盖罪恶的能力，而动物却没有。人在伤失理智时，比猛兽更可怕，他们可以无缘无故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中国人的悲哀，大致出自一群丧失人性的“革命家”!

我想但丁的神曲里，地狱的第十圈外应当增加第十一圈，那一圈就是为假革命者和独裁者准备的，他们死后所遭到的报应，应比所有的恶鬼酷吏更严。

我前面讲的故事，还没有收场。当电视机播完了这一段以后，那男主人再也按捺不住，走到电视机前忿忿地关上电钮，对着那黑黑的屏幕大声喊道：“谁还不知道你们这一套贼喊捉贼的假新闻，今天明摆着你们出动的是坦克，机枪来镇压无辜的学生，怎么颠过来反说学生在杀你们的人，中国的百姓真被你们一直在当傻瓜耍啊。”

陈力，张锡锟，刘顺森们，你们听见了么？你们今天在天堂，为天安门城下浩大的学生和市民奋起的队伍而兴奋吗？

算起来陈力牺牲了十九年了，张锡锟也牺牲了十四年了，当年只有你们喊出的声音，今天已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了!！今天老百姓那一个不唾骂这个凶残贪婪的统治集团？善良老实的中国民众已从中共的欺骗中清醒过来。

我相信，我会亲眼目睹，这个实行专制失去民心的党走向灭亡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一定备酒到盐源的山岗上与你们一道共庆。

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再以与会国联合的形式，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国际金融组织一再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暴行实行制裁。在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声讨声中，中共当局竟然无耻的公布如下“六四”伤亡记录；

“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共 6000 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暴乱中有 3000 多名非军事人员受伤，200 多名死亡，其中包括 36 名大学生，……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同时，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兰州等一些大城市接连发生暴徒冲击执法机关，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一贯黑白颠到，中共真面目百姓看清了吗？

为了歪曲六四真像，他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在报纸上、电台、电视，连篇累牍的刊载暴徒袭击民警的暴行。由中共举行“为六四事件牺牲的英烈记功表彰大会”这些蒙骗国人的手段，令人肉麻。

可是这一次不可比 1976 年的“四五”事件，这次无论在参与者的广大，市民觉悟的程度都大大的与毛泽东当年不同了。

这一次，普通百姓家里家家都在抨击当局的无耻颠倒！北京死亡的学生岂止 36 名。

仅北师大教授丁子霖女士，在当局极端封锁下，徒步走访登记六月三日晚，有姓有名的死难学生就是 155 名，另有 65 名伤残者。这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仅北京一地死于这次中共暴行的不会低于数千人！

“六四”已永远铭刻在中共的历史上！

第三节 “六四”以后的那几天……

七月初，我借出差重庆的机会，顺便走访了重庆大学同划右派的老同学，想听听他们对“六四”的见解，顺便也想了解重庆大学的学生在“六四”运动中的具体行动。

早上十点钟，当我顺着汉渝路重大的后校门支路，走到松林坡杨家铭家。刚刚跨进她家的门槛，她连忙关上门，屋里门窗关闭，显露出十分紧张的样子，开口的第一句话竟向我问道：“你怎么这么大胆，这几天是什么时候，还敢东走西窜的？”我被弄得十分的惊奇，反问道：“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何来畏惧？”

她凝视了我好几分钟，像是在试探我似的，用一种十分神秘而略带恐怖的眼神望着我说：

“你在工厂还不知道吗，这几天学校水紧得很，全校正在大清查，凡是六四期间上了街参与游行的人，都要由学校保卫处进行登记，算有了新的‘历史污点’。有的头头已被隔离反省，听说正在甑别，有的要逮捕送监，有的遣返回原藉下乡落户，轻的也要开除学藉。”

好了，一股正义热情涌动下反腐败反官倒的人，现在却要面临锒铛入狱的下场。学藉没有了，前途渺茫，当年我们曾有过这种亲身经历的痛苦，而今却要这些孩子们从蹈我们的足迹！

我望着面前这个三十年前同在南桐丛林沟与我共过患难，现今已白发苍苍的老女人，一时不知该向她说什么才好。

中共这一套用运动整人，制服学生运动的手段我已领教过了，从这位老同学的身上，使我深深感到历史伤痕多么深的刻在我们的身上。难道中国的命运就这么长期操持在几个寡头手中吗？如果大家都被红色恐怖吓成这样，中国的民众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相对的默默坐了两分钟，看得出她越来越不安，嗫嚅着告诉我：“昨天党支部书记还专门上我家来过问，最近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时值七月盛暑，四周的门窗却紧紧关闭，闷热的空气使我大汗顺着脸颊淌下来，而心却像冰冻一般，一阵阵战栗。知道刚刚她的话已是逐客令，便立刻站起身来，告辞出门。

当我离开松林坡，朝着汉渝路往回走时，心里说不出的懊恼。看来我完全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跑到学校来，中共对付学校和学生的那一套，依然没有变。今后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校园永远不会是学生们安心攻读的乐园。

举目望公路两旁的水泥电杆上，还残留着六四那几天学生贴出的标语残迹，那激愤的人流仿佛还在眼前，耳中还响起那激昂悲壮的口号声和歌声……

专制！令人泪咒的中国独裁，中华民族还要驭着你走多久？中华民族还要为这具僵尸付

出多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民主前途究竟还有多远？今天我算是又上了一堂沉重的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如当年在狱中一样的沉重。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想去拜访一下隔着一条龙凤河，住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的程贻举，因为他当时已是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想来可以在他那里采访到在六四中，民主党派发出的声音，了解他本人的态度。

当我走进他的家门，也如杨家铭的家那样，大热天窗门紧闭，连窗帘都拉下了。他见到我时同样面露恐惧的表情，决不比杨家铭更好，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后，他告诉我说：

“北京这次全国八大民主党派，都参与了声援学生运动的游行。现在已将这次运动定性为动乱，八大民主党派看来又一次在重大政治关头‘站错’了队。一如当年反右派运动一样，现在只有听凭（中共）党中央‘发落’了，我们都等候着中央的处份！”

说罢脸现阴沉，很失落的样子。看到他的面容，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平时一贯在中共鞍前马后，待候主人的奴婢像！

既然他不敢直言说“六四”孰是孰非，却在小心冀冀地等着开庭审案，未免替他感到汗颜。也罢，就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天牌人物，还不是一付唯唯诺诺的相，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子，以“帮闲者”的身份出现，坐在主席台上，貌似木雕，平时是不敢轻言表态的。

看见他的颓丧样子，我也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只是重复的说，“大家上街和平请愿，实在是对腐败已经看不下去了，还不是为了中国好，希望政府知过而改。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六四期间问心无愧，你也不用担心。”

一场恐怖过去了，留在人们心坎上的又是一道深深的鞭痕，无论是自己烧自己的军车嫁祸于无辜的学生和市民，还是军人驾着坦克屠杀学生，罪魁祸首都是明白无疑的，罪魁的目的也是明白无疑的。只有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北京市民，都清楚记住这些军人的番号。

北京市民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长期将遗恨放在四川人身上。

两年后，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着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问路，这位北京老乡向他直翻白眼，眼里透出极其鄙视的神色，白了他的一眼，什么也没回答他便走开了，口里带着鄙夷的口气骂道，“四川猪！”

看到这种情景，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烦，我只好决定，在北京期间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当地人说话，凡事都由我操东北口音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人民之间竟因六四如此隔阂！

其实惨死在“六四”中的，无论是学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军人过后都应当清楚，他们都是专制和腐败的中共政权的牺牲品。

在这些牺牲者中唯有投入静坐绝食，要求中共当权惩治官倒，惩办贪官，放弃特权，放弃独裁实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学生们，才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们没有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中国专制政权的大军。

在六四中以屠杀学生而暂时占上风的中共独裁势力，效发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开始了又一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赵紫阳被软禁；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大学院校，开始了搜捕参加六四爱国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人物，大搞人人过关，层层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双手沾满鲜血的侩子手，陈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长的宝坐，由他负责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发起人狠下毒手。

当时由北京军管会发出通辑令，通辑著名的民主运动领袖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以及学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方励之，李淑娴，追捕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吾尔开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当时落入军警特务魔爪的人，数以万计，一场真正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各大专院校。对六四参与的学生登记，并受到处份，情节严重的与以逮捕劳教。

三十年来无论是我们这些不更事的少年，还是老教授们糊里糊途的被划为胡风份子还是右派，糊里湖途的“认错”，后来又将这些糊里糊途的人，押到边荒农村糊里糊途的流放，像牲口一样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残酷的折磨使他们大多数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峡谷中……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招唤民心，同全付武装的军警搏斗，在两个月中把中共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余。

尤其是在强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权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内部也在这种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弹指一挥三十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每一个人都看到中国，决不是中国独裁势力能所欲为了。

1989 年 6 月 23 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题目便是“公审”赵紫阳。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仅仅几个月又把他打翻在地，这既说明共产党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乱了阵脚。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气势汹汹以叛徒罪名将赵紫阳“永远开除出党”。更没像斯大林对付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处以绞杀。

邓小平看到史大林，毛泽东众叛亲离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尸扬灰的厄运。他的内心又是何等虚弱。

李鹏在这个报告中不是公开承认，当时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么？实际上独裁的中共，不得不在专制和民主的较量中，修改一党独裁的脸谱。

如果赵紫阳能与邓小平相抗衡，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已经到了没有主义的时候。所以六四事件虽然又牺牲了许多为民主而战斗的年青人，中共也不得不答应，严惩贪官污吏，放宽党禁。让各民主党派稍稍有一点生存的余地，敢于在某些问题上行使监督的权力。

当然，邓小平自己便是毛泽东的叛逆，他知道赵紫阳所做的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赵所主张的，不过是政治体制向民主方向再迈进一步。对于学生运动残酷镇压的决定，也让邓小平足足犹疑了两个月，毕竟国内日渐猖厥的腐败是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在六四学潮的推动下，6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坚决”把惩治腐败作为头等大事，特别要注意抓好的决定。

1989 年下半年以反贪污，反贿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便掀开了帷幕，8 月 1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份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公告》规定，贪污份子必须在 10 月 31 日前向政府自首坦白，8 月 19 日监察部发布《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共中枢机关不敢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

他们明白，逐渐腐败的政府正坐在失去民心的火山口上，再不整治将会使整个统治大厦崩塌，但是它却不想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开刀这个肿瘤，而是采取了一个内部的行政命令办法来处理它。

这就正好对烂疮自已下刀，烂疮是永远割不掉的。事实证明中共这些年来贪污之风越来越严重，贪污腐败与专制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仗着不受约束权力的掌权者，对另一批同样掌着权力得到贿赂的人实行整肃贪污，能治得了谁？

事实上，对六四的镇压，客观上放纵了中共各级贪污的胆子。从九三年开始全国纪监机关自己公布的数字，贪污贿赂案件以每年 9%的速度递升，而受到党纪政纪处份的官员，又以 12%的速度递增。从中共检查机关 1990 年至 1998 年共受理各种腐败案件达 110 万件，立案五十余万件，涉案人员达六十余万。

后来为了专制，中共的独裁头子江泽民喊道，“对腐败现象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而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要失去党的执政地位。”他的担忧是必然的，但他的惊呼丝毫没有阻止中共腐败的大势。

到了跨进二十一世纪，据中共自己所公布的资料，新华社 2004 年公布，1 月-11 月查处的贪污贿赂以及各种渎职侵权的案件 3650 件，涉案人数 42225 人，比 2003 年增加了五倍。足以说明中共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整个的国家行政管理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甚至于还出现了所谓 59 岁效应，官吏在退休以前都要大捞一把的事，成为国家机关腐败的公开现象。

89 年 8 月 15 日国家审计局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了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等全国最大的几家公司的审计，对这些公司的内幕没有公开。但据传它们与中共天字第一号挂勾，并由太子党的实权派所操纵，并以这些中共的实权派为后盾则是明白无疑的。

这些公司，从事私自买卖外汇，倒卖国家紧俏商品和走私偷税漏税数额之大要以亿来计算，由于劣迹昭著加上统治集团的内讧，五家公司被责令追交了五千万税金了事，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当权者私人资本的基地，以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以分赃并保持着相对平

衡而相安无事。

5 月 19 日监察部发布限定全国的贪污份子，规定在 10 月 31 日的最后期限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本身说明中共的大小官吏无法无天，全无顾忌，若不是六四的推动，监察部也不会向全国大大小小贪污份子发通谍了。

现今限期已到，检查机关随后公布战果，在这一阶段受理投案的人达到三万多人，中共自己十分明白这个人数只是事情败露，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的小鱼小虾，真正的鲛龙还藏在深水处，永远都不会触动他们。

当时社会流行着，“大鬼坐衙门，小鬼跪阶下，三堂审贪官，只给外人看”这样做做样子势必还要使中共更进一步腐化。到了 2004 杀了一个广西大员成克杰又怎样？不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共的灭亡是迟早的事。

设计师因在国人中名声太臭，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坛，转到幕后当起太上皇来，11 月 9 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算是对六四运动的引咎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交出了军权。从此个人专制主义的标志，行政长官终身任职的权力，在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取消了。

但是中共一党专制仍顽固地保持下来，在国内外强大与论的震慑下，统治集团重新改组，一方面清理赵紫阳这样的政治异已，另一方面为缓和国内矛盾，在肃贪、扶贫、禁毒、平抑物价、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等方面作出一些收揽人心的动作。

1992 年，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次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从 1993 年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体制改革，毛泽东最后一点僵死的国有模式终被冲破。

然而顽固的中共独裁势力并不会因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血腥镇压六四后，将六四领袖人物驱出海外，想以此消除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流亡在外的民运精英们，纷纷组织民主政党继承发扬六四革命播下的种子，继续同中共的独裁势力作斗争。

1990 年 1 月，北京解除戒严令，并对王丹等人进行审理，尽管这是违背民意和宪法的，但比之当年毛泽东对政治犯的赶尽杀绝，殊及无辜，无中生有等等暴行就缓和多了。

同年 6 月 28 日一直在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的政治犯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得到准许让他们赴美“治疗”，使他们得以流亡海外。

令人感到惊心的是，邓小平用坦克对付“六四”却给毛泽东这个恶棍找到了腐尸还阳的借口！一股专制腐败势力在民间蠢动，使毛泽东恶名得以抬头，他们把政府贪污腐败以及学生闹事，归结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不但这魔头当年所犯的累累罪行没清算，还公开鼓吹：“只有毛泽东才会禁绝贪污腐败”。

中共后极权时期为了防止老百姓打倒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强行灌输的文化遗毒，根本不

清算，只将露骨的文化独裁收敛了起来。毛泽东“愚”录，虽没有再泛滥，“欺”世歌“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却没有列为禁歌。

尤其对几千万的饥民被饿死，人民一贫如洗，人民之间尤如野兽般的相互残杀，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大量被虐杀，流放，人性已普遍为兽性所替代，父子不相识，兄弟相残等极其严重的罪恶，并没有得到清算。

我原以为，毛泽东专制遭到否定后，在信仰危机中，应当出现一个对独裁的批判时期。但事与愿违，连我写这个自传时，仍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并出现了“只有毛泽东才会像恶神一样镇住贪污、腐败和烟毒娼妓”等等奇谈怪论。由于历史相去越来越远，这种奇谈怪论竟成为民间舆论就更令人深省了。

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现过一点“伤痕文学”却像小媳妇那样嘤嘤哭泣了一阵，便很快消声了，1981 年由白桦编写的“苦恋”，哪怕是哀诉独裁对知识分子任意残害的作品，都遭到党阀们的口诛笔伐。

舞台上，千方百计掩盖独裁统治下残酷斗争和冷酷的人际关系，表现那个年代竟是：“纯真可爱，开诚布公的人际关系。”我举一个最露骨的电视片“真诚年代”，那是彻底歪曲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令人呕心。

今天，大陆上再有才华的作家提到毛泽东如骨梗喉，要末继续写“愚民作品”，要末写些无聊的武侠艳闻，或家庭纠纷的低俗东西。

邓小平一方面顽固坚持把毛泽东这个死人像，照样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以对付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大肆宣扬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这个时代中共政策的两手，然而毛泽东的罪恶不得以清算，中国的独载不与扬弃，中国社会就始终难以进步，这一点也是六四失败的原因。

人心背离促使中共进一步的分裂，“六四”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赵紫阳，于 2005 年 1 月 14 日在北京含恨去世。六四以来拒绝中共要他承认六四期间所犯“路线错误”；拒绝承认学生在六四事件中使社会动荡的指控。

他以行动证明，中共在八九年的历史关头已不是一个意志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执政党。并说明中共除了用军队和暴力来实现它的集权，别无他法！证明当前中共内部的腐败正在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动荡。

而我们这些经历了这几十年中共暴虐的人们，看到中共这种内幕，要想社会长治久安，必须重新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和经济发展协调的民主社会。

最近在世界主流思潮推动下，许多知名的学者，不怕中共打压，在 08 宪章的签名运动中，签上自已的名字，这证明“民主”已逐渐成为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坚持独裁的中共顽固派睁开眼，不要等着被历史唾弃那一天。

今天“六四”那一尊在自由村里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像一轮朝阳，照醒了亿万昏睡的人们，接着又在悲壮的歌声中缓缓离去。

“六四”之火虽被中共享血腥手段扑灭，但是放开眼看看世界，“六四”期间戈尔巴桥夫造访北京，学生运动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共产党所建立的奴隶制，被撕下他们狞狰面具后，再也难于维持下去。

这一年东德人民在古城莱比锡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11 月 9 日德共在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放宽东德公民出入境制度，随之东德人民涌上柏林街头，自发用锤子榔头电锯敲打柏林墙，建于 1961 年经历二十八年之久，1989 年 11 月 10 日，人民终于推倒了这堵 155 公里长，对东德人民禁锢与奴役的墙。墙倒之日东德人民欢声雷动，喜迎德意志祖国统一。

叶利钦在苏共中央成立民主纲领派，1990 年 9 月民主纲领派退出共产党，并在竞选中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早在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互争“领导权”的共产党头目，早己分道扬镳，社会主义阵营早已解体。

1991 年 8 月 19 日叶利钦当选为首届俄罗斯总统。苏联成为历史名辞。

中共可以在大陆这块落后的封闭故土上，用暴力继续维持他们的独裁，然而，违背民心和民主潮流的反动能坚持走多远？大陆筑起的坝，终有倒塌的一天。

以后每年到六月四日这一天，不独北京的独裁执政者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我们更透过当局的层层封锁，听到来自全世各个角落中国人呕歌六四的记念歌声，这歌声带给我们多少怀念和思考!。

第四节 从游行想到的

1999 年 5 月 9 日凌晨零点，我被一阵口号声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侧耳倾听。楼下的街道上人声嘈杂，由手提麦克风传出来的口号声，和人群中有节凑的呐喊，汇合在一起，虽然有些混杂，但仔细分辩仍听得清楚。

其中频率最高的呼喊声分明是：“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而那有节凑的呐喊是：“中国，雄起，……中国，雄起”。口号和呐喊在刚刚入睡的小城上空汇集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刺激。

我马上想到昨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已播出：“五月七日晚，北约的三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使大使馆被炸毁，三名驻南记者遇难，一名失踪，二十名使馆人员受伤”的消息。

同时还播出了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严正声明，称：这一事件是北约蓄意对中国的挑衅……云云。在表达了愤怒和遣责后，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

与此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处理这一事件的紧急会议。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相继发表声明，拥护政府维护主权尊严的严正立场。

此刻我已明白，北碚的两大院校师生，现正走出校门组成游行队伍，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声”。

我连忙从床上翻身坐起，很快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只见一支大约几百人的队伍，经我们住的大楼前，向着天生桥方向前进。

从队列后面向前看到最前面的几排学生，用身体并排地裹着一幅红色的横幅上，猜得出是抗议北约“暴行”，捍卫民族尊严的内容。

领头学生两旁及队列周围，稀稀拉拉跟着几个手执麦克风的年轻人。口号声正是从这里发出，再由游行人们合着节拍响应而成。

学生队伍后面是一群住在附近的市民，他们进进出出人数不定，最后面跟着十余两出租的士，大约是些专跑夜路的青年司机，跟着“看热闹”，也顺便给中途从游行队列中退出，准备回家的人，提供一点交通方便的。

出租车队列的后面，便是十几名骑着摩托的武装警察“断后”，人声喧哗，似乎并没有人专门去注意他们的“特殊使命”。

就这样，这个由学生、市民、出租车和警车组成的队伍，在狭长的街道上排了足有一百多米缓缓前进。在昏暗的街灯下，我认出他们是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商店的营业员、三轮车夫、小饭馆里的服务人员，以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下岗工人们。

我插进他队伍中，想听听生活在社会下层老百姓的议论。

自从 1989 年“六四”学运以后，我已整整十年没看到学生们组织的规模壮观的游行队伍了。但眼前看到的这支队伍，无论在规模和情绪上都无法与当年的“六四”相比。

平时他们聚在一起，多半都花在麻将桌上那点事。而今天，他们都以好奇的口气，议论着从早到晚电视里重复播送的消息，发着莫明其妙的提问。“克斯握是什么国家，在那里啊？”一位小饭馆的中年女人，向她身旁的一位戴眼镜的附近小学的教师发问道。“北约在那里？为什么要轰炸中国，他们隔我们很近吗？”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向他身旁的老者发问道：“我们在这里干吼干闹的，美国政府会理睬么？”

尽管政府所掌握的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天天都在宣传报导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但从周围人们令人可笑的问题中知道，除了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民族冲突和近期以来发生的战争。

这种漠不关心，正是中共长期愚民所造成的。“六四”后在中共统治下，长辈们对年轻学生的担心一直没有消退。上年纪的人还用十年前看“六四”老眼光，认为学生上街，又不知为反那一个贪官？

至于那些新近下岗的失业者，他们被面临的艰难生活弄得心力憔悴，所以一看到游行队伍马上就敏感到，又不知是那里生活不下去的失业工人，被迫起来向政府请愿；或者就是那条街的拆迁户，因为所住的陋室被房屋建筑公司老板强行拆迁流落街头时，被迫起来向政府呐喊

请愿。

居民们在游行队伍中相聚，各聊各的家常，干涉那些刚从床上被闹醒，跑上街看热闹的自家孩子，且听他们的对话：

“你们厂的下岗生活费定了么？”；

“孙二娘的下岗饭馆昨天才开张，张嫂的擦皮鞋摊证是昨天向段上去要的，擦皮鞋还不错，一天也挣个十来块钱，相当于吃低保了。”

“这该死的江泽民把我们工人是整惨了，今天可不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工人们都下岗讨饭。”

“娃儿要读书，学费书费往那里去凑钱，生活这么贵，低保费就只有百十元怎么活呀？我们家的小三，小学毕业就只有上街卖报纸了。”；

“去当棒棒吧，可是哪有那么多请棒棒的？”；

“李二嫂就只好去干那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黄昏时候去守电杆”；

“拾破烂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家的小子也干那事，每天满街头拣烂纸，一天下来只能拣两块钱的东西。”；

“昨天西师的员工宿舍又发生了杀人的事件，警察出动时杀人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社会乱了套，晚上我就关照我们那口子，不要上街，谨防半夜三更撞上鬼”；

“封三哥两个娃儿都沾上了毒瘾，你们的小二要小心，他常常与封三哥鬼混，那天说不准撞鬼，怎么死在下水道里还不知道”；

“前天开到壁山去的公共汽车，又发生公开的抢案，那趟车上，余二哥被杀成了重伤！”

“你们知不知道天生街段自杀的那两口子，失业几年了，女的又有病拖着两个娃儿，段上的人去处理，那住的地方比狗窝不如，屋里没有一样象样的家俱，两张破床上没有一床好铺盖……可怜丢下两个娃儿，唉！”

我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却另有高论，一个说：

“这世道太不公平了，穷的穷富的富”。说着他指了指身后不远跟着的摩托民警唱道：“一等公民称公仆；二等公民叫大款；三等公民算倒爷；四等公民大盖帽；五等公民公务员；我们呀是新生的无产阶级”。

另一个接着说：“谁叫我老汉是穷工人。原先说地主、资本家骑在他的头上，现在啊，五等公民骑在我的头上了。

忽然队伍中不知是谁爆出一声：“江泽民雄起”的喊声，队伍中原先有节凑的“中国雄起”喊声中，在人们的笑浪声中掀起轩然大波。于是“中国雄起”的口号声变成了“江泽民雄起的”

呐喊。

一种对当局的无奈，点燃了这支队伍的后半段，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乘坐摩托的刑警们，若无其事的任队列中怎么喊，只要不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江泽民的口号，谁又愿意去干预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绪，挣札在贫困线上的人？

此时我随着游行队列走到了隔西师大门不远的上坡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参入游行的人纷纷走出队列，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渐渐散去，但“江泽民雄起”的笑浪声，却并不因此而减退。

好在这年头不像毛贼东年代，动不动用暴力对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讳，说些不为当局喜欢的话，那也仅限於“私下”，这种有限的牢骚話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处末代。

国民政府时期，组织民众游行示威以反对政府，是中共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后，依然用民众游行作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此刻，处在游行队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事不断在我脑子里涌现：

记得 1950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夜空中突然飞起了几道耀眼的照明弹，接着位於嘉陵江边解放台，传来了隆隆的礼炮声，不一会安在自来水塔附近的高音广播喇叭，传出一个宣佈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夜地处北碚附近几所学校和机关就在老新华书店，举着火把在川东行署官员指挥下举行了这座小城的第一次环城游行。以后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举行游行庆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会在这里举行杀人的“公判大会”，每次要求学校组织参加，使每个参会的学生领会那种“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惨景，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脑”方式，那时红色恐怖笼罩着大陆。

1953 年以后，这种游行庆典成了“制度”，开会那天九点钟，所有该到会的单位到齐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唱国歌，按贯例三部曲一完，到会者原地坐下。

各“领导”在主席台前相继讲话，内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话。但对于盘腿而坐的我们，则是最难熬的两小时，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练了几天禅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每次游行前又要举行贯常阅兵典礼。

1955 年，我考入重庆大学后，这种每年两次由官方组织的游行，在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举行。前去参加的单位是指定的大专院校和机关，人数也有规定。

参加单位准备了象征性的大彩车，那是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制成的钢铁厂、发电站或农庄的模型，车上盛装的彩男彩女，在游行时，挥动花束向周围的围观者致意。

游行队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庆军事院校组成的队列，他们在列队通过解放碑的检阅台时，礼炮齐鸣，坦克和军车隆隆开过，步兵方阵整齐的迈着阅兵式规定的步伐，接受重庆部队长官检阅。

队列中举着："随时准备粉碎来犯者"的巨幅横幅，其势杀气实足。现在回忆，这样的游行示威完全为了镇慑老百性，同时也是做给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贼东全民洗脑的重要手段！这种庆典，也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

可怜的大陆百姓在这种长期折腾中怎么不穷！除了吓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么作用啊？

1958 年 5 月末，我已成了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师的监督下，参加了校园里的游行。

反右刚告一段落，校园里的"阳谋"暂时收场，二十多名下放干部在一片喝彩声中，被校方戴上"光荣下放"的大红花，簇拥着登上披红戴绿的彩车，游行队伍锣鼓齐鸣，绕校一周以示告别。

吃过午饭后，我们这七十多名已被认定为第一类极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连人带包的塞进了几辆卡车中。在干放干部乘坐的包车押解下，离开了学校，向南桐驰去。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五年的学生生活，并从此告别了校园。

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惨痛的遭遇，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蒙懂中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炼狱，监狱的"年轮"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

当我从死难者身边走过，我暗暗发誓，我不能死，爬也要爬出这地狱，把我所亲身的经历写成书，永远留给后来的中国人!!

中共自吹自擂，把这种非人的折磨，说成是无产阶级对反动派最人道的改造，说只有那样，才能脱胎换骨，改造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经历这种"改造"后我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至今这种法西斯专政并未向公民公开揭露，施暴者没有向受害人道歉，那些遍布全国的集中营（劳改农场和监狱）并未撤除，里面还关着异议人士，甚至反抗中共压迫的老百姓（例如法轮功信徒），继续进行见不得人的残害。

像眼下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导弹轰击，发生中国驻外使团人员的伤亡，在真像不明朗时，煽起学生毁坏外国驻华办事机构，举行游行示威，又是多么危险的玩火行为。

反过来说，一支为声援政府抗击外侮的游行队伍，却要用警察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岂不是对游行者的莫大讽刺？由此可以看到中共统治者与老百姓存在的距离有多么远？当然这种对立，中共又要千方百计掩盖了。

其实在民主社会里，发生歹徒危害社会时，决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人民会起来制止少数人的为非作歹。如果人民真到了对危害自身的行为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国家用什么来抗卸外侮？

第九章 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於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 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巳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

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唤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余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

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水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水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掺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 月 20 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她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 21 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

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两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 月 22 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1916 年 10 月 23 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 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 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 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 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 1957 年被冤划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 1978 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 1994 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裁者，用卑鄙的心

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阀。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口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 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设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 1999 年 12 月 20 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 12 月 30 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抠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厉，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书以志记念。

她刚去世的那几天，每当傍晚，我都会独自沿着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独自徘徊。特别在附近街心花园里，我会坐在花园角落里，静静坐着，仿佛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过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边做操。一边听她叨叨重复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树荫下潸然下泪。

第三节 为保护生存权的一场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亲住院间期的费用时，听到住院病人讲，该院进出使多人摔伤，该院护士抱怨进出时，脚下常发生磕碰，过去就有人向九院负责人反映这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门上仔细看，这是一扇仅 1.8 宽的双开活页玻璃大门，门在关止处，留着内外高差十分不明显的门坎。

我取来尺子一量，那门坎只有 5cm 高。由于进门时，光线阴暗，病人进出门时不会引起注意，又无警示标志，特别老年人多数老眼昏花，提脚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们在进出大门时，被这个不起眼门坎绊倒。我向医院负责人提出门坎致人伤害的危险，要求他们为老年人安全着想，填平它，却遭到拒绝。

2000 年 1 月 14 日，我在消协王尔金秘书长支持下，填好投诉表，并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关母亲跌伤的病历记录，陪伴人的目击证词，伤害我母亲的门坎照片，拿着母亲的死亡通知，1 月 18 日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王秘书。

当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该院的院长，本想通过说理使九院的领导承认他们工作上的疏忽，并能及时治理好这条致人摔伤的门坎。我俩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等出该院处理人身伤害的唐副院长，当我们向他呈诉母亲摔伤致死全过程时，那姓唐的面带轻蔑的冷笑说：

“在我院门坎上跌倒，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责任，何况，医院只对医疗事故负责，所以，这件事是不应当来找医院的，你们回去吧！”

我俩没想到医院的负责人，这么干脆的给了我们闭门羹。王秘书长显得非常尴尬，我却用愤怒的眼光看这盛气凌人的小官僚，一时还没有找倒足够份量的话给以还击。

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报记者李良军的关注，在他采访王秘书长，核实了我整理的取证材料后，于 1 月 20 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老人之死谁之过”的报导。不料这唐副院长不但蚩之以鼻，还打电话到报社公开威胁小李。

过了两个月适逢 3 月 14 日，北碚各有关单位摆摊记念消费者权利日之际，在九院摊位上我公开斥责来参加活动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对病人不负责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负责人，说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一场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军关于九院进门门坎伤人致死的报导，在西南工商行政报上见报后，立即引起重庆

媒体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响。长期以来，被病人视为活阎王殿的医院，一直是市民怨声沸腾的焦点。

2000 年 4 月，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第九人民医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对母亲伤害致死负起赔偿责任。不料素与法院某院长关系密切的唐副，不知玩的什么招数，长达七个月审理后，竟无视该门坎无数次伤人的严重后果，不顾全市市民的反对，北碚法院驳回了我的投诉。

医院对本该由医院方承担的医疗事故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闻媒体逮住，在报上曝光的事层出不穷。于是，母亲的死亡赔偿，被当作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 年 4 月 8 日在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北碚法院对老年康复中心的门坎伤害责任，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那天到会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后边的是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作为人证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医院的刘医生。在新闻媒体和全国消委的介入下，这个案子惊动全国。

刘医生以雄辩的不容推卸口气，讲述了九院大门坎频频发生事故。矛头直指九院领导，那姓唐的副院长不再像上次开庭，故意做出虚张声势的狂妄态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着脑袋。

北碚法院对事故的责任很快重新划定，九院终于负起陪偿的责任，一时各大报社报导了我们胜诉的消息，医院和病人的关系，原来由医院说了算，向前迈了一步。病人作为消费者的权益纳入消法保护，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记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输了理以后，唐院长们并不甘心，背地里的交易始终在进行，他们利用上诉机会，再次与中级人民法院商量，请出专门打“疑难官司”的重庆政法委书记女儿办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们上诉的辩护律师，在事实无法推翻情况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旧赔偿标准，使赔偿金额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决生效，至此、整个门槛违背建筑法致使我母亲跌伤，致死的人身伤害，九院只作了低额的赔偿而结束。

第四节 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 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秀门下。

1935 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 年 10 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

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育学系副主任等职务。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 9 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夫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发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 年春天某一天，“东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 1937 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膺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 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

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 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 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 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 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 2006 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栽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 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 1960 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 1968 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 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 1956 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庾死狱中！时年仅 47 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

第五节 合葬

母亲去世时，我想父亲带着一腔报国志向，从 1931 年离开故乡，在外撞荡二十年，寻求救世救国的道路，一生为教育奉献，也该让他流落他乡的孤魂，回故乡入土为安了。

然而我无法找到他的尸骨丢在何方。于是我把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遗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与盐城新兴场老家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就在父亲故乡买下了一方坟地。

2000 年清明后，我亲自背着母亲的骨灰盒，和当年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条旅行口袋，与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车辗转到了盐城新兴场。

盐城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过去我听说苏北地区地域苦寒。若不是让二老魂归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专程到这个地方来。

来时正值初夏，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川上，空气犹为清新，比之雾气横弥的重庆简直是一个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来时如何。但我想这么肥沃的水乡，定是一个适于安息的地方，

若不是中国遭遇到了战争，遭遇到民主和专制的生死较量，才使父母背景离乡，发生这段伤心的经历。今天历史故去，留给我们的只有对历史的反思。

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后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块，上面简述了二老生平的简历。

他们俩都是新的教育事业先行者，只因为黑暗政治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坎坷一生，无法为振兴中华教育奉献一生，连他们组成的家庭也横遭离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更那里谈得上事业？像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大陆累见不鲜！这是一个时代的谬误！中华民族的浩劫！

现在他们到了冥间，可以在一起切搓他们生前献身的事业了！！

当我将骨灰盒和父亲遗物送入墓中，当一吊一吊纸花扬向天空，入殓的颂唱在耳边声声哀响，我和馨儿长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间。

人生何求？归宿何在？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如何？

第六节 孩子在绝世里挣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亲求学时还是闹学潮的参与者，同民主建国会关系亲密，但是反右运动她失去了所有亲人，我唯一的亲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杀的，对生活绝望的母亲几乎自杀！暴政无端毁灭了我的家。

1979 年当我回到重庆，母亲独自一人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见面时，我们母子俩面对她睡的单人病床，一张木桌一个凳子几个纸箱，重新开始建家。被中共摧毁的家已无法再恢复，要把家延续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 年经过我教书学校老师们的撮合，我和刘启建结婚，当时我年过 44 岁了，为了急於求一个孩子，1982 年我们婚后第一次去峨嵋山旅行。

也许是峨眉求佛的灵验，回到蔡家后刘启建便怀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个姗姗来迟的男孩便降生了。当我们的孩子降生后，老来得子，我俩从内心都十分疼爱这个迟来的独生宝贝，我又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仅仅留下我和母亲。

现在因妻子和儿子到来，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临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本来同刘启建几乎离婚的僵局，因孩子降临暂时缓和。

孩子的可爱之处积存在我的记忆里，给我安慰和天伦之乐。也许因为中共独子政策，家里没有第二个孩子作伴，他从小喜欢小动物，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可以弄到的小鱼、小鸟、小乌龟、小狗从来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挚友。

孩子九岁这一年过年，母亲买了一只大黑鸡，捆了双脚，放在厕所里准备年三十的下午杀。中午孩子放学回家，看到厕所里捆着的鸡，便把它松了草绳，放到楼下坝子里让它饱饱吃了一顿，再用一个木箱子，把它装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亲发现黑鸡不见了，到处找，终于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欢动物的习惯，当天下午就提前把鸡杀了。

下午馨儿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当他发现木箱不见了便跑到厨房去，看到被打整得干干净净的鸡已经装在盆子里面了。

他顿时放声大哭，扭着婆婆定要还他一只活鸡。

哭罢，便从撮箕里捡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阳台的花盆里，并用一块三层板，上书“黑鸡之墓”，插在装鸡毛的花盆中，旁边还点上两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将他爱惜生命的本性，表现得很真挚。

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多次写他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世界。写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区的中学生文艺征文中得过奖。

他读初中时，每逢周末，我们照例要到龙凤溪去捞小鱼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经常不顾龙溪河刚刚退水留下的泥泞，也要去那里捉小鱼。有时穿的鞋、裤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给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忆。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仿佛也年轻了许多。

到了初中三年级，他常常向母亲要钱，独自去商店买一些奇装异服。袖子特别短，管口特别小，腰身很瘦，还缀着许多彩色的边条，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样打扮自己。

特别是买了染发药水，把头发染得红红的，模仿着歌星们时髦的发型，在镜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诉他染发的药水是有毒的，但他并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变成学星，他那童贞的爱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规劝他，讲穿这些很不合身的奇装异服，有碍于他的健康和发育。

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学背着背兜打猪草的故事讲给他听，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讲述从小节俭，长大后养成良好习惯的道理。

但这种故事讲了几遍后，孩子却不耐烦的说道："老是听你翻那本老皇历，让人烦不烦呀，总不能用你那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为了应付联招考试，初中三年级，我们不得不将孩子从 22 中学转到北碚的 118 中学，这所学校因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连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区出名。我们想在这一学年里，专门的给他进行教材难度的加餐。

"填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必需做大量超过大纲的偏题怪题，考前一个月内为强记这些怪题的有关公式，规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记住的东西统统默念一遍，凡有不记得的强记二十遍。

经过联招考场的筛选，我们的孩子以 1：3 的录取率被朝阳高中录取，说明孩子在学业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进朝阳中学以后，我已从工厂退休到城里打工，没有时间再督促他。刘启建更认为翻过重点高中门坎，考大学便没有问题了。

当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检查孩子的作业时，才发现平时作业教师根本没有批改。照说高中课程比之初中难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课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疑问。布置的作业，教师既没有检查，更没有督促。课堂上拉下的账在作业上没有及时弥补。

久而久之，孩子越来越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加上文革遗风并没受批判，学而无用的观点在他脑海里起了作用。主观上没有及时弥补的积极性，放学以后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干扰，同班里和几个本来就是差生的议价生，交上了"哥们"，我们孩子的功课就这样一天天蹋下了。

老师的师德很差，他的班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上英语课时，年轻的罗老师在一次课堂抽问时，抽到了他，当时他没的回答出来，直楞楞地站在那里。

那罗老师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语言嘲笑道：

"你上课一直在讲话，以为我没看见你，你自己不好好学习，还猪八戒倒打一钉钯，说我们只知道收你们学生的钱，却不负责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个学生，如果你不听，就给我滚出去，没有你这个学生，看我会不会在月底工资中少拿一分钱？"

倔强的孩子因此赌气，走下坐位出了课堂。从此便完全放弃了英语课，后来期末考试，孩子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刘启建接到成绩通知，才开始翻看孩子的作业，发现已经整整有三个月英浯课堂作业没被老师批改过，追问孩子，他回答说，我讨厌这女人，她讲的我根本没听懂过。再追问下去，孩子才讲出在上英语课时发生过的这件事。

高一学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网吧。开始时，他还仅仅在有电脑的同学家中上网，时间也选在周末晚上。后来上网成瘾，在几个同学相约下，每晚都去网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为了怕母亲跟踪发现他在哪一家玩，他还故意变换离校的时间和走出学校的位置，使去校门口接他的母亲每每扑空。

直到有一次，几个辍学的小流氓在网吧里动手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两耳光，他还久久的瞒着我们，当然更不会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使他瞒不住了，才讲了出来——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点了他还没有回家，刘启建焦急的向几个平时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学家里打电话。这几个孩子都睡了，从床上爬起来回答说："晚上下晚自习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没有，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我和刘启建的心像猫儿抓一样，社会上很乱，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时街上夜雾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对着街上像疯子般喊着孩子的小名，静下来的马路上并没听见孩子的回应。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才回到家里，进门时脸上带着伤痕，衣服上沾着泥巴，在我们追问下，他才讲出他们学校与街上另一所学校学生打群架的事，他们学校还打伤了两人，住在医院。

接连发生了两次放学途中被抢被打的事后，我不得不与他们班主任商定，今后凡下了晚自习，他的母亲到教室接孩子时，没接到的，发生问题一律要由校方负责。

事实证明，把精力放在议价生的校长，对学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根本无所谓，议价生这种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横财，使学校的头们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点学校教育，完全被校长之流追逐蝇头小利变质。他们哪能肩负培养品学兼优的国家建设人才重任？要转学校，就要交几万的转学费，何况那一所学校不都是半斤八两。

孩子高中阶段陷入"网聊"以后，每夜也不知与荧屏相隔多远距离，同另一个不相识的人用奇怪的称呼，嘻嘻哈哈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来。开始是好玩，渐渐的彼此交流着厌学和对人生前途。

为了弄清他在网上同谁交谈，我专门搜了他的课桌，在我收搜他的网友来信中，还发现了一个南昌的网名叫巴比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不是一个中学生而是一个工人，爱好唱歌。

不久，这年青人来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才离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乐碟子，因为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学期了。

在他离去时，孩子还向我告假，说巴比请他在春节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绝后，一味迁就他的母亲，给了他两百元作路费，春节前与我不辞而别，去了南昌。当我知道后，孩子已经上了火车。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钟，天色已暗了下来，防盗门的门环上响起了拍击声，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刘启建，像一个皮球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冲到门口。

我从刘启建身后，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华贵的综色西服上糊满了泥，那平时精心梳理的头发，发型也被破坏变成了一蓬黄色的乱草！

脸颊颧骨突起，平时孩子气的脸蛋变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丧，眼皮搭拉着，看样子好像几天几夜困在矿井下刚脱险而出的矿工，那一刻他给我的印象是累极、饿极、疲倦之极。

我当时低估了社会的影响，尽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响他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了几天，他依然故态复萌，依然地染红头发，依然的穿奇装异服，依然坚持他选择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后他便独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厅看中，要他去那里担任報幕员。我虽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种环境，被烟毒、娼妓、黑社会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渊，但已回天无力。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自已的家，我仍拿出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的七万元积畜，给他购买住房，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买房子，而是用这笔钱与他的男友，开了一家小餐馆，尤其没料到，开店剩余的钱，被他母亲以抚养拉下债务的名义，还了长期累积的债务。

2009 年我已七十二岁，还必须面对老来的孤独。人到晚年，倍觉凄凉、夜半一觉醒来，感到枕巾上沾着刚留下泪痕。

就因为我和刘启建本来就缺乏了解、相爱、相尊。时间一长，裂痕不断在孩子面前公开暴露，于是宽严不但没有得到互补，反而偏执的双方对对方横加指责，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恶劣后果。

2009 年 7 月，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刘启建已被刑事拘押，一个家落到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败，但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孩子了，所以当他责问我，家破碎成这样，妈妈落到这步下场，你要负几成责任？并说他之所以 2001 年独闯成都，就因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 年 6 月，我收到他从渝中区看守所打给我的电话称：他被拘留两周，含糊其辞说了拘留原因。

真没想到，他二十八岁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恋男友在看守所渡过。拘峃期满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经完全变异，欺侮身生的父毌，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长期受了中共洗脑，对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网闻，还在天真寄希望中共会安排他一个满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亲团聚后建起来的家实际已经破败。我们这个教书为业的家，从此就在大

陆上消失了。

难道这是蒼天惩罚？我们何以归终？去敬老院还是能去一个足可让我完成我的写作，较为安定的去处？那儿才收留我？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至此，我们的没有了后代，按中华民族观念，孔家解体了。大陆上无缘无故遭此家破人亡厄运的何止我一家？

常听人说，不良社会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喪身在這柄利刃之下？

第十章 退休后的打工

第一节 四轮摩托

马刚原是重庆机床厂的一名普通干部，七十年代曾以武斗出名，外号人称马司令。改革以来，他利用和重庆市政府的老关系，靠走私车发家，并且买下重庆机床厂的几台重型淘汰机床，打通了重庆重型汽车制造厂的配套部门，从配套处挖出了一些配件生产销售，1995 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在了解发达国家汽车发展的一般规律后，估计随着经济发展，汽车正在进入轿车时代，自以为能为中国轿车进入家庭做点贡献。完全不懂汽车制造的马刚，1996 年从附近属于部队的山花汽车厂，以低廉价格买回一台发动机后置的微型车。

买进后，雇请了几个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在南坪临时租用了一个场地，开始了他对微型车的研制。当时他急需聘请一位懂得汽车结构和制造的工程师，便求助于原来的老朋友李伦，在李伦的介绍和推荐下，1997 年初夏，我到了位于南坪的金汇公司，开始投入了微型车的研制。

在一无生产场地，二缺资金和设备，仅仅只凭买来的极不完全的图纸，和一台样车，四个人开始组装第一台“金汇牌”微型样车。

马刚给每个组装的人开始只给几百块一月的工资报酬，他靠造反派的传家本领，不断向我们做思想激励工作，说只有在这种白手起家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每个参加者的创造性和水平，还说中国首批民族工商业产品，都是在白手起家的环境中出生的。

当时，重庆地区热销三轮摩托，它的轻便，载客量，和安全都优于普通的两轮摩托。加上销售中享受摩托车的优惠，很受运营者的欢迎。

但它行驶中震动和噪声，车身发抖和易倾翻的缺陷累出事故，使乘客日渐不满，特别是交管部门十分反感，所以每逢节日庆典，为装点城市的文明和市容，各级交管部门除了贴出告示，还要出动军警，没收、禁止三轮车上街载客。

在试制人员的建议下，金汇公司产品的开发思路由“微车”改为“四轮摩托车”，1998 年马刚向市申报该年度重庆市科技成果项目。

两年以后，样车也制作出来了，不过这才经历了最初的几步，它的开发能否成功，谁也没有底。

整个底盘实际上是东拼西凑而成的，零件图纸和买来的实物不相符合，经常发生装不起，装起后相互干涉的故障，要重新拆装，所以安装进度极慢。

最后勉强凑合，装成的底盘，又遇到市场上没有现存配件的困难。纵使开发成功，今后由于市场上买不到零件，又会碰到售后服务的困难。

1998 年秋天，两辆挂着金汇牌试车牌照的四轮摩托车，开出金汇公司的试制场地，向车管所的检测站开去接受整车性能检测。

能在不到一年时间，装出两台样车，挂上试车牌照，开去检测，已相当不容易了。

进入市区时，被一大群路过的三轮车夫围住，他们停下自己的三轮车，七嘴舌地问道："这是什么款式的车，从来没见过？""这车的外观造型小巧玲珑、顶好看的。"

样车向车管所前进时，到了通往新桥的支路口，两个恶狠狠的交警拦住了样车的去路，开车的小刘预感到意外的麻烦又降临了。交警将样车拦在马路边上，先把驾驶员的驾驶证拿了去，把我们统统叫下车来。

小刘咕噜道："年关到了，交警们又在打过年奖金的主意了，看来，我们今天恐怕开不走了。"好不容易老马与交通局周局长联系。用钱打通了关节，傍晚才把车开到车管所的检测站。第二天，检测结果令我们大大失望，七个必须通过的强检项目中，在制动，测滑，灯光，噪声，排放上就有五个指标不合格，整车总体评分挨了一个"×"。原先盼望着整车顺利过检的马强，满脸挂着不满，向试车组全体成员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辛辛苦苦装了一年的车结果仍是一个不合格品。

在大陆上，由于冗长的过程和资金不足，经历的衙门太多，一个自行设计的新产品常常经不住这些关口的扼杀，而在过关前，就已死在它的漫长途程中了，除非靠行贿买通这些部门。

马老板哪有那么多钱作买路钱？

试制组又经过了两个月对四轮车整治，并在租来的场地内反复试车。这时候一家厂址在成都龙泉驿的军工厂，经重庆市经委介绍，来我们的试制场地参观。

这家军工厂家正在物色一个适合于他们生产的民用汽车产品，他们看到了我们组装的四轮摩托，相中了它的灵巧和外观。

当即在老马的公司本部商谈，决定由该厂出场地，金汇公司提供图纸和样车实物，并以这家工厂购买的方式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

为了进一步合作，对方邀请金汇公司去龙泉驿九二工厂进一步进行商谈。正在想对这个新产品进行一万公里可靠性试验的试制组，本想借往返成都，在行驶中对四轮车的可靠性作结论。

1998 年底，由试车组的全体成员驾驶的样车，便在马总小车跟随下，向龙泉驿进发。从早上五点出发足足行驰了十四个小时，到了下午七点钟才行驶到达这家工厂的大门。

龙泉驿九二汽车厂属于部队编制下的民品生产厂家，既是军工企业，门卫森严。进入大门后，工厂里静悄悄的，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近万平米的生产车间里，除了设备和一些材料推放着，车间里并没有任何的产品摆在现场上。

来迎接我们的工厂领导人介绍说，这家民品工厂成立三年来，因产品滞销，所以已经停

产半年了，他表示厂的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到来，望我们带来的产品能给工厂带来活路。

四轮车是第一次长途运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日行五百公里行驶，样车没有发生重大的质量故障。第二天大约十点钟，九二厂接待我们的人来了，我们一起步行到昨晚到过的车间。

这下看得更清楚，车间里稀稀拉拉的分散着身穿制服的工人，办公室就在车间的楼上，当我们登上楼梯时，忽听办公室传出激烈的吵架声音，那是一个待岗员工因为两个月没领到工资在劳人科大呼小叫。

眼见这种气氛，令我想到了十年前李友当政时的农用汽车制造厂，军工厂都不死不活，足见全国有多少工人面临没事做，没饭吃的生存危机中。

下午，与九二厂汽车分厂领导，在会议室中举行双方第一次会议，正式讨论联合开发生产四轮车的事宜。

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厂方在九二厂的招待所里包了两桌酒菜，名义是为了欢迎我们到厂协商联合生产，其实这是亏损厂常有的规矩，一桌酒席少说也在几千元。

亏损工厂平时没钱来吃喝，遇到这种可以向军方上报的机会，借上级的钱，来安抚一下职工中的大小头目们，何乐而不为？

那一天，对方来进餐的人足有二十多人，一些与商谈业务毫无干系的“头”们都到齐了。这使我看到军管企业中，国有体制的遗风是多么顽固。

对方明摆着是想寻找一个让他们渡过目前状态产品，老马对这个产品质量心中无数；整车的排放和噪声两大难点还没有解决；生产许可证还没取得的条件下，与九二厂联合，是想借军队力量强行取得生产许可证。

强行走向市场的四轮车，一切质量和安全的责任，将落在我们这些负责研制的具体人肩上！

所以一进入谈判，我便用国营企业的工厂那种无人负责，遇事推诿的眼光，来看待马总选的合作伙伴，预先感到合作困难。

联合生产四轮车的意向性合同第二天就签订了，金汇公司需要提供四轮车的全套图纸和指导人员，协助九二厂汽车分厂作好技术和生产的准备工作。

还好，我已把车架的工艺装备图纸，以及车身分块的工艺卡预先准备好了，我和马总商量后，决定把刚刚进厂负责工艺的黄辉详接到龙泉驿来，一边完成底盘焊接工艺装备的制作，一边对九二厂试制第一台样车作工艺指导。

我们立即返回南坪作下一步的准备，像来成都的行驶一样，样车在马总小车监护下从成都出发，车到潼南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为了赶路，老马大胆建议走高速公路。

根据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禁止试车驶进高速路的。好在潼南高速公路的进口疏于监视，

等到四轮车买了票，已经驶过路口好几百米了，管理处的人才疑惑的喊道：“那红车子是什么车？”另一个检票的回答道：“我也没看清楚，好像是进口汽车，样子很漂亮。”

当我们两辆车驶过了路口监视人的视线之外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汽车在高驶公路上提速，使我们能在傍晚时分驶抵南坪。老马对样车倍加称赞，第一次长途连续行驶千余公里，整车没有发生任何故障使他十分高兴。沿途对样车造型交口称赞，说明造型美观，很受一般人的青睐。

回到重庆已是 1998 年的除夕前夜，大家只放了一天假。

1999 年 1 月 2 日，第二次与黄辉祥一起乘坐四轮车到了九二厂，这一次我和老黄花了几晚上详细的校对了四轮车工艺小车的图纸，以及四轮车车架各组合焊的分件尺寸，并且初步计算了初期投入的成本。

在九二厂派来的专职技术员参与下进行校对后，初步确订了单车底盘的材料定额，工时定额，以及焊装工艺的过程。整整进行了十天紧张工作。

没有想到我们回到重庆后，还没有一个星期，黄师傅打电话回南坪告诉马总，所要制作的车架材料迟迟没有买回，招来装车的工人，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经常不见人影，这些工人的理由十分充足，九二厂的工厂管理方面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工钱。

这年头拖欠工人工资事太多，这家工厂实际上处于停工待料。整天面对着冷冷清清的车间，黄师傅自己一个人怎么干？因为天气冷，得了感冒，反正干不起来，他要求从成都回来，另换他人。

自此原先热火朝天的计划和图纸很快变成纸上谈兵，我在开始谈判的担心终于发生了

回想起来，我从 96 年为赚取孩子学费，打工三年处处短命，处处碰壁。最先的青杠干了才半年，就碰到了政府封杀走私车，只好离开；接着就为陈家桥的防弹服项目，全套文件已经准备好，鉴定会也开过了，又遇到了领头人因利益冲突很快散伙；

这一次四轮摩托车搞了一年多辛辛苦苦的爬地沟，加夜班苦思苦想解决四轮车存在的问题，又因缺乏资金，看来又干不下去了。

后来由于道路和车辆管理的部门扯皮，设置层层障碍阻拦，而不得不使这个项目中断。尽管老马绞尽脑汁，眼看这么好的项目只好夭折了，我的打工生涯布满荆棘！

第二节 枪杆子也抢民品

2002 年初接到马刚电话再次邀请，电话上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在南坪找到了新的合伙人：“xina 计算机公司”，这家公司与九二厂同属军工系统。

在电话上他告诉我，这几年他在四轮摩托车的研制中，对发动机后置结构暂停研制：新的结构仍取发动机前置，前桥取独立悬挂，传动机构和后桥结构采用这些年进步很快的三轮车结构，动力用 125 单缸发动机。

同时这几年将四轮车划在摩托外的规定有所松动，为实现原先金汇公司的计划提供了条件。只要对原先的事业持之以恒总会有成功的时候。

对他的事业心我很赞赏，但我对成功的希望并不乐观。

我带着犹豫和试探，于 2002 年 2 月份第二次来到位于南坪的金汇公司，它已在南坪西路的中段临街左侧，租到了一套普通民房作为办公室。

他见到我以后，对两年前四轮车试制中一点挫折当了“逃兵”作了责备。我只是哑然一笑，说像你这样几百块钱一月请人帮佣实在为数不多的，去留当然会随便一点，我已退休，不像你有事业的想法，低工资对我没有约束力，更不存在与产品共存亡的那种豪气。

但是他却拍着胸脯说：“男儿所追求的是一番事业，有我老马在，就有四轮车在。”说话中底气十足，对他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说着把我带到了试剂厂旁边的一个十分简陋的厂房里。

我们从金汇公司出来坐的是公共汽车，我随口问道：“你的两辆日本丰田车呢？”他苦笑道：“因为四轮车的开发，耗尽了我的家当，两辆车也变买了，我现在也靠公共汽车上下班了。”

当他带着我跨进他租来的破旧厂房时，里面噪声刺耳，尘灰飞扬，厂房里七八个工人，正挥舞砂轮机打磨几个玻动钢做成的车身。

用玻璃钢替代原来钢板结构的车身，这大概就是他这两年来对四轮车作出的重大改进。

接着他又带我到 Xina 公司的本部，四轮车生产安排在公司底楼一角，大约占了五百平米的场地，在主楼的北侧用石棉瓦临时塔起了一个工棚，场地很简陋。工棚中间排放着两排共十台车架，电焊的火花此起彼落。我看了看那房顶虽是牛毛毡盖的。但离地足有十米，不会发生安全事故。

工棚外侧的过道上，放着两个已装上了玻璃钢车身的四轮车，装配工正在装内饰和校正底盘的操纵机构，他们边装边埋怨，整车许多地方装配很困难。

我在这底盘前观察良久，发现安装转向器的横直拉杆系统左右相差太大，同时因为缺横向稳定杆，估计就是勉强装好，整个转向系统不会协调。

再去看安装车架的预装工位上，乱装的现象十分严重。一看就明白这些工人都是生手。问道：“你们是从那里调来的？”回答说：“我们原是从公司的各个车间里抽调出来，并不懂车，也没有经过培训，不懂怎样才叫正确的装配”。

我问道：“现场上的施工人员在那里？”那工人指了指车间进门口坐着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说“他原是金工车间抽出来一名工程师，姓张”。

经过了解，我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印象，装车的工人基本上是一批生手，没有技术指导，我又问道：“你们装这种车装了多久？”回答说：“才装了两个月，公司说边装边熟悉”。

下午我将要离开时，我向马总介绍了我看到的情况：“整车全是生手在装，乘用车尤其要注重安全，装车错误出了事是要人命的。”

老马才说："正因为这样，我请你做现场指导，至于月薪，暂时按每月一千五百元给，是四轮车工段最高的工资了。"

这种四轮车结构，是马总从一个姓赵的手里买下的，底盘采用了长安微型车的悬挂结构改造而成，但极不成熟，还需要大幅度改进。

2001 年 10 月经过中介人的撮合，马刚与 Xina 计算机公司刘经理。签订一项开发金汇牌四轮客车的合作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制造出来的四轮车在推向市场实现盈利后，金汇公司占有 60%的利润，而接受委托加工的 Xina 公司只能得到 30%的利润。

在自己的地盘上以自己军工资格向国家贷款，用自己的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自己仅只得到 30%的利润分成，再大的傻瓜也不会答应的。但对四轮车一无所知的刘经理，利用国家的钱冒多大的风险，只要私人得到实惠都是可以的。

何况，若四轮车开发顺利，"一无所有"的小小金汇公司，将被 Xina 关起门来吃掉，"贪婪"这个怪物产生出阴险的算计。

当然，在这场赌博中无论是 Xina 还是金汇，都在用国家资金下赌注。这便是当时流行国有资产"流蚀"的合法方式：拿国家银行的贷款和国有设备，实现利润，这是两家牵手的基础。

不过合作人之间各谋各的打算，使这种"开发"带着尔虞我诈。

我到 Xina 上班的第一天，老马就向我打招呼说："我们和 Xina 是委托加工的关系，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都必需经过我的手，他们的内部关系很复杂，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所以你在现场上最好少发表意见，遇到问题要及时向我讲"。

两年不见，原先不懂车的老马，现在是技术主管了。从别人手中买过产品，又用 Xina 公司的资金和人力将这个未成熟的产品生产出来，老马想出四轮车开发的路够绝的。

Xina 可不是一个破产企业，也不同于龙泉驿的九二汽车制造厂，这里的制度表面上极其严格，进出大门都必需出示工作证。

第一天上班大约半个小时，车间里走进一个夹着点名册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人，张工告诉我他是专门负责思想工作和考勤的杨书记，今后在他面前说话要当心点。经张工提醒，在我忙碌的纠正现场各种错误的装配时，偶而也对这位翘着二朗腿的人投以警惕一瞥。

十点钟，工间休息的铃声响过以后，这位杨书记走到我的身旁，以询问的口气漫不经心的问道："你是那一个厂退休的，今年好大年纪？"我平静回答了他提的问题后，他又问道："看样子，你的身体不太好，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吗？"我马上就警觉到，他是在嫌我年老体弱。

心中产生了一种防备对方挑剔的警惕，便毫无惧色的冷笑道："你们 Xina 有的是年轻人，随便挑一个出来试试，他敢在我面前充狠吗？"碰了这么一个软钉子后，他自觉没趣，退到他的的凳子上翻自己的报纸去了。

在中共国营工厂中，像这位杨书记，上班时不做工，而是转着一双贼眼，专门靠找人岔子为职业的人并不少见。尤其在军工企业中，凭着官票和一张打小报告的嘴，占着上风的小人到处都是，同他们打交道，最好是不与理睬。好像这种人不存在一样，便是上策。

我和老马分了工，他专管试剂厂那边的玻动钢车身，而我主要负责底盘的安装和整车的装配，现场反映出来的问题的确不少，有的是设计上的错误，大量则是工人缺乏装配常识乱装。还有的是从市场购进的不合格品而带来的，那张工程师因为不懂汽车几乎不能搭上帮手，使我在现场忙得团团转。

刚刚才接手一个多月，便接到四月底，全国摩托车产品展销会在陈家桥开幕的通知，Xina 的毛总，亲自下令组装两台样车参加展销会。

而我知道这个车目前在装配时，就已毛病百出，更因为它没有经过行驶的验证，心中对它的质量和可靠性本就无底，所以反对草率参展。

结果毛总说装车已三个月，已经花费了近百万的投入，工厂不能老试制下去，见不到效益，投进去的钱怎么向主厂交待？

他俨然从被委托加工，变成主持生产的主人。下令由杨书记督促，务必按时完成展车的生产进度。

展车是从已装好的成品车中选出来的，这位杨书记在展车的车厢外，贴出了 Xina 的大幅商标，并且以 Xina 的牌名，印制了产品说明书。

这就像一则外国寓言里说的，老虎从猫那里学会了捕捉动物的本领后，就反过来要吃老师了。不过这杨书记也太性急了，老马可不是一个随便向 Xina 交底的猫。

我清楚四轮车处在当前质量状态，距成批生产投入市场还远。

负责整个产品质量的我更明白，虽然这个车能够开走了，但是，负责生产行驰系统的厂家还要花大力气，重新思考新的结构，才能确保安全。

经过一个多月了解，我对 Xina 这般人马接手四轮车开发毫无信心。

国营企业那种见利就上，见困难就让的作风是改不掉的，四轮车前途堪忧。

我对杨书记这种轻狂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贴在车上的商标撕去，那姓杨的当即气急败坏追问撕下商标的人是谁，工人指认是我，他便破口大骂说我每月拿的工资是他的双倍，现场那么多问题没解决，要我立即滚回去。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狂叫，并不答话，把我填写的工作记录当众向他掷去，告诉他我才进厂一个多月便发现和解决了两百项的问题，叫他睁开他的狗眼看清楚了。

大声喊道：“我不是你叫来的，而是老马叫我来的，要我走，也要老马叫我走，还轮不到你。”

中午时分老马来了，他已听说了上午在装车现场我和杨书记的对吵，他对这姓杨的蛮不讲理作风心中早就不满了。

一面安慰我，一面就这件事专门找到了毛总，双方约定下午在金汇的办公室里，再次对委托加工进行“搓商”。

名曰协商，双方都不加掩饰表示出争夺四轮车研制成果的意向。Xina 指责首批的三十台样车进展缓慢，技术根本不成熟，边做边改，实际 Xina 已不是原来委托加工协议中的被委托方，而是研制的主体。

现在凭他们占据的试制场地，投入成本，提出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提案。根据这个提案，Xina 所有的八个中层干部都在这个公司中占有一份股份。

这样一来，金汇公司占有的股份不是原来的 60%而是 20%，同时四轮车的牌名应由金汇牌改为西金牌。才四个月的委托加工，Xina 已由刚刚试制时一无所知的状态，而变成主人了。

老马没有估计到形势如此陡转直下，原来与四轮车开发完全无关的 Xina 中层干部，全部成了毛氏股份的股东。

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新型社会主义私有原始积累：Xina 用国家的钱作资本，如果赚了钱就落进股东们的荷包里，如里亏了，这些股东分文不会掏私人的钱来抵亏的，这种用国有银行贷款进行的公开掠夺非常精彩，当然，Xina 入股分红的八名干部，又绝不会按机会均等的原则平均分赃。

到果真四轮车撞入市场，获得的利润，杨书记和毛总，岂容费尽心机赚来的钱与其它人平分共享？

拿去参展的两台四轮车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最佳效果，四轮车以价格低廉，样式美观，安全可靠，受到了使用三轮车代步的外国用户青睐，这些国家的贸易代表团在展销会开完后，便到 Xina 公司四轮车生产场地进行了参观，并且分别与 Xina 签订了每年供货两千台的意向合同。

利令智昏的 Xina 领导班子欣喜若狂，那毛总跟着下达每月安装出一百台的生产计划，并加大了对装车配件的资金投入，公开加紧了对老马的侵占和排挤。

自从毛总向马刚亮了重组联合公司的底牌，老马很后悔当初找错了搭挡，现在对手吃掉他的面目已显露出来，而所有的四轮车又都在对方的场地上，没法撤了，继续合作下去，只能反被当雇佣使唤，他的研制全都完了。

为了做好同 Xina 撕破脸的准备，他决定要我将四轮车的图纸和牌名，向重庆专利局申报专利，一旦撕破了脸，马刚唯一指望的，用合同法在重庆法院的经济法庭上指控 Xina。

但中国人都明白，在中共人治的霸权下，所有法律是那么苍白无力，尤其是对于 Xina 这样的国防工业生产厂家，他们完全可以在枪杆子保护下，置之不理。万般无奈的老马，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呼吁了。

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公司的常任法律律师，请她草拟一份状告 Xina 的投诉材料，将 Xina 告到重庆市经济法庭，同时他动用了在市里的关系，向副市长吴某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其实 Xina 的头们在抢夺四轮车成果时，显然缺乏全面权衡。

Xina 的头们根本就不懂，机动车这种产品，是不同于其它任何民用品的。在大陆，机动车的管理和生产，是由公安部和交通部联合颁布的“公告目录”加以规范的，凡对于目录中没有的厂家和车品要取得生产许可证，是要通过业内人士并花费大量金钱才可买到的。

再说，这现场所摆的三十台样车，在悬挂、后轿、转向上存在着致命的危险，急待解决时，公司领导却大打内战，还有谁能安下心来一个个加以解决？

正好，五一节前，原来长沙地区已经禁止三轮车进城，原先从事三轮车营运的残疾人迫于生计，奔跑全国各地到处寻找四轮车生产厂家。

他们得到四轮车已在 Xina 批量生产消息后，便蜂涌而至，一到 Xina，看见高大的厂房和森严的门岗已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赖，在 Xina 的四轮车车间里赖着不走，硬要将停放线上的三十辆有严重缺陷的四轮车全部买走。

五一节那天是法定节日，全都没有上班，天也下着很大的雨，马总为此事专门找我对长沙残疾人要车的事表个态。

我说：“那三十辆车我是不敢签字放行的，全部的车都要更换悬挂摇臂和轮毂，尤其是轮毂已在试车时飞出了两次，差点造成翻车，合格的配件等了四五天还不见买回，现在老毛叫放行，说卖出去后再来补救，那是设下一个陷阱，翻了车出了人命，坐班房的是我。”

三十辆四轮车终于没人敢放行，长沙的残疾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

第二天，老马传达了 Xina 总部的通知，为了防止外聘人员混入 Xina 厂区对军事秘密窃密，Xina 刚刚成立的四轮车分厂总部，立即迁入第二机床厂租借的厂房里，六月初就在 Xina 总部的督促下，四轮车车间迁出了 Xina 本部。我的工作场地暂时也迁到了第二机床厂里面。

三十辆等候换轮毂的样车，在二机床厂的现场上足足停放了两个月。

七月底按照老马布置，试制组全体成员，从三十台首批四轮车中，挑选了两台车准备完成规定里程的行驶试验。在更换不合格的部件后，准备交重庆技术监督局作首次质量鉴定。

正当办完所有手续，第二天就要开到质量监督局进行检测时，Xina 突然单方面宣布，将所有试制的三轮车统统开回 Xina，两辆已开到半路上的待检车也中途折回，开进 Xina 的大门内。

那已经好久没出面的张书记，带着两个人突然收缴了二机厂库房的钥匙，并在门上贴上了 Xina 的封条，一场强盗式的抢劫四轮车，及库房四轮车配件的行动，便在二机床临时租用场地突然打响。

我在车间的楼上亲眼目睹了这场穷凶极恶的抢掠，一伙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抢劫了自己

的合作伙计！

Xina 的五架卡车在车间搬运工的配合下，几个小时之内，将三十台样车和全部库房物质，装配车架用的工艺装备全部抢走，运到 Xina 本部，交给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看管起来。

当时，我忍不住在楼上向指挥抢窃的杨书记骂道："强盗，简直是一伙强盗。"那姓杨的竟毫不介意的从楼下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不禁想，这伙从贵州大山里迁到这里来的山野村夫，看着几辆四轮车都眼红，日子久了，不定还会干出更出格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把这些车抢去了，可没有弄清存在重大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抢了一个祸事捏在手心里。

深夜三点钟，当楼下的东西已基本上一扫而空后，安在楼下的电话铃响了，电话筒里传来了老毛的声音，他说："你不要误会，我们因为场地租赁费太贵，现在重新搬回了 Xina，等待着安排新的场地，眼下我们正在重新的调整四轮车的技术力量和劳动力，我们欢迎你到总部来上班。"

听到他的话我浑身阵阵感到肉麻，姓毛的不仅抢了东西还想抢人，我恨恨的回答他："没看见你们这样公开抢老百姓东西的部队，你就不怕金汇在法庭上指控你吗？"对方的电筒里传来了哈哈大笑。

按他的逻辑，他们是保卫公家的东西，不被私人老板占去。从来没有民营企业告倒军队的先例，毛泽东早就说过了："枪杆子里出一切！"

抢劫事件的第二天早上，金汇公司办公室里，撞进来了南坪工商所执法人员，他们说接到举报电话称，金汇公司"私自"组装没有任何许可证的"黑车"，按照工商管理条例，非法组装的黑车，不但要没收，还可追查黑车组装者的法律责任。

看来 Xina 的毛总和杨书记十分通晓黑吃黑这一套，四名执法人员要马刚带他们去黑车的现场。

到此金汇老马反被反咬了一口。

马刚走到他最不愿看到的一步，请律师向重庆法院就违反合同法和侵占他人专利权，将 Xina 告上了经济法庭，就这样从 2001 年 11 月开始至 2002 年七月份止，为时八个月 Xina 和金汇公司合作对四轮车的开发研制，最后以 Xina 撕毁合同，抢占四轮车宣告了它的终结。

垂头丧气的老马被迫解散了四轮车所招纳的金汇公司全体成员。

然而他并不甘心失败，一边将我留在他的公司办公室里，根据张工绘制的残缺不全的四轮车另件图纸，以及我对整个四轮车底盘的回忆，依凭在试剂厂的厂房里还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玻璃车壳，绘制了整车的装配图。

老马不甘心就此放弃奋斗多年的研制成果，一面应付着与 Xina 的这场官司，一面四处寻找新的投资伙伴，准备时机成熟东山再起。

可是，靠抢杆子抢夺他的人产品的头头，把到手的产品看得太简单了，股东们坐在办公室里打着如何“分赃”的算盘，争吵声在大楼上响了好多天。

但对于四轮车的结构和基本性能一无所知，听凭一群 Xina 本厂的工人在现场上瞎装的 Xina 头们，严重连反边试制边试验的科学方法。对初期试制样车已发现的问题又不知怎么去克服，便匆匆将带病的三十台样车卖了出去。

结果卖出去不到一个月，便陆陆续续的被用户退了回来。在残疾人用户的一片谴责声中被迫关门整顿。面对这种恶果，Xina 的领导们为追究责任，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狗咬狗的争吵。

好在 Xina 头头们自有弥补损失的招数，三十辆长期积压在库房中的旧车，被当成产品试制的正常报废，名正言顺地报销了。其后果，无非是给上交国库的中国亿万纳税人，增加了一笔小小的负担而已。

在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市场经济，产生出中共官僚中的贪婪、外行和荒唐。他们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用正常情况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的冒险机会，以卑鄙手段掠夺弱势个体，不用尊守道义规范和失败的风险。

第三节 城市猫

十月底，金汇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重庆市国际公司一位杨经理打来的电话，自称是马老板在机床厂的师兄弟，现在承包了该公司进出口车辆的业务。

最近他得到了国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轮摩托订货单，他知道老马从事四轮摩托研制多年，所以特地来电话和他商量。

姓杨的打电话来时老马没在，等到中午老马回办公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正在焦头烂额中寻找合作伙伴的马刚，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与这位杨师弟通了话，并在下午亲自到国际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时，他满面红光，心情显得兴奋起来，将近三个月堆积的一脸愁云，似乎消失了。

回到办公室里，便把几张我们没见过的三轮车照片往办公桌上一摊，指着它们说：“这便是国际公司得到孟加拉国国订购的样车照片，名字叫“城市猫”，对方说，只要在外形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生产多少他们就要多少。”

这对于三轮车相对生产过剩的重庆大小三轮车厂家，都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客户。

城市猫的发动机是意大利比亚特公司产品，我听后心中却在想，要上批量并不那么容易了。何况发动机还要靠进口，制造成本经过初步核算没有？

正想提出问题，老马已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根据照片的外形，立即绘制一张整车的效果图，再用电脑进行修正复制，达到这张照片的正面和侧面的效果。并说外商在两三天内就要

来公司洽谈，达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图传真到孟加拉国，国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国际公司的老杨带了一位广东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汇的办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罗，看上去很年轻，他看了绘制的城市猫效果图后，介绍了孟加拉国国对这种车型需求的市场前景说："只要按质按量在二十天内拿得出样车，他便能够代表孟加拉国订出年需求量三千辆的订单。

三位老板级人物的乐观，使金汇公司小小办公室里泛起了一阵起死回生的春潮。我们商议了在二十天内出样车的方案，老马表示金汇公司虽受 Xina 的影响，但生产四轮车玻璃钢的厂房可马上用作新样车的试制场地。

刚解散的人也马上可以召回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摩托装配工，可以根据样车的照片和效果图，确定出它的结构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购买装车部件的资金了，老杨立即表态，初期制作样车的钱由他负责筹集。

于是三个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马总负责生产场地重新布置及今后的现场管理；杨老板负责试制资金以及外销的运输集装箱准备；罗总答应马上通知孟加拉国，并负责运发的国际手续和样车出售后的资金回笼。

生产场地很快地整理出来，原来四轮车用的玻钢车身和模具暂时全部堆放起来，第二天杨老板带来了一个叫陈大发的投资人，据杨老板介绍那陈大发原是他在渝州大学读书的同学，现在正在宗申公司协助袁老板筹建璧山三轮摩托车分公司的建设。

重庆的摩托业私营厂家，经过几年拼杀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兴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团，他们各自拥有几十亿的资产，虽然民间对三大集团的总裁口卑并不好，但谁也说不清，他们同中共重庆市委有什么样的渊源。

璧山新成立的三轮厂，把过去套用宗申铭牌的各小三轮车厂实行了兼并，正积极地寻找新的三轮车样车。所以在得到老杨信息后，决定将金汇公司纳入到宗申集团，专事开发新的三轮样车。

那陈大发一到了金汇公司的办公室，将腋下夹着鼓鼓囊囊一个皮包向老马办公桌上一扔，老马见财神到，满脸堆笑躬身站起来，打开我们制作的城市猫效果图请他审阅。

一面介绍金汇公司开发四轮车的经过和积累的经验。那陈大发对老马的自我介绍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看准备制作样车的场地是否已就绪。

在参观了生产现场后，那陈大发倒也爽快，回到办公室从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叠百元面值的五万元现钞，往办公桌上一甩说：

"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两台三轮车和一台四轮车开发，购买零部件和材料的专用资金，如果不够，随时通知我。样车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质按量完成，那么今后你们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员了，我们以你们为基干力量共同开发外销车。"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色一沉，继续说道；"如果样车搞砸了，那么金汇公司就砸了自己

的饭碗，我们充其量就当作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听到了这带刺的话，我心里实在不是一个滋味。在这些没有长大的资本家看来，唯有钱才是万能的，有钱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书，挣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虚”名，只不过是人家用几个工钱召来，可以随意使唤，不满时可以炒鱿鱼的打工仔。

五万元在老马看来是一笔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钱，而在陈大发的眼里，不过是赌场上一局小小赌博的赌资。

当然小老板的洒脱会使老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奋斗，交给这个赌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团，也是近来才从市政府通缉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小摩帮，时来运转，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招数，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团这样的独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庆市三大摩帮巨头，连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也敢今天在这里说大话。

真可谓社会主义江山无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意时，绝对尊守谁逮到耗子便是好猫这个原则。

钱，在初期长大的小老板眼里才是适应生存的手段。

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机械局参加会议时，就听说重庆市几个摩托帮主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门封杀通缉的故事，私人的摩托业主当年，最难弄到的就是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权，没有钱买到生产许可证的工厂，即被认为非法经营。

对于重庆摩帮，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发展过程，从没有认真思索过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无法估量他们今后的无量前途。

只听说他们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个地点开了张，像游击队作战一样，想不到这样顽强拼了几年后，竟然长大了。

今天产生像牟其中这样的中国巨富，那一个又不是邓小平及其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随着中国权力变幻，这些风流人物有几个能逃掉阶下囚的最终归宿而昙花一现？

小业主们在市场经济苛捐杂税的重压下，难免偷税漏税，或在流通领域中“违法乱纪”，是使他们沦为阶下囚的原因。同时为了私企的发展，对这个失去了监督的官僚体制实行贿赂，就成了常有的现象。

重庆的几个摩帮巨头中，无论是左宗申、尹明善和涂建华都是善观统治者脸色的投机者，只消看看他们在种种公开场合中打出来的旗号，就会明白他们向权力谄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报国心，款款宗申梦”的巨幅横幅，撑在交通枢纽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这些叫得泛味的标语后，提出来比较切合民众心理的口号。

中共的专制政体最命脉的一条，就是强迫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意志下统一，尽管这些民族

主义的口号与中共的纲领，牛头不对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板，在改革开放中拼命扮演一党独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帮几年打工就知到摩帮的底，他们决不愿为科技发展而献身的。

研制四轮车，在马老板这里找不到一本设计资料。

后来在宗申和隆兴的研究所，看不到属于本公司自己设计思想的理论阐述和计算资料。在他们的开发室里，找不到一辆属于自己民族研制的样车和换代产品，甚至于找不到一个独特的样车模型，里面除抄袭和模仿外什么都没有。

至于摩帮研究所的领导人，无论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完全热心于短期效益，照抄国内现有的其它厂产品，照搬国外过时的设计，工厂标准互相抄袭。

然而，只知抄袭别人的民族是一个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这些老板拿不出任何冶理企业，规划产品的方案来。国家和民族决不会因他们的出现而振兴，也决不能依靠这些私企老板求发展。

国家要这些老板为生存而拼命赚钱，并交纳征税，以取代原来的国企!!

在私企工厂的劳动者可以随意被解雇，每个劳动日的劳动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并且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这些就是走投无路的国企，所要达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盘剥更多的劳动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体制下的私人企业，是比任何资产主义更残酷剥削工人的怪胎。

马老板在接到陈大发的五万元后，立即派人买回了样车制作所需要的钢材及配件。三轮车无论是车架和车身上的设计，是现有机动车辆中最简单的一种，对于从未从事三轮制造的我，仍坚持根据车的最大载荷，画出每根梁上所承受的力。以选择材料和断面保证其刚度和强度。

三轮车结构绝大部份由焊接而成，为消除每个焊接点所产生的应力集中，选择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证行驶中不致发生断裂、变形等安全隐患；需要编制工艺，进行设计计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术资料，却找不到有关设计和工艺的资料。

而我按常规进行这种计算时却受到三个老板的讥讽。

陈大发板着脸问道：“像你这样搞，等到你把整个计算拿出来了，雇主恐怕就另求厂家了，你懂不懂什么叫商机，商机就要讲快，没有像你这样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力学计算的时间。我们宗申集团，不能让你们这种书呆子当成试验的场地，坐失商机”。

那老马和老杨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个制造交货期只有二十几天，我们不能让你慢条丝理的搞计算了。”他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他们话语中刺激人的用词使我懂得，这里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轮车结构的熟练工，而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绊脚石，我预感到我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三轮车从来就讲的“类比设计”，根据现有的车，凭经验，甚至凭感觉选择材料，确定断面尺寸。

至于这样定下材质断面，会不会断裂和变形，或者因为过份粗大而浪费材料，带来功率损耗，就只有在今后从行驶中才能发现。

老板为争得商机，关键能不能在用户所规定的时间拿出样车，耽误交货的时间是决不允许的。我一个打工仔，怎能拗过财大气粗的陈老板？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个老板已经视我为障碍，既然他们已经跳到指挥开发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尽快地躲开，走为上计。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岗位前，千万沉住气，老板怎么说，就怎么执行，同这些把精力花在赌场和女人身上的有钱人，犯不着争谁是谁非。

就是看到明明错误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板定的，我就要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今后出了问题也不会算在我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私人老板有时比国有企业的厂长更不讲理，更不懂科学，那怕两个老板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天。有了几个臭钱就变成了凌驾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猫”试制的开工的时间选在 2002 年 11 月 8 日，杨经理说，这一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日历上写得清楚，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共产党都相信天命了，阴阳八卦，讲天道轮回，对于不信鬼神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他吩咐在简陋的试制场地挂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将临时召来十多名工人召集起来，朗声宣布，宗申三轮自制的第一台摩托车就此开工。整个简陋工棚里立即被电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轮机，敲击声，震耳欲聋，一改三个月的戚静。马老板在下料工段指导着每一个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从那以后，陈大发每天晚上十点钟驾着他的进口立桑车，赶到现场对已焊好的车架，指手画脚地发表一通意见。

根据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原则，现场的工人们都要根据他的意见，把已焊好的结构重新割断，重新焊接，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既不耽误进度，毫无根据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长工人的加班时间来补偿，所以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二点钟，而召来的工人对这种只加班不加工钱的蛮横做法，心里只有暗自骂娘。

但是，社会上的失业者到处都是，马老板招来的都是附近的国营长江电工厂下岗的待业工人，他们忘不掉失业待岗的尴尬，只好用白天消极怠工发泄不满，并不敢违抗。指定的组长秦三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讨好老板，背地里把工人说的牢骚话都悄悄报告了老板。

所以，小小工棚里几乎天天都要听见陈老板对工人的训斥声。

陈大发骄横，杨老板拔扈有余，马老板阴阳变脸，三个小老板各有手段，为了争“我说

了算”谁都互不相让。他们本就是为了“城市猫”优厚的外汇，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联盟，无所谓谦和和团结。加上他们那一个都凭着“我看这样才好”的主观意愿，所以谁都不能说服对方。

有一次就所占厂房的租约，杨老板和陈老板没说上五句话，便当着工人的面大吵起来，并不顾及他们同窗情谊，开口就拿对方的妈出气，摩帮内说话粗俗已成习惯并不奇怪。

工人们看到小老板为一点小事翻脸，也在老板间拔弄是非，所以这个总共不到二十个人的集体，从成立开始就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

看来，开工的黄道吉日并没有选好。这使夹在这些人中的我特感难处，我本抱着拨一下动一下的态度，在这种一盘散沙的集体中几乎动弹不得，最后，连秦三都认为我可欺，动辄当着老板指责我。

我虽将技术上的决定权拱手还给了马刚，但老板们随意定出来的尺寸到头来却要我表态。我只好声明，整个的设计都由陈大发决定，我凭什么下结论？于是马刚把编写产品说明书和企业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我。

车还没造出来，技术参数凭什么定？虽然可以胡弄我国商检部门，但要骗用户就困难了。当然，中国的商品基本是从外国偷学来的，造假仍是中国大陆的拿手好戏，我就只好根据马老板的意思，把我眼睛闭上，瞎抄别人的东西。

然而，我一双不识时务的眼睛，看不惯缺乏机动车结构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车把龙头，不能用切断材料对接焊起来，这样焊接起来会造成应力集中，潜伏把手折断的危险；秦三将减震器焊成与车架几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减震作用，反而会因行驶中车架来回振动力作用，成为撕裂车架的原因。

当我纠正他时，他说：“那里的位置不好焊，经请示马总以后叫这样焊的。”

我见他把 Xina 杨书记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学了过来，忍不住长期所受的委曲，怒骂他是一条围着陈大发的腿转来转去的狗。

一个三轮车底盘因没有在动工前进行设计，违反机动车常识的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抢”字当头装出来的车，怎么不发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陈大发不提出要辞退我，我早就准备离开了。

然而老马，却反对辞退我。经他们的商议，改派我去当采购零部件总成的技术顾问，买回来的配件因为买东西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件装在何处，它的功能怎样，买回来不是装不起，就是材质不对，要反复买几次还不行。例如一根进汽管因弯曲度不对就反复买了几次。

试制就这样在忙乱和吵吵嚷嚷之中进行下去，谁都说不清焊成的车架有几成合格？正好，那位广东的小罗，却带回了孟拉加国需要铁壳四轮车车身的信息。于是我乘机向老马提出，将我派驻指导四轮车的外协。

铁壳的四轮车身，是离南坪五十公里外的专汽厂大庆分厂制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

床，匆匆去乘坐从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车。

晚上要摸黑才赶回来，回到临时租的房间里已是半夜，疲惫不堪，肚子还是空空的。插上电炉自己弄饭吃，一直折腾到十二点才能脱下衣服，皮肤触到已很久没有换洗过的被盖，感到沾糊糊的，疲惫不堪的我还经常不能入眠。

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我已六十五岁了，仍只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离婚后还不知家在何处，心中牵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学怎样了，现在可是他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

想到孩子祖父毕生献身教育，到头来，身陷冤狱，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辈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权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给孩子产生的压力，在孩子幼小心灵中刻下了深伤痕。社会影响对他的伤害，致使他对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点可以弥补的办法来。

窗外飞起细细的雨来，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对于僵卧在租用房里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别冷，白天受那陈大发故意的刁难和刺伤，心里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难以入眠。

经过连夜加班，外销的“城市猫”样车终于在奋战了一个月后，横躺在工棚里。进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陈大发还按照比亚特公司的照片，将车架上发动机的位置移到了大梁的中段位置，并且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强横梁，拿出去在附近马路上行驶一圈以后，车架的脊梁好像得了佝偻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细地察看了整个的纵梁，除因为多次返工，反复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无数癌细胞一样重重叠叠的焊疤，使整个车架退了火似的变软了。

所以当驾驶员一坐上驾驶台后，还没有装上车壳，车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这是一台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驶的车。我由此想到摩帮们的胆大不就是因为不懂吗？不懂车的人指挥做车，发生的车祸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可怕。

我正在对这些车架发怔，那陈大发却在一边冲着我吼道：“你站在那里怔什么！整车要按时交货，进度必需得到保证，你现在根据车架尺寸，将车厢的结构图画出来，明天就去道角的车厢厂，无论如何要他们在五天内，拿出车厢，连夜装车油漆不得有误。”

我从蹲着的位置上站起身来，正想向他讲我刚才测量的结果，劝阻他千万不要把这种车拿出国境外出丑，但耳朵里突然响起了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曾说过：“……如果样车搞砸了……我们充其量就当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对我非礼，并扬言要辞退我，便一声不吭的走到办公室里。

画好草图交给老马审阅后，第二天，便拿着草图向道角的方向趁车到车厢厂去。到了车厢厂，他们要求将车架运过去，他们好根据实际测量出车架和车身有装配关系的地方，再定出车身的尺寸。

我告诉他们，老板正追着抢进度，不可能将车架运过来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现场，马老板在吃饭时就命令我说："光有车身还不行啊；你去把样车的座椅给我定回来。"

吃过饭我又急忙奔座椅厂，与座椅厂的周厂长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厂长冷冷的说："你们那个金汇公司一点信用都没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开发费。"

听了他的话，当即向老马打了电话，讲明现货没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开发费。马老板在电话那一头，恶言说道："他们不供就算了，摩帮没有先支付开发费的规矩，只是请周厂长想清楚，今后我们的外销车开发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挤进来供应，就已经晚了"。

摩帮这种主厂吃配件厂兼以讹诈利诱相威胁，逼迫对方上钩是一种经常的惯例。我明明知道这次开发的失败结局，四轮车的门铰链还要等我到大庆沟定下来，不允为座椅纠纷耽误时间。

于是便要了几个长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后，再批量定货不迟。主意打定，便买了一套长安车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试制车间。

老马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见我拿着长长的凳子回来，便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按照我们车的尺寸，长丰座椅厂确实没有现存的货，我只好拿回来现存的凳子，由长改短，确定安装的准确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厂批量的供货。

不料，他把脸一沉，训斥道："现在大家都在加班赶进度，派你去半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拿回两个这么长的凳子怎么装？"那陈大发从工棚里钻了出来说："我们是私营企业，不能拿你国营厂什么都等现存的工作作风来混日子"。

两扳子不轻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将好几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气冲口说道：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是设计车身，我已经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实了，并且有了解决的方案，今天一天从早上六点起床，直到现在，工作变了三次，还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被你们当作一个棋盘上的走卒一样，一会儿摆在这儿，一会儿摆在那里，如果你们实在看不顺眼，我走好了。"

说着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掼，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浇油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那杨老板见我动了怒，便缓了口气说道："你吃了晚饭没有，先去厨房把饭热一下，填饱肚子再看怎么办？"我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吃过饭，按照我在归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个工人一齐动手，将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两点钟，两付座椅已改制成功。马老板自觉下午说的话有些不妥，向我解释说："外商的交货期逼得紧，你看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忙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离开，这种车出了国境线，今后打起国际官司来，我真要兜着祸事走了。晚上便写好了离职的报告，第二天交给了马总。

马老板看着我的辞职书一言不发，此时他从两个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来，他

明白我们合作多年，开发四轮车走过了多少政策、技术、人办、资金所铺设的坎坷路。

2003 年，一月份，宗申集团的基地从南坪，迁进了他们在大堰沟租好的厂房里面。

就在我执意离开宗申公司的前两天，两台已油漆好，准备运往海关的“城市猫”三轮车，雄纠纠正开出了试制场地，在马路上作装箱前的最后也是第一次试车。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驾驶员旁边跟着试车，样车顺着铜元局一路下滑。

此时他的心里很得意，因为这是他“指挥”的第一台外销样车的制作。

不料刚刚开出去不到一小时，估计两台车驶到河边的最低处向上回返的时候，马老板接到了秦三的电话说：“两台样车在上坡时，无论如何都爬不上来了，现在正停在河边，只等公司派汽车把它们拖回来。”

等到两辆新车拖回试制工地的厂门时，秦三沮丧的从样车上走下来，我看到那里程表的读数才十公里，再仔细看大梁已明显压弯，发动机离地面只有 10cm，秦三嚷道：“后轿的速比装成了平原型的，当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还不知道有多少问题等着这辆第一台“城市猫”。还好，没有伤着人，新开发的“城市猫”仅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开了，这个车架最后只能割断，重新来过。

承诺按时交货的罗老板只好立即用国际长途告诉接货方，因为客观的原因，海关没有通过，至于何时才能发货？要等海关手续办完以后。

当时对重庆三大摩帮有一句评语说：“只有摩帮那么大胆，因为他们不懂。”这无疑是指的现象，要探究摩帮兴起的原因，只能从国营企业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不能创新，长期成为国家负担上寻找。

摩帮的出现，帮助中共新的当家人，完成了甩掉国有企业背得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国营企业“破产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顺势被推出了国有企业，流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会主义最惨的试验品。

我不知道，重庆的摩帮怎么会热衷于“冲出国门”这种壮举？被中共利用和操纵的摩帮，对自身产业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冲出国门无疑于“找死”。

也许把摩邦的“冒险”精神，说成中共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未免夸大，但是用无知和冒失代替科学态度和诚实工作，个体户短浅的暴利追逐，拿出质量极差的“中国货”，无疑要在走出国门后受到国际制裁，今后会证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产品，同中共的独裁制度一样将受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自从今年 2 月，我辞别了含谷，来投马刚后，短短一年时间经历的所见所闻，亲身体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社会百态，目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期的表现，只感到乱麻一团，理不出头绪来，更看不出它今后发展成什么样子？

第四节 在劲龙公司

我将要投奔的是属于大渡口区大堰工业园区里的劲龙公司，它属于三大摩帮之一的隆兴公司。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谭总介绍，这几年重庆摩帮从发达国家那里引进了三轮、四轮，以及用于水上、雪地、沙滩等等道路的专用车。

他告诉我劲龙公司准备成立一个特种摩托车辆厂，在听到我的经历后，他欣然的接纳了我。

谭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他在万虎摩托车厂当了八年的销售经理，对于摩托新产品的开发，有浓厚的兴趣。但因为他原本是学会计的，所以对机动车是外行。在我来前，他已从摩配厂家那里听到了我的情况，表示欢迎我来他的公司做技术指导，他的谦虚使我从树了信心。

第一天去，我就在他的陪同下参观了刚刚铺设的生产线，如果说经营得好，特种摩托车，有很可观的前途。

这一天返回南坪我原来租用房时，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没想到，在我住宿地门口的马路边，碰到了马老板。他见到我，满脸堆笑说，为了等我，他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问我上那里去了，怎么手机一直关着？

我告诉他我已在劲龙公司应聘，过几天我就要搬过去了。他连忙劝阻我说："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忙于产品开发，外销的任务使我们彼此没有交换意见的时间，对于一些误解也没有及时疏通，相互产生的不愉快希望不要往心里去，我们已合作多年，彼此都十分了解，何苦为口角而离开？"

我心里暗想，如果没有试车对"城市猫"来了一个大揭丑，暴露出它的致命失误，使他清醒，他会对我主动疏通么？

我告诉他，我虽是一个打工仔，但知道为人诚信。我既然已答应了谭总，岂有失信于人的道理？何况那陈大发对我已下过多次逐客令，我岂有再回去的道理？

他明白已经无法挽回了，说了声"如果你在劲龙工作不如意，我仍然张开双手欢迎你归来。"唉！有他这么一番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到劲龙公司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安排在开发部里。技术部里的工作人员小陈和小曾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他们拿出一大叠香港著名影星，在公司成立庆典上与公司要员们的合影照片，在这些精制印刷的广告中，最显眼的是本公司特聘的"形像大使"成龙。

这几年，重庆的商业广告已为各行各业采用，重庆的摩帮为了销售战略的需要，用重金聘用一些名演员来作自己的代言人，李连杰，周杰伦，成龙等等巨幅照片布满了马路两旁。

至于摩托车的技术和质量究竟如何，是无法从广告上知道的。

小陈和小曾打开了靠墙的档案拒，里面除了存放着劲龙牌两轮车的企业标准以及原总工程师留下四轮车装配示意图外，连三轮车的装配图和部件图都没有一张，更不要说有关特种车

辆的技术资料。

小陈说：它们全都储存在开发部的三台计算机里。

但是，我请他们打开计算机，看看里面究竟存放了哪些资料，小陈却说："你不要拿正规的工程设计去要求摩帮，计算机是没有的，它们有时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一个车的车架就只要尺寸就够了，至于讲新品开发，只能按要求选择现存的类似结构就可以了。"这大致就是摩帮们共同的技术状态。

两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了公司的人际关系，他们说公司成立还不到半年，各部的部长都是新到位的应聘者，宗派关系还有没形成，本公司工作作风还算正派。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以为可以放手干点事。

于是，进入公司第一天，我就草拟了准备开发特种车的工作计划。

按照谭总的工作安排，我们在装配车间的楼上，开辟了一个足有五百平方米的样车试验基地，样车在计算机上经过绘制结构图，便可绘制车架图。

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三台全新的三轮车底架图，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便绘制出来，它们陆续在试制场里诞生了。

下一步就是对样车进行可靠性的行驶试验，只有经过长途试车，才可以验证我们所作初步设计的可靠性。也才可以验证整车的动力、动力传递和结构是否合理，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而试车的牌照却一直迟迟地没有拿下来，由我起草并经过谭总批准的试车申请报告，一直押在公司的经理办公桌下。

公司的头目说什么"摩托车"试什么车？这一笔费用该由谁来开支？他们根本不同意自己进行有创意的车体结构设计。

他们问道：自己设计的车身，用户能接受么？市场能接受吗？我们是靠自己的钱来办厂，而且又是小厂，开发后能否打开市场？即使一举成功，大家争着去学，你的新车说不定还没有卖出，别人已经仿制成功了。这笔试制费岂不是替人家付了吗？

谭总在公司决策人面前被问得哑口无言，试车工作由此受阻。

为了纠正谭总的开发计划，隆兴公司派了一个姓罗的人来担任总工程师，干脆取消了我领导的技术开发室。

这姓罗的积极主张"捡别人现存的东西做。"这是摩帮们对新品开发的原则!！这种时侯我只好采取回避，独自一人在开发室里闷坐。

停在开发室里经过两个月辛苦开发的十几种款式新颖样车，被全部封存！公司的管理机构却像肿瘤一样长大。这个总共六十名成员的小公司，就有一半以上的科室管理人员。

总经理以下有六个科室，分设五个部，最大的销售服务部就占员十五人，几乎是全体员

工的 1/4，物流部的采购人员就有五个，还有库房管理人员五个，这样的公司恢复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

谭总为了推行部长责任制，排解天天都发生的扯皮现象，不得不每天召开生产协调会，然而，扯皮的生产协调会，除了拖住谭总的全部精力，并不能推动工作的按时完成。

这与我很熟悉的李友时代的农汽厂几乎一样，生产协调会上到会的部长们各说各的理由，然后毫无结果的散会。可是亏损却像鬼魂一样的附在这个新成立的公司身上。

我曾建议谭总少开会多调查，多调整不协调的部门，可是他说这是公司选择的日本管理方法，谁也无法违背公司的管理思路。

贫穷百姓在中共致富诱惑下，重庆的三轮摩帮在其开始兴起时，是由许多彼此独立的家庭手工业组成。这些向大公司采购发动机和配件，借用大公司的牌名，一哄而上的，分散在重庆九区十三县的街道小巷中的私营小“作坊”，从来没有正规的设计。

这些质量低劣的三轮车，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场。小业主说如此总比失业好，正是靠着廉价的优势，满足了视生命很贱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苦力的营运需求。

这些带着结构和材料的先天缺陷，使三轮车不断发生翻车、车架断裂、制动失灵、方向失控的致命事故，危害穷苦下层百姓的生命。

中国的车辆管理部门想通过国际上推行的 3C 认证，来消除或减缓这些层出不穷的人身伤害，扼制粗制滥造所带来的交通隐患。但是中共各级官僚的腐败，使 3C 认证机关把这种神圣的使命变成金钱的交易。

小作坊找到大企业，大企业出钱买认证，小作坊出钱买合格证，最后还不是维持老样子。隆兴公司也同相当规模的大摩帮一样，决不会把 3C 认证的过程当成认真提高产品质量的企机。

在上级部门发出通知以后，一面向政府机关交钱，买过关的认证书，一面指示下属子公司对过了关的 3C 材料依葫芦画样照抄，伪造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数据，便成了公司获取 3C 认证的方法。

谭总知道，我在专用汽车制造厂负责质量工作，所以把认证工作交给了我。我虽不愿做这种花钱作假的事，也只能随大流。

坐在办公室里抄袭其它单位弄来的文件，填写假数据，亲眼看到公司把几十万块钱拱手送给市的认证中心。承接这种抄袭的文牍工作，整整忙了三个月。

没有多久，这个刚刚成立才十个月的企业，就处在内无新品可生产，外无过硬产品开拓销路。在隆兴公司高层管理层的干预下，已严重出现亏损。

到了 2003 年 7 月份，隆兴公司的财务总监，拿着一张劲龙公司十个月来总计亏损百万元的通知转给了谭总，接着由隆兴公司派出了一个审计工作组，进驻劲龙公司本部，把谭总推到被审计位置上去，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我也被当成亏损的一般成员一齐下课，离开了这家公司。

早已等候我的老马，听说劲龙公司的人事变动，当即打电话给我，表示欢迎我重新回到宗申公司。他们那时已从南坪全部迁到大堰工业园区，就在劲龙公司的附近。从劲龙公司出来，我准备去老马那里看一下现场。

刚出门就被老马碰上，他说今天凑巧，杨总、陈总都在办公室，我们正缺 3C 认证的负责人，这一次你就不要推诿了。

我只好同他一起到了宗申现场，试制的场地摆满了各种新型的摩托车，尤其已投入了孟加拉国国所需的“城市猫”的成形手工模具。相比起来我的起步比他们早，可惜被开发不如抄袭的思想占了主位，劲龙公司在后期没有投入，所以这里反而先行了一步。

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老马介绍，宗申现在新品开发的工作全由老马负责，大概因为擅自作主，使第一批的样车完全失败，陈大发已完全不干预开发工作，老杨也只负责外销，不像原来那样，多头变成了无头。

我心中有一些动摇，加上我已经脱离了劲龙，所以对老马的诚意不得不加以考虑，必竟我们是多年合作了。

我们走上了办公楼上，果然老杨和陈大发都在那里，他们见我到来，都起身相迎，陈大发第一句话便向我作了道歉，这种诚意不可以随意傲对。

私营企业用人没有那么多手续，没有那么多弯子，灵活调整的优点，是官僚气味实足的国营企业所无法企比的。原因很简单正如陈大发所说:“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掏的腰包!”

赚的钱和亏的钱全要落在老板肩上，是他们历精图治的原因。纵然有主观盲目，不讲科学，但吃了亏后便及时改正也是可取的。想到这些，我当即便答应暂时留下来试一试。

第五节 脑出血 打工的终止

“城市猫”开发的失败，客观上促进陈大发的反思。对他来说，最深刻的教训是没有认识到技术不是简单抄袭可以得到。好在他本人也读过几天大学，明白设计和计算是一个产品必不可少的。

其实，私人老板个个都是人精，趁我与谭总因劲龙公司大换班的机遇，便招我重回宗申，本来就是老马一直关注的事。

然而，正当我准备重新搬回来时，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它使我不得不结束我的打工生涯，进入了人生最后的晚年。

我在劲龙短期的聘用，是住在谭总原来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口袋屋，时值八月盛夏，我住的屋子十分闷热。

当时我从旧货市场买回一台旧的窗式空调，旧空调风力太小，白天已很累，晚上开足空调也只有一束解不了热的风。

8 月 4 日因为太热，我睡在躺椅上。迷糊中渐入梦乡，没想到躺椅突然倾翻，我随着躺椅跌倒地上，头先着地。顿时天崩地裂，脑袋炸裂般的疼痛。

挣扎着从地上坐起身来，抚头呻吟。打开电灯，稳了一刻，头痛并不见减轻，但心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清楚，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跌到了致命地方？"想到《血纪》还没有整理，也没打印，今生最起码的工作还没完成。回忆我一生曾经多少风雨和磨难，岂能就此结束？

忍痛从地上爬上床，看看手表，时间正凌晨两点，心中想，只有等到天亮再打主意。

我来劲龙后，刚刚在弹子石一家电力配套厂分配了工作的王玲，曾到劲龙来找过我，想到劲龙来。在我的介绍下，谭总接纳了她，在我所在技术室里担任技术员工作，那时她已结婚两年。我既碰到了眼下这种事，举目无亲的我，只好依靠她了。主意打定，静静等着天亮后，用电话通知她再作定夺。

迷迷糊糊中，感觉头痛减缓了，不知什么时候，廊沿的扶梯口有了脚步声。窗上已惭惭眨出白光，劲龙公司的工人们正陆续起床下楼洗漱。

我用手机给王玲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昨夜我跌跤的事，请她上班进办公室前，务必到我这里来一趟。

九点钟不到，王玲来了，我马上嘱她去药店，为我买回两盒"脑心通"。中午，她买回药来并告诉我，药房的人问起我的情况，关照她说："像这种年龄，头部跌伤，切不可大意，最好能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服药以后，感到头痛已经减轻，并没发生呕吐，说不定就是普通跌了一跤，我命大不碍事。

反正今天还没有去宗申报到，我可以好好休息一天，看情况如何！

第二天，头痛减轻了，起床时除有些恍惚，还能行动。于是我并没有告诉老马我跌跤的事，照常去宗申车间上班，为现场解决了一个三轮车制动管路的铺设，下午回办公室着手三 C 认证标准的起草工作。

如此坚持了半个月，我的头部伤势一天天严重起来，吃药并不见效，白天头痛加剧，晚上睡不着觉，尤其是走路双脚不听使唤，一向以硬汉自居的我，终于感到无法再硬撑下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我向宗申公司告了假，独自一人踉踉跄跄走到公路上，摇摇晃晃的爬上了过路的公共汽车，到袁家岗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门诊的脑外科就诊。

在那里，一位才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脑外科医生，在测了我的血压，翻看我的瞳孔后，嘱我赶快去 CT 室照片，他说我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延误治疗我的生命都会危险。

CT 照下来确诊我是硬膜血肿，我的后脑勺里微血管破裂，后脑勺下部已经积存着大量的淤血，必需马上做开颅手术清除淤血。

我在门诊里接通了王玲的电话，请她赶快到重医来。

下午五点钟，王玲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医生将王玲留下来守护着我。晚上七点钟，我被送进了开颅手术室，这种手术有生命危险，进行手术前，一定要我的家人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但此时，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家人来签字啊？我已离婚四年，唯一的孩子远在成都，这时候，我才感到我行为的冒失，痛感到离婚以后独自流浪在外无依无靠的狼狈。果真我就此一命呜呼，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签字总算由王玲代笔了。

在无影灯下我渐渐地麻木过去，只恍惚地感到手术台周围，几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来回忙碌着，耳边响着手术刀打开颅骨时撕碎头盖骨的声音。

忽然我看到王玲还呆呆的站在我的病床前踌躇，她说："医生不准我离开，要么有人在这里守着你。所以从现在开始，得请一个看护，我要回公司上班。"看看时间已是下晚一点钟了，原来她一直守护着我没有离开。

一个临近病床上的男看护走过来说："每天只要给我二十五元看护费，病人就交给我吧！"我才想到王玲明天还要上班！于是摧她赶快回公司。一连两天，我彻夜不能入睡，头部开刀的地方像一把刀在伤口上不停的扎，我摸摸我的被子，分明感觉到那粗糙的棉布。

见我开刀后效果很差，医生复查的结果证明第一次开刀，淤血并没取淨，而且原来破裂的血管也没扎好，他们决定还要开第二刀。我嘱看护接通了范萍的电话，请她无论如何赶紧到医院来一趟。那一夜可是最痛的一夜，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超离了肉体，从病床上飘了

起来，我想我已经死去，人死后，灵魂便从肉体上出窍，在空中自由游荡。

迷糊中我在空中寻觅着我的母亲，母亲始终没见着，倒是蔡家场那池塘边的老宅见到了范萍，她还是像当年的少女那样迎接了我，我握住她的手说我自由了。可以牵着你穿过山坳河湾去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家了………

接到我打的电话，中午范萍带着她的侄女和同事五六个人站在我的床前，并在我开第二次手术的申请书上签了字。我再次回到了无影灯下，又一阵风吹来，将我飘起的灵魂又沉沉地掼到尘埃，我听见我躺的担架护理车车轮滚动的响声。晚上，当麻药解除以后，我的头部像炸裂般的疼痛，像一把尖刀截着我的伤口，一下！一下！耳边隐约响起范萍的哭声。

我安慰她说："别哭、别哭"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人死只不过是灵魂从原来的躯壳上超脱开来，依附到另一个躯壳上，所以只要你记住我的灵魂，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地方重新相聚，那地方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来生吧，只是来生千万不要重演今生的悲剧。

好久好久，我又重新回到了那四壁白墙的病房里。我明白，我还活着，身旁已没有亲人，范萍她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剩下的依然是那陌生的男看护。

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安慰啊，但是能给我安慰，抚平我创痛的人在哪里啊？头痛加剧，眼前除了天花板便是白色的墙，我只好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打发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第四天，手机的振铃响过以后，电话里传来馨儿的喊声："爸爸你怎么啦，王玲姐才打电话告诉我你跌成脑出血了，我这就请假从成都赶回来看你……"

儿子带哭的喊声使我暗自流泪，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孩子生长年代对生活的追求，与我们这一代相隔太远，他没有按我的希望成才，却被社会夺了过去。

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独自在外闯荡，我对他缺乏理解和耐心，几乎对他失去了信心……此刻我为我没有尽人父之责而倍感痛心。苍天保佑，现在，在我孤伶伶的一个人与死神较量的时候，在我最需要亲人关心的时刻，孩子终于要来到我的身边了，我枯瘦的脸颊上淌下了热泪。

高效的消炎药物和疼痛的伤口日夜折磨我，使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不想进食，只能靠喝水度日，但是体温和心脏证明我的身体能够抗过这场死劫，重新活过来。

第六天，我的孩子终于来到我的床前，他给我带来了苏打饼干，还带来在医学院工作的小陈，他们忙碌的查我的病历和服用的药物，俨然像医生，好像在检查给我的治疗方法是否正确？

吃饭时，他用匙子喂我，问我好不好吃？我看着我的孩子想到他儿时，我驼着他去上学，一边教儿诗的情景。从两岁开始到十岁的绘画作品至今还保留在书柜里，等我康复后一定重新把它们整理出来交给他。

第七天，刘启建终于来了，她一来就声明说是孩子叫她来的。她那人格的尊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不是法院的判决，她到了最后都表示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现在既然已经离婚了，她就不能主动看我了。

回想起来，在我们结婚的十八年中，我一直没有爱过她，活了一辈子也没人关爱，她也够苦的。天哪！"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我千丝缕，天涯地角有情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我是生错了时代，建错了家哪！

我在动手术后的第九天，第一次从病床上站起来，在看护人员的帮助下走出病房，穿穿跌跌的走出病房，那天是阴天，我的语言功能还没有恢复，我多希望有人能同我谈心啊！我记不得有多久没同人交谈过了，当我在医院的花园里慢慢在陪伴人的掺扶下散步，我多么希望有人同我讲话。

下午，我的中学同学申德荣来了，他与我中学同班，从初一到高中毕业。我平反回北碚，常和他相聚。

后来他退休不久遁入佛门，从此笃研佛经，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世间的善根恶果，与风轮法师一样，他以人间因果报应为依据，劝我皈依佛门。

这一次他听说我跌成脑出血，来看我时，专门给我带来了神龛上供佛的水果，和一盒颂念阿弥陀佛的磁带。教我跟着磁带上放出的音乐，每天颂念百遍，自会心里平顺，伤势也会在菩萨的保佑下很快康复。

其实我本来笃信因果报应。若非杂念无法排除，而信守了随缘自生的安排，还在凡间徘

徊留恋，饱受人间的苦难，也许我已随他出家了。

他坐在我的床边开导我说："人生无常，你要切记，就比方说，你突然跌了一跤，肯定是有缘因的，那一刻改变了你的一生，这就是无常。无常不定因欲而烦恼。"

跌跤那天正是我的生日，难道这是佛的警示？他继续说："我劝你抓住这个机会，从此信佛，免去了六道轮回，再不受人间轮回之苦，岂不善哉！"跟着老同学出家山林，在心理上寻找依托，但又怕晚年孓然一身，怕我烈烈一生就此消影山野。左右思来，不得其果！我与皈依佛门失之交臂。

自从申德荣来过以后，我循他教导，每天放颂他给我的磁带，从此以后，我的病床前一早一晚，都会响起悠扬的阿弥陀佛颂唱。就如他的说法，我果然一跤瞬间就改变了我此生的道路。人是多么脆弱，就跌了这么一跤，便永远结束整整七年的打工生涯。

以后，在我病体恢复期间，我的心静下来，成天很少出户，整理我一生的回忆录，最后，完成了《血纪》的长篇整理和打印，我决心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记录这段中共所创下的历史。

从此，早晚在佛的面前焚香、悔过，虽然我心与潘老相仿，时时还有杂念缠着。

第十一章 寻访

1980 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暂定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随着片断的撰写，每当夜阑人静，死难者的音容笑貌都会来到我面前，与我交谈，大致因为我在他们牺牲时走过他们的遗体前留过誓言：“只要我能活着出狱，我定要将你们的事迹告诉全中国，把你们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告诉全世界。”

现在，是该把烈士们的噩耗告知他们的亲人了。

第一节 寻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连他们生前准确的住址都没有，当时又没电话，在人海茫茫中，我与他们又从未谋面，大海捞针，徒步寻访，他们在那儿呢？

根据刘顺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两次去大阳沟寻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据他讲，他的姐姐当年是重庆共青团委的干部，1956 年他被抓进少管所以后，便与那个三代工人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为了不受到刘顺森的影响，他的姐姐割断亲情以求自保，这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普遍的。

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口号下，扭曲人性破坏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灭。我相信刘顺森的老父老母不知为失去亲骨肉流过多少泪！我甚至还相信，刘顺森的姐姐在经历了这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体会中共宣传的欺骗和虚妄。

䦨久以后，在中共法西斯真面目越来越暴露，被扭曲的灵魂也在恢复，割断的亲情必将重新建立。

刘顺森的亲人们，一定会像张锡锟的亲人一样，翘首等待他的归来。因为她们比谁都了解刘顺森，他的聪明，正直和冤曲，他们没有理由死守曾作过的荒唐决定。

如果此时，我把刘顺森的死讯告诉他的父母和姐姐，她们会怎样反应呢？我虽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带着这种心情走进了大阳沟。

整整一天，我的足迹走遍了那里所有小巷，挨家挨户询问：二十五年前，这里有没有一个曾在市团委工作过的姓刘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个小巷时，总是带着怅罔再穿进第二个小巷。最后在一无所获后，只好改变主意，让岁月将她们浮出来了。

寻找皮天明就更难了，在盐源我就没有打听到他家的确切地址，只知道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在渔洞，可渔洞那么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渔洞属九龙坡区，从北碚到渔洞要转两道车，过长江到南坪再转车，光赶路就得花五个小时，所以我特别作了准备，选了一个晴天，早上五点钟乘上公交早班车，天不亮就出发了，直到上午十一点过，我才到达渔洞车站，下车以后，不知该向那个方向找，怀着侥幸去叩开那些街边一间间简陋小屋的柴门，询问有没有姓皮的住户？

依据他生前对他的后娘和兄弟的描述，应当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里所有的巷道，只问得两家姓皮的人家，他们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人，更没听说皮天明的情况。

想到他赴义前，在六队的大监门口临就义前的嘱托，我便挨着大街一户一户的问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虽渺无踪影，但我的心意已尽。直到下午过了五点钟，证明我的寻访失败从回车站，望着灰色的街道，我擦着汗水悻悻离去，再次寄望未来的岁月或偶然机会，将他的亲人们浮现出来。

陈力就更难了，他压根就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的家在何处，只有他被捕入狱时的华龙桥弹簧钢板厂还在，兴许在那里可以问到他的父亲，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钢板厂的门房那里，便将我档了出来，他们说，从来就没有陈力这个人，更没有听到有关这个人的事。

在中国为民主和正义而献身的人怎么这么凄惨？难道他们的家都被毁灭了不成？当然，他们的档案会提供他们的下落，不过，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好在，我的《血纪》有他们的记载，不会让他们在地下默默无声。

第二节 马开先的下落

1979 年的九月我从盐源平反归来后，就一直打探马开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为右派后，这是我心灵上烙下的最厉害的隐伤。二十三年来每次想起，心里一直很伤心。

自从 1958 年我离开重大后，我们就被强行拆开，从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狱。尤其是，我要弄清当年曹英为斗倒、斗臭我俩，是怎样诬害我俩的？她怎样渡过这二十三年，现在又在何方？

当年重大来盐源为我“平反”时，我尝试向郑老头询问过她的下落，但被拒绝回答，79 年回重庆路过成都一直留意寻访，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后来我向重大保卫科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询问她的下落，结果都被拒绝，这就更加令我怀疑，当年给我们的诬陷，定有不敢公开的东西。

受到这种羞辱，而不理会，还算七尺男儿么？

（一）线索

1989 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离别整整三十年的郑业文，她姐姐当年也在北碚托儿所工作，姐妹俩父母早亡，从小进了孤儿院。这次与郑业文相遇时，她已满头花发，相互倾诉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绝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来 1958 年反右运动尾声，七十六名极右份子离开重大去南桐后，郑业文姐姐在托儿所向党交心时，说他们两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县地主，郑业文因此从重大实验室“清理”出来，下放到北碚东阳公社。

开始她在一所小学当教师，文革时却被公社的干部诬为地主阶级的后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

那时她刚怀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连六小时的斗争，残酷的惩罚使她小产，幸好中医院老医生相救，母子终于逃脱了生命危险。

后来她拖着孩子打扫过厕所，拉过板板车，挣扎着渡过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她一边叨叨不绝诉说经历的伤心事，一边痛哭起来。其实她们的祖父早在她们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运动并没有饶过这对可怜的孤儿。

那一次相遇，我问到杨明彦下落，郑业文告诉我："杨明彦自 1961 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过批斗，但遭遇比我好。1987 年四川农机学院改名四川工学院，她就一直在那里任教。当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几乎全知道，兴许杨明彦能提供马开先的下落。"

正好，我厂有一位叫陈孝牧的检验科人员，他是 1967 年应届四川工学院毕业生，是杨明彦的学生，他说过几天他要参加学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我当即拜托他回校参加校庆时，务必不要忘记去看杨老师，并向她转告我的问候。

为了说清我找杨明彦的目的，我专门写了一封简单的信，托他当面转交给她。那封信简单讲了 1958 年我被划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陈孝牧参加校庆后回厂不久，我便收到了杨明彦从四川工学院发给我的回信，在这封整整八篇长信里，她的伤感倾泻无遗，读罢我的身心溶进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贞的回忆。——

"看到你的来信，我久久不能平静"，她写道："一个勤奋好学，喜欢探索，有理想有上进的青年，被整得这么惨，使我万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学时代的校友和兄长，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绩更好"。

少时友人对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给我带来了安慰。

杨明彦也许是我当年同窗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在这封来信中，讲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们大学求学就认识的，她在读书时他已工作，在那种险恶的年代，她俩从大学开始恋爱，终于有了善果，这在同时代人中要算稀贵的。

信中还介绍了她的事业，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机械专家，眼下还带着几个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 58 年的遭遇，她的父亲也在 1957 年划为右派。当时剥夺了他在西农正常的执教，将他放到一家劳改工厂，后来死在狱中。

1960 年以后，她们姊妹三人被拆散，一个流落他乡，一个在工厂做工。唯独她才侥幸从重大毕业，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执教至今。但她没有逃脱文革的风雨，挨斗抄家，对她这种被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对我托她寻找马开先的下落，她写道："历次运动中私心重的人确实害了不少好人，这笔账就算在错误历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点良心和人性，他们自会受到良心责备。你够苦了，去找这种小人算账反而伤自己，不值得"。

无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恳求“历史”惩治那些做尽伤天害理坏事的人，而无法惩戒这些坏人，甚至于连控诉余地都没有，还蒙在鼓里的杨明彦把一切只看成个人整个人的行为。

后来我接连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告诉了我一大窜在成都地区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学地址或下落。其实人的相聚是要讲缘份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几乎没一个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讲几句值得我永生纪念的关怀话！想起他们在斗争会中学舌的丑恶嘴脸，我就对他们感到呕心！。

（二）访少年学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专程去拜访了杨明彦。记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会期间，座落在成都郫县的四川工学院风景格外美丽，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郁。

汽车在四川工学院的大门口停下。走进校门，按照门卫指点的路线，我在教学大楼西侧的一群老式三层楼的楼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从 1958 年一别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多年，从她略呈花白的两鬓中，我仍可以认出她来，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强，以及特别清晰的五官，让我记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样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动。相见一刹那，表面装得十分平静，心里翻腾着复杂的波澜。

她伸过手来接过我提的皮包，一边解释道：“早上我去校门两次都没有接到你，今天又不凑巧，天伦又在开系务会，女儿出差去了湖南，家里丢着两岁的孩子，我怕母亲照应不过来，就没有去车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着她，听着她那毫无惊诧很随便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分别了不久似的。

于是我问道：“我真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来过照片么？我怎么认不出来？”听她这么一说，我也笑了起来，回答道：“你虽然老了，但少女的轮廓还没有脱形，这就叫‘本来面目’。”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忧郁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当我跨进她家那扇已经褪色的朱红木门时，我才意识到原先估计她住的“教授”别墅，同眼前所见相差太远。这套房间还是二十年前的“遗产”，毛泽东时代，大学里的臭老九们住这样的房子已经相当不错了：两间卧室，没有客厅，也没有过道，外面一间放着两张大床和一个两开大柜，这便是大陆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年知识份子的家境。

临窗放着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籍资料和字典，墙上挂着绘图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证明这里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为一体的“教授房”。一张木桌四个凳子证明这又是吃饭的地方，房子里已经十分拥挤，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里屋的，同样是朱红木门里挂着帘帏，门半掩着。主人打开那门，里面同样摆着两张床，床的四周被整齐的大柜子包围。大柜里整齐的插满了各种大部头的精装参考书和工具书，这样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动空间”。

靠门边那床上，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在那里搭积木。当我们走进去，他朝我们望了望，依然聚精会神的在设计着他的“建筑群”。我取过提包，从里面取出那可爱的“唐老鸭”，放在床上按动电钮，便在床上“扑”动起来，还发出“呷”、“呷”叫声，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来，从床中间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试图捉住那“怪物”，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时杨明彦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爷爷”。听他这么教，我顿时感到时间已在中共迫害中，将我们拉成两“代”，我的孩子还只有七岁。

门外传来一声老妪轻声的招呼：“明彦，红烧鸡的酌料还没有买，我这就去小卖部，灶上熬的排骨汤你看着点。”

估计她是杨明彦的母亲，少年时我曾在西农见过，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个招呼！当我跨出过道，便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向楼梯口走去，我连忙喊了一声伯母。她同我母亲年龄相仿，退休时还是西农讲师。

从她苍老面容，可知她过去吃了不少苦，她回过头来，向我点头，明彦介绍说母亲专职在家带孩子。说中国知识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黄不接，其实也未竟然。

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份子“溃缺”的时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识份子依然被闲置一旁，并无他们的用武之地。

现在我明白，杨明彦信上所说的四代同堂，便是讲她的家四代人口，济济一堂于这两间陋室之内的现状。这样的四代同堂，客厅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饭拉屎拉尿，这厨房和厕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杨明彦发问。

她指着过道对面的一个砖墙砌起来的小屋说：

“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每层一共十间房子，新建的教学大楼竣工后，学生宿舍搬到西侧的教学大楼南面。这些腾空的旧房子便加以‘改造’，将两间房中间打通，增加了一道门又封掉了一道门，成了一户人家的一套两居室，用来分给老知识分子住。临时过道上又搭建了小厨房，浣洗间和厕所，两家共享。”

我走进了那两家共享的厨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里面放着一个炉子和一个烧木材用的灶。那炉子上的锑锅里，正溢出排骨汤的香气。这种住宿条件，与我在 80 年初回重大时所见右派的家情况相似，至今十年来依然如故。

他们在极不公正待遇，在歧视轻蔑里，仍保持着那勤奋的韧劲，无怨无悔的劳动着。有诗云：“阳和不散途穷恨，霄汉长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九十年代，中国的大款已纷纷上市，住的小洋房，驾的小汽车，请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园，高档生活设施应有尽有，还要养情妇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钱权交易，随手捞来，八旗子弟们发福得轻飘飘的，从八九年的六四民运以来，更感到这特权不可丢失。

现在对“姓资姓社”的无聊争论不感兴趣的官僚们，只盯着权和钱，活得快活的人，不屑于知道创造财富的下苦力都市劳动大军；也不屑于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和专家们，在怎样条

件下奉献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 1979 年回重大时，已瘫痪的钱企范教授。

可惜，中国知识阶层这头“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挤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像正常人那样反抗施暴者？却以德抱怨。

“过去的就不谈了”这是我的旧友们共同的口头禅。

能不谈么？能不知羞耻么？能不知雪恨么？能做一辈子忍字当头的顺民么？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一个断论，就陷死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生？他说“知识份”子是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谈话间，忽然楼下传来了喊声：“杨明彦接电话”。她向我做了一个歉意的手势，便匆匆下了楼。我再次环顾了四周，暗暗自问道：教授也够可怜的，不但身居陋室，连电话都没有一部。

两分钟后她上楼来了，带着无奈对我说道：“真对不起，本来今天，为了你远道而来，我专门请了一天假，但连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刚才系上来了电话，叫我把资料室的钥匙拿过去。”

她的母亲刚从副食店回来，不声不响的独自到厨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里教她的小外孙玩唐老鸭。

大约十二点钟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们互致问候后，便忙着将她母亲已弄好的菜淆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这个“远道”来客没有外人，相互之间没有拘泥。一到吃饭照样会与十年前联系起来，大家都是饥饿年代的过来人，对那段数粮票过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较起来，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间，她告诉我，她已问遍了过去重大毕业来成都工作的同事，他们并不知道马开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过在成都科技大学机械实验中心工作的杨治国认识马开先，而且是马开先的远房亲戚。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得到马开先的一些下落？

杨治国是我在重大同一专业同年级的同学。在重大时，因为诗歌文学创作方面爱好，我同她都曾是重大业余话剧团的成员。1956 年的暑假和寒假，我们还在重大话剧团的组织下，去重庆市话剧团受过培训，在参观了当时该剧团采排的曹禹名剧“雷雨”时有过交往。

在杨明彦家吃过午饭后，便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转了一下校园，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便向她道别，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杨明彦提供的电话先给科技大学挂了一个电话，证实杨治国确在成都大学的机械实验室里工作，并且这些天没有外出。

吃过早饭便乘坐公共汽车外环线路南进，过了九眼桥，大约九点钟，我已顺利地走进了

科技大学的校门，并在门岗指点下向学院东侧的中心大楼走去。

当我走上实验大楼门口的石阶上，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在他带领下，我走进杨治国的实验室，见一位穿着白色大挂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两个年轻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试验机前。引路人指着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学生时代一别至今整整三十三载，眼前的她已两鬓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乱世后，和杨明彦一样，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里忙碌奉献，若不是因为我突如其来的寻访，恐怕我们今生都难以重逢。

按学校规定，工作时间谢绝会客，但她破例转过身去向两个年轻人交待了几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会议室就坐，我明白，虽然是久别重逢，但这里不是畅说旧事的场所。在递出了我的名片后，简单介绍了我现在工作和近况，听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声长叹伤感的说：

“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经啊。”这简单的感慨已勾画了这三十多年来，她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来意后，她走出会议室，两分钟后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告诉我说，马开先现在何处她不知道，但她有一个亲堂弟就是名片上的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说不定他能告诉你。

那名片上写着马开运，工作单位是成都气象学校总务处。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寻找，我终于在浩如烟海的人流中觅到了她的踪影。

从成都科技大学乘公共汽车奔气学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想这些年，我在中学同学中每次打听马开先下落，就听他们说我和她的种种诽闻，这些诽闻，全是曹英们为批臭我们而编造的！

至于我的冤情和当年事实却无人说起。他们宁可道听途说，为什么不顾事实和受害人长达二十多年痛苦，起劲向受害人伤口上撒盐？也不愿为被害人说几句公道话！

母亲听到这些谣言，劝我再不要找马开先了。

然而不明真像的人还在向我身上拨脏水，就越坚定了我揭示真像的决心。虽然我将拜访的是马开先的弟弟，这个人会持什么态度我心中没有底。

十一点钟我在气象学校的门房里，马开运的爱人接待了我。当时这位女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我的来意。当时该校正在建设，建筑承包人经常到总务处找马开运。

那女人热情的招呼我，忙着请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诉我说，马开运今天出差到龙泉驿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向她说，她会如实转告的。

于是我只好向这位从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隐私”。我预计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马开先的下落，至少也会把她现在何处告诉我。

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令我吃惊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脸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

起来，原先谦和的态度倾刻变得凶恶，充满敌意训斥道：

“最好你别再找她，你还嫌当年害她不够是不是？你现在听明白了，她已经有家，有儿女，她恨着你，也决不会再理你，你还是走吧！”

在这突然变化的脸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绝的可能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听她那种对我和马开先的事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敌对的口气，使我的心凉透了。

面对向我拨来的这盆污水，我太难堪，看到办公室里另外两个年轻人，都莫明奇妙的看着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嘴巴也像被堵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怀着一股被羞辱被驱赶的恼怒，我从坐椅上霍的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出那学校的大门！

此刻我的脸热辣辣的，好像被刚才那女人狠狠搧了两耳光。愤怒和羞辱顿时集中到刚才这个毫无教养的妇人身上，却又骂不出口，无法渲泄，小跑着向车站走去。

这一次算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课，哪怕在大陆这块灾难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也只给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饭吃而己，八十年代，一度兴起的“伤痕文学”，用被害人凄惨遭遇，也只赢得善良人们的一抹眼泪。

只要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被推翻，那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没有拿出来公开受到揭露审判。在平反中还有一堵：“不要过多纠缠过去，而应向前看”的墙，严严实实堵着国人省视历史的视线，公开说：“反右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受害人悲惨的过去永远不会得到昭雪。

受害人对自己被害在那里都没有弄清，怎么平反？

与全国千千万万被害人一样，我同马开先这段被当局封杀的冤情，其中必有他们不可告人的内幕。我持续几十年努力寻找她，就是要找到当年受侮辱的原因，揭這层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车，想到“平反”后奔波已快十载，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的时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诽谤之声：“你还嫌害她不够是不是？”不断像炸雷般响在我的耳际。她那话是代表马开先本人，还是代表她的家人？

从中，我可以隐约感觉出，这些年来马开先被中共糊里糊途整得生不如死的惨景，也许只有这种悲惨的遭遇，才会强烈的震憾着她的亲人们，也才会让她的兄弟媳妇有如此“一触即发”的愤怒。

上有毛泽东，下有曹英，统治着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那来的生路？我不知道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认识？所以寻找马开先将这段被中共掩饰的罪恶真像公诸于世，不但是关系我和马开先个人的事，也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晚上，我没有心情去杨治国那里作客，按照她给我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没有提及马开运的妻子那令人咀伤的“接待”，只告诉了她，马开运因为出差没有碰到，因为我将回重庆，在成都该办的事还得抓紧办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后若有机会到成都来，一定挤出时间拜访她。

（三）意外得来

说来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牵引，两年以后的春节，在邀约重大当年赴南桐监督的右派同学小小聚会上，我在王泽庸家里获悉了马开先的下落。

原来，正逢 1990 年 60 届重大校友毕业 30 周年纪念，重大校友会，曾向全国各地同系同届校友发出回校团聚通知，10 月中旬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校友重聚饶家院，各诉三十年来的事业和人生遭遇。

王泽庸回忆其中一名来自西北的女同学，在聚会的第二天晚上自由发言时，讲到当年她被划右派而遭受批斗侮辱，声泪俱下，控诉了当年机械系六〇届中共党支部委员曹英，对她的胁迫和威胁，她因不堪侮辱而逃离学校，于是被开除了学藉。在生活无着，万般无奈下，嫁给一个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泽庸还告诉我，机械系六〇届的同学，总共六百多同学，当年划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这次参加这难得的聚会仅只有十来人。

这种聚会，不可能专门反映那个年代里令人伤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记载他们的血泪仇恨。仅仅几个人的哭诉，已把聚会带到了那个血腥年代里。

曹英正好就是当年这个年级中共支部委员，同学们纷纷控诉这个对无辜学生的迫害狂，为了疯狂捞取政治资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泽庸回忆说：根据这位女生的揭发，曹英对当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女生，进行肆无忌惮的调戏和玩弄。毕业时，利用决定毕业生分配的政治评语，强迫她们同他发生“初夜欢”，居然把中世纪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带到校园里重演!。

从北京来的同学告诉大家，文革中曹英调到北京某机关，因为恶习太深，兽性不改，被人打断了了脊梁骨，已直不起腰，终生残废。所以，他不可能来参加这次聚会，逃过了这次当年被他残害同学们对他的控诉!

易曰：“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癞皮狗拖着一生罪过，最后怎么到阎王老爷那里去下地狱，了结肮脏一生啊!

听王泽庸这段叙述，我想起当年曹英组织对我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式斗争，硬逼着我按他的意思，编造与马开先的“不规”行为，以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来他自己就是实足的禽兽。

直到我入监后，他那狞狰的嘴脸，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有人说，在这个暴虐时代，“趴儿狗比主人更凶狠。”在那个年代，类似于我的遭遇岂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党专制存在一天，这种罪恶还会不断发生，像曹英这样的禽兽还会公开的加害无辜者。

王泽庸所讲的西北来的女同学，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的她？

我问起他当年聚会时的同学通讯录，他便从抽屉里找出来给了我。

我当时就在这本同学通讯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后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肃兰州西固区第二十一中学，在这本同学录的最后一篇，《重庆大学机械系 55 级毕业三十周年活动纪录》中写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兰州市西固区政协副主席，一级教师马开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想不到她已离开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兰州，过着"名人"的生活，她是怎么会从右派奴隶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还是她的亲人中有中共的新贵？我却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泽庸，我恐怕还不知道那年那月获此信息！尤其是马开先不是因她以甘肃省人大代表，在这种会上涕洒泪流的"介绍自己不幸的经历"，怎么知道至今我所获悉的这一切？缘分吗？巧合吗？

也罢，既然马开先的下落已经找到，不管她现在的情况如何，我都必需马上与她取得联系。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提笔给她写信。

当我发往兰州的信过了十来天，我终于收到了从兰州寄来的"回音"。

当我拆开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识颤抖！她那弟媳妇尖刻的警告声，此时又回荡在我的耳际。

"我几乎是在痛哭中读完了你的来信"，她写道："收到你的来信整整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泪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现在又一滴一滴地洒落在这一封长长的信纸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离开了重大，我当时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时我真想得很绝，真想找你拼命，一刀杀了你再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说毛泽东是杀人狂，他的杀人不但在战场上，在刑场上，在监狱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斗办法，制造出人和人间的自相残害。

马开先兄弟媳妇的怒斥，不应说完全无理，在"阶级斗争"年代中，有多少子杀父，夫杀妻，兄弟相残的悲剧啊。马开先当年对我如此的愤恨并不足怪，要怪就怪我们生在这万恶的毛贼东时代！

此时此刻，如烟的往事，唤起了有关她的一段回忆：

鸣放初期，在正义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为她的一位长辈，鸣冤，伸张。据她介绍重庆钢铁公司一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间被认定"大老虎"。为逼迫他们承认大笔贪污款项，双双隔离审查，毒打折磨了两个多月。两人不堪冤枉和羞侮，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监押他们的人不备，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倾盆，两个走投无路的人在雨中抱头痛哭一场，便双双触电自杀。丢下两个女孩，大的六岁，小的才四岁，无人收养，被送进了孤儿院。

两年后，事情终于水落石出，这对夫妇并没有贪污劣迹，可是，当时的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拒绝对他们平反，反诬他们“革命意志不坚定”戴着“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永远的含冤九泉。两个孤儿，也不知如今流落那里？

不过当时的马开先，并没有看清这一点，仅仅出于正义感，站在同情受难者的立场上“帮助党整风”。在大鸣大放会上她赢得听众热泪横溢，也成了她“借题发挥”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

死者的“冤”没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进去，成了连环冤。中共统治下，正义被蹂躏，这又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例证之一。

批斗我的时候白天开斗争会，晚上派人轮流守着我，按照他们已定好的罪名强迫我写“交待”。因为几夜没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刚刚闭上眼皮时，他们就用预先准备好的竹棍敲我的头，用针扎我的脸。五天五夜下来，我的头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写的交待写了又被他们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写，直到第五天我实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们口授的东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来时，我还睡在反省室里。

就这样，年仅二十岁的我，被逼着开始了我长达二十三的冤狱之路。至于当时交待中我写的是些什么，已全然忘记，当我听说，我写的材料重重的伤害了马开先时，我便负着良知的重枷。

对马开先的诬害，恐怕是曹英最恶毒的绝招！！中共的无耻，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气喧，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窦娥虽含冤而死，但为此东海大旱三年。民间传说在临刑前，伤心过度的窦娥，怒撞在侩子手的尖刀上自尽。古来的烈女，节妇比比皆是，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还少了这样的事吗？

而曹英三十年后成了爬不起的一条癞皮狗，天道是怎么编写人间故事啊！

写这封信触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经历时，在信笺上留下了两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述。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切“魂”之痛，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一触这伤口就会流出血来。

她从此就没有和机械制造专业沾边，她流向社会后的经历没有写出来，使我无法为她这段经历落上句号。

信中接着介绍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张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儿子承包了一家车辆维修店。

她一共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已成了家，一家人过得挺平静。阿弥陀佛，慈悲为怀的佛

祖爷在她身陷绝境的时候，将她引出了重大这块是非之地，引到了这北国古城，重新给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给了她的家。

来信的最后，她还告诉我，九〇年，她所以不辞千里迢迢的专程回重庆参加同学聚会，主要正是寻访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开会期间她问遍了到会的同班同学，可惜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我的下落。问到重大党委，他们故作惊讶回答说“不知道”，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诗·国风·汉广》有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苍天安排人间的缘份阴差阳错，更堪统治者故意的搅乱！处在音信渺无的她，唤起的岂止心灵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埋在那里？他的这本悲剧怎么没有一个结尾!曾经爱过，却被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无缘无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后，天涯各方，你在那里？

从此又负着心灵的责备！这责备会有尽头吗？到了生命结束时，这责备变成了悲歌长泣，她因不能弥补，而把这段永生的恨唱出来，哭出来的呀！

“现在突然之间，苦苦寻觅的人从远方寄信来了。还是北碚，这令人断肠的地方!!不是说你早已离开了那里？怎么你又回到了原处？拿着这信，怎不使我伤伤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从此以后，我们万里尺书，遥寄着向对方的祝福。“雁来音讯全无，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她来信还介绍了她眼前的生活，说她因为身体很差，有几次几乎因心脏不好而死去，现在满头已布满了银霜。

后来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学长寿秘功，受益匪浅。93 年还随甘肃省人大代表团，到了青海省塔尔寺拜了藏医院长扎西活佛为师，并皈依佛门，成了俗家弟子，长期素斋。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人生自此，已近归途。搬着指头，年已五十五矣，但经历年轻时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领悟了人生苦谛。

后来，她来信告诉我，她长期练功显了奇效，白发转青了，精力充沛。还练了一身好功法，常常为他的家人挚友发功治病。但凡邻人相求从不拒绝，不收分文，只图善缘。

当我告诉她我患严重的气管炎而苦恼时，她便抄摘了一篇长长的气功疗法，嘱我贴在墙上对照着早晚修练，还介绍了很容易制备的药方，用她介绍的方法，泡制服用。

这正是“寄身但忧兰州远，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遗慎风波。”（刘长卿诗）

97 年一封信，告诉我她已退休，并说苦了一辈子，晚年希望搞一点实业，以资儿孙们的不足，这封信整整写了一篇，介绍了兰州的地理风貌，把这座甘肃走廊上的古城，描绘成了瓜

果满市，绿茵成林的西北乐土。

说兰州尤其适易住家，并恭候我去兰州一游。

兰州乃我国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汉时期张迁和班超都曾经过这里，我虽然没有去过，对这座沙漠上的绿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象到她的美丽。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王之焕的“出塞”，以及宋明许多大诗人的诗词遗作，也许赋出了身在北国的马开先的心情。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小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落根兰州的重庆女孩，是思乡情切而产生自我安慰，还是兰州真的那么美？

我在电话中问她是否打算回重庆，与我今生作最后相见？她笑着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爷的安排了。”我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都下了决心，今生相见完全是可能的。”到2003年抠指算来，我俩已分别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这段封存了近半个世纪可悲可叹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对其中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极想将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写出来，向我的读者们作一个更完整的交待。

当我告诉已经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们的悲剧写出来时，她却反对我写这本《血纪》，说我逆缘，走远了，阿弥陀佛……！在漫漫黑夜里能熬过来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选择逃避是很自然的。

后来我们就再没相见，这样了结，算不算演完一场有始有终的悲剧？

在这个中共一手导演的悲剧舞台上，暴力和恐怖扼杀了多少人性？被践踏的美好东西不能恢复，受害人选择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第三节 王大炳和他的女儿

回重庆后，按留给我的地址，给王大炳发出的信过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长寿后，当年她的女儿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样辛勤劳作，总算能图一个果腹，近年来他又自己打土胚，筑墙，建起了能让一家人遮风避雨的窝。

在盐源农场，大家因他的勤劳管叫他犾牛。信上告诉我，他原来的判决，是以叛国投敌作结论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对他来说，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土地上当牛马。

来信告诉我，今冬岁末农闲时，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一叙久别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场迎接了我这位患难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车站下车后，找不到偏僻角落里的二十四中，所以预先和他约好了时间，他到蔡家场以后，我到车站去接他。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车站上足足等了他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从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地地

道道的“老农”。

他身穿灰色补丁的棉衣，脚踏绿色的解放鞋，由于终年的劳累和省吃俭用，那干瘦苍老的脸，高高突出的颧骨，颈项上黑黄的皮肤裹着深深的皱纹，下巴被树皮样干燥的皮肤拉得长长的，配以压得略弯的腰，榨干了油似的双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展出的两尊屹立门前呆望天空，手里柱着打狗棍的老农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刘文采压榨出来的，而是中共强迫“改造”出来的。

正在下车的他，手中提着一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还小一岁，正逢壮年，但那样子好像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大约五年没有相见，相逢第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比之盐源他新婚的岁月，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过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叙六年前，给我的母亲送信和带来一包瓜子的情景，指点着所经过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变的地方。我说：“世道变了，现在已不是当年，吃的东西并不缺，你不该路远迢迢带这么重的东西来重庆！”

他说自己土里一点绿豆，算我对你母亲一点心意，他对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着他的脸耽心的说：“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劳累，不要太节俭，留着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孩子要你抚养成人，千万不要还像犾牛一样的干，身体拖跨了什么都没有了。”

算来他的大女儿已经六岁，小儿子才四岁啊！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医院，因为他曾来过，所以并不陌生。

母亲早已在她的房间里等候了许久，今天特别买了很多菜。吃中饭时，她还回忆当年大炳送瓜子仁来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当时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他给我送来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希望。

吃过午饭后，我俩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们促膝谈心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去成都探看张锡錕家的经过，还告诉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渔洞、化龙桥、大阳沟等地寻找陈力，皮天明，刘顺森的家。告诉他，由于中共的封锁失去联系的人寻找很难。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并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并且预约，成为我第一批的读者。

当我问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难时，他说，这几年，原来的茅草房要重新盖瓦房，更换破

烂的家俱和农具，给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时称盐打油、买种子化肥都需要钱。眼看明年大女儿就要开始读书，孩子们的学费全指望他在农闲时候替人帮工，换点力钱。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补疤棉衣，便将我的衣服，翻出几件来送给他。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暗暗替他悲哀，这是一个经中共长期炼狱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内心里那一团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胆忠心永不会泯灭。

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钱，虽杯水车薪，解除不了他的贫苦，但总是我的一番心意，叮嘱他明年岁末农闲时一定再来我这里，那时我写的片断就更多了。

从此以后，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交往，看到他们的信更使我想起狱中的经历。

远在长寿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时间给我寄信来，问侯母亲的身体健康，谈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直到 1986 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帮助下，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以后每年秋收完结，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归来，途经重庆都要来我家一聚，人虽穷而情谊浓，每次相聚如亲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谈国内外大事，有时我们一起到潘老家共聚，畅谈。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王琳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那一端传来了她断续的哭泣声。告诉我说，她的父亲因煤气中毒身亡！

闻此噩耗，我吃惊不已。三个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绕道重庆时还来看过我，当时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体没有原来利索年龄不饶人，远离家人更要小心。

没想到，意外厄运真缠上了他。

现在他丢下妻儿，在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没有马上身亡，煤气把他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学校通知他的妻子时，一家人才匆匆赶到北京。

他这一走，丢下了两个孩子，长女才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亲朋都是些穷苦农民，加上在这个人情菲薄的年代，谁又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倾力相助？在边远的农村，娘儿三人活下去更加艰辛。

可恨的，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不知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着眼泪将行将咽气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车，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庆。

刚下火车，王大炳便闭上了他的双目，与这个奴役他一辈子的社会永远长辞了。悲痛欲绝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车站附近，草草办了丧事，将他送去石桥铺火葬。

他的离去，使我痛失一个可以交心的挚友。他那诚恳，质朴的语言，干瘦的外形，都会唤起我内心对他的无限思念。

也罢，大炳逝去，从此再不为儿女牵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对不平世道愤懑不平了。

面对他丢下的孩子，王琳正面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中专或高中的学业关头，按他母亲的意愿，只要她在初中毕业后，能在城里谋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才只有十四岁，就必须应付世道里处处潜伏的危险。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竭力支持她读书，至于经济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资中省下一部份来供她。便当着她母亲的面，承诺了帮助她继续求读，至少也要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这许多年来，在中共统治的天下，天天耳闻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对受害者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渐渐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时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讨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没有去做。

听王琳母亲讲，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学校，因暖气烟道前年堵塞，并未疏通，所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人死后只付了她们母女仅八千元了事。为亡友，为他的孩子向学校讨公道，索取应赔的损失，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中共把保护劳工权利，口头上唱的比什么都重要，而实际上看看他们制定的劳工权利保护法，便知道他们的虚假，公认的劳工基本权力，中共并无可行办法给以保障，连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所得的赔偿也是低得可怜。

为替王大炳讨回一点公道，为王琳向北京用工单位多争一点赔偿，我到我厂劳动人事处借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贯彻劳保条例的细则，想找到一点关于用人时，被雇佣者死亡或工伤致残，劳动者可以诉诸法律的条款。

遗憾的是，劳动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只字不提劳动者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规定，以及遇害时，如何索赔的条款。

只有一段“职工因病伤死亡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职工在职期间因工死亡的，用人单位除承担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住院费，补发十五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抚恤费；承担死者治丧的全部费用；……其配偶在农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劳动力，应由所在单位给与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补助费，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单位承担生活补助费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据用人单位说，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资仅 400 元，十五个月工资只有 6000 元。而给与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补助费，在四川省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每月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

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是连吃白饭苟延生命都不够的。

8000 元拿给三个人用来买粮食吃，能维持多久？何况大炳一条人命岂可以八千元了结？当然，这比草菅人命的毛泽东时代，算“进步”了。那时，像大炳这样中毒而死的五类，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抛尸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据，只好按“劳保条例”中的抚恤标准，找用人单位算账，看能不能多争到一点抚恤金，以救救将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想到这里，便提笔以王琳的口气，写信给那所学校，一面据理陈述有关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对死亡职工的抚恤规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算，一次性需要这所学校所付出的抚恤金，至少需再补一万的费用。

写完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王琳，嘱她将原件保存好，一次性复印三份，一份挂号寄给那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如果这位校长抱着不理的态度，则可以将其它两封向劳动部投诉。当然这些信都只能抱着试的态度，因为，这种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会重视的。

两个月后，给学校发出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答应再增加三千元抚恤费作为一次性了断，面对这种“软打整”，王琳犹疑了。

她说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琳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同时马上就是初中毕业生考试，孩子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竞争，据她说长寿地区当年初中毕业生要求考中专的学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专学校招收长寿农村学生的总数不到一百人，在这场竞争中她必须取胜。

她说“爸生前对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长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让我上学，现在他去世了，考大学受经济条件限制，唯一只有应考中专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从学校毕业后得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暂时只好将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试以后再作计较。

其实她已经在舅公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追索父亲死亡赔赏的念头，无可奈何地了结了这场人命纠份，在中共专制时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后以 1.1 万人民币了结了，在中共眼里普通劳动者人命多么贱!!

1996 年夏天，在长寿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专的考场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录取 96 名的高难竞争中，沉着应对，以总成绩 486 分，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农村学生的苛刻录取线 440 分。

但是在如此优异的成绩面前，她的面部没有任何兴奋。在她那孩子气脸上不但布满了倦容，还忧虑的告诉我：她报考第一志原的学校已半月，一直没有发来录取通知书。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重庆市工业学校有没有相识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种自己不能克服的困

难困绕着。

在我追问下，她终于告诉我，这次报考她填写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工业学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数时，她的中学校长特别叮嘱道，重庆工业校是重庆市经委主办的一所重点中专学校，因为该校包毕业生分配，所以是重庆报考生最多的一所热门学校，考进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类毕业生常受用人单位拒绝女生的影响，所以工科专业，女生被录取的机会比男生更苛刻，过去长寿地区常常发生女生上了录取线，没被录取的事。所以请求我设法与工业校疏通关系，说关系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数线，也有被落榜的危险。

像王琳这样远在长寿偏僻农村里的女孩子，那来与工业学校攀亲沾故的关系？万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尽弃回家务农，要未交足两万元读该校的议价生。两种后果，对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亲为她读书连老命都丢在异乡，还不是让她能走升学这种唯一前途，她从小刻苦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背米上学交学费；放学了打猪草喂猪；内衣烂了也没有换的，补了又补；做作业把其它同学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打草稿。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钱去交议价费。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烙下了铭心印记，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想在求学中找到一碗饭吃的穷孩子们，最痛苦的事。报纸上每年都有这种因考不上学校的考生，走上自杀轻生的消息。

事不宜迟，病笃乱投医了，王琳在几个亲戚的商议下，在老校长的建议下，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千元，这可是她父亲的丧命钱，用这钱买了烟酒之类的常规“礼品”，战战兢兢怀惴着剩余的几百元钱，到重庆找到了工业学校。

工业校已放暑假，就连操场上也没见几个人影，怯生生的她跟着老校长，找到了往届长寿中学毕业后就读工业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为王琳介绍现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林老师，据这位李同学介绍，报考同学只要上了线，都可托他来决定入校的资格。

于是老校长和王琳跟着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师住宿楼。不巧林老师放假后回乡下老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这位校友答应林老师回来后，立即办这件事，劝他们暂时回长寿听候消息。

王琳回到长寿，在焦虑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业校的录取通知，仍杳无音讯。王琳心中想：是这笔私下交易出手太轻，还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节？乡下又没有电话，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娇阳下天天往学校跑，犹如热锅的蚂蚁，经过发奋努力考试成绩名列前矛的她，还要为求学送礼，撞后门！

又等了十天，她终于耐不住，再度从长寿乡下来重庆，这一次跑来求助于我了。学校在国家统一下达招生指标外，增收应届落榜生的规定，称之为“议价生”，教育上的投资，大陆向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学校招收议价生的“正当理由”。

我不知道这种议价生的招生人数和价格是谁定的，也不知道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兴的。

只听说收议价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学的一种措施。大陆实行一胎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一个独生子，特别是贫穷的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唯一独儿进得一所较好学校。

在中共毛泽东时期穷怕了的臭老九们，盼来了发财的好机会。议价学校遍地开花，教育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之一。古时候卖官鬻爵是可杀头的，而今中共领导下，文凭变成了社会主义流通中特别的商品。当然双方都心甘情愿本无可非议，不过买方往往成了无力支付的穷人。

而且“文凭”不是日用的商品，买卖文凭这种公开的腐败在中共后集权时期的猖厥，窒死了求知识求本领的学风。

中国是一个文明教化的国家，自古我们祖先办教育是以“修身，致知”为目的，古来圣人办学完全是为了修好社会风气的。提倡苦学，以立身为本，老师也只满足于束攸之礼。

而今文凭既成了进身的通行证，成了有钱人眩耀自己的阶梯。办学的人也从事贩卖假文凭的勾当，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报上偶然看到对买卖文凭的批露打击，那是行骗者搞得太不像话，拿个别人开刀做做样子的。学校都这样，教师收取学生贿赂，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敲诈学生便一点不奇怪了。

令王琳烦恼的就是为了求学的这份礼该送多少？这是不比商场上的商品，挂着“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使买卖双方都明白的。送给老师的这份礼，其多少也要根据求学人数变化的“供需”关系来调整，俏时可以几千元，溅的也是几十块。

再加上，这种议价为世人所不齿，需要遮遮掩掩进行，王琳再烦恼也只好委屈着忍受，好歹这也是社会主义特色一绝！

不过，已经付出去了一千元，穿着拣来的比自己大两个码子很不合身的花裤子，对于刚跨进城里，在工业学校的大门口徘徊的王琳来说，就是一笔了不起的巨大开支，要知道仅仅这么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抚恤费十分之一的数目，是长在农村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开头讲元朝未年有一个叫王冕的少年，他十岁时就给人放牛，因为他七岁的时候父亲早逝，母亲为人做针线活，供他到村校读书。每天黄昏回来，放牛的东家给他的一些鱼肉，用帕子包好，带回家孝敬母亲。白天放牛时常骑在牛背上，画池塘的荷花，日渐成名。

长大以后，他常常以自己画的荷花拿来集市上换些柴米，后来有人发现他不但才艺高超，且胸襟开阔，便举荐他去当官，王冕却为了逃官跑到山东济南靠测字绘画为生。没有好久，明朝改代，礼部拟定了在民间行科举考试办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试，以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士。

王冕说：“这种科举制度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以此为进身之道，必会把文行出处也看轻了。王冕后来隐居会稽山中。

古人连科举制度都有非议，而今天却兴出来贿赂作弊。王琳既然跑来求助我，也是天有

巧合，工业学校校办工厂的厂长陈明生，正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八六年我和陈明生在同学会上重逢，当时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人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现在王琳入学的问题正好请他出面帮助疏通。

当我接通陈明生的电话，告诉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应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带着王琳匆匆地乘车赶到了化龙桥，在工业学势校教职工的宿舍里，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头发已斑白的陈明生。

自上次同学聚会后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老同学尤其显得光阴摧老。他告诉我，他刚刚才退休，校办工厂和学校的大小化验室他都没有介入了。今年招生办公室负责的教务主任张某正是他的学生，向来关系处得不错。

当我讲到当今社会上教育的种种丑恶现象，生活在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当即表示，现在不是评论中国教育危机的时候，而是要赶快落实王琳入学的具体问题，于是他又亲自带着我们去到了张主任的家里。

张主任的爱人接待了我们，但她告诉我们，张老师去成都招生还没有回来，估计要下周才能回家。陈明生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把王琳的名字、考区、准考证的编号以及所考的分数全部写在上面，拜托这位张主任务必关照。

便条写好，交给了张夫人还一再地嘱托张夫人等到张老师回来后，务必落实这件事，这么一来王琳的录取才算是有了着落，但终究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回到陈明生的家里，我把和王琳父亲同我在狱中多年交往告诉了他，他感叹说，现在人和人之间感情的空间已越来越窄，社会上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很淡。”

教师为了多捞几个违心钱，与学生关系搞得如此庸俗，仔细想来难道不是中共统治设下的隔阂么？师生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情丧失，人与人之间全是势、利关系，何等可悲。

当我们起身告辞后，我嘱王琳暂时回长寿家里，好好的休息几天，准备好上学的行李和学习用具。中专学习的时间足足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所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固然我可以帮助她，但必竟是有限的。

大约十几天以后，我终于接到到了陈明生的电话，告诉我，王琳被工业学校正式录取，我问老同学需不需买点礼品，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如此，他和这位教导主任纵有师生之谊，也该随着俗流有所表示。否则王琳就是被录取了，今后还要拜托工业校的老师和校长们对她多多的关照。

他在电话上说：“不必了，否则也太小看他这位老同学了。”但是他关照王琳先前送的礼也不要再去追究，礼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况收礼的林老师今后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后三年的学业中，不但要依靠他对她的关照，还要在三年以后的毕业评语上得到他的肯定，千万不能得罪他。

但我还是主张找个适当时间，大家认识一下，就在附近找了个干净食馆吃顿饭聚一聚，一来为王琳顺利入学庆祝一下，二来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亲向学校拜托王琳今后三年中学业顺利，陈明生同意了。他们把聚会相识的时间订在该校开学的时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学校来给她付开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王琳在得知她被录取的消息，究竟高兴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万万个类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会得到她这种比较满意的结果，中学毕业升入中专，以及今后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开学前三天，王琳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来到我家，那包里装了一袋绿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块农村的"老腊肉"，满脸汗水，脸蛋涨得通红的王琳向我解释说："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本来还想把家里的几十个鸡蛋带来的，但我实在拿不动了，再说路远迢迢的，鸡蛋在汽车上又容易打烂，所以我没带。"

我知道在偏僻的长寿农村，她送来的东西恐怕要算农家最值钱的礼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对王琳说"你母亲对你的用心，你应当牢记，这些东西，你在大热天这么老远的扛来，谢谢你妈的心意，但你还是带到学校去，酬谢一下你的陈伯伯吧。"

后来我知道，陈明生也没收她的礼物，最后还是送给了班主任林老师了。

后来，陈明生告诉我，他已问过张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礼给林老师这件事，张主任说林老师压根就没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陈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进工业学校的校门，并坐在课堂里上课，恐怕还是一个未知的事。

后来为托付王琳的入学和学业，我曾两次去过林老师的家，在他的家里家庭电影，柜式空调，国外进口的高级 VCD，讲究的家具摆设，应有尽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里希罕王琳带来的一包绿豆，一块腊肉啊。想到可怜的王琳连内衣都没有换的，我心里真有说不清的滋味。

听这位林老师说，他除了工作外，还兼任好几个业余的职位，他拿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某机械进出公司的推销员。

因穷而逼出来的致富狂热，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动下，对穷得上无片瓦的中国人，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尤其是像林某这种人，邓小平的政策意味着一个富人集团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古人说："人无横财不富"。

所以现在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这种从更穷的人身上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这可是中国人中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无疑是文革道德堕落的继续，有这种行为的人，怎么能担当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使命？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经历毛泽东疯狂的摧残已完全堕落，人们以随意的骂人打人为习惯。以公开枪劫为乐事，社会道德的危机日趋严重。接着就被一群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机，可说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危机。形形色色的腐败以及公开的损人利己已严重

腐蚀了青少年，据报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龄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低了三岁，1999 年公布的我国青少年作案数，占整个刑事案件的 19%，并以偷、盗为重点。

先前还有在报章媒体上发一点“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渐渐的淹没在“怎么发财”的嚣声中，人们似乎对社会的堕落感到麻木，当局更担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呐喊会引发六四的回声，会因此而动摇中共统治的大厦。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口号，就像包着无数腐肉的侬包，越包越烂，人们耽心，为维持一个腐败政局的稳定，究竟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们古代的哲人主张内心的修养。把修心养性当成教育的出发点，百年树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业，被一群打着“解放中华民族”,“砸烂封建礼教”的革命家们糟踏得一无所存了。

当然，王琳送给林先生的礼物，既无聊也无知，然而这恰恰是被社会看作可行的途径，林先生对给他送去的酒和烟不屑一顾，这区区一千元的礼物，对聚财有道的林先生哪里算得上是“礼”？但对于连布衣服都没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笔想了又想凑了又凑的大数字。

同在一个课堂上的师生怎么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尴尬？所幸工业校求学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我想这大概是王大炳的遗传基因作用，是他那双死不瞑目的灵魂，在阴间对他女儿的督促？

1999 年夏天，她从工业校毕业以后，在南坪一家电力公司下属的配件加工厂从事技术室的工作。算是她跻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业之地”，实现了她的母亲最低的要求。

由于我已年老，这几年很想找到继承我的遗志，完成对这个时代无情批判的大业，我曾倾注于我的儿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会争夺我的孩子时，我却失败了。

曾一度把这种神圣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没料到，我的影响终于没有战胜恶劣社会空气对她的影响，三年的中专生活，在环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诚实的品性被渐渐改变，渐渐地我们失去了原先那种感情，自 2003 年她结婚以后，我们就很少往来了。

但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延续，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儿，他们身上固有的秉性会最终会起作用，我想我终生反对专制主义那种不懈斗争，终会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结出硕果。

第四节 潘朝元

1979 年回重庆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庆后还没有电话，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联系，从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里站柜台，并暂住在大女儿家里，大女儿是重庆干电池厂的职工。

1980 年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去了大坪大黄路，并问到了去干电池厂的路。

到了重庆干电池厂，大门传达室里的人将我引出厂门，指着山下傍在嘉陵江边陡壁悬岩半山中的“吊脚楼”，告诉了我潘老大女儿潘丽娜的门牌号数。

我向山下远远望去，认得那些依傍着绝壁札下的“鸽子棚”，还是当年抵抗日寇长驱入侵，

国民政府从南京西迁，以重庆为陪都时，跟随着国民政府流落这里的难民留下的遗迹。

这些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当亡国奴的子民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也为了从简建起可以遮风避雨的窝，选择了这些绝壁，用木板石头为材料砌成临时“吊脚楼”，成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珍贵记念留了下来。

它们曾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被搬上银幕。它们的屹立，证明中华民族的子民不屈强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气节。为抗拒日人入侵，他们宁愿在这里风餐露宿过着流浪生活。

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简陋的建筑依然还在，中共三十年来既没有将这些遗迹保护和培修留为文物，现在却被编上门牌号码，变成了贫民窟。毛氏三十年统治，建设竟是白纸一般。

而潘老回到这里安居，真是想都没想到啊！

我沿着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问去，大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终于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儿潘丽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筑的小木房里。当时没有电话，事前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我那一天来访，所以当潘老的女婿打开小木门的时候，带着诧异和陌生问我找谁？

这时在木屋门口仅一尺宽的山路外侧吊脚楼里，响起潘老的回应声。我定睛去看那吊脚楼，靠三根圆木柱，从更低的岩石上支立着。两块厚木板架成了通路。远远看去令人心悬，说不定那阵巨风就会将它连根拔起来吹走。

潘老的回应响过以后，他从关闭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别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热烈的拥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从天而降，来这儿也不给个信。”他还是那么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盐源时精神了许多，虽然头发更花白，但脸却是红润的，显得很健康。他的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了出来，那是他的小外孙，我来时他正教小外孙做作业。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个面积不过六平米，顶上盖着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里的大树作荫蔽，可以减轻太阳对小屋的幅射。

屋里摆着一张小木床，一张小桌和两个小凳，小桌上还摊着小外孙的作业本。虽简陋，但主人却将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环顾了一下小屋问道：“这小屋冬天恐怕够呛，下面的江风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吗？”

他尴尬一笑，说道：“这总比监狱强些吧！何况，这小屋通风和光线都好，有益于长寿。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历三冬，倒也习惯了，被共产党磨出来的，什么苦也不当回事。”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大女儿一家。大女儿在厂里任会计，大女婿姓汪在工厂任技术员。

两个外孙，大的已上中学了，小外孙还在读小学。

因为事前大女婿没有任何准备，中午他执意邀请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们便踏着山路向上走去，边走边以这些吊脚楼为话题，谈到当年抗日战争。

抗战时，他才从军校毕业，在汤恩伯的部队里当排长。由于累立战功，抗战胜利时他升到少将军衔，内战时期他的部队打散了，辗转回到重庆。1952 年因在深圳偷渡，准备去香港事情败露，被中共边防部队抓捕入狱。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信仰，若非遇到 76 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决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对抗日战争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了解，颇得他的教益。

我告诉他，“平反”后，我回重庆路过成都，曾去张锡锟家。他听到张锡锟母亲和兄妹悲惨遭遇后，唏嘘不已。

讲到徐伯威时，他说：“1976 年我回重庆之初，市委统战部也曾把我请去市参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绝，因为我不愿意按共产党的意图，写国民党当年在重庆的历史。我宁可去商店站柜台，也不愿说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于是来劝说他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将他分配到黄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点，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资，聊够糊口。

他说：“当局之所以今天对我们保持统战的“客气”，不仅因为三十年统治，原形毕露，民心丧尽，统治地位动摇了，更因为台湾今天发达的经济和实力。随着大陆的开放，国民逐渐了解真情，台湾赢得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民心，历史定将证明台湾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宁可住在这里昼迎江风，晚看渔火，过着超然脱世的生活！”

说到这里，他停下脚步，望着绝壁下滔滔东流的江水叹道：“几年来，我常常独自站在这里仰望兰天。春天，当候鸟从南方飞来，秋天大雁从天空掠过，我的心就想到南归，我常常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八年，尚有归期，而我也许只好终老这里了”。

这真是：“几日避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读陆游绝命诗，对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当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鸽子棚里，我们俩将他大女儿屋里的沙发抬进他的吊脚楼阁里。与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俩就在这“加宽”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黄昏一过，月光便从那石棉瓦逢里透了进来，银色的月光洒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静夜思”。

他是我在重庆最知心的知已，我在他面前可以轻松坦露心怀，甚至于个人隐私也无回避，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讲了邹银双的故事，长叹道，年轻岁月被中共所践踏，身处蔡家场偏僻的乡间，不知我底细的“好人家”，又有谁愿把自己的黄花闺女，许配给我这个劳改释放犯？

记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讯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辞了，好在北碚到重庆并不远，今后每逢假节日重逢团聚的时间还多，那时虽然家里还没有电话，但平时，通信问好互道近况则是经常的。

1987 年春，我接到潘老给我的信，说他随着全家从黄沙溪悬崖壁上的吊脚楼里，迁到了重庆电池厂新建的职工宿舍，说我半年与他没相见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来了一张他所住大黄路新宅的位置图，按照他图上提供的坐标，我在一个星期天再度专门去拜访他。

从公路上到达那楼房的底层，大约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这样的新居，虽然免却吊脚楼那种风雨袭击的惊恐，但从马路登到他住的八楼，足有二百余台阶。潘老已七十多岁，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够呛的。

但这年月有一住处已相当不易，谁还管它进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八楼窗口，便听到那窗口处传来了他的喊声，他早就在这里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楼，他已从楼上下来接我，好在多年劳动锻炼，他当时身子还很硬朗，见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摇。我知道，长期的孤单今日得与我相见，那心情一定很高兴。

我们一起走到八楼左边的房门前，他取出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进门第一间小屋，大约 6 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间。进到屋里，一个平柜，一张小床，一张供他写东西看书的办公桌。

与黄沙溪旧居相比，听他打趣说道："高高在上，空气清新，更加远离人间，进入仙境，我搬来时，想既成了仙，本不应有任何的东西，连这床、柜、桌、椅都不要，中共关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监后又过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资够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不知台湾政府知道我们这些当年党国幸存者，住在这高空上有何想法？"

进他房间后，他张罗着给我倒茶，我们俩在小床上对面而坐，他细细打量了我以后，叹气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够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显得苍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么痛快吧？"

他摆了摆手说道："我今年已七十三岁，来日不多，这把老骨头被中共消磨殆尽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阴曹地府后，来生再不受这种折磨。"

说了一会话，便邀我到客厅就坐，自己到厨房去了，不一会从厨房里传来了他的叹息声："真够呛！又停水了。"他告诉我说："临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厂的水压不够，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为了解决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来接水，自来水像一条线一样，开着龙头一直流到天亮还留不满蓄水缸。夏天经常闹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来，到楼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来，有时候我也要下楼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岁，已过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涩仍在困绕他。

我听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楼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经够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凑合着用吧？”

正说着，他的小外孙放学回来，我已经五年没看到他了，现在已经长到一米五以上，俨然一个大小伙子，潘老说他已小学毕业上中学了。小外孙告诉我，外公为了到楼下端水，前几天还在三楼楼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们都不准他下楼端水。

城里的居民，楼房建起来了，却陷入水电供应不配套的难事，这种本来很快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拖就要几年。

潘老叹道：“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缺着过吧!”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女儿丽娜夫妇下班回家。丽娜提着一把宝剑，从客厅里拿进卧室。潘老笑着对我说，他的女儿也学起国粹来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着剑到楼下的水泥坝练半个小时，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着说：“可不可以赏光，施展几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她笑着说：“明天早上就请你在楼上看我现丑吧。”

看来，他同女儿女婿生活还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间，因为二十几年的隔阂一时没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还住在缙云山的西山坪养殖场，很少回来，暴政给他们留下的伤痕难以弥合。

下午女儿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上中学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俩人，我才翻开他递给我的杂记，里面有律诗杂文和回忆录，那是他在深夜里的愤世之作，我曾建议他能够系统的写下人生回忆录。

一篇“南归赋”就我记得的，录下了下面几句：

“余南国之弟子兮，祖皇考于民国。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义。少时求读军校兮，正逢国难当头。壮年从戎恩伯兮，启于浙中金华。烽火连天生死兮，败军于乱贼中。独苦战众寡兮，身陷敌虏。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镬求生！……”四十载，他对国民党的向往，至死没有改变。

《七律·十年动乱》写道：“笔锋战紧更兵锋，国事不堪问吉凶。败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敌婢死生从。强扶拓鲁宣邪道，肆诋孔灵黜正宗。野种独根无好果，民族败类史难容。”

另一首是对劳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炼狱的过程；“十年劳改不寻常，欲说真情泪满肠。‘思想斗争’如烈火，精神炙灼胜骄阳。饥劳索命动魂魄，偶语毒刑宁哑盲。压力重重呼吸紧，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 年六队的恶吏，张剑波为了和姘妇交欢而虐杀发妻的案发，他写了《恶吏传》。痛斥那些人面兽心疯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写道：殊世之共产政权在其阶级斗争之腥风血雨中，对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国民党人仍加紧迫害，除一批在历次运动中杀掉外，四十岁以下的多数投入“劳动改造”。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我们同监十五年，最令我终身难忘的，便是 1967 年 8 月那个血腥之夜，我被军警打掉门牙，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

兽警还向全体流放者警告说："谁敢帮助孔令平，替他送饭送水、倒粪倒尿，就将同他一样受到惩罚"。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队在中共狱头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当一批人高举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浅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叫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收折床，从客厅搬进了他的小屋里，仍同在黄沙溪悬崖的旧居一样，我睡的床对着他的床安下，中间只留下一个拳头的距离。

夜间，同以往一样，是我们俩久已盼望的促膝对话的难得时光，在小屋内纵论天下大事，昼情释放积郁在内心的烦闷。

夜深了，听那自来水如线的水滴，从龙头中掉进水缸里发出淙淙的响声。他打开那壁上的灯，看看挂钟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便起身去看了厨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没有接满，然后和我肩并着肩坐着继续讲他的经历。

1949 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从浙东一带逃出包围圈，在兵荒马乱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历数月终于到达深圳，想在那里越境投奔母党。想不到第二年被边防部队抓获，紧接着被遣回重庆关在二监狱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连，那时她才三十岁，戴着反革命，反动军官家属双重帽子，拖着两个女儿替人帮佣，受尽欺凌。1958 年被缙云山西山坪劳教所关押劳教，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因为常年劳累，严重缺乏营养，使她瘦如干柴。

1960 年，两个女儿姐姐才十三岁妹妹十岁，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饥饿的眼睛，把分配给她的口粮从牙齿缝中节省下来，自己却用菜脚叶充饥，因常年饥劳，经常昏倒在缙云的山路上。

每每讲到带孩子的伤心往事，她那干涩眼眶里常挤出泪来。

1972 年，大女儿在重庆干电池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电池的工作，依附着大女儿在黄沙溪的悬岩壁上原先无家可归的她，筑起了归巢。1976 年在这里迎接潘老从盐源归来，这个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总算依附着大女儿，"破镜重圆"了。

人说破镜重圆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来这面被中共打碎的镜子已碎成了粉末，那心灵的粘合力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潘老归来面对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气肿，冠心病，严重的贫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病床上的她反复唠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于他。

性格固执的潘老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中，实际上仍处于鳏居独处，逃避着妻子的唠叨和抱怨。

她咳嗽刚停，便又重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说，那儿空气新鲜些。

看到潘老与老妻实际已分居两地，我几次劝他考虑重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已年老不愿拖累别人"。

直到 1988 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在他写的《水调歌头》悼亡妻中，我深深体察他内心里用苦水泡出来的爱。那辞是这样写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曾经十载医护，病告几番危。眼看一丝游息，明灭半支残烛，断续又光回。婿女多劳苦，绝地救娘归。

毕生苦，磨折尽，瘦如柴，能经多少风雨，长寿永不埋。忽尔一声噩耗，魂断缙云西去，从此弃尘埃。已矣今真死，遗我有余哀。"

原来，人生的真感情是伟大人格铸成的。听他的小外孙说，外婆死后，外公曾闭门三月不出，从门缝里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书。

这时他原先退休的那个黄沙溪副食商店，因为承包给了私人，承包人因为他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再三恳请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虑到继续打工会有三种好处，一是与店伙计们相处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带给他的思念和孤单；二来每天去那个店步行两里地，可以煅炼身体；三来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为老来进养老院筹点钱，所以欣然答应了。

我知道后，劝告他因年纪已大，行动不灵活了，万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已痛苦，反而增加女儿一家负担，至于靠守店那点收入无补所缺。倘若需要，那点钱重庆市的朋友都会乐意相助。

但是他执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里发给他的"误餐"糖果留下来，每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便将它们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关照说："带给你的小馨馨吧，就说潘爷爷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见到这些糖果就像见到我一样，潘爷爷祝他快快长大，好作国家栋梁！"

1992 年我乔迁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诉了他。我诚恳的请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请他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写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举步为艰，黄沙溪的差事也力不胜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杂念累累……正到处寻找我此身的归宿地，效外？市内？老家？总要觅得一个合适的去处。有时整天纳闷，情绪很不正常，所有的远近亲戚，邻居良朋，一概不住来了，愿意小屋一人孤寂独处，一年多来断绝外缘……对于生死，我早有准备，很少去专门思考这个结局。"

他年近八旬也许预感到了什么？本来经过中共关押二十七载，经历长期的洗脑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伤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终身折磨着他。现在他感到妻子仿佛就在天堂口等着他。

由于坚强的信念，经二十五年监狱万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维正常。

收到这封回信后，我决定立即去他的住处。

这次到了他住的八楼，他仍和上次一样在底楼迎接了我，我仔细端详他，他的确更加苍老了，然而上楼时仍保持着矫健的步伐，他告诉我说，明年他就满八十了，这岁数已令他满足了。

进到他的房间，我指着他放在桌子上已写的回忆录嘱他："共产党将我们下狱二十多年，斗我们整我们，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压垮我们，好给良民百姓们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场，但他们不但没有整垮我们，相反的，使我们成了这段中华民族最黑暗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今天最有资格揭露中共欺骗的人。

这一夜，我们俩再次促膝到鸡叫时才合眼睡去，第二天，临走时，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时间，他说虽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条件，但一来他本没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来事前也没有和女儿商量。

自从妻子死后，他的女儿把他管得很严。我说："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厂里的车来接你。"

讲价还价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过几天到我那里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关心的德馨小儿，但讲好了的，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北碚过夜。

一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北碚，给德馨小儿带来了四尾金鱼。

在我劝说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写的"片断"，并且在回去时，带走了我写的一些初稿。以后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纪》注入他的心血，给后来的读者以更多教益。

1994 年，当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气中毒身亡的消息，叹气道："怎么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当我把王琳带到他那里讲述孩子的困难，并告知他，我已经收她为我的干女儿后，他立即从他的柜子里取出两百块钱拿给孩子，表示对她求学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强渡日，这钱实际上凝聚着对死难者后代的关注和希望。王琳含着泪水说了声谢谢，便跪倒在地。

1995 年他满八十，不知是因为阿弥陀佛的佛力招唤，还是因为寻找此身归宿的尝试，他应磁器口宝轮寺主持风轮法师的邀请，去那寺院当了居士，其实是应法师邀请，为寺院抄写经文。得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去了宝轮寺。

当我跨进宝轮寺的山门找到他时，他正向一群围坐的老人讲地藏经，我站在远处不敢惊动他，只能从他那微闭双目抑扬顿挫的语言中体会他的虔诚。

一个小时后讲经完毕，他缓缓地向我走来，我迎着他，牵着他的手低声问道："在这里习惯么？"他说："四海为家到哪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女儿和女婿去贵州开了一个锌矿，我一人整天闷在屋里，正觉无聊，这时风轮法师在街上碰到我，他说我面带佛缘，于是我就来了。”

我进到禅堂，潘老将我介绍给寺庙的主持。听他说横行于世的大盗和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对自己罪业一遭顿悟，皈依佛门是常有的事。

过了两个月，我再度登宝轮寺山门，这一次我们在主持的禅堂里相见，风轮法师纵论当今世道险恶，极言世界末日正逼临人类。

他说：“潘老已将你在狱中情况告诉了我，端详你的面像很像钟馗，佛祖将你降生，专打恶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狱中累次逢凶化吉几次逃过死劫，正因为还要继续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过斋饭，潘老从他的寝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这里，成为他留给我的遗笔之一，现摘录于后：

“我身入佛门，俗念未净，仍然烦恼在心，痛苦难除。时时回忆一生颠沛流离，蹉跎岁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却被无明掩盖，凡夫的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窍，种下恶业，造了不少人间恶果。

“……我小的时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爱如珍宝，生怕养我不活，长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庙，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缘缝起了一件五颜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岁，还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陆腐败，而无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凉心情可以想见，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门解脱自己。

在宝轮寺，他仍以勤奋谦恭待人，诙谐幽默的谈吐，博得寺庙众僧的尊敬，但是，谁能料到，这便是他渡过晚年的最后一岁。

1996 年春天，寄住在寺庙中的他，开始咳嗽咯血，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的支气管出血，半个月服用中药不见好转，痰中的血越来越多，在他小女儿劝说下，由风轮法师亲自掺扶去三军医大检查，检查结果初诊是肺癌。

等到我获悉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经穿上病号服，住在大坪医院的肺科病房里了。我走进病房，见他一如往常谈笑风生，正在同对面床位上的一个病人讲“精神”治疗法：

“为什么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龙活虎，死气沉沉还叫什么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每天早上我还要打太极拳，起来在阳台上练气功，像我们这样的病，如果就这样躺在床上，没病都要躺出病来。”

病房里的病人向我介绍说，他每天早上六点便按时起床，还要帮助其它病人打开水，真是一个热心快活的老人。邻床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说：“爷爷给我讲故事，他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好听极了。”

我问他：“谁替你办的住院手续？怎么连陪伴人都不请一个？”他说：“五天前是小女儿

替他办的住院手续，请人服伺每天还要开给他三十元工资，我那里给得起？就是这住院费，退休单位承诺一半，你看，我那有这个经济力量住院啊？”

贫病交加，他心里十分凄凉！

我又问：“丽娜呢？”他说：“从贵州回重庆一趟光路费得上千元不说，耽误的时间也补不起，我嘱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诉她，现在病情还没有下结论，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暗地里询问了主治的医生，医生摇头说：“晚了，没有康复的希望，何况他这么大年纪，最多只能三个月的阳寿了。”

然而，他依然地谈笑，依然讲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时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饭菜，打开水，依然的为邻床的病友送药递水！

一个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发生的事，这除了仰仗他那毕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贯的临危不惧外，未必没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聪明过人的长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对着大口吐出的鲜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过了两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赶到他的住处，这时他的家刚从八层高楼上搬到了临街的新修楼房，不用再爬那么高的楼。

我去时，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铺，很坦然地告诉我说：“一个人生死有定，阳寿多少都是在阎罗王的生死薄上圈定的，何况我已过八十一岁算是知足了。”

我担心他这么出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医院未必答应，他回答说：“医生嘱咐我还是回家调养，开了许多中药，在家里熬药方便，过半个月再来复诊一下，我在医院，每天所付的昂贵的住院费使我反而担心，女儿在贵州找点钱也不容易，我怎么能多花他们的血汗钱？”

我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锅里面正熬的稀饭。

我问道：“你现在咳那么多血，如果再不在营养上补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摇摇头说：“吃不下啊；再说谁能替我上街买菜啊？两个外孙都已在电池厂上班了，早出晚归，我不愿麻烦他们，自己慢慢的下楼上街，生活也从简了，一天两顿都吃稀饭，这样反而肠胃受得了。”

听他这么说我真想放声大哭。

我忍着悲伤，向他说：“我替你在北碚请一个保姆过来，专门替你买菜弄饭吧！”他很坚决的拒绝了，告诉我说：“我的二女儿和住在杨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后来帮过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你看我一个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运动，病情反而会加重的！”

面对着形体枯槁的潘老，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却反而拉着我的手吃力的说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放声痛哭起来，这是一个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尘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这个世道昏浊的人间，已经不多见了。

拨通了他侄女家的电话，对她说："潘老在人间已是最后几天了，丽娜又没在家，千万对他要尽最后几天的责任，请你马上过来，千万不要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万一不小心摔在马路上，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忍得下心？"

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哭声，答应马上赶过来。

还没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孙打来电话，带着哭声在电话中他通知我说："外公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钟离开了人间。"我的心顿时收缩得厉害。

我没有迟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车赶到他家时，已是华灯初照。

就在他家楼下的巷道中，灵堂已经布好。逢布遮盖的"灵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儿，外侄女和两个外孙，里面空荡荡的坐着几个紧邻的邻居，老家凉平的两位老哥和远在贵州的大女儿，都只发了通知他们的加急电报，还没有赶到。

灵柩前方的一张桌子上两位宝轮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还在不断地诵经，为他的亡灵超度。

那悠扬哀怨的颂经声，吸引着一群周围邻人的孩子们。我坐在灵堂前放的一张长凳上，听着那抑扬顿挫的经文，脑子里正翻滚着几十年回忆的画页：

我与他相识于 1960 年 8 月重庆南岸弹子石四川第二监狱中，刚入狱那时我才满二十二周岁，虽头顶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大帽，实在讲还不懂什么叫"政治"，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长者。

靠着这天赐的缘分，我们俩在 1962 年 3 月份一起从孙家花园在枪押之下，流放到凉山自治州甘洛农场，在那里九死一生地闯过老母坪，同年 10 月死里逃生又从甘洛农场再发配西昌黄联关。

以后又一齐押送到西昌地区的盐源农牧场，这其间除了短期的调散，到农六队以后的十四年间都在同一中队，编在同一个组，铺褥相依，朝夕为伴。无论是年龄、资历和学问，他都无愧于我的长辈，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启迪和教诲。

从 1960 年到 1976 年狱中相伴十六年，有难同当，有危相扶。我遭受狱吏残酷折磨，被打伤后，在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他敢于顶着枪杆子的威胁帮助我勉励我，渡过最难熬的日子。在饥寒交迫之下，我们相扶为生存而拼博。十六年令人难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荡在耳际，不敢忘怀。

1975 年中美建交，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共对国民党县团有以上人员颁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庆，1979 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脱离盐源的地狱回到重庆。以后，我们又在重庆相逢，以不断的书信、互访联系着我们间的友谊，共勉共励，成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然而凭着他在狱中的坚定信仰，待人平和宽容的人品，凭着他的博学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却赢得了狱中共患难的难友们普遍的尊敬。人们恭称他为"潘翁"，是狱中最有号召力和威信的"国民党人士"。

五〇年锒铛入狱以后，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连，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进行劳教，从此带着政治上的歧视，拖着两个小女儿，大的不满三岁，小的未足两岁，也在监狱般的管束下，终身为奴。可以说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义事业，而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了。

临终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与遗言”，我在这里摘抄下来，一面给我的读者留下对他的简介，一面也让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后人的教诲：

“由于我过去亲自感受饥饿二字，深有体会，又来自农村，熟谙庄稼人耕田种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乱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认识，深深懂得物力艰难，从来敬爱农民，从来不敢抛洒粮食，也足见我的生活节约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过去。

因为我从苦中来，早已苦惯了，君子忧道不忧贫，穷困威胁不到我。

出狱二十年来，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补，逢人从不说苦，在经济收入低于普通职工，受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不得不更加节约，不吃烟和茶，酒在严冬喝一口。好在我一个人又已年老，消化机能减退，齿牙摇落，咀嚼困难。每天吃两餐粥，有时候换吃面条，一菜下饭无兼味。

看起来我生活确实清苦，但比起那狱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诉丽娜丽施两女，我死了不举哀，不办丧事，不穿寿衣，不烧香烛纸钱。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详之物，要来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个失意者，没有任何留恋，洒脱而去，岂不快哉！”

好一位彻底的无我者，临终前留下的这段文字潇潇洒洒，对这个痛苦不堪的人间，没有任何牵肠挂肚和遗憾，没有任何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当我问主理后事的外侄女，有没有追念他的悼词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她却摇摇头。

在这种临终的时候，纵有千言万语，岂是一段家人的悼词能说清？

好在他身虽归去，灵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随灵魂而一起长存。至于一生，后人如何评说，对于置生死于度外的他也不会计较。更何况，又有谁为他写传记，留存人间呢？于是我默默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农家，六十年前从政治大学毕业，后来去黄埔求读，从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义的根，追随着国民党从事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之际，毅然从军，官拜浙江金华行辕主任，并挂少将衔，抗击日寇，八年倥偬。

抗战结束共军蜂起，他愤然率军抗击兵匪，终因兵败成囚，锒铛入狱，然而由于信仰坚定，在中共高压刑镣之下，狱火垂炼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苏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励周围。做到在独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无愧于孙中山之最为忠诚的信奉者。

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之‘救星’，贫苦者之救世主，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挑动内战，涂炭生灵，残害无辜，制造人为的战争饥荒，杀人如麻的人比起来，显得光彩夺目。这同那些争夺权位，呼风唤雨，穷奢极欲的当今各级贪官污吏和毫无正骨的人比起来，又是何等磊落！

历史一定会对一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向邪恶斗争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决。历史会永远记念潘朝元这个忠诚的民主战士。“

是夜，就在那灯光昏暗的灵堂之中，在他的遗体之前，我把这段文字在他的灵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脚前，我将四条长板凳，拼在一起，重温过去鬓发相触的情谊，俯身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声：“潘伯，我来矣，就在你的脚前与你作最后一次相伴吧。”言毕和衣悄然躺下，似与往常那样，面对面促膝相对，只可惜此时我们已不能对话了。

心中似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一摸我自已的额头烫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凉风突起，凌晨二点左右忽狂风大作，雷电骤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灵前烛光随着狂风而摇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来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游魂了。

紧接着倾盆大雨狂泻不止，好似要冲净这地面上人间太多的浊泥垢土，冲净这人间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楼下响动，他的大女儿丽娜和丈夫才下火车，匆匆赶到。两个女儿扶灵柩恸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并无他人，连生前最密切的挚友都没有在场，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计其数，仅盐源同过患难，而今就在重庆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个也没有来。

后来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绝症后，全部断绝了同周围友人的信息。他的病来得突然，他的灵魂走得仓促。

后来我问到唐元澄等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连黄沙溪副食店，他站过柜台守过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们，都不知道他得绝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别的关注他的晚年，主动获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着他的灵，渡过这最后的令人难忘的一夜！

这段晚年的凄凉和悲景，以及他为自己设计的潇潇洒洒离世的全部过程，真正实践了他的临终遗言。

这同那讲排场，嘱儿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伤的市俗人们比起来，有多大差异啊！

上午九时许，一辆卡车载着他的遗体，一驾旧中巴客车，载着送行的不到三十个亲朋，就在阴霾的天色里缓缓驰向石桥铺火葬场。

夜间下起的雨变成了霏霏细雨，就像老天爷的泪水永无止尽。

送葬的队伍没有乐队，没有仪仗，没有鞭炮。灵车缓缓驰出巷道，悄悄的，那气氛可以

说十分凄凉。

身处此情此景，我泪流不止。十点钟，潘丽娜在火葬场院吊唁厅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家庭遗体告别会。告别会刚刚结束，我已难以坚持，前一夜风寒感染，此时已使我浑身发烧，满脑袋的昏昏沉沉说不清是病还是过度悲哀，坐在那告别会厅前的廊沿长凳上，我止不住哭出声来。

我想，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得知像潘老这样的忠枕三民主义之士，在铁蹄，囹圄之下守着这信仰的方寸，矢志未移。而今天又如此凄凉与世长辞，何时才能为他补上一个追悼会，昭扬他光明磊落的一生，以及他为民主事业所作的贡献，他的在天之灵便可告慰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点，我在泪眼中目送他那枯瘦的遗体缓缓推进火化炉，眼望着那伸入苍穹的浓烟，把他的魂灵和他的肉体一起带入到天堂，永别了这块苦土。

和着他写的“吊亡妻”我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悼潘公

“人生如灯烛，烛尽光难收。明灭半载默忍，咬牙独徘徊。瞀然枯槁今去，六魂悄然苍穹，消洒南天回。蓦然回首处，我在守忠骨？

八十终，坎坷尽，魂弥留。万事萧萧，曾经沙场英雄事。兵败阶下成虏，囹圄自比苏武。晚年佛门皈依，方悟万事空。从此蓬莱去，净土迎君回。”

潘老骨灰安葬于哥乐山陵园。

十年后，我同他的侄女一同拜谒了他的墓，在苍柏丛中，仿佛又见他的遗容，于灵前填《江城子》一首：

“君卧山岗已十年，今复见，松柏间。梦里拾遗，故事有多少？纵使阴阳已隔离，五十载，旧时日。

指处荒冢忆昔时，正伏案，愤疾书。促膝相对，岁月能倒流？唯有正义摄人心，一曲在，永唱吟！“

第五节 夏光然

毛泽东时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斗争中，我和夏光然结下了共生死的患难之情，当年张锡锟和刘顺森相继惨遭毒手以后，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还的主要成员。

回重庆后，当我知道他在出狱后混迹市井的遭遇，对他深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资助过他。我几次为他找工作的努力没有实现，深感力不从心。

中共长期的虐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伤痕，铁打的汉子也难避这种伤痕的恶性发作。所以幸存者之间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约定。

1989 年他与王正印闹得很僵，决定离开重庆，回到成都金牛镇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们同去北温泉和缙云山玩了一天，并且合影留念，我问他回成都

以后的打算，他不无伤感的回答我说：

“随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在江湖上漂泊多年习惯了。我最牵挂的是那些在盐源牺牲了的先烈们，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盐源五号梁子去，凭吊当年已经牺牲的难友们，他们的遗骨如何处置我也要打听一下”。

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短信，这些短信只有几句相报平安的话。

直到 1996 年才收到他从资中城关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准备到重庆来投奔我，我敏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动的时候了，想来重庆找一份工作暂时栖身。

我当即与毛贯益联系，看看他的八桥客车有限公司能不能给老夏安排一个看门的工作，不料，老毛严辞拒绝了。

想他从资中到来后，再作商议。那时我已在璧山投奔李伦所办的海山公司，正同孙庸利用璧山坐椅厂的场地，开办一个制作防弹衣的工厂。

接信后，我立即回了信，答应无论如何我要为他安排一个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里。我忙从璧山匆匆赶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进门见他端坐在我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灰色很旧的中山装。大概因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劳顿，那满脸的皱纹，花白头发已盖满了他的两鬓，比之五年前从重庆离开时苍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脏又黑，好像有几个月都没洗过似的。脚上套着一双绿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样与进城打工的乡下农民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数十秋，乱世今日抚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问他怎么稿得如此狼狈？但我却不知从哪个标准和哪个状态来问，事实上夏老三从我在孟平店里与他久别重逢后，一直都处在穷愁潦倒的状态中，想来他在 89 年从王正印家离去后，恐怕日子一直过得十分艰辛。

今日中共统治下，过去的五类份子及其后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何况像他这种不甘弯腰事权贵的人，半生囹圄，几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离。看到他，想到近几年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愿低头，苦难伴随着他们的晚年。

见到他们如同对镜照见自己，相比他们的命运，我中年后得到了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免去了在社会上流浪，近年又蒙李伦不弃，取得了一个小小科长职位，却因天性不苟与浊世同流合污。不但与一些发财的机会失之交臂，还在工厂内部的斗争中提前退席。

退休后，立即进入打工仔的队列，虽平时节俭刻苦，仍无多余积蓄可用来支付穷朋友们的求助，面对着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压力。

好在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解决个把人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当我俩坐定后，我向他问道：“你现在生活来源靠什么？”见我直端端的发问，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嗫嚅了一阵说：“离开重庆时，早先有一点积蓄，本想做点中药材生意，却上了别人的当，本钱也被人骗走了。”听他这么一说，便不想追问下去，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来。

他接过钱捏在手里继续说：“来前在资中，往在朋友家，已经身无分文，这次从资中来重庆，火车票还是朋友给买的。一下火车到北碚来，因为没有钱买汽车票，便将自己贴身衣服脱下来，当给汽车售票处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脱下那又脏又旧的中山服，里面居然没有任何衬衣。

他怎么会混成这样子，我不想追问，连忙到厨房里热了热现存的菜饭，同他将就着共进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带他去壁山坐椅厂，请求孙庸念在我和李伦的交情上，给他安排一个看守大门的工作。

他狼吞虎咽吃着我给他热好的饭菜，一面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风雪夜归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讨饭的破碗了。

吃完饭以后，我在衣柜里给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过的衣服，重新再添了五十块钱，要他去汽车站把押在那里的衬衣赎回来，一面挂通了壁山坐椅厂孙庸的电话。

这孙庸原是李伦的童稚之交，从小一起在含谷的农村中长大。据李伦介绍，文革时他在壁山公安局供职，因家庭出身，在文革中被划为走资派的黑狗崽，后来在李伦母亲的掩护下，躲过造反派的追捕，免去一场杀身之祸，不得不离开壁山，离井背乡到外地混了几年。

文革结束后，孙庸得到平反回到了壁山县公安局，不久下海，以老家的农舍为基地，开始做一点汽车零件的买卖，办起的公司起名海山公司，李伦任专用汽车厂厂长，他依靠专汽厂而暴发，1994 年壁山坐椅厂已成了占地 50 亩的厂家，并获得四川省私营明星企业和重庆市私营企业十强的桂冠。

我与孙庸从丁家开始按触，是以质量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在质量上扶助他们，从丁家茅舍到壁山坐椅厂的建立，开始时，因为“生存”关系，对直接扶助他的部门极为谦恭，虚心接受客户反映出来的各种质量问题，认真加以改进。

一年后，他对专汽厂的几个大综产品，例如坐椅，侧窗，不仅形成依附关系，而且形成了包销包用的关系，干脆取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坐椅厂。而专汽的职工，因为他们售后服务态度好，几乎包揽弥补操作者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总装车间的装配工并没有不满的意见。

孙庸本人原是壁山公安局的警察，他熟谙共产党权钱交易的诀窍，知道除了依附专用汽车厂外，还必须有一个“保镖”，他的小儿子顶了他退休让出来的位置。

为了应付政府各级衙门，孙氏父子承包了壁山街上最毫华的酒店，壁山市政府官员和公安局的刑警是他酒店的常客。

后来，孙庸从相隔不远的某机械厂私下用重金挖来技术骨干，并购置了一条生产摩托发

动机的生产线，以最快的速度在坐椅厂地盘中心，建立了一条年生产能力千万台的摩托车发动机装配生产线。

开始半年果然获利颇丰，孙氏父子，便将利润很薄的坐椅换成生产摩托发动机。殊不知道这一次独立运作的结果，却没有逃掉商品的经济规律，重庆摩托车发动机一哄而上，产品很快出现过剩危机。上千万流动资金被卡住，整个工厂无法继续运转，生产线停止了运转。

而这时，无锡常州一带更为狡诈的商人，探听到发动机处于滞销的海山公司，便从江苏专程到重庆壁山与孙庸商定，以赊销的办法，将这些滞销货运往沿海，答应一定在装配后，将这些赊销的货款如数返回。殊不知这些发动机有去无回，运出去一年了，赊销的货款却连个影都没有看到。

在短短一年多的发动机热中吃了这个大亏，使孙庸明白他那点功夫，只有依附一个主厂，保证他的产品销路，才能存活。他没有掌握一支为他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和营销班子，唯一手段就是贿赂国有企业的头。李伦下台后，窃取了专汽厂领导班子的陈增，向他伸出了“双赢”之手。

中共“改革派”想用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为有产者，尤其想证明一党执政比多党制优越，为继承独裁衣钵辩护。然而，失去竞争所带来的粗制滥造，失去监督所带来的腐败却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贫富分化使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抢劫银行、抢劫珠宝店的事频频发生，老百姓几乎家家有防盗门。

防弹衣及防弹车应运而生。

1996 年重庆市把各银行配置的防弹车生产权交给了专用汽车厂，双方进行了“协商”，孙庸以丰厚的回报，从陈增手上接过了防弹车的生产权。

老夏大约就是在壁山坐椅厂陷入困境，孙庸刚刚与陈增搭上关系时，来到了这家工厂。根据我的估计，看在与孙氏几年的老交情上，由壁山坐椅厂接纳一个夏光然应当不成问题。

我从家里打电话到壁山坐椅厂时，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了老孙大儿子的声音，说他老子去浙江讨债去了，虽然他没有拒绝我的请求，但听得出态度非常勉强。他向我诉说了一大堆的苦衷。

听他的回答，让老夏一个人去恐怕要碰软钉子，所以决定亲自陪他去一下。下午三点钟便与他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壁山坐椅厂。

我在总经理室里终于碰到了孙露，彼此寒暄后，我向他介绍了夏光然，着重地向他介绍老夏的能力和现状。孙露皱着眉头，重复着在电话里已经说的话：“工人已大幅裁员。”

讲了好半天，最后孙露表态说，只有将原先守门的人数再压缩一个，让老夏暂时充任。老夏就这样免强地留了下来，工资没有定。

那时，李伦的海山公司正在规划防弹衣的生产线。我在陈家坪为防弹衣生产线绘制流程图。

几天后，我又专程从陈家坪到壁山探望他，看他住在其它看门人一道，问他孙老板给他每月多少工资时，老夏苦笑着沉默不语。在我追问下，他摇头说：

“谁叫我无一技之长，又在这种垂老時寄人篱下？我的处境在别人眼里如乞丐并无两样，能够有一碗饭吃，夜容一宿，我没理由向东家再讲待遇。再说你也不容易，孙氏父子已不像从前那样为产品过关而讨好你，你也在人家的管束下拿点打工钱。”

最后他才告诉我，孙庸每个月只给了他两百元，除了节省着吃饭就一文不剩了。听到这个情况，我立马想找孙露去论理，因为我知道，重庆市门卫的待遇一般都在五百元一个月，怎么会给老夏这样少的工钱？

我刚刚站起身来，就被他拉住说道：“孙露是晚辈，你找他有失你的身份，再说我来时，他把话说明了，他这里不需要人，换句话说，我是从别人碗里分饭吃，何况我才刚来，试用期也是三个月，等到以后你找他父亲平心静气商量这件事也不迟。”

我又问道，你们除了看门还包含那些附带工作？他说：“看门的人已经少到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半兼职的饮事员，所以我们的值班时间，每天已增加到十二小时，除负责对进出员工登记，收发公司来往信件，还要负责厂区前的清洁卫生打扫，登记员工的迟到早退，督促工人们按时上下班。”

壁山坐椅厂开办初期的雇佣者，都是孙庸老家的子弟，开始他们为摆脱农活，甩掉农民帽子感到新鲜，不久他们被烦重的（有时是没日没夜的）生产任务，和不小心报废产品扣除工资的惩罚，使他们对孙老板感到憎恶。他们在背地里咒骂他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要周剥皮。

工人们把工厂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趁下班时夹带出工厂大门，千方百计买通门卫，偷拿之风盛行。甚至发展到深夜用汽车，把整车的铝材、窗框、汽车坐椅偷出门去，日子一久，被孙老板发现，除了增派狼狗夜巡，并毅然的撤换了“门岗”，将最亲信的外侄和娘舅充任这些岗位。

身为中共党员的孙老板，其剥削手段一点不比资本家差。

恰恰好在夏老三当门卫的这段日子里，1997 年初，在壁山坐椅厂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由七八个人组成的“索债队”，气势汹汹的撞进工厂大门。他们不听老夏的制止，径直穿过庭院，直端端的向办公室大楼撞去。

在两个戴大盖帽，身着蓝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带领下，撞上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孙庸办公室外的财务和管理人员阻拦不住，两个“警察”亮出了自已的工作证，证明他们是壁山县工商局的执法警察。

来人口称，县工商行政管理所，收到了二十几家工厂的状告信，说壁山坐椅厂长期拖欠

他们的摩托车零件款，现在已是年关在即，所以特别来查对这个事实。

索债队伍中有两个女人，在楼下尖声的吼道："今天你们不还钱，我们就要把你们的摩托发动机搬走"。那时孙庸还在浙江催款没有回来。

手头没有钱又想发财的小业主们，常常凭着一时产品的适销热，一哄而上，在产品热销推动下，小业主窜合一起，将自己的零件材料盲目投入一个组装厂，开始时哥们相称，大碗的酒喝出了最初的"兄弟"关係。

但是好景不长，积压发动机欠下配件款，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见现象马上出现了。一半因需求严重跟不上生产，一半因一时脱销而粗制滥造，产品滞销加质量低劣产生了小业主间的欺诈和斗殴，很必然发生眼前这一幕了！

现在两个自称县的工商民警，在经理室门外乱吼了一阵，却不见里面的动静，其中一个一面狂喊："孙庸你给我出来：" 一面在阳台上拾起一块砖头向总经理室玻璃隔窗上猛砸过去，只听见哗啦一声，足有 8 毫米厚的毛玻窗就像惊雷一样被砸开一个大洞，碎玻璃落得经理室门前一地都是。

在里面躲着的孙大少爷，马上陪着笑脸走了出来。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他连忙从裤包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来，连声陪着小心说道："诸位有话好说，消消气"，一面吩咐在过道上办公的办事人员快给客人倒茶。

然而两个大盖帽将自己的公文皮包朝孙露办公桌上一甩，打开包，从中间拿出一大叠欠条。原先在楼下喊叫的女人，见两个警察在楼上攻破了办公室，便连骂带恐吓的撵上楼来，随行的其它人挽袖擦掌，口口声声喊道："我们厂反正活不下去了，今天不拿钱来就砸了这家工厂。"

那用砖头敲碎大门玻璃的大盖帽，将手中的"警棍"交给了一起来的年青人，年青人会意，立刻挥动警棍将办公室其它几扇窗子一扇扇敲碎，一时办公楼乱成一团。

孙露被来势凶猛的讨债人吓昏了头，呆呆坐着，连大气都不敢出。他明白，今天这种场合，自己有一句失言，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正当办公大楼里闹得乌烟瘴气，孙露束手无策时，突然楼下坝子中一声大喊，只见此时的老夏戴着门岗执勤的红袖套，手里拿着一根一公尺长的铁棍，另一手叉腰、怒目圆睁的大喝道："那里来的，敢在这里撒野？这是工厂重地，那个敢在大白天撞到这里来闹？"

楼上的肇事者，被楼下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震住，一起停下了手，把脸转向楼下老夏站在地方，等到看清楚吼声正是看门的老头发出的，为首的大盖帽推了一下帽沿，轻蔑地回敬道："你一个小小看门的敢来干扰老子执法，小心弟兄们一个给你一拳，就要叫你扒在地下起不来！"

几个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立即在楼上向他挥动着拳头。

殊不知老夏冷笑一声，毫无惧色，接口道："你那戴大盖帽的人听着，你这一套只能诈骗

那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你们一进门我就看出你们是一群雇来的二流子，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壁山工商所了，他们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人来要债。

现在，你们别在这里装腔作势的哄人了，我已经把你们来这里捣乱的事报了警，一会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这些冒充工商的人一个都脱不到手，我奉劝你们还是趁早滚出去，否则你们就要倒霉的。”

他一面厉声的警告，一面还走到铁门前伸手把门关上，做出一付关门打狗的架势。老夏的出现不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大家都一齐把脸扭过去，朝着从县城马路上驶来的汽车张望。

办公室前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大盖帽，一下收了刚才的架势，为首的那个大盖帽下意识的把头上戴的帽子摘下来提在手上，接着用手向他带来的人马一招，所有的肇事者便跟在他的后面，一面小声骂着，一面向楼下“撤退”。

只有那两个女人还拉长了嗓门，但已不像刚才那泼妇骂街的架势，而是带着哭声嚎叫道：“老娘已经快一年没有领到工钱了，本来老板答应我这次摧债如果有了钱，就首先补给我们的工资，砍脑壳的孙庸你教我们怎么活下去哟？”一面还是跟着讨债队的后面，向着楼下“撤离”了。

走到工厂的那两扇大铁门口，一脸晦气的大盖帽，指着孙露吼道：“我还要来找你的，等着吧！”当他丧气的跨出大门时，他又歪着头狠狠的瞪了这看门的老头一眼。恰恰好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这支队伍不敢怠慢，一齐跨出厂门径直向路边的一辆过路的中巴车奔去，叫停了那车，蜂拥爬上了中巴车，一溜烟的跑掉了。

院子里沸腾起来，年轻的本厂子弟，把夏光然簇拥着。他们对这个老头已有了敬意，今天亲眼看见，老夏在凶恶的催债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围的风采。孙露正准备打开保险柜，取出最后一点钱来退敌，却没想到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对这个平日不大开腔的老头刮目相看了。

这时，老夏才向包围他的工人们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没有报警，也没有打电话去县工商所，他这样的吓唬来人，是从这支讨债队，自已语言上出现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厂家雇佣来的打手，当老夏道破他们是冒充县工商局的，使他们感到心虚。那有不预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厂的？

这种以诈对诈，本是从中共常用的惯伎学来的。

想当年，林扯高抓到一纸“火炬”刊物，想诈出一个惊天的反革命集团大案，趁此机会，将他们十几年最棘手的六队人物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在险恶情势下，面对气势凶凶的刽子手，不被对方设置的坦白从宽陷阱所迷惑，变被动为主动，反而质问何庆云的证据。接连几天笼罩六队的恐怖气氛被击破，创下了以往一经被抓住把柄，只有挨斗、挨整的被动局面，转危为安。

这也许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经不多，这是坐椅厂的工人，无法理解的，也是孙庸和他的儿子所不知道的。

自从这次风波后，孙老板觉察到靠上层的“权”和手中的“钱”是不够的。他开始对这个过去两个多月来从没正眼看过的，衣着破旧，沉默寡言的守门人刮目相看了。

原来孙镛的轿车出入厂门，从不停一下，更谈不上对守门人招呼一声。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从浙江回来后第二天，轿车进厂门时，破天荒停下来，跨出车门主动向夏光然握手，并从车厢后备箱里取出从浙江带来的水果。询问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专门给他带来了胃药。

不过老夏并不愿改变他一贯的不卑不亢态度，从此，每当白色的桑塔那经过工厂大门时，不论孙老板是忧是喜，老夏只礼节性点点头。

而他同工厂里的工人们，相处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为夏老师。他同打工者相处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门房里总是聚着一大群小伙子，有说有笑的谈古论今，倒也冲淡了他的孤独，使他并不感到凄凉和贫苦。

然而他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了，先是吃饭老是感到喉里不畅，渐渐出现呕吐。1998 年 4 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饭，小伙子们替他在厨房里熬粥，热中药。他变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却忍着病痛，不露声色照常值班，守门，打扫清洁。

那时，我正按李伦的布置，加紧准备防弹服的鉴定工作，听说老夏病体越笃，便在 5 月份专程赶来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寝室里他躺在床上，形如骷槁。无力的说：“我已不能进食，现在连喝下一点鸡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个月没有看到他，竟变成了这样，忙询问他到医院看了么？他说，孙庸亲自用车送他到县医院去作了胃镜，只说是胃炎，开了许多中药。

我看他床边摆满了大包小包的药，告诉他防弹衣厂审核一旦通过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里，做一点编制计划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着值夜班。这样，生活上有条理，我们就可以相互照应了，对他的病会有所帮助。

这一夜他才把隐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诉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镇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最小的弟弟十五岁，便考入了成都军校，毕业后入伍，参加了共产党。而夏光然，1962 年在一群中学生中组织了金牛镇人民党，不久被中共破获，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将他下狱。

当年老幺出于仕途原因，登报断绝了与老三的亲兄弟关系……二十年后，他从盐源回到金牛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五弟的耳中，这时候这位五弟已是成都军区的一个大校军官。不知这位五弟良心发现，还是骨肉亲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头替人代笔书信维持生活，便派

人把他带到军区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应他在军区大院随便干点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来，是对当年他的不认亲哥表示忏悔。毕竟眼下在金牛镇只剩下他们两兄弟了。

对中共早已认清的夏光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久只身离开了成都，他说：“天地有正气，人活就为这一口气。拨出去的水难以收回，他不愿一个曾公开宣布将他赶出家门的亲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篱下。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成渝沿线布着他流浪的足迹。

一种无牵无挂交织着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随着他亲身体验监狱外整个社会底层的酸楚，饿一顿饱一顿，晚上经常在车站码头露宿过夜。

据他口述，1979 年他因刑期刚满，调到农四队，1982 年在盐源农场为张锡锟和刘顺森作戏剧性平反会上，他当场责问邓扬光：“人都被你们杀害了，现在凭你们一张空头平反书有什么意义”？

刑满后，他仍保持着“火炬”成员的本色，继续反抗中共对留场人员的压迫，负责管理他们的敖麻子说他反革命本性丝毫没有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离开盐源农场，回到了他的金牛镇老家。

返回金牛镇后，他在场口摆了一个替人代写家信和讼状之类的小书桌，晚上又在附近茶馆里为喝茶人讲评书，得点茶水钱，维持着清苦的生活。

1963 年，他入狱后，怀着遗腹的妻子，被所在生产队长强娶，并逼她堕胎，遭到她拼死反抗，总算把怀胎八个月的孩子生了下来。

老夏回到金牛镇时，他的儿子已满二十岁，儿子面对着这个站在面前的“陌生人”心情极为复杂，要认吧，想起幼时被人欺凌时，这个本该保护他的人到哪里去了？不认吧……

回到金牛镇，房子早已归他人占有，妻子也成了他人妇，看着站在跟前儿子眼里的尴尬眼光，知趣的老夏悄悄的离开了他们，用发给他的安家费在昔日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个干打垒的土房子，聊作栖身之榻，不久便同路经成都的盐源同难结伴，一起流浪到重庆。

他用平淡的口气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处境很像狄更斯笔下的奥立弗，只是他并不是济贫院里长大的孤儿，而是经过中共十几年监狱锤炼出来的火炬战士，同他们认钱不认人，奉行大鱼吃小鱼作风完全不同，他靠自己的正义感和正直，影响周围的人，虽然他常遭人算计，弄得往往连饭都没得吃的地步。

他讲完了这段从未向任何人讲述的隐情后，显得非常疲倦，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得的病我最清楚，如果真的得了不治之症，那么我想，我最后投靠五弟的时间也许到了，我预计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大量的金钱，在这个时候我再不花他的钱给我治病，就未免太傻了。”

认定终身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那么他宁可流浪飘泊也不会去讨权贵的恩赐。中国自古就流传着叔齐、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的故事，我们这个年代中，像陈力，张锡锟这种宁死不屈的中华精英，真值得我们的后代大树特树，否则怎么说中华魂犹存？！

那天晚上，我俩相聚在我房间，夜半我还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大概因为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宽慰，喝下了没有呕吐，平静的睡去。我却没有睡意，突然感到我同他可能是最后一夜相聚了。

直到五点钟与李伦约好，今天是防弹服鉴定会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匆匆的起床，在离开这位难友时，我一再叮嘱他，现在他的病情未知，身体已十分虚弱，一个人回成都，我绝不放心。必须有人护送，所以请他无论如何等我两天，在我开完鉴定会以后，由我专程护送他回成都。

两天以后，当我回到壁山坐椅厂时，门岗上却不见了他。我连忙去他的宿舍里找他，正碰上与他同值夜班的老吴。他告诉我说："你走的第二天，老夏开始大口吐血。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不能再等你了，再不走恐怕真走不回成都了，我再三劝他再等一天，等到老孔回来，他也没有听，临走时嘱托我，把你给他过冬的衣服归还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问道："有人陪他一起走吗？"老吴回答道："他临走时说是去丁家找小王，是不是请小王送他一下，我就不知道了。他刚走才半天，现在要去小王家，兴许他还在那里？"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字条，我接过那张字条时手在颤抖。

令平如晤：我不能再等你了，这次给你增添麻烦了。我这次打工教训太大，真实了解基层打工仔的艰辛。我的性格决定我不向新贵们卖笑，同时，我的病情又发，不得不走。等你四天你还未来，我只好离去。我决定到成都医病，如能康服，九月二十七日一定再到盐源凭吊死难的友人。然后叫我在共产党的显贵"弟弟"供我晚年，（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我还要慎重考虑再作决定）。今后可能经常见面畅谈今生事，或写点小东西，握手。

友：光然 1997 年 6 月 7 日

读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喊道："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好人老是没有出头的日子？敢于反抗暴政的人老是被人整得无路可走？"

九月二十七日，正是"火炬"最后一位烈士刘顺森牺牲于中共屠刀下二十一周年的忌日，病笃流浪的夏光然仍念念不忘，其忠已表，只是大陆上何年何月有这些英烈的记念碑，使他们的英魂为更多的民主事业后继者所记念？

来不及多想，把信折好存放，向老吴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丁家找小王，兴许他还没有走。"老吴为难的说："你知道，孙老板的规矩门卫值班是不准换班的。"

我只好到车间去问几个家在丁家的人。找到以后，在厂门口登上一辆去青杠的客车，等我们匆忙赶到小王的家找到小王时问他，他却说："老夏一直没有来过。"我心中一阵紧张，这个老夏，这个在监狱里经历过多少磨难，好不容易活到今天的硬汉子，此时究竟在那儿呢？我迷惘的望着通向青杠的马路自问。

难道他自己独自上了去成都的高速公路，我们上那儿去找他？

我和带路人只好返回坐椅厂。回到宿舍，老吴将他临走时，嘱咐转交的一包棉衣提出来

交还给我，那是我为他准备过冬的东西，现在人去物留，看着它我此刻挂牵他能平安到成都吗？他能康复吗？

唉！这些年来，从毛泽东地狱里熬出来的挚友们先后离我而去了，王大炳、潘朝元、现在难道轮到夏光然了吗？这些相逢时可以倾吐内心的至交血友，今天还剩下了几个？邓自新，邓小祝、陈孝虞、王文典这些人如今生死不明，不知漂泊到何方了？

每想到这里，便将他留给我的那张字条拿出来读了又读，不愿相信他就这样走了，难道这一张质朴的留言，真的是留给我的诀别书？人生何其短暂，算起来，他不过比我大五岁啊！今年才六十多岁呀？

从那以后，大约三年的时光，我都在盼望邮递员会突然送来告知他下落的信件，甚至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来信约我同去盐源祭拜已牺牲的难友。

1999 年，我专门写信到如今还滞留在盐源农场的朱凌飞，王文典，告诉他们夏光然在我这里离去的经过，并告诉他们老夏若康复他要重祭先烈的宿愿。并请他们注意一有老夏回盐源的信息立即通知我。

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夏光然从此再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成都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老夏没有去过成都，盐源就更是杳无音信了。

倒是每年我却在做着一个梦——在盐源二月的沙尘暴中，我看到了令我伤心的二道沟，在风沙弥漫的五号梁子上，在那些埋葬这些烈士们的乱石堆中，夏光然正在向那些熟悉的坟茔鞠躬，一遍又一遍!!

原先的“火炬”成员一个个离去了，我越来越感到，揭露中共监狱黑暗的任务，在我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

第六节 散落在市井里的盐源难友

1985 年，我还住文星湾的危房时，有一天中午下班回来，邻居刘大爷告诉我“你早上上班后不久，就有两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中年人来找过你，我告诉他们，你在农用汽车制造厂上班。他们立即留下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给你。”

我接过那张字条一看，那上面写着：“令平兄，别来无恙，听说你回重庆后，现在在农用汽车制造厂工作，今天特别的专程从市中区来到这里拜访你。不巧，你不在家，我们又不好去厂里惊动你们的门卫，加上还有其它事要办，所以我们就没等你回家，特留下我的地址，希望你能抽空到重庆一聚”

字条落名孟平，地址是市中区五一路某街 100 号。

在蔡家场听到从盐源返回的何福安讲过，张锡锟和刘顺森后来得到“平反”。同刘顺森一起，当年以“反革命越狱”逃跑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孟平和杨汉群，也从南充监狱中获释，孟平回到重庆后便在大阳沟一带居住。只是不知道他住的详细地址，也不知道他谋生的职业是什么？

孟平比我小十岁，据他本人讲，被捕前是西南铝加工厂的一名工人，因派系武斗而被捕，人很机灵，今天他突然出现，并找上门来必定有事。我本来就想弄清楚刘顺森当年逃到重庆的经过，也想知道孟平等人的平反过程，了解他们从南充监狱放出来的伙计们下落和生活情况。

当时决定下个礼拜，到市中区按字条提供的地址，会见这位当年小兄弟。

我按字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里时，已接近中午，而门却锁着，据隔壁的邻人讲，他平时一大早就出去了，白天很不容易找到他本人，只有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他才回家。我从门缝里向里张望，只见室内堆放零乱，也没什么家具。

问他的邻居，那人说，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是租来的，如果你要找他，可到大阳沟菜市场去找，他弟弟在那里开一家火锅馆，门面叫“兄弟火锅馆。”

到中午，我才找到了那里。火锅馆正在营业，生意不错，但是除了他的弟媳妇在那里张罗，孟平却没有在。问到老板娘她说;“他去买火锅料了，你等一下吧。”

十分钟后，只见他提着一个篮子，身后跟的人竟是夏光然。自盐源一别整整七年没有相见，看他的穿着打扮已与当年完全不同。见面后，最先问孟平，盐源宣判后，什么时候改判的？现在各在那里谋生？

夏光然穿着中山服，还是那个老样子，他告诉我说：“我成了无业游民，至今落魄江湖，四海为家，前年我到了重庆，一直住在王正印家里，帮他在朝天门的水果市场贩运水果。”

“我打听了你好久，都没有弄清你在那里，后来，还是在王明丰那里问到你在北碚。最近，我和孟平合开一个五金商店，做些买卖标准件的生意，上周我和孟平到北碚联系一批业务，问到你的住址就去了文星湾……”

从老夏介绍中，我已听出，他出狱后，四处流浪，为求生活和孟平在市井相遇聚在一起。我指了指火锅店，向孟平问道：“这店的生意不错，想来你发了”孟平淡然一笑回答说：

“这是我弟弟和弟媳妇的根据地，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歇个脚。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在南充监狱结交的那帮朋友缠上了我，前些日子又在江北碰上了蒋真富，他从盐源回来后，回到他以前的铁作社，铁作社现在改行生产螺丝螺帽。我们商量从他那里拿来的标准件，摆到大阳沟租的一个五金门市中来卖，大家都想弄口饭吃，权且以此谋生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他们的近况已明白几分。问到他们，这么多年来是否安了家，老夏苦笑道：“四海为家，我们这种处境，谁看得起我们？”

我们在火锅店吃过午饭，便由夏光然陪着我到了他们开的五金门市，在大阳沟的偏僻弄堂里，我们找到了他们合伙的五金店。

那是一幢居民住宅楼的底楼用作出租门面，门面大约五米宽，纵深不到两米，摆在玻璃厨柜里，全是些普通的联接零件和一些扳手之类的小工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正伏在厨柜的玻璃台面上打瞌睡，看来生意相当清淡。

我们穿过门市旁边很窄的巷道，进去后，便是一个通向地下室的石梯坎。走下石梯坎进入地下室。过道里漆黑一团，拐过弯，才看见从地下室射出来的灯光，进去是两间套房，昏暗的灯光中弥漫出劣质香烟的呛人气息。

外面那间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大约五六个青年男女正围着一张桌上玩着麻将。见有人进来一齐把脸扭向我们。

用不着介绍，我已经猜出这些人是孟平在南充监狱里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岁上下，从那穿着看，男的全是新潮的牛仔衣裤，女的坦胸露肩，披着没有钮扣的连衣裙，脚上拖着拖鞋，口里叼着香烟，头发蓬乱，好像才起床的模样。

从他们的外形上判断，这是些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所描写的社会底层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认识他们，这是些随时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会弃儿，是一群被生活遗弃的社会另类。

跟着老夏向里面的房间走去，那里面摆着三张床，一股低档香水夹着霉气迎面扑来，那床上乱扔着肮脏的被褥，以及乱堆在一起的衣裤，地上丢着满地的烟头。证明这些男女们过着群居的流浪汉生活。

看到他们的生活现状后，我马上会想到，为了求生存，他们极有可能就会在今晚的某次行窃中，被当成嫌疑人抓进看守所，他们从小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社会弃儿，没人关心过他们的苦难和内心痛楚。

其实我在盐源渡过的十六年时间，早了解他们了，他们是些从市井和农村流落出来，生活失去来源的人。他们被抓起来，又被监狱放出来，正常人谋生的路在他们脚下已经断绝，只好落到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田地。

中共不但对知识份子造下了罪孽，尤其对劳苦大众，造下了比历代王朝更深更广的罪孽。

下午留下夏光然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向我讲了他目前的生活，特别讲到在与孟平合伙做机械零件生意过程，他说“不久前，孟平背着我将价值三万元的零件，私自拉了一车到成都出卖。突然说雇佣的包运车是黑车，车在运送过程中失踪，这件事发生得太蹊跷，那是大家好不容易凑起来的本钱。

车是孟平雇的，想不到这小子给我玩黑吃黑的把戏，现在底金抽空了，生意也做不起来了，所有的人就只好在这里鬼混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异，孟平的底细我并不清楚，当年在六队物色越狱的人也是刘顺森亲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深。那一次三个人从六队出逃。究竟怎么栽在重庆，我也不清楚，但获刑的人中除刘顺森饮弹刑场，其余两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论人品他纵然变得再坏，也不可能拿大家凑的钱做出这种缺德事，就是黑社会里也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怎么在江湖上混？

沉默好半天，我忧虑的问他：“你同孟平推心置腹的交谈过了吗？我想现在社会极混乱，

运输车发生这种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也不排斥你讲的黑吃黑的可能，眼前我觉得你总要找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不能老在社会上混。”

为了规劝他，我介绍了潘老的为人和晚节，他晚年只是帮人站柜台，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过他的晚年。像老夏这种经历比潘老惊险的人，更要保持一个政治犯的本色。我建议他最好找一个事企业单位，从事管理的职业，千万不可在当前的困境中消沉堕落。

1987 年我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水果市场上，碰到了王正印，在王正印家里再次与夏光然相见，当天晚上在王正印家留宿一夜。

这一次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向他们较详细了解。

老夏刑满释放后，便同赖开明，张映国等一起做收购黄连生意，据他说受商贩骗，赖开明被人暗害，生意也散了伙，便跟王正印来朝天门做水果生意。

同孟平交谈到过去农六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往事时，他的评价是，“我们当年在做蠢事。”他对中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认为同中共讲真理是可笑的，更不主张同他们正面的硬拼。

他说：“真理在共产党眼里，只有大傻瓜才会孜孜不倦追求，只有愚弄人的时候才会讲‘牺牲是伟大的’。”

他断言人是自私的，他说：“与其抨击当局，触恼他们，还不如去做破坏这个社会的事。例如不惜手段贿赂当权的，通过他们捞回大把钞票，或者把毒品贩到这个国度来，或从事走私，总之‘生意’做得越大才算好汉！”

1992 年，孟平两次到北碚来找我。第一次拿了一个摔坏的轿车面罩，叫我找人给他焊补一下，他说他最近已经在作进口车的走私生意，自己也有了一辆本田车。我告诉他日本车的面罩，不能用普通焊补，只有另外下材料仿制一个，价格要五百元，他没有思考的一口答应了。

那一次，我虽然没有问他的生意是怎么做的，也没有问他现在有多少钱，但我根据中国人还很少有私车年代，他就拥有了轿车，一定在按自己的计划，在做很大的生意，大把捞钞票，一步步跻身于“中产”行列了。

第二次他拿了一大卷英文资料，我看是一部全自动洗衣机的图纸和清单，于是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又在做走私车，又在做洗衣机？”

他说：“重庆洗衣机厂生产的洗衣机是我从国外搞来的，我已经买断了它的专利，现在我已查明，这个厂未经我的同意，大批仿造这个产品，所以我将向重庆市经济法庭，按盗用专利的名义起诉该厂，并要求索赔。现在请你找一个懂英文专业的翻译，把这些图纸和说明书翻译出来。”

听他说的我已猜出，他已混迹进出口商贸场，并在外贸上初露头角了。

我为难的说：“英语我完全还给老师了，要请人翻译，我不懂这方面的行情，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完成这套资料的翻译报酬？”

他说：“我也是一个外行，所以特来请你帮忙，你们厂的技术室里从重大毕业的年轻人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个？”三天以后，我回答他请人翻译全套大约要三千元，只是他们需要的时间要三个月。他听后说钱不贵，只是打官司的时间恐怕不允许延续那么长，我只好另找他人了！于是他收回了他的图纸。

那时，我家还没有安电话，他已使用“大哥大”了。

1994 年夏天我在沙坪坝参加一个质量体系培训班，在培训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开的是一个新的凌志车，车上还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女秘书，他本人不但西装革履，带着一付太阳镜，很像近代派被尊为大腕的人物。

1996 年，我已辞去了我的工职，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这一天晚上大约已经八点钟了，我正在青杠车站旁的马路边，碰巧他驾驶的凌志车顺着高速公路刚从成都返回重庆，在高速公路青杠出口站把车停下来，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着他的小秘。

这次邂逅，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在进口车生意中站隐了脚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庆和成都拥有两个规模可观的销售门市，专门在西南边境同东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做“进出口生意”。

说罢他还从皮包里亮出泰国和越南的护照，和一张出入边境的特许通行证，上面盖有四川省公安厅的大印。

他说他已经取得了泰国的国籍，我明白，他是瞄准了这些年进口汽车的热门，靠走私小轿车发起来了，手里有的是钱。

我问他兄弟现在在干什么？他说现在在重庆宾馆担任业务经理。

重庆宾馆是重庆市政府对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庆官员们的小金库之一。这里有来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与市政府搭线联络，干着各种“秘密”勾当。能担任这里的业务经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揽到，看来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迹在中共权力富有阶层之中了。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不过当与他交换对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看法，他毫不掩盖他对这个杀人魔王的切齿愤恨，透露他与中共内的某种倾轧有关。

1971 年他入狱不久，便到了六队，与刘顺森交为挚友，1975 年刘顺森组织向重庆地区的逃亡中，首选的成员便是他，其中他那机灵过人，以及对重庆地区文革状况的熟悉，是刘顺森选择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对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也许就是他的狡诈之处。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杠镇街边的一家馆子里吃过晚饭后，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园里交谈得很久，他说他在出狱后经过认真的反思，对张锡锟刘顺森的人品推崇备至，替他们的遇难深深

惋惜，但认为当时刘顺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讲到他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他说：“我对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个不是为赚钱谋生活而奔忙？那一个不是对中共既抱着一腔怨怒，但不会走上大街散发反对邓小平的传单！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赚钱！赚政府的钱，赚共产党的钱我决不半点手软，因为共产党内有的是贪官，像我现在干的买卖，首先就是逃关税，巧妙利用这些贪官为我批条子做护身。我现在就是要捞大笔钱来补偿我十年的牢狱之灾！”

好明确的主张，好熟悉的手段，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资派的黑崽子们，到了今天父母官复原职，以后被称为“太子党”的人们，冒出来的肺腑之言，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他算是挤进了中国新生的富有阶层了，凭着他的机灵他会混得很惬意。

深夜十二点钟，他才起身告辞，他的“女秘书”一直呆在车里没有出来，我说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说已与他的几个伙计约好，今晚回重庆宾馆住，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反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找约束呢？结了婚，行动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受罪，像我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在家庭问题上也是时髦的现代派，同居的双方都不受道德和责任的约束，这是不是新的家庭观念，我不知道。

当我讲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难，以及其它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资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钱做些慈善事业可是一件积德的事。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种好事。

不久当潘老去世时，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同去参加潘老的追悼会时，他却没有应诺前往，这令我感觉到他与我们当年狱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远，没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系了。

至于我所知道的从盐源农场获释的几十名人员中，除了几位获平反回到机关企业的人员，如张忠信，王明丰、王平依靠工资而过活外，邓自新回了西南毛纺厂，陈孝虞身体很不好，曾带信到蔡家场寻找过我，至于陈蓉康因家被拆迁，当时缺电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朱凌飞、王文典还留在农场的老残队。

1991 年当我出差成都专门寻找解放中路张锡锟的家，准备第二次探访他的大哥，但那里已重新拆修，原来的 1268 号早已消失，因不知电活号码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方？

刑满释放人员绝大多数处于市井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个地下室里看到的那样。也有些实业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从事一个涂料小作坊，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场从事开面馆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给了他们一点可以求生存的条件，他们年纪都已六七十岁，再没有精力过多去想其它的门道，并以他们亲身经历诉说中共当年“改

造人”的真相。尤其见证当年高举火炬，英勇抗暴人们的事迹。

第十二章 前途

在毛泽东对中华社会大破坏以后，中共的腐败酝酿着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除所涉公职贪污、贿赂成风、官霸民宅、抄家窃财、冤狱横生、烟毒无忌、道德沦丧外，还要将我从日常生中所见到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乞丐娼妓、市井欺诈记载在下面，看看这个以“解放人类”为宗旨建立的社会究竟怎么样了？也从中看到社会的末来。

第一节 市井公害

六十年中共统治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损失最惨的是道德的败坏，毛泽东时代讲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友爱被无情斗争代替，今天中国人又被金钱利益毒害，街上受伤的老人没人去扶救，乞丐玩着花样骗人怜悯，投机商用低劣假货骗人，大米蔬菜肉蛋牛奶无不含危害人体的毒素充斥市井。

社会道德已沦丧到这种粉碎性程度，令人对中华安危感到优虑，一旦大陆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演卢沟桥事变，恐怕就再不会出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人人都有抗战守土天职”，出现与入侵者拼死相搏的淞沪战场壮景了。

（一）如此建设

再看看中共吹得天花乱堕的“四化建设”。

上世纪末重庆綦江门户彩虹桥突然垮塌，致使四十多过桥行人顿时命伤黄泉，这种惨案实际上充满了这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为减少这种恶性事故重复泛滥，当时朱镕基特指派中央电视台赴重庆，就虹桥事件负责人举行公判会，用电视对公审现场进行了报导。

可是道德沦丧已深入国家中枢，人们对人命关天的事已麻木不仁，劣质工程有增无减，进入 2007 年以后矿井垮踏、瓦斯爆炸造成危及工人生命的事故频发，除翻墙得到许多消息，这些被认为“负面”东西又为中共噤声。

近三十年来高楼大厦不少，又有多少是服从于国计民生需要呢？

新近距我的住处不远，落成了一家私人营业的休闲娱乐餐厅，因为每天傍晚我都要去龙凤河边活动身体，经过那里的门口。看到几十个工人在那里忙碌着装修，只是门面和招牌没有扯出来，所以并不知道这里干什么用场。

待到装修初具眉目，并且在霓虹彩灯下映出了《月光 28》几个大字，才知道它同遍地开花的餐厅一样，名字取得很漂亮。

因为它的位置选在环城公路通北碚市区的第二个路口，隔着公路，面对龙凤河，门前是宽阔的丁字路口，可以摆放几十台小轿车。整个场地楼高五层，每层长约七十米，每层大约千余平米。面对环城马路的一面，全是玻窗结构，视野开宽，环境幽美，算适合于小车一族者们进餐的地方。

中间过道隔开的后面，是一处处隔开的小包房，大概用于玩的人洗澡泡妞！

临三岔路口的一方，还有一个圆拱形的玻璃窗装饰的透明机动升降装置，可供食客玩者上下。

整个餐厅入夜以后，灯光通明。我虽没有进去过，但从设备条件估计在这儿休闲费用一定不低，在北碚地区，属于中档以上消费的用餐娱乐场所。近十几年来，这些场所频频建立，反映的不是一般平民生活的提高，而是贫富的两极分化。

忙碌了一个多月，前几天终于竣工，开业庆典是从前天开始的，接连两天，门口站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女招待。下午五点钟，门口停满了以轿车为主的车辆，每一辆车开来，便从后备箱里抬下一个个花蓝，表示来客对业主的祝贺。

我走到花蓝前，看到上至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北碚区政府、渝北区政府、北碚公安局，依次是财政局、税务局、房地产公司、北碚技术监督局……几乎本地市政管理机关，都统统名列在花蓝的条幅上。

一个北碚私人开办的餐馆老板，请来这么多政府部门为它开业庆典捧场，足见这种靠当官的作背景，不但是一种时尚，简直就是一种规矩。

商而无官，缺了靠山，也缺了财源，要想私人独撑，应付税收、治安等等的纠缠，简直是不可能的。官为商提供条件，商为官提供贿赂，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致！一个小小酒楼老板都能贯彻这个宗旨，可见它的普适性。

我正在想，突然门里撞出来的一位税务稽查胡某，他曾是我在中学教过的学生，后来在税务局升了官。此时他满脸通红，后面跟着是他的老婆和儿子，手里都提着一包“礼品”，他已带有三分醉意，但还认得我这个“老师”。打过招呼后，便偏偏倒倒提着东道主送的“大礼包”，走到他车前，一家人上了车。

看到这个学生，我又在想，东道主送给捧场人的大礼包，甚至还有“红包”，也不知价值究竟多少？几十个单位，每个单位来人至少是五人，带上他们的家眷连吃带包，老板要拿出多少钱应付这些白食客？

然而商人当然不会作蚀本生意，花出去的钱，开业后在几天之内就赚回来的。有句民彦：“舍得会花，便懂得会赚。”投入的本钱越大，赚来的钱越多。不管胡锦涛如何讲八荣八耻，也不管他口头上如何扶助三农和消除贫富悬殊。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权。没有监督，一党独裁对少数人就有这些好处！

当我走过那儿，一个醉汉从旁边的小餐馆里出来，对拦住马路的小车群，脸上显出鄙夷，带着点醉意怒喝道：“滚开！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摇摇摆摆走过“月光 28”门口，指着站在那里的女招待说：“我不敢惹你，只有大佬才玩得起你们，哈哈……”

表面看，后极权时期，中共把工作重心投入经济建设，中国经济的增长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快，那是因为毛泽东留下来几乎是没有公路桥梁的“处女地”。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的中

国，只要将资金投在公路桥梁，高楼大厦等等，实现 8%的增长速度是容易的。

地方政府为凑足工业增长的百分比，不惜重复建设。本来市政建设已够畸形的，拆了又建，建好又拆，这种加在贫弱经济上的可怕浪费，处处可见。

另一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上增长甚微，百姓收入和民生改善几乎停滞，甚至倒退。

同时，高楼大厦下，藏着无数穷愁潦倒的苍生，他们蜗居在城市角落。走进这些贫民窟，里面的脏臭，使人不敢相信，他们就是高楼大厦的建设者，配称为城市的主人，居住的小屋潮湿阴暗，四壁破墙难遮风雨。破床上堆着肮脏发臭的破絮，夏秋蚊苍缭绕，冬日壁上生风。

然而新闻媒体，在摄下高耸的大厦时，却很少用笔为贫困的民众呐喊。是被人遗忘而忽略？是因为新闻主管的特务紧盯？

（二）乞丐、娼、赌、毒

我刚跨过丁字路口，就看见马路旁，一个跪地行乞的乞丐，蓬乱肮脏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衣衫褴褛，年纪已经不小，手里捧着一个破盆子，正在一个劲的向过路人叩头。有好心人见他可怜，动了恻隐之心，摸出五毛或一元钱丢在那讨钱的盆子里。

“月儿湾湾照九州岛，几家欢乐几家愁”，古老的悲歌在贫穷中国大地上反复吟唱了千年。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越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越是赞歌不断，谁在大街上唱悲歌以舒发压抑的内心，就要作好被抓被斗的准备。

这几年，残疾的乞丐可以推着一架破旧的小车，放着民间傳统的哀歌，向路人乞讨。若是在饥寒交迫的毛泽东时代，谁敢在大街上公开说一句“我冷，我饿”，发一声“你们发发善心救救我吧”的求救声，必会受到警察严厉盘查。弄清那乞丐从那里来，家庭出身是什么？倘如出身五类，定遭斗争会，领到一顿暴打当即性命难保。倘若是一个平民出身，也定会关进看守所，在那里有一群专等二两罐罐饭的无赖打手，围着乞丐开斗争会，直到把他折磨到生不如死才了结，所以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乞丐。

现在，我在小城街上随处都会看到这些可怜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鹑衣百结的中年残废人，断腿、断手、四肢畸变的；有的扒在人行道中，以路为纸，用粉笔，或以口噙毛笔，写出颇公整的仿宋体，自编出五言或七言诗句，倾诉自已不幸的遭遇。

从他们所写的，我还读到对贪官污吏的控告，说当地乡长村官，不但不施舍他们，反而驱赶他们，背井离乡流落天涯。社会的不公平暴露无遗，同时说明中共无能治理不公平的社会；

衣衫褴褛，头发脏乱的女人，抱着残疾的孩子，面前摆着一个碗，押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和孩子的身世，跪在地上，埋着头，向路经的行人伸出她的手……

新近，中山路最宽阔的步行街口，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前面的地上，摆着主人的文凭，和他身份的证件，一张白纸上写出他流落街头的原因，它告诉人们，残疾人并不像邓大少爷吹嘘那样，受到“党”的阳光普照，即使读到大学，眼睛失明，依然只有流落街头卖艺行乞的命。

桌上放着电喇吧和电子琴，肩上挂着一个吉他，弹动吉他，一边和唱着歌，喇吧里放出他唱的歌声，音色哀怨，桌子周围吸引了一大圈路人。从他的琴艺和歌喉，我判断这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盲人，桌前的盆子里甩着一些零钞……

有人悄悄议论，说瞎子的文凭是假造的。但我想伪造文凭，已成时下热门。马路上，墙壁上到处书写着土“广告”，上书“办证”两个字，留下电话号码，这种民间广告被称城市“牛皮癣”。

社会上纵然假文凭、假证件满天飞，机构庞大的城市管理机关，却视而不见，任由它们“装饰”市容。

不过乞丐却大可不必使用假文凭，因为人们对求乞者的施舍，几角块把钱，不会因求乞者有无文凭取舍。

可是报纸上把这些因失学、残废的行乞者，说成骗子，并说有百万巨富的“叫花王”，列数他们的招数。

而我认为，这是对中共统治下贫穷失业现象的漠视，乞丐是社会底层中最可怜的人群，他们都是身体残疾，或被社会抛弃，走投无路时不得已而为之，他们除了靠人的恻隐心给与施舍，几乎没有有效保护自己生命的手段，更不会顾及人们对他道德上的非议。

前几天就有一则消息，一群恶少，无凭白故的围殴两名行乞者，致其死亡，媒体却流于一般报导，对如此凶恶的行为，并没发出社会应有的遣责！

又一天下午，靠汽车站不远摆着两个摊，一个七十开外的老人坐在地上，他的面前放着一台洋琴和扩音器，和一个盛钱盆子。听他拔动琴弦，演奏“天涯歌女”虽不悦耳，却足以表现他行乞的哀怨和无奈。

老乞丐对面相隔十公尺处，又是一个摊，却是一个女孩手拿一个话筒在那里哀唱，面前摊在地上是一张求乞书，标题醒目：“请叔叔阿姨们帮帮我”求乞书告诉路人，她是一位家在合江的苗族姑娘，今年初中毕业，父母是农民因负担不起昂贵学费，要她小小年纪便打发人家……于是她流浪乞讨，期望遇到好心人，帮她继续读书。求乞书旁摆着她的学生证和几张证明品学兼优的证书……

一老一少，并没多少人围观，闹市街上，这种事司空见惯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天奇广场前散步，又碰上了一男一女两个年青的行乞卖唱者，男的拿着一把提琴，女的提着一把二胡。

被男歌手哀怨低沉的歌声吸引，我挤进人群，仔细看了放在地上他俩的身世介绍：他俩是贵州某音乐学校的学生，家在农村，今年秋天，因家遭水灾，家园被洪水冲毁，不但不能供他们继续念书，还巴望他们拿钱回家救灾。

两人只好辍学卖唱。那男歌手正好廿岁，正是我当年沦为右派的年纪。听他歌声哀怨凄凉，不知怎么联想到读书时代的我，听着听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正是“凄凄不似向前声，

满街重闻皆掩泣。街中泣下谁最多，七十老翁青衫湿”。

从身上摸出十元钱，放进他们面前的盆子里。不料两个孩子放下他们手里的乐器，站到我面前，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每逢周六，辽宁路、中山路、胜利路的街心花园附近，会出现许多年纪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他们身背书包，面前地上摆着一张写着“家教”的纸，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群还在西师，西农求学的穷孩子们，利用假日出来，为自己找一点伙食费或书费。学费的昂贵，社会的贫穷可以由此窥见。

有人解释满街挑着水果、小菜叫卖的小贩；背着皮鞋箱替人擦皮鞋的妇女老人；或手里提着一个电喇叭沿街收买废旧的“破烂王”，是农村富裕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正常现象。

我住的这条街又是城市的“红灯区”，多年来沿街布着发廊、按摩店、洗脚城。大白天涂脂抹粉的年轻女郎，坐在门里向过路男人频频招手；甚至于游走在大街上，见到上了岁数的，便凑上去答讪：“要不要”？会意者如果答应，便会跟着“介绍”人走进背街小巷里，那里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红嘴鲤鱼”半裸睡在被褥乱扔的床上，见有客进来便打起精神与来客讨价还价。

城市郊区，去重庆的马路上，一过白马桥，黄昏时间，就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红色的大伞，像一朵朵罩撑在大路两旁。伞下坐着稍加打扮的女孩，不断向过路汽车司机招呼，敞若是“熟客”不用多话，司机煞住车跳下驾驶室，便挽着从伞下走来的女郎，很快消逝在丛林中。

听说重庆市中心附近，还有专供上了岁数的女老板的“三陪男”，打的招牌很别致，什么“明月楼”，“醉仙居”。低档的茶楼，消闲房遍及背街小巷，一方面因精神无寄托；一方面失业人群无以为生。

先前受礼义约束，廉耻规禁，皮肉买卖就是在十里洋场，百乐门里，为普通市民不齿，有识人士所不屑。自文革以后，礼义廉耻扫荡贻尽，皮肉生意得以在大白天公开在大街上揽客。

因为久居月亮田，周围的居民都知道鳏居独身的我，楼下一家“美发厅”的老板娘，几次向我示意，叫我进去“玩”，都被我拒绝，她因此说我太吝啬，其实我打心眼里替这些不满二十岁的“美容小姐”难过，也替她们的父母难过，将心相比，一个正常人家的父母，怎忍心自已的女儿去干这种事？

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最大政绩，无过于麻将的普及，八十年代五讲四美风行一时，扫黄禁赌虽风声大雨点小，一般小百姓行赌还要藏着玩，后来，生意做大了，为官者应酬所需，赌场愈多，赌资愈大，赌风益盛。会赌的不仅以此贿赂官场，奸商以赌为媒，兴风作浪。

干脆赌也市場化了，专营赌场的老板像开妓院的鸨婆，大小兼有，公开的于大街上摆几张麻将桌，以应付查赌的，暗处则在地下室，或山间别墅，那排场就大了，那里往往就是黑社会的窝，兼营毒品，也是大官二奶的消魂处。

因为教育沦丧，道德的颓落，使社会秩序恶化，市民麻痹了，这又是毛老魔头给社会造

成的灾难。人们交谈动不动用对方的妈出气，小市民三句话不对，便要捋拳搓掌，甚至于拔出凶器逞强，伤人性命。

中学生打群架之风盛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因帮会厮拼，青红帮大爷为争码头，打群架的事已远去多年。中共后极权年代，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打群架而酿成流血的事件屡见不鲜，警方视而不见，就是死了人，也取搁平了事。他们害怕惹恼了黑社会，招来意外麻烦。

毒品泛滥已成灾害，贩毒的人，瞄准位于市中区的天生民中和四十中学，两所学校学生厕所经常发现用来注射大麻的针管。

母亲的义子，工商联的李重生，家住望龙门，他儿子李辉上高中时因碰到吸毒成瘾的周兵，为筹毒资，周兵逼迫李辉向家里要钱，为躲避亡命的周兵，李辉几次逃学，被李重生追问查实，无奈之下只有被逼转学。

（三）假

因为商人为赚钱而不讲道德和诚信，假货充斥，欺行霸市，直接危害着贫苦的人民大众。假药品，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充斥市场，其根源就是专门欺骗百姓的社会风尚。

有奸商就说："毛主席就是骗老百姓的山大王，我们跟他学一点，真是鸡毛蒜皮，那算得了一回事？"

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年龄与我相当，衣着破旧，面相老实的农民，正提着一篮鸡蛋站在天生菜市的进口出售，他向询问的顾客许以"假一赔十"的承诺，当时我相信了他，从他的篮子里选了二十个蛋，拿回家打开一看，真上当了，怀着一种受骗，想借此劝告这个农民大哥，我提着蛋当即去找他，幸好他还在那里。

我从五十年前的大跃进讲起，（他不致于忘记，那一次运动，农民被共产党的邪说骗得一无所有并陷入饿殍遍野绝境），一直讲到今天，严肃的告诉他，受欺骗之害最深的是他们这些老实的农民。

中共"不谈过去"，反而使它不光彩的过去，变成倍受年青人关注的"敏感"话题。邓小平为了推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便说，国家已处在崩溃边沿，既如此，又为什么自相矛盾对毛三七开，可知不让人说真话，正好暴露了中共一贯的欺骗脸嘴。

从毛泽东开始，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从此开始，为了吹嘘政绩，做假成了中共一党专制的政风，国内宣传的"建设成绩"，拿到国际上没有不被怀疑的，这些数据或指标，既没有权威的核实机构，假风泛滥不止，人们"习惯"了，但全社会中毒了。

假货可以没收，可以一大堆的烧掉，即使如此，不做假何以图利？所以罚没一时，假货又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上来。野火烧不尽、过后定猛生！打假办公室也形同虚设，而对于"软件"，就更不能用罚没这样简单的办法可以禁止。

中国的教育可说是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既然走后门，靠老爸可以轻易入仕。要文凭干吗？何况文凭本是一张纸，原本可以伪造，大街小巷贴着假文凭制造人的电话，只消一个电话

花几百元钱办妥了，何必十年寒窗苦？

六四运动不是早就呐喊，学生没有一方可供容纳课桌的“地方”么？年轻孩子们只好相沿着做假了。这些年来，凡遇考试，学生在卷子上几乎人人作弊，从小学一直抄到大学，考场成了作弊的公开场合，高考的考堂里有所谓代人作试卷的“枪手”，每次考试只要花上几千元请枪手代考，如此而已。

被录取的学生，怎能见得真成绩？反正那种靠父母入仕的，与请枪手过关的都差不多。在这种考试的竞争场上如此，那里寻觅真才实学的苗子？我的几个朋友叹息这一代不如一代的教育。

进入 2010 年，当权官僚后代，逐渐取代统治，所谓“老子打下江山，儿继位”，中共太子党渐渐得势。尽管胡锦涛用“和谐社会”掩盖太子党间日趋恶化的内斗，但官僚腐败，民怨沸腾加剧了太子党间的内斗。

在第二年中东茉莉花革命期间，在民主潮流冲击下，中共体制越益腐败，民主运动越来越显示取代独裁专制的趋势。

2009 年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从我区公安局长谢某家中搜出的现金就达两千万，谢某任职仅一年，这便是他的“政绩”？其实而今中共当官的，包括那装正神的薄公子，哪个不双手沾满大陆无辜百姓鲜血，哪一个不在任内不成腰缠万贯的富翁？

本次运动中，市公安局长文强被抓，接着，检察长乌小青在看守所里自裁市长王鸿举被免职。老大们称王称霸，平日里，哪一个老百姓都不敢正眼一视！啊！原来我居住的直辖市，穷的穷，富的富，却是一帮黑帮的乐园。

有人若要展示一下，不过是腐烂窝窝里的苍蝇耗子，翻出来令人呕心。黑幕里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东西？再瞎的人也可看到这样腐败的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第二节 台湾是中国的希望

想来台湾当局不会忘记，从中共建国之日起，三十年间，借口“镇压反革命”，前前后后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毛泽东还不甘心，还要制造一个“五类份子”，对他们的家属肆意残害，三十年间成千万的中国人冤死在运动中，五千万同胞被饿死。这个数目比抗日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至今侥幸存活者，每逢天阴下雨的夜晚，还依稀听得到死者从天空里发出的悲泣声。

当年逃亡到台湾的人更应牢记，若不是海峡的阻断，毛泽东定要“宜将趁勇追穷寇，”追着杀尽一切国民党人，好像杀不完他们，留下他们就留下了祸根。

（一）不该出现的

2005 年 5 月台湾国民党负责人连战首次访问北京，他把这次仿问称为“破冰之旅”。倘若中国人一时没看清国共双方，谁是内战和分裂的罪魁？谁是陷中华于落后的祸首？那么这半个

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台湾海峡两岸的同胞，已看得很清楚了。

特别是现在，事实证明三民主义才是求富强的中华坦途！而中共所主张的才是一条绝路。

可是，中共一直对台湾的成就“恨得要死”，时时刻刻都想消灭这个“异类”。中共享自已行动再次证明它是多么邪恶。

连战在向北大师生发表“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一再声称：“国民党现在要做五件事”，可惜他所说的五件事，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如果从 1949 年算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国民党在小小台湾站住了脚，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治理台湾拿出来与中共比试的，无非是顺应了台湾民众民心的民主政治！！

现在国民党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事，便是扩大民主政治制度的成果，向大陆的执政者和民众表明，要想求中国的统一，大陆应当尽快向民主转型的路上走。

值得一提的是，连战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此行（哪怕是做做样子）去慰问一下多年生活在中共压迫下，被残害的当年国民党人的家？去那些被中共害死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和将士送上一个花圈？

可知这些牺牲者是在抗日战争中用生命保卫這片热土的民族英雄！他们才值得国民党痛心，对他们的抚恤才能赢得人心，激厉保卫民主台湾战士的士气！也才能赢来台湾本土人民的民心，否则像弃如敝履般抛弃他们，就是抛掉了民心，今后怎么赢得执政的支持者？

不知连战在接受中共款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住的地方竞是瀛台，这个地方是当年清朝未年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安排他住在这里，是巧合呢还是中共有意的暗示？连战此行只能使人相信，国民党当今领导人是一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但是，刘阿斗是不能校仿的啊！

如果正如连战在北大的讲演中所说：“两岸所走路的方向已使我们两岸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小”，那么他应当强调的是，“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从毛泽东的阴影下，走向同我们的差距日渐缩小的道路上”。可惜他的演讲中却让人听不出这个意思。

他还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联合中共治台独’”这种提法犯了社会学最基本错误，曾经不共载天的敌人，在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错误立场时，就忙着认作联合的对象，来对付本该由台湾内部的和平竞选解决的台独问题。

大陆在毛泽东时代经济上一穷二白，连当年邓小平都惊呼堕入到崩溃边沿，这几年修了点高楼大厦，却陷入高层争权夺利，人民贫富分化，中共上下腐败不堪，老百姓依然过很苦的日子，尽管中共刻意维持极不稳定的民心，然而群体事件逐年增加，国民党当局急着向中共示好，难道他们是瞎子？！

在台湾民众的努力下，不但在自然灾害特多（三百年前还是一个荒芜的小岛）的条件下，建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政治上进步的宝岛，这其中与国民党曾付出的代价（包括大陆上好多人的牺牲和奉献）密不可分，无视这一切的人，小看人民的贡献不觉得可耻吗？

蒋中正说：“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置个人生命于度外。”继承人连战可曾记得？礼义廉耻

四个字概括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精髓，这个精髓已被中共完全破坏，而只有原台湾国民党人才把这“国之四维”继承了下来，难道连战在继承和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是大非也分不清了吗？

特别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大陆上本该回首这一页，真诚悼念那些在抗战中浴血牺牲的抗战将士，建立抗日纪念碑，并在上面刻记英雄们的伟迹，抚恤他们的后代，但他们除做些表面面姿态，并没有任何实在的措施。

抗日战争中，面对着装备和训练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动员和组织了全体人民，用血肉筑起抗日的万里长城，出现了空前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

中共却还在抹杀事实，将抗战的功劳掠为己有。编写和拍摄了大量影视剧，继续为中共趁抗战中，国民党全力抗战的机会，拓占割剧势力范围，制造摩擦的阴谋涂脂抹粉。

更有甚者在“内战”中，共军大杀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抗战的国军将士，毫不软手。

不妨让我们都来回忆一下当年的抗日战场：国民政府投入军队，历经南口战役，泸沟桥保卫战，太原会战，忻口会战，娘子关保卫战，淞泸保卫战等大会战二十二次，有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负伤不致被日人生俘，杀身成仁。

以淞泸保卫战为例：参加当年会战的老兵易谨，劳声环回忆往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们亲眼看到有的师团投入战斗，不到三小时，便牺牲了一半，在残暴的野兽面前，抗日将士除了尽忠报国，团结杀敌，再没有其它想法！淞泸战之壮烈，振憾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称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在这场战役中，半数团职以上将领以身殉国，使骄狂的日军大量伤亡，空军炸毁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海军第三舰队旗舰，迫使日军改变原来的战略计划，并为国民政府西迁赢得了时间。

整个抗日战争，国军陆军三百二十余万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空军六千多名血染长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全部覆没。

现今大陆人又知道不知道，让国际刮目相看的是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他以伤亡一万七千人的代价毙日军十万，成为皇军克星，使日本司令部丧胆。另一位让日军丧胆的抗战英雄张灵甫，在长沙会战中夜袭张古峰时掉了一条腿。这样的英雄，却被中共诬为杀人魔王。

而中共吹得天花乱坠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太原会战的小部份，也只打掉了一支日军运输队。另一个虚构的李向阳更是无中生有，而真正让日人闻风丧胆的委员长卫队，以两个营阻击进攻南京的一个师团，每个卫队士兵阻击着 50 倍于自己的日军。

因抗战的胜利，才扭转了近百年来中国被列强分割的极为屈辱的历史。

这才是中华民族之魂，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中共抹杀它，除了暴露自己民族败类的本性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再举一例，今年人们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9 月 3 日在重庆竟发现了："一位死去的将军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这个日子"，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朱鸿勋将军的坟墓，首次暴露在记者的镜头下。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身经百战，声名显赫的抗日将领，竟被埋在重庆南山黄桷垭的一块红苕地里，长眠达半个世纪！他那在天英灵何等悲伤？而中共不肖子孙并不以此汗颜。

1937 年，泸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国军 53 军与日人将战于黄河南北，晋鄂之郊。朱将军不为寇慑，奋勇率军而起，1940 年宜昌市相继陷落，他率军进驻湖北境内藕池口，使日军挥戈南下的计划不得实现，1941 年除夕，他率部偷袭日军，日军利用空军反袭，朱将军饮弹牺牲。

牺牲后，蒋中正代表中国革命军，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当时因湖北是日本沦陷区，国民政府将其遗体暂时埋葬于重庆南山复兴村，准备抗日胜利以后，运回他东北老家安葬。

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便迫不及待的挑起了内战，东北三省悉数为共军占领，致使国民政府安置朱将军遗体的后事，便被耽搁下来。

共军占领重庆后，便把当年浴血奋战的抗日英烈，弃之如敝履，长达半个世纪，他的忠魂无人照料。将军坟茔早已烟没在南山脚下的红苕地里，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迹。

1958 年"大练钢铁"时，八个大汉用铁锹硬是把将军墓碑撬出来，打算用来砌练铁炉，由于碑石仅十厘米厚，根本不够作炉圈，故将它改作炼铁厂伙食团用的水缸。石碑被撬出后不久，人们将墓石等材料拆出，充作练铁炉的材料，将军墓横遭肢解。

谁也说不清将军的尸体被弄到哪里去了？成了实足的游走在南山笋林荒郊中的孤魂野鬼!！六十年代初，铁厂垮了，一个村民见铁厂的水缸盖材质不错，便请人把石碑抬回家来，充作猪圈石，后来猪圈拆了，石碑又改成了洗衣石。

像这类的事，在中共统治之下可以说是绝非仅有。这种辱没先烈的耻辱又该由谁来承担，谁来洗雪？

两天后（9 月 5 日），媒体又报导了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牺牲事迹，总算使中国老百姓对真正抗战的中流砥柱，得到了一点支离破碎的信息。这还是因为李家钰之子,李克熙曾任重庆人大副主任之职,这一报导就是记者在组织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访问李克熙所写的一篇文章!

1937 年抗战爆发后，李家钰率二十二军从西昌徒步北上，辗转跋涉四十余日，到达山西前线。1938 年 2 月，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攻东阳关，想一举驱逐驻守长治的李家钰部。李亲临前线，明知在装备上数量上，与日军无法相匹敌，仍率部殊死博斗。

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迅社报导长治守军，几乎全军覆灭，子弹打完后，继以拳头、大刀、乱石!！城破，巷战中击毙日军两千……1944 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大战，同时强渡黄河，5 月 21 日、36 军奉命阻击日军西进潼关，结果在行军途中遭日军伏击，李家钰阵亡。

阵亡后家人留下血衣带回四川，1944 年 6 月 13 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7 月 16 日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下褒扬令，入祀忠烈祠。1945 年蒋总司令题词：“勋烈常昭”，其夫人安淑范，亲自撰写挽联：“马革衰尸还，是男儿得意收场，亦复何恨？”

抗日战争喋血沙场的英雄千千万万，可与日月同昭，我大陆作家却在中共操纵下放弃了这许多的素材不去讴歌，而是写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范傻儿”，以他的粗犷无知和鲁莽，博取低级市民一笑，岂不知日寇的残暴，中国军队在抗日的鼓励下的英勇牺牲，怎么容博得一点票房价值？

中共这样做不正好暴露出了他们的汉奸嘴脸吗？无数的抗日英烈在天之灵，怎不对这般不肖子孙扼腕长叹！

特别要再提的，在轰轰烈烈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为取得割据地盘，在日占区助日军剿杀正浴血奋战的国民党抗战部队，更有甚者在大陆建政后还以镇反为名，大肆屠杀抗战有功的国民党将士，据最近统计并披露的材料，被杀的仅将军以上军官就有百名，将士三百万！与整个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相当！

中共欠下中华民族的这笔血债该怎么算啊！

应告诉后人，今天大好中华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是当年英雄的抗日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而独夫民贼毛泽东居然说，没有日本入侵就没有中共今天的天下，并表示不要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赏。对这样的执政党，台湾凭什么向它示好？

中共接待连战“破冰之旅”中，也受到各界“热烈”的欢迎。不过大家马上要联想到当年国内战争中，中共与八个小伙计，也有城下之盟，答应组成反蒋统一战线，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但一经夺得了天下，先前的诺言全都在“不断革命”口号下撕得粉碎：那怕小伙计稍对“党天下”表示了一点异议，例如小和尚瞿安平，竞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掩盖自己背信弃义的嘴脸，他们还在借八个已成为政治僵尸的小伙计，玩什么风雨同舟，长期共存的骗人把戏。

每逢过年过节，为了赢得一点民主的美誉，把他们从棺材里扶出来，招待一翻。其作用难道不是胡弄给国际的民主力量看，做给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看的么？

我看今天接待孤悬海外台湾的一个在野党主席，正好说明毛泽东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今天的中共，已将先前的伪装剥去，被蒙骗的老百姓已经觉醒，失去民心是当今中共最感恐惧的。这使我相信由贪婪、权欲、欺骗发动的战争，虽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将失去一切。

如果中共真的要洗心革面，把自己溶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他们早就该向人民清算毛泽东所犯的累累罪行，天安门城楼上那魔头像，该早就摘下来了。对历次运动受到伤害的无辜者早该赔罪，认错。然而他们依然坚持一党专制，依然在抹杀历史真像，依然对他们迫害过的无辜者拒绝陪礼道歉。

在这种基本态度没有明朗之前，连战慌慌张张跑到大陆上来向中共示好，这不是“好日子过得不自在了”么？，国耻忘了，甘做李后主，蜀汉刘禅这样的亡国之君，又是为什么？

（二）对台湾的希望

六十年来，当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人在蒋总统领导下，忠实地沿着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道路走，经过蒋氏父子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终于民主建国成功。民主政治实行以后，台湾人心稳定，生活富裕。

现在大陆上，人们翻墙就可以听到，频频传来大陆民众越海峡之险投奔台湾的消息。

在民心归顺民主的趋势下，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2010 年一位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发表了精采的讲话。

她用赤子的情怀，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眷恋，唱出了一个两岸人民共同的一曲：“中国梦”。

她明确地指出：“礼，义，廉，耻”是中国梦的基石！她以泣血情怀，用周厉王纵容卫巫的故事相告戒，坚决地摒弃了中共以军事为后盾，政治上唯我独尊，经济上炫耀财大气粗，欺压民众，残害异议人士的“崛起”。无情揭发“血浓于水”的欺骗，这无疑是对中共病入膏肓的“独裁病”下的一剂猛药。

她特别介绍了台湾选举的“乱”，说这种人人都有发表主张的自由权，使各自见解充份发挥出来，怎么可能“清风雅静”？所以表面看起来的乱才是“民主政治”的必修课，然而正因此，才能使决策真正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台湾快速进步，因此雄踞海峡，为表面强势的中共国所畏惧!

特别是讲到台湾小学教育中以“反攻大陆”为教材的那段，令中共闻之胆寒，1976 年毛泽东输光了所有政治资本，致使被他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邓小平，堂堂皇皇走进中南海，抓了毛钦定的接班人下了大牢。直到今天“九常侍”明争暗斗，使中共王朝腐败，逃不掉灭亡下场。

中共长期的打压和收买，对台湾人也是一个巨大考验，1948 年至 49 年，台岛军人，有许多投共的，例如当年空军中就有徐迈，韦大卫感到走投无路，在中共收买下“驾机叛离”。

结果过了几年，他们全都被划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遭到残酷镇压，他们本人在折磨和监禁中纷纷选择了自杀，一家老小沦为黑五类，逃不掉家破人亡之灾。

中共对人性的扼杀和破坏，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台湾女作家琼瑶，以一部《还珠格格》电视剧，赢得了大陆观众的交口称誉，因为被毛泽东扼杀的人性，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得以恢复，人们对人性的渴望和追求便成了《还珠格格》热产生的原因。

另一位台湾的歌手邓丽君，毛曾用淫晦歌相侮，然而她的歌声以颂唱和平、自由、爱情、人性进入普通的千家万户，她的歌，滋润着亿万被毛共扭曲的中国百姓的人性。“小城故事”用友谊化解敌对，几乎成为中学生人人都会唱的歌。

“四季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多愁”凄惋美丽，就是她最善长的爱情歌曲，脍炙人口，打开毛封闭多年的人性窗牖，将人回归到本来面目，而不是相互残杀的嗜血野兽，在文化封锁的毛泽东年代，在海峡两岸只有用大炮隔绝的毛时代，却封锁不了邓丽君的歌声！

早在五十年代后期，电视已传入大陆，可是电视作品受到独裁统治的把持，毛泽东时代几个“样板戏”称霸舞台，而邓小平时代，同样禁止优秀的电视作品占据银屏，文化部的官僚们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宁可让低俗，无聊、色情、平庸，占据电视，也不敢让“敏感性”的题材留在文艺作品中。

在中共统治下，像样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能激发人的良知、友爱和正义感的影视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廖廖无几。

最近，文化部的统计表明，国产电视剧每年有一半压仓。就是搬上银幕的收视率也极低，他们惊呼每年有二十个亿白扔了，这已经说明独裁统治对文化实行专制的结果了。

几位报社记者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在私下对我表露，普遍感到“压抑”，他们说心中最大的苦衷，便是不能说心里话，真话。文艺工作的装腔作势和假话连篇，反映中共不得人心。

而腐败文化趁机在大陆上泛滥，更促进了大陆社会的动荡不安。

比较起来，还是亚洲自由之声的编辑和主持人，比连战清醒多了。因为他们饱赏中共统治年代里所有的痛苦，知道中共的底细，清楚毛泽东的罪恶和后继独裁者的狰狞，他们才是最有资格的发言人。

他们宁可亡命海外，通过电波飘洋过海，以他们的忠诚，以他们传播的事实，揭穿中共专制的霸道和虚伪，向全世界和大陆上传播着真理之声，而赢得中国听众的爱戴。

前几年，我常在深夜中收听他们声音，了解被中共封锁的世界真象和中共内幕，知道我的同胞们一天都没有间断对专制的斗争，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如同与他们共呼吸、共欢乐、共哭泣，他们的声音和传播的信息。成了我生活的鼓舞和精神食粮。

“了解这世界，探索它的未来”，在亚洲自由之声电台编排的节目中，我最喜欢收听的是马平和史东编排的“一周时事评述”。听他们用雄辩的语言，辛辣的讽刺，直刺中共专制无法掩饰的疮疤和内部的勾心斗角，不断揭发中共出卖领土的卖国行径，使老百姓更好地认识中共政权。

鲁南则以其浑重，低沉的噪音播报的“文学禁区”节目，把听众带到了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听到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从地下发出来的呼声，使我难忘那个惨痛年代独裁者所欠下的笔笔血债。

亚洲自由电台之声以令折服的语言，在浩翰的天空中织成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无情地射向中共所设置的新闻封锁网链，让一切阴暗角落里用政治欺骗蒙骗老百姓的鬼蜮，现出原形，无法继续得逞。

所以，中共对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竟使出了痞子惯技，根据亚

台的波段和频道，播放强大功率的噪声，在它们播出的时间，同步播出。真理之音，被一片噪声包围，使渴望真理的中国大陆居民，在刚刚得到一片阳光后，立即陷入嘈杂的锣鼓的喧嚣中，回到又聋又瞎的状态。

大陆本属国民党，是毛泽东依靠史大林洋爸从国民党手中抢去的，“反攻大陆”合情理也合时宜。

当然，如果忌讳这党那党，中国人要选择什么制度？民主和自由，得由中国人自己决定，那就在大陆实行选举吧！

把枪口挪开，让人走上大街发表施政的竞选演说，像台湾那样，让选举出来的人组成政府吧！中共你们敢吗？而台湾的人民就凭这点精神建起了这棵美丽的东方明珠，今天中共却用上千枚火箭相虎视，你们真要做民族大罪人，受后代子孙的万世唾骂吗？

第三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真善忍”与“假恶骗”

不愿放弃独裁衣钵的中共执政者，明白自己处在人民的对立面，六四以后，特别加强了对民主运动的防备，对于萌芽中的反政府苗头一经发现，立即斩断。但是腐败使自身百孔千疮，小心防备反而增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举个例子来说明江氏集团的惶恐状态：许多年来中国大地出现了练气功强身的修练团体，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八十年代最著名的有香功和法轮功。九十年代，名目不少的练功者从山林，寺庙中“脱颖”而出，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尤以法轮功传播最广。

由于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反对奢侈，练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颇得普通老百姓的青睐.，练功人数迅速扩大，几年来参加修练的学员发展到数千万之众。

中南海广场因环境安静，空气清新，历来是老百姓练功的去处，选在这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渐增，守卫人员以中央首长要在这瑞安静办公为理由，横加干涉。试图禁止学员在这里练功。

干涉的官腔，惹恼了练功的老人们，开始相互攻讦，警卫人员用武力强令禁止，江泽民用毛泽东镇压百姓的章法，用暴力驱散练功的百姓，并在 1999 年 7 月 22 日，以中共中央民政部、公安部联名发出不准修练法轮大法的通知。用一顶新帽子“邪教”扣在法轮功学员头上，取缔了法轮功。

于是，一起本来很容易协调安抚的练功场地纠纷，变成了与全国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的对抗，这便是独裁统治的恶例。

练功者的反抗怒火，迅速燃遍全国。江泽民效法毛泽东，出动全国警力搜捕坚持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拘押他们，查封数以千计的练功站，焚毁他们的练功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邪教运动。

为了对付这个人员巨大的练功组织，成立了“630”专案办公室，恐怖再次笼罩了大陆，数以千计的人，因邪教罪名关进劳教场和精神病院，进行肉体和精神摧残。借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制造惊世丑闻。

被迫转入地下练功的信徒，并没有屈服，他们像当年活动在日本鬼子占领区的游击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揭露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

许多法轮功练功学员被迫流亡海外，将中共破坏信仰自由的恶行传遍了全世界。他们与流亡海外的反中共力量结合一起，形成海外声势浩大的统一阵线，使江跨出国界如丧家之犬，处在一片喊打声中，凡江泽民参加的国际会议，必遭受自发组织起来学员们示威抗议。

江泽民的霸道源出毛译东，证明，毛泽东在大陆阴魂不散，国无宁日。

打开法轮功的书，明白它的宗旨是提倡“真善忍”。“权”“钱”交易和物欲横流让人们窒息，他们用“真善忍”对抗中共的“假恶骗”。

记得我是 1998 年，在南坪的打工现场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印发的小册子，从中了解了李宏志其人，但初初接触印象很浅。

1998 年春天，有一天，老马公司的一位管理生活和伙食的女工周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老孔，你要不要戒指和项链？”我好奇地问她，我从未带过这些东西，你问我是何意？

她说：“我想把我戴的这些首饰卖掉，托你找个买主。”

我说：“你缺钱是吧，要不，好好戴着戒指折价卖掉岂不可惜？”

她说：“我因为心脏不好，长期失眠，甚是痛苦，三个月前我看到我的老邻居李大妈的老肺气肿居然好了很多，问她吃的什么药，是怎么治疗的？她才告诉我，这是她练功收来的效果。在她的劝说介绍下，我同她去了石坪法轮功点，加入了他们练功行列。

现在已三个月了，果然见效，失眠，气紧，心律不齐的毛病大有好转。听老师指点，练功时不能穿金戴银，练功先要练心，做到心静，欲敛，方能收效，并说法轮功学员要三忌，忌贪、忌色、忌追求功名。现在练功收到了实效，我的首饰留着没用处，倒不如卖掉，给孙子上学用。”

又过了几天，她给我带来了“转法轮”的小册子，上面除介绍法轮功宗旨，还附有练功的图片。从那时开始，我更了解法轮功，江泽民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却启发了我。联系我的一生经历，把毛泽东的学说定为迷信和邪教才恰如其分，中了他的毒的中国人，有几个是保留了做人良知啊！

没想到 2002 年我重新回到马老板公司打工，有一天又碰上了这位周师傅，问起她现在还坚持练功吗？她摆摆手压低嗓门说：练功站早被捣毁了，我还受到了追查，但我回答他们说：“我这把年纪用不着他人来训斥我”现在为了躲避麻烦，明里不练了暗中我还坚持天天练，否则心脏病要发作！”

说完后沉思良久，叹口气说，这么好的功被禁了，那些公安对贪官污吏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个什么世道啊！说罢她又大骂江泽民，说他只能在国内老百姓面前充狠，他出国访问那一次不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臭鸡蛋"迎接"，只好像蛤蟆一样躲在防弹车里，连面都不敢露……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法轮功在海外以其"真善忍"的人性魅力，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广大信众，他们在国外创立神韵，用美丽的艺术，真正继承并发扬了华夏传统文化。他们用事实在全世界面前揭穿中共法律的随意，虚假，中共是一伙无法无天，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的恶棍，毛教才是祸国殃民的邪教。

特别是中共借审讯为名，对无辜者大施毒刑，割摘信徒的器官，活显出中共野兽面目，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庭，承接了海外法轮功信众的起诉，正式以灭绝人类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天道有常，审判结果罪犯的罪名若成立，从此这些人只要跨出国门一步，在世界任何地方，法院即可按引渡办法，立即进行抓捕。看来他们总有一天会以罪犯身份接受人民正义审讯的，而今天距"邪教"法之颁布才廿年。

（二）群体事件——民愤

毛泽东死后，全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1978 年北京西单墙民主运动尤具代表性，例如北京民刊《探索》主持人魏京生，与此同时相继有任畹町，《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民刊和民众组织联席会召集人刘青人，上海人权协会王辅臣，武汉市朱建斌等人成立武汉民主墙，与秦永敏合办民刊《钟声》，他们都为大陆民运开道，是大陆民主啟蒙的先師。

然而这些民主啟蒙的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中共残酷的镇压，"六四"以后，老百姓仍被禁锁在专制主义的牢笼中，基本权力被剥夺。争取人权的民运领袖们纷纷被捕，有的逃亡海外，在海外与六四民运人士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相呼应，成立以争取实现中国民主为纲领的民运組织，携手战斗。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正处在独裁全面解体的过程，用和平方式去推动顽固的中共结束中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同去世界接轨！是大陆的主流。

中共推行的专制主义的罪孽越深重，所背的包伏也越沉重，中国注定还会徘徊在表面平静，而内部动荡的年代。它那摇摆不定的步伐走向何处令人怅惘。

邓小平继位后，出于与毛相同本性，除吸取经济上到了崩溃边沿的教训，提出经济建设是硬道理外，原封不动的继承了独裁衣钵。

现今中共在制定国策时，无论开中共党代会或人代会，都清风雅静听到一个声音，看一个表演，抬着傀儡：一起举手，一致通过。

专制主义视民主为大敌，它拒绝任何民主制约，经济虽然发展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却无法控制了。人民被激怒了，"六四"燃起燎原大火，证明独裁统治必然引起政府与人民的对立。

所谓公民的合法权是指选举权、人身自由权、生存权、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这些各国宪法公认的权利，一直被独裁的中共诬为资本主义自由化而被剥夺，中共统治下人民是没有任何自由权的奴隶。

反对失业，维护就业权；反对对居住房的强迫拆迁；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征收苛捐杂税；反对不顾生存环境的建设；反对对农民土地的强迫征用等等。所以目前所指的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绝大部份还仅限于维护公民的生存权。

“六四”，中共在光天化日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可见它的本质多么邪恶。“六四”运动是因贪污腐败，中共各级政府大量侵害老百姓生存权的非法行为所引发的。

说这些年来“六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就是指人民在它的启发教育下，懂得用维护自身的权利向独裁作斗争的道理。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证明，老百姓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任人宰割不知反抗了。

对于贫穷老百姓手里极其有限的钱，都要收入国家金库，这本是专制政权的“绝招”，从上一世纪末期因扶助民营企业而允许民办银行建立，是经济的一种进步现象。可惜没有多久，对民办银行便以绕乱国家金融秩序加以取缔，给取了一个新罪名：“非法集资”。

后极权时代，中共对钱的好处有了浓烈的兴趣，民间那点可怜的钱也成了他们聚敛的对象。2001 年，中共突然决定，冻结所有非国有银行的民间集资，穷苦百姓为了买住房、准备儿女上学、筹办婚事、生病住院等等需要，平时辛辛苦苦换来的钱，集存在这些银行中，不说清原因便加以冻结。

加上中共素有霸占民房，以没收名义强抢老百姓钱财的恶迹，这个荒唐决定刚一出炉，立即引发了大规模民间抗议。人们立即聚集到各地政府的衙门口，表达强烈抗议，我看见各集资银行外的马路上，被抗议者占满。

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决定!”；“强烈要求政府归还我们的血汗钱!”；“责问政府，你们的做法同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吗？”；“朱镕基，你就这样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当的总理吗？”……

马路再次被老百性围断，面对愤怒的民众，集资银行的职员吓得紧闭大门，龟缩在工作室不敢出来。这样相持着不知过了多少天，集资银行向每天围聚讨债的民众贴出“安民告示”，说：“大家的钱已转存国家银行，请大家保存好集资的凭据，听候通知，到国家指定的银行兑换现金。”

至此，市民不知多少不眠夜，悬在心头的大石头才暂时稳住。

以后市民们不断的拦马路、上访各级政府、围银行，也不知闹了多久，集资银行门口才贴出了“兑现通知”，叫集资者根据集资金额的大小，按口家利息分期分批兑现。整整闹了一年多，一直悬着的贫苦市民的“血汗钱”本金，终于在市民们群起反对所施加压力下，重新要了回来。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出街，就会看到写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标语到处都是。市民的交谈中少不了这个话题，也不知多少家庭主妇与丈夫为此口角，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贫穷的中国老百姓还要对自已糊口的工资，提心吊胆，害怕被中共“没收”了。

这起因集资引发的民运整整持续了五年之久，侍到归还时，本金要了回来，但利息取没有按集资银行所承诺的偿还，而是按国家规定的极低利息偿付，从此老百姓手里的钱又被国家控制起来了。独裁统治者搜括民脂一贯不择手段。

大家都知道，毛的独裁统治是以国家垄断为经济基础，工业、矿山、能源一律实行“国有制”，农业实行集体化。

人民公社这一毛独出心裁模式搞得全民饿饭，天怒人怨，邓小平就是从这里找到突破口，从被打倒的位置上翻身取代毛指定的接班人，进到了邓小平时代。

在“改制”名义下掀起一场由国有变私有的运动，实际上把国有这种独裁占有，变成中共权贵掌管的“公司”“银行”“部门”所有，在权力与金钱等同条件下，吃亏的当然是一无所有的工人。

接手老板在中共的卵翼下，第一件事就是把“多余”人员裁减出去，大量工人被解雇，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侯，他们走上了维护生存权之路。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除各级中共大小官吏贪污、包二奶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外，民间闹得最凶的便是“下岗”。

所谓下岗就是失业，穷人一家因此而断了生活来源，刘欢一曲“再从头”的歌，响遍大街小巷，也不知唱哭了多少下岗、待岗者。

命运让他们蒙里蒙懂跟着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安身立家，已将一辈子都贡献给这“家”的四、五十岁的老职工，怎么也没想到，中共竟无缘无故抛弃他们，家破灭了，他们已到行将退休的年纪，便被轻易甩问街头！一家人生活无着，夫妻因此闹离婚，家被撕裂的悲剧我没有统计，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附近一家电器器材厂破产后，一对夫妻双双下岗，家里已有半年没买过肉。有一天中午，两个幼小的孩子看到邻家孩子端的碗里有红烧肉，便吵着妈妈要肉吃。

父亲心里正烦，突然把左手摆在菜板上，右手提起菜刀，眼睁睁挥刀向自已左手指头砍去，只听到大女儿惊叫一声，看着父亲从菜板上捡起砍下的血淋淋手指头，怒目园睁向小儿子甩了过去，吼道：“给你吃！给你吃……”

被惊呆了的两个孩子抱在一起，呆对双手血淋淋的父亲。

说起肉，又使我想起邻居一个下岗工人家里已有好几月没买过肉，父亲为满足孩子吃肉的要求，有一天父亲到肉店里偷了一块不到一斤的猪肉，不料被人当场捉住，肉没偷成反而挨了两耳光羞侮一顿，回家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一位母亲因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生了两个女儿，男主人因下岗，丢下妻女独自外出打工。先前还寄点钱回家，半年前钱也不寄了，电话从未打一个回来。女主人替人帮佣，但要维特两个孩子的生活，早就无法维持。

有一天清早见街上还没有几个人，牵着才六岁的小女儿，经过街心池塘，突然停下脚步指着池里的一双鞋，叫女儿下水去捞上来，趁女孩不备，她竟将孩子推入池中，仓黄逃离。

池中孩子大声呼救，过路人把她从水中救起。在目击者指证下，派出所民警抓走了孩子的母亲。从破屋里带走这女人时，女孩哭喊着一路追着带走她母亲的警车，喊道，妈妈没有把她推进池塘，她的妈妈是好妈妈，一面哭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而警车里的妈已经泣不成声。

周家岩下的一个小厂破产后，由于生活无着，有一家人，男的勒死自已的妻子和女儿后，上吊自缢。

这种悲剧在大陆上充满大街小巷，人们听多了，习以为常也麻痹了。然而这些大陆正上演的幕幕悲剧，虽不像毛泽东时代，大批饿死、成批枪杀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但这些老百性的斑斑血泪天天都在发生。

2001 年 8 月 26 日下午 5 点多钟，我正在杨公桥寻公共汽车准备回家，见公路中间，聚集了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簇拥着一些牌扁和标语组成的方阵，将马路拦断。方阵上方扯起一幅横亘马路的横幅，上面写着：“失业工人争生存有理，防暴警察无理打人有罪”十九个大字。

一股文革的遗风，陡然袭入我的眼帘，那栏在路正中的牌扁上方，贴着一张毛泽东彩像，下面贴着“请愿书”，结尾上写着灯泡厂和水泥厂的职工签名，那上面横七竖八的写着几百个名字。

牌扁的后面，是许多由老头老太婆手执的竹千板做的标语牌，每一块标语牌都贴着毛的像，内容相似。几百个老人和他们簇拥的“牌扁－标语”方阵，俨然像一座祭神的坛，坛的前面，并排正襟危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已是下午六点钟了，这些老人表情严竣，严阵以待。

我挤进人丛，听围观者七嘴八舌议沦：“工厂是国家的，现在破了产，工人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就叫他们回家，物价那么涨，叫人怎么活？”

“活不下去了，年轻人还可以跑生意，做小工，老人只好饿饭。”

这马路也扎了快一个月了，警察打伤了人，把带头人抓进看守所，关了十来天还没放人，市里下来了几个人，谈判了几回，什么也没解决。带头的人被警察打成重伤，住院一个星期，医药费也无着落。

一辆满载身穿迷彩军装警察的警车，就停在附近，他们手中个个握着警棍和电击棒，路人说他们打人从不手软。

这些原国营企业工人，现在因破产而处在生活无着的人们，他们落到这种地步，都是中共造的孽。现在他们用堵马路的方法，意在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

毛皇上为控制国计民生，将工人集中在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从事生产，给极低的工资，起码的供应，以苟延他们的生命，禁止他们自由迁徙。

可惜又犯了中共安定大局的忌，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选择拦断公路的办法打着毛旗反当局的策略，争生存权的斗争，却不敢明目张胆的提出，足见中共当局的霸道。

他们可以在各种年会上称台湾和香港居民为“同胞”，却狠狠咒骂被生活所迫起来反抗的工人为暴民，动辄以警棍相对！

本来代表国法维持秩序的警察，在公众心目中应是公正的化身，但是毛泽东把它变成了维护统治、施行暴力的工具，从此它与老百性处处作对，《血纪》上、中两集，记述监狱老管的种种暴虐就是最好证明。

可以说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维持正义和良心的老管，不久前在上海发生的“袭警”事件中，公共与论为什么异口同声支持杨佳，说他是抗击暴力的英雄，而异口同声谴责警察？

坐落在重大下方，靠嘉陵江边的重庆造纸厂，因为技术落后，环保能力极低，一直是毒气、毒液的排放地。我没有资料提供死于该厂排放毒气毒水人数的统计数目，单知该地区属于癌症高发区，该厂职工一般寿命只有四十岁。

在这种恐怖笼罩下，该厂的“领导”经中共地方组织纷纷外调，离开了这个鬼门关。职工为改善自已的生存条件，频频上访，被拒绝后涌上街头，曾听说他们截断了江北区观音桥大道，声势很大。直到 1992 年在市民的强大反对声中，该厂宣布停产。

停产后，该厂工人连续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 2001 年工厂破产，市政府按工人工龄每年九百元买断工龄后，工人们带着被污染而受到伤害的病体离开工厂，自谋生路，还要按规定交纳养老金，直到退休。今天那里的工人们还在为增加伤残、毒害补偿费向政府进行长期的交涉和斗争。

生产特殊钢材的重庆第二钢铁厂，工厂改制后，生产日渐萎缩，面临工资发不出的危机，原先慕集工人的股金又退不出来，工人生计面临威胁，引发了持续的截路斗争。中共的特务和特警部队在对付他们使尽了手段。

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表达出新的内涵，他们意识到自已在中共统治下的奴隶地位，原来的中共党员纷纷宣布脱离中共组织，并公开向社会宣传。

双碑是殊钢厂的中心，工人们拦断了双碑通往市中区的路段。经过很长时间斗争，中共把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另外开通北碚到重庆通道。军警们紧紧包围了罢工范围，禁止罢工车辆越出，封锁与外界的通讯，严禁记者采访报导，隔断拦路者与外界一切联系。

有一天，拦马路通重庆方向开来了几辆军车，向拦路者说：“重庆市政府正在哥乐山上开工作会，特邀请你们上山当面提你们的条件，市长在那里公开答复你们，特派我们来接的，请上车吧！”指挥部听到这话正在犹豫，却经不住大家七嘴八舌，性急的已爬上了前面的军车，

接着大家喊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上哥乐山看个究竟"便一齐上了车。

等到车队开到哥乐山，大家下了车，看看开到的地方，却并没看到任何开工作会惯有的会场布置，也没看到一辆市政府的小车。正要询问开车人，司机们已纷纷坐上各自的驾驶台，军车已经启动，开足马力一溜烟的跑了……

工人们对中共堕落到将工人骗到哥乐山倒掉的行为极为愤恨，殊钢厂拦路请愿中军警曾扬言："打死人算不了那回事，老百姓只要有几万块钱什么事都可搁平，钱不过是国家拿出一叠纸罢了。"

可见在事件中，军警奉了中共指令，对拦路者进行抠打和抓捕，并打死人，然而这留下新的血债又算给谁？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中共对闹事者也作了"善后处理"，对死者安埋，被抓的参与者释放，拦路者大多都安排了工作，上了岁数都作了退休或内退，将他们交给了民政部门。就这么一些"实惠"也是工人十几年的长期斗争换来的。

在我生活的城市，各"改制"厂矿的职工，纷纷为争取增加遣散费和抵制由"资方"单方面制定的改制方案，走上街头，举行频繁的示威游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山峡洗衣机厂，他们选出代表与区、市级地方政府交涉，进行为时十几年的斗争。

就是最没有声势的专用汽车厂，也在厂门张出横幅，遣责趁改制侵吞职工们多年创造出来财富的硕鼠，几次派出代表到国资委和机电公司（中共指定负责改制的机关），进行历时六年的"破产－改制"谈判，为"亏损"而被抛弃的职工，声讨无能腐败的中共官员。

民运推动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公交公司为争得自身待遇罢运；摩托车经营者为抵制交通警察的无端罚款，动辄扣车，在北碚街上联合"的士"司机进行过多次环城示威。

此外为反抗市政管理机关，工商局无止境无理增收高额的营业税、场地租金而开展的小经营主的罢市斗争；

教师为政府对待遇的承诺食言，边远地区为极少的工资而罢教事件累次发生，总之各行各业贫苦的职工向中共展开的斗争，方兴未艾。

以上所列均我亲眼目睹，亲耳所闻。

工人为维护生存权的斗争，还带动了市民和农民起来向中共展开维权斗争。村民因争取村乡基层选举的民主普选，向中共基层组织展开的斗争曾遍及全国。河南郑州市南曹乡七里河村 1998 年至 1999 届换届选举中，村民推选的村长提名，被原村中共支部书记杀害，恐怕是农村基层选举一个典型惨案。

这个惨案揭露中国今日的"民选"遇到层层阻力，根本原因是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所致。农村中少数靠权力富有者，决不会放弃使他们致富的，那点手中窃据的权力。

因建筑开发商强迫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涉及贫苦农民生计的反征地运动，一度遍及全国

农村。我母亲当年流放地蔡家场，去年因“开发”渝北区，向该地居住的农民大兴征地，今年三月农民为征用土地补偿太低，与开发商雇用的打手发生多起斗殴事件，被打伤的农民，至今还在为争取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向政府控告肇事开发商。

全国因强迫征地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城市居民因城市建筑，要拆迁他们久居的贫民窟，眼看自己久居的破屋将被待命铲除的推土机推掉，政府却没有安置他们的新居，或草率给了起居十分不便的另一陋室，而引发贫民们的抗议。脚跟脚地跟着拆迁办人员到政府衙门诉苦评理的事层出不穷，发生抠打阻止拆迁的流血事件，成了民间最多的传闻。

胡锦涛所提的和谐社会，原意在维护独裁政体下，建立唯稳体制，但是病入膏肓的中共独裁政体，把“和谐”，当成与他的祖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完全一样的欺骗！

第四节 独裁的没落

1976 年，一代枭雄毛泽东，带着众叛亲离的遗恨，拉下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命债见阎王爷去了。

在他晚年，毛泽东思想已为他的谎言所彻底否定，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信仰危机使独裁面临厄运。国家弄得民不聊生，毛氏深感帝位无人可继，匆忙中，将他的私生子叫来榻前，以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草草完成了帝位世袭的最后交位，匆匆去见专制独裁的列祖列宗去了。

这本书仅从我亲身的经历，如实反映中共六十年来用社会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一步步暴露它的独裁、虚伪真面目，走向灭亡的过程。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目的是迫使整个社会臣服于他的独裁。他将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建立一个新的人压迫人，等级森严的社会。

为了巩固帝位，他甚至不惜使用专制王朝最残酷的文字狱，要人只读他的“经”，强迫人进行“思想改造”，把人的思想禁固在他要求的范围内，不准任何偏离。

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饿死那么多人，也必须按他的路子走！皇令如山，就是他的大臣们，稍有偏离也必须领死。因反对他的“三面红旗”而死的中共元老还少吗？

邓小平并不想改变这种个人为所欲为的统治秩序，只是改变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的禁律，他认为毛泽东所以“失败”就是忽略了经济建设，所以“经济发展”被他列为“硬道理”，摆到了第一位。

人民公社行不通了，用包产到户替代。然而土地所有权仍在国家手中，而在中共统治下，代表国家的是掌握政权的各级地方官吏。这样作把农民变成置于中共地方官吏监督下的农奴，他们随时可以“建设需要”为借口，拆迁农民的家园，驱赶农民背井离乡流落城市。

国有制行不通了，他们可以以一纸文件，对工厂实行“改制”，将剩余劳动力赶出工厂，而把工厂廉价卖给了刚刚新生的小业主，为他们缴纳利税；靠权力将子女以公务员身份安置到国家管理机关，警察，学校，医院，银行，税务，房产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

这样，一方面是以地方权力所有者为基础，直到中央的宝塔式官僚统治阶层：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组成了供他们随意驱使的城市建设廉价劳动建设大军。这才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发展经济”代替“社会主义革命”；用“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代替“平均主义分配”。中国在他的带领下走上的不是人人奔小康，而是一种渗入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

“六四”几乎要改写邓小平历史，在大势所趋之下，他宣布退位，并结束了中共的个人终身制，当然也结束了世袭制，同时以“安定团结，压倒一切”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换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极权时期。

既然，利益向权力敞开了大门，中共内姓资姓社的激烈争吵，暂时的安静了一段时间，太子党们，人人有份何必争呢？毛泽东独裁带来的灾难，邓小平含含糊糊地掩盖着。既不清算，也不继承，结果反而激怒了毛泽东的旧臣们，他们并不安心退休疗养、享受！

而是指责靠权力发起来的太子们腐败，反而替罪恶的毛泽东招魂了。

在这一时期，中共恶习——说假话依然是官方少不了的“党风”。新闻管制，剥夺人权，在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旗帜下，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可是，不受监督，使贪污腐败恶性肿瘤般长大。而今成了对中共政权致命的威协久治不愈。因为“权力资本”只有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才能长大。

随便举一例子：血腥屠杀六四的元凶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的案子。据官方公布 1990 年结案，仅他挪用重点建设资金为他营造豪华别墅就达 3511 万元之巨，收受贵重礼物 55.5 万元，吃喝挥霍公款 165 万元，国家金库成了他任意取用的保险柜。这种‘硕鼠’在中共现政权中到处都是，他们是由一党独裁孕育出来的。

到了 2004 年，“六四”过了整整十五年，这支硕鼠大队日渐庞大，各级公务员、法院的法官，公安刑警队长、检查官、揖私队长、反贪局长等凡与政权沾边的人都争先恐后加入。中共官员有“五十岁不贪是傻瓜”的说法，生怕为官期间错过发财机会，令人终生遗憾。

在湛江走私案处理时，最高法院院长感慨面对媒体惊呼：“在这起走私案中，所有涉及湛江市及海关，大小两百名官员无一不贪！”连逃亡在外八年即将遣送归来的赖昌星，也敢出大话威胁中共：‘我若回国被追究，少说也有上百人人头难保’。可见中共腐烂到什么程度？

据透露这个海关使国家蒙受的利税损失高达数百亿，其中海关官员的主要份子，贪污贿款均在数百万以上。当采访镜头摄下被采访的海关一般职工时，他们竟要绕开采访镜头，不敢回答记者所提问题，要求记者隐匿自己身份，以免遭受“飞来横祸”。

可见，政府与黑社会相勾结，猖狂到了何种程度？中共官场腐败已入骨三分，谁跳出揭

底，谁就逃不掉粉身碎骨的下场。

但，这种腐败终因“狗咬狗”而不断揭发出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自 2003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的十个月中，全国发生滥用职权案 1841 件，造成 6.5 亿元损失，致人死亡 460 人，伤 117 人。

仅从此官方公布的数字看，大陆每天发生滥用权力的案子就达六起，根据中共一贯粉饰太平，虚报瞒报的传统，这无疑还是大大缩减了的数字，真实情况只有让历史来记载了。

另一说明官场腐败的例子，便是买官鬻爵，这种事就是在封建社会也是绝对要受制裁的，一旦被皇帝老倌发现，往往带来“满门抄斩”的后果。故云：“尚利者乱，尚义者治”，“贪夫殉财”便是市井的警句。可在中共统治之下，买官鬻爵却成了家常小事。

仍以报载为例，黑龙江市委书记马德从 1992 年 1 月至 2002 年，十年因卖官所得就达六百万元，马德就凭这种“人事买卖”进入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却并没有伤之毫毛。从他手里买得中共高官的人数涉案人员达 265 人。

其中包括大贪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都是投他的门下入道。据绥化县市各部门靠他得官当上一把手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就达五十余人，以致于他的案子层层受阻。中共官场之黑，马德算是一个典型。

国家官员掌权的可以卖官批条，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收入”。甚至于将统考的考卷，犯罪人所获的刑期，都成了有价证券“入市”，堂而皇之进入流通。雇用打手保镖也成了“自卫”的手段，光天化日之下，买凶杀人，使“秉公”执法者望而生怯。如此猖狂的黑恶势力控制之下，又有谁敢秉公执法？

报纸上偶尔出现抗争恶势力的义勇之士，其报导也限于对付鸡鸣狗盗的小贼，这些报导，新闻记者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光明的饥渴心理支配下写出来的。如此黑暗统治，怎么不发生烟毒泛滥，车匪路霸横行，杀人越货，强奸卖淫？

失业工人为反对无理解雇的游行；居民为抗议横蛮的住房拆迁；老百姓为反恶吏和贪官的抗议；国家机关的弄虚作假这些为当局禁发的消息，远远还没有登载出来。

当然这比毛泽东统治年代有了“进步”，那时，对大量饿死人的事；逃荒流窜他乡冻死街头；逼使水肿病人下地干活；五类份子被斗被打致死的事，是不准见报的。这样比，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也罢！我们现在就以官方允许在报纸（2007 年）所登载的消息，归纳成下列五点：

第一，上层官僚集团的贪污案，已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不治顽症，这些消息只选登了百万以上的大案，至于几万的小耗子，可以说遍地皆是。无官不贪，是概括当今官场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共设立了纪委检查委员会，后来又设反贪局，百万以上的大耗子仍在逐年增加。

第二，由于官僚集团疏于管理，使社会上人身死亡的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和近期突出的矿难事故）医疗事故、传染病、天灾、矿难等灾害事故层出不穷。中共素来就有报喜不报忧的

习惯，报纸上已经传播的事件肯定是相当严重，并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公开报导的事。

例如河南的艾滋病传播，2003 年非典的流行，都是在国际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并在亚州自由之声连续报导以后，才在媒体上公开曝光的。而随着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曝光，又暴露出与国家管理的相关上层机关的腐败。

第三，毛泽东“共产主义”被现实扯穿以后，代之以“金钱万能”。社会道德的堕落是这个社会是最危险的信号。

为了独裁统治所需而提出的“维稳”，形成人们相互间除利害关系，见义勇为被认为是傻瓜才干的，代之以欺骗泛滥，欺软怕硬，弱肉强食造成整个社会一盘散沙，这种不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气氛害了中华民族。

毒品空前泛滥起来：据报载：世纪大毒枭刘招华在广州过堂，他曾在 1995 至 1998 年间制造冰毒 18 吨！搜查出装在纸箱内的冰毒，整整堆满了一个篮球场，当场缴获的冰毒相当于 1998 年全世界查获的冰毒的总量！

值得一提的是冰毒集团的成员，大多是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刘召华本人曾荣立过中共奖给的三等功！大陆变成了毒品的运集、生产基地。

盗劫、杀人、贩毒等刑事犯罪和黑手党的猖狂，使老百姓民不聊生，终日生活在恐怖的阴霾之下。

第四，邓小平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民奔小康”，是太虚假了，他明明知道，资本原始积累是赤裸裸的剥削,哪有全民同富的好事？至今城市贫民每户人平均一百元的生活费的赤贫户，官方没有公布统计的数目，但不会是少数。农村里的人，每户人均每月收入不足五十元所占比例更大。

城市中到处是擦皮鞋的，下苦力的，卖小菜的，挑着担子沿街叫买水果的，收破烂的。洗脚城、发廊里的小姐遍街都是。问他们的家住在哪里？先前还有人说是农闲时节，出来到城市里找活干。

近几年，由于扩大了城市建筑面积，傍城周围的土地被征用了，除了几千元的土地征用费，他们已没有土地，只好流落城市。

这些因中共“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是一股使社会不稳的潜在力量。这些人如果身体还健壮，往往因不满自己赤贫处境，铤而走险，杀人越货。

2004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惊呼，2004 年未解决温饱的年收入仅 637 元以下的贫困户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八十万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布的中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称 2003 年中国人收入差距拉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

贫困家庭中，姐弟俩因解决谁继续读书而抓阄，酿成姐姐跳崖自杀，恐怕就不是个别的悲剧；在这样情况下，少女被迫卖淫惨遭恶徒在脸上用刀刻字，也不是个别人的惨剧；在这样

的情况下，在垃圾堆中刨废铁，而被虚空的渣层垮下来，命丧黄泉的夫妇岂止一对？

第五，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卖国集团：与中共对百姓的残暴统治相对应，为了取得政权，在国际上一味迁就俄国。毛泽东为此而甘拜史大为干老汉，根据俄国外交部公布的解密档案，国人才知道毛泽东暴政的另一面：

1945 年毛泽东在一边倒政策指导下，引狼入室，这一年，为夺得江山，投入斯大林怀抱的毛泽东，与苏联签订了卖国的“哈尔滨协议”，把军政大权拱手让给斯大林指挥。

1949 年又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秘密协议”，苏俄得到中国大陆地下资源的开采权并武力控制东北、新疆。让中国人民为苏俄充当炮灰和工奴；

1950 年 7 月 16 日，中央通讯社又公布了“中美协议”秘密条款 13 条，集哈尔滨与莫斯科两协定，并补入内蒙设自治区，进入西藏条款。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以“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为理由，对在押的 1063 名日本战犯处以“一个不杀，对个别罪大恶极者只处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将 1000 名双手沾满了中国抗日将士和几千万中国老百姓鲜血的刽子手，悉数免于起诉，“交中国红十字会遣送回国”。（见外交部 2006 年公布的解密档案）

1978 年 8 月 12 日，又未经全国人民讨论，毛的皇位继承人华国锋根据毛氏遗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声明”，正式放弃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国际协议。

邓小平执政以后，为了统治目的，压根就没想到纠正这些可耻的卖国勾当，而是将大陆继续出卖给周边国家，那怕相邻小口看到中共国内乱象环生，也乘机在沿海地区争地争海，对此我就不一一列举。

由于国内形势不稳，不惜以国土为代价，在他统治下，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有争议地段”的边界协定，最严重的是承认毛与俄国所签的卖国条约：

1999 年“中俄国界议定书”，中共放弃了 160 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包括黑龙江东 64 屯，唐努鸟梁海，帕米尔高原等相当于 44 个台湾领土），

2004 年 11 月 14 日（中俄国界补充协定）中，俄国竟占去了黑匣子岛一半的主权，正式承认了 1999 年的议定书。

有人质疑，邓小平刚上台时，曾指天发誓，五十年绝不搞运动，写在纸上还没过三十年，由中共挑起的“六四”、“镇压法轮功”大规模运动，未曾间断，当时便有人断言：中共离了运动便无法生存。

中共建政之初，不但向全国各界许诺了一大堆民主建国诺言，一篇联合政府的文章欺人民，骗国际，把民主党派哄得围绕它团团转，至今建政六十年了，任何中国人都看清楚了：

六十年来，前三十年，老百姓别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有洋房小汽车”，给人民

不是享受民主和共产主义梦想，而是弄得连饭都没得吃，三十年和平年代饿死、整死过亿，毛贼东是制造冤狱最大的统治者；是古今中外杀人最多的刽子手。这本书只揭其冰山一角而已。

后三十年邓小平执政，老百姓有口饭吃，开始建家，但人民依然权力一无。至今贪污猖行，贪官遍地，他们用国库的钱到国外消魂；贫富两极，贿、赌、毒、淫盛行，邓公喜麻将，在他竭力提倡下市井农村遍地开花，也是他一大“功绩”，如此建国，还提倡什么五讲四美！

举目世界，独裁统治正一点一点被逐出人类的恶梦，几个不识时务的权力拥有者：朝鲜、古巴、伊拉克萨达姆想用杀人渡日，自己却上了绞架。

经历了六十多年中共独裁势力在大陆的折腾，国家伤权辱国，神圣领土遭可耻肢解，实践告诉每个现代中国人，现在，重新回到民主宪政的大道正是时候，以和平方式再造共和，已是万心归一。

可太子党内竟出现了一个官迷心窍薄熙來，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想出唱红歌的药方，为行将就木的独裁起死回生，一时官办的大小会议红歌一派。

听到令人肉麻的颂词歌声，我会立刻联想毛贼东的大跃进年代，社会主义好的歌声正掩盖了餓殍遍地的大陆哀鸿。

一个“假”便能概括当今大陆，不光假货充斥市场，假话充斥社会，假象迷漫官场，然而红歌岂能为妖孽壮胆？可知，红歌陡起时，恰恰是中共危机深重时！

在這朝野贪腐背景下，“红歌”犹如为独裁下葬时的“挽歌”！

既然中共无自知之明，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让我在这本书中简略回顾中共统治大陆期间的所作所为，《血纪》就秉笔直书写到这里。

其实这本书所记载的都是我亲身经历，每个情节断无虚构，由于年代相隔几十年，记忆有所丢失之处，使读者读后可能感到不足。

有人打电话给我，劝我在中共天下，不允再提旧事，今天拿了中共发的养老金安安稳稳怡养天年吧！

但是，我却正告规劝者，我的一生都被毛泽东肆意践踏，他使我家破人亡，知耻而忍辱，我的秉性决不相容。何况供养我的是中国民众，不为他们说话，我为谁说话？

加上白白被奴役我们二十三年，中共连工资都还欠着我们，我不向奴役我们的人要，又向谁要？

那些牺牲的挚友们在天之灵，还时时叮嘱我：为我们共同的“民主”大业奋斗！生就了我至死不悔的脾气，何况今日全家人都去到极乐世界，我是天天准备与他们天堂相会。

生活在今天，有冤不能申，有耻不能雪，家徒四壁，我有什么顾忌呵！

说假话的人心是虚的，原苏共头目也会尊“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为俄罗斯良心之父！为

什么？就因为凭着良心说真话，就像一柄正义之剑会穿透骗子的心脏，是假话连篇的政治骗子最害怕的！

若要问中国的前途是什么？我说是民心！。东方雄狮不能再长睡不醒！我们决不是任由暴政凌辱的奴隶，在大陆一党独裁必须让位给民主共和。

后 记

已丑年，离开盐源整整三十年了，《血纪》已完稿，想为它的故地配以像片，向读者介绍这些血腥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更想知道经历改革整整三十年，这血腥的故地，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些年来，从那里出来的人，告诉我那里还在不断散出阵阵血腥，例如前年的徐友全告诉我，两位留场右派，因收入拮据，一家人难以生活，分别投水库自杀。

他还告诉我，留场就业的几十个人，连与国营农场职工同工同酬都没有实现。被中共奴役了一辈子，他们现在只凭每月四百五十元生活费，聊渡晚年，有人只好守在这里终身鳏居。

所以，我决定 2009 年清明节期间，重返盐源农场故地。因为我们听说前几年，有人为挖掘这里被中共掩埋的血腥罪证，拍照时，被留守人员重大马寅初塑像阻绕未果，所以本次重返盐源农场只约了荆楚同行，对还在原地幸存的盐源难友今日并不通知，决定快去快回，拍下照片后马上离开。

同三十年前不同，从重庆到西昌已不用绕成都，石棉，雅安的汽车路，四月八日，我和荆楚直接从重庆到西昌。当四月十曰晨，我们突然出现在原农场的中心十字路口，（盐源农场已撤多年，这里已改为盐源果场）我和荆楚走下公共汽车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很快问到了车站不远处朱凌飞的家，见到了朱的爱人，在她带引下我们很快找到王文典，罗玉杨，周德汉，徐友华等人。

当天我们步行到了农六队（这里已卖给了私人），过去的高墙电网已全部推倒削平，大门己重修。所幸岗楼、探照灯架，六队大监房以及院坝尚存，好像留下这些遗物是专门为我们提供的。

离开六队，我们立即沿水渠步行三里，登上五号山原盐源农场（909）梁，当年张锡锟、皮天明的遗骨就被弃置于此，而今改建成两类人员坟场。

此时，正赶上已丑年清明节，我当即点燃了随带的香烛、纸钱、鞭炮，祭拜了当年在盐源洒血的烈士们，以及被毛泽东当年残害在这里的数百无辜怨魂！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雇了一辆面包车，驱车水库、农五队、农科所，回顾盐源农牧场建场之初，从甘洛押赴这一片不毛之地的奴隶们，怎样在枪杆下开垦出这个农场。

再驱车去原农七队，在当年农七队，枪杀张锡锡锟和皮天明的宣判主席台，和院坝，以及陈尸张锡锟的白桦树拍下照片。它们好像为了今天的取证，而完好保存了四十多年。

当年由张锡锟们高举的“火炬”，照亮了地狱里反抗暴政的奴隶，当年喊出反抗独裁迫害的呼声，彷佛还响在耳边。

我们随即还找到了盐源农牧场场部，摄下关押我和陈力的“反省室”，以及当年农三队和基三队旧址。《血纪》记载了当年我们向施暴者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经历。

1964 年春节，我和陈力从场部的“反省室”，搬到附近一排废弃的羊圈里，当年我们亲手浇灌的核桃树，而今已成了一棵傍山而立的大树。是夜靠它的指引，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羊圈反省室”，羊圈己不复存在，那里留下了一凼积水，触井生情我仿佛又想起，月影朦蒙中金梅的悲歌！

下午我们雇车，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屠杀陈力和刘顺森的刑场，当年目击者说，枪杀陈力时，只见他满脸是血，刽子手为了不准他临终时呐喊，而割掉了他的舌头！！为让他跪下饮弹，刽子手刺穿了他的腿！

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用自已血腥的暴行，永远在人们心中刻下了一道永不会消褪的血痕。同车去的人还回忆枪杀陈力八年后，在同一刑场上枪杀刘顺森时，给他打了哑针，使他无法在临牺牲前呼喊……

《血纪》里呕歌牺牲者的壮烈场面，已在当年目击者心中留下了完美的形象。

四月十二日，我们又从西昌坐汽车去了甘洛，这一段经历，是当年我们在流放途中最惨烈的一段，如果 1962 年甘洛农场在短短七个月，将从内地调集的年轻力壮小伙子饿死了一半，这场全国性大量饿死人的灾难，从 1959 年算起至少持续了五年，数量之多就更不是四千万所盘点得了的。

甘洛可算我们这批无辜流放者的鬼门关，我从车窗搜索着当年经过的老母坪，直到下午汽车进入甘洛都没看到，下车后我们询问当地开环城车一位司机，他告诉说，离甘洛城偏北二十多里路有一个小地名就叫老母坪。

查地图我才猛然想起，当年是从雅安经荣经进甘洛，恰与本次路线相反，告诉路线的司机还警告我们，城附近聚居的倮倮见了汉人很可能行抢劫，要我们警惕。我回头看了一眼荆楚，估量两人人地生疏，不能贸然行事，决定雇了他的车去西西卡看看。

沿着马路，司机把车只开到西西卡山下，远远相隔，荆楚摄下了山上西西卡的景像，便请司机将车开回火车站。考虑到我们连日赶路，两人都得了感冒，怕在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当晚返回成都。

在成都，我们受到省城彭慕陶先生组织的二十余右派同难热情的迎接，热心的彭先生已于半年前，将我所写的《血纪》第一稿付印一批，交给同难们传阅，本次聚会彭先生介绍了我们重返盐源的初衷和经过，期望大家抓紧余暮晚年，写下自已过去的经历，以供历史考鉴并流传后人。

在中共严密监视下，大家的热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四月十四日，我们回到重庆，按照《血纪》记载的故事，我们还将去南桐。

南桐是我们初入“右派”炼狱的进口；是我们最初受到毛泽东虐待的地方；更是我们认清中共的虚伪欺骗，看清“三面红旗”带來的灾难，从而放弃幻想坚决抗暴的开始。

当然，大浪淘沙，在中共残暴的摧化下，当年“右派”这个蒙懂的受害群分化了，甚至

也有不齿人类的伥鬼出现。

四月十五日晨，我们乘车到了南桐矿区的万盛市，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当年只有独街狭路的小城，已是高楼林立的渝南重镇了。正感到人地变异，旧地难寻时，同车到达的一位姓朱的当地妇女自告奋勇为我们领路，在她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南桐法院，和隐没在居民平房里的南桐看守所旧址！

回忆五十年前，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背着破烂的行囊，跟着带我来的鲁召到了这里，由于信任和依赖，我根本就没去看挂在门口的招牌，当我进得阴深深的监房时，我还误以为这是母校为我另换了一个场地呢！！

就是今天，我也无法理解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怎么会这么忍心，将一个无知的孩子，抛弃在地狱中！中共对人性的扭曲太可怕了。

然而正是残酷的炼狱，使我扭曲的神经恢复了正常，使我踏上了正常的人生之程，《血纪》就从这里开始，记载了这条我走过的路。

当我们重走当年拉着成吨铁矿的板板车，飞奔而下的海孔马路，当我们拍下遗弃了半世纪的高炉烟囱时，我们再次知道中国学生群体的大规模灾难就此开始，我们是这场灾难的受难者，因此也是这场灾难的见证人。

若从清匪反霸、土改开始，按毛所规定每次伤害 5%计，三反、五反、镇反、反胡风、反右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杀一小批、武斗、四五运动、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镇压西藏新疆和全国民运中，有几个中国人没有挨整？

恐怕中共也知道，毛的那一套必亡国，当然也必亡中共。

从 1979 年我离开盐源至今又过去三十年了，初初那种希望中国会从毛泽东的恶梦中醒来，重新开始中国的未来，像新的恶梦破灭了，时至今日，引中国进入这场灾难的魔头画像，仍悬于国门之上，中国依然是一党专制，中国人难道生就了是在专制政体下做奴隶的命？

大陆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毛泽东独裁的毒瘤长得太深，他虽在万民唾骂中结束了他的独裁，但他发动的那么多运动，却使中国失去了凝聚力。

今天，中共的当权者搬着指头算一算，你们的党欠下无辜者的命债每个人摊几条？加上你们已高度腐败，纵能掌控枪杆子，他们能听你们的话，甘心为你们卖命几天？毛泽东魔力能管多久？回首你们欠下那么多血债，你们不感到讨还血债的一天随时都会降临？那一天来临是非常可怕的。

2010 年 10 月 14 日重庆国安部三个人造访了寒舍，领头姓白的人看到我独居的地方十分简陋，便问到我的家人，我说都被你们整死了，我也几乎被你们的人整死。他见我态度强硬便接着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劝我不要出版《血纪》。

我也不绕弯子，回答来人："这是不可能了，你们也知道，你们想枪杀我，牛头马面已带过我去阎王殿了，古人云：士不惧死，耐何以死惧之？

当然你们可以不依法而按“政策”办事，但“无法”怎么治理若大的中国？至于我写的书既敢在全世界人面前公开，只要我能按事实陈述，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是无所顾忌的。你们可以就我所写的事挑骨头，但你们决抹杀不了事实。”

今天，大家已经看到，连中共上层都在惊呼：不进行民主变革，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原因就在奉行独裁只有死路一条，独裁将导致民心殆尽，在世界民主巨流的冲击下，中国不会长陷于独裁的泥坑，我们翘首踮足中国民主大业的成功。

人生如梦，梦醒后方觉自巳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尘，生逢恶世，我不知逃过了多少死结，不知不觉今年已过七十二载。当我最后回顾一生，只有这本记载我一生的书留给后人了。希望后来人好好读这本书！从中吸取走自由民主的教训吧！

全书于 2007 年 10 月写完

2007 年第一次修改

2008 年第二次修改

2009 年第三次修改

2010 年 2 月第四次修改

2010 年 8 月第五次修改

2011 年 7 月第六次修改

作者：孔令平